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J.基-泽博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　J. 基－泽博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英文本1981年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一次出版
巴黎75700，丰特诺亚广场7号

THE UNESCO PRESS: ISBN 92-3-501707-6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
Methodology and African Prehistory

EDITOR J. KI-ZERBO

责任编辑：关　仪
责任校对：燕桂珍
地图绘制：张凤娣
封面设计：林胜利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　J.基　泽博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41.25印张　字数900(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统一书号：11220·1　　定价：(精)8.00元
　　　　　11220·2　　　　(平)7.20元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一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我公司接受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承担《通史》各卷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本卷的翻译、审订工作中，我们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江西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特别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各章译者姓名分别列于章末。我公司参加本卷译稿编审工作的有张造勋、何大基、梅祖培、严明新等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12月

序　　言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还有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象非洲各族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倒象是作者想当然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过去欧洲的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使人相信，自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使得任何种族集团和民族都不能融合，使沙漠两侧壮大起来的社会集团也不能交流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在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的联系密切。但是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而这些民族和社会是被具有悠久历史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贩卖奴隶和殖民化，出现了的种族成见，随之产生了轻视和无知，而这种成见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使他们把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广泛使用"白种"和"黑种"这个标签的观念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就不得不起来斗争了，他们既反对经济上的奴役，也反对心理上的奴役。非洲人由于肤色易于辨认，于是变成了商品，在他们身上打戳记，让他们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的

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文化和历史事实的理解必然受到歪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生活和作为其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主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其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为了进行这一繁重任务，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因为资料的浩繁和文件的零散使得这一任务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第一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69 年，专门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业务工作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着手搜集口头传说，建立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中心，搜集未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材料辑成的，以后分九卷出版了。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非洲和其他各洲的专家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工作大纲。

xix

第二阶段是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专门用来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1969 年和 1970 年分别在巴黎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两次国际专家会议，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八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 3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职责。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各种资料来源为其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之一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

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设国家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 xx 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有时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的一个巨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象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继续大量研究各种专题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中正在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还将努力编写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孤立地拼凑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各种问题和非洲未来的专家以及了解非洲大陆全面情况的专家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教科文组织作出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它地区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

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正义、进xxi步、和平。这就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具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它们热心帮助，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关 仪译）

编写计划说明

xxiii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巨大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著作都是过于经常地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 《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 《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就能在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xxiv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问题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或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还尽可能特别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xxv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纪 年 注 释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日期。史前日期，可用两种不同方法来写。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日期，以+1950年为基准年；凡有关+1950年的日期都是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凡有关基督纪元的日期均以+号或一号在日期前表示。在提到世纪的时候，便以"我们纪元前"或"我们纪元"字样代替公元前和公元这两个用语。

现举例如下：

（i） 距今 2300 年＝－350 年

（ii） 公元前 2900 年＝－2900 年

公元 1800 年＝＋1800 年

（iii） 公元前五世纪＝我们纪元前五世纪

公元三世纪＝我们纪元三世纪

目　录

注意：凯瑟琳·珀尔斯夫人为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四章的定稿作出了贡献。
埃莱娜·罗什夫人为第十九章提供了某些资料。

插 图 目 录

照片目录

表格目录

总　论

J. 基-泽博

非洲*是有历史的。在早已成为过去的时代里，地图和航海图上曾有过大块大块的空白，表示非洲大陆是边沿的和附属的地方，而学者们对非洲的了解也曾经被概括成这样一句带有神秘色彩的话：“这里为狮子出没之所”，这本身也许就是对非洲并无所知的辩解之词。但是后来发现了这里的矿山和由此可带来的利益，随之又发现了拥有这些矿山的“土著部落”，而这些土著部落象矿山一样被当做殖民国家的财产予以并吞。后来，这些“土著部落”觉醒成为对他们身上的枷锁忍无可忍的民族，他们热血沸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斗争。

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到处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这种形象一直被无休止地突出推断，说现在和未来都理应如此。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部单纯与殖民主义历史算旧帐的历史，使殖民主义历史作者的用意适得其反，而是要改变人们的看法并恢复那些已被忘却或丧失的形象。为了创造真正的文化意识，我们必须再次求助于科学。我们必须把事情的真实发展过程重新组合起来，而且，我们还必须找到另外的论述方式。

---

* **本卷编辑注：**

非洲即“阿非利加”(Africa)，这个词的由来很难说清。自罗马时代起“阿非利加”这个名称就为人们所接受，它取代了原为希腊或埃及文的“利比亚”(Libya)，“利比亚”在创世纪里是指利布人或利宾斯人的土地。“阿非利加”原指北非沿海地带，从公元前第一个世纪末开始，“阿非利加”成为对整个大陆的名称。

但是，这个名称的原来究竟是何所指呢？

首先，就可能性最大的解释而言，已提出过下列一些说法。

有人认为“阿非利加”一词来源于居住在迦太基南部的一个柏柏尔人部族的名称，即阿法利克(Afarik)或阿乌利加(Aourighs)，因而，“阿非利加”(Afriga)或(Africa)的意思是阿法利克人的土地。

阿非利加一词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两个腓尼基词，其中一个意思是玉米棒子，这是该地区富饶的象征，另外一个词是法利基亚(Pharikia)，意思是水果之乡。

还有人提出，这个词可能起源于拉丁语的一个形容词“阿卜利加”(aprica)(阳光明媚)，或来自希腊语“阿卜利克”(aprikē)(没有寒冷的)。

另外一个来源可能是腓尼基语“法拉卡”(faraqa)这个词根，是分离或分散的意思。但可指出的是，在一些非洲语言里，如班巴拉语，也可发现同样的词根。

在梵语和印地语中，词根阿帕拉(Apara)或阿非利加(Africa)表示在地理上位于什么地方后面的地方，换言之，就是西方。因此，阿非利加是西面的大陆。

利奥·阿弗里卡纳斯(Leo Africanus)讲述的一个历史传说认为，一个叫阿非利克斯的也门人首领在公元前二千年曾入侵北非，建立了一个叫阿非利基亚(Afrikyah)的小城。但更可能的是，阿拉伯语中伊非利基亚(Ifriqiya)一词是阿非利加(Africa)这个词的阿拉伯语音译。

有种说法甚至认为，阿弗尔(Afer)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孙子，海格立斯的伴侣。

如果这些是这项工作的目的和原因，理由和动机，那么如何着手进行，即采用什么方法，和往常一样，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教科文组织赞助下编写的《非洲通史》第一卷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为 什 么?

这是一项科学工作。依然笼罩着非洲大陆过去的阴影和昏暗是对人类好奇心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实际上，非洲的历史还没有人了解。拼凑的家系，不明的年代，用印象派的含糊手法描述的结构，或若隐若现的模糊结构，由于以前发生的事已无案可查致使时间顺序荒唐可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影片，它只能反映我们的愚昧无知，然而，虽然这是一部令人气愤，以致实际上很有害的后果，但我们还是把它当做确实发生过的真正非洲历史了。因此，非洲历史在全部人类史和文明史中被赋予如此低微和从属的地位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些是伟大的甚至卓有成就的，一直在古老的非洲进行着全面的发掘工作。每年都有许多新的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表示了越来越肯定的态度。关于非洲的一些发现，有些是重大的发现，使整个人类史某些阶段的含义成了问题。

但是这种工作的分散形式本身就带有危险：由于缺少协作可能造成矛盾和混乱；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可能更重视研究人员而不是他研究的对象，如此等等。因此，为了尊重科学，似乎很有必要在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并在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领导下和有非洲编辑的参加下，由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小组进行一项具有无可指摘的质量的全面研究，使之反映最新情况。在这次对非洲的伟大新发现中，共同工作的研究人员的数目和名望使这项工作成为国际合作中的一次卓越的尝试。和任何其它科学相比，历史学可能更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直接产生于奔忙不息的、有时纷乱的各民族火热熔炉中。人类亲自在生活本身创造的并在实验室、图书馆和发掘地点构思的历史，也是为了启发和促进人类和人民的认识而编写的。

对于非洲人来说，非洲的历史不是某种可对之感到自我陶醉的镜子，也不是回避今天的工作和任务的巧妙借口。如果它是那种转移目标的东西，那么整个工作的科学目标就要受到损害。但对自己的过去不了解，或者说，对自己的大部分情况不了解，不是更容易使我们脱离前进的目标吗？今天，危害非洲的所有邪恶弊端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势力造成的。正如合理诊断和对症下药的第一步是重新研究疾病的发展过程，同样，全面分析非洲大陆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分析它的历史。一个人除非生活在麻木不仁和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否则，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没有回忆，也不可能都是别人的回忆。而历史则是各个民族的回忆。这种回忆对于一个人自己来讲，可以做为一种解放性的精神发泄，就象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需要的那样，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分析在暴露抑制我们个性的基本力量的同时，使我们从复杂心理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复杂心理把我们的意识牢牢禁锢在下意识深处。但是，如果我们想确保不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对历史事实，即真正的和直接的意识之母，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证实。

怎　样　做？

这样，我们就面临了怎样做的难题，也就是面临了方法问题。

同在其它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采取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不把非洲作为过于特别的情况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不过多地使用世界其它地方通用的方式。有些人说，在我们谈论非洲的真正历史以前，应当设法寻找欧洲写历史时那样的证据以及同类的书面材料或碑铭文献。简言之，他们认为，无论在热带还是在南北极，史学家的问题都一样。关于这一点，必须明确重申，借口缺少材料来压制理性是行不通的。理性并不因为应用于热带而有所不同。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屈从地理位置。但是，恰恰因为理性不是盲目的，所以为了准确而牢固地掌握情况，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不同的现实。因此，当一个人既要研究《松迪亚塔法萨》① 这一史诗，又要研究牧师会法规《感维利斯》或拿破仑给他的高级官员的函件时，就必须按照不同的思维方法应用内部和外部批评的原则。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与技巧。这种思维方法在非洲也要因地而异。尼罗河盆地和这个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就历史的再现而言，与欧洲共同的地方多于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共同的地方。

实际上，看一看非洲大陆的自然地理情况，就可以知道非洲历史所特有的困难了。非洲，如果说确曾存在过的话，也是一个孤零零的大陆，过去似乎并不理睬旧世界的其它部分，与之相连的只有苏伊士地峡这根脆弱的脐带。非洲大陆的坚硬地块一直伸到南面的海洋中，四周被海岸山脉所环绕，河流穿过这些山脉的峡谷以磅礴的气势奔腾入海，这些河流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撒哈拉沙漠与阿比西尼亚山脉之间的唯一较大通道也被加扎勒河的广阔沼泽地所堵塞。大风和海流守卫着从布朗角到佛得角的海岸，而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则是造成与外界隔绝的内部障碍。南面是卡拉哈里沙漠；中间是号称“绿色沙漠”的赤道森林，人们要想安全通过，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危险；北面是撒哈拉沙漠，它是沙漠之王，巨大的大陆过滤器，茫茫无际的沙石之海，与阿特拉斯山脉边缘相连，把非洲的地中海沿岸部分和大陆其余部分隔开。这些生态力量，尽管没有使非洲成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是，特别在史前时期，对非洲命运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它们还提高了所有自然通道的价值，这些通道在千百万年前开始对非洲探险时，就已被作为过道或走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那南北走向的东非大裂谷，它从非洲中部开始，穿过埃塞俄比亚山脉一直到伊拉克。东西走向的桑加、乌班吉和扎伊尔峡谷也一定曾被当做走廊。黑非洲最初的几个王国在这些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即萨赫勒地区② 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这些地区曾一度可以从内部穿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界开放的，与拥有不同的补充资源的邻近的

① 用马林克语(Malinke)说就是“松迪亚塔(Sundjata)赞歌”。松迪亚塔是十三世纪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是非洲史上最有名的英雄之一。

② 出自阿拉伯语(Sahil)海岸，这里是被当做海洋的沙漠边缘地区之意。

非洲地区有过交往。这些开放地区的进展比较快，从而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据，证明了与外界隔绝是非洲在争取某种进步方面速度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3]正如费尔南德·布劳德尔所写的那样"文明产生于土地之上"，他还说"文明产生于聚居"。非洲大陆地域辽阔，但人口稀少，因而易于流动；自然条件优越，水果繁多，矿产丰富，但地方病和传染病[4]流行，这就使得非洲不能实现人口集中，而人口集中则几乎一直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实现重大质变的前提。而且，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贩卖奴隶，特别是在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这种交易大规模组织起来之后，曾造成严重的人口外流，这只能使非洲失去甚至技术方面的任何突出创造所必需的稳定和人力。无论自然条件还是人的条件，地理条件还是历史条件都不曾有利于非洲。为了客观地，而不是从种族低劣、天生的部族制和所谓非洲人的历史被动性这类荒诞说法出发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进化过程的这些基本条件。这些主观而荒唐的方法充其量只能掩盖故意装出的无知。而最糟的情况则是说得越少越好。

资料来源的困难：

必须承认，就非洲而言，资料来源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关于非洲历史的知识有三个主要来源：书面文献、考古和口头传说。这三者的后盾是语言学和人类学，因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可帮助我们分析和提炼那些可能是粗糙和难以理解的资料。但是，事先生硬规定哪些资料重要，哪些次之，将是错误的。

（1） **书面资料来源**，如果不是十分罕见的，至少也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的。非洲历史上最模糊的年代是缺少清楚而精确的文字记载的年代，例如，基督诞生前后的年代(北非在这方面是例外)。但即使有这种证据，对它的解释也是难以理解和含糊不清的。因此，在重新审查伊本·巴图塔的旅行笔记以及他与欧麦里记录地名的各种方式时，许多史学家对桑卡拉尼河上的尼亚尼是古马里的首都的说法表示怀疑[5]。从数量上来说，大量的书面材料，档案的或口述的，还没有得到利用，最近对未发表的有关黑非洲历史的手稿的不完全调查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手稿不但在摩洛哥[6]、阿尔及利亚和欧洲的图书馆可以找到，而且在苏丹学者和整个尼日尔湾地区城镇中显要人物的书房中也可以找到[7]，这些手稿的题目提出了一些大有希望的新线索。教科文组织在廷巴克图建立了艾哈默德·巴巴中心以促进此类材料的收集工作。且不说美洲国家，仅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印度和中国的档案中就一定有许多零散的非洲史料在等待着具有远见和想象力的研究者去研究。例如，在伊斯坦布尔的首相档案馆中就保存着分类的奥托曼帝国国会的法令记录，其

③ 气候因素不可忽视。瑟斯顿·肖教授(Thurstan Shaw)强调了下面的事实，即在尼日尔峡谷地区种植某些适于地中海气候(冬季下雨)的谷物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北纬18°以南，由于热带锋的影响，这些谷物不适于生长。见C. T. 肖(C. T. Shaw)的著作，1971年b，第143－153页。

(**中文版编者按**：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本卷所附参考书目中查阅。)

④ 见J. 福特(J. Ford)，1971年。

⑤ 见J. O. 亨威克(J.O. Hunwick)，1973年。作者冒险使用了这样一个论据："如果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越过尼日尔河或塞内加尔河，他就会这样说的。"

⑥ 见教科文组织1973年第SHC/WS/294号文件。

⑦ 见《马里研究》，马里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9月第3号。

中发现了穆拉德三世苏丹1577年5月给迈·伊德里斯·阿路马和突尼斯总督的信件。这批信件提供了说明当时加奈姆－博尔努的外交和费赞的局势的新情况⑧。

在深受穆斯林文化影响的非洲国家，非洲问题研究机构和历史研究中心在寻求手稿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新的指南，如在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国际档案局出版的指南，有助于研究人员在散落在西方的文献之林中进行工作。

要想使这些新的努力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成倍地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在对非洲过去的了解方面取得关键性的质的飞跃，就必须有一个坚定而审慎的出版和再版政策，并做好在非洲的翻译和发行工作。在这方面，对大量新文献持新的态度几乎和这些新文献本身是同样重要的。从十九世纪或殖民时代就沿用下来的许多文本急需进行重新审查，摆脱时代性错误偏见，采用自己的方法。在这方面不应忽视以撒哈拉以南地区（瓦伊、巴蒙、阿雅密）手稿为基础的书面资料来源。

（2） 考古所提供的无声证据往往比官方的编史家更可靠。考古工作惊人的发现已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特别是在没有文字或口头记载的时候，非洲千百万年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因而，只有那些与人埋在一起的物证无声无臭地守候在大地的沉重覆盖之下。有些物证在衡量文明时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物证包括铁制品和有关的技术，陶器及其铭文、生产技术和风格，玻璃制品，不同的书画刻印风格，造船、捕鱼和编织技术，食品，以及与气候演变有关的地貌、水文和生态结构。考古发掘的文字从性质上来讲是客观的和无可辩驳的，因此，对尼日尔－乍得撒哈拉地区发现的陶器、骨器和金属器进行的研究说明，乍得盆地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的各族人民（萨奥）与远至尼罗河和利比亚沙漠的文化区域之间是有联系的。泥土烧制的带有斜挎带的小塑像，小雕像身上的装饰，罐子和手镯、鱼叉和骨器的形状，箭头和飞刀，⑨等物品所显示的亲缘关系，在如今这一片荒凉而沉寂的景色周围，重新看到了过去那种栩栩如生的联系。非洲考古地点的确定、分类和保护是一件非常紧迫而重要的事，这一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以防盗贼、不负责任的业余考古工作者或无知的游人毁坏和弄乱这些地点从而使其失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但是，对这些地点进行这样紧急和大规模的发掘，只有在非洲内部制定的方案基础上，加上国际上的有力合作才有可能。

7

（3） 非洲历史除了前两个资料来源（书面文献和考古）以外，还有口头传说，口头传说是保存和传播人民积累的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和文化创造品的真正活宝库。口头历史是一条很脆弱的线索，我们可以用它追溯往昔，探索那时间的阴暗曲折的迷宫。这种历史的讲述者都是一些声音嘶哑、记忆模糊、讲究礼仪（象对有权的祖先那样）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象一幅风景画上残存的几个孤岛，这幅画曾经非常壮观，紧凑，但现在由于现代主义急浪的冲击而遭到腐蚀，失去光泽，变得混乱不堪了。他们就是现代的化石！

一旦他们当中有一个死了，也就等于断了阿里阿德尼的线的一根纤维，风景画上残存的东西也就消失于地下了。然而口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最直接、最丰富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来源。正如一则非洲谚语所说的，"老人的嘴气味难闻，但所说的却是金玉良言。"文字

⑧ 见B. G. 马丁(B. G. Martin)，1969年，第15-27页。

⑨ 见P. 瓦尔(P. Huard)，1969年。

8 记载不管多么有用，但对主题的叙述必定是有限的和枯燥的。它所提供的都是一些生搬硬套、支离破碎、公式化和呆板僵化的材料，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的破坏。而传说则有血有肉、生动活泼，赋予过去的历史以生命。口头传说以生动的形式提出的，常常是充塞纸面的史实。松迪亚塔的母亲在突然找到儿子后所表现的无比欢乐，至今仍生动地表现在马里民谣歌手的热情洋溢的叙事歌谣中。当然，我们必须避开许多通常易犯的错误，以便对口头传说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筛选，即去粗取精，去掉那些仅仅为了语言匀称和华丽所使用的词藻，去掉那些仅仅为了在形式上修饰遥远的过去所编选的套语。

有人说，口头传说不足信，因为它是实用主义的，好象各种人类资料，包括档案在内都肯定不是实用主义的，实际上，档案这类材料由于被动性很强，打着客观与不偏不倚的幌子，进行删节，从而掩盖了很多谎言，表面上高尚体面，实际上包藏着许多错误。的确，叙事性传说是对过去情况的一种神话式的再创作，是向社会群体揭示其起源并培育社会群体个性的全部价值的一种精神剧，是使社会群体能够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到其祖先王国的一叶神奇扁舟。这就是口头传说和历史记载不尽相同的原因。这两者重复时，在确切的时间问题上常有时代性错误，就象考古工作在地下发现的物品一样，在时间的确定上有很大伸缩性。但是，难道文字记载中就没有这种使人迷惑不解的东西吗？象在其它方面一样，我们必须找出识别的方法，努力找到试金石以辨别真假金属。

当然，叙事性传说有它严重的弱点，这就是年代顺序不清。混乱的时间顺序使我们对过去所得到的影象不象镜子中的影象那样清楚稳定，却象微波涟漪的河面所反映的倒影，支离破碎，转瞬即逝。各朝各代的平均寿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根据近代时期进行的推断必须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因为人口与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有关的两个因素。有时，某个有魅力的杰出君主夸大他先王和继承君主的业绩，而低估其他人的作用。卢旺达的某些君主或塞古国王达·蒙宗（十九世纪初叶）就是这样，民谣歌手把王国的全部重大征服都归功于他们。

此外，脱离具体内容的口头传闻就象无水之鱼，不能生存。如果孤立地看，口头传说与非洲假面具相似，这些面具是从虔诚教徒团体夺来以后向好奇的非教徒展示的。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和生命。然而，它确实经历过生命，因为它一直由负有流传责任的新证人所继承。正因为如此，口头传说才适合新听众的期望；尽管口头传说不总是保持原样的内容，但是，大体上与所叙述的相符。此外，口头传说的一些现代骗子和奸商甚至把文字材料改头换面，放到口头传说中去！

9

甚至口头信息的内容也经常是神秘而隐晦的。对非洲人来讲，讲话是件重要的事，是一种可做可不做的模糊动作，说话可能招灾惹祸。因此，口头信息不是公开和直接地用言语表达，而是隐藏在寓言、比喻、暗示和谚语中，这些对于平民百姓很难理解，但对于有智慧的人是一清二楚的。在非洲，讲话关系重大，不可随意胡言，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在公共场合讲话就越少。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吃了蛤蟆而吐出了它的头。"那个人会立刻理解，他因推诿责任而受到谴责。[10] 这种半说不说的隐晦情况立刻显示了口

[10] 见H. 阿格西(H. Aguessy)，1972年。

头传说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和局限性：将一种语言的丰富含义转到另外一种语言简直不太可能，特别是当另一种语言在结构上和社会意义上相距甚远的时候，就更加如此。传说不太适于翻译。如果寻根究底的话，它就失去了活力和真实性，因为语言是"生活的本源"。因此，推到传说本身上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不胜任的或不慎重的翻译造成的。

即使如此，口头传说的有效性今天仍被充分证实，并且被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的相互检验所肯定，例如，昆比萨利赫现场，基萨勒湖遗迹和绍纳人流传下来的十六世纪的事件，D.P.亚伯拉罕认为，与那一时期的葡萄牙旅行家的文字记载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口头传说的讲述方式，无论是史诗体的还是散文体的，无论是说教式的，还是伦理式的，都具有三重观点。首先，它显示了推动一个民族并通过从前的原型方式来调整该民族以后行动的标准和惯例。这样做，不仅反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当达·蒙宗被称为"江河之主和人类之主"时，这象征着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同样的故事也表明，他在不断地请教他的武士、民谣歌手和妻妾。[11]《弓之歌》歌颂松迪亚塔(松迪亚塔赞歌)的名句"萨雅卡奥萨马洛耶"[12]无疑流露出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巴卡里·迪恩反对库纳里的富拉尼人的斗争故事也完美地表示了同样的思想。英勇的巴卡里·迪恩一气之下返回故乡栋戈龙戈村，但人们前来请他重新统帅塞古军队。最后当人们谈到敏感的自豪和光荣的问题时，他终于同意了："忘记以前说过的老话，你必须考虑你当前的名声，因为人生在世即为名声。如果你出生，成人，直到死亡，未留名声，那么，你就默默无闻而生，默默无闻而死。"于是他喊道："塞古的民谣歌手们，既然你们来了，那就能做到。为了我的荣誉，你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是为达·蒙宗，我不是为塞古的任何人，我仅为我的荣誉，即使我死以后，它也要给我的名字增光。"

10

同样——一条关于文明与法律的证据——锡拉马卡说道："你们很幸运，我不能杀害使者。"

然而，重现历史绝不是完全虚构。存在着回忆的途径和历史的脉络，这些常常比对史诗想象的生动加工乏味一些。"这样，集体放牧制度就在班巴拉城镇开始了。如果你被选为牧人，那么，你就是一个公众的富拉尼。公众的富拉尼照看国王的羊群。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叫邦克。"同样："那时，人们不穿拖鞋，而穿鞣制的牛皮鞋，穿鞋时，在大脚趾上拴条带子，围住脚跟也拴条带子。"史诗里总是间接提到技术，提到与行动虽无必要但说明所在位置的物件。"达·蒙宗派人将他的60个索莫诺划桨者召集起来，30人在船头，30人在船尾。这只船装扮得富丽堂皇。""梯子备好后将它们靠在墙上。塞古步兵发起进攻，最后攻入城里……塞古骑兵发射带火的箭。于是村里的房屋都着起火来。"与达·蒙宗相爱的那个叫萨兰的女人去把科雷战士的火药弄潮……。只有对传说叙述者和他们的听众的精神作用进行细心的分析，有时甚至还要进行心理分析，史学家才能得到历史事实的可靠梗概。

各敌对集团——例如每个贵族保护人(霍朗，德亚蒂古伊)的众多的民谣歌手——提出不同说法的数目非但不是一种障碍，恰恰相反，对于批判的历史恰恰是进一步的保证。如

[11] 见L.凯斯特卢特(L. Kesteloot)，1978年。
[12] "宁死不受辱"。

果讲述的都一样，例如象敌对营垒的班巴拉和富拉的民谣歌手的情况那样，那么证据的可靠性就进一步加强了。古罗的情况是，按世系传播的自由的和种族平等的公开的传说，与秘密社会的寡头的和琐细的秘密传说同时并存，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口头历史因为来源各不相同，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自我检查的成分。实际上，它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来源于和服务于社会众多集团的公共财富。

重要的是，在对这些文字材料进行内部批判时，应充分掌握这些有争议问题的全面情况，就是说对其主题与技巧，规章与套语，多余的废词、常用的离题话语，语言的进化状况，听众和他们希望讲述者讲的内容等都有充分了解。总之，史学家必须了解讲述者属于哪个等级——他们的生活准则，他们如何长大成人，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学校。我们知道，例如，在马里和几内亚，几个世纪以来，在凯拉、基塔、尼亚加索拉、尼亚尼等地一直有真正的启蒙学校。

11　通常这些固定的、正式而悠久的口头传说还有宫廷音乐的补充和协助，宫廷音乐是口头传说必不可少的，它很强调其说教和艺术的部分。所使用的乐器，如索萨巴拉琴（苏马罗坎泰的巴拉风），年代都已很久，所以具有考古调查的价值。但是乐器类型与音乐类型，歌曲类型与舞蹈类型之间的和谐一致构成了十分井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破格情况与以后的补充是很容易被察觉的。每个类型在每一文化范围内都有其本身的特殊乐器。巴拉琴（木琴）或波隆琴（竖琴－琵琶）是配合史诗用的，莫西的班德雷鼓（用葫芦做的巨大单面鼓，赤手敲击）是供国王的“扎比欧雅”（以战争的名义）的庆典（经常是没有记载的）使用的；姆维特琴（竖琴－齐特拉琴）是供芳族叙事诗乐手的热带尼贝龙根使用的。这些乐器是口头历史的工具，是神圣的，是崇敬的对象。它们是艺术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在交流信息方面的重要性比口头传说要大得多，因为语言只有语调，而音乐可直接传达意思；乐器是艺术家的喉舌，他可以不必直接说话。音调、强度和长度这三重韵律构成了有意义的音乐，即马塞尔·儒斯所讲的那种语义旋律。实际上，由于音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口头传说的一部分，所以许多传说只能用歌曲来表述。以讽刺形式表达人民意愿的流行歌曲有时搀杂着黑人的幽默，这些歌曲即使在今天的竞选运动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因而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它们补充着官方记载的证据，价值与之不相上下。

这里所讲的关于音乐的作用对于其它表现形式也同样适用，例如视觉艺术。在阿波美王国和贝宁王国的浮雕或库巴的雕刻作品中，我们有时发现它们直接表现了历史上的人物、文化和事件。

因此，口头传说不仅是在缺乏其它资料时所寻求的次好资料。它本身就是确切的资料，具有现在采用的方法，它可以给非洲大陆的历史提供有力的原始资料。

（4）　在语言学方面，非洲历史没有一种辅助科学，但有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把历史作为它的中心题目。它的良好例证就是努比亚，它埋藏在麦罗埃废墟和无法翻译的麦罗埃文字的双重沉寂之下，因为这种语言至今还不为人所知。⑬在这个领域中，确实还有许多事要做，而首先要做的是科学地确定有关语言的定义。描述的方法不能降低到旨在从

---

⑬　教科文组织于1974年在开罗召开了一次国际讨论会，讨论关于翻译这种非洲语言事宜。

事类型和起因的比较和合成的方法。只有通过精确的而艰苦的分析语言的实际情况并"对其元音、辅音和语调的'实义'、大量意群组合、在特定社团的讲话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意义'的分析",⑭人们才能推测往昔，如果对有关语言缺乏丰富的历史知识，那么，这项工作就困难了。实际上，能依据它们的当前程度，进行比较的唯一方法就是断代的方法，这是进行任何历史的和起因的综合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基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区域，特别是对班图，学术性争议很激烈。马尔科姆·格思里支持自生的理论，约瑟夫·格林伯格提出了大胆的辩护，认为班图语系需要置于更广泛的大陆范围内来看；他说，这是因为它们很相似，而这种相似不是受外界影响造成的偶然性类似，而是源于一种内部的起因亲属关系，表现在代词、基本词汇和诸如名词分类体系这类语法特征中的相似方面，从沃洛夫到巴卡(苏丹共和国)的数百种语言都如此。这些争论就史学家而言，并不是学术性的辩论。例如，任何认为表示羊群的相似语言分布在中非森林边缘上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同种羊群并非聚集在森林边上，而是分布在森林的两边。这说明上述这种动物分布在草原和森林毗连的生物区域的两侧；而在更远的东部，语言模式构成了从东非到非洲南部的垂直带，这说明是从右侧角度向纬度的平行线传播的，而且，相反，表明森林在传播技术上的限制作用。⑮但是这种作用在所有的传播技术中并不是都一样。简而言之，语言研究表明，移民的路线和途径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相关语言的传播。因此，对于希望了解非洲进化的意义和动力的史学家来说，历史语言分析和同源语言演变史是多么重要。例如，格林伯格曾论述过卡努里在文化术语与军事技术术语方面对豪萨的贡献，这就使博尔努帝国对豪萨王国的发展起了作用。特别是博尔努王朝的官衔与作风，包括"凯加马"、"米吉拉"等等卡努里词汇，传到远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对人名和地名的系统研究也能提供相当精确的证明，但名称必须根据内部途径进行修改。大量的名称已被非洲以外的人的外来发音或翻译，或担任翻译或缮写的非洲人歪曲了。准确词语的搜集工作，即使当它在写作中已延用了若干世纪以后，也是非洲史最难完成的任务之一。

现举例说明。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用来表示苏丹一个王国的"加奥加"(Gaoga)这个词，经常与"加奥"(Gao)这个词混用。但是，如果"加奥加"这个词是根据泰达语和卡努里语分析的，那么，这个名称的王国也可在瓦达伊(纳梅那)、达尔富尔(苏丹)和费尔提特(中非共和国)三者之间来确定。⑯从H. R. 帕尔默时代以来，人们在某种深度上曾研究过作为许多苏丹王朝发源地的也门的问题。难道也门这个词不应解释为穆斯林编年史学家所虔诚召唤的阿拉伯费利克斯，而应解释为"亚姆"(源出"亚曼")⑰的远古土地吗？研究一下斯瓦希里语辞汇(其中充满来源于阿拉伯的词汇)，研究一下住在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民族(安泰莫罗、安塔劳特拉、安塔诺西)的词汇，也能给史学家提供大量线索。

无论如何，已为非洲史做出相当贡献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应排除错误的种族主义态

⑭ 见M.乌伊斯(M. Houis)，1971年，第45页。
⑮ 见C.埃雷特(C. Ehret)，1968年。
⑯ 见P.卡尔克(P. Kalk)，1972年，第529～548页。
⑰ 见A.和E.穆罕马杜(A. and E. Mohammadou)，1971年。

度，这种态度是A. W. 施勒格尔和奥古斯特·施莱歇的非洲语言学的特点。根据他们的说法，印度－欧洲语系的语言位于进化的高峰，而黑人的语言则在阶梯的最底层，尽管以前人们认为它们有意义，因为它们显示出一种接近于语言原始状态的情况，那时的语言被认为没有语法，讲话只是发出一系列的单音节，词汇有限，只有基本的。⑱

（5） 人类学和人种学的情况则更是这样。由于环境的影响，⑲人种学的论述一直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前提和含蓄的政治性结论，具有两者之间的必然暧昧不清的"科学的"运用。其主要前提经常是直线进化，欧洲是文明的先驱，站在人类进化的前列，殿后的则是大洋洲、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原始"部落"。它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印第安人、黑人、巴布亚人、阿拉伯人究竟如何？其他人，不论是否更落后，不开化和野蛮，总是不同于他们，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是科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是奴隶商贪婪的目标。因此，要求人种学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种针对"土著人"的满足欧洲人的好奇心的部门。在外表上，人种学尽管充满裸体、苦难和民间传说，但经常是虐待性的、狡猾的，充其量不过是温情主义的。人种学方面的文章和报告通常是想维护现状和帮助"不发达地区进行发展"。⑳达尔文式的进化论尽管在其它方面有其长处，但它是单向传播论，过分地把非洲看做是其他地方发明创造的被动输出地或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机能主义（否认原始社会具有任何历史地位）等等，所有这些学派的思想都自然地适应殖民地的情况，在这肥沃的土壤上，它们会充分地蔓延扩张。㉑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对于了解外来社会是很少有帮助的，由于以下原因更加不起作用：他们所感兴趣的恰恰是他们最陌生的社会，是人类初级阶段的形态。他们所选择的社会只是微小的有机组织。他们起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有些甚至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对于历史进程影响更大的更强大的社会政体来说，这种作用通常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非洲人自己可能认为非洲整体的形象相当陌生——就好象本世纪初布列塔尼王国中部，康塔尔和撒丁岛社会的住房条件、餐桌礼仪或技术水平象征欧洲一样。此外，基于各人主观经验由于充分而完整，但只是在小天地的水平上是完整的进行调查的人类学方法得出"客观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一旦用于推断就变得十分脆弱了。

最后，由于无情的辩证法，人种学的目标本身和"其它"方面逐渐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消失了。那些靠狩猎和采摘（如果不是靠食人为生）的原始土著人变成了世界生产体系各外围中心的半无产阶级，它在北半球具有吸引力。殖民制度耗费和消灭了它本身的目标，因此，那些在实现目标中起过作用的人，即非洲人，决定采取独立的叙述方法，作为历史的课题，他们甚至敢于提出，在某些方面最原始的人并不是被描述的那样。同时，那些没有先

⑱ 见M. 乌伊斯，1971年，第27页。

⑲ "人种集团"这个字眼一直带有强烈的偏见，因为从一开始它用来指那些被认为没有文字的民族。甚至在十六世纪，克莱门特·马罗特（Clemeat Marot）还在使用"崇拜偶像的或人种的"这个词组。人种志是对文件材料的描述性的综合；人种学是比较性的综合。

⑳ 见J. 柯庞斯（J. Copans）和M. 戈蒂利尔（M. Godelier），1971年，第45页："殖民主义观念和人种学构成同一结构的一部分，在现象的这两个分类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两者发展的相互作用。"

㉑ 见J. 吕菲耶（J. Ruffie），1977年a，第429页："伪达尔文主义文化激发了十九世纪人类学思想，使得殖民主义合法化了。对于它们，殖民主义不是统一的政治思想的产物，而是生物结构的结果，总之，是自然淘汰的问题。十九世纪人类学给欧洲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依据。"

入之见从事寻找非洲社会(不管其政体如何)的本来结构和历史线索的人，即这样一些先驱者，例如弗罗贝尼乌斯、德拉福斯、帕尔默和埃文斯-普里查德，仍继续努力工作，他们的工作得到更近代的研究人员的提炼和进一步的坚持。这些人认为，广泛地利用人类科学特有的各种知识工具并使它们适用于非洲，可能获得客观的效果。因此，他们摈弃了基于“土著人”与其它人之间假定的重大和天生差别的错误方法，或基于前者在文明发展道路上处于原始阶段的观念的错误方法。必要的是承认，尽管非洲人的“存在”是相同的——同样的智慧——但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同的。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新的工具就能得以发展，用以理解他们的特别演化情况。

15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要它不是教条的)和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对被认为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进化问题也提供了有用的但相反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基本上是历史的，而对方法来说历史是行动中的集体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较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强调实践与准则，而结构主义的方法则旨在显示无意识的然而符合逻辑的结构，以及组织和构成社会与心理活动的那些紧密联系的群体。我们希望人类学从这些新的来源中吸取养料，不再是为了满足新需要从某种人种学的死灰中飞起的不死鸟。㉒

但是，如果通过历史的方法，人类学包括暂时的广延，那么它就只有避开那些使实用人种学名声扫地的各种矛盾，因为今日的结构，如果仅与当代相联系，就无意义了，因为当代必须与以前的和已经指向将来的动力相结合。如果人类学要对历史有用的话，那么，它就必须避免观念重于具体事实的那种理论建设，这种建设就象“在贫血的躯体上的中风脑袋”，它只能产生实用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虚假的历史。只有使用能与进化的理论形式相比较的结构，才能看清历史的进程。根据它们的社会概念研究重新出现的结构现象(例如家系、朝代表、年龄组等等)能导致特别新型的、卓有成效的分析。

人类学应该对其本身的程序进行批判，既坚持实践又坚持准则，不应混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过去的经历和构成它们的结构。广泛地使用探讨的定量方法和集体方法以及采用合理的客观的论说方式，都会使准则、结构和意见丰富起来。人类学不但与一般因素的相互联系有关，而且与历史的组合有关。例如，以下两者之间似乎具有相互关系，即一方面，某些商品被王室垄断的那些贸易之路，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早期的加纳和马里，十八世纪的阿散蒂帝国，扎伊尔的隆达王国等等)。重要的是，尼亚库萨和科萨这样的民族与恩贡德人和祖鲁人不同，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风俗也相同，但是远离此类贸易之路，没有到达君主制阶段。㉓根据这一点，人们可能想推断出一种人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规律。

16

血缘关系也能对历史进化起很大作用。例如，当两个操不同语言的部落相遇时，两个部落之间的联姻形式通常决定哪种语言占优势：只有在妇女被看作是妻子，而不是奴隶或妾时，母系语言才盛行。因此，一些恩古尼部落将他们的原始语言保留下来，而其它娶索

㉒ 这样，社会学就成为现代世界的社会内部的科学，而人类学就相当于比较主义的(社会之间的)方法。但这就等于复活那些相当不可靠的类目，这些类目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分断处——人种史，人种植物学等等。确实，为什么不产生人种考古学、人种解剖学、甚至人种数学呢？

㉓ 见L. 汤普森(L. Thompson)，1969年，第72-73页。

托人为妻的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被索托人接收过来。来自马西纳和富塔贾隆的富拉牧民也是如此，他们娶曼丁哥女人为妻，创建了欧索罗省。他们保留下来的富拉尼人原有的一切只是名字和某些身体特征。他们失去了原有语言，改讲马林克语或班巴拉语。

因此，如上所述，非洲史的主要资料不能根据那种使某些资料永远比另外一些重要的价值等级来安排优先地位。各种情况都要根据其本身情况来判断。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证据根本不同的问题。一切都可看成是说明，它们从往昔来到我们这里，而且作为不完全中立和客观的信息工具，包含公开的或隐藏着的意图。因此，一切都需要从方法上进行批判，而且根据具体情况，每一个都可能占优势地位。每一个都可能导向其它资料。例如，口头传说，经常导向考古现场，甚至可能有助于正确地安排文字证据。因此，伟大的伊本·哈勒敦在他的《柏柏尔人史》一书中描述松迪亚塔："他的儿子曼萨·乌里继承了他。曼萨在他们的语言中意味着伊斯兰教国王，而乌里是阿里的对等称呼。"然而，所有讲故事人都仍解释说，曼萨·乌里的意思是"白皙肤色的国王。"

研究的原则

如果我们想把非洲史的编纂工作推向新的阶段，那么必须用**四项主要原则**来指导研究。

首先是**跨学科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它本身差不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资料来源。例如，社会政治人类学对于塞古王国的口头传说的应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一幅空白的画面，这幅画面如果没有得到这项填补，就只能是一株光秃秃的有一些永恒功绩装饰的家系之树，因此，有时建于古代王权基础上的（例如：马里）结构的错综复杂和相互渗透就以其全部鲜明具体的形式暴露出来。同样，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诸国的情况中，口头传说表明，那地方的发展不完全是由于贩卖奴隶和棕榈油贸易的影响，远至拉各斯和伊杰布国的南北和东西方向中原来的内部关系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这种内部关系支持和大大丰富了帕切科·佩雷拉在《埃斯梅拉多》中的引喻。[24] 富拉牧民的最早文本[25] 使史前史学家解开塔西利壁画之谜，例如，在称之为牛和九头蛇的壁画上的无腿动物，万代尔巴文的神秘的"U"等等，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吗？因而在间隔一万年之久的今天仍然举行的仪式，使我们能够认出，在贾巴伦壁画中的五个出色的舞蹈者就是基卡拉七个儿子的五个神话式的姐妹。

17

正如语言学、口头传说、人类学、考古学的协调一致的资料和阿拉伯、葡萄牙、英国与南非的早期文字资料所证实的那样，班图的扩张成了活生生的事实，这一事实经过生动综合是可以阐明的。同样，当语言学的争论集中在那些表明王室用的锣和双铃是从西非传到下扎伊尔、沙巴和赞比亚等技术问题上时，考古学的证据无疑是会对此作出极有价值的肯定的。当资料综合可减少编年学的困难时，它就更加必要了。碳－14断代的方法不总是可以获得的，一旦获得，就需要解释并与其他证据，如冶金术或陶器（材料与风格）进行比

[24] 见E. J. 阿拉戈阿(E. J. Alagoa)，1973年。
[25] 见A. 哈姆帕特·巴(A. Hampaté Bâ)和G. 埃迪特伦(G. Dieterlen)，1961年。

较。我们不是象在乍得[26]北部那样，总有大量的陶器碎片，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代表六个等级范围的编年标准。将现有的一切材料加以汇总的杰出范例就是恩内迪，在那里能建起一种绘图和陶器风格的历史类型学，并根据这些风格描绘出八千余年的编年系列表；所有这些都为地层发掘所证实，为碳断代法和对于植物区系、动物区系、栖息场所以及口头传说的研究所确认。[27]

标出已知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看到的日月食的地图，在日月食与历代传说中的朝代时间一致时，可提供有力的断代证据。但是，一般来说，编年学需要使用多种资料，其原因有许多：首先，朝代和世代的平均持续时间不一样；第二，君主及其继承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总是那么清楚；第三，"儿子"这个词的意思有时带有社会学意味而不是生物学意味；第四，一个国王有时有三至四个"强有力的名字"；最后，如本巴人情况那样，首领的名单有时与首领候选人的名单合在一起。　18

我们不希望贬低历史的重要部分，即编年学的重要性，也不能停止把编年学置于坚实基础上的努力，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抵制精确狂——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恶魔。我们为什么那样热切地说昆比萨利赫灭亡于1086年，而不说十一世纪末呢？并非所有的日期都同样重要。所要求的准确程度是不同的，无须把它们都置于一个基础上。

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应当把历史进展的全过程重新与非洲的时间结合起来。后者不反对将叙事性资料按照事实顺序排列，这些事实根据先例和因果关系产生其它事实。非洲人的时间概念是基于因果关系原则的。但这是一种根据特定规范所应用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逻辑处于神话之中，并以神话为转移，在这种关系中，所达到的经济阶段是基本的，而且时间并非金钱，因此无须用数字来衡量它；在这种关系中，工作与天数的节奏对于人类活动是相当合拍的；在这种关系中，日历并非抽象的或普遍的，而是涉及月亮、太阳、降雨和干旱这类自然现象以及人与动物的活动。每个小时都由具体的活动来规定。因而在布隆迪，"阿马卡马"是挤奶时间（上午7时），"穆图鲁卡"是开始放牧时间（上午8时），"库阿沙赛"是太阳开始照耀的时候（上午9时），"库穆沙赛"是太阳普照山岳的时候（上午10时），如此等等。在这个畜牧国家里，时间是根据畜牧和农业生活来衡量的。在别处，孩子的名字是根据生日，根据生日前后的事件来定。例如在北非，穆斯林倾向于以孩子出生的月份给他们命名——赖麦丹（9月）、舍本（8月）、穆哈兰（1月）。尽管神话无大用处，但是故事与传说是一种合理理解社会发展进程的努力。"从那时起开始在家里喂养牲畜……开始有了铁匠……妇女才开始做这种工作。"这就是历史的寓意。

这种时间的概念在多方面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老人政治的非洲社会，论资排辈的观念比任何地方都更重要。因为只有根据年资才能享有权利，如在公共场合讲话，参加特殊舞会以及享用某些菜肴、参加婚礼、得到他人的尊敬等等。长子身分对于王室继承来讲通常不是一种特殊权利，具有潜在要求权的人（叔叔、兄弟、儿子）的数目总是很大的。在相当公开的竞争中，总要计算年龄的情况又一次赋予编年学以意义。但是，没有必要了解谁确切地生于某某年；主要的是要证明谁出生在某某人之前。只有在大得多的和特征不明　19

---

[26] 见Y.科彭斯(Y. Coppens)，1960年，第129页和以下各页。

[27] A.拜娄德(A. Bailloud)，1966年，第31页和以下各页。

显的社会里，引证纯粹编年学才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社会时间的概念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根据非洲的全物力论宇宙哲学，人们应该不断地增加人们的生命力，因为生命力显然是社会性的，而且包括社团中的进步观念和通过社团取得的进步观念。正如巴卡里·迪恩所说的："即使我死以后，它也要为我的名字增光。"在某些语言中，同样一个词（例如班巴拉语的"博格纳"）指礼物、荣誉和成长。

季节的推算经常是根据对一组星座，例如，对大熊星座的天文观测进行的。在上扎伊尔的科莫，人们把昂宿星团比做一篮子砍刀，标志着到了磨刀和清理土地的时候了。必要时，这种时间的概念可更具有数字的性质：例证包括作为档案保存在多贡洞穴中的在特殊木条上的刻痕；每年在博诺曼苏国王的殿堂的锡罐里放一块金锭，或在国王的位于曼丁哥农村的茅舍中的坛子里放一块玛瑙；更不用说在埃及法老和穆斯林王国，例如阿尔莫哈德王国，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一个人考虑到把一系列朝代改为一系列日期的困难，并考虑必须确定一种固定的参考要点的话，那么，很明显，后者通常由某一记有日期的外部事件——例如，对于博诺曼苏的进攻——提供。文字的使用、基于准确起始点的历法的宇宙神宗教的传播以及非洲进入利润和积累财富的世界，已改变了传统的时间概念。但在那个时代，它满足了有关社会的需要。

另外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最终必须从内部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而不能再沿用外国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没有自我意识和不同权利的意识，就不存在独立的集体特性。当然，自我检验的政策和实践不在于人为地废除非洲与新旧大陆之间的历史联系。但是，必须根据非洲对人类发展确曾有过贡献的那种相互交流和多边影响来分析这些联系。非洲的历史态度决不是报复性的，也不是自我满足的；它将是旨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次重要的集体回忆。外部许多有利害关系的人对非洲形成了有屈辱标记的形象，今天的电影还是那样看法，所以现在该重新看待非洲了——从内部看非洲，它是一致的、真实的、觉醒的非洲；正如雅克·贝尔克称这是恢复到本源时所说的"恢复本来面目"。当人们考虑非洲的词汇与 20 名称的力量时，当人们考虑给某人命名几乎是要占有他，从而当提到受尊敬的人（父亲、丈夫、国王）的名字时，总是用他们的略称或委婉的称号而不直呼名字，这时人们就意识到涉及非洲史的全部词汇与概念、全部的旧框框与思维方式对最微妙的隔离形式又增加了新的因素。需要进行一次真正哥白尼式的彻底革命，首先，这次革命应该是语义方面的革命，而且在不否定一般科学的要求的前提下，应注意非洲历史的全部进程从而将其纳入新的模式。[28]

正如J. 麦肯齐早在1887年所说的，在茨瓦纳（博茨瓦纳），许多非洲人的名字是他们自己和其他非洲人都不曾用过的。他们经过殖民化的洗礼，以献身隔离化的身分而出现。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洲语言写非洲史书。这首先需要进行其它的结构改革。许多论述非洲的史书慷慨地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来写殖民化以前的历史，他们的借口是人们对此所知甚少！结果是，他们越过所谓的黑暗年代，直接描述某些

---

[28] I. A. 阿金乔格宾（I. A. Akinjogbin）（1967年）为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作者首先比较了"艾比"（扩大的家庭）的制度，即奥约对家庭所持权威的假定材料与达荷美通过君主独裁统治适应贩卖奴隶的制度，并解释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不同。又见 B. 维尔海根（B. Verhaegen），1974年，第156页。

著名的探险家或总督、救世主或救星，据说真正的历史是从这开始的，而非洲独立的往昔则被认为是一段不光彩的史前史。当然，不存在否定曾作为促进或激发力量的外来影响的问题。例如，火器在十六世纪传入苏丹中部，这使得由奴隶组成的步兵军队对于封建骑兵占了优势。这一变化影响了苏丹中部地区的权力结构，原来从奴隶中招募的卡萨拉或凯加马在贵族首相锡罗玛与国王的关系中取代了锡罗玛。但是根据外来影响(甚至关于座椅头枕!)进行的机械解释以及在外部传入与非洲历史中的运动之间的机械对比这两点应该摈弃，以利于进行更内向的分析，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内部矛盾和推动力。[29]

此外，这部历史只能是**整个非洲大陆各民族的历史**，根据非统组织宪章的定义，大陆是指包括本土和马达加斯加等邻近岛屿在内的整体。非洲史显然要包括地中海地区，这是一个由长期的，有时是鲜血联结起来的地区，这种联系使得撒哈拉沙漠两侧的非洲象一座门的两扇，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必然是一部各民族的历史，因为甚至某些王朝的专制制度，总是由于距离遥远，由于缺少加强集中领导的技术手段以及由于农村民主的长久性而有所缓和，因而从基层到最高级，各级为了讨论和通过讨论而召集的委员会就构成了政体的核心。这必须是一部各民族的历史，因为除了近代几十年之外，非洲从来没有根据殖民化所规定的国界而定型，因而，非洲各民族的领土基础与继承殖民者所划分的边界完全不同，这一点是完全有理由的。仅举一例说明，塞努福延伸到马里的部分地区，象牙海岸的部分地区以及上沃尔特的部分地区。因此，就非洲大陆而言，应强调共同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来自共同的渊源和区域间长期的人、商品、技术和思想的交流，换句话说来自物质的与精神的商品的交流。自史前以来，虽然存在自然障碍和技术水平低下，但在大陆范围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历史一致性，它一方面存在于尼罗河盆地与包括离散的卢奥人在内的东非之间，通过分散的班图人存在于苏丹与中非之间；通过跨越沙巴横贯大陆贸易存在于大西洋和东海岸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过大规模的移民，不能把这看做是走向旷野、又离开旷野的巨大人流。即使沙卡，即姆夫坎的动人的英雄传说也不能仅用这种言词来解释。莫西部落(上沃尔特)从达戈姆巴和曼普鲁西(加纳)向北部的迁移运动是由一群群骑士进行的，尽管他们在不同时期占领过许多地区，但是，他们也只是与在那里发现的人合并在一起并在当地娶妻成家才得以立足的。他们给予自己的司法特权很快就实行了广泛的面部刺纹，这种刺纹起着一种身分证的作用。新来者的语言和机构取代了其它民族的语言和机构；但是，其它如有关的耕作宗教和定居管理权等习俗，仍然掌握在当地头领手中，此外，他们同路上相遇的人建立起"轻率的亲戚"关系。那位伟大的"莫西"征服者乌布里本人就是一个"混血儿"。这种渗透过程几乎总是取代"无政府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入侵"的罗曼蒂克但过于简单化的概述，这表明贝尼希拉尔人闯入北非这件事是如何长期被错误地描写的。

非洲通史不是一个种族的历史。目前所有严肃的作者都反对种族歧视的自然人类学的谬论。但那些为适应这个目的而想象的含米特人和其它棕色人种仍有待于在另外某种科学头脑的幻想与臆念中发现。[30]

---

[29] 见R. C. C. 劳(R. C. C. Law)，1971年。作者认为，奥约的衰落是由于取决于统治权力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内部紧张局势：奴隶、国王在各行省的管家，地方驻宫廷的代表，王室宦官(左、中、右的)三头政治。

[30] J. 希尔诺(J. Hiernaux)，1970年，第53页及以后各页。

J. 希尔诺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写道:“这些类别不能认为是生物单位……富拉尼人是一个文化群体而不是生物群体。例如，喀麦隆南部的人与坦桑尼亚的哈亚人有着密切的生物关系。至于摩尔人与索马里瓦尔辛吉里人之间的接近性，与其说源于遗传，不如说源于决定两个群体的相似生物地带(荒芜的草原)。”

严格地讲，数千年来，生物因素一直被自然淘汰和遗传学要旨搞得含糊不清，因而不能给分类提供任何可靠论据，无论是依据血型还是依据 Hbs 基因的出现率，这种基因决定异常血色蛋白质，而且与一种正常基因合在一起，能加强抗疟的能力。这表明适应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例如，较高大的身材和较大的骨盆适合于非常干燥炎热的地区。狭长头部的生态是一种减少吸收热量的适应性生态。如有可能，“部落”这一词，除了北非的某些地区的情况而外，[31] 在这部书里将不再使用，因为这个词含有污蔑和许多错误的思想内容。不管人们怎么强调：部落是一个文化单位，有时是政治单位，可是有些人仍认为它表示一个生物学上特殊的群体，还大肆渲染“部落战争”的恐怖，而这种战争常常最多只造成几十人死亡，然而，这些人忘记了所有的真正交流，这种交流在生物、技术、文化、宗教和社会政治方面把非洲各民族联在一起并赋予非洲的成就以一种无可怀疑的家族气质。

此外，**我们的非洲史必须避免叙述过繁**，因为否则就有过分强调外部因素和影响的危险。当然，首要的任务是确定关键的事件，这对于明确非洲进化的本来概貌任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主要应考虑文明、制度和结构：耕作和冶金技术，艺术和工艺，商业网，权力的概念和组织，宗教和教义与哲学思想，国家和国家出现以前的问题，现代化技术等等。这种方法使得跨学科的研究更为必要。

23

最后，为什么要回到非洲的资料上来？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这种对于往昔的探索可能只是一种满足好奇心的方法，对于某位急切解释斯芬克斯谜语的人而言，这是一种高度激发知识的实践，我们事业的真正意图应该大大超出这些纯个人目的。因为非洲史对于理解世界史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非洲大陆的历史地平线还未照亮，那么，其中许多章节就仍然是不解之谜。此外，从方法上来讲，根据本卷所列出的模式编写一部非洲史，可能提供一些资料，说明整部历史的支持者所提倡的方法是否有效，这是一部各阶层从各方面使用现有一切调查工具都可理解的历史。这样，历史就变成一门和谐的学科，在这里可同时听到各学科的意见。这种在任何特定时刻的结合随着课题和研究所达到的阶段而变化，以便适应表达的需要。但是，事后重建已经用生命之石建起的大厦对于非洲人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他们对此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在遭受数世纪或数十年的挫折之后，进入了这一领域，就象一个流落他乡的人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家乡的轮廓，这一轮廓顿时显得又新鲜又古老，因为他们一直在暗暗地希望看到它。活着而无历史就等于流浪天涯，或者说等于使用他人的根。这等于否定自己是后人的根的可能性。这等于在进化的海洋中，接受了做为原生动物和浮游生物的那种无名作用。非洲的政治家们应该对历史感兴趣，把它看做是民族遗

㉛ 阿拉伯语“部落”一词指按家系联系在一起、共有一个祖先、居住在一个特定地区的一群人。因为家系血统在闪米特民族(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等等)中相当重要，所以“部落”这个词(这个词的英文对等词是“tribe”)在许多北非国家的历史中曾起过而且现在有时仍然起着一种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保持这个词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全部含义，原词“部落”将予以保留。

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这一遗产的保护人，当他们通过历史从整体非洲的角度了解其它非洲国家时，更应当如此。

但是，这部历史对于非洲各民族本身而言甚至更为必要，因为它将给他们构成一种基本权利。非洲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趁为时不晚，尽可能拯救那些历史遗迹。必须建立博物馆并通过立法来保护遗址和文物。必须颁发补助金和奖学金，特别是在训练考古学家方面更要如此。必须彻底检查教学大纲和学位课程并给予适当的非洲观点。历史是源泉，我们不但应该从中看到和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而且还应该从中吸取养分并焕发我们的精力，以便推动人类进步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如果这是这部非洲史书的宗旨，那么这项枯燥而艰巨的任务无疑将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将成为各种灵感的源泉。

因为在往日的死灰之下，还存在着充满复活光辉的余烬。

（计建民译）



1 非洲史学史的发展

25

J. D. 费奇

非洲历史的撰写和一般历史的撰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史学家，和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史学家，都是以整个的已知世界作为参考依据来进行工作的，其中也包括相当部分的非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是这两种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个地区的历史，和南欧或近东的历史，同是这两种文明的史学家所关心的。实际上，直到十六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以前，北非历史一直是西方历史研究主流的一部分。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后，北非再次成为史学家调查研究不能不考虑的地区。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和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之后，随着欧洲在北非殖民势力的增长，欧洲人的殖民主义观点，逐渐支配了北非历史的撰写。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伊斯兰教兴起现代主义运动，北非殖民地发展了欧洲式的教育，北非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了非洲土生土长的历史学派，并用法文、英文和阿拉伯文撰写历史，使北非历史的研究恢复了适当的平衡。

因此，本章所谈的主要是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部非洲的编史工作。无论是经典的欧洲史学家，还是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史学家，都对热带非洲的历史很有兴趣，但是他们的眼界，受到他们所接触范围的局限，不论是穿过撒哈拉到"埃塞俄比亚"或比拉苏丹，或从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到季节风航海的边缘。

古代作家的资料，特别是有关西非的部分，既贫乏又零散。希罗多德、曼涅托、大普林尼、斯特拉波等人所谈的，不过是穿过撒哈拉的偶然旅游或突然袭击情况，或大西洋沿海试航的情况。其中有些记载是否可靠，常常是现代学者热烈争论的主题。关于红海和印度洋的经典性资料，有较扎实的根据，因为很明显，地中海的商人或至少亚历山大港的商人，是在这些海岸发展贸易的。大约在我们纪元100年发表的《红海巡航记》和大约在我们纪元150年发表的克劳迪亚斯·托勒密(虽然传到我们时代的版本所谈的多是我们纪元400年左右的事)以及印度旅行家科斯马斯于647年发表的著述，仍然是东非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26

阿拉伯学者掌握较多的资料，因为在他们的时代，撒哈拉居民利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促进了同西非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也促进了北非商人在西部苏丹主要城镇定居，同时，西印度洋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沿着东非海岸建立起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或较近的亚洲地区的商人移民区。因此，以下这些人的著作对于九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这一阶段的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历史的再现，是十分重要的：马苏第(约950年)、白克里(1029-1094年)、伊德里西(1154年)、亚库特(约1200年)、阿布-菲达(1273-1331年)、

欧麦里(1301－1349年)、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和哈桑·伊本·穆罕默德-武扎恩(在欧洲以利奥·阿弗利卡纳斯知名，约1494－1552年)。

但是这些作者中的任何人或他们的古典派祖先中的任何人，不管他们的著作对现代史学家多么有用，是否应该被算作重要的非洲史学家，还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每个人所描绘的，主要是他们写作时掌握的资料的那部分非洲情况。关于一段时期的变化，他们根本没有进行准确的调查，当然也就谈不到著述了，而这种著述才是史学家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描述同时代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某些资料可能是当代的，但另一些资料，尽管在作者活着时还流传，却常常来源于更早时期的报道。最后的缺点是，一般来说，无法鉴定资料的权威性，例如，作者的资料是亲自观察收集的第一手材料呢，还是从同时代人第一手资料得来的呢，或者仅仅是从当时的传闻或者前代作者得来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利奥·阿弗利卡纳斯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象伊本·巴图塔一样，亲自在非洲旅行过，但他和伊本·巴图塔不同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他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亲自观察所得。

“历史”一词的含义并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也许值得回顾一下。今天，历史的一般意义似乎是“对一段时间的事件的条理记述”，但是它也可能含有“对自然现象的系统记述”这一比较旧的含义。利奥·阿弗利卡纳斯的著作的英文标题《非洲地理历史》使用“历史”一词，主要就是根据这一意义。这一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只是在自然历史(当然，这是普林尼的书名)这个逐渐过时的名称中。

然而，从最恰当的现代意义来说，有一位重要的早期非洲史学家，这就是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如果他能被西方学者更好地了解，他可能夺去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称号。伊本·哈勒敦当然是北非人，生于突尼斯。他的著作中的一部分论述了非洲[①]及其与地中海和近东其他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对这些关系的观察中，他逐渐得出一个循环过程的历史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从热带草原和沙漠来的游牧民征服了可耕地地区的定居民族，在那里建立起主要王国，约三代以后，失去了原来的朝气，成了新的游牧民侵略的牺牲者。这对北非的大部分历史，确实是一个不坏的模式。伟大的史学家马克·布洛克[②]采用了伊本·哈勒敦的主张，来阐述早期中世纪欧洲历史。但是伊本·哈勒敦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因为他想出一套历史哲学，而且——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和众人不同，不把所有史料片断都当作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同等的效用，认为真理的探索必须经过批判和比较的过程。伊本·哈勒敦实际上是个现代史学家。多亏了他，我们才得到几乎可以肯定在任何现代意义上都是最早流传下来的热带非洲书面历史的片断。作为一个北非人，还因为(不论他的哲学和方法多么新颖)他也在旧地中海和伊斯兰教传统下工作，他不能不关心撒哈拉的那一边正在发生的事。因此，伊本·哈勒敦著作中的一章[③]，实际上就是马里帝国史，这是他毕生达到顶峰或者说接近顶峰的作品。该章一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口头传

27

---

① 关于非洲的各主要段落，载于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最重要的著作《穆卡迪玛》(由樊尚·蒙泰伊(Vincent Monteil)译成法文)，以及他所著的《世界史》的一部分，由德斯莱恩(de Slane)翻译，题为《柏柏尔史》。

② 例如参见M. 布洛克(M. Bloch)，1939年，第54页。

③ 在M. G. 德斯莱恩(M. G. de Slane)翻译的题为《柏柏尔史》的译本中，出现在第二卷，第105-116页。

说。由于这一原因，它仍是这个伟大非洲国家历史的重要依据。

如果对它的基础和后来的发展没有一些公认的著述，那么，象马里这样的强大国家，或者象早期豪萨人的王国或东非沿岸的城邦那样的较小国家都不能保持它的特性和完整性。当伊斯兰教带着阿拉伯文字越过撒哈拉，穿过东部海岸时，黑非洲人就不再依靠口述方法保存他们的历史，很快地开始编写文字历史了。

也许目前所知道的这类历史中早期最优秀的例子是《苏丹史》和《法塔史》。这两部书最初主要是十七世纪在廷巴克图编写的④。在这两部书中，作者们详细记述了他们时代或不久以前的发展情况，并且有分析，有解释。他们还在序言中，就有关留传下来较早时期的口头传说作了评述，因此，最终结果是，不仅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 28 的历史，而且还试图评论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主要是古代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这种做法是想把廷巴克图写的历史和阿拉伯文的其它早期非洲历史著作区别开来，例如通称为《卡诺编年史》和《基尔瓦编年史》等历史著作⑤，这些著作不过是把早期据说是口头保存下来的传统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基尔瓦编年史》的一个版本似乎在十六世纪为葡萄牙史学家德巴罗斯使用过。至于《卡诺编年史》，迄今无法证明在大约十九世纪以前有过文字形式。

有趣的是，这类阿拉伯文编年史不一定只限于完全伊斯兰化的非洲地区。因而中部的现代加纳，在十八世纪编写了《贡贾编年史》。近来艾弗·威尔克斯和其他人的研究显示，这一地区和邻近地区有成百种阿拉伯文史料。⑥当然，还不应忘记，热带非洲的一部分，即现代埃塞俄比亚，有自己的闪米特文，起先是盖埃兹文，后来是阿姆哈拉文，这种连续不断的文字传统已持续和发展了约两千年。这一传统肯定在十四世纪产生一些历史著作，例如，《阿姆达锡昂战争编年史》。⑦直到十九世纪，才发展了用其它非洲文字写的历史著作，如豪萨文和斯瓦希里文。这些著作不是用外来的古典阿拉伯文写的，而是利用它的手稿。

十五世纪，欧洲人开始熟悉热带非洲的海岸地带，这样很快地导致产生对现代史学家提供宝贵史料的文学作品。热带非洲有四个地区受到特别注意：西非几内亚沿海地区，下扎伊尔和安哥拉地区，赞比西河流域和附近高地，以及埃塞俄比亚。其中后三个地区，在十六、十七世纪已经深入内地。但是就象早期经典作家或阿拉伯作家的情况一样，结果并不总是，或立即是撰写非洲历史。

几内亚沿海地区是欧洲人最早接触的非洲地区，从大约1460年（卡达莫斯托）到十八世纪初（巴波特和博斯曼）出现了一整套有关这些地方的著作。其中有大量材料具有极大的 29 历史价值，因为它们提供了第一手有年代日期的证据，很多其他西非历史都可以以此为准。在这些著作中，特别是在达珀（1668年）的著作中，还有很多历史材料（不是当代材料），达珀和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他没有进行第一手考察，而只是把别人的考察资料加以

④ 《苏丹史》是G. 胡达斯(G. Houdas)(1900年)编辑和翻译的；《法塔史》是G. 胡达斯和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编辑和翻译的。

⑤ 《卡诺编年史》载于H. R.帕尔默(H. R. Palmer)1928年的英译本第三卷第92-132页，《基尔瓦编年史》载于G. S. P.弗里曼-格伦维尔(G. S. P. Freeman-Grenville)英译本(1962年)第34-49页。

⑥ 关于现代加纳的《贡贾编年史》和阿拉伯文手稿，见N. 列夫吉翁(N. Levtzion)著作，1968年，特别是第xvii-xxii页；I.威尔克斯(I. Wilks)著作，1963年；和T.霍奇金(T. Hodgkin)著作，1966年。

⑦ 这一著作有若干译本，其中有J. 佩若琼(J. Perruchon)于1889年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

编辑。但是所有这些作者，主要都是叙述当时形势，而不是写历史。反常的是，只是到了今天，大量西非历史才得以再现，他们所应该阐述的很多事实的重要历史意义也才受到应有的重视。⑧

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人感兴趣的其它非洲地区的情况有些不同了，其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地区都是早期传教事业的领域，而欧洲人在几内亚的活动总是以贸易为主要焦点。只要非洲人能供应欧洲人所需要的商品，几内亚的情况大体上就是那样，欧洲商人就不会感到改变非洲社会的迫切性；他们只是满足于保存这种社会。另一方面，传教士有一种积极的动力，想改变他们发现的社会。了解一些非洲史也许能成为他们的有用资本。当然在埃塞俄比亚，进行这种了解很方便。他们学习和研究盖埃兹文，并可利用盖埃兹文写的编年史和其它作品。编写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任务，由两个著名的传教士先驱来进行，他们是派罗·佩斯(死于 1622 年)和曼诺尔·德阿尔梅达(1569-1646 年)。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由欧洲一位最早的东方学家约布·卢多尔夫(1624－1704 年)写成了。⑨在下扎伊尔和安哥拉，还有在赞比西河流域及其附近，商业动机大概比福音传教动机强烈，但是总的来说，传统的非洲社会，如果没有相当压力，是不能输出欧洲人所需要的商品的。结果，非洲社会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因此，即使叙事体论文，也难免有一部分涉及历史。事实上，在皮加费塔和洛佩斯(1591年)以及卡瓦齐(1687年)这些人的著作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叙述。1681 年，卡多尼加写出了《安哥拉战争史》。⑩

到十八世纪，热带非洲似乎逐渐受到欧洲史学家应有的重视。例如，这时他们有可能利用的早期作家主要是叙事体作品作家，如利奥·阿弗利卡纳斯和达珀，利用他们的史料，这样当时的世界历史和地理，如 1736 到 1765 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史》，就能合理地给非洲以一席之地。⑪那时还有一些专题论文，如席尔瓦·科雷亚的《安哥拉史》(约 1792 年)，贝尼泽特的《几内亚历史散记》(1772 年)和两部达荷美历史著作，即诺里斯的《包萨·阿哈迪统治纪要》(1789 年)和达尔泽尔的《达荷美史》(1793 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慎重。席尔瓦·科雷亚的著作直到本世纪才出版。⑫上述其他三种著作之所以早已出版，是因为到十八世纪末，对贩卖奴隶一事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贩卖奴隶是欧洲与热带非洲以往 150 年或更多年联系的主要媒介。达尔泽尔和诺里斯都利用他们在达荷美贩卖奴隶的经验写历史，贝尼泽特也写历史，但他们的写作意图都是为了提供论据，来讨论是否应当废除贩卖奴隶的做法。

如果不是由于这一情况，这些书能否找到销路，就大成问题了，因为当时欧洲学术的主流，正开始对非欧洲社会持有越来越不利的看法，并断言他们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这

---

⑧　G. R. 克龙(G.R.Crone)，1937 年；J. 巴尔博特(J. Barbot)，1732 年；W.博斯曼(W. Bosman)，1967 年的注释本。

⑨　载于 C. 贝卡里(C. Beccari)的著作，1905－1907 年；佩斯(Paez)的著作载于第二卷和第三卷；阿尔梅达(Almeida)的著作载于第五卷至第七卷；阿尔梅达著作的部分英文译文载于 C. F. 贝金汉(C. F. Beckingham)和 G. W. B. 亨廷福德(G. W. B. Huntingford)，1954 年。卢多尔夫(Ludolf)的《埃塞俄比亚史》1681 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⑩　A. 德奥利维拉·德卡多尼加(A. de Oliveira de Cadornega)的著作，1940－1942 年。

⑪　《世界史》的对开本共有二十三卷，其中十六卷是现代史，有两卷是关于非洲的。

⑫　里斯本，1937 年。

种态度主要产生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科学革命这三种思潮的综合影响。其结果是，欧洲知识分子，依靠他们认为的唯一的希腊罗马遗产，使他们自己相信，欧洲社会的目的、知识、力量和财富是如此优越强大，以致必须胜过所有其它地区，因此欧洲历史是理解一切的关键，而所有其他社会的历史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态度，可能特别是针对非洲，因为欧洲人直到那时，除贩卖奴隶以外，对非洲和非洲人几乎毫无所知，而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地方都因为从事贩卖奴隶出口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

黑格尔(1770-1831年)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十分明确地叙述了这种情况。该书关于非洲有这样一段话：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非洲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正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们从来就是这样。"注意一下下面的事实是有趣的，早在1793年，准备出版达尔泽尔著作的一位编辑认为，必须为出版一部达荷美历史提供正当理由。他完全同意黑格尔的看法，他说，为了对人性有一种正确的认识，通过较原始民族的历史取得进展是绝对必要的……在估计人类幸福时，没有其它方法比这类比较更能评价教化的价值。⑬ 31

虽然黑格尔对编写非洲史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大，但他所代表的观点已成为十九世纪历史正统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不乏追随者。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曾宣布过以下一段话：

> "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
>
> 请不要误解我。我不否认，甚至在黑暗的国家和黑暗的世纪，也有人类存在，我也不否认，他们有过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感兴趣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但是历史，我相信，主要是一种运动形式，也是有目的的运动形式。他不仅是一种正在变化的形象和服装、战争和征服、朝代和篡夺、社会形式和社会崩溃等的幻景。……"

他认为，"历史或者历史研究都有一个目的。我们研究它，是为了发现我们是如何有今天的"，而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如此被西欧思想、技术、和价值观念统治着，以致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就世界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来说，只有欧洲历史起作用。因此，我们没有"那种闲情逸致，玩赏地球上风景如画但又毫不相干的角落的野蛮部族的无益的迁移回转。"⑭

具有相当讽刺意味的是，在黑格尔活着的时代，欧洲人已着手对非洲进行现代的和科学的有效探索，从而开始为合理评价非洲社会的历史和成就打下基础。这种探索一部分与反对奴隶制和贩卖奴隶的反应有关，一部分与争夺非洲市场有关。

早期的一些欧洲旅行者，对尽可能发现热带非洲人的过去真正感兴趣，他们收集了一切可能得到的资料：能得到的非口头传说的文件以及关于他们见到的文物古迹的札记。这些探索者写了大量文献，其中有些是很好的历史，所有这些文献对史学家来说几乎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主要著作可列举如下：詹姆斯·布鲁斯的《考察尼罗河发源地旅行记》(1790

⑬ A. 达尔泽尔(A. Dalzel)，《达荷美史》(1793年)第v页。

⑭ 上文引自休·特雷弗-罗珀教授(Hugh Trevor-Roper)题为《基督教欧洲的兴起》系列讲演的第一讲开场白。见《听众》，1963年11月28日，第871页。

32　年)；T. E. 鲍迪奇的《从海岸角堡到阿散蒂的使命》(1819 年）和约瑟夫·杜普伊的《阿散蒂居留日记》(1824 年）这两部作品关于游历阿散蒂首都库马西的记述中专讲历史的篇章；海因里希·巴尔特的《北非和中非旅行见闻》(1857－1858 年)；M. 吉兰的《东非历史、地理和贸易文件集》(1856 年)和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的《撒哈拉和苏丹》(1879－1889 年)。

纳赫蒂加尔的事业是把非洲历史扩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欧洲人正着手征服这个大陆并统治该大陆人民。进行这件事，似乎需要从道德上找依据，在这里由于引用达尔文主义而加强了黑格尔的观点。这种做法的征兆性后果是人类学这门新科学的兴起，用非历史的方法，调查和估价这些原始人的文化和社会，这些原始人曾被认为是“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的，“低于”欧洲人的，从实用的角度用皮肤的色素把他们同欧洲人区别开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谈的是理查德·伯顿(1821－1890 年)。他的旅行使他成为十九世纪到非洲旅行的欧洲人中最伟大人物之一。他生气勃勃、好奇心切、学识渊博，从而成为杰出的东方学家；1863 年他是伦敦人类学学会(后来成为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的情况比纳赫蒂加尔的更突出得多，他的事业标志着詹姆斯·布鲁斯开创的对非洲进行不带偏见的科学探索时代的结束。例如，在他的《会见达荷美国王格莱莱》(1864 年）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黑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请注意，不是“黑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论述，离题很远。其中有这样的提法：“在人类家族中，纯粹黑人的等级处于两个伟大种族阿拉伯人和雅利安人以下”(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则相反，认为这二者低于黑人)以及“就整体来看黑人，进步的不会超过某一限度，是不值得尊敬的，在智力上还停留在儿童阶段……”⑮有些非洲知识分子，如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霍顿，在同伦敦人类学会一些有影响的会员辩论过程中，试图改变这种看法，但是没有达到目的。

大约在这个时期，尤其在德国，由于出现了史学家行业的观念，使非洲史的研究工作遭到了挫折，因为根据这一观念，研究历史不属于文学或哲学范畴，而属于基于对原始材料严格考查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就欧洲历史来说，这些原始资料当然主要是书面资料，但非洲在这方面显然是薄弱而不足的。1923 年，A. P. 牛顿教授在伦敦(皇家)非洲学会以《非洲和历史研究》为题作过讲演，当时，他对这一观念说得非常明确。他说“在欧洲人到来以前”，非洲“没有历史。历史是从人类有文字记载时才开始的”。所以，欧洲帝国主义入侵

33　以前的非洲历史，只能“根据残留的遗物、语言和原始习惯”重写，而这些不关史学家的事，而是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事。⑯

事实上，牛顿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处于他那个时代出现的史学行业的边缘。一些最有名的英国史学家，如詹姆斯·斯蒂芬(1789－1859 年)、赫尔曼·梅里维尔(1806－1874 年)、J. A.弗劳德(1818－1894 年）和 J. R. 西利（1834－1895 年)，⑰在十九世纪大多数年代，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洲人(或至少是他们的本国同胞)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但是继西利担任剑桥

---

⑮　前引书，1893 年版，第二卷，第 131 页和 135 页。

⑯　“非洲和历史研究”载于《非洲协会杂志》第 22 期(1922－1923 年)，第 267 页。

⑰　斯蒂芬(Stephen) 于 1825 至 1847 年在殖民部工作，1849 至 1859 年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梅里维尔(Merivale)在接替斯蒂芬担任殖民部常任次官之前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47 至 1859 年)。弗劳德(Froude)在牛津大学渡过了大半生，1892 至 1894 年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但是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任殖民大臣驻南非代表。西利(Seeley)于 1869 至 1895 年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

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是阿克顿勋爵(1834-1902年)，他在德国求过学。阿克顿立刻开始计划《剑桥近代史》的编写工作，1902-1910年出版了十四卷。它的欧洲中心论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欧洲人在外部世界的活动，几乎全不收录。以后，关于殖民历史的编写，留给查尔斯·卢卡斯爵士(或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等人)⑱，他们象斯蒂芬、梅里维尔和弗劳德一样，也都亲自积极投入了殖民事务中。

然而，到一定时期，殖民史或帝国史成了公认的边缘学科。《新剑桥近代史》在乔治·克拉克爵士指导下，于1957年开始问世，在十二卷中有非洲、亚洲和美洲史各章。此时剑桥史的范围已包括牛顿为主编之一的《剑桥大英帝国史》(1929-1959年)在内。但是只要随便翻一翻这部书就可看出，殖民历史，即使对非洲来说，也和非洲史大不相同。

在《剑桥大英帝国史》的八卷书中，有四卷是专门写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印度的，其余的三卷是总论性质的，但强烈地与帝国政策相适应(在六十八章中，只有四章直接谈到英国和非洲的关系)；另外一卷是专门写南非的，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角，欧洲人在这里的殖民根深蒂固。实际上，这一卷是八卷中最厚的一卷，所谈的全是关于这些欧洲移民者1652年第一次到达该地以后所发生的种种纠纷。占这个地区人口大多数的非洲土著都被归并到一个导言和另外两章，导言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写的，但大部分并不是讲历史，另外两章虽然出自当时最有头脑的两位南非史学家，C. W.德基威特和W.M.麦克米伦的笔下，但对非洲土著的看法必然是根据他们对欧洲人在非洲出现的反应。 34

另外，在某些相对来说不朽的著作中，非洲历史也不是以堂堂正正的姿态出现的。例如：巴黎出版的二十卷本《世界通史：人民与文明》(1927-1952年)，巴黎出版的G.格洛茨主编的十卷本《通史》(1925-1938年)，柏林出版的十卷本《世界历史入门》(1929-1933年)，伯尔尼出版的十卷本《口头历史：世界史手册》(1952和以后几年)；1955年莫斯科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1955和以后几年)。1928年米兰出版了意大利人C.孔蒂·罗西尼的重要著作《埃塞俄比亚史》。

专业的殖民史学家，同一般专业史学家一样，总认为撒哈拉以南的土著无历史可言，或者说没有可供他们研究或值得他们研究的历史。如上所述，牛顿认为，他们的历史是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范围。的确，现在考古学家象史学家一样，从专业角度关心人类的过去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也象史学家一样，不甚关心如何把他们的技术用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原因大致有两个。

第一，发展中的考古学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是，和历史学一样，它主要靠书面材料指导自己。它专攻这样一些问题，如寻找古代特洛伊的遗址，或寻找文献资料尚未肯定的古希腊或罗马或埃及的社会情况，而这些地方的主要文物古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人们思考的中心。它过去是，现在有时仍然是和历史专业的一个分支，即古代史紧密相联，有时它对发现和解释古代碑文和对其它文物同样都关心，但是很少听说过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过这类吸引考古学派注意的主要文物——例如在阿克苏姆和津巴布韦及其附近。第二，考古学

⑱ 卢卡斯(Lucas)于1877至1911年在英国殖民部工作，曾升到助理次官；后来他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研究员。阿诺托(Hanotaux)(1853-1944年)从事两项事业，作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曾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法国殖民事务和外交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史学家，被选入法兰西学院。

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是集中探求人类的起源，从而对人类过去的看法，地质学成分多于历史学成分。确实，在L. S. B. 利基和雷蒙德·达特这些科学家的著作中，探求的主要部分最终集中在东部和南部非洲。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是遥远的过去，甚至远到社会还不存在的时期。在他们所发现的化石与史学家关心其过去社会的现代人之间，常常有一条令人猜测的巨大鸿沟。

35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以前，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大都避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然而这个地区的人的体形、社会和语言的复杂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注意，因为他们开始形成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这两类学者可以长期坐在安乐椅上研究科学，但是象伯顿和S. W. 凯尔(《非洲的多种语言》，1854年)这一类学者，很早就证明了现场调查的价值；特别是人类学家成了非洲现场调查的先驱者。但是不象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样，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没有认为有必要去发现过去发生的事，他们在非洲发现了大批材料，有待说明、分类和分析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任务。常常，他们对过去所关心的，只是把历史加以再现，他们认为，这种历史将留给后世，解释他们所提供的材料。

但是他们并不总是了解，历史的再现是要如何推理和假说的。人类学家C. G. 塞利格曼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1930年首次出版的《非洲的种族》一书中，直截了当地写道："非洲的文明就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非洲历史就是这些人及其与其他两个非洲种族尼格罗人和布须曼人交往的记录……"。⑲从推断可知，"其他两个非洲种族"是劣等的，他们在文明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于受含米特人影响的结果。在另外一处提到"一浪又一浪"从草原来的含米特人，比"务农的黑色尼格罗人"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和较敏捷的才智，含米特人影响了这些尼格罗人。⑳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来证实这种判断："非洲文明就是含米特人文明"，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进步完全归功于含米特人或主要归功于含米特人。该书当然没有提出任何历史证据，现已弄清，它所依据的许多设想都是毫无根据的。例如，J. H. 格林伯格曾断然表示，如果含米特和含米特语这样的名词有任何价值，他们最多也不过是语言学分类的部目而已。㉑在人们所讲的语言与他们所属种族或文化之间，肯定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格林伯格特别提出一个有力的例子，"讲……含米特语的以农为业的豪萨人，是受讲尼日尔－刚果语(即尼格罗语)的以畜牧为业的富拉尼人统治的"。㉒他同样

36　驳倒了塞利格曼关于再现非洲其他地区黑人(特别是讲班图语的黑人)文化历史应该主要以含米特人为基础的论断。

对塞利格曼所以特别注意，是因为他是英国这一专业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在非洲进行认真现场考察的首批人物之一，还因为他的著作已成为某种经典性著作，再版多次，直到1966年宣传广告仍认为他的著作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然而他赞成浅肤色人优于深肤色人的神话，这只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普遍存在的偏见的一部分。欧洲人认为，他

---

⑲　前引书，1930年版，第96页；1966年版，第61页。

⑳　前引书，1930年版，第158页；1966年版，第101页。

㉑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63年。事实上，格林伯格和其他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全部避免"含米特"一词，他们把所谓的含米特语同闪米特语和其他语种一起列在更大的一类里，叫做亚非语类或厄立特里亚语，他们不承认任何特定的含米特小类。

㉒　J. H.格林伯格，1963年，第30页。

们比非洲黑人优越的看法已被他们自己对殖民地的征服所证实，因此在非洲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苏丹地带和大湖区，情况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是继续其他浅肤色侵略者（一般是指含米特人）在他们到来以前早已开始进行的文明化过程。[23] 同一主题贯穿在1890年左右到1940年左右的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品中，这些作品中的重要史实，比塞利格曼的小册子中的多得多，这些作品的大多数都是亲自参与征服和殖民过程的男男女女所描写的，他们并不是专业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或史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确实对他们所发现的异国社会情调感兴趣，并想更多地发现一些其中的情况，以便和其他人共享这些知识，所以他们是真正的业余作家，例如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莫里斯·德拉福斯，都对非洲语言学（和其它领域）作了真正重大的贡献。但前者把他的主要历史大纲叫做《外族对非洲的殖民史》（1899年；1913年改写并增订），而后者在西部苏丹权威性调查的历史部分的题目《上塞内加尔－尼日尔》（1912年），是在他引入一个"犹太叙利亚"移民以建立古代加纳时确定的。弗洛拉·肖著有《热带属地》（1906年），醉心于穆斯林对非洲历史的贡献。马杰里·佩勒姆是卢加德勋爵的传记作者和朋友，她恰如其分地提到她描写的"从阿拉伯人最早征服非洲到戈尔迪和卢加德的征服这一时期的宏伟潮流"。[24] 一位优秀的业余史学家伊夫·于尔瓦（《中部苏丹居民史》，1936年；和《博尔努史》，1949年）完全误解了他精确叙述的撒哈拉牧民和定居的黑人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意义。一个精明的文物收藏家里查德·帕尔默爵士（《苏丹回忆录》，1928年；和《博尔努撒哈拉及苏丹》，1936年）在寻找动力时，总是在距离尼日利亚主题很遥远的地方去找，甚至到的黎波里或也门那样远的地方去找。

然而，在塞利格曼以后，专业性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大都避开含米特神话的阴影。对他们的培养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B. 马利诺夫斯基和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强烈反对各种类型的推测性历史。事实上，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社会进行的严格的实际探讨，对历史兴趣起了阻碍作用，即使在他们通过现场调查，特别有利于获取历史资料的时候。然而，在欧洲大陆（还有北美，但并不是说，五十年代以前，有很多美国人类学家在非洲工作），比较旧的人种学传统仍在继续，这种传统特别注重物质文化，正如对社会结构的注重一样。 37

这样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品，例如图尔·伊尔斯塔姆的《干达王》（1944年），或拉斯·森德斯特龙的《几内亚的贸易》（1965年）。但有两部作品值得特别提出：赫尔曼·鲍曼的《非洲人种学》（1940年）和迪德里希·韦斯特曼的《非洲史》（1952年）。前者是对非洲文明和各民族的百科性调查，重点放在对他们的历史知识方面，是一卷本手册，一直没有别的作品能代替它。（最近的作品是美国人类学家C. P. 默多克的《非洲：人民及其文化史》（1959年），经过比较，发现这本书有缺点，因为作者在这一领域缺乏用来估价其数据的第一手非洲经验，还因为它同推测性历史纲要有关联，即使不象塞利格曼那样有害，也与他同样有其独特的古怪性。[25]）韦斯特曼主要是对语言感兴趣（他的非

[23] 《非洲的种族》修订第1版（1966年）第61页有一个重要说法是1930年原版本中所没有的，这是明显的事实，在那里，给含米特人所下的定义为"欧洲人，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人类的一大分支，如同白种人一样。"

[24] M. 佩勒姆（M. Perham），1960年，第234页。

[25] 见本人的评论文章《人类学、植物学和历史》，1961年。

洲语言分类作品，常常对格林伯格作品有启示，鲍曼著作中有关语言的章节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但是他的《历史》一书是当时有关非洲人民口头传说的一部很有价值的汇编．然而不幸被含米特理论歪曲了。

除这些作品外，还可以提一提的是 H. A. 维施霍夫的《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文化》(1943年)，这里只介绍他的导师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弗罗贝尼乌斯是人种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史学家，但在他活跃时期，相当于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他几乎是最多产的非洲史学家。他几乎在非洲大陆各处都进行过大量现场调查，结果使他出版了一系列作品。但现在已很少有人读他的作品了。他的书是用德文写的，而德文从那以后与非洲和非洲专家们的关系越来越少了。他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翻译过，作品的含义常常很难翻译，因为其中充满了有关阿特兰提斯和伊特拉斯坎对非洲文化各方面的神秘学说等等。

38　对今天高度专业化的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弗罗贝尼乌斯仿佛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怪人，他的作品不仅由于他的稀奇古怪的解释而减色，而且还由于他的急促、草率和经常具有破坏性的实地考察的方法而减色。但是他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些成果的取得明显地先于以后更科学的调查者的成果，另外一些成果在目前条件下，则很难或者不可能再得到。他仿佛有一种赢得提供资料者的信任和确定历史资料的天赋本领。现代史学家最好是从他的作品中把这些资料抢救出来，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价，抛掉他对这些资料所作的想象性的解释。㉘

象弗罗贝尼乌斯那样一个富有灵感、自学成才的天才所持的独特看法，倾向于肯定学院派史学家的观点，认为非洲史对他们的专业来说不是一个可接受的领域，从而倾向于把注意力从殖民时期所做的大量严肃工作转向别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人对非洲兴趣的增长，向非洲人自己提供了宽广的研究领域，以便他们在这个领域中表达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在西非尤其是这样，那里和欧洲人接触最早而且时间最长。在西非，特别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那些地区，在十九世纪初期，已有一种建立欧洲正规教育的要求。正如廷巴克图的伊斯兰化的学者很快地用阿拉伯文描写他们的历史一样，到十九世纪后期，非洲人对罗马字手稿已能读能写，他们已认识到必须在完全被欧洲人和他们的历史所吞没以前，把他们所知的自己的历史记载下来。

有两部早期的这类古典著作是非洲人自己写下的。象以前写历史的其他非洲人一样，他们对于输入文化的宗教表现了积极态度，并起了教名。这两部著作是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1895年)和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历史》(1897年完成，到1921年才出版)。这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甚至在今天，任何研究约鲁巴历史的人都离不开约翰逊的著作。但这种规模的历史论文大概是不可避免地与早期民族主义者的著作有牵连。这些早期民族主义者，从 J. A. B. 霍顿(1835－1883年)和

㉘ 在这样短短的一章中不可能对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的大量作品作出公正评价。他的最后一部综合性著作是《非洲文化史》(1933年)，而他最伟大的成就或许是十二卷作品《阿特兰提斯：非洲民间童话和民间文学》(1921－1928年)。但是还应当考虑到报道他个人考察活动的著作，例如(考察约鲁巴和莫西的)《以及非洲语言》(1912－1913年)。见1968年F. 克雷奇马尔(F. Kretschmar)的全部文献目录。最近的几篇英文文章，如 J. M. 伊塔(J. M. Its) 1972年作品以及文中提到的作品都谈到对弗罗贝尼乌斯的著作又发生了兴趣。

E. W. 布莱登(1832－1912 年)到 J. M. 萨尔巴赫(1864－1910 年)，J. E. 凯斯利－海福德(1866－1930年)和 J. B. 丹凯(1895－1965 年)，都论述过许多历史问题，但总是以宣传为目的。J. W. 德格拉夫特·约翰逊(《西非走向民族主义之路》，1928 年；《黄金海岸的历史地理》，1929 年)和 E. J. P. 布朗(《黄金海岸和阿散蒂读本》，1929 年)可能都属于这两类学派。但在他们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有意地培养有关非洲历史的神话，以抵抗欧洲至上主义的神话，例如，J. O. 卢卡斯的《约鲁巴的宗教》(1948 年)；J. C. 德格拉夫特·约翰逊的《非洲的光荣》(1954 年)就是如此。有些欧洲作家也倾向于同样做法；因此，伊娃·L. R. 迈耶罗维茨关于阿肯族的作品，力图把他们写成具有地中海的光荣血统，与卢卡斯为约鲁巴族所寻求的可以相比。

39

但在较小规模上记载当地历史传统方面，仍有许多认真而扎实的工作要由非洲人完成。这里，同基督教传教士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于是从 A. 卡格瓦(他的第一部作品于 1906 年出版)时起，在乌干达史学界就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派，关于约鲁巴兰，R. C. C. 劳曾注意到，1940 年以前有二十二名当地史学家时常用本地语言出版作品——乌干达作家也是这样。这类作品中已经成名的一部是 J. U. 埃格哈瑞夫巴的《贝宁简史》，从 1934 年首次发表以来，已再版多次。

其次，当然，许多殖民主义者本人是些聪明好问的人，他们总是想发现并确立他们来此统治的人们的历史。对于这些人，非洲历史也常常有些实际的价值。欧洲人如果了解被他们统治的人过去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管理，在他们建立的越来越多的学校里和教会同事中也有必要教一些非洲历史，虽然这只是作个台阶，去完成教授英国史和法国史这样更重要的任务，以便非洲人取得学校文凭或学位，从而被列入名册，充当有用的假欧洲人助手。

弗洛拉·肖、哈里·约翰逊、莫里斯·德拉福斯、伊夫·于尔瓦和里奇蒙·帕尔默等人已经在上文介绍过了。还有一些人写过严肃的非洲史，相对来说，都摆脱了文化上的偏见，虽然他们(或他们的出版商)有时选择明显的不适当题目；例如，鲁思·费希尔的《黑色巴干达的黄昏故事》(1912 年)；C. H. 斯蒂甘德的《津吉的国土》(1913 年)；弗朗西斯·富勒爵士的《消失的朝代：阿散蒂》(1921 年)，这些作品完全是按照鲍迪奇和杜普伊的传统写的；此外还有 E. W. 博维尔的《古撒哈拉的商队》(1933 年)或夏尔·蒙泰伊(例如《马里帝国》，1929 年初版)，或路易斯·托克西埃(例如《班巴拉历史》，1942 年)的许多博学作品。也许法国人在描写真实非洲历史方面比英国人成功些，英国人的一些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例如，W. W. 克拉里奇《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1915 年)或约翰·格雷爵士的《冈比亚史》(1940 年)，虽然不包括作者后来关于东非的文章)完全倾向于以欧洲为中心。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他们回到法国时，一些法国行政官员(例如，德拉福斯，乔治·哈迪，亨利·拉布雷)[27]就整个大陆，或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地区都写过一些一般性历史学短文。

40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法国殖民当局想比英国人建立更正式的训练和研究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首先成立了法属西非历史及科学研究委员会(建于1971年)，创办

[27] 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21年；G. 哈迪(G. Hardy)，1937年；H. 拉布雷(H. Labouret)，1946 年。

了《公报》，接着成立了法国黑非洲研究所，中心工作是在达喀尔进行研究(1938年)，出版《公报》和一系列《回忆录》，还有雷蒙德·莫尼的权威著作《中世纪西非地理志》(1961年)。即使如此，殖民时期的史学家仍然是处于历史专业以外的业余学者地位，英国如此，法国也如此，因为，尽管德拉福斯和拉布雷这种人回国以后都到学院工作，但都是担任非洲语言教师或殖民管理教师，而不是充当史学家。

1947年，非洲文化协会和它所办的《非洲的影响》杂志开始推动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思想。同时，一代非洲知识分子掌握了欧洲人的历史调查技术，开始自己探索非洲的过去，并在这种探索中寻求殖民主义者拒不承认的文化同一性原始资料。这些知识分子还利用机会改进和扩展史学研究方法的技术，抛掉了大量的主观神话和偏见。在这方面，应该提到1974年教科文组织在开罗组织的专题讨论会，它使非洲和非洲以外的研究工作者能够自由交换关于古代埃及居民问题的观点。

1948年，W. E. F. 沃德的《黄金海岸史》一书问世。同年，伦敦大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开设非洲史讲座，任命罗兰德·奥利弗博士主讲。同时，英国还在它的属地着手建立发展大学的规划：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建立大学机构，原喀土穆的戈登学院和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学院都升级为大学。与此同时，比利时和法国殖民地也有了类似的发展。1950年达喀尔开设了文学高等学院，七年后改为完全正规的法国大学。1954年，在比属刚果(现在的扎伊尔)设立第一所大学，即洛万纽姆大学。

从非洲史学史的观点来看，1948年以后新成立的多种大学，比少数早已存在、但因缺少基金难以发挥力量的学校要重要得多，例如1864年设于蒙罗维亚的利比里亚学院和1876年设于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就是这种情况。

1940年南非已有九所大学，由于比勒陀利亚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学校处境都很困难；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以欧洲为中心，非洲历史仅仅是白人移民的历史。

但非洲所有的新大学，都很快成立了历史系，第一次吸收很多专业史学家在非洲工作。最初，这些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只能来自非洲以外的大学。但非洲人很快接替了这些工作。第一个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非洲人是K. O. 戴克教授，他是1956年应聘到伊巴丹的。他培养了很多非洲学生。在非洲任教的专业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增加更多的非洲历史课程，他们还认为在对非洲历史所知甚少的时候有必要通过他们的研究去探索。

1948年以来，非洲的编史工作，越来越象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早期的文献材料较少，因而需要开辟其它来源，例如口头传说，语言学和考古学。

但是，即使非洲编史工作在使用和解释这些资料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与拉美、亚、欧各洲其他国家的编史工作相比也不会有根本区别，因为这些国家也必然面临类似问题。此外，史学家所用的证据的实际出处，对于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主要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批判的和比较的方式使用这种证据，以便对过去作出明智而有意义的阐述。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非洲各类院校已对历史有了专业兴趣。非洲历史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固定的高度专业性活动，非洲各国间的交流以及非洲大学与世界各地大学间的联系将保证这类活动继续发展。但是应该强调，如果没有非洲打破殖民枷锁的过程，这种进步是不可能取得的。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武装起义，1955年摩洛哥的独立，阿尔及

利亚人民的英勇战争以及所有非洲殖民地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对这一过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这些斗争给非洲人民提供了重新接触自己历史并组织研究的机会。教科文组织很快承认这一需要，并发起或鼓励举行专家会议，它还正确地坚持系统搜集口头传说，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1966年为了满足非洲知识分子和非洲国家的愿望，教科文组织提出编写《非洲通史》的意见，从1969年以来，在教科文组织赞助下，执行这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一直在不断进行。 42

（宣兆鹏译）

43

2 历史在非洲社会中的地位

布布·阿马和J.基-泽博

人是一种历史动物，非洲人也不例外。同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非洲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观念。事实上，这种创造能力的证据和成果是以下列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耕作方式、烹调、制药、习惯法、政治组织、艺术作品、宗教仪式以及高度完善的礼仪规则。自从人开始出现以来，经过许多世纪，非洲人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这个社会仅仅以它的生命力就足以证明非洲人的历史才华。这部历史是靠经验，即演绎形成的，也是由个人和社会集团凭归纳想出并使之深入人心的。就这样，历史成了知识的参考依据，精神和感情的权威，生活的理由和背景，即一种模式。

但是，历史意识反映它所属的那个社会，甚至反映那个社会演化的每一重大阶段，所以，非洲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观念显然将打上他们自己的特殊发展的烙印。仅仅与世隔绝这一事实就足以限制一个社会的历史观。因此，上沃尔特的莫西人国王习惯于冠上"莫格霍-纳巴"称号，即"世界之王"，这充分说明技术和物质的局限性对人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人们可以看到，非洲人的时间有时成了神话式的和社会的时间。但是，非洲人也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历史的活跃工具，因此，正如我们将发现的那样，非洲人的时间除了是神话式的和社会的时间之外，还是真正的历史的时间。

神话式的时间和社会的时间

乍一看，或者从许多人种学的研究报告中看，人们所得到的印象是，非洲人淹没在犹如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的神话式时间里，而且几乎被淹死，而世界上其他民族则沿着历史的大道前进，这条大道上树立着一块块进步的里程碑。的确，神话——对过去时代的想象——往往支配着非洲人对民族生活发展的概念。这种情况甚至达到这种地步，以至对真实事件的选择以及对其意义的认识有时竟然要服从一种神话式的模式，这种模式预先决定着统治者和人民的最平凡的行动。因此，神话在古老风俗习惯的掩盖下控制了历史，而且成了历史的佐证。从这里，产生了非洲人的历史思想中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它的永存性以及它的本质上的社会方面。

44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不是那种影响个人命运的持续，而是社会集团呼吸的节奏。时间不是一条朝着一个方向，即从一个已知源头流向一个已知出口的长河。在技术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基督徒，也明确把世界末日和永恒区分开来，这也许是因为《新约》划分了飞逝

中的现世与来世，但是还因为其他许多原因使人的时间实际上世俗化了。但是一般说来，的确可以说，传统的非洲时间包括并体现向前和向后两个方向的永恒性。过去世世代代的人并未在现今泯灭，而是以特有的方式留到现代，而且影响力之大即使不超过他们在世之年，也不相上下。在这些情况下，因果关系当然沿着前进的方向起作用，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它不仅通过已过去的事件的影响起作用，而且可以朝任何方向起直接干预的作用。当马里皇帝曼萨·穆萨(1312-1332年)派使臣到亚滕加国王那里劝他皈依伊斯兰教时，这位莫西人的统治者回答说：在做出这类决定以前，他先要请教祖先。这表明，过去与现在之间通过宗教直接连接起来，祖先在他们去世许多世纪以后发生的事件中仍作为特殊而直接的力量起作用。同样，在许多朝廷中，负责圆梦的官员对政治行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执掌未来的大臣。举一件著名的事件为例：卢旺达国王纳齐姆巴卡·尤比三世(十七世纪末)有一回梦见一些白皮肤的人从东方走来，他拿起弓箭，但在拉弓之前先把熟香蕉绑在箭杆上。对梦中这个又敌视又欢迎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的解释在卢旺达人的共同意识中灌输了一个特殊的形象，这对下述事实也许不无影响：尽管卢旺达人是能征善战的武士，但在十九世纪德国军队开来时，他们并未作多少抵抗，因为他们还不曾忘记两个世纪前那位国王梦中看到的白脸孔。

在这种停滞的时间中，现时甚至可以起着被视为过去的、但实际上仍是现代的事物的作用。今日献祭的鲜血可以鼓舞昨日的祖先。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非洲人还在互相叮嘱，不要忽略对祖先的祭奠，因为得不到祭品的人在死者世界中是穷人，他必须靠慷慨奉献的人施舍过活。

某些宇宙开创论用更基本的方式把一些在历史时间中造成的进步归结于神话式的时间；因为历史的时间不易被个人察觉，而是被历史的集团记忆所代替。基库尤人关于第一次冶铁的传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恩盖(上帝)把动物分给了男人和女人，但是，女人太狠毒了，使得她们的动物跑掉了，变成了野兽。男人代妻子向恩盖求情，说："我们想向您献上一只羊羔，但我们不愿用木刀去杀它，免得也象我们的妻子那样不幸。"恩盖赞扬他们的智慧，而且还教他们如何炼铁，以使他们有更锐利的武器。

这个神话式的和集体的概念使时间具有君主的属性。希卢克国王是永生权力在人间的源头，因为他集神话式的时间(他是英雄始祖的化身)和社会的时间于一身，被视为集团生命力的源泉。在东扎伊尔的巴富勒罗人、乌干达的巴尼奥罗人和上沃尔特的莫西人中间的情况也同样，因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首领是集体的时间的主要支柱："姆瓦米在，人们活着。姆瓦米不在，人们就死。"国王一死，时间就断了，一切活动和社会秩序停止了，生命的一切表现都停止了，从笑声、耕作直到人或动物的性交都完了。这个空白期是时间中的一支插曲。只有到另一个国王登了位，才能再创造社会时间，时间才又有了生命。在万物有灵论思想下产生的这种永恒时间中，一切都无所不在，局部相当于甚至代表了全体，一个人的头发和指甲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以免让敌人控制自己的力量。

的确，我们必须弄清非洲人对世界的总观念，才能理解他们的时间观念以及时间对他们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思想中，时间在普通意义上只是个人在其他方面所经验的另一时间的一个方面。当一个人晚上躺在席上或床上要入睡的时候，正是他的另

45

一个自我开始重新踏上这个人白天所经历的道路，重临他白天到过的地方，重复他在白天生活中有意识地做过的工作和活动的时候。在这些历程中，他的第二个自我遇到了善的与恶的力量，遇到了善良的精灵和能吃掉第二个自我或塞科人（桑海语和扎尔马语的叫法）的妖巫。一个人的个性栖息在他的第二个自我之中。当桑海人说某人的"布亚"（第二个自我）重或轻的时候，意思是说这个人的性格坚强或懦弱。护身符的用处是保护并加强第二个自我。一个人的理想是使自己与第二个自我合为一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我，这样就会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最伟大的创造者或主人（"科尔泰-科尼尼"，"齐马阿"）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这时时间和空间都不复是障碍。斯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桑海王朝因他而得名的祖先。"恐怖是斯依的父亲，即雷电的父亲。牙痛时，他嚼砂石；眼痛时，他喷火焰。他脚跨大地。他无处不在，又无处能见"。

一个集团以这种方式感受的社会的时间，即历史，集中权力，这种权力通常由长老、氏族首领或国王传给继承人一些物品作为象征和具体形式。它也许是一颗珍藏在"托巴勒"或战鼓里的金球，加上狮子或大象或豹子身上的某些部分。它也可能保存在盒子或箱子里，如莫西国王的王权标识（"梯博"）。在桑海人和扎尔马人中间，这种标志是一根一头尖的铁杆，在古代的加奥帝国的索尔科人中间，则是一个大鱼形的偶像，鱼嘴上衔着一个圆环。在煅铁的人中间，该标志是一台神秘的煅铁炉，它有时在夜间又红又热以表示愤怒。传授这类东西成了权力的合法传授。最突出的例子是索尼·阿里的后裔索宁克人。他们传授的是金链、银链或铜链，链条的每一环都代表一位祖先，整条链条代表索尼大帝以后的各个王朝世系。这链条是巫人在神秘的仪式上从嘴里吐出来的，使观看的人惊讶不已。当一个索宁克族长老临死时，最后一次吐出链条，由他选定的继承人衔着链条的另一端把它吞进肚里。把链条传给继任王统的人以后，他就立即死去。这是一种实物遗嘱，非常清楚地说明非洲人对神话式的和社会的时间的概念的力量。

有人认为，对历史进程的这种观点是静止的，无结果的，因为它把完整的原始模型放在遥远的过去，放在时间的起源。这样，就似乎给一代代后来人树立一种理想，这理想就是一成不变地重复祖先的行动和功绩。这样，神话就成了历史的动力，而历史本身是不动的。但我们可看到，非洲人的历史观不能仅从这样一个途径来解释。

还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历史起源都有神话式的解释。每一部历史都是以宗教的历史开始的，而且，这种观点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并以各种奇异或惊人的形式经常再现。这种形式之一是民族主义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一个著名的现代国家元首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一个人而对他讲话。在纳粹政权下，种族的神话——种种可以追溯到洪荒时代的仪式赋予它具体的形式——使千百万人遭到了浩劫。

非洲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是自己历史的动力？

的确，许多世纪以来，非洲人因多种原因未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一直习惯于来自外界的外邦人的命令，命令多得出奇，使得它们纵然住在远离奴隶海岸或远离白人官员地区，灵魂上也势必烙有致命的奴隶烙印。

同样，在殖民地以前的时期，非洲许多几乎是封闭的基本社会单位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们的成员仅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和深度内才意识到创造历史，而且通常只是在大家族居住的区域范围内，在传统的长辈统治的统治集团的范围内，而这种统治集团的统治是严厉和暴虐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水平上(也许特别是在这个水平上)，自治感、团体的自动调节感也是生动活泼的、有力的。洛比和卡布雷族的农民如果在自己村里是家族的主人，[①] 他就感到自己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在这类“无国家”的地区，权力分享的范围最广泛，入侵者、尤其是殖民者要想在这里立足，是困难重重的。在这里，对自由的热爱是热爱主动精神和憎恨异族的证明。

另一方面，在结构高度严密的社会集团里，非洲人对首领的概念使首领在国家历史上占有被夸大了的地位，他完全成了国家的集体命运的化身。因此，人们在发现《松迪亚塔赞歌》有了追溯马林克人最早的全部历史的口头传说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尼日尔河湾的桑海人中间流传的有关索尼·阿里的传说也是如此。它并不是扼杀任何批评精神的思想桎梏，尽管在一个口头传说是传送消息的唯一渠道的社会里，当权者控制着一大批民谣歌手，对官方“真理”的传布几乎拥有垄断权。但是民谣歌手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固有团体。

殖民以前的非洲的后半期的历史表明，非洲领导人在人们脑海中的地位大概没有被夸张。沙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战斗的动荡中确实是他建立了祖鲁国家。

文字和口传材料告诉了我们关于沙卡的事迹，这肯定是在非洲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再创作的。我们听说，曼丁哥族的宪法在松迪亚塔时代就制定了，而奥塞·图图和阿诺基埃在阿散蒂“国家”的创建中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合乎阿散蒂人自己至今仍持有的建国观念。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作为历史动力的领导人的概念从不会降低到过分简单的地步，以至把整个人类的进步归功于一个人。几乎永远有一个生气勃勃的负有如此盛名的集团。首领的同伴们并没有被遗忘(即使他们处在较低的地位，如民谣歌手，发言人或仆人)，他们常常是历史中的英雄。

妇女也是如此。与人们一遍遍重复的情况相反，她们在非洲人的历史意识中所占的地位比她们在其他地区的姐妹的地位更重要。这在母系社会是容易理解的。在特腊(尼日尔)附近的万扎尔巴村，酋长世袭权属于母系。在殖民时代，法国人曾试图通过任命男子当酋长来使这里的人与其他地区一致。但是索宁克人[②] 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卡赛依，即女巫师。女巫师至今仍是精神权力的源泉。其他地区的人也认为，妇女在国家历史进化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48

国王的女儿、姐妹、妻子和母亲处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可以影响一些大事件。吕吉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她曾先后是国王的女儿、妹妹、妻子和母亲，完全无愧于她的称号——“斯瓦娜·穆隆达”，即隆达之母。在十五世纪，著名的阿米娜代表扎里亚征服了豪萨国的许多村镇和土地，这些地方至今仍以她的名字命名，妇女能够对非洲社会施加影响的历

① 班巴拉语中的词汇“索-蒂长，多古-蒂法”(村长)、“迪马尼蒂法”(乡长)和“凯莱-蒂法”(大酋长)都表明了这种权力的力量。

② 在这些人当中，权力是“通过乳汁”传递的，尽管他们公认血缘联系更加强了世系；但在索科人中间，权力只通过乳汁而代代相传。

史权威思想这类例子数以千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今天，由于妇女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以及在撒哈拉南部为独立进行民族主义斗争的政党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思想在非洲仍然存在。的确，非洲妇女也是玩物和装饰品，正如我们在看到达荷美国王在穿着进口衣料的贵妇簇拥下主持宴会时所想到的那样。但是，就在同一仪式中，还有强悍的女战士，她们在反击奥约人和反击入侵的殖民军的卡纳战役（1892年）时是勤王军的尖兵。非洲妇女通过她们在农业、手工业和贸易中的活动，通过对她们儿子——不论是王子还是农夫——的影响，通过她们创造文化的活力，历来被认为在非洲人民的历史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永远有为妇女而进行的战斗或由妇女进行的战斗。妇女自己也常常扮演卖国者或诱惑者的角色（如松迪亚塔的姐妹）或者类似塞古国王达·蒙宗送到敌人那里去的妇女的那种角色。

尽管不准她们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非洲人都知道，妇女是无所不在的。妇女就是生活，是更丰富的生活的希望。各民族通过妇女维护了联盟关系。在公共场合，她可能很少开口，但是在家里，她掌握着全家的喜怒哀乐。正如谚语所说："妇女能成事，也能败事。"

总的来说，在非洲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好象一直保持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因此非洲的历史进程就成了一个具有明显普遍性的进程。由于社会单位小，历史成了每个人的事。虽然缺乏高效的通讯工具（尽管非洲人用鼓语传递信息），但历史空间的有限性意味着，它是在每个人的智力范围内的。因此，非洲人的历史观念大部分无可争辩地具有民主特点。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重要，都感到自己至少能把退出和逃亡他乡作为逃避专制统治的最后手段。沙卡在他的事业终了时就有过这种经历。这种创造历史（即使在村子的小天地里）的感觉，以及，另一方面，觉得自身在一个被看作创世者的国王高高在上所创造的历史洪流中只是一个原子的感觉，对史学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事实，从而又反过来帮助创造历史。

非洲人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

但是非洲人的时间能被认为是历史的时间吗？有人说不能，因为非洲人只把世界看作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翻版，以致成了过去世界的顽固信徒，要用"我们祖先就是这样干的"一句话来验证他的一切行动。如果确实如此，那末伊本·巴图塔就不会发现马里王国，而是只能发现住在洞穴、身披兽皮的史前公社了。

非洲人的历史概念的社会性本身就赋予这种概念以历史性，因为历史就是一个集团的生活的演进。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可以说，对非洲人说来，时间是能动的。人不是原地踏步的囚犯，也不是命定要根据传统观念或伊斯兰信条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件事的。

当然，在缺乏由特殊工具计量和组合而成的统一单位造成的数学的和物理的时间概念的情况下，时间仍然是实用的和社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因此就是静止的和中性的。在黑非洲对于世界的全面概念中，时间是一个舞台，人们永远可以在这里为反对削弱他们的生命力、争取增加他们的生命力而奋斗。这是非洲万物有灵论的主要特点，[3] 这一理论

[3] 万物有灵论，其实也可以说是传统的非洲宗教，特点是崇拜上帝和属于中间的精灵的力量。

认为，时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市场，在那里，栖居于世界的各种力量互相斗争或互作交易。个人或集团的理想都是要保护自己不遭任何削弱，要使自己更健康，更强壮，要使自己的田地更多、家畜更兴旺，子女、妻子和村庄也越来越多。

桑海人(尼日尔)的塞科氏族和索宁克氏族是冤家对头。前者代表过去，企图统治黑夜。他们进攻社会。后者是白昼的主人，代表现时，保卫社会。

这里有一份引自桑海人法术咒语的重要资料：

50

它不是出自我的口

它出自 A 的口

A 把它给了 B

B 把它给了 C

C 把它给了 D

D 把它给了 E

E 把它给了 F

F 把它给了我

我的它放在我口中也许胜似在祖先口中。

非洲人总是从过去寻找证据。但这篇咒语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也不违背进步和力量成长的总规律。因此咒语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它在我口中也许胜似在祖先口中。"

在黑非洲，权力往往用一个意味着武力或力气的词来表示。[④] 这种同义词显示了非洲各族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武力——即使不是对暴力——的重视。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粗野的物质力量。它指的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包括各种多价的力量，从强健的体力、机逸、直到完美的道德。道德价值被视为用权力行仁政的必要条件。许多故事中述说的民众的智慧是这种观点的见证，这些故事描写了专制的酋长最终受到惩罚，从而明确地刻画了历史的道德。在《苏丹史》和《法塔史》中充满了对哈吉·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品德的赞扬。的确，两个故事都没有忘记物质利益，但它们条理分明地把统治者的道德与他们的幸运连在一起。在穆罕默德·贝洛身上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思想，他敦促亚库巴·巴瓦特奇去思索桑海帝国的历史。由于他的公正，穆罕默德·阿斯基亚不仅保留而且扩大了索尼·阿里留下的遗产。到阿斯基亚的儿子们违反了伊斯兰的公正教义时，他们的帝国就分崩离析，成了若干弱小的土邦。

奥斯曼·登·福迪奥的儿子认为，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政府："回顾过去，看看所有那些在我们以前统治过的人，……在我们以前有豪萨国古老的诸王朝。在它们中间，许多人掌过大权，但是这些权力崩溃了，因为他们背离了正义的基础，背离了习俗和传统，因为它们被正义削弱了。如果我们要长久地立足于世，我们的力量必须是真理的力量和伊斯兰的力量。我们杀死了云法，[⑤] 毁灭了纳法塔、[⑤] 阿巴希[⑤] 和巴瓦·赞格奥佐[⑤] 的事业，这甚至会给处在伊斯兰影响之外的当代人留下印象，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看到这一切。他们将根据我们留给他们的组织机构的价值来判断我们，根据我们所确认的伊斯

④ 在班巴拉语、莫雷语和萨莫语中，分别用"方加"、"奥安加"和"潘"来表达这个词。

⑤ 戈比尔(Gobir)的王子们。

兰永恒力量来判断我们，根据我们在国内实行的真理和正义来判断我们。”

51　这种有关伦理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高尚观点不仅来自索科托领导人的伊斯兰信条。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中也有这种思想，即宇宙力量的秩序也能被不道德的行为所搅乱，因而出现的不平衡只能伤害肇事者自己。在对世界的这种看法中，道德价值和道德条件构成宇宙秩序本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看来也许很神秘，但它对人们的行为，尤其对许多非洲政治领袖的行为产生了客观影响。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这样说：虽然历史往往是过去的验证，但也是对将来的规劝。在前国家体系中，道德权威能保证对公共事务的掌管方式，也能惩罚执掌公共事务的人。这种道德权威属于特殊的，有时是秘密的集团，如塞努福人的“洛”或上几内亚的“波罗”。这些集团常常成为人们能够在既定制度以外向之求助的平行权力。有时，这种集团到了最后便秘密地篡夺官方的权力，那时，人们就把它们看作是夺取本民族对自己历史的控制权的秘密决策中心。

在同一类型的社会中，按年龄划分集团对建立了人民的历史极为重要。这种结构(就符合一个已知的周期性而论)，可把历史追溯到十八世纪。但同时它在社会本身的生活中也起了特殊作用。甚至在对重大技术发明一无所知、因而十分稳定的农村公社中，不同辈人之间的冲突也非罕见。所以，必须控制住冲突。于是不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构：它能使冲突不致于恶化成暴力对抗或突变。主管大事的一代派一个成员作为代表到下一代接班人那里，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年轻一代的急躁，而是去引导他们那无穷的精力，使之无害于整个社会集团，又不伤害年轻集团将来担负公共责任的能力。⑥

非洲人对已流逝的时间感受很深，但是已流逝的时间虽然对现在的时间影响很大，它仍未失去它的生命力，许多谚语已证明了这点。正如人们所了解的，时间概念在非洲社会中肯定不是非洲人某些特别固有的或与之合为一体的。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定阶段的标志。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人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的非洲城市居民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点与他们在丛莽中的同时代人和兄弟对时间的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别。历史时间的基本要素是对一个其起源还有待探索和检验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即使是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传说和神话的背后，也可看到一种想为社会发展找到合理解释的企图。有时甚至有人进行更积极的努力，试图计算历史的时间。这可能要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如把一段非常短的时间说成是需要举步的时间。它也可能与生物学相联，如呼吸的一呼一吸。但它常常同那些与个人无关的因素相联系，如宇宙的、气候的或社会的现象，尤其是当这些现象重复发生时。在苏丹的热带大草原上，传统的非洲宗教信徒常常用雨季来计算年龄。为了表示一个人已到垂暮之年，人们说他已经过了多少雨季，或者更干脆一些说：“他已经喝了许多水”。

52（页边码，位于“志。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一行旁）

有时尝试一些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⑦，但是只有到书写文字传播以后才出现决定性的

---

⑥ 如费苏(阿比让附近)的阿拉迪亚人至今仍组成五代，每一代统治九年，甚至负责管理现代活动，如建筑，为颁发证书、提升职务而举行的庆祝仪式等等

⑦ 艾弗·威尔克斯(Ivor Wilks)在批评D.P.赫尼奇(D.P.Henige)所著《口头传说编年史》：《对比火女怪的探索》一书证明，阿肯人(芳蒂族、阿散蒂……)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历法，一周七天，一个月六周，一年九个月，这一历法用尚未被完全理解的方式按太阳历以有规则的排列。“例如，阿肯人的历法可以用来查到阿散蒂亨·奥赛·邦苏(Asantehene Osei Bonsu)统治的第四个月的第十八日”。在第十八、十九世纪这种记年方法在欧洲国家仍有使用。见I.威尔克斯，1975年，第279页及以下各页。

步骤，尽管有了一个识字阶层并不能保证全体人民都意识到有一部共同的历史。但它至少能建立一些使历史得以围绕它们而成形的参考点。

引进其他民族历史固有的一神教曾为集体的往日的精神形象提供另一套能常在各种故事中窥见的模式。例如，各王朝常被武断地与伊斯兰教的起源相连，黑人先知们曾利用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去改变他们本国发展的进程。

但是，时间中的最大动荡是来自物质利益世界的出现和金银财宝的聚敛。接着，外界文化的传入把个人的和集体的时间感变成了抽象图样，在那些经济和文化上影响非洲人的国家中起作用。

于是，非洲人认为，金钱创造历史。非洲人曾如此接近自己的历史，甚至感到自己似乎在他的小天地里创造着历史。但是，现在他既面临着危险，也面临着机会：处于异常孤立地位的危险，具有共同推动世界进步的机会。

（龚晓庄译）



照片 2.1 铜像，象征达戈尔桑海王朝的权力(A. 萨利富)

54

3 非洲史学史的最近趋向及其对总的历史的贡献

P. D. 柯廷

本卷和以后各卷一样，都计划用非洲的观点来阐述非洲的过去。这是一种正确的想法，也许是国际上通力合作的唯一可能采取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非洲和世界各地的非洲史学家的主要研究方法。对于非洲人来说，了解他们自己社会的过去，是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这对于在一个形形色色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具有自我意识是至关重要的。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近数十年来非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昂贵的装饰品放在一边，坐等牢固地掌握更迫切的发展情况再说。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史学家首先考虑跨越殖民史的残迹，并从非洲各民族的历史经验重新开始的原因。其它各章和其它各卷将叙述这种恢复的状况，叙述作为仍在繁荣的活的传统的历史，叙述历史知识在为独立的非洲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所起的作用。但是本章所谈的是非洲历史的意义，首先是对国际史学家社会的意义，其次是对非洲以外的广大教育界的意义。

非洲历史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被严重忽视，这只是历史研究中大量现象的一个征兆。正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非洲的殖民阶段遗留下了一份有待纠正的知识遗产。欧洲人在十九世纪征服并统治了亚洲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在热带美洲，虽然按国际法惯例来看有一些独立国家，但是它们的不发达现象和欧洲人统治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现象，又产生了殖民主义。历史知识方面的殖民烙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表现为一种虚伪的观察方法，即欧洲人统治时期建立的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这种观察方法当时通过欧洲人在殖民地建立的教育制度向外界传播。即使在欧洲人从未统治过的地方，欧洲的知识，包括欧洲中心论史学史的各个方面，也往往被当作现代知识而加以接受。

55

只是在最近的历史研究中，欧洲中心的世界观才消失了许多，但是它仍然支配着许多史学家，而且象在西方世界① 一样，支配着非西方世界的广大公众。这种现象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学校里"学历史"，而在以后的生活里却得不到重新学习的机会。甚至搞研究工作的史学家有时也会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外很难跟上新的研究成果。教科书一般都比最新的研究成果落后十年到二十年，而其他一般历史著作经常带有过去研究的陈腐偏见。任何新解释，任何新材料，几乎都要通过一番斗争才被接受。

尽管作为一种普通知识，从发现到接受要延误一段时间，但是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两个方面的革命，这种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到现在尚未完成。这

① 本章所用的"西方"一词是指世界的下列地区，即文化上属于欧洲或其文化主要来自欧洲的那些地区，包括美洲、苏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种革命一方面是把历史从编年纪事转变成与人类社会变革相关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是用一种放眼世界的广阔观点来代替民族偏见。

对这些新动向所作的贡献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欧洲本身，有的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史学家，有的来自北美和大洋洲的欧洲侨民。他们努力扩大历史学的视野，使之不仅包括以前被忽略的人民和地区，而且包括以前埋藏在狭隘的政治史和军事史里面的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对非洲历史有较好的了解就会成为一种可贵的贡献。但是，这也许会使非洲史成为另一种地方观念的历史，对自我了解有足够的价值，对非洲的发展是一种帮助，但是，对世界史的新观点来说却不是最有意义的贡献。

的确，历史学的地方主义是旧历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积习之一。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好的历史学才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古老的情绪，即认为历史学是半私人所有，任何特定社会的历史只对该社会有价值，与其它社会无关。如果外国人对某国历史有了兴趣，最好的情况是被认为多管闲事，弄不好会被认为搞学术间谍。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传统特别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点。各教育部门倾向于给历史下定义为民族史——甚至不是欧洲通史，更不是全面观点的世界史。历史被有意识地神话化，以建立民族骄傲和为本民族事业而甘愿献身的精神。正如麦考莱勋爵指出的那样，历史部分是叙事的艺术，部分是"伦理和政治教诲的工具"。② 它被用来反复灌输爱国主义，而不是给人一种关于人类发展的全面观点。这种态度现在仍然支配着绝大多数的教育系统。 56

少数史学家以学术名义表示反对，还有少数以帝国主义名义表示反对，但是绝大多数人把这种民族偏见当作正常的如果不是所希望的现象加以接受。在法国，有一点关于法国疆界以外的欧洲的知识，就可得到史学教师的学衔，更不用说具有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知识了。在英国一些大学里，仅有英国历史的基础仍可得到文学学士学位。用英国一词而不称不列颠就是一种征兆；英国小学生关于罗马史的知识很可能比关于十八世纪以前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的知识还要多。东欧的情况也如此，虽然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有欧洲一些小国家，如比、荷、卢集团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似乎倒放手把重点扩大到整个欧洲。不过，北美对文明史的研究方法(欧洲的同类作品也是这样)仍然以种族为中心，对问题的提法是"我们是如何从过去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而不是"人类是如何发展成今天这样的?"

转向世界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史上将起国际上公认的作用)的观点的任务部分地属于上述各洲文化中出现的史学家，他们逐渐摈弃了自己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但这一任务更属于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突破文化界限的史学家——属于开始撰写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洲史学家，属于开始把非洲史或亚洲史向本国同胞进行解释、有意识地使自己摆脱古老欧洲中心论偏见的欧洲人或北美人。

非洲的和世界各地的非洲史学家的作用，在这场共同的奋斗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非洲史比其它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更被忽视，还因为非洲史更受种族主义谎言的歪曲。种族主义具有变化多端的特性，因此是一种非常难以消除的灾祸。十六世纪以来种族主义有各

②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35年2月2日关于印度教育的谈话记录被广泛翻印，最近菲利普·柯廷(P. D. Curtin) 1971年第182页及以后各页都曾引用。

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有些非常极端，在某些时期内导致种族的灭绝，特别是贩卖奴隶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今天仍然作为一种可怕的挑战在南非和其它地方残存着，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③ 和其它机构曾论证过它的无理性本质。根除偏见需要很长时间。种族主义渗透并充斥在学校教科书里，使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影片充满偏见，并且还影响着不完全自觉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时是由于宗教教育，更经常地则是由于无知和蒙昧造成的。在这场战斗中，科学地讲授各民族历史是一个具有压倒一切战略重要性的武器。十九世纪西方关于种族的假科学理论，即根据形体不同、衡量能力高低决定人们的地位，由于形体上最明显的差异是肤色，他们自然把非洲人放在等级的最底层，因为他们好象和非洲人区别最大。他们不断宣称非洲史不重要或没有价值，因为非洲人不能产生真正的文明，任何值得称赞的品质一定是从他们邻居那里得来的。非洲人因而成了历史的对象，而从来不是历史的主体，因为他们被认为只能接受外来影响，对整个世界没有丝毫贡献。

假科学的种族主义早在本世纪头十年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中间衰落下来，而真正从受人尊敬的科学界销声匿迹则是1945年以后的事。但是，假科学的种族主义传统却继续存在着，城市种族关系的日益紧张，在民间知识方面支持了这一传统，因为在西欧城市，非洲和亚洲裔移民大量增加——而且人们偏见的迹象依然明显。它所以受到支持，还因为人们一直记得他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受教育的人(那时假科学的种族主义是生物学公认的原则)，在六十年代才刚刚到退休的年龄，而更为无形中保留下来的事实是，支持种族主义的证据消亡之后，建立在这种证据上的理论却仍能存在下去。“因为非洲人是劣等民族，非洲没有重要的历史。”这种命题站不住脚了，但是西方知识界却依然隐约记得“非洲无历史”这一概念，即使他们已经忘记为什么有这一概念。

在这种看法和其它看法中，种族主义的传统又加强了依然存在的文化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于认为西方的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在六十年代后期，英国广播公司摄制了一套很长的电视系列片，片名叫做《文明》，它所谈的完全是西欧的文化遗产。有时其他一些社会也被当作是文明的，但在本世纪中期，文明与不文明的界限，一般是以有无文化来定。这样就把殖民时期以前多数没有文化的非洲社会定为原始类型。但是，从拥有一些学者能读、能写这个意义来说，非洲的大部分，事实上是有文化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有文化，因为大众有文化在任何地方都是工业化以后的现象。埃塞俄比亚有它的古代文字盖埃兹文。整个伊斯兰非洲，从北部沿海、撒哈拉、苏丹北部边缘从塞内加尔到红海，以及东部海岸以下到莫桑比克海峡的沿海城市，都使用阿拉伯文字。早在殖民时期以前，阿拉伯文就随着久拉商贩进了热带森林，而葡萄牙文、英文或法文则被当作西部沿岸贸易用的正式书写文字。但文化沙文主义加上无知使得西方当局仍然在沙漠的边缘划了一道有文化和无文化的界线，从而把北非历史和大陆其它部分历史分开的不幸倾向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是，把“未开化的”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仅仅是西方广泛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西方大

③ 参阅第十一章。

众也被排除在外，这也许不是出于明显的阶级偏见，而是由于历史学的说教性质，每次对名人的颂扬都提出仿效的榜样。榜样通常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历史成了叙述少数上层人物的事件，这已不是偶然现象。它低估或全部删去了影响社会大众的那些行为类型。知识分子的历史并不是反映人民思想的历史，而是伟大思想的历史。经济史不是经济的或经济行为的历史，而是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私人公司和经济生活中革新的历史。如果欧洲的史学家对自己社会的大部分基本上不感兴趣，他们对其它社会或其他文化也不可能有很浓厚的兴趣。

在这一点上，最近的历史研究有两种并行的革命性倾向。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和上层人物的历史出于同一个根源，但是为西方社会寻求更宽广领域的人和在西方之外寻求更宽广的历史研究领域的人很晚才开始在工作上进行合作。最初，他们都在各自的阵地上前进。非洲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击退那种认为非洲无历史或没有值得了解的历史的论断。首先，最容易的是按反对派的说法加以驳斥。如果反对派宣称非洲无历史，非洲的专家就可指出一些王国和庞大帝国，说明它们确实有一部读起来和欧洲史早期情况相似的政治史。可利用西方公众(和西方培养的非洲公众)优越感的偏见，作为一种手段用来证明非洲历史归根到底是重要的。但是，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论据，因为这只涉及非洲过去情况与西方过去情况相似的一面，没有真正答复不同文化的误解所产生的问题。在恢复非洲史的初期阶段，很少史学家认识到帝国往往是残暴无情的制度，不一定是政治进步的一种标志。例如，很少有人准备承认非洲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巨大成就可能是基于合作而不是基于压迫的没有国家的社会，不用说非洲各国的组织是为了保持真正的地方自治这一事实。

这种接受旧日编史工作某些方面的倾向作为非洲史的非殖民化的第一阶段，已对殖民时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已经有了一部现成的"殖民"史，它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欧洲人的活动而忽略非洲的因素。最坏的例子，就是把非洲人说成是野蛮人，他们的意志和判断力是薄弱的或错误的。因此，这意思是说欧洲来的优秀人种来从事非洲人还不能替自己干的工作。殖民史充其量只能让非洲人在历史舞台上担任二流角色。

纠正这种观点的第一步只是改变价值观念的判断，角色不变。探险家、殖民统治者和军官成为残酷的剥削者，而不是向文明进军的英雄。非洲人成了无辜的牺牲者，但是他们仍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小撮欧洲人和过去一样仍被描绘为创造非洲历史的主力。(在殖民阶段的历史中，欧洲人有时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每当根据地方一级的新研究所作的修订，都表明欧洲人的作用远不如在1960年以前左右出版的殖民历史中所表现的那样重要。)

对殖民时期的历史进行非殖民化的第二步，是同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来到的。这时，非洲人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对这种作用给予应得的估价也是恰当的。在独立运动时期从事写作的政治学家是首批进入这个领域的人。④稍后，主要是在六十年代，学者们开始从时间上向上追溯，以查明殖民时代初期抵抗运动和抗议运动的根源，或者更早

④ 例如：见T. 霍奇金(T. Hodgkin)，1956年；D. 埃普特(D.Apter)，1955年；J. S. 科尔曼(J. S. Coleman)，195[illegible]年；C. A. 朱利恩(C. A. Julien)，1952年。

时期的对欧洲统治的最早抵抗的真相。⑤这些关于抵抗和抗议运动的叙述对非洲史是一项重要的纠正，但仍不足以得出公正持平的看法。

殖民时期非洲史的最终非殖民化，将不得不等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革命同反对上层人物的革命结合起来以后才能实现。这种态度上的革命已经开始对非洲史的编纂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最近才发生的，范围有限，研究成果多数尚未出版。某些史学家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利用农业史和城市化历史等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贡献。而另一些人则开始着眼于单一的小地区，期望通过微观的研究来说明更大和更复杂的社会或经济变革的模式。⑥这种研究已经开始有力地推动经济史和宗教史的某些专题，但是在这些领域中，非洲史的真正非殖民化才刚刚开始。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分析史的逐步发展。分析史也是一种实地考察的历史，即不仅埋头于档案的口头采访和现场调查的结果。不依靠档案资料对殖民统治阶段和档案材料比较少的殖民统治以前的阶段一样也是重要的。"殖民史"的问题始终是，建立档案和留下记录的人都是外国人。这些记录对他们自身，对他们所统治的人，以及对二者的作用等等都必然反映他们的偏见和态度。欧洲或北美的政府记录也是这样，那里的偏见就是亲政府，会给殖民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如果史学家向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活人进行口头采访后吸取另一种观点，更加如此。

非洲史学家是利用口头传说的先驱者，对殖民时期不如对殖民前期利用得多，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担任的。从大约1890年到1914年之间，一代为殖民政府服务的学者兼政府官员开始记载关于重要史实的口头传说。第二部分人则在过去15年内出现。五十年代的这10年是以G. P. 默多克1959年的论断结束的："当地的口头传说完全不可靠。"⑦六十年代初出版了简·旺西纳的《口头传说：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一书，该书表明，要使口头传说成为可靠资料，就必须进行批判性的控制，最近一些历史著作是根据口头传说写成的，经常与其它资料一起使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⑧

国际非洲学会1961年召开的关于热带非洲史学家这一专题的达喀尔讨论会，以及1965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关于非洲史新观点的讨论会，着重强调了需要采取新的研究方法，还特别强调了口头传说作为非洲史资料来源的独特作用，以及史学家从来源于口头传说的语言学和考古学可能得到的全部好处。

非洲史学家早已通过他们关于殖民以前时期的著作，影响了其它社会科学。这种影响表现在多方面。最大的影响面是迫使传统的非洲不是静止的这一点得到了承认。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都倾向于使用"以前"和"以后"两种模式，"以前"是指被认为实际上一成不变的传统社会，面"以后"则是指出现巨大变化的现代化过

⑤ 例如，见G. 谢泼森(G. Shepperson)和T. 普赖斯(T. Price)，1958年；T. O. 兰杰(T. O. Ranger)，1967年；J. 艾利夫(J. Iliffe)，1969年；R. I. 罗特贝格(R. I. Rotberg)和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1970年；伊夫·佩尔松(Y. Person)，1968-1970年。

⑥ 见P. 希尔(P. Hill)，1963年。

⑦ 乔·彼·默多克(G. P. Murdock)，1959年，第43页。

⑧ 例如：见J. 旺西纳(J. Vansina)，1973年；R. K. K. 肯特(R. K. K. Kent)，1970年；D. W. 科恩(D. W. Cohen)，1972年；E. J. 阿拉戈阿(E. J. Alagoa)的工作，部分在1971年阿拉戈阿书中作了概括叙述。A. D. 罗伯茨(A. D. Roberts)(编辑)，1968年；D. T. 尼昂(D. T. Niane)，1960年。

程。史学家作为对变化的研究者，寻找人类社会不断发生的变化，他们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非洲殖民化以前的机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宗教以及经济同其他处于农业和工业革命之间的社会一样，以同样快的速度变化着。变化速度虽没有工业化以后时期的速度那样快，目前这种情况影响着工业化的非洲，但"传统的"过去是静止的说法，再没有人接受了。

静止的传统思想或观点给人类学家造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按一种社会模式进行工作，他们强调的方法是，文化总和中的每一部分都起着使总体成为一个工作整体的作用。他们承认，他们正在调查的非洲社会自从开始殖民统治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们在资料中把这一事实看作是一种不幸的异常现象。按照他们的看法，必须把国家调整到欧洲人征服前不久的一个短暂的平面上。他们认为，只要从现在观察到的材料中减去所有看来属于外来影响的东西，就能发现这一传统社会的本质。其结果就是他们所说的人类学的现状。

这种机能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统治英国人类学界的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他们好不容易才了解简单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机能主义者由于坚持不仅单纯询问资料提供者，而且通过参加观察，长期进行细微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其他重要进展。但也得出一些不幸的结论。这种方法导致一些人类学家去寻找简单的社会和孤立的文化。这种选择法给非洲一些大而复杂的社会的叙述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加重了原始非洲的神话色彩，从而歪曲了西方对非洲文化的认识。

从实际现状抽象出人类学现状所作的努力，还进一步加强了这样一种设想使得非洲社会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学家为了描绘其职能而努力使社会模式处于稳定状态，这使许多人忘记了，他们为进行分析而当作静止状态的社会实际上并不是静止的。最严重的是，静止的设想使他们无暇询问，他们细心研究的社会是如何或为什么发生变化的。如果问一问，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了。

不管怎样，没有历史的影响，机能主义无疑将继续照常发展。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关于文化适应性的研究，对它进行了修正，而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和他的信徒在战后年代里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人类学中和社会人类学的某些方面，殖民以前的史学家的工作曾帮助提醒他们注意变革的动力，并帮助人类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62

由于最近历史研究的影响，非洲宗教和宗教机构的研究工作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研究非洲宗教的人是寻求有信仰和有实践的静止团体的人类学家，或者是在研究他们想取而代之的宗教时接受人类学现状观点的传教士。他们都承认，伊斯兰教很有朝气，因为在殖民时期它比基督教传播的还要快；但北非和西非最重视研究伊斯兰教的工作是法国殖民政府，目的是防止可能发生的不同政见。这样的研究一般是集中在宗教领袖和团体上，而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过程。当然最近几十年来，不仅是史学家，还有其他几个方面，都恢复了关于非洲宗教变化的研究。神学家所关心的是具有一分基督教基础的非洲新宗教的发展以及从欧洲教会分裂出来的独立教会。关心文化变化的人类学家也进行类似的研究，而史学家最初由于关心宗教在殖民地反抗和抗议运动中的作用而积极参与。关于殖民以前的时

期，他们也逐渐认识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宗教改革的重大而明显的重要性。这使他们逐渐意识到非基督教和非伊斯兰教的宗教也在起变化，虽然各种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刚刚开始对各种变化的模式进行应有的系统研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当地的泛灵论宗教以及有时处于秘密状态的协会和社会发生了新的兴趣，因为他们在非洲各民族的发展中经常起决定性作用。

许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似乎能在非洲宗教问题上愉快地共同工作，广泛交流方法和思想，与此同时非洲经济的研究工作却陷于严重分裂状态。经济史学家，同宗教史学家一样，近年来已表示，非洲经济在不断变化，而且经济变化既由于内在的刺激，也由于海外的影响。但是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依然不考虑他们正在试图操纵的经济文化。他们倾向于不仅忽视已发生的变化过程，而且忽视经济人类学家提出的静止的模式。

63 这样做符合发展理论的下述目的，例如，认为非洲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目的，每一个家庭几乎生产本身消费的全部物品和劳务。赫拉·姆英特在六十年代中期特别宣扬这种观点和经济发展的剩余品出路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解放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基础上的。⑨事实上，在殖民以前的非洲，没有一个社团是在毫无贸易的情况下自给自足的，而许多非洲社会都有许多复杂类型的专业化生产，并向四邻输出。撒哈拉边缘的许多牧民每年所需要的热量半数或半数以上是通过用牲畜换取谷物而获得的。其他许多人经常生产并出售剩余农产品，以支付来自远距离贸易的特种产品，如盐、牛、西树脂、柯拉果或枣。非洲经济的静止状态的错误基础，当然是人们熟悉的原始非洲的神话，人类学家们寻找最简单的社团的倾向以及他们过去在资料中不考虑时间深度的倾向都加深了这种神话。

实地研究过非洲经济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当然承认贸易在殖民以前的非洲的重要性，而且少数人承认，在外国人大批出现以前，非洲经济已在以相当的速度起变化。但是也有一批人离开了经济思想的主要路线，不强调经济文化间的相似点而强调其差别。这批人有时被称为实质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实质，试图把人们满足其物质需要的方法同某一社会的广泛模式，而不同正式的理论相联系。他们往往认为，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他们的研究领域。⑩结果，在发展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发展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现实经济实况而采用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工作，而实质主义派则避开多种文化理论，强调微观经济模式。

迄今，经济史学家尚未弥补这一鸿沟，他们在非洲问题上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没有达到史学家对人类学或宗教研究那样的程度。近年来非洲历史已取得巨大进展，特别在开创新的方法，填补一些过去很少涉及的大的历史空白方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有时还落后于其他社会的编史工作中业已出现的变化。它对行为革命的挑战所作的反应，不如某些研究领域那样快。无论在政治史或历史计量经济学方面，它也没有跟上计量历史学所能做的激动人心的新工作。

---

⑨ H.姆英特(H. Myint)，1964 年。

⑩ 为便于概括这种立场，见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编辑)，1968 年。

随着非洲历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新的非洲史的影响取决于一支在教学和写作中以非洲史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史学家队伍。非洲史在西方之所以落后，甚至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编史工作还落后，是因为这项工作主要是一些非洲专业史学家搞的。这些人还依靠其他工作为生，在大学没有固定地位，因而很少有机会影响西方国家的历史专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东欧的一些研究所已开展非洲问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在高等教育的总计划中几乎总是占次要地位。因而不利于培养史学家。唯一的例外是埃及学和古罗马时代北非史的某些方面。此外，在 1950 年以前的非洲史学家中，专业史学家很少。有些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有些是传教士。其他的则是一些非洲人牧师和教士，他们用某一种国际语言写作，例如黄金海岸的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约鲁巴的塞缪尔·约翰逊或者塞内加尔的谢伊赫·穆萨·卡马拉。卡马拉的《萨瓦丁历史上花中之花》尚未全部发表，最近其他史学家才开始利用。① 某些人类学家也研究历史题材，但是在 1950 年以前，非洲没有一个大学为研究生在非洲专业方面开设过适当的课程。1950 年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专门从事非洲史写作和教学的专业史学家。二十年后，约有 500 名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资历的专业史学家主要从事非洲历史研究工作。 64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回想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在非洲、欧洲和北美——各大陆有各自的原因——从政治、知识以及大学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有利于涌现一支专业非洲史学家队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非洲的这种需要就明显了，当时至少是北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已可看出争取独立的运动迅速发展。到五十年代，新的大学建立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先在大学，然后通过师范学院直到中小学，设立一种用非洲观点说明的新的非洲史。翁伍卡·戴克是为再教育进行广泛努力的先驱者之一。他是伦敦大学正规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非洲史学家中的第一人。外籍史学家也作出了贡献，例如加纳大学(当时的黄金海岸)的 J. D. 费奇，塞拉利昂福拉湾学院的 J. D. 哈格里沃斯，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里格利和西里尔·埃利希。

在法语非洲，这种变化比较慢。在前法属诸领地独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依然是法国大学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们还保留着法国的历史课程。但是先驱者却在悄悄地编写非洲史。贡献明显的有：塞内加尔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上沃尔特的约瑟夫·基-泽博和喀麦隆的佩尔·昂热贝尔·姆旺。法语非洲的外籍史学家后来在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五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帮助扎伊尔洛万纽姆大学推广非洲史的简·旺西纳当时已在刚果和卢旺达的比利时政府研究机构工作。后来成为巴黎大学非洲史教授的雷蒙德·莫尼当时正在法属西非的达喀尔黑非洲基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伊夫·佩尔松当时还是一个殖民地官员，但已开始进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使他在 1968 年写成了《萨摩利》一书，并且使他在阿比让大学和达喀尔大学推广非洲史的教学中起了重要作用。《非洲的影响》通过它的杂志以及 1956 年和 1959 年分别在巴黎和罗马召开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两次重要代表大会，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65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在非洲开展非洲史有关。使非洲史对世界史发生影响的重要步骤是

① 塞缪尔·约翰逊 (S. Johnosn)，1921 年；克里斯琴·赖因多夫(C. C. Reindorf)，1889 年；C. M. 卡马拉 (C. M. Kamara)，1970 年。

在其它各洲开展非洲史研究工作，而这一进程几乎与非洲本身在大学提倡非洲史同时开始的。五十年代初，罗兰·奥利弗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教非洲史。在苏联，D. A. 奥尔德罗格和他的同事们在列宁格勒人种学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研究计划，随后用原文出版了撒哈拉以南非洲1500年或更早时期以来一切的已知文献，并译成俄文，加了注释。⑫在这十年中，巴黎大学设立了第一个非洲史讲座，不久又设立了第二个。一个由前总督贝尔·德尚担任，另一个由雷蒙德·莫尼担任。与此同时，亨利·布伦什维格开始在高等实验学院指导非洲史的研究工作，而罗贝尔·科纳万则出版了他的非洲史概论第一版，后来又多次修订和增补。

欧洲和非洲以外各洲的进展并不那样快，即使在欧洲，非洲史也是先在那些在非洲有殖民地的国家被列入大学课程的。人们本可以期待非洲裔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美洲会关心非洲史，但是巴西和加勒比地区对这点没有什么兴趣，尽管这里的非洲文化气息最强烈。从普赖斯·马尔斯博士二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开始，海地的某些知识分子对当地从非洲传入的民间文化表示兴趣。文化上的非洲－古巴主义对尼古拉·纪廉这样的古巴文学家的影响较大。但那里同巴西一样，对非洲－美洲文化的兴趣并未导致对非洲感兴趣，更谈不上对非洲史感兴趣。在英属西印度群岛，非殖民化，包括西印度群岛史的非殖民化，占有更优先的地位。但是政治性的泛非主义，在西印度群岛的知识分子中，却很少带有历史的含义，甚至到六十年代依然如此。

六十年代以前，美国在这方面的兴趣甚至更淡薄，仅有的兴趣也都是集中在北非。最近汇编的北美关于非洲史的博士论文篇数表明，1960年以前(包括1960年在内)完成了74篇。从表面看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但实际上是骗人的。因为大多数是关于北非的，而且几乎都是专攻古典历史和考古学、北非和中东史或者欧洲海外殖民地概况的史学家写的。他们进行博士学位研究时涉及到非洲几乎是一种偶合。只有少数编写殖民史的人在广义上可以称为非洲专家。先驱者之一是耶鲁大学的哈里·鲁丁，他在三十年代发表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史，到五十年代他更广泛地关心非洲问题了。作为集团来讲，美籍非洲人更为重要。W. E. B. 杜波依斯早期对非洲很感兴趣，虽然在1961年退休并迁居加纳以前，他没有机会积极从事这一事业。很久以前，1961年卡特·G. 伍德森创办了《黑种人历史杂志》。杂志内容主要的是谈美籍非洲人，而不是谈非洲人，但它正式规定要介绍非洲史，偶尔发表几篇关于非洲过去的文章。另外一个提倡非洲史的人是霍华德大学的威廉·利奥·汉斯贝里。他掀起了一个孤军奋斗的运动，为把非洲史列入美国大学的教学计划，特别是在南方各洲当时还处于种族隔离状态的主要是黑人的学院的教学计划中。

因而，在1960年以前，在非洲以外地区，已不同程度地为非洲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1960年前后短短几年中，北非和热带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使海外突然大肆报道起非洲来，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不仅对它的现状和未来发生兴趣，而且对非洲的过去也发生了兴趣。

1960年以来非洲史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失望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惊人的。例

⑫ L. 库贝尔(L. Kubbel)和V. 马特维也夫(V. Matveiev)(俄文)，1960年及1965年。

66

如，对非洲的兴趣最初仅限于对某一个国家的历史，最多也仅限于北非史。尽管在政治上强调非洲团结，但是北非的大学和学者在研究自己的历史时，用大陆观点处理问题进展很少。马格里布属于地中海世界，属于穆斯林世界，属于仍然以巴黎为中心的说法语的知识世界。这三个世界足以引起受过教育的人的充分注意。埃及官方发言人经常强调埃及既属于非洲也属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但是埃及的史学家却更具有地方观念，即使当阿斯旺水坝和在努比亚工作的国际考古队注意尼罗河上游时，也仍然如此。

67

南部非洲史学界的地方观念更重。欧洲人对南非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毫不放松的。在大学里很少注意非洲史。在那里历史仍然意味着欧洲的历史，在南非意味着少数欧洲人的历史。《牛津南非史》(1969－1971年)扩大了范围把占多数的非洲人包括进来，这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两个编者之一伦纳德·汤普森已不再在南非从事史学工作这一行了，而另外那位莫尼卡·威尔逊则是一位有历史头脑的人类学家。津巴布韦(或罗得西亚)的历史研究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把非洲简史包括进去，但是在白人少数派从英国统治下片面宣布独立以后，又逆转了方向。奇怪的是，按人口平均计算，津巴布韦的非洲史学者超过了南非，但大多数是在流亡中被迫从事这项专业的。

在非洲大陆上，非洲史的第一故乡是热带非洲。在独立后的头十年，那里取得了最重大的发展。非洲史已成为热带非洲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新的问题是调整，使地方史、地区史、非洲史以及世界史之间有一合适的平衡。简言之，这是一个对整个历史课进行非殖民化的问题，不仅是加上非洲的成分。变化最大的是非洲英语地区，在那里放松严格的欧洲标准的速度比法语国家快，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教学被新的课程所取代。英帝国史趋于完全取消，而英国史则同欧洲史合并。对非洲所教的欧洲史重新作了考虑，其趋势是把国别史放在从属地位，把城市化或工业革命等重大专题放在重要地位，要跨国界看问题。与此同时，非洲史学家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欧洲以外的历史——转向北方的伊斯兰世界的历史，特别强调它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影响；转向被认为同非洲具有相同经历的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历史，转向亚洲史，因为亚洲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作为非洲的学习榜样。因而非洲史的影响将全面确定对世界及其过去的看法，这种看法将真正是非洲中心的观点——不象欧洲旧传统只顾欧洲那样只顾非洲和非洲人，而是出发点以非洲而不是以欧洲为世界观的。

68

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即使在最先进的说英语的大学培养新一代具有创见的非洲史学家并按他们自己选择的新方向前进，不可避免的是需要时间。说法语的大学落后了十年左右。阿比让、达喀尔和卢本巴希(在历史学范畴内继承了洛万纽姆的传统)是最老的说法语的大学，直到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历史系教师才大部分由非洲人担任，而最老的说英语的大学在六十年代初就发生了这种变化。一旦非洲史学家在说法语的大学取得了地位，对历史的世界观进行类似的调整就有望了。然而法语国家的中学历史课程早在1963年就进行了改革。此后不久，大学历史课程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制定的大纲范围内也进行了改革。

非洲史对西欧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是与原来的殖民关系有联系的。这也是法国与英国成为欧洲的非洲史主要中心的一个原因。不过，非洲史教学在其它地方也取得了某些进

展，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在苏联莫斯科卢蒙巴大学系统地讲授非洲史，其主要任务是教育非洲学生。在其他地方，研究工作是由个别学者在一些分散的大学中心进行的，在一些按德国大学传统组织的研究机构中，进行得则更系统一些。后果是非洲学研究有些孤立。这很可能就是除英国和法国外非洲史未能进入很多欧洲大学的部分原因。

历史研究的一般传统在这些国家也是地方性的，但是他们首先对培养殖民地文职人员负有特殊任务。大约在1955年以后，这些文职人员开始被遣返，其中一些人留下来，从事新的职业，成了他们从前治理过的国家的史学家。法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德尚和佩松教授是突出的例子。对法国和英国都同样，五十年代非洲新的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意味着在非洲有就业机会。年轻的史学家在开始从事研究时选择了非洲方面的题目，或者在非洲教学时着手专攻非洲史。后来，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外籍史学家逐渐为非洲人所取代，一般是在非洲过了八至十年之后被吸收到宗主国教育机构工作。所有这些人并非都从事非洲史教学工作，但总数是相当可观的——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大学从非洲大学吸收60到70名史学家，约占英国大学这一期间聘请的史学家人数的8%－10%。1974年近代史(按传统是指英国近代史)有三个讲座是由专攻非洲问题的人担任的。现在估计从非洲重返英国这件事对英国历史传统有多大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很可能是很大的。

69

在法国，人数相对来讲少一些，从非洲回来的人在大学聘请的人员中所占比例也小一些。但进程是相似的。一代新的史学家开始注意非洲。在巴黎，几所大学和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都有一些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的学者，他们曾在不同时期在一些非洲大学服务过，并且同他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克斯、波尔多和利翁的情况也很相似。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就成了培养取代外籍人的非洲史学家的中心。⑬这就势必使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巴黎大学一些更分散的部门以及巴黎培养专家的研究生院担负起特殊的任务。例如，从1963年到1973年，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有58%首先到非洲任教。在这个总人数中，英国人不到20%，毕业后首先到英国大学任教的不到13%。⑭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对英国教育的直接影响，该院的非洲史学家的队伍是世界各大学中最大的。除该院外，伯明翰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都在他们所讲授的课程中给了非洲史特殊地位。此外至少还有八所大学都有一名非洲史专家经常在大学教授这门课。

英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水平，从英国在非洲大学结构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利益来看，是可以预见的。六十年代北美的非洲史学者队伍的壮大是无法预见的。其所以不能预见，部分原因是美国史学家在公正对待他们社会的非洲美国人的历史方面声誉不好。大量在美国的非洲裔少数民族始终也没有引起人们对非洲的显著兴趣，甚至没引起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大多数的兴趣。非洲史研究在加拿大和在美国一样突然出现了，尽管加拿大不象英国那样有统治一部分非洲的经历，也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少数民族。

70

⑬　我应向伊巴丹大学的J. K. 阿德·阿雅伊教授(J. K. Ade Ajayi)，向J. D. 费奇教授(J. D. Fage)和罗兰·奥利弗教授(Roland Oliver)致谢。感谢他们提供了非洲史对欧洲和非洲总的历史的影响的有关材料。这方面如有任何事实上和重点方面的错误应由我负责。

⑭　R. 奥利弗(R. Oliver)，1973年。

1960年以前，北美洲几乎不教授非洲史。1959年，非洲研究协会成立不久时，只有21个具有史学家身分的会员在美国或加拿大居留。其中不到半数在大学专教非洲史。1962年在阿克拉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洲学家会议，参加者有800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在开幕词中当众概略地叙述了为新非洲进行历史研究的职责。接着出现了一个剧变。到1970年，北美非洲历史和考古学专家的人数增加到350人。其中有些是原来学其他科目的史学家，后来改为从事非洲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但大多数是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学者。1960到1972年间，北美的研究生院培养了300多名非洲史博士。其中有些是非洲学生，他们都计划回非洲，有几个来自欧洲，但大多数是北美人，约相当于非洲裔美国人与欧洲裔美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即在美国约占10%，在加拿大则少得多。

非洲史在北美的发展是由历史研究中两种相反倾向推动的。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强烈表示这种信念，认为非洲史专属于非洲人民及其在其他大陆上的后裔，正如欧洲国别史专属于每个欧洲国家一样。非洲史为非洲服务的目的与非洲史在世界史范围内的目的之间的固有分歧公开化了。但分歧不一定是对抗的。这两种历史尽管对过去强调了不同的方面，但并不是势不两立的。

结果是，狭隘的种族中心论的历史观在北美受到了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的震动。在许多学校里，旧"世界"史实际上只是西方文明史，在六十年代让位于一种用世界角度去观察世界的新的、更真诚的尝试。由于这种努力，非洲取得了同南亚或东亚其他主要文化区域平等的地位。北美许多大学的历史系开始把旧的只划分美洲史和欧洲史的两种分类改为三种分类，使第三世界历史取得平等地位，成为历史研究中的第三分支。

这些变化还远未完成，但是，随着非洲史在英、法的传播和非洲大学历史课程的重新定向，上述变化在使非洲史对整个历史发挥影响的道路上却是重要的一步。能否成功最终将取决于编写他们自己社会的历史的非洲学者共同努力，取决于把非洲史介绍给其它社会的非洲以外的学者，还取决于扩大国际社会科学的程度，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人类社会问题时将不得不考虑把非洲资料作为适当基础。 71

（屠尔康译）

72

4 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

T. 奥邦加

历史批判的一般规则和历史的方法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史学家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手段，前者使历史成为一种文献整理技术，后者要求我们从人类所经历的漫长道路来研究人类社会。由于忽略了这一事实，西方史学家长期以来对非洲各民族不感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欧洲是历史的全部。虽然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态度反映了这样一种顽固的成见，即非洲没有任何真正的历史，因为那里缺乏文字材料和考古文物。

因此，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显然是确定资料，而这项工作本身关系到评价历史研究技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殖民时期结束以后，一批研究工作者出于一种新的强烈求知愿望，一劳永逸地为非洲史奠定了基础，尽管适合其需要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在探讨中。文献的范围很广，这使研究工作者向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随着非洲历史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它的变化也越多，并朝着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在过去十五年左右里，在研究手段方面发生了一场革命，有些手段现在公认对研究非洲史很有用，包括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学、考古学、古植物学、花粉学、能够测量绝对年代次序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自然地理和人类问题、人种和社会的考察和分析、口头传说、历史和比较语言学、欧洲文献、阿拉伯文献、印度文献、中文文献，以及适合计算机计算的经济文献和人口文献。

非洲史的资料就其范围而言伸缩性仍然很大，因此应不断探索智力合作的新型式，而这种新型式往往使迄今被认为互不相干的学科出人意料地联系在一起。各种资料的综合利用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创新。只有同时利用各种范畴的资料才能达到真正的暂时深度，因为孤立的事实容易停留在总趋向的边缘。各种方法的全面结合和各种资料的综合利用是非洲对知识和对当代史料认识的实际贡献。

73

史学家应同时对几个方面进行探求。他们的工作不限于确定史料，还必须用扎实的多学科文化来掌握人类的过去。历史就是现代人对整个过去的看法。

本卷将叙述专门适用于非洲史的大部分资料和技术，这些资料和技术分别来源于数学、地质学、原子物理学、自然科学、人类与社会科学。所以，我在本章集中谈谈其他各章未加阐述的一些方面和问题。

近年来在方法方面取得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无疑是将现代物理学应用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使用使我们有了确定年代次序的手段，碳-14方法可以测定智人的最早日期，钾-氩方法可以测定100多万年前的各个时期。

这些准确确定日期的方法现在可以大大缩短有关古生物和史前史问题的讨论。① 根据钾－氩方法的测定，我们纪元前530万年非洲就有了最早的原始人类。这是1971年布赖恩·帕特森教授在肯尼亚的洛萨加姆发现的带有一颗完整臼齿的原始人类下颚碎片的日期。另外，卡米耶·阿朗布尔和伊夫·科彭斯二人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和P.克拉克-豪厄尔带领的美国探险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奥莫河流域的维拉弗朗阶地层发现的原始人类的牙齿的年代为200万至400万年前。坦桑尼亚著名的奥杜瓦伊峡谷的东非人，用同样的钾－氩方法测定，已有175万年历史。

由于采用了钾－氩同位素测定方法，我们发现东非人（我们目前知道的最古老的人）的诞生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的诞生——因此普通古生物学越来越普遍承认一元论。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人们一直以种种不同方式对人类的起源提出这个关键问题："人类诞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而目前所知的非洲人的残骸化石提供了答案的实质部分。

把非洲排斥在历史领域之外的陈腐观念如今已经完全改变。人们通过使用各种资料和方法——上述例子所提的古人类学和原子物理学——所揭示的事实已经明确表明非洲历史的巨大跨度。非洲历史的起源与能劳动的人的起源是同时的。 74

从其他资料，如地球科学，得到的情况也有助于说明，非洲历史是独立于任何文字材料之外的。例如，如果没有自然地理学的帮助，就很难知道乍得盆地各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方式。因此，这个方法在方法论上的价值值得强调。

人类和其他生物在乍得盆地的分布是有规则的。这个地区从高度上看，情况大致如下：中间是海拔180到300公尺的沉积层平原，周围是有点不规则的古老的风化岩高原，被侵蚀的岩面往往被近年的火山灰所掩盖。这圈高原的平均高度为900米，连接高原和平原的是恶劣气候条件不断侵蚀的峭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能够吸收雨水的、由岩屑形成的沙质土壤地区，每平方公里为6至15人。在萨赫勒式气候的冲积层地区，人口也相当稠密，这里受到地下渗水和乍得湖的洪水的灌溉。在它东面和南面的达尔富尔和阿达马瓦高原（这里有乍得湖的支流），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1人。北部实际上已属于撒哈拉，人口密度更低。所以说，人口密度逐渐下降的格局同自然地理学和地形学问题有密切联系并以其为条件。

因此，在沙漠的侵袭下文明逐渐后退，退到不需灌溉便能种植玉米、高粱的地区，也就是大致退到新乍得这一纬度（在洛贡河和沙里河沿岸利用灌溉可以种植蔬菜、烟草和小麦）。农民、牧民和渔民生活在南部地区，因为这里有湖泊河流，土壤湿润，牧草常青，经常吸引大批渔民。而在北部的沙漠地区，水土流失造成土壤不稳定，植物稀少，只有适应干燥气候的荆棘丛。

这些地形特点还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譬如，侵略行动常常迫使当地农民从气候良好的高原和肥沃的平原退到不适合放牧的陡峭山区。富拉尼人就这样把布米人和杜鲁人赶到阿达马瓦最贫瘠的地区，把喀麦隆北部的基罗伊人赶到曼达腊山脉的花岗岩碎石地带。在这种贫瘠的坡地上，这些民族的劳动当然事倍功半，然而他们的原始工具却在这里取得

① 伯泽尔(J. B. Birdsell)，1972年，第299页。

了满意的成果。在冲积层地区常年的和季节性的沼泽地，蚊虫遍野。洛贡河和沙里河沿岸
75 的新淤泥地大量覆盖着低矮喜湿的柳属植物和含羞草，采采蝇在那里滋长，由此发生的疟疾和睡眠症使这些地区无人涉足。

简而言之，乍得盆地曾经由于气候的变化经历了几次第四纪变化，要充分了解那里的人类生活，史学家必须研究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各类专门资料和技术。目前各民族的分布、他们昔日的迁徙和农牧业活动等等，无不紧密地受环境条件左右。

乍得盆地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知识的探索摆脱狭隘的成见以后，就能取得使人豁然大悟的效果。奥莫河流域的尼扬加通人或布米人同肯尼亚西北部的图尔卡纳人有血缘关系。1971 年和 1972年 分别对他们中间的 300 人和 359 人进行了血液化验，发现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在免疫方面，不是表现在性别之间，而是表现在村庄之间。这些村庄的人口从 20 到 300 不等，以畜牧、农耕、采集食物、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按照严格的氏族体系组织在一起，但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在这种社会中，最高的首脑是长子。因此，在尼扬加通人的区域性社会组织中产生的这种差别可从血清学上得到反映：对虫传病毒抗原的血清反映图能准确地显示出受化验人的地区分布。②

寄生物学家同古人类学家积极合作的这个例子，对史学家很有教益，堪作楷模。对史学家来说，了解以下情况是很重要的：这种书面证据还存在而且可能与调查尼扬加通人的性行为和人口增长有关。

归根到底还是这样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和认识论的问题：非洲史的史学家必须注意各种分析方法，以便把工作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做得扎扎实实。

对于早期的历史来说，思想上不抱成见尤为重要，因为那时既没有文字材料，也没有口头传说。例如，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农作物在亚洲、欧洲和非洲是小麦、大麦和粟，在美洲是玉米，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远古时期最初的耕作制度。我们无法判断以抢掠为生的人同务农为生的人之间的差别，也无法知道各大陆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开始培育植物。在这些方面，口头传说和神话都无济于事。只有考古学和古生物学才能充分回答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无价遗产——农业——的重要问题。

在条件适宜的非酸性土壤中，花粉颗粒的外壳能够历久不损。现在已开始通过对植物
76 残体的显微分析进行古孢粉学的研究。用热氢氟酸或盐酸对土壤试样慢慢进行离析，可以取得花粉化石，酸性可剥离硅石和石灰石而不伤损花粉，继而剥离腐殖质。对残余物进行分离、着色和制成胶片。最后要做的只是分辨和计算花粉颗粒并列出百分表，从表上可算出沉淀物的花粉外形。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当地是否存在过农业，可以了解地形的变化，通过植被的变化断定气候条件，还可以发现人和动物对植物生长的可能影响。

这样的研究可使我们了解非洲食用植物的培育过程。它集中在几个中心，并向更广大的地区推广。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高粱(最先培育的是在乍得湖到埃塞俄比亚与苏丹边界的热带草原地区)、黍、非洲稻、饲料豆、油棕(在森林边缘地区培育)、粟子、秋葵和非洲甘薯。

---

② 参见昆虫学家弗朗索瓦·罗丹(Francois Rodhain)和人种学家塞尔日·托尔内 (Serge Tornay) 的著作。他们都参加过 1971 年和 1972 年由 M. 伊夫·科彭斯(M. Yves Coppens)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前往奥莫河地区。

美洲食用植物引入非洲比较晚，有具体文字材料提到这一点。例如，现在中非一些民族的主要食品木薯十六世纪以后才传到大西洋彼岸的刚果王国。1591年皮加费塔和洛佩斯在《联系》一书中关于生长在刚果王国首都刚果周围的高原的食用植物只提到下列几种：龙爪稷，其种子"来自尼罗河沿岸，在那里它布满了第二大湖"；③ 一种属于蜀黍属的草；玉米，"其价值最低，用来喂猪"；④ 稻子，"其价值也不高"；⑤ 香蕉和油棕。

人们不大知道的是非洲的食用植物也传到其他地方。毫无疑问，某些非洲的品种传到了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方，只是时间比较晚。在印度进行考古所获的证据表明，我们纪元前1,000年那里就有两种谷子（黍子和粟子）。高粱的出现比较晚，因为在梵语中没有这个词。

在缺乏文字材料和口头传说的情况下，这些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帮助史学家阐明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从搜集食物经济向生产食物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此外，与任何传播学派的理论相比，这些事实更能证明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间的往来关系。

猪、狗、羊的残骸说明，在中东新石器时代的中心，动物的驯化与农作物耕种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即我们纪元前9,000到8,000年之间。据此，人们推算出不同种类动物的驯化时间的理论编年。首先是象狗这样的食腐动物，其次是鹿和羊这样的游牧动物，然后是人们只有在定居后才能喂养的动物，象牛猪之类。最后驯化的肯定是挽畜，如马、驴和驼。但是，对非洲来说，这种一般性的编年并不完全适合。

自古至今，与牛驴一样作为动力使用的马是在喜克索人入侵末期，即我们纪元前 1,600年左右才出现于非洲的（更准确地说是在埃及）。这一点有文字和图形资料可作佐证。约在我们纪元前十三世纪，马传入利比亚，用于征战，后来在我们纪元前十世纪初传入努比亚。除了受罗马文化影响的地区以外，非洲的其余地区直到中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才开始广泛使用马匹。根据作家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所述，在马里国王的王徽上有两匹鞍具齐备、头戴撞角的马。

单峰骆驼传入非洲也不晚。创作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的乍得撒哈拉的岩画上，骆驼的形状依稀可辨。我们纪元前 525 年，甘比西斯王把单峰驼引进埃及，从此骆驼对尼罗河到红海之间的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骆驼传到西撒哈拉，成了沙漠的真正居民，常常取代了牛和驴。大概是罗马军队中的叙利亚人将它带到马格里布。反对罗马人统治和占有领土的柏柏尔人依靠骆驼获得了自由，使他们到了罗马统治区以外的草原和沙漠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结果，原来住在绿洲的黑人被赶向南方或沦为奴隶。

综上所述，得到的结论是，利用物理学和生物学所得到的资料和技术可以获得各种丰富文献材料。这个结论的本身就是方法论上的一项显著进步。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大胆，充分探索各种途径。在新方法论中，"辅助科学"一词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除非今后把"辅助历史科学"的意义理解为了解历史所根本需要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来自各门科学，但至今尚未完全发现。今后，技术性调查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它们向历史提出了向科学方向迈进的漫长道路。

---

③ F.皮加费塔(F. Pigafetta)和D.洛佩斯(D. Lopez)，罗马，第10页。
④ 同上书。
⑤ 同上书。

78 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现也有助于历史研究。但是，在非洲史研究中，对研究和批判手段贡献最大的还是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如埃及学、语言学、口头传说、经济学和政治学。

埃及学值得一谈，因为它是非洲史研究中迄今尚未利用的资料来源。

埃及学包括历史考古和文书释义。对埃及语的了解是从事这两项工作的根本前提。埃及语是使用了近 5,000 年的活语文(如果把科普特语包括在内)，它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1) 象形文字，它所包括的符号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个类型是表意符号，即字符(如一个编织的篮子的形象表示"篮子"一词，其中主要的语音音素是nb)；另一个类型是音标符号，即音符(如一只篮子的形象只含有一个语音音值：nb，这个符号也用于表达除篮子以外的具有同样音值的词，如"君主"和"全部"等)。音标符号分成(a)三辅音字母符，(b)双辅音字母符和(c)单辅音或单元音字母符。这些符号构成埃及语语音字母。

(2) 僧侣文字，它是象形文字的草写体，约出现于第三王朝时期(我们纪元前 2778-2423年)。它的写法是从右往左，用羽毛或用芦杆作笔写在纸莎草纸、碎陶片或石头上。它被应用的时间同象形文字一样长(最近的象形文字的文书为我们纪元 394 年)。

(3) 通俗文字，它是僧侣文字的简化形式，出现于大约第二十五王朝时期(我们纪元前 751-656 年)，消失于第五世纪。如果仅仅就字母而言，人们公认，它的起源是通俗埃及文字和努比亚语的麦罗埃象形字(后者还未能破读)。

埃及文字体系引起了一些有趣的方法论上的问题。通过具有特点的书写习惯，凡是懂得一点文字破读的史学家都能够，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捕捉早已死去的人的思想状况和意图，因为书写这一实际行为永远反映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破读就是交谈，要不断力求做到准确和客观。此外，埃及文字体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断的简化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破读文书的历史就是一种具有高度历史精确性的基本资料。因此，伴随着埃及文字体系，在把文字作为符号和人类交流工具的体系而进行的综合研究中，非洲占有重要地位。⑥

79 关于埃及文字在黑非洲传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史学家研究方法的范围，也为非洲史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下面谈几点有关的事实。吉坎迪文是肯尼亚的基库尤人使用过的一种表意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的象形字同埃及象形字惊人地相似。早在 1912 年，英国学者P.阿莫里·塔尔博特发现并报告说，埃菲克地方(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恩西比迪象形字同埃及象形字在结构上是相似的。许多埃及象形字同塞拉利昂南部门德文字使用的符号在结构上也明显近似。利比里亚北部洛马文字中使用的符号多半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在埃及象形字同蒙罗维亚(利比里亚)邻近地区的瓦伊文字中使用的某些符号也有姻缘。喀麦隆巴蒙人的文字也有两种以上的文字体系，它同尼罗河流域的象形字也有同样数量的惊人类似情况，这些类似之处已公认是外来的。如同在埃及一样，多贡、班巴拉和博佐的象形字也能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分析。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非符号具有可使它们所表示的

⑥ E.多布罗弗尔(E. Doblohfer)，1959 年。

人和事物产生自我意识的作用。这是关于文字的超越经验的力量的典型想象，在埃及的文学形式中也有发现，用于书写关于来世的某些文书。

因此，我们还很有可能看到一种迄今还完全属于未知的铭文学和古文书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关系到对黑非洲各个文字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彻底研究。史学家肯定能从中获得益处，因为文字史和破读史能揭示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的历史。对于文字体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史学家应该保持准确的时间概念，因为许多文字体系的产生历史较短，不能说明早期的历史。文字体系的丰富情况说明，埃及的影响非常深远。有人认为，埃及文字消失于我们纪元 394 年，但是看来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这一期间曾不断复活。因此，认为远古同非洲近代历史是割断的看法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错觉。事实上，有一股潜流把这两个时期联系在一起。

只要对埃及文字有所了解并具有破读文书的能力，就可直接研究法老时期的语言。史学家最好尽可能阅读原作，因为哪怕是最好的翻译本也难免有纰漏。懂埃及语的史学家可以亲自阅读各种的古埃及文书，这方面的书有：墓志铭、碑刻、行政文件、赞美诗、哲学论著、医学论文、数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小说、故事和寓言）。 80

一系列的文书清楚地表明，认为在远古时期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同邻近的其他非洲地区之间存在着屏障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可资证明的一个例子是，第六王朝的法老奈费尔－卡－赖（佩比二世）于我们纪元前大约 2370 年写了一封信，给远征南方地区（信内称之为世界之边缘，大概就是非洲湖泊地区）的商队首领赫尔胡夫。这是一系列远征中的第四次，它带回了一个俾格米人。

另外一卷写于我们纪元前二十世纪（第十二王朝开始时）的埃及文书简要而十分风趣地叙述了当时的水手生活、红海航行以及尼罗河流域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来往。这卷书叫《海上遇险的故事》。

哈特普苏特女王从我们纪元前 1504 年到 1483 年在埃及临朝 21 年。她组织过几支远征的商队，其中一支是在她当政的第 9 年前往索马里海岸的彭特地方。上埃及的代尔拜赫里的宏伟的浅浮雕就是这次远征的写照。

这指出了一条崭新的研究道路，一定能使非洲史学家感兴趣。我们只是刚刚认识到非洲大学开设古埃及语课程的重要性。非洲大学负有重大责任，来促进对非洲文化遗产从时间空间上全面进行最新的研究。

关于古埃及语的语言分支情况，1974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在开罗召开的重要国际讨论会"古埃及的居民和辨读麦罗埃手稿"所提出的总结报告指出："不能把埃及语言与非洲的情况孤立开来，其起源也不能完全用闪米特语族来解释；因此，希望在非洲发现相关的语言是非常正常的"（《总结报告》，第 29 页，第 5 节）。

明确地说，法老时期的埃及语不是闪米特语族的语言，因此最好放弃某些作者使用的"含米特－闪米特的"或"非洲－亚洲的"说法，这些作者往往既不了解闪米特语族，也无埃及学的基础。

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寻找合适的技术，对古埃及语和现代黑非洲的语言进行比较，以便尽可能根据词法上、词汇上和语音上的相近点重现它们的共同祖先。繁重的任务

在等待着语言学家。在发现法老时期的埃及和黑非洲其他地区共同的文化宏观结构时，史学家也必须准备根本的观点转变。准确地说，这样一种共同因素现在只是推测，还有待于正式证实。但是，这个领域比其他领域，更需要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通力合作，因为语言学已成为历史资料，特别是在许多语言相互重叠的非洲。

这主要是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事。使用的方法是比较法和归纳法。比较的目的是去再现，也就是去发现所比较的各种语言的重叠点。这种重叠点将称之为“先方言共同语”。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例如，根据适当研究如今发现的各种班图语言再现的共同班图语，既不是古代语言，也不是完全复原的真正语言。所谓“共同班图语”或“原型班图语”只是指现在已知的各种班图语言中的关联体系，推想这种体系可以追溯到这些语言几乎完全相同的时代。比方说，印欧语也是如此。从严格地现实角度来看，语言考古学说到底纯粹是想象，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或仅仅是语言的蛛丝马迹可说明，在遥远的史前时期使用过这种再现的共同语言。

历史语言学的关键主要不在于发现先方言共同语，而是在于鉴别各种表面上并无关系的语言的整个传播情况。语言的使用地区很少是界限分明的，但它往往越过自己的地区而与具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的其他语言发生联系。这种联系起初往往不易察觉。重要的基本问题显然是人口的迁徙。语言相同，种族不一定相同。但是，它的确能反映一种本质的、其实也是唯一真正的统一，即由共同语言联系起来的人们的基本文化的统一，尽管他们之间往往在起源和政治制度上截然不同。例如，如果我们承认尼日尔-刚果家族这个实体，那么，它表明，在西大西洋各民族，曼德、古尔和克瓦族，生活在贝努埃和刚果(扎伊尔)之间的各民族，阿达马瓦东部各民族，以及东非、中非和非洲南部各班图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古老的社会文化联系。

因此，历史语言学是非洲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来源，口头传说也是一样。后者尽管长期不受重视，但是有时它是唯一的可直接利用的史料。譬如，对刚果的姆博奇人就是如此。只有靠口头传说才可能在时间(应该承认是比较短的时间)和空间上重现他们各个酋长领地的历史。口头传说还能解决文字记载无能为力的问题。编年史学家德拉波特于1753年和普罗亚特于1776年都记载说，在中非西部的洛安加王国，历代国王分葬于两处墓地，一处在卢布，另一处在勒万吉里。至于分葬的时间和原因，至今所知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谈到。只有今天维利人的口头传说解释了这个分葬现象。由于马卢安戈王朝和勒万吉里的人民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的国王和王公不得已决定改换墓地。就这样，由于王室同王国一个富饶省份发生了冲突，放弃了勒万吉里的墓地，改葬在卢布的墓地。在这件事上，言之成理的口头传说弥补了文字记载之不足。在非洲有无数事例说明，口头传说指导了考古挖掘，同时还解释了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1960年底，当时的达喀尔大学教授J.德维斯、D.罗伯特和S.罗伯特对加纳王国(苏丹西部)的城池泰格达乌斯特进行了挖掘。他们综合利用了当时口头传说、中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和普通考古技术。就这样，非洲史上一段很少为人所知的时期(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又入了档案了。功劳当然主要归于考古学，但是当地的传说和文字记载也有一份功劳。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非洲的口头传说比起其他任何地

方的，都更是史学家基本材料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大大扩大了材料来源的范围。写非洲史的时候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口头传说反映的时代呼声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

口头传说如何表达时间本身，以及口头传说如何及时表达事件，这两个关键问题至今还没有研究透彻。症结问题是民间歌手如何表达历史。非洲的民间歌手几乎从不使用编年的原则，他们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人间的起承转合。因此，要以向前看的态度来听他们所说的内容，而且不用任何其他方法。关键在于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卷入生活的人，即不受时间限制、在世界活动中有价值的人。这就是非洲民间歌手往往不对其讲述的故事的不同时期加以综合的原因。他们孤立地叙述各个时期，各时期有各时期的意义，相互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他们讲述的故事在时间上没有起承。这种历史的贴切称呼是绝对的历史，而绝对的历史全面地展现事件发生的阶段没有时间性，因而是简单的结构历史。在民间歌手的词汇中实际上缺少其他地方都有的时间概念，如周期、时期、时代、年代、系列和时刻。当然，他们没有忽略宇宙性的时间(季节和年等等)也没有忽略人类的过去，因为他们讲述的事是过去发生的。他们很难建立时间的模式，其时间观念完全没有阶段性。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内，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贡献还能使我们对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各种成分重新下定义。王国、民族、国家、帝国、民主、封建主义、政党等概念虽然肯定适用于其他地方，但不一定总能自然地适用于非洲。 83

譬如，考虑一下刚果"王国"的准确意思是什么。那里的人自己使用的称呼直译是"刚果之国"。这个称呼包含一个种族集团(刚果)、一个地区（国）和这个种族集团对生活在此地区的意识，这种意识形成了这个种族集团的国度。边界是完全不固定的，只是用于表明种族集团属下的大小家族的分布范围。这里说的"王国"是指完全由属于同一族集团的男人和女人居住的特定领域。种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致性是根本条件。国王(mfumu)事实上是承认共同祖先的每个家庭和每个母系家族的长子（mfumu）和舅父（mfumu）。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情况，就会发现，刚果王国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酋长国，即把当地小的酋长领地结合在一起的政府体系。国王则是长子和舅父中最年长者，这一条件使他成为最高酋长。因此，刚果王国不是西方概念中的由国王统治的国家。总之，西方概念(如乔治三世的王国)是一种较晚的、不恰当的和混杂的概念——简言之，是国家经过专制君主政体向民族国家过渡的一种特殊情况。

另一方面，古达荷美王国(今贝宁共和国)比较接近专制君主政体的模式，即法国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六时期的那种不幸形式的典型。这里有一个长期的中心地带，并且正象格莱莱教授所指出的，它拥有一个由国王、大臣和大臣代表组成的中央政权。国王是权力的核心，拥有全部权威和控制权。他对臣民操有生杀大权。从臣民中间，国王、官长和各种财富占有者选择和募集农民去耕种他们的庄园或作为礼物奉送给王公和酋长。在村落和地区，由酋长以国王的名义行使中央统治权。因此，古达荷美王国就成为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但在这种组织下采取分权治理的酋长制。这就是通过酋长对一个民族(达荷美人)实行统治的中央政权。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征服战争，一些国家被吞并，纳入原来种族集团的中心地带。对邻近有关系的民族(丰人、马希人、阿拉达人、萨维人和朱达人等等)不断进行征服、吸收和同化，因此这个王国变成了多种族的国家，它的组织和中央集权是通过 84

强有力的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受到高度控制的经济实现的。在殖民化以前，古达荷美王国就已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其统治原则是协商、谈判并取得居民(通过酋长进行统治)的支持。

刚果和古达荷美的例子说明，"王国"一词的意思在整个非洲并不完全都一样，所以史学家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要特别小心。还要指出的是，在刚果，酋长制相当于政体，然而在古达荷美王国，酋长制则是分权治理的形式。

在西欧的一般情况下(特殊例子另当别论)，按照注重法律研究的中世纪史学家的理解，"封建主义"一词是指大约在第十或十一世纪形成的采邑制度以及家臣与拥有庄园的封建主之间的全部关系(臣服、效忠和纳税)。这个词的意思不包括农民，他们不属于上等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广义上使用封建主义这个词的，是指以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对下等阶级(农奴)进行经济剥削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农奴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依附于领主。领主也许已不再随意处死农奴，但是还能出卖农奴(即对劳动者拥有有限的产权)。农奴制取代奴隶制，但仍保持许多奴隶制的特点。农奴或农民都不能参与政事，也不担任行政职务。在欧洲社会进化过程中，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仍把封建主义的政治概念同封建领主制的社会经济概念相混淆，多亏马克思，史学家从1847年以来懂得了二者的区别。

但无论根据哪一种意思使用这个词，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方式是否真正一成不变地存在于殖民统治以前的黑非洲。只有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至今甚少)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并做出必要的区分。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巴里巴人(贝宁共和国)的组织的"封建"性质，但主要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性假设。对黑非洲封建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史学家应该小心谨慎。黑非洲各个社会表现的所谓封建倾向很可能不是基于分封采邑的实际权利，而是基于以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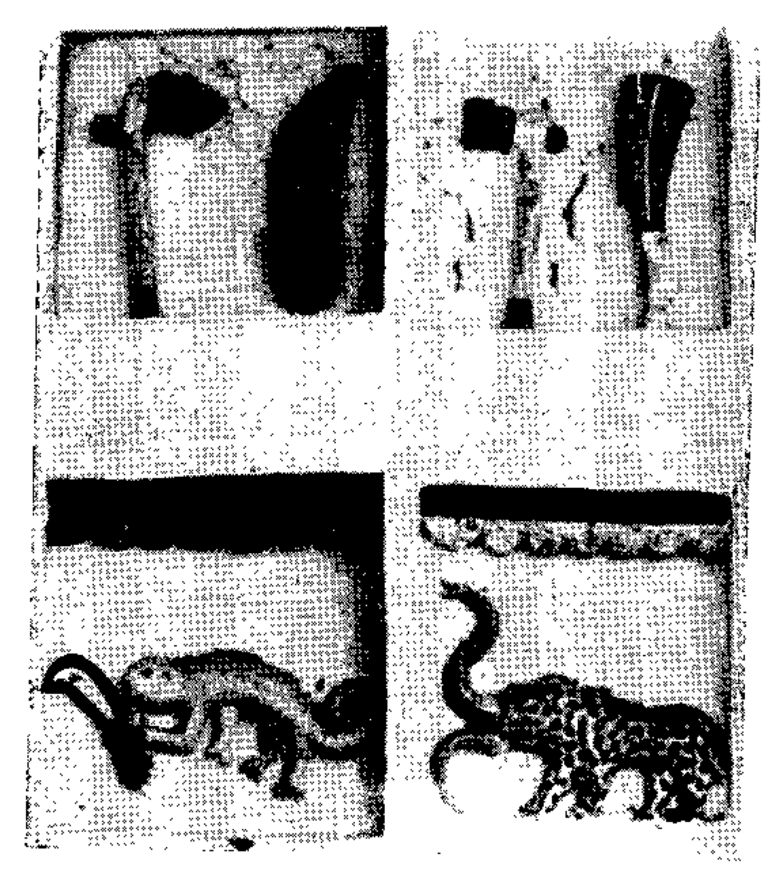
因此，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工作也能向史学家提供材料。在非洲，由于时期和题材的不同，也由于史学家个人兴趣的不同，史学家的档案材料的差别很大。现在非洲正在从精密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收集系列材料。研究的方法是同时综合利用数种专门资料和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的记叙如今完全改变了。口头传说、珍本阿拉伯文书、考古挖掘和碳-14日期测定法所提供的资料终于使有关乍得、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萨奥民族的传奇变成了可靠的非洲历史。如今人们已经知道乍得共和国境内的姆达加土墩有近2,500年的占领历史，即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但是，如果不同时综合利用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出人意料而又恰当的结论的。

85

非洲史研究破除了关于历史批判法的传统概念，如"辅助科学"、"资料选择"和"原始材料"等等。这标志着当代编史工作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非洲史学家的工作正在成为多种学科之间的不断交流。由于在理论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新的远景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可以说，综合使用资料的思想已经使一种新的著史方法从普通方法论的土层下破土而出。因此，在历史研究同其他学科结合的方面，非洲史的编纂和解释可能发挥作为楷模的先锋作用。

(熊志勇译)



照片 4.1 浅浮雕品，阿波美博物馆(摄影努比亚)

86

87

5 十五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

H. 贾伊特

文字资料的概念极为广泛，以致含糊不清。如果我们把书面文字理解为传送人的声音和其它声音的东西，那么文字资料将包括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唱片、钱币，总之一切保存语言和思想的信息，不论它们是何种物质媒介。① 这样的引伸将意味着，本章应当包括古钱学、铭文学和其它辅助学科。严格说来，这些学科已经独立于文字资料领域之外。因而，我将把考察对象局限于在纸草、羊皮纸、骨头、纸张等材料上用通用符号书写或刻印的资料。即使如此，研究和思考的领域仍旧很大，首先，因为从时间上讲，它包括自发明书写到近代初期(十五世纪)为止这一整个时期；其次，因为从空间上讲，它包括具有同时存在和相继出现的不同文明的整个非洲大陆；最后，因为它所包括的史料，在语言、文化传统和类型方面，是形形色色的。

下面将先探讨一下依照时间、地区、类型分析资料时所遇到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再编一个井然有序的资料目录。

一般性问题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非洲历史的文字资料做过全面研究。由于编年研究或区域研究的专门化，这些稀有的研究总是限于狭小的学术研究领域。例如，法老时代的埃及属于埃及学学者的领域，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代的埃及属于古典主义学者的领域，穆斯林时代的埃及则属于伊斯兰学学者的领域。三个时期分属三个专业，只有第一个专业专属埃及，其余两个则属于更广泛的范围(古典世界、伊斯兰教)。对马格里布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研究古迦太基的学者既是东方学者又是古典主义学者，而研究柏柏尔的专家则介于二者之间，无法分类。

88

黑非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短，成为近代研究的对象也较晚。它本身很复杂，对它的研究需要跨越不同的语文和专业，因为资料既有古典语文的，也有阿拉伯语文和当地语文的。在撒哈拉以北，我们所找到的也是这三种语文的资料，但在撒哈拉以南，资料没有那么广阔的分布，而且其意义也不同。在十五世纪以前，在一个广袤的地区，那里没有文字资料。阿拉伯语文资料对于马格里布来说是第二等资料，但对尼日尔盆地来说，却是最重

① A. 戴恩(A. Dain)，1961 年，第 449 页。

要的。研究阿拉伯文文献的黑非洲史学家对待文献的态度不象马格里布的史学家那样，更不象一般研究伊斯兰教的史学家那样。

上述分科和干扰既反映了非洲历史的客观状况，也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历史研究的趋向。实际上，埃及曾先后并入古希腊世界、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而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就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古典作家把非洲史视为罗马史的一幅插图，而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非洲的确与罗马文明的命运牵连很深。然而相当确实的是，甚至研究罗马时代非洲的现代史学家首先是罗马主义者，其次是非洲主义者，他们把伊斯兰方面排除于其认识领域。因此，了解非洲整个历史，并把它的文字资料看作同整个历史有关，是一项细致而异常艰巨的任务。

历史分期问题

在研究文字资料时把十五世纪初作为分界线，是什么理由呢？难道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十五世纪以前的大量文献有某种内在结构的统一吗(尽管在文化上和时间上有差别)？或者是因为下列原因呢：总的历史发展情况现在趋向于把古代和中世纪并为一个单一的漫长时代，并把中世纪时代同似乎在一切方面与以前迥然不同的近代划开？事实是，这两个论据是相辅相成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文学作品。无论是年表、编年史、游记，还是地志，它们所提供的证据大多是加工过的。而从十五世纪起，档案资料——未经加工的证据——日益增多。另外，十五世纪以前古典的和阿拉伯的资料占大多数，但是在十五世纪以后，甚至阿拉伯的资料也日趋消失，但我们突然从另外一个来源找到了证据：欧洲的文献(意大利的、葡萄牙的等)和黑非洲的当地文件。资料性质和来源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非洲实际历史命运的变化。十五世纪是欧洲人扩张的时代。[②] 1415 年葡萄牙人在休达定居，二十年后，即 1434 年侵入黑非洲海岸。[③] 对于非洲的地中海和伊斯兰边缘地区(马格里布、埃及)，两个历史时代的明显分界早在十四世纪就已出现，当时这些地区已经感受到西方缓慢扩张的影响，无疑还有自己内部衰退力量的影响。但是，十五世纪是决定性的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有关穆斯林贸易的远东方面的资料枯竭了，从而使他们的洲际作用宣告结束。从这时起，地中海-非洲地区的伊斯兰势力持续而急速地衰落。因此，如果对这一问题不过分刻板地去理解，那么把十五世纪定为分界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把分界移到十六世纪初，或许理由更充分些。 89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代，根据差异性和统一性这两个必要方面，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a) 古代，迄至伊斯兰纪元，即从古王国到我们纪元 622 年。

(b) 第一伊斯兰时期，即从我们纪元 622 年到十一世纪中期(1050年)。

(c) 第二伊斯兰时期，即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

---

② 莫尼(Mauny)(1965 年，第 178 页)建议将葡萄牙人从海上向黑非洲扩张的起始时间定为1434年。并参见莫尼，1961年，第 18 页。

③ A. 拉鲁伊(A. Laroui)，1970年，第 218 页。

当然，这里的古代概念与西方历史中的古代不同，因为它只是部分地与古典古代一致。非洲的古代不是以蛮族的入侵，而是以伊斯兰教的骤然出现而告终的。伊斯兰教以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标志着与过去时代的决裂。对过去时代的称谓因地而异，可分别称之为古代、史前时期、早期历史时期。还应指出的是，自希腊时代以来，大多数古代资料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

根据现有文献的构成情况和总的历史进程，必须把产生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资料的七世纪视为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不过这个新的伊斯兰阶段应该分为两个时期，即从阿拉伯人征服到十一世纪中叶的第一时期和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第二时期。在撒哈拉以北的非洲的历史上，第一时期相当于按照伊斯兰教模式组织这个地区，并附属于跨洲的帝国(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的时期。第二时期相反，恢复了本地的组织原则，同时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马格里布来说，十一世纪中期正值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建立、齐里德人重新赢得自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拉尔人入侵。在埃及，政治上的分期要晚一个世纪，以阿尤布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但是在这时，贸易活动中心已从波斯湾移至红海，世界范围的贸易格局逐渐建立起来，其影响非常重大。

90

十一世纪期间，撒哈拉以南地区也与伊斯兰世界建立了持久的关系，特别是在商业和宗教方面。

文献资料的性质起了变化。在数量上，资料日益丰富多样；在质量上，随着岁月推移，有关非洲地中海地区的未经加工的资料(文献记录、法律判决书)越来越多，有关黑非洲的资料越来越准确。

种族-文化区域和资料类型

按历史时期对资料分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既考虑非洲形成以各种力量为特点的种族-文化区域的情况，而且除了根据历史分期和空间差别以外，还要考虑现有资料的现行分类法。

种族-文化区域

先谈第一个问题：人们从一开始就情不自禁地在撒哈拉以北的非洲部分与以南的非洲部分之间划一条基本分界线。前者是白种人的阿拉伯伊斯兰教的非洲，它浸透了地中海文明，从这一点看来，离它原有的非洲特征已相去甚远；后者是地道的黑种人的非洲，具有不屈不挠的人种历史特征。实际上，在不否定上述这些特点的主要性的情况下，更深入的历史研究表明，分野更为复杂，但不那么明显。譬如，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苏丹国一直与阿拉伯-柏柏尔的马格里布共处。从资料的观点看，它与马格里布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超过与班图世界的关系。位于尼罗河上游的苏丹与埃及的关系、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于是有人又情不自禁地划出两个对立的非洲。一个是地中海地区的沙漠和平原为主的非洲，它包括马格里布、埃及、两个苏丹、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以及远至桑给巴尔的东海岸。另一个是崇信万物有灵的纵深大陆的热带和赤道地区的非洲，包括

扎伊尔盆地、几内亚海岸、赞比西河－林波波河地区、内湖地区，还有南部非洲。事实上，第二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外界的开放和伊斯兰教的渗透程度为标准的。这种文明状况的依据是现有的文字资料，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有关前一个非洲的资料非常丰富，但南北有差异，有关后一个非洲的资料则完全空缺。但是，考虑到与外界的联系和文字资料的状况这两点，就有这样一种风险，人们可能作出对价值的评价，使几乎半个大陆(中部和南部非洲)蒙胧不明。有些史学家已经提请人们注意“依赖阿拉伯文资料”导致的危险：因为这些资料强调苏丹地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那里是有组织的文明和国家的唯一中心。④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再谈。但是，即便现在，我们承认，虽然文明状况与现有资料的状况有关，但不能简单地根据这种联系解释实际历史进程。一个客观的史学家没有权利只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作出对价值观念的评价。但是他也没有权利由于这些资料可能使人步入迷津而忽视这种材料所能提供的东西。 91

一部包括整个历史时代并依据全部现有文献资料的通史可能使扎伊尔盆地具有与尼日尔盆地或埃及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仅限于十五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的研究工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适当考虑上述一切以后，我们现在可以提出如下地区分类：

（a） 埃及、昔兰尼加、苏丹的尼罗河流域。

（b） 马格里布，包括撒哈拉北部边缘地区、西部边远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

（c） 广义的西部苏丹，即远至乍得湖以东并包括撒哈拉南部。

（d）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非洲之角和东海岸。

（e） 大陆其余地区，即几内亚湾、中非和南部非洲。

这种分类法的优越之处在于没有把非洲分成两个对立的部分。这种分类法依据非洲在地理历史上的近似情况加以区分，也适当考虑现有文字资料的特点。从文字资料的角度来看，尽管中非和南部非洲可能有过丰富的文明，但与其它最小的地区(如费赞或厄立特里亚)相比，其资料却贫乏得可怜。另外，勿庸置疑的是，对以上划分的各个具体区域来说，资料中除了具有说明“已知”非洲的资料的特点的一般一致性以外，还具有更清晰的特殊一致性。因此，为了列出一个详细的资料目录，必须按时间和地区来审查现有资料原文。但是我们在动手时必须认识到，在所有地区以及某些历史时期，我们的资料只有少数几种语文和某些有限类型，而且并非都来源于它们所论述的地区，也并非都与所记述的事物同时。

文字资料的分类法

92

（a） 流传至今的文献所使用的语文种类繁多，但并非都有同等的重要性。最常用的记载史料最多的非洲语文是古埃及文、柏柏尔文和埃塞俄比亚文。而最多产的语文是那些并非非洲当地的语文：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阿拉伯文甚至被一些非洲民族接受，作

④ I. 赫尔贝克(I. Hrbek)，1965年，第五卷，第311页。

为自己的民族语文)。

如果按结构对文献进行分类，既考虑数量又考虑质量，那么次序大体如下：阿拉伯文文献、希腊文文献、拉丁文文献、古埃及文(僧侣专用语文和通俗语文)文献、科普特文文献、希伯来文文献、阿拉米文文献、埃塞俄比亚文文献、意大利文文献、波斯文文献、中文文献以及某些不太重要的语文文献。

从时间上看，现有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僧侣纸草，而纸草上面的文书内容可能写于更早的"中王国"初期(我们纪元前2,000年之初)特别是名为"致梅里凯尔王的教谕"的纸草。⑤嗣后是"新王国"时期的纸草和陶片，上面书写的依然是埃及僧侣专用语。希腊文资料始于我们纪元前七世纪，一直到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我们纪元七世纪前后)没有中断。希伯来文资料(《圣经》)和阿拉米文资料("埃利方太尼犹太人")始于第二十六王朝，埃及通俗文资料始于托勒密王朝时期。后来出现拉丁语文献。科普特文文献始于我们纪元300年前后(科普特文使用埃及语言，但字母是希腊字母，外加了几个字母)。以后逐次出现阿拉伯文、中文、⑥可能还有波斯文、意大利文的资料。后来还有埃塞俄比亚文的资料，最早的埃塞俄比亚文资料是在十三世纪写的。⑦

(b) 一般来说，现有资料可分为记叙资料和档案资料。前者是特意记录下来以便留下一个证明。后者则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非洲，除了埃及，但包括马格里布在内，十二世纪以前文献资料几乎全是记叙资料。因而这些资料在时间上既包括古代，又包括第一伊斯兰时期。从十二世纪起，在马格里布出现档案文献，但很少(如一神论教派文件、哈夫斯时代的法特瓦，即法律判例)。在埃及阿尤布王朝和马木路克统治时期(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档案文献越来越多，而埃塞俄比亚修道院里的手稿则用附录方式保存了官方文件。但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整个时期，非洲其他地区实际上没有档案文献。⑧

93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记叙资料始终占优势；从十二世纪起，非洲的地中海出现了档案资料，或者说相对增多了，而黑非洲根本没有档案资料；但总的说来，文献资料从1100年左右显著增加，在十二至十四世纪达到了高峰。

现有的资料可作如下分类：

记叙资料

编年史和记年表，

地理著作、游记，自然科学家的著述，

法律著作、宗教著作(有关宗教戒律的论文、祈祷书或圣徒传记)，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⑤ 见E. 德里奥东(E.Drioton)和J. 旺迪埃(J. Vandier)，1962年，第226页。

⑥ 现有的中文资料是十一世纪后半期的，但尚待挖掘的中文资料主要是关于十五世纪和东非海岸的。下列著作也可以提一提：J. J. L. 杜文达(J. J. L. Duyvendak)，1949年；F. 希尔思(F. Hirth)，1909-1910年；T. 菲莱西(T. Filesi)，1962年；L. 利布拉(L. Libra)，1963年；P. 惠特利(P.Wheatley)，1964年

⑦ S.哈布特-塞拉西(S.Hable-Selassie)，1967年，第13页。

⑧ 现有一种"马赫拉姆"，是博尔努国王在约十一世纪后半期颁布的特许状，即有授予乌姆·吉尔米(Umm Jilmi)和马斯巴尔马(Masbarma)家族的特许状。有关这个问题，可见R. 莫尼，1961年。

档案资料

私人文件：家书、商业信函等，

国家和当权者发布的官方文件：官方信件、法令、特许状，立法和财政条文、法律－宗教文件。

应该指出，记叙资料起源于我们纪元前八世纪荷马史诗。记叙资料中很多是凝聚着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杰作。在那些作者中有些是伟大人物，如希罗多德、波里比阿、大普林尼、托勒密、普罗科匹厄斯、花拉子密、马苏第、贾希兹、伊本·哈勒敦。尽管他们大都没有专门论述过非洲，但在较广阔的背景下多少给予非洲以重要地位。非洲的档案文献是世界上最古的。欧洲所保存的档案文献是我们纪元六世纪初的雷文纳纸草，而埃及"新王国"的纸草则比它早二十个世纪。的确，这类资料在第一伊斯兰时期并未超出埃及的疆域，而且至今也没有很大的扩展。这可能是由于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实际上对保存国家文献的原则一窍不通。十四、十五世纪是档案资料极大丰富的时代，但这些档案大多是随百科全书流传下来的。而正规的档案库还必须等待近代，即奥斯曼帝国和欧洲时代来建立。

按时期编排的资料目录

94

伊斯兰教以前的古代时期（自我们纪元初期至622年）

与以后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考古方面的资料更广义地说非文学性资料占优势。不过，即使这些文献资料是次要的，但偶尔也会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情况。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文献资料日益增多、日益准确。应该指出，就地区分布而言，非洲西部和中部完全是空白。

埃及、努比亚、东非

（a） 我们纪元前十世纪以前，有关埃及的文字资料完全是埃及人自己写的。这些资料是僧侣纸草和陶片。就物质形态而言，不会早于"新王朝"时期，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他们可能记录更古代的史料。⑨ 所谓纸草和陶片是用以记录符号的材料，纸草是一种植物，陶片是石灰石片。埃及僧侣文字在草书形式方面不同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它们是用于画在而不是刻在材料表面的。有关"新王朝"时期的第十九和二十王朝，即拉美西斯时代（我们纪元前1314-1085年）的纸草和陶片数量很多，上面既记载政府活动，也涉及私人生活。我们现已发现行政和法律报告、来往帐目、私人信函以及短篇故事和小说等。法律⑩ 和文学⑪ 方面

⑨ E. 德里奥东和 J. 旺迪埃，1962年，第7-9页；J. 约约泰(J. Yoyotte)，1956年。

⑩ 在法律文件中，现存艾博特纸草、阿默斯特和迈耶纸草以及图林纸草，这些纸草是关于拉美西斯九世、十世和十一世统治情况的基本资料。它们已经被发表，参看《埃及僧侣文字纸草选集——大英博物馆汇编摘录》（伦敦，1860年）；P. E. 纽贝里(P. E. Newberry)，1899年；皮特(Peet)，1920年、1930年

⑪ 大英博物馆藏有丰富的文学纸草文书，譬如"真理与谎言的故事"、"霍鲁斯和塞特的故事"。这个问题的著名专家波泽纳(Posener)列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埃及文学作品目录，有58篇之多（波泽纳，1951年）。他还发表了一些陶片（波泽纳，1934年）。

的纸草受到人们的认真研究，并且十九世纪以来已陆续发表。

有关努比亚和彭特地区的情况，我们通过文字资料毫无所获，因而除非有新发现，必须依靠考古和铭文方面的资料(特别是那些粗糙雕刻)。

（b） 我们纪元前十个世纪，特别是自前六世纪以后，所提供的资料种类繁多，因而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编排。记叙文献不仅与档案文献同时并存，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取代了档案文献。譬如，作为《旧约全书》一部分的"列王记"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第二十二王朝的产生(约我们纪元前 950 年)的宝贵资料，对于考察波斯人统治(我们纪元前 525 年)以前的一段历史仍是非常有用的。"列王记"最初写于耶路撒冷陷落前，即我们纪元前 586 年以前，⑫ 在"巴比伦之囚"时被改写过，但它再现了远至我们纪元前十世纪初的传说。其他外国资料，即希腊文资料，如梅南案、亚历斯多德姆斯、费洛克鲁斯、希罗多德的著作阐述了从第一塞特王朝(前七世纪)起古代埃及的晚期历史。从档案角度看，这时的纸草是用希腊文或埃及通俗文写成，这种文字比埃及僧侣文更草。前五世纪，埃利方太尼犹太人的纸草给我们提供了主要史料，而在前四世纪、三世纪则有《埃及通俗文编年史》。

95

（c） 从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末)到阿拉伯征服(我们纪元 639 年)这一千年的特点是，希腊文资料数量最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进入我们的视野。波里比阿、斯特拉波、西西里人狄奥多洛斯和大普林尼相当准确地论述了这一地区，当然他们也不免有无知幼稚之处。罗马自然科学家大普林尼的《自然史》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关于商路和商品方面的资料。这部书是瑕瑜互见，但由于细节丰富而堪称佳作。

基督教出世以后五百年的资料更准确了。众所周知，在二世纪埃及是希腊文化的主要场所，因而埃及理所当然应当产生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和教堂神甫。在政治上，埃及先是并入罗马帝国，后来又并入拜占庭帝国，从而成了很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外国记叙著作和档案(譬如《狄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新法典》)的题材。我们还可指出，纸草传统并未中断。在埃及国内外的许多文献中，有少数著作极其重要、引人注目，如托勒密的《地理学》⑬(约我们纪元 140 年)，《红海巡航记》⑭(作者不详，成书时间曾被定为一世纪，现在被认为 230 年前后)以及号称"印度旅行家"的科斯马斯的《基督教徒地形志》⑮(约我们纪元535年)。这些著作是我们关于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知识的主要依据。但是整个说来，这一简短概述显示出两种不均衡现象：一是文字资料与其它类型的文献不均衡，二是现有关于埃及的知识与关于努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的知识不均衡。

96

⑫ A. 洛兹(A. Lods)，1950 年，第 7 页；E. 德里奥东和 J. 旺迪埃，1962 年；J. 多雷斯(J. Doresse)，1971 年，第一卷，第 47-61 页。

⑬ 有关古典时期和以后时期论述非洲的地理学家，见 Y. 卡马尔(Y. Kamal)的权威著作，1926-1951 年；再版时，最好增加一些新的重要的评注材料。

⑭ 米勒(Müller)编辑，1853 年，第 1 卷；耶斯·亚伊马尔·弗里斯克(Jöns Hjalmar Frisk)重新编辑出版，1927 年。目前尚有这部重要著作的十六世纪版本(1533 年和 1577 年)。

⑮ 科斯马斯(Cosmas)游历过埃塞俄比亚和索科特拉岛。他的著作收在米涅(Migne)编的《希腊教会圣师著作全集》第 XXXVIII 卷，此书和米涅所编《拉丁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同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必读参考书。1968-1970 年巴黎雄鹿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三卷本)。关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化的重要资料，见收入米涅的《希腊教会圣师著作全集》的鲁菲努斯《基督教会史》，该书一直有拉丁译文。

古代马格里布

古代马格里布文字历史起于迦太基与罗马的冲突。因而，除了在希罗多德和其它希腊史学家的著作中的东鳞西爪的暗示以外，我们对我们纪元前二世纪以前的重要情况一无所知。了解古迦太基时期的真实情况，需要靠考古学和铭文学。而且，有关迦太基历史的文字资料，包括汉尼拔以前的，与罗马冲突期间的以及稍后短暂复兴时期的资料，几乎都不是迦太基人写的。现在已经确定，希腊文的《汉诺周游记》(此书描述了远至非洲西北海岸的地理情况)是伪造的，它的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我们纪元前一世纪。这样现存的较早资料只有被认为是马戈写的农业著作，而且还是拉丁文作者保留下来的片断。但是，在当时资料中应当提到的是大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书中所保留的尤巴二世的告示。

有关迦太基、罗马、汪达尔和拜占庭等历史时期的古代马格里布历史的文字资料，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是古典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即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作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所组成。一般说来，这些作者都不是非洲人。但是，随着非洲罗马化，当地的作者涌现出来，特别是在教会神甫之中。

(a) 我们纪元前 200 年至我们纪元 100 年间，这是迦太基鼎盛和衰亡时期，也是在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统治下成立罗马非洲省时期。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名著成了我们的资料。波里比阿(我们纪元前 200 年－120 年)的著作是主要资料。此外还有斯特拉波、西西里人狄奥多洛斯、撒路斯特(我们纪元前 87－35 年)、李维、阿庇安、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我们纪元一世纪)、托勒密(我们纪元二世纪)，当然还有许多小作家的著作。[16]

97

把散见于各书中有关北非的资料集在一起可能是大有裨益的。迄今只是在有关摩洛哥的资料上做了这种工作。[17] 目前，研究人员仍不得不经常查阅古典著作的庞大汇编。这些汇编是《条布涅利安丛书》、《洛布古典文库》(附有英文译文)、《比德藏书集成》(附有法文译文)、《法国大学藏书集成》、《牛津古典文献集成》。这些书是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动员了最大力量，经过考证和艰巨劳动编成的。

除了这些记叙资料以外，还有罗马法条文构成的比较直接的资料，即使这些条文来自铭文。[18]

在研究这一阶段历史时，希腊-拉丁文的编年史家、纪年表家、地理学家的著作的价值并非整齐划一。有的作家只不过倾向于对前人知识进行编纂，有的则向我们提供珍贵的原始资料，偶尔甚至还有第一手的证明。譬如，波里比阿是西庇阿的密友，而且，我们纪元前 146 年围攻迦太基城时，他似乎也在场。撒路斯特的《朱古达战纪》是有关柏柏尔诸王国的第一流文献。恺撒的《内战纪》是一位历史活动家的著作。

波里比阿的个性和著作在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他被称为希腊文化和“希腊时代之子”。[19] 他出生于我们纪元前 200 年左右。当时罗马处于帝国主义高潮，正与地中海地区、

---

⑯ 这里还可以提一提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政治学》)、恺撒 (Caesar) (《内战纪》和《非洲战纪》)、厄特罗比(Eutropius)、查士丁尼(Justinian)、奥罗西(Orosius)。仅有关汉尼拔(Hannibal)的史话就有二十多种文字资料。

⑰ M. 罗热(M. Roget)，1924 年。

⑱ P. F. 吉拉德(P.F.Girard)，1937 年。

⑲ T. R. 格洛弗(T. R. G lover)，1977 年，第一章，第 1 页。

特别是与希腊东部对抗。波里比阿作为一个俘虏被流放罗马。艰苦的流放生活成了这个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严厉教师”，饱尝了流放的教育。西庇阿的庇护使他的日子轻松一些，特别是使他有机会通晓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经过16年的俘虏生活，他回到故乡希腊，但他立刻又动身再次周游世界。据说，他在非洲时，小西庇阿给他提供了一支船队，使他得以对非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进行考察。换言之，他是一个敢于冒险、富于经验、追求新知的人。波里比阿不仅是有关迦太基与罗马较量的各种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从更广意义上看，他是当时非洲和埃及情况的第一流观察家。要是他的四十卷本的《国事诏书》流传下来，我们的知识肯定比现在丰富得多。甚至我们还可能获得别处所缺少的有关黑非洲的准确资料。而即便是目前这种状况，流传下来的波里比阿的六册书，无论从资料的质量上，还是从眼光的远大上，都是其它资料无法比拟的。

98

（b） 一世纪以后的四个世纪，罗马帝国先是在非洲深深扎根，后来是陷于持久的危机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文学资料极为匮乏。有关二世纪的资料实际上完全空缺，有关三、四世纪的资料基本上是基督教的著作，其中主要是西普里安和奥古斯丁的著作。现存的一般性著作超出了非洲参考范围，而提出一些重大的宗教问题，丝毫没有直接讨论历史。但也有个别的论战性著作对于当时的事件比较直接关心。譬如，我们对于多纳图运动的了解是基于它的主要对手圣奥古斯丁（354－430年）的抨击言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处理资料时必须特别谨慎。

实际上，就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字资料而言，《教会圣师著作全集》是我们主要的、但非常片面的知识工具书。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还必须查阅卷帙浩繁的希腊文版的《柏林全书》和拉丁文版的《维也纳全书》。这两部书是德国的不朽学术著作。在法国也有与之相媲美的米涅编的两部全集：《希腊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希腊文本，附拉丁文译文）和《拉丁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只有拉丁文本）。

汪达尔人对北非的入侵、拜占庭帝国对北非的再征服以及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使更多的作家记录当时的事件。不太知名的著作很多，档案资料（信函、立法条文）出现了。特别是，六世纪出现了一位天才的多产观察家普罗科匹厄斯，这是很幸运的。他的《汪达尔人战纪》是迄今我们最基本的资料。

希腊文资料可资利用的有《波恩拜占庭全集》，其次有《希腊史籍残卷》。拉丁文资料很多，可查阅《拉丁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圣富耳根契对汪达尔时期颇感兴趣）或《大日耳曼历史参考文献》，[20] 这是又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国学术作品。它收集了拜占庭时代的一些不太知名的编年史，包括卡西俄多鲁斯、普罗斯佩尔·蒂罗、希达提、特别是维塔的维克托和科里普斯的著作。最后的两位作者最值得注意。维克托的著作是关于汪达尔人时期的，科里普斯的著作是关于拜占庭时期的，因为他们都深入过非洲内地，使人对于长久被人遗忘的那个最神秘的非洲有所了解。[21] 查尔斯·迪尔在其论述拜占庭时代非洲的经典著作中提

[20] 见蒙森（Mommsen）主编《大日耳曼历史参考文献》，第九卷第1、2册（1892年），第十一卷（1894年）和第十三卷（1898年），维塔的维克托（Victor Vitensis）的著作收在C. 霍尔姆（C. Holm）编的第三卷第1册（1879年），科里普斯（Corippus）的著作收在J. 帕尔奇（J. Partsch）编的第三卷第2册（1879年）。

[21] 关于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的非洲，现有两部提供可用资料的细目的现代权威著作：C. 库图瓦（C. Courtois），1955年和C. 迪尔（C. Diehl），1959年。S. 格塞尔（S. Gsell）的著作（巴黎，1920－1928年）虽然有些陈旧，但仍值得参考。

出，如何结合使用考古资料与文字资料，以便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实。他尽可能广泛利用文字资料：首先是普罗科匹厄斯的著作，其次是科里普斯的著作，以及阿加提阿斯、卡西俄多鲁斯、乔吉斯·西普留斯㉒的著作、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信函、《新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等。这对于考察社会经济生活大有裨益。 99

看来，很难指望有任何新的发现来丰富现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文献，办法是对于这些文献进行更充分的研究、严格的考证，根据考古和铭文资料（这是尚未充分利用的）对他们进行校勘，总之，以更忠实、更客观的态度使用。㉓

撒哈拉和西非

严格地说，关于西部黑非洲，现在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赞同莫尼的看法㉔，认为古代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活动从未超出朱比角和加那利群岛范围，现在的可能性则大些，那么他们著作中的资料所谈的是摩洛哥最南边的地区。可以肯定，他们曾到过黑非洲的边缘，但未深入进去。

《汉诺周游记》一书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是伪造的。㉕它是从希罗多德、波里比阿、波赛多尼乌斯、假斯基莱克斯的著作中抄袭拼凑的，是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的作品。而上述作家的原作则是更严肃认真的。希罗多德报道了迦太基人在摩洛哥南部的没有记载的贸易活动。假斯基莱克斯的继承者（我们纪元前四世纪）则提供了有关迦太基人与利比亚柏柏尔人关系的宝贵资料。但主要的是波里比阿的著作，再次被证明是最准确的资料。大普林尼的著作所引用的他的片断文字给我们留下最早可辨认的古代地名。但这些资料也以朱比角为限。关于加那利群岛的情况，还需要普林尼收集的尤巴二世的告示等加以补充。斯特拉波、西西里人狄奥多洛斯以及我们纪元前后几个世纪的其他史学——地理学家除了补充个别细节外，都是编纂以前作家的资料。最后，在我们纪元二世纪，托勒密继续所有前辈的工作，特别是依靠波赛多尼乌斯和提尔的马里努斯的著作，在其《地理学》一书中最详尽地记述了古代有关非洲概貌的知识。㉖这位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地理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利比亚内域”的舆图。这是他根据罗马军队在几次出师帝国边塞之外、远至费赞讨伐途中获得的资料绘制的。这几次远征是我们纪元前19年巴布斯远征、我们纪元70年弗拉库斯远征、86年马泰尔努斯远征。最后一次最远到了利比亚沙漠。㉗ 100

某些民族和地区的古代名称一直保留下来，如毛里塔尼亚、利比亚、加拉曼特人、盖图莱人、努米底亚人、赫斯佩里德人，甚至象尼日尔这个由托勒密提出、被利奥·阿弗里卡纳斯以及近代欧洲人所接受的名称。这是现有文字资料提供的一项内容。此外，这些资料给我们的是古代对于非洲的印象而不是实际的资料。零散出现的少数资料所涉及地区集

㉒ 《罗马世界志》，H. 格尔泽(H. Gelzer)，1890年。

㉓ 关于因片面理解文字资料造成的曲解，A. 拉鲁伊(A. Laroui)对西方史学的批评非常贴切、见识也很广博。

㉔ R. 莫尼(R. Mauny)，1970年b，第87-111页。

㉕ 同上，第98页；H. 托克西埃(H. Tauxier)，1932年，第15-37页；G. 热尔曼(G. Germain)，1957年，第205-218页。

㉖ Y. 卡马尔(Y. Kamal)，《非洲和埃及地图集成》，第二卷，第1分册，第116页及以后各页；R. 莫尼，1947年。

㉗ 提尔的马里努斯(Marinus)对此有所论及，托勒密(Ptolemy)引为资料；参见Y. 卡马尔，第一卷，1926年，第73页。

中于利比亚沙漠和西撒哈拉海岸。西部黑非洲依然在这些文字资料之外。

第一伊斯兰时期(大约650-1050年)

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和哈里发体制的确立，先前分属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区域归为一统，人文地理区域扩大了，商路改变了，对以往不为外界所知的民族有了深入的了解。因此毫不奇怪，这时我们开始有了关于黑非洲(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的日益准确的资料。但是，黑非洲与埃及、马格里布不同，埃及和马格里布已成为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共同体的实际组成部分，而黑非洲仅仅处于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之外。因此，现有关于黑非洲的资料零零散散，互不衔接，有时玄虚无稽，但仍然很有价值。

档案资料是埃及特有的并一直延续着的传统(阿芙罗狄蒂的希腊纸草和科普特纸草、法尤姆和艾什穆奈因的阿拉伯纸草[28]以及十世纪法蒂玛王朝时为数不多的档案)，除了这些档案资料以外，现有的大多数文字资料对整个非洲来说都是共同的，不管是广义上的记叙资料还是间接资料。这是地理著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许多法律文献中也明显可见到。因此，今后按类型编排现有资料的目录似乎比较适当，虽然，我将说明时间顺序，同时也照顾史料构成的地区差别。

编年史

(a) 现有的编年史都是八世纪以后的。在八世纪，口头资料正在形成，埃及是除非洲东海岸以外的不容置疑的中心，它与伊拉克南部有直接的商业联系。但是，埃及、马格里布都不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更不必说苏丹了。因此，甚至当九世纪阿拉伯历史学突然兴起时，重要的史籍[29]，如塔巴里的史著、迪奈维里的史著、拜拉祖里的《贵族系谱》等对于这些地区都不予重视，他们集中注意的是东方。只有不久前几乎无人知晓的纪年表，即哈里发·本·海亚特的《历史》[30]例外。这部书不仅是阿拉伯最古老的纪年表(哈里发卒于伊斯兰历240年)，而且还保留了塔巴里所忽视的古代资料。其中特别是有关征服马格里布的章节具有极高的价值。麦地那的《武功纪》传统是对征服埃及和马格里布一事轻描淡写，而只有拜拉祖里的《征服诸国》一书提供了毫不修饰的基本事实。埃及法学家伊本·阿卜杜勒·哈克姆选择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写出了九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他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31]一书表面

101

[28] A. 格罗曼(A. Grohmann)是这方面的权威，1934-59年和1955年。H. 贝尔(H. Bell)对希腊和科普特纸草有所研究。关于法蒂玛档案，参见沙雅尔(Shayyal)，1958年。

[29] 但应当指出，最早的阿拉伯史学家之一欧麦里·本·沙巴(Umar b. Shabba)给我们留下最早论述黑非洲民族的阿拉伯证据。它的文本被塔巴里(Tabari)抄录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见第七卷，第609-614页。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关于伊斯兰历145年即我们纪元762年麦地那的苏丹人起义。它是这一时期非洲人重要活动的最早记录。这个资料至今无人评注。

[30] 此书由欧麦里(Umari)编辑出版(纳贾夫(Najaf)，1965年)，由A. S. 阿里写前言。

[31] 此书在1922年由托里(Torrey)编辑出版，加托(Gateau)翻译了部分章节，1961年由开罗艾米尔出版社再版。关于引用时的注意事项可参见R.布伦什维格(R. Brunschvig)，1942-1947年。笔者认为，布伦什维格带着苛刻的批评态度进行的研究无损于这个资料的价值。这个资料是关于埃及的基本资料，对于易弗里吉叶(Ifriqiya)很有用，对于黑非洲也很重要(譬如布伦什维格在其他文章中否定的关于欧格伯与费赞之间可能存在的接触，与努比亚人签订的著名的巴格特条约)。

上类似一部编年史或《武功纪》，实际上是一部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法律传统的汇编。[32]

(b) 在一个世纪之久(850－950年)的"沉寂"[33]之后，出现了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肯迪(卒于961年)著的《埃及文官和法官列传》。这部著作至今似乎尚未研究透彻。这是一部传记著作，而不是一部编年史，但也可以视为编年史。它不仅有埃及的第一手准确资料，而且由于记载了埃及与马格里布的早期联系而成为现有关于八世纪马格里布的最可靠的资料之一。[34]十世纪是伊斯兰教，首先是非洲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派兴盛的世纪。因而，什叶派著作，如《侍从加法尔年鉴》，尤其是卡迪·努曼的《药书开篇》可供我们查阅。后者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尽管它没有提供很多历史年代，但载有关于法蒂玛运动起源的丰富资料。[35]

(c) 十一世纪前半期，拉基克(卒于1028年)的名著《历史》问世。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据说，原作已经遗失。但此书的精华部分为稍后的编纂家如伊本·伊达里所吸取。不久前(1968年)，摩洛哥人曼努尼发现了论述伊弗里基叶时代早期的残卷，并在突尼斯予以公布。但这是不是拉基克的作品，尚不能肯定。[36]所有这些编年史籍几乎都未提到黑非洲。而且，史学家在使用这些编年史籍时，需要严格考证、不断地与其他史籍中的其他资料以及源于其他地方的资料相互核对。而首要的是，研究马格里布和埃及的史学家不能局限于这些编年史，充分了解东方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正在使用这些资料，还必须精读古典时代的东方编年史。

地理资料

从九世纪以来，有大量重要地理资料。其种类计有：以花拉子密的著名《地形图》为代表的制图学、行政地理(《地方和道路志》)以及统属于多少带浪漫色彩的游记。不论阿拉伯地理著作属于哪一类，它们表现了一种希望从整体上了解人们借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愿望。因此，很自然，黑非洲在这些著作中应当得到反映，而这些著作也就成为我们了解黑非洲的基本资料。库贝尔和马特维耶夫编辑了到十二世纪的著作的最完备的目录。[37]在40个论述黑非洲的作者中，有21人是地理学家，这些人的资料是最丰富的。但是若要真正从这些资料得到真正好处，必须根据阿拉伯的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些阿拉伯地理著作。譬如，书中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反映纯文学的陈旧题材及其各个组成部分？[38]哪些是承袭了希腊的、伊朗的或纯粹阿拉伯的遗产？哪些是编纂

㉜ E.莱维-普罗旺萨耳(E. Levi-Provencal)发现并推崇的晚近编纂家奥贝德·阿拉·本·萨利赫(Ubayd Allah b. Salih)的著作作为关于征服马格里布的新资料并没有提供很多东西，1954年，第35－42页。莫尼在其《图表》(1961年)中(第34页)沿袭了莱维－普罗旺萨耳的评价，对阿拉伯资料的分析虽然很缜密，但并不吹毛求疵。

㉝ 这一时期只有少数几部值得注意的作者不详的编年史，如假伊本·库特巴(Pseudo-Ibn Qutayba)著的《政治对信仰的启示》(开罗，1904年)和《编年史丛书》(马德里，1867年)。

㉞ 1912年由R.格斯特(R. Guest)编辑出版；1959年在贝鲁特重新编辑出版。

㉟ 此书由M.达什拉乌依(M. Dachraoui)在突尼斯和贝鲁特出版。

㊱ M.塔尔比(M. Talbi)断然否定拉基克(Raqiq)的著作权，见《突尼斯丛刊》，第19期(1971年)，第19页及以后各页。说服力不强，因此问题仍悬而未决。

㊲ L. E.库贝尔(L. E. Kubbel)和V. V.马特维耶夫(V. V. Matveiev)，1960年和1965年；并参见J.库克(J. Cuoq)，1975年。

㊳ A.米凯尔(A. Miquel)，1967年和1977年。

102 表格 5.1 主要文字资料的编年表

时间 我们纪元前	编年史 年代表	地理学 游记等	法律、宗 教著作	文学著作
	记叙资料			
2065				
1580				
800				荷马史诗
			《列王记》（前 586 年）	
500				
	希罗多德（485－425年）			
300	《埃及通俗文编年史》			
200	波里比阿（200－120年）			
100	狄奥多洛斯	斯特拉波伪造的《汉诺周游记》		
	撒路斯特（87－35年）			
我们纪元				
	大普林尼			
100	塔西佗			
	普鲁塔克			
200		托勒密《红海巡航记》（230 年）	圣西普里安（200－258年）	
300				
			圣奥古斯丁（354－436年）	
400				
500	普罗科匹厄斯（492－562年）			
		“印度旅行家”科斯马斯（约 535年）		
622				
		法扎里	《圣训易读》	
800	伊本·阿卜杜勒·哈克姆（803－871年）	花拉子密（833 年以前）		
			《记事》阿赫卡姆·塞克	贾希兹
		亚库比（卒于 897 年）		

档案资料			
官方记录	私人文件	时间 我们纪元前	历史背景
		2065	中王国
埃及僧侣纸草、陶片		1580	新王国
		800	建立迦太基 古埃及晚期
	埃利方太尼犹太人纸草	500	
		200	罗马托勒密王朝 征服非洲(146年)
		100	非洲罗马化
查士丁尼新法典			
		200	亚历山大学派鼎盛时期
		300	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化及基督教化(333年)
		400	
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纸草		500	拜占庭对非洲的再次征服(533年)
		622	穆罕默德前往麦地那 阿拉伯扩张 伍麦叶王朝(661－749年)
	阿芙罗狄蒂的阿拉伯语纸草	800	阿格拉布王朝(800－910年) 僧祇的暴动(868年)
法蒂玛王朝的非洲书信			

104 表格 5.1 续前

		记叙资料		
时间 我们纪元前	编年史 年代表	地理学 游记等	法律、宗 教著作	文学著作
900	基尔迪	马苏第(活动高峰于947年)	卡迪·努曼(什叶派) 阿布·阿拉伯(逊尼派) 伊本·萨吉尔(哈列哲派)	
		伊本·豪卡勒(活动高峰于977年)		
1050	拉基克(卒于1028年)			
		白克里(活动高峰于1068年)	马利基	
1100	不具名的《研究》	伊德里西	阿布·扎克利亚 迈赫祖米	
1150				卡迪 法迪尔
1200	伊本·阿西尔(活动高峰于1234年) 伊本·伊达里	亚库特(活动高峰于1229年) 伊本·赛义德(1286年以前) 阿卜达里(活动高峰于1289年)	哈夫斯·马纳吉卜	
1300	努韦理 伊本·阿比·扎尔 达哈比 伊本·哈勒敦	欧麦里(卒于1336年) 伊本·巴图塔 提贾尼	埃塞俄比亚庙宇手稿	
				萨法迪
		克莱斯克《马约尔卡地图集》(1375年)		
1400	伊本·台格利巴尔迪			
1450	祖拉拉	麦格里齐		

档案资料			
官方记录	私人文件	时间 我们纪元前	历史背景
法尤姆和艾什穆奈因的阿拉伯文纸草		900	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统治的确立(969年)
		1050	
埃及的法蒂玛档案 阿尔莫拉维德人书信	吉萨		希拉尔人在易弗里基叶 阿尔莫拉维德人征服加纳(1076年)
乌姆·吉尔米的特许状 阿尔莫哈德人书信		1100	
	吉萨	1150	阿尔莫哈德在马格里布 阿尤布在埃及
		1200	哈夫斯王朝在伊弗里基叶
意大利文献	意大利文献		马里尼德在摩洛哥 马木路克在埃及
公产证书		1300	
	法特瓦		马里帝国 曼萨·穆萨(1312－1335年)
盂勒盖山迪			
		1400	马里帝国崩溃及桑海帝国出现 葡萄牙人占领休达(1415年) 葡萄牙人发现博贾多尔角(1434年)
麦格里齐		1450	

他人成果，哪些是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史学家还必须从资料内部来研究这些资料，即依据全面的非洲史知识来考证这些著作。当然，他必须注意，不能仅凭实际上属于地理学的资料来了解历史。但是，那种出于对伊斯兰教的厌恶[39]或出于对内向的泛非主义的不应有的担心而不认真研究的观点即纯粹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不能允许的。[40]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家几乎都多少论述过非洲，但只有极少数人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这些人是伊本·库达特拔、亚库比(卒于897年)、马苏第(活动最盛时是965年)、伊本·豪卡勒(活动最盛时是977年)。[41]比鲁尼·亚库比游历过埃及和马格里布，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两个地区的大量描述。他在《历史》和《地方志》两书[42]中记载了有关黑非洲的大量情况，其中涉及埃塞俄比亚、苏丹、努比亚、巴杰和僧祇。在有关苏丹的篇章中，他提到了加奈姆的扎加瓦人，描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他记述了强大的加纳王国，并在这方面探讨了黄金问题，就象他在谈到费赞时，论述奴隶问题一样。伊本·豪卡勒的《地形书》[43]资料更为详实。他游历过努比亚，可能还涉足过西苏丹。他的记述文字的特殊价值在于提供了关于马格里布和苏丹的贸易关系的情况。十世纪的其他地理学家几乎都对黑非洲有所记载。伊本·法基记述了加纳和库库的情况，旅游家布祖尔格·伊本·沙里亚尔记录了在东海岸和僧祇的见闻，穆哈拉比在其论文中保存了欧斯瓦尼的著作片断。最后还有马苏第的《黄金的土地》(965年)，通篇都是有关僧祇和东海岸的资料。上述这些著作很早就受到非洲学专家和东方学专家如德拉福斯、塞鲁利、[44]克雷默斯[45]和莫尼[46]的重视。

法律和宗教资料

从萨赫嫩的《纪事》到哈列哲教派论文的这一时期的法学论文和传记体的圣徒列传都是关于马格里布的资料宝藏。其中有些著作对于研究与黑非洲接壤的撒哈拉地区也有用。在伊本·萨吉尔著的塔赫尔特地区罗斯塔姆王朝编年史(十世纪初)[47]中，我们发现，在八世纪末伊巴迪亚教派封邑与加奥之间就有商业联系。如果我们结合这部编年史，在稍后使用维斯亚尼编辑的《商旅》这类书，我们所发现的贸易范围会扩大到整个北非撒哈拉边界。不过，这些圣徒列传中的资料只是以引喻方式透露情况。查阅时，必须参照已确定的基本历

[39] 关于这一点参见L.弗罗贝尼乌斯(L. Frobenius)以及J.鲁什(J. Rouch)的强烈批评论点，1953年，主要谴责在苏丹编年史籍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失实。

[40] 的确，这些资料主要论述的是苏丹地带，因此不借助考古学而单纯查阅阿拉伯资料可能导致错觉。但是如果说阿拉伯作家不够客观，也不属实，而如果责备这些作家，说他们的作品杂乱无章，那就无异于只要史学家的文学观点而不要史学家的社会观点，N.列夫吉翁(N. Levtzion)所表达的观点是恰如其分的。类似的观点可见I.赫贝克(I. Hrbek)给维也纳举行的第12届国际历史学大会所写的文章(《文件集》，第311页)及以后各页。还可参见T.莱维基(T. Lewicki)，1971年和1969年。

[41] 见教科文组织《信使》，1974年6月号。

[42] 亚库比的《地方志》与大多数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由M. J.德胡耶(M. J. de Goeje)于1879～1894年发表。见第七卷。G.维厄(G. Wiet)的译文《地方志》很有用但并非完全准确。

[43] 《地形书》，上引书第二卷；L. E.库贝尔和V. V.马特维耶夫，1960年和1965年，第33页以后各页。

[44] E.塞鲁利(E. Cerulli)，1931年。

[45] 《伊斯兰百科辞典》"地理"(Djughrāfiyā)条，L.克雷默斯(L. Kramers)，1938年。

[46] 莫尼的《图表》第一章对地理资料做了系统的编目。

[47] 此书载于1908年出版的《第14届东方学者国际会议文件集》第三部分，T.莱维基(T. Lewicki)对此有所研究，1971年。

史线索，而且需要经常与其它资料核对。依笔者所见，对这些资料不能做出莱维基那样大胆的解释和推论。

第二伊斯兰时期(1050 - 1450年)

这漫长时期的特点是资料丰富、质量良好、种类繁多。与文学作品相比，档案资料仍居第二位，但价值却不相上下，譬如吉萨文献、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的信函、公产证书、法特瓦、意大利文献、收入大型汇编中的官方文件等。编年史家撰写了第一流的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记载了作者对当代事件的观察，而且在于抄录了现已遗失的古代资料。最后，由于新的非洲文献以埃塞俄比亚人手稿形式出现，我们对于黑非洲的了解达到了顶峰。

档案资料

(a) 档案资料几乎只与埃及和马格里布相关。现有的开罗吉萨文献涉及第二伊斯兰时期。然而，其中多数属于法蒂玛时代，只有少数属于马木路克时代。这些文献是反映埃及和其他地区的犹太居民专心致志精神的家书和商业信件的残存部分。这些书是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字母写的，没有署日期。使用这些书信，在技术上要相当小心。但它们毕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料宝藏。[48] 在私人档案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公产证书和法特瓦。前者是开罗登记处[49] 所保留下来的，大量属于马木路克时代，后者属于哈夫斯时代。

(b) 另一方面，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埃及和马格里布的欧洲文献一部分成了私人资料，一部分是官方资料。它们被保存在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巴塞罗那的政府和私人档案馆，包括协议、契约和书信，一般都与商业有关。阿马里和马斯 - 拉特里所发表的仅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50] 就总体而言，这批文献数量很大。使用这些文献可以扩大我们对于经济和社会史的调查领域。 109

(c) 严格来讲，关于这一时代的情况没有国家档案。不过，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某些官方文件被保存下来并已发表，这使人们对这两次帝国运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和机构有了新的了解。[51] 关于这点，拉鲁伊说："人们开始从内部考察阿尔莫哈德教派。撰写这个王朝的宗教与政治史不再是无从下手了。"[52] 稍后一个时期，在埃及出现了历史法律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们编纂了数量可观的官方文件。他们对埃及财政和立法机构的详尽描述--般是依据国家文献。在这类档案和编年史各半的著作中有买买提的《政府法典汇要》(阿尤布时期)，盖勒盖山迪的《夜盲者的曙光》(十四世纪)和麦格里齐的大量著

---

[48] 在这方面S. D. 戈伊坦(S. D. Goitein)是权威，见他为《伊斯兰百科辞典》撰写的"吉萨"条目和他的著作，1960年、1967年、并见 S. 沙克特(S. Shaked)，1964年；H. 拉比(H. Rabie)1972 年，第 1 - 3 页。很多这类文献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

[49] H. 拉比，1972 年，第 6 - 8 页和第 200 页。

[50] M. 阿马里(M. Amari)，1863 年；L.马斯-拉特里(L. Mas-Latrie)，1866 年。

[51] H. 穆尼斯(H. Munis)和 A. M. 马基(A. M. Makki)编《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官方书信集》；E.莱维 - 普罗旺萨耳(E. Lévi-Provençal)、拜达克(al-Baydaq)编译《阿尔莫哈德王朝官方书信 37 件》，1928 年。

[52] A. 拉鲁伊(A. Laroui)，1970 年，第 162 页。

作，尤其是他那部极其珍贵的《埃及志》(十五世纪)。[53] 麦格里齐的著作不仅对于研究伊斯兰埃及的整个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努比亚、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都是很好的资料。

记叙资料

(A) 编年史

十二世纪是一个沉寂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我们只能找到一部不具名的著作《研究》以及少数几部小作品。而在十三、十四世纪，我们获得了从一切观点来看都丰富的编年史籍大丰收：自伊本·阿西尔的《历史大全》迄伊本·哈勒敦的《殷鉴书》，中间尚有伊本·伊达里、努韦理、伊本·阿比·扎尔以及达哈比的著作。这些作家除了谈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外，还致力于综述以往时代的事件。努韦理的著作不仅对研究马木路克时代，而且对研究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54] 的征服也有价值。伊本·伊达里的著作对研究阿尔莫哈德王朝和整个伊弗里基叶历史有重要意义。伊本·哈勒敦关于柏柏尔社会的学说使他成为非洲历史的最高权威。

(B) 地理著作

在这四个世纪期间，地理论著数量很多，但其价值则因作者和所描述的地区而异。其中两个地理学家以其资料的广博和精粹而超群出众，这就是十一世纪的白克里(活动最盛时是 1068 年)和十四世纪的欧麦里(卒于 1342 年)。伊德里西的名著值得商榷，而且还有争议，但从一些不大闻名的地理著作，如对苏丹颇为注意的伊本·赛义德的著作中可选出原始资料。[56]

110

白克里的《列国道路志》[57] 一书代表现有资料中关于马格里布和苏丹的地理知识的最高水平。作者并未亲自游历过这些国家，但他很善于利用现已遗失的瓦拉格的笔记和商贾游客的第一手资料。伊德里西的《罗吉尔之书》(1154年)大量借鉴了前人成果。这部书对埃塞俄比亚的记述相当混乱，而有关西非的记载则比较准确。书中不时有些原始记录，有的很有价值。

伊本·赛义德·加尔纳提的《地理学》(写于 1286 年以前)一书对于埃塞俄比亚的记述尽管有些新资料，但基本上抄自伊德里西。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苏丹所作的记述，但大部分是依据十二世纪旅游家伊本·法蒂玛的著作。

对于研究黑非洲的史学家来说，十四世纪的主要著作是欧麦里的《鉴别之路》。[58] 这部著作是第一流观察家的证言，是我们研究马里王国内部组织以及马里与埃及、伊斯兰教关

---

[53] H. 拉比，1972年，第10-20页。

[54] 麦格里齐的《知识》一书提供了埃塞俄比亚穆斯林诸王国的名册，尽管这个资料确是抄自欧麦里 (Umari) 的。1790年在莱顿出版了节本：《阿比西尼亚伊斯兰王国史》。

[55] 然而，有关篇章至今未整理出版。

[56] 关于详尽的地理学家的名册，见 L. E. 库贝尔和 V. V. 马特维耶夫，1961 年；作为补充材料可参见 R. 莫尼(R. Mauny)1961 年著作第一章，T. 莱维基 (T. Lewicki) 1971 年的短评和 A. 米凯尔(A. Miquel)的论著的前言，1967 年。

[57] M. 德斯莱恩(M. de Slane)编译：《北非志》。

[58] M. 戈德弗鲁瓦·德蒙比内(M. Gaudefroy-Demombynes)选译：《埃及以外的非洲》。

系的主要资料，也是阿拉伯关于十四世纪埃塞俄比亚穆斯林诸国的资料中最详细的叙述。欧麦里除作了有趣的描述外，还提出了黑非洲的国家起源问题和伊斯兰化问题。这与三个世纪前白克里提出大宗黄金贸易问题颇为相似。白克里的著作涉及到马格里布与苏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欧麦里的著作则涉及到黑非洲与埃及关系的日益密切。伊本·巴图塔是研究苏丹和马格里布实况的直接观察家，他的著作是对欧麦里的著作的补充。

不过还有许多不太重要的地理学家和旅游家，如祖赫里(十二世纪)、亚库特、迪马什基(十四世纪)、所谓"穆扎法尔地理学"的作者、伊本·祝拜尔、巴格达迪、阿卜达里、提贾尼、巴拉维、希姆亚里，他们的著作都应当参考。

（C） 宗教资料和神灵文学

宗教资料的背景是多种多样的，有《传记》作品，逊尼派、哈列哲派、马拉布特教派、甚至科普特基督教的圣徒列传。还有埃塞俄比亚教会手稿，手稿的空白处抄录着官方文件。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价值，不仅使我们了解宗教感情和有关的宗教世界，而且使我们加深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认识。如马利基的《利雅得》和艾亚德的《探索》这类著作中有关社会学问题的随笔比比皆是。哈列哲派资料对于整个马格里布撒哈拉地区无疑非常重要，这一地区是与黑非洲有联系的地区。这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斯亚尼、达尔吉尼、阿布·扎克里亚、以及稍后的沙马希。最后，中世纪埃及地方教会所撰著的全部浩繁的阿拉伯文和科普特文著作揭示了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教会上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59]这一时期的宗教文学资料很丰富，几乎只同马格里布和埃及有关。在这类资料中，卡希·法希尔的《论文集》，尤其是萨法迪编纂的大辞典《已故名人传略》占有特殊的地位。

总之，与前一时期相比，第二伊斯兰时期的现有文献数量大、种类多，而且总的来说质量较高。在真正的伊斯兰非洲，作家不再满足于描绘简单的政治轮廓，而是注重说明机构的活动和历史深处的潜流。我们对于黑非洲的认识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只是在欧洲文献和当地文献问世以后，我们才进一步深入，把研究领域扩大到迄今还处于无法测知的神秘状态的地区。

结 论

如果认为十五世纪以前非洲大陆的文字资料是令人绝望的匮乏，那就错了。不过，非洲的文字资料总量要远远少于欧洲和亚洲，这一点是属实的。然而，尽管在非洲大陆的很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文字资料，但对于其余地区，不仅能够了解其历史，而且，拿埃及来说，可以凭借极为丰富的文献去了解。这就意味着，即便没有发现新资料(这似乎也不大可能)，但只要审慎而得当地利用现有资料，仍可大大扩充我们的知识。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展开对资料原文的考证、重编、校勘、翻译工作。这项工作早已由少数人创始，还必须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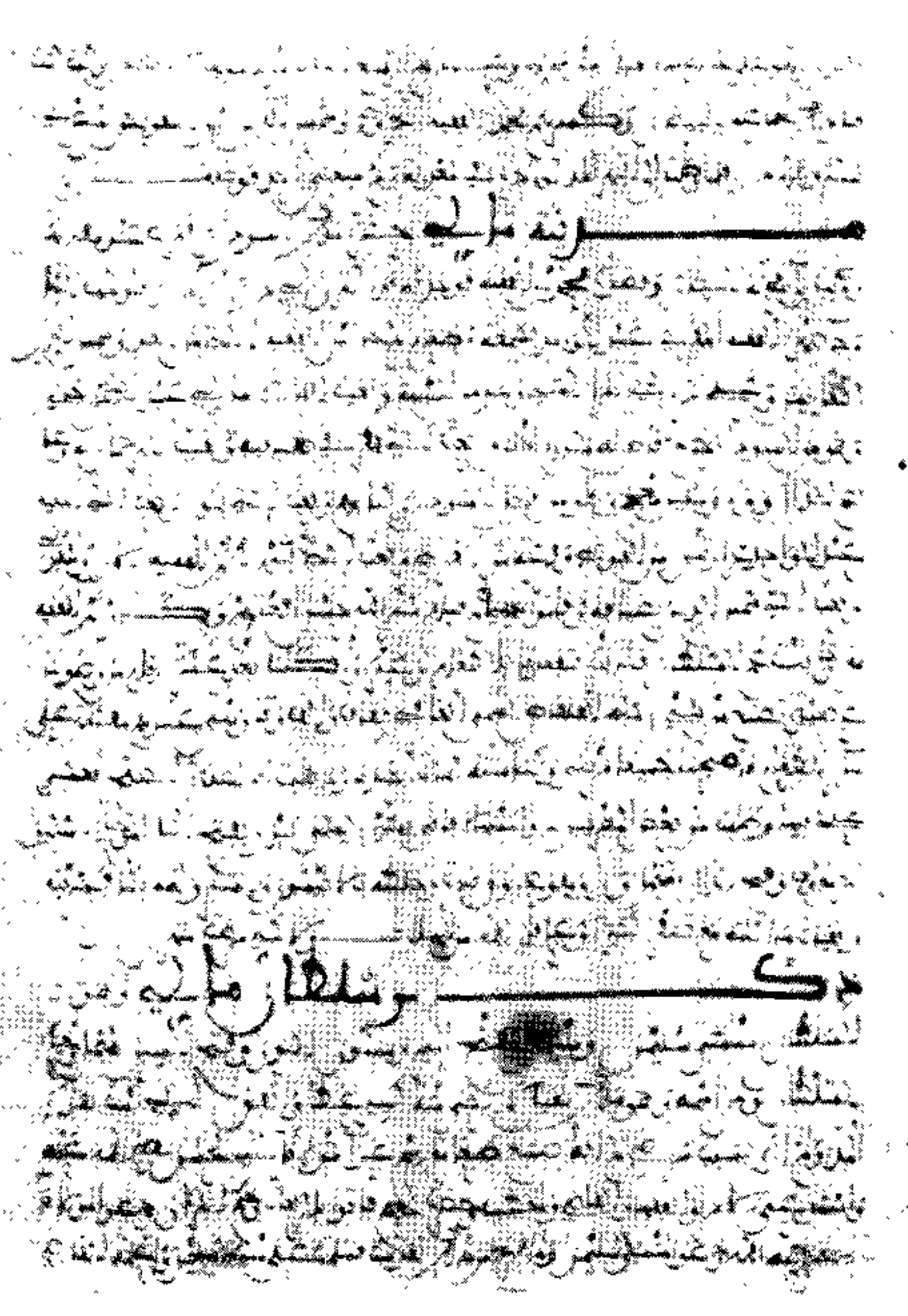
---

[59] 这方面的主要汇编是《东方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其中与我们有关的首先是亚历山大的塞维鲁(Severus)（十世纪）和伊本·穆夫拉(Ibn Mufrah)（十一世纪）的著作以及论述埃塞俄比亚的《主教大人纪事》。并参看叙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著，查博特(Chabot)编译的三卷本(巴黎：1899年，1910年)。

最后，虽然我们的资料是在放眼非洲以外的世界文化——古典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范围内撰写的，但是这种资料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们大多有共同点，从而可以联系非洲的情况来理解。当然，在遇到意识形态的猜想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阿拉伯文资料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阿拉伯文资料仍然是我们的知识的主要基础。这些资料相对或绝对地不了解 112 所论及的问题，这一点除了说明空间距离外，丝毫无损于资料的价值。因此，一方面必须承认社会文化差别，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这些资料显示了非洲的某种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伊斯兰和非洲学者至今并非总是清楚的。

（刘北成译）

113



照片5.1　阿拉伯文手稿（巴黎国家图书馆第2291号，第103页。伊本·巴图塔手稿（第二部分）对马里的记述）



十五世纪以来的文字资料

I. 赫尔贝克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世界，特别是非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关非洲历史的文字资料的性质、来源和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与前一时期相比，从这个时期的大量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新的趋向。有些资料涉及整个大陆，另外一些则仅涉及大陆的某些地区，主要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首先，随着各种记叙资料(游记、叙述、描写、编年史等)的不断增加，出现各种类型的原始资料，如官方的、商业的和教会的信函和报告、法律契约以及其他档案性质的资料。在此之前，这些资料只有零星发现。现在这类资料日益丰富，给了史学家更大的帮助，但同时也使得对资料的全面调查更为困难。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阿拉伯记叙资料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里，土著居民用阿拉伯文写的历史文献问世了，只是从这时起，我们才有可能听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讲述自己历史的声音。这地方编史工作的最早和最著名的例子出自苏丹地带和东非海岸，而在赤道非洲其他地区只是在以后才有类似的发展。

在最近二百年间，非洲人也开始用自己的文字写作。最初是用阿拉伯文字(譬如斯瓦希里文、豪萨文、富尔富尔德文、卡嫩布文、久拉文、马达加斯加文等)，后来改用拉丁字母。也有用真正的非洲文字，如巴蒙文和瓦伊文写的历史(及其他)资料。

第三种趋向是前一种趋向的必然结果，即出现了由居住在美国但仍记忆着自己的非洲历史的非洲人(被解放的奴隶或其后裔)用英文(以及在较少程度上用其他欧洲文字)撰写的作品。

最后是，外来的阿拉伯文资料逐渐被各种欧洲语文的记叙资料所代替。这种文献的数量不断增加，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仅仅是有关的文献书目就数以十计了。

当然，在非洲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埃及、马格里布和埃塞俄比亚，历史编纂工作不仅有变化，而且也有延续。那些地区的编年史家和传记作家保持着前一时期的传统。虽然在埃及，在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这类著作的质量、甚至数量有所下降，但在马格里布，特别是在摩洛哥，有才华的学者仍然辈出，他们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可观的。

资料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文字资料论及的地理区域。十六世纪以前，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是以苏丹的萨赫勒的边缘地带和东非海岸的狭长地区为界限的，而新的历史时期则逐渐扩大到资料过去未触及的新地区。当然，在不同地区，这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有所不同，

而且各个世纪情况也有变化。更复杂的是按照这些文献的文种、性质、目的和起源进行分类。

总的说来，文字资料是从沿海扩展到内地的。但这种动态相当缓慢，到十八世纪末才真正加快了速度。早在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就已粗略地描述了非洲海岸及其毗邻的内陆地区。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使用多种语文写出的文字资料开始比较详细和丰富地介绍沿海各民族。欧洲人只深入到少数内陆地区（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尼日尔河三角洲和贝宁、刚果王国领域以及沿赞比西河到莫诺莫塔帕帝国），从而把这些地区纳入有文字记载的范畴。同时，一些实际上从未被触及的地区日益被世人了解，即西南非海岸或马达加斯加。

阿拉伯文的资料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苏丹编史派除提供以前不了解的地区的情况以外，还向其他地区，主要是向南扩展。因而，到了十九世纪，可以说，撒哈拉和森林地带之间的整个地带，甚至远至沿海的某些地点，当地文字资料都有所记载。不过，大部分内陆地区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可靠的文字记载。

即使在沿海地区，各地的历史资料状况也有很大差别。整个来说，有关大西洋海岸的文献多于有关东海岸的，有关古代刚果、塞内冈比亚以及帕尔马斯角到尼日尔河三角洲之间的沿海地区的资料远远多于有关利比里亚、喀麦隆、加蓬或纳米比亚等地区的资料。这种状况也因时期不同而异。十六、十七世纪有关东海岸、贝宁和埃塞俄比亚的文字资料远远多于十八世纪。而有关撒哈拉的资料，十九世纪前半期比后半期多。

116

由于资料在空间、时间、性质、起源和文种各方面都存在不同情况，因此在讨论资料时最好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而不偏执一种方法。因此，我们在介绍资料时，有些按照地区，有些则根据资料的起源和性质。

北非和埃塞俄比亚

北 非

有关说阿拉伯语的北非地区的资料与有关大陆其他地区的资料一样，与前一时期相比都有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没有特别影响当地的历史著述。这些著述象过去一样，仍以传统方式逐年记录着大事。在以后的年代史专家和编纂家中，没有出现能与中世纪阿拉伯伟大史学家相提并论的杰出人物。伊本·哈勒敦所倡导的历史考证法没有被后人所继承下来。一直到二十世纪，现代阿拉伯历史编纂学才诞生。

变化主要关系到两类资料：不同来源的档案文献以及欧洲人的报告。直到十六世纪初，主要资料（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资料）才开始日益丰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都不亚于欧洲史料最丰富的国家，但这些档案至今很少为研究非洲这部分地区的史学家所利用和研究。同一时期，在成为奥斯曼帝国部分地区的国家（埃及、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次要的档案。①摩洛哥的情况特殊。它的档案馆保存

① J. 德尼(J. Deny),1930年；R. 芒特朗(R. Mantran),1965年；R. 勒图尔诺(R. le Tourneau),1954年。

着整个独立时期的丰富史料。② 它所保存的文献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档案。而有关贸易、生产、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资料较少，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是这样。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给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提供这种珍贵资料的私人档案。对某些国家和一些时期来说，这种缺陷可以弥补。譬如，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现的关于摩洛哥的资料已收入亨利·卡斯特里的不朽著作，并予以发表。③ 对有关其他北非国家的资料进行类似的汇编，至少编出目录，是近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117

现在再来看阿拉伯文记叙资料。我们会发现，历史著作的质量和数量都在不断下降，只有摩洛哥例外。摩洛哥传统的编年史学派在继续撰写上起两个谢里夫王朝，下至当代的详尽历史。这方面的例子有莫赫塔尔·苏西撰写的20卷《殷鉴》以及目前正在发表中的《得土安史》。④在连续不断的史学家行列中，我们仅能列举最卓越的一些。乌弗拉尼（约卒于 1738 年）是研究萨阿德王朝的杰出史学家。他的著作记述了 1511 至 1670 年的历史。⑤尔后一个时代（1631 至 1812 年）则有幸被中世纪以来摩洛哥最伟大的史学家扎亚尼（卒于 1833 年）详尽记载了下来。⑥ 纳西里·斯拉维（卒于 1897 年）把传统方法和近代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档案资料，写了一部重点放在十九世纪的本国通史。他还撰写了一部地理著作，提供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大量资料。⑦除了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外，还必须提到游记。游人大多是香客，他们不仅记述了摩洛哥，而且还记述了远至阿拉伯半岛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最好的两部游记是锡吉勒马萨的阿雅希（卒于1679 年）和撒哈拉边缘塔姆格鲁特的艾哈迈德·达尔希（卒于 1738 年）撰写的。⑧ 另外两部有趣的作品是1581年至1591年摩洛哥驻土耳其宫廷大使塔姆赫鲁提写的报告和摩洛哥驻马德里宫廷大使伊本·奥斯曼写的《比赫拉》。⑨

位于摩洛哥和埃及之间的几个国家的当地编年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略有逊色。在阿尔及利亚，有作者不详的关于阿鲁季和蓝胡子海鲁丁的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史籍⑩，还有穆罕默德·提利姆萨尼写的截至 1775 年的军事史⑪。关于突尼斯历史，可阅读扎尔卡希（生平资料截止到 1525 年）⑫ 到麦克迪什·萨法库西（卒于 1818 年）⑬ 的一系列编年史著作。穆罕默德·加勒本（活动最盛时在 1739 年前后）⑭ 撰写了一部的黎波里历史。伊巴迪亚教派的编年史籍和传记，如沙马希（卒于 1524 年）的著作，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撒哈拉和苏丹的宝贵资料。⑮ 118

② A. 迈克纳西（A. Meknassi），1953年；G. 阿雅谢（Ayache），1961 年。

③ 《摩洛哥未刊史料》，24 卷（巴黎，1905 至 1951 年）。

④ E. 莱维-普罗旺萨耳（E. Levi-Provencal），1922 年；莫赫塔尔·苏西（Mokhtar Sussi），《殷鉴》，已发表 20 卷；达乌德（Daoud），《得土安史》。

⑤ 其著作已由 O. 乌达（O. Houdas）编译出版（巴黎，1899 年）。

⑥ 其著作已由 O·乌达编译出版（巴黎，1886 年）。

⑦ 此书在开罗出版，1894 年，4 卷本。另外有不少法文和西班牙文选译本。

⑧ 这两部游记有 S. 贝尔布鲁格（S. Berbrugger）的译本（巴黎，1846 年）。

⑨ 此书有 H. 德卡斯特里（H. de Castries）的译本（巴黎，1929 年）。

⑩ 这些史籍已由努鲁丁（Nuruddin）编辑出版（阿尔及尔，1834 年）。

⑪ 此书有 A. 卢梭（A. Rousseau）的译本（阿尔及尔，1841 年）。

⑫ 此书有 E. 法尼扬（E. Fagnan）的译本（君士坦丁，无出版日期）。

⑬ 此书在突尼斯出版，1903 年。

⑭ 由埃托雷·罗西（Ettore Rossi）出版，（博洛尼亚，1936 年）。另外还有一些土耳其文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编年史籍。

⑮ T. 莱维基（T. Lewicki），1961 年。

一般的或专门的传记或人名辞典(大多数记载的是杰出人物，如学者、法律家、王公、术士、作家等)往往是把传记材料与历史记述结合起来，因而从中可以了解社会文化史的各个方面。这类著作在阿拉伯各国，尤其在摩洛哥，都很盛行。甚至某些诗歌，有时是用方言写的，都可成为史料。譬如，埃及诗人哈桑·希贾齐(卒于1719年)的讽喻诗就有对当时重大事件的记述。[16]

研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历史，必须依靠大部分尚未发表和尚未利用的编年史籍。在这一时期，埃及只产生了两位大史学家，一位在土耳其人统治之初，另一位则恰在土耳其人统治结束之时，前者是伊本·伊雅斯(卒于1524年)。他逐日记录了他的时代的历史。因而他所提供的细节之丰富是其他著作中罕见的。[17]后者是哲白尔帖(卒于1822年)，他撰写了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岁月的编年史以及拿破仑的占领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的编年史，从而把埃及历史上的一个转捩时代包括进去。[18]尽管阿拉伯各国出版了不少编年史和其他史籍，但是大多数依然是以手稿形式藏在本国或外国的图书馆里，等待研究和发表。

在这一时期，欧洲旅行家的游记日益重要。尽管作家反伊斯兰教的偏见使他们难以完全客观地报道情况，但在这些游记中仍然有很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值得重视的真知灼见，因为当地作家认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平淡无奇，毫无趣味。游历过马格里布诸国并留下回忆录和详略不等的游记的欧洲旅行家、使节、领事、商人、甚至囚徒(米格尔·塞万提斯即是其中之一)多得不可胜数。埃及的情况也许更是如此。由于埃及具有商业上的重要性并且邻近圣地，因而吸引了大量游客。[19]拿破仑远征军中的科学智囊所编辑的不朽著作《埃及通志》(24卷，巴黎，1821-1824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有关新时代前夜的埃及各方面情况的取之不尽的资料库。

在十九世纪，有关北非历史的资料与有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资料一样丰富：地方编年史和游记退居第二位，让位给更客观的档案资料、统计、报纸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证据，从而使史学家能够使用撰写欧洲史这类完全以文件为主的历史所用的正统方式方法。

119

地处阿拉伯世界边缘的毛里塔尼亚和东苏丹这两个说阿拉伯语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值得分别讨论。这两国资料的共同特征是，至少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传记、宗谱和诗歌大大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式的历史著作。关于毛里塔尼亚的各种宗谱和传记已由伊斯梅尔·哈迈特出版。[20]而勒内·巴塞和不久前H. T. 诺里斯收集的诗歌和民间传说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资料。[21]毛里塔尼亚学者穆赫塔尔·乌尔德·哈米敦正在积极地和富有成效地寻找新资料。在本世纪初诞生了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艾哈迈德·欣吉提编写的《辞典》是一部有关摩尔人古今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22]尚有相当一批价值不等的当地手稿采用了内马、瓦拉塔和欣吉特的编年简史的文体。[23]毛里塔尼亚的阿拉伯文资料特别

[16] 哲白尔贴(al-Jabarti)曾谈到这点。

[17] G.维厄(G. Wiet)，1960年。

[18] 此书有多种版本；谢菲克·曼苏尔(Chefik Mansour)的译本(开罗,1886-1896年)不太可靠。

[19] J. M.卡雷(J. M. Carre)，1932年。

[20] I. 哈迈特(I. Hamet),1911年。

[21] R. 巴塞(R. Basset)1909-1910年；T. H. 诺里斯(T. H. Norris)，1968年。

[22] A. 欣吉提(A. al-Shinqiti)，1910年以及很多新版本，圣·路易(St. Louis)，法文选译本，1953年。

[23] P. 马尔蒂(P. Marty),1927年；诺里斯(Norris),《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学报》,1962年；V.蒙泰伊(V. Monteil),《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学报》,1965年。

引人注目，也特别重要，因为其中很多不仅记述了毛里塔尼亚本身，而且还记述了西苏丹的所有邻国。由于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因而在摩洛哥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必然藏有关于毛里塔尼亚的珍贵历史资料。除了阿拉伯文资料外，还有欧洲人关于十五世纪以来沿海地区和十七世纪以来内河流域的记叙文献。我们还发现十八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和欧洲文字的外交和商业函件。

东苏丹当地的历史编纂工作似乎是在芬吉苏丹国末年，即十九世纪初才开始的。当时，把口头传说记录在所谓的《芬吉编年史》中。此书现有数种版本。[24]各阿拉伯宗族的世系表是一种有用的资料。[25]瓦德·代法拉赫编写的苏丹学者人名大辞典《传记》也是有关芬吉王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资料宝藏。[26]现在所知最早的外界来客是1523年抵达的犹太旅行家戴维·鲁本尼。在十九世纪以前，只有少数几部有价值的游记，但从中我们找到了詹姆斯·布鲁斯(1773年)、W. T.布朗(1792-1798年)和突恩西(1803年)这样的敏锐观察家的记述。布朗和突恩西是最早游览达尔富尔的人。[27]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游览苏丹的人要比去赤道非洲其他地区的人多。他们的游记多得不计其数，作为史料，具有不同性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没有任何关于尼罗河上游(北纬12°以南)的文字资料，而关于北部地区则有充分的埃及档案文献(开罗档案馆)和若干欧洲档案文献。有关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最重要的资料是马赫迪档案，包括八万份左右阿拉伯文文献，目前大部分藏于喀土穆。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的文字资料情况并无特殊之处。在这里，如同在说阿拉伯语的北非一样，史学家可随便使用各种国内外文献。在涉及某些转捩时期时，甚至可使用对立的资料，如，关于十六世纪前半期艾赫迈德·格兰率领穆斯林入侵一事，埃塞俄比亚的莱布纳·丹吉尔皇帝的《皇家编年史》(盖埃兹文本)是以埃塞俄比亚的观点写的，而格兰的书记阿拉伯-法基1543年写成的详细编年史则是用穆斯林观点记载的，且不提葡萄牙人的目击记录。[28]

编写皇家编年史的工作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几乎每代君主，即便在衰落期间，至少有一部或一部以上详尽记录当时大事件的编年史。[29]这个传统流传于整个十九世纪并延续到二十世纪，曼涅里克二世的《阿姆哈拉编年史》就是那样。[30]其他许多种埃塞俄比亚文献，如圣徒传记、宗教论辩、诗歌、传说、修道院史等，提供了有用的史料。僧人巴雷于1593年撰写的《加拉人历史》是一部独特的文献，他是加拉人入侵埃塞俄比亚的目击者。[31]一

---

[24] M.希贝卡(M. Shibeika)的调查，1947年。

[25] H. A.麦克迈克尔(H. A. MacMichael)，1922年收集了这些宗谱及其他历史文献。

[26] 尤素福·法德勒·哈桑(Yusuf Fadl Ha..an)，1971年，他的评注本是最新的。

[27] J.布鲁斯(J. Bruce)，1790年；W. G.布朗(W. G. Browne)，1806年；欧麦尔·突恩西(Omar El-Tounsy)，1845年。

[28] 阿拉伯-法齐(Arab-Faqih)，1897-1901年；M.卡斯坦赫索(M. Castanhoso)，1548年；英译本，剑桥大学，1902年。

[29] 参见R.潘克赫斯特(R. Pankhurst)，1966年；H. W.布伦德尔(H. W. Blundell)，1923年。

[30] 此书作者是加布雷·塞拉西(Gabre Selassie)，法译本，巴黎，1930-1931年。

[31] 参见C. F.贝金汉(C. F. Beckingham)和G. W. B.亨廷福德(G. W. B. Huntingford)，1954年。此书除包括巴雷(…ubrey)的历史著作，还包括阿尔梅达(Almeida)的《上埃塞俄比亚史》若干章节。

个世纪以后，欧洲研究埃塞俄比亚问题的创始人希奥布·卢多尔夫根据一位博学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资料编写了这个国家最早的通史著作之一。[32]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遗留下来唯一的基督教国家。因而，很自然，甚至早在十五世纪，121 它在欧洲引起的兴趣比非洲其它地区在欧洲引起的兴趣都大得多。难怪游历并记述这个国家的有那么多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军人、商人或冒险家。其中不仅有葡萄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如俄国人、捷克人、瑞典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33] 有时还出现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的游记，以多种方式对其他资料做了补充。[34]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欧洲各列强和亚的斯亚贝巴乃至喀土穆档案馆所收藏的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最近斯文·鲁本森对维沙尔条约(1889年)所做的精辟分析表明，仔细研究阿姆哈拉文的原始文献对于正确阐明历史是非常重要的。[35]

南非共和国

同非洲其他地区(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和埃塞俄比亚除外)相比，南非在所回顾的这一时期所提供的上述各类资料，不论是档案资料还是记叙资料都要多得多。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十九世纪以前的真正的非洲资料，尽管许多欧洲人的记叙资料保存了土著居民的口头传说的片断。最早的史料出自十六、十七世纪在东南沿海遭到船只失事的葡萄牙或荷兰水手。[36] 随着荷兰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1625年)，资料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了。这部分资料是官方文件，这些文件现在主要保存在南非自己的档案馆里，另一些则保存在伦敦和海牙。其中部分已经发表或通过某种方式可以得到，但主要部分依然得不到。[37] 另一方面，资料是记叙文献，这些都是白人旅行家、商人、官员、传教士和移民写的书籍和文章。他们是非 122 洲社会的直接观察者。然而，在很长时间里，这些人的眼界受到地域的局限，直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他们才深入内地。因此，最早的记叙资料是关于现已灭绝的开普科伊人，这是很自然的。继十七世纪的若干记载之后，[38] 第一份详细记述是彼得·科尔布于1705-1712年写出的。[39] 在荷兰统治时期，有很多欧洲人抵达这个海角殖民地，但他们很少不是出于对非洲人的一时好奇，很少敢于深入内地探险。戈代·莫尔斯伯根和洛诺雷·纳布尔汇编了这些人

---

[32] 希奥布·卢多尔夫(Hiob Ludolf),1681年；英译本，1682-1684年。

[33] 参见C.贝卡里(C. Beccari)的不朽汇编，1903-1917年。但是在贝卡里之后，又发现了很多前所未闻的资料。这些资料尚有待于公布和研究。

[34] 例如，著名的土耳其旅行家乌里雅·谢莱比(Ewliya Chelebi)(卒于1679年)的《游记》第十卷记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地。也门大使海米·库卡巴尼(al-Khaymi al-Kawkabani)留下一部1647年他出使法西拉达斯皇帝宫廷的生动报告。而有关这位皇帝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编年史籍全部遗失。海米·库卡巴尼的报告已由F. E. 佩泽(F. E. Peiser)出版，两卷本，柏林，1894年和1898年。

[35] 斯文·鲁本森(Sven Rubenson)，《维沙尔条约中的保护关系条款》，《非洲历史学刊》(JAH)，5，2(1964年)，以及与C. 吉利奥(C. Giglio)的商讨，《非洲历史学刊》6，2(1965年)和7，3(1966)年。

[36] 参见G. M. 锡耳(G. M. Theal),1898-1903年和C. R. 博克塞(C. R. Boxer),1959年。

[37] 在D. 穆迪(D. Moodie)的著作中，有关于桑人、科伊人和班图语民族的官方报刊及其他文献的摘录，1960年。另见G. M. 锡耳、1897-1905年。

[38] I. 沙珀拉(I. Shapera),1688年(1933年)；威廉·滕吕内(Willem ten Rhyne),1686年和J. G.德格雷弗布鲁克(J. G. de Grevebroek),1695年。

[39] P. 科尔布(P. Kolb),1719年。

的大量报告。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很多不太著名的游记由开普敦的范里贝克协会陆续出版。[40] 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有些传教士[41] 和富于经验的观察家，如斯帕尔曼、勒瓦扬、阿尔维蒂、约翰·巴罗和利希滕施泰因，写了一些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非洲社会的情况。[42] 约翰·菲利普斯应享有光荣的一席地位，因为他把生命和工作都献给了保卫非洲人的权利，因而他所揭示的情况通常是官方报告所不能提供的。[43]

随着十九世纪商业、传教和殖民活动的扩大，有关比较偏远的非洲种族的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虽然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已有个别人到过纳米比亚，[44] 但只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传教士开始活动，[45]探险家，如J. 亚历山大、F.高尔顿、J.廷德尔，[46] 把这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以后，才出现关于桑人、纳马人、赫雷罗人生活的较详细的记述。

有关奥兰治河以北地区的情况与上面类似。早期商人和狩猎者的报告逐渐让位给探险家和传教士所撰写的日益增多的游记。这些探险家和传教士，如罗伯特·莫法特、E. 卡萨利斯、T. 阿尔布塞等，由于有较多的经验和非洲语言知识，因而具有进行观察的更好条件。自然，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大卫·利文斯通。[47] 有关莱索托早期历史的各种资料，包括档案文件、书信、官方法令等，已由G. M. 锡耳汇总收集。[48] 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出现了表达非洲人观点的文献，如莫谢希和非洲其他首领的书信。　123

与沿海地区相反，纳塔尔和祖鲁兰内地地区到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才被外界知晓。早期观察家，如N. 艾萨克斯或H. F. 弗因，[49] 一般没有受过训练，因而在处理非白人的事情上难以做到准确、客观。但是，祖鲁人还算幸运，他们的口头传说较早得到收集，尽管发表得较晚。收集工作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A. T. 布赖恩进行的。不过，在使用他的著作时要慎重。[50]

象在非洲其他地区一样，十九世纪欧洲人写的报道大大增多了，因而无须赘述各类报道及其作者。更有趣的是关于非洲最早的学者或某些传统统治者的各种反应的记载。这些记载保存在书信、报刊、诉讼书、日记、法令以及他们最初撰写自己人民历史的尝试作品中。

除了莫谢希、丁干、塞茨瓦约、姆兹里卡济、洛本古拉、维特布伊、格里夸酋长和许多首领与殖民当局之间的浩繁书信以外，还有1874年用南非荷兰文写的《雷霍博斯村社习

---

[40] E. C.戈代-莫尔斯伯根(E. C. Godee-Molsbergen),1916-1932年；S. L.洛诺雷-纳布尔(S. L. L' Honoré Naber),1931年。

[41] 参见诸如D. K. 米勒(D. K. Müller),1923年。

[42] A.斯帕尔曼(A. Sparrmann),1785年；F.勒瓦扬(F. Levaillant),1790年；L.阿尔维蒂(L. Alberti),1811年；J.巴罗(J. Barrow),1801-1803年；H. 利希滕施泰因(H. Lichtenstein),1811年。

[43] J.菲利普斯(J. Philips), 1828年。

[44] A.D.瓦茨(A. D. Watts),1926年。

[45] H.维德(H. Vedder)的权威著作《早期的西南非洲》主要是根据德国传教士的报告编纂的。

[46] 詹姆斯·亚历山大爵士(Sir James Alexander),1836年(1967年)；F. 高尔顿(F. Galton),1853年；《约瑟夫·廷德尔日记1839-1855年》(Journal of Joseph Tindall)(开普敦，1959年)。

[47] R. 莫法特(R. Moffat)，1842年和1945年；E. 卡萨利斯(E. Casalis)，1859年；英文版，伦敦，1861年；T. 阿尔布塞(T. Arbousset)，1842年，英文版，开普敦，1846年；D. 利文斯通(D. Livingstone),1957年。

[48] G. M. 锡耳：《巴苏陀兰资料》，3卷本，1883年(第四、五卷未出版)，现存开普敦档案馆。

[49] N. 艾萨克斯(N. Isaacs),1836年；N. F. 弗因(N. F. Fynn)，1950年。

[50] A. T. 布赖恩(A. T. Bryant),1929年。并见他的《祖鲁人历史》，最初于1911-1913年作为一系列文章发表，1964年在开普敦出书。另外参见J. 伯德(J. Bird)，1888年。

惯法》或《亨德利克·维特布伊日记》[51]之类的资料。在南非档案馆里或在伦敦，保存着非洲人大量陈情书和诉讼状，还有很多调查报告、规划以及根据非洲人口头资料做的统计。

由于出现了当地语文的报纸，我们有可能估价那些变动中的社会的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在1870至1880年期间发行的周报《伊锡迪吉米》上出现了第一批批评欧洲人的政策及其对非洲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文章。撰稿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蒂约·索加（卒于1871年）或G. 尚扎赫（卒于1896年）。这家周报还发表了W. W. 格阔巴（卒于1888年）所收集的豪萨人的历史传说。自1884年始，《黑人之声报》成了非洲人的另一个论坛。约翰·T. 贾巴武（卒于1921年）主编这份报纸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久，有十一种非洲语文的杂志发行，但并非都维护了非洲人的事业。这一时期，有一位叫姆格诺基（卒于1924年）的杰出人物。他积极参加了1879年的祖鲁战争，以后（在美国）发表了回忆录和许多有关南非生活的文章。[52]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非洲人自己写的最早的历史著作，[53]从而开始了南非历史学的新时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从有利于白人集团的角度观察非洲大陆这个地区的历史，白人集团往往把非洲各民族的历史看成不足挂齿、毫无意义。当前正在南非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展开的斗争也要求对历史资料采取新的态度，必须特别注意非洲人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艰巨斗争的文字凭证。[54]只有根据全部证据和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才可能写出一部真正的南非历史。

外域的记叙资料

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文字的资料

九世纪至十五世纪期间，阿拉伯文资料占优势，因而这一时期一度被称为"阿拉伯文资料时代"。而在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这类资料急剧衰落。这种变化的原因与伊斯兰世界的总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有关。这些原因将在以后卷帙的适当章节里加以讨论。这并不是说，阿拉伯文记叙资料全然没有，而是说，它们的数量和质量（除极少数例外），都不能与前一时期或其他地区的资料相比。

利奥·阿弗里卡纳斯（原名哈桑·乌赞·扎雅提）的著作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沿袭的是阿拉伯地理学传统。而且，在十六世纪初游历西苏丹和中苏丹时，他还是一个阿拉伯穆斯林，以后才皈依基督教，退隐到意大利。他的著作不免有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谬误。但是，在近三个世纪期间，只有他给欧洲提供了关于非洲内地的真实知识。[55]

曾经为瓦斯科·达伽马从马林迪到印度导航的水手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于十六世纪初撰写的航海著作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资料。在他的有关航海理论和实践的大量著作

---

[51] 这些习惯法保存在雷霍博斯和温得和克；维特布伊（Witbooi）的日记于1929年在开普敦发表。

[52] 参见L. D. 特纳（L. D. Turner），1955年。

[53] 参见S. T. 普拉切（S. T. Plaatje），1916年和1930年；S. M. 莫莱马（S. M. Molema），1920年；J. H. 索加（J. H. Soga），1930年　同上，1930年；T. B. 索加（T. B. Soga），1956年。

[54] 见D. T. 贾巴武（D. T. Jabavu），1920年；J. 马哈巴瓦（J. Mahabava），1922年。

[55] 他的书最初于1550年在罗马出版；近来最好的译本是A. 埃波拉尔（A. Epaulard）翻译的，A. 埃波拉尔、T. 莫诺（T. Monod）、H. 洛特（H. Lhote））和R. 莫尼注释的《非洲志》，2卷本（巴黎，1956年）。

中，记述东非海岸的那一部最为出色。[125] 其中不仅有大量地形资料和航海图，而且还对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提出了有力见解。[56] 在阿布·麦赫拉马（卒于1540年）撰写的《亚丁堡编年史》中可以找到少量关于东非和僧祇的原始细节资料。[57] 关于同一地区的最新编年史，是萨利勒·伊本·拉齐克（卒于1873年）撰写的《阿曼教长和赛义德家族史》。这部著作收入了阿曼的希尔罕·伊本·希尔罕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写的一部早期著作。[58]

十八世纪没有出现很有价值的关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阿拉伯文外域资料。而在下一个世纪初，这方面则有某种程度的起色。前面提到的突恩西（卒于1857年）在关于瓦代王国的第一部编年史中记叙了他对瓦达伊的游历，还写过一部关于达尔富尔的有价值的报告。[59] 再往前几十年，在苏丹地带的另一端，摩洛哥人阿卜杜勒·萨拉姆·沙拜尼记载了迪纳兴起以前廷巴克图和马西纳地区的情况。[60]

不仅在苏丹的编年史中，而且在前面提到的几位摩洛哥史学家的著作中都记载了桑海帝国及其衰落和尼日尔河流域的日后变迁。最近在摩洛哥各图书馆发现了大量关于马格里布与苏丹地区之间关系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有待于非洲史学家整理出版和研究。在北非其他各国和土耳其肯定还有散落的十分珍贵的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资料，迄今我们对此了解还很少。这种状况为史学家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前景。寻找、发表和翻译这些资料是最近将来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其他东方文字资料比阿拉伯文资料甚至更少。但绝不能排除发现更多的资料，如波斯文的和印度文的。迄今为止，关系最密切的资料要算土耳其旅行家乌里雅·谢莱比的游记。他游历过埃及和苏丹、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但是他对非洲其他地区的了解都是间接的。[61] 他的同胞海军上将西迪·阿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抄录和翻译了伊本·马吉德关于印度洋的著作《海洋辞典》中有关阿拉伯地区的论述，只在细节上作了一些补充。[62] 十九世纪初，阿塞拜疆学者扎因·阿比丁·希尔瓦尼访问了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东苏丹和马格里布，并在游记《游览乐园》中描述了他的游历情景。[63] [126] 在外高加索人，主要是亚美尼亚人中间似乎对非洲、特别是对埃塞俄比亚非常感兴趣。十七世纪末，两个亚美尼亚教士，阿斯特瓦卡杜尔·蒂姆布克和阿瓦提克·巴格达萨里昂，从埃塞俄比亚出发，经努比亚、达尔富尔、乍得湖、塔克鲁尔王国，抵达摩洛哥，横跨非洲，写了一部游记。[64] 1821年阿斯特拉罕的亚美尼亚人瓦尔加从北边穿过撒哈拉，游历了廷巴克图，最后抵达黄金海岸，在那里用英文写下了篇幅不大但资料充实的游记。[65] 在苏联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加

---

[56] T. A. 舒莫夫斯基(T. A. Shumovskiy)，1957年。

[57] 此书由O. 勒夫格伦(O. Lofgren)出版，1936-1950年。

[58] 此书由G. P. 巴杰尔(G. P. Badger)译出(伦敦，1871年)。

[59] 《瓦达伊游记》，佩隆博士(Dr. Perron)译(巴黎，1851年)。

[60] 此书由J. G. 杰克逊(J. G. Jackson)出版，1820年。

[61] E. 谢莱比(E. Chelebi)，1938年。

[62] M. 比特纳(M. Bittner)，1897年。

[63] 参见M. 哈尼科夫(M. Khanykov)，1859年。有关东非的章节正在由列宁格勒的V. P. 斯米尔诺娃(V. P. Smirnova)编辑以供翻译。

[64] G. 哈拉江斯(G. Khalatyanc)，1899年。

[65] 参见P. D. 柯廷(P. D. Curtin)，1967年，第170-189页；I. 威尔克斯(I. Wilks)"阿斯特拉罕的瓦尔加"。另见D. A. 奥尔德罗格(D. A. Olderogge)，1971年。

盟共和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关于非洲还有其他的亚美尼亚文或格鲁吉亚文资料。[56]

欧洲文字写的资料

十六世纪初以来，关于热带非洲地区的欧洲人写的记叙文献浩如烟海，即使是最重要的著作或作者，也无法一一列举。与其无休止地开列作者名单和图书目录，不如对这种文献的总特点进行一次研究分析，不如对这种文献作为非洲历史资料进行一次评价，这将更符合本章的宗旨。

地理范畴方面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熟悉从塞内加尔到瓜达富伊角的整个海岸线，到这个世纪末，他们深入到古老的刚果、安哥拉内地和赞比西河流域，以后两个世纪里，欧洲人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偶尔有人试图穿越撒哈拉沙漠，沿着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建立了比较持久的联系，有一个旅行家从赞比西出发到基尔瓦，在马拉维湖中止了他的旅行计划。另一方面，关于沿海民族，主要是西非地区诸民族的资料更具体和多样化了。对非洲内地的系统考察到十八世纪末才开始，但这种情况随着殖民列强对大陆的瓜分结束了。

关于资料作者的国籍问题，可以说，十六世纪大部分是葡萄牙人，十七世纪多数是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八世纪多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十九世纪多数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当然，其他欧洲国家在这几个世纪也有所作为。譬如十七世纪在刚果、十九世纪在东苏丹的意大利人，十八、十九世纪在奴隶海岸和黄金海岸的丹麦人。在游记和记叙著作的作者（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中），还发现有西班牙人、俄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瑞典人、挪威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瑞士人、美国人、巴西人，有时甚至还有个别希腊人、罗马尼亚人和马耳他人。幸运的是，用不大通用的文字写的著作大多已译成比较通用的文字。

127

在评价欧洲资料时，我们应该少考虑作者的国籍而多考虑欧洲人对非洲人及其整个社会的态度变化。因而如果认为葡萄牙作者在看待当时所记述的人时比英国人抱有更多的基督教偏见，或者认为荷兰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倾向于客观观察，都未免简单化了。当然，用中世纪标准考虑问题的十六世纪的葡萄牙编年史专家与十七世纪后期受过比较合理文化熏陶的荷兰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之间，是有差别的。现有的资料数量之大和种类之多不容我们匆匆做出判断。只有按照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当然还考虑它们的成书时间和目的，逐一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还必须避免这样一种谬见，认为在这一时期，记述日益趋向客观，我们越接近今天，对于非洲实况的考察就越科学，因而预先规定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仅仅根据这个事实，十九世纪旅行家的报告比三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报告更为可信。伯顿和斯坦利作为观察家成了所谓在科学上证明了的白人优越的概念的俘虏，与作为所谓基督教信仰优越概念的俘虏的葡萄牙作者并无二致。一般说来，贩卖奴隶的时代不利于客观报道非洲人，但是贩卖奴隶的实际需要又要求密切注意他们的经济活动和行政管理

[56] 有关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埃塞俄比亚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史的一系列文献正由埃里温亚美尼亚共和国东方学研究所出版

体制。因此，从这时起，我们就有了一系列非常珍贵的记录。

论述非洲和非洲人的书籍的作者有传教士、商人、官员、陆海军官、领事、探险家、旅行家、移民，有时还有一些冒险家、战俘。这些人各有各的利益要求，因此著书的目的和方法也大大不同。旅行家的游记是特殊文学体裁中的典型，侧重写异国风土、奇闻怪事，而且必须满足读者的广泛要求。这类异国风土志和冒险札记或多或少地有些关于非洲民族的荒诞想法或描绘侠客式旅行家的种种险遇。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67]

128

传教士相当注意非洲的宗教，然而他们大多数人缺少理解非洲宗教的知识和诚意，而主要是揭露宗教的“谬误”和“野蛮”。不过，他们懂得当地语言，因而比其他人更能洞悉当地的社会结构。他们有时对历史表示兴趣，并且开始搜集口头传说。

在十九世纪，探险家们写了一大批记叙文献。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解决重大地理问题。他们的贡献在于扩大了自然地理知识，而不在于加深对非洲社会的了解。“他们之中大多数对水路的兴趣超过对生活方式的兴趣。”[68] 而且，其中很多人作为自然科学家，缺乏历史感或者相信非洲无历史的神话。当然，这个规律也有例外。最著名的例外人物是海因里希·巴尔特。

另一方面，甚至在十八世纪就出现了一些非洲国家国别史或民族史，如阿奇博尔德·达尔泽尔著的《达荷美史》(伦敦，1793年)。但是，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发现此书是一本反对废奴主义的小册子。

上面我们指出了欧洲记叙资料的不足之处，现在把注意力转到资料的积极一面。首先，它们提供了非洲史十分需要的编年大纲，而口头传说中的致命弱点就是年代不详，甚至某个旅行家或其他作者所提供的一个日期，譬如他与某个非洲人物会面的日期，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甚至几个民族全部年代表的一个起点。这并不是说，只是由于日期已记录下来就一定都是准确的。欧洲作者根据道听途说著书时或试图依据无从核实的资料推算年代时多少造成了严重错误的事例是存在的。不过，欧洲人测算时间时一般都掌握比较先进的技术。

这种记叙文献作为经济史的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观察和记述商路、主要市场、商品和价格、农业和手工业、自然资源时，能做到不带有偏见，实际上确都做到了这点。此外欧洲人从本身利益出发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尽可能客观记叙。的确，有人把某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渲染过分了。其目的是想抬高探险家的身价。不过，史学家对这类夸大其词的事情已司空见惯，会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的。

欧洲人最擅长观察非洲社会的外表，即所谓的风俗习惯。他们大量、准确、精彩地描述了各种礼仪、服饰、举止、战争的战略战术、生产技术等等，尽管有时在描述中夹以“野蛮”、“原始”、“荒谬”、“可笑”之类的形容词或其他贬意词。这些形容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作者出于文化偏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得多的是，这些作者完全不懂非洲社会的内部结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相互承担义务的后果以及某种行为的更深刻原因。简言之，他们无法发现深藏在非洲人活动背后的动机。

129

---

[67] 参见最近R. I. 罗特贝格(R. I. Rotberg)，1971年。

[68] 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1969年。

然而，假若没有欧洲人的记叙资料提供材料，那么几乎不可能写出非洲历史。这些资料有各种不足之处，很多细节不是完全被忽视就是被偏见看待或被曲解，但这是任何历史编纂工作所固有的正常风险，因而没有理由抛掉大量的和非常重要的资料。相反，迫切需要尽量翻印这种资料，并附以适当的评注，以便依照新的非洲历史编纂学重新评价和解释。

非洲人自己的记叙资料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是个急剧的转折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所写的历史著作出现了。最初，表达工具不是任何非洲地方语文，而是阿拉伯文，后来则是几种欧洲语文。阿拉伯文是伊斯兰世界中有教养的人进行交流的工具，其作用可与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相比。

这种编史的传统似乎同时起源于苏丹地区和东非海岸，正好处于过去阿拉伯文外域资料所包括的两大地区范围内，在那里，伊斯兰教长期产生影响。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籍可溯源到十六世纪初，而它所记述的事件则要更早。第一部史籍《法塔史》记述了杰内的卡迪三代宗室，包括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为止的桑海及毗邻国家的历史。廷巴克图史学家萨迪著的《苏丹史》内容比较广泛详尽。它不仅包括同一时期的一部分，而且一直写到1655年。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学术造诣很深，视野广阔，对当代事件有深刻的了解。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非洲人自己的真实声音，尽管这些作者偏袒伊斯兰教，并以这种偏袒眼光来观察世事。十八世纪出了一部无名氏作者的史书，此书内容非常详尽，记述了1591年至1751年廷巴克图的摩洛哥帕夏，其中还有关于邻近国家和民族的有用资料。[69]另外还有一类资料，其代表作品是廷巴克图的著名学者艾哈迈德·巴巴（卒于1627年）编的西苏丹学者人名辞典。[70]在桑海帝国，有一部作者署名伊本·艾德瓦尔的阿拉伯文编年史《萨伊史》。据说，此书写于1410年。假使果真如此，那么这部著作就成了现存西非最古的文献。但是，它似乎更象是后人对口头传说的记录[71]

130

撰写编年史的传统从廷巴克图和杰内向其他地区扩展，主要是向南向西扩展，即萨赫勒与热带森林之间的地区，有时甚至向远至更南的地区扩展。从十八世纪中期，甚至更早时期起，穆斯林学者开始编写本地编年史、民族谱系、人物小传和宗教书籍。学术水平最高的成果是1752年以后写的《贡贾志》。这是一部论述贡贾王国的史书，其部分资料是根据口头传说。[72]现存不少比较次要的编年史籍，而且很可能在久拉人或豪萨人社会组织影响下的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发现新的编年史籍。上述著作大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但也有很多编年史籍是用阿雅密文字写的，就是说用阿拉伯文符号与当地语文写的。

在富尔富尔德语地区，首先是在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也有类似情况。在几内亚、达喀

[69] 《法塔史》由O. 乌达(O. Houdas)和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编译出版（巴黎，1913年；再版，1964年）；《苏丹史》由O. 乌达编译出版（巴黎，1900年；再版，1964年）；《忘却的记忆》由O. 乌达编译出版（巴黎，1899年；再版，1964年）。

[70] 此书于1899年在非斯出版，1912年在开罗出版。

[71] 参见V. 蒙泰尹，《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学报》，第28期（1968年），第675页。

[72] 关于这部书及其他资料，见I. 威尔克斯，1963年和T. 霍奇金(T. Hodgkin)，1966年。

尔以及巴黎的图书馆有一批阿拉伯文，或富尔富尔德文，或两种语文兼有的当地编年史籍，大部分成书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直到最近，富塔贾隆的资料才出版，供学术工作使用。这方面可参考的还有达喀尔的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图书馆的吉尔伯特·维埃亚尔全书。[73] 另一方面，在富塔托罗，十八世纪作者西雷-阿巴斯·索赫撰写的《塞内加尔富塔编年史》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公之于众了。[74] 还有一部早期著作，即穆罕默德·巴尔塔伊里编写的被称为《法斯－萨库尔》的人名辞典(约 1805 年)，目前正由约翰·亨威克编辑出版。甘盖勒的沙伊克·卡马拉·穆萨于 1921 年写成的富塔托罗的近代史，书名为《苑中之花》，至今没有出版。[75]

在尼日利亚北部，阿拉伯文的编年史籍及其他史料也出现得比较早。伊曼·伊本·法尔土瓦(十六世纪后半期)留下一部关于马伊·伊德里斯的生平、时代以及征战的动人的详尽记录。[76] 从近代起，出现了各种博尔努统治者的名册和博尔努编年史。有一种特殊的史料，即所谓马赫拉姆，是统治者授予宗教权贵家族的特许状，从中可以窥见社会和经济状况。[77] 在豪萨人地区，圣战前的史料保存得并不太多，虽然当地的(主要是富拉尼人宗教领袖们的)文化水准相对很高。[78] 不过，某些豪萨文诗歌与博尔努的卡努里文诗歌相似，附有对当时事件的评注。[79]

131

十九世纪初，在苏丹中部和西部，阿拉伯文文献再次兴起。除了阿拉伯文著作外，用阿拉伯文符号的豪萨文、富尔富尔德文、卡努里文、曼达拉文、科托科文等当地语文写的著作日益增多。写得最多的是尼日利亚北部进行富拉尼圣战的那些领袖们。尽管他们的大量文学著作是论述宗教事物的，而且只有少数著作可视为真正的编年史籍，[80]然而所有这些文献，无论是阿拉伯文的还是某种非洲语文的，都有助于更连贯地说明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关于豪萨人城邦(如卡诺、卡齐纳、阿布贾等)的编年史，尽管成书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但在某些程度上都取材于早期文献或口头传说。[81]在更远的东部，在巴吉尔米、科托科、曼达拉和瓦代也有类似情况。一些编年史籍和国王名册已经发表，但仍有很多手稿未经整理，而且很有可能在私人手里发现更多的手稿。[82]。

一部用富尔富尔德文写的韵文编年史描述了伟大的图库洛尔族改革家哈吉·奥马尔·托勒的生平和活动。[83]这位改革家自己写过一部宗教著作《仁慈真主教友会之矛》。书中有大

---

[73] A. I. 索(A. I. Sow),1968年；T. 迪亚洛(T. Diallo),1968年。

[74] M. 德拉福斯和 H. 加当(H. Gaden)合译本(巴黎，1913 年)。

[75] 此书手稿现存达喀尔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图书馆；参见V. 蒙泰伊，1965 年，第 540 页。

[76] 此书由 H. R. 帕尔默(H. R. Palmer)编辑；译文见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一卷和 H. R. 帕尔默，1929 年。

[77] H. R. 帕尔默收集，1928 年和 1936 年；并参见Y. 于尔瓦(Y. Urvoy),1941 年。

[78] M. 希斯凯特(M. Hiskett)，1957 年，第 550-578 页；A. D. H. 比瓦(A. D. H. Bivar)和 M. 希斯凯特，1962年，第 104-148 页。

[79] 参见 J. R. 帕特森(J. R. Patterson)，1926 年。

[80] M. 贝洛(M. Bello),1951年；E. J. 阿内特(E. J. Arnett)对豪萨语释义的英译本，1922 年；A. 丹·福迪奥(A.dan Fodio)，1963 年；H. 萨西德(H. Sacid),未署日期；另有O. 乌达(O. Houdas)的法译本，1899 年。

[81] 《卡诺编年史》，H. R. 帕尔默译，1928 年，第三卷；关于卡齐纳编年史，见同书第 74-91页；关于阿布贾编年史，见马拉姆斯(Mallams)、哈桑(Hassan)和舒埃布(Shuaibu),1952年。

[82] 参见 H. R. 帕尔默，1928 年；J. P. 勒伯夫(J. P. Lebeuf)和M. 鲁宾逊(M. Robinson)，载《喀麦隆研究》，1948年，1951年，1955年和《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学报》，1952 年和1956 年；M. A. 突比亚纳(M. A. Tubiana)对瓦达伊的论述，载《非洲研究丛刊》，第 2 期(1960 年)。

[83] M. A. 蒂亚姆(M. A. Tyam),《哈吉·奥马尔生平》，H. 加当(H. Gaden)译(巴黎，1935 年)。

量关于西苏丹情况的历史引喻。[84]

132

在编年史篇的数量方面，东非海岸与苏丹不相上下。阿拉伯文的或斯瓦希里文(用阿拉伯字母)写的关于个别城市的编年史提供了国王名册和政治生活记实。其中只有基尔瓦编年史是真正古代的作品。它成书于1530年左右，现在留下两个不同的文本，一本是德巴罗斯留下的，另一本是1877年在桑给巴尔复写的。[85]大多数编年史是近代编著的。少数成书时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之前。有一些主要记述葡萄牙人抵达以前的事件。因而，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口头传说，因而应该照此来对待和评价。[86]有相当一批手稿至今仍在私人手中。1965年以来发现了三万多页斯瓦希里文和阿拉伯文的手稿。预计对整个海岸进行彻底考察之后，将发现能够说明东非历史许多未知方面的材料。[87]除了城市编年史外，还有其他文学体裁的文献，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写的诗篇《披露》之类的斯瓦希里文诗歌，可供史学家利用，该诗记述了帕塔的兴衰史。[88]

在用阿拉伯文写作了两个世纪之后，非洲人开始用欧洲文字写作。可以想见，最早的样本是西海岸人的作品。因为西海岸与外界的接触比其他地方要密切得多。

虽然出身于芳蒂族的贾各布斯·卡皮泰因(1717－1747年)、A.威廉·阿莫(约1703－约1753年)、菲利普·夸克(1741－1816年)作为用欧洲文字写作的先驱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但是他们对非洲历史学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被释奴伊格内休斯·桑乔(1729-1780年)、奥托巴·库戈诺(约1745-1800年)和奥劳达·伊奎亚诺(古斯塔夫斯·瓦萨；约1745-1810年？)的著作是无比重要的史料。这三人首先关心的是废除贩卖奴隶，因而他们的著作是论战性的。但这些著作同时也提供了有关非洲人在非洲和欧洲的境遇的大量传记性资料。[89]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献，即卡拉巴尔港口的一个大商人安特拉·杜克用洋泾浜英文写的日记，日记涉及的时期很长。虽然日记略嫌短些，但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的贩卖奴隶港口的日常生活。[90]

133

在马达加斯加，梅里纳的伟大国王腊达马一世(1810－1828年)用阿拉伯字母(surabe)写了一本日记。1850年左右，另外两个梅里纳贵族拉翁巴纳和拉哈尼拉卡用拉丁字母写了几本小说。这些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十九世纪伊梅里纳的日常生活。[91]

在十九世纪，很多非洲人或美国黑人参加了考察旅游或发表了对非洲社会的观感，有时带有一般性的论战性。曾在塞拉利昂和英国受教育的约鲁巴人塞缪尔·克劳瑟在1841

---

[84] 《仁慈真主教友会之矛》(开罗，1927年)；J. R. 威利斯(J. R. Willis)正在着手再版和翻译工作。

[85] 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G. S. P. Freeman-Grenville)对此有所分析，1962年。

[86] 有关阿拉伯文和斯瓦希里文编年史的概况，参见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年；A. H. J. 普林斯(A. H. J. Prins)，1958年；J. W. T. 艾伦(J. W. T. Allen)，1959年。

[87] 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桑吉志》，此书记述了索马里南部和肯尼亚北部的历史。参见E.塞鲁利(E. Cerulli)，1957年。

[88] 参见L. 哈里斯(L. Harries)，1962年。

[89] I. 桑乔(I. Sancho)，1781年；O. 库戈诺(O. Cugoano)，1787年；《非洲人奥劳达·伊奎亚诺(古斯塔夫斯·瓦萨)生活的趣闻》(伦敦，1789年)。

[90] D. 福德(D. Forde)，1956年。手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格兰毁于轰炸，但有关1785-1787年的片断抄本保存下来了。

[91] H. 贝蒂埃(H. Berthier)，1933年；拉翁巴纳和拉哈尼拉卡的手稿，《马达加斯加学院学报》第19期(1937年)，第49-76页。

年和1853年参加了尼日尔考察队，留下了一部游记。[92]生于英国的混血儿托马斯·B.弗里曼在西非作了广泛游历。他满怀同情地记述了沿海和内地各民族的情况，很有见地。[93]两名美国黑人罗伯特·坎贝尔和马丁·R.德拉尼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尼日利亚寻找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美国黑人的殖民区。[94]利比里亚人本杰明·安德森非常详细和精确地描述了他在尼日尔河上游的旅行。[95]非洲两位杰出领袖爱德华·W.布莱登和詹姆斯·阿弗利卡纳斯·霍顿的著作则自成一体。布莱登写的书、报告和文章本身就是史料。另外一些已具有从历史角度进行解释的性质。这些著作对于研究非洲意识的出现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资料。[96]霍顿的著作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注重细致观察他所密切联系的社会。[97]

这两个人是非洲人报道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开创者。第一个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是生于圣路易城的混血儿阿贝·布伊拉特，他写了《塞内加尔概貌》，书中比较侧重于人种学。[98]受英国影响的非洲地区对于主要依据口头传说来编著史书更感兴趣，但这只是十九世纪末的事。加族人C. S. 赖因多夫于1895年在巴塞尔发表了《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从而被视为第一个非洲血统的近代史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历史》与赖因多夫的著作是同时写成的，但迟至1921年才出版。他们二人开创了非洲史学家的连续不断的名册。 134 非洲史学家起初都是业余起家（大多是传教士），后来专攻史学。专门讨论非洲史学发展的那一章将对约翰逊和赖因多夫的思想和著作进行详细评述。

所有这些记叙资料，不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还是用各种非洲和欧洲语文写的，组成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史料库。当然，它们并没有包括历史进程的所有方面，而且还受到地域局限，在某些情况下只提供了片断画面。穆斯林写的资料往往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偏见，在涉及非穆斯林社会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用欧洲语文撰写记叙资料的作者同时也是反对贩卖奴隶或争取平等的论战者，因而不免带有片面性。然而，这些缺点是一切记叙资料的通病。当人们通晓这些资料之后就会承认，它们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优点，即它们是非洲人自己的声音，给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而这种声音在外界人的大量见解中几乎是听不到的。

档案资料，私人文件，机要报告和其它记录

原始资料实质上是指那些出于需要而记录各种人类活动的书面文件，这种文件最初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一般公众，而只是为了有利害关系的少数人。因而原始资料主要包括官方和私人信件、机要报告、各类交易记录、商业报告和书刊、统计资料、各类私人文件、条约和协定、航海日志等。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些资料都是原料，因为与按照一定目的编写的记叙资料不同，它们是客观的证据，原则上不进一步考虑更多的公众或后代。这类资

[92] 参见《J. J. 斯科恩神甫和克劳瑟先生的日记》（伦敦，1842年）；S. 克劳瑟(S. Crowther),1855年。
[93] T. B. 弗里曼(T. B. Freeman)，1844年。
[94] R. 坎贝尔(R. Campbell),1861年；M. R. 德拉尼(M. R. Delany),1861年。
[95] B. 安德森(B. Anderson),1870年。
[96] C. 布莱登(C. Blyden)；参见H. R. 林奇(H. R. Lynch)，1967年。
[97] J. A. B. 霍顿(J. A. B. Horton)，1870年。
[98] 巴黎，1853年。

料大多藏在国家和私人的档案馆或图书馆里。

过去认为，有关非洲历史的基本文字资料不充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前宗主国和非洲本地，不仅分别存有殖民时期以前和殖民时期欧洲国家或私人机构创作的丰富文献和大批资料，而且还存有非洲人自己用欧洲语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原始资料。过去人们认为，非洲人的文献只是在少数特殊地点发现的罕见物品。现在已经很明显，在非洲大陆很多地区以及在欧洲和亚洲的档案馆里都有非洲人写的大批文字资料。

让我们先看看用阿拉伯文写的资料。十九世纪以前的阿拉伯文资料，现在发现的只是

135 零星的信件(当地的和国际的)，而且大多出自西非。在土耳其档案馆里发现了1578年奥斯曼苏丹致博尔努的迈·伊德里斯的一批信件。另外，还有十六世纪末摩洛哥苏丹致桑海的阿斯基亚以及致克比的坎塔的一些信札。不仅皈依伊斯兰教的苏丹地区诸宫廷，而且非穆斯林的统治者也都使用阿拉伯文作为外交语文。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散蒂人，他们任用穆斯林书记用阿拉伯文与北方邻国和沿海的欧洲人通信。在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批这类信札。库马西的阿拉伯文书室直至十九世纪后半期仍在正常工作，阿拉伯文也被用于记录行政和司法决议、财政事务等。非洲另一端的例子是法国奴隶贩子莫里斯与基尔瓦的苏丹于1776年用阿拉伯文签订的条约。

在十九世纪，整个大陆上阿拉伯文的书信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苏丹地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必然导致频繁的行政和外交活动，这类书信资料大量问世，主要出自索科托哈里发统治区及其从关杜到阿达马瓦的附属酋长国，出自马西纳国家和博尔努帝国。所有这些穆斯林统治者，不论其国家大小，都忙于互相通信，有时忙于与正在向他们进行渗透的殖民列强通信。在西非各国(有时在欧洲)的很多档案馆里，有数以千计的这类阿拉伯文档案文件。它们出自哈吉·奥马尔、阿赫马杜·塞古、马-巴、拉特·第奥尔、马哈马杜·拉敏、萨莫里、巴卡吉、拉比赫这些人物之手，有的出自很多次要领袖和酋长之手。塞拉利昂、几内亚、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殖民当局也用阿拉伯文与上述这些人通信。现存的信件计有的黎波里的奥斯曼帕夏与博尔努首领的，有达尔富尔苏丹与埃及的，还有廷巴克图与摩洛哥的。东非的情况与此类似。然而在桑给巴尔这样一个在商业和政治上有重大影响的城市的档案馆里没有应有的那么丰富的阿拉伯文文献。当然，私人手里一定有大量各种内容的文件。对这些文件进行收集和编目并非易事，但这是最近将来的一项当务之急。

很多资料是用瓦伊文写的。瓦伊文是穆穆卢·杜韦拉·布克勒于1833年前后发明的，很快就在瓦伊族中传开，因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几乎所有瓦伊族人都认识这种文字，并经常用这种文字写私人信札和官方书信、记帐并记载习惯法、谚语、故事和寓言。许多邻近民族，如门德族、托马族(即洛马族)、格尔泽族(即克佩勒族)和巴萨族，采用和改革了瓦

136 伊文，用于类似的目的。[29]

二十世纪初巴蒙(喀麦隆)苏丹恩若亚为巴蒙语发明了一种特殊字母，生前进行了四次改革。但是，与大多数人普遍使用的瓦伊文不同，认识巴蒙文的只限于苏丹宫廷的少数人。不过，恩若亚用这种文字写了一部巴蒙人历史和风俗的大书。他在这部书上花费了多

[29] 参见D.多尔比(D. Dalby)，1967年。

年心血。这部书是一个真正的珍贵史料宝藏。[100]

此外还有十字河流域(尼日利亚东南)的用恩西比迪文写的资料,[101] 包括寺庙铭文和一些秘密社团成员使用的特殊形式的语文。

用欧洲语文写成的资料从十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资料是用十余种语文写的,内容极为丰富,散见于全世界上百个地点、档案馆、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这使史学家很难利用资料,特别是手边没有参考手册或书目时。因而国际档案理事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道义和财政赞助下,着手编制一套关于非洲史料的参考指南。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研究非洲历史的学者的需要,办法是向他们提供使用全部可用资料的机会。历史研究工作长期集中在藏有殖民时期各种资料的少数档案馆,因此还很有必要提请人们注意分散在各地尚未利用的大量资料。这套指南主要是针对公共和私人档案馆,但也同样重视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这套书预定出 12 卷,介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档案资料情况。目前已出版以下各卷:第一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0 年);第二卷——西班牙(1971 年);第三卷——法国-I(1971 年);第四卷——法国-II(1976 年);第五卷、第六卷——意大利(1973-1974 年);第八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71 年);第九卷——荷兰(1978年)。第七卷,计划介绍罗马教廷的资料情况。联合王国和爱尔兰的一卷已单独出版(1971 年),比利时和美国的各卷也将单独出版。但这三卷的介绍方法与上面各卷相同。[102] 正象约瑟夫·基-泽博在这套丛书的导言中所正确指出的:“在重新发现非洲历史的战役里,这套《非洲历史资料指南》是一个新的战略战术武器。”[103] 137

除了这个主要工程以外,还有另外一些资料指南,主要是按地区或依据特定标准编制的。其中最完备的是 1962-1973 年出版的五部西非史料指南,介绍了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法国以及联合王国的档案馆。[104]

气魄更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有利的是把那些档案文献的全文汇编成册或编成目录。迄今为止,主要是对葡萄牙档案馆里的资料进行了这种工作。除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派瓦·曼索的著作之外,[105] 目前还有两部取材于葡萄牙和其他档案馆的传教士文献的重要汇编,一部是 A. 达席尔瓦·雷戈编的,[106] 另一部是 A. 布拉济奥编的。[107] 几年前,葡萄牙和津巴布韦档案馆合作开始编辑一部大型汇编,这部汇编将用原文发表有关东南非洲的全部葡萄牙文件,并附以英文译文。[108]

另外还有按时间、范围或问题分类汇编的文集。这类书刊主要是殖民时期的英国议会

---

[100] 《巴蒙历史和风俗-苏丹恩若亚主持编纂》,P. 亨利·马丁(P. Henri Martin)译(巴黎,1952 年)。原稿保存在丰班的苏丹王宫。

[101] 参见 E. 戴列尔(E. Dayrell),1910-1911 年;J. K. 麦格雷戈(J. K. MacGregor),1909 年,第 215、217、219 页。

[102] 美国卷和联合王国卷对有关整个非洲大陆的文件都做了编目。

[10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中有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历史资料指南》,第一卷(瑞士,楚格,1970 年),前言,第 vii 页。

[104] 《欧洲档案馆中西非历史资料指南》(伦敦大学,阿斯隆出版社),P. 卡森(P. Carson),1962 年;A. F. C. 赖德(A. F. C. Ryder),1965 年 a;R. 格雷(R. Gray)和 D. 钱伯斯(D. Chambers),1965 年;P. 卡森,1968 年。

[105] P. 曼索(P. Manso),1877 年。

[106] A. 达席尔瓦·雷戈(A. da Silva Rego),1949-1958 年。

[107] A. 布拉济奥(A. Brasio),1952 年。

[108] 《东非和中非历史文献》,里斯本-索尔兹伯里,自 1965 年出版,将出版 20 卷左右。

文件和各种兰皮书、白皮书，另外还有较近的学术性选编，如J. 居韦利埃和L. 雅丹选编的关于古刚果历史的梵蒂冈文件集，[109] C. W. 纽伯里选编的英国西非政策文件集，G. E. 梅特卡夫对有关英国与加纳关系的文件性调查报告。[110] 这类资料还有正由C. 吉利奥编辑出版中的，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和邻国政策的大部头资料汇编。[111] 另外，许多取材于欧洲各档案馆的资料汇编已将殖民地历史的某些方面的文献公之于众。这些选编的弱点正在于选编性上，因为各个编者都以自己的主观标准选择资料，而研究者则需要全部的资料和完整的文献。

目前非洲各独立国家都有政府档案馆，其中也收存从以前殖民当局接收的资料。虽然一些国家已刊印资料指南或资料目录，但非洲大多数档案馆仍处于系统整理和介绍的阶段。[112] 目前迫切需要为非洲所有国家和私人档案馆出版象目前正在为欧洲档案馆出版的一套指南。

非洲各政府档案馆与前宗主国的城市的收藏相比，既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短处。除了少数例外，在非洲开始对详细记录资料进行保存的时间不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而且资料还有许多佚缺。这种不足必须用其他资料弥补。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是私人手中的传教的和商业的记录和文件，当然还有欧洲各国首都档案。

另一方面，非洲建立的档案馆与前宗主国大都市档案馆相比，优点是很多的。数量差异表现在，非洲档案馆的资料和记录同当地局势有具体的关系，而欧洲的殖民地档案馆所包括的主要是这个殖民国家的政策文件。非洲档案馆常常保存着殖民以前时期的记载，如最早的考察家的报告，商人、官员和传教士在边远内地搜集的情报，当时认为不值得送往欧洲但对当地历史具有异常价值的报告。这些档案馆保存的出自非洲人之手的文献还远远多于欧洲档案馆保存的这类文献。一般而论，即使欧洲档案馆与非洲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在数量上彼此相当，但只凭前宗主国档案馆的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都将宁肯写关于欧洲在非洲的利益的历史，而不愿写非洲本身的历史。另一方面，单纯依靠非洲收藏的档案也不能画出完整的画面，因为许多记录和文献已遗失或残缺不全。

最后，我们应该谈一谈另外一些类型的文献。首先是地图和其他地图资料。尽管十六世纪以来印制的非洲地图逐年增加，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以手稿形式保存在欧洲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其中有些装潢色彩都很漂亮。在这些地图上，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地点现已不复存在或已改变名称，但在其他口头或文字资料中已提到。例如：东班图某些民族有一个称为从顺瓜亚地区迁徙的传统。目前这个名称的地点已无人知晓，但在一些古老的地图上，如范林朔滕的地图(1596年)或威廉·布拉厄的地图(1662年)和其他地图上，顺瓜亚以各种不同拼法出现，它距离海岸不远，最初把它称为城镇，后来把它标为地区。这些古老地图还提供有关种族分布、边界或国家和行省、山川河流的各种名称以及其他地貌的资料。总之，它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地名资料，而这些资料反过来又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W.

[109] J. 居韦利埃(J. Cuvelier)和L. 雅丹(L. Jadin)，1954年。
[110] C. W. 纽伯里(C. W. Newbury)，1965年；G. E. 梅特卡夫(G. E. Metcalfe)，1964年。
[111] C. 吉利奥(C. Giglio)，1958年。
[112] 关于独立前夕的档案馆的状况调查，见P. D. 柯廷(P. D. Curtin)，1960年，第129-147页。

G. L. 兰德尔斯在他的《十六世纪的东南非洲》一书中做出了把地图资料用于历史研究目的的实际榜样。[113]资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早已得到承认，史学家已经有优素福·卡马尔的巨著《非洲和埃及地图集成》，此书还有许多记叙文献的原文和译文，但在年代上只编到十六世纪。[114]因而我们必须欢迎约瑟夫·基-泽博的呼吁，出版带注释的全部非洲古地图集。[115]最近莱比锡出版了近百幅地图的专集，虽然注释不足，而且仅仅是再版了刊印过的资料，但毕竟是这方面的第一步。[116]

另外一类文字资料是语言资料。由于本卷专有一章作为一门有关的历史科学讨论语言学，因此我们可以不谈方法论问题，只谈语言资料的线索。从最初接触非洲起，欧洲人写游记或其他报告时就喜欢附上长短不一的土著语言词汇表。最早的这类词汇表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在十九世纪以前，找一本没有这种附录的书简直是很难很难，有的书甚至还附有简明语法。尽管单词拼写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并不难鉴别这些单词和语言。最著名的这类出版物是克勒汇集的160种语言的词汇巨著。[117]这部著作的价值超出语言学的范围，柯廷、旺西纳和海尔早已说明。[118]古刚果王国在这方面特别幸运，因为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编辑关于刚果语的著作。布律西奥托于1659年编写了语法，德盖尔(卒于1652年)编了一部辞典。[119]除了这些已刊印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散存于梵蒂冈、大英博物馆、贝桑松等图书馆和档案馆里。这些文献对于史学家来说，其价值大于单纯的词汇表的价值，因为它们比较完整，从而为社会和文化术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条件。[120] 140

文字资料，不论是记叙资料还是档案资料，不论是用非洲语文还是用东方语文或欧洲语文写的，都是非洲历史极其丰富的宝库。已知的文件、记录、书籍和信件虽然很丰富，但很可能只是现存资料的一小部分。在非洲内外一定有无数地方至今还有完全未发掘的有关非洲历史的记载。目前这些未开发地区在非洲历史资料的地图上是真正的"空白点"。这些地方开发得越早，非洲历史的画面就越丰富多采。

(刘北成译)

---

[113] W. G. L. 兰德尔斯(W. G. L. Randles)，1958年。

[114] 开罗，1926-1951年。

[115] 参见前面注103。

[116] 《十二至十八世纪地图上的非洲》(莱比锡，1968年)。

[117] S. W. 克勒(S. W. Koelle)，1854年(再版，格拉兹，1963年)。

[118] P. D. 柯廷和J. 旺西纳(J. Vansina)，1964年；P. E. H. 海尔(P. E. H. Hair)，1965年。

[119] 《极难掌握的刚果土语的简便语法规则》，A. F. 亚钦托·布律西奥托(A. F. Hyacintho Brusciotto)编(罗马，1659年)；J. 范温(J. van Wing)和C. 彭德斯(C. Penders)，1928年。

[120] D. A. 奥尔德罗格(D. A. Olderogge)为此目的研究了布律西奥托编的语法，1959年。

照片 6.1 巴蒙文手稿(藏于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博物馆)

照片 6.2　豪萨文手稿(藏于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博物馆)

照片 6.3　瓦伊文手稿(转引自 S. E. 霍尔苏:《一部早期瓦伊文手稿》,国际非洲协会出版)

142

7 口头传说和方法论

J. 旺西纳

口头文化

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南地区的非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口头文化，即使象西非这样从十六世纪以来就存在文字的地区，也是属于口头文化，因为只有很少数人会写字，而且文字对于一个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常常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如果把口头文化贬低仅仅是因为缺乏文字的结果，或继续采取许多俗语——如中国谚语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说的，识字的人生来看不起不识字的，那就错了。持这种态度的人显然是对口头文化的特性全然无知。一位熟悉秘密传说的人说过，"言语的力量是惊人的，它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而泄露这一秘密就会毁掉我们"——也破坏了社会的特性，因为言语打破了共同的秘密。

一个想研究口头传说的人首先必须完全了解并接受口头文化对语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用文字记载所有重大事件的文字文化的态度完全不同。一个口头文化社会认为语言不仅是日常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保存先人智慧的一种手段，这种智慧藏于人们可称之为基本言语(即口头传说)中。事实上可以给口头传说下个定义，即一代人用口头方式传给下一代人的口证。几乎在任何地方，言词都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因为它能创造事物。这至少是大多数非洲文化的观点。多贡人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这种唯名论观点，但在所有的宗教仪式上，名称就是事物，"说"就是"做"。

口头办法是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不是缺乏某种技能。口头传说使当代史学家感到无法解释。他们置身于浩瀚的文字史料中，因而必须锻炼出快速阅读的技巧，但他们还是能够根据经常重复各种形式的事物的办法来帮助加深理解。口头传说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反复推敲。扎伊尔的福·基奥说的对，读了一两遍口头传说的记录本就自以为已懂得的态度是天真的。对待口头传说要象对待诗一样，听、记、消化，仔细推敲以弄清许多不同意思，至少对待重要的传说应该如此。因此，史学家必须学会耐心慢慢工作、反复思考，努力了解一个生疏的思想和形象体系，因为一部传说集是一个社会为了阐述自己而留下的集体回忆录。阿马杜·哈姆帕特·巴或布布·阿马等许多非洲学者非常雄辩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史学家必须首先懂得口头文化的社会是如何思维的，然后才能解释它的传说。

143

口头传说的性质

前面已经指出，口头传说是一代人用口头方式传给下一代的口证，其特点在于它是口头的，传播的方法，与书面材料不同。口头传说是复杂的，很难下一个定义来概括全面。书面记载是一个物体：一份手稿、一片瓦或一份图表。而口头记录却可以用几种办法来说明，因为说话者可以中断、纠正和继续再谈，等等。因此对口证的有些武断的定义也许是：一个人对过去一系列事件所作的全部陈述，只要他在各种说法之间没有得到新材料。如果得到的话，传达的情况就混杂了，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种新传说了。有些人，特别是象民间歌手这样的专门人才，熟悉关于一系列不同事件的传说。我们知道时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就同样的历史事件谈出两种不同的传说。提供资料的卢旺达人关于"图西"和"胡图"讲述了两种不同的传说。一则说第一个"图西"来自天上，他在地球上遇到了"胡图"；另一则说，图西和胡图是兄弟俩。同一个人就同一个主题有截然不同的说法。这说明在口证的定义中为什么包括"一系列事件"这个用语。最后，众所周知，当地谈情况的人常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不同传说编造出一个故事。

传说是世代相传的信息，但并非所有的口述情况都是传说。首先要选出目击者的口证。这种口证很宝贵，因为它是第一手材料，不是转述的，因此失真的可能性也最小。事实上，任何有效的口头传说都必须根据目击者的叙述。谣传必须排除在外，因为尽管它确曾转达了信息，但按定义它是道听途说的。因而具有小道消息的性质。它常常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以致它的唯一价值是表达了群众对某事件的看法。经过后代的多次重复，它也能变成传说。然而毕竟有真正的传说、把真相传给后代。 144

因此，传说的起源可能是目击者的口证，也可能是谣传，或者是依据构成新信息的已有不同口头材料所形成的新故事。但是，只有以目击者的叙述为基础的传说才是真正有效的。伊斯兰史学家通晓这一点。他们发展了整套复杂技术来鉴别各种圣训的价值，或者鉴别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友人记录的穆罕默德预言所构成的传说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训的数量越来越多，有必要清除那些用文字记录圣训的学者同穆罕默德的友人的纽带已无法弄清的圣训。对于每个环节，伊斯兰编年史学者都要提出可能性和可靠性的标准，这种标准要同今天的历史批评学所遵循的标准一样。居间的见证人能知道这个传说吗？他懂得这个传说吗？篡改事实对他有好处吗？他传播过这个传说吗？如果传播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采用什么方式？

要注意的是，这里对传说所下的定义是说除了用口头讲和通过口头传播外没有其他限制。因此，传说不仅包括有意识地描述历史事件的王国编年史和部分社会的家系，而且还包括全部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会详细描述过长的事件，这种描述由于是无意识的口证而更加珍贵，而且还是研究思想史、价值史和口头技巧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传说也是文学作品，所以应当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正如有必要研究构成某种文化的各种表现的内容基础的社会环境一样。因此，以下各节将先介绍文学批判、社会和文化环境问题，然后再介绍年代问题和对传说所作的总的评价。

作为文学作品的传说

在处于口头文化的社会中，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传说，而且所有有意识的传说都是口头讲述的。象所有的言语一样，形式和文学标准都影响信息的内容。因此，传说必须置于文学结构研究的整体之中，并且必须据此作出批评性估价。

第一个问题是信息的实际形式问题。由于两类原则的实际结合，出现了四种基本形式。在某些情况下，用词是靠死记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可以由作者自由造词。在某些情况下，普通言语的语法要顺从一套特殊的正式规则，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参见表格7.1：

145

表格7.1 口头传说的基本形式

		内容	
		固定的	自由的(选词)
形式	规定的	诗体	史诗体(诗体)
	自由的	惯用体	叙述体

这里面的“诗体”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提法，它涉及所有背诵的材料，并具有特别的结构，其中包括歌曲。“惯用体”这个提法常常包括谚语、谜语、祷词和家谱，也就是说，包括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除了要遵照正常语法规则以外不受其他撰述规则的约束。在这两种情况下，传说不仅包括信息而且包括传递信息的实际言语。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以象对书面材料一样，原先的传说是可以恢复的。历史论据可以以语词为基础，不只是根据对信息的一般观念。但是，不可能恢复原先面目的常常是惯用体而不是诗体，因为改动的地方太多。例如，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家族的箴言来源于其他一系列箴言，但无法证实言词的原先的具体形式。人们很容易明了惯用体容易被人改动的原因。事实上，并不能阻碍这种进程的有形规定。

另一方面，固定的材料在原则上是最宝贵的，因为它们的传播是最准确的。实际上，材料中很少是有意识地要转达历史情况的。此外，在这部分材料中我们显然会碰到古字，而且有时未作解释。但是，在班图语中可以找到他们的意思，因为在相邻的语言中很可能包括与古词词根相同的词。我们还必须借助提供材料者的注解，因为他会重复传说的注解或作出自己的注释。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类口头记录中掺杂着许多富有诗意的隐喻、含蓄的想象，以及玩弄多义词的把戏。没有注解就不可能弄懂其中任何词句的奥妙，不仅如此，而且常常只有作者才明白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把一切都包括进与诗一同传播的种种注解之中。这种特点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南部非洲(茨瓦纳、索托)、东非(沿湖地区)、中非(卢巴、刚果)和西非(伊佐)等地的颂诗或者颂歌中。

“史诗体”一词意味着作者可以根据正规的格律，如韵脚、语调格局和字母多少，选择

用词。不应当把这种情况同具有英雄体裁的长篇文学作品混为一谈，如松迪亚塔、姆温多（扎伊尔）和其他许多叙事文。这类传说包括的是信息和正规格律，只此而已。但是，我们往往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独特的诗句，它们充实了篇幅，或者使作者想起固定的正规格律。某些诗句大概可以追溯到史诗体的创立时期。非洲有这样的“史诗”吗？我们认为肯定有，如卢旺达的某些诗的形式，尤其是芳人（喀麦隆－加蓬）的寓言歌，都属于这一范畴。应该注意，恢复这些史诗的原型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者可以自由选词。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形式的要求，一首“史诗”的所有变体都依据一个共同的起源。对变体的研究往往表明情况是这样。 146

最后一类是叙述体，它包括大多数有时间概念的历史记事。作者可以自由选择多种组合、很大程度的改写、重新安排情节、增加描述、进行发挥等等。这样就很难恢复其原型。但只有从文字角度出发，作者才能有充分自由。有时他的社会背景可能使他死板地遵守他的原材料。虽然有这种种困难，但通过收集所有变体，包括那些据认为不是历史传说的变体和考虑邻近民族产生的变体，还可以找出一种传说的混合原体。有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地从历史世界来到一片使人眼花缭乱的奇境。但是，我们仍要设法去掉那些不以目击者的叙述为依据的口头传说。这种批判的方法是必要的。

每种口头文学在文学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分类。史学家不仅应该努力了解形式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的意义，而且还应该对各种形式至少收集一件典型样品，因为从中可以找到史料。而且从全面情况来看时，他特别感兴趣的传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内在的分类提供了评价尺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的宣传者是否对——例如——历史叙事作品和其他类型叙事作品加以区别。

文学的形式也受到惯例的约束，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涉及的不是正式规则，而是用语、表达方式、特殊前缀、各种类型诗词破格的选择。必须格外注意那些有多种不同反响的词汇或表达方式。此外对于那些社会结构和世界观有密切联系的而且实际上无法释意的关键性术语，需要联系它们所处的文学作品的上下文加以解释。 147

要收集齐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史学家必须考虑实际需要，这样，一旦他获得每种文学形式的代表性样品，他将不再有奢望了。

只有对正进行研究的某个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各类叙事作品加以分类，才可能不仅找到中意的形象或表现方式，而且还会从（例如）那些不妨称为移民传说的叙事作品中找到已成格套的情节。例如，坦噶尼喀湖畔流传的一篇卢巴叙事作品，谈到一个首领想除掉另一个首领，就邀请那个首领坐到下面布满尖桩的深坑的席子上。该首领坐下来掉到坑里被害了。不仅从五大湖地区到沿海能发现，而且在利普塔科的富拉人（上沃尔特）、豪萨人（尼日利亚）和亚滕加的莫西人（上沃尔科）中，也能发现同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题材虽然平庸，但显然很重要。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顶用的参考书，虽然鲍曼在介绍各民族起源时谈到了一些。① 现在似乎已有必要作出切实的分类以便鉴定这些传统的情节。所谓

① H.鲍曼(H. Baumann)，1936年。

的民间主题索引使用不方便，也不明确，因为它们根据的是武断选出的少数几个特点，而在非洲的叙事作品中，情节代表一个自然单位，往往很有特色，范围也比一个主题宽，因此比较容易分类。

当我们遇到这类平常的题材时，我们无权认为整个传说或有关这一系列事情的那一部分是无用的。我们倒是应当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使用这类题材。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中，它简单地谈到一个首领杀死另一个首领，然后加上一段具体做法的描述。这是想象出来的，但使听众高兴听。通常这类常见题材是根据完全有根据的情节进行解释和评论的。

文学批评不仅要考虑传说的文学意义和作者意图，而且要考虑规范的和文体的要求对作品表达方式的限制。如果有损害美学形象的情况（往往是有的），就要估价其影响。毕竟，即使过去的作品也不一定使人很厌烦！在这一点上，观察反映传说的社会表现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我们用表现一词而不用复述一词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美学成分有关。如果美学标准比复述的准确更重要，那么就会在反映公众趣味和传播传说的艺术方面出现严重损害美学的情况。即使情况不是如此，那就是讲述的安排问题了，甚至使具有特定内容的传说披上当前艺术标准的外衣。譬如，在叙事作品中，构成主要情节的是一系列向高潮发展的事件，而其他部分则是熟练的类似的重复，或者只是从一个叙述到另一个叙述阶段的过渡。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讲述得越接近于典范，越受公众称赞，就越容易损害原著。在许多变体中，有时能找到正确的变体，因为它与这些标准背道而驰，正如一个同传说的社会功能背道而驰的变体往往比其他变体更真实一样。然而，不应忘记，并非所有的口头作者都是尽善尽美的。有些人是蹩脚的，其变体也总是很糟糕。但是，公众的态度同表演时的布景一样，不只是关系到艺术，它首先关系到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把传说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虑。

148

传说的社会基础

社会认为对其机体的正常运行、对正确理解社会不同阶层及其作用、对每个人的权利和职责具有重要作用的任何东西都是仔细向下流传的。口头文化社会是凭传说作到这一点的。而在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中，传说只记叙那些无关紧要的事。这种情况使来自书面文化社会的史学家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传说是一种神话、摇篮曲或儿童游戏。

每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还有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体现在集体对这个社会进行描述并为之辩护的传说之中。因此，用莫尼奥特的话说，每个传说都有其“社会外表”。没有社会外表的传说就不会再传播下去，若它不起作用，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从而被构成它的基础的那个社会部分所抛弃。

人们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追随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先要将人类集体按照国家、无国家的社会等类型进行分类，就可以推导出历史传说所要叙述的某个社会躯体的轮廓或特性。虽然各种非洲社会的确大致可以按照这些类型分类，但是这些类型无疑又可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类别，因为社会各不相同，而使用的标准是武断的和有局限性的。没有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具体情况是相近的。虽然马赛人（肯尼亚－坦桑尼亚）、恩布人（肯尼

亚)、梅鲁人(肯尼亚)和加拉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社会可以列入"同龄组"社会，而且都位于非洲的同一地区，但它们的组织基础却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想找一个由建立在许多家庭基础上的小集团组成的所谓简单的无国家的社会，那么古罗人(象牙海岸)就是个好例子。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只叙述世界故事和家谱的传说概况。我们的确找到了。我们还发现一个秘密社会流传下来的秘史。在赞比亚的通加人当中，我们再次找到有关世家的故事，而且还找到有关求雨者举行仪式的地点的故事。这类社会都会向我们透露没有料到的重要体制。各国中最特别的例子要数特克人的王国(蒂奥)了。虽然据说这些王国有相当悠久的传说，但那里有关王室的传说不超过两代。不仅如此，有关贵族神奇的象征的传说也比有关君主的象征的传说历史悠久。对传说的价值仓促下结论的做法和依然普遍存在的简单化倾向都是没有道理的。只能采用归纳法来确定传说的某一躯体的轮廓。 149

显然，传说所起的作用往往会歪曲这些作用。一一列出这些作用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是，一个传说可以具有几个不同的作用，而且所起的作用同其关系有时是明确的，有时是模糊的，但是主要原因是，"作用"这个词本身使人很难捉摸。它往往用来描述所有那些巩固或维持它所赖以存在的体制的东西。由于这种联系不是有形的，所以想象力会发挥无数的作用，而无从作出选择。尽管如此，要区别传说具有的某些明确用意并非难事，不管这种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潜在的。例如，有些"神奇的宪章"、王朝故事、家谱和帝王名录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不成文的宪法。我们可以扩大这个类别的范围，把同公众法律问题有关的所有传说都包括进来，如支持公众财产权的传说。由于它们在社会里具有普遍效力，所以通常称之为**官方**传说。同其他社会的集团或机构有关的**民间**传说虽然不那么重要因而保存得不完善，但是它们往往比其他传说更真实。然而，应当指出，民间传说对传播它们的集团来说是官方传说。因此，同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比，家族史就是民间的，从而家族史谈到国家的地方也比官方传说受到的国家限制少些。但在家族内部，这种民间传说就成了官方传说，其全部目的同家族有关，因此应把它视为官方传说。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家族史或地方史有助于澄清总的政治史中的问题了。它们的证据受到的歪曲较少，人们可以用来对官方传说提出的说法进行有效的检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传说涉及的只是小集团的情况，所以在转述时也就不够仔细深入。从通常大量存在的变体中就可看出这种情况。 150

其他的普通作用，简要地说还有，宗教和宗教仪式的作用，私法(惯例)作用，美学的、说教的和历史的作用，对秘密口头记载所解释的作用，以及人类学家所说的神秘作用。这些作用同文学形式共同构成一个有效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使史学家可以对他的资料所受到的歪曲作出一般的估价，同时它还介绍有关传播的迹象。就选择后留下的那些类型来说，我们可以分辨名称、职衔、口号或箴言、仪式用语、成语、地名、人名和世系表等。根据其基本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用语视为典型的"惯用体"。历史的、颂扬的、礼拜和庆典的、宗教的和个人(抒情等)的诗歌，以及摇篮曲、劳动号子、打猎曲和摇船曲等各种形式的歌曲都是这种意义的"诗体"。"史诗体"作为一种基本形式，包括那些同通常所谓的内涵不相干的一些诗作。最后是"叙述体"，包括历史的或其他的有关风土、家族、壮举、病因和美学记载以及个人回忆。这里还将包括在口头传说中罕见的法律案例、对口头记载的解

说以及基本上是对以下这类问题的简明回答的偶然注释，如“我们是怎样着手种玉米的?”“这种舞蹈面具是从哪里传来的?”等等。

由此可以立即看到，一个机构对任何这些形式的传说进行的歪曲可能是什么？但是应当指出，这种行为的确存在，或者歪曲的可能性非常大。经常可能发现，一个传说由于没有受到预料中的歪曲面成为有用的资料，例如，某个民族说它比另一个民族“年轻”；帝王的编年史上承认有一次战败；理应解释某一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定惯用体不再符合目前情况。所有这些传说通过分析就能判明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未受歪曲。

在研究文字现象的著作中，古迪和瓦特认为，口头文化社会不断地和自动地趋向一种自然平衡，这种状态使公众集体忘记了传说同其社会外表之间的矛盾，因而出现了“结构性健忘”的说法。但是，上述例子说明，这种平衡只是局部的。因此可以推断，不能因为传说具有某些作用和对每个传说都必须做出严格的社会学评论，就一股脑儿地否定传说的历史价值。在这同一部书中，两位作者指出，一个无文字社会的文化是匀称的，也就是说每个成人的知识都相差无几。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工匠、政治家、法律和宗教专家知道的东西当中，有许多是同代人不知道的。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思想家。例如，在库巴人(扎伊尔)当中，我们遇到三个人，他们依据同样的符号体系提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哲理。我们猜想在多贡人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就传说而言，我们发现很多集团都有公开的传说和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传说。例如，阿散蒂王室知道关于他们起源的秘密故事，而一般人只知道官方的说法。在卢旺达，只有比鲁的专门人员才知道王室仪式的秘密，但他们也只有凑到一起时才了解全部情况，因为不同的集团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情况。在尼日利亚，几乎所有纪念历史事件的活动和整个非洲帝王登基的庆典都有秘密的习俗和传说。这能说秘密的传说一定比公开的传说更准确吗？那要视情况而定。总之，出于迫切的原因，秘密传说也会受到歪曲。由于占有秘密的集团是社会中的关键集团，这种迫切性就更大了。应当指出，事实上，我们如今所知道的秘密传说是极少的，因为它们所扎根的旧秩序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所知的那些秘密传说是来自经历过重大变迁的社会，其中许多肯定会失传而留不下记载。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片断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约鲁巴地区的某些奥格博尼人的传说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以致它们关于这个民族起源的说法都不可靠了。而比鲁人的传说看来比较可靠。这不是由于这些传说是秘密的，而是由于传说的用意。前者使少数人拥有的很大权力具有合法地位，而后者只是使人想起一种实际的礼仪。

每种传说都有其社会外表。为了收集传说并分析传播的质量，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弄清他所研究的社会的种类。他必须研究这个社会的所有机构以便择出所需的传说，就如同他为得到史料去研究各种文字材料的体裁一样。社会的主要集团掌握着官方传说并由专门人员来传播。他们利用记忆手段(一般是歌曲)来记住他们所学习的情况。有时在私下排练时或在举行重要庆典的公开演出时，由同行对传说进行检查。但是，这些专门人员不一定都属于主要集团，如负责家谱的人，首领的或帝王的鼓手、守墓人② 和民族宗教的祭司。但还有其他类型的专门人员。在科萨人(南非)中间，有的妇女擅长讲恩措米笑话的艺术，还

② 但是，在一些国家中，这些人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莫西人的鼓队队长。

有一些人则只会不精。他们经常参加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某些宗教仪式的司仪也精通口头传说。绍纳人(津巴布韦)的蒙洪多罗守护人通晓委托给他们守卫的神灵的历史。有些人象民间歌手，是民谣歌手，他们收集各方面的传说，在婚丧大事、首脑家宴等场合向观众演出双方同意的传说。在那里非专业化的情况是少见的，即便是在国别史和家史方面。总有些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布隆迪掌握土地事务的头目)或者是比较聪明的，从而他们受到委托去背诵和传播传说。最后一类了解情况较多的人——难以称作是专门人员——是那些住在重要古迹旁边的人。在这方面，居住在如古战场等地点对记录有关传说将在记忆方面提供帮助。

因此，对"社会外表"进行研究就可能找到现有的传说，把传说产生的背景联系起来，找到负责这些传说的专门人员，并对其传说进行研究。通过这种研究还可了解关于表演方式和表演次数的珍贵情况。次数可以反映传播的忠实情况。在多贡人（马里）中，每60年左右只进行一次锡吉(Sigi)的仪礼。这就容易造成遗忘。看过两次锡吉而在第一次就能熟悉情节并能指导第二次的人是十分罕见的。这种人至少要在75岁以上。可以设想锡吉的内容和传递的情况同尼日利亚南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表演的传说形式相比，会有大得多的变异。另一方面，非常频繁的表演不一定就意味着传播是特别忠实的。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如果它想表现得真实，次数多是有益的。某些咒语，如驱魔咒语，就是如此。这说明为什么一些姆本人(扎伊尔)用来避雨的咒语含有古代地理的内容，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的姆本地区都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社会对传播的忠实问题不重视，大量的表演反而会更快地破坏传说，例如，民歌和最受欢迎的民间故事就是实例。通过对所收集的变体的研究，可以查出也应该查出所有这些情况。变体的数量直接反映传播的忠实程度。

这样看来，发生的种种变化趋于增加社会机构和伴随着的传说之间的自然平衡。因此在这方面，古迪和瓦特并非全错。只要有变体的存在，并且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我们就可以作出推断：同社会机构的目的和职能最不一致的变体是最准确的。此外，有时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情况，一则传说没有任何变体，传说已成为一种平庸的主题，同时有一种说法："我们的来源全部是X"，而X又完全同这个社会的需要相适应。还有一种情况，正如民间故事一样，变体是很不相同的，以致搞不清传说的主题，也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传说都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大多数传说的内容都是根据其他民间故事新近编制的。但是，从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缺乏变体确实是由于社会具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而变体繁杂是由于艺术考虑或由于盖过其他一切考虑的娱乐需要。我们也可以看出，无意识的文化自负感使得传说十分一致，以致传说没有变体、内容平常。现在必须研究这种文化的影响。

153

传说的精神基础

我们用精神基础这个词是指某种文化的不自觉的集体思想和想象，它影响这种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同时构成其世界观。精神基础因社会而异，在表面上发现这种基础的一部分是比较容易的，办法是对所有传说的内容进行典型的文学批判，并将其同这种文化的其

他表现形式——主要是象征表现形式——进行比较。传说总会把事情理想化，尤其是诗歌和故事。于是形成深孚众望的模式。整个历史都倾向于制造一种典范，结果历史就变成虚构的，无论其内容是所谓“真的”还是假的。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理想行为的范例，找到价值观念的范例。在王室的传说中，模式化的人物同西部作品中的模式化人物一样容易识别。一个国王是“术士”，另一个统治者是“正义的”，还有一个是“勇士”。但是这就歪曲了情况，例如，把本来是某人挑起的战争说成是模式化勇士国王引起的。不仅如此，所有国王都具有反映对王室的理想化观念的那些共同特征。要在其他社会找到各种人物的模式，尤其是领袖的模式也不见得更难。到处都有“文化英雄”式的人物，他使社会从混乱变为有条不紊。对混乱的模式化概念就是对事物完全颠倒过来的世界的描述。我们可以找一个以上的开国英雄的模式。在伊加拉人(尼日利亚)中，这种开国元勋是猎人或国王的子孙。前者代表事业的成功，后者代表继承关系或因果关系。出现这两种人物的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博斯顿指出，第一个模式隐藏着新的集团抓权的事，并指出这两个模式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形势。

154

但是，一种令人十分满意的理论应当揭示同构成所有社会行动和每个世界性制度的基础的社会职位和职责有关的整个准则体系和思想体系。但直到最近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麦加菲发现，刚果人(扎伊尔，刚果人民共和国)拥有一个由社会中四个相互补充的理想的职位组成的简单模式化体系，这四个职位是，巫医、占卜者、首领和预言家。发现肯定的或否定的总价值是容易的：对慷慨大度的赞许，对作为巫术征兆的嫉妒的抨击，命运的作用——这些准则在贝宁湾的传说中以及在内湖地区传说中都随时可以找到。但是，这些准则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了，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包括全部集体理想和想象的很有条理的体系。因为准则和理想只讲了理想的——有时或是现实得更令人发笑的——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应指导每个人的实际行为和需要履行的职责。职责同社会地位相关联，而社会地位同构成这个社会的诸机构相关联。因此从理论上讲，必须对社会进行解剖才能揭示它的行动规范、它的理想和它的准则。史学家这样做通常是无意识的、不深入的。他们避开了明显的陷阱，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整个体系提出的假设。他们没能从环境中分出所要的资料。我们深知这一点，因为我们花了18年时间试图从受到歪曲的、起源于库巴人(扎伊尔)的传说中发现这种联系。

对传说影响最大的集体概念，首先有若干前感类的概念，即时间、空间、历史真实性和因果关系。其他概念象把光谱分解成各种颜色的光，并不十分重要。每个民族都根据人类活动或循环的社会活动(结构时间)来划分时间单位。两种形式的时间都受到普遍采用。把白天和黑夜分开，白天又根据工作和进餐情况分成若干部分，而且这些活动同太阳的高度有关，夜晚的时间是根据某些动物的叫声划分的。月份、季节和年度通常根据环境及有关活动来确定。除此之外，我们必须用结构时间的单位来计时。即便如此，星期是根据一种社会节律确定的(例如市场的周期)，在许多情况下，也同宗教周期有联系。

比年更长的时间是根据某种崇拜、同龄组、王朝统治或世代计算的。家史是根据构成生物历的出生情况来计算。大饥荒的发生、动物疾病的严重爆发、传染病的流行、彗星的出现和蝗灾的形成这样一些特殊事件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这种灾历肯定是不规则和不准

155

确的。乍一看，这种计算法对于年表似乎无用。然而，如果世系、王朝和同龄组的周期为人们所知，那么利用这些周期性事件就应能使相对年表变成绝对年表。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谈。

社会记忆能容纳的最长时间长度直接取决于同传说有关的机构。每个机构有其时间长度。家史总是不长的，因为大家族只包括三代人，对于记忆更早的事一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人数最多的机构所能追溯的历史可能也最久。对于部族、血统最古老的家系、马赛型同龄组和王室来说，情况正是如此。阿拉伯和苏丹的一些作者确认在苏丹大草原，关于泰克鲁尔、加纳和马里王国或帝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十一世纪。但是，有时所有机构都受到某种时间长度概念的限制，如特克人(刚果人民共和国)总把各种事情归于父辈或祖父辈。包括王室历史在内的一切事情都被大大缩短，短到发生于父辈时期，至迟是祖父辈时期。

这个例子说明，时间形式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内湖地区，有的地方把时间看作是循环的。但是，由于循环是一圈连接一圈的，这种概念变成了一种螺旋的概念。同样的社会在考虑时代时，尤其是混乱时代和历史时代，却用了不同的联系办法。在别的地方，如特克人，也不把时间看作是直线运动的。随着世代的更替，对时间的概念也产生变化。对于陈述传说的方法来讲，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大明显的是，在这方面，空间概念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倾向于把民族的发源地说成是某个闻名的地方或沿着某个重要的轴心，其方向是神圣还是凡俗，则要看那个民族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从神圣到凡俗还是从凡俗到神圣。每个民族都有其地理方位体系。河流常常被当作表示基本方向的轴线。许多社会沿着轴向安排村庄和陵墓，有时还有田地(库库亚人，刚果人民共和国)。这样作的结果有时是想象不到的。以部分地势起伏来决定某个地区方向的地方，它的方向是按照各种起伏特点作相应改变的，在这里"顺流"是向西，在那里则是向北；在这里去顶峰是向东，在那里则是向西。我们不仅发现某些民族，如库巴人(扎伊尔)和卡古鲁人(坦桑尼亚)，硬说自己是从独特的方向迁徙来的，这就使这种故事变成宇宙论而不是历史，我们甚至发现，由于地势起伏不平，发源点会产生差异。只有根据太阳的运行决定空间轴走向的社会才能讲出关于总的迁徙的准确情况。不幸的是，这样的民族占少数，或许只有西非的大多数民族才把东方视为民族的发源地。 156

在每个清楚的口头历史传说中，起因的概念都是含蓄的。起因常常被说成是每一现象的个别的、直接的起因。这样，每件事都有其起源，这种起源在时间上都是最早的。要是研究了所谓的罪恶的起因，就能深刻地理解这种因果的特点。这种因果常常同巫术、祖先等直接有联系。从这种因果观念可以推断，变化主要是发生于一些非常明确的方面，如战争、王位继承等等，而这些方面都受模式的影响。最后应该指出，这种对于起因概念的概述是非常简略的，必须辅之以其他起因概念，虽然这种概念相近似但比较复杂，并且只影响少数社会机构。

至于历史事实，它总是与传播的口头传说的可靠性密切相关。因此，它所指的要末是统治者的意见一致(伊多马人，尼日利亚)，要末是承认传说与前辈人的说法一致。

这种种认识同准则的象征性表现结合起来产生人类学家称之为"神话"的记载。最容易

受到改编为神话的传说是关于民族起源、因而也就是关于民族的本质及其生存原因的传说。由于揭示了迁移的秘密，最终大量关于库巴人起源和乘独木舟迁移的复杂的故事也就得到了解释，因为他们的迁移是逆流而行的，也就是从神圣到凡俗。同样，对于许多移民名称和来源地区一直是用宇宙起源学说来解释的。在库巴人的故事中，这种观念并不明显，而在其他许多种族集团的故事中，这种关系是相当清楚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不幸追随贝德尔曼的人种学家、结构主义者或功能主义社会学家，都一口否认口头传说的价值，因为他们说，这些传说表现的完全是世界的认识结构，它先验地构成所有的思想基础，犹如绝对的东西。要知道，对你正在阅读的书籍或者对贝德尔曼本人的著作也都适用判断！显然这些人类学家都是夸大其词。此外，他们的许多解释看来完全是假设的。史学家应该记住，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对某一传说表示反对或提出疑问时，都必须提出理由，因此他必须找157 出其理由。只有在的确能证实一个传说的编撰真是为了宣传纯粹的象征意义时，才能否定这个传说。因为总的来说，传说既反映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也反映了历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来源于某一准则和利益体系的每一模式化传说不仅是神话，而且是有待破译的历史密码，所以历史课本就成了神话学教科书了。

年 表

没有年表就没有历史，因为没有年表，人民无法分清事件孰先孰后。口头传说一向用列举的方法或依世代相排的方法提供一种相对年表。一般来讲，这种年表可以使人把正在研究的社会的全部传说纳入广大地理区域的家谱、帝王年表或同龄组的范畴之内。但是，这种年表却不能使事件的相对顺序同这一特定地区以外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些重要的历史动向和地方性演变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使人产生怀疑都是因为这种年表计算时间所使用的单位太受地理上的限制了。家谱只对一家及其居住过的村庄有用。例如，恩布人（肯尼亚）的年表是以同龄组为基础的，而同龄组只涉及年青人同时长大成人的一个非常小的地区。所以，必须把相对年表联系在一起，可能时，应该改成绝对年表。但是，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保证所使用的材料符合事实，不要把时间弄错。

口头年表受到两个相反方面的歪曲，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因为历史事件延续的时间有时被缩短，有时被延长。还有一个倾向是调整年谱、继承次序和同龄组的先后，使其符合社会当前的理想标准。否则，情况就会提供先例，造成各种法律纠纷。这种自然平衡过程是千真万确的。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卢旺达，一大批专门人员承担起整理传说的任务，他们的报告得到了考古学出土文物的证实。

人种学家曾指出，所谓的无完整体系的社会往往抹掉"无用的"祖先，这是指这样一些先辈，他们没有留下作为单独群体依然生存的后代。这说明为什么特定社会的每个群体的家谱的代数往往是固定的。只有"有用的"祖先才被用来解释今天的情况。这有时造成家谱中代数的大大缩短。再者，人口事件有时会使某支后裔，与其祖先的兄弟姐妹留下的其158 他几支后裔相比，要少得多，以致他们无法同相邻的大群体并存，从而被某一大群体所吞

并。于是家谱就重新调整，人口逐渐减少的群体的祖先就让位给较大群体的祖先，这样家谱就简化了。一个种族群体的特性常常表现为处于家谱首位的一个祖先。这就是“鼻祖”、创业英雄，是第一代“有用的”祖先的父亲或母亲。这样，起源与有意识写的历史之间的差距就没有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常常造成下面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有把握地追溯到比几代人更远的时间。

人们往往认为，许多非洲社会，特别是君主政体社会，没有经过这种过程。没有理由认为，国王世系表是错误的，也没有理由怀疑其家谱。除非有时发生造假的情况，即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时候，新王朝会利用旧王朝的家谱以便使自己合法化。但是，国王的人权和世代的数量依然是正确无误的。然而，最近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缩短、延长和调整的做法同样会影响有关王朝的传说。如篡位者——也就是说当今或在其统治结束之后曾被认为是篡位者——的名字会从帝王名单上删去。没有参加全部传授礼仪的国王的姓名也可能被删去，这些礼仪有时是很长的。国王复位，其前后统治时期有时会算成一个。所有这些情况都打乱了历史的进程。

在实行父系长子继承权的地方，如内湖地区，使事实合法化的倾向已使正规继承(即子承父业)次数多得惊人，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平均数字，甚至超过创纪录的数字。由于这种做法，出现了从远古到十九世纪的典型直系家谱，到十九世纪才分出旁支。结果是增加世代的数量，延长了王朝的统治期，因为旁系也被视为父子。同名人之间、帝号(或封号)与人名之间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所造成的混乱，都会延长或缩短王朝的统治期。在殖民时期，尤其在间接统治下的地区，延长王朝统治期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是由于欧洲社会同许多非洲社会一样有崇古的风尚，为延长王朝统治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手段和各种可行方法。所有可用的名字都用了，必要时重复使用，配上循环使用的帝号，还加上旁支来延长主干。

最后，常常在涉及王国的地方，属于宇宙进化论范围的创业英雄同第一位在历史上“有用的”国王之间存在差距。只有经过非常仔细调查才能发现是否确实发生了上述过程。在继承关系和家谱中出现异常情况常常是真实性的最好保证，因为它们表明继承关系和家谱没有受到自然平衡的影响。 159

还没有对同龄组社会进行这种有系统的考察，一些例子表明，调整的方法起了作用，使周期变得更规则或者减少同名人造成的混乱。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同龄组的继承情况仍有待研究。我们还不能下结论，只能说已出现的问题类似家谱的问题，因为还是以代为单位。

进行一次彻底的统计研究，就是得到上述的多数资料，研究的结果表明，王朝的平均时期为 26 年到 32 年。统计数字的取样主要来自父系王朝，但是，母系王朝并不是集中在(例如)统计分类的较低层，这些资料对他们同样有效。君主统治的平均时期随继承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如此之大，竟无法提供普遍有用的材料。即便是在同类的继承体制中，王朝的不同也会造成相当大的差别。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把关于世代的相对年表转化成绝对年表，除非对家谱的歪曲很大，使这项工作徒劳无益。首先是计算第一个写明日期的绝对年表资料同目前的资料的平均数，如果此数在 26 至 32 之间，然后用这个平均值去对照历史情况。但是，平均值毕竟

只是平均值。随着所涉及的世代的增加，或然率也就提高了。这种计算方法只能为序列的开始提供比较合理的年代，最多为100年一次。要想更高的精确度反而会出错。无论如何，为了说明实际情况，在所有以这种方法计算的年代前都应加上±符号。因此，库巴王国创建的年份±1635年表明，计算年代的依据是家谱和帝王世系表。

这个办法同样可以用来确定君主统治的平均期。情况一直显示，这种平均数不如有关世代的平均数那么可靠，原因之一是，把这种平均数运用于历史情况时，据说继承制度没有变化。然而，在许多年间这个制度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在一个王朝创建时，这种制度可能发生过变化，因为创建就是要创新，而继承无疑要经过一定时间变成规律。此外，还必须考虑平均寿命会有所变化。由于出现误差的幅度增大，获取绝对年代就特别有用了，这种年代是通过文件或其他能追溯到尽可能远的过去的任何手段来确定的。

然而，进一步对相对年表进行分析，就有可能设法通过对同期发生的事件的研究把若干不同但又相近的年表协调起来。两位有名有姓的国王打了一场仗，就是同期发生的事。它有可能使双方有关的年表协调起来，并且合二为一。根据经验，在3个以上的单独单位之间同期发生的事件就没有用了。情况可能是这样，由于甲与丙都曾遇见乙，那么甲与乙或甲与丙都生活在同一时期。因此，甲＝乙＝丙，但是推论只能到此而止。因为事实上甲与乙的相会同丙与乙的相会可能发生在乙一生中的任何时期。这说明甲＝丙是有限的。对古代中东的年表的研究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只要谨慎利用那些同期发生的事，就可以设想出具有共同相对年表的相当大的单个地区的过去情况。

考察了有关世代的资料，还可以通过传说中提到的日食情况来确定绝对日期。如果可能的日食日期不止一个，就要确定哪一个可能性最大。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其他的天文现象或引起灾害的特殊气候现象。但是，比起日食来，这些现象的可靠性要差，因为(例如)在东非闹饥荒的情况比日食多。除了日食外，其他类似材料主要对近两世纪才有用。即便如此，能记住早得多的时期发生的日食现象的民族是极罕见的。

对口头传说的评价

对材料进行全面的文学和社会学的评价之后，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们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这种评价虽然不能用数字表示，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某传说提供的情况能够从其他独立的传说或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这则传说的精确度就大大提高了。两个独立的材料如能相互印证就可以使某种有可能的事成为肯定的事。但必须证实材料的独立性。然而，不幸的是，倾向性太严重了，无法相信从一个民族集团传到另一个民族集团的传说的纯真和可靠性。其实，象安哥拉的因班加拉人或无疑久拉人和豪萨人那样的商队会把一些历史片断带到所去的地方，由于这些片断同那里的情况很一致，它们被掺进当地的历史之中。后来，在殖民统治初期，各个集团的代表间形成了联系，他们相互交流有关各自传说的情况。在非直接殖民统治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出于实际的考虑，特别是那些王国想编写历史。不仅如此，所有这些历史都受到非洲人早期编纂的历史著作的影响，如约翰逊关于奥约王国(尼日利亚)的著作或卡格瓦(乌干达)关于布干达人的著作。结果，在约鲁巴地区

和讲英语的内湖地区出现把所有的历史统统拼凑成文字形式的现象，试图在时间上一致起来以使王朝的历史能至少象典型的王朝那样久。这两个例子说明必须经过仔细分析才能肯定传说确是独立的。必须先查考档案，研究殖民统治前的接触情况并仔细估量一切情况才能作出判断。

同文字材料或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独立证据。在这方面，必须证实独立性。例如：当地居民按照传统把一个明显的遗址说成是这个地区前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人类居住过的明显残迹，与当今在那里居住过的人遗留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这块遗址想当然地是最早居民留下的。这种材料不是独立的，因为这个遗址是通过推理和演绎说明属于那些居民。那些偶像纪念物就是这样出现的。这种做法还造成了许多有趣的猜想，尤其是关于多贡地区的所谓的泰莱姆遗址（马里）和锡里夸遗址（肯尼亚）的猜想，这只是两个著名的例子。尽管如此，著名的昆比萨利赫遗址（毛里塔尼亚）和基萨莱湖遗址（扎伊尔）依然表明，考古学有时会为口头传说的可靠性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常常很难使口头材料同文字资料协调起来，因为二者所谈的内容不同。外国人描写某一国家的著作通常只局限于经济和政治事实，而且往往对这些事实还不完全理解。口头材料着重于内部情况，偶尔才提到外国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两种资料虽然所谈的是同一时期，但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当外国人在这个国家居住下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当地政治感兴趣并且理解之后，才能使材料协调一致，首先是年表方面的一致。十七世纪以来的塞内加尔河谷就是这样。

当口头材料出现矛盾时，应该选择可能性最大的材料。普通存在的试图折中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口头材料同考古资料发生显著矛盾，应该采用后者，只要后者是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这种资料是实物而不是推论。若是推论，则口头材料的可靠性更大。文字资料同口头材料发生冲突时，解决办法是把这种冲突完全视为口头材料之间的矛盾。要记住，大量文字材料往往更可信，可是有关动机的口头材料则比文字材料更准确。最后，史学家尽力确定那些是最可靠的材料。最糟的情况是，只能找到一件口头资料，而且证实它很可能已受到歪曲。这时在解释和使用这份资料时必须充分考虑歪曲的程度。

最后，史学家常常不满足于他所得到的口头材料。他会说：他并不相信它是确实可靠的，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材料，他只得使用它，除非发现其他资料。 162

收集和出版

根据上面论述的，可以看出，对传说进行历史的批判所需的全部资料必须就地收集。这就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社会和语言知识。史学家可以自己掌握这些知识，或者借助于专门人员。即使如此，他们还必须吸取由人种学家、语言学家和帮助他们的翻译人员所提供的全面情况。最后，材料的收集要力求完备，材料的所有变体都必须收集起来。所有这些意味着，要长期住在当地，如果史学家对他研究的文化不够熟悉，那么留住的时间就要更长。必须指出，研究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史学家所取得的直觉知识是不够的。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是必不可少的。史学家必须重新挖掘自己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经验表明，有时甚

至一个国家的本地人也不能轻易地理解象颂诗那样的某些口头记录，或者很难搞懂与他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不同的方言。此外，最好由语言学家核对一下他用本国语文记录下来的文本(至少核对其中一部分)，以确保这份文本把理解其内容所需的全部信息都包括进去，其中包括语调。

因此，收集传说需要很多时间、很大耐心和深入研究。经过一段初步尝试之后，必须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要考虑各种情况的特点。无论如何要前往他所研究的历史进程的有关场所。有时还有必要利用民间材料中的典型加以分析，但是对这种典型的利用不应是无目的的。并应以这些规律为依据制定典型分析的原则。不加区别的广泛收集材料，即使工作进展迅速，也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研究人员必须注意考察传说的传播方式。他们会越来越多地碰到这样一些提供材料的人，其知识来源是有关这个地区的历史著作、教科书、报纸或科学出版物，以及广播和电视讲座。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这种危险会不可避免地增加。

163 目前还发现一种比较狡猾的拼凑方法。传说利用了一些手稿——有时是非常古老的——尤其是殖民政府早期的报告，把这些当作前人的实际情况，因此，必须对档案材料进行核对，还要弄清科学著作、教科书和广播等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在现场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往往可以先找些其他说法或向提供材料的人说明广播和书本在这件事上不一定都对，来消除这些有害因素。一旦离开实地，再想搞清楚就太晚了。

制定研究计划时必须有清晰的历史观念。把传说都收集全是决不可能的，想求全的任何做法都只能得到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首先必须决定要研究的历史问题，然后寻找说明材料。研究人员为了提出问题，显然必须吸收有关的文化。然后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决定对其政治史进行研究。但是，他还可以选择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或艺术史等等。各种情况采取的收集传说的办法是不同的。当今研究工作中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历史意识，存在着被所发现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严重倾向。

缺乏耐心是另一种危险。人们总希望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广地进行研究。这就很难评价所收集的材料，材料是杂乱的，不完全的，缺少变体。关于材料的变化、形成和传播，了解甚少。这样研究工作就做不好。特别有害的影响是，在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中间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个"地区"已经研究过了，从而减少了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不应忘记，口头传说是会消失的，虽然可庆幸的是消失的速度不象一般想象的那么快。任务紧迫并不是草率从事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说，而且也确已有人说过，我们在这里提倡的是不切实际的，是主张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是利用现有时间和现有方法做好工作的唯一途径。没有捷径可行。如果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这些工作对研究历史只起了很小作用，我们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与此同时，我们增加了所研究的文化的语言、文学、集体思想和社会结构的普通知识。

除非发表了成果，否则工作就没有完成，因为学术界还看不到它。至少应该对全部调查材料进行一次分类，并作些说明、注释和索引，以便使它成为大家都能利用的档案。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常常同时发表根据全部和部分材料写成的研究论文。任何出版商都不会出版全部材料，包括变体和情况的解释。此外，为了进行归纳而埋头于大堆未经整理的史料

是不值得的。但是，每种著作都要说明传说的收集过程，并编制简明史料目录和提供者名单。这样便使读者能够判明史料的质量，并理解作者关于史料所含的原则。出于同样的考虑，著作应该分别引用各种口头传说。如果著作用"传说是这样……"，那么这部著作就一般化了，这是危险的。 164

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出版物，即史料编辑。其采用的标准如同出版手稿一样。实际上这项工作常常成了各科专家之间的合作。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史学家、又是语言学家、又是词源学家。事实上，目前见到的最成功的版本几乎都是两人合作的，至少其中一人必是语言学家。出版史料汇编是件艰苦的、不讨好的工作，这就是这种出版物如此稀少的原因。但是，在非洲口头文学专家的协助下，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增多。

结 论

目前非洲各国都在收集口头传说。收集的大量材料主要是关于十九世纪的。这只是历史再现的史料来源之一，这个时期的其他主要史料是文件。每年有五、六部著作出版，其研究几乎完全以传说为依据。从类型上看，它们主要是研究政治史和王国史。从地理分布上看，它们多半集中于东非、中非和赤道非洲，在这些地方，传说往往是唯一的史料。年表很少追述到1,700年以前的情况，而且怀疑那以前的情况。某些学者认为大部分材料甚至不会早于1,800年。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增加对传说特性的了解，将会对早期收集的材料作出更准确的估价。因此，卡瓦齐在十七世纪记录下来的传说，一直到1970年人们进行实地研究之后才被利用。

除了近代传说外，还有大量英雄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和有关宇宙进化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的材料有时是远古时代的。松迪亚塔史诗就是一例。传说本身并不能证实年代。譬如，关于内湖地区历史遗址的时间，保存了一份被曲解的回忆录，追溯到我们纪元一世纪，甚至更早，但是口头材料却没有提到这个年代。只有考古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在刚刚提到的卡瓦齐所记录的传说中包括一些历史片断，对于研究安哥拉各民族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一些简洁材料涉及到不断继承的王朝和不断接替政府的形式，简单地说，它们总结了上宽果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情况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以前，甚至远至五、六世纪。但是材料中却没有任何关键性的年代。

最后还要注意一个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收集传说往往还是从表面出发，所做的解释过于刻板而且过分依赖有关的文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要维护非洲的这样一种形象，其历史除了来源和迁徙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必须承认，那就是企图确立一种特征的传说所反映的形象。大多数反对使用口头传说的批评意见，尤其是人种学家的意见认为，解释肤浅，收集的材料不够系统。 165

实践经验证明，传说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文化范围内的历史变化。我们发现这一点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千真万确的，以致即使殖民时期的文字材料非常多，也要不断求助于目击者的叙述或求助于传说，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并使民族的演变能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还发现，在有关年表和数据资料方面，传说常常使人误解。此外，任何因

进展缓慢而不为人所注意的变化都被社会所遗忘，例如有关宗教思想的改变就是如此。只有在非专门涉及历史的口头传说中才能找到有关这些变化的只言片语，即使这样，进行复杂说明也是必要的。这说明口头传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但是实践证明，它是有关近几个世纪历史的头等材料。对于更早时期的历史，它的作用就较小了，因而成了考古学的辅助科学。关于语言学和人种学材料方面，口头传说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虽然原则上这三种材料加在一起理应象考古学那样对于我们了解古代非洲作出了重大贡献。

传说已经证明，它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现在不再有必要去说服人们相信传说是了解情况的有用资料了。每个史学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目前所要做的是完善我们的技术，以便使这个材料源泉能够奉献出蕴藏着的全部财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熊志勇译）

逼真的传说

166



A.哈姆帕特·巴

撰述是一件事，知识是另一件事。撰述是知识的真实记载，但并非知识自身。知识是人类的一盏明灯，是我们祖先在认识方面的全部遗产，正如波巴布树潜伏在种子里一样，在萌芽之时，我们祖辈就把它传给了我们。

——蒂埃诺·博卡尔①

在谈到非洲的传统或历史时，我们指的是口头传说。如果不依靠口头和师徒耐心地代代传下来的各种知识遗产，那么洞察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和心灵，是办不到的。这份遗产还未丧失，而是保存在伟大传说传播者最末一代的记忆中。关于这些人，可以说："他们是非洲的活的记忆"。

在一些现代国家里，书写的东西重于口讲的东西，书本是传播文化遗产的主要工具，在那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无文字的民族是无文化的民族。幸运的是，自上两次大战以来，由于各国一些伟大人种学家的努力，这种完全不正确的看法已开始消失。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采取的别开生面的勇敢行动，正进一步揭开口头传说传下来的知识宝库的帷幕，这座宝库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对某些学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在证明过去发生的事情时，能否象相信书面材料那样相信口头传说。据我看，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妥。书面或口头证据归根结蒂只是人类的证据，与人类具有同等价值。

若干世纪的记录和个人的记载，难道不是产生于讲述？世界上最早的档案馆或图书馆都是人的头脑。作家或学者，在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之前，先有一番自我问答。在写下一篇故事之先，先要回忆一下耳闻的或经历过的事。

167

认为事实的书面记载比代代相传的口头证据更真实，这种臆断毫无根据。近代战争的一些记录表明，就象人们（在非洲）所说的，各方或各国都"从自己的门口看太阳以断定时间是不是正午"——即透过自身情感或心理或利益，或切望的棱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此外，书面文件本身并不总能避免精心伪造或辗转传抄造成的无意改动——这些现象特别引起了关于《圣经》的争论。

① 蒂埃诺·博卡尔·萨利夫（Tierno Bokar Salif）（死于1940年）在马里的邦贾加拉度过一生。他是伊斯兰教提加尼教团的领袖，在非洲事务中，也是一位墨守传统的人。参阅A. 哈姆帕特·巴（A. Hampate Ba）和M. 卡尔代尔（M. Cardaire），1957年。

因此，证据本身隐匿的东西是提供证据的人的实际价值，是人作为其一环的传递链条的价值，个人或集体记忆的可靠性，以及特定社会里事实真象的价格。总之，它隐匿着人同言语之间的联系。

在那些只有口语的社会里，记忆的功能得到最高度发挥，此外，人和言语之间的联系也最紧密。在不存在书写的地方，人们必须信守诺言，并受其约束。他就是他的诺言，他的诺言就是他自身的证明。社会的协调依靠诺言的价值和对诺言的尊重。然而由于书面文字的侵入，文字逐渐取代诺言而成为唯一的证据和凭证，签名盖章成了唯一认可的约束。与此同时，把人和言语结为一体的深远而神圣的联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常规的大学学位。

根据非洲的传统——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撒哈拉以南整个草原地带的传统——言语除了它的基本道德价值以外，具有同它的神圣起源及其所拥有的玄妙力量相联系的神圣特征。它作为魔法的最高动因，各种精灵力量的主要动力，不可等闲视之。

在当时，许多宗教的、魔术的或社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保存了口头传说的可靠性。关于这些因素，我认为应当向读者作个简要说明，以便更好地以非洲口头传说为背景，并从内部以某种方式予以阐述。

如果问一个真正的非洲传统主义者，"什么是口头传说?"他很可能不知所措，他也许经过长时间沉默以后回答说，"口头传说就是知识的总和。"仅此而已。

那么，口头传说一词包含什么？它表现了什么现实，传播了什么知识，教授了什么科学？口头传说的传播者是些什么人？

同一些人的想法相反，非洲口头传说并不限于故事和传奇的讲述，更不是仅讲神话或历史故事。法国人称为民间歌手——游动歌手和诗人——远非口头传说的唯一合法保护人和传播者。

168

口头传说是生活的一所大学校，它包括并影响生活的各方面。对那些不知内幕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片混乱。它说不定会使笛卡尔哲学信徒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各种事物分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在口头传说里，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并不是分离的。

口头传说，由于经历了从秘授到公开的过程，能适应人的接受能力，按人的理解能力向他们讲述，根据他们的天赋揭示其真谛。它同时是宗教信仰、知识、自然科学、手艺、历史、游艺和娱乐，因为任何一个细目都能使我们一直回到原始的统一。

口头传说以传授和经验为基础，约束着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有助于造就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有助于塑造非洲人的灵魂。

非洲文化，由于同个人和集体的日常活动相联系，因此不可能是孤立于生活的某种抽象事物。它包含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看法，更确切地说，它包含世界上的一种特殊风貌——这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其中万物相互连结并相互制约。

口头传说是以人的某种概念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种概念为基础的。在研究它的各方面之前，最好先确定它在总联系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创造人和诞生语言的奥秘。这个奥秘由语言传授，而语言则诞生于此奥秘中。

语言的神圣来源

我不能很有根据地谈论我未亲身体验或研究过的任何传说——特别是森林地区传说——因此，我将从撒哈拉以南草原地带的传说中选取基本例证(此地区以前被称为巴富尔人地区，构成前法属西非的草原地带)。

班巴拉人的可磨盟会[②]传说教导说，库马，即语言，是从最高主宰——造物主马阿·恩加拉——自身分出的基本力量。它是创造的工具。可磨神的合唱指挥人——吟唱祭师——宣称，"马阿·恩加拉讲的话都是对的！"

这篇开天辟地的神话，由可磨盟会会主(他常常是一位铁匠)向行过割礼的青年传授，这神话透露，当马阿·恩加拉渴望有位对话者时，便创造出第一个人：马阿。

那些年满21岁又行过割礼的青年需隐避63天，这时总是向他们灌输这段创世传说，然后花二十一年的时间深入钻研它。 169

在可磨盟会住地，神圣森林的边缘，第一批行过割礼的青年随着有节奏的和谐敲打声，唱道：

马阿·恩加拉！马阿·恩加拉！
谁是马阿·恩加拉？
马阿·恩加拉在哪儿？

可磨盟会领唱人总是回答道：

马阿·恩加拉是无边的威力。
无人知晓他的年月，
无人熟悉他的地域。
他是多姆巴利(不可知的)，
他是当巴利(真正的神)。

这段引子之后，开始原始创业的讲述：

当时，除了一位神之外别无他物。
这位神既活生生，又虚无缥缈，
正耐心地沉思着一些可能产生的生命。
这位唯一的神居于无限时光之中。
他自命为马阿·恩加拉。
马阿·恩加拉希望为世所知。
因此他创造了扇，
一只奇妙的九黄蛋，
还给它注入了九种基本生命形式。

"这个原始的蛋终于孵化，产生了20条奇妙的生命，构成整个宇宙，构成各种存在的

② 曼德人(马里)的最大秘密盟会之一。

力量和潜在知识的总汇。

“但是，哎呀！他们没有一个适合作马阿·恩加拉渴望的对话者(库马-尼昂)。

“所以，他从20条生命中各取少许，加以混合，然后给混合物吹入一种似火的神气，便创造出一个新生命，即人，并采用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给他取名马阿。由于姓名和吹入体内的神气，这个新生命便含有马阿·恩加拉的一些成分。”

人马阿是全部存在物的综合，最高主宰的卓越创造，现存力量的总汇。作为马阿·恩加拉的遗产，他领受了神的部分创造力，以及心灵和语言这两项赠礼。

马阿·恩加拉授予其对话者马阿关于创造宇宙万物并继续生存的法则。他任命马阿为其宇宙的保卫者，并责成他监督万物保持和谐。这就是马阿所以很重要的原因。

170 马阿经其创造者传授秘诀，后来又把自己所知全部传与他的后裔。这就是口头秘传这支伟大链条的起点，可磨盟会则自称是它的承续者(马里的拿玛盟会、可勒盟会等也如此)。

马阿·恩加拉一旦创造了自己的对话者马阿，便对他讲话，同时赋予他回答的机能。万物创造主马阿·恩加拉开始同万物的共生马阿对话。

语言从马阿·恩加拉移向人时，具有神性，因为它尚未接触有形物。语言同有形体接触后，便失去某些神性，而具有神圣性。另一方面，人体则因神性语言的这种接触而产生神圣的振动，同马阿·恩加拉建立起联系。

因此非洲的传说认为，言谈是神的赠礼，它具有两重性：下到人时具有神性，上达时则具有神圣性。

人的言谈具有创造能力

相传马阿·恩加拉将他创造的20条生命中含有的技能、希望和知识三种潜力贮存于马阿体内。但马阿所继承的这些力量在体内毫无声息，它们处于静态，直至言谈使之运动。后来，它们因为神性语言赋予的生气而开始振动。它们在第一阶段变成思想，在第二阶段变成声音，在第三阶段变成语言。因此，言谈——说出的话——被看作是各种力量振动的形体化或具体化。

但我们要指出，“说”和“听”这类涉及现实的词语，其含义在这里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据说：“马阿·恩加拉的言谈，看得见、听得到、闻得着、尝得出、摸得到。”它是总的知觉，是人类积累的知识。

同样，由于言谈是各种力量振动的具体化，因此，无论取何种形式的力量，其每种振动的表示都被视为它的言谈。每一事物都是具有体形的言谈，这就是宇宙万物皆能讲话的原因。

在富尔富尔德语中，“言谈”(哈阿拉)一词来源于动词根hal，意为“给予力量”，引伸为“制造材料”。富拉尼传说讲道，最高主宰盖努通过谈话赋予第一个人基卡拉以力量。锡拉蒂奎(富拉尼人传授师)说，“由于同盖努谈话，使基卡拉强壮”。

假如言谈就是力量，那是因为它创造了往和返(富尔富尔德语为亚阿-瓦塔)的结合，

这种结合又产生运动与旋律，因而产生生命与行动。织工的脚一上一下就是这种往返的象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传统手艺部分将会看到。（事实上，织机的象征的全部基础就是体现于行动中的有创造力的语言。） 171

人类的言谈是马阿·恩加拉言谈的反响，因此它同马阿·恩加拉的言谈一样，能使潜在的力量运动。言谈使这种力量活动并激发它——正象人听到喊叫自己姓名而起立或转身一样。

言谈可以创造和平，也可毁灭和平。它好似一堆火。正象燃烧的小树枝可以触发一场大火灾一样，一句粗率的话可以引起一场战争。马里箴言说："什么东西成事（把事情安排和处理好）？言谈。什么东西败事？言谈。什么东西能让事物和谐？言谈。"

这篇传说不仅赋予库马即语言以创造力，而且赋予它拯救和毁灭的双重机能。言谈，首先是言谈，成为非洲魔法中的伟大积极动因，其原因就在这里。

言谈是魔法的积极动因

必须铭记，一般说来，非洲的全部传说都假定"世界是宗教的幻影"。可见的世界是作为不可见的世界的符号，凝固化和外壳而被认识和感知的，不可见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由永恒运动的各种力量组成。在这个广阔无垠的统一体内，万物相连，并被坚实地束缚在一起。人的行动被看作是他自身，同时也被视为他周围的世界（矿物世界、植物世界、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它要遵循一条很合礼仪的规则——这条规则可能因种族和地域的差别而有不同的形式。

违反这些神圣法则，必定打乱各种力量的均衡，其表现常是种种不同的动乱。因此，魔法行动即对各种力量的操纵，目的通常在于恢复失去的平衡并重建和谐，我们已知道，根据创造者的安排，人是这种和谐的保卫者。

在欧洲，"魔法"一词总被认为具有贬意，但在非洲，它仅具有对各种力量进行管理的意思，这些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它有益还是有害，由给予它的方向而定。据说，"魔法和命运自身都不坏，其好坏全在于对它们的运用。"

好的魔法，秘传者和"知识大师"的魔法，目的是涤除人类、动物和各种物体的罪孽，以恢复力量平衡。言谈的力量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就在这里。

因为正象马阿·恩加拉的神圣言谈赋予马阿体内那些静止而无限的力量以生命一样，人的言谈也能赋予万物内部各种静止的力量以生命，使之运动和觉醒。但为使言谈产生充分效验，必须有节奏地吟唱，因为运动需要旋律，旋律自身的基础是节拍，言语必须再现作为旋律本质的往返。

因此，在仪式性吟唱和咒文念诵中，言语就是旋律的形体化。如果说言语的力量能引起各种精灵的反响，那是因为它的和谐在创造运动，运动产生力量，这些力量又影响本身就是各种行动力量的精灵。 172

在非洲传说中，言谈的创造力和效验力来自其神圣性，同人及其周围世界和谐的保持和中断直接相关。

大多数口头传说社会认为，说谎实际上是道德堕落，原因就在这里。在传统的非洲，一个人失言就是丧失自己的公民身分，断送宗教和超自然的人格。他就割断了同本身、同社会的联系。对他自己及其家庭来说，死去比活着更好。

马里库利科罗地方的迪比可磨盟会的歌手，在一首仪式诗中唱道：

言语象神一样精确，

人必须象他一样精确非凡。

伪造言词的言语，

将体内血液毒染。

在这里，血液象征体内活力，它的融洽被说谎搅乱。格言说："糟蹋自己的言语就是糟蹋自己"。一个人言不由衷时，就割断了同自己的联系。他破坏了言行的神圣统一，即万物统一的反映，在他内部及其周围制造了不和。

现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在有口头传说的各种社会中尊重言谈的(特别是当传播先辈或长者遗留下来的话语时)魔法－宗教背景和社会背景。在传统非洲，最珍贵的是祖宗遗产。人们常用这样的话说明全部遗物及其宗教礼仪附属物的来历："这是师傅传给我的！""这是父亲传给我的！""我在吃妈妈的奶时就吮到了它！"

传统主义者

这种口头遗产的伟大保存者是一些被称作传统主义者的人。他们，非洲的活记忆，是非洲的最好证据。这些大师是些什么人呢？

在班巴拉语中，他们被称作多马或索马，即"博学之士"，或被称作多尼凯巴，即"知识制作者"。在富拉尼语中，他们依地区的不同而被称作锡拉蒂奎，甘多或特基奥里克内，意思均为"博学之士"。

他们可能是一个特殊传统行业(铁匠、织工、猎人、渔人等各盟会)的传授师(和盟会 173 主)，也可能是有广博的传统知识的人。因此，有精通铁匠科学的多马，精通放牧科学的多马，精通纺织科学的多马，以及属草原地带那些大秘密盟会里的多马——例如在马里，这种秘密盟会有可磨盟会，可勒盟会，拿玛盟会，多盟会，迪阿拉瓦拉盟会，恩亚盟会，恩亚瓦罗莱盟会等。

但是不要误会。非洲的传统并不割裂生活，"博学之士"很少是专家。他们一般是通才。例如同一位老人，他不仅熟知植物学(各种植物的优缺点)，而且懂得土壤学(各种不同土壤的农业特性和药物特性)，以及水利学、天文学、创世说、心理学等。所包含的就是**生活的科学**，在这里，知识总能得到实际运用。我们谈到创世说或神秘学时，这些术语可能使西方读者困惑，然而传统非洲总是将它理解为一门卓越的实际科学，其功用在于了解怎样同各种力量建立适当关系，而这些力量是物质世界的基础，能用来为生活服务。

原始创世秘密和生活科学的保存人，传统主义者，通常具有惊人的记忆天赋，他们也往往是传说所传下的过去事件或当代事件的案卷保管人。

因此，要写出一部本质上是非洲的历史，就必须依靠这些有资格的非洲人的不可或缺

的证言。谚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些伟大的多马，这些知识丰富的人，遐迩闻名，受人尊崇，人们为了求教于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总是不辞长途跋涉。

阿多·登博，一位富拉尼人多马(锡拉蒂奎)，传授给我关于富拉尼人的知识，现已去世。

另一位富拉尼人锡拉蒂奎阿里·埃萨还健在。

丹福·西内几乎是一位万能的多马，在我小时常到父亲家来。他不仅是可磨盟会的大传授师，而且具有他所处时代的全部知识——历史学、创世说或各种自然科学的知识。他在锡卡索和巴马科之间，即凯内杜古和贝莱杜古两个古老王国的地域内，无人不晓。

他弟弟拉蒂夫也是一位伟大的多马，经历过同样的秘传。他还具有阅读和书写阿拉伯文的长处，并在乍得服过兵役(法国部队)，因此能获得许多关于乍得草原地区的知识，这些知识同在马里所传授的相似。

象伟大的盲人乐师班佐马纳一样，在马里，伊瓦是健在的最伟大的曼德传统主义者之一。他的身分是迪埃利。

在这里应当说明，迪埃利不一定是传统主义的博学之士，但如有这方面资质，就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他不能加入可磨盟会，它的大门对迪埃利关闭。③

一般说来，传统主义者，如果实际上不为殖民政权所反对，就要被抛弃。不用说，殖民政权力图根除本地传统，以传播自己的思想。因为正如殖民者所说："在已种植的或休耕的土地上，都不能播种。"因此，秘传通常离开大城镇而避入丛林地区，这些大城镇被称作图巴布-杜古斯或"白人城镇"——意指殖民者。 174

但是，在旧巴富尔地区的非洲草原地带的一些不同国家里——其他地方无疑也同样——仍有一些博学之士，继续把这份神圣遗产传授给这样一些人：他们愿意求教并且由于耐心和谨慎而值得教诲的人，因为耐心和谨慎是神要求的两项基本条件。

10或15年之后，最末一批伟大的多马，最后一批继承了各方面传统的老人，可能都要去世了。假如不赶紧搜集他们的材料，聆听其教诲，一个种族的全部文化和精神遗产将同他们一起被人遗忘，无根底的年轻一代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传授的真实性

传统主义者-多马，无论知名与否，都必须比其他人更尊重事实。因为，对于他们，说谎不仅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且**违背礼仪禁令**，因而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说谎者不能成为传授人或掌刀主，更不能作多马。假如发生这种前所未闻之事，一个传统主义者-多马被证实是说谎人，人们就永不会再向他请教，他的作用便立即消失。

一般说来，非洲传统极厌恶谎言。据说："小心，不要同自己割断联系。割断同周围的联系都比割断同自己的联系好。"然而有关礼仪上的谎言禁令，对各级宗教职司(或献祭人

③ 关于迪埃利(dieli)，见下文第137-141页。

或掌刀主等)[4]更有特别影响。这些职司从族长(他是家族献祭人或祭司)开始，直至铁匠、织工和传统手艺人——技术操作被视为神圣活动，这一点我们将可看到。这种禁令还触及这样一些人：他们必须执行某些魔法－宗教职能，主持各种礼仪活动，因而被视为普通生物同各种守护力量之间的媒介。受禁令约束的最高位是神圣的地区主祭(例如多贡人的霍贡)，最后是国王。

据我所知，在非洲草原地带的全部传说中，都有这种礼仪上的谎言禁令。

175 禁止谎言的原因是，宗教职司说谎，将玷污礼仪条例，因而不再具备执行这种神圣行动所必需的全部礼仪条件，其中主要是在操纵生活的各种力量之前，自身必须和谐。因为，不要忘记，非洲的整个魔法－宗教体系，目的都在于保持或重建各种力量的平衡，它是周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保持和谐的依靠。

多马受这种禁令的约束比任何人更甚，因为作为传授师，他们是伟大的"**世界占有者**"，人类活力和各种精灵的积极的主要代理者。他们是神圣咒文的继承人，这些咒文代代相传，一直能追溯到第一个人马阿发出的第一次神圣的振动。

我举皮尼亚里(班迪亚加拉地区)的多贡人掌刀主为例。我在年轻时就认识他。他将一位被追逐的妇女藏在家中，并为救其性命而说谎。事后，他自动辞职，确信自身不再具备合法地保有职位的那些礼仪条件。

在涉及宗教或神圣事务时，传统的大师们不怕群众的反对意见。如果偶尔有错，他们就公开承认，不指望宽容，也不推诿辩解。对于他们，承认可能犯下的任何过错，是忠于职守，因为它是对玷污的净化。

如果说传统主义者或博学之士在非洲受到高度崇敬，那首先是因为他尊重自己。由于内部融洽，永不说谎，所以他很有涵养，是体内各种力量的主宰。他周围的事物也井然有序，动乱完全消失。

即使没有这种谎言禁令，他也节制言谈，绝不信口开河。因为我们已看到，假如将言谈看作内部各种力量振动的体现，那么反之，内部各种力量则产生于对言谈的适应。

如果传统主义者－多马是言谈的占有者，那么其他人就只是杂谈的保管者。

根据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对重要的传统非洲教育从属于自制这一点，便能更好地理解了。节制言语是良好教化的标志和高贵的象征。未成熟的青年很早就学习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仿照同他在一起的原始马阿温顺而有规则地容忍宇宙的全部力量，学习对自身各种力量的包容。

关于一位受人崇敬的博学之士或能主宰自身的人，人们说："他是一个马阿！"(或者用富尔富尔德语说，是一位纳多)，即一个完人。

传统主义者－多马很熟悉采用娱乐方式和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授，切不可把他们同吟游诗人、故事讲述人和民间演唱者混淆，后者的身分通常是迪埃利和沃洛索(家庭俘

176 虏)[5]。对于他们，不存在诚实的宗规，只要千方百计取悦观众，传统就允许他们曲解或更

---

[4] 并非所有兴礼仪式都必须用动物作祭品，祭品可以是粟、牛奶及其他天然产物。

[5] 沃洛索(字义为生于家里的人)或家庭俘虏是奴仆或世代属某家族的奴仆家庭，传统允许其享有行动和言论的完全自由，对主人财产也有相当的物质权利。

改事实，即使这种曲解或更改很厉害，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人们说："迪埃利是允许有两只舌头的。"

相反，经受传统主义熏陶的非洲人，对一位传统主义者－多马的话，连作梦也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特别是在传授从祖辈继承下来的知识时更是如此。

多马在传授以前，出于尊敬，要向先人的英魂禀奏，祈求帮助，保佑他言语无失误，记忆无差错，以免错漏。

丹福·西内是我在孩童时代在布古尼认识的一位伟大的班巴拉人多马，可磨盟会领唱人。在传授故事或训诫之前，他总要说：

啊！我的蒂埃马布莱姆·萨马凯家族的先主！
啊！来自东方的第一批传授始祖，
　过世的铁匠和织工们的英灵！
啊！吉吉，你第一个到达杰里巴（尼日尔）向可磨传授秘诀，
　你是伟大的人！
你们都降临吧！都来听吧！
倘若我传授时恰当而忠实的言语能得到护佑，
我就要依照你们的话语，
向明天的人传授。
他们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的后裔。
我要向他们讲述，
从你们过去到我们今天，
件件事情的起始根由。
啊！紧握我言语的缰绳吧！列祖列宗！
指引我讲述的词语，
遵从一定规则，
这些规则他们生而固有。

然而他总是补充说：

"我，萨马凯（雄象）家族的丹福·西内，当着两位证人马科罗和马尼芬⑥的面，就要根据我所听到的向你们讲述这段故事。"

"他俩同我一样，知道故事的经纬⑦。他们将监督我，帮助我。"

如果故事讲述人有差错或遗漏，他的证人就会插嘴说："喂！请注意你的言语！"对此，他总是回答："请原谅！我热情的舌头骗了我！"

一个并非出身铁匠、然而熟知制铁科学的传统主义者－多马，在谈论制铁之前说："我受惠于某某，某某又受惠于某某，等等。"他要用躬身低头、肘部着地并伸出前臂这种象征

⑥ 马科罗（Makoro）和马尼芬（Manifin）是同他共事的两位门人。

⑦ 传统故事总有一根主线或不可移动的基础，它们绝不可改变，但为了激励或依照听众情绪的提示，可加以润饰性的发展或修饰。

忠心的姿势，对铁匠先辈表示崇敬。

多马也可能引用师傅传授给他的话说："我对农法伊里以及他和我之间的全部中间人表示尊敬……"⑧而不必一一列举其名字。

总是要讲到传授世系，多马自身则是其中的一环。

在传统知识的各方面，**传授世系**最为重要。如无正规传授，便无魔法，而只有谈话和故事讲述。言谈就无效验力了。通过传授世系的传授，被视为从原始传授开始的力量的传递，使言谈具有效验力和神圣性。

这种尊重传授世系或尊重传授的观念意味着，未受欧洲文化影响的非洲人，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借助文盲的惊人记忆，按照听来的言词或情节加以复述。如有矛盾，他仅回答说："某某是那样教我的！"——总是说出传授人姓名。

除传统主义者－多马自身的和谐统一和他对传授世系的依赖之外，周围**同辈和长者的经常监督**，是传授可靠性的又一保证。这些同辈和长者总是多疑善防地监视着传授的真伪，常常因一点点差错而打断多马的传授，这一点我们在丹福·西内的事例中已看到。

在进入丛林的宗教行进中，可磨盟会领唱人，对他继承自传授世系的传统歌词，可能加进一些冥想或鼓动词句，并为他的同伴歌唱。他的歌词，新的节奏，有助于丰富前辈的歌曲。但他总是警告说："这是我加的，这是我说的。我不是不会错，我可能是错的。如果我错了，别忘记，我同你们一样，靠一点粟、一口水和一些空气生活。人不是不会错的！"

盟会成员和同他一起的初学者学习这些新歌曲，于是学会了可磨盟会的全部歌曲，而且牢记不忘。

可磨盟会门人的晋升尺度，不是他学会的歌曲**数量**，而是他的**生活**同这些歌词的**一致性**。假如一个人只学会 10 或 12 首可磨盟会歌曲，但能**身体力行**，那么他在同伴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可磨门人。要成为可磨盟会领唱者，然后成为传授师，则必须精通全部继承的歌词——并身体力行。

178

传统教育，特别当它涉及与秘传有关的知识时，总同经验相联结，与生活成为一体。那些想接近非洲宗教材料的欧洲或非洲研究人员，如不同意过与宗教材料相应的秘传生活，接受秘传规则，满足**语言知识**这个最低先决条件，就总要责备自己仍然处于课题的外部边缘，其原因正在这里。因为有些事情是无法解说的，但可体验和实践。

我记得 1928 年我在图冈服役时，一位人类学家到那里研究举行割礼时用作祭品的母鸡。法军指挥官去找本地村落的酋长，要求千方百计满足这位人类学家的要求，坚持应把全部情况告诉他。

酋长把村里的领导人召集起来，向他们说明事实，并重复了法军指挥官的话。

会议领导人是举行割礼地方的掌刀主，因此也负责主持这次割礼仪式和相应秘传。他问村酋长："他要我们把一切全告诉他吗？"

"是的！"村酋长回答说。

---

⑧ 铁匠的始祖。

"可是他是来行割礼的吗?"

"不! 他是来搜集材料的。"

老人转过脸去问道:"如果他不行割礼，我们怎能把一切全告诉他呢? 酋长，你知道，你完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要我们把全部训诫讲授给他，他就必须象行过割礼的人一样生活。"

"因为我们被武力所迫，不得不答应，"酋长回答说，"所以才找你想办法。"

"那好!"老人说，"我们把他放进稻草里，把他应付过去，而一点声色不露。"

"放进稻草里"，或戴上眼罩，就是在不愿把真相告诉别人时，编造故事欺骗他。当殖民政权派代理人或代表来研究人类学、但不愿在所要求的条件下生活时，发明了这种方法。后来，许多人类学家都不知不觉地成了这种策略的牺牲品——还有许多实际上未被引入歧途的人类学家，在没有身体力行因而并不真正懂得时，却以为自己了解透彻。

传统教育，除了一些大型秘密盟会，如可磨盟会或其他盟会中的秘传外，实际上开始于每个家庭。在家庭里，父亲、母亲或年长人即是家长又是老师，形成传统主义者的第一个小组织。他们是人生中教第一课的人。他们的传授不仅通过经验，而且借助故事、童话、传说、格言和谚语等。格言是祖辈传给后代的指令，数量很多。 179

孩子们的某些游戏，由受过秘传的人设计，以便根据年龄传授一些密码暗号的知识。我可以举马里的巴南戈洛游戏为例。它以数字体系为基础，同 266 个锡奎巴或符号有密切关系，它们相应于造物主的一些属性。

此外，传统教育并非系统的，但同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这种方式似乎很混乱，但事实上非常实际和生动。利用特殊事件或体验进行的教育，深深铭刻在孩子的记忆中。

假如一位老先生在丛林行走碰上蚁塚，这就使他有机会根据身边听众情况传授某些知识。他可以讲蚂蚁本身，它的生活规律，所属类别; 也可以谈论集体生活依靠团结和忘我精神，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 如果听众能理解，他还可以讲更深一层的道理。这样，生活中的任何偶发事件，任何琐碎小事，都能在许多方面加以引伸，讲述神话、故事和传说。根据遇到的现象，人们可追溯到产生现象的各种力量并联想到生命统一和谐的秘传，这种生命完全由原始的神圣力量"塞"所赋予，而它本身则是造物主的一部分。

在非洲，万物皆历史。生活的崇高历史包括土地、湖泊和河流的历史(地理学)，植物的历史(植物学、药物学)，土地蕴藏及其产物的历史(矿物学、冶金学)，星球的历史(天文学、占星学)以及水流的历史等。

在草原地区的传统里，特别是在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的传统里，地球上各种生命表示的总和，被分成三类或三等，每类或每等又分三组:

(1) 处于下层，无生气，是所谓"哑"生命，其语言被认为是神秘的，因为常人听不懂或听不见。这类生命包括存在于地表(沙子、水)或地下(矿物、金属)的万物。在无生气的哑生命中，我们发现有无生气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直译为烟)。

(2) 处于中层，无生气，是固定生命，他们生机勃勃，但不能移动。这一类是植物，它们能在空间延伸或张开，但不能移动根基。在无生气的固定生命中，我们发现有蔓延植物，攀缘植物和竖立植物，后一类属最高级组。 180

（3）　最后是有生气的活动生命，包括各种动物直至人。有生气的活动生命包括陆栖动物(脊椎或无脊椎动物)、水栖动物和飞行动物。

因此，地上万物都可归类⑩。

在全部历史中，最伟大和含义最深远的是万物的共生人自身的历史，因为按照神话传统，第一个人的构成物取自在他之前存在的万物。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各类生命(矿物、植物和动物)，在那里它们同多种力量结合，具有高一级的机能。关于人的教义，是以创世说的神话为基础的，它们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其同有生命和无生命世界的关系。它们既要说明人体的象征意义，又要说明其精神的错综。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的传说是："人的内貌多种多样。"它们应教导人对万物怎样行动，怎样尊重它的均衡、不搅乱赋予其生气的各种力量，大地万物只是这些力量的外部可见显示。秘传要说明人同这些力量世界的关系，逐渐引导他走向自制，最终象马阿·恩加拉的对话者，有生命世界的保护人马阿那样，成为完人。

传统的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是口头传说的重要动力。

在传统的非洲社会里，人类活动总是具有神圣或神秘的特征，特别是对物质有效验并使之变化的那些活动，因为一切都被视为有生命的。

每种技术的作用都同代代传下的秘传知识相连，都起源于最初的天启。工匠的工作是神圣的，原因是他仿效马阿·恩加拉开天辟地，并补充其创造。事实上，班巴拉人的传说教导说，创世尚未完结，马阿·恩加拉创造我们大地时，留下了不完善之物，所以他的对话者马阿为使万物臻于完备，可以增补或修改。工匠的动作被想象为重复创世秘诀，因此它集中一种神秘的力量，不遵从一定礼仪条件，人们便不能接近这种力量。

传统的工匠干活时，伴之以礼仪性的歌唱或神圣的韵文吟诵。他们的动作被视为语言。事实上，从象征意义上说，每种手艺的动作都体现了相应的原始创世秘诀，正如前述，它同语言的力量紧密相联。据说：

181

铁匠铸造语言，

织工编织语言，

皮匠将它搓揉平滑。

让我们以纺织工为例。织工的手艺同分散于时空的创造性语言的象征相联系。

一个织工身分的人（富拉尼人称马阿博）就是33种秘密的储存所，它们是织机的基本秘密，各有其含义。例如，织机框架由8根主要木头构成：竖的4根不仅象征4种本源要素(土、水、气、火)，而且象征4个主要方位；横的4根象征4个附属方位。织工端坐织机中央，代表第一个人马阿，他居于空间8方的中心。由于织工的出现，构成9种成分，它象征实体的9种基本状态，生命的9个类别，身体的9条通路(各种生命力量的门户)以

⑩　参见A.哈姆帕特·巴，1972年，第23页以后。

及富拉尼人中的9等人，等等。

工作之前，织工必须触摸织机的每块木头，同时吟诵格言或连祷词，它们同体现于木头中的生命力量相对应。

他的脚上下踏动踏板时的往返运动，象征创造性语言的原始韵律，同一切事物的两重性和循环运动的规律相联系。他的脚据说要这样说：

方扬科！方扬科！两重性！两重性！
一只上来，一只下沉。
国王驾崩，太子登基，
祖父去世，孙子诞生，
离婚的争吵混杂着婚礼的闹声。

织机的梭则说：

我是命运的小舟。
经线表示生命，
我在它的暗礁之间穿行。
我从右岸到左岸，
为纺织出力，
毫不振抖我的肚肠(线)。
我再从左岸到右岸，
毫不振抖我的肚肠。
生命就是不断往返，
生命就是永恒自给。

已织好的布，用一根棍子卷起，放在织工大腿上，代表过去，与此同时，而仍在编织、未卷起的线的晃动，则象征神秘莫测的明天。织工总是说："啊！明天！别把讨厌的意外事情留给我。" 182

整个说来，织工的工作代表8种往返运动(脚，手，梭和织物经纬线有节奏穿行的运动)，它同织机框架的8根木头相对应，同神话中蜘蛛的8条腿相对应，这种蜘蛛向织工始祖传授了纺织技艺。

至于铁匠，他是各种变形秘密的储存所。铁匠是杰出的火之主，起源于神话，在班巴拉人的传说中，被称为大地的长子。他的技术来历可追溯到第一个人马阿，其创造者马阿·恩加拉传授给他的技术中，就有金工的秘密。铁匠的风箱称作"扇"，与那个原始"蛋"同名，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原始蛋产生了整个宇宙，是第一个神圣的铁匠铺。

铁匠铺的各种工具，同性的象征相联系，它是宇宙产生过程的表现和反映。

因此，铁匠助手操作的两个圆形风箱好比男性睾丸。风箱鼓入的空气是生命存在，它们通过代表男性阳物的通风管道而进入熔铁炉内。熔铁炉象征子宫，具有变换力的火在那里施展造化。

传统的铁匠只有在礼仪性的净浴之后，才可进入铁匠铺，净浴用水用各种树木的叶或皮或根煎煮成，树木的选择依时日而定。因为植物(象矿物和动物一样)被分为7等，同一

周的7天相对应，两者由类似而且对应的规律相联系。[10] 然后，铁匠采用特殊方式装扮起来，因为他不能随便穿任何衣服就进入工作间。

每日清晨，铁匠采用其熟悉的植物，通过特殊的熏蒸办法，净化铁匠铺。

上述活动完结，铺外的一切接触物也全部净化，铁匠便处于神圣状态。他又变得圣洁，等于是原始铁匠。只有这时，他才能仿效马阿·恩加拉进行创造，改变物质并使之合于要求(富尔富尔德语称铁匠为拜洛，字义为"改造者")。

开始工作前，他召唤创造的4个本源要素(土、木、气、火)，在工作间里，它们必须有所象征：水常盛于一容器中，火在熔炉里，气由风箱送入，土在工作间旁边。

工作中，接触每种工具时，他都要吟诵特殊咒文。接触象征妇女容受性的铁砧时，他说："我不是马阿·恩加拉，我代表马阿·恩加拉。创造者是他，不是我。"然后，把一些水或一个鸡蛋放在铁砧上说："给你聘礼！"他拿起象征阳物的铁锤，敲几下铁砧以使之敏感。联系建立了，他可以开始工作。

学徒不得发问，只能观察和鼓风。这是学徒的沉默阶段。随着知识的增加，他就要按一定节奏鼓风，这种节奏越来越复杂，且各有其含义。在口授阶段，师傅将其全部技能逐渐授与学徒，训练并纠正他，直至技艺纯熟。然后，结业仪式完毕，新铁匠便可出师，独立门户。铁匠通常把自己孩子送给同行作学徒。因为俗话说："师傅的老婆和孩子不是他的好学生"。

传统的工匠就这样仿效马阿·恩加拉，通过其动作重复原始创造。他不习惯于在纯经济意义上工作，而习惯于执行一种使生命的各种基本力量活动的神圣职能，并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隐避于工作间或铁匠铺，参与补充永恒创造的秘密。

铁匠拥有的知识必须包括生活的广阔领域。鉴于神秘学家的声望和精通火与铁的秘密，他成了有资格主持割礼的唯一人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可磨秘密盟会的大掌刀主总是铁匠。他不仅精通有关金属的全部知识，而且是植物及其属性分类的专家。

一座既能熔炼又能浇铸的高炉，其操纵者的知识最为丰富。除冶金学的全部知识外，他具有"大地腹中之子"的精深知识(矿物学)，通晓植物和丛林的秘密。他确实能识别哪种植物覆盖含有特殊矿物的地表，只需考察植物和圆石，就能探出金矿脉。

他熟悉那些有关大地和植物的咒文。天地万物都被视为有生命，各种力量赋予它生气，任何扰乱它的行动都必须伴之以礼仪性举动，以拯救和保卫其神圣均衡，因为万物皆相联，事物之间都有对应反应，每一行动都能搅动生命的力量，并引起连锁反响，人们能够感知其影响。

因此，传统的人同世界的关系，是天然的**参与**关系，而非纯粹利用关系。在**包罗万象的宇宙幻想中**，亵渎神圣的人数微不足道，是可以理解的。

例如，在古老的巴乌莱河地区，地下金矿丰富。它被视为神圣的金属，不能无节制地开采。黄金首先用于王室或宗教器物的制作，也作交换手段和制造礼物。谁都可以开采黄金，但谁也不能保有超过一定重量的天然金块，超过标准重量的任何天然金块都要交还神

[10] 关于这种类似而对应的规律，见A.哈姆帕特·巴，1972年，第120页以后。

灵，放入王室金库，这个神圣金库，国王们也无权动用。因此，有一定数量的王室财宝便原封不动地留传下来，直至欧洲人的占领。由于大地理应归造物主，所以人不能占有土地，他对土地只有使用权。

回到传统工匠的本题。他不仅是以姿势和行动体现知识的完美典型，而且是终身体现知识的完美典范。他必须遵从一整套与职能相连的禁令和义务，它们构成工匠对万物和同胞的正规行动准则。

因此，便存在着所谓铁匠的生活方式（班巴拉语为努穆西拉或努穆亚），农人的生活方式，织工的生活方式等等，从种族上讲就是富拉尼人的生活方式（拉沃尔·富尔富尔德）。它们是每一集团在道德、社会和法律方面特有的真正法规，这些法规通过口头传说忠实地留传下来并信守不移。

可以说技艺或传统作用在于塑造人的本性。现代教育同口头传说的全部分野就在这里。在西方学校学到的东西可能有益，但并不总能**身体力行**，然而由口头传说继承的知识却体现于人的终身。一门技艺的仪器或工具，给神圣语言以物质形式，学徒同这门技艺接触，使有义务利用他的各种姿势体现这些语言。

口头传说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结为故事或某种知识的传授，原因就在这里。它**产生并造就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我们可以说，有铁匠的文明，织工的文明，牧人的文明，等等。

在这里，我只是深入考察了铁匠和织工的事例，这些事例特别典型。但一般说来，每种传统活动都构成一个巨大的秘密或魔法－宗教盟会，这是通向统一和谐之路，对入会者说又是统一和谐的一种反映或特殊表现。

为使各种技术秘密及其产生的魔法力量保持在一定血统范围，各集团通常必须遵守不同外人通婚的禁令，而实行族内通婚制度。因此，实行同族婚姻并非由于不可接触的思想，而是希望将礼仪性秘密保持在集团的范围以内。我们一旦知道这一点，就能明白，正如现今非洲草原地带存在的那样，这些与神圣职责有关的特殊狭小集团，如何逐渐引伸出社会地位的概念。俗话说："战争和贵人制造俘虏，但制造工匠（恩亚马卡拉）的是造物主。"

因此，社会地位高低的概念，并非基于传统社会学的现实。它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出现的，只在某些地方出现，它可能是一些特殊帝国出现的产物，在这种帝国里，贵族保有的武士职能赋予他们无上权力。在遥远的过去，贵族的精神权力居于世俗权力之上，贵族的概念可能不同。在那样的时代，管理富拉尼人各种组织的是锡拉蒂奎（富拉尼传授师）而不是阿多斯（酋长、国王）。

185

同某些文字记载或推测相反，在非洲，铁匠令人敬畏，而不是受到藐视。作为大地的长子，火的主宰，神秘力量的操纵者，他的威力尤其使人畏惧。

无论如何，传统使贵族负有供养工匠或恩亚马卡拉各阶层（班巴拉语工匠为恩亚马卡拉，富尔富尔德语是涅埃诺，复数涅埃贝）的义务。这些工匠阶层并不要求工作报酬，而是要求承认一种贵族不得拒绝的特权，从而享有获得实物（或金钱）的特殊恩典。

曼德传统集中于马里，但也或多或少地包括原巴富尔的整个领土（即除森林地区和尼日尔东部外的前法属西非），在这种传统里，处于工匠或恩亚马卡拉地位的人包括：

（1） 铁匠（班巴拉语称努穆，富尔富尔德语称拜洛）。

（2） 织工（班巴拉语和富尔富尔德语均称马阿博）。

（3） 木工（指木刻师和装修木工；班巴拉语称萨基，富尔富尔德语称拉博）。

（4） 皮革工（班巴拉语称加兰凯，富尔富尔德语称萨凯）。

（5） 说唱艺人（班巴拉语称迪埃利，在富尔富尔德语中，它被一般地称作恩亚马卡拉，或泯埃诺的一部分）。也许它的法语名称格里奥（民谣歌手）更为人熟知。

虽然严格地说不存在地位优越的观念，但恩亚马卡拉中的4种手工匠阶层居于迪埃利阶层之上，因为他们都有秘传，都有特别技能和一定知识领域。铁匠地位最高，织工次之，他们的技艺最为古老。这两个阶层的成员可以通婚，因为他们的妇女都是传统的制陶匠，因而享有同等的妇女秘传。

在曼德人的分类中，各种工匠——恩亚马卡拉总是划分为3种。

有3种铁匠（班巴拉语为努穆，富尔富尔德语为拜洛）：

（1） 矿山铁匠（或冶炼铁匠），挖掘矿石，冶炼金属。他们的伟大秘诀也适用于铁匠铺。

（2） 店铺铁匠，在铁匠铺里操作，不挖掘矿石。

（3） 贵金属品制造工或宝石匠，通常依附于一位酋长或贵族，因此常在酋长或贵族的宏伟建筑的外院工作。

有3种纺织工（马阿博）：

186 （1） 羊毛纺织工是最受称赞的盟会成员，毯毯上的图案总是象征性的，同各种数字的和创世学说的秘密相联系，且各有其名称。

（2） 克卡纺织工纺织宽大的毯子，蚊帐和棉织悬挂物，这些织物可以长达6米，花样变换无穷。我见过一些织物有165种花样（各有其名称和含义，名称本身是表示多种事物的象征）。

（3） 普通纺织工纺织简朴的成段白布，未经高级秘传。

贵族有时进行普通纺织。例如，某些班巴拉人贵族纺织成段白布，因为没有这种纺织工。但他们并未受过秘传，也可能不纺织克卡、羊毛或蚊帐。

有3种木工（班巴拉语为萨基，富尔富尔德语为拉博）：

（1） 研钵、杵和小圣像的制作者。研钵用以捣碎圣药，属礼仪性器物，只能用一些特殊木料制作。

如铁匠铺一样，这里也有两种基本力量的象征：研钵象铁砧，代表女性；杵象锤，代表男性。

小圣像依照多马——受过秘传者的吩咐制作，他们因某种特殊用途而赋予小圣像以神圣的威力。除规定的礼仪外，木料选择和雕刻还必须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种条件只有木刻师知道。

木匠自己砍截所需要的木料。因此，他也是木刻师，其秘诀同植物和丛林的秘密知识相联。因为树木被看作是有生命的，有其他生灵居于其中，因此，无木刻师熟知的礼仪上的特殊预防办法，便不可以砍伐或雕刻。

（2） 家庭木制器皿或家具制作者。

（3） 凿挖独木舟的制作者。

独木舟制造者还必须进一步被传授以水的秘密。

在马里，索莫诺人也开始创造凿挖独木舟，他们不是博佐人，却已变成渔民。他们在库利科罗和莫普提之间的尼日尔河岸劳作。

有三种制革工（班巴拉语为加兰凯，富尔富尔德语为萨凯）：

（1） 制鞋皮革工。

（2） 制皮带，缰绳，笼头等等的皮革工。 187

（3） 制马鞍、马轭等等的皮革工。

皮革制造也属秘传，加兰凯常享有巫师声誉。

猎人、渔人和农人并非相应的阶级，而是相应的种族集团。他们的活动在人类社会中属最古老之列。采集（植物）和狩猎（无论在陆上或水上）代表另一些大的秘密会社，因为大地母亲的各种神圣力量和野兽生活的丛林的各种力量，不是可以任意接近的。象冶炼铁匠一样，猎人通常熟悉丛林的全部咒文，而且必须彻底精通动物世界的科学。

医治者（既用植物，也用语言医治）可以归属任何阶级或种族集团。他们往往是多马。

人们往往有一种由秘授而世代相传的特殊技术。因此，马里的多贡人享有精通麻疯秘密的声誉，可以迅速将病治好而不留下痕迹，并且深知肺结核治疗的秘密。他们还是杰出的接骨者，能在骨头严重破碎的情况下重接断骨。

民间说唱艺人（班巴拉语称迪埃利）

假如创世和秘密科学为掌刀主和神的合唱指挥者所专有，那么，另一方面，音乐、抒情诗，供公众消遣的栩栩如生的故事、常常还有历史，则是迪埃利的知识领域，他们属于抒情诗人或吟游诗人一类，可以在各处漫游，也可依附于一个家庭。

人们常常误认为迪埃利是唯一可能的传统主义者。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可以将他们分为这样几类：

（1） **乐师**，弹奏各种乐器（单弦琴，吉他，可拉，手鼓等），是古代音乐保存者和传授者，也是作曲家，因为他们往往是优秀的歌手。

（2） **专使**和家臣，在大家族间产生不和时，负责从中调停。他们总是依附于王室或贵族家庭，有时依附于一个特殊人物。

（3） **家系学家**，史学家或诗人（或称三位一体之人），通常也是故事讲述者和伟大的旅行家，不一定依附于一个家庭。

传统使迪埃利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不象霍朗（贵族），他们不必注重羞耻，并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迪埃利可以不受限制地，甚至无耻地行动，有时戏弄最重大，最圣洁的事物而不顾后果。他们既无小心谨慎的义务，对事实也不必绝对尊重。他们有时可以厚颜无耻地说谎而不受追究。“那是迪埃利说的！话不是真的，但我们知道真相”。这句格言足以说明，传统怎样接受迪埃利的虚构，而又不受其欺骗——格言还补充说，迪埃利有“一张骗人嘴”。 188

在整个巴富尔地区的传统里，贵族或酋长不仅在公众集会上被禁止演奏乐曲，而且举止言谈必须适度。俗话说："话太多同一位霍朗的嘴不相称。"所以在发生大小问题时，依附于家庭的迪埃利便十分自然地起调解人、甚至专使的作用。他们是主人的喉舌。

依附于家庭或个别人物时，迪埃利通常负责依据惯例需要进行的谈判，特别是婚姻谈判。例如，一位年轻贵族不愿直接向姑娘吐露其爱情。他便让自己的迪埃利作代言人。迪埃利将同姑娘，或姑娘的女迪埃利接触，以便讲述其主人的情感，颂扬主人的功德。

非洲社会主要以个人之间的对话以及会社或种族集团间的商讨为基础，因此，迪埃利在这些活动中便自然成为积极的代理人。由于允许迪埃利"嘴里有两只舌头"，所以如有必要，他们可以撤回前言而不受严厉质问。贵族则不能，他不得猝然失言或改变决定。为了挽救危难或保全贵族脸面，甚至允许迪埃利李代桃僵。

在秘密会议上肩负重大责任，"用正确眼光观察事物"的是会社里的聪明老人，使聪明老人的决定变成命令付诸实施的是迪埃利。

由于有搜集和传播消息的锻炼，迪埃利是伟大的新闻传送者——但往往也是传播丑闻的人。

他们的班巴拉语名称迪埃利，意为血液。迪埃利确实象血液一样在社会机体中循环，因此，社会健康与否，便取决于其言行是否一致。

但我应立即指出，这只是总的情况，迪埃利不一定全是轻率或无耻之徒。远非如此。迪埃利中有被称作迪埃利－法阿马即迪埃利之王的人。他们在勇气、道德、廉洁和智慧方面完全不亚于贵族，对于社会习俗赋予他们的权利也从不滥用。

迪埃利总是伟大而积极的人类商业和文化的代理人。

他们常是极有才华的人，由于对贵族和酋长的影响，在巴富尔地区的传统社会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现代，常常为了礼物，也常常为了处于危难中的贵族，他们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用他们的歌来刺激和唤起贵族的家系荣誉感。

189

例如，举行割礼前的夜晚，迪埃利鼓舞孩子或青年保持冷静态度，以显示自己无愧于祖先。他们在富拉尼人中吟诵道："你的父亲[⑪]某某死于战场。他忍受着红铁（子弹）的惩罚，没有眨动眼睛。我希望你明天对铁匠的刀刃也不惧怕。"在尼日尔博罗罗富拉尼人的棍子或索罗仪式上，男青年必须接受棍子在胸部痛打而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以证明其勇敢和耐力，迪埃利的歌声便是这些青年的支持力量。

迪埃利站在主人方面参加了历史上的全部战争，他们回忆主人先辈的高贵血统和丰功伟绩，以激励主人的勇敢精神。对于非洲人，家族荣誉有着巨大力量。即使现在，也采用讲述家系荣誉的方法，对人表示欢迎或表彰。

迪埃利影响历史进程的效果，取决于他们用言词激起的领导者的虚荣心是否过度，或者象常有的那样，能否唤起领导者的传统责任感。

很清楚，在巴富尔地区那些伟大非洲帝国的历史中，迪埃利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作用值得专门彻底研究。

---

⑪ 在非洲的词语中，"你的父亲"一词也完全可以指叔父、祖父或祖先。它指整个父系，包括旁系亲属。

迪埃利所以有力量并对霍朗(贵族)有影响，其秘密在于他们具有家系学或家族史的知识，其中有些人是这方面的真正专家。这样的迪埃利很少属于一个家族，而是周游各地，以寻求更渊博的历史知识。因此，在以华丽词藻述说贵族家系、先驱谋略和历史沿革时，他们深信具有触发贵族热情的几乎是魔法般的才干，当然也得到贵族的慷慨馈赠。一个贵族能够剥夺自身及其家庭的财产，并将其全部占有交给设法鼓动他感情的迪埃利。因此，这些家系学家迪埃利深信，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种酬劳。工作报酬的概念同恩亚马卡拉阶级要求于贵族阶级的权利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12]。不论穷富，贵族都有向自己的迪埃利或任何恩亚马卡拉或沃洛索赠送礼物的义务[13]——甚至最贫穷的贵族，即使要求者同给予者相比无限富有，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极力恳求的是迪埃利阶层。但无论获得多少，迪埃利总是穷人，因为他指望贵族帮助，所以挥霍无度。“啊!”一个乞求的迪埃利唱道：“贵族毫不吝啬。他总是把手迅速伸进口袋，向乞求人施舍。”如果万一不能立即给予礼物，这个贵族最好是当心“有一张骗人嘴的人”找麻烦，他的“两只舌头”能让无数计划毁灭，能使许多人的声誉扫地!

190

因此，从经济观点看，象恩亚马卡拉和沃洛索阶级一样，迪埃利阶层是社会的，特别是贵族阶级的重大负担。由于从前的贵族或迪埃利从事有报酬的职业，随着经济及其有关条件的逐渐变化，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是尽管如此，传统习俗仍继续存在。人们在举行洗礼或婚礼时，为了赠予那些用歌声使庆典充满生气的迪埃利，仍不惜倾家荡产。现在一些政府力图废止这种习俗，但据我所知，尚未奏效。

迪埃利，作为恩亚马卡拉，原则上必须在恩亚马卡拉各阶层中婚配。

作为家系学家的迪埃利，擅长讲述家族史，往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非洲社会的所谓档案保存人，偶尔成为伟大的史学家，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要记住，并不是只有他们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史学家迪埃利确实堪称传统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传统知识纯粹限于历史方面，而传统知识的方面却很多。

出身迪埃利的人，虽然具有成为史学家的某些可能性，但不一定成为史学家。他也不一定因此而精通传统事物，成为有知识的人——决不是这样。一般说，迪埃利是距秘传领域最远的阶层——这些领域要求镇静、谨慎和节制自己的言论。

然而，成为知识名家的大门，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对迪埃利并未关闭。正如多马-传统主义者(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名家)可以同时成为家系学家和史学家，迪埃利同任何社会阶级的任何成员一样，如果资质允许，经过相应秘传(可磨盟会的秘传例外，它禁止迪埃利加入)，也能成为传统主义者-多马。

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叙述过马里的两名健在的迪埃利知识名家，即伊瓦和班佐马纳，后者既是伟大的乐师、史学家，又是多马-传统主义者。

作为多马-传统主义者的迪埃利，是绝对可靠的知识来源，因为秘密盟会成员的资格

191

[12] 把霍朗一词译为“贵族”(Noble)不妥，事实上不属恩亚马卡拉阶级或琼(俘虏)阶级的任何人都是霍朗。琼阶级由战俘演变而来。霍朗的职责是保证会社的防卫安全，并为此献身，以及保证其他阶级的生存。

[13] 沃洛索(woloso)，家庭俘虏，见前面第128页注5。

赋予他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服从谎言禁令。他成了另一种人。前面说过，他是迪埃利之王，人们向他的智慧和知识请教，他虽然能够为人们提供娱乐，但绝不滥用他通常有的权利。

当迪埃利讲述故事时，人们通常问道："这故事来自迪埃利，还是多马？"如果来自迪埃利，人们就说："原来是迪埃利讲的！"而且希望对故事真相略加润饰，以渲染一个家族有如此这般的作用——一个多马－传统主义者不会增添这种修饰，他最关心的是真实传授。

在史学家迪埃利面前，我们必须辨别和确定，他是普通迪埃利，还是多马－迪埃利。但是必须承认，讲述的基本史实几乎未变，基本史实是诗歌和颂词中夸张的起点，这种夸张如果不是欺骗，至少也是对史实的修饰。

在某些法语辞书中仍然存在的一些误解应予清除。在法语书中，迪埃利被称作格里奥（民间歌手），被当作巫师（苏尔西埃），其实并不是巫师⑬。一个迪埃利，可能恰好是个科尔泰-蒂奎，即坏蛋赌徒，正如一个迪埃利碰巧是位多马－传统主义者博学之士一样——那并非由于他出身迪埃利，而是因为他接受秘传，在其主人的某个盟会里精通各种技艺。

这种误解大概产生于对格里奥（民间歌手）一词的双重理解。法语格里奥一词，有时指所有的恩亚马卡拉（包括迪埃利以及其他人），但往往仅指迪埃利阶层。

根据传统，恩亚马卡拉阶级全部是萨巴，即通晓隐秘知识的人。但这种知识只有作为神秘学家的盟会成员才能精通。传统将迪埃利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他们不过各种特点的秘传生活。因此，只有工匠——恩亚马卡拉才是萨巴，其中加兰凯即皮革工，才真正享有萨巴的声誉。萨巴一词取其贬意是巫师。

我倾向于认为，第一批欧洲口译者混淆了萨巴和萨巴加（两词发音相近），加上格里奥一词的双重含义，终于导致上述误解。

因为传统声称"恩亚马卡拉全部是萨巴（神秘学家）"，所以第一批欧洲口译者必定认为

192　"恩亚马卡拉全是萨加（巫师）"，又因格里奥一词有指个别和全体两种用法，结果变成"格里奥全是巫师"。误解因而产生。

即使迪埃利是巫师，其重要性也不在于他拥有任何妖术力量，而在于他对言论的运用——当然，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这种运用也可说是魔法的另一种形式。

在结束迪埃利的论述之前，让我们对一些可能引起混乱的例外加以说明。某些纺织工放弃传统手艺，成为吉他弹奏者。富拉尼人称他们为班姆巴阿多，原义为背在背上的人，因其花销总是依靠他人或会社。班姆巴阿多往往是故事讲述人，也能成为诗人，家系学家和史学家。

某些木刻师也可能舍弃工具而改弹吉他，成为优秀乐师和家系学家。博卡尔·伊洛和伊德里斯·恩加达属于我所知道的上沃尔特伟大的家系学家之列，他们就是由木刻师转为

⑬　英译者注："格里奥"（Griot）一词见罗伯特（1969年）模范法语词典，不知起源，其意为"属特殊等级的西非黑人，格里奥常被王公选作顾问。他们既是诗人，乐师，歌手，又是巫师"。在关于前法属西非各族的英语著作中，经常使用"格里奥"一词，但它是稀有的外来字（牛津词典和韦氏词典中均无）。在法语中，"格里奥"一词为众所周知。A.哈姆泊特·巴先生用法语撰写本章时，常使用它。但是，正如他所说，鉴于格里奥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它同非洲的迪埃利一词一样，对一般英语读者说来很陌生，所以本章英译文采用迪埃利一词。

乐师的。但是，这些都是例外。

此外，某些没落贵族可能成为民间说唱艺人——但不是乐师[⑮]——他们被称作蒂阿波尔塔(班巴拉语和富尔富尔德语称呼相同)。然而他们比最轻率的迪埃利还要轻率和无耻，对他们的意见无人采取严肃态度。蒂阿波尔塔向迪埃利乞求馈赠，简直达到迪埃利见他们到来就逃走的地步。

一般说来，音乐是迪埃利的伟大专长，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由盟会成员演奏并伴之以仪式或舞蹈的礼仪性音乐。然而这类神圣音乐的乐器是真正崇拜性器物，以便同各种不可见的力量的联系成为可能。由于它们是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所以能同土、气、水诸要素和谐一致。

使音乐成为火的精灵的咒文是食火者协会的特点，其成员被称作克西-科洛宁或唐恩知-索罗。

一个人怎样成为传统主义者

正如我所指出的，在非洲的巴富尔地区，任何人都能成为多马-传统主义者，即在传统知识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知识大师。知识对每一个人开放(到处都有各种形式的秘传)，知识的获得全靠个人天赋。

知识很受尊重，以致知识优于一切，占有崇高地位。任何领域的知识大师，无论其社会地位——霍朗(贵族)，恩亚马卡拉或沃洛索，均能参加管理公社的耆老会议。谚语说：“知识不知种族，也不识父系门户(氏族)。它使有知识的人成为贵族”。

非洲教育不象欧洲学校教育那样有系统。它分散于生活中，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在巴富尔地区，一个人在42岁之前都应在生活的学校里，除特殊例外，无权在集会上讲话。他应继续学习并加深自21岁秘传以来获得的知识。到42岁，人们便相信他青年时代以来接受的教诲已融会贯通。他有权在集会上演讲，转而成为教师，以便将从社会取得的知识交还社会。但是，如果他希望继续向长者学习并恳请指教，教师身分对此毫无妨碍。一位老人，为求得更多知识或寻求忠言，总能找到比自己更老更聪明的人。他们说：“耳朵里每天都能听到新东西。”因此，教育可以贯穿人的一生。

年轻工匠——恩亚马卡拉学得手艺之后，便遵照有关指教，准备独立生活。他通常走过一村又一村，向新师傅请教，以丰富其知识总量。人们说：“没旅行过的人什么也没见过。”因此，他们常从一个工作间转到另一个工作间，尽其所能在国内周游。山上人来到平原，平原人走进山里，贝莱杜古人到曼德人中间，等等。

旅行中，年轻铁匠总是背着风箱，以资被人识别。木刻师带着斧或锛。纺织工背负拆卸的织机，而将梭子或线管高高放在肩上。皮革工则拿着盛颜料的小容器。在大村庄里，手工匠按行业分居，年轻工匠到达时，人们便自动将他们领到皮革工住地，纺织工住地，等等。

---

⑮ 我们一定要记住，富拉尼人或班巴拉人霍朗(贵族)从不弹奏乐器，至少在公共场所是如此。总的说来，蒂阿波尔塔仍保持这种习惯。

在旅行和调查中学到多少，取决于个人的灵敏和记忆，尤其是个性。如果谦恭有礼，惹人喜爱，又勤勤恳恳，老人们就会将不愿传给别人的秘密传授给他。因为，据说："老人的秘密不是用金钱，而是用礼貌买来的。"

至于年幼的霍朗，他总是在父亲家里度过童年，不出村。在村里，他出席各种会议，倾听大家讲故事，并尽量记在心里。在同龄伙伴晚间聚会时，每个孩子都要复述他听到的故事，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创世传说(对后者的内容却不能完全领会)。7岁以后，他自然成为村里秘密会社的一员，开始接受秘传，我已指出这种秘传涉及生活的各方面。

当老人在集会上讲述一段创世传说时，常常发挥故事的象征性含义，以适应听众的性格特征和理解能力。他可以使之成为仅有一种寓意的奇异故事，以适合孩子的需要；也可以使之成为一堂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与不可见的世界关系的深奥课程。各人都按照自己的天资予以记忆和理解。

194

历史故事的讲述也是如此。历史故事给集会以生命和灵魂，故事对先辈的丰功伟绩、本地的英雄勇士描绘得栩栩如生。过路的陌生人要讲述外地的故事。所以，孩子们便经受着一种特殊文化环境的熏陶，并在记忆允许的条件下吸收这种文化。他的童年是以历史、故事、童话、谚语和箴言为标志的。

年轻的霍朗通常不出国，因为他命定必须保卫国土。他同父亲一起劳动，其父可能是农民、缝纫工或从事保留给霍朗阶级的任何职业。假如是富拉尼人，他便随双亲的帐幕移动，独自一人日夜出没于丛林，很快学会看守畜群，并接受富拉尼人的秘传，这种秘传同牲畜的象征表示相连。

一般说来，不出本村的人便不能成为多马-传统主义者。

需要深化知识的医治者必须旅行，以弄清各种植物，并同该学科的其他名家一起学习探讨。

旅行者发现和体验不同的秘传，注意其异同，以扩大理解范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参加集会，听历史故事，在擅长秘传或家系学的传统传播者住地流连忘返。他就这样接触到旅行地区的历史和传统。

可以看出，成为多马-传统主义者的人一生都是探求者和研究者，绝不半途而废。

草原地带的非洲人习惯于到处旅行，结果是交流和传播了知识。在非洲，集体的历史回忆很少局限于一个地方，原因就在这里。确切地说，它同各家系或种族集团在整个大陆上的迁徙相连。

许多商队总是使用在传统上受诸神和国王们保护的特别商路网，在这种商路上旅行不会遭受抢劫或攻击。否则便会招致袭击，或无意中破坏地方的某些禁忌而付出高昂代价。旅行者每到一陌生地方，总要"投靠"某位有名望的人，因而成为旅行者的保证人，因为"触犯客人就是触犯主人"。

伟大的家系学家必然总是伟大的旅行家。一个迪埃利可能因精通依附家族的家系而故步自封。但一位真正的家系学家——迪埃利或非迪埃利——为增进知识，则必须在国土上旅行，以查明一个种族集团的各个主要支派，然后出国寻觅迁出各支系的历史。

195

因此，我有幸认识的伟大家系学家莫洛姆·加奥洛，拥有塞内加尔全部富拉尼人的家

系学知识。因高龄而不能出国时，他便派遣儿子马马杜·莫洛姆出国为他调查一些富拉尼人家族，他们随哈吉·奥马尔通过苏丹(马里)而迁出。在我认识莫洛姆·加奥洛时，他已成功地编纂和保存了过去大约40代的历史。

他有参加各大家族的每次洗礼或葬礼的习惯，以记下生死情况，将其列入他惊人记忆中已汇辑的名单。因此，他能用美丽的词汇对任何富拉尼的重要人物讲述说："你是某某的儿子，某某所生，某某的后裔，某某的子孙……他们每人因何原因死于何地，埋葬的地方又是如此这般……"当然，这类知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部由口头传授，仅由家系学家的记忆加以记载。文盲的记忆力能记下什么，人们毫无所知。他听的故事就象镌刻在铸模上一样，然后，无论何时需要，都能原原本本地从首句复述到末句。

莫洛姆·加奥洛终年105岁，我相信他大约是在1968年去世的。他儿子马马杜·加奥洛现年50岁，住在马里，因自身也是文盲，所以采用同样的口头手段，继承父业。

与马马杜·加奥洛同时代的瓦哈布·加奥洛也健在。他在乍得、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甚至在扎伊尔，对讲富尔富尔德语的各种族集团(富拉尼人和图库勒人各族)进行了调查，目的是查明移居这些国家的各家族的系谱和历史。

加奥洛家族不是迪埃利，而是讲富拉尼语的一个集团，其地位相当于恩亚马卡拉，并享有与之同等的特权。作为空谈家和演说家而非乐师(他们的妇女除外，她们合着自己粗陋乐器的伴奏歌唱)，他们可能是故事讲述人和表演者，其中有许多家系学家。

在马尔卡人(属曼德集团)中，家系学家被称为盖塞尔，来源于马尔卡人家系学家所属家族集团的名称。

家系学家即史学家，因为优秀的家系学家熟悉提到的每个人的，或至少熟悉最杰出人物的历史和功勋。这门科学是非洲历史的基础，因为假如人们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这并非由于年代，而是为了家系——以便根据迁移的时间和地域去探索一个特定家族、氏族或集团的来龙去脉。

所以在非洲，人人都懂点家系学，都能清楚地追溯自己的家谱，如果不能，就如同没有身分证一样。在往昔的马里，无人不知自己的至少10或12代祖先。跟随哈吉·奥马尔到达马西纳的全部图库勒老人中，人人皆知他在塞内加尔富塔的家系(他们的原籍)，及其同那些仍留原籍的各家族的关系。莫洛姆·加奥洛的儿子马马杜·莫洛姆到马里继续其父的调查时，他所咨询的正是这些老人。 196

因此，家系学既具有身分证明的意义，又是增添家族荣誉的手段和诉讼中的凭证。例如，家系学家可以解决一块土地的争端，他总能精确地说出谁家祖辈开垦和耕种了这块土地，以后又把它给与谁以及给与时的情况等。

即使现在，我们发现许多人既不属于迪埃利阶层，又不属加奥洛家族，但他们精通家系学和历史。他们是非洲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是如此。每位族长都是自己家族的家系学家，迪埃利和加奥洛常常由此取得材料，补充他们已有的知识。一般来说，非洲的每个老人都是某些历史或传统领域的知识大师。

因此，迪埃利和加奥洛并没有垄断家系学知识，但只有他们才专门为贵族讲述家系，以收取礼物。

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草原地带各国即原巴富尔地区广泛传播的伊斯兰化，并未影响非洲记忆的特色及其口头传播的形式。事实上，伊斯兰教无论传播到何地，都未能使非洲传统适应它的思想，反而让自身适应了非洲传统——正如常见的那样——却又总是不违背其基本教义。二者的混合达到极高程度，以致有时很难将一种传统同另一种传统加以区分。

在十一世纪前很久，昆塔部落那个伟大的阿拉伯－柏柏尔家族已使昆塔地区伊斯兰化。这些本地人一学会阿拉伯语，就开始按其祖辈的传统传播和阐释伊斯兰教。

那些纯粹采用口授法的伊斯兰学校，使用各种方言讲授教旨（讲授古兰经和正规祈祷文的文字例外），其中应提到杰尔戈吉主持的口授法学校（称卡贝），巴拉尼主持的学校，法里马凯地方（马里的尼亚奋克地区）阿马杜·福迪阿主持的学校，迪利地方（马里的纳拉地区）穆罕默德·阿布杜拉伊·索阿杜主持的学校，以及沙伊克·乌斯曼·丹·福迪奥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学校，在那里全部采用富尔富尔德语讲授。距我们较近的有邦贾加拉地方蒂埃诺·博卡尔·萨利夫主持的扎维亚和萨伊克·萨拉赫主持的学校，后者是一位伟大的多贡伊斯兰教修道士，现仍健在。

197　说明一下非洲人在这方面的记忆能力。古兰经学校毕业的大多数孩子能熟记整本古兰经，能用阿拉伯语背诵所要求的全部赞美诗，而不知其含义！

所有这些学校非但不排斥非洲传统的一些基本原则，反而依据古兰经的启示应用和阐释这些原则。蒂埃诺·博卡尔在非洲和伊斯兰事务两方面都是传统主义者，他因为这种教育方法的彻底应用而驰名。

事实上，他们对宇宙有共同的看法，认为它是神圣的，对人和家庭有同样的概念，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两者的传统中，同样总爱引用名家的材料（阿拉伯语为伊斯纳德）而绝不改变其师傅的话语；同样尊重社会秘传世系（阿拉伯语称锡尔西拉或链条）；有同样的会社生活体系，使教义知识通过体验而深化（在伊斯兰教里，伟大的苏菲派会社，或称泰里格，复数为图鲁格，其"传授世系"追溯至穆罕默德本身）。

现在，在尚存的各类传统知识名家的行列里，又增加各类教士（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广泛地理解为法律哲学）和伟大苏菲派的各种沙伊克，但是社会结构（各种等级和传统技艺），即使在最伊斯兰化的地域也被保存，并继续传授他们的特殊秘密。伊斯兰教的知识成了提高传统知识的新源泉。因此，加奥洛出身的阿尔法·阿里（1958年去世）象其先辈一样，是班迪亚加拉地区伊斯兰教问题最伟大的权威，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事业。⑩

口头资料的搜集

为了实际说明在口头传授的社会里，历史或其他方面的传说怎样存在于集体记忆中，

⑩　一般说，从北部和东部传入的伊斯兰教特别影响到草原地带各国；而由海上传入的基督教对沿海森林地区影响较明显。我不能谈传统与基督教的冲突，因为没有这个问题的材料。

并很忠实地保存着，我要讲一讲自己怎样在纯口头传说的基础上，设法搜集各种资料，使我能写出《十八世纪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17]

因为我属于当地统治者提德雅尼的家庭，从童年起便具有听取和记忆各种传说的理想条件。在班迪亚加拉，我父亲的邸宅里总是宾朋满座。日夜都有大型集会，人们在会上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传统问题。

我父亲的家族一直与当时的各种重大事件牵连在一起，因此各种传说往往属于历史，每人都希望叙述一段某次战役的著名插曲，或引人注目的事件。我总是参加这些集会。我的记忆象未使用过的留声机片一样，记录下一切，绝不漏掉一句。

195

就在这里，我年幼时就认识了伟大的讲富尔富尔德语的故事讲述人，家系学家和史学家科莱尔。我跟随他周游各地，学会许多故事和传说。我习惯于自豪地将这些故事和传说复述给我的同龄伙伴，以致他们送给我阿姆科莱尔的绰号，意思是“小科莱尔”。

因为身不由己的一些情况，我随同家人到过许多国家，在那里，我总能同一些伟大的传统主义者交往。因此，当我父亲不得不住在布古尼时，我结识了伟大的班巴拉人多马丹福·西内，后又结识他兄弟拉蒂夫，科莱尔也跟随我们到了那里。

后来，在巴马科和卡提，我父亲提德雅尼的朝廷实际上得以重建，各国传统主义者蜂涌而至，他们了解在那里可以会见其他知识大师，同这些人在一起，不仅能检验，甚至能增进自己的知识，因为人们总是能找到比自己更有学问的人。

就在这里，我开始听到大量关于马西纳富拉尼帝国的历史传说，我既听取马西纳克人(即站在塞古·阿马杜家族一边原籍为马西纳的人)的叙述，又听取他们的对立面图库勒人的叙述，还听到了其他种族人的叙述(班巴拉人，马尔卡人，萨拉科尔人，桑海人等等)，他们或者参与其事，或者是目击者。

在个人有充分准备之后，我开始系统地搜集材料。我的方法主要是，首先将各种传说全部记录，而不论其真伪，其次，将马西纳克人的传说同图库勒人或其他有关种族人的传说加以比较。在每个地区都可以发现一些集团，他们的传说可以检验那些当事人的叙述，因此总可以进行比较。

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搜集材料花去我15年。搜集材料意味着旅行，我从富塔贾隆(塞内加尔)旅行至卡诺(尼日利亚)，走过塞古·阿马杜和哈吉·奥马尔当年旅行过的全部路线。

就这样我记录了至少一千人讲述的传说，最后，我仅保留那些说法一致的陈述，即不仅同马西纳克人和图库勒人的传说，而且也同其他有关人的传说相符合的陈述(这些资料在我书中已予引用)。

我发现，整个说来，这一千位陈述人尊重了事实真相。历史的主线处处相同。分歧仅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这主要是由于陈述者的记忆或特殊的心理。陈述人可能倾向于将某些失败减至最低限度，或为失败寻找一些理由，这要看他所属种族集团而定。但是，他不改变基本事实。一个故事讲述人，在乐器伴奏影响下，可能有点为热情所左右，但事

196

---

[17] A. 哈姆帕特·巴和J. 达热(J. Daget)，1962年。

件的基本轮廓仍然不变，如地点、战争、胜败、会议和谈判，以及主要人物所述事情等等。

这番经历向我证明，从学者的观点看，口头传说也完全是有根据的。不仅可能将不同人的叙述加以比较，进行核查，如我所做，而且社会自身就进行着永恒的自我检验。陈述人不允许自己改变事实，因为在他身边总会有伙伴或长者，他们会立即指出错误，当面骂他是说谎者——一条严重违法的罪状。

正如我在《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一书中提到的，蒙泰伊教授曾向我讲过一些传说，这些传说是他父亲早在50年前搜集的，现在只字未变。这说明口头传说所保存的材料忠实可靠。

非洲人记忆的特点

在世界各民族中，不会书写的人的记忆力最发达。

我已举出家系学家的例子，他们记忆的材料，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也可以举出某些文盲商人为例(我现在还认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进行的交易可能涉及几千万法郎，外出旅行时，贷与许多人款项，这些货物和金钱的全部变动总是最精确地存在他们的脑海中，完全不用填写票据，而又无丝毫差错。

象给留声机片灌音一样，应予记忆的材料一举便铭刻在传统主义者的记忆中，它全部继续留存脑海，永远可资利用。[18]

非洲人记忆的特点之一在于，象从头至尾地放映一部影片一样，它**完整地**复活存留的事件或故事，并且再现其发生**现场**，使人身临其境。这不是记忆问题，而是把过去的事件**引入现场**，让每人——故事讲述者和听众，都参与其事。

故事讲述人的全部艺术就在这里。一个人除非能把事件描绘得原原本本，栩栩如生，使听众同自己一样，成为事件的活着和积极的新证人，否则就不能成为故事讲述人。现在每个非洲人都可说是故事讲述人。一个陌生人到达一个村庄时，有礼貌地说："我是你们不认识的人！"村里人回答说："房门为你敞开。安心进去吧！"然后他们说："把新奇的事告诉我们。"接着，陌生人便采用让听众踏上旅途，同他一起再作一次旅行的方式，讲述离家以来的全部经历：他的旅途见闻，以及经历的事情等等。故事的时态总是现在时，原因就在这里。

200

概言之，非洲人的记忆记下了史实的整个实况：环境、人物及其言谈，甚至衣着，直到细微末节。在图库勒人的战争传说中，我们知道了伟大的英雄奥马雷尔·唐多，在一次约定的战斗中，用何物装饰其所穿的"布布"；他的马伕是谁，由何物所变；他的坐骑名称，由何物所变，等等。所有这些细节给传说增添色彩，使故事场面生动感人。

---

[18] 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一事实有关，即过去人的感官使用最多的部分最发达，在现代生活中人的感官有所萎缩。例如，传统的非洲猎人能听到和辨别几公里外的响声。他的视力特别敏锐。有些人象占卜者一样，能"认识"水而无须魔杖。沙漠里的图阿雷格人对方向有近乎奇迹般的辨别力，等等。然而为噪音和知识所包围的现代人，其感官逐渐萎缩。医学证明，城市居民的听力越来越差。

传统主义者不能对故事加以概述，或者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对事件加以概括，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要求他扼要讲述一件事，这对于他就等于抹煞事实。根据当时的传统，他无权这样做。对画面的真实，每一细节都有其重要性。对于故事，要么全部讲述，否则全不讲述。对这类要求，他会回答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听，我改天再讲。"

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怕重复。也无人对用同样词藻讲述同样故事感觉厌倦，因为他也许已经把故事讲过许多次。每一次，整部影片都重新放映。复活的事件展现眼前。过去的事变成现在的事。活生生的事实不应加以概括。如果为了孩子，人们最多压缩某些段落，长话短说，而对它也就不能信以为真。对于成年人，人们必须讲清事实原委，否则拒绝讲述。

传统的非洲记忆，热中于口头传说，它的上述特点本身就是传说真实性的保证。

至于传统主义者，特别是多马－传统主义者或那些精于多方面传统知识的名人，其记忆是一座真正的图书馆，各种案卷未予分类，但有全部目录。

对于现代人的思维，这是紊乱，但对于传统主义者，如果存在混乱的话，它只是象水分子一样，在大海里相互混合而形成有生气的整体。在这里，他们就象鱼一样游泳自如。

口头传说在编目上难以把握，可将它分为格言，谚语，故事，传说，神话等类别。这可能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大类，或者是新旧训导故事的专题登录。例如，各种故事，特别是秘传的故事，都有永远一致的主线，但讲述人可以给故事增添文彩，予以发展或加进适合听众智力的教导性内容。神话也如此，它是具有综合形式的各种知识的纲要，为了学生，传授者可能对它总是精心推敲或深入钻研。

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神话的内容，且莫急于为它编目。神话中常常隐匿着种类极不相同的各种现实，有时甚至可以同时从几方面予以理解。

201

某些神话提到秘密知识，甚至经数世纪传下来，传授者讲述的内容仍被掩盖，与此同时，另一些神话可能反映同实际事件的某些关系。以神话中的富拉尼蛇神锡阿纳巴为例，传说追溯它从大西洋至整个非洲草原地带的历险和迁徙。负责修建桑桑丁坝的工程师贝利姆从伟大的富拉尼博学之士哈马迪·迪昂古多处得知这一传说。大约 1921 年，他因好奇而追踪传说中的地理线索。结果，奇怪的是，他发现了通向尼日尔河旧河床的路径。

结　论

对非洲来说，当今的时代是错综动荡的时代。在非洲，不同世界，不同心理和不同时期交迭，互相干涉，有时互相影响，却总是不能互相理解。二十世纪与中世纪衔接，西方世界同东方世界并存。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笛卡尔主义从全人类都实行和体验过的万物有灵论旁边轻轻擦过。

现在的年轻领袖们执掌政务所依据的法律或意识形态的心理类型和体系，直接继承自外国模式，外国民族，以及依靠不同法律和心理类型的国外现实。例如，在前法属西非的大部分地区，正式法典是紧接独立之后，由我们那些刚毕业于法国各大学的年轻法学家制定的，它纯粹只是拿破仑法典的抄袭。结果是，一向由继承祖辈的、曾保证社会和谐的神

圣习惯所支配的人民并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却凭另一种习惯之名对他们进行评判和非难，而这种习惯不是他们固有的，他们不熟悉，而且与国家的各种基本事实也不相符。

我将称之为"基本非洲"的整个戏剧就是，非洲常常被不再理解它的少数知识分子所统治，统治的原则与它是矛盾的。

新的非洲知识阶层，受西方大学纪律的熏陶，对于他们，传统常常不再存在。传统即老人的故事！但是必须说明，现在仍有许多有教养的青年，为探寻自身根源及其最深处的秘密，日益感到迫切需要研讨祖先传统并吸收其基本精义。

相反，在远离大城市——西部的岛屿——的"基本非洲"，传统仍然富有生气，正如我所指出的，仍可找到许多传统的代表或其存留者。但是能维持多久呢？

202 事实上，传统非洲的巨大问题就是**传统的传播的中断**。

在前法属殖民地，1914年的战争引起传统传播的第一次大中断。大多数青年应征入伍，在法国作战，许多人从此再没有回来。这些青年离开故土之时，正是应该经历伟大秘传并在长者指导下加深所得知识的年龄。

重要人物必须将儿子送入"白人学校"，目的是把他们同传统割断，这一事实也促进了传统传播中断的过程。殖民政权的急务是，尽可能清除当地传统，播下自己思想概念的种子，以取而代之，这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世俗或教会学校，就是这种破坏工作的主要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的年轻人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使这一过程趋于完成，创造了一种真正的文化移入现象。

秘传逃离大城市而潜入丛林，由于大城市的吸引，各种新需求的引诱，在丛林里，"老人们"发现听取他们传授的"温顺耳朵"越来越少。因为俗话说，教诲只能由"甜蜜的嘴巴给予恭听的耳朵"(接受力敏锐的耳朵)。

因此，对于口头传说及其包含的全部内容来说，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后一代伟大的存留者。以后10年或15年内，搜集口头传说的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原因正在这里，自此之后，非洲文化中最末一批活生生的伟大纪念碑将消失，一种不可取代的特殊教育——既是物质的、心理的，又是精神的，它基于对生命统一的感知——的宝库将随同他们而消失，它的源泉就会被抛弃在时代的迷雾里。

为使这项伟大的搜集工作获得成功，研究工作者必须有巨大耐心，必须记住：一定要有"鸽子的心灵，鳄鱼的皮肤和鸵鸟的肠胃"。有"鸽子的心灵"，是要永不激动或发怒，即使对你讲了不愉快的事。如果人们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你就不必坚持要他回答，你最好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里的争论在其他地方也会引起反响，因此小心谨慎地离开会使对方感到悔恨，往往会使他把你召回。有"鳄鱼的皮肤"，是要在任何地方，任何东西之上，都能全然躺卧，而不紧张急躁。有"鸵鸟的肠胃"是要使你能咽下任何食物而不嫌弃或生病。

但是，全部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工作者必须抛弃按自己标准判断一切的习惯、为了发现新世界，必须忘掉自己的世界，否则只能带着自己的世界走路，而不能"耳聪目明。"

203 受过秘传的年老人的非洲，通过班迪亚加拉哲人蒂埃诺·博卡尔之口，告诫年轻的研

究工作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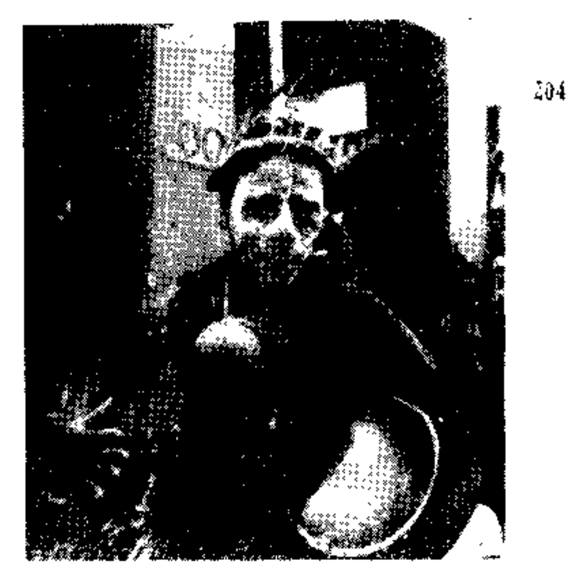
倘若你想知道我是谁，
倘若你想取得我所知，
暂且休论你是什么人，
还要忘却你所知道的。

（罗建国译）



照片8.1 瓦利哈演奏者。乐器是木制的，带有钢弦(人类博物馆)

204



照片8.3 模仿已故"姆瓦米"的"民间歌手药医"(B.南泰)



照片8.2 姆维特衣手(法国文献)

205



照片8.4 演奏"阿尔丁"的图库勒乐师(卡耶，马里，号码AO-292)

206



非洲考古中应用的自然科学技术

Z. 艾斯坎德

引　言

考古学家每当发现一件器物，总是先用纯粹考古的方法加以研究，例如记录它出土的层位，辨认它上面的图案文字，描绘它的形状，度量它的大小等等。随后将这些材料进行地层学、语言学、类型学的研究，有时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考古资料，象它的年代，起源等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家可能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回答他的问题或者帮助他从现有材料中得出任何结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对器物进行科学分析，借以了解关于它的质地、起源、制造技术、年代、用途等有价值的资料。但要强调，这种分析研究，只能认为是考古学家可以据以处理某一问题的另一种尺度；这种科学证据应该同文体、语言、地层等其他方面的情况一起考虑。①

有助于考古学的其他科学技术还有：对地下考古遗址不加发掘而进行现场调查的技术以及对出土文物和遗迹的保护技术。

所使用的科学技术适用于一切考古学，既适用于欧洲、亚洲或美洲的考古学，也适用于非洲考古学，只是有时候应用的方法不同。这个题目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因此这里只对下列项目作一般性的叙述而不详细介绍实验情况：

（1） 考古计量学中使用的分析技术
（2） 考古计量学分析研究的目的
（3） 断代技术
（4） 考古勘测技术
（5） 文物保护技术。

207

考古计量学中使用的分析技术

分析技术增加了很多，以致有时难以决定对一件标本使用哪一种技术才能取得所需要的资料。下面谈谈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

① E. T. 霍尔(E. T. Hall)，1970年。

分析方法的选择

考古标本之所以特别可贵有两个原因：第一，可供使用的标本的数量常常极少，甚至可能还不够做一次全面分析，而且要是用完了就可能再也没有第二份。其次，必须保留一部分样品以便将来参考或展览。因此，必须十分慎重以保证从一次考古计量分析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选定分析方法的准则可简述如下：②

可供取用的物质

如果可供使用的物质相当多，那么确定标本主要成分元素百分比时最好用湿化学分析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最精确。原子吸收分析适用于确定钠、钾、锂等碱金属的百分比。但是，对于痕量元素和化合物，则以使用X线荧光分析和X线衍射分析比较好，尽管它们的结果可能有10～20%的误差。

如果可供使用的标本的数量很少，而且要估计的元素却有几种，那么最好使用分光测光法或X线衍射法。如果考古学家连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物质也不想给，那么，可以用发射光谱测定法或X射线荧光分析，但实物的大小和形状必须适合所要使用的仪器。

要分析的物质的种类

考古物质的种类繁多，有的全部或部分是有机物，例如食物、油膏、树脂、油、蜡等，有的是无机物，如金属、颜料、陶器、玻璃、灰泥等。有机物通常可用燃烧、皂化作用、溶剂萃取、红外线鉴定、热分析或色谱分析的方法。无机物可用普通的湿化学分析、发射光谱测定法、X线荧光分析、X线衍射或中子活化等方法，根据所需要的资料而定。

所需要的资料的种类

208

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必须和考古学家合作，按照周密的计划进行分析来解决具体问题。譬如，古代的纯铜和青铜，看起来很相似，要加以区别只要检验一下锡的含量就可以。通常用浓硝酸浸润一小部分样品，然后用蒸溜水稀释，有白色偏锡酸沉淀析出就是青铜。这种试验甚至考古学家自己就可以做。还有，埃及曾一度在釉陶上用过铅矿物质，所以，只要检验一下铅就可以大致推断釉陶的制作年代。

分析结果的提出

研究科学考察的成果并利用这种成果进行评价和得出结论的考古学家本人往往不是自然科学家，所以应该用容易了解的方式提出考察成果。例如，不要用每100克标本中某一

② E.T.霍尔，1970年。

组成的克当量表示成果；所有成果都用百分数表示，那比较好，这样他们一般都能明白。此外，这样也便于对各种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

检查和分析的方法

根据上述考虑，现列出考古计量学中最常用的几种分析技术如下：

显微镜观察

若要对古代器物或制品有一个初步印象，用一个简单的放大镜（10×或20×）观察常常很有用。更好一点的设备是双目型放大镜，放大倍数为7×、10×或20×，物镜和聚焦面之间有较长的操作距离，因为操作距离较长可以看到凹坑的底部，而用放大镜则无法进去。

为了得到更加清晰的印象，可以用多镜头显微镜观察标本，放大倍数为100×、200×、400×和1,250×并用油浸。显微镜观察可用于以下几种目的。

（a） **鉴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显微镜观察标本组成的颗粒大小或结晶形式就可以鉴别该标本，不管是纯的，还是由多项混合物组成的。

（b） **定性分析**：这种技术目前可用来观察标本的一小部分上的沉淀，溶解，气体发209 生物以及其他种种过程。③ 例如，把一小块标本放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水，观察它是否溶解。如果在此溶解液中加上一滴硝酸银，形成一种不溶于硝酸的白色沉淀物，这表示有氯离子。

（c） **定量分析**：用显微镜对复合的多项混合物作定量分析特别有效，这在一般化学方法是做不到的。④ 通常的做法是计算粉末标本中不同成分的数量并确定颗粒的大小。只要知道每种组成的密度，混合物的组成体积百分数就能转算成相应的重量百分数。⑤

射线照相

射线照相对检验艺术品十分重要，可用以测知一具包着的木乃伊里面，例如：是否放有什么器物，或者在腐蚀层下面是否放有什么装饰品。了解这些，对于决定下一步打开木乃伊包裹物或保护金属制品等采取正确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对开罗博物馆中一些帝王木乃伊作X射线照相后发现，即使是已经剥去包裹物的木乃伊还藏有珠宝饰物，这些珠宝饰物过去未被发现，因为它们藏在厚厚的树胶层下面⑥（照片9.1）。

比重测定

古代的金子一般都含银或铜。金器十分宝贵，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从中取样进行分

③ G. W.尤因(G. W. Ewing)，1954年，第411页。

④ E. M.夏莫(E. M. Chamot)和C. W.梅森(C. W. Mason)，1938年，第131页。

⑤ I. M. 科尔索夫(I. M. Kolthoff)，E. B.桑德尔(E. B. Sandell)，E. J. 米汉(E. J. Meehan)和S. 布鲁肯斯坦(S. Bruckenstein)，1969年。

⑥ J. W. 哈尔彭(J. W. Halpern)，J. E. 哈里斯(J. E. Harris)和C.巴恩斯(C.Barnes),1971年，第18页。

析的，即使很小一块都不行，所以卡利想到用比重测定的方法，完全不必破坏器物就可以得出艺术品含金量的百分比。⑦这个方法很容易，利用阿基米德原理就可以。如果器物在空气中重量为W克，在水中重量为X克，则其具体比重等于$\frac{W}{W-X}$。

因为金的比重(19.3)几乎是银(10.5)或铜(8.9)的两倍，所以少量的含银或含铜量也可以测出。假定合金中不含铂，组成确定(是银或铜)，其中也没有发现填料，则测定金含量的误差在1%量级左右。

普通的湿法化学分析

210

这些方法对于考古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可用以研究艺术器物的成分以及确定适当的保护方法。它们通常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灰浆、灰泥、金属制品的锈蚀产物、食物、化妆品、防腐材料残渣等。

这类分析方法的详细内容不在这里介绍。所有在考古领域中工作的化学人员对此都很熟悉。具体细节在一些分析化学教科书中讲得很详细，如科尔索夫等关于无机物的著作，⑧艾斯坎德⑨和斯特罗斯⑩关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著作等。在尼亚尼(几内亚)发现的铁器，断代在十三－十五世纪，化学分析证明它含有铜，磷，镍，钨，钛和铝，这可能是因为当年使用的矿石原料不纯。⑪

发射光谱仪

这一技术用于分析古代青铜器、陶瓷、灰浆、颜料等。发射光谱与其他迹量分析方法比较之所以特别有用有下述原因。一般说来灵敏度比较合适；测知大部分元素的比例较高(可达20%)。此外，标本中全部元素的含量比例可以一次曝光把谱线摄录在同一张照相底片上，成为随时可以参考的永久记录。"激光毫针谱仪"⑫的发展使光谱分析增加了一个新方法。自然主义的尼日利亚伊费"青铜器"经光谱分析发现，它们是由黄铜制成的而不是由青铜制成的。⑬

原子吸收分析

这个方法适用于任何无机物质样品，如金属、水泥、焊料、玻璃、釉、盐等，它在考古计量方面的优点是只用5到10毫克标本就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精确度(约1%误差)：标本中大量、少量、迹量元素都可用同一份样品测出；而且，它是一种标准技术，实验室之间可以可靠地进行相互比较，因为实验误差的各种根源比较容易控制。⑭

211

⑦ E. R. 卡利(E. R. Caley)，1949年，第73-82页。

⑧ I. M. 科尔索夫、E. B. 桑德尔，E. J. 米汉和S. 布鲁肯斯坦，1969年。

⑨ N. 法拉格(N. Farag)和艾斯坎德(Z. Iskander)，1971年，第111-115页；Z. 艾斯坎德，1961年；Z. 艾斯坎德和A. E. 沙欣(A. E. Shaheen)，1964年；A. 扎基(A. Zaki)和Z. 艾斯坎德，1942年。

⑩ F. H. 斯特罗斯(F. H. Stross)和A. E. 奥唐奈(A. E. O'Donnell)，1973年，第1-16页。

⑪ A. 马泽(A. Mazur)和E. 诺塞克(E. Nosek)，1974年，第90页。

⑫ E. T. 霍尔，1970年。

⑬ F. 威利特(F. Willett)，1964年，第81-83页。

⑭ A. E. A. 沃纳(A. E. A. Werner)，1970年。

X射线荧光

用X射线激发样品也是一种很有用的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高能X射线轰击原子时，内层轨道上的电子移位，而新生空位被外层轨道上的电子填补；内外层间能量差别表现出标本各组成元素的次级X射线或荧光X射线的特征。[15] 由于X射线穿透深度有限，所以只能用于研究物体的表层，因而只适于分析玻璃、彩陶和陶釉、火山岩以及大部分石头。但是，古代金属器物由于较活泼的金属部分地移向表面，中部贵乏，因此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器物的表层分析同整体分析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16]

中子活化分析

这一技术是将一组样品和已知化学组成的标准样品一起放入核反应堆内，用热中子照射。产生的几种同位素将具有适当半衰期并将放射出γ射线。因为每一种放射性同位素的γ射线都具有该同位素特有的波长特征，分析这些射线就可以使我们鉴别样品中所存在的元素，并能测定主要元素和迹量元素的浓度。

中子和γ射线的穿透能力比X射线大得多，可以分析较大厚度的样品，因此可能忽略金属的铜化作用。[17]

然而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牢记，如果样品要送回博物馆，那么剩余放射性必须在适当时间内减到低水平。例如，放射性银有一个半衰期为225天的同位素，如果对银器辐照剂量太高，那么几百年之内都不能把它送回博物馆。[18]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标本在一小圆片糙面石英上擦一下，取下少量银，然后将这个带纹理的石英放入反应堆内照射，按常规分析银、金、铜、锑、砷。

212

最近这种方法已应用于研究非洲出土的古玻璃珠，把它们作两次中子活化分析，第一次照射时间极短，照射后立即分析样品的短寿命同位素。第二次照射强度大，持续八个小时。搁置几天后，分析中等寿命的同位素，然后再放些时间，分析长寿命的同位素。[19]

塞尔和迈耶斯[20] 研究了这种技术在考古计量学中的许多次应用。

考古计量分析的目的

考古计量学中科学研究和分析的最重要的目的如下：

---

⑮ I. M. 科尔索夫，E. B 桑德尔，E. J. 米汉和S. 布鲁肯斯坦，1969年。
⑯ E. T. 霍尔，1970年。
⑰ 同上。
⑱ 同上。
⑲ C. C. 戴维森(C. C. Davison)，1973年。
⑳ E. V. 塞尔(E. V. Sayre)和P. 迈耶斯(P. Meyers)，1971年。

确切鉴别物质

要准确地描绘古代器物，就要正确地鉴定它，因为往往只有确切知道它的物质组成的性质，才能对它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很遗憾，在较古老的考古文献中鉴定的错误屡见不鲜，以致引起许多混乱。虽然青铜的发现和使用标志着一次文化革命，但有时纯铜和青铜被人混淆。青铜有时又和黄铜混淆，因此在器物断代上就会得出错误结论，因为第一次出现黄铜是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中期，而青铜的问世和使用要比黄铜早 2,000 年。[21]

因为大多数鉴定错误是出于相信直观，所以必须强调，一定要根据化学试验或射线衍射分析鉴别古代物质，这样才能避免错误的解释。

对不认识的古代文字进行翻译

有时借助精确的鉴定来阐明不认识的文字的意义。例如，埃及萨卡拉的霍尔阿哈王（第一王朝，大约我们纪元前 3100 年）的坟墓中出土了两个罐子。每个罐上都写着象形文字 seret，不明白它的意思。化学分析发现罐里盛的是乳酪，由此推断 seret 的意思是"乳酪"。[22] 213 另一个例子是，某些石像上写着象形文字 bekhen。因为这种石头在另外场合被鉴定为灰瓦岩（硬砂岩），而这个字在原文中同哈马马特干河连用，所以断定 bekhen 的意思很可能是哈马马特干河的灰瓦岩。[23]

查明物质的来源

如果发现一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是由非本国的材料制作的，那么，它们显然是经过通商输入的。如果能确定这种物质的产地，通商的途径也就能确定。例如，大家知道，埃及是不产黑曜岩的，然而早在前王朝时期（我们纪元前 3100 年以前）埃及就使用黑曜岩了。检验了一些用这种黑曜岩制成的器物，并同邻国发现的黑曜岩比较，结果发现同埃塞俄比亚的黑曜岩很相似，由此推断：它是由埃塞俄比亚输入的，而且这两个国家很早以前就有了通商关系。[24]

用中子活化或X射线荧光来确定陶器中痕量元素也是研究当地或各国间的通商途径的一种方法；[25] 而铜矿和铜制品中的痕量混杂物也有助于了解制品与它所使用的矿物品种之间的关系。[26]

通过测定古代铁制品中的镍，可以肯定它是陨铁还是人工制铁，因为陨铁的含镍量总

---

[21] E. R. 卡利，1948 年。
[22] A. 扎基和艾斯坎德，1942 年。
[23] A. 卢卡斯(A. Lucas)，1962 年，第 116、419-420 页。
[24] 同上。
[25] I. 珀尔曼(I. Perlman)和 F. 艾萨罗(F. Asaro)，1969 年。
[26] P. R. 菲尔兹(P. R. Fields)，J. 米尔斯特德(J. Milsted)，E. 亨里克森(E. Henricksen) 和 R. W. 拉梅特(R. W. Ramette)，1971年。

在4－20%以内。作者用发射光谱分析检验了著名的图坦卡蒙铁匕首，发现其中含镍相当多，因而证明此铁就是陨铁。

弄清使用物质的目的

有时很难知道为什么要使用某种物质。在这方面，化学分析大有帮助。例如，1956年在埃及法尤姆发现的尼弗尔普塔(约我们纪元前1800年)的墓中有一只很大的乳白瓶，里面装了2.5公斤奇特的物质。经化学分析，其主要成分是48.25%方铅矿(天然硫化铅)和51.6%树脂，就是说方铅矿和树脂几乎是1∶1。这种组成以前从未发现过，所以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在墓里。可是参考埃伯斯纸草书中所列处方，发现其中402号处方指出："消除双眼出现白斑的另一处方是黑空尔〔方铅矿〕和克特－瓦〔树脂〕磨成粉，放进双眼"。根据此书所述和瓶中物的化学组成，可以推断：这是一种治眼的药，因为尼弗尔普塔有一目或双目都患眼膜白斑病，所以准备了大量的这种药物供她永世使用。㉗

确定古代技术操作的详细过程

通过科学方法检验古物，可以了解古代人在化学工艺和工业方面运用的技术。以下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埃及蓝的制作

至今已用化学的、显微镜的、X射线衍射仪的方法检验过这种蓝颜料，并且通过实验，复制了类似的蓝色玻璃料。这些研究证明：埃及蓝是古代用沙或石英粉、石灰粉、孔雀石和食盐或天然碱助熔剂等一组混合物加热到840°C制成的。㉘

金属制品的显微镜检验

金属制品的金相检验可以显现出它们是铸造的还是锻造的，或是两者兼用的。例如，1954年在吉萨大金字塔后面的奇阿普斯殡船中发现的铜钩环，经过金相显微照相检验显示，金属具有分裂的树枝状特征(照片9.2)，因而证明它是锻造成形的。㉙

检验防腐剂残渣

对埃及赛加赖、卢克索和迈泰里耶发现的防腐剂残渣样品进行分析后证明，它们含少量固体脂肪酸皂，是制作木乃伊时尸体脂肪受天然碱作用而皂化所形成的。由此可以推论，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在把尸体放在制作木乃伊的台上用大堆天然碱盖没使之脱水之前，使用这种物质来暂时填塞体腔。㉚

㉗ N.法拉格和Z.艾斯坎德，1971年，第111-115页。
㉘ A.卢卡斯，1962年，第416，419-420页。
㉙ Z.艾斯坎德，1960年。
㉚ Z.艾斯坎德和A. E.沙欣(A.E. Shaheen)，1964年。

熔化玻璃的坩埚

对奈特龙洼地玻璃工场遗址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古罗马时期埃及制造玻璃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玻璃料，方法是将硅土石英、碳酸钙和天然碱或植物灰(或两者都用)混合放在一个特种坩埚里即熔化坩埚内加热到略低于1,100°C、制造这种坩埚的粘土中含有很高比例的砂和切细的禾秆。这种混合物焙烧后成了多孔的陶器。古代玻璃匠人显然有意使之具有多孔的这一特点，这样便于他打碎坩埚取出玻璃料块(照片9.3)。因此这种坩埚只使用一次。

第二阶段是制作各种颜色的高质量玻璃。料块磨成又细又匀的粉末，分成小份。在每份粉末料内加入一定的氧化染料、遮光剂或退色剂，重新加热直至完全融化，以便得到所需要的那种玻璃。㉛

检验真伪

多少年来鉴别古物真伪只能靠历史探讨和美学探讨的办法。近年来由于科学检验取得了很大进展，已有可能比较确切地判断器物的真伪。鉴别真伪最有效的科学方法有以下几种：

紫外光鉴定

这种技术对鉴定象牙和大理石特别有用。不同的大理石在紫外光照射下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古代大理石的表面通常有一种特殊的荧光色彩，与新开采的同类石头的荧光色彩大不相同。根据同样道理，一件古代的大理石或象牙制品，或绘画，其变动部分或修补部分在普通光线下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放在紫外光下检验，就看得特别明显。同样，红外光和X射线在检测伪造品方面也很有用。㉜

鉴定表面锈蚀层

古代金属总是逐渐锈蚀，经过一段时期形成一层紧贴表面的锈蚀层或硬壳。金属伪造品表面总有一层人工锈蚀层，使它显得古色古香，但这一层比较松散，可以用水、酒精、丙酮或吡啶等溶剂把它除去。此外，对于纯铜和青铜制品，这种人工锈蚀层大都只有一层，很容易同自然形成的表层区别，因为自然形成的表层至少有两层，内层是红的氧化铜，外层是绿的碱性碳酸铜，或酸性硫酸铜或氯化铜。这样的组成无论怎样刻意模仿也欺骗不了考古博物馆中有经验的化学家。 216

分析器物的质料

这个技术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对古埃及釉陶坯的分析。真正的古埃及釉陶坯是石

㉛ S. A. 萨利赫(S. A. Saleh)，A. W. 乔治(A. W. George)和F. M. 赫尔米(F. M. Helmi)，1972年。
㉜ E. R. 卡利，1948年。

英玻璃料，而现代的釉陶仿制品的体坯常常是高岭土或瓷土，因此能又快又可靠地检验出真假。再举一个例子，古代金属都含一定杂质，如砷、镍、锰等，因为古代冶金术尚未达到精炼金属的程度。所以，从制品上不显眼的地方取一小块标本，用中子活化或X射线荧光加以分析，如果不含这类迹量元素，那么器物很可能是伪造品。

鉴别绘画上的颜料和稀释料

使用微量化学分析技术可以相当精确地鉴定绘画用的颜料。只要验出有近年发明的颜料，那么画就是伪造品。例如，扬在鉴定一幅据称是十五世纪的侧身肖像时验出其中蓝色颜料是合成群青，而群青的发现和作为颜料使用不会早于十九世纪。白色颜料是1920年以后才使用于绘画的氧化钛。因此这幅绘画肯定是伪造品。[33]

检验表面的氧化层和光泽

大多数石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表面就有一层氧化层或漠境漆皮。这是由于铁盐和锰盐移向表层，以氧化物形式沉积在表面，形成一种外壳或结皮。这种结皮紧贴表面，成了石头的一部分，不容易用中性溶剂洗掉或刮去。因此，新砍的石头表面，即使有人工制造的结皮，也能与年久的陈旧表面区分开来。

除了自然形成的结皮以外，根据古时的切割和磨光的特点也能分辨真假，因为古人切割时不用粗锉刀，也不用细锉刀或金钢砂纸抛光，而留下不规则的交叉线条，在石头或金217 属表层下面仍能看出来，这同近代抛光的有规则的平行条纹很容易区别。

测试陶器的热释光

在陶器上以及埋藏它的土壤中，都含有极少量的放射性元素，它们放射定量的射线，几千年来在陶器内形成电子积累。这种陶器加热到500°C以上时，积累的电子就以热释光形式释出，光量大小随陶器年代长短而不同。因此热释光方法为博物馆工作人员鉴定陶器真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在被测试样品的不显眼地方钻一个小孔，取出些粉末样品，蔽光条件下加热到500°C以上，如果发出热释光，陶器是真的；如果没有，就是假的。[34]

断代技术

科学为判断古器物年代提供了多种技术。在这方面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有：

用考古计量分析方法粗略断代

分析同一种类但已知年代不同的样品，例如灰浆、玻璃、瓷器、金属和颜料等，所得结果可以为其他未知年代样品粗略断代提供线索。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

[33] W. J. 扬(W. J. Young)，1958年。
[34] M. J. 艾特肯(M. J. Aitken)，1970年。

利用分析技术为西非玻璃珠断代

双色“阿柯里”玻璃珠的反射光呈蓝色，透射光则呈黄绿色。用X射线荧光对它进行分析，发现它分成两组，A组含铅量(不到0.05%)和含砷量(不到0.05%)比B组少得多，B组含铅约27%，砷约2%。锰含量也稍有差别(A组为0.3±0.1%，B组约0.05%)。其他测出的元素有铁、钴、铜、锌、铷、锶、锡、锑和钡，但没有太大差别。A组玻璃珠是在西非较老的内陆遗址发现的(我们纪元430－1290年)，B组只在较晚的层位中才发现。所以，在墓地或地层中发现了这类珠子，就能据以大致推断墓地或地层的年代。[35]

通过分析蛋白粘合剂来判断南部非洲绘画的年代

218

将颜料加水分解测定其蛋白粘合剂中氨基酸数目，可以判断绘画的年代。曾用这个方法为南部非洲的133幅岩画判断年代，精确度为20%。布兰德山的“白妇人”有1,200－1,800年之久。林波波绘画的年代在100年到800年之间。德拉肯斯堡绘画的年代在60年到800年之间。能验出的氨基酸数目随绘画年代的增加而减少，5－10年的粘合剂中有10个，1,200－1,800年的物质中有一个。[36]

用分析灰浆的方法断代

分析埃及使用的各种灰浆的结果表明：埃及使用石灰浆不早于托勒密一世的年代(我们纪元前323－285年)。[37] 所以，无论是砖砌的或是石头砌的任何建筑物，凡出现石灰浆的都属于我们纪元前323年以后的。

放射性碳断代

基本原理

宇宙射线轰击上层大气中原子，使之分裂成碎片并产生中子。中子轰击空气中含量最丰富的原子，即质量为14的氮，使之转成原子重量为14的碳原子。新生碳－14是放射性的，与空气中氧结合成$^{14}CO_2$，然后与普通的二氧化碳混合，其中主要成分是非放射性的碳－12和碳－13原子，丰度分别为99%和1%。^{14}C同普通的$^{12}CO_2$和$^{13}CO_2$借光合作用一起进入植物体内形成植物器官。由于动物以植物为食物，因此“所有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都因带少量^{14}C而具有非常微弱的放射性（一万亿个碳原子中有将近一个^{14}C原子）。大气CO_2又以溶解的碳酸盐形式进入海洋，并从中形成所有的贝壳和沉积物，所以它们也都带微弱的放射性。”[38]

古代有机体死亡时，据说同现在有生命的有机体具有同样的放射性。但死亡以后，与

---

[35] C. C. 戴维森(C.C. Davison)，R. D. 吉奥克(R.D. Giauque)和J. D. 克拉克(J.D. Clark)，1971年。
[36] E. 丹宁格(E. Denninger)，1971年。
[37] A. 卢卡斯，1962年，第416、419－420页。
[38] M. J. 艾特肯，1961年。

大气就隔离了，就是说不再继续吸收或交换放射性，碳-14开始衰减，或者象利贝教授所说：
219 “放射性碳时钟开始工作”。[39] 只要测定一下古代样品放射性，并同现代样品的放射性作比较，那么，由于已知碳-14的半衰期，[40] 就可以用放射性衰变公式算出古代样品的年代。

最适合用放射性断代的物质

能用这种技术断代的必须是有机物质，如木头、木炭、骨头、皮革、布帛、草类、食物、贝壳等；但最合适的是一年生植物，如芦苇、谷类、草或麻。采标本时不能用任何化学剂处理，应直接装入玻璃容器或尼龙袋，以避免沾上任何新的有机物质。处理过程通常分四步，即：清洗标本，燃烧标本，纯化 CO_2 气体样品，最后计算放射的粒子。

结果和展望

为了检验这个方法的精确度，对历史上已确定年代的标本同放射性碳年代进行了比较研究。[41] 因为埃及年代学有历史最悠久、年序最清楚的年代序列，所以国际上一致决定测量一长系列的埃及标本的放射性碳含量，这些标本的年代是已经经考古学精确确定的，范围从第一王朝(我们纪元前 3100 年)到第三十王朝(我们纪元前 378－341 年)。这项断代工作由几个实验室同时进行，采用 5568 年和较新的、物理上更正确的 5730±40 年两种半衰期计算年代。这些实验室测试的结果表明，回溯法老塞努塞尔特第三时期，即大约我们纪元前 1800 年，用 5730 年半衰期计算的碳－14 年代与历史年代很符合，但是就年代比这更早的标本而言，两个年代却差别很大。可是将我们纪元前 1800 年以前的标本年代根据斯图维尔－聚斯校正表校正后，就能同考古年代相符，至多差 50－100 年。[42] 例如，从萨卡拉的第一王朝卡亚的墓中出土的芦苇由英国博物馆实验室用放射性碳方法断代为我们纪元前
220 2450±65 年，加上校正因素，得我们纪元前 2928±65 年，这同历史年代我们纪元前 2900 年非常接近。[43] 目前推测，主要偏差也许是由于地磁场的减弱[44] 或者是挡开宇宙射线的太阳风强度的变化。[45]此外，碳－14 半衰期并未完全确定。还有一些原因正在考虑中，许多实验室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如果这些疑问都有了答案，早于我们纪元前 1800 年的标本断代便可以更加精确。到那时为止，对各个时期的古代有机样品作常规放射性碳测量时都必须作上述校正。

---

[39] W. F. 利比(W. F. Libby)，1970年，第 1－10 页。

[40] 碳－14 衰期(放射性减为原有一半的时间)原订为5568 年，后来更为精确是5730±40 年。

[41] R. 伯杰(R. Berger)，1970 年；I. E. S. 爱德华兹(I.E.S.Edwards)，1970 年；H.N. 迈克尔(H. N. Michael)和E. K. 拉尔夫(E. K. Ralph)，1970 年；E. K. 拉尔夫，H. N. 迈克尔和 M. G. 汉(M. G. Han)，1973 年。

[42] R. 伯杰，1970 年；H. N. 迈克尔和 E. K. 拉尔夫，1970 年；E.K. 拉尔夫，H.N. 迈克尔和 M.G. 汉，1973年；M. 斯图维尔(M. Stuvier)和H. E. 聚斯(H. E. Suess)，1966 年。

[43] I. E. S. 爱德华兹，1970 年。

[44] V. 布卡(V. Bucha)，1970 年。

[45] S. Z. 卢因(S. Z. Lewin)，1968 年。

钾-氩法断代

放射性碳断代的年限大约只有70,000年，因此留下的空白时期很长，而生物和地质发展的年代序列可由此一直延伸到一千万年以前。对于这个早期阶段，可以采用测地质年代的放射性衰变方法，如：铀-235衰变为铅-207，半衰期是7亿1千万年，或铷-87衰变为锶-87，半衰期是139亿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空白可以用钾-氩断代技术来填补。[46] 事实上，这种方法多用于测定较老的地质年代，但是若用大量颗粒较小（但不小于100μ）的、只含少量大气氩的标本，就可以应用到比较近的时期，甚至可以同碳-14测定范围交接。[47]

基本原理

目前自然界存在的钾含93.9%钾-39，6.8%钾-41，0.0118%钾-40。地球形成时，钾-40的丰度约为0.2%，但大部分衰变成两个子元素：钙-40和氩-40。因为钾-40的半衰期很长(13.3亿年)，故仍有少量钾-40存在(0.0118%)。100个钾-40原子，有89个衰变成钙-40(β衰变)，11个衰变成氩-40(β粒子捕获)，氩是气体，保留在矿粒之间。[48]

钾-氩断代法之所以能广泛应用，理由如下：

（a） 地壳中钾占重量2.8%左右，是最丰富的元素之一，几乎所有物质中都含钾。 221

（b） 氩-40即使浓度很小也比其他许多元素容易测量。

（c） 钾的半衰期相当长，在地质上感兴趣的阶段内，含钾矿物中会形成相当数量的氩-40。测定放射成因的氩-40的浓度和矿物中钾的总含量，就可以按放射性衰变公式测出矿物的年龄。[49]

钾-氩法断代可解决的问题

近来钾-氩断代法已应用于计算古老骨头中氨基酸消旋的原地一级速率常数。一旦校正了某一遗址的消旋反应，就能利用这种反应测定其他出土骨头的年代。用这一方法推断的年代与碳-14年代完全一致。这些成果证明，消旋法对于确定某些骨头年代是个重要的工具，这些骨头若用碳-14断代不是年代太老就是标本太少。举一个应用钾-氩断代法为人骨化石断代的例子：赞比亚布罗肯希尔出土的一块罗得西亚人的骨化石，经分析初步推测的年代约为110,000年。[50] 对上新世和更新世阶段进行钾-氩法断代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确定人类起源的绝对时标、世界各地化石时代的统一标度、玻璃陨石的起源以及其他特殊地质问题。

---

[46] M. J. 艾特肯，1966年。

[47] W. 金特纳(W. Gentner)和H. J. 利波尔特(H. J. Lippolt)，1963年。

[48] 同上；E. I. 汉密尔顿(E. I. Hamilton)，1965年。

[49] W. 金特纳和H. J. 利波尔特，1963年。

[50] J. L. 巴达(J. L. Bada)，R. A. 施罗德(R. A. Schroeder)，R. 普罗茨基(R. Protsch)和伯杰(R. Berger)，1974年，第121页。

钾-氩法现已应用于测定奥杜瓦伊的玄武岩层和上面覆盖的凝灰岩层年龄，目的是确定在靠近凝灰岩床Ⅰ号底部发现的东非猿人遗存的绝对年代。据库尔特和埃弗登推测，奥杜瓦伊的玄武岩至少已有4百万年，但用来断代却并不可靠，因为所有已加断代的奥杜瓦伊玄武岩薄片显然都有化学变化，只有那些与较老的卵石工具生产有联系的除外。关于测定的结果互有差异这一点，金特纳和利波尔特认为："既然覆盖凝灰岩的年代和玄武岩的年代不存在其他的不一致，东非猿人的年代就可能是2百万年。"[61]

古地磁断代

为了对此项技术作比较浅显的介绍，我们分项说明如下。

古地磁

222

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指对古代遗物的永久磁性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所根据的事实是，地球磁场不断地改变方向和强度。过去50年的观察说明，地磁方向按每年向西0.2经度的速率变化。[62]在测量焙烧过的古代器物和岩石的永久磁性的基础上对古代地磁场变化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过去8,500年间地磁场强度最大的时期约在我们纪元前400－100年，当时场强是目前场强的1.6倍；最小约在我们纪元前4000年，场强为目前的0.6倍。[63]这种方向和强度的效应或变化称为"长期效应"。它有区域性，这是磁性断代的依据，因为焙烧过的陶器中以热剩磁形式留下了地磁场变化的记录。

用于考古断代的热剩磁

为了对烧过以后留在原位的焙烧土进行古地磁法断代，首先必须在要断代的区域内测量已知年代的古建筑，从而确定地磁场方向变化的规律。然后将结果画成曲线，显示该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地磁变化。在知道同一地区的未知年代的焙烧土中录下的磁场方向以后，就可以参考长期变化曲线来确定它的焙烧年代。

最宜于用磁性断代法的标本是至今仍留在原来位置的窑、炉灶和火炉中的焙烧土。因为现在还没有可携带的磁场计用来在原地测定磁场方向，标本还必须移到实验室去用固定的磁场计测试。所以一定要在每个标本上标出它原来的方位，作为它的永磁方向的参考。常用的办法是用熟石膏套盖住标本，注意使顶部表面保持水平，并在标本取出之前在石膏模子水平表面上标出地理正北方向。这样，古代磁场的偏角(D)和倾角(I)都能确定了。[64]应该取六个或更多的标本，以防偶然的差异，最好是从建筑物的各个部位对称地取样。[65]

223

古地磁的D和I的变化规律，英国、法国、日本、冰岛、苏联都已获知。就我所知，非洲还没有用过这个方法。但希望这个方法不久也能在非洲考古断代中应用，特别因为近几

[61] W.金特纳和H.J.利波尔特，1963年。
[62] M.J.艾特肯，1961年；R.M.库克(R.M. Cook)，1963年。
[63] V.布卡，1970年；V.布卡，1971年。
[64] M.J.艾特肯，1970年。
[65] R.M.库克，1963年。

年来它已大有改进。

热释光断代

热释光是物质加热时发射的光，它同红热发光大不相同，是加热物质中以阱捕获电子形式储存的能量在释出时发生的光。

原理

所有陶器和瓷器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铀和钍含百万分之几；钾含百分之几)。另外，周围土壤中也含有放射性杂质，宇宙射线能穿透土层到达埋陶器的地方。它们都放出射线，轰击结晶体(如陶器中的石英)。电离产生电子，电子可能陷入晶体结构中。这些"电子阱"都处于亚稳极限，陶瓷样品加热时，这些阱就消失，多余的能量以光子形式发出。这种光或热释光的强度直接与年代有关。它同陶器中特有的热释光物质及周围环境也有关。[56] 通过测定陶片和土壤中的铀、钍、钾含量，就可以算出陶片每年接受的射线剂量。原则上可用下列关系直接计算年代。[57]

$$年代=\frac{累积辐射剂量}{年剂量}$$

年代精确度和展望

目前绝对精确度达到±10%左右。这比碳-14断代所能达到的精度稍差一些，因为有许多困难，如埋葬条件不清楚以及埋处的湿度不清楚，由于陶片内的放射性同位素，湿度能影响剂量率。希望今后能进一步研究解决这类难题，但是由于各种实际原因，不大可能将精确度改进到±5%以内。[58]

然而，这种技术尽管精度低，却有比放射性碳断代法优越的地方，这就是考古遗址中陶片比有机物丰富得多，而且所测定的年代是陶器烧制的年代，而碳-14在测定木头或木炭时所判断的是树木砍伐的年代而不是用它制作器物的年代。 224

这项技术在埃及将有很重要的应用。对埃及新石器文化和前王朝文化的断代，至今一直主要是按照弗林德尔斯·比特里创始的断代系列，根据这些文化时期的陶器形态特征来确定的。[59] 现在已有可能用热释光断代法来确定这些文化的年代。

在考古勘测中应用的科学技术

在野外勘测利用科学技术的基本目的是希望在发掘之前或者不用发掘就能发现有关地

[56] M.J.艾特肯，1970年；E.T.霍尔，1970年。
[57] M.J.艾特肯，1970年。
[58] 同上。
[59] W.M.F.比特里(W.M.F. Petrie)，1901年。

下考古遗址的情况，以便节省许多时间、精力和费用。考古科学勘测方法包括以下各种技术：

航空照相

这项技术基本上是用来根据几何图形辨认目标，主要应用在两方面：第一，它可以较远距离地观察，从而把各个表面痕迹凑合成较有意义的图形，使人能看到更清晰的图景。[60]因此航空照相能用来辨认哪些区域应予发掘，对整个古代遗迹有完整的了解。在研究埃及卢克索的凯尔奈克神庙的过程中曾用过这个方法。该遗址面积约120公顷。

第二种应用是从农作物特征上显示耕作区域内地下是否埋有古代建筑物。土壤潮湿条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农作物特征。底下土内埋有石墙的作物长势差，显出浅色线条，底下有地下沟的作物肥，颜色深些。从这些痕迹的几何轮廓上能辨认并发掘地下的建筑物。[61]

土壤分析

古代居住集中地区的遗迹和古代墓地通常可以用土壤分析来定位。因为磷酸钙是骨头225和人类其他废弃物质的主要成分，其百分比在居住区和埋葬区自然要高得多。所以可以采用按一定间隔取土样并进行磷酸盐含量分析，找出考古区域的界限。

花粉分析

有花植物的花粉通常由鸟、昆虫和风传播。由风传播花粉的花产生大量花粉粒，其中大部分未经授精而落入土中。通常这些花粉粒都损坏了，但是如果落入泥土或泥炭沼泽等适当土壤中，就会化石化，很容易在显微镜下检查出来。鉴定并查点样品中各种花粉粒，对考古很有用处，因为它可以提供人的遗骸和器物当年的生态环境讯息，对生态环境的了解，又可帮助了解当时的主要生活状态。

但是，只有在花粉谱同基于某种直接断代方法如碳-14断代法的时标相关时，花粉分析才能作为一种断代的技术使用。

关于这一技术的详细情况，见费格尔和艾弗森[62]以及丁布尔比的著作。[63]

电阻勘测

这是考古工作最早使用的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这种技术是将电压通地，然后测量其间的电阻值。电阻值与地下情况有关，与保留在气孔中的水量和可溶盐含量有关。硬而紧密的石头，如花岗岩和闪长石，比粘土土壤的电阻高得多。因此，电阻勘测主要应用在勘探埋在土中的石头建筑和嵌在石头中的土质结构。[64]

正规的勘测方法是将四个金属探针成行插入土中，靠外两个探针间通电流，测量内部

---

[60] R.E.利宁顿(R.E. Linington)，1907年。
[61] M.J.艾特肯，1961年。
[62] K.费格尔(K. Faegri)和J.艾弗森(J. Iversen)，1950年。
[63] G.W.丁布尔比(G.W. Dimbleby)，1963年。
[64] M.J.艾特肯，1961年。

两个探针间的电阻率。只要地下物质相当均匀，所测电阻值大致是深度约等于内部两探针间距离1.5倍的范围内地下物质的平均阻值。[65]

一般来说，电阻率勘测的运用几乎都要划出读数线，保持等距离的接点和间隔以便标出电阻值有变化的位置。通常这些线要连成方格，得出阻值的整个分布情况，埋在地下的遗迹特征就可以从异常读数区显示出来。 226

这种技术，主要由于有些缺点，现在已多少被磁性勘测所代替。其主要特点是勘测速度慢，依赖长期的气候效应，以及除了极其简单的情况外，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解释。[66]

磁性勘测

这是目前考古勘测中最常用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在准备勘测地下遗址的地表面上按点测量地磁强度，然后从测出的磁场变化找出考古现象。它可用来探测埋在地下的铁器、焙烧过的陶土结构，如窑和炉以及石头间的填土坑或埋在土中的石块结构。

地下埋着的铁器能引起很大的磁场变化，其他物质引起的变化则弱得多。因此，探测仪器必须对细小变化非常灵敏，而且要速度快和容易操作，否则这种技术就毫无用处。[67]牛津大学考古学研究实验室成功地研制了一种质子磁强计，可以达到上述要求。[68]它由探测瓶和计数器两部分组成。探测瓶放在木制三脚架上，由一名工作人员在勘测面上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另一名工作人员控制计数器以平面图形式记录读数。判读这张平面图就能鉴别地下考古结构的位置和概貌。[69]已问世的其他形式的磁场有：差分质子磁强计、磁通量闸门梯度计、[70] 铯磁场计、电子自旋共振磁强计。[71] 这些磁场计各有优点，但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最有用的要算是差分质子磁强计。

鉴于磁法既简单又快速，结果也容易解释，因此它比电阻率方法优越。[72]

利用宇宙射线探查埃及金字塔 227

宇宙射线中包含一种带电粒子流，即通常所谓“μ 介子”。这些射线以同等强度，约每秒每平方米 10,000 个 μ 介子，从天空四面八方入射到大地。宇宙射线有很强的穿透力，比X射线强得多。其速度几乎等于光速。

把宇宙射线用于勘查很有用，因为 μ 介子穿透物质时损失能量。损失的能量（或吸收的 μ 介子）与该物质的密度和厚度成比例。宇宙射线穿过时的强度或数量可以用一种通常叫做火花电离室的设备来计数，在金字塔中应用时放在地下室内。介子穿过空穴（或未知的空室或走廊）时比穿过固体石头时慢下来的程度要小些，所以穿过空穴的宇宙射线的强度要大些，用火花室可区分出来。用两个水平放置的火花室，垂直方向相距约 0.3 米，

---

[65] R. E. 利宁顿，1970 年。
[66] 同上。
[67] M. J. 艾特肯，1963 年。
[68] M. J. 艾特肯，1961 年。
[69] 同上。
[70] F. T. 霍尔，1965 年，第 112 页。
[71] I. 舍勒(I.Scholiar)，1970 年。
[72] R. E. 利宁顿，1970 年。

不仅有可能探出隐没的空室，而且还可以标出它的位置，准确到几米以内。然后按所示位置发掘到该空穴或室。

这种方法最早用在探测第四王朝凯夫伦法老的第二金字塔（我们纪元前2600年），数据是用计算机分析的，1969年4月30日发表了结果，指出了两个重要情况。第一，这位法老的墓室不在金字塔基的正中心而在偏北几米处。这一发现与调查结果相符，从而证明用这种技术探查金字塔是有效的。第二，此金字塔的上部二分之一没有任何未知的墓室或走廊。

这种实验必须用其他仪器重复进行，这种仪器要设计得可以探测整个金字塔。记录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个金字塔内再没有任何未知的空穴，这一结论同考古上的估计是一致的。

文物保护技术

本章不准备介绍各种物质制成的器物的保护技术，如陶器、瓷器、玻璃、象牙、骨头、木头、皮革、纸草、编织品、金属等，因为它们种类繁多，需要的篇幅太大。关于它228们的保护方法，可参考专门书籍[63]和期刊，特别是伦敦国际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出版的期刊《文物保护研究》。

在非洲，在文物保护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物质太脆，石建筑极易损坏。

物质太脆

非洲许多国家气候酷热、干旱，许多有机制品，如羊皮纸、纸草、皮革、木头、象牙等制品变得很脆。处理时必须十分小心，以免碰碎。这种器物先要在封闭的湿润系统内存放一段时期，或裹在潮湿的吸墨水纸中，或放在蒸气罐里用蒸气处理一下，使它们全部或部分恢复其延展性，这样才能安全展开或摊开而不致碎成细片。

恢复了延展性以后，这类制品应该放在有空调的博物馆或储存室内展出或保存，保持室温17°±2°C，相对湿度60－65%。如果暴露在干燥气候条件下，它们就会再度变脆。

石建筑的极易损坏

这个重要问题要比较详细地谈谈。

破损的主要原因

造成非洲石建筑严重破损的主要因素有：

（a）　**盐的迁移**　盐碱土壤中溶解的盐类，在有水和湿气时借毛细管作用进入石建

[63] R. M. 奥根(R. M. Organ)，1968年；H. J. 普伦德莱思(H. J. Plenderleith)，1962年；E. 佩多克(E. Payddoke)，1963年；G. 萨维奇(G. Savage)，1967年。

筑。在干旱条件下，这些盐以水溶液的形式由石头内部渗到表面，而在表层下结晶引起表层片粉状剥落。这些效应大多出现在表面上，形成风化，或者在与盐碱土相接的墙脚或柱脚处结晶，苏丹布亨神庙的一些柱脚处就可见到这种情形(照片9.4)。

（b） **严酷的大气作用** 在非洲，气温和湿度的大幅度变化使石头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石头表层因之逐渐风化。

许多地方，尤其是滨海地区，两种破坏因素都有，致使古石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这在利比亚的大雷普提斯和萨布拉塔的罗马神庙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表面处理并不适宜 229

为了加固变质的石头表面，用有机的保护层或无机硅酸盐处理做了广泛试验。结果证明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因为它加速了石头的变质和风化。保护石建筑的国际讨论会曾强调这种试验无效，并宣布加固石头的问题还远未解决，对于这个难题必须小心从事。

国际协作解决难题

鉴于这个问题的难度和严重性，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文物古迹理事会和国际文物保护中心于 1967 年成立了由 10 位石头保护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进行了多次研究，提出了几篇报告，一直工作到 1975 年年底，草拟了一系列标准试验方法来判断石头的变质程度和各种保护措施的效果。

新的希望

卢因教授发明了一种加强石灰石和大理石表面的新方法。[24] 这种方法是用加上尿素(约 10%)和甘油(约 15%)的氢氧化钡(约 20%)的热浓溶液来处理变质部分，这个方法从化学上说是用钡离子置换已损坏石头中的钙离子。这种处理使石头明显变硬，更能抵抗风化因素的作用。因为新形成的碳酸钡和石头本身连成一体而不是形成同内部性质不同的表层，这就有希望使被处理表面不致剥落，并将下面一层保护好不再受风化侵蚀。

1973年 7 月用这一处理技术加固了吉萨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石灰石像颈部的受损表面，一直到写本书时效果仍令人满意，但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至少要十多年后才能报告这种技术对保护变质石灰石的效果。

补救办法

尽管我们对卢因的技术寄予希望，然而必须看到，用化学处理方法保护石建筑的问题仍未解决。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机械处置方法，来保护石建筑不受风化因素的侵蚀。这些方法是： 230

（a） 在户外直接暴露在日光下的石建筑表面不宜用任何保护溶液处理，它会使石头孔隙堵塞，继而使表层剥落。

---

[24] S.Z.卢因，1968年。

（b） 石建筑的基础周围的土壤必须定期用水清洗掉盐分，并由设计良好的排灌系统排水。

（c） 可能时，把石建筑同盐碱土壤隔开，切断可溶盐从土壤渗入石头的通路。可以在雕像、墙壁或柱子等下面铺一块铅板或一厚层铋，起阻隔作用。

（d） 如果石建筑中含有可溶盐，会引起风化或潜在的风化，必须用水洗去这些盐分，并且(或者)用湿的砂质粘土盖在受盐浸蚀的部分，反复几次直到石头变得几乎完全没有可溶盐为止。

（e） 如果石建筑相当小，可以从户外搬入博物馆或其他处所，使它的表面不再因大气作用而变质。另一种办法是将它留在原位，在上面盖个棚舍。

（f） 屋顶漏了必须重修，以保护内部壁画和浮雕，防止直接受日晒雨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因气温和湿度的激烈变化而造成的损坏。

推荐几种修复方法

对器物或建筑处理不当，会引起更大的损坏，甚至完全毁坏，一些国际会议提出过一些有关修复的重要准则，现引述几项如下：

（a） 无论如何不能洗掉或除去古石建筑的氧化层，露出石头原来的颜色。正面的情况应只限于去尘，注意不要触及氧化层，因为那是古石建筑的最重要特征。

（b） 修复古代建筑时，只应把掉落部分重新砌在原来的位置上。应避免置换或添加任何部分，除非需要用以支撑掉落部分或者防止旧表面受气候因素的侵蚀。

（c） 重修时应将石灰浆嵌入石头之间，这样它们的重量就能平均分布，使建筑不致扭曲或龟裂。

（d） 修整墙壁用的灰浆照例要用同原来一样的灰浆(除非原来用的是石膏)。在修整用石灰石或砂石等沉积岩建造的房屋时，最好不要使用水泥。

（e） 无论重修什么建筑，最好使用无盐的石灰－油灰灰浆，因为它延展性好并且多231 孔，在气温变化时石头微有移动也不妨，不会发生扭曲和龟裂。

（f） 至于如何辨别新加石头的表面的问题，以下几种方法值得一提。

（i） 可在新表面同原来石制品垂直表面之间稍稍镶嵌一条边。

（ii） 可用不同的质料，但要修复到原来的尺寸。

（iii） 也可用同样质料，但料块的大小和形状要做得同原来那部分不一样。

（iv） 石头层次和所有接合处可按原来规格排列，但是新砌石块要用不同大小的料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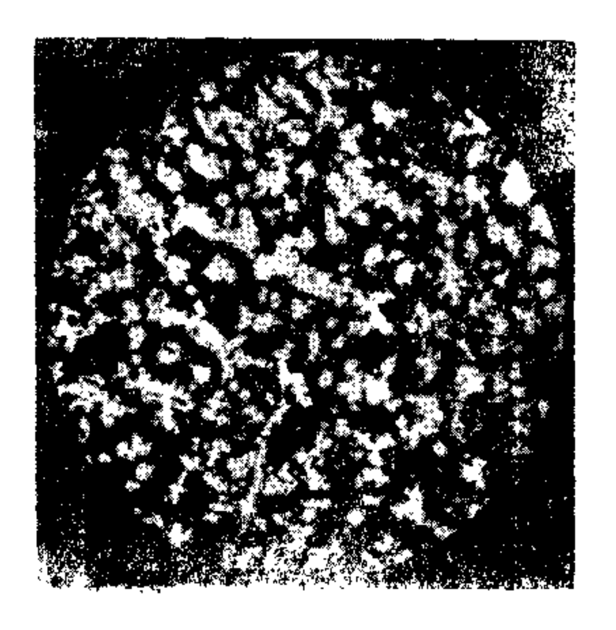
（v） 可在所有新石块上标有修复日期等标记。

（vi） 可在新石头的表面用尖头工具琢出麻点或用刻刀深深刻成一定的几何图形，比较多的是平行的或交叉的线条，这样，同老石头表面就完全不同了。

（仇士华 蔡莲珍译）



照片 9.1 第二十一王朝尼哲美特王后木乃伊前胸部分的X射线照片，显示出一个大的护符宝石和四个小的塑像(代表荷拉斯的四个儿子)在剥开木乃伊包裹物后仍然留在胸腔里(开罗博物馆)



照片 9.2 吉萨的奇阿普斯陵墓出土的[illegible]不截面的缩微照片，显出锻造形成的分裂的树枝状特征



照片 9.3 显出平坦的上表面、侧边和附留在右边的坩埚碎块的玻璃料块



照片 9.4 苏丹布亨神庙一根砂石柱的底部，图示由于风化造成的表层剥落

233

10 历史与语言学

P.迪阿涅

Aada koy demgna woni(富尔富尔德语)

Lammii ay dekkal demb(沃洛夫语)

言语是具体表达历史状况的手段

非洲人认为历史与语言存在着联系。班图人、约鲁巴人和曼德人都有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创见。

实际上，在修昔底德时代以前，一个阿拉伯人或一个希腊人都一定会同意富拉尼人的那句格言：*Hanki koy daarol awratee*（哪里有历史，哪里就有对历史的叙述）。

在非洲的口传中，历史与语言的联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整个口传所依附的历史和语言的看法。

语言和思想常常被认为是一致的，而历史并不被看作是科学，而是被看作知识，被看作生活的一种艺术。

历史旨在认识过去。语言学是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一门科学。历史叙述和历史著作是思想的内容和形式，语言本身则是这种思想的媒介和支柱。

因此很明显，语言学和历史各有其研究范围，各有其具体的课题和研究方法。不过，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至少从两个观点来看是如此。

语言作为一种系统和交流工具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有自己的历史。语言作为思想的媒介，作为了解往事的媒介和作为了解以往学问的媒介，它是取得历史证据的渠道和最重要的来源。因此，这里所使用的语言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包括一个为历史提供至少两类材料的研究领域：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材料；第二类是可以称之为超语言的证据。语言学可以通过思想的证据，某一语言中使用的概念手段以及口头的或书面的证据，来观察人类的历史和他们的文明。

因此，一旦明确这个问题，那么要在研究非洲问题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找到共同点就比较容易了。

语言科学与历史

234

把语言和思想作为研究课题的各种科学都能对历史研究做出贡献，但是，其中某些科学跟历史有更直接的关系。

尽管这种看法经过进一步考虑有可能靠不住，但它仍然是个公认的看法。因此通常说，研究语言间的关系的工作面临着在语言学和历史之间作抉择的关头；但很难说，分析书面材料或口头材料所提供的以及某一语言的词汇所提供的材料的发展工作也是如此。然而这两类研究工作都同语言事实或思想事实，从而同历史事实有关。

这里，欧洲的编史工作已经提出建议，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与书本历史或概念历史区别开。这种区分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

具有班图文化的刚果人，几内亚的伊博人或苏丹的苏苏人都没有留下什么(如果有的话)符合现代历史科学标准的文献。另一方面，就材料来源而言，它们确实提供过丰富的口头文学，这些文学多少被明显地分成各种体裁和作品。人们当今会情不自禁地把这些体裁和作品划归下列名目：短篇小说、各种记叙文、编年史、叙事诗、传奇文学、神话、哲学作品或宇宙起源作品、或技术的、宗教的或神圣的思想。

在以上各类中，历史上真实的东西跟杜撰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纯粹想象的东西跟可以找到准确时间的事件混在一起。为了重构刚果人、伊博人或苏苏人的历史，不仅要批判地分析他们的文献和口头传说，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他们的话语、技术和知识，方法是辨认或解释他们使用过的语言、概念和词汇，把这些语言、概念和词汇结合在一起，还可以看出每个集团的历史。

我们将谈谈能指导非洲历史学家的各种科学和方法，但是所列举的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从说明情况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做可能是一件好事。语言学家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确定了合理的界限，从而使他能够深入研究特定的领域。因此，语言学家把研究各种思想史、各门科学、经济学或文学工作留给对路的专家，让他们去考虑他们调研的语言学范围。

分类科学与非洲各民族的历史

对各种语言进行分类，是为了揭示说这些语言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民族的历史。分类法有以下几种。

谱系分类法

235

这种分类法是确立语系内部的亲属关系和渊源，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重新确定各民族和各文化在历史上的一致性，因为这些民族和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是从一种共同语系派生出来的。

类型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是把结构上或系统上具有明显相似性和同源性的各种语言加以归并。来源相同的或完全不同的各种语言，在名词、动词或代词方面可能具有同样类型的词汇结构，而同时在谱系上、历史上或地理上却相距甚远。在沃洛夫语和英语中都有采用相同的名词和动词形式这种倾向：

沃 *Liggeey*(工作(动词)) *Liggeey bi*(工作(名词))

英 *to work*(工作(动词)) *work* (*n.*)(工作(名词))

但是尽管有这种类型上的相似性，两种语言的习惯用法在谱系上和地理上却都有很大差别。而且，数种语言可能属于同一个语系，但在类型上却可能很不相同。它们是否有亲属关系，这要取决于它们拥有的共同词汇在数量上是否让人信服，即使这些语言是按不同的结构方式发展起来的。有时，由于词汇的借入和借出，词汇本身就可能出现差别。迄今制定的非洲语言的分类法，还不能，例如，把所谓乍得语系或所谓塞内加尔-几内亚语系的某些语言加以归并，然而，根据进一步的研究，这些语言的语音系统、形态和句法结构却表明，这些语言的大多数无论如何事实上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地理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主要是人们本能地倾向于对目前任何环境中的数种语言进行比较和归类的结果。这种方法所根据的材料常常是不充分的。

就非洲而言，这种分类法是基于明显的地理上的考虑，但是忽视了各民族的迁徙和杂居这样一些现象。克勒、德拉福斯、韦斯特曼和格林伯格主要是采用地质学和地理学的一些名称和归类法，因此，他们把非洲语言划分为下面一些类别：西大西洋诸语言，尼日尔-刚果诸语言，塞内加尔－几内亚诸语言，尼日尔－乍得诸语言，等等。

正确的非洲语言分类法，需要有一些能确保如下条件的程序：打算用来作为比较的成分的形式、词汇和语言结构不仅是代表用来进行比较的语言，而且还属于那些语言本来的样子。任何相似点都既不应归于语言借用现象，也不应归于较早时候或较近时候的语言接触。

236

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几个世纪，有时是几千年，许多非洲语言一直保留着大量阿拉伯语和闪米特语，还有法语、葡萄牙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词汇。斯瓦希里语的一些变体的阿拉伯语外来语，占60%以上。人们很容易出于宗教热情或由于对科学缺乏关注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斯瓦希里语属于闪米特－阿拉伯语。有时确实已经得出了这种结论。

一种以上语言本来所共有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语音、形态或结构方面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受语言学规律制约的发展情况是人所熟知和可以进行分析的现象。甚至这些形式的意义，进行比较的总词汇中的词的意义，在一个语义场*的限度内都可能发生变化，这种语义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说明的。例如，沃洛夫语的现代形式表明：词尾元音在重复的辅音字母后要脱落，因此人们用 Bopp 或 fatt 取代 Boppa 或 fatta，而后两种形式至今仍保留在冈比亚人和莱布人的语言里。古埃及语的语形“neds”在现代富尔富尔德语中已经变成了 neddo，在沃洛夫语中变成了 nit。班图人说 Mutumuntu，豪萨人说 Mutu，曼迪人说 mixi 或moxo，丰族人说 gbcto，米纳人说 agbeto，等等。埃及人说的 xemit，从前的意思是“烧焦的”或“黑的”，如今用来表示“灰”，“烧伤”等意思。

一种语言的历史重构作为重新发现词汇和共同的结构传统的一种方法，考虑到了这些变化。这种重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追溯一种语言或一个语系的历史；它有助于确定最早的

* 语义场(Semantic field)又译作“语义域”，是一个语言学术语，指一些在意义上有关联的词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中。有些学者用另一个术语——词汇场(lexical field)——来代替语义场。——译者注

原始母语，并确定原始母语分成各种分支的时期。就此而言，重构是在分类方面有助益的极为宝贵的手段。

各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被用来重构一种语言和再创造该语言的原始构成成分。语音音变在重构一种原始母语或确定一种语系的亲属关系时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当我们知道在一种语言变体中 p 变成 f，而在另一种语言变体中 u 变成 o，那么通过断定 Fa=Pa，Lu=Lo，就有可能重构原始的语音系统和形式。

语音重构

这是重构词语基础和原始词汇的一个步骤。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音位：**形态**和**结构**也在变化。拉丁语中主语的功能是由称作主格的变化来表示的，而在起源于拉丁语或受拉丁语影响的语言中，这一功能主要由词序来表示：

Homo vidit = vidit homo = l'homme a vu = the man saw*

在重构原始母语(原始班图诸语言，原始乍得诸语言，等等)的时候，总是要提到**词汇**和**共同的词汇来源**，因此，进行词汇统计，并算出共同词汇占有的百分比，是可以办到的。J.H.格林伯格[①]的分类法主要是依据这种方法，D.萨丕尔[②]关于西大西洋语族的著作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他得出结论说，他归入同一语族的塞雷尔语和富拉尼语，共同词汇有37%；巴加语、科巴语和滕内语，有79%；滕内语和塞雷尔语，只有5%；巴萨里语和萨芬语也只有5%。然而他把所有这些语言都归并在一起，划入同一个语系。但是，共同词汇(即可以很容易被借用的词汇)的范围大小还不足以证实或反驳(语言间)在历史上的联系。因此，我们通过比较，例如，代词的、动词的或名词性词的系统等来考虑其他因素，如形态特征的相似性或**结构的同一性**。 237

这种形态成分加上词汇分析和语言分析提供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更让人信服的成果，因为历史和外部影响都被考虑进去。重构还旨在确定这种共同传统在原始母语内部是何时被共同具有的，其后在分化演变过程中又是何时被相关语言所接受的。这涉及到确定使各种不同语言得以产生的原始语言的特点，而这些不同语言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原始母语。

重构和测定年代的工作也可以用来确定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收集的词汇材料和结构材料的年代，并且，通过比较，以不同的准确程度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语言有多大关系。这些方法还为原先属于同一文化领域和同一语言领域的民族的分离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的界标。同时，它们还可以说明种族集团的历史和多民族或多种族文化的历史。

关于近代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研究工作，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我们纪元前4,000多年的语言的研究工作，由于缺少证据，会增加许多困难。然而，这项任务仅仅成了搞清语言变化的各决定性时期的历史的任务。词汇或结构中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根据这一目的

* 以上词组分别为拉丁语、法语、英语，意思都是"(那)人看见了"。——译者注

①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63年a。

② D. 萨丕尔(D. Sapir)，1971年b。

而研究的，正象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变化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不易掌握。为了弥补材料不足，已找到一些具有不同效果的方法。

语言年代学是应用于非洲范围的这类方法中最新的方法之一，它的原则是根据某一语言词汇变化的速度来测定该语言的词语发展的时间，这种语言的词汇包括：文化词汇（哲学概念、技术等）和基本词汇（人体各部分的名称、1至5的数词，表示自然现象的词，等238等）。语言年代学，作为一种方法，是要提供关于词项和词汇形式发展的时代、阶段和状态的材料。在古代社会里，基础词汇或基本词汇的发展速度相对来说是缓慢的，至少在不发生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变时是这样。特别是在黑非洲，德拉福斯的著作使我们通过使用十一世纪以来有记录的词表，对这一发展速度形成一种看法。德拉福斯的著作研究了阿拉伯语文献中收集的苏丹各种语言的词汇。这种词汇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仅基本词汇的发展很缓慢，语言年代学的支持者们还提出，其发展速度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不变的。这是斯瓦德希的看法，他曾设法把这一理论应用到非洲语言中去。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进行的试验似乎证实了这种假说。语言年代学认为基本词汇的各词项有一个变化速度，这个速度能够用百分比来衡量。该理论认为，在一千年的既定期间，词汇保持力的变化比率在81±2%和85±0.4%之间。在此基础上，语言年代学运用以下方程式提供了若干结论：

$$t = \frac{\log c}{1.4 \log r}$$

（t＝持续时间，c＝被比较的语言所共有的词汇的百分比，r＝保持力的比率）。问题是，根据所得出的结果，是否能把语言年代学看作是一种可靠的时间标准，一种历史时针。事实上，由于以下简单原因，所获成果并非象我们预料的那么好：在语言相混和词语干扰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而且，如果从文字资料或其他资料得不到准确证据，在目前状况下，不容易按顺序组织材料，不容易区分正常变化和外来语引起的变化，即使是在基本词汇内作这种区分，也并非易事。

然而在将来，应用这些方法的分类科学将说明种族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分类法与种族文化关系

尽管人们作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语言和种族的关系问题在非洲远未得到解决。在许多地区，在揭示这种关系时，直观方法仍然胜过用科学方法确立证据。

关于把绝大多数中部非洲人和南部非洲人统一起来的班图语集团这种想法和概念是十九世纪随着W.H.I.布勒克的著作产生的。布勒克在其1862年出版的名著中，确认了居住239在广阔地区的一些种族集团所说的语言及其方言变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种族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互有区别，使用的语言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互通。在互为近邻的那些种族集团的生活环境中，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显然是最突出的，所谓班图人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某些情况下，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造成了一些问题，富拉尼人就是这种情况的恰当例子。从塞内加尔盆地到尼罗河盆地，他们群居在一起，在截然不同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内常

常被孤立开来。喀麦隆的杜亚拉人说的一种班图语言，正象姆班达卡或金沙萨地区的语言，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同属于班图语言的杜加拉语支，尽管由于相距遥远，使林加拉语支与说后两种语言的语言集团隔开了，尽管它跟后两种集团没有什么关系。

五千年前使用的法老时期的埃及语，在某些方面跟豪萨语，沃洛夫语和桑海语非常相似③。

还存在语言交杂的现象。主要的、通用的和统一的语言由于各种原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续是不同种族集团统一的基础。随着语言的发展，它们通过它们的社会压力和历史影响排除其他语言和文化，往往只留下一些残余。

林加拉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约鲁巴语、特威语、伊博语、班巴拉－迪奥拉语、富尔富尔德语、阿拉伯语和沃洛夫语被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不同种族的人使用。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大大超过它们原来的种族和地理范围，变成本来往往是来源很不相同的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语言。

富拉尼人和塞雷尔人是塞内加尔说沃洛夫语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沃洛夫语原先是莱布人的一个种族集团的语言，在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边界地区可以发现使用这种语言的痕迹。今天，莱布人不过是生活在佛得角半岛上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

然而，随着塞内加尔日趋都市化，沃洛夫人的文化和语言正在把许多方言从我们眼前抹掉，如塞雷尔语、莱布语、富拉尼语、迪奥拉语、努恩语等，这些语言分属于跟语言名称一致的各种族集团，它们在几个世纪以前曾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种总的发展情况。几千万说班图语的人使用的斯瓦希里语，产生于桑给巴尔最初只有几个村子的人使用的一种方言。它很快就在语言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班图语区传播开来，一直到它现在跟林加拉语一起，构成了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主要交流语言。在这个地区（扎伊尔、刚果、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南非、苏丹、埃塞俄比亚，等等），说这两种语言中的一种的人或说一种与这两种语言系属非常相近的语言的人，有五、六千万。 240

传统的非洲见解不仅常常显示出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混杂现象，而且对语言学在解释和阐明历史时可能起的作用往往也认识得非常清楚。在非洲的传说中，许多轶事都说明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或这些语言之间有所区别的、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起因。观察材料往往是正确的。富尔富尔德语和塞雷尔语之间的相似处就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几乎是凭直观断言：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种族上和语言上的密切关系。曼德人、说各种班图语的人、阿肯人和富拉尼人都把自己看作是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他们有时直觉地感到他们是独立的共同的大家庭中几支或几个分支的成员。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之所以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关系，只是因为需要与在种族集团内具有某种有影响的地位的集团同化或共存。因为有关家族的口传传说只有在有关民族承认彼此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受到各民族的拥护，不管这种血缘关系的依据的是实际情况还是神话。

---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姆尔·杭伯格(Mlle Homburger)的著作，参考格林伯格教授和奥邦加(Obenga)教授在本书中的有关章节，以及开罗专题讨论会的记录汇编。

但是，关于非洲社会的传统语言知识并没明确说明非洲关于这种关系的古代科学或系统见解。这与其他领域看到的情况形成对照，比如词源学、语言分析本身，甚至跟词汇现象有关的问题。富拉尼语、班图语或沃洛夫语的语言修辞大师往往非常有意识地关注词汇的来源，并且在这方面很了解情况。例如，卡约尔的史学家把区分外来语或细分一个词以说明其来源视为一种乐事。维护卡约尔传统的人说，Barjal,一词来自 Baar 和 Jal, 他进而解释了该词的组成成分所经历史词形缩约过程，以及该词的情况和意义。A. 塔尔的一篇文章[④]列举了有关莫西人和古尔曼切人中口头词源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工作的例子。

把分类科学应用于语言学的工作，始于 S.W. 克勒、W.H.I. 布勒克和欧洲的研究工作。这门科学的开创是十九世纪印欧比较语言学者的著作，而对非洲语言学进行的研究则是印欧比较语言学者的追随者所首创的。

各地都做了大量重要研究工作，其重要性如果不是表现在见解的新颖或解释的充分方面，至少是表现在收集的材料的数量方面。

W.H.I. 布勒克[⑤]是首先确认班图诸语言在系属上相互有关的科学家之一，而且在这一领域中，他比迈因霍夫或约翰斯顿等作家都早。德拉福斯[⑥]研究西非语言做出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

241

C.R. 莱普西乌斯[⑦]、A.N. 塔克[⑧]和 G.W. 默里[⑨]研究尼罗诸语言以及巴塞研究柏柏尔语做出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研究古埃及语（这对于研究非洲语言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北非的闪米特语言或印欧语言，甚至迦太基语言和希腊-拉丁语言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J.H. 格林伯格是最新的也是目前最有争议的非洲语言分类法的作者，正如他所强调的[⑩]，介绍整个非洲大陆的最著名的现代著作出自德雷克塞尔[⑪]和迈因霍夫[⑫]。但是这些著作既不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批，也不是唯一的。克勒[⑬]早在 1856 年，米乔德[⑭]早在 1914 年，就提出了一些分类的方法和类型，鲍曼和韦斯特曼[⑮]在 1940 年提出了关于同样目的的有趣方法。

然而，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有争议，还存在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非洲语言学没有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关于这一点，J. H. 格林伯格本人最近发表的评论跟谢赫·安塔·狄奥普二十年前在《黑人民族及其文化》一书中所表述的意见完全一致，跟 T. 奥邦加在（增加了比较新的材料）向 1977 年拉各斯盛会提出

---

④ "口头传说"，尼亚美口头传说文献的地区中心，1972 年。
⑤ W. H. I. 布勒克(W. H. I. Bleek)，1862-1869 年。
⑥ 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24年；L. 杭伯格(L.Homburger)，1941 年。在推广分类法的作者中，我们还应该提到 A. 韦贝尔(A. Werber)，1925 年和 1930 年。
⑦ C. R. 莱普西乌斯(C.R. Lepsius)，1888 年。
⑧ A. N. 塔克(A.N. Tucker)，1940 年。
⑨ G. W. 默里(G. W. Murray)，1920 年。
⑩ J. H. 格林伯格，1957 年b。见格林伯格1957年b 和 1963 年的书中的批评性分析。
⑪ 参阅 J. H. 格林伯格的著作。
⑫ C. 迈因霍夫(C. Meinhof)，1904，1906，1912和1932年。
⑬ S.W. 克勒(S.W. Kolle)，1854 年(1963 年版)。
⑭ F.W.米乔德 (F.W. Migeod)，1911 年。
⑮ H. 鲍曼(H. Baumann)和 D. 韦斯特曼 (D.Westermann)，1962 年。

的论文中所重复的意见也一致。

第二个原因纯粹是科学方面的。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为，想要进行分类还为时尚早；没有在方法方面采取必要的预防手段；经过适当分析和加工的材料尚未汇集起来，而这种材料对于非洲语言间进行谱系比较，甚至类型比较是必要的。

进行更多的研究的必要性

即使简单地开列一张非洲语言清单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开列清单的任务，还没有取得任何明确成果。根据粗略估计，非洲语言系统介于 1,300-1,500 个之间，这些语言系统可以归纳为若干种语言。近年来肯定已经取得了进展，虽然还没有形成适宜的气候来进行真正彻底的综合工作，因为有些语言还必须作精确的鉴定和确切的分析，而且此项工作如不完成，就不可能进行语言分类。 242

我们用几个具体事例来说明争论的深度和未搞清的问题的广度。

头两个例子涉及到闪-含语系和黑非洲语系目前地理边界上可以发现的一些方言。第三个例子与西大西洋语族(或称塞内加尔-几内亚语族)有关。

从迈因霍夫⑯、德拉福斯⑰、米克⑱、卢卡斯⑲、以及科恩⑳的著作到格林伯格 1948 年，A.N. 塔克和 M.A. 布赖恩㉑1966 年的著作，以及 T. 奥邦加㉒最近的评论，可以看出，不论就材料、分类方法、语族成员而言，还是就尼罗河流域和乍得盆地的语言关系的起源和特点而言，都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然而特别是地理状况和地理位置的接近，使这些语言具有真正的统一性。黑非洲的语言和闪米特语言的多年并存导致了这两支语言相互大量借词。这种相互借用语词的情况使人很难在原有词和外来词之间划一条界限。问题是要了解：出现在柏柏尔语和闪米特语(如阿拉伯语和阿姆哈拉语)中并与古埃及语、豪萨语、科普特语、巴吉尔米语、萨拉语和乍得语有关的词汇，是否就是一个语系关系的证据或只是借用词的证据。

有关古埃及语的材料可以上溯到 4,000 年前，而有关闪米特语的材料可以上溯到 2,500 年前，但是对乍得、柏柏尔和库什特语进行比较分析却不早于我们纪元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

M. 科恩于 1947 年发表了他的《对闪-含语语音和词汇的比较》，在这篇论文中，他比较了古埃及、柏柏尔、闪米特、库希特诸语言和豪萨语(对后者他只是偶然提到)。1949 年，莱斯劳㉓和欣策㉔开始向科恩的发现提出挑战，甚至对他的方法也提出质疑。J. H. 格林伯格认为，闪-含语系这个概念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而扩大了构成这个语系的语言的

⑯ C. 迈因霍夫，1912 年。
⑰ M. 德拉福斯，1924 年。
⑱ C. 米克(C. Meek)，1931 年。
⑲ J. 卢卡斯(J. Lukas)，1936年。
⑳ M. 科恩 (M. Cohen)，1947 年；J. H. 格林伯格，1948 年："闪-含语系"，SJA，VI，第47-63 页。
㉑ A. N. 塔克(A. N. Tucker)和 M. A. 布赖恩 (M. A. Bryan)，1966 年。
㉒ T. 奥邦加，在拉各斯盛会宣读的论文，1977 年。
㉓ W. 莱斯劳(W. Leslau)，1919 年。
㉔ F. 欣策(F. Hintze)，1951 年。

范围。他提出了第五个独立的成员，即乍得诸语，并把整个语系重新命名为含语系，后来又易名为亚-非语系。这些结论性的意见从其发表之时起就引起了争论。波罗茨基[25]对当时是否可能接受存在五支语言的说法表示怀疑。值得注意的是，格林伯格重复了(仍然没有什么说服力)关于乍得语及其亲属关系主要立足于地理上的论点，这一论点原来是他在《世界的语言》一书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只需查一查格林伯格、塔克和布赖恩的自相矛盾的分类法，就会了解他们的建议不能使人信服的性质，连这几个作者自己也常常对这些分类法产生怀疑。

最近的研究工作使乍得语系这个概念有了内容，这支语言的疆界远远超出乍得湖岸。纽曼和马[26]于1966年，伊利·斯维蒂埃[27]于1967年使我们加深了对原始乍得语的认识。Y. P. 卡普里尔[28]的作品用图表说明了原始乍得语在乍得本土的发展。根据系统的观察，在萨拉语族和乍得语族以及一些可以归入西大西洋语言(塞雷尔语、富尔富尔德语、沃洛夫语、萨芬语等)的语言之间，就有可能提出一种谱系上的联系[29]。正如C. T. 霍奇在一篇出色的文章[30]中强调指出的那样，仅仅这些归属的提出就足以使人怀疑在分类问题上的尝试。黑非洲语言和闪-含语言的边界的语言间各种联系是什么性质这个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论证非洲文化跟闪米特文化的一致性的大批著作又是一个问题。

黑非洲语系的成员情况，乃至它们的一致性问题，仍然没搞清楚。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召开了关于"古埃及居民情况"的专题讨论会；会议强调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S. 索内龙教授说明了这些不清楚的问题，并回顾说："不能把古埃及语跟它所在的非洲环境隔离开，也不能完全从闪米特语角度来解释它的起源"(《总结报告》，第29页)。

库希特诸语言是目前研究工作和分类工作不能肯定的又一个例子。格林伯格、塔克和布赖恩以及苏联学者多尔戈波利斯基最近对一些语言(索马里语、加拉语、锡达莫语、姆布古语等)的组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如果不说是自相矛盾的)分类法，他们把这些语言的组合称作库希特诸语言。多尔戈波利斯基的分类法取决于以有限例子为基础的语音重构类型。他特别比较了这些语言的唇音(p, b和f)和齿音(t和d)，并把它们(语音)分作10个语支，而他的同事则认定是3-5个语支。

格林伯格轻视语音、形态和语法方面的材料，而主要集中于对词汇进行比较，但是借词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塔克和布赖恩批评了格林伯格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以比较代词系统和动词结构为基础的分类法。他们认为，把他们自己归并在一起的一些语言包括进去是靠不大住的，并强调他们的方法纯是试验性的。人们能看到的不过是：这里提出的一些分类法的突出特点在于分类法是临时性的。

以西部大西洋为界沿海岸从毛里塔尼亚南部到塞拉利昂的地区的语言，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1854年，克勒在他的《非洲的多种语言》一书中，把这些语言归入西大西洋的门类

---

[25] H. 波罗茨基(H. Polotsky)，1964年。
[26] P. 纽曼(P. Newman)和R. 马(R. Ma)，1966年。
[27] 伊利·斯维蒂埃(Illic Svitye)：《乍得语言辅音系统史》；参阅C.T. 霍奇(C. T. Hodge)，1968年。
[28] Y. P. 卡普里尔(Y. P. Caprille)，1972年。
[29] 参阅P. 迪阿涅(P. Diagne)，1976年。
[30] C. T. 霍奇，1968年。

中，划分的根据是上述语言的前缀变化，或开首变化或词尾变化。这是班图语言的一个典型特征，但不足以据此确定一组语言。此外，克勒后来终于把所有这些语言都看作是未分类的。德拉福斯于1924年[31]，韦斯特曼于1928年断言，西大西洋诸语言构成了一个语族，格林伯格[32]于1963年表示他全力支持这种看法，他把这些语言称作是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极西部语族。

同年，威尔逊[33]和多尔比[34]注意到这个语族在内部形态上有相似处，但还是完全不同意把这些语言看作是相似的和有关联的语族的见解。威尔逊写道：在形态、句法和词汇的细节方面，“西大西洋”语族或“塞内加尔-几内亚”语族决不是一个实体。的确，1974年出版的D.萨丕尔[35]的最新著作表明，在绝大部分这些语言当中，共同的词汇不超过5-10%，正如其他著作指出过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这些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就是地理。就拿尼罗-乍得地区来说，由于迁徙，造成不同来源的民族杂居在一起：仅仅因为这个，在没有阐明历史、启发史学家的确切材料的情况下，把他们硬捏在一起或许是太草率了。

此外，语言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目前遭到严重限制。研究工作者面临上述双重障碍。研究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成绩，是由于这一工作还不完善，处于初期阶段。其次是研究的初步结果往往不能使用，因为研究方法和思想意识都被歪曲，所得的结果不真实，靠不住。

思想意识的歪曲

历史是最能体现思想意识的领域。思想意识围绕着历史，并在其中发展。非洲历史和非洲语言的最早著作是跟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同时出现的，这样的著作受到当代种族至上观念的强烈影响。

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自然体现出，需要根据内部关联来评价任何文化。它导致人们把任何文化的最大特点都拿来为我所用，以便使他们在思想和权力方面对世界的控制合法化。 245 文明的印欧、雅利安人或白人至高无上的种种理论都是过头做法的证据，时至今日，这种过头做法仍然给许多非洲历史和非洲语言学的著作留下了深深的烙印[36]。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埃及跟非洲大陆其余部分比较处于次要地位，有时为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其他文明中心的利益恢复一些活力，根据未经证实的推测，这些文明中心是指印欧或闪米特的。贝宁被认为是想象的艺术创造者。关于含米特化[37]的系统理论被提了出

---

[31] M.德拉福斯，1924年。
[32] J.H.格林伯格，1963年b。
[33] W.威尔逊（W.Wilson），1966年。
[34] D.多尔比（D.Dalby），1905年。
[35] D.萨丕尔，1971年b。
[36] 参阅J.H.格林伯格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37] 在几个世纪中，“Hamite”（含米特人）和“Hamitic”（含米特语）这两个词在西方世界的学者语言和日常用语中用得太多了。这种使用来源于断章取义的和带有倾向性的《圣经》读物，因而造成了咒骂含姆的黑人子孙神话（传说认为含姆（Ham）系基督教《圣经》中洪水以后的人类新始祖诺亚（Noah）的次子）。这个术语作为十九世纪语言学家和人种学者学术研究的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轻蔑的意味，而且至少失去了它的宗教含义，但它们被继续用来作为标准、来区别被视为优越者的黑人和其他黑人。不管怎样，国际科学委员会正在鼓励人们对这个术语的历史用法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现在这个术语只有在受到明确的限制时才能使用。

来，以便通过外部影响来解释黑非洲的任何有趣的文化特征。

虽然格林伯格提倡严格的科学方法论(他的贡献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仍不失为有创见的和重要的)，但有时还是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些消极思想。

塞利格曼和迈因霍夫，以及他们之后的德拉福斯、鲍曼、韦斯特曼和米勒这样一些重要的作者，都提出了一些非常不科学的论点，其基础便是迈因霍夫的那类偏见，他曾写道："在历史进程中，一种现象经常是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含米特各族人征服并统治过黑皮肤的民族"。

这种观察的结果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研究向史学家或一般人类科学家提供任何材料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

格林伯格写道："把'含米特'这个词当作语言学术语并进而把它引伸为主要看作是高加索人的这一类人的人种学术语，这种模糊不清的使用法导致了这样一种种族理论：把黑非洲的大多数土著居民看作是含米特人和黑人的混合结果"。因此，C.G.塞利格曼在《非洲的人种》一书中把操"尼罗－含米特"诸语言的人叫作人种上的"半含米特人"，而班图人也被认为是含米特化的黑人的另一变种。于是，格林伯格继续写道：这"根据的是迈因霍夫的种种推测(他从未对自己的推测提出一点点证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可能提出证据)，正如塞利格曼所说明，班图语是一种混合语言，好比是含米特父亲和黑人母亲的后裔"。

246

非洲各民族的东西迁徙和南北迁徙把非洲大陆的种族、人种和语言地图搞得混乱不堪。对人名、地名和关于基本词汇本身的纯语言事实所做的许多研究报告已说明了这一点。塞内加尔的沃洛夫语、迪奥拉语、富尔富尔德语和塞雷尔语跟南非(阿扎尼亚)、坦桑尼亚、喀麦隆和扎伊尔的班图诸语言的相似处，比跟它们周围地区的曼德系诸语言的相似处多得多。正象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书面的古埃及语的词汇、结构和基本原理，与沃洛夫语或豪萨语这样一些语言中的相应现象更接近，跟达荷美的书写传统也更接近，而跟闪－含语言系统却不那么接近，因为这二者是轻率地被扯在一起的。

古埃及语、豪萨语以及卢旺达牧民、阿比西尼亚人、富拉尼人和努比亚人的种种语言都被命名为闪－含语言，其依据是些显然站不住脚的材料或一套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方法和标准的选择。

正象卢巴人、苏苏人、桑海人和许多在以前和现在的聚居地的黑人和白人有接触那样，富拉尼人可能是混血种人，虽然由于肤色变化过程的最新发现，关于混种问题的这一假说现在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富尔富尔德语在其音韵、词汇和结构上，跟塞雷尔语比跟其他任何已知的语言都更接近，因此塞雷尔语和富拉尼语本身就表明它们的关系不仅是语言上的而且是人种上的。但这还是没能阻止米勒、杰弗里斯、迈因霍夫、德拉福斯和韦斯特曼这样一些学者想证明富拉尼人起源于白人的企图，他们的根据是：富尔富尔德语是一种原始含米特语言[38]。W.泰勒甚至写道："从富尔富尔德语的大量词汇、响亮的发音以及它所能表达的意义上的细微差

[38] J.H.格林伯格，见已引证的著作。

别来看，我可以肯定富尔富尔德语不属于(黑人的)苏丹系语言”。所有这些意见都表明，语言类别上的混乱状况就象不同语言、生活方式和“人种”的那样普遍，更不用说在种族集团的概念的混乱情况了，因为这样概念的使用完全是按照爱好用来指这些类别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正象格林伯格指出的，必须抛弃在含米特人跟牲口所有权和征服之间简单划等号的做法，在西非，两者之间的关系百分之百地相反，因为说“含米特”语的豪萨农民曾被说黑非洲语言(苏丹语言或尼日尔－刚果语言)的有牲口的富拉尼人所征服。人们可能注意到另外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操苏丹语的曼德人或沃洛夫人对仓促同化在“含米特人”的民族进行了长期和不断的统治，含米特人就是所谓含米特人以前的富拉尼人或柏柏尔人。 247

从科学的观点看，为整个或部分非洲草拟的分类法，没有一种迄今能确实被看作是正确可靠的。种族中心主义对材料分析的歪曲做得太过分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假设为论据进行辩论，并匆匆做出全面评述。

如果我们按照有助于阐明非洲各民族与文化的历史的严格科学原则来研究非洲语言，那么我们就必须满足若干条件。

首先，这种工作必须摆脱研究闪米特语或印欧语产生的一些无关思想的纠缠，这些语言都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

此外，如果我们要确立非洲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引证早期的语言根据，而不是依赖地理分布情况、早期或晚期的影响以及先验地选择的解释纲要或跟语言系统的主要事实只沾点边儿的语言特征。

辅助学科

文化移入的分析，即英语中所说的类型分析[30]，是研究文化特征(思想、技术等等)的起源及其传播的科学的一部分。德国学者是首先实际应用这一方法的，如弗罗贝尼乌斯、韦斯特曼和鲍曼等对文化循环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常常涉及到农作物和农业技术的传播、畜牧方法、铁制业和其他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与传播，马的使用以及众神或各种艺术形式的本体论概念的发展。

但是，有时类型学超越了自身的纲要，特别是，它把许多谬误带进了分类的语言学。许多粗枝大叶的作者认为，只根据文化特征就可推断语言关系，虽然这些现象常常归因于语言借用、语言接触或语言融合。

专名学是研究各种名称的科学：地名、人名、水文名称，等等。

专名学跟词汇有密切关系。在血缘上一度比较相近的种族集团，以及在其成员组成上比较庞杂并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种族语言集团，主要都是参照语言中的实际情况取名的。他们给他们现在居住或从前居住过的地区或地理环境提供特有的名字。根据人名来确定一个集团的种族特征也是同样可能的：塞雷尔人一般被叫做琼恩、米弗、塞恩、图雷、贾拉 248

[30] 参阅M.格思里(M.Guthrie)，1969年。

等，而柏柏尔人和说班图语的人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名字。

人名学在政治或文化集团的种族社团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塞内加尔的图库洛尔人使用的人名所做的研究表明，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组成成员很不相同的种族语言集团。这个沿塞内加尔河建立并分布于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交界地区的说富尔富尔德语的集团，在文化上是非常相同的。他们具有高度发展的民族感情。实际上，这个集团是富拉尼人（他们提供了富尔富尔德语）和曼德人、塞雷尔人、莱布－沃洛夫人以及柏柏尔人的结合物。

地名学和水文名称学对于研究民族迁徙问题也是不可缺少的。采用从前或现在的村子的名称，就可以绘制能说明曼德人迁徙情况的精确地图，这些曼德人的村子的名称保持着dugu 这种形式。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绘制富拉尼人从前或现在的聚居地的地名地图，富拉尼人使用 Saare 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定居点。还可以绘制类似的地图以说明沃洛夫人用Ker这个词；阿拉伯－柏柏尔人用 Daaru 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说明豪萨人等等表示他们居住地的词。

语言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或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种旨在从人类语言来揭示人类文化的新方法。该方法立足于全面分析从一个种族集团或其成员各异的语言集团使用的语言中挑选出来的所有材料，这个种族集团或语言集团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它的文化、思想和历史。

这一方法不仅限于收集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说和文学；它还涉及重构某一语言中的整套思想，但不一定跟系统的成果或系统的论述有关。因此，这样的研究既在够不上语言学又在超过语言学的水平上进行，以便从词汇、思想模式、形式化和概念化的程序以及语言的结构来确立各种类型的知识，在这些知识内，说某一语言的集团所特有的世界观和历史得以具体化。人类文化语言学揭示这样一些系统：抽象概念、伦理学、本体论、美学、逻辑学、宗教、技术知识，等等。

因此，跟豪萨人的历史有关的书面和口头文学以及他们的宗教文献、寓言、法律、医学、冶金和教育说明了豪萨人思想的发展和他们的历史与文化。

在书面材料欠缺而口头文化占优势的情况下，要想根据不同时期的材料进行比较以作出历史性说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语言学就成了重新发现知识遗产的一种非常宝贵的手段——几乎是一种时间机器。

249　通过语言人类学对探究的口头文化，不仅为我们提供可以收集到的和记录在案的作品，而且还可使我们了解那些作品的作者及其专长。非洲的任何口头或书面文化，比如沃洛夫人的这类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恩达阿茅·戈萨阿斯这样的哲学家、萨·巴西这样的政治历史学家、语言和修辞大师、伊本·姆本格[40]这样的叙事诗人和小说家，以及药物、医学和农业或天文技术方面的发明家[41]。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的文化蓬

[40] 所有这些人都是沃洛夫人思想史中的著名历史人物。

[41] 约翰斯顿(Johnston)关于约鲁巴人的著作，坦普尔斯(Tempels)关于班图人的著作，格里奥尔（Griaule）关于多贡人的著作，特拉奥雷(Traoré)关于非洲医学的著作，格恩里关于冶金的著作等，加上"固定的文学经典著作"，都为语言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参阅 P.迪阿涅(P. Diagne)，1972 年的著作。

勃发展情况的极好资料。

班图语本体论，实际上是可以解释，甚至可以阐述得清清楚楚并系统化的，办法是考察跟世人有关的班图语词并进行详尽阐述和概念化，这一过程通过班图语词和话语可以形成以下看法：班图语言具有哪些现象。

语言好象是世世代代造成的全部知识工具和物质工具的结晶，因此我们可以把人民的历史经验看作是沉积在语言组织内部的各个层次中。

文字记载和历史思想的伴随物

如今口头传说在非洲历史中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欣然接受。传统主义的民谣歌手甚至被邀请去出席会议。有人提出了建议，认为大学应该给他们设立若干职位，甚至应该请他们去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

就整体而论，口头材料比文字材料更出色，这在今天的非洲仍然是事实，就象其他地方以乡村口传文化为主一样。

口头表达具有自己阐述和说明思想成果的方法。虽然思想的文字形式和口头形式涉及同一范围，但是这些形式的概念和传递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总是相同的[42]。

我们将简单地说明一下，文字形式的思想，即狭义的文学，象现在确定的那样，具有一种永远固定下来的比较大的倾向。这把它与口头传说区别开来，为虚构和神话的创造提供了较大的领域，在语言方面，口语词对促使产生方言也有较大的潜力，因为对口语词的发展限制较少。主要用于口头表达的语言跟人民的关系更近，因而也更易于受到改变，经常的使用会导致它在结构、语音、乃至在其借用的形式上发生这样一些改变。

250

另一方面，一种文学语言则更多地趋向于统一，此外，它还具有比较重要的可视性方面，因为在它的表达方式中，它还具有若干书写特征，这些特征给它一套特殊的书写符号：一种跟语音学相抵触的拼写法和一套标点法，等等。

另一方面，口头语言还更多地使用声音，通过声调、韵律、半谐音或不谐和音以及其他发音技巧来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靠记忆来发挥的这种作用对于弥补缺少文字媒介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影响口语的特点及其采用的表达形式。口语自觉地接受记忆术——记忆文献的特殊学科——的种种限制。这样，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便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并把它们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43]。

此外，口头叙述一旦被记录下来，便成了文学材料[44]。

---

[42] 参阅P.迪阿涅，1972年的著作。

[43] 同上。

[44] 参阅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出版物：A.哈姆帕特·巴(A. Hampate Ba)，A.易卜拉欣·索(A. Ibrahim Sow)，穆夫塔(Mufuta)，E.当皮埃尔(E. Dampierre)，K.莫埃纳(K. Moeone)，F.拉克鲁瓦(F. Lacroix)，M.格里奥尔(M. Griaule)，G.迪埃特伦(G. Dieterlen)，怀特利(Whiteley)，E.诺里斯(E. Norris)，L.凯斯特卢特(L. Kesteloot)，T.尼昂(T. Niane)，M.迪阿巴特(M. Daibate)，J.姆比蒂(J. Mbiti)都写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经典著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朱利雅尔德公司、加利马尔德公司、尼亚美中心等出版。

书写传统——非洲的文字

创造文字时所碰到的种种需要的性质和起因由于环境的不同而各异，而且并不总是都清楚地显露出来。文字作为商业和行政管理的工具，是都市文化的一种现象，但这未必就是所有文字的起因。在非洲，不仅在法老时代，而且在达荷美君王或曼丁哥的曼萨斯时代，文字主要是为精神上的需要服务的。古埃及的文字和达荷美浅浮雕品的文字或班巴拉人或多贡人的表意文字，在其最初的环境中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把思想记录下来并使之具有宗教或神圣意义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根据神话传说，古埃及文字是知识与魔法之神创造的，并在长时期内主要只限于庙宇和祭司使用。这种文字用来记录供刚担任神职的人员使用的秘密，或作为某种以积极内容产生的一种思想的媒介，这种内容可以形諧言词或文字本身。

251 文字记录在纯粹起源于非洲文化中所起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与使历史永远存在这一需要相吻合的。不论是埃及的文字还是阿波美王朝的文字，都用来赞颂君主和有关人士，说他们的业绩应当名垂青史。同样的目的也吸引了班巴拉人或多贡人，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表意文字刻在邦贾加拉的城墙上。

在格莱莱君王用来传递信息的一种仪式斧和那漠尔王的纪念碑之间不只是存在着密切关系，不仅仅是它们的精神实质一致，而且书写的原则和方法也相同。[45]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埃及文字被认为是知识与魔法之神创造发明的，他还发明了魔术和技巧，多贡人的狗头神也是如此，狗头神本身就是语词、知识有效话语的护卫者。

少数专家研究了(往往是非常详尽地研究)起源于非洲的文字系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无视存在于最知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黑非洲的文字系统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学术上是可以证明的。

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是作为庙宇的工具使用的，那时基本上还是一种图画文字。这种文字就象达荷美的象形文字一样，尽可能参照形象化的东西。它是一种有意造得象实物一样的文字，旨在用最具体和最真实的方式把有生命的东西、物品和思想形体化，就象是把它们的自然特性贮藏或保存起来一样。

使用草书，会使图画文字发生变形，因为草书改变和破坏了所代表的物品的形体，它只能在庙宇以外使用，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主要用非宗教目的的僧侣文字(尽管它在词源上跟希腊正教有联系)和受大众欢迎的甚至有着更简化的符号的古埃及通俗文字，都是一些非宗教的实用文字系统。

正如 M.科恩所正确强调的，对埃及的祭司来说，象形文字除了它的其他特性外，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科恩认为，这说明为什么那些有害的动物的形象不是被忽视便是被肢解。这里我们所持的是一种本体论观点，这种观点根源于黑非洲的传说，又贯穿于黑非洲的传说之中。在几千年中，这一传说总是无法使思想及其口头或书写媒介摆脱宗教色

[45] M. 格莱莱(M. Glele)，1974年。

彩，就象印欧人，特别是希腊人所做的一样。班巴拉人、约鲁巴人、恩西比迪人和多贡人的祭司对文字系统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这些文字系统用于他们的庙宇或占卜仪式中。

起源于非洲的文字系统的统一不仅在于它为那些系统规定了作用和性质的思想先决条件，而且还在于誊写技术本身。

纵观非洲文字体系的整个历史，用文字记录思想的三种技术是互相关联的：通过描绘动物或物品的图画文字，使用图象；通过表意符号来代表一个实体，使用符号，这些表意符号在形体上跟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并无直接联系；最后是使用音标文字，每个音标文字代 252 表整个一组同音异义词，也就是说，用同一个音或一组音来表示一组实体。这就是象形表音文字的原则。

对那漠尔王的石碑和格莱莱或达科多努的仪式斧进行比较是说明问题的。这两种物品都是根据同样原则来记录思想。

在石碑上，我们看见一位国王正抓住一个被打败的敌人的头发，正要处决他，而其余的残兵败将则从这位强大的法老的脚下逃窜。这些图画文字是清楚而雄辩的。其它符号都是表意符号。一个别具一格的符号是一个椭圆形的"ta"，象征地球。上方是一组符号和一个正方形，正方形象征该法老的姓名——浩瑞斯。鱼和鸟是对法老姓名的补充。这两幅图都是象形-表音文字。

盖佐的仪式斧表明：达荷美的君王取水牛外形，就象法老是以一只猎鹰作为象征一样。它的牙齿暴露在外，表示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他的敌人中间制造恐慌气氛。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用符号表达的例子。其他例子就更重要了。

达科多努(或多科多努)王的仪式斧就更早(1625-1650年)，这是勒埃里塞描述的，它甚至更清楚地说明了达荷美象形文字的原理。斧刃上的文字如下：有一个代表石器"da"的图画文字符号，下方有一个代表地球的"ko"的符号，地球的中间是一个洞"donon"。这些符号在这里是作为象形-表音文字使用的图画文字。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象在那漠尔王的石碑上表示该法老的姓名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达荷美王的姓名是Dokodunu。达荷美的文字与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这种象形文字系统的原理与要旨最相似不过了。这为我们展示了埃及文字的三种书写方法：图画文字形象、表意符号和象形-表音符号[48]。

苏联学者德米特里·A. 奥尔德罗格在一篇综述得很出色的文章中再次宣称，正如谢赫·安塔·狄奥普第一个指出的，黑非洲的象形文字系统一直存在到最近。

卡瓦齐·德蒙特库多洛在其1687年出版的《刚果、马坦巴和安哥拉的三个王国的历史概况》中提出，象形文字在这些地区使用过。

1896年，在莫桑比克赞比西河旁边的太特的岩石上，发现了一种象形文字铭文，铭文的内容当时已公布。谢赫·安塔·狄奥普注意到巴奥尔在使用一种新的象形文字系统，在那里最近在一些上千年的猴面包树上发现了象形文字的痕迹。利比里亚的瓦伊人多年都在树皮上使用一种图画文字系统。

---

[48] 见以上第四章。

253 在古埃及的南部疆界一带发展起来的麦罗埃文字，无疑是古埃及文字的一种继续。后者促进了前者的产生；要不然就是前者产生了后者，或具有共同的起源。

但是，文字的表意符号系统在黑非洲西部这块土地上看来比象形文字持续的时间更长。实际上，无论是占卜术中使用的，还是宗教祀祭司以及艺术制品的雕刻师等等使用的表意符号文字，绝大多数非洲人都是熟悉的。

古尔马人有着精心设计的复杂占卜方法。占卜者在沙子上画一些符号并加以解释，然后把他占卜的内容用抽象符号写出来，这些抽象符号用小刀刻在一块葫芦上，以表示祭坛和委托人必须去祭祀的地方，还表示应该用何种动物作祭品，应献祭多少次，等等。实际上这是一种代码文字系统。

沿贝宁湾海岸发现的伊法人占卜术，也是异常丰富的。占卜者把若干棕榈果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这样倒腾 8 次，并根据留在左手的棕榈果的数量，在布满尘土的盘子上或地上写一个数字。用这种方法把文字写出来(可能的最高限额是 256 个)，其中 16 个最重要的构成**命数**(odu)或神圣的言词，命数或神圣的言词都是受伊法命运之神支配的。每个人都必须向他的**命数**献祭，但同时还必须考虑他的亲属和祖先，考虑他的家乡等等。变换的方法数不胜数，各种各样的**命数**结合在一种神话般的谋略中，这种谋略也是一种字相技术。

收集表意符号系统的工作[47] 使人获益甚多，特别是对位于热带大草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地方保留了他们传统的宗教，相对来说没受到伊斯兰教多少影响。这并非巧合。许多专家(其中米乔德是首批中的一位)都揭示了这些系统中的一部分。

M.格里奥尔和G.迪埃特伦描述了多贡人的表意符号文字，他们分析了班巴拉人的书写系统并对这一地区的各种系统做了出色的评述。

尼日利亚南部的伊博人使用的恩西比迪表意符号文字是欧洲人在十九世纪末发现的。这种文字的根据是整个几内亚海岸地区非常流行的书写原理。

使表音文字的使用更加系统化的语音文字[48] 是用正规符号来代表简单的或复杂的语音，D.多尔比认为，这些系统是作为一种最新发展在非洲出现的。古埃及和达荷美的象形文字用符号来代表许多语音。

254 但是，以词、音节或单个音位——后者是字母标音——为基础的纯粹语音文字系统，标志着一个新阶段。[49]

柏柏尔文字是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使用的，而且仍然以塔非奈格的名称闻名，据说是在跟迦太基人的接触中受古迦太基语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努比亚人的文字系统是在十世纪通过跟科普特人的文字接触建立起来的，而后者本身又是在希腊文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和蒂格里亚语使用的字母则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萨巴语* 文字派生而来。

---

[47] 参阅G.尼昂戈拉·布阿(G. Niangora Bouah)：《[illegible]之研究》，博士论文，阿比让(Abidjan)，1972 年

[48] D.多尔比(D. Dalby)在其 1970 年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见解。

[49] E.霍(E. Hau)，1959 年。

* 古也门通行的一种语言。——**译者注**

西非的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系统从十八世纪末起在几内亚海岸和苏丹地区甚为流行，这些文字系统可能是通过内部发展产生的，也可能是受欧洲或阿拉伯的外来因素的遥远的或不很远的影响而形成最后这个样子。[60]

1834年埃里克·贝茨的发现和1849年克勒的发现使欧洲逐渐知道了瓦伊人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在象形文字系统的遗迹已被注意的某一地区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利比里亚派驻英国的一个叫莫莫卢·马萨库阿的领事，描述了当时他所在的地区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的种种原理[61]。

莫莫卢报告说，为了表示对敌人取得的胜利，瓦伊人就在一块树皮上(而不是在纸莎草纸上)画一个把双手举过头顶，正在奔跑的男人的图。在图的旁边画上一个小圆点，表示大批逃走的人，即被击溃的军队。在用一个圆点来表示多数而不是象古代尼罗河盆地用破折号来表示多数的用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法老文字的若干特征。

因此，瓦伊人可能已经改变了他们早期在语音符号方面的系统。今天，在西非的许多民族中，我们发现跟瓦伊人文字相似的情况，如马林克人、曼德人、巴萨人，格尔泽人、克培勒人、托马人的文字就是这样。最近沃洛夫语和塞雷尔语也得到了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文字系统。

跟通常的看法相反，从那濮尔王的石碑到格莱莱的仪式斧，使用文字一直是非洲历史和思想的永久性特点。丰富的文字系统以及使用这些文字系统的大量根据都证明了这一事实。

法老时代以后的非洲文字系统是按正常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很简单。这一发展适应了富饶的农村社会和农村经济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要求。农村社会的成员并没有由于贫穷的压力而被迫在他们那个时代去加强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的建树，因为这些东西不再继续受到威胁。在资源和人口之间提供一种廉价平衡的社会生态学，从地理的角度给了非洲大部分文明及其文化特征、盛衰的力量，同时又总是使他们把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的原则——保持住。从内部均衡的观点看，这样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但是外部力量和正在增长的进步的影响使这种脆弱性成了一种障碍。 235

结 论

语言学对非洲历史科学的发展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只有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有所贡献。迄今为止，它的贡献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从科学的角度讲还不牢靠。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增加了，同时调查研究的领域也明显扩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预料，对非洲语言进行分析，将在最近的将来对阐明大陆历史的重要问题有所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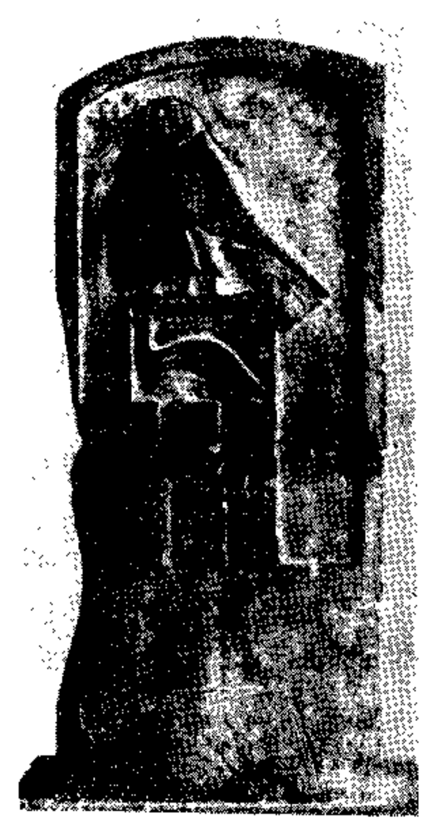
(黄长著译)

---

[60] 苏丹的文字系统把象形文字(实际的图形)和表意文字(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合二为一。参阅M.格里奥尔和G.迪埃特伦1951年的著作。这些符号的结合旨在根据这种文字和这种文字所传播的知识，用一种使初学者可以辨认的方式写出并固定言词。

[61] 参阅D.奥尔德罗格(D. Olderogge)1966年的卓越评述文章。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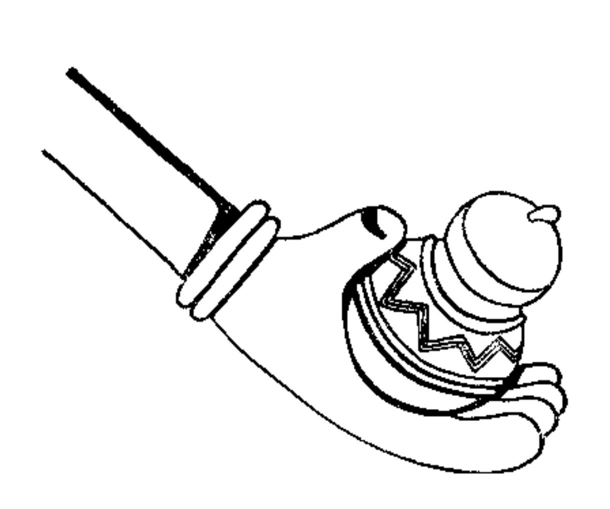
照片10.1 蛇王石碑(罗浮博物馆)

(原书缺此图。
——中文版编者注)

照片10.2 奉献给达荷美的第一个君王——达科多努王——的仪式斧(努比亚)



照片10.3 阿波美博物馆中使人望而生畏的幼狮(M.A.格莱莱摄,努比亚)



照片10.1 阿波美博物馆的仪式斧，上面的葫芦是权力的象征（努比亚）

照片10.5 用瓦伊文写的《古兰经》第一章第一页（引自T.奥邦加，1973年，非洲风貌）

照片10.6 瓦伊文字的语音表（引自T.奥邦加，1973年，非洲风貌）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illegible]	a*	[illegible]	ga	[illegible]	la	[illegible]	ra	[illegible]	wa
[illegible]	é	[illegible]	gé	[illegible]	lé	[illegible]	ré	[illegible]	wé
[illegible]	ĕ	[illegible]	gĕ	[illegible]	lĕ	[illegible]	rĕ	[illegible]	wĕ
[illegible]	ī	[illegible]	gī	[illegible]	lī	[illegible]	rī	[illegible]	wī
[illegible]	ō	[illegible]	gō	[illegible]	lō	[illegible]	rō	[illegible]	wō
[illegible]	ŏ	[illegible]	gŏ	[illegible]	lŏ	[illegible]	rŏ	[illegible]	wŏ
[illegible]	ū	[illegible]	gū	[illegible]	lū	[illegible]	rū	[illegible]	wū
[illegible]	ba	[illegible]	ha	[illegible]	ma	[illegible]	sa	[illegible]	ya
[illegible]	bé	[illegible]	hé	[illegible]	mé	[illegible]	sé	[illegible]	yé
[illegible]	bĕ	[illegible]	hĕ	[illegible]	mĕ	[illegible]	sĕ	[illegible]	yĕ
[illegible]	bī	[illegible]	hī	[illegible]	mī	[illegible]	sī	[illegible]	yī
[illegible]	bō	[illegible]	hō	[illegible]	mō	[illegible]	sō	[illegible]	yō
[illegible]	bŏ	[illegible]	hŏ	[illegible]	mŏ	[illegible]	sŏ	[illegible]	yŏ
[illegible]	bū	[illegible]	hū	[illegible]	mū	[illegible]	sū	[illegible]	yū
[illegible]	da	[illegible]	ja	[illegible]	na	[illegible]	ta	[illegible]	za
[illegible]	dé	[illegible]	jé	[illegible]	né	[illegible]	té	[illegible]	zé
[illegible]	dĕ	[illegible]	jĕ	[illegible]	nĕ	[illegible]	tĕ	[illegible]	zĕ
[illegible]	dī	[illegible]	jī	[illegible]	nī	[illegible]	tī	[illegible]	zī
[illegible]	dō	[illegible]	jō	[illegible]	nō	[illegible]	tō	[illegible]	zō
[illegible]	dŏ	[illegible]	jŏ	[illegible]	nŏ	[illegible]	tŏ	[illegible]	zŏ
[illegible]	dū	[illegible]	jū	[illegible]	nū	[illegible]	tū	[illegible]	zū
[illegible]	fa	[illegible]	ka	[illegible]	pa	[illegible]	va		
[illegible]	fé	[illegible]	ké	[illegible]	pé	[illegible]	vé		
[illegible]	fĕ	[illegible]	kĕ	[illegible]	pĕ	[illegible]	vĕ		
[illegible]	fī	[illegible]	kī	[illegible]	pī	[illegible]	vī		
[illegible]	fō	[illegible]	kō	[illegible]	pō	[illegible]	vō		
[illegible]	fŏ	[illegible]	kŏ	[illegible]	pŏ	[illegible]	vŏ		
[illegible]	fū	[illegible]	kū	[illegible]	pū	[illegible]	vū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字	音
[illegible]	cha	[illegible]	kpa	[illegible]	nda	[illegible]	nya	[illegible]	zha
[illegible]	ché	[illegible]	kpé	[illegible]	ndé	[illegible]	nyé	[illegible]	zhé
[illegible]	chĕ	[illegible]	kpĕ	[illegible]	ndĕ	[illegible]	nyĕ	[illegible]	zhĕ
[illegible]	chī	[illegible]	kpī	[illegible]	ndī	[illegible]	nyī	[illegible]	zhī
[illegible]	chō	[illegible]	kpō	[illegible]	ndō	[illegible]	nyō	[illegible]	zhō
[illegible]	chŏ	[illegible]	kpŏ	[illegible]	ndŏ	[illegible]	nyŏ	[illegible]	zhŏ
[illegible]	chū	[illegible]	kpū	[illegible]	ndū	[illegible]	nyū	[illegible]	zhū
[illegible]	dha	[illegible]	lba	[illegible]	nga	[illegible]	sha		
[illegible]	dhé	[illegible]	lbé	[illegible]	ngé	[illegible]	shé		
[illegible]	dhĕ	[illegible]	lbĕ	[illegible]	ngĕ	[illegible]	shĕ		
[illegible]	dhī	[illegible]	lbī	[illegible]	ngī	[illegible]	shī		
[illegible]	dhō	[illegible]	lbō	[illegible]	ngō	[illegible]	shō		
[illegible]	dhŏ	[illegible]	lbŏ	[illegible]	ngŏ	[illegible]	shŏ		
[illegible]	dhū	[illegible]	lbū	[illegible]	ngū	[illegible]	shū		
[illegible]	gba	[illegible]	lda	[illegible]	nja	[illegible]	tha		
[illegible]	gbé	[illegible]	ldé	[illegible]	njé	[illegible]	thé		
[illegible]	gbĕ	[illegible]	ldĕ	[illegible]	njĕ	[illegible]	thĕ		
[illegible]	gbī	[illegible]	ldī	[illegible]	njī	[illegible]	thī		
[illegible]	gbō	[illegible]	ldō	[illegible]	njō	[illegible]	thō		
[illegible]	gbŏ	[illegible]	ldŏ	[illegible]	njŏ	[illegible]	thŏ		
[illegible]	gbū	[illegible]	ldū	[illegible]	njū	[illegible]	thū		
[illegible]	hna	[illegible]	mba	[illegible]	nkpa	[illegible]	wha		
		[illegible]	mbé	[illegible]	nkpé	[illegible]	whé		
[illegible]	hnĕ	[illegible]	mbĕ	[illegible]	nkpĕ	[illegible]	whĕ		
[illegible]	hnī	[illegible]	mbī	[illegible]	nkpī	[illegible]	whī		
		[illegible]	mbō	[illegible]	nkpō	[illegible]	whō		
[illegible]	hnŏ	[illegible]	mbŏ	[illegible]	nkpŏ	[illegible]	whŏ		
[illegible]	hnū	[illegible]	mbū	[illegible]	nkpū	[illegible]	whū		

Miscellaneous.

字	音
[illegible]	faa
[illegible]	hn
[illegible]	kpna
[illegible]	nwa
[illegible]	nwo
[illegible]	whew
[illegible]	shn

Punctuation and other Signs.

符号	名称
[illegible]	bridge
[illegible]	comma
[illegible]	question
[illegible]	period
[illegible]	exclamation
[illegible]	accent
[illegible]	detraction
[illegible]	nasal
[illegible]	continuation of sound

* 这些元音有下面这样一些音：a有如ah中的[a:]，é如they中的[ei]，ĕ如net中的[e]，ī如pin中的[i]，ō如old中的[ou]，ŏ如not中的[ɔ]，ū如tube中的[ju:]。

（此处印的这个表是通用的，但我们怀疑u所表示的是否真的就是"rule"中的u音，而不是通常听到的tube中u的读音，u的读音是y和u的结合。 编者注）

258

	ka	kɛ	ke	ki	ku	ko	kɔ
瓦伊语（1849年）							
（1962年）							
门德语							
洛马语							
克培列语							
巴萨语							
巴姆姆语（1906年）						–	–
（1916年）						–	
奥贝里-奥凯梅语							
迪乌卡语							
曼丁哥语							
沃洛夫语							
富拉语（迪塔）							
富拉语（巴）							
贝特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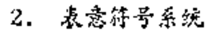
巴甘语文字和古罗语文字（没有资料）、约鲁巴语"圣"字体和戈拉语字体（这两种字体均无法辨认）不包括在本表内

照片10.7 非洲本土一些字体的文字样品（引自D. 多尔比，1970年，第110－111页，弗兰克·卡斯有限公司）

259

1. 图画文字系统

姆姆语词	意 义	1900 年收集的符号(克拉波特)	1907 年收集的符号(戈里林)
pì	可拉果		
fòm	国 王		
ntat	房 屋		
nyad	牛		





3. 语音-音节文字系统：

= 音节ba，来自nba，表示"二"，"两个"

= ben：舞蹈(中的一种)

= be，来自byé：环绕，或bye，表示"拿住"

= cha，来自ncha：鱼

照片 10.8 穆姆语文字系统(引自T.奥邦加，1973 年，非洲风貌)

照片 10.9 埃及和西非文字系统(引自 T. 奥邦加，1973 年，非洲风貌)

埃及图画文字(距今约 4000 年)：

A_{31} 正在跑动的男人，单臂前伸 inw 相当于"送信者"

F_{32} 哺乳动物的胃：ht 相当于"肚"，"身体"

I_1 蜥蜴：'š3 相当于"许多"，"丰富"

I_{14} 女人或蛇(hf3w，或 ddft)

N_8 wbn：升起

N_{11} 新月： 相当于月亮

恩西比迪图画文字[34]

戴雷尔书，正在跑动的男人，单臂前伸

麦格雷戈书(212页)，一个送信者

戴雷尔书127，表示鱼刺的符号

塔尔博特书，蜥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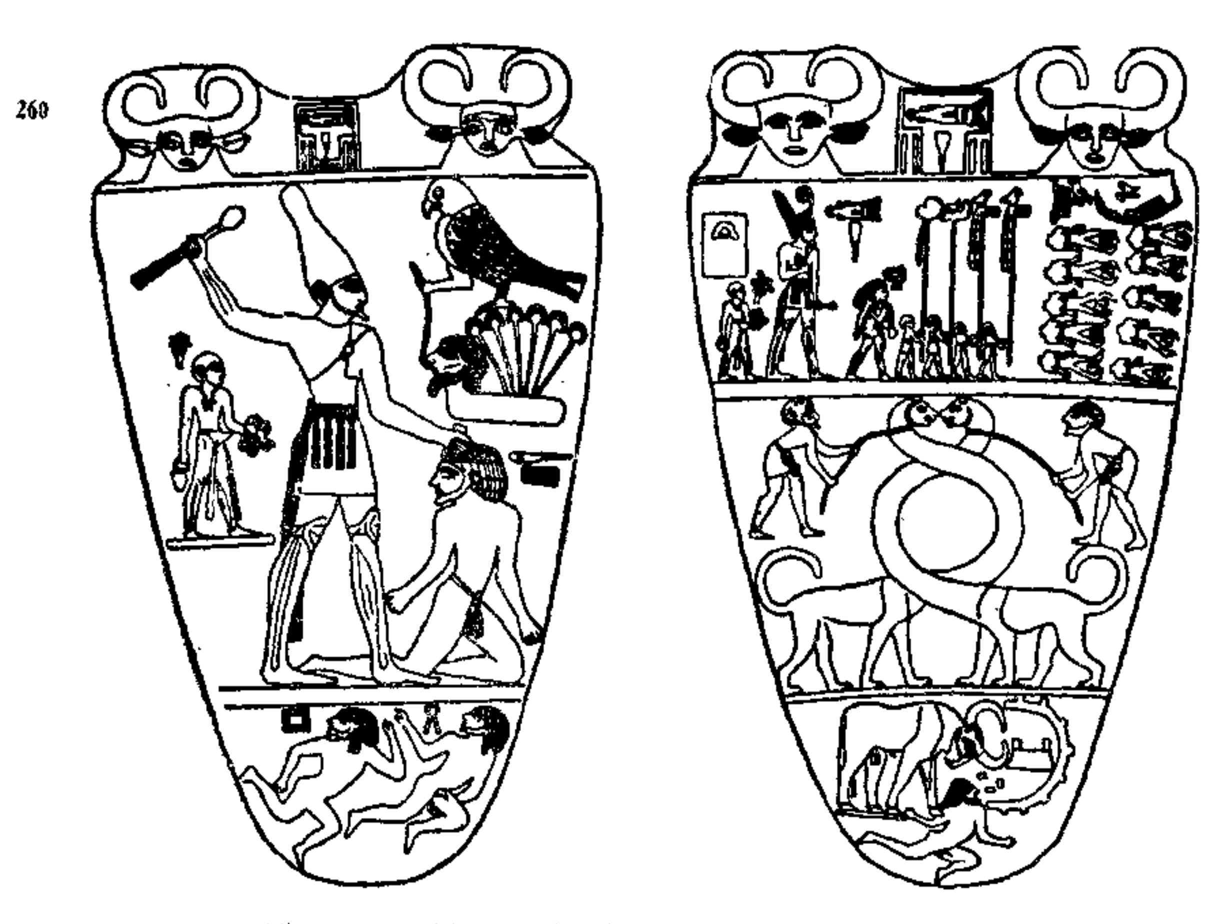
麦格雷戈书(212页)，蛇；戴雷尔书，很长的蛇；... 在埃菲克语中表示蛇，而元加语则用ehaw表示蛇

塔尔博特书，光芒四射的太阳，埃菲克语用otinn 表示太阳，而元加语却用duawng表示太阳

塔尔博特书16，新月，在元加语中，月亮是ebt

[34] 关于恩西比迪图画文字，特别要参阅我们所引述的J.K麦格雷戈的书第215页、217页、219页，书中从1—98给各种符号编号；E.戴雷尔的书，LXV－LXVII，共列363个符号，P.A.塔尔博特的书，附录G，"恩西比迪符号"，448页－461页，列举了77个符号和8段文字材料。

260



照片 10.10 那迈尔王的纪念石碑(选自 C. A. 狄奥普,1955 年,非洲风貌)

编者的说明：

关于非洲“人种”与历史的若干理论

J.基-泽博

251

人种的概念是最难用科学术语下定义的概念之一。如果我们同意达尔文以来的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人类是单独的一系①，那么“人种”理论只有在进化的环境中才能科学地发展。

人种变化是进化演变全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如J.吕菲耶指出的，它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分离生育(往往是部分的)，它逐渐产生一种特殊的遗传和形态状况。因此，人种变化是遗传基因种系的区别引起的，要末归因于遗传变化（也就是说，遗传基因的随意传播导致某一具体的基因比其他基因传播得更经常，当然除非等位基因传播的范围更广），要末归因于自然选择。后者导致了适应性变化的产生，通过这种变化，一个集团倾向于保留使集团最适应某种环境的遗传特性，在非洲，这两个过程显然都有过。在一些小集团内发挥了最强有力的作用的遗传变化，也会在有限的人群范围内起作用，他们在频频发生领土争端和其他争端的年代里，不管怎样说都经历了二元分裂的社会过程，出现这样情况还由于他们能够利用极其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在同一部族内部通婚的和住在森林里的各民族的遗传特征尤其会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而自然选择将在沙漠、茂密的森林、高原地区和长满热带红树的海岸地区等不同环境中起作用。用生物学中的术语来说，这相当于一个“人种”中的成员共同具有某些遗传因子，这些遗传因子在另一个“人种集团”中则被他们的等位基因所取代，而在混血种人中，这两种基因都存在，处于共存状况。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人种”最初是根据一些可见的标准来识别的，但是一些更深刻的实际情况却逐渐被人考虑。的确，表面的特征和内在的现象并不完全无关。因为尽管肤色是由取决于某些遗传基因的遗传机制所决定的，但是它也受环境的影响。人们注意到，在身材与最热月份的最高温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正比关系，而在身材与湿度之间则存在着反比关系。同理，窄鼻子在较冷的气候中更能使空气变暖和，并使干燥的空气变湿润。这就是为什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各民族从沙漠地带穿过热带大草原来森林时，他们的鼻指数有明显升高的倾向。虽然他们有着跟白人一样多的汗腺，但他们排的汗多一些，这使他们的身体和皮肤保持较低的温度。

252

因此，对人种进行的科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① 关于多中心理论及其变种的情况，见G.魏登赖希(G. Weidenreich)和库恩(Coon)的著作以及罗伯茨(Roberts)提出的反驳证据。

形态学方法

赖克施泰特把人种定义为“属于原始人类的各种形式的自然的动物组合，从形态学和行为学的观点看，其成员表现出同样的、典型的一套规范的遗传特点。”

现在有一整套观察方法和测量方法，这些方法从有关肤色和发型或人体毛发质量的材料直至有关度量方面和非度量方面的特征的材料、甚至包括前部大腿弯曲和臼齿尖与臼齿槽情况的材料。人们特别注意头指数，因为它跟头部容纳大脑的那个部位有关。例如，狄克逊根据用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的3种指数——水平头指数、垂直头指数和鼻指数——来确立各种类型的指数。但是在27种可能的组合中，只有8种（最经常发生的组合）被承认是基本类型的代表，余下的19种都被看作是混杂型。然而，形态特点或多或少地只是遗传贮存的一种不正常的变种。很少发现这些特点在一种完美的原型中结合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别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那些特点更多地是获得的，而不是遗传的。

这说明了形态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最严重的弱点之一，人们最终会发现该方法的例外情况会比规律性更明显、更多。此外，我们不应忽略对于测量方法（怎样以及何时等等）的学术性辩论，因为这些方法使人们无法进行可靠的比较。多变量差数据和人种相似的“形式”与“模型”数据的相关因素，纳哈拉·诺维斯的概括的差异——所有这些都在起作用，但是人种是一个实在的生物实体，它应该作为一个起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作为一个被割裂的标本来考察。

人口统计或种群分析方法

因此这种方法从一开始便把全部力量集中在群类遗传因子（基因汇聚或染色体组）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群类遗传因子不如个人的遗传结构容易发生变化。实际上，这是在某一人种中所观察到的特点的出现率，而不是对鉴定某一人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特点本身。既然形态学方法实际上已经被抛弃[2]，那么血清因子或遗传因子便可以根据一些更客观的规律来进行分类。兰德曼认为，一个人种就是“一群人，跟其他群类的人相比，他们彼此之间（少数例外）表现出更多的遗传型相似点，而且还很经常地显示出表现型*相似点”。阿列克谢耶夫也遵循人口统计方法来探讨使用纯粹地理名称（如北欧人、非洲南部人等等）的人种的问题。施韦德伊茨基和博伊德强调了遗传分类学：A型、B型和O型血的类别；Rh因子的结合；唾液分泌基因，等等。

血型专家也重视解剖学，但只是在分子方面。他们关心的是描述其抗原结构和酶结构各异的那些人的细胞的微小结构，为达到此目的，最合适的组织就是血液。在对人类种群

② 参阅K.威尔金斯基（K. Wiercinsky），1965年的著作。

* 表现型（genotype），生物学术语，也称表型，跟遗传型不同，前者指凭肉眼能见到的特征作为区别而形成的一型，遗传型依据的是遗传特征。——译者注

进行的科学鉴定工作中，血标为产生一次历史性的、质的飞跃提供了可能性。跟形态标准相比，血标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它们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它们几乎总是一次便可做出判断，也就是说，血标的存在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基因，而例如头指数，则是许多很难精确表示的因子产物③。

再有，当形态标准变成数字，从而导致任意的和界限不清的差别(例如在典型的短头颅和典型的长头颅之间)时，根据血标就可以判断是哪种情况。一个人是A型血，或者不是；是Rh因子阳性，或者是Rh因子阴性，凡此种种。此外，血液里的遗传因子几乎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血型在合子(受精卵)形成的时候是耐久不变的，这样，血标就不受形态标志的制约：个人是按照遗传型来描写的，而种群则是按遗传型的出现率来描写的。这些因子的高度精确性弥补了它们只代表组成一个基因型的大批基因中的一小部分这个缺陷。这为绘制传统的“人种”地图提供了可能性。

已确立了血液因子的三个类别。某些血液因子，如ABO系统中的血型，无例外地存在于所有传统的人种中，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在人性发展之前就有了。其他血液因子，如Rh因子系统中的变种，是无所不在的，但在某些“人种”中占优势：染色体r主要是存在于白人中，而染色体Ro(即所谓“非洲染色体”)在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中具有特别高的出现率，因此必然会有一些系统从人类开始进入种种生态环境时就有了。变种的另一个类别甚至表明了更清楚的人种界限，例如萨特氏因子和亨肖氏因子几乎只有在黑人中才能发现，而凯尔抗原则主要是存在于白人中。虽然这些因子从来不是完全排他的，但它们还是被称作“人种标志”。最后，某些因子在地理上限制在很小的地区，沃尔特高原地区的民族中的血红蛋白C便是一例。 264

虽然血液因子作为适应性变化并没有直接的意义，但它们跟环境的易传染方面和寄生方面却不是没有关系的：后者可能对有存留价值的血液因子有选择地起作用，因而导致，例如，特有的血红蛋白的存在。一个例子是跟红血球中的镰形血球或镰状红细胞的存在有关联的血红蛋白S，后者是在非洲和亚洲的黑人的血液中发现的。血红蛋白S(Hb S)只有在纯合体的情况下才是危险的，它是对**恶性疟原虫**，即疟疾寄生虫的存在的适应性变化。

研究广阔区域的血型为建立同基因曲线提供了可能，这些曲线表明全世界血液因子的地理分布。这一研究连同发生年代学的计算，使我们对不同种群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基因传播的方向使我们有可能重构它们演化的早期阶段。

尽管血型和种群分析方法有其显著成就，但是却碰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它的各种参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同时这些参数已经在产生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奇怪到了如此地步，以致被人看作是异常的。因此，L. L. 卡瓦利－斯福尔萨关于世界民族情况的谱系树便背离了人体测量分类法。人体测量分类把非洲的俾格米人和桑人跟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人都归并在人体测量的同一个分支里，但是根据谱系树显示的情况看，俾格米人和桑人跟法国人和英国人更接近，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则更接近于日本人和中国人④。换

③ 参阅J. 吕菲耶(J. Ruffie)，1977年a。

④ 引自J. 吕菲耶1977年a的书，第385页。再有，根据某些遗传特征(达菲系统中的Fy^a抗原，Ro等位因子，等等)在美国发生的异族通婚引起了白人与美洲黑人的混合，这种混合的百分比估计为25–30%。某些科学家据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在这里说的这种白人和黑人的混合是一个新的人种集团，有些草率地把它称为“北美有色人种”。

句话说，人体测量特点受气候的影响比基因受气候的影响更多，这样，形态上的关系是个环境相似的问题，而不是遗传特征相似的问题。R.C.莱翁汀根据血型研究所写的著作指出，对全世界来说85%的变种发生在各个民族**之内**，只有7%的变种发生在属于同一个传统人种的民族之间，而且只有7%的变种发生在传统的人种之间。总之，在同一人种集团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差别比在“人种”之间存在的差别要多。

正因为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采取全盘否认人种存在的极端立场。J.吕菲耶认为，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居住在根本不同、相隔很远的生态区域的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开始发生分化以适应十分强大的淘汰压力——他们的技术来源极其有限——并产生一些变种：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最早的智人。例如，外表是身体最受特定环境影响的部分，进化得很不一样；在赤道地区，皮肤里的黑色素逐渐显现出来，等等。但是这一变异趋势很快就停了下来，停留在初期阶段。各地的人类都开始使自己适应所在的环境，但并非从形态上，而是从文化（也就是说，从衣、食、住等方面）上去适应。在气候炎热的赤道地区出生的人，在长时期中是作为已绝种的灵长类和能人甚至直立人进化的。“只有在第二冰河时代，由于有效地控制了火，直立人才选择了在寒冷气候中生活。人类正从多型向单型过渡，人种统一的这个过程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全人类今天都必须被看作是互相有联系的基因的单一汇聚”⑤。

1952年，利文斯通发表了论“不存在人种”的著名文章。鉴于为描写人种而采用的标准极为复杂，从而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他建议抛弃林奈式的分类法，并提出了一种“谱系图”来取而代之。在未被阻隔的区域里，某些特性或基因的出现率在各个方面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种群之间的差异跟他们之间的自然距离是相吻合的，遵循一种地理上的梯度变化曲线。把各种不同特性跟可能促进这种特性发展的选择性因素和适应性因素联系起来，我们就可发现跟工艺、文化和其他因素显然有密切得多的联系的出现率，这些因素跟“人种”分布地图不完全一致⑥。每当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标准（肤色、头指数、鼻指数、遗传特点，等等），就获得了一种不同的地图。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得出这种结论：“关于人种的全部理论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而且可以说是虚构的。”

“根据人类遗传学中的最新进展，如今任何生物学家都不再承认，在人类中存在着各种人种”。⑦从生物学上讲，肤色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染色体组相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要素。本特利·格拉斯认为，白种人之不同于黑人，至多不过是6对基因。根据基因的数目来看，不仅在白人中，同样在黑人中常常有比这更多的变种。教科文组织根据这一情况，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专家会议，并发表了大意如下的声明：“人种与其说是一种生物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神话”⑧。下面的事实可说明这一说明的真实性：在南非，一个日本人被看作是“名誉白人”，而一个中国人则被看作是“有色人”。

希尔诺把人类比作遗传区域网，即形成各民族的集体染色体网，这些民族在不同程度

⑤ J.吕菲耶，引自E.迈耶(E.Mayr)，1977年a的书，第115页。
⑥ 参阅M.F.A.蒙塔古(M.F.A. Montagu)1952年的著作。
⑦ J.吕菲耶，1977年a，第116页。
⑧ 关于人种问题的四项声明，教科文组织，巴黎，1969年。

上是相似，性质上的不同是通过数量的估计(数字分类)来表示的。根据气候变化率所确定的这些区域的界限，实际上是随着影响各集团的可见特征(表现型)和血清数据(遗传型)的所有变化而变动的。

这证实了达尔文的卓越直觉知识，即任何“人种”归根结蒂都似乎跟一种无穷尽的过程是一致的，后者跟在流体动力学中观察到的那些过程相似，而且，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并正在成为混血人。实际上，每当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一同出现，可以从科学角度把这种结果分析为一种基因突变而且基因传播会影响这两个民族的生物贮备。

但是，即使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即使有关集团真正接受这些变化着的遗传区域，我们能否说“种族”感情就因此被根除了呢？这些集团的可见的和有形的差别仍然会以表现型特征的形式明显地表露出来。

纳粹分子——希特勒和其他假知识分子——断言，地中海人是雅利安人(“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和黑人(“根据血统属半猿人”)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从那时到现在，人种的神话一直十分顽固，固执己见的形态学家仍然有气无力地死抱着他们那种毫不足取的见解⑨。林奈在十八世纪把人类分为6个人种：美洲人、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未开化的人和畸形人。我们可以相信，种族主义者属于最后两类人中的这一类或那一类！

因此，我们可从所有这些理论、命题和假设中选出“人种”现象的有力特征，进行更严密的研究，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是处理许多不同等级的缓慢而复杂的变化过程，在这些等级中，肤色的变化——即使是用电子分光光度计测量的——和鼻子的外形所占的地位很低，几乎可以不去管它。“人种”动力学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即可以看作是正在发挥作用的巨大生物数据库的遗传特征，以及最广泛意义的环境，因为胎儿时期的环境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始的。

267

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要末是以选择和难以检验的基因移动（异种通婚)的形式出现，要末是以遗传变化或有偶然性的基因突变的形式出现。总而言之，一个种群的全部历史才能说明该种群当前人种概貌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集团的态度、宗教与规定食物、衣着和其他习惯。

根据这一点来看，就非洲大陆而言，我们能对人种说些什么呢？由于非洲的土壤潮湿，酸性又大，人类化石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因此，很难对人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然而，可以说，与力图把非洲居民说成是亚洲来的移民的欧洲理论相反，⑩非洲居民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作者认为，既然黑色是一种抗御有害光线，特别是抗御紫外线的自然保护色，那么住在赤道地区的非洲大陆最早的居民的肤色必然是黑的（布雷斯，1964年)。北部各民族的白皮肤和浅色眼睛被认为是由于突变或选择压力引起的第二特征(科尔，1965年)。

今天，虽然我们还划不出固定不变的界线，但我们能够鉴别住在撒哈拉沙漠两边的非

⑨ J.吕菲耶引述了一本在1972年还在坚持人种概念的法国医学与生物学词典，他说，根据形态、解剖、社会(以及心理)标准看，共有3个主要的类别：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在本世纪初，夏尔·塞纽博斯(Charles Seignobos)在《文明史》一书中写道，“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在语言、智力和感情方面也有所区别。这些区别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地球上的居民细分为若干类别，名为‘人种’。”

⑩ 说上含米特理论(塞利格曼等)的部分原因是提出理论的人对某些事实无知，部分原因是他们企图证明殖民体系是合理的，因此这种理论是伪科学解释中最富于种族主义的。

洲大陆上两个主要的"人种"集团。北部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集团，他们从"地中海"各民族(利比亚人、闪米特人、腓尼基人、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等)获得遗传特征和文化传统，而南部则是黑人集团。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使沙漠消失的气候变化，在数千年中造成了大量混血的居民集团。

内·马萨托什和A.R.罗伊·考德胡里用了几十种血标来研究白人集团和黄种人集团内和两者之间的遗传差异⑪。他们使用了相关系数，来确定这些民族分离和最后变成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大致时间。黑人集团看来是在12万年前分出来的，而黄种人和白种人只是在55,000年前才分出来。J.吕菲耶认为，"这种年代计算与我们的基本集团的大部分材料相符"⑫。从那时起，不同人种通婚便在非洲大陆频频发生。

人们甚至试图对种群的主要成分进行统计分析，借以说明种群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268 杰夸尔德用包括18种因子的5种血型系开始了这项工作，其对象是从地中海地区至撒哈拉以南的27个种群⑬。他概括出包括4个聚合体的3个主要集团，这4个聚合体是：北部聚合体是白种人聚合体，包括欧洲人、雷吉巴特人、沙特阿拉伯人和凯尔·库默尔·图阿雷格人；南部聚合体包括阿加德兹的黑人集团；中部的两个聚合体包括某些博罗罗·富拉尼人、阿伊尔和塔西利的图阿雷格人、埃塞俄比亚人等；但是还有传统上被看作黑人的哈拉廷人。因此，如果把这种分法看作是支持把人划分为人种的传统分类法，那就错了，因为除了上面谈到的情况外，这种分法还取决于要研究的材料的数量；如果数量很少，那么几个点就可以群聚成一个。

关于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人，应当注意的是，林奈最初给他们起的名是Homo afer(非洲人)，稍后被称作"Negroes"(尼格罗)，后来又被称作"blacks"("黑人")，有时"negroid"(准黑人)这个术语被用来包括非洲大陆边缘地区或其他大陆都可发现的跟黑人相似的所有人。今天，除了为数很少的几种不同意见外，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撒哈拉以南的民族在遗传上是基本一致的。人种的谱系分类法方面的作者博伊德认为，只存在着一个准黑人集团，该集团散居在非洲大陆的整个南撒哈拉部分，但在埃塞俄比亚也有，它跟所有其他主要集团都很不同。希尔诺的研究提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主张。希尔诺并不否认变异在当地是明显的，他对101个种群的5,050种差异进行分析后，获得了调查结果，说明南撒哈拉这一广阔区域的各民族是一致的，该区域包括"苏丹人"和"班图人"、海岸地区的居民和萨赫勒地区的居民、"科伊桑人"、俾格米人、尼罗人、富拉尼人以及各种不同的少数集团，如跟"埃塞俄比亚人"近似的各种少数集团。另一方面，它还说明了把"亚洲黑人"同非洲黑人分开的重大遗传差异。

语言学领域虽然同"人种"问题无关，但在种族主义理论中也被用来发明一种反映所谓"人种"等级的语言等级，"纯粹的黑人"被置于等级阶梯的最低级，即使如此，一些新的分类体系正在越来越明确地说明非洲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

躯体的变化可以根据上面讨论的变化原因从科学角度加以解释。特别是生活小区一旦

---

⑪ N.马萨托什(N. Masatoshi)和A. R.罗伊·考德胡里(A. R. Roy Coudhury)，1974年，第26、421页。
⑫ J.吕菲耶，1977年a，第309页。
⑬ A.杰夸尔德(A. Jacquard)，1974年。

可能产生一些更混杂的种群的结合体(如尼罗河盆地)，有时也可能产生显示相对反常的特征的各民族居住的小块地区，这在多山地带、森林、沼泽地带等可以发现。最后，历史是造成其他一些反常现象的原因，因为这些反常现象是入侵和迁徙造成的，特别是在边远地区。阿拉伯半岛从生物学的角度对非洲之角所产生的影响在该地区的各民族——如索马里人、加拉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中也很明显；但是毫无疑问，在特达人、富拉尼人、图库勒人、桑海人、豪萨人等民族中也同样很明显。我曾看到马尔卡人(上沃尔特)具有非常典型的"闪米特人"的形象。 269

总之，非洲表现型的多种多样是一种迹象，说明这个大陆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内一直在进化。现有的史前残遗化石表明，撒哈拉以南发现的模式标本，已在南非到撒哈拉北部的广大地区固定下来。苏丹地区显然处在这些种群迁移的十字路口。

非洲历史不是一部"人种"史，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关于某些人种优于其他人种的伪科学的神话，却被过分频繁地加以滥用，无法说明某种历史记载是正确的。甚至今天，混血种人还被认为是巴西的白人和美国的黑人的结合。人类学科学已经充分说明人种和智力程度之间并无联系，另一方面又发现，这种联系有时确实存在于人种和社会阶级之间。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文化的历史地位一直明显地优于生物学，但人们很可能会问，这种历史优势到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的思想上占上风呢?

第十章术语 270

Allele(等位基因)—— 一对基因中的任何一个。

Selection(选择)——遗传型从一代到另一代的区别繁殖。

Genic migration(基因移动)——繁殖的个体从其最初的种群到选定的种群的交换(不同人种通婚)。种族主义者认为不同人种通婚有害于所谓高等人种，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人种通婚说明了人类基因汇聚之丰富，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尽管它有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

Genetic drift(遗传变化)——遗传特征组成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偶然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团中，造成基因出现率的降低或等位基因的消失。

Mutation(突变)——通过改变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因而发生的一种遗传特征的变化。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作为《非洲通史》计划的一部分所写的研究论文：

J.希尔诺：《关于人种概念的报告》，巴黎，1974年。

J. P.赖特迈尔：《对非洲人种史与种群史的评论》，纽约，1974 年。

E.斯特劳哈尔：《人种研究问题》，布拉格，1976年。

(黄长著译)

271

11 迁徙与种族分化和语言分化

D. 奥尔德罗格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非洲各民族从来没有自己的任何历史，也没有他们所独具的任何发展。一切具有文化成就性质的东西统统被看作是亚洲来的一批批移民从其它地方带给他们的。这样一些信念在十九世纪许多欧洲学者的著作中都有。那个时期从事写作的德国人种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把这些信念以金科玉律的形式系统化和具体化了。那时，德国是研究非洲语言和文化的学者的主要研究中心。非洲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以后不久，介绍殖民地国家各民族的生活与习俗的著作开始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问世，从科学的角度研究非洲语言的潜力最早是在德国被认识到。1907 年，在汉堡建立了殖民研究所，后来成了一个庞大的科学研究中心，并负责出版德国派非洲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跟其它殖民主义大国相比，德国在这一领域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为在英国，东方问题研究院直到 1917 年才开始讲授非洲语言，而当时在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几乎不怎么注意非洲语言。只是到 1947 年，伦敦的东方问题研究院才改名为“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院”。法国也是在晚些时候才开始系统讲授非洲语言的。

德国学派的理论与最新发现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前的那个时期，德国在研究非洲的历史、人种史和语言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还说明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出版的著作都是以德国学者的理论为根据。因此，二十世纪初，西欧的人种史学者继续保持德国学者所宣传的观点，即非洲各国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而且这些看法给语言学家的所谓含米特理论提供了根据，这种理论认为非洲文明的发展受到来自亚洲的含米特人的影响。

272

对这些思想进行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思想都来源于黑格尔，他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两类：对人类历史发展做过贡献的历史民族和没有参与世界的精神发展的非历史民族。

黑格尔认为，非洲本土没有历史发展，这个大陆的北部边缘地区的命运可以说是跟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他把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看作是亚洲的组成部分，他在埃及看不见有任何体现非洲精神的东西。黑格尔的看法对十九世纪有关非洲的几乎全部科学研究，特别是对施瓦茨就非洲各民族的历史所做的初步探索，有很大影响，施瓦茨把欧洲人种的历史比作阳光明媚的一天中发生的事件，而把非洲的历史比作睡眠者一觉醒来随即忘记的无聊的梦。

黑格尔说，精神之光发亮的地方和世界历史开始的地方是亚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且欧洲的学者都把亚洲看作是人类的发源地，侵入欧洲和非洲的所有民族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下述情况很有意思：英国的人种学者斯托认为，非洲最古老的居民——桑人——是分两股迁徙浪潮从亚洲来的：第一批由岩石画师组成，第二批由岩石雕刻师组成，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斯托认为这是完全可信的。据说他们是由曼德海峡穿越红海，然后通过热带森林到达非洲大陆的最南端的。

德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 Fr. 斯图尔曼的著作对德国学派提出的并为其历史根据和文化根据所证实的论点做了最充分的说明，这个论点认为，一批批移民逐渐占据了非洲大陆。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有人对构成 R.泰勒、L.H. 摩根、卢伯克等人著作的理论基础的人类进化信条，发动了强烈的攻势。这个文化和历史思想学派否定了关于人类一致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一种认为存在不同文化循环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这些文化循环由于主要物质文化所产生的一些内在要素而有所区别。这些作者认为，文化成就的传播主要是由于迁徙造成的。首先提出这一见解的是德国学者莱奥·弗罗贝尼乌斯，随后，安克尔曼描述了整个非洲的文化循环的进展。但是对非洲文化发展做出最详尽的叙述的还是斯图尔曼，他认为非洲最初的居民由小个子民族——俾格米人和桑人所组成，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文化基础。后来，黑皮肤的、有毛茸茸头发的黑人随着从东南亚掀起的迁徙浪潮来到了非洲，他们分布在整个苏丹草原上并深入到热带森林，他们带来了早期的农业、香蕉和块根植物种植技术、木制工具和弓箭的使用技术，以及建造圆形和方形棚屋的技术，这些民族说的语言自成一体。继他们之后，纷至沓来的应该也是来自亚洲的原始含米特人，然而这次却是来自比黑人的故乡更靠北的地区。新来的这些人说的语言是具有若干名词类别的粘着型语言。他们教非洲本土各民族如何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锄，教他们种高粱和其它谷物，饲养牛等等。原始含米特人和黑人之间的异族通婚生出了班图民族。继他们之后，是皮肤白皙的含米特人的大批侵入，其中有些通过苏伊士地峡，另一些人穿过曼德海峡来到非洲。据说他们是富拉尼人、豪萨人、马赛人、巴利人、加拉人和索马里人的祖先，同时也是科伊科伊人的祖先。最后来的这些人又给非洲带来了一些文化成分，引进了大角牲畜、矛和盾以及对皮革的许多用法，等等。斯图尔曼认为，这些白皮肤的含米特人最初是从亚洲西部的大平原来的。继含米特人之后，潮水般涌来的是闪米特人，他们为古代埃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带来了谷类植物的栽种技术，带来了犁和青铜的使用方法。在埃及，紧跟闪米特人来到的是喜克索人和希伯来人，而在埃塞俄比亚高地，继闪米特人之后来到的是哈巴沙特人和梅赫里人，来得最晚的是阿拉伯人，他们是公元七世纪才来的。所有这些民族都给非洲带来了新的文化成分，而在他们到达之前，非洲人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文化成分的。斯图尔曼的著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久，于 1910 年在汉堡发表的，但是他关于非洲文化是由外来种族逐渐建立的见解，后来又被其它人种史学家发展了，如德国的斯帕瑙斯和路山，英国的塞利格曼，奥地利的霍尼。

273

在语言学中，含米特理论是跟文化－历史学派的各种理论同时出现的。这一理论的创立者迈因霍夫认为，今天的桑人的祖先是非洲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人，而且桑人是完全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种的一个人种，他们说的语言都具有吸气辅音，而黑人被看作是赤道和苏

丹地区土生土长的人，说的语言是具有单音节词根的声调语言，自成一体。后来闪米特人取道北非从阿拉伯半岛进入苏丹。这些新来的人说屈折语言。他们从事牲畜饲养业，而且从文化观点来看，他们的水平比黑人高得多。然而，有些闪米特人入侵者穿过东非大草原，跟当地居民通婚，生出了说班图语的各个民族。

总之，这一模式可以归结为一部有四集的系列影片。开始时，是具有吸气音的语言，紧接着是苏丹黑人说的一些发展很不完善的语言，都各成一体；它们跟含米特诸语言混在一起产生了高级的粘着型班图族诸语言；最后是含米特征服者说的语言，这些语言引进了明显的高级屈折语言。许多语言学家都支持这种含米特理论，该理论从德国流传到整个西欧，乃至更远的地方。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理论全都破了产。它们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1924年在南非发现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化石。接着不仅在非洲南部，而且在北非，特别是在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曾经有，而且不断地有其它发现。所有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都确凿无疑地说明，在非洲，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人种变异的全过程。因此，认为非洲居民是连续不断的成批移民所形成的任何理论都站不住脚了。正如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阿朗布尔所正确指出的：非洲是能够按连续年代顺序来证明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唯一大陆。实际上，更新世灵长类时代的标本——猿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各有各的工具，从最久远的年代相继进入新石器时代。这证实了达尔文的理论，即人类最远古的祖先曾住在非洲大陆。此外，这些发现还证明：否认人类祖先的文化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方面，在阿特拉斯山脉，南部非洲和撒哈拉沙漠发现的岩石画和岩石雕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突出证据。

关于文化考古证据高度深刻性，已不再有丝毫可疑的了，因为绝对年代测定法现在已经补充了相对年代学。相对年代学是根据物件的形状和处理以及物件在地层中的位置，绝对年代测定法依据的则是碳-14法和钾-氩法这样一些科学方法。非洲各族人民文化演变格局已完全改观了。例如，已经发现，在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地区，新石器时代应该上溯到比原来想象的要久远得多的时期。这一发现完全改变了非洲和地中海世界之间，特别是和近东之间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交界地区的阿杰尔高原和塔德拉尔特-阿卡库斯发现的古代遗物，都是结论性的。对这里发现的炉边什物和陶瓷制品进行的检验表明，早在我们纪元前8,000年，人们就在使用陶器。在阿卡库斯，发现了一具带有兽皮衣服痕迹的准黑人型人的遗骸。各种物件经过鉴定，都是我们纪元前9,000年的。在阿尔及利亚阿哈加尔山脉也发现了年代相同的古代遗物，三个独立的实验室对这些遗物进行了分析。从这些发现中可以得出结论说，阿杰尔高原和乍得的恩内迪的新石器时代显然比马格里布诸国的新石器时代更早，跟欧洲南部的和昔兰尼加的属同一时代。

对下努比亚的新石器时代的营地发现的有机遗物进行研究的结果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些获得的结果有可能引出以下结论：早在我们纪元前13,000年，人类就已经开始采集野生谷类植物并用它栽种谷物，对在巴拉纳地区发现的古代遗物所做的放射性碳测定，表明年代为12,050±280年。采用同样的鉴定方法来测定图什凯地区的古代遗物的年代，表

明年代为12,550±490年。这证实，在尼罗河盆地，从野生谷类中采集谷物的做法比近东早4,000年。

按照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任何对非洲历史的叙述都应该以埃及为出发点，然而，今天有充分的根据来修正这种看法。美国的埃及古物学者布雷斯特德在本世纪初的著述中，把由埃及、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组成的地区描绘为"肥沃的新月"，这个地区也确实是构成了一个新月形，在这里形成了法老时期的文化，出现了苏迈尔和阿卡德这两个城邦。但是这些仅仅能上溯到我们纪元前6,000年或5,000年，而比那早得多的是，在位于印度河流域和大西洋之间的整个大片地区，由于存在着适合于畜牧业和初级农业发展的气候条件，而有利于出现一种原始形式的阶级社会和国家。

因此"肥沃的新月"只不过是在一个充满生机的广阔区域里的最后发展，在那里，人们逐渐熟悉了野生谷类植物并开始种植，同时也开始驯养大角牲畜——绵羊和山羊。由于研究了撒哈拉沙漠的岩画和采用了放射性碳测定法，加上对化石粉等进行的分析等等，从而为所有这一切提供了证据。我们可以期望以后的某种年代纲要能搞得比以前的更精确些，然而关于非洲的居民是从亚洲移民来的这个理论已经完全不可信了。相反，必须把非洲看作是一个中心，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石器时代初期)，人员和技术便从这个中心向外发展。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发现趋势相反的证据：移民的潮流回流到非洲大陆。

人类学问题与语言学问题

276

对非洲古代史所进行的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资料，对这种资料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人类学肯定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数据。人类特征持续的时间是很长的，而语言有时在几代人中要经历急骤变化，就象我们在一个民族移到另一语言区，或者该民族遭到说另一种语言的征服者的入侵时所看到的一样。这样，我们发现，北美的黑人，尽管其居住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跟他们起源的大陆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很不同，他们最初的人种类型依然不变，但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现在跟美国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的古代非洲文化背景和精神背景的唯一痕迹保留在诗歌、音乐、舞蹈和宗教信仰中。西迪人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是非洲人的后裔，几个世纪以前从非洲东海岸被运到了印度。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这些人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但是现在他们说的却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印度人的语言——古吉拉特语、乌尔都语和其它语言，因此仍然存在的能说明他们是起源于非洲的，是他们的体型。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非洲人带到异国去的语言，在一两代人中便失传了。我们还可以引述一下北非土著居民使用的语言的历史。

在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诸国之后，特别是在阿拉伯部落于十一世纪入侵这几个国家后，就语言和文明而言，北非这几个国家的居民变成了阿拉伯人。他们最初的语言仅仅残留在摩洛哥的部分地区，以及卡比利亚、内夫萨山和一些绿洲地带。但是，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最初的体型的主要特点一直没有改变，这说明，虽然人类特征易于受到生活小区对身体特点方面的影响，但还比语言或文化稳定一些。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总的

看来，整个非洲的近代人种类型的分布再现了主要人类集团的古代模式，这些人类学集团有时过于草率地称作"人种"。从很久远的年代以来，地中海人种的不同类型在北非部存在。一些准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东非，古人类学家在肯尼亚的几项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非洲大陆的最南部居住着桑人集团。热带和赤道森林从前覆盖的面积比今天的要大得多，很可能这里就是俾格米人出现的地方。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人种，由于气候极端潮湿，而且森林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光线，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体型发生了变化。被称作苏丹人或"刚果人"的准黑人人种，为了适应热带地区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西非更是如此。可能是因为热带的酸性土地不利于化石的保存，几乎找不到什么遗骸来鉴定并测定其年代。然而继阿塞拉尔发掘出第一批出土文物之后，各个不同时期的，有时是极古老时期的准黑人型遗骸，不只是在撒哈拉沙漠有发现，而且在尼日利亚南部也有发现。这种情况可能表明，这种特殊类型的人是在这里进化的。围绕撒哈拉这种早期居民的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根据对岩画的研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黑人在这个区域处于优势地位。虽然也可以发现其它一些人种类型，如具有非洲-地中海人特征的集团，他们也是这里的早期居民。在埃及，一些古埃及王国的文献和石碑提到了有白皮肤、蓝眼睛的特梅胡利比亚人，还提到了皮肤较黑的特亨努人。希腊的史料也谈到白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更靠南部的肤色较黑的埃塞俄比亚人。由此看来，利比亚古代的居民是由不同人种组成的。因此一位罗马作者写道："有些利比亚人象埃塞俄比亚人，而另一些则跟希腊克里特岛人有血缘关系"。① 尼罗河流域居民的种族成分看来是十分复杂的。由于撒哈拉沙漠干涸，那里的人退到了潮湿的河谷地带。准埃塞俄比亚人和非洲-地中海人集团跟苏丹人类型的黑人集团混在一起。同样类型的混合在跟撒哈拉沙漠相邻的所有河积盆地和湖积盆地也可能发生过，比如下塞内加尔、尼日尔中部和乍得湖。因为正如我们强调指出的，人类形体表现出显著的、经久不变的特点，往往数千年都无甚变化，把今天种族模式的某些主要特征回溯到史前时代，也许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无论如何，一个人种的形成是许多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逐渐产生不同的遗传特点，但是也通过遗传把这些不同特点留传下来。这些特点来源于一个民族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环境，适应阳光、气候、植被、湿度等等情况。

作为一个通例——自然有不少例外——人类学家都认为森林中的非洲人的身材十分矮小，而且肤色很浅，而大草原上的非洲人和萨赫勒人一定是瘦高个儿，皮肤较黑。但是，千万不可只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因为许多因素都在同时起作用。例如，具有不同遗传特征的集团的迁徙，立刻就会促使两种可能的变化根源发挥作用：第一个是生活小区的变化；第二个是不同集团的会合。并有可能发生异族通婚。每当我们注意两个在空间上相距甚远的民族集团、在身体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时，他们居住在同一个纬度上这个事实有可能为作出完美的解释提供线索，比如在沿尼罗河上游居住的丁卡人和塞内加尔的沃洛夫人之间就存在这种相似性，他们之所以看起来相似，是因为他们都是黑皮肤，高个子。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促使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这一点必须永远牢记。② 关于这一点，俾

① R. 弗埃尔斯特(R.Foerster)编：《相面术手稿》，1893年，第一卷，第389页。
② 参阅J. 希尔诺(J. Hiernaux)，1970年，第一卷，第53和55页。

格米人和桑人的这个极易引起争论的情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过去曾经假定，在非洲的俾格米人和亚洲南部的矮小人之间存在着人种上的联系，但是这个理论现在似乎已经被抛弃了。

看来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民族是某种体型适应所在环境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在一个长期隔绝状态中发生的。目前，俾格米人在喀麦隆、加蓬的大森林中，在中非共和国、扎伊尔和卢旺达的某些地区都可以找到。然而看来很清楚，他们过去居住的地区要大得多。西非的某些民族，口头传说提到了在高个子人到来之前生活在森林中的矮个子集团的情况。

西欧一些民族的种种传说谈到擅长金属冶炼并生活在山中的矮个子的情况。然而，由于我们拥有历史证据，表明俾格米人过去在一些地区存在过，而今天在那些地方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足迹，我们应当更认真看待有关比较矮小民族的传说。

最早提到俾格米人情况的材料，见于埃及古王国第六王朝的碑铭。在阿斯旺的赫尔胡夫③ 坟墓内壁上，刻有法老佩比二世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年轻的国王感谢赫尔胡夫作为礼物给他带来了一个叫 Deng 的矮人，在埃塞俄比亚的现代诸语中可以找到 Deng 这个词，例如，在阿姆哈拉语及其各种方言中，以及在蒂格里亚语、加拉语、坎巴塔语和其它一些语言中，这个词以 denk, dank, dinki, donku, dinka④ 等形式出现。这封信说，一个类似的矮人早在那以前一百年就被带给了法老伊塞西，就是说，是在第五王朝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回忆一下一个英国旅行家的报告，他曾谈到，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一些地区存在着许多被称为doko的矮人。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说明在现在的苏丹共和国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境内，过去曾有矮人在那里生活过。

生活在赤道森林中的俾格米人逐渐被进入森林的身材高大说班图语的民族所代替。俾格米人被赶到伊图里和韦莱的森林的最密和最远的地方，这些情况是在《恩松加-利昂加》 279 中叙述的，这是芒戈人的一组史诗，说的是扎伊尔盆地民族的组成情况。在说班图语的其它民族中间也有类似传说。因此，现在存在的相互隔绝的俾格米人集团所在地，可以被看作是残留下来的一块块飞地，证明有过一个比较大的种群，该种群一度住在非洲赤道森林和热带森林中。

桑人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另一个十分特殊的集团。他们的身材矮小，皮肤呈古铜色或黄色，同时，他们的头发呈卷状生长。在人类学研究中，人们还是把他们连同科伊科伊人一起归入“科伊桑人种”。毫无疑问，这是根据语言分类做出的推断，这种分类把桑人和科伊科伊人的语言都归入一个单独的语系中，该语系的特点是使用吸气音。“科伊桑”这个术语是沙珀拉提出的，现在在许多著作中都被采用了，“Khoisan”（科伊桑）是两个科伊科伊语词——khoi（科伊）和 san（桑）——的结合。其中 khoi 表示“人”，san（桑）的词根是 sa，表示采集可食的植物，把根拔起来，收集果实，还指捕获幼小的动物。因此一个人类集团是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命名的。然而，就事实而论，桑人和科伊科伊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特点。能够提出的倒是他们的浅色皮肤，以及在他们使用的两种语言中都有吸气的音。但

③ Herkhuf（赫尔胡夫）这个名字的准确写法应为Hrw-hwif（R. 赫佐格〔R. Herzog〕，1938 年，第 93 页）。

④ W. 莱斯劳（W. Leslau），1963 年，第 57 页。

是，我们应该记得，这并不是一种独具的特点，在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斯威士语这样一些东南支班图语言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吸气音。

不过，对这两个集团的人类特征所做的考察表明，科伊科伊人和桑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区别，比如在身材方面，前者明显地比后者高；在头部特征⑤、发型以及在妇女中非常普通的女臀过肥等现象方面，他们也不相同，而内眥赘皮的存在则是桑人所特有的。此外，科伊科伊人和桑人的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词汇方面都有所区别。这一领域的主要专家E.O.J.韦斯特法尔指出，言语中最古老和最稳定的部分——代名词——在科伊科伊诸语中已经有了相当高度发展的形式。它们具有两个性和三个数——单数、双数和复数；存在着内包形式和外排形式，而在桑语诸语言中则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⑥因此，把桑语和科伊科伊语划在一个语族中是没有足够理由的。就这两个民族的文化而言，他们在各方面都不同，况且这是十七世纪涉足南部非洲的第一批旅行家（如彼得·科尔布）注意到的。科伊科伊人生活在有栅栏防护的村庄里，从事金属冶炼并饲养牲口，而桑人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没有固定的住处。因此，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提不出足够的根据，来说明存在一个由科伊科伊人和桑人组成的科伊桑语族。

280

这两个民族集团的历史完全不同。桑人肯定是非洲大陆最南端最早的居民的残余，如今他们仅存在于纳米比亚和卡拉哈里盆地一些荒凉的无水地区。他们也以群体的方式散布在安哥拉。从前他们居住在南部非洲草原和远至肯尼亚边境地区的东非草原上，这些地区的地名和水文名证实，当地的河流名和山川名都借自桑人的语言；有几种班图语言借用了桑语所特有的吸气辅音。最后，南部非洲大草原上的岩画向我们展示了矮个子、白皮肤的桑人和高个子、黑皮肤的武士的武斗场面，后者的种族身分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使用的盾的形状辨别出来。生活在坦桑尼亚埃亚西湖地区的一个叫"哈扎皮"的小种族集团，进一步说明了以前桑人在整个非洲的定居范围。人们尚未对哈扎皮人的语言作足够深入的研究，但是有理由认为，这种语言跟桑人的语言有关。整个东非有许多中间穿孔的圆石，有时用这种圆石来证明下述论点：桑人过去占有的区域比他们今天居住的地区要大得多。桑人把这些环状石头称作"库维"(kwe)，用以套在某种棍状工具上以加重分量，来挖可食用的块根植物。然而却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技术是桑人集团传播开的，因此，如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和哈拉尔地区的加拉人中，人们用叫"冬戈拉"(dongora)的长圆头钻来掘地，这些圆头钻几乎总是装有上述环状石头。这种装置也被用来加重碾槌的分量以研碎烟叶。因此，不能支持以下看法：凡是可以找到"库维"一类的环状石的地方，桑人从前都涉足过。

但是，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不应只根据大森林中的俾格米人和热带大草原的桑人来判断，其他民族可能跟他们同时存在。比如，前不久，在安哥拉发现了一个夸迪人集团，夸迪人的生活方式酷似桑人，在语言上可能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维德研究了奥塔维人的情况，他们是前几个集团的残余。奥塔维人身材矮小，靠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跟桑人不同，他们的皮肤黝黑，嘴唇很厚。他们自称为"努科伊恩人"，意思是"黑人"，以别于被他们称做"红人"的科伊科伊人。这个集团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特征是他们的计数方法，这个

⑤ 关于这两个集团在头盖骨方面的区别，参阅K.阿列克谢耶夫(K. Alexseev)，1973年。

⑥ E.O.J.韦斯特法尔(E.O.J. Westphal)，1962年。

方法完全不同于科伊科伊人以十计数的方法。这样一些集团(或许在其它地区也有)，有力地说明了中部和南部非洲森林中和草原上最早的民族这一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在班图语言的词汇和语言中找到了答案，比如，吸气音的存在说明了各个种族集团很早就有接触。由此可见，班图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有时居然在词根构造方面都有区别，这种情况见于班图语区西北部的荆人集团的语言。这些区别只能是受先已存在的语言基础影响的结果。 281

上面谈过的俾格米人和桑人，今天跟占优势的"尼格罗人"集团相比，即便是跟北非的非洲地中海型人种相比，在数量上是很少的集团。

今天非洲的语言地图跟"人种"类型的分布并不一致，虽然在很久以前可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早期的种族集团长期来成倍地增加，迁徙以及和异族通婚，语言的发展和"人种"类型的形成在时间上不再是一致的了。各种"人种"类型的形成过程是指遗传特征以及对外界环境的逐步适应。现在，在人种分布和语言分布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这种情况在苏丹各民族中特别明显，苏丹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语系的会聚地区。

包括毛里塔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北非，属于广阔的闪－含语言区。这是一个不妥当的术语，因为它表明这个语系的语言分为两个语族——闪米特语族和含米特语族。在十九世纪，语言学家们的确认为，这个语系一方面由近东地区通行的闪米特语言和另一方面由非洲通行的含米特语言组成。但是法国闪语学家和语言学家 M.科恩说得很对，即没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分为两个语族。实际上，现在普遍同意把这个语系的语言分为 5 个语族：闪米特语族、库希特语族、柏柏尔语族⑦、古埃及语族⑧和乍得语族。由此可见，有好几个人种都说这个大语系中的语言，即包括闪米特人，又包括黑人。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桑语(还应加进安哥拉的夸迪语和坦桑尼亚的哈扎皮语)看来应该归属一个特殊的语族，后者拥有两个一般特点：存在着吸气音和一种特有的结构类型。因此最聪明的办法也许是把这些语言划为古非洲语言，就象用古亚洲语言这个术语来指东北亚一些边远地区的语言一样。

其语法结构各异的科伊科伊诸语言，不应包括在这一语族中。科伊科伊人曾经是家畜饲养者，他们把自己的牧群从东北非带到了南部，并定居在当地的桑人居民中间。桑人的一些集团，例如奥塔维山地区的一些集团，选择了科伊科伊语。这完全可能也就是桑人的核心成分的历史，特别是纳隆人的历史。这条路线可能确实是科伊科伊人在从北部尼罗河上游经过东非大草原向南延伸时所走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在离坦桑尼亚的埃亚西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桑达维人集团，他们的语言在系属上看来跟科伊科伊语有关。一般来说，科伊科伊人的历史是非洲种族进化问题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一点，可注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他认为，科伊科伊语中的吸气音可能是从桑语借来的。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但是迄今很难找到根据来支持该理论。 282

毫无疑问，东非大草原是非洲大陆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区今天只有讲班图语的黑色人种的民族，但是在他们之前居住的是桑人和科伊科伊人集团，这两个集团中的幸

⑦ 有些作者认为，柏柏尔语言是闪米特语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⑧ 某些研究埃及古代文物的学者认为，古埃及语是非洲的一种"尼格罗人"语言。

存者便是桑达维人和哈扎皮人。这个地区的其他民族说库希特诸语言或属于其它语系的语言，比如伊拉库诸语。这些语言都是说班图语的人到来之前在这些地区生活的各民族的语言，说班图语的人当中有些是在后来较晚时候才出现的。

在大陆北部说闪－含语的地区与南部说古非洲语言的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语言区，在那里居住的各民族说的语言，被德拉福斯称为黑非洲语言，迈因霍夫和韦斯特曼称为苏丹语言和班图语言，而格林伯格现在则称为刚果－科尔多凡语系的和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语言。

早在 1963 年，我就认识到这些语言的一致性，建议把它们叫做津吉语言。在这个总的范畴中，语系或语族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区分。

“黑非洲语言”这个术语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该术语的第一部分看来是把人种和语言的概念混为一谈了。美洲的黑人居民，以及有时甚至是非洲本土某些地区的黑人居民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该术语的第二部分——非洲——也不是妥当的，因为非洲居民所使用的全部语言，包括南非荷兰语在内，都是非洲语言。

此外，把“黑非洲”语言分成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苏丹诸语言和班图诸语言——看来也是一个错误，因为韦斯特曼的著作表明，西苏丹诸语言就其结构和词汇而言，都具有跟班图诸语言相同的许多特征。他的著作为全面修正德国语言学派很不适当的非洲语言分类法开辟了道路。

283

格林伯格提出的分类法所根据的是大量比较的方法。虽然他考虑语法结构的基本特征，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词汇上。格林伯格运用这一方法，于 1954 年区分了 16 个语系，后来又把它们缩减为 12 个。这以后，他于 1963 年再次把这个数字缩减到只有 4 个。在语系的数目上作如此迅速的缩减充分表明，他使用的方法是不够精确的，同时还说明，不顾一切提出一种分类法，委实太仓猝了。

在格林伯格保留的这 4 个语系中，亚-非语系实际上就是闪-含语系。至于所谓有吸气音的语言的语系（后来被称为科伊桑语系），它包括桑人和科伊科伊人的语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结合是错误的。除尼日尔-刚果语系（格林伯格后来把科尔多凡诸语言也加进去了）外，他还区分了由尼罗-撒哈拉诸语言构成的第 4 个语系，但对这些语言结构所做的研究实在太少了。1972 年，埃德加·格雷格森使用格林伯格的方法，得出结论说，后两个语系的所有语言仅仅构成一个单独的语系，他建议以刚果－撒哈拉这个名称来表示。

这种意见跟我自己建议把所有这些语言都归在津吉语系这个名目下的意见是一致的。该语系的特点是使用多种不同的声调和名词类别，这不同于具有自己独特的重读法和语法上的性的闪－含或厄立特里亚诸语言。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津吉语系或称为刚果－撒哈拉语系内部某些具体语言或语族的特点，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已显示出，例如，印欧语系所具有的那种一致性。

在这个很大的津吉语系中，班图诸语言无疑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布勒克、迈因霍夫和格思里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韦斯特曼在苏丹语族发现的一些分族中，曼德语很明显是最一致的。

曼德语族的西支和东支语言被韦斯特曼分别叫做西大西洋诸语言和古尔诸语言。然

而，西大西洋诸语言之间并不象曼德诸语言之间那样相似：于是英国语言学家在西大西洋诸语言中发现了一个不同的语族，他们把它称为梅尔诸语言。实际上，非洲的这个极西部地区是个庇护场所，这里，潮水般涌来的弱小民族在新来的人的压力下被挤到一块。这些语言中，有些仍然保持了班图语言所具有的特点，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布洛姆语。早些时候的假说认为，古尔诸语言构成一个独立单位，这个假说现在遭到这个领域中一位著名权威曼内西的著作的反驳。古尔诸语言中的名词类别是通过使用前缀、后缀、甚至附加成分等 284 大量不同的方法来构成的，这些名词类别的存在标志着这个地区的种族成分十分复杂，该地区是许多所谓古尼格里特集团的庇护所，从塞内加尔到科尔多凡的整个苏丹的山地都能发现他们。这个理论是说，他们是苏丹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居民的残存者。然而这种推论看来是毫无根据的。把群居在这些荒凉地区的各个集团硬拼在一起的组成情况无论就语言而言还是就人的体型而言都是极其不同的。苏丹编年史报道了这样一些事件，因此指出与其有关的进程并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由此可见，非洲的语言分化首先必须跟那些引起迁徙潮流的历史原因联系在一起。

在非洲所有的语言中，东苏丹诸语言似乎最不受注意。在苏丹各语言中，尼罗诸语言构成了一个单独的语族，甚至是一个单独的语系，就是说，一个在谱系上相近的语言的语系是在很长的隔绝时期中发展起来的。英国语言学家 M. A. 布赖恩和 A. N. 塔克的杰作表明，东苏丹各族人民的民族与语言组成情况是极端复杂的，这两位语言学家设想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方法，根据一些语言的特点的重要性来区分各种语言。这导致把东苏丹的语言分成两组：T/K 诸语言和 N/K 诸语言。

在这个很大的刚果-撒哈拉语系的各语族中，班图诸语言的谱系关系非常引人注目，以致必然被看作是一种相当近期的现象。在所有津吉语语族中，只有班图诸语言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单位，它们无疑构成一个在谱系上彼此有关的语系。阐明“班图人的起源”的问题，不只是语言学家，而且还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在大力进行研究。但是存在着若干种理论。一些人认为，说班图语的民族来自北部，更准确些说，来自喀麦隆地区，或者象一些人所想象的，来自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乍得盆地，有人认为迁徙是沿北部的森林边缘进行的，这样可从东面绕过森林，然后穿过东非向南部非洲进发。H. H. 约翰斯顿等学者认为，班图人是直接从非洲中部地区穿过扎伊尔森林来到的。最后，有些学者同意语言学家马尔科姆·格思里的理论，认为生活在卢巴人和本巴人中间的班图人的语言核心原型是在上扎伊尔，他们想象班图人的最初故乡是在那个地区。

更有甚者，说班图语的民族甚至被说成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和文化上的单位，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情况：班图这个术语只跟语言学有关。然而，有些考古学家把非洲大陆南部铁的 285 使用的传播跟班图人的迁徙联系起来，他们设想是班图人带来了这种优良技术。但是，当葡萄牙人在费尔南多波岛登陆时，发现当地居民说布比语——一种班图语言，但对铁的使用一无所知。这种把语言跟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混为一谈的错误，人种史学者已经犯过，他们认为“含米特人”涉及到一个人种、语言和文化的统一体。当人们正在追溯历史发展的情况时，最重要的不是着手去努力寻找纯粹的模式标本。

必须记住，说班图语的各个民族在他们的种种人类特征方面——他们的肤色、身高、

体格等等——是千差万别的。生活在森林中的说班图语的民族，跟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民族的身体特点不同。在父系家庭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说班图语的人属于母系制度，而另一些人则属于父系制度；有些人使用面具并成立秘密社团，而另一些人则根本没有这类活动。所有这些民族的唯一的共同东西，是以若干名词类别为基础的一种相似的语言结构，名词类别的标志总具有一个共同基础派生的相似语音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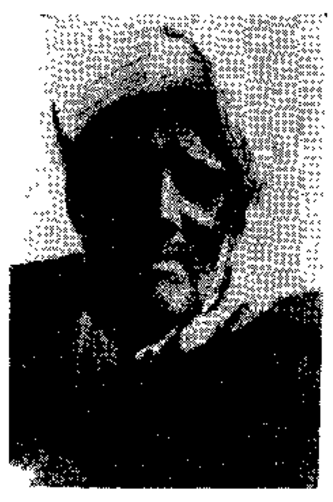
在苏丹草原上，显然存在着一些民族集团，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很长的时期，说的语言带有名词类别，在这些类别中，音调上的各种差别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撒哈拉沙漠干涸，这些民族撤到比较潮湿的地区：到北部的山区、东部的尼罗河盆地、以及到巨大的古乍得湖地区。这一群群的猎人和牲口饲养者赶走了当地人，迫使他们向南撤：要么到森林中去，要么绕过森林向东去。这些迁徙活动未必跟冶铁业传播的开始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某些新来者由于拥有冶金技术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所处的地位比别的民族更为有利。

事情是如此之巧，铜矿和古代的矿内作业区都分布在格思里定为班图语区中心地带的那个地区，在那里，卢巴语和本巴语包含属于“共同的班图语词汇”的最大百分比。铜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对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发展必定是一种促进力量。离中心地区越远，班图语的类型就越不纯，因为当说班图语的人离开中心地区后，他们就越来越多地与说其它语言的民族混在一起。

这一具体事例告诉我们，语言、人类学类型和文化的概念决不容混淆，但在多种人口流动而逐渐定居非洲大陆的过程中，生产方式对于语言发展，甚至对某些生物特征占优势也许经常起主要的推动作用。

286

（黄长著译）


照片11.1 摩洛哥人(里歇·奎基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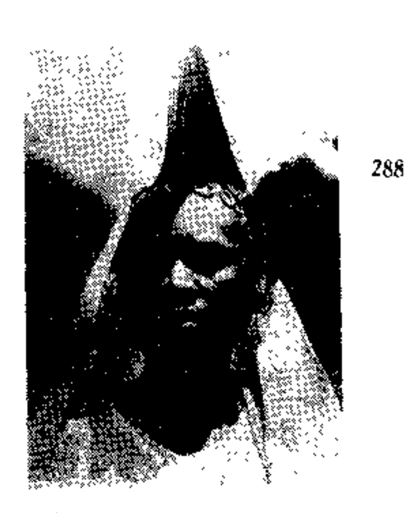

照片11.2 阿尔及利亚妇女和婴孩(A.A.A.热洁摄)

287


照片11.4 喀麦隆的加鲁阿 市莱汁近的富拉尼族妇女(霍尔摄)


照片11.3 阿尔及利亚伊德莱斯的哈拉廷族妇女(A.A.A.诺德摄)

288


照片11.5 富拉尼族妇女(引自海外文献)


照片11.6 毛里塔尼亚的萨拉科莱族妇女(属河流区域的索宁卡人集团)(B.南泰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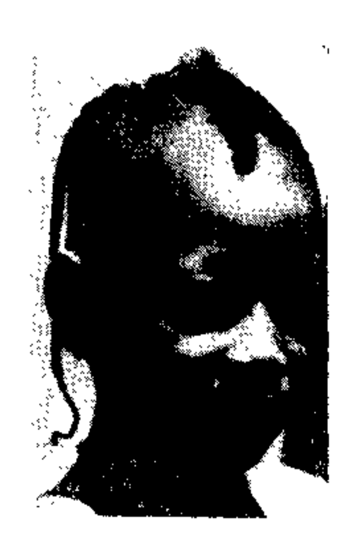

照片11.7 毛里塔尼亚游牧民首领鲁基茨(B.南泰特)

289


照片11.8 马里的富拉尼族姑娘(A.A.A.诺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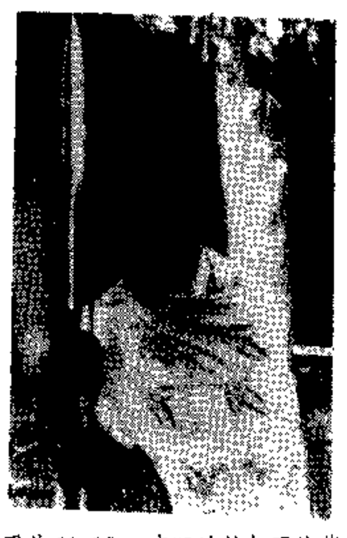

照片11.9 沃尔特人(A.A.A.诺德摄)


照片11.10 尼日尔巴拉耶拉的杰尔马桑海族妇女(B.南泰特)


照片11.11 尼日尔阿加德兹的图阿雷格族儿童(B.南泰特)

290


照片11.12 尼日尔博罗罗和塔瓦的富拉尼族妇女(B.南泰特)


照片11.13 卢旺达的特瓦族俾格米人(B.南泰特)


照片11.14 祖鲁族妇女(A.罗宾拉尔德,人类博物馆藏)

291


照片11.15 刚果的俾格米人(刚果通讯社,丹迪,人类博物馆藏)


照片11.16 桑人集团(F.巴尔桑摄,人类博物馆藏)

12 非洲语言分类

J.H. 格林伯格

292

语言分类的性质与目的

正如任何其它一组统一体一样，语言也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划分。

但是，通常称作谱系分类的一种特定方法，具有某些独特的和重要的特点，所以当"分类"这个术语在没有做出跟语言有关的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使用时，它就是字面表达的这种分类。因此，它将构成本章后几部分阐述的详细分类的基础。

一种谱系分类把具有相同逻辑结构的一组组按等级排列的单位的形式，当作划为种、属、族等项目的生物分类，在生物分类中，处于同级的一个组里的成员都被包括在较高一级的成员中。实际上这种情况可以用一种谱系树的形式来说明。对语言来说，在这样一种树形结构中具有一种直接的共同原始母语意味着，它们都曾一度是同一种原始母语的方言后来发生分化的继续。我们可以用众所周知的印欧语系的例子来说明。既然印欧语系还没有显示出它属于任何更高一级的组合，那么它就应当是我们所说的最高一级。印欧语系可划为若干语族，例如，日耳曼语族、克尔特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伊朗语族和其他语族。换一种说法就是：最初的印欧系语言统一体最终分为若干方言——日耳曼方言、克尔特方言等等。例如，日耳曼方言又分为三种方言：哥特方言、日耳曼语西支方言和斯堪的纳维亚方言。其中，哥特方言已经消亡，但从早期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它的情况，而日耳曼语西支分化为盎格鲁－弗里西亚语、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其中每一种都构成今天的地方方言，有些成了标准语的基础，例如，德语(高地德语方言)、荷兰语(低地德语方言)和英语(盎格鲁－弗里西亚方言)。

这些分类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反映了在语言方面种族分化的真实历史。其次，它们构成了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的基础，利用这些方法，可以重构各集团的大部分语言历史。293 最后，语言历史的这种知识为推论有关各集团的非语言的文化史提供了必要基础。

非洲语言分类的历史

显然，如果不积累非洲语言方面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足够材料，就不可能对这个大陆的语言进行全面分类。甚至直到十九世纪的早期阶段，才最低限度地满足了这一要求。然

而，即使在这一阶段以前，某些跟分类有关的研究工作就已经进行了，所根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十七世纪开始积累的，那时，非洲语言的第一批语法和词典已开始出版。① 例如，路易斯·莫里阿诺早在十七世纪初就注意到，马达加斯加语"跟马来语很相似，这种情况几乎是明白无误地证实：马达加斯加的第一批居民来自马六甲海峡地区的一些港口"。② 在差不多同样早的时期，几个葡萄牙调查者注意到，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的语言跟西海岸的安哥拉和刚果的语言很相似，这从而预示着班图语系这一概念的形成，该语系包括占非洲大陆南部三分之一面积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一个例子是约布·卢多尔夫在十七世纪对盖埃兹语和阿姆哈拉语的描写，他指出，这些埃塞俄比亚语言跟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和阿拉伯语是有关联的。

在十八世纪，关于非洲语言的知识只是稍稍有所增加，但是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发现，谱系分类的基本概念以具体假说的形式开始清晰些了，该假说认为存在着某些语系。正是这些假说构成了十九世纪语言学作为一门历史比较科学的发展基础。

研究语言学史的著作通常都引述威廉·琼斯在1786年的见解，他认为印欧系语言的关系对语言来说是决定性事件。这种见解很流行，从如下事实可以看出：早在五年以前，马斯登和焦尔马蒂就至少以同样明确的措词分别说明了关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和芬兰－乌戈尔语言的类似假说。

294

随着这些发展而来的是真正热切希望收集大量语言的比较材料。最早的一部这种材料是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1787年倡议编写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1790－1791年的修订版包括了30种非洲语言的材料。

十九世纪初期的一个特点是大大加速了非洲语言的语法和词典的编纂工作，同时也大大加快了相当多的非洲语言的比较词表的出版工作，如基勒姆（1841年）、诺里斯（1841年）和克拉克（1843年）的词表。③ 在这些词表中，就篇幅、系统组织和语音符号的连贯性而言，最重要的当推S. W. 克勒在弗里敦（塞拉利昂）撰写的经典著作《非洲的多种语言》。④

跟十九世纪初期积累这种材料同时进行的工作，是对全面分类所做的最初尝试，例如巴尔比的尝试和普里查德的《人类物质历史探索》⑤ 的相继再版。

尽管在细节上有差别，但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还是产生了一些普遍为人接受的结论。其中有些经受住了以后的研究工作的检验，而在其他情况下，有些结论至少引起了后来的分类者必须致力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到1860年取得的成果可以概括如下：

（1） 施勒策尔1781年采用的"闪米特"这个术语，已被人们按近似于它目前的形式来理解。⑥ 闪米特语言的埃塞俄比亚分支的存在得到了很好的确认，它包括盖埃兹语（古埃塞俄比亚语）和阿姆哈拉语与蒂格里亚语这样一些近代语言。

---

① 关于非洲语言历史的更详细的材料，见C. M. 多克（C.M. Doke）和D. T. 科尔（D. T. Cole），1961年的著作；D. T. 科尔，1971年的著作。研究中世纪史的作者在著作中也偶尔提到非洲语言的一些词，关于这些词的情况，见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12－1914年的著作，第281－288页；以及C. 迈因霍夫（C. Meinhof），1919－1920年的著作。

② 《1613－1614年圣洛朗岛探险记》，这是1903－1920年出版的葡萄牙文版的法文译本，作者系A. 格朗迪迪埃和G. 格朗迪迪埃（A. and G.Grandidier），第22页。

③ H. 基勒姆（H. Kilham），1828年；E. 诺里斯（E. Norris），1841年；J. 克拉克（J. Clarke），1848年。

④ S. W. 克勒（S. W. Koelle），1963年。

⑤ A. 巴尔比（A. Balbi），1826年；普里查德的书的最后一版是E. 诺里斯编辑和增订的：J. C. 普里查德（J. C. Prichard），1855年。

⑥ A. L. 冯·施勒策尔（A. L. von Schlozer），第8编，1781年，第161页。

（2） 其他某些语言与闪米特语言的相似以及与它可能的关系已被注意到。这些语言包括古埃及语、柏柏尔和库希特语言。库希特语言主要通行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人把西非的豪萨语也归入这一类。这些语言有时被称作闪米特语族下属语言。含米特语族这个名称是勒南于 1855 年提出的。⑦

（3） 在非洲南部，利希滕斯泰因被认为是首先明确区分科伊科伊语和桑语一方与班图语另一方⑧ 的学者。这时，才清楚地认识到有密切关系的班图诸语言间的一致性。它们有时被称为卡弗拉里亚语系，有时被称为南部非洲语系。"班图"这个名称来自许多班图语言都表示"人"的一个词，是 W. H. I. 布勒克首次提出的，1851 年他开创了班图语比较研究，从那时起，人们就知道班图语这个名称了。

295

（4） 还有一个很大的语族，这个语族包括通用于苏丹西部和东部的大多数语言，这些语言不能归属于刚刚提到的那些语族，也就是说，它们跟闪米特语族、含米特语族、桑语族或班图语族无关。这些语言通常被称作尼格罗语言，给分类学家造成的问题最大。诺里斯 1855 年修订普里查德的著作时承认，他们"避开了分类"，还承认，"迄今一直主要是根据生理上的证据，而不是依据语言方面的证据，把尼格罗人看做是一个人种"。⑨

虽然直到最近对非洲语言进行的所有全面分类都是把班图语跟"尼格罗"语截然分开的，但是有些评论家指出：在被看作是"尼格罗"语的语言中，一些或许多，特别是西非的语言，跟班图语言有关系。很明显，O. E. 维达尔主教是第一个在他给塞缪尔·克劳瑟的《约鲁巴语语法》写的导言中提出这种情况的。⑩ 布勒克做了全面论述，他把班图语这个名称扩大到远至北纬 13 度的西非大部分地区，这样，班图语区从塞内加尔一直延伸到上尼罗河地带。⑪ 这一基本见解在那以后很久被韦斯特曼修改的形式重新提出，而格林伯格则在当前通行的分类法以更明晰的方式重新提出。

（5） 我们已经看到马达加斯加语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有亲属关系，因而跟非洲语言无关，这一事实早在十七世纪就已被注意到，而且被普遍接受。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值得注意的大事是出现了两种全面的分类法，直到 1910 年左右，一直在分类领域占主导地位。第一种是莱普西乌斯分类法，该分类法于 1863 年和 1880 年分别以两种形式出现。⑫ 另一种方法是弗里德里希·米勒分类法，也有两种形式，即 1867 年的和 1884 年的。⑬ 米勒的著作为 R. N. 卡斯特的重要研究提供了依据，卡斯特对于在英语世界普及米勒的著作起了促进作用。卡斯特的论文是当时非洲语言学文献的极宝贵的资料。

莱普西乌斯和米勒都不认为马达加斯加语在语言学上不是非洲语言。至于其他方面，

296

---

⑦ E. 勒南(E. Renan)，1855 年，第 189 页。

⑧ H. 利希滕斯泰因(H. Lichtenstein)，1811－1812 年。

⑨ J. C. 普里查德，1855 年，第一卷，第 427 页。

⑩ O. E. 维达尔(O. E. Vidal)为S. A. 克劳瑟(S. A. Crowther)的著作写的导言，1852 年。

⑪ W. H. I. 布勒克(W. H. I. Bleek)，1862－1869 年，第一卷，第 viii 页。

⑫ R. 莱普西乌斯(R. Lepsius)，第二版，1863 年和 1880 年。

⑬ F. 米勒(F. Muller)，1867 年(1876－1884 年)。有关非洲语言部分见第一卷，第 2 册(1877 年)和第三卷，第 1 册(1884 年)。

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尼格罗"语言及其在跟班图语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因为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尼格罗民族使用的一组已被大家接受并广为通行的语言。在米勒和莱普西乌斯的分类法中，人种方面的考虑起主要作用，尽管方式不同。

莱普西乌斯分类法根据的是各种名词分类的标准。这一方法来源于布勒克早期的著作(1851年)。⑭布勒克对他所认为的班图语言与闪米特语言和含米特语言之间的基本区别有深刻印象，班图语言具有名词类别的复杂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性别的性不起什么作用；而闪米特语言和含米特语言却把性别的性作为名词分类的原则。布勒克按照这一区别，把科伊科伊语算作含米特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具有性的区别，尽管实际上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跟各种桑语言基本相似。

莱普西乌斯把布勒克的总的看法作为他的出发点，认为，在尼格罗人使用的各种语言中，具有非性别名词类别的班图语言是基本的，而其余语言则是混合型的，一直在受着含米特语言的影响。他把所有这些语言分为四个语族：（1）班图语族；（2）混合型的尼格罗语族；（3）含米特语族；（4）闪米特语族。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存在两组语言：(a)班图语言和混合型的尼格罗语言(类别语言)以及(b)闪米特和含米特语言(有性的区别的语言)。最后还应该说明，闪米特语言和含米特语言跟印欧系语言是有关联的，因为后者也具有性别的性。实际上莱普西乌斯把印欧语言、闪米特语言和含米特语言称为具有三个语族的诺亚语系，这三个语族代表诺亚的三个儿子：雅弗、闪姆和含姆。这些有性的区别的语言的优越性，已论述得很清楚。"然而，看来毫无疑问，有性的区别的语言的三大语族不仅过去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的财富贮备和工具，而且它们，特别是它们中最年轻的一支，雅弗还象征着未来的希望"。⑮"含米特理论"从布勒克通过莱普西乌斯留传给晚些时期的迈因霍夫的理论这一思想脉络是很明显的。

在米勒1884年的综合性著作中，世界上已知的语言是根据如下假说划分的：在身体类型和语言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几种基本划法是："直立发型人的语言"、"卷发型人的语言"，等等。这一假设使他不象莱普西乌斯那样把科伊科伊语跟含米特语言划在一起，而且把它跟头发卷曲的人种的语言的巴布亚语言划在一起。大多数"尼格罗"语言被划分为非洲尼格罗语言和班图语言。米勒关于这个问题的假说跟莱普西乌斯的看法正好相反，因

297 为他把非洲尼格罗语言看作是基本的，而把班图语言看作是派生的。黑人说的许多语言被认为属于在文化上更先进的、叫努巴-富拉人的语族，使用该种语言的人在体型上跟地中海人和卷发的德拉维达人有关。在卡斯特向英语世界普及米勒的看法时，把非洲语言分为以下6类：（1）闪米特语；（2）含米特语；（3）努巴-富拉语；（4）尼格罗语；（5）班图语；（6）科伊桑语。

有个时期把分类问题暂时搁了起来，因为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对非洲语言进行描写这一重大科学任务上。韦斯特曼1911年论述苏丹语言的著作和迈因霍夫1912年论述含米特语言的著作开辟了现代时期。⑯

⑭ W. H. I. 布勒克，1851年。

⑮ C. R. 莱普西乌斯，1880年，第90页。

⑯ D. 韦斯特曼(D. Westermann)，1911年；C. 迈因霍夫，1912年。

韦斯特曼的基本论点显然是在迈因霍夫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前者采用了“苏丹语言”这个术语，实际上把闪米特语言、含米特语言(在迈因霍夫提出的扩大了的意义上)、班图语言或桑语言以外的所有非洲语言都包括进去了。因此，苏丹语言基本上包括了早先被称为“尼格罗语言”的所有语言。韦斯特曼从这个庞大的语言体中挑出8种语言(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它们全列出过)，其中5种选自苏丹西部，3种选自苏丹东部，他力图根据一系列词源事实和重构的原始形式来确立这些语言间的关系。

迈因霍夫由于写了比较班图语方面的基本著作已经出了名，他在论述含米特人的语言的书中，力图把含米特语族的组成扩大了通常接受的范围，把富拉尼语、马赛语这样的语言包括进去，并按照莱普西乌斯的方法，基本上根据名词的性的标准，把科伊科伊语也包括进去。这部著作带有含米特人人种优越的明显色彩。[17]

因此，从迈因霍夫和韦斯特曼共同的研究成果中，产生了一个五重方案(闪米特语言、含米特语言、苏丹语言、班图语言和桑语语言)。这些成果通过艾丽斯·沃纳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并成了人类学和语言学教科书的规范。[18]

这种分类法在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时期(大致是1910－1950年)并非没有受到怀疑。虽然在通常的教科书的论述中没有反映，但是最重大的批评，却来自韦斯特曼自己1927年关于西苏丹语言的重要研究论文中。[19] 在这部作品中，他把他先前有关苏丹语言的概念局限于西非的苏丹语言，并通过详尽的词汇与语法文献，在西苏丹语言中分出若干不同语族(如西大西洋语族、克瓦语族、古尔语族)。甚至更有意义的是他指出，西苏丹语言与班图语言在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方面非常相似，但从未完全明确地论述过它们的关系。实际上，亨利·约翰斯顿爵士在论述班图语和半班图语的大部头著作中，把许多西非语言都看作与班图语有亲属关系。[20] 在他使用的术语中，这些西非语言就是指“半班图语言”。但是，他坚持了名词分类的形态标准，这样，在两种密切相关的语言中，如果其中一种具有若干名词类别，那么它就属于半班图语言，而另一种则不属于。

298

还应该简要提一提1910－1950年期间的其他几种分类法，其中只有德拉福斯的分类法得到了传播。其中一种是德雷克塞尔提出的，他想把非洲各语系和文化一致起来，成为**文化循环理论**假定的一种关系。法国研究非洲语言和文化的学者M.德拉福斯跟那个时期的德国研究者相反，认为只有柏柏尔语言、[21] 古埃及语和库希特语言属含米特语言，从而把所有其他非闪米特语言和非科伊桑语言都看作是一个庞大的尼格罗非洲语系。[22] 除16支非班图语言，其中许多是根据地理的标准，而不是根据纯粹语言的标准来确定的以外，德

---

[17] 含米特人优越的假说成了文化－历史方面的许多论述的根据。关于此点，见E.R.桑德尔(E.R.Sanders)，1969年的书。

[18] A.沃纳(A.Werner)，1915年和1930年。

[19] D.韦斯特曼，1927年。

[20] H.H.约翰斯顿(H.H.Johnston)，1919－1922年。

[21] 应本委员会一个委员的要求做如下补充说明：这一分类法不仅跟德国学者的见解相反，而且也的确跟科学事实不符。北非的语言学家揭露了其中的政治动机，这些动机促使法国柏柏尔语学者中的殖民主义学派把柏柏尔语列入含米特－闪米特系语言。事实上，柏柏尔语是闪米特语言，甚至跟阿卡德亚语和希伯来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因此，正如本章其他地方所说的，柏柏尔语既不是含米特－闪米特语言，也不是亚－非语言。详见M.法西(M.El Fasi)1971年用阿拉伯文写的著作。

[22] M.德拉福斯，1921年，第463－560页。

拉福斯显然认为，班图语应该包括在尼格罗非洲语中。德拉福斯的部分术语仍然通行在用法语写作的非洲语言与文化专家当中。还应该提一下姆莱·杭伯格，他也是从非洲语言是一致的这一看法出发(但他的想法更广泛)，赞同用来源于埃及这一理论来解释这种一致性，甚至不考虑其中矛盾，把非洲语言的最终来源解释为印度的达罗毗荼语言。㉓

1949－1950年，笔者在《西南部人类学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叙述了一种从许多方面讲都不落俗套的分类法，这一分类法最终赢得了广泛的承认。㉔就方法论而言，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先前的分类法；从本文引言部分所描述的意义上说，它是严格的谱系分类法。由此可见，各语族间同时在语音和意义方面都有大量相似点，这种相似现象无论是涉及词根(词汇)还是涉及语法构形成分，都被认为是语言分类的证据。仅仅语音相似而意义不相似——例如都具有声调，或仅仅是意义相似而语音不相似，例如语法的性一致，而种种标记的语音形式不一致——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些形态特征已在先前的一些分类法中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仅仅是具有性别的性还不足以成为有亲属关系的证据，因为，例如，性别的性在世界不同地区可能而且的确是独立出现的。另一方面，亚－非语系(闪－含语系)各分支中具有阴性标记t肯定是亲属关系的一个证据。同理，由于失去类别而不存在性，这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相反情况的证据。在比较方法站稳脚跟的领域——例如印欧语系——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在印欧语系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和赫梯语等都没有性别的性，而这个语系中的大部分其他语言都有。

早期的一些分类法，例如，莱普西乌斯的分类法，没有使用和引述任何具体证据来进行归类。韦斯特曼在论述苏丹语言的著作中确曾提供了词源方面的事实，但也只是为数百种有关语言中的8种提供了这种材料。早先唯一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阐述的，只有韦斯特曼后来论述西苏丹语言的著作，而且这也仅仅涉及到非洲的一部分。笔者的分类法根据对文献的仔细考证，为所有主要类别提供了词源特征和具体的共同语法特征。

最重要的具体建议(其中有些提出了范围相当广的、引起争论的文献)如下：

(a) 以韦斯特曼的材料为基础，认定班图语言跟西苏丹语言有亲属关系，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班图语言并未变成这个比较大的语系的一个单独语族，只是韦斯特曼命名的西苏丹语系贝努埃-刚果("半班图")语族中的一支语言。此外，较远的东部(阿达马瓦－东部语言)的许多其他语言是被重新命名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部分。

(b) 迈因霍夫曾建议含米特语族应包括更多的语言，但其中只有豪萨语被接受，而且，豪萨语只是闪-含语系的一个大语族(乍得语族)中的一个成员。闪米特语言也仅仅是作为跟其他语族并列的单独一族而包括在内的。由此可见，含米特语族只是变成了今天被易名为亚-非语系这个较大语系中代表非闪米特语言各语支的一个随意采用的名称，亚-非语系被认为是由下面5个语族组成：(1)

㉓ L.杭伯格(L. Homburger)，1941年。

㉔ 有关格林伯格分类法的最新的描述，见J. H.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66年的著作。关于这一问题的评论性文献的提要，见D.温斯顿(D. Winston)的"格林伯格的非洲语言分类法"，载《非洲语言研究》，1966年7月号，第160-170页。对不同观点的论述，见前面奥尔德罗格(Olderogge)教授写的第十一章。

柏柏尔语族；（2）古埃及语族；（3）闪米特语族；（4）库希特语族；（5）乍得语族。[25]

（c） 不包括在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尼格罗”诸语言被列入另外一个称为尼罗-撒哈拉语言的主要类别。 300

（d） 科伊科伊语被划入南部非洲科伊桑语系中部语族的桑语言一类。

取得的全面成果是，非洲语言被分成四个主要语系(不包括梅里纳语系)，我们将在下面几节阐述，对其中每一语系都将进行深入探讨。[26] 在阐述中，我们将在需要进行适当的和更激烈的评论的地方，谈到修改或扩大最早分类法的最新建议。

亚-非语言[27]

这些语言也叫闪-含语言，包括北部非洲的全部语言、几乎所有东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语言；南部远到坦桑尼亚所通行的是库希特语族的一些语言。此外，闪米特语族包括的语言几乎是整个中东地区现在和过去通用的语言。亚-非语系通常包括5个大小相差无几的语族：柏柏尔语族、[28] 古埃及语族、闪米特语族、库希特语族和乍得语族。但是，弗莱明最近提出，迄今被列入库希特语言西支(这组语言包括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卡法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的语言，实际上形成(亚-非语系)第六支，并建议称之为奥莫特和阿里-班纳语族。[29]

亚-非语系柏柏尔语族的内部分化比这个语系(古埃及语族外)任何其他语族都少。它的主要区分看来是在撒哈拉沙漠各图阿雷格人集团的语言与北非和毛里塔尼亚通行的柏柏尔语之间。加那利群岛上的关切人已消亡的语言可能跟柏柏尔语有关。此外，还应提一下古利比亚语的铭文，尽管还不能完全释读，但它们却可能代表了柏柏尔语的早期形式。

亚-非语系的第二个语族——古埃及语族——的证据是早期的象形文字铭文、僧侣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稿以及近期用通俗文字写的文献。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同一种口头语言。 301 在基督教盛行时期，这一语言继续用作口头语言，并发展了一种用希腊文改成的字母来书写的丰富文献。在后来的或科普特语的形式中，曾有过若干标准方言，其中博海里方言仍在科普特教派礼拜仪式中沿用。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这种古埃及语逐渐失去了地盘，可能在十七世纪，作为一种口头语言消亡了。

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所具有的内部分化比柏柏尔语族或古埃及语族都多得多。通常认为闪米特语族内最基本的划分是闪米特语族东支和闪米特语族西支。东支的唯一代表是

㉕ J.卢卡斯(J. Lukas)，1939年，第286-299页；M. R.科恩(M. R.Cohen)，1947年。

㉖ 本章篇幅有限，关于更详细的语言情况，见J. H. 格林伯格，1963年b，《非洲语言手册》(丛书)各卷和D. 多尔比(D.Dalby)1977年绘制的暂定《非洲语言地图》，伦敦国际非洲研究所出版，并参看C. F. 和F. M. 沃格林(C. F. and F. M. Voegelin)，1973年。

㉗ 在开罗古埃及居民情况专题讨论会上，非洲学者追述格林伯格教授的分类法忽视了确定语音规则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的看法得到了伊斯特万·福道尔(Istvan Fodor)教授的赞同。这些非洲学者还提出论据，证明古埃及语言与近代非洲语言在语言谱系上有亲属关系。

㉘ 参阅前面注21。

㉙ H. C. 弗莱明(H. C. Fleming)，1969年。

以楔形文字书写的早已消亡的阿卡底亚语。它有两种基本的地区方言：南部方言(巴比伦语)和北部方言(亚述语)。而闪米特语族西支又分为西北闪米特语和西南闪米特语。前者包括迦南语言(希伯来语、摩亚比特语、腓尼基语，大概还有乌加里特语)和阿拉米语。其中，只有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几种方言流传下来，希伯来语在上个世纪作为以色列的口头语言复活了，而阿拉米语的几种方言依然在使用。阿拉米语的现代形式是叙利亚前黎巴嫩山脉一带残留的阿拉米语西支的语言以及主要在伊拉克北部通行的阿拉米语东支的语言。

东南闪米特语言同样具有两支：北支语言和南支语言。北支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方言和从这些方言派生的一些现代语言，这些派生语言主要流行在北非、中东和部分苏丹(即阿拉伯地区)的广大地区。南支一方面包括南阿拉伯语，另一方面包括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语言。南阿拉伯语的古代形式见之于米尼亚语、萨比亚语和卡塔巴尼亚语的铭文，而它的当代形式则见之于阿拉伯南部的梅赫里语和沙赫里语、以及印度洋中索科特拉岛的索科特拉语。

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语言分为北支(蒂格里亚语、蒂格雷语和盖埃兹语或古埃塞俄比亚语)和南支(阿姆哈拉语、古拉格语、阿尔戈巴语、加法语和哈拉里语)。

亚－非语系的第四个语族——库希特语族——包括大批语言，它们又分为5个很不相同的语支：北部语支、中部语支、东部语支、南部语支和西部语支。库希特语言北支实质上只有一种语言——贝扎语。库希特语言中支有时被称为阿高语言，过去它们大概是在一片连绵不断的区域通用，但是早先说这些语言的人大部分已经选择了埃塞俄比亚的各种闪米特语言。法拉沙人或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从前说一种阿高语。库希特语言中支包括北部的一组语言(比林语、卡米尔语和克曼特语)和南部的阿维亚语。库希特语言东支包括两种拥有大批使用者的库希特语言——索马里语和加拉语。库希特东支语言分为下面几个组：(1)阿法尔语、萨霍语；(2)索马里语、巴伊索语、伦迪勒语、博尼语；(3)加拉语、康索语、吉多勒语、阿尔博雷语、瓦拉齐语、察迈语、格莱巴语、莫戈戈多语；(4)锡达莫语、阿拉巴语、达拉萨语、哈迪亚语、坎巴塔语、布尔吉语。其中，最后一支，或“锡达莫-布尔吉语言”大概应该成为单独一支，以别于其他三支。库希特语言南支通行于坦桑尼亚，包括布龙吉语、戈罗亚语、阿拉瓦语、恩贡威亚语(阿苏语)、萨尼埃语和姆布古语。从语言学上讲，南支的这些语言跟库希特语言东支最接近，前者很可能只能算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库希特语言南支中的一种语言——姆布古语——在语法和词汇两方面都曾受到班图语的广泛影响，因而有些研究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混合语言。

302

库希特语言西支跟传统上被看作是库希特语言的其他各种语言差别很大。库希特语言至少可分为两组：西部语言和其余的各种语言。正如我们前边指出的，弗莱明建议把它作为亚-非语系单独的第六支。库希特语言西支可划分成两组语言：阿里-班纳语言(在早期的文献中，巴科语这个术语被用来代表阿里语)和其余各种语言。这些语言本身又可分为下面几类：(1)马吉语、那奥语、舍科语；(2)詹杰罗语；(3)卡法语、莫查语、希纳沙语、南马奥语；(4)吉米拉语；(5)奥梅托语(锡达莫语言西支)、包括查拉语、马勒语、巴斯克托语、维拉莫语、扎伊塞语和科伊拉-吉迪乔语。

应予考虑的亚-非语系的最后一个语族是乍得语族。它包括西非通行最广的语言——豪萨语，还可能包括小得多的集团所使用的多达100种的其他语言。在格林伯格（1963年b)的分类法中，乍得语言被分为以下9个分支：（1)(a)豪萨关达拉语，(b)贝德-恩吉津语，(c)(i)瓦尔贾瓦(鲍奇语北支)语，(ii)巴拉瓦(包奇语南支)语，(d)(i)博勒瓦语，(ii)安加斯语，(iii)罗恩语；（2)科托科语；（3)巴塔-马尔吉语；（4)(a)穆斯戈伊语，(b)马拉卡姆语；（5)吉德尔语；（6)曼达拉-加麦古语；（7)穆斯古语；（8)马萨-巴纳语；（9)乍得语东支，(a)松赖语，(b)加贝里语，(c)索科罗语，(d)莫德格尔语，(e)图布里语，(f)穆比语。

P.纽曼和R.马普提出，在上面这些分支中，(3)与(6)特别相近，(1)和(9)也相近。他们建议把这两组语言中的前一组命名为比乌-曼达拉语，把后一组命名为萨赫勒高原语。[30] 关于其他几个分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主张。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言

这个语系有两个语族，使用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都很不一样。第一个是尼日尔-刚果语族，涉及非洲南撒哈拉的相当一大部分地区，包括西非的几乎所有地区、苏丹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而且这个语族的班图分支语言占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的另一个语族是科尔多凡语族，它只用在苏丹科尔多凡地区的一个不很大的区域里。 303

尼日尔-刚果语族基本上分为两类，即曼德语言和其他语言。曼德语言除了缺少尼日尔-刚果语族其他语言具有的许多最普通的词汇外，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曼德语言具有科尔多凡语言和尼日尔-刚果语族其余语言通常具有的名词类别。当然，尼日尔-刚果语族的许多个别语言也失去了这种系统。由于曼德语言存在这种差异，穆卡罗夫斯基提出，曼德语言实际上是尼格罗非洲语言的另一个大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一个语支，但是研究曼德语言的著名专家威廉•E.韦尔默斯不同意这个看法。[31]

现在普遍认为，在曼德语言内，根据用不同的词来表示“10”，便把曼德语言分为“曼德语-tan”和“曼德语-fu”，这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划分法是德拉福斯首先提出的。[32] 曼德语言可分为如下几类：(A)西北支：（1)北部语言：包括苏苏-雅隆卡语、索宁克语、惠拉-努穆语、利格比语、瓦伊-科诺语、哈松克语和马尼卡-班巴拉-久拉语；（2)西南部语言：门德-班迪语、洛科语、洛马语、克佩勒语。(B)东南支：（1)南部语言：马诺语、丹语、图拉语、姆瓦语、努瓦语、甘语、古罗语；（2)东部语言：萨莫语、比萨语、布萨语。只有“锡亚语”(博博-芬语)尚未归类。显然这就是曼德语，但是也许应该把它看作是曼德语族中最早的分支，这样，从谱系的角度来讲，它就成了两支语言中的一支，另一支则是曼德语本身。

---

[30] P.纽曼(P.Newman)和R.马(R.Ma)，1964年。
[31] H.G.穆卡罗夫斯基(H.G.Mukarovsky)，1966年。
[32] M.德拉福斯，1901年。

其余的尼日尔-刚果语言按格林伯格(1963年c)的分类法被分为以下5个分支：(1)西大西洋语言；(2)古尔语言；(3)克瓦语言；(4)贝努埃-刚果语言；(5)阿达马瓦-东部语言。然而，这几组语言中，(2)、(3)和(4)特别接近，形成了一种核心组合，在这个组合内，特别是贝努埃-刚果语和克瓦语间的界限不清。㉝

西大西洋语言这个术语是韦斯特曼于1928年提出的，就其组成情况而言，跟德拉福斯和他以后的法国研究者提出的塞内加尔-几内亚语言是完全相同的，可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语言组：北部语言组和南部语言组。这种情况和特别是北部语言内部的多样性，促使多尔比建议抛弃西大西洋语言的概念，并促使他断言：格林伯格提出的西大西洋语言南支(林巴语不在内)所组成的南支语言是独立的，他建议用"梅尔语言"㉞这个术语来代表这组语言。但是，戴维·萨丕尔以语言年代学事实为其基础，在最近的著作中重申，按传统构想，西大西洋语言是一致的，他还把林巴语包含在南支语言中。㉟他提出的主要改革是：比热戈群岛通用的比热戈语应该被看作是跟北部语言和南部语言并列的一支独立的语言。这跟我自己的印象是相吻合的，即这种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应当指出，迈因霍夫曾认为富拉语属含米特语言，并且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现在普遍认为，这种语言包括在西大西洋语言中。因此，西大西洋语言的分类情况如下：(A)北支：(1)(a)富拉语、塞雷尔语，(b)沃洛夫语；(2)诺恩语；(3)久拉语、曼贾克语、巴兰特语；(4)(a)腾达语、巴萨里语、贝迪克语、科尼亚吉语，(b)比亚法达语、帕贾德语，(c)科比亚纳语、班胡姆语，(d)纳卢语；(B)南支：(1)苏阿语(库南特语)；(2)(a)滕内-巴加语，(b)谢尔布罗-克林语、基西语，(c)戈拉语；(3)林巴语；(C)比贾戈语。

304

尼日尔-刚果语族中的另一个主要组合是古尔语言，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沃尔特语"，在法语文献中特别常见。有关古尔语言细分的最新建议是本多尔-塞缪尔提出的，在这里作一简略叙述。我们已经注意到，被看作是古尔语的绝大多数语言，属于一个很大的语支，本多尔-萨缪尔称之为中古尔语言。㊱这相当于早先调查研究的莫西-格龙希语言。中古尔语言可分为下面3支语言：(1)莫雷-古尔马语；(2)格鲁西语；(3)塔马里语。其余几支古尔语言是：(1)巴尔古(巴里巴)语；(2)洛比里语；(3)博瓦姆语；(4)库兰戈语；(5)基尔马-蒂乌拉马语；(6)文语；(7)塞努福语；(8)塞梅语；(9)多贡语。

即使如前面提到的，克瓦语确实有别于贝努埃-刚果语言，克瓦语言仍有两支语言：最西部的克鲁语和最东部的伊乔语，但说它们属于克瓦语，这可能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有这些保留意见，克瓦语下属的几个分支可大体按从西到东的顺序陈述如下：(1)克鲁语；(2)包括埃维-弗语、阿肯-古昂语(现在有时称作沃尔特-卡莫埃语)在内的西克瓦语、加-阿当梅语和所谓的其余各种多哥语言；(3)约鲁巴语、伊加拉语；(4)努佩语族；(5)埃多语族；(6)伊多马语族；(7)伊博语；(8)伊乔语。贝努埃-刚果语基本上跟尼日尔-刚

㉝　关于这个问题，见J.H.格林伯格，1963年c，第215-217页。

㉞　D.多尔比(D. Dalby)，1965年，第1-17页。

㉟　见D.萨丕尔(D. Sapir)，1974年b，但是关于本文所引述的几个结论，萨丕尔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见。

㊱　这里我所提出的详细分类，是根据J.T.本多尔·塞缪尔(J. T. Bendor-Samuel)的文章。尼日尔-刚果语言与古尔诸语言中，该文载于T.A.西比奥克(T. A. Sebeok)编：《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语言学》(巴黎/海牙：摩顿出版社)，第141-178页。

果语族中被韦斯特曼称为"贝努埃－克罗斯语"或"半班图语"的那支语言是一回事，只是把班图语包括在一个分支内。贝努埃－刚果语言基本上分为4类：（1）高原州语言；（2）朱库诺语言；（3）十字河州语，包括最大的语言集团埃菲克－伊比比奥使用的语言；（4）班图语族，包括班图语、蒂夫语和贝努埃地区中部的若干较小语种。

尼日利亚的一些语言，从前在广义上被看作半班图语，如今被普遍认为就是班图语，其中包括巴米累克语、埃科伊语和贾拉瓦语。对班图语言本身所做的最基本的划分可能是在这些语言和通常理解的班图语言之间进行的。在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班图语言内部，基本区分看来是在班图语东支和西支之间。格思里为了分得更精确，他分了许多地区，用字母表示，这种划分方法目前在流行，[37] 但其他专家对这种划分法做了程度不同的修改。

305

把班图语组作为一个整体划为贝努埃－刚果语言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本身就是庞大的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一支)，已成为格林伯格分类法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之一。格思里特别赞同如下见解：班图语就谱系而言是独立的，而且在其他尼日尔－刚果语言中存在的跟班图语广泛相似之处，是班图语对根本不同的语言影响的结果。根据这一点，他论证说，班图人本来的发祥地是沙巴区南部的"中心"地带。格林伯格却认为是在尼日利亚贝努河河谷地区的中段，因为这地区所说的语言是贝努埃－刚果语言的班图语支中最相关的一些语言。[38]

尼日尔－刚果语族中最后一组语言是阿达马瓦－东部语支。阿达马瓦语支包括许多比较小的语组，其中可作为例子提的是昌巴语和姆布姆语；东支语言包括若干比较重要的语言，例如中非共和国的格贝亚语，以及赞德语。[39]

跟刚刚讨论过的庞大尼日尔－刚果语系相反，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的另一支，即科尔多凡语不包括重要语言，它们跟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语言一起通行于科尔多凡丘陵地带。科尔多凡语可分为5个很不相同的语支，其中图姆图姆语与所有其他语支大不相同。这5支语言是：（1）夸利布语；（2）泰加利语；（3）塔洛迪语；（4）卡特拉语；（5）图姆图姆语(也称"卡杜格利－克龙戈语")。[40]

尼罗－撒哈拉语系

尼罗－撒哈拉语系是尼格罗非洲语言的另一主要语系。一般说来，这个语系通行于说尼日尔－刚果语言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并在尼罗河上游盆地以及撒哈拉沙漠东部和苏丹东部占主导地位。但是它们在尼日尔河河谷地带还有一个孤零零的西部桑海语区。尼罗－撒哈拉语系拥有一个很大的语族——沙里－尼罗语族，包括整个语系中的大多数语言。尼罗－撒哈拉语系各语族基本上可按由西向东的顺序排列如下：（1）桑海语族；（2）撒哈拉语族：(a) 卡努里－卡嫩布语，(b) 特达－达扎语，(c) 扎加瓦语、贝尔蒂语；（3）马班语

[37] 关于这一分类法，见M.格思里(M. Guthrie)，1948年。

[38] 关于班图语的争论，见M.格思里，1962年，第273－282页；R.奥利弗(R.Oliver)，1966年，第361－376页；J.H.格林伯格，1972年，第189－216页。

[39] 关于阿达马瓦－东部语言的详细名单，见J.H.格林伯格，1966年，第9页。

[40] 关于科尔多凡语言的详细情况，见J.H.格林伯格，1966年，第149页。

306 族；（4）富里亚语族；（5）沙里－尼罗语族（详情，见以下几节）；（6）科马语族（科马语、甘扎语、乌杜克语、古勒语、古穆斯语和马奥语）。

沙里－尼罗语言包括两组主要语言，即东苏丹语和中苏丹语，还包括两种独立语言，即贝尔塔语和库纳马语。

东苏丹语是尼罗－撒哈拉语系内最大的独立单位。它包括以下10个分支：（1）努比亚语：(a)尼罗努比亚语，(b)科尔多凡努比亚语，(c)米多博语，(d)比尔克德语；（2）姆尔勒－迪丁加语；（3）巴雷亚语；（4）因加萨纳（塔比）语；（5）尼马－阿菲蒂语；（6）特梅因语、泰松达纳布语；（7）梅拉里特语；（8）达古（达朱）语；（9）尼罗语言分为：(a)尼洛特语西支：布龙语、卢奥诸语言和丁卡－努埃尔语，(b)尼洛特语东支：(i)巴里语，(ii)卡拉莫琼语、特索语、图尔卡纳语、马赛语，(c)尼洛特语南支：南迪语、苏克语、塔托加语；（10）尼扬吉亚语、图索语（伊克语）。

对于把尼洛特语中分为东支和南支的做法，争议很大。迈因霍夫把马赛语划归含米特语言的时候，显然想把这两支语言中的其他语言也都包括进去，尽管这些语言跟我们在这里分出来的尼洛特语西支（例如希卢克语、卢奥语、丁卡语）非常相似。迈因霍夫之所以把什卢克语和马赛语这样一些在其他方面相近的语言分开，首先是因为马赛语具有性别的性这种特征。韦斯特曼想采取折衷立场，把东西支尼洛特语称为尼罗含米特语，可能认为这些语言是混合语言。韦斯特曼保留了“尼洛特”这个术语来代表尼洛特语西支。塔克起初采纳了这种看法，但后来又把这些语言划分得更接近尼洛特语言，称之为“类尼洛特语言”。[41]在最近时期，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霍亨贝尔格和亨廷福特，前者把马赛语比作闪米特语，后者显然是力图恢复迈因霍夫早先的看法，认为这些语言都是含米特语言。[42]

沙里－尼洛特语言的其他重大分支是中苏丹语言。这一语言可分为下面6个分支：（1）邦戈－巴吉尔米语；（2）克雷什语；（3）莫鲁－马迪语；（4）芒贝图语；（5）芒布图－埃费语；（6）伦杜语。

科伊桑语系

所有科伊桑语言都有吸气音，说这些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是体型与众不同的桑人。

大部分科伊桑语系语言都通行于非洲南部，然而，在坦桑尼亚北部很远的地方却有两个很小的集团——哈察人和桑达韦人，使用的语言彼此很不相同，跟南部非洲的语言也很不相同。因此，科伊桑语系可分为以下三个语族：（1）哈察语族；（2）桑达韦语族；（3）南部非洲科伊桑语族。南部非洲科伊桑语族分成三个语支：（1）北部语支包括奥恩人和昆人的北部桑语言；（2）分成两个语支的中部科伊桑语言：(A)谢奇瓦雷语，(B)纳龙语、科伊科伊语；（3）南部桑语言，这个语支内部区别最大，具有相当多彼此没有联系的桑语言。[43]

307

---

[41] 见A.N.塔克（A.N. Tucker）和M.A.布赖恩（M. A. Bryan），1966年。

[42] 关于这些研究的情况，见G.W.B.亨廷福特（G. W.B. Huntingford），1956年；I.霍亨贝尔格（I. Hohenberger），1956年；J.H.格林伯格，1957年b。

[43] 见第十一章中介绍的D.奥尔德罗格（D. Olderogge）教授所持的相反意见。

正如在本章论述分类史的那一节提到的，若干语言学家，如布勒克、莱普西乌斯以及后来的迈因霍夫，都把科伊科伊语言跟桑语言分开，把前者归入含米特语言。目前，E.O.J.韦斯特法尔支持这一理论的修改模式，[44] 他把这里描绘的科伊桑语言分为两个独立的语系：一个是桑达韦语和中部科伊桑语言构成的桑达韦－科伊科伊语系。除谢奇瓦雷语以外，所有这些语言都具有性别的性这一特征。关于这些语言是否可能跟闪－含语言有联系的问题，他什么也没有说。韦斯特法尔所说的另一个语系是由哈察语以及北部和南部桑语言组成的哈扎－桑语系，然而他又认为哈察语和桑语言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得到证实。

梅里纳语没有被列入上述分类中，这种语言已压倒马达加斯加岛某些地区使用的非洲本土语言。作为一种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它的地位从未引起争议。在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中，跟它关系最近的大概是婆罗洲的马尼安语。[45] 在前面的分类中，没有提到的另外一种语言是麦罗埃语，[46] 那是一种死语言，是用两种字母形式书写的文字：象形字体和草写字体。麦罗埃语大约是在我们纪元四世纪消亡的，只能从考古遗物上了解，从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到苏丹的喀土穆，这一地区几乎都可发现这种遗物。尽管已经知道麦罗埃语字母的音值，但是由于缺少两种语言的铭文，我们对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很有限，而且靠不住。最早的理论认为这是努比亚语言（格里菲思的看法）。迈因霍夫和齐赫拉尔茨认为麦罗埃语属于含米特语言的假说，受到了欣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驳斥。后来，认为它属于努比亚语言的假说被特里格尔以一种更扩展的形式复活了，他提出，麦罗埃语属于尼罗－撒哈拉语言的东苏丹语的分支。按照格林伯格的分类法，努比亚语也被归入东苏丹语言。[47]

最后，还应该提一提近代进入非洲的一些欧洲语言和印度语言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出生于非洲的居民现在还在使用这些语言。英语除在南非和津巴布韦通行外，还是建立利比里亚的美洲黑人后裔使用的语言，它也在弗里敦、塞拉利昂以克里奥尔语的形式（克里奥语）通行。南非通行的一种南非荷兰语跟荷兰本土的荷兰语很相近。北非还有大批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居民。有一种克里奥尔形式的葡萄牙语是几内亚和其他地方成千上万人的第一语言。最后，某些印度语言通行于东非，这些语言既有雅利安语言，又有达罗毗荼语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吉拉特语。

表格12.1 格林伯格分类法的各阶段

一 （*1949－1950 年*）

1	尼日尔－刚果语系	5	东苏丹语系
2	桑海语系	6	亚－非（闪－含）语系
3	中苏丹语系	7	有吸气音的语言的语系
4	中撒哈拉语系	8	马巴语系

---

[44] E.O.J.韦斯特法尔（E. O. J. Westphal），1966年。

[45] O.C.达尔（O.C.Dahl）在1951年的书中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46] 应当提出，1974年1－2月在开罗举行的重要专题讨论会检查了释读麦罗埃文字的研究工作（见第二卷）。

[47] 关于这个问题，见F. 欣策（F. Hintze），1955年；B. G. 特里格尔（B. G. Trigger）：《库什语言》，第188－194页。

9 纳奇蒂加尔的米米语系
10 富尔语系
11 特迈因语系
12 科尔多凡语系
13 科曼语系
14 贝尔塔语系
15 库纳马语系
16 尼扬吉亚语系

二 (1954年)

1 尼日尔－刚果语系
2 桑海语系
3 大苏丹语系(一.5 东苏丹语系；一.3 中苏丹语系；一.14 贝尔塔语系；一.15 库纳马语系)
4 中撒哈拉语系
5 亚－非语系
6 有吸气音的语言的语系
7 马巴语系(一.8 马巴语系；一.9 纳奇蒂加尔的米米语系)
8 富尔语系
9 特迈因语系
10 科尔多凡语系
11 科曼语系
12 尼扬吉亚语系

三 (1963年)

1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二.1 尼日尔－刚果语系；二.10 科尔多凡语系)
2 亚－非语系
3 科伊桑语系(以前是二.6 有吸气音的语言的语系)
4 尼罗－撒哈拉语系(二.2 桑海语系；二.4 撒哈拉语系(以前叫中撒哈拉语系)；二.7 马巴语系；二.8 富尔语系；二.11 科曼语系；沙里－尼罗语系，其中包括二.3 大苏丹语系、二.9 特迈因语系和二.12 尼扬吉亚语系)

参考文献

1 《西南人类学杂志》，1949年，1950年
2 《西南人类学杂志》，1954年
3 《非洲的语言》，1963年

(黄长著译)

第十二章附录：

309

非洲的语言地图

*D.*多尔比

非洲人口虽然不如整个世界的稠密①，但是就语言的复杂程度而言，却比其他任何大陆都复杂②。因此直到今天非洲大陆才有了详细的语言地图，即使这种地图是史学家和其他人所极需的。苏联出版的非洲人种统计地图可能是目前最完善的③，虽然它把种族和语言的差别搞得模糊不清，在地图上堆积了过多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种族语言”数据，并把所有非洲的名称都换成了西里尔字母。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图(种族集团地图，而不是语言地图)一般来说都太简单了，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④。

任何想全面观察非洲语言的分布和关系的尝试，都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种程度的过分简单化。唯一真正精确的地图需要用不同的亮光点来表示大陆上的每一个人，当人移动时，亮光点也跟着移动，并根据当时人所说的语言，用两千种不同颜色中的任何一种显示出来。由于这种地图从物理上讲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那种不大完美，但比已有的文献详细和精确的地图。近10年来，一直在着手绘制非洲专门的语言地图(不同于人种地图)，本文将重点探讨这项工作中跟非洲历史有关的几个方面⑤。

311

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学术性的，但非洲语言的比较研究往往过于简单。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今天的复杂语言地图是从过去简单得多的地图发展而来的，而且语言亲属关系可按照具有由大而小的等级(“语系”、“语族”、“语支”等)的“语系树形图”来表示。有人认为，非洲的数百种现代语言可按正常次序追溯到少数几种“原始母语”，这种信念导致比较语言学先研究非洲语言可能存在的最终的和最遥远的关系，然后在可靠的基础上确定语言的直接关系。它还导致人们把全部力量都放在语言(这些语言具有一种假设的共同来源)分化的历史过程上，而不管系属相近的语言内部的汇聚过程或再汇聚过程。这种方法的消极影响由于以下事实而加剧：用这种方法得出的伪历史的分类还被人们当作参考依据来使用(不仅对非洲语言是这样，甚至对非洲各民族也如此)，从而对有关非洲的历史见解产生了不利影响。

① 虽然非洲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左右，但是它的人口却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0%以下。

② 新几内亚(比非洲面积的四十分之一略大一点)的语言复杂程度跟非洲不相上下——甚或更复杂，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非洲南撒哈拉那样的语言那么“杂乱”的广阔地理区域。

③ 《非洲各民族》(莫斯科，1960年)和《非洲各民族地图》(莫斯科，1974年)。

④ 例如，G.P.默多克(G.P.Murdock)的《非洲部落地图》(1959年)，或70年代早期《泰晤士报》出版的罗伊·刘易斯(Roy Lewis)和伊冯·福伊(Yvonne Foy)：《现代非洲的部落与民族地图》。

⑤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国际非洲研究所(IAI)正在绘制《非洲与相邻岛屿的语言地图》，该地图计划按五百万分之一的基本比例来表示“家庭”语言或“第一”语言的现代分布，以及语言间的亲属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的比例是二百五十万分之一和一百二十五万分之一。国际非洲研究所于1977年出版了附有非洲语言分类表的暂定本(这导致以后的定本，由朗曼出版社出版)。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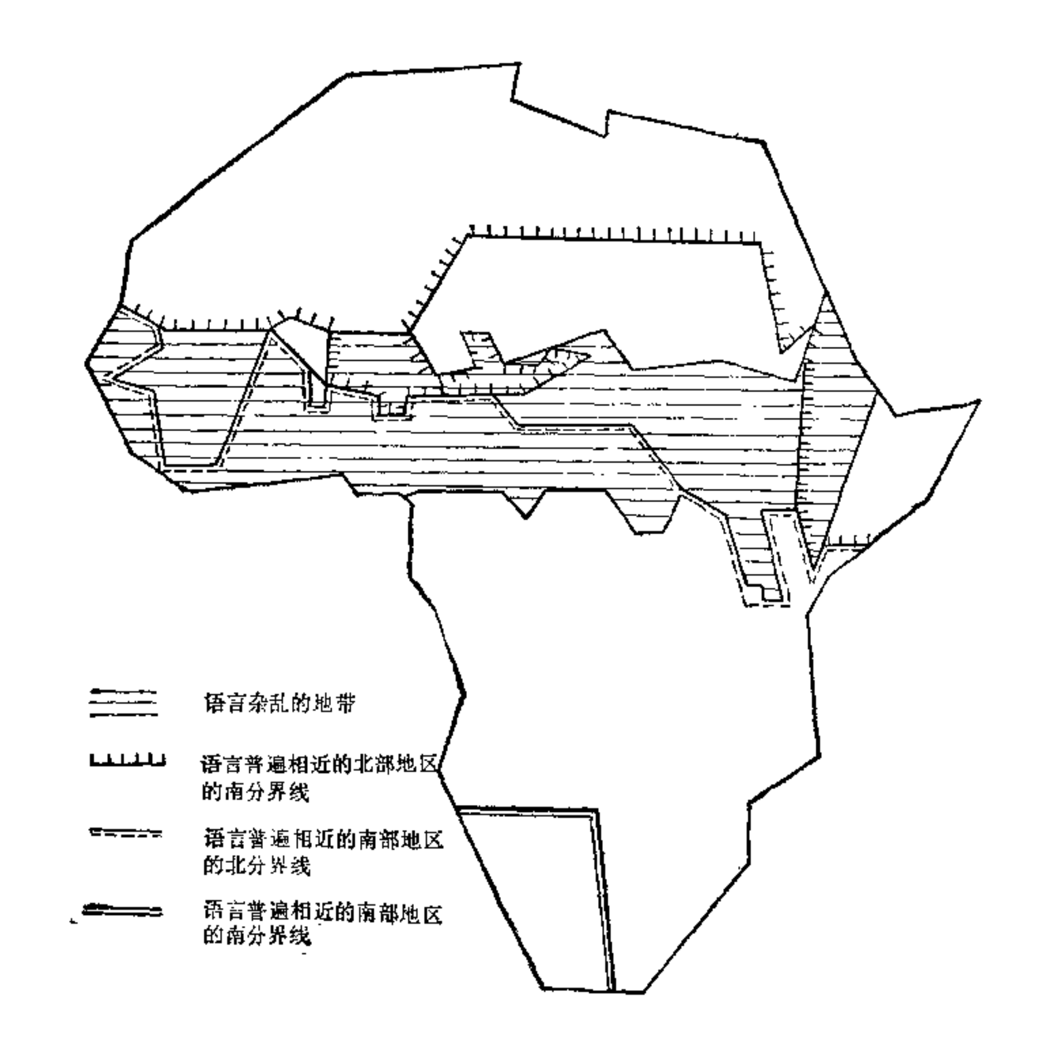


插图 12.1　用图解法表示的非洲语言地图

因此，首先必须澄清非洲语言地图中的语言混乱现象，把这种现象归纳为直接组成部分（即具有密切的全面关系并具有外部与内部一致性的语言组⑧，这相当于“复杂单位”；或者不能列入任何那种语言组的个别语言，这相当于“简单单位”）。这种处理方法揭示了先前一些分类法搞混的语言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非洲的全部120个左右复杂和简单单位中，有100多个完全局限在一个地带，该地带西起塞内加尔海岸，向东延伸，横过非洲，直达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和东非高原⑦。以单个语言的形式出现

⑧　如果在语言“A”、“B”和“C”之间确实有一种亲属关系，那么它们可能被认为具有“内部一致性”。然而，如果这些有关语言同时不具有“外部一致性”，那么这种组合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如果“A”跟“B”的关系、“A”跟“C”的关系或“C”跟“B”的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比这3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与这3种语言以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近，这种组合就没有意义了。

⑦　在其余的单位中，不少于9个单位包括通行于语言十分杂乱的地带的边缘的语言（只剩下南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很少几个“非班图语”单位）。

的⑧、约占非洲大陆语言总数三分之二的语言通行于这个长度约为5,600公里、而平均宽度仅为1,100公里的地带。该地带直达撒哈拉沙漠南部并跟其平行，根据它的走向及其语言的复杂程度，把它称为南撒哈拉“**语言杂乱地带**”或许是不无裨益的。它的范围可参考自然地理学和语言地理学来确定：北部大致与撒哈拉沙漠边缘相连，东部是东非高原，南部是森林边缘地区，西部是大西洋海岸。从空间上讲，语言最杂乱的地区位于“语言杂乱地带”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等边缘，在东非突出部分的南部末端，以及包括西非很大一部分的地区。就全面的结构关系和词汇关系而言，语言最杂乱的地区可能在东非突出部分的末端和末端附近。在那里，格林伯格设想的所有四个非洲语系中有代表性的语言都在半径仅40公里的范围内通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多哥丘陵地带、乔斯高原、喀麦隆高原、纳布丘陵地带和埃塞俄比亚高原西部的情况下，在多山的国家和严重的语言杂乱现象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相互关系⑨。还应该注意到，“语言杂乱地带”以外和以内的语言所代表的某些复杂单位的内部亲属关系，在它们(复杂单位)进入“语言杂乱地带”的那些地方，越来越变得混沌不清⑩。

“语言杂乱地带”在语言学上和历史上的重要性，由于被附加上了欧美语言学家设想的“语系”和“语族”网，而降低了。在这些语系和语族中，可以挑出两个范围最广的“语系”，它们比格林伯格分类中的其他两大“语系”，甚至比其本身按传统被“分”成的一些“语族”具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其确实性也更加没有争议。既然“家系”这个术语更多地是表示人类或生物遗传关联，而不那么适用于语言现象，那么就可以建议把“(语言)关系较广的地区”这个术语作为代表这两个“语系”中的每一个的恰当标志，特别是它们各自都包括非洲大陆上或多或少连在一起的地区。其中第一个是**语言关系较广的北部地区**，传统上叫作“闪-含语系”，而近来被格林伯格称为“亚-非语系”，或被塔克称为“厄立特里语系”；第二个是**语言关系较近的南部地区**，近来被格林伯格称作“尼日尔-刚果语系”和“刚果-科尔多凡语系”，或被默多克称作“尼格里特语系”。⑪ 关于这两个语言关系较近的地区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已没有什么争议，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语言学家就已认清这一点，而非洲研究者对这种情况的认识大概还要早得多⑫。这两个语言关系较近的地区包括非洲通用的语言的80%以上，仅语言关系较近的南部地区本身就包括非洲大陆的各语言的66%左右。这个事实说明了这

---

⑧ 至于非洲或多或少密切相关的言语形式的许多语言组，只能在“语言”和“语言”的“方言”之间进行武断区分。如果我们把或多或少可以互通的一组语言形式作为单独一种“语言”来处理，那么非洲语言的总数大约是1,250种；如果我们把每一种言语形式作为独立的语言来处理(使用该言语形式的说话人就是这样看的，而且该言语形式还有自己独立的名称)，那么语言总数将达到2,050种左右。如果把后一种方法应用于欧洲，那么瑞典语、挪威语和丹麦语就应是几种独立的语言；但是若按前一种方法，这几种语言就应合在一起算作单独一种语言。有人提出：应该取这两个估计数字的平均数来得出非洲语言数目的“大约数”，就是说非洲语言大约为1,650种，其中约有1,100种(用同样方法得出的)通行于“语言杂乱地带”。

⑨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在北美印第安语言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语言杂乱地带”，这个3,000多公里长、约300公里宽的主要是山区的地带，与太平洋海岸从南部阿拉斯加到墨西哥边境平行，还包括北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语言最杂乱的地区(设想的北美印第安语的8个主要语系中，有6个语系的有代表性的语言，通用于半径为150公里的范围内)。

⑩ 即闪米特语言、东“库希特语言”和班图语言(包括类班图语言)。

⑪ 格林伯格的“刚果-科尔多凡语系”包括他所说的“尼日尔-刚果语系”加上苏丹科尔多凡地区的一小批关系不很密切的语言。“尼格里特语系”是分类法中一个比较老的术语，1959年被默多克重新起用。

⑫ 见本卷格林伯格执笔的那章(前面第213-262页)；格林伯格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马达加斯加语和马来语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是十七世纪被发现的。

两个地区的相对重要性。在用于当代语言地图的保守分类法中，语言关系较近的北部地区的语言是在总共17个复杂和简单单位内(其中12个完全局限于"语言杂乱地带"内)探讨的，而语言关系较近的南部地区的语言则是在总共58个复杂和简单单位内（其中57个完全局限于"语言杂乱地带"）探讨的⑬。

在语言关系较近的最终区域(在非洲大陆上)和最近的复杂单位或简单单位（在相对局部上）之间所以没有建立中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由于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这样一些中间的语言关系远不如最终的和最近的语言关系那样显而易见，而且给它们下定义也困难得多。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语言关系较近的南部地区的"西大西洋语言"或"克瓦语言"、或"古尔语言"、或"贝努埃-刚果语言"的一致性，或者语言关系较近的北部地区的"库希特语言"或"乍得语言"的一致性，都从来还没有做过足够的论证。虽然几年前⑭，已经注意欧洲和美国对非洲语言所作的传统分类中这个主要的薄弱环节，但是分类中的这些中间情况在有关文献中还是占重要地位。对非洲语言地图实行和保持这些武断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与对非洲大陆政治地图进行武断的殖民主义划分的历史相提并论。

314

格林伯格在提请人们注意随意使用"含米特语族"这一术语作为一个中间的分类⑮时，对非洲语言学作了很大贡献，但不幸的是，他要对任意使用许多其他中间分类永久化这一情况承担责任。语言学家已经对一些中间分类提出了疑问⑯，但是最近，斯图尔特教授对"贝努埃-刚果语言"——格林伯格设想的最大的语族——进行了更明确的驳斥：

> 研究贝努埃-刚果语言的全部(最新)重大成果，是对贝努埃-刚果语言作为一个谱系单位是否确实可靠提出了严重怀疑。起初，认为格林伯格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认为许多共同的创新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引证，哪怕事实上他只引证一个，比如引证一个表示"孩子"的词。然而威廉森报告说，当人们考虑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时，这个词便被证明不只是存在于贝努埃-刚果语言，因而不能算是确实可靠的证据；她进一步报告说，在《贝努埃-刚果语言比较词表》的整个第一卷中，没有一个词算得上确实可靠的证据⑰。

当斯图尔特指出长期存在的疑问(这些疑问在涉及贝努埃-刚果语言的外部一致性时就已存在)时，人们不禁感到惊讶，为什么比较语言学家如此难于放弃使用外部一致性作为他们分类工作的一部分。可悲的是，"贝努埃-刚果语言"的整个活生生的教训似乎已不存在，而且，斯图尔特不仅不放弃中间分类中的这种情况和其他未经证实的情况，反而赞成把格林伯格的方案永久化，他的做法是把"贝努埃-刚果语言"跟"克瓦语言"和"古尔语言"(这两个概念也同样是武断的)合而为一，以便构成另一个依然是武断的类别——"尼日尔-刚果语言"，⑱即现在大家熟悉的"沃尔特-刚果语言"。在斯图尔特的"沃尔特-刚果语言"进一步扩

⑬ 在语言关系较近的南部地区，(主要)分布在"语言杂乱地带"以外的唯一复杂单位是班图语言。一方面，这一个复杂单位几乎占了语言关系较近的地区的其他57个单位合在一起的语言总数(500种左右)。

⑭ 见D.多尔比(D.Dalby)，1970年。

⑮ 见格林伯格(Greenberg)在本卷写的那一章(前面第213-226页)。

⑯ 见D.多尔比，上引书，第160页。

⑰ J.M.斯图尔特(J.M.Stewart)，1976年，第6页。

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伯格的"尼日尔-刚果语言"中唯一清楚而没有争议的中间"语族"是曼德语族。这种一刀切的划法反映了如下事实：曼德语族是格林伯格设想的尼日尔-刚果语言的唯一"语族"，其基本组成本身就值得怀疑!

大以包括整个"尼日尔－刚果语言"或语言关系较近的北部地区(的语言)之前，我们无疑将必须等待更多的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上几个部分合起来是清楚而没有争议的外部和内部一致性的唯一基本情况。

史学家应该注意，就尼日尔－刚果语言而言，"广泛接受"格林伯格的标准分类法，主要立足于格林伯格自己接受的韦斯特曼把西非语言分为若干**语族**的分类法。正如已经指出的，韦斯特曼并**没有**证实他那些语族的外部一致性，[19]而这些语族明显的内部一致性仅仅证明了构成这些语族的语言属于语言关系较近的北部地区。 315

虽然当代非洲语言分类法值得史学家有保留地进行探讨，但是非洲语言地图作为获取非洲大陆史前史材料来源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还有待进行更深入得多的研究，人们期待的是讲非洲语言的新的一代历史语言学家。他们将能对相邻的和关系很近的语言进行严密而详尽的比较，从而打好必要的基础。从这个阶段起，就有可能来说对整个非洲语言地图进行更广泛的策略性解释。尽管非洲语言的复杂程度比任何其他大陆都高，但它还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因为非洲语言的三分之二属于一个语言关系较近的地区，而且以不同方式构成的这三分之二的语言都局限于撒哈拉以南的语言杂乱地带。班图语区是非洲大陆的一个地区，对语言材料在史前进行的解释，已深入讨论过。然而，在整个非洲大陆的范围内，对这些材料进行史前解释的关键，将是我们对"语言杂乱地带"内语言亲属关系的全面了解，虽然对这项任务的规模不会估计过高。

(黄长著译)

[19] D.多尔比，前引书。

316

13 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方面

S.迪亚拉

导　言

非洲历史，当然是很难离开其地理环境的。但凭宿命论观点来确定非洲各社会及其环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是不会取得成果的。每一个社会都以各自的方式来适应其所处的环境。长期以来，人们在征服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证明了人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也证明了他们掌握了有效的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然而，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非洲，重要的是研究其某些突出的地理特点，从而说明该大陆漫长的地理和政治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在这方面，整个非洲结构上的特点，其异乎寻常的气候地带以及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虽然曾经世世代代地限制或促进人类的活动，但对其发展进程并无决定性的影响。总之，要弄清非洲大自然与在那里生活并按照其政治结构、技术条件和经济利益来开发，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人的密切关系，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非洲大陆的结构特点

人们普遍认为，在远古时候，非洲、美洲、南亚和澳大利亚同属一个大陆，后来才分裂逐渐漂离分开。当时，这一大陆名为冈瓦纳(Gondwana)，据说是由于地壳最早的造山运动造成的，造山运动的结果形成了条条大山，其走向一般是西南向和东北向。这些地壳皱纹，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剥蚀严重，终于变成了准平原地带，其中最大的就在非洲。

非洲的地质特性

非洲的地质特性，首先是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岛基台的巨大面积，它占了非洲表面的大部分。这个岛基台本身都是十分古老、十分坚硬的结晶岩石(花岗岩)和变质岩(页岩、石英岩、片麻岩)，这些岩石有些以露头形式遍布整个大陆的三分之一，有些则为不同厚度的一层沉积物和火山物质。除了马格里布的阿尔卑斯系和好望角的海西褶皱以及阿特拉斯山南部地区以外，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形成了一个古老的稳定台地，构成它的是一个自从前寒武纪以来未曾经受任何可观褶皱的地盾。这片台地经过积年累月的风雨侵蚀而逐渐变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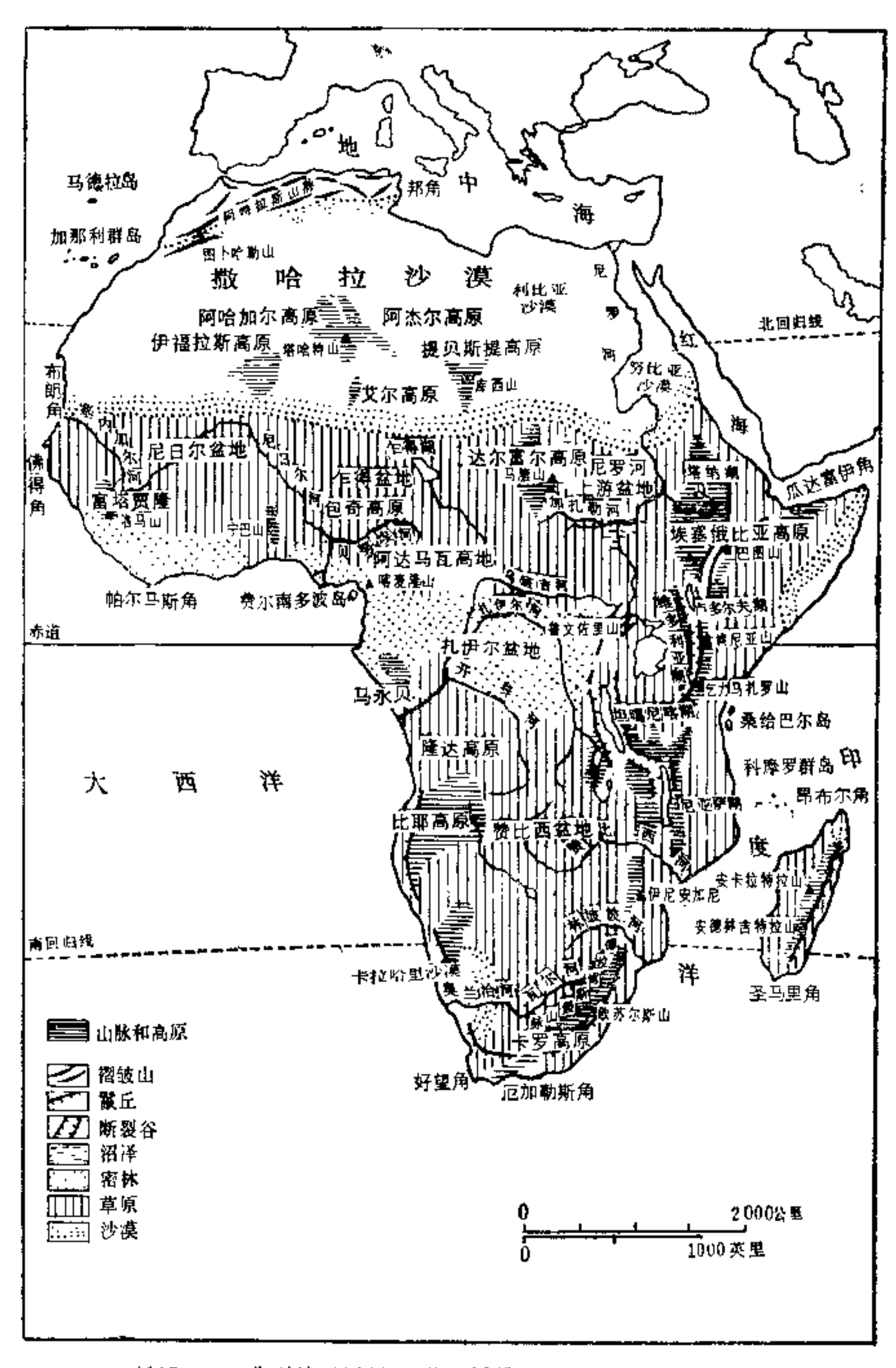


插图13.1　非洲地形图据〔J. 基－泽博(J. Ki-Zerbo)〕1978年改绘)

平，地平线以下的沉积层或厚或薄，高低不平，年代各异，从第一纪到第四纪的都有。这些沉积火成岩的构造都是粗糙的，通常是沙状物质，多为大陆性的而不是海洋性的，因为这个岛基台只是部分地被海洋淹没一段时间。在西非，前寒武纪台地的露头范围内，原始性砂岩形成一个接触变质带。在非洲南部，大量的、石炭三迭纪的大陆性沉积物构成了卡鲁系地带，其中的砂岩系列厚度有时达到 7,000 米。在大陆北部，特别是东撒哈拉地区和努比亚沙漠地区，侏罗纪和白垩纪的砂岩是“双层大陆性的”。但在第二纪中，从侏罗纪直到始新纪，在沿海地区和内陆盆地都聚积了海洋系列。人们可以从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贝宁、加蓬、安哥拉各海湾，从乍得盆地以及从索马里直至莫桑比克的东非沿海平原中看到这一点。从始新纪以后，“终极大陆性”的河流沉积和风化沉积聚集于非洲内陆的大盆地。铺在这坚硬台地的所有这些层状火成岩体并没有受皱纹的影响，而是受到从第一纪直至近期广泛发生的大畸变所影响。大片区域的隆起和大规模的沉陷，造成了非洲大陆所特有的褶皱与盆地相间的结构。在第三纪，由于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暴发高潮，更加猛烈的垂直运动造成了东非的巨大断裂。这就形成了由断层作为脉络的南经线长长的断裂——断裂狭谷。有时，这种断裂加上火山喷出的熔岩，造成了突兀拔起的山峦，如乞力马扎罗山，其冰川峰顶高达 6,000 米。西部的断裂原来比较小，但几内亚湾底部的断裂处由于火山活动频繁，结果形成了巍峨高耸的喀麦隆山峰(4,070 米)。

古气候的影响

紧接造山运动之后，非洲大陆经受了不同侵蚀期的长期影响，而这种侵蚀作用在各个地质年代显然是缓慢的。在各个稳定期，都伴随有复发性的侵蚀，结果形成了宽阔广袤的平展地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候变化，而最突出的气候变化是在第四纪。几个时期潮湿气候和半干旱气候的交替变化，其结果是岩石被风化，发生了线形的或片状的侵蚀。低洼地区被填充了，硬石突显出来，常常形成从平地突兀耸起的单独峰峦。在撒哈拉南部一些地区，现在仍有很多这样的岛山。在第四纪，除气候变化和海面水位变化以外，以前几个时期连续性剥蚀周期和堆积周期的变化方式也有很大变动。古气候的因素造成了现今的撒哈拉沙漠，在这里发现的大量石器和赤道型的动物化石证明，古代该地区的气候是适宜于人类居住的一种潮湿性气候。但在第四纪，由于雨量增多或减少，现有的南北各气候带都扩大了。因此，几次洪积期大大扩大了大陆上宜于人类生活的区域的总面积。另一方面，各干旱时期又使沙漠区域扩大，超出其现有的范围，使撒哈拉沙漠成为地中海地区和热带地区两个世界的气候分界线。尽管如此，几乎占整个大陆三分之一、跨越约十五纬度的撒哈拉大沙漠从来也没有成为南北之间的绝对障碍。在这里居住的是游牧者，很多世纪以来，骆驼队沟通了南北交往。因此，从古到今，它没有成为热带非洲同地中海之间的交通障碍，但它毕竟象一个过滤器那样，限制了地中海方面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农业、建筑和手工艺方面。因此，全世界这个最大沙漠在地理上隔离非洲大部分大陆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非洲大陆的整块状结构

非洲大陆明晰有力的地形特点使它与其它各大陆迥然不同。非洲的完整块状及其强烈起伏是漫长的地质历史造成的。纵观非洲地图，北自本萨卡角(北纬 37°21′，比塞大附近)，南至厄加勒斯角(南纬 34°51′)，三千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陆地跨越了将近 72 纬度。从最北点至最南点，直线距离约 8,000 公里；东西方向，从佛得角到瓜达富伊角，中间距离达 7,500 公里。大陆的一大半——约三分之二——是在赤道以北；处于南半球的部分显著缩小。非洲的块状地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例如，欧洲和中美洲那样的曲折海岸线。而且，岛屿在大陆也不占重要地位，其刀削斧凿之形因其轮廓平直以及陆地台不开阔而显得更为突出。海面再低一些，也不会使非洲的地形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一千米深的深海等高线，一般来说都是同海岸线接近的。非洲大陆的厚块状形态尤其表现在它的强烈起伏方面，其隆起面常常形成整片整片的高原，高原的边缘凸起形成沿海的褶皱，使河流水系难以穿过。虽然褶皱山脉不多，但非洲大陆的平均海拔高度竟达 660 米，这是由于上新世造山运动的压力所致，这种压力的特点是使该台地发生猛烈的断裂和极大的上冲力。然而，在表面平直的起伏下面，各地区仍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马格里布地区，其显著的特点是通过条条山脉和平衡的起伏与欧洲相通。它有两大山区，一是特勒和北里弗山脉，一是南阿特拉斯。这些山脉造成了地中海与撒哈拉沙漠之间从东到西的条条狭长地带。 320

在广阔的非洲东北、西非和扎伊尔盆地，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起伏。这些地区的地形特征主要是平原、盆地以及被山脉褶皱环抱的低高原。在这个大陆心脏地带，最大的盆地是尼日尔盆地、乍得盆地、扎伊尔盆地和加扎勒河盆地。

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是这个大陆的高原地区，很多地方的高度都在海拔 1,500 米以上。南部高原的边缘是大鬣丘的褶皱山脉，该山脉以陡峭的石崖屹立于海岸，有些地方高达 3,000 米。但东非洲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三纪构造运动所造成的强有力的起伏。在这种运动中，整个台地猛烈上升，而在断层和断裂之处则留下了条条深壑。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强烈的火山运动的影响。阿比西尼亚山，在高高隆起的山峦之上，又不断堆积了 2,000 米高的熔岩，致使峰顶高达 4,000 多米。从红海到莫桑比克，有伸延 4,000 公里的断裂峡谷。这些断裂峡谷对于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裂谷地带有许多湖泊，如尼亚萨湖、坦噶尼喀湖、基伍湖、爱德华湖、莫布图湖(原阿伯特湖)、维多利亚湖和图尔卡纳湖(卢多尔夫湖)，峡谷边缘是巨大的火山，其中最著名的是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

地理上的隔绝状态

由于其完整的块状和强烈的起伏，直至近代为止，非洲大陆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除了面对地中海世界的北非以外，大陆的其余部分几千年以来都与外界没有什么贸易交往。诚然，这种隔绝从来也不是绝对的，但它极大地影响了地处偏僻之乡的许多社会的发展。当几个大陆各自漂移离析、非洲从此脱离东半球以后，它还有一个同亚洲交往的

接触点，就是苏伊士地峡这个史前人口大迁徙的走廊。非洲海岸线的大部分濒临两个大洋，而两个大洋的使用程度在近代以前是不均等的。西面的大西洋一直不为人们使用，只是到了十五世纪欧洲人才出现在这一洋面上，开始其伟大的航海探险。在这以前，由于为帆船航海技术所局限，阿拉伯人无法远行，例如，他们无法远离撒哈拉沿海一带，因为他们的船只无法克服信风而航行，这种信风一年四季总是往南吹。但是，在印度洋方面，它早就促进了东非和南亚的交往。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帆船利用交替变化的季风的风力，可以来到非洲，然后再返回原来的海港。东非与印度洋各国建立的密切关系当时仅限于沿海地区，因为从亚洲各地来的航海者只想推行贸易，并不想往内地殖民。其他大陆的海洋文明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到热带非洲的内地，大部分停留在东半球之外。

321

非洲沿海很难停泊船只这一特点，一直被看作是它与外界隔绝的原因。海岸线平直少湾，这意味着没有很多港口，沿岸沙多水浅。西非的岩石海岸很少，但在马格里布，在埃及的红海沿岸以及在非洲南部的极南端，这种岩石海岸却不少。在西非，从塞内加尔南部到几内亚，以及喀麦隆和加蓬的沿海，都是沉降海岸。这是一些宽阔的港湾，是由于古代的河谷下沉造成的，但大部分已淤塞。有些浅平的海岸，由于潮水冲刷，形成了红树沼泽，特别是直至塞拉利昂的“南部水系”地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加蓬沿岸。在其他地方，大陆沿海还有许多近海沙洲，有些地方还有些泻湖，如同几内亚湾的泻湖那样。最后，沿红海海岸、莫桑比克海峡和马达加斯加海岸，还有大大小小的珊瑚礁。非洲海岸不易接近，主要原因是，长年累月波浪翻滚，汹涌澎湃，冲击岸石，使人难以在某些区域靠泊。但过去在这方面未免强调得过分了，因为地中海沿岸并没有阻挡北非与内地千百年来的贸易来往。直至近代为止，人们一直把缺乏天然港湾说成是热带非洲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但人们只要列出一些吸引航海家的地点，即可看到，无论是在大西洋沿岸还是在印度洋沿岸，非洲的天然港湾是很多的。无论如何，上述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亚洲的影响以及后来欧洲的影响都给非洲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隔绝状态仅仅是相对的。毫无疑问，非洲沿岸人民对远航探险兴趣不大，主要应归结于人的因素。

非洲的各气候地带

非洲的生活条件主要取决于气候因素。本大陆被赤道拦腰分成对称的两半，两半的面积都很大，整个大陆呈厚实块状以及起伏状态相对整齐划一，这些因素加到一起，使非洲各气候地带具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特点。非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与赤道平行的一系列气候带。无论在赤道以南或赤道以北，纬度越高，降雨量情况越坏。由于非洲热带区域最广，所以它与世界各国相比都是最热的。除了炎热之外，越靠近南北回归线，气候越干燥，或者说，纬度低的地方，一般来说湿度较高。

322

宇宙方面的因素

在这个突出的热带地区的大陆，气候的差别主要在于降雨量而不在于温度，因为大部

分地区的温度一年四季都是很高的。雨量和热度在任何情况下首先是同宇宙的因素有关，就是说，同纬度高低和太阳的视角运动有关。在所有热带地区，太阳每年有两次居临天顶，但到达南北回归线却只有一次，其日期分别是6月21日和12月21日，即北半球的夏至和冬至这两天。在赤道线，太阳一年两次到达天顶，其日期分别是春分(3月21日)和秋分(9月21日)。太阳的视角运动轨道从来不在地平线上很低的地方：这就是热带地区一年四季气温总是很高的原因。在靠近赤道的地区，太阳的视角位置总是徘徊于天顶线附近，这些地方没有炎热季节，因为四季的温度很少变化。一年之中温度只有3至4度的变化。但接近南北回归线时，温差就越来越大了。在撒哈拉地区，1月份同7月份的平均温差很大(约为15度)。大陆的最北端和最南端，属于温带地区，那里的气温有明显的升降，每年的温差很大，冬天寒冷，夏天炎热。而且，地中海区域每天温度上升的最高点可达到热带地区那么高。宇宙因素造成两大类型的炎热状况：在赤道地带平稳不变，而越接近南北回归线，变化则越大。

降雨状况

非洲气候之所以有季节性的变化，是因为那里存在着几个主要的大气活动中心，使各种类型的气团，如热带气团或赤道气团、海洋性或大陆性气团不停地移动。在大西洋上，有两个永久性的反气旋或高压中心，一个在北半球(亚速尔反气旋)，另一个在南半球(圣赫勒拿反气旋)。此外，还有两个反气旋单体，一个在撒哈拉上空，另一个在卡拉哈里上空。这些大陆性反气旋都是季节性的，只在南北半球的冬季起重大作用。到了夏季，这些反气旋明显减弱，而且退到大陆的南北两个端点。另一个主要的大气活动是集中在热赤道的一个低压带，它的活动范围是在南纬5度(1月)到北纬11度(7月)之间。地面风从反气旋地点出发，移向赤道的低压带，即形成横扫热带地区的信风。从亚速尔反气旋吹来的是清新、稳定的风——大西洋东北的信风——只影响撒哈拉海岸至佛得角的一个狭长地区。撒哈拉上空的强反气旋是稳定的、东北方向的大陆风的来源，这股风干燥，比较凉爽，但在往南推移过程中逐渐变暖。东来的哈马丹风，灼热而干燥，每年都十分定时地从乍得驰向塞内加尔，吹遍整个萨赫勒地区。它还伴有阵阵沙暴或尘暴，干雾弥漫，一片灰暗。在南半球的冬季期间，在扎伊尔盆地的某些地方，也有相当干燥的热风。但首先是，在南部的冬季——相当于北部的夏季——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大陆性低压，吸引着由圣赫勒拿反气旋产生的海洋性信风，它在越过赤道以后向东北推移。这就是几内亚季风，它在哈马丹风之下行走，不断地把哈马丹风向北和向上推进。在这些不同方向、不同温度和湿度的气团汇合之处，有一个热带辐合区，或称热带锋，由此产生雨季。

323

在北部的夏季(5月至9月)，东西走向的热带锋从北纬10度逐渐移至北纬20度，从而使南信风得以把潮湿的气团带向几内亚海岸，这就开始了雨季。在冬季期间，辐合区发生在几内亚湾，挨着喀麦隆的海岸，横跨大陆的南半部，直至莫桑比克海峡和马达加斯加西北角。在赤道以北，西非被干燥的大陆风控制。赤道以南，南来的大陆信风同来自印度洋南部的海洋信风的气团汇合，造成降雨。

总的气候状况可能受一些地理因素，如海洋流、地面起伏和海岸线走向所制约。而非洲在大西洋一侧的稳定冷洋流，在赤道南北两边都是对称的。在北边，由亚速尔反气旋产生的风所推动的卡纳利洋流，沿着海岸线由直布罗陀海峡进至达喀尔，带来了降低的气温和雾。在北纬15度左右，卡纳利洋流转向西去。南半球与此相对的洋流是本格拉洋流，它是由圣赫勒拿反气旋产生的风所吹动的。它给非洲西南沿海一带带来了低温和浓雾，然后在与弗里亚角平行的某处转向西去。这就是毛里塔尼亚和纳米比亚的海岸沙漠的成因。在大西洋洋面上，介于这两股对称的大西洋沿岸冷流之间的，是赤道线上的几内亚反流，它将温暖的水团从西向东移动，增大了大气湿度和不稳定性，从而增加了从科纳克里到利伯维尔整个沿岸地区降雨的可能性。

在印度洋这一面，海洋环流的流动采取另一种不同的形式。由来自马达加斯加东边的反气旋的东南风所推进而趋向本大陆的赤道洋流，形成莫桑比克暖流往南流动，继续往南，即为厄加勒斯洋流。这就给非洲东南沿岸带来湿气。在赤道以北，各洋流随风向的改变而逆转。例如，在夏季，一股东北热流沿索马里海岸流动；在冬季则是一股寒流从阿拉伯半岛流向赤道。

非洲的地形起伏虽然较为整齐，但对气候有一定影响，因为它起到一堵挡风墙的作用，象一道真正的屏障阻挡着湿润的海洋气团进入中央盆地、内陆高原和裂谷地带，使这些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干旱。

就带雨的风的方向来说，海岸所处的位置也是影响气候的因素之一。西非正面迎受西南季风的海岸段，特别是其中的山区地段，雨量是最多的(在几内亚共和国几乎达到5,000毫米)。在非洲南部和马达加斯加，与海洋信风的方向成直角的海岸得到大量的降雨，而与此种海风方向平行和没有突出起伏的海岸段，如科托努至阿克拉之间的海岸和索马里的海岸，则雨量较少。

在非洲，四季气候的变化状况主要取决于雨量多少。从赤道向南北回归线方向，雨量逐渐减少，而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地带每年的雨量都不到250毫米。往北走，就发现总降雨量在减少，与此同时，四季雨量的分配状况也愈来愈有明显的差别。在靠近赤道而常年处于低气压状态的地区，一年四季经常下雨，但在冬至和夏至时节则大为减少。离开赤道较远的北方或南方，降雨量基本上集中在相当于夏季的一段时期。因此，靠近南北回归线，雨季和旱季形成对比，而且旱季越来越长。然而在非洲的南北两端——即马格里布地区和开普省——气候颇为独特，因为冬季有雨。这两个地区都有中等雨量，但各地雨量分布不均。

气候带

由于年降雨总量的差别以及四季雨量分配的不同，整个非洲可分为下述几个主要气候带：

（1） **赤道气候** 这是南北紧靠赤道的中心地区所特有的气候。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热带锋先后两次经过这里，造成大雨。从喀麦隆南部到扎伊尔盆地一带，一年四季都

有充足的雨量。每年的总降雨量一般都在 2,000 毫米以上。由于空气湿润，各月份的温度并无很大差别：全年平均温度是25℃。

靠东边的赤道地区，由于受印度洋气候的影响，虽然降雨型式仍一样，但每年总降雨量不到 1,500 毫米。这里的年温度变化比靠大西洋一边的赤道地带要明显一些。这些地区白昼温度较高，从气候上讲，属于印度洋范围。 325

（2） **热带气候** 这是赤道地带以北和以南受热带锋移动所影响的广大地域的气候。在非洲西北部，从北纬 4 度到北回归线之间，有多种多样的气候，其南部每年可遇到两次热带锋经过，其北部则只有一次。在几内亚湾沿岸，为副赤道性气候或几内亚气候，那里不存在旱季，但每年当太阳两度达到天顶线时，雨量更多一些。沿海岸的高山屏障，其地形作用使西南季风所带的湿气凝集而加重。因而从几内亚共和国到利比里亚之间的海岸边缘地区，年降雨量达 2,000 毫米以上。

更北面的苏丹地区则从几个方面表现出热带气候的特点。由于靠近沙漠的距离不一样，湿度和干燥程度都有不同。纬度越高，热带锋的两次经过就越难以分辨。这就是说，两个季节——湿季和干季——在热带地区是不断交替的。在赤道地带的多雨气候和北回归线的干旱气候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看到以下几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每年总降雨量在 1,500 至 2,000 毫米的第一分带，每年要下 6 个多月雨。一年四季，温度比赤道地带高。

中间分带是比较干燥的地带：每年只有 3 个月至 6 个月的降雨期，总降雨量为 600-1,500毫米。这里的温差明显增大。

北分带，又称西非的萨赫勒地带，全年降雨量不超过 600 毫米，下雨期不到 3 个月。这里的雨天越发没有规律性，四季的温度变化也较大。

赤道以南，同样可以按纬度线划分为三种不同程度的热带气候地带。不过，这三个地带的气候差别更加明显，因为非洲南部地面不如北部平坦，濒临印度洋的沿海平原夹有既高且大的山峦起伏。来自西北方的赤道海洋空气同来自东面的热带海洋空气在这里汇合，给莫桑比克沿岸和马达加斯加东部带来充足的雨量。但是，大西洋沿岸地区，由于本格拉寒流的影响，气候干燥，由此产生了纳米布沙漠。

（3） **沙漠气候** 这是南北回归线两边的地区特有的气候。这些地带的年降雨量不到250毫米，而且很不规律。在撒哈拉沙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沙漠，总的来说，全年降雨量不到 100 毫米。但其中按纬度高低也有程度上的差别，这是因为撒哈拉反气旋来回移动之故，在夏至和冬至期间，它移至地中海，或退往低纬度。在高纬度位置时，它有助于季风向纵深前进；在低纬度位置时，它带来极地空气。由于它的来回移动，撒哈拉沙漠可以区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北部的特点是在旱季中有来自地中海的雨水，中部根本无雨，南部在酷热季节则有热带雨。 326

在南回归线，卡拉哈里沙漠比撒哈拉沙漠更容易受到西南海洋的影响，因为在这里，整个大陆比较狭窄，反气旋单体对气候的影响也相对减弱。因此，这一带的湿度较大，热度较低。

（4） 马格里布地区和非洲最南端的地中海气候，其特点是冬季凉爽多雨，夏季酷热

干燥。带有温带风的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在冬季有带湿气的海洋气旋经过。有时，还有极地空气侵入，带来强烈的寒流、霜冻和降雪，这主要是马格里布的山区。夏季干燥和炎热是邻近沙漠吹来的风造成的——在北半球是撒哈拉沙漠的风，在南半球则是卡拉哈里沙漠的风。

非洲的生物气候环境

在非洲，人类的生活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首先是受到生物气候环境的制约。气候和地形两个因素决定着几个主要区域的划分，其中每一区域在水文、土壤和植物生长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大陆河水的流出

气候的多样性反映在水文地理条件上面。但是在非洲，流入海洋的水大大少于雨水带来的水量。非洲大陆一半以上的地面，是无水系区域，或者是只有内流水系的区域。而且，大小河流沿途多障碍。从侧面来看，这些河流坡度不大，但连着一些急流和瀑布。因此，大量河水在盆地、裂谷和高原洼地的停滞过程中不断向下渗透和大量蒸发。

水流网络的组成

本大陆无雨或少雨的广大地区均无固定水道。但干燥的地中海区域时而有暴雨，积成一片片水洼，有时汇成河流。但这种流水最终由于蒸发和渗漏而消失。在雨量充足的区域，在热带气候或赤道气候的区域，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组成了一个个完整的水道网，汇集盆地的一部分水，然后绕过重重障碍将水排出。拥有非洲大部分水系的几个盆地，周围都是脊状，隆起凸出，不利于河水入海。整个大陆的河水都得经过沿海的褶皱山，通过狭窄的峡谷入海，在一些大河的下游，河流的坡度常常忽大忽小。扎伊尔河在斯坦利湖至河口一段就有 32 处急流。赞比西河在维多利亚瀑布下跌 110 米，然后冲入卡里巴峡谷，并经过几个玄武岩大瀑布。尼罗河从喀土穆以下，经过 6 处急流即大瀑布区，然后才到达地中海。而其他几条大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奥兰治河、林波波河——都有阶梯状的流程，主要在下游。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洲内河航运如此困难，这些河流都不适宜于交通运输。尽管如此，这些河流在历史上起了鼓励本大陆各地区人民进行有益交往的作用。

在几大河系之间，还有一些小河、湖泊、沼泽纵横交错的网络，不成系统，也无固定的外流水道。有时，这些水是一片死水，或者是附近河流汛期泛滥留下的一片积水；有时，这些积水又流回那些大河系去，在地质史上，这种情况发展为沉降盆地，而在沉降盆地的底部形成了湖泊，并不断构成冲积层。由于构造运动，终于使水的外流成为可能，一向无出路的湖水可以通过断裂谷或断层找到出路。这种构造运动或地貌改变所造成的河流袭夺，对于目前各水系形态的形成，无疑也起了作用。但是，在乍得盆地和奥科万戈盆地，目前仍可见到内向排水的现象，在那里到处是浅湖和沼泽，一到雨季，雨水汇成小河

而注入，这时，这些湖泊和沼泽便成了一片汪洋。然而，也有其他一些沉降盆地，虽有入海的出口，也同样有内流的倾向。这便是马西纳沼泽或内尼日尔三角洲、苏丹的加扎勒河省沼泽和扎伊尔盆地。

非洲河流状况

在非洲各地，降雨的形式调节着水文状况：各河流水量的四季变化取决于年降雨量。赤道区域的水道比较正常，常年都有充足的水量。但这些水道也有两次涨水时期，相当于春分雨期和秋分雨期。

在热带地区，在相当于雨季一次涨水期——夏至——之后，便是旱季的一个雨量稀少时期。因而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在下雨期和涨水期之间却有一个间隙，这是因为雨水在地面流得缓慢，地面坡度大都平缓。

在半干旱地区，河道的水流是间歇性的，一阵稀有的暴雨过后，河水便猛涨，但这样的大水很快就退了，因为水向下游流去。在地中海地带，由于雨势猛烈，加上有山，河水汹涌湍急。这些河流极不稳定，冬季猛涨，夏季则水位极低。在这个气候带范围内，很多水道都是时流时断的干涸河道。 328

非洲的几条大河，其支流网络跨越几个气候地带，因而涨落情况不是上边所说的那么简单。这些河流的特点是情况复杂，流量有季节性变化，有时表现在上游，有时表现在下游。

非洲的主要河流

非洲有几条大河可算入世界最大河流行列，它们排泻着一些广阔盆地的水，而这些盆地几乎都在热带地区。河流的涨落取决于各盆地倾斜面上所获雨量的多少。

扎伊尔河是赤道河流中最典型的一条，每年有春分和秋分两次最大涨水期。扎伊尔河流域将近400万平方公里，从南纬12度起直至北纬9度止。通过开赛河和卢阿拉巴河这两条支流，它流经夏至和冬至时雨量最大的南部地区。它在北半球的主要支流则靠北部的冬至的降雨获得水源。从它所流过的地域来看，大部分都是流经在每年春分和秋分两次大降雨的区域。各支流不同时期的涨水汇合到一起，使下游的金沙萨形成每年两次最大涨水（3月和7月）。扎伊尔河是一条水量充足、终年不冻的河流，全年平均流量为40,000立方米/秒，仅次于亚马孙河。

尼罗河通过其源头支流卡格拉河，发源于卢旺达和布隆迪。它的水源是一直流到苏丹加扎勒河省的沼泽区的赤道水系。在穿过维多利亚湖之后，它又汇集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山区的热带支流。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这两条在夏至和冬至达到最高水位，这使尼罗河得以穿过一片大沙漠地带，最后注入地中海。尼罗河全长6,700公里，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但其水势并不凶猛，常年平均流量不到3,000立方米/秒。尽管如此，自古以来，它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河流之一。

尼日尔河流域从北纬5度到北纬16度，它的水文情况更复杂。它的河道很象一个巨大的、不寻常的套圈。它发源于大西洋岸的边缘山系，流向撒哈拉沙漠，然后折回几内亚

湾，入海前穿过一片辽阔的三角洲。它的上游和下游都流经南部潮湿的热带气候的地区。它的中游穿过一个具有萨赫勒风尘气候的内三角洲，弯弯曲曲勉强地进入次沙漠性的廷巴克图地区，最后在下游得到越来越大的水源。在雨季，上游和下游同时出现洪水。但是上游的洪水，尽管远及尼日利亚，由于在热带地区有所蒸发和渗漏，水位便渐渐降低了。下游的洪水从尼日利亚西北部直至下游，由于当地的夏至和冬至大雨而继续上涨。在下游，由于汇集了其主要支流贝努埃河的河水，尼日尔河的水量更大了。

329

非洲的土壤

非洲土壤的地理分布，取决于气候影响的地带。各种土壤的形成主要是当地的岩石受到水淋和气温作用的结果。在热带区域，温暖的、丰富的、酸性的雨水不断冲洗岩石，溶解了基本矿物质并把它们带到地层深处。在十分潮湿的低纬度地带，即南纬10度或北纬10度的赤道地带，岩石化学分解后形成铁铝土。这种土壤一般都是松散的红色泥土，厚达数米。其成因是由于该基质转化为一些胶体成分，其中包括高岭土、赤铁矿和一定比例的二氧化硅(约为整体的30%)。这种铁铝土受到地面林木的保护而免于侵蚀，含有少量有机物质或腐殖质。

在具有明显的干旱季节的苏丹地区，有一种热带含铁土壤，但其厚度却小多了。这种土壤含有丰富的氧化铁，表土为沙质，深层为粘土。土壤结构很不稳定，极易为风雨所侵蚀。表土如无植被，土壤结构即迅速恶化。在西非，这种土壤常常结成硬块或硬板状，在雨季受雨水冲刷而造成沟壑，到旱季则又十分干燥，特别是刮哈马丹风时更为干燥。在几内亚湾海岸北部的某些地区，有的表土在古代受到剥蚀，呈现为块状或带一层硬土磐，被称为bowe。它的特征是大块大块地聚积着氧化铁和铝，其浅层甚为坚硬。很多这种古代bowes是在第三纪形成的，其硬化的表面在上层松散的泥土被侵蚀流失后即穿洞裂口。各处的这种土壤均无多大的农业价值。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的西北，在tampoketsa的上层也有类似的土壤。在赤道以北更北面的一些地区，即具有鲜明季节气候差异的某些地带，在草木植被之下形成了一种棕色的结构土壤，具有很大的农业价值。尽管很容易发生沟道下切，但它仍使农业得以不断发展，在历史上造成了殖民时代以前的苏丹大帝国。

赤道以南，在赞比西河流域各国，在干燥森林覆盖下，形成了一种与灰化土质相似的、有轻度沟痕的土壤。

在北部靠撒哈拉和南部靠卡拉哈里的半干旱地区，有一种棕色的、与草原土相似的土壤，其土质多少带固定性的沙丘沙土，在低洼处形成泥沙土质。这种土壤既轻又松，很宜于耕种，但如要使它更新，则需要较长的休闲期，让其生长灌丛或杂草。在机械式侵蚀为主的干旱地区，温差很大，岩石往往出现干裂，在风和稀少的雨水的强烈作用下，造成了片蚀。在这些地区，有一些不毛沙地，形成大片大片的沙质沙漠、砾石或砾质沙漠，只在平原中有泥土结壳。除了一些绿洲以外，这些沙漠根本没有可耕种的土壤。

330

在地中海周围，水和不同气候的四季对岩石的化学风化作用不如在潮湿的热带大。那里的土壤类似热带干旱地区的土壤，具有红、灰或栗色的表土。这些土壤一般含有丰富的

盐分。有些土壤，例如类似草原土的土壤，则含有丰富的钙质，预示着将进入温带地区的环境。还有一些土壤含有钙质或石膏结壳，是地中海地带所特有的土壤。

生物地理区域

气候和土壤是形成不同植物景色的各种自然环境条件的构成因素。

茂密潮湿的森林

非洲最壮观的植物风景是在大陆的中央，即南纬 5 度和北纬 5 度之间的地带。这里特有的植被是高大、茂密、湿润的森林。这种森林可以分为好几层，而一些匍匐枝和附生植物使长青树叶重重遮盖造成的暗淡更加朦胧。然而，茂密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有些是潮湿泥质土壤上的沼泽密林，有些是标志着地面转为较干旱的稀疏的林带。在湿润森林中，林木的种类很多而且混杂在一起，难以开发利用。由于常年炎热和潮湿，不但植物生长茂盛，而且微生物、蠕虫、昆虫大量繁衍。这种环境很不利于人类生活；尽管环境寂静，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例如河马、大象、野猪、豹子等。但在这些树林中，生存繁衍得最自由的则是栖于树上的鸟类、爬虫类和哺乳动物，尽管有各种致病因素，例如许多寄生虫，在威胁着它们的生命。在赤道地带以外，这种潮润的大森林也存在于一些地势较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沐浴着带水分的凉风的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高原的东麓。

热带稀树干草原和稀树林

雨林地带的边缘是干燥的落叶林，这种落叶林是雨水集中于夏至和冬至时节的地区的特点。这种树林常常是稀稀疏疏的，它的树木只能部分地遮盖林下的灌丛和植物。如果人为地大加砍伐，就会变为一片草地，即干旱季节更为明显的地区所特有的草地。到了南北纬度较高的地方，便出现了热带稀树干草原。这种草原处在气候有季节性差别的地方，其中有热带气候中多少带潮湿性的植物。

在林地干草原中的树林边缘，仍有一些大树，但不如灌丛那样常见，而青草已成为主要植被。在河岸两边则有或宽或窄的带形林。在热带草木区中，有些地方大片大片地生长林木，周围是覆盖较少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生长很高的杂草。有些地方则是没有树木的热带草原，这显然是由于人为的过分砍伐以及土壤结块形成的。距离茂密森林更远的地方，杂草茂盛而高挺的大片热带草原即逐渐消失，呈现在眼前的则是密灌丛干草原，但在一片片植物之间，常有寸草不长的裸露土壤。以上各种热带干草原都给野生食草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这里是狩猎的好地方，也可放牧。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作很容易，因为在这里开拓土地并不困难。 331

草原地

杂草丛生并常有很多刺灌木特别是刺槐混杂在内的草原，大都出现于旱季时间很长的地区。这种一望无际的草原景色常见于西非和东非的北部，偶尔也见于南非，卡拉哈里以

及马达加斯加的西南部。在年雨水量不到200毫米的一些地区，有贫瘠草原的副沙漠植被。

地中海植被

在非洲大陆的南北两端，在最干旱的地带有一些灌丛或草丛草原。但在较湿润的地带，特别是在马格里布山脉，却有一些绿栎林、栓皮槠林、松树林和雪松林。这些树木四季常青，下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

结　论

非洲是个古老的大陆，人类在远古时就开始在这里居住，而且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非洲的地理，无论在其构造特点上还是在自然环境方面，都表现出从久远的地质演变中所形成的粗犷有力的特点。非洲的完整块状和大陆性质比其它任何大陆都明显。位于大陆中心的广大地区，远离海岸1,500公里，长期隔绝在几个主要环流之外，这说明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人类定居于南北走向的大槽谷，例如东非大裂谷的重要性。这种地理上的隔绝状态，在靠近南北回归线处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气候变化而更为加深。

撒哈拉地区原是一个气候湿润的地区，曾在数千年间成为世界最古老的人类住区之一。后来，由于几个干旱期而形成了几个大沙漠，如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由于大沙漠横亘其间，大陆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虽受阻碍但并未断绝。所以，气候因素是了解非洲过去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降雨情形和生物气候环境今天仍对人类生活有实际影响。非洲各社会实际上利用了各气候地带的相互补充的作用，在它们之间建立了悠久的蓬勃贸易交往。最后，非洲历史还突出地受到其丰富的矿产的影响，它的矿产财富是吸引入侵民族的最强烈的力量之一。努比亚和库什的金矿曾为古埃及各朝代所开发。后来，热带非洲的金矿，主要是苏丹地区和津巴布韦的金矿，成了北非和近东各国社会兴盛的一个源泉，也是撒哈拉以南几个非洲大帝国的主要物质支柱。铁矿在古代曾是非洲大森林和热带地区之间的贸易商品。撒哈拉边缘地区的盐矿对各苏丹黑人国家同北非的阿拉伯－柏柏尔民族之间建立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非洲的矿物财富一直为殖民主义国家所开发。今天，它依然是主要的出口原料。

332

（严明新译）

14 历史地理学：经济方面

333

A. L. 马博根耶

根据吉尔伯特的看法，"历史地理学的真正作用是重构往日的区域地理"。① 对于本书这样一部著述来说，这一定义的意思就是要试图介绍史前非洲的区域地理，并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从事这项工作，显然需要全面考察远古时代的自然情况和人类生活情况，而且势必要和本卷其它许多章节的内容重叠。有鉴于此，本章的重点在于探讨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特别侧重于在史前非洲如何看待和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出于这样考虑，我们在着重指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非洲种种自然资源情况的同时，还设法强调其中哪些自然资源当时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些资源出现在哪些地方，它们怎样得到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或妨碍了人类对非洲大陆广大地域的控制。

矿物与人类技术的发展

在各种自然资源中，对于人类征服环境最有意义的资源也许莫过于矿物。矿物是构成整个世界的材料。一般来说，矿物的形成过程极为缓慢，可能长达千百万年之久。因此，与人类在地球上居住只有300万年相比，地质年代是非常长的，可以推算到50亿年以上。

非洲大部分土地的表土下面是岩石层，有些是世界最古老的岩石。这种古老的、结晶的岩石，被称为基底杂岩，其分布面至少占整个大陆的三分之一。其主要成分是花岗岩和严重变质的岩石，如片岩和片麻岩。有些岩石已经高度矿化。最重要的这种地层是沙巴(扎伊尔)和赞比亚的铜矿带，这条铜矿带延伸达300多公里。它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矿床外，还有一些结构最复杂的镭、钴等复合矿床。德兰士瓦(南非)的布什费尔德火成杂岩(面积95,000平方公里)以及穿过德兰士瓦到达津巴布韦的大岩脉(长530公里)组成了另一高度矿化地带。这里的矿藏有铂、铬铁矿和石棉。非洲的钻石地带是举世无双的，它大部分集中在南非，虽然在坦桑尼亚、安哥拉和扎伊尔也发现较小的矿床。南非、加纳和扎伊尔还有金矿场，扎伊尔和尼日利亚有锡矿。西非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还有丰富的铁矿。

334

非洲的古老基底杂岩也曾遭到频繁的火山破坏，这种破坏甚至早在寒武纪前就曾发

① E. W. 吉尔伯特(E. W. Gilbert)，1932年，第132页。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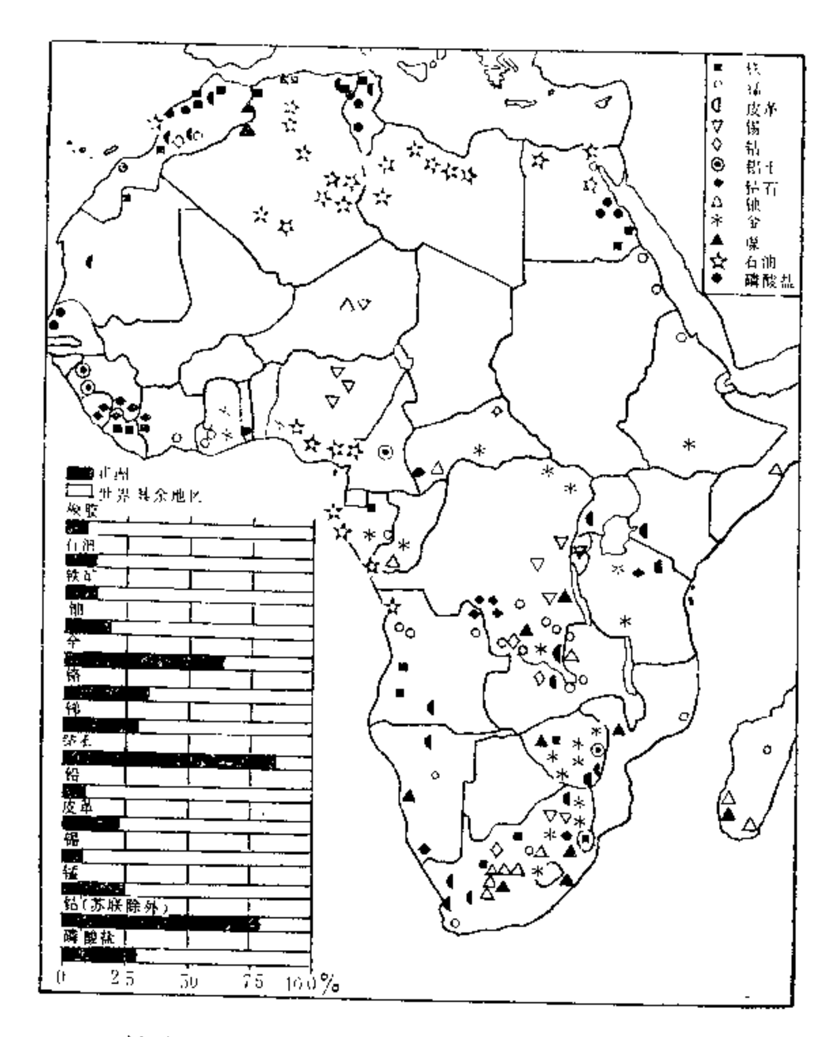


插图 14.1 非洲矿产资源（根据福尔诺的著作，1976年）

生。这些破坏一方面造成了花岗质的侵入，从而使金锡伴生，另一方面造成了基性岩和超基性岩的侵入。此外，它还产生了喷发岩或喷出岩，有许多是年代较近的，这种岩石除了风化为良好的肥沃土壤之外，还提供了矿物和岩石，例如肯尼亚的黑曜岩、玄武岩，这些对大陆历史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大陆其余三分之二的很多土地下，发现了古老的，前白垩纪时代的沉积岩。这些岩石因年代久远，也有值得注意的矿床。例如，沿大陆北部边缘，从摩洛哥经过阿尔及利亚直至突尼斯这一地区，是一个大的磷盐岩地带，该地带伴有相当价值的铁矿矿床。同样，在南非的卡鲁地区和纳米比亚的达马拉体系，也发现重要的沉积铁矿矿床。另一方面，煤矿矿藏除了在南非的高草原和津巴布韦的万基田野零星见到一些以外，在非洲几乎看不到。好象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撒哈拉地区和西非沿海地区，后白垩纪时代的年代较短的沉积岩中，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这些丰富的矿藏财富，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人类组织活动和谋利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例如，有人认为，控制西非同北非穿过大沙漠进行的黄金贸易是中世纪苏丹西部各王朝帝国兴亡盛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一千年以来，把阿拉伯人吸引到东非的肯定是黄金和铁矿砂的交易。另一方面，欧洲人起初是醉心于拉丁美洲的矿物财富，但近百年来，他们集中全力到非洲，把它作为获取矿产原料的殖民地后方，以促使其工业增长。

然而，在史前时期，对人类技术的逐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那些矿物，其价值并不太高，分布也比较零散。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单一、坚硬度强而且具有形成薄片特性的石质矿物或石块矿物。[2] 其中最好的就是火山玻璃，这种矿物可在东非的火山地区，特别是在格雷戈里裂谷一带找到，它构成旧石器时代肯尼亚卡普萨工业生产长石刀和各种细石器工具的基础。 335

质地良好的其它物质有玉髓形式的二氧化硅、火石、燧石和碧玉、硅质岩(例如石英岩)以及细颗粒的硅氧硬化岩石，例如硅结砾岩、硬化页岩和凝灰岩。玉髓被广泛使用于中石器时代津巴布韦的班巴塔工业，而始新世的火石和燧石在突尼斯高原和埃及具有特别重要性，人们认为，那里的火石和燧石是输入的。石英岩在非洲分布较广，特别是以卵石的形式出现在各河道河床，形成被称为阿舍利时代的那个最古的石器时代的工业的基础。有些地方，例如南非奥兰治河的中游地区，硬化页岩在当时的用途主要和石英岩一样。

质地较差的石质工具原料有称为绿岩的细颗粒的闪石岩，基础的和中间的火成岩，如玄武岩、粗玄岩和闪长岩，这些都是制作石斧的好材料。此外，还可以用来制作武器，如投石和石箭头。玄武岩也许是当时制作石头容器最常用的火成岩材料，尽管实际上各种岩石均可制作容器，而且制作过。在其它火成岩中，花岗岩、粗玄岩和斑岩，在各地区也都具有各自的重要价值。稍软的岩石，如石灰岩，也并非毫无用途；在埃及，甚至很软的岩石，如块滑石和蛇纹石，均被人利用。此外，在整个非洲，泥土从中石器时代以后曾为范围广泛和品种繁多的制陶业提供了基础。

矿物在史前时代发展人类技术的重要性不限于制作工具、武器和容器。它们无疑还被

② A.罗森费尔德(A. Rosenfeld)，1965年，第158页。

用来建造住所，用泥土作为重要的粘合物。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或有历史意义的土石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也需要用大量的硬质花岗岩或石英岩。有些矿石可用作石画的颜料．在撒哈拉地区和非洲南部，有些岩画一直保存得很好，直到今天还不坏。矿石颜料是把各种岩石，如赤铁矿、锰矿和高岭土研磨成粉末，然后用某种油质或树脂介质调和而成。

但是，毫无疑问，对于史前时期后期非洲的发展具有最重大意义的矿物是铁矿石。虽336然现代技术由于高度机械化和大量经济投资，要求使用品质较高的矿床，而这种矿床只能在有限的局部地区找到，但是在史前时代，局限性不那么大。在非洲的热带大草原，几乎遍地都有含铁的红土或铁砾岩，这种矿石是古老的高平原的典型矿物，而且种类很多。有些种类十分丰富，构成大陆最早的炼铁活动的基础。炼铁技术一经在某处发现，它就立即传遍整个大陆。与这种情况截然相反的是铜和锡的冶炼，因为铜和锡的分布地区非常窄，除了少数几个使用铜的史前社区，例如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高原居民和沙巴族的卢巴部落外，它们并没有给非洲提供广泛的青铜文化。但是，应当追述的是，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毛里塔尼亚曾有过一个灿烂的黄铜时代。

植物资源与人口增长

非洲大陆之所以能维持越来越稠密的人口，是同非洲的植物资源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前面已经指出，非洲主要是一个草原大陆，各种草本植物占总面积的50%以上，其次是沙漠，占30%左右，森林占20%弱。对于人类的定居来说，多种多样的环境是很有价值的，它能维持可供狩猎的各种动物，提供可供食用的浆果或根茎，生长可用来制造工具、衣服和住所的材料，并提供各种可培育成农作物的食用植物。

草原区是非洲大陆猎物最丰富的地区，这里的猎物种类繁多，如羚羊、瞪羚、长颈鹿、斑马、狮子、水牛、狷羚、大象、犀牛、河马以及无数小动物。因此，难怪克拉克指出，人类最早的一些居住遗址，总是沿着江河溪流两岸，在湖泊的周围和沿海一带；而这些地区如今已变为草原、林地、萨赫勒型的半沙漠或真正的沙漠。③这种遗址通常不在森林地带，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狩猎技术的更大提高，驱使人们去征服各种各样的地域，从沿海地带到高原山区，从现在的无水源沙漠直到森林地带。

但是，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植物分布情况不一定与史前时代的情况相符。以撒哈拉大沙漠来说，它在历史上经过了连续几个时期的气候大变化，这个地区在第四纪的早期曾是比较潮湿的地带，有热带草原型植物，使野牛、野猪、疣猪、羚羊、河马等动物337得以维持生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赤道地带的森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则是比较干燥的。

人类在不同植物地带从可供狩猎的野生动物获得各种资源的同时，还从这些植物地带中获取可食的果实和根茎。在这方面，由于草原区江河两岸生长着长廊般的树林，这就意味着，当时的阿舍利人可以同时享受森林和草原环境所提供的水果、籽仁和坚果。克拉克

③ J.D.克拉克(J.D.Clark)，1970年c，第93-94页。

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后期赞比亚北部的纳奇库凡人可食用的草原野果、坚果和野菜，例如马布尤和马苏库的果实，有许多至今仍为讲班图语的一些民族经常采食。④后来，人口继续增加，使居住范围实际上扩大到各种环境时，人们采食的食物种类也必然大大增加。例如，有人认为，由于居住在尼罗河流域的以采食野果野菜为生的部落对谷类草本植物更加重视，才导致了对谷类植物的有意栽培，开创了发展农业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于人类在非洲居住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狩猎和采集食物以外，植物资源在提供工具、衣着和住所的材料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坦噶尼喀湖南端的卡兰博瀑布附近，完好地保存了一些古代的木制工具。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单尖头和双尖头的木制工具以及可能是掘土用的一种斜截头的短木锥，这些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产物。尽管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木制工具，但仍有迹象表明，这种木制工具曾广泛使用。例如，在赤道地带森林，旧石器时代的卢彭巴文化反映了木工在两面修整的核斧中的重要性。同样，在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草原林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纳奇库凡人所用的石器中有许多沉重的刮削器，这表明当时木器及其副产品已广泛使用，毫无疑问，当时曾用它们制作围捕猎物的藩篱、尖桩以及各种陷阱。

有些地方，例如林地地带，大猎物不十分充足，毛皮不足以供应衣着，常常用树皮代替。今天发现的一些手斧，例如在赞比亚北部姆韦拉岩石区发现的带把的磨边手斧，很可能是以前剥树皮制作衣着、容器和绳子的工具。特别是在中石器时代以后，开始使用植物材料建造住所以代替岩洞。例如，人们用树枝、茅草或草席建造中石器时代的挡风墙，在卡绍泉发现了这种挡风墙倒塌后的遗址，估计其年代是我们纪元前2500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有了农业的地区，用植物材料或有时用植物加泥浆材料建造的住所，数量更多、分布更广。这标志着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盖上文化印记的最初几步。 338

但是，如果这种低级住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实际占领地球表面的开端，那么他们从周围大量野生植物培育出新品种的能力，确保了他们最终的统治地位。到底有哪些条件使人类从野生植物中培育出可栽培的新品种，仍是学者颇有争论的问题。此外，如何评价非洲对这一伟大业绩的贡献，也是有争议的。就目前所知，大家普遍认为，非洲的贡献并不大，与亚洲的贡献相比，当然要逊色。俄国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认为，除了埃塞俄比亚高地以外，非洲并未有过任何重要的作物培植中心。在他的不朽作品之后，最近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对非洲本土为培育现有作物的贡献提供了更可靠的看法。⑤在这方面，无可否认，热带草原远比森林地带重要得多。在热带草原上，在我们纪元前四千年至一千年这段时期，人类培育了目前非洲本土作物的许多品种。这些品种，许多是种子农业范围内的，其特点是以播种作为栽培的先决条件。⑥

相反，在森林地带的少数培育均属植物栽培的范围，是以插种截枝、根茎、块茎或嫩枝作为栽培的先决条件的。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培育作物是薯蓣，它的不少品种至今仍为人们所栽种。这一地区培育的另一种植物是油棕。

---

④ J.D.克拉克，1970年C，第178页。

⑤ N.I.瓦维洛夫（N.I.Vavilov），1935年，见本卷第二十七章。

⑥ R.波蒂埃（R.Portères），1962年，第195-210页；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二十七章。

虽然培育的作物的种类不多，但培育法的发现却意味着人类和他们的群落生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它意味着某种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把其他地方传来的栽培品种加以推广，而非洲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新作物，特别是从亚洲和南美传来的。从利用自然植物资源的角度来说，这种只从本地和外来的植物品种接受有限植物品种的做法，不仅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环境中吸取食物维持生存，而且意味着他们走上了大大改变生物的途径。由于需要开地种植新作物，由于需要砍掉其它植物使它不争夺土壤的养分，非洲各地的植被在性质上起了根本变化。

也许，人类为此目的使用的最有用的媒介是火。据考证，人类在非洲使用火的历史可339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从而可以断定，早在60,000年前，人类在非洲已经常使用火。可是，在开始阶段，可能只是用火来保护自己，制作工具，也许还通过放火烧草来猎取各种动物或把它们赶走。一旦他们懂得了栽培作物，自然也就会用同样办法来除掉不需要的草木。为了栽培作物而放火烧荒的做法对草和树有着不同的影响。杂草露出地面的部分一般都可烧掉，特别是在热带草原的干旱季节，但是不能烧死，因为还有根留在地下。另一方面，树木如没有厚皮保护则可能被烧死，要是烧不死，也就变成歪歪扭扭、形成节瘤了。

因此，火的使用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是，非洲人经过几个世代已大大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由于经常放火烧死潮湿森林中不堪火烧的树种，为逐步扩大草地范围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在西非，这一过程发展得十分迅猛，以致由此开拓的热带草原形成一片辽阔的地带，向南一直延伸到北纬6度的地方。⑦而在热带草原内部，可以看到，由于每年放火烧荒，植被的性质在改变，自然面貌也略为改观，草丛遍地的开阔草原一变而为一片片有较多树木的岩石地带。事实上，树林岩石地带得以存留下来，使人提出了这种看法：今天大部分草地上的植被过去一定是森林。⑧

不管怎样，非洲草地区域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源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容易开地，栽培作物，还因为更容易使人通行。易于通行这个因素，对于非洲大陆人口生息有着决定性的关系。非洲的特点是，总有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有些正在从考古学、人种史学、语言学和历史的角度进行考证和描述。人口的大量移动是新思想、特别是工具和技术的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有时传播速度非常快，往往使有关的研究者很难查证所传播的各种革新技术的起源地。

易于通行对于从空间集合各群落组成政治实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非洲的草原地区为非洲各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这些国家在掌握了压制手段后，就很自然地设法把其它组织较差或战争工具较差的群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力量较差的群落的抵抗一旦被制服，则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被吞并，要么退到较偏僻或荒凉的地方去。总之，草原地区出现一系列国家的结果是，力量较弱、组织较差的群落进一步分散到340条件更困难的环境，例如互相阻隔的山区、干旱的荒凉地区或森林茂密的地带。

由此可以看到，非洲的植物资源在非洲人类的历史演进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些

⑦　W. B. 摩根(W. B. Morgan)和J. C. 皮尤(J. C. Pugh)，1969年，第210页。

⑧　S. R. 艾尔(S. R. Eyre)，1963年。

资源不仅供给人们以丰富的水果和根茎，而且使他们得以发现可以栽培和保护的各种作物，从而取得新的、更丰富的食物来源。食物的增加促进了非洲人口的稳步增长。到我们纪元1650年为止，根据卡尔·桑德斯所说，非洲大陆的人口数量仅次于亚洲，当时已有一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以上。⑨人口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得较好的社会政治实体使人们更加安全。由于这些社会政治实体更多地分布在草原地带的范围内，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地带的人口占当时全大陆人口的大部分——这种情况后来随着对奴隶的劫掠以及十六世纪以后外来势力在非洲大陆建立殖民地而渐渐向相反方面转化，特别是在西非。

动物资源与文化的多样性

与植物资源密切相关的是动物资源的分布状况。从有记载以来，非洲大陆就以拥有大量哺乳动物资源而引人注目。有人说，除了蝙蝠以外，非洲的哺乳动物多达38种。

这些动物在非洲大陆的分布情况，各时期和各地区都不一样。动物化石表明，非洲各地区在不同时期都有过各种更大的野生动物。例如，北非地中海地区曾是狮子和大象等动物的家乡。有人认为，许多这类动物在更新世的几次大干旱时期被逐出了这个地区。而剩下的大多数，在我们纪元开始后的年代又被人们滥加捕捉，以满足诸如罗马竞技场的大量需要。但近至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奥马尔公爵率领的大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到之处，从君士坦丁的悬崖到奥兰的平原地带，都发现了大群大群的包括狮子在内的野兽。

现在的沙漠地带仍然保存着种类可观的野生动物。其中包括一般羚羊、瞪羚、大羚羊、弯角大羚羊或羚羊鹿。在更早得多和更潮湿得多的时期，据了解这些地带的动物资源数量更多，并包括大象、犀牛、河马、长颈鹿、现已绝种的大水牛，以及许多大羚羊。

但是，大多数非洲动物的真正家乡是在草地平原。⑩在西非、东非以及非洲中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带，都有狮子、豹子、非洲豹猫、鬣狗等猛兽。在这些地方，还有大猬羚、非洲大羚羊、红面羚、疣猪、花毛羚羊、斑马、长颈鹿和鸵鸟。这里也是大象、水牛、黑犀牛以及德比和好望角旋角大羚羊、南非羚羊、非洲大羚羊和棕褐色羚羊的天然乐园。但其中每一类的分布范围经过千百年都有所变化。各种动物都遭到人类的大劫掠，或者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在为生存而进行的大搏斗中被其它种类所淘汰。例如，在赞比西河和白尼罗河上游之间，白犀牛所以绝迹是由于在更新世时期植被和气候的改变使更好斗的黑犀牛在生存竞争中占了上风。 341

虽然大多数的野生动物经常出没在热带非洲的森林中，但整个说来，森林地带的动物资源较少，比较常见的森林动物有：丛林野猪、巨型森林猪、大羚羊、大无尾猿，如大猩猩和黑猩猩以及中非鹿。即使在这些地区，环境的改变也影响以前生存地域的范围。大羚羊这一动物的断续出现就是由于赤道非洲过去的大片森林面积缩小了。

这些丰富的动物资源在人类主要以狩猎为生的漫长时期里无疑给了他们很大帮助。这

⑨ A. M. 卡尔-桑德斯(A. M. Carr-Saunders)，1964年。目前，非洲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

⑩ F. 索默尔(F. Sommer)，1953年，第64页。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本卷第20章。

些资源看来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有些非洲社区至今仍处于靠狩猎为生的发展阶段。动物资源中，一个特别的种类是鱼，早在中石器时代，也曾被人们捕捉。不仅河流，而且淡水湖泊，例如，东非的图尔卡纳湖(鲁道夫湖)、纳库鲁湖和爱德华湖以及西非乍得湖，都以丰富的鱼类资源吸引了早期人类居住。[11] 各河流之中，尼罗河显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这里发现了在河岸居住的群落，他们用骨制的鱼叉和鱼钩捕鱼，此外，他们还捕食河马和鳄鱼。在非洲各地，今天仍可看见人们使用整块木料挖制的小独木舟在内河湖泊捕鱼，只有少数几个渔业群落制造过较大的独木舟，试图在沿海捕鱼。直至最近非洲大陆各处由于技术水平跟不上而不能开发周围海上的丰富鱼类资源。

然而，陆栖动物种类异常丰富，为驯养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当时非洲的动物驯养实际上只限于驴、猫、珍珠鸡、羊和牛。[12]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新石器时期，非洲受到了西南亚较早的和较成功的试验的影响。畜牧业传入非洲大陆正是这个时候。据克拉克说，“新石器时期的最初放牧者是在我们纪元前 5,000 年或更早时候在撒哈拉出现的。他们驱赶着一群群长着长角或短角的牛和山羊以及一群群绵羊来到这里，直到我们纪元前 2,500 年以后，由于气候日益干燥，才迫使其中一些人迁徙。”

342

但畜牧业在非洲各种环境中的发展并非完全均衡。虽然大多数群落驯养了各种小牲畜，但是只有少数群落掌握了驯养较大动物的技能。其中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西非洲热带草原的富拉尼人，以及东非草原的马赛人仍然一心致力于畜牧业，并不想将畜牧业同农业结合起来。这些群落常年累月，赶着畜群，寻觅水草，至今仍过着地地道道的游牧生活。然而东非的一些班图人却将畜牧和农耕结合起来，使两者都得到了改进。

阻碍畜牧业在非洲扩展的因素之一，也许是其他种类动物的增殖，对大陆动物资源的发展起了不利影响。这些动物中最突出的是采采蝇。这种扰嚷的棕色大蝇是昏睡病的主要传播者，但不是唯一的传播者，昏睡病使人昏睡，并使其家畜死亡。在非洲，目前采采蝇出现于南纬和北纬 14 度之间的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海拔 1,000 米以上的较寒高地，以及草短的开阔地带，那里旱季太炎热、太干燥，不宜蝇类滋生。

非洲在很古的时候就有采采蝇。在北美第三纪中新世的一些河床里发现了采采蝇的化石印记，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此种飞蝇在史前时期的分布一定更广。[13] 它从非洲许多地区的消失，部分地可能是气候变化、天然障碍和冰川现象共同造成的结果。事实上，非洲更新世的气候变化不仅对各种蝇类的分布，而且对其疾病传播率也一定有极大影响。

飞蝇猖獗的地带成了畜牧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放牧的人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他们的畜群经过采采蝇危害的地域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牲畜从北非进入非洲南部时，必须穿越没有采采蝇的天然走廊和人口密集的农业区群落建立的无蝇走廊。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约在 900 年前，牲畜所有者的迁徙以及同其他民族的混合产生了今天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人和胡图人社会。

343

假如非洲大陆一直没有采采蝇，非洲的历史便大不一样了。由于采采蝇使大牲畜根本

---

⑪ 参阅佩顿(Putton)的著作；关于这一点，见第 20 章。
⑫ J.D.克拉克，1970 年 c，第 204 页。
⑬ T.D.A.科克雷尔(T.D.A.Cockerell)，1907 年，1909 年，1919 年。

无法到达定居的农业群落地区，因此那里从未使用大牲畜驮运和干活，也没有机会发现轮车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较大的牲畜却成了一些部族乘骑的牲口，其快速的奔跑力鼓励这些部族对定居民族进行侵略和政治统治。⑭

在对动物不利的其他因素中，还有疟蚊和蝗虫。有不少种疟蚊能够传播这种或那种疟原虫，其中有些对人的血液更感兴趣。非洲最主要的蚊虫是冈比亚疟蚊，因为这种疟蚊也吸动物血液，即使暂时吸不到人血也能存活，所以极难消灭。疟蚊通常在死水中繁殖，靠近沼泽和江河的地方最多。疟蚊滋生地随雨水增加而增加，炎热的气候有利于幼虫的发育和成蚊体内疟原虫的增殖。据此推测，纬度较高地区气温较凉，疟蚊的滋生就会减少，因此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地方性疟疾即使能在这样的高度传播，仍将趋于消失。

在非洲，疟蚊成为人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究竟有多久，不得而知。许多非洲居民中广为流行的镰状细胞特质，似乎说明，疟蚊同非洲人口发展有长久的密切关系。这种特质，肯定是那种有利于居民在地方性疟疾猖獗的条件下生存的长期淘汰压力的产物。疟蚊，就其严重损害不适应的人种的生存机会而论，也是非洲历史中的主要因素。可以肯定，在二十世纪以前，疟蚊有力地使欧洲人不敢在炎热而潮湿的西非定居，从而使西非没有遇到北非、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较高地区在历史上遭遇的棘手的种族问题，那些地方都成了移居殖民的牺牲品。

蝗虫也是非洲的传统祸患。它们是大蚱蜢，一般单独生活，或结成小群，其活动地域为沙漠边缘或靠近林地和大草原这些向植物带过渡的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蝗虫主要有三种：红色蝗虫、非洲移栖蝗虫和沙漠蝗虫。这三种都需要两种供产卵栖息的环境：无覆盖的地面用以产卵，有植物生长的地区用以给食。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蝗虫取食的地方很小，这时它们便结成大群，侵入远处和近处各地。虽然《旧约》确实讲到，在摩西时代，蝗虫是埃及的祸害之一，但是要确证遥远的古代的这类入侵事例并非易事。大约从十九世纪以后，这类侵害事例的记载才比较丰富。例如，中非在1847-1854年、1892-1910年，以及最近1930-1944年之间的不同时间里，都遭到红色蝗虫的侵害。对于定居的农业人口来说，特别是在收获前夕，这种侵入的劫掠，可使丰收变为饥荒。过去，由于干旱这样的自然条件同蝗虫侵犯同时发生，为非洲大陆发生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准备了条件。 344

水资源与人的迁徙

水资源在非洲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虽然非洲大陆拥有世界年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但也有年降雨量最少的地区。辽阔的撒哈拉和卡拉哈里沙漠是有力的证据，说明非洲大部分地区是严重干旱地区。但除了这些沙漠之外，广阔的热带草原区雨水只是勉强够用，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主要依靠风力带来的降雨，因而雨量变化无常。但是，如能利用其他水源，如地表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等，那就不会成为人们严重关切的问题了。

---

⑭ 骑马的武士在创建非洲国家，特别是赤道以北国家所起的作用，说明了这种情况。

然而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比较炎热而低洼的地区，河谷寄生有各种有害昆虫，不宜人类居住。河流水位同降雨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雨水稀少或持续干旱的季节，河床干涸，河流对人类没有多少好处。在传统的技术中，除尼罗河下游地区外，没有储水防旱的方法。技术落后还意味着，即使在自流水盆地这种地质结构有利于大量储存地下水的地区，也无法汲取。低于一定深度的地下水。非洲大部分地区，下层基底为杂岩，雨水贮存力非常有限，人们只能靠每年的雨水生活。

因此，雨水短缺引起的严重干旱，是非洲人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更新世时期的气象史表明，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可能有长期的或多或少的降雨周期性的格局。但不论情况如何，345 干旱是对人的一种环境压力，迫使他们以各种方式作出反应。实际上所有的反应方式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迁徙，寻觅水源较充足的地区，暂时居住，或永久定居。人们的这种迁移可能是和平的，但也往往是侵略性的，这要看他们的组织情况和领导而定。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记载了他们从一地迁到另一地的活动，或更强大的迁移集团的入侵，对他们的社会进行征服和改组。

但是，在水量充足的地方，不论水源来自降雨还是地下水，在农业技术已有发展的地方，定居人口就有增长，而且有可能使社会逐渐沿着制服大自然的艰巨道路前进。作物丰富多样，它们成熟的节奏支配了社会生活的节奏。收获季节成了特殊的节日，人们把收获看成是无法理解的，只是自然力量的恩赐，因此，发展了各种仪式，把作物丰收奉为神圣，表示感谢。这样定居的居民，在社会前进的阶梯上能否更上一层，还决定于其他许多因素，其中起码要有丰富的食物资源，以促进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加速有专门技术的集团的产生。这种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充足的供水，而且还取决于土壤的肥沃。

土壤资源与村落的社会发展

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地质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土壤性质。因为基底杂岩内的岩石多种多样，所以，在这种本源物质基础上发育的土壤，其特征是千差万别的，肥力仅为中等。然而整个说来，这类岩石往往含有丰富的、植物所需要的多种无机物养分，但这些无机物的多变性说明，地质条件在短距离内可能变化很大。另一方面，在水成岩基础上发育的土壤的特性大片区域内往往比较一致，但它们并不能形成象乌克兰小麦产地或北美草原那样大块大块的高产沃土。

土壤特性和气候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土地肥力，归根到底对其维持稠密人口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例如，在湿度大的地区，植物生长茂密使人产生了土壤肥沃的假象，从而看不到土壤易受损伤的性质。天然植物一旦被清除，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就会由于一般高温刺激而产生的强烈的细菌作用而迅速分解。土地肥力立即减退，作物收成随之减少，人们不得不移居它处。

另一方面，湿度不很大的地区的土壤却肥沃得多。然而土壤湿度模式的周期振动，使346 大片大片地区被含有氧化铁的红土壤硬壳所覆盖，而这类土壤完全不宜耕种。这种地表硬壳的出现意味着具有普通肥力的土地分散，其维持稠密人口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这类土

壤条件是西非森林地带以北和扎伊尔盆地边缘的中非高原地区的特点。在雨水较少的半干旱地区，也有类似的地表硬壳，这里称之为钙质壳，但分布更为分散，结果，使这类地区的棕色沙壤较有价值。在雨量充足的年景，能得到中等的好收成。再往北，沙漠土壤土层浅薄，地表贫瘠，缺少有机物。

因此，非洲地理的突出情况是，真正肥沃的土壤有限，而且分布非常分散。它们包括在上新世及其以后的玄武岩和火山岩基础上产生的深厚垆坶粘土，这种土壤特别分布于东非。在高地森林覆盖下，这些土壤在地势高的地带呈巧克力棕色，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呈红色。与上述土壤具有同等价值的是丰饶的冲积土壤，产生于同类岩石，分布于尼罗河这样的河流冲积平原。这两种土壤上的丰富物产促进了人口密度的增长。象在尼罗河流域那样，这种人口集中的现象是与出现王朝之前新石器时代那种高度的社会和环境管理相结合的，这就为出现更发达的社会准备了条件。这种社会及其城市文明的发展、阶级的分化、精美的工艺和纪念性建筑，以及书写的运用，并不只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正常交往不断增长的结果，也是农产品有余，从而有可能养活不同社会集团构成的稠密人口的结果，农产品有余对遥远的古代来说必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后来，在尼日尔河湾这样一些少数非洲地区，于中世纪初期加纳帝国出现之时，也具备这样的条件。虽然还有其他土地肥沃地区，但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千百年来不断风化的高地草原，土层薄，缺乏充足的植物养分和必要的无机物，甚至至今对农业的价值仍然有限。在这样的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只能靠改变耕种作物，维持生活。这种经济形成，造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费，从而不利于产生密集的定居村落。因此，必须把非洲广大地区人口稀少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不利作用，看作非洲历史的有害因素。当然现在尽人皆知，任何地区的肥力取决于土壤管理得是否有效，也取决于土地的自然特性。事实上，社会发展现已达到较高水平的世界其他地区，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经济也依靠改变耕种作物来维持。因此，对非洲来说，土壤管理是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 347 的问题。过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今它指出了来日必须采取的道路，以便认真努力，开始一个必然取得进步的过程。

结　论

非洲的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给人得出的印象是，非洲大陆的大自然非常仁慈，至少在地层表面是如此。但大自然的慷慨在表面上对非洲居民有点象陷阱，突出的例子是茂密但很不可靠的热带森林。各部族发现生存非常容易，于是就逃避了社会进化的痛苦要求。确实，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有远见的人物或集团，驱策本部族前进，但他们的影响未能延续下去。外来的干涉，特别是劫夺奴隶的漫长历史，对非洲大陆发展的总情况无疑是有致命影响的。但是这样一种干预有可能发生这一事实，无情地提醒所有人群，如不进行不懈努力，结成更强大和更团结的社会组织，就有面临挑战的危险。

如不大力强调这一事实，非洲历史将对我们毫无裨益。正如史前时期一样，今日的非洲地理揭示，非洲大陆仍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在前不久才结束殖民统治，因此，

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许多资源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出口原料，以满足其它社会的需要。此外，资源的开发及其所需要的高度科学技术，要求非洲各族组织结成庞大的统一社会，开发这些资源，以利真正的发展。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的十年历史给人留下一种模糊的印象，人们还远远不理解需要形成此类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进行竞争的重要性。叙述非洲大陆历史的经济的地理学的目的，如果还有什么用处的话，就应当是强调，非洲的自然条件同其他地方一样，既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也不能决定这个民族所要走的道路。自然条件的作用至多是给人以便利。民族也象个人一样，过去是，以后还将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

（严明新　罗建国译）

15 历史研究采用的学科间相结合的方法

J. 基-泽博

348

引 言

结合各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一种流行的主张，但付诸实施就有困难了，因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差别很大；研究人员受专业习惯的影响很深，唯恐本学科领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甚至在提出研究成果时也表现出同样倾向：研究一种社会生活时，仍然按各种完全孤立的题目进行，例如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各学科间协作的建议都被视作是吞并其他学科的建议。在这场争夺地盘和领导权的斗争中，史学处于一种矛盾境地。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各学科必然有的，但是由于史学没有(不象其他学科)自身的深奥语汇作为实际工作者的避难所，所以它有贬值的危险——可谓舍尊严而求普及。

假如历史是一支管弦乐队，按照传统，指挥就是文字记载。但非洲的历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历史，其特点是文字材料较少，尤其我们纪元十六世纪以前，七世纪以前就更少了。非洲有一句谚语说："母亲不在，就吃祖母的奶。"①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材料，非洲历史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以便重新构想过去的状况。文字材料的缺乏，归根到底可能成为好事，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避免文字记载的过分影响和由于文字记载而贬低其他资料的价值。

在非洲，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工作长期深受两种相互矛盾的弊病之害，一种弊病是史学家的弱点，他们把社会变革过程只看做是一连串年代。因此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种使人容易理解人类发展过程的年代学，完全忽视了其余各方面，如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果，成了单线研究，旨在记录家系和一个个的事件，简言之，就是无血无肉的历史骨架。另一种弊病更有害，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把肤浅的进化概念对原始状况的成见应用到非洲现实生活中来。它分析各种结构时，好象把它们当作是超时间的产物，不顾历史的深度，而只有历史的深度才能赋予它们客观或主观的意义。

349

此外，有些学者满足于在本学科范围内自足的想法，因为有些语言学家厌恶有关文化相互作用的任何提法，效用主义人类学家则拒绝历史深度的想法。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水泼不进的壁垒正被逐渐打破。J. 德斯蒙德·克拉克写道："人们认识到，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或人种志学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学科间进行

① 乳汁分泌好象是一种反射过程，但非洲药物中有使祖母分泌奶汁的秘方。

协作，这种认识是今天研究非洲问题最令人鼓舞和振奋的因素之一。"②

一味注意年代学的伪历史以及完全静止的、形式上的结构分析的错觉做法都在衰落。证明这一点的是，有些学派正在把语言历史学和对立意见纳入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做法是，把文化资料和语言资料融为一体（例如卡拉梅-格里奥尔和乌伊斯），或者放弃社会学家采用的静止方法，改用富有生气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运动和比较当作工具（巴朗迪埃）。矛盾毕竟是现实中不能缺少的部分。可以肯定，任何一种学科都无力单独解决非洲现实的难题。难题是不能用一种方法解决的。

有些研究工作者声称，他们在单个因素里找到了对特定非洲社会的基本解释，例如在亲属关系的结构分析中，或在表现形式、信仰、神话和象征等一整套东西中发现了这种解释，而这一整套东西本身被视为独立于生产关系的逻辑整体。③ 事实上，对亲属关系的研究表明，非洲的亲属制度，如同澳洲的亲属制度相比，不但不"单纯"，反而更复杂，莱维－斯特劳斯承认，它的结构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有单纯亲属规则的制约，也有经济和政治因素。

非洲历史，同在一片空白中发展起来的其它学科相比，条件较差，即使(实际上特别是)在可能被认为是历史学的特有领域，如建立年代学方面，也是如此。正确解决年代学上的问题，往往需要运用四种不同资料：文字记载、考古资料、语言资料和口头传说。因

350

此研究历史的学者就象汽车驾驶员一样，手头掌握几种工具来测定路程：里程表、手表和里程碑，可以想象还有从当地居民得到的情况。这种必不可少的合作，有助于使重构的历史的图象清晰完整，而单凭一个方面的资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白克里对昆比萨利赫的描述，如果没有考古发掘的大量补充材料，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在这方面，甚至口头传说也起了作用，因为有了传说，才发现昆比萨利赫遗址。因此，将资料来源按重要性划分，将文字记载置于首位，而将口头传说置于末位，似乎是不妥当的。资料来源的价值如何不是绝对的，其重要性因研究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任何一种情况中，可利用的大量资料都包括一种主要资料，哪一种是主要资料则因研究课题的差异而不同。研究非洲史前史，或研究俾格米人社会，文字记载显然不是最好的资料来源，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类记载。对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来说，历史证据的领域主要靠各种不同的主要资料，其他资料则起辅助作用。不署名的盖图莱人部落、朱古萨王国、北喀麦隆的基尔迪人、加纳的阿散蒂人、多哥北部的卡布雷人和《法塔史》中描述的加奥帝国的主要资料都不尽相同。况且主要资料很可能只有在研究完成之后才能确定，因为虽然研究成果取决于资料，但是断定主要资料是否正确的却是研究成果。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研究非洲历史，采取学科间结合的办法，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事实上，也别无其它办法。

各种资料如何相互补充

显而易见，非洲历史的各种资料是相互补充的。任何单独一种资料都会有不足之处，

② J. D. 克拉克(J. D. Clark)，1970年。
③ 见M. 格里奥尔(M. Griaule)和G. 迪埃特伦(G. Dieterlen)，1965年。

对真实情况只能给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只有借助其他各种资料，才能给人以清晰的形象。

考古学本身只能作出枯燥无味的说明，或者无实际效果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只是根据少量的文物标本作出的。如果只能等待进一步发掘来证实或推翻所作的假设，那么前进的步伐就会慢得难以容忍。但是如果探索多方面的问题，那么考古学确实能为其他学科做很多工作，同时也从其他学科得到许多好处。考古学的发现往往用考古学以外的材料来说明，例如在津巴布韦，金矿及其防卫，以及宗教，才能使人明白那里的大部分地面和地下结构有什么意义。墓葬物，以及死者在墓穴中的方位，只能结合一个民族的信仰及其关于来世的概念来解释。相反，当加纳北部的发掘说明其建筑特征与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建筑特征一致时，考古学便提出或解决文化影响的有趣问题。

351

另外，非洲的艺术只能阐明历史，如果历史用艺术来阐明的话。艺术，特别是史前时期的艺术，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从地质学，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君主的野心，一直到宗教、神话和宇宙开创学说。美学受伦理学的严密控制，同时又为它服务。此外，由于艺术记载了礼仪、纹身、发式、服装和剧情，因此，它往往起到了社会(甚至自然)人类学的博物馆的作用。

被解释为技艺加灵感的艺术，没有历史便无从理解。它的风格特征往往根据社会组织得到解释。例如在贝宁，同一批艺术家(伊格贝桑范)搞木雕和牙雕，而另外一些人制造陶器和青铜器。制造象牙器物和青铜器物主要根据一种材料转变成使用另一种材料来解释，正如起源于史前期的陶罐外形和外部装饰，只能根据它们是从草编筐承继下来的来说明。其次是面具。在面具制造方面，非洲人的想象力无限丰富。例如博博人的面具，特别是三种主要类型：凯莱(祖先面具)、基米(鹳鸲头面具)和蒂埃贝莱(水牛头壳面具)，是真正人格化了的，村民很熟知，因为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证据，而且对解释历史有积极贡献。④

伊本·巴图塔于我们纪元1352年描述的马里宫廷里的玛瑙贝，原为货币，但也被艺术地串成长串作为装饰品，这种装饰品在社交场合和宗教仪式上特别重要。艺术是整个复杂模式一个组成部分，模式给艺术以含义，同时艺术则赋予模式以生气。从事某些非洲社会的历史研究，而对玛瑙贝和面具的丰富语言一无所知，就象进入图书馆而目不识丁，因为，不可避免地要对它们产生不全面的解释。

口头传说的情况也一样，口头传说在其他章节有详细论述。口头传说是生活的历史，由集体记忆传播，有残缺不全和添枝加叶的描述，但也保持了生气和活力。口头传说肯定有它的缺陷，例如它往往不提经济和社会等因素。但即使有缺陷，它仍能给我们指出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更有关联，例如各种手稿和考古遗址。实际上，在制定任何发掘计划之前，最好先搜集口头传说。它还有助于纠正单纯根据外部观察作出的错误解释，并使假

---

④ "伟大的神祇面具或'神灵'是戈嵩，由称为戈诺拉的高级祭师护卫。这种伟大面具，在这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崇拜祖先的扩展，这种崇拜仪式是在晚上极秘密地进行的。波罗盟会集会时，先把这个伟大面具置于圣木之上，覆以白布。戈诺拉充当头人和祭司，也是祖先奉若神明的真理的施与者。戈嵩也是一位立法者。他的决定要在村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译自乌伊斯(M. Houis)《几内亚研究》，1951年，G. W. 哈利(G.W. Harley)，1950年。

352 设的数量得以限制，使选择范围得以缩小。⑤ 如果同一件事有几种传说，则根据其他材料(如参考一张显示日食月食影响的区域图)决定取舍。

鼓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非洲重要的活教材之一。有些鼓是神谕，有些鼓是广播站，是鼓动英雄主义的战争呐喊，或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它们的语言本质上是充满历史内容的信息。就这一点而论，有人把人种音乐学分为内部技术音乐学和外部音乐学，它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⑥ 最伟大的史诗和编年史常常由专门组织的集团按照非洲特有的方式歌唱，根据这种方式，全体听众都参加歌唱，因为音乐绝不是只供人消极倾听，而应该是全体出席者都参加演唱。结果形成集体庆祝；歌舞和音乐合为一体，对于这种融合，语言学、历史学、植物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宗教等，都有贡献。不夸大音乐年代学的重要性，运用算术方法和统计分析对音乐和乐器进行比较研究，就能提供关于文化传播和发展问题的确切证据。

非洲的音乐面对其他类型音乐的入侵，正在衰落；而这些音乐，即使由经济上更为富有的各方传入，也不如非洲音乐丰富。难道创造了历史的鼓是命中注定在不久将来作为博物馆陈列品结束自己吗？

语言学越来越成为历史的伙伴——一个年轻、可靠而又富有的伙伴。因为语言是保存传说的一个活博物馆，因此要吸取传说的精华就必须掌握语言这门科学。每一种语言既是一种心理上的统一体，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例如，语言词汇反映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正是语言即"词"把一整套的概念和行为准则注入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动机之中。有些概念很难用一种适合各种不同环境的语言来恰当表述。例如"萨纳库亚"（曼德语)或"拉基雷"（莫勒语）可大致译为"开玩笑的关系"，它在苏丹和萨赫勒地带的历史中发353 挥了重要作用，"德亚蒂左伊"(曼德语)同"地主"这一简单的概念绝不一致；"滕索巴"字面意思是"土地的主人"或"土地祭司"——但它们并不能表达那种含义。史学家在使用其它资料时，将继续运用语言学的证据。例如，洛比地区圆形废墟的年代和起源，是综合几种相互矛盾和相互支持的证据决定的。德巴罗斯在课本中提出了废墟源于葡萄牙人的假设。但根据被认为已使用过的道路以及对掺有小石子的路面的考察表明那种假设是站不住的。因为这些路面太新了，不能证明年代已久。后来威利人和比里福尔人称这些废墟为"科尔纳沃"，或"外国人的牛栏"，这一称呼受到了注意。根据废墟中发现的陶器的式样，认定这些外国人是库兰戈人。最后考虑了有关该地各族的迁徙传说，对废墟的年代作了估计。这实际说明了语言学在阐释特定的历史事实中是起决定作用的。⑦

将属于文化的语言现象与部族特征或种族的生物因素混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十四世纪侵入沃尔特盆地的达贡巴骑兵的语言，可能由于被当地库萨西妇女的语言所取代而

⑤ 很显然，口头传说必须前后连贯起来看。对故事和传说进行有趣的列表分析，可列出几方面，故事本身内含的资料(如语义学资料和文体资料)和外部资料，其中有些资料属教化和文化范围，有些则不是。见《阿拉伯-柏柏尔口头传说文献》，《联络通报》1970年第4期，巴黎人类博物馆马格里布研究中心。

⑥ 沿这些线索继续前进，可能进入许多更专门的领域，例如音乐同语言的关系，音乐与社会象征和哲学象征的关系，旋律与人的情绪感情的联系，音乐同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不同人种集团之间的音乐的关系。D. 马丁（D. Martin)和T. 杨诺波洛斯(T. Yannopoulos)关于西姆哈·阿伦(Simha Arom)和D. 康斯坦特(D. Constant)的介绍，1973年。

⑦ 见P. 帕伦科(P. Parenko)和R. P. J. 赫伯特(R. P. J. Hebert)，1962年。

消失。他们娶了这些妇女为妻，这些妇女也就成了他们孩子的母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牺牲政治统治阶级的语言(有时真有那种情况)而使语言混淆的事例。

人种历史学，作为效用主义人类学家奉送的类似静止的人种志礼物，并非真正的历史。它根本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材料，我们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顺历史潮流而变动。此外，效用主义人种历史学过分忽视物质文化，忽视勒鲁瓦－古尔昂称之为文明母体的一般生产活动。用食盐换取苏丹黄金的穿越撒哈拉的实物交易（几世纪后改为用奴隶交换枪支），很可能是西非各王国和帝国兴起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懂得，有生气的社会学也必定是非洲历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之一。这并不是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把工作重点盲目地从社会－政治方面转到另一方面，因为产生的问题会多于解决的问题。例如，计算帝王在位的平均时间，简单地从已知的同时代的平均时间往后推算是不行的，因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一定都一样。此外，在亚滕加的莫西人王国里，选择旁系继位(由弟兄继位)；而在瓦加杜古王国里，则选择直系继位（儿子继位)，两者不会有相同的平均标准。在瓦加杜古王国，平均在位时间往往比较长，世代的数目较大。另外，也应考虑宗教因素。因为在甘人诸王(甘人－马萨)在朝期代，国王是定期从最年轻的成熟男人中挑选的，因而平均统治时间就更长。换句话说，确定年代时不能不考虑特定地区的政治社会学资料。但是，甚至稳定自身的概念在各个时期和地区也并非一成不变。稳定也许只是表面上的，也许是以高昂的社会代价获得的。在埃塞俄比亚和瓦加杜古王国里，消灭或驱逐失败的候选人或旁系继承者，就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但在人力资源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对这些国家的发展给以真实的历史说明，就必须从不稳定方面说明这一点。

354

为了使非洲历史的图景明朗清晰，还必须利用自然科学。我们利用计算机计算某些数字材料，利用工艺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等方法来确定年代，分析金属、植物和食物，调查家畜及其遗传，还利用流行病学和自然灾害(气候学的分支)研究。在非洲的传说中，饥荒占重要地位，象战争一样是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这绝非偶然。暴力在非洲的历史发展中，如同在其他大陆的历史发展中一样，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又情况不同。一方面，技术发展水平低，降低了它的绝对影响，而另一方面它的相对影响却较大，因为在这一领域一个民族即使比另一个民族略微领先，也会增加重要性。在埃及的亚述人、古加纳早期诸王以及祖鲁人沙卡所以能建立霸权，其决定因素很可能是装备上的悬殊。

仅就确定事物的量而论，统计学也有重大贡献，如不确定数量，事物的性质就会受到歪曲，因为超出一定界限，社会现象中的事物便可说发生了质的变化。万人的结构同千万人的结构不会一样。在谈到十四世纪非洲军队的入侵时，有可能从二十世纪的状况来看这些军队，那就是违背时代的错误。依靠统计资料，即使只是粗略的统计资料，也有助于使事实的阐述更接近真实情况。

此外，对非洲战争的研究，只有同宗教研究联系起来，才对了解非洲历史有用。非洲的战争同宗教紧密相连，因为战争艺术部分是施行魔术。只要看一看布里·恩迪阿耶缀满护符的战袍，就会确信这一点。这种习俗一直留传给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步兵。

355　自然人类学也能帮助真实历史的编纂。这一领域由于建立在人种外貌基础上的种族主义神话，如"含米特"理论，而混乱不清。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学科间的协作研究，综合各类证据，弄清真实情况。某些证据的线索是史前期的岩画提供的，但重要的是不能将岩画上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同种族混淆起来。必须记住，某些类型的骨骼畸形，如芒贝图人使头骨变长，同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关。血液学能帮助澄清一些错误观念。然而它表明，即使血型也适应生活环境，因而证明居住地域对人种形式起决定作用。只有将种族（象许多历史事件一样）看作由生物学联系起来的自然和文化的混合物，才能理解它。非洲的大自然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所以，尽管我们避免单纯的机械决定论，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环境因素。⑧正如德贝勒·德爱尔芒所指出的，要理解中非文化和史前发展的特异性，就必须记住热带丛林缺少阳光——这使我们想到空间对时间的影响。⑨不参考地貌学和史前气候学，也无法对尼罗河流域最早的居民进行深入研究。⑩

方　法

因此，研究非洲的史学家必须考虑各种相互联系和交叉的学科。在争取了解非洲过去的面貌的斗争中，他如何组织这个包括众多同盟者的联合阵线呢？

结成一个松散的协会是可能的，这只是同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成员按本学科的技术要求工作，最后聚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这似乎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即使说不上不利用各学科的全部优点，至少可以说未能利用它们相互紧密联系的有利作用，这样，各学科原有的欠缺之处仍然原封未动。较好的途径是学科间进行协作，根据这种方法，不同学科不仅并肩工作，而且结合在一起。不仅整个研究策略必须共同决定，而且研究中的战术细节也必须合力解决。首先，粗略地开出一个要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单子；然后，按问题可能涉及的学科分组。必须定期审核和交流成果，必要时，参加工作的一方提出要求时就进行审核和交流。然后，按照总的进度安排，再公布经过修订的问题。审核后发现的任何意外障碍或阻碍，将采用应急方案或集中力量的办法予以解决。为使这种协作或整个工作不中断，需要一位指导整个计划或方案的领导人。但可先确定各小组的领导人来负责不同阶段的调查——其中有的需要语言学家，有的需要社会学家，等等。这种学科间的协作，很可能使各学科的研究技术得到改进，并对共同研究的课题解决得更有效。它能迅速防止走入死胡同的现象，能最大限度地采用有益的方法和捷径。在这种协作研究中，考古学家带领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艺术专家和植物学家到他们的考古遗址，象一个巨大的拖网，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沉入世界历史的海洋。当然，采用这种方法的先决条件是，各个非洲研究所（已有许多这样的机构）能使自己的结构适应这种工作方法，尤其是研究工作者

356

⑧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写道："自然提供，人类支配"。但正如泰亚尔·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所指出："历史的鸟瞰向我们显示了自然史的最新篇章，难道不是吗？"

⑨　见H.勒费弗尔(H.Lefebvre)，1974年，这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作者研讨了空间（自然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一元论。

⑩　对钙、磷酸盐、花粉和蛋白质进行化学试验能帮助重构饮食习惯，这又能说明人口学方面的问题和遗址存在的时期。花粉学家正致力于建立非洲花粉库。

自身首先要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那么，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使非洲人了解他们的历史概况，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过去。这不可能和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有点象柏拉图关于山洞的寓言所说的那样，必须把往日的真实情景传达给人。

生命的本质就是统一和连串性，是各种不同力量为共同目标的结合。死亡的定义就是瓦解和不连串。生命，无论是个人生命还是集体生命，都既非直线的又非单方面的，它是严密而坚实的组织。把往昔重新勾画出来是史学家很少做到的，但历史小说家的尝试有时都获得成功(应该承认，是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师，在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安德列·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和托马斯·莫弗罗的《恰卡》这类著作所描述的生活片断里，会找到进行共同研究的有益题目。

不要转而谈论小说创作，但我们必须着眼于重构致密的社会组织，因为真实生活所包含的情节甚至比小说更复杂。现实的东西超过虚构的小说。每一历史过程都同时包含社会现实的各方面，重构往昔如不把各个方面都考虑进去，那么即使不能说它不是历史，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异样的历史，因为它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片面的。当然，我们可以专注于历史画面上的一个点，并从这一点向外扩展，但必须始终记住它是历史画卷上的一部分，没有这一部分，甚至对画面上的一点也不能全面理解。对整个画面来说，更是如此。各种主要历史事件，如曼德人在西非的扩张，是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技术、物质装备、贸易、语言优势、适当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热情。人们在努力详细说明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之前，想不适当地突出一个首要因素(正如经常所作的那样)，就等于不设法在头脑中重新构想过去，而确立一种概念性的结构。这种全面观察历史的方法，对那些单纯而相对统一的社会，比对分为阶级的国家更重要。非洲社会被分为(也许有点轻而易举)有国家结构的社会和无国家结构的社会，当然后者是根据个人的集体经验的尺度划定的。⑪ 这也许忽略了马里帝国这样的情况：它没有碎石铺筑的道路，没有官僚机构，事实说明其统治者有意赞成分权，其结果是大多数居民实际上仍生活于国家结构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继续生活于乡村，这些乡村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独立，既无封建采邑的法律环节和铁路、公路等这些有形的环节与中央联系，也无所得税申报，中央或地方政府条令等职能环节与中央联系。忽视这类情况就会使自己陷入一种列举帝王名单为依据的过分简单的方法，其中许多帝王可能因为在位10年或20年有一两件重大事件为人所知，他们被武断地立为本民族实际生活中的界碑。非洲各族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也是过着单一社会的生活，在这种社会里，从工具制造到庆贺丰收的礼仪，包括相爱或死亡的仪式，件件事情都有一整套规定。从这意义上说，泛灵论统治的社会同伊斯兰教统治的社会一样，是高度统一的。在许多方面这不是一种世俗社会，如果这样认为，必定要抛弃大部分事实。在这类地区确实存在集中制，但它不是现代国家的那种集中制，⑫ 在那里，集中制仿佛是

357

---

⑪ 关于这一点，见J. J. 马奎特 (J. J. Maquet)，1961年。作者分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力图确定一种适用于象加人社会的模式。

⑫ 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 所述关于布雷人民的插曲，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马里帝王企图同化他们但却未成功，最终承认他们在文化上独立。

把分工推向极端所付出的代价(和解毒剂)。例如，在塞努福人和洛比人以及塞内加尔的迪奥拉人中，组织秘密盟会常起关键作用，整个社会生活都围绕秘密盟会进行组织。塞努福男人的秘密会社是波罗盟会，洛比人的秘密盟会是德约罗。此外，象上沃尔特的萨摩地区和伊博地区那样，整个村庄联盟可围绕共同祭坛或祭礼建立。

非洲的生产力仍然比较低，但它的民间艺术却很丰富。由于人们几乎全部依赖大自然，因此所有衣服都很精致。最简陋的工具或容器都有装饰。此外，在身上划痕所显示的358 凹凸花纹有着双重作用，既作为种族的身分标志又满足爱美的强烈愿望。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洛马人(托马人)、基西人、科尼扬克人、门德人和库兰科人所使用的铁铸币，也有类似情况。它们既是铸币、是房屋和土地的守护者，也是故人和祖先灵魂的休息处。将其职能局限于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为了清晰地描绘这类单一社会，就要求一种相应的包罗万象的历史，即学科间协同工作所撰写的历史，人类学家戴维·泰特和史学家 J.D. 费奇对孔孔巴历史的共同研究便是一个范例。J. 贝尔克在论述一个埃及村庄的社会史这项工作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学科结合的方法。[13]

这种全面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外部因素和纯属局部的因素都考虑进去。这意味着要超越非洲的疆界，把来自欧洲、亚洲、美洲和印度尼西亚的撰稿人统一在非洲个性中。机械搬用当然不够，因为即使存在外部影响，它也受内部各种力量的左右。正如经院哲学家的格言所述："所接受之物皆依领受者之状况而定"。因此，亚洲水稻在非洲本地水稻已经存在的区域栽培，同一样树薯则在已有薯蓣的地区培育。非洲文化是各种因素的巧妙混合物，不能把它降为这些因素的数学总和，因为它不是可以排列和清点的杂货。非洲文化将其组成部分都融为一体。非洲历史的目的必须是充分重视各部分，以描绘出整个文化有生气的发展。换言之，学科协作的方法最终应导致跨学科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各门学科都享有平等权利。

(罗建国译)

[13] J. 贝尔克(J. Berque)，1957年。

16 编年基础：非洲的洪积期和冰川期

359

第 一 部 分

R.赛义德

我们这一章的目的是概括说明非洲大陆在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或近世时期的某些自然变化。在这200万年左右期间，世界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很大。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气候变化使地球的北纬地区连续遭到四次冰盖的前进和后退（如阿尔卑斯山地区众所周知的贡兹冰期、民德冰期、里斯冰期和武木冰期），形成了很多河谷和阶地，造成了现在的海岸线，并引起了地球上动植物群的巨大变化。最早的原始人类就是在更新世初从其祖先灵长目中分出来的，在更新世的下部地层发现了可辨认的最古老的工具。自从人类作为能用工具的哺乳动物出现以后，标志更新世各个阶段特征的环境因素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在更新世的几个阶段中，冰川的分布比现在广得多，这种认识早已在欧洲牢牢确定了，而且不久就弄清了，欧洲的这些气候恶化期的出现远不是局部性的。例如，对非洲进行的研究表明，非洲大陆在更新世期间经历了影响深远的气候变化，虽然至今还没有把这些变化与北半球发生的变动最终联系起来，但是，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却以一种有待探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十年中，建立新生代晚期和更新世时间表的前景大大改善了。深海钻探计划对于地球历史较晚时期变动的断断续续的沉积记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对这些计划获得的岩心进行详细的多学科研究、地球物理学研究，特别是古地磁研究的进展以及放射性测量技术的完善，都有助于合理确定地球历史这一较晚时期的时间表。在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因为至今还没有把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动与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动最后联系起来。但360是，地球历史后期的年代比其它许多时期的年代都确定得比较妥贴，即使由于把上新世和更新世的标准地层类型列入根据海相层建立的层序产生了巨大混乱，使许多作者对于划定更新世的界限问题仍有分歧，本章还将采用以下分类法。过去五百万年的地磁时间表证明，地球磁场一直从正常到逆转交替变化着。这些时期由于一些较小的变动而被中断，在这些变动中该特定时期的一般地磁式发生了倒转。这些时期从最短到最长分别为：布容期（69万年前到现在）、松山期（243万-69万年前）、高斯期（332万-243万年前）和吉尔伯特期

(540 万-332 万年前)。吉尔伯特-高斯地磁间隔期的特点是世界许多地区都可见到气候严重恶化的情况(见海斯(Hays)等，1969 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这个凉爽的气候阶段相当于内布拉斯加大陆冰川作用的初期(如墨西哥湾所记录的)，北大西洋中具冰擦痕岩屑的开始出现和中期维拉弗朗大陆动物群。几位作者把上新世和更新世间的界线定在第一次气候恶化的开始，根据这种意见，这一阶段标志着更新世的开始。但是，接受这一界线就会和1955年国际研究第四纪协会大会所规定的界线发生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把意大利卡斯特拉尔卡托典型剖面的动物化石组合排除在上新世之外。由于这一剖面在世界范围内已用于生物地层的对比，所以一致的意见是，把它保留在上新世中。更确切地说，这条界限定在距今 185 万年前，相当于松山期卡拉布里的初期和松山期奥杜瓦伊地磁变动。最近研究工作表明，这是一个变暖阶段而不是变冷阶段，温带纬度地区第一次巨大的更新世冰川作用发生在距今约 70 万年前，即在布容-松山期界线上。这次冰川作用可能相当于阿尔卑斯的贡兹冰期。因此，更新世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晚期是冰川期，早期是冰期前的更新世。阿尔卑斯里斯冰期发生于距今约 12-13 万年前，武木冰期开始于距今 8 万年前。后一冰期的年代可能定得最准确，对它的研究也最透彻。它一直持续到距今一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

如上所述，本章的目的是回顾非洲大陆因更新世气候变化所起的最明显的自然变化。非洲这样大小的大陆具有各种不同的环境，每种环境不一定都会因更新世古气候的巨大变化而发生同样形式或程度的反应。因此，方法是回顾非洲大陆现在的主要气候区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区可分为以下两大类，赤道和亚赤道带，以及热带和亚热带。 361

赤道和亚赤道带

现今的赤道带包括西非炎热而潮湿的扎伊尔盆地，它的特点是，风的变化以及温度和湿度的季节变化都不大，多骤雨和雷雨。这条带现在有典型的热带雨林。亚赤道带包括非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其特点是夏天多赤道型气团，冬天多热带型气团。冬天干燥，比夏天稍凉爽。该带的大部分地区湿度都很大，保持着热带草原植被。但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现在保持着热带干旱草原植被。

由于更新世期间这些地带的降雨量起伏不定，因此可根据洪积期和间洪期相继出现，对更新世进行分期。名为卡格拉、卡马西亚、坎杰拉和甘布勒的洪积期被认为是亚赤道带与北半球的四个主要冰期的对等时期，但这至今还未得到证实。现已确认全新世可划分为两个次一级洪积阶段，即马卡里亚阶段和纳库鲁阶段。

在较大的干谷冲积层和较高的湖泊沉积物层中或由于现有湖泊的扩大而在几个封闭盆地留下的滨线上，都可看到这些洪积期的影响。间洪期的特点是风的活动的扩大，这时风成沙的沉积或重新分布的范围远至现今活动沙丘的南限，因而植被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个带的几座火山峰显示了比现今雪线低的高度上的冰川特征，说明以往各个时期的气候比较凉爽。下述各段的例子说明了非洲赤道和亚赤道带某些地区所发生的这类变化。

东非的湖泊盆地

东非，特别是它的湖泊盆地是非洲亚赤道带洪积期和间洪期的典型地区。东非的湖泊位于非洲裂谷系范围内。除维多利亚湖外，位于裂谷东支低洼部分的湖泊都没有地面排水口，都处在非常干燥的气候环境中。相反，裂谷西支的主要湖泊却都有充足的水量，而且常常溢出。

从一开始就必须看到，在东非这样一个强烈地震活动带中，应把湖泊水位较高的证据看作是启发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在这样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必须考虑滨线的构造位移、湖泊溢流水位的变动和湖泊盆地倾斜等可能性。由于这一原因，早期到中期更新世洪积期的概念已不复使用(库克〔Cooke〕，1958 年；弗林特〔Flint〕，1959 年 a；祖诺〔Zeuner〕，1950 年)。最近对东非湖泊的研究已把这种地层、气候证据的用法限于甘布勒洪积期，因为那里有些地方记录了构造上未变形的沉积物。 362

但是，丰富的地质资料无疑地证明，主要雨林的边界过去曾反复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西部流域盆地的大森林在整个考古记录中一直是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坦桑尼亚北部奥杜瓦伊峡谷著名的层状岩层遗址的底部完好地保存着真正更新世早期的各种脊椎动物群。各种气候关系表明，那是一个降雨量很高的时期(卡格拉或奥杜瓦伊 I)。除这之外有两个层位，分别说明一个较干旱的时期，随后出现相对高的降雨(奥杜瓦伊 II-IV)。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据了解有一个地层序列，它记载了最完整的手斧演化过程，欧洲和西亚都知道，从最早的原始形式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各种主要专用变种。

东非甘布勒洪积期的证据主要是从前三个邻接湖泊的高滨线和含化石的湖底沉积物，三个湖是纳库鲁湖、埃尔门泰塔湖和奈瓦沙湖，位于内罗毕西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稍前的奈瓦沙湖湖滩很高，这说明当时湖的最大深度有 200 米，可能泛滥到附近分水线。因为该湖的汇水面积很小，而现代湖深又不超过 10 米，所以这个层被认为是东非过去气候较湿的标志。

在肯尼亚一个俯瞰现代纳库鲁湖和埃尔门泰塔湖的岩石屏障上，利基在甘布勒岩洞发现了一个地层分层很好的真正大规模刀具制造业的遗址。据说最下面的沉积物是湖滩卵石层，覆盖在高出现今湖面 200 米的屏障石质底板上。在卵石层上不整齐地覆盖着含器具的沉积物，包含松散的"灰烬、尘土、骨头和黑曜石"。有关的动物群显然属于现代类型的。按照利基的看法，含有器具的层位属于一个高降雨时期的末期(他按照该遗址的名称把它命名为甘布勒期)，这是继奥杜瓦伊含有阿舍利器具和非常独特的绝种动物群的最晚层位时期之后的最早时期。

尼尔森(Nilsson，1913 年，1940 年)关于东非湖泊盆地的经典著作是对过去这些湖泊水位变化记实性研究的最好著作之一。他描述了青尼罗河发源地塔纳湖(水面高度 1,830 米)的高滨线，记录了五条 +125 米的主滨线，和 +148 米处的不太清楚的水位。尼尔森还指出，东非裂谷的四个湖(兹瓦伊湖、阿比亚塔湖、兰加诺湖、沙拉湖)曾经相连，并且一度泛滥，向北汇入阿瓦什河。 363

维多利亚湖的古气候记录表明，在距今14,500年以前一个未确定期限的时期内，湖面很低，没有出口，当时遍地是广阔的草原植被。在距今12,000年以前，湖面开始上升，其北部边缘周围第一次出现了森林植被，但在距今约万年的短时间内，水位可能下降到现在水位以下12米。在距今9,500到6,500年之间，维多利亚湖水量充沛，湖岸附近生长着常青森林。维多利亚湖的水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出水口切开的影响，但是从前的低水位以及花粉序列肯定与这一因素无关。

巴策尔(Butzer)和其他人(1972年)对东非的湖泊盆地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用放射性碳的方法测定了这些湖泊盆地的一些湖滩沉积物的年代。图尔卡纳(鲁道尔夫)湖、纳库鲁湖、奈瓦沙湖和马加迪湖第四纪晚期的变动和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图尔卡纳湖当前的表面面积为7,500平方公里，是东非最大的无出水口的湖泊。它位于与东非裂谷邻接的下沉带中，湖水来源主要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西部的奥莫河。巴策尔的研究表明，在距今13万年前与这个湖有关的岸滩、三角洲和冲积层比现在高60米左右，在距今13,000年前比现在又高60-70米。在后一时间和距今9,500年前之间，这个湖曾比现在小，气候比现在干燥。在后一时期，湖面再次上升，并且在现在水位以上60到80米之间波动，直到距今7,500年前鲁道尔夫湖面积开始缩小为止。后来在距今6,000年前又进一步升高。距今约3,000年前，湖缩小到现在这样大小。

经巴策尔等人1972年研究证明，东非其它湖泊也具有类似的第四纪晚期的历史。

乍得和苏德盆地

乍得盆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位于撒哈拉大沙漠和在更新世期间曾经淹没整个盆地的一个大面积内陆海的南缘。今天的乍得湖就是这个古老内陆海的遗址(见莫诺〔Monod〕，1963年和巴策尔，1964年)。该盆地的水系发源于中非热带大草原。

该湖现在的水面高度为280米，面积在10,000和25,000平方公里之间变动，平均深度3到7米，最大深度11米。它被加扎拉干谷造成低分水岭的一个缺口分成博德莱和克茹拉卜两个大洼地。现在乍得湖的最低湖滨线为6-4米，可以使湖水泛滥到500公里以外的博德莱洼地。在它332米的最高台阶上，更新世的古老乍得湖在40-50米高度上曾经形成明显的湖滨线，所以它的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中间也出现一些不太连续的湖滨线。格罗夫和普兰(Grove and Pullan，1963年)指出，现在乍得湖因蒸发面损失的大量湖水大体上可以同南方洛贡河和沙里河流来的水量平衡。这两个作者估计，更新世乍得湖的蒸发作用可能比现在大16倍，因此，它每年得到的水量可能相当于扎伊尔河年排水量的三分之一。

巴策尔(1964年)正确地指出，古乍得海充分证明了半湿润的热带纬度地区有过较大的降雨量。遗憾的是，没有把这个盆地不同部分的湖滨线互相联系起来研究。在盆地几个部分下面的600米厚的更新世剖面表明，这个内陆海有复杂而悠久的历史。格罗夫和普兰(1963年)根据尼日利亚的情况提出，在上更新世期间曾有52米的湖泊阶段，后来气候干旱，在先前的湖泊平原上形成了大片砂丘。再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河流网，接着又出现

364

一个比较湿润的时期，湖水在全新世期间至少上升 12 米。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距今 21,000 年以前，似乎发生过两次未完全了解的建湖运动；在这两次运动之后都出现长时期的干化作用和风成活动，直到距今 12,000 年前这个湖泊又开始短期扩展时为止。在 1 万年前左右，湖水达到最高的水位，同时发生间歇性的泛滥。这一高水位一直延续到距今约 4,000 年前。

因此，看来这个内陆海的上更新世－全新世历史在细节上同东非盆地的这段历史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本文作者的看法，位于苏丹南部的苏德盆地是另一个巨大的内陆海，其发展历史可能与乍得盆地相似。苏德盆地是一个干枯的湖泊，据说曾覆盖过尼罗河上游的苏德地区，并扩展到白尼罗河地区以外、青尼罗河部分地区和加扎拉河流域。以前存在着这个湖的想法是一些在埃及工作的灌溉工程师(隆巴迪尼、加斯廷和威尔科克斯)提出的，后来由劳森(Lawson，1927 年)和鲍尔(Ball，1939 年)作了阐述。平坦的苏丹中部和南部平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他们认识到：尼罗河水系的水位稍有上升，就会淹没大片地区。据鲍尔估计，苏德湖面积曾达 23 万平方公里(在 400 米等高线即善贝高度以内的面积，在这范围内目前巴盖贝尔的苏德湖的增长开始淹没这些冲积平原)。这区域被乌姆鲁瓦巴组地层覆盖，最近已完成了这个地层的填图工作，它由河流、三角洲和湖泊长期沉积的岩系组成。该组地层最高点的海拔超过 500 米，远远高于喀土穆以北萨巴鲁卡山脊的最低溢流点 (434 米)，据推测，该山脊构成了苏德湖的北界。正如赛义德所指出，这个山脊位于构成地震强烈的努比亚地块南缘边界的一条主要断裂线上。因为这一原因以及与萨巴鲁卡峡谷受后来剥蚀作用而下切的有关原因，这个海拔高度不能认为是该山脊在苏德湖充填期间的高度。在涨水期间青尼罗河河水冲入尼罗河，对白尼罗河河水起着抑制作用，这就产生了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即使苏德湖的详细历史还未被了解，但是从白尼罗河两侧 382 米高的大面积河滩来看，清楚地证明了它曾经有过广阔的水域。象乍得盆地一样，在距今 12,000 到 8,000 年前，苏德湖似乎也非常广阔。向北的宽度肯定有 50 公里(威廉斯〔Williams〕，1966 年)。在这之后，该湖收缩。在距今约 6,000 年前，在喀土穆附近年降雨量减少到约 600 毫米，白尼罗河的水位下降到现在平均水位以上0.5－1 米。 365

冰川现象

非洲从前的冰川作用与现代冰川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冰川主要又取决于极高的陆地的分布。阿特拉斯山脉是一个例外，众所周知的一些受冰川作用的高原位于赤道几度范围内的东非地区。海拔从近 3,900 米到 6,100 米。弗林特 (1947 年，1959 年a) 总结了这些受冰川作用地区的重要资料，并且指出补给冰川的降雪量可能是从南大西洋向东运动的海洋气团带来的水分而产生的山岳降水。

肯尼亚山(南纬 0°10′；东经 37°18′)的海拔是 5,199 米，现在的雪线为 4,600 米；而更新世最高雪线估计为 900 米(弗林特，1959 年a)。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 (南纬 3°05′；东经 37°22′)，海拔 5,895 米，目前似乎正好位于气候雪线之上；而更新世最低雪线在

1,300 米以上(弗林特，1959 年a)。乌干达的埃尔贡山（北纬 1°08′；东经 34°33′）为 4,321 米，现已完全位于气候雪线以下，在更新世期间曾出现冰川。鲁文佐里山(北纬 0°24′；东经 29°54′)海拔 5,109米，其现代雪线在西侧(刚果)海拔 4,750 米，东侧(乌干达)为4,575 米。更新世冰川西侧向下伸展到 2,900 米，东侧向下伸展到 2,000 米。

埃塞俄比亚高原现在没有冰川作用，但是瑟门山脉(北纬 13°14′；东经 28°25′)在更新世似乎出现过冰川。尼尔森（1940 年）证明，在这条山脉（海拔约 4,500 米）的某些山峰中，有过两次古冰川作用，气候雪线为 3,600-4,100 米和 4,200 米。在更新世晚期发生的冰川退却使雪线上升到 4,400 米。尼尔森(1940 年)还描述了卡卡山(北纬 7°50′；东经 39°24′)更新世晚期的冰川作用，估计当时雪线的海拔高度为 3,700 米。现在完全位于雪线以下的埃塞俄比亚其他火山峰也曾有过冰川作用，如古纳山(北纬 11°43′；东经 38°17′)、安巴弗里特山(北纬 10°53′；东经 38°50′)和奇拉罗山(北纬 7°50′；东经 39°10′)。

这一证据使人相信，非洲的赤道和亚赤道带至少经历过两次冰川作用，这两个地带在武木冰期相当凉爽。除这条带的某些山峰的冰川现象以外，在埃塞俄比亚(4,200-9,300 米)还发现过泥石流和冻土活动。按照布埃德勒（Buedel，1958 年）的意见，武木冰期的泥石流活动下限为 2,700 米。据报道，非洲赤道带的许多地区均有冰水沉积物。德海因策林(de Heinzelin，1963 年)研究了鲁文佐里山的沉积物，发现这些沉积物分属于塞姆利基河的甘布勒洪积期的各级阶地。塞姆利基河把扎伊尔和乌干达边界的爱德华湖和阿伯特湖连接起来，具有块状的大砾、砂砾和红土沉积层，这些沉积物是由塌积物冲积在一起的。德海因策林指出，桑戈-卢彭巴各级阶地和鲁文佐里山的冰水沉积物是同时期形成的。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现在的非洲热带地区盛刮东风，气温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该带西部地区有稳定的信风，气温相对凉爽，空气湿度高，几乎无雨。该带的其余地区包括非洲大陆北部和南部的大沙漠。这些地区气候炎热干燥，日温度变化大，并有最高的绝对气温。亚热带地区包括非洲大陆的北缘和南缘，特点是夏季多热带性气团，冬季多中间型气团。季节的气温和降雨量相差很大。而具有地中海型气候的地区，夏季天气晴朗无风，冬季多雨。

撒哈拉

撒哈拉也许是这带最突出的情况。它从红海到大西洋延伸 5,500 多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 1,700 多公里，面积几乎占整个非洲大陆的四分之一。横跨整个地区，降雨量分布虽然很不均匀，但有些地方每年仍有 100 多毫米，只是平均降雨量更少。因此，在撒哈拉，除发源于离这个沙漠很远的尼罗河外，没有发现有任何常年河流。这样一些确因地表径流产生的短期或常年水池对现代人类生活的影响并不比源于地下的井水和泉水更大。

撒哈拉地区由覆盖着古生代至新生代沉积物的前寒武纪岩石刚性地核构成，在大部分

显生宙期间它一直是稳定的。仅仅在从加贝斯湾到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地区和尼罗河以东的红海丘陵地区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地壳翘起和褶皱。在昔兰尼卡地区和北非沿海的地下也发现了类似的地壳变动。这些褶皱运动属于新生代晚期和第四纪的阿尔卑斯造山系。另一方面，红海山脉则与巨大的非洲裂谷的地壳运动和扩张有联系。

最大的地势起伏区是降雨量最高的阿特拉斯山丘。在昔兰尼卡以及撒哈拉中部的阿哈加尔和提贝斯提山丘有一些很小的高地。后两者构成两个多山地形区，中间由图莫山的低矮鞍形山脊连接。这个地区虽然有高达 3,600 米的山峰，但平均海拔只有 2,000 米。多数山峰由火山岩构成，这些火山岩是在一直延续到更新世的长期持续的火山活动期间形成的。在欧韦纳特高原阿哈加尔西南的阿伊尔山丘也发现一些较小的火山岩区，这个高原是在提贝斯提高原与尼罗河、阿特尔山和其它山脉之间突然中途拔起。虽然现在这些高山丘对气候的影响不太大，但是，丰富的地质资料证明，在更新世的几个时期中，撒哈拉地区远不象现在这样干旱。

今天撒哈拉沙漠因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干旱中，最强烈的侵蚀作用是风蚀作用，它对撒哈拉这个巨大侵蚀平原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风蚀作用产生的风成粗砂堆积在所谓纯沙沙漠或砾质沙漠的区域里，而那些较细的物质则被风刮起来，在空中长时期保持局部悬浮状态。因沙漠侵蚀作用而造成的裸露岩石表面就是所谓的石漠。在这些岩层上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盆地和凹陷。其中有的盆地小而浅，某些地方的巨大凹陷深度可达海平面以下 134 米(卡塔拉凹陷)。在洪积期间，这些凹陷就成了冲积作用的场所，而当它们降低到地下水水位线时，就变成泉水活动和湖泊沉积作用的场所。大的凹陷多数位于鬣丘的边缘，但四周难得被悬崖环绕。因为它们构成没有出口的内陆盆地，因此肯定是风的作用形成的。 368

关于撒哈拉的地质历史，众说纷纭。有些作者认为，它在整个显生宙这样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片沙漠，湿润期只是一个不连续干旱的历史时期中的异常变化。另外一些作者则认为，沙漠化作用是近期的现象，与现代的气团分布形式有关。

撒哈拉沙漠在不久前曾有过较湿润的气候，从动物群分布形式到沉积特征各方面都有极充足的证据，如果设想过去不曾有过较湿润的气候，那么动物群的分布和沉积特征就无法解释。据说，这个沙漠中曾经生活着某些中非土著动物，除了通过植被或水的渠道，它们不可能由其他途径迁移到那里。在阿哈加尔和提贝斯提山丘深谷中的水穴里发现了中非鳄；北而远至突尼斯南部的比斯克拉绿洲曾记载过非洲鳅。这个沙漠的径流特征表明，从前有较大的降雨量。在阿哈加尔高原西面，一个巨大的平原从大西洋向东延伸数百公里，从埃尔胡夫凹陷缓慢倾斜。过去显然这里是一个水系范围广阔的蒸发盆地。从阿特拉斯山南坡朝南流的径流线有重要意义，其中萨乌拉河有 500 多公里。从这一点看，过去它是一条水量充足的河谷，冲积了大量的风成砂，致使今天它的中段被这些沉砂堵塞。

发源于红海丘陵的一些干涸河道长达 300 公里，流域面积近 5 万平方公里。其中之一的海里特干河道流入阿斯旺北面的考姆翁布平原，它两侧的薄层冲积细粒粉砂达 100 多米深。当然这些粉砂肯定是在一条水量相当大的活动常流河中沉积下来的。

莫诺(1963 年)评述了关于撒哈拉地区气候地层划分的大量著作。他引用了阿利芒、夏瓦伊隆和马尔加等人(1965 年)关于典型的萨乌拉盆地的著作，他们建议把该盆地分为下列

几个时期，从最古老到最新的顺序为：

（1） 维拉弗朗洪积期(＝埃迪亚时期)：红-淡红色的砂、砾、砾岩沉积，覆盖在较久岩石之上。

（2） 维拉弗朗洪积期后的干旱期：坡积角砾岩、砂质黄土等，顶部为一层红棕色古土壤。据报道，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遗址中有加工粗糙的卵石工具。

（3） 第一麦哲洪积期(Q/a)：砾岩和砂。

（4） 麦哲期后的干旱期：砂质粘土沉积、风成砂、岩屑堆积。

369 （5） 第二塔乌里特(或乌加尔特 I)洪积期(Q/b)：砾石，非常发达的石器文化，可能为阿舍利(旧石器时代)中期。

（6） 塔乌里特洪积期后的干旱期：侵蚀作用。

（7） 第三洪积期(或乌加尔特 II)：各种颜色的卵石和砂或红棕色古土壤。

（8） 塔乌里特洪积期后的干旱期：侵蚀作用。

（9） 第四萨乌里洪积期(Q^1)：灰绿色砂、碎石、黑色古土壤－新石器时代。

（10） 萨乌里洪积期后：砂岩壳：新石器时代。

（11） 吉尔湿润期(Q^{2a})：新石器时代。

按照阿朗布尔(1962 年)的意见，撒哈拉西北部的四个主要洪积期——麦哲、乌加尔特I、乌加尔特 II，和萨乌里可能相当于东非的四个洪积期——卡格拉期(奥杜瓦伊 I)、卡马西亚期、坎杰拉洪积期和甘布勒期。非洲西北部的吉尔期可能相当于甘布勒洪积期后的湿润阶段。

尼罗河

很久以来，尼罗河一直吸引着很多学者注意，描写尼罗河各个侧面的文献浩如烟海。最近，温多尔夫(Wendorf，1968 年)、巴策尔和汉森(1968 年)、德海因策林(1968 年)、温多尔夫和席尔德文稿)、吉根加克((Giegengack，1968 年)以及赛义德(印刷中)深入研究了尼罗河的史前史和地质演化。下面的叙述是上述最后一个作者的研究成果，他的依据是对尼罗河谷地的河川沉积物和共生沉积物的野外填图工作以及对找水或找油所钻探的大量深孔和浅孔的调查工作。可以设想，尼罗河自从在上中新世形成河道以来共经历过五个主要时期。各时期的特征是河流的大部分水来自埃及以外的发源地。在头四个时期(目前仍处于最后一个时期)即将结束时，尼罗河似乎衰退了或完全不再流入埃及了。这几个重要的衰退阶段伴随着重要的自然、气候和水文变化。在衰退之初，海水似乎流入内陆，形成一个海湾，其范围远至阿斯旺以南已形成河谷的地区。随着更新世的到来，第二个衰退阶段开始并延续了 110 万多年。在这个阶段，整个埃及出现极度干旱的气候，转化为一个真正的大沙漠，风的作用极其强烈，以致沙漠中巨大的凹陷开始形成，几乎整个上新世期间遍布埃及地区的植被都被摧毁了。有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的早期，这里出现过一个相当短的强烈的洪积期。在这个洪积期中，出现一些水流湍急的短期河流，它们的河水只来自埃及。自上中
370 新世尼罗河河谷形成以来，有五条河流先后流经这个河谷，分别命名为：始尼罗河(Tmu)，

古尼罗河(Tplu)、原尼罗河(Q_1)、前尼罗河(Q_2)、新尼罗河(Q_3)。

这样记载的埃及气候变化，从最古老的到最新的，可总结在下表中：

（1） 上新世洪积期(Tplu)，距今332万年到185万年前。古尼罗河的沉积物多数呈薄层状的细粒碎屑物和粘土，据了解，它们处于该河谷的地表中，沿着干涸河道两侧也有。古尼罗河的发源地在赤道非洲和亚赤道非洲以及埃及。当时那里有重要的植被，强烈的化学分解和减低的流量。年降雨量均匀。

（2） 晚更新世高度干旱期(Tplu/Q_1中间)，距今185万年到70万年前。埃及变成沙漠，尼罗河谷地震活动频繁，风的作用达到最大程度。这个干旱期中间出现一个短暂的洪积期，结果形成了与均粒砂层或泥灰岩层互成层次的砾石层，砾石嵌在红、黄色的基质中，顶部为一层胶结的红色角砾岩。在这些沉积中没有发现任何工具。

（3） 伊德福洪积期(Q_1)，距今70万(?)到60万年前。这时又恢复到古尼罗河的气候。原尼罗河又出现了古尼罗河的气候环境，具有其前身相似的水源，并流入埃及，从西面与现代尼罗河平行的方向在基岩上切开了它的河道。河流沉积物为砾石层，由嵌在砖红色土壤基质中的石英和石英岩卵石组成。沉积物来自经过强烈分解和高度淋滤的地区。据了解，在沙漠中，可比的干谷砾岩沉积物是以倒流河道的方式产生的。在这些沉积物中发现了可能是舍利传统的轧制工具。

（4） 前尼罗河干旱期(Q_2)，距今60万(?)到125,000年前。一条水势汹涌的新河流流入埃及。水源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些高地。前尼罗河沉积物的矿物成分表明，那里有普通辉石(这是埃塞俄比亚高地的现代尼罗河沉积物的特点)和丰富的绿帘石矿物，根据这一情况可以把这些沉积物同后来的新尼罗河和现代尼罗河的沉积物分开。这个时期的早期阶段具有形成小洪积期的条件。

（5） 阿巴西亚洪积期，距今125,000年到8万年前。由于努比亚地块上升，前尼罗河的水源被切断，停止流入埃及。这个洪积期的特点是，沉积物是多成因的砾石，来源于地表强烈分解但很少淋滤的埃及红海丘陵。在这些砾石中发现了丰富的阿舍利晚期的工具。 371

（6） 阿巴西亚/马卡德马干旱期，距今8万年到4万(?)年前。侵蚀作用。

（7） 马卡德马亚洪积期，距今4万(?)年到27,000年以前。据了解，在前尼罗河的侵蚀基底河床的一些斜坡上有席状冲积物，其中含有桑戈-卢彭巴传统的工具。在沙漠中，到处可发现莫斯特和较晚阿特利传统的工具。

（8） 新尼罗河干旱期(Q_3)，27,000年前到现在。水源和总体特征与现代尼罗河相似的一条河流(新尼罗河)流入埃及。新尼罗河经历了几个衰退阶段，形成几个最大的亚洪积期：德尔法库里亚洪积期(距今15,000年到12,000年以前)；迪什纳亚洪积期(史前10万年到9,200年)和新石器时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

因此，可以说，尼罗河谷地的沉积物与撒哈拉地区所记载的沉积物没有很大差别。实

际上，可以概括地说，埃及阿尔曼特洪积期可能相当于撒哈拉西北部的维拉弗朗洪积期，伊德福洪积期可能相当于麦哲洪积期，阿巴西亚洪积期相当于乌加尔特洪积期，马卡德马亚洪积期相当于萨乌里和德尔法库里亚洪积期，迪什纳亚洪积期和新石器时期可能相当于吉尔洪积期。

最后，必须指出，非洲的洪积期必然是世界性气候变化引起的，在理论上这些变化应该与欧洲和北美的冰期相当。即使这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仍然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乌加尔特洪积期（西北非）、阿巴西亚洪积期（东北非）和东非的坎杰拉（奥杜瓦伊IV）可能与阿尔卑斯的里斯冰期有联系。在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之前，还必须进一步工作，特别是在古地磁和放射性测量方面。

第二部分

H. 富尔

引　言

地球几百万年历史的特点是，气候多次发生激烈变化。一百多年来人们所熟知的最突出的现象无疑是冰川在高纬度和高拔海地区的异常前进和退却。这种现象反映了冰川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人类的环境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非洲第四纪气候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湖泊面积扩大，而今已是干旱地区，大片沙丘扩展，而今该地区的气候已经比较湿润。372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碳-14的经常应用，在确定过去3万年所发生气候变革的年代方面取得了相当大进展。关于过去几百万年的气候变化，根据钾－氩法放射性测量来确定地磁倒转的年代，就可以弄清相隔遥远的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那些地区，特别是海洋区均使用这种方法。

在开始使用这种相关年代法之前，第四纪地层主要是以气候变革相继发生的顺序为依据，以此作为年代基础。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的相互关系是通过比较具有相似气候特征的连续时期确定的。例如，有人提出欧洲冰川期和非洲洪积期之间相当武断的相互关系。这种意见受到几个作者的反对（其中有特里卡尔〔Tricart〕，1956年；巴卢〔Balout〕，1952年a）。

现在证实，回答这种相互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虽然现在对全球气候学的历程有了较深的了解，并且建立了过去几千年的详细气候年代学，但是这些仅仅是开始。

古地磁地层学与放射性年代测定

除鲁什迪·赛义德上面的评述外，人们对岩石地层单位、生物地层单位和年代地层单位经常发生混淆，结果由于没有精确的定义，产生了一个术语，而这个术语在较准确的年代范围内往往很难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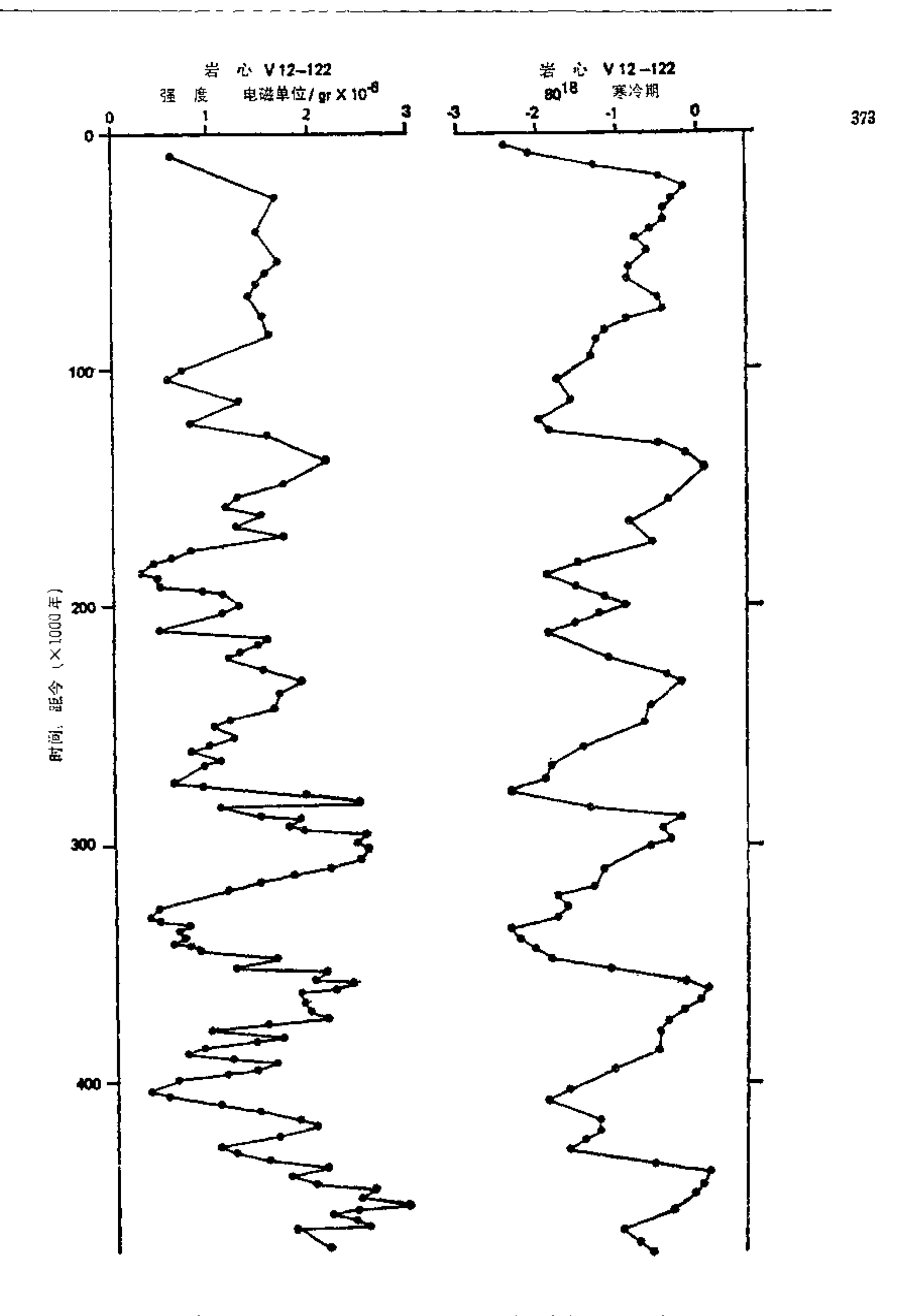


插图16.1 表示过去45万年深海岩心的氧同位素（或温度变化）与地球磁场强度之间的相似性的曲线图（根据沃林、埃里克森和沃林，1974年）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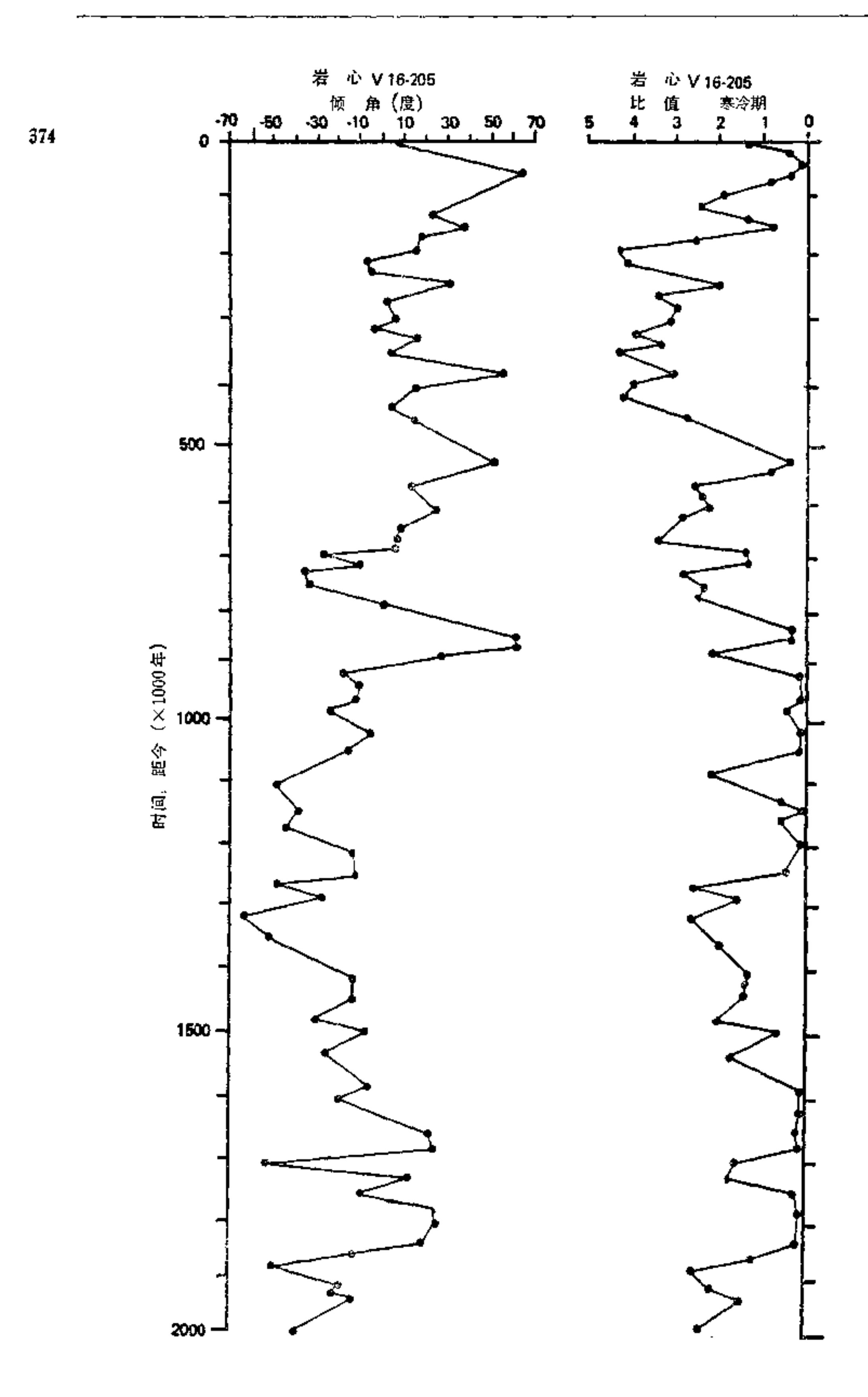


插图 16.2 表示过去 200 万年微体动物群指示的温度与磁倾斜之间的相似性的曲线图(根据沃林等人，1974 年)

另外，磁场的某些特点，如斜度和强度似乎和气候特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插图 16.1 和 16.2，据沃林等人，1974 年）。

第四纪冰川作用与年代测定

第四纪堆积在洋底的连续沉积物中可能记录了至少十二次相当寒冷的气候变化（见插图16.2）。在北欧的陆相沉积物中只辨认出约八次。阿尔卑斯地区的河成阶地和冰川沉积与四（或六）次普遍承认的冰川作用有关：即贡兹冰期、民德冰期、里斯冰期、武木冰期（和多瑙冰期、拜伯冰期），每个冰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由于陆相证据的不连续性，如果相距遥远地区的冰期在地磁或放射性测量年代表上还没有确定的位置，那么要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难的，而且常常是幻想。实际上，公认的阿尔卑斯冰川作用的年代也是含糊不清的。在不同地区，贡兹期、民德期、里斯期、武木期和拜伯期这些术语被用来表示并不是同年代的地层组。因此，根据对夹在莱茵河阶地中的火山岩的钾－氩年代测定，名为民德 I 组和 II 组的地层似乎已有 30 万年和 26 万年的历史，而名为贡兹 I 和 II 的阶地则有 42 万年和 34 万年之久。但是，同是“贡兹”期这一术语有时也用于克罗默尔期前的寒冷期，因此这个寒冷期可能有 90 万年至 130 万年的历史，与海底岩心中的加拉米洛变动以前的寒冷期相当。按照后一种解释，多瑙期，即前一个寒冷时期应当包括吉尔萨变动，并相当于伊比鲁期。 375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把根据大陆性气候的连续顺序所建立的年代学从一个地区转到另外一个地区是多么危险；如果我们核对一下已确定的寒冷期出现的次数，并检查一下对它们的武断命名，所发现的偏差就会使阿尔卑斯冰川作用与从海洋岩心中测得的寒冷气候的连续变化之间相互联系的任何证据都很不可靠。

如果制定一个地层表（即使近似的），如果有可能对两个地区进行确有根据的对比，那么所有气候现象的（一方面）以及地磁地层和放射性测量的参数的（另方面）全面而连续记录都是必不可少的。

用孢粉法鉴定松山－布容地磁倒转（69万年）发生在克罗默尔阶段，吉尔萨冰期（179万年）则出现在伊比鲁阶段（范孟特佛朗斯[Van Montfrans]，1971 年）。

第四纪海侵与年代测定

每次冰川作用都会引起海洋的冰－海面退缩，退缩程度可达一百米左右。因此，冰的融化所引起的海退使得在滨海带有可能把气候地层年代和海蚀旋回的年代联系起来。

在珊瑚相的海相地层地区巴巴多斯、百慕大、新几内亚、红海，通过建立在铀不平衡基础上的方法对珊瑚文石的年代测定有可能确定最后几个间冰期（距今约 20万年、12 万年、105,000 年、85,000 年前）中海侵的年代。在各种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物理误差范围内，据观测这些高海面完全相当于海洋微体动物群、花粉和氧同位素所指示的较高气温阶段。

376

全球气候结构

气候分析并不是确定年代相互关系的一种简单方法。由于在任何已知时间（或长达数百年或数百万年）构成气候因素的复杂性，不能使用未经严格年代测定的资料作为地层或年代的标准。

导致这些看法的事实有两类：

（1） 对几十年(或几百年，根据历史资料)全球气候演变的认识表明，这个问题在全球范围是多么复杂。我们必须了解所有因素的演变，包括太阳常数、海洋环流、极前峰情况、气温分布和降雨量的演变（不仅是平均数，而且还要考虑其变率)。

（2） 通过放射性测量方法所得到的过去 25,000 年（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某些气候因素变化的知识，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些变化的速度，关于这方面有可靠证据；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知道全球范围内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所考虑的时间表起着重要作用。

按照美国华盛顿国家科学院所下的定义(1975 年)，气候系统包括影响气候及其变化的各种性质和过程(热的性质：气温、水温、冰温、土壤温度；动力学性质：风、洋流和冰的运动等；含水性：空气湿度、云、地表水或地下水、冰等；静力学性质：压力、海洋密度、盐度等；以及该系统的几何界限和常数)。系统中的所有变量是通过发生在系统中物理作用如降水、蒸发、辐射、传导、对流、湍流等作用互相联系的。

气候系统的自然组成部分是大气圈、水圈、低温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影响气候的物理过程可以用运动的动力学方程、热力学能量方程以及质量和水的连续方程来定量地表示。

因为气候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相互作用，所以气候变化将是复杂的。因此，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特别要注意所涉及的时间表和相互作用的结构(反馈)，海洋在气候的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在空气和水的分界面之间进行着控制热量、温度和能量交换的过程。

这些初步考虑是想说明第四纪的气候地层学一直处于必要的近似认识阶段，但是现在正逐步试图了解涉及不同时期具体情况的结构。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将审查有关现代、全新世、更新世和上更新世的几个最新成果。

377

非洲现在和近世的气候

在非洲，热带地区每年旱季和雨季的循环交替与热带辐合区的位移有密切关系。

正如 J. 马莱伊(Maley, 1973 年)和 L. 多里兹(Dorize, 1974 年)近期总结的，热带辐合区是季风(来自赤道地区的潮湿空气或南半球的海洋信风)和哈马丹风(来自撒哈拉的干燥空气)相遇的地方。近似东西向的热带辐合区在春季和夏季的头两个月从南向北移动，然后

从北向南移动。这种季节性的往复现象出现在北纬4°到北纬20°-23°之间。潮湿空气和干燥空气之间的不连续面从北向南缓慢回升。夏季季风湿气的积累只是朝北的一个很薄的冷壁角，不能提供很多降水。要出现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降水，湿润空气必须达到1,200米到1,500米厚。只有在热带辐合区南面200到300公里的地方才具备这种条件(L. 多里兹，1974年)。由于整个非洲和大西洋气压场的作用，热带辐合区的位置不仅季节之间有很大变化，而且每日的变化也很大。如P. 佩德拉博德(Pedelaborde, 1974年)所指出，来自南大西洋的侧向推力加上南极锋的活动是使辐合区朝北推进的主要动力。因而，热带辐合区(在九月)朝南的撤退是南大西洋反气旋的减弱和北半球的影响所致。经过撒哈拉地区上空后变干的北方空气的偶然侵入只能给撒哈拉山区带来少量降雨。相反，穿过大西洋之后的南方空气则带来潜在的温度。

萨赫勒地带的气候转折是热带辐合区的位置保持了比其平均位置还要偏南3°至4°引起的。另一方面，在1950-1959年气候湿润的十年中，撒哈拉沙漠收缩了。J. 马莱伊(1973年)曾指出，这个湿润阶段和撒哈拉南部边缘最高温度的下降时间是一致的。

极地空气越冷，极锋越强，它们向赤道方向就伸展得越远。关于这一点，马莱伊(1973年)分为两种结构，即冰川期的结构和已弄清的现代结构。在前一种情况下，北半球的冰盖面积曾有过相当大的增加，而南极冰盖倒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因而，北极锋就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夏季把季风向南推进得很远。于是，干旱与冰川的扩展同时并进。在距今5,000至4,000年之前的全新世，由于气温较暖，极地活动中心减弱。在北方的夏季，北极锋的退却有利于赤道以北的季风范围扩大，而南极锋则迫使亚热带反气旋朝赤道前进。在北方的冬季，北极锋可能再度扩大它对撒哈拉地区的作用，并带来雨水。夏季和冬季都出现降雨，这就可以解释全新世前半期南撒哈拉地区的湿润气候和沙漠的缩小。 378

在过去5,000年中，北极冰盖的后退削弱了北极锋的力量，而南极的活动中心在力量上也减小了。因此，季风的推进和与此同时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作用的减弱可解释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的原因。

这些气象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非洲在第四纪发生的各种气候变化。

过去25,000年的年代测定和气候

近代和现代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在第四纪最后的25,000年(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冰川大规模前进，继而后退，一直延续到目前的间冰期。在这一时期，热带地区经历了极度干旱、湿润、再干旱的变化。这是唯一可供研究的几百年或几千万年的气候变化，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对地球上几乎所有纬度的许多地区气候系统及其变化的要素进行对比。此外，在这个时期，与现代种类相同的花粉，硅藻和动物群所提供的标志使我们能够精确地确定地理环境变化的幅度。此外，对海面平均高度的充分了解可使我们得到一些关于主要蓄水区(海洋、冰)中冰的总量和氧同位素关系的情况(见莫内尔〔Morner〕, 1975年)。

至于非洲撒哈拉地区，自从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所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调查(巴策尔，1961年；莫诺，1963年；富尔〔Faure〕, 1967年和1969年)以来，可以作为气候变化详细编年

基础的最新研究是M.塞尔旺和S.塞尔旺对乍得和尼日尔地区的研究，F.加斯对阿法尔地区的研究，以及范津德伦·巴克和利文斯通两个考察队、理查森、威廉斯、威肯斯等对东非地区的研究。他们的调查结果可以和高纬度地区许多调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维利奇科和379 德雷马尼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通过"气候长远分析，制图和预测"小组① 和麦金太尔的工作，可以了解整个大西洋地区，而通过范德哈门、威廉斯、鲍勒和其他一些人的论著则可以了解南半球的情况。

为了从全球角度正确确定过去25,000年非洲气候演变的地位，可以划分下列几个编年阶段。

距今25,000到18,000年前

高纬度区

距今25,000到18,000年前这个时期相当于北半球冰盖扩展极盛期的末期。武木期冰川作用的最后一次扩展(威斯康星-魏克塞尔-瓦尔代)的冰覆盖面积相当于先前所有第四纪冰川作用期间冰覆盖面积的90-95%(弗林特，1971年)。因此，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冰川作用模式。

在冰缘地区，永久冻土(常年冰冻的土地)似乎比在其它冰期中分布得更广(维利奇科〔Velitchko〕，1973年和1975年)。大陆上的有广阔冻土带似乎与北冰洋有大面积的海冰有关，这些海冰是使海空分界面上蒸发作用减弱的一个因素。

海洋区

由于海冰造成的流动水面的缩小，平均海平面从约-50米下降到-100米，两者结合起来进一步使海洋面积又减少了10%左右。在讨论的该时期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大陆架都露出了水面。

"气候长远分析，制图和预测"小组的研究人员(麦金太尔〔McIntyre〕等，1974和1975年；海斯等)绘制了冰川极盛时期(距今18,000年前)大西洋表面水的温度图表(插图16.3)。根据同现存情况的图表(是一个间冰期的图)比较，这些图表表明，冰川极盛时期和现在这个间冰期之间的总平均温差只有2.5°。但是，温差的分布在中纬度地区最大(温差为6°至10°)，在热带纬度地区则表现为很小(小于3°)(插图16.4和16.5)。例如，在北纬50°西经30°处，18,000或17,000年以前冬季的水面温度比现在冬季水面温度低7.3°到12.7°。夏季的温差下降为1.2°到6.6°("气候长远分析，制图和预测"小组〔CLIMAP〕，1974年)。

在南北半球，极地海水的迁移是这一冰期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北大西洋，极地海380 水从远至第42条纬线的地方(靠近现在约北纬60°的位置)南下，在第42条纬线以南产生了急剧的温度梯度变化，因此，这可能是这一冰期中西风带的轴线。这个界限以南的情况和现在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据观察，与非洲海岸平行延伸的等温线表明，在那里，特别是

① 属于"国际海洋考察十年"，其英文缩写为：CLI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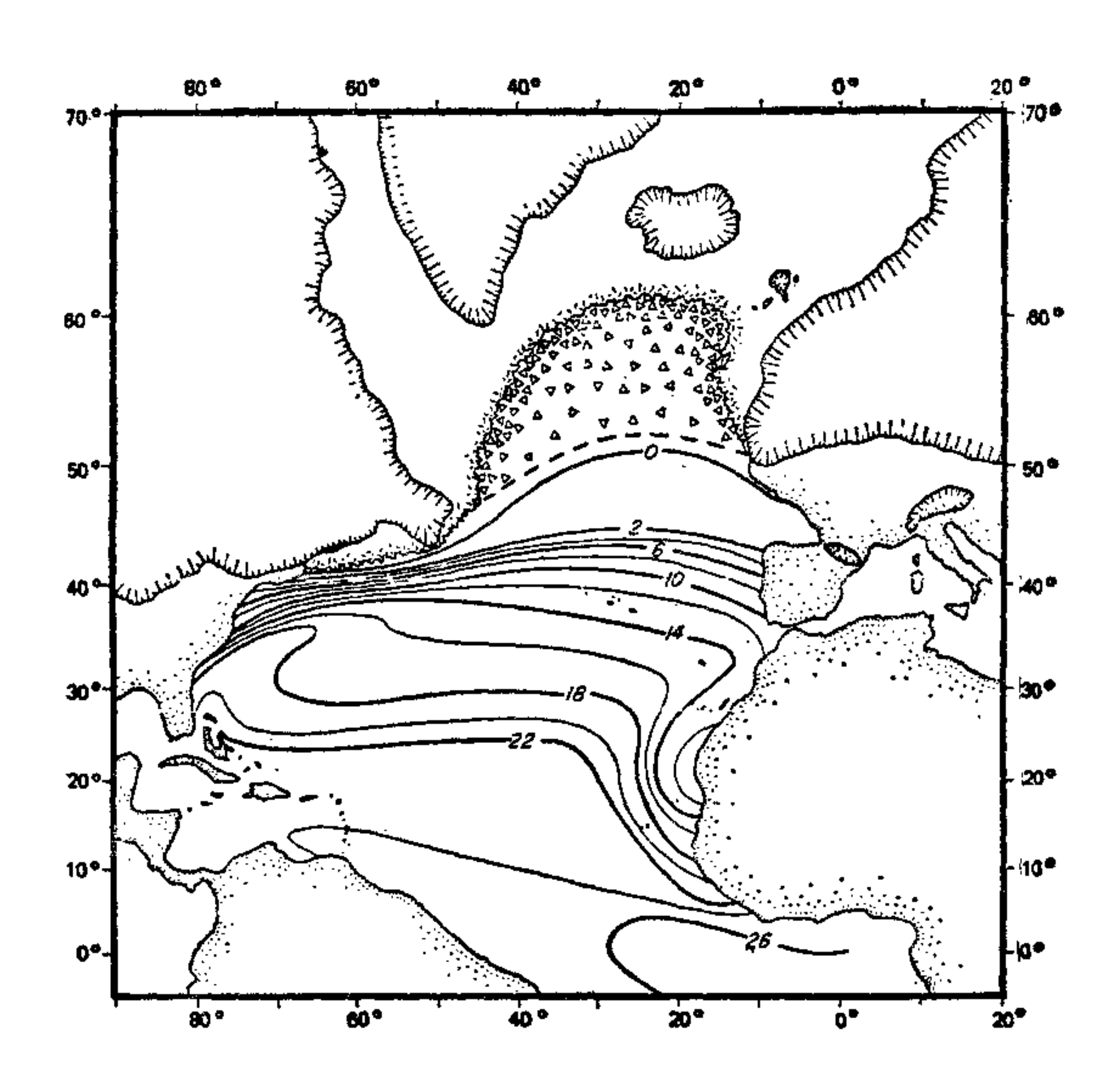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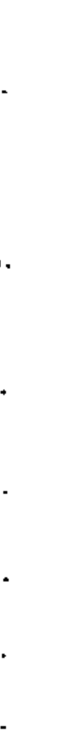
插图 16.3 距今 18.000 年前 2 月份大西洋水面的等温线图。虚线表示的是解释的等温线。阴影线画出的轮廓是主要的大陆冰块体，带密点的轮廓线是永久性大块浮冰。冰期的海岸线按现在海平面下－85 米的高度画出（根据麦金太尔等，1975 年）

冬季，存在着由于涌升水流增加而形成的相对冷水域（加德纳〔Gardner〕和海斯，1975 年）。

在北大西洋，极锋和西风带轴线向赤道移动了 2,000 多公里，而在南大西洋只移动了 600 公里（在太平洋，极锋在冰期中似乎移动很少）。这就说明了在这个冰期结束时整个撒哈拉地区季风侵入的减弱（见马莱伊，1973 年，第 7 － 8 页）和萨赫勒地带的干旱情况。

非洲地区

在南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过去 25,000 年间气候的一般演变情况表明，从大西洋沿岸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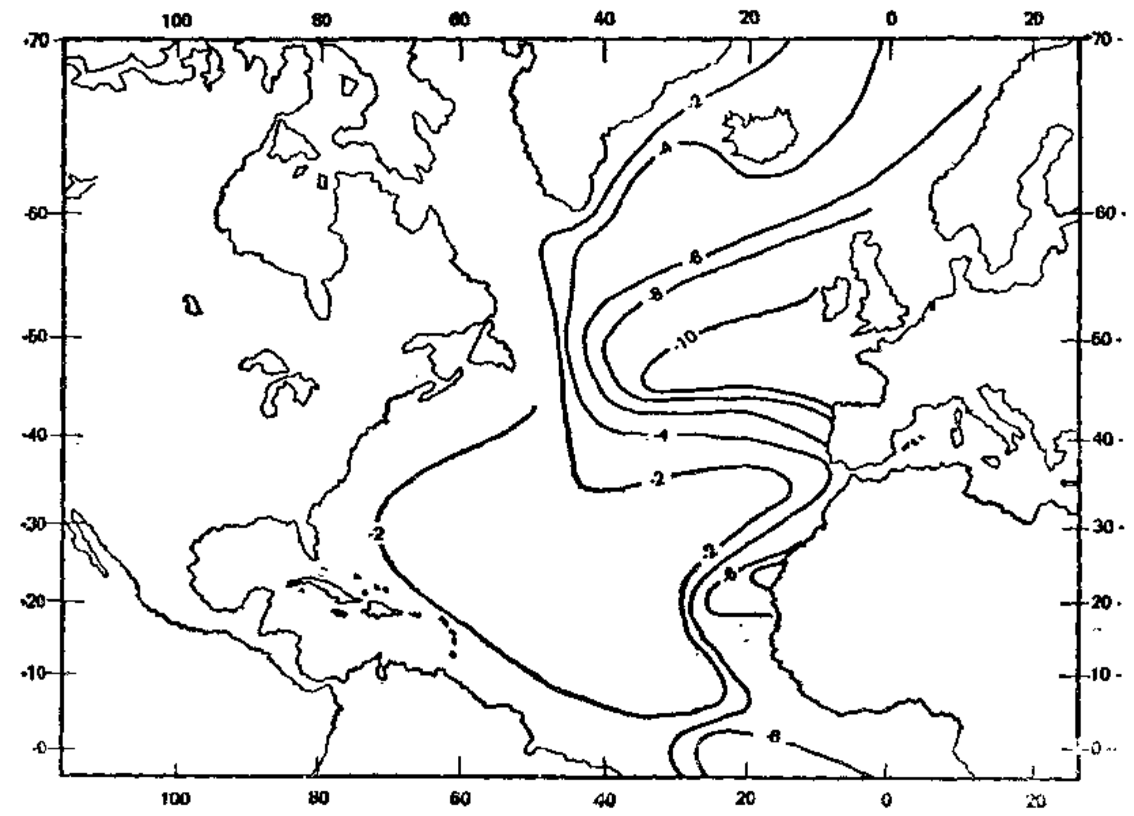


插图 16.4 在距今 17,000 年(或 18,000 年)前和现在大西洋冬季的水面温差图(根据麦金太尔,1974 年)(气候长远分析,制图和预测小组)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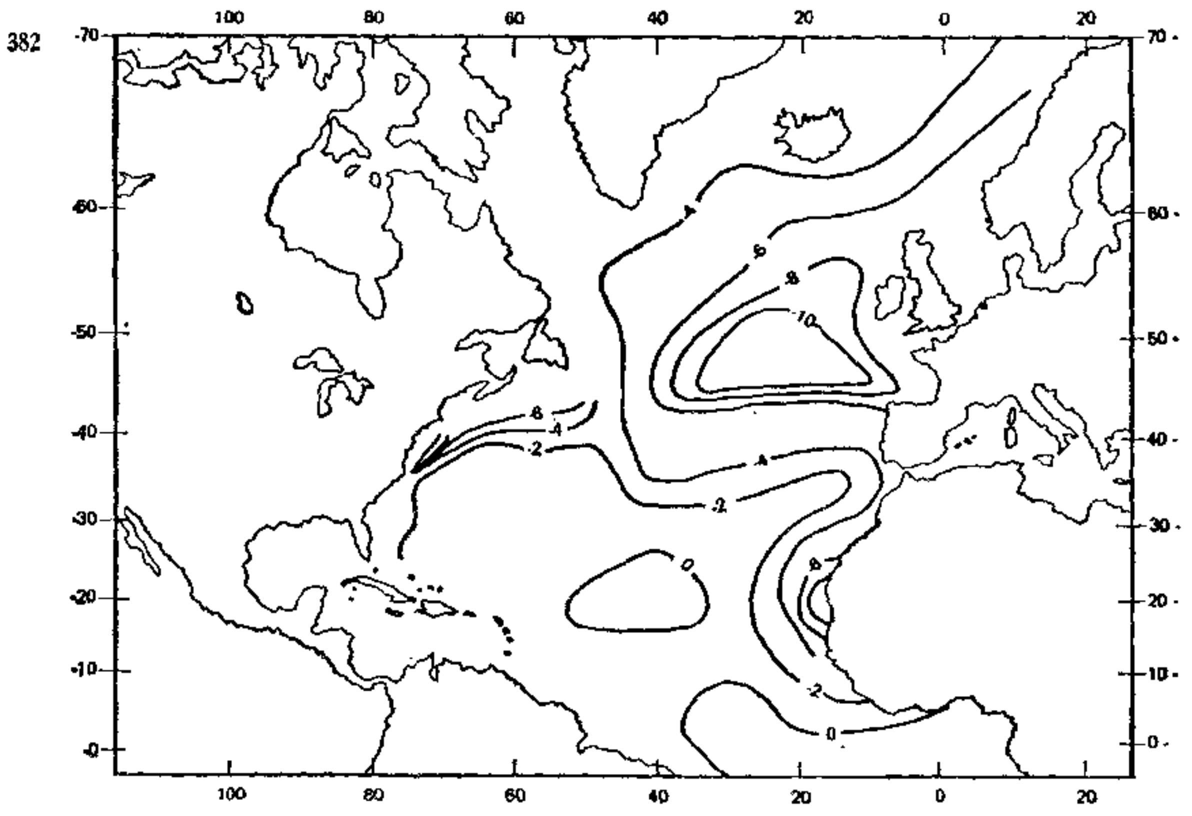


插图 16.5 在距今 17,000 年(或 18,000 年)前和现在大西洋夏季的水面温差图(根据麦金太尔,1974 年)("气候长远分析,制图和预测"小组)

到红海有非常相似的演化趋势。这一时期包括上更新世湿润阶段（从距今约3万年前延续到约2万年前）末期和12,000年左右前结束的干旱阶段初期。

对乍得盆地湖泊沉积的研究表明，降水和蒸发之间的关系足以能使4万年前到2万年前维持相当大的湖泊(M.塞尔旺[Servant]，1973年)。在以后8,000年里，干旱区扩大，延伸到它现在界限以南的400多公里。

这种从湖泊阶段转到干旱阶段的情况在阿法尔地区的湖泊沉积中也可以看到，F.加斯指出，上更新世出现过三个湖泊阶段。在距今2万年前到17,000年前之间，湖泊周围的环境恶化，在干涸的阿巴亚湖湖底长满禾本科植物(加斯[Gasse]，1975年)。

M.塞尔旺(1973年)和F.加斯(1975年)在评论最近的一些文献时提到，东非其它一些位于不同高度和纬度的湖泊具有完全可以对比的演变过程。这些文献有理查森、肯德尔、巴策尔等、格罗夫等、利文斯通关于图尔卡纳湖、纳库鲁湖、奈瓦沙湖、马加迪湖、艾伯特湖等的论著。有一幅图概括了这一对比，并说明非洲十二个湖泊具有非常一致的演变过程。

距今18,000到12,000年前

高纬度地区

在高纬度地区，这个时期相当于冰川极盛期末和冰消作用期。22,000年到18,000年前之间覆盖北美洲东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并达到最大范围的冰帽，在那之后立刻开始消融。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冰帽在14,000年前才发展到极盛时期，约在1万年前消失。因此，一般冰消作用约在14,000年前开始。另一方面，在南半球，南极洲东部的大陆冰帽似乎没有多大变化，而南极洲西部的大陆冰帽的底部在海平面之下，似乎缩小了很多(华盛顿国家科学院，1975年)。

海 洋

覆盖着海冰的浩瀚海面随着冰消后海平面的迅速上升肯定会消失。在15,000和12,000年前之间，海平面平均每一百年上升1.5米，在那段时间内海平面的上升如果没有三分之二也有一半。与此同时，大西洋的极地海水又回到更北的纬度地区。 385

非 洲

据大量文献资料记载，18,000到12,000年前之间这一时期的特大干旱曾波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尼日尔和乍得(塞尔旺，1973年)、阿法尔(加斯，1975年)以及苏丹(威廉斯，1975年；威肯斯[Wickens]，1975年)等地区湖泊水位演变的图表充分证明这一现象。植被的消失使风能把沙丘向赤道方向和露出水面的大陆架推进400到800公里。毫无疑问，经过几千年这样扩大的撒哈拉沙漠形成了比今天的撒哈拉沙漠更难使人类逾越的障碍。这次干旱似乎极为普遍，许多迹象表明，非洲(威廉斯，1975年著作引证德普罗耶、范金德伦·巴克尔等人)、亚洲，特别印度(辛格[Singh]，1973年)的整个热带地区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干旱。

威廉斯(1975年)最近评论了关于这个干旱期的文献，指出这次干旱现象是罕见的，并且几乎是同步扩展。

地中海盆地

虽然在最后一次冰川作用期间（约10万年前）地中海盆地的气候演变似乎是相当复杂的(见下面第289页)，孢粉学上的发现(博纳蒂〔Bonati〕，1966年)和土壤学上的发现(罗登博格〔Rohdenburg〕，1970年)表明，在冰川极盛期，气候干燥而寒冷。在16,000到13,000年前之间，地中海地区是一片干旱的旷原，土壤表面板结着钙质的壳层。

南半球

在澳大利亚，花粉的研究表明，直至18,000或17,000年前，气温曾一度逐渐下降，而干旱季节逐渐固定下来，沙丘扩展到露出海面的大陆架上(鲍勒等，1975年)。冰川覆盖了塔斯马尼亚岛和斯诺伊山脉，而在16,000年前澳大利亚南部的湖泊完全干涸。在15,000年前左右森林线高度上升，气候条件开始变暖，但仅仅在1,000年前以后澳大利亚南部的湖泊才开始再次积水(鲍勒等，1975年)。

范德哈门(Van der Hammen, 1974年)和威廉斯(1975年)注意到，在18,000年前左右最后一次冰川极盛期，南、北半球的气候是相似的。除美国的西南部以外，地球上所有的低纬度地区一般都出现持续几千年的干旱。

386 距今12,000年前到现在

高纬度区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冰川作用结束和气温明显上升，在过去7,500年和4,500年之间气温升到顶点(即气候适宜期，在欧洲仍被称作大西洋期)。在约1万年前科迪勒拉山脉的冰帽迅速消融。不久(9,000年前)斯堪的纳维亚的冰帽(9,000年前)也很快消失。人们注意到，在2,500年间气候迅速而明显地变化(例如，10,800年前和10,800年前之间新德雷亚斯期的较凉爽气候)。

北欧和北美分别在距今8,500年左右和7,000年前左右，冰川作用的情况开始和现在相似(华盛顿国家科学院，1975年)。当时，南极洲西部的冰盖也退缩了。

海 洋

海平面的上升反映了全世界冰川的一般溶化状况，在12,000年到7,000年前之间海平面的上升仍然是很迅速的(平均每百年上升一米多，但在11,000年左右前上升显著变慢，甚至下降)。在6,000年前以后，各大洋的海平面似乎非常接近现在的海平面高度，从那时以后只在这个高度上下几米之间摆动。除了这个总趋势之外，海平面的变化还取决于总的气候变化(莫内尔，1973年)。

沃林和埃里克森研究过的地带，即海洋沉积作用很快的沉积地带也使我们能追踪有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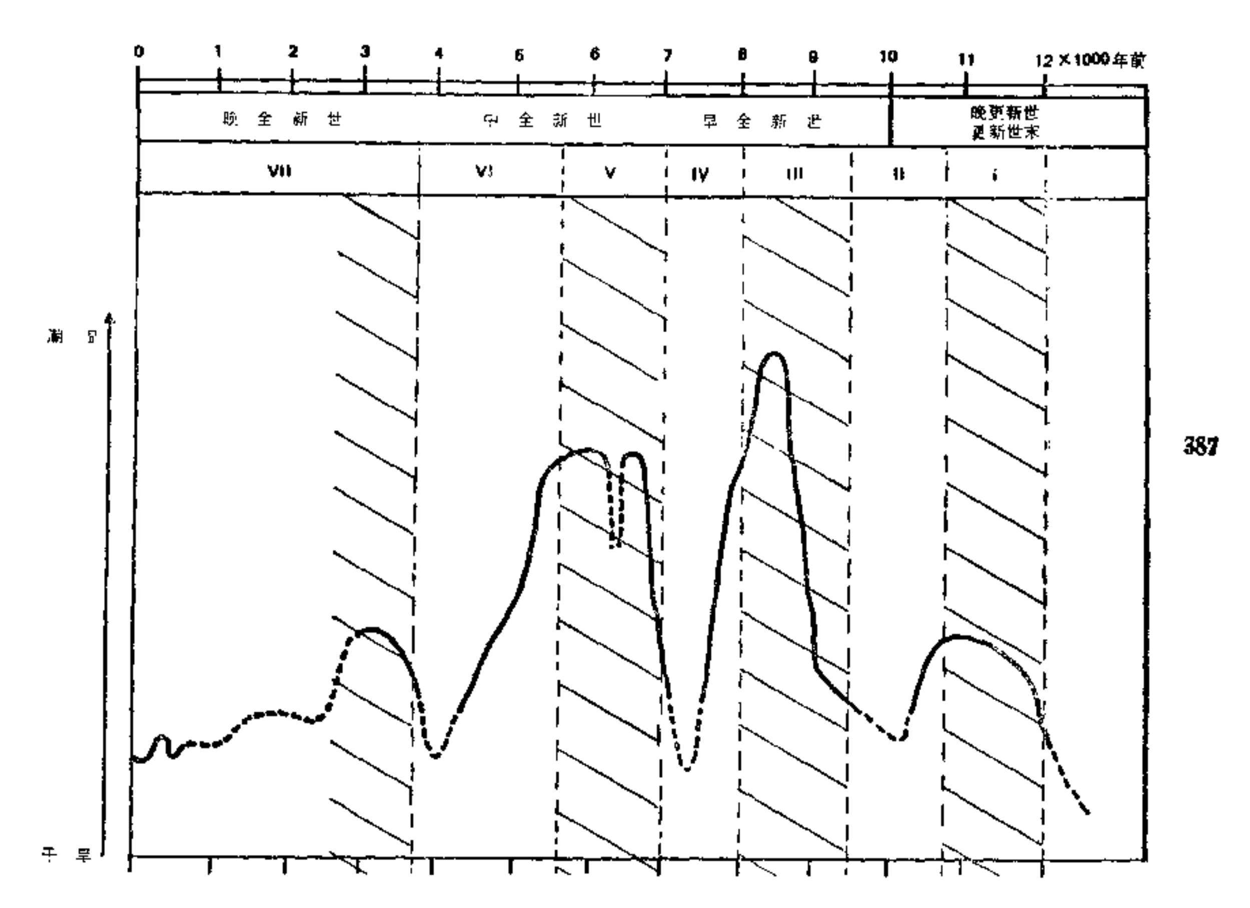
虫目分布的变化，特别是左旋球轮孔虫属的百分率变化。按照莫内尔（1973年）的意见，这种相关曲线的峰值可能反映用格陵兰冰的同位素测量、孢粉分析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的峰值。但是，这里达到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精度范围，考虑到沉积速率的变化。在年代测定值之间需要使用线性插值。另外，与时间表有关的碳－14编年表的偏差必须进行校正，而且，仅仅把存在一二百年的现象相互联系起来是靠不住的。

非　洲

在16,000年到14,000年前这一时期的极度干旱以后并从12,000年前开始，撒哈拉地区的湖泊明显地从大西洋沿岸向红海扩展。在几乎所有地势低的地区，都可以见到通常含有硅藻的湖泊沉积。

388

在尼日尔和乍得，M.塞尔旺（1973年）根据对各种类型湖泊的研究，考虑了它们的水源补给、水文地质和地貌情况，制出了一条降水量/蒸发量比率的曲线（插图16.6）。这条气候曲线说明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似乎有普遍的性质：约8,500年前湖泊大大扩展②，4,000



387

插图16.6　过去12,000年间乍得盆地（北纬13°18°）降雨量和蒸发量比率的相对演变。这种演变是决定于主要由地下水层、溪流和河流补给的不同湖泊水位变化的对比研究（据M.塞尔旺，1973年，10－52页）

② 恰恰在7,000年前收缩，约6,500年前又一次扩展。

年前收缩，3,000 年前之后只有较小的波动。这些巨大的变化也影响阿法尔地区的湖泊，可是由于水源补给的不同造成一些小的差别(加斯，1975 年)(插图 16.7)。可以看出，在乍得气候曲线和西伯利亚大陆带湿度曲线之间肯定有相似之处。

对非洲其它湖泊的研究得出了一条完全可以对比的气候演变线。利文斯通和范津德伦·巴克认为，东非和欧洲的气候演变颇为一致。

8,000 年前撒哈拉地区湖泊的扩展似乎与全年雨量的适宜分布和足以使蒸发量减小的浓密云层有关。M.塞尔旺(1973 年)认为那时的大气环流量与现在的完全不同。几个寒冷气候硅藻层的存在使他设想整个撒哈拉地区可能有极地空气的侵入。现在的气候结构似乎到 7,000 年前之后才确定下来。

南半球

按照鲍勒等人(1975 年)的意见，澳大利亚北部和新几内亚(威廉山)的冰川在 8,000 年前消失，降雨量增加但有较小的变化。在 8,000 年到 5,000 年前之间，平均气温似乎可能比现在高 1°或 2°。当时，似乎全球都出现最适宜气候条件(高热条件)，而 7,000 年到 3,000 年前之间的雨林自从 6 万年以前先头间冰期以来一直享受对它发展最有利的条件。同样，到 15,000 年前干涸了的澳大利亚南部的湖泊约在 11,000 年前又开始充水，在 8,000 年和3,000 年前左右达到高水位。

在过去 12,000 年的前半期，低纬度地区一般来说很可能气温上升，温度增加，从而造成目前间冰期特有的气候环境。

关于过去 25,000 年气候年代学的结论

这个时期使我们了解了冰川极盛期间(在冰期末期)和走向间冰期(现在间冰期)的冰消期间的气候演变情况。这种冰消半周期的模式表明，在非洲普遍化的干旱延续了约 5,000 年之久，并成为冰消作用末期的特点，接着是一个可比较的持续湿润阶段，这个阶段不断变化，但逐步转化为一个干旱阶段。

390

极锋的位移及其对热带锋的影响以及快慢两个极端的空气环流类型可以解释 2 万年时间表上的这些气候的周期变化。

这种模式也有可能代表其他一些象第四纪那样规模的情况，即在持续时间和范围上类似的情况。但是，没有理由据此推断持续 10 万年的整个冰期的情况，更没有理由据此推断数百万年时期内的所有第四纪冰川作用。因此，现在要从总体研究一个冰期的编年情况。

过去 13 万年的年代测定和气候

过去13万年(上更新世)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研究一个完整的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地层学模式。这个时期的年代远远超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所能达到的范围，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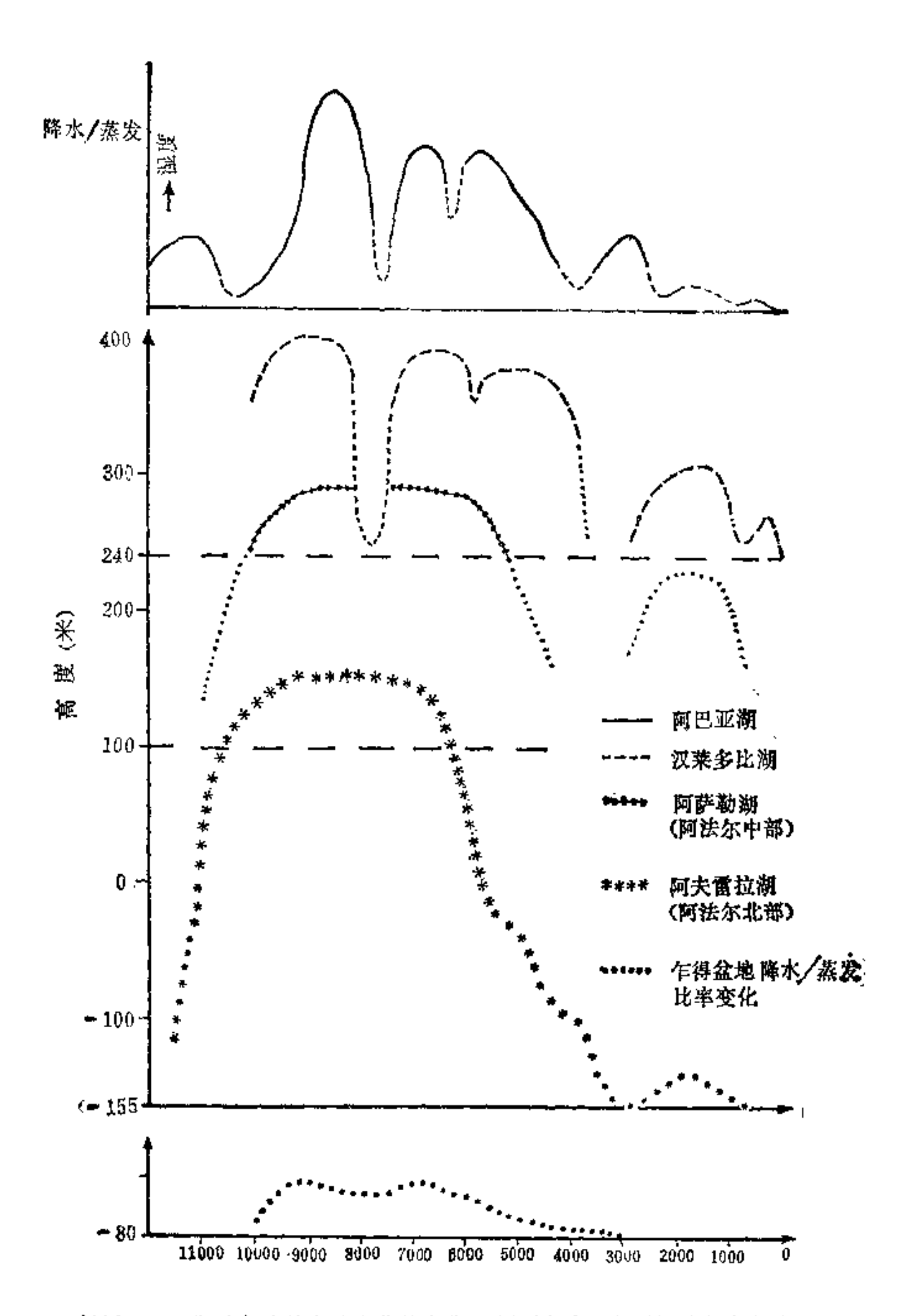


插图 16.7 阿法尔盆地湖泊水位的变化。图顶部表示位于阿法尔中部的阿巴亚湖、汉莱多比湖和阿萨勒湖的曲线。阿夫雷拉湖的曲线是单独表示的。可以同乍得盆地的降水量/蒸发量比率变化曲线作对比(据 F.加斯，1975 年)

这种方法只能使我们对过去25,000年确定一个相当准确的年代顺序(每个时代范围在100年或至少1,000年内)。但是，相当于目前间冰期以前的主要间冰期(义米间冰期)和主要冰川作用(武木冰期、威斯康星冰期、魏克塞尔冰期、瓦尔代冰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已被人们了解得相当充分，其年代测定误差的保险率约为90%，在最远古的时期的情况下约为80%。

实际上，在海洋和沉积盆地中，根据已知的沉降速度进行推断，以及包括铀和钾－氩不平衡在内的方法在其范围的上限的应用都提供另外的年代数据。在一个连续地层顺序中已测定了年代的点之间进行线性内插可以求出近似的年代。但是，对于延续时间不超过几千年的变动，就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大的时期中的相互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大体上是在充分验证并在各区域都能进行比较的平均年代(1万年)中的一般趋势。

高纬度地区

义米间冰期的植被表明，在该间冰期最温暖的阶段(约在125,000年到8万年前之间)中，欧亚大陆和北美洲的气温完全可以同和大西洋期(7,000年到5,000年前之间)的气温对比，也就是说，和现在的气温没有多大差异。这两个间冰期都是在气温大幅度下降(里斯冰期最后非常寒冷的阶段，为135,000年前；武木冰期的最后非常寒冷的阶段，为2万年前)之后突然出现的。

391 **海 洋**

大洋海面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这两个冰川的极盛期，在这期间海面下降相当(大约2万-18,000年的第二个冰川极盛期为－110米±20米)。在义米间冰期中海面达到的最高度相当于现在间冰期中的最大高度(上下不超过5%)。在过渡阶段(45,000年前到3万年前之间)海面的上升可以达到最大上升的60－80%(如毛里塔尼亚的因奇瑞时期)。这证明了，在过渡阶段消融了同等数量的冰。

非 洲

和海洋地区的情况一样，冰川现象的影响可能朝着热带纬度区减弱。冰期和间冰期的平均纬度温差为5°到10°，而在回归线之间仅有2°到3°的温差。在非洲，对降雨量及其分布的影响是最容易观察到的现象。

非洲少数地区很好地建立了过去13万年的放射性年代测定的编年。但是，F.加斯(1975年)通过对阿巴亚湖的探测证实了，在从2万年到14,000年前的干旱作用之前，在上更新世中存在下面三个湖泊阶段：最早的湖泊阶段距今5万年到6万年前(或许从6万到8万年前)，正如硅藻类所证实的，它相当于一个较凉爽的时期；第二个湖泊扩展阶段约从距今4万年前到3万年前；第三个湖泊阶段从距今3万年到2万年前(温暖湿润的热带气候)，后两个阶段被大约距今3万年前相当大的一个湖泊退缩期所分开。

对阿瓦什河谷(阿法尔)上游的花粉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关于上更新世中未确定年代的气候变化，在那里，R.博纳菲尔(Bonnefille，1973年，1974年)发现了一些证据，说明那时气候比现在气候显然要湿润得多，或许更冷些，其特点是高原上覆盖着草原植被。

地中海盆地

地中海盆地位于上面所研究的两个地带之间，是一个重要的气候区，它的演化似乎很复杂。特别是，再也不能把冰川作用看作是确定潮湿气候的唯一原因。

埃米利亚尼(Emiliani, 1955 年)，韦尼奥－格拉齐尼和赫尔曼－罗森堡(1969 年)，维姆斯特拉(1969 年)，范德哈门(1971 年)，罗西尼奥(1969 年)，伊萨德(1968 年)，伊萨德和皮卡尔(1969 年)，法兰德(Farrand, 1971 年)分析了地中海东部、希腊、以色列地区的孢粉、微体古生物和同位素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下述结论：在最后一次冰川作用期间，空气温度下降了 4°，海水温度下降了 5° 到 10°。在这个冰期中希腊地区干旱较为显著，而在以色列沿海地区情况正好相反。 392

另一方面，切尔诺夫(1968 年，法兰德，1971 年)对哺乳动物（啮齿动物）化石碎片的研究似乎表明了过去 8 万年湿润环境向干旱环境逐渐演化的情况。约 2 万年前，以色列的利桑湖的水位因为环境较干燥(再加上死海裂谷中的构造运动)，每一千年下降 190 米，正如我们已了解的(第 287 页)，武木冰期寒冷气候发展高峰的最后阶段在整个地中海盆地伴随着寒冷而干燥的环境。

象非洲一样，地中海盆地中地质气候情况非常复杂，以致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才能使我们对武木冰期的气候演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关于过去 13 万年中年代测定和气候的结论

最后这个冰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期 10 万年左右的完整气候循环的模式(间冰期－冰期－间冰期)，在这个模式中各阶段期间以及各阶段之间的气候变化延续了 1 万年左右。在非洲，它的特点是湖泊扩展的各个阶段(持续时间可以对比)间隔着干旱阶段。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而言，年代测定还不够精确到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确定非洲的寒冷或温暖时期与湿润或干旱时期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目前进行的工作在得出连续的事件顺序的切片和取样工作的协助下，使我们能够在将来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 350 万年的年代测定和气候

第四纪的一个特点是缓慢地朝低温变化，这一趋势早在约 5,500 万年前就开始了(新生代气温下降期)(国家科学院，1975 年)。南极洲的冰盖约在 2,500 万年前已经形成，约在 1,000 万年前有相当大幅度的增加，后来约在 500 或 400 万年前再次增大，当时接近它目前的体积。邻近北大西洋大陆的北极冰盖约在 300 万年前出现。180 万年左右前(毕晓普和米勒[Bishop, Miller]，1972 年著作，引证邦迪的材料)，在卡拉布里海洋阶段海平面下降到最低之前不久，大致在吉尔萨冰期发生的同时(179 万年前)，海洋的温度第一次普遍开始大幅度下降。

非洲几个地区(乍得、东非等)具有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最初认为这些化石属于维拉

393 弗朗洪积期(330 万年前到 170 万年前之间或 100 万年前)的。某些哺乳动物群共生的先决条件比现在这些沉积物的环境条件潮湿得多。因此，它们被看作是非洲“洪积期”的标志。

基于钾-氩和古地磁年代测定的最详细的地层是东非裂谷沉积物的地层。依照这种沉积物填充的类型，了解气候的影响比了解构造和火山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地形变化的影响更难，因此，笔者放弃了建立详细气候顺序的尝试。另一方面，年代地层学已稳固确立，成为世界性对比的组成部分。

在东非的各种脊椎动物和人类化石沉积物中(插图16.9 和 16.10)，已确定了年代的沉积顺序如下：

奥莫河流域(埃塞俄比亚)

约 1,000 米厚的顺古拉地层从 320 万年前延续到 80 万年前；乌斯诺地层从 310 万年前延续到 270 万年前(根据德海因策林、布朗和豪厄尔〔Heinzelin, Brown and Howell〕，1971 年；科彭斯〔Coppens〕，1972 年；毕晓普和米勒，1972 年；豪厄尔，1972 年；布朗，1972 年，1975 年)。对顺古拉地层的花粉研究揭示了 200 万年前左右气候大幅度向较干旱方向的转变，同时茂盛的热带草原也发展起来(博纳菲尔，1973 年，1974 年)。对动物群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变化。可以认为，它和世界性的海洋温度的下降(180 万年前)是一致的。

奥杜瓦伊(坦桑尼亚)

已被确认的地层组的顺序及其年代如表格 16.1 所示。

表格16.1 已被确认的地层组的顺序及其年代

地层组	层	年代
恩杜图	层	32,000年前 40 万
马森	层	60 万
	层 IV	80 万
晚坎杰拉	层 III	115 万
	层 II	170 万
晚卡马西亚	层 I	210 万

(据利基、库克和毕晓普，1967 年；豪厄尔，1972 年；海伊，1975 年)

396 **东图尔卡纳(鲁道尔夫)(肯尼亚)**

地层情况总结在插图 16.10 中，这个图应归功于布劳克和伊萨克(1974年)，它涉及到从约 350 万年到 150 万年这一时期的 325 米厚的广泛分布的沉积物(根据鲍恩、布罗克、艾萨克和冯德拉，1975 年)。

397 **哈达尔，阿法尔中部(埃塞俄比亚)**

最后，阿法尔中部哈达尔的地层组已由国际阿法尔考察队进行过研究，那些地层含有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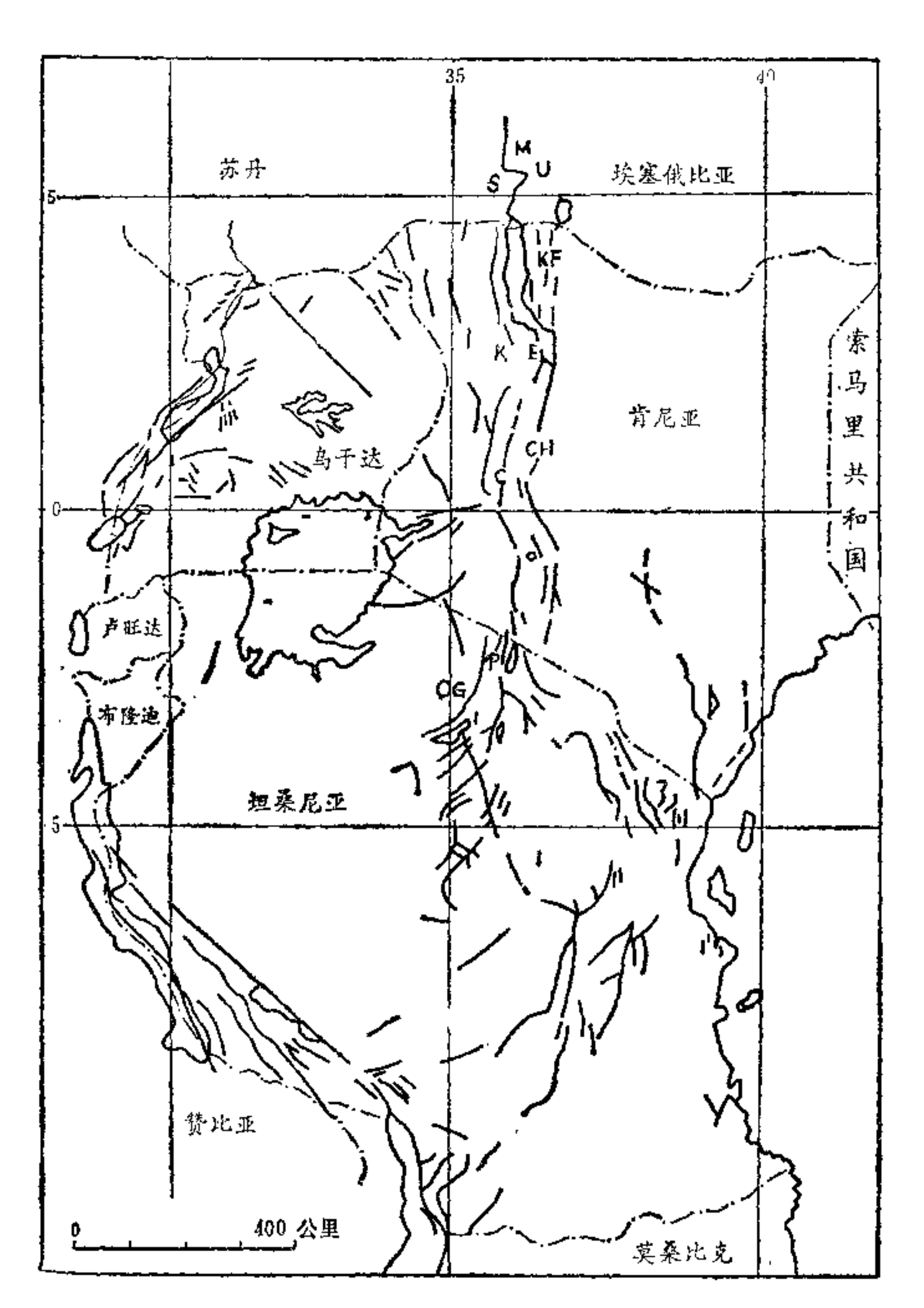


插图 16.8 东非上新世/更新世标准化石产地分布图：M--穆尔西；U—乌斯诺；S--顺古拉地层，奥莫河下游；I—伊莱雷特；KF—科比富拉，鲁道尔夫地区东部；L—洛萨加姆；KE- 卡纳波和埃科拉，基埃罗河下游；C—切梅龙；CH—切索万贾地区，巴林戈盆地；K—卡纳姆，卡维龙多湾；P—佩宁季，纳特龙盆地；OG--奥杜瓦伊峡谷；LA—莱托利尔，塞伦盖蒂平原。本图大部分根据《肯尼亚概览》的 1:4,000,000 的东非地质图绘制（据 F. 克拉克·豪厄尔，1972 年）

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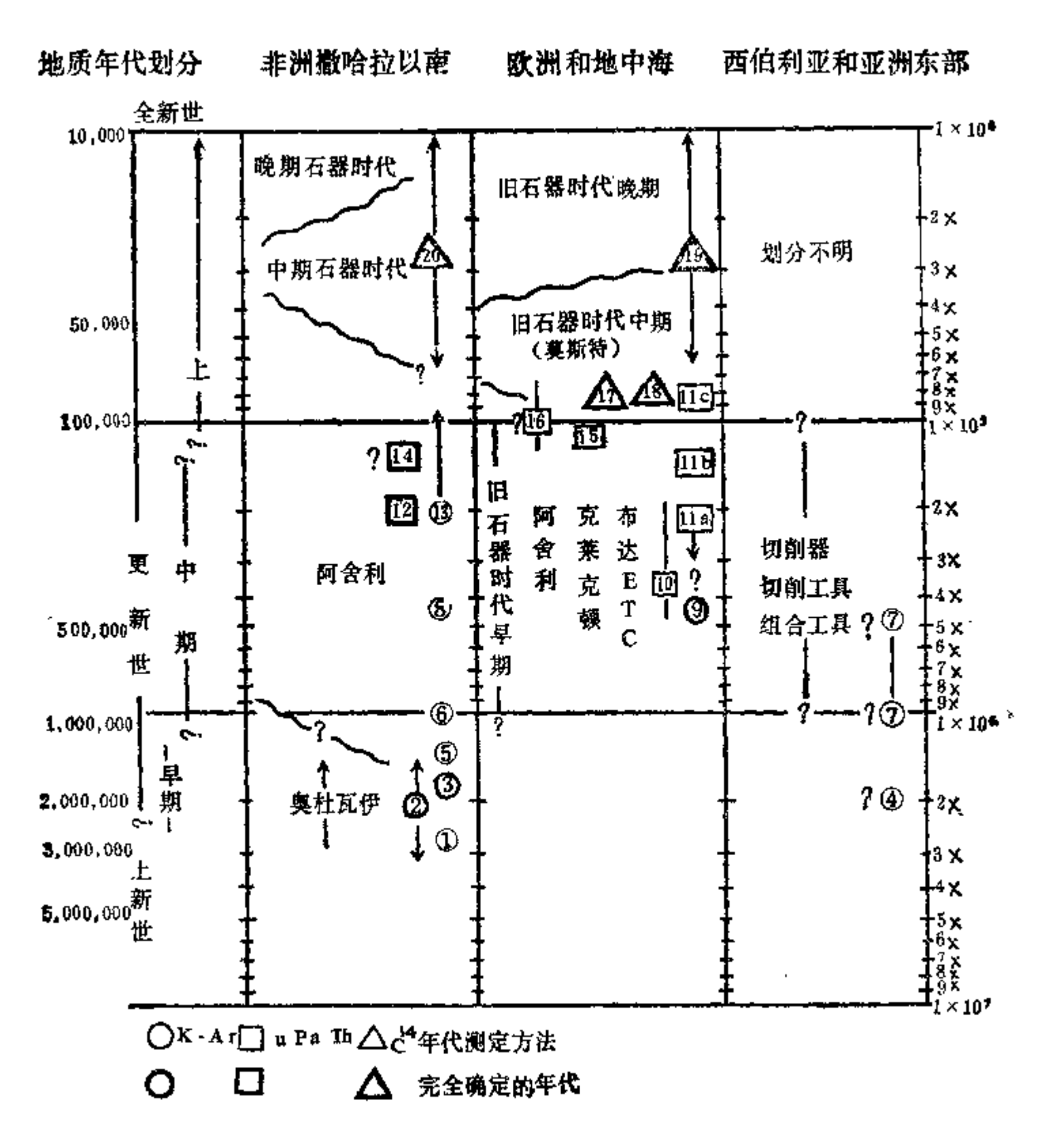


插图 16.9 更新世期间标志着人类进化的文化变革的年代和发展速度。这里表示了文化地层的实物与对数时间表的大致关系（据毕晓普和米勒合编著作中的G.L.艾萨克的文章，1972年，第381-4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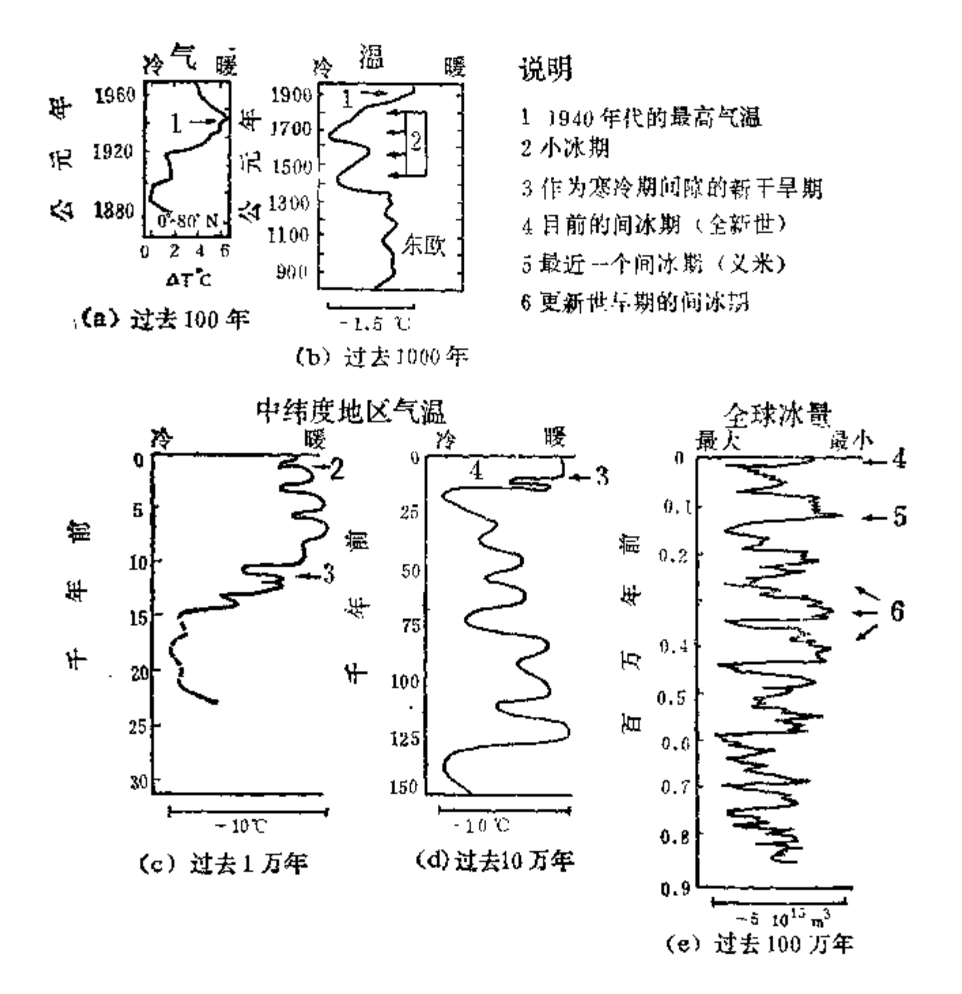


插图 16.10 过去一百万年全球气候的一般变化趋势。(a) 近一百年中 0-80° 北纬地区每五年平均地面温度的变化(米切尔，1963 年)。(b)过去 1,000 年中东欧冬季严寒指数(拉姆，1969 年)。(c)根据树木年轮变化(拉马什，1974 年)，阿尔卑斯和大陆冰川边缘变化(丹顿和卡伦，1973 年)以及花粉系列记录的植被类型的改变(范德哈门等，1971 年)所确定的过去 15,000 年中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气温的一般变化趋势。(d) 根据中纬度地区海面温度、花粉记录和全世界海平面记录确定的过去 10 万年中北半球气温的一般变化趋势。(e)根据深海岩心 V 28-238 中浮游生物化石同位素成分的变化确定的过去 100 万年中全球冰体积的变化（沙克尔顿和奥普代克，1973 年）

丰富的人类祖先的化石，根据约翰逊和塔伊埃卜等人([Johanson and Taieb]1974 年，1975 年)的考证，那些地层已有 300 万年。

用一二年时间积极地对东非这些地区进行研究将有可能根据沉积学和动植物生态学，并考虑构造和火山活动因素的影响，提出另一种气候演变的理论。

关于非洲其它部分，例如：萨乌拉河流域(阿利芒[Alimen]等，1959 年；阿利芒，1975 年b)，尼罗河谷（温多尔夫，1968 年；巴策尔和汉森，1968 年；德海因策林，1968 年；吉根加克，1968 年；赛义德，印刷中)，乍得（科彭斯，1965 年；塞尔旺，1973 年)和北非，已作过深入研究。所提出的气候变化是建立在这些水系的沉积作用和河床下降的顺序，或哺乳动物群的顺序基础上。如果没有放射性和地磁地层的年代测定，至今还不可能说明这些变化与欧洲冰川变化的相互关系。

结 论

过去500万年晚新生代的一个特点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全球热梯度的加大是伴随着相当大的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热梯度的加大导致了高纬度地区气温的巨大变化，因而产生了冰期和间冰期。在热带纬度区，热的变化稍有减弱，但是，受极锋变强或变弱干扰的大气环流使降雨的分布和数量发生很大变化，这促进了不同气候带环境的深刻改变，从而使动物赖以生存和人类借以发展的地理环境和植物环境产生周期性更迭。这些气候变化比欧洲的冰川作用更清楚地证实了非洲演化的有节律变动模式。

在简短地总结我们关于非洲气候变化和年代测定的认识状况时，应当记住：在使我们各方面不同的认识适应严格的理论体系之前，还必须不断地观察和测量。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各种气候变化表现形式的时间表的重要性。在正确的时间表内，应重视每一项观察和每一种现象。这一点曾以结论的方式在插图 16.10 中作了说明，该插图引自国家科学院的著作(1975 年)，插图中为从 100 年到 100 万年变化范围的时间表列举了 5 个气候变化的例子。

（李 森译）

398

插图 16.11 东非、西南欧和北美西部上新世/更新世时间范围的放射性和古地磁测定。伊莱雷特和科比富拉地区出露的非常重要的顺序还在调查研究中，由于结果不完全，这两个地区的栏空缺（据 F. 克拉克·豪厄尔，1972 年）

399

400

17 人类形成的过程：一般性问题

第一部分　古生物学资料

Y. 科彭斯

人是一种哺乳动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有胎盘的哺乳动物。① 他属于灵长目。

古生物学标准

人是灵长类的一部分。灵长类与其他有胎盘的哺乳动物不同，因为他们的脑子发育早熟，有进步的立体视觉，有减缩的颜面部，爪为扁平指(趾)甲所代替，拇指能与其他指对握。灵长目分为原猴和猿猴两大类。人被归入第二大类，这个大类的特征是：身材增大，眼窝在脸上的位置向外侧移动，使得视觉有所改善，颞窝被分隔开来。

在大约3,000万年前的上渐新世，在这些猿猴中，类型骤然增多，由此可以推测，人科中出现的差别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为了写出这些人科动物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在过去3,000万年的猿猴类化石中进行搜寻，以鉴别其进化趋势指向人属典型性状的那些动物，这些使我们作为人属代表的性状就是两脚行走，这意味着以下各部位发生了变化：脚、腿和骨盆，头骨位置，脊柱比例，脑壳发育，面部减缩，齿弓圆钝，犬齿减小和硬颚变深。

上渐新世的原上猿表现了这种种进化趋势的一些不同形状，这就是有些学者过早热衷于将它看成我们同类的缘故。

401 在腊玛古猿中可以看到的趋势更加有关，因为它的脑子体积看来已增长到400毫升，面部缩小，齿弓圆钝，门齿和犬齿也比较小并且位置垂直。另一种灵长类山猿已发现有完整的骨架。它具有同样的头骨特征和偶尔两脚行走的骨盆，可以推测，尽管我们还没有腊玛古猿的头后骨骼，但它的骨骼也可能具有身体适应直立姿势的同样的初步形状。

可是，关于南方古猿的进化趋势却没有含糊之处，因为这些经常性两脚行走者已具有

① 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的五个纲中最高等的，有胎盘的哺乳动物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等的。它们有一种新的器官，即胎盘，胚胎经由胎盘进行呼吸并取得营养。

人的脚、现代人的手、显然较大的脑子、较小的犬齿和较小的面部，因而只能被认为是人科。

在此进化链索的终端，人属与南方古猿不同，因为他有下列特征：增高的身材，改善的直立姿势，增大的脑量(在最早的种内可多达 800 毫升)，牙齿的改变，由吃植物改为吃杂食的结果，使前齿比侧齿发达。

可以看出，古生物学的探索涉及对解剖学的研究，这既是比较的研究，也是动态的研究。因为古生物学家知道，进化总是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从未分化的到特化的，他们必须发现化石，这种化石既可进行充分比较，又在适当考虑其地质时代情况下，与古生物学家正在寻找其祖先的人类有足够的差别。

最早的灵长类是原猴类。现在，这一类的代表是马达加斯加的狐猴、菲律宾和印尼的跗猴以及热带非洲的丛婴猴。

从始新世② 向前发展，猿猴类分为两大组，即阔鼻类③ 或新陆猴和狭鼻类或陆猴。前者的鼻中隔宽阔，有 36 枚牙齿，后者的鼻中隔狭，有 32 枚牙齿。

狭鼻类又分若干科：狭鼻猴科、猿科、人科、长臂猿科、山猿科、巨猿科等。

2,000 万到 4,000 万年前

缺乏证据使我们难以知道灵长类在始新世和渐新世(距今 2,000 万－4,000万年前)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有许多考察队研究过开罗以南大约 60 英里的法尤姆的一个丰富的遗址，这里有一些迹象表明有种类多得难以置信的灵长类：傍猴、亚辟猴、渐新猴、原上猿、风猿和埃及猿。 402

傍猴和亚辟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有三枚前臼齿，即象原猴类和阔鼻猴(新陆猴)那样有 36 枚牙齿。双猴是在缅甸发现的第三种类型，有相似的形态，属于一组。

但是其他许多特性使这一组灵长类更可能属于狭鼻类 (特点为 32 枚牙齿)。它们实际上是狭鼻猴或原狭鼻猴的祖先。

因此，我们初步向后一看就可看出一个先驱阶段，即有 36 枚牙齿和存在三种类型(傍猴，双猴，亚辟猴)的原狭鼻类。

渐新猴、原上猿、风猿和埃及猿都有两枚前臼齿，它们是真正的狭鼻类，有 32 枚牙齿。

渐新猴是一种小的灵长类，大约有三分之一米高，有原始型的臼齿，被认为是狭鼻猴亚科的祖先，这是已知的最早的具有 32 枚牙齿的灵长类。

风猿有巨大的犬齿和带独立齿尖的臼齿，可能是长臂猿的先行者。与其密切相关的是欧洲中新世的上新猿和肯尼亚及乌干达中新世的湖猿。

---

② 我们记得，地质时代分为第一纪，第二纪，第三纪和第四纪。灵长类出现于大约 7,000 万年前的第二纪末，在第三纪和第四纪得到发展。第三纪分为五个主要阶段，从老到新为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和上新世。第四纪只有两个阶段，即更新世和全新世。

③ 本章附有一份词汇表，说明本章用过的各个科学术语的意义。

埃及猿也有大的犬齿和异形的前臼齿。④它是旧世界发现的森林古猿的祖先，也可能是黑猩猩的祖先。

原上猿有不大粗壮的臼齿和带有一个半齿尖的下前臼齿。人科特征之一是两个下前臼齿形状一致，原上猿这种具有一个半齿尖的下前臼齿是后来人科的这一特征的预兆。那末，原上猿是人科的祖先吗？或者更谨慎地说，它是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吗？或者它已经是猿科的一个成员吗？

不管它们之间有什么型式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证明东北非在3,000万年前已有种类繁多的小灵长类。它们预示着今天的所有灵长类(狭鼻猴类，猿科，长臂猿科和人科)，因为根本的方向已经奠定了。

403

1,000万－2,000万年前

在此期间又向前迈了几步。L.S.B. 利基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发现过一种小的灵长类，即肯尼亚古猿非洲种，他把这一类归为人科。这种古猿生活在2,000万年前，具有圆钝的齿弓，向两侧分开的上颊齿，⑤和稍微向前突出的颌骨。⑥它的门齿和犬齿都是垂直的，前臼齿和臼齿低。不管怎样，许多评论者从这一种古猿身上看到了猿类的特征。

利基还在肯尼亚的特南堡发现了1,400万年前肯尼亚古猿威克种，他认为这是同一类型的另一种。

其他专家对这种标本的特征作了不同的解释，或根据其他特征而不是利基所选择的特征提出了意见。他们把这个种也归入猿科。

但是利基提出了文化方面的论据，支持他的新的候补者。1967年，他在达喀尔举行的泛非大会上出示了玄武岩碎块，其自然切割边带有使用的痕迹。1971年，他在亚的斯亚贝巴断言，与肯尼亚古猿威克种一起发现的大多数动物骨骼曾被人工打破。关于非洲小灵长类选择锐利尖石头制备食物的思想，肯定会激起想象力。从理论上说，至少这不是不可能的。

从1934年以来，我们已经在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发现了800万－1,400万年前的另一种灵长类，腊玛古猿旁遮普种。它们是从中新－上新世地质结构中发现的。

耶鲁大学的西蒙斯重新对它进行了研究，并把它与曾被归入布腊玛古猿的化石联系在一起。腊玛古猿旁遮普种是一种小灵长类，体重约18－36公斤。它的面部低，下颌厚，附着部垂直，门齿小，犬齿也小且位置垂直，下颌上迟长的臼齿和前臼齿彼此相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许多(虽非全体)专家把腊玛古猿旁遮普种归于人科。

西蒙斯甚至把它与东非的肯尼亚古猿和中国与欧洲的几起分散的发现当作证据，证明中新世时前人分布区包括整个旧大陆。

---

④ 前臼齿和臼齿的齿冠有几个小的齿尖。在大的猿猴（猿科）中，第一下前臼齿象犬齿，只有一个齿尖。在人科中，此齿象第二前臼齿，有两个齿尖。第一种情况是异形前臼齿，第二种情况为同形前臼齿。

⑤ 前臼齿和臼齿统称为颊齿。

⑥ 突颌意指颌骨向前突出，指的是鼻下方的面部的全部或一部分向前伸出。

事实上，他没有错，因为过去三年的寻找已导致在土耳其(由I.特卡亚)和匈牙利(M.克雷佐伊)发现了同样的腊玛古猿，而皮尔比姆的考察队从巴基斯坦收集的新材料中得到了有关这种灵长类的大量资料。

中国和印度已经发现了一种巨大的灵长类，巨猿。中国的叫步氏巨猿，印度的叫比拉斯普巨猿。巨猿的时代估计为数百万年。巨猿的门齿小，犬齿虽不大，但不是人科的。下第一前臼齿有两个齿尖。颊齿大而强，磨耗相当重。面部低，下颌有力，附着部长且垂直。但今天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它可能是人类的祖先。 404

在L.德博尼斯领导下在希腊进行的考察，发现了1,000万年前的灵长类，奥兰诺古猿，它可能是巨猿的祖先。

最后，还有1,200万年前的另一种灵长类，山猿，它惯常在托斯卡纳森林，也可能在肯尼亚森林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

山猿是1872年热尔韦发现的，后来被一位天才的瑞士古生物学家约翰内斯·许尔策勒描述过。许尔策勒在托斯卡纳的格罗塞托作了几次发掘，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几乎完整的山猿骨架。山猿面部低，鼻子的侧面向前突出。它有小门齿和乳犬齿，第一下前臼齿上有两个齿尖。其骨盆是两脚行走者的，但前肢极长。

山猿可能是一种小的人科生物，但它是一种臂行类型的灵长类，⑦适应于树上生活。

因此，我们有了肯尼亚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古猿威克种、腊玛古猿旁遮普种、步氏巨猿、比拉斯普巨猿和山猿。目前，重要的不是要知道谁是谁的祖先。不管怎样，它们代表着若干条进化线。但把中新世和上新世的这四种类型放在一起来看，便提供了一幅栖息林中的灵长类的图景，它们首次来到湖边和河岸的开阔地带，寻找食物。从树林中出来，自然就有必要过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面部和前齿缩小，并且出现第一前臼齿不再受犬齿妨碍，发展两个齿尖而不是一个齿尖的趋势。这预示着对平原的征服，同时预示着用两脚行走。⑧

1,000万－100万年前

从上新世到更新世，从1,000万到100万年前，存在着南方古猿类，这一组动物在类型上很快就起了很大变化并且局部化了。简短地叙述一下它们的发现史，可帮助我们了解它们的历史及其地理分布。 405

年代史

1924年，雷蒙德·达特教授描述了第一个南方古猿并予以命名。这是一个大约五、六岁小猿的头骨，发现于贝专纳兰的塔翁一个洞穴中角砾岩内。1936年以后，又有许多其他的标本被发现，这些标本是达特教授和菲利普·托拜厄斯教授在德兰士瓦以下四个洞穴发

⑦ 臂行是在树上的一种行动方式，包括用前肢悬挂着从一根树枝到另一根树枝进行运动。
⑧ 两脚行走是在地面上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以一种直立姿势用两个后肢行走。

现的——斯泰克方丹，斯瓦特克朗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罗姆德赖和波希特斯勒斯附近的马卡潘斯盖洞穴。

1939 年，德国教授科尔·拉尔森在坦桑尼亚的埃亚西湖东北的加鲁西或莱托利尔发现了一个下颌骨，从而把南方古猿的分布扩展到了东非。

最近，玛丽·利基在这片堆积上重新开始了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她发现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人科化石，它可能与南方古猿有关。

后来利基一家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进行了驰名的研究工作。从 1955 年以来，他们发现了接近 70 件属于人科的标本，其中有些是很不平常的。

1964 年，R. 利基和 G. 艾萨克在纳特龙湖附近发现了一块南方古猿下颌骨，从而把坦桑尼亚的发掘地点增加到三个。从此，发现的地点向北移动。

1967年，一支国际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下游以西的古生物地点又开始了发掘工作。这个队有三个分队：一支是法国分队，由阿朗布尔教授和科彭斯教授领导；一支是美国分队，由克拉克·豪厄尔教授领导；另一支是肯尼亚分队，由 L. S. B. 利基及其儿子理查德领导。这些地点是法国旅行家本世纪初发现的，1932 年和 1933 年曾由阿朗布尔领导的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察队发掘过。在头一个月内，这支新的考察队就幸运地发现了这个地点的第一个南方古猿下颌骨。接着又有其他许多新发现：在九个季度的工作过程中，法国和美国分队发现了异常多的化石：大约 400 块人科化石。

肯尼亚分队于 1968 年离开奥莫，在 R. 利基领导下去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东岸进行勘查。在十个季度的工作过程中，这个分队收集了 100 多件人科化石碎块，其中有些是很重要的。

这时，哈佛大学的一支美国考察队在 B. 帕特森的领导下，在同一湖泊的西南岸，发掘了三个小地点，其中两个出土了人化石。

伦敦贝德福德学院的一个工作队发现了五个包含人类化石的地点。这个工作队的目的是测绘肯尼亚巴林戈湖盆地的地质图。

406

莫里斯·塔伊埃卜、伊夫·科彭斯和唐纳德·C. 约翰逊领导的国际考察队，到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地区的哈达尔进行考察，从1973年开始，在四个季度中发现了 300 多件古人类化石碎块，它们属于一个或两个人科类型，保存得异常好。随着这第一个考察队之后，阿法尔地区的第二个考察队收集了一个可以归属于猿人的头骨。

最后，于 1975 和 1976 年，让·夏瓦伊隆经过 9 年的辛勤发掘，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默勒卡孔图雷发现了三件有趣的化石碎块与奥杜瓦伊和阿舍利工业伴存。

所有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看，把南方古猿的分布局限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

年 代

在这些地点中，年代最早的是 900 万-1,200 万年前的恩戈罗拉，它位于肯尼亚的巴林戈湖盆地。迄今为止，只出土了一枚上臼齿，属于未鉴定的类型的人科。但是它使人们对未来的发掘抱很大希望。这枚臼齿象腊玛古猿的一样，是低冠的，但齿尖的构造象南方古猿

的，它可能是一种西瓦古猿。

在巴林戈盆地的卢凯诺的另一组堆积中也发现了一枚臼齿，年代在600万-650万年之间，这是一枚最后下臼齿，与南方古猿的很相似。

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西南的洛萨加姆，帕特森发现了一块破下颌骨，带着一枚牙齿，从其形状看，它可能是一种南方古猿。同时发现的有关的脊椎动物表明，它的时代为上新世，可追溯到500万-1,600万年前。

肯尼亚的其他两个地点(巴林戈湖盆地的切梅龙和图尔卡纳湖的卡那波伊)分别出土了一块人类颞骨和肱骨。

坦桑尼亚莱托利尔堆积的年代至少在350万年前。此地的人科化石与埃塞俄比亚阿法尔的哈达尔收集的标本非常相似，后者的时代在280万-320万年之间。

奥莫的各地点包括深度接近一英里的沉积层，其成分为一系列可以肯定年代的含化石沙层、粘土层和火山堆积。现已研究出，这些地层的底部的时代为400多万年前，顶部的时代不到100万年前。人类化石发现于320万年前的层位与顶部之间的一段堆积中，换句话说，持续达200多万年。

图尔卡纳湖以东出产人化石的各个遗址分布于300万－100万年前之间。

根据动物群的比较，最近估计出，南非最老的出产南方古猿化石的洞穴(马卡潘斯盖，斯泰克方丹)的年代在250万年到300多万年之间。但对年代的估计仍有很多争论。 407

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过人科化石，其活动性约为一百码厚的堆积物，其基底部的年代为180万年前。

南非的其他两个含南方古猿化石的洞穴，即斯瓦特克朗斯和克罗姆德赖，大约与奥杜瓦伊的最老的层位同一年代，甚至稍早(200万-250万年)。

最晚的南方古猿可能来自肯尼亚的巴林戈盆地的切索万贾和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还可能包括南非的塔翁角砾岩，这些地点几乎不超过100万年。

因此，南方古猿似乎出现于大约600万-700万年前，消失于大约100万年前。那末这些地点给我们提供了些什么呢？有几类人科化石，其中有些是同时的。有一类叫做南方古猿粗壮种或傍人或东非人。另一类叫做南方古猿纤细种或南方古猿本身，或迩人或副南方古猿。还有一个第三类叫做能人或南方古猿能干种，第四类叫做直立人或远人或魁梧猿人。

南方古猿粗壮种

这个种发现于南非的洞穴中，时代从200万到250万年前，还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以东的奥杜瓦伊，时代大约在180万年前，还发现于切索万贾，时代在110万年前。它被称为粗壮种，是因为事实上它比其他种大而壮。

头骨的形状适应一套有力的咀嚼装置，臼齿和前臼齿很大。有一个强壮的下颌，为咀嚼配备了很发达的肌肉，一对有力的颧弓⑨和一条为颞肌所附着的显著的矢状嵴。⑩没有前额。面部高且扁平，前齿小，以便向侧方的咀嚼运动。因此下颌附着部很高，以增强咬

⑨ 颧弓是头骨上联结前额和面部的骨。

⑩ 矢状嵴是在头骨顶部的一条骨性增生，形成一条形似钢盔上的嵴。

肌和翼肌的咀嚼运动。

身体比南方古猿的其他种强壮。约有1.5米高，其重量估计约在36-66公斤之间。

它并不完全适应于用两脚行走：股骨上的突起小，股骨颈长。

408 斯瓦特克朗斯和奥杜瓦伊的化石的脑量估计约为530毫升，小脑的发育值得注意，它可能表示对运动(例如操作和行动)的控制有所增强。

南方古猿纤细种得自南非的马卡潘斯盖和斯泰克方丹，还被认为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坦桑尼亚的加鲁西或莱托利尔和肯尼亚的洛萨加姆发现过。

据说，其身高刚超过1.2米，体重在略低于18公斤到略高于32公斤之间。

面部比南方古猿粗壮种突出。眉嵴⑪很发达，支撑一个比较发达的前额。

门齿呈杓状，位置垂直。犬齿小，与门齿相似。两侧颊齿向后张开，形成抛物线状的齿弓。颊齿大，齿尖圆钝，釉质厚，直接向下磨耗。

即使这种南方古猿比南方古猿粗壮种的食物更多样化，它必然基本上仍是吃植物的。其下颌骨和釉质的厚度，牙齿向下磨耗到齿龈，面部短缩，前臼齿和臼齿较大，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一个强有力的咀嚼系统。

牙齿萌出较晚。这一点与较厚的釉质共同意味着，它们适应较长的青春期和较长的生命。

脑量从428到485毫升，这是南非类型的平均脑量。

长骨，特别是肱骨和肩胛骨，使人想起在树枝间摆荡的祖先。但是南方古猿纤细种是一种经常两脚行走的动物。

1964年，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曾有人描述过能人，埃塞俄比亚的奥莫，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以东和卡那波伊可能也遇到过。

颊齿比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纤细种的标本平扁，也较长，较窄。

根据顶骨估计，能人脑量为680毫升，而图尔卡纳湖以东的一个头骨几乎有800毫升。

因此，牙齿和脑的进化趋势使它比南方古猿更接近我们。不管怎样，除了头骨以外，其余骨骼⑫都很象南方古猿纤细种，因为从锁骨特别看出，其祖先与南方古猿纤细种的祖先一样，是在树枝间摆荡的。

能人的身高估计约在1.2-1.4米之间。

409 **直立人**

最后，在南非的斯瓦特克朗斯(250万年前)，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150万年前)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以东(150万年前)，在埃塞俄比亚的默勒卡孔图雷、博德和奥莫(50万到150万年之间)，发掘者们发现他们叫做直立人的标本。这是在进化表上人科中比以前生活过的任何类型都更进步的类型。

1949年，布鲁姆和鲁宾逊在斯瓦特克朗斯分离出一些他们归为更近于人类的骨骼，称为远人。

---

⑪ 眉嵴是眼窝的骨性上缘。

⑫ 头后骨骼是一个术语，用以指减去头骨的整个骨架。

1957年，鲁宾逊认为应把它归属于猿人，并称之为直立人。

1969年，罗恩·克拉克、克拉克·豪厄尔和布雷恩拿起斯瓦特克朗斯的标本，注意到南方古猿粗壮种头骨SK 847号与远人的上颌完全符合。这种结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图景，证实鲁宾逊的假设：一个显著的眉嵴⑬的上方有后缩的前额，与南方古猿粗壮种缺乏前额的情况相对应；头骨有大的额窦；⑭眶后缩狭⑮很显著；鼻骨突出；齿弓短，说明有一个附着部低而垂直的小颌骨；最后，面骨的结构和牙齿使得这标本与人属接近，特别是与直立人接近。

在奥杜瓦伊，人化石13号的牙齿比能人小20%，下颌骨也较小。人化石16号有突出的眉嵴，利基和托拜厄斯认为，这是直立人。虽然这两个化石的情况还不肯定，但人化石13号却是肯定的，它无疑代表直立人的头盖骨。

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东发现的大量标本与人属的这个进步的种有关。特别是最近发现的三个不同时代的头骨很好地显示出这个种的进化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测定最古老的爪哇猿人，即在莫佐克托发现的小儿头骨的年代为190万年，但它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直立人还是可争论的。

托拜厄斯和孔尼华在剑桥大学比较了爪哇和坦桑尼亚的真化石，他们得出结论说，最早的能人在形态上与古爪哇魁人是相同的，也可能与中国的裴氏半人相同，最近发现的能人(人化石13号)在形态上与爪哇猿人IV号、桑古兰B和远人是相同的。 419

工 业

在灵长类历史上，第一次与人造物一起发现了这样一类化石。

1969年，法国考察队在奥莫地点发现了200多万年前的一些石器和骨器。第二年，肯尼亚考察队在图尔卡纳湖以东的一层200万年前的火山沉积中发现了数量相似的石器和骨器。1978年，法美考察队在奥莫发现了200多万年的相似的考古学遗物。在三年中，通过图尔卡纳湖更新世盆地的发现，第一批人工制作的工具被推前了250多万年，甚至可能300万年，因此，比以往知道的人工制造工具的时间增加了一百多万年。

世界上第一批人工制造的工具包括大量细心击破并利用其切边的破片，用以磨出尖头或磨锐边缘并加以改进的卵石以及用某种办法加工成各种形状或直接使用的骨头和牙齿，例如直接使用河马或猪科的犬齿。

这些工具可分成若干类型，每种类型有若干例子说明。这表明，其形状是仔细加工出来的，并且是事先想好的，这是一代传一代的经验的果实，说明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离工具的实际起源年代有250万年，而是说，我们正在接近了解产生工具的最近年代。再往前追溯，就不能与自然物相区别了。

在南非的马卡潘斯盖，已发现一种用骨、角和牙齿制造的工具的工业。由于其所用的

⑬ 当眉嵴为一骨性扩张超越时，叫做眶上圆枕。
⑭ 额窦是空腔。
⑮ 眼窝后方头骨缩狭，叫做眶后缩狭。

材料而被称为骨牙角工业。如果最近把南非洞穴与大量东非地点联系起来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这种工业也可能是很古老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认为，这与图尔卡纳湖盆地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是大量出土的，这说明，制造过程已不再处于早期阶段。

罗什最近在哈达尔发现了与奥杜瓦伊相似的一种成形的卵石的工业，其所在层位可能是 250 万年以前的。

在奥杜瓦伊最早的堆积(180 万年前)中，到处都可发现工具，数量多而且总是相同的。411 特别常见的卵石工具使这一工业博得"石器文化"的名称，它又叫奥杜瓦伊(由地名奥杜瓦伊而来)文化。

有一天，利基博士正在奥杜瓦伊的最古老地层工作，发现大量玄武岩卵石。在发掘工作进行时，他看到这些石头排成若干小堆，形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杂乱地散成一片。每一堆石头可能是用来作为柱子，插入地面。这使人联想到一圈柱子和柱与柱之间的兽皮或植物，人们自然会不由得看出这里是某种建筑物的遗址。因此，大约 200 万年前就有了居住的处所！

让・夏瓦伊隆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默勒卡孔图雷的最早的奥杜瓦伊文化层(150 万年前)中发现颇为相似的构造。他在遍地是工具的一个居住区当中，忽然发现一块直径约 2.5 米的圆形地面，其中没有任何工具，高出周围地面三分之一米左右，还有一条大约 1.8 米长的沟。几堆石头还说明那里有柱子。

有人提出，南方古猿粗壮种可能是南方古猿纤细种的雄性，能人是一种比南非发现的那种稍稍年轻但比较发达的南方古猿纤细种，斯瓦特克朗斯的远人或直立人可能来自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南方古猿粗壮种的变种的下限，古爪哇魁人是一种南方古猿；甚至提出，某些南方古猿(如奥杜瓦伊和斯瓦特克朗斯的)是猿人。

但从这种显然混乱的情况中，可得出一个清楚的论据，即在南方古猿分布地区内出现人属和精心制作的石器，而南方古猿区最初局限于东非和南非，随后(同样的或更进步的类型的南方古猿)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亚洲。

石器很快就成了制造者的标志，为了特殊的目的迅速发展了各类工具，工具制造代代相传。最后建筑了居住的处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种可以说是起源于非洲。

结 论

在一段漫长的历史的终端，人类就这样作为有朝一日改进了他已使用很久的工具的灵长类而出现了。精心制作的工具加上住所，突然呈现出一种会思考的人类，一种有远见的人类，他会教导，能传播，他创造了第一个社会并且赋予社会以最早的文化。

最近，有人提出，爪哇的某些人类化石的年代为 200 多万年。有时有人认为法国南部 412 若干地点的人类加工过的卵石也同样古老。但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来看，胜利属于非洲，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发现了大量而重要的早期证据。

好象在 600 万-700 万年前非洲大陆的东南部分出现了一群叫作南方猿的人科生物，在

250 万-300 万年前，从这一形态多样化的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生物，南方古猿本身，或者已经可以叫做人的那种生物，这种生物能变更石头和骨头的形状，能建筑茅屋，并能在小型社会生活。这种生物就这样以他的全部表现成了制造工具的人(确切地说)的起源。

最近 100 万年

在最近 100 万年中，诞生了智人，在最近几百年中有了惊人的繁殖。世界人口从 10 亿增加到 20 亿用了 115 年，在以后的 35 年中从 20 亿增加到 30 亿；在过去15年中从 30 亿增加到 40 亿，而且这种增加速度还在继续。

第二部分　考古学资料

L. 巴卢

史前学家探讨非洲的人类形成过程的问题，观点与古生物学家有些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人类形成过程就是大脑逐渐形成的过程，使人类为了自己进一步的发展想出并借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的技术，用各种有效的工具(从这个词的最广意义讲)装备自己，以便世世代代对自然环境产生累积的影响，足以打破各种各样的生物平衡。导致人类出现的古生物进化不允许我们指出人类形成过程有任何明确的门槛，因为一块被打碎的石头足以说明这个门槛已被跨过。德日进在一段名符其实的著名论断中说："人类无声无息地登场……事实上，他是如此静悄悄地前进，以致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注意到他在那里时，由于提供人类存在大量证据的永不消失的石器工具的显示……他已经遍布整个旧大陆了。"

史前学家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所缺少的真正一环不是南方古猿类与猿人类之间、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之间的中间类型，而是人工改形的石头和骨头与这些化石之间的东西。有人把史前工业绝对肯定地归之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智人，还有人不大肯定地把它归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看来史前工业，只能假定地被归于猿人类和南方古猿类。毫无疑问，这是这方面唯一可能的科学假设。但是与北京人伴生的工业不同于与其他猿人类一起发现的工业，而且与爪哇(爪哇猿人)、阿尔及利亚(阿特拉人)和东非的工业也都不同。至于南方古猿类，它们是不同成分组成的一个类群，仍然很难说其中哪一个成员是骨牙角文化和石器文化的可能的、甚至很可能的制造者。

然而，如果对古生物学家来说有一道人类形成过程的门槛，即瓦路瓦教授以 800 毫升脑量规定的脑界限，那末史前学家也有一个技术的门槛，这个门槛，一旦被跨过，就开辟了通向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之路。但是在我们能够确定这个门槛之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怎样跨过的？什么时候跨过的？第一个问题必需排除所有自然的原因并且通过工具鉴别人类的手艺。就第二个问题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年代学框架，使我们能够测定——在可接受的近似程度内——最古的人类活动证据的年代。

到现在为止，只有非洲对这两个问题提供了象是肯定的解答。

而且，由于普遍接受了一元发生论，或整个人种有一个共同起源的观点，目前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摇篮。这个有轮子的摇篮——步日耶神父这样称呼——如此长久地从帕米尔之巅到幼发拉底平原来回飞奔，后来暂时定居在东非，在那里，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切至少发生在300万年前。《旧约》、《创世记》把人间乐园伊甸置于花园和耕作的景色中。上帝让亚当过一种农业和畜牧的生活，这是在一个逐渐显示旧石器时代的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所有来自基督教《圣经》的年代学把创世的时间定在我们纪元前6484和3616年之间。近东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如果不是实际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形成的中心之一。但已不再可能把它称为人类的摇篮。

人类无声无息地登场，而且正是他磨制的石头在很久以后说明了他的存在。人种"在最初出现时并没有震动自然界……我们看到它作为种系出现了，正象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德日进）。因此，史前学家的责任是重大的，因为在鉴定人类活动的最早的可看得出的痕迹时，他做了古生物学家所无力做的事——他通过工具确定人类。

非洲史前学家必须先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工具是人类形成过程的真正标准吗？

（2）　工具能使我们确定人类形成过程的开端吗？

（3）　如果工具存留下来，能肯定地鉴定它们吗？

（1）　解决这一问题的资料主要来自非洲。步日耶神父曾被某些动物的行为所感动，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前告诉我，他怀疑，工具是否真能标志人类形成过程的门槛的跨越，拿艺术作为标准，是不是更妥些。这等于把人属的真正"智人种"，拉斯科的画家，我们的直接祖先，与一系列较早的勤劳的生物，即通常所说的"人属制作种"，区分开来。

414

正如蒂特里夫人指出的，使用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天然工具以外的工具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甚至不是一般灵长类所特有的。昆虫中的地蜂和工蚁，鸟类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鹫类、鸥、秃鹫、鹡鸰以及鸫、河狸和海獭、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都证明这一点。在灵长类中，黑猩猩最接近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黑猩猩使用工具和武器来防御蛇这一类的敌人，而且恐惧或防御反射将使它捡起树枝、木棍来挥舞。[16]从1964年到1968年，坦桑尼亚动物保护区也研究了这种已在动物园和其它豢养形式下观察到的行为。在那里，30多个黑猩猩形成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它们挑选细树枝，掘白蚂蚁，用树枝捅鸟巢找蛋吃或掏蜂蜜吃，用树叶舀树穴中的水喝，用树枝作钩子钩香蕉。它们用石头敲果实并且向上向下投掷石头（代替树枝）赶跑与它竞争的食肉动物。最后，他们用可听见的信号交换情况。对卢旺达的大猩猩也进行过相似的观察。[17]

因此，如果把工具看成是人类形成过程的一个标准，那末仅仅使用身体的"天然工具"以外的某种东西是不够的。必须对所使用的物体进行有意的改变，这是使我们可能对第三个问题（虽然不是对第二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一种概念。

（2）　工具不可能使我们确定人类形成过程的开端。首先，只有成为化石的骨头和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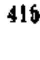
[16] 《当代人类学》，1967年6月。
[17] 国家地理学会，华盛顿，1971年10月。

流传了下来，无须特地去寻找很远的人种学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回想起，一群人完全可以从植物世界得到它的全部工具。典型的例子是安达曼群岛的门科皮斯人。但是它既可能证明同样又不能证明，在非洲高原的多树平原上，树木供给最早的人种以最初的工具。至于化石骨头和牙齿，达特把一种以骨、牙、角为基础的工业归之于德兰士瓦的南方古猿类，从而把它们的时代定得更早。他把这一工业称为骨牙角文化，而关于这一点，长期存在着争论。我们在后面还得谈到这一问题。在石器文化中，R.范里特·洛区别了破裂的卵石和修整过的卵石，其中第一类(仅仅被破碎的卵石)通常被人怀疑。的确，如果一块被人手拣起和掷出的卵石没有保留它被这样使用的可辨认的痕迹，这块破裂的卵石很可能只是天然产品。瀑布和波浪产生的石头是无法与人破开的石头进行区别的。假定的卡富工业经不起 415 这种仔细研究。

我所引证的德日进的部分原文存在若干巨大错误和严重遗漏。这段文章更完整的内容是："人类无声无息地登场……事实上，他是如此静悄悄地前进，以致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注意到他在那里时，由于提供人类存在的大量证据的永不消失的石器工具的显示，他已遍布从好望角到北京的整个旧大陆了。的确，他已经会说话并且过着群居生活。他已经造火。总之，这不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吗？每当某种新的生物从历史的深处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难道我们不知道它出现时已充分形成并且已形成大批大批的吗？"但是，会说话的人似乎实际上直到猿人时期才出现；而且在猿人之前，至少不在非洲，没有任何有关被错误地归于南方古猿普罗米修斯火种的可靠证据；而来自奥杜瓦伊的永不消失的石器工具肯定不能说明是一个开端。类型的繁多，数量的巨大以及制作时的精心、谨慎，只能说明一个过程的完成而不能说明它的开始。非洲的史前学家所需要的是奥杜瓦伊第1层之前的另外100万年，这是奥莫和科比富拉最近向他们提供的。而且即使那样也不能使我们满意！

（3） 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第三个问题，这就是在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工具中证明人类的意图。只有非洲为此提供了足够的丰富材料。有两个主要的探索领域——骨头和石头。

（a） 骨牙角工业。唐纳德·F.沃尔伯格在1970年2月的《当代人类学》上探讨了达特在1949年提出的假说。步日耶神父，在研究与周口店北京猿人一起发现的骨头时，曾首先推测，石器时代之前可能有一个骨器时代。据推测，旧石器时代之前有一个"前石器时代"。在1955年南非发现有关遗址以前，以及在1959-1960年(坦桑尼亚奥杜瓦伊)、1969年(埃塞俄比亚奥莫)和1971年(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前，没有与南方古猿类遗址共生的石器制作的证据。达特则提出了以骨、牙、角为基础的骨牙角文化。不幸的是，关于南非的南方古猿类，没有可靠的年代，不管是相对的或绝对的，虽然关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南方古猿类存在着可用的年表。从1949-1960年，达特坚持有骨器工业，他的论据基础是对狒狒和南方古猿类头骨进行过研究(采集马卡潘斯盖发现的骨头似乎是经过选择的而不是随便的，例如，股骨56件，肱骨336件)，另一基础是颈椎，而颈椎与牛头骨一起占全部采集品的56%。据达特说，在发现南方古猿类的洞穴的角砾岩中发现的动物骨头是一些废料即吃肉的狩猎者的厨房的碎片，狩猎者既然已能直立，就能用手挥动工具和武器。在考察50个狒狒头骨和6个南方古猿类头骨之后，达特宣布，80%是被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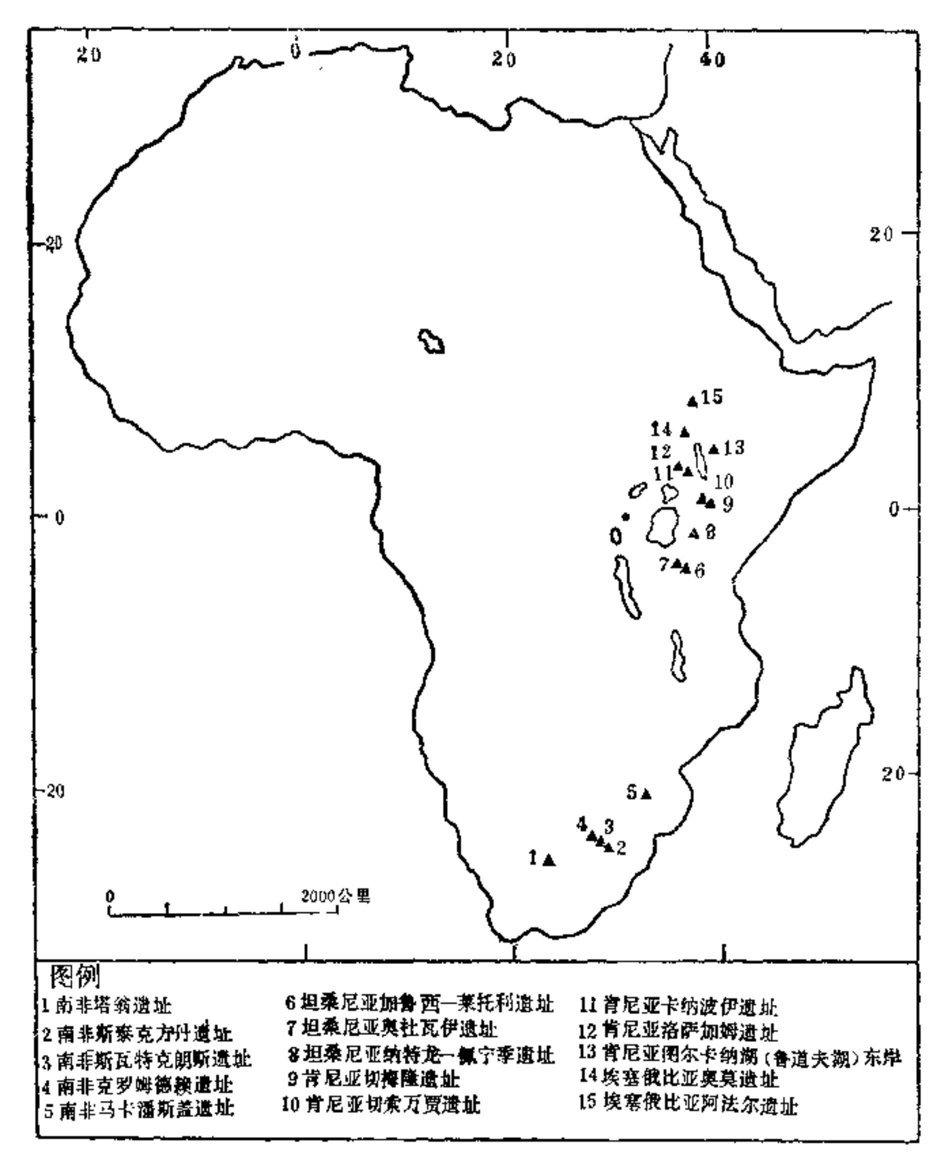


插图 17.1 古生物学资料

后遗留的伤痕。打击通常来自前面，并且有些打击是成双的，这说明所使用的武器是双头武器。在马卡潘斯盖，许多蹄类肱骨具有在石化之前已被磨损的痕迹，而其他的长骨是完整的，达特由此推断南方古猿类的典型武器是骨棒，更可能是有蹄类的肱骨。狩猎者还使用颌骨。肱骨或胫骨上的螺旋形裂纹被认为是由于扭转应力的作用并且还暗示了人类的手的作用。步日耶和德日进在谈到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时已提过这一点。因而，一件埋在一羚羊股骨中并被方解石固定在那里的石化的纤细羚羊角说明人类有某种活动，不管它是一件用于破开股骨的工具或是一件用股骨当把手的工具。对鬣狗头骨和插在脑壳和颧弓之间的羚羊跟骨也作了类似的解释。

所有这些都说明先有一个骨牙角文化阶段，首先是前石器时代，以后是旧石器时代，最初导致石器文化，随后导致手斧工业。这肯定将构成一种“文化工具活动”的开端。

这种理论必然引起关于哪一个是狩猎者和哪一个是被狩猎者的热烈争论。有些专家认为，所有这些骨头包括南方古猿类本身的骨头，只是食肉类动物狼吞虎咽遗留下来的残

余。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堆积在鬣狗窝中的废料，虽然这并不符合那种动物的习惯。还有人把它归之于豪猪。但是1955年以前，在马卡潘斯盖发现的7,159件碎骨片中，只有200件被啃过。况且，鬣狗生活在其他鬣狗的骨头的周围。里斯－武木时期的一个遗址显示，在130件动物标本中，110件是鬣狗的，而在马卡潘斯盖，433件标本中只有17件是鬣狗的。在南方古猿类洞穴中，在729枚单个牙齿中，有47枚是鬣狗的；在里斯－武木遗址中的1,100枚牙齿中鬣狗牙齿占了1,000枚。

但是，逐渐出现了一种有利于骨牙角工业的一致意见，虽然不影响将被看作是狩猎者的南方古猿类类型。这个理论得到了与南方古猿共存的石器工业的支持(斯泰克方丹，1955年)。但是决定性的证据来自玛丽·利基精辟描述的奥杜瓦伊的骨器工业。[19] 这一发现是无可争论的，它给被归于非洲、亚洲(周口店)和欧洲(例如托拉尔瓦和昂布罗奈)的猿人类的相似的工业铺平了道路。在整个史前时期，正象有一种石器工业一样，存在着一种骨器工业。骨器工业是更难分析的，但是同样是存在的。因此，即使还未证实有一个前石器阶段，也没有比非洲的更古老的地方。

(b) 石器工业。由于原始石器理论已被废弃，长期以来被称为石器文化的磨制过的卵石就成了最早被公认的石器工业。E. J. 韦兰1919年担任乌干达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曾在那里注意到1914年以前在锡兰发现的那种被击碎的卵石。1920年他发明了石器文化和卡富文化(后者来自卡富河一名)这两个术语，并且到1934年分了四个连续阶段。1936年韦兰建议，用奥杜瓦伊文化作为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进步石器文化的名称。1952年，范里特·洛试图第一次对石器文化进行技术和形态分类。但是，第一次对各种类型确定真正的定义是1944年H. 莫维尤斯在亚洲进行的，提出了砍砸工具和手斧等术语。这种看法逐渐被整个非洲史前学家——虽然不总是欧洲史前学家——所接受，这些人是阿尔及利亚的C. 阿朗布尔，摩洛哥的P. 比伯森，撒哈拉的H. 于戈，H. 阿利芒和J. 夏瓦伊隆，沙巴的莫特曼斯，等等。L. 拉曼多和P. 比伯森这样的专家提出了以击打技术为基础的形态分类。立刻出现了两件事：首先，石器文化太复杂了，其类型太多、太严格和太固定，以致不能代表石器工业的真正开端。其次，就其潜力而言，石器文化包含将导致非洲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典型两面器和手斧工业的一切可能性。我们只详细谈谈第一点。 418

由于石器文化的复杂性和它的分布情况，非洲史前学家希望建立一个比原年表更长的年表，建立那个年表本身曾费了不少精力，它给第四纪分配了100万年。用钾－氩法测定奥杜瓦伊工业的年代(第1层是185万到110万年)首先得到测定奥莫砍砸工具的年代(210万年和250万年之间)的支持，不久又得到测定图尔卡纳湖遗址的年代(260万年)的支持。但是，图尔卡纳湖遗址，虽然它确曾包含大量被击碎的卵石，但并不都属于石器文化。那是一种破片工业。1972年，其他破片，或许是不具有结论性的破片，发现了奥莫。因此人们可能纳闷，把卵石制成石器工具之前是不是就没有一段使用从大块原料上敲打下来的破片的时期。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后得到的解释可能是非自然的；如果加工痕迹不清楚，如果我们必须强调改进，我们再一次面临原始石器的老问题。

---

[19] 《奥杜瓦伊峡谷》，第3卷。

因此，除非人科介入，我们碰到的是不能说明的。但我们停在哪里呢？路易·利基已达到最大胆的界线，他把"敲击骨头的活动"归之于肯尼亚古猿，认为肯尼亚古猿使用过一块由于使用而被击残的熔岩和一根具有压陷的断骨的长骨。⑲

在这一点上，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骨器工业的问题和石器工业的问题成了一个问题。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技术的或形态的证据。人类活动没有典型标志。事实上，唯一肯定的论据是与肯尼亚古猿遗骸一起发现的石片，这种石片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即使排除了"造化的恶作剧"，也不排除某种前人类的人猿使用的可能性。我们已看到，已观察到的黑猩猩的行为可能有助于说明这种可能性。

对于非洲史前学家来说，骨头和石头工具证明了250万年前人类形成过程中脑子发展的进程。但那并不是它开始的时间。

词 汇 表

Abbevillian 阿布维尔文化：步日耶在法国北部索姆河谷的阿布维尔定名的工业复合物。它的特征是存在用硬石锤敲打以去掉大石片的两面器。这一复合物是在欧洲定名的，在欧洲，它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开始。又见舍利文化。

Acheulian 阿舍利文化：源于法国北部索姆河谷的圣·阿休尔。这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主要文化复合物，它从民德冰期持续到里斯－武木间冰期的结束。最典型的特征是一种比阿布维尔文化更规整而且是用木制或角制的软锤敲打的两面器。

Aeneolithic （来自拉丁文 *aeneus*：青铜，和希腊文 *lithos*：石）金石并用时代：最早使用铜的史前时期。

Amazonite 天河石：微斜长石的绿色变种。

Amirian 埃米尔：与欧洲民德时期同时的摩洛哥的大陆旋回。

Anfatian 安法蒂：源于摩洛哥的安法。摩洛哥的第三次第四纪海侵。

Aterian 阿特利文化：源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比尔阿特。北非莫斯特文化与卡普萨文化之间的旧石器工业。它包括带柄脚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少量树叶形尖状器。阿特利文化的发展贯穿于武木时期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部分地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

Atlanthropus 阿特拉猿人：C. 阿朗布尔在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因遗址定名的古人类群的化石。化石的年代为早更新世的末期。

Augite 辉石：构成玄武岩组成部分的钙、镁和铁的天然硅酸盐。

Aurignacian 欧里尼亚文化：源于法国加龙河上游的欧里尼亚克。始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开端的史前工业。这个名字是H. 步日耶和E. 卡泰哈1906年创立的，用以标示年代上处于莫斯特文化与佩里戈尔文化之间的工业。工业的特点是用驯鹿角做的矛头，厚刮削器，修成扁平的长石叶以及一些刻刀－齿刀。这是最早出现艺术作品的证据，它包括粗糙的小型动物雕像和在石灰岩块上刻划的简单符号。其年代约为3万年前。

⑲ L.S.B.利基(L. S. B. Leakey)，1968年。

Australopithecus （出自拉丁文 *australis*：南方的，和希腊文 *pithêkos*：猿）南方古猿：达特1924年创立的属名，以标示南非发现的若干显示猿猴特征但又预示人的某些性状的化石。后来东非和南非也有类似的发现。

Basalt 玄武岩：一种火山岩。

Biface 两面器：从两面敲击使其成为杏仁形状的石器。最初这工具被称为“砍砸器”，后来被称为“手斧”，似乎是被用来切割的，其次是用于刮削。它们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典型工具。

Breccia 角砾石：普通石头被石灰等胶结在一起而形成的岩石。

Calabrian 卡拉布里：源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是M.吉纽1910年鉴定的海相第四纪的最早阶段。

Calcite 方解石：在白垩、白大理石、石灰岩、雪花石膏中发现的一种天然结晶碳酸钙。

Capsian 卡普萨文化：源于突尼斯南部的卡普萨，卡普萨是加夫萨的拉丁名字。J.德摩根鉴定的非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是与大量细石器和小厚石锥一起发现的，这些石器很可能被用于在鸵鸟蛋皮碎块上钻孔以制造项链。年代约为11,000年前。

Carnelian 光玉髓：红色玉髓。

Catarrhines 狭鼻类：旧大陆猴，有32枚牙齿和窄鼻中隔。

Cenozoic 新生代：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同义词，从6,500万年前的始新世开始，接着是渐新世(4,000万年前)，中新世(2,500万年前)，上新世(1,100万年前)，更新世，以及全新世时期。

Cercopithecus （源于希腊文 *kerkos*：尾，和 *pithêkos*：猴）长尾猴：一种非洲长尾猴。

Chadanthropus (*Chad man*)乍得人：从解剖来看，位于南方古猿和猿人阶段之间的人科化石。

Chalcedony 玉髓：由石英和蛋白石组成的二氧化硅的纤维状变种。

Chellean 舍利文化：源于法国谢勒。G.德莫尔蒂耶描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工业复合物。阿布维尔文化的旧名。

Clactonian 克拉克顿文化：源于英国的克拉克顿。1932年步日耶描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工业，其特征是具有光滑而宽阔的打击面的燧石石片。看来，克拉克顿文化与阿舍利文化同时。 421

Cleaver 手锛：大的石片工具，具有一个由打击两个相对的面而产生的锐利切刃。这是非洲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也发现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若干遗址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的工业中。

Diabase 辉绿岩：辉长岩和闪光岩族的岩石，常呈绿色。

Diorite 闪长岩：一种粗粒状的岩石。

Discoid 盘状器：在两个刃上削的阿舍利文化晚期的盘状石器。

Dolerite 粗玄岩：辉长岩族的岩石，构成它的矿物，用肉眼可见。

Eocene 始新世：第三纪的第一个时期，年代为6,500万到4,500万年前。

Epidote 绿帘石：水化铝、钙和铁构成的天然硅酸盐。

Fauresmith 福尔史密斯文化：南非奥兰治自由邦的地名。石器工业包括单刃修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手斧和小斧，相当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Galena 方铅矿：天然的铅硫化物。

Gamblian 甘布勒：在肯尼亚的纳库鲁湖，奈瓦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附近确定的非洲第四河蚀旋回。与武木时期同时，但这一名词已不再使用。

Günz 贡兹：源于德国一条河流的名字。最早的第四纪阿尔卑斯冰川。

Haematite 赤铁矿：天然氧化铁。

Handaxe 手斧：在两侧刃缘修整成杏仁形状的石器，用于挖掘和剥皮。同义词是两面器。

Harounian 哈朗尼：大西洋摩洛哥的第四次第四纪海侵。

Holocene 全新世：始于1万年前的第四纪的最近一个时期。

Hominid 人科：以化石和现代人为代表的高等灵长类的动物学上的一个科。

Homo 人属：动物分类中给予化石和现代人的属名。

Homo faber 人属制作种："制造工具的人"。

Homo habilis 能人：利基、托拜厄斯和内皮尔创立的名字，用以表示解剖进化程度处于南方古猿类和猿人类的中间的化石。

422 *Homo sapiens* 智人：1735年C.林奈创立的名字，现用以表示人的现代类型或新人类型、依靠智力他已达到适应环境的状态，从而使他能自由地思想和反省。

Ibero-Maurusian 伊比利亚－毛鲁西亚：马格里布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复合物，其发展标志是细石器数量的大量增加，从12,000年前持续到7,000年前。

Jadeite 硬玉，翡翠：天然钠的铝－硅酸盐，含有少量的钙、镁和铁。

Jasper 碧玉：不纯的玉髓，通常具有红色的脉或斑点。

Kafuan 卡富文化：源于乌干达的卡富河。东非旧石器时代初期开端的工业复合物，其特征是已被粗粗敲打过但未修整的扁平石。关于它是不是人的起源，还有争论。

Kageran 卡格拉：源于坦桑尼亚的卡格拉河。是韦兰于1934年鉴定的非洲第一雨期。与阿尔卑斯的贡兹冰期同时。这一名词已不再使用。

Kamasian 卡马西亚：源于肯尼亚的卡马西亚。非洲第二雨期，通称卡马西亚I。与欧洲的民德冰期同时，但这名词已很少使用。

Kanjeran 坎杰拉：源于肯尼亚的坎杰拉。是L. S. B.利基确定的非洲第三雨期。通称为卡马西亚II。它相当于阿尔卑斯的里斯冰川时期，但这名词已不再使用。

Lapis Lazuli 杂青金石：镶嵌工艺品的蓝青金石，粉末被用于深蓝色的染色。

Laterite （出自拉丁文*Later*：砖）红土：富于氧化铁和氧化铝的鲜红色或红褐色土，由于热气候中的过滤而形成。

Levallois （technigue）勒瓦卢瓦（技术）：源于法国的勒瓦卢瓦－佩雷。一种石器制作

技术，可以从一个预制的石核上得到具有预定形状的大石片。

Levalloisian 勒瓦卢瓦文化：1931 年，H.步日耶确定的工业复合物，其特征是利用勒瓦卢瓦型石核打出的石片，很少或不继续修整。它不再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工业。

Lupemban 卢彭巴文化：源于扎伊尔开赛的卢彭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复合物，其特征是同时有粗大的敲打石器（大尖状器和凿）和两缘修整的叶形尖器，年代起于我们纪元前约 8,000 年。

Lydianite 试金石：变硬的页岩。

Maarifian 马阿里弗：源于摩洛哥的马阿里弗。大西洋摩洛哥的第二次第四纪海侵。

Magosian 马戈西文化：源于乌干达的马戈西。1926年，韦兰发现的石器工业，位于甘布勒和马卡利亚之间，兼有石核、盘状器、尖状器、两缘修整的叶片这类具有莫斯特文化形式的器物和几何形细石器。 423

Makalian 马卡利亚：源于肯尼亚的马卡利亚河。南部非洲第四纪的湿润期，与欧洲的冰后期同时。这个名词已不再使用。

Malachite 孔雀石：绿色的天然碱式碳酸铜。

Mazzerian 麦哲：撒哈拉沙漠的第一次雨期，等同于卡格拉。

Mesolithic （出自希腊文 *mesos*：在……之中，和*lithos*：石）中石器时代：长期以来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可能位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复合物。现在它们更多地指后期的石器时代阶段。

Micoque 米科克：位于法国中部萨尔拉西北 25 公里、莱塞济北面的一个史前遗址，这里产生了米科克文化的工业，是阿舍利文化的一种非常进步的类型，与武木冰期同时。

Mindel （民德）：巴伐利亚河流名称。阿尔卑斯第四纪冰川的第二个冰期，看来在 30 万和 40 万年前之间。

Miocene （源于希腊文 *meiôn*：较少的，和 *Kainos*：新近的）中新世：换句话说，它包括的近代类型动物比它以后的一个时期所包括的少。它是第三纪中的一个时期，在 2,500 万和 1,000 万年前之间。

Moulouyan 穆卢雅：源于摩洛哥的穆卢雅河谷。比伯森使用的术语。摩洛哥的维拉弗朗中期。

Mousterian 莫斯特文化：源于法国多尔多涅流域的穆斯捷。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史前工业，广泛分布于最后间冰期的后半期。是 1865 年拉蒂特鉴定的，其特征是仅从一面修整石片得到的大量尖状器和刮削器。

Nakuran 纳库鲁：根据肯尼亚纳库鲁湖 102 米以下滨线沉积物的堆积确定的湿润期。这些堆积层出现了 3,000 年前左右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风格的工业。

Neanderthal 尼安德特人：源于德国迪塞尔盆地的河谷名字，1856 年富尔罗特博士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标本。这是生活在西欧晚更新世的人属的一个特别类群的代表，没有留下后裔而突然消失。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源于希腊文 *neos*：新的，和 *lithos*：石）从事食物生产（农业，畜牧业）的石器时代。1865 年 J. 卢伯克创立的名词。

Obsidian 黑曜岩：类似暗色玻璃的致密玻璃质的火山岩。

424 *Oldowan* 奥杜瓦伊文化：源于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1911年卡特温凯尔发现的古代石器工业复合物(石器工具)。是利基鉴别了奥杜瓦伊文化 1 的十一个层位的复合物，相当于旧舍利文化，而奥杜瓦伊文化 XI 相当于阿舍利文化 VI，具有勒瓦卢瓦文化的工具。

Oligocene 渐新世：第三纪的第二个时期，从4,500万到 2,500 万年前。

Osteodontokeratic 骨牙角文化：以骨（希腊文 *osteon*)、牙(希腊文 *odous, odontos*)和角(希腊文 *Reras,Reratos*)为基础的史前工业，是达特在南非的马卡潘斯盖发现的。

Ougartian I 乌加尔特 *I*：撒哈拉沙漠的第二雨期，等同于卡马西亚。

Ougartian II 乌加尔特 *II*：撒哈拉沙漠的第三雨期，等同于坎杰拉。

Palaeolithic （出自希腊文 *paleos*：旧时的，和 *lithos*：石)，旧石器时代：用来表示没有食物生产的石器时代的名词。1865 年 J. 卢伯克创立的术语。

Palaeozoic 古生代：第一纪的同义词。

Paranthropus 傍人：1948 年在德兰士瓦的克罗姆德赖的上新世－更新世堆积中发现的粗壮南方古猿＝东非人＝副南方古猿。这一古代类型显示了许多猿猴的特征，但是，特别在其牙齿结构上，具有使它更靠近人而不是靠近类人猿的特征。

Pebble Culture 石器文化：已知最古老的石器制造工业，基本上由卵石组成，在卵石上通过打掉一个或更多的石片形成一个切割刃缘。

Pithecanthropus (Monkey-man)猿人：显示了相当接近现代人而被归入人属的特征的一种化石，同时显示了代表其他种属的不同特征。第一件标本是 E. 杜波依斯 1889 年在爪哇发现的。属于直立人种。

Platyrrhines 阔鼻类：具有 36 枚牙齿和宽鼻中隔的新大陆猿。

Pleistocene （出自希腊文 *pleistos*：更、多，和 *kainos* 新近的）更新世：第四纪时期中的——地质上的再分部分，包括第四纪时期的开始和大部分。这个名词是 C.莱尔 1839 年创立的，相当于第四纪大冰川时期并且先于距今 1 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时期。

Pliocene 上新世：第三纪的晚期，始于 550 万年前，结束于 180 万年前。

Pongid 猿科：以猩猩为典型代表的类人猿科，也包括大猩猩、长臂猿和黑猩猩。

Pre-Cambrian 前寒武纪：最古老的地质构造。它从地球形成(估计年代为 40 亿年前)开始一直到第一纪（5 亿年前)。

425 *Pre-Soltanian* 前佐尔丹：相当于里斯阶段结束而先于佐尔丹(源于达累斯佐尔丹)的摩洛哥的大陆时期。

Ramapithecus; Ramapithecus wickeri 腊玛古猿；腊玛古猿威克种，可能是人科祖先的中新世的杂食灵长类，年代为 1,200 万－1,400 万年前。发现于印度北部的锡瓦利克山。其他标本已在中国、土耳其、非洲（特南堡）和欧洲(奥地利、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和西班牙)发现。

Riss 里斯：巴伐利亚河流名称。阿尔卑斯第四纪冰期中的倒数第二个冰期，在 20 万和 12 万年前之间。

Songoan 桑戈文化：乌干达维多利亚湖的桑戈湾的桑戈遗址。是1920年韦兰发现的石器复合物，其特征是有用勒瓦卢瓦技术生产的成片器物，粗大的尖状器，两面器以及原始石核斧子。这个遗址在卡马西亚与甘布勒之间的时期。

Saourian 萨乌里：源于萨乌拉，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中的旱谷。撒哈拉沙漠的第四雨期，等同于甘布勒。

Serpentine 蛇汶岩：水化的镁硅酸盐。

Shale 页岩：易于分成薄片的叶状硅-铝沉积岩。

Sinanthropus （出自拉丁文*sinensis*：中国的，和希腊文*anthrôpos*：人）中国猿人：显示了相当接近于现代人可以归于人属的特征，同时显示了代表其他种属不同的特征。1921年到1939年，裴文中、M.步达生、T.德日进神父和F.魏敦瑞主持了北京西南周口店遗址的工作。属于直立人种。

Solutrian 梭鲁特文化：源于法国的索恩-卢瓦尔的索吕特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工业，其特征是有非常薄的燧石石叶。典型工具的出现是由于这一事实：工具是通过平面平行修整过程成形的，修整是在这件工具的两面进行的。

Stillbay 斯蒂尔贝文化：源于南非开普省的斯蒂尔湾。这个石器工业有很多在两缘修整的树叶形石片，使人联想起法国梭鲁特文化的桂叶形石器。与甘布勒同时。

Tektite 熔融石：富于硅石和矾土的天然玻璃，很可能起源于陨石。

Telanthropus 远人：949年布鲁姆和鲁宾逊给他们在南非斯瓦特克朗斯堆积中发现的两件颌骨破片的属名，具有使人联想某些原人类型的形态。

Tensiftian 坦西夫特：源于摩洛哥西部的坦西夫特旱谷。摩洛哥的大陆阶段，相当于里斯冰期的第一部分。

Tschitolian 奇托洛：为说明在扎伊尔开赛的奇托洛发现的石器复合物而创立的名词 这是一种后旧石器时代的工业复合物，其特征是不断有大工具(虽然尺寸比卢彭巴文化的小)以及大量两面修整的箭头。 426

Tuff 凝灰岩：轻、软而多孔的火山岩。

Villafrancian 维拉弗朗阶：源于意大利皮埃蒙特的阿斯蒂自由镇。相当于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间过渡的沉积构成。

Wilton 威尔顿文化：源于南非开普省西部的威尔顿遗址。约15,000年前的石器工业，包括小型穹棱形刮削器，"新月形"和梯形细石器，石锥和带齿形边缘的石片。这是一种时代较晚的文化，一直持续到铁的传入。

Würm 武木：源于巴伐利亚-湖泊和河流的名称。阿尔卑斯第四纪冰川中的最晚的冰期，始于我们纪元前75,000年，结束于我们纪元前1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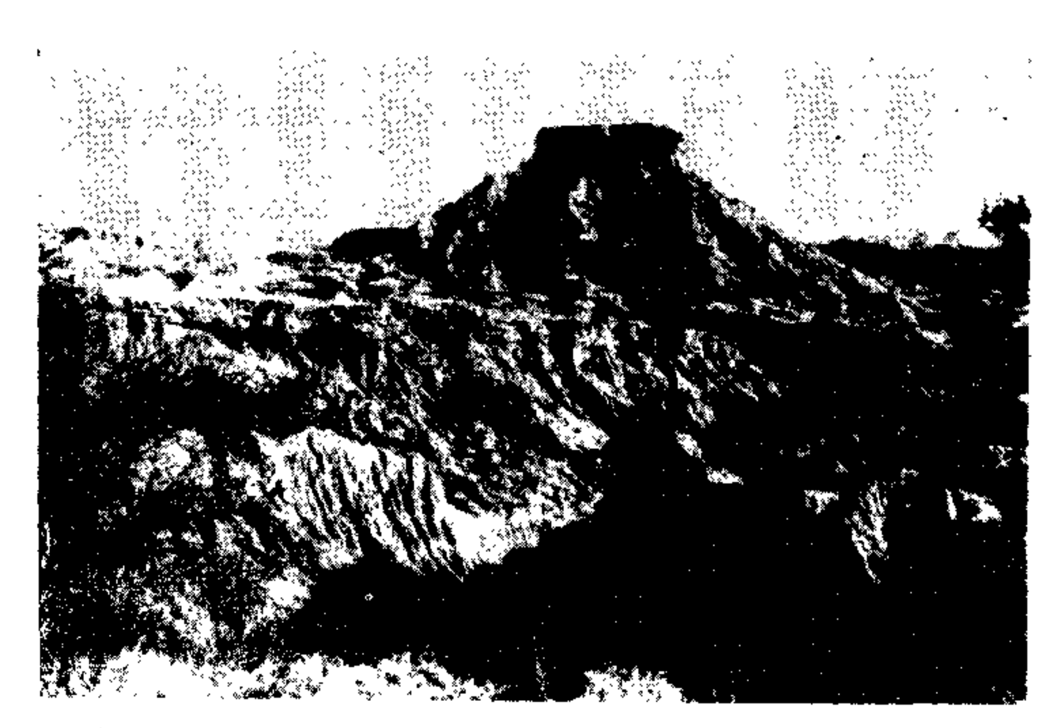
（吴新智 林圣龙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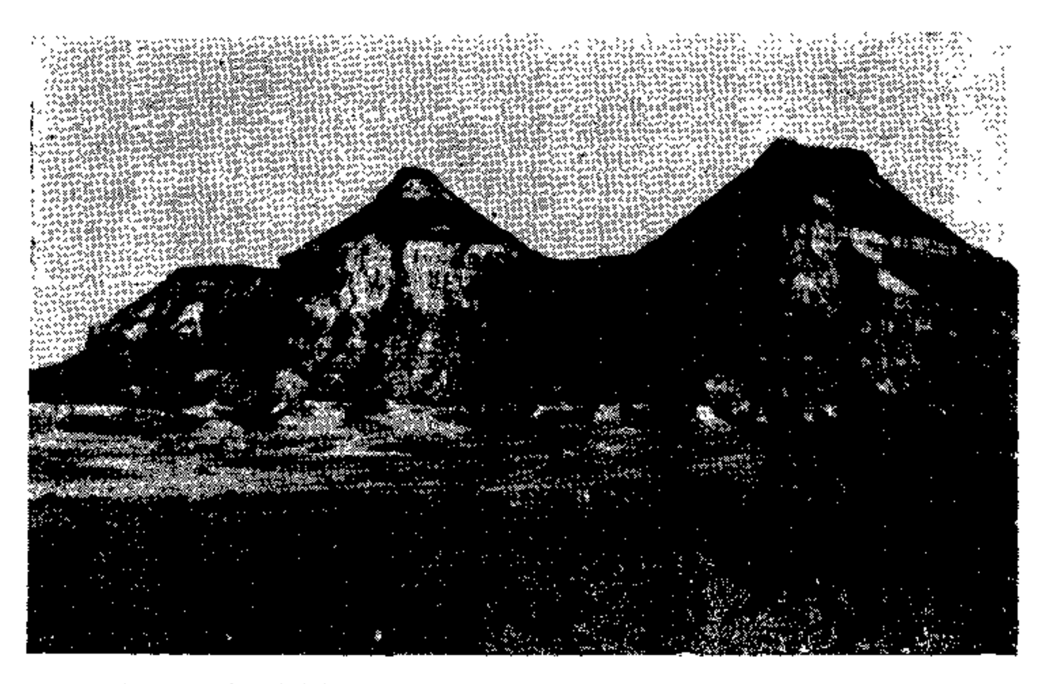
427

照片 17.1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制品之一，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奥莫遗址；J.夏瓦伊隆主持发掘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 17.2　巴基斯坦北部锡瓦利克发掘现场；是 D.皮尔比姆主持发掘的 (H.托马斯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428



照片 17.3 埃及法尤姆始新世和渐新世遗址(E.西蒙斯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 17.4 四千万年前法尤姆环境复原图。盖拉德和伯顿辛绘(人类博物馆藏品)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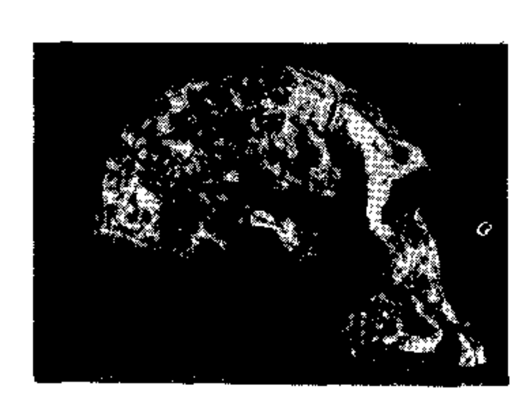
照片 17.5 南方古猿粗壮种头骨(右)；南方古猿纤细种头骨(左)(J.鲁宾逊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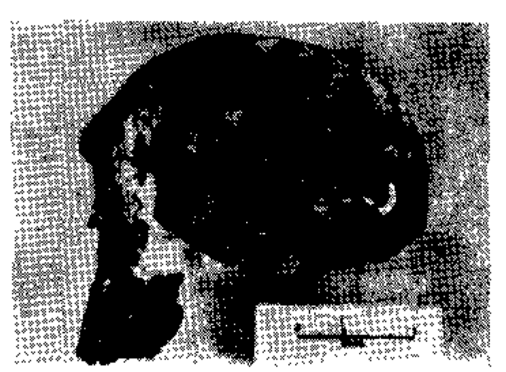




照片 17.6 南方古猿鲍氏种头骨，埃塞俄比亚奥莫遗址；Y.科彭斯主持发掘的(J.奥斯特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430





照片 17.7 能人头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照片17.8a 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复原)(J.奥斯特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8b 直立人头骨（见图17.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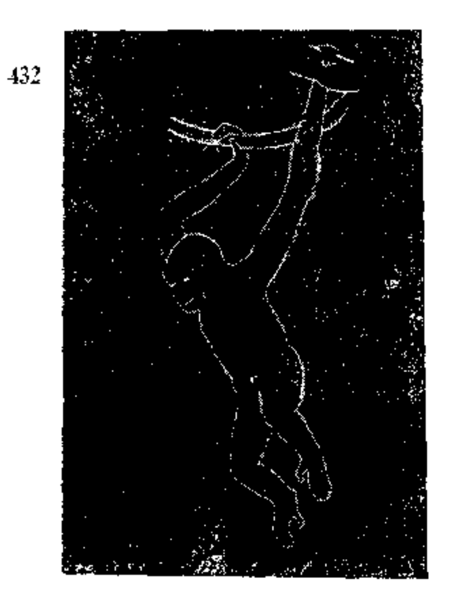


照片17.9 中国周口店直立人生活环境复原图(4,000万年前)。盖拉德和伯顿辛绘(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10 南方古猿非洲种头骨——右：幼儿(塔翁，博茨瓦纳)，左：成年人(斯泰克方丹，德兰士瓦)(Y.科彭斯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432



照片17.11　山猿班博利种复原图



照片17.12　山猿班博利种的骨架，1,200万年前，1958年约翰内斯·许尔策勒在托斯卡纳的格罗塞托遗址发现(J.奥斯特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13　阿尔及利亚阿法卢的克鲁马农类型头骨(J.奥斯特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14　腊玛古猿头骨复原图（J.奥斯特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433



照片17.15　埃塞俄比亚阿法尔遗址；M.塔伊埃卜，Y.科彭斯和D.C.约翰逊领导的考察队供稿(M.塔伊埃卜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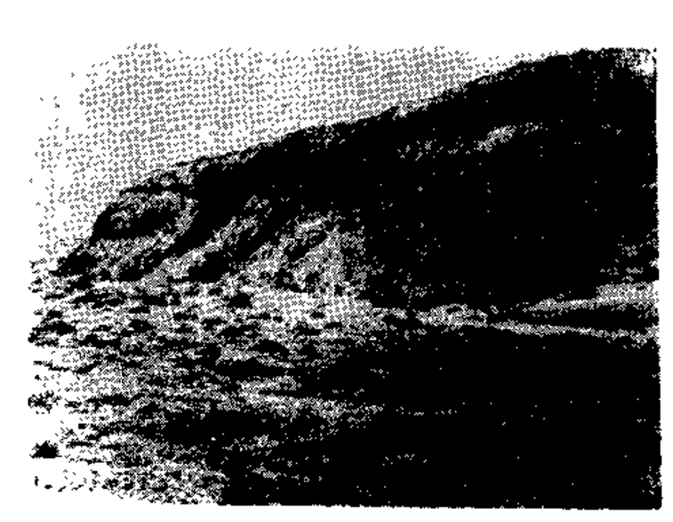
照片 17.16　奥莫遗址和1969年Y.科彭斯领导的法国考察队发掘的古生物（Y.科彭斯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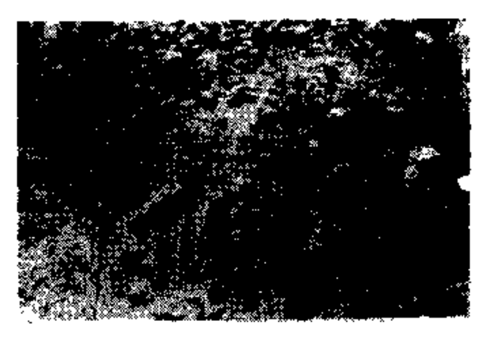
435 照片17.17 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L.利基和M.利基主持发掘的(Y.科彭斯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18 在奥杜瓦伊发掘的遗址(J.夏瓦伊隆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照片17.19 在奥杜瓦伊发掘的地表面详图(J.夏瓦伊隆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436



照片17.20 在奥杜瓦伊发掘的地表面近貌：可看到河马骨头和若干多面体石核(J.夏瓦伊隆摄，人类博物馆藏品)

18 非洲化石人类

R. 利基

非洲，人类的摇篮

关于进化的研究，查尔斯·达尔文是第一个发表重要科学论述的科学家，关于人的祖先，他提出了一些见解。达尔文最早指出，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地，而且近百年的研究已证明，他是何等正确。达尔文的开拓性工作的许多方面已被证实，因此，把进化只看成是一种理论，已不再是实际的了。

人类在非洲发展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但近十年来，可用来研究和解释人类发展的化石标本已大大增加。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非洲是最早出现人类的大陆，而且后来作为人类技术适应性的组成部分，还发展了二足直立行走的步态。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何种过程才能如此适应环境的，人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人类的进化期是很长的，而事实上，人类进化的许多阶段很可能没有化石标本作为代表，因为化石标本只能在十分特定条件下才能形成。

形成化石，必须具备一定的地质条件，沉积物是快速沉积的，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能使其发生矿物取代情况。如此形成的化石深深埋在堆积物中，除了大自然通过侵蚀和地壳运动来发挥作用以外，也许永远不会被现代人所发现。侵蚀和地壳运动所暴露的化石地点是不多的，虽然每年都报道发现了新的化石地点，但大部分非洲地区将永远不会提出人类出现的化石证据。

说明非洲某些地区为何有那么丰富的史前证据，这是很有意义的。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非洲有种种不同的栖息地。非洲大陆广阔无垠，它跨越赤道并延至南北两个温带地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气候是多种多样的，但非洲赤道地区有大面积的高原地区。地块从海岸线通过一系列高原地带而隆起，直到山脉和顶峰，尽管气候相当干燥和炎热，但在一些山顶仍然有积雪。

这些高低不等的高地提供了不同的环境，因为当海拔高度增加时，气候就逐渐变凉。这些因素在非洲总是存在的，由于气候肯定发生变化，所以非洲似乎总有适合栖息的地方。当某一区域的气候太热或太冷时，就可迁徙到更合适的环境去。相反，在世界温带地区，冰川期中寒冷气候条件的出现会使广阔的地带被冰封冻，因此除了少数特殊地区外，对生命是不适宜的。



插图 18.1 非洲重要的人科遗址

439 有人认为，北半球的冰期与非洲的湿润期有关，因为那里的湖泊水面似乎有较大的变动，它反映雨量的变化。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虽然冰川向前推进时可能对气候产生全球性影响，然而似乎不可能有特殊关系①。尽管这样，在被称为更新世的时期，非洲湖泊的沉积物的累积证实了：在那个时期，非洲曾有较大的雨量。

沉积物的这种快速堆积是很重要的。在非洲更新世时期，许多湖泊又小又浅，这可能是季节性的，每年水面高度有所变动，这反映了热带气候的模式，一年中有几个月雨量很大，其余月份则干旱无雨。这些湖泊有利于沉积物的堆积，浅湖每年洪水泛滥，使沉积物延伸到平坦湖岸和支流河口，在水位高时便溢出河岸。在湖岸附近，不管什么原因致死的动物的遗骸，经常被埋在洪水期沉积的砂土和淤泥中。这个过程连续几百万年，动物遗骸被埋在最后可超过 500 米的沉积物的不同层位的堆积物中。

由于湖泊淤塞和降雨模式的变化，某些湖泊干涸，而一些新的湖泊却形成了。化石形成的过程虽然是缓慢的，但更新世持续 200 多万年，在这漫长的时期及其前后时期，动物遗骸不断被埋进适于形成化石的沉积物中。

确定这些遗骸的地点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当然是个重大的问题，但在非洲，特别是东

① 见前面第十七章。

非，又有各种因素有助于减轻寻找这种地点的困难。在更新世时期，特别是该期的后期，东非经历了一次与地壳薄弱环节(今天被称为大裂谷)伴生的地壳运动的时期。这些地壳运动引起了断层并在许多地方造成沉积物的地块上升。后来的侵蚀暴露了形成化石的地层，而寻找化石的工作通常是集中在其沉积物构造已经断裂而暴露为崎岖陆地的古代湖泊盆地。

也有一些例外，从非洲南部收集的大量人类化石就是这种例外的情况。这些化石是在石灰岩洞穴中形成的，在那里，骨头被埋在洞穴填充物、塌陷的洞穴填充物和坍塌的洞顶之中。这些骨头是由若干种动物带进洞穴的，大多数可能是吃腐肉的和食肉的动物，例如豹子和鬣狗。某些证据表明，早期人类也住在洞穴里，因此，后来形成化石的某些骨头碎片是由他们所造成的。这种洞穴遗址的问题是，实际上没有详细的分层，因此，难以决定所发现的化石的相对年代。 440

在更新世期间，非洲的许多地区的条件不适于动物遗骸化石。因此，虽然非洲大部分地区可能没有早期人类存在的证据，但也没有理由认为，早期人类没有在非洲大陆广泛分布过。继续寻找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遗址。

比化石遗骸更普遍的是石器。这些石器一般更有耐久性，不必迅速地埋在适当的沉积物中也能保存下来。因此，考古学家积累了非洲早期人类技术方面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向我们说明了人类出现的大量情况。

人，或更准确地说人属，可以被认为是能制造石器的唯一动物，象研究人类起源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见解。

人类起源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多学科的研究——不只是研究化石骨头。地质学、古生态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都很重要，而在人类已开始使用人工制品以后的阶段，考古学就成为主要的了。研究生存的灵长类包括人，对于更全面地了解本星球的史前史，常常是有用的。

人科化石可以说与猿科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从目前追溯到1,400多万年以前的中新世时期。有关人类的最早的证据是不完全的，我们对于人在1,400万年前和300多万年前之间的发展情况的了解还存在着一大段空白。正是在这个时期，似乎开始了适应期的最后阶段，因为我们已认识了500万年前再向前的若干化石人科类型。

有时我们对人类以外的动物群的化石记录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有更完整的材料。这种记录是很重要的，而且有可能使我们重构早期进化时期的古代人科生态学。适应性的重大变化可能是人对影响环境的灾变事件的一种反应。已有迹象表明，许多动物经受急剧变化有几个重要时期，可以推测这种变化是对环境压力的一种反应。

已可看出，人类在具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脑子和二足完全直立行走以前，曾经历过不同阶段。在某一时期，都存在一种以上的人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似乎都代表一种特殊的适应性。从很早的类似类人猿的中新世人科类型的种种变化，都必然反映出某种特殊化或适应性，而我们所关心的是了解这些变化的本质。虽然现有的证据远不完全，但复杂情况的某些细节，我们是知道的。这里我们将首先研究最近的化石，然后逐步追溯到最古老的化石。 441

现代人和智人

字典对人下的典型定义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人、人种、成年男人、单个的人(男人)”。定义的问题之一是，现代人也许是已知的最多样化的物种。世界各地现有的居民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行为的和体质的——有待于记录。这些差异起重要作用吗？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是重要的，但本文的目的是要强调这样一点：尽管存在这些表面的差别，但今天的人属于一个物种，所有的人有着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早期发展史。可能只是在过去几千年中，人才受到表面差别的影响，我们期望这种认识将加速人对他的共同特性和共同目的的承认。

人属于智人种，因而今天能生存在十分不同的栖息地。在各种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能居住在不同的栖息地，是由于技术引起的行为的变化。拥挤繁闹的城镇生活与游牧民在沙漠牧养骆驼的生活形成对比，正如此二者与非洲西部雨林深处的猎人生活形成对比一样。人能在海面下潜水艇中生活很长时期，而且能在太空飞行舱中绕地球轨道运行。在每种情况下，关键都在于通过技术而取得适应。一个大而复杂的脑子和一双摆脱一切机动职能而充分进行操作的双手，是基本的体质条件。证明发达的脑子、能操作的双手和二足行走的证据，在时间上与人的技术活动的经久成分一样，可追溯到很远的过去。在追溯人类起源时，脑子的发育、熟练技能和二足行走的程度，很可能是最好的标尺。

在非洲已有若干重要发现，说明原始智人在该大陆已存在10万多年。此外还有各种迹象表明，智人在非洲存在的时间象在其他地方一样长，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为最早的记录得到一个精确的年代，这个年代可能是接近20万年以前。

1921年，在赞比亚的布罗肯希尔发现了一个头骨和一些体骨，因为这个国家以前被称为北罗得西亚，所以标本被称为罗得西亚人或罗得西亚智人种。他的时代曾被推测在35,000年左右以前，该标本无疑是在人种的范畴内。这批重要的化石的时代也许更早一些，但不可能测定头骨本身的年代。它与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材料近似，非常可能是这个多形种的非洲标本。智人的更早一些的证据已在东非发现。

1932年，已故L.S.B.利基博士从肯尼亚西部一个叫作坎杰拉的遗址中发现了两块残破头骨。化石看来与中更新世晚期的化石动物群有关，这意味着时代接近20万年。遗憾的是，这个遗址的年代至今尚未精确地测出，这两块残破的头骨和一块残缺的大腿骨好象是智人种的样本，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已知的这个物种在非洲最早的证据。

442

1967年，从埃塞俄比亚西南的奥莫河谷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两个人的部分化石，这批标本包括一个不完整的头骨，一部分残缺的体骨以及第二个头骨。这两个人的化石大概都是从10万年稍多一点的地层中发现的。奥莫河谷的化石地点可能因为有较早的化石而著名，但在那里有相当广阔的近代沉积，这些沉积物使非洲拥有更丰富的早期智人的线索和材料。此外，在同一地区，还报道过，一些遗址曾发现早期陶器，鉴于奥莫和尼罗河体系之间的史前联系，进一步的工作可能会研究出有关早期使用陶器的更多资料。

尽管早期智人化石的标本还很贫乏，但仍可合理地设想这个物种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

方都有广泛的分布。

智人以前

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早期物种与现代物种有关，但这只能是一种广泛的一般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智人的起源是在一个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谱系之内。在不同的时间内，这个谱系内可能存在若干形态的独特模式，而现代人的遗传学构成必然部分地反映遗传下来的各种不同因素。

命名化石物种是不容易的，常常由于需要给某一特定的标本定名而引起混乱。一般的做法是把相似的标本归入一个物种，次要的差异提供区别物种的基础，而主要的差异则是区别属的基础。古生物学家的问题是考虑一段时期内影响某个可能经历过迅速的适应过程的特定物种的进化上的变化。因此，形态种这个术语将被用于描述体质特征相同的化石。这里应该指出，与人类起源研究有关的争论，主要是使用术语时的不同观点引起的。

在过去300万年的化石记录中，人科至少有两个属和若干个种已被鉴定，而这些类型是了解智人种起源的基础。直到最近为止，人们认为进化的速度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看来，某一物种的地区性居群可能对自然选择的压力有不同的反应。显然，原始的类型可能与先进的或进步的类型发现于同一时代。鉴定长期有记录的某一物种的原始特征不象鉴定有限样本的原始特征那么困难。有可能辨认一些趋势和适应性，这些趋势和适应性有助于解释经过改进而生存下来的过程。 443

非洲的人类化石记录表明有两个主要的特征组。可以把这两个组看作两条发展线或两个进化系统，其中以人属为代表的一个系统能追溯到今天，以南方古猿属为代表的另一系统，显然在大约100万年以前已渐趋灭绝。

还可以认为，原始类型被发现于较新的沉积物中，在这些沉积物中没有发现过以前从较早的沉积物中发现的更先进的类型。可以认为，这是退化的证据，但更有可能的是，一个进步物种的后裔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标本。这只是因为在它的居住区域里，遗骸没有形成化石被保存下来。

为了达到本章的目的，我们想在两个谱系的基础上考虑智人以前的人。由于化石证据非常零碎，所以不容易辨认两个谱系的祖先类型。最早的非洲人科证据是在肯尼亚的特南堡发现的，在那里发现若干上颌碎片、下颌的一部分和一些牙齿碎块。该遗址的时代为1,400万年。化石证据表明，那时的人科和猿科已有区别。在特南堡发现的牙齿碎块表明，作为人科鉴定性特征的退化的犬齿已从典型的猿类状态前进了一步。

1,400万年和3,500万年之间的化石记录是很不完全的，因为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标本只有4件。1932年，已故L.S.B.利基博士在肯尼亚卡纳姆发现一块相当破碎的下颌骨残片，另一个附有一枚牙齿的下颌骨是在肯尼亚的洛萨加姆找到的，而一枚单独的臼齿是在肯尼亚的恩戈罗拉获得的。前三件标本是从400万年和550万年之间的沉积物中发现的，而那枚单独的牙齿被认为是从900万年的沉积物中找到的。由于这些标本太破碎，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清楚地得到解释。在洛萨加姆发现的下颌骨残片与南方古猿有关，然而，许多

人类学家认为，在这个阶段作出任何肯定的结论都是不妥当的。

来自上新世初的化石人科遗骸的标本则比较丰富，从400万年左右以前到智人最初出现的这段时间，非洲具有关于人类进化的重要材料。从1973年以来，在两个地点进行了444 新的工作，从300万年和400万年之间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化石。莱托利尔(坦桑尼亚)和哈达尔(埃塞俄比亚)这两个遗址在人属最早记录的化石证据方面值得专门加以论述。

莱托利尔遗址位于著名的奥杜瓦伊峡谷南面大约50公里、俯视埃亚西湖北端的莱马格鲁特山的山坡上。这个地点的年代大约是350万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人们认为，这里发现的早期人科的各种化石属于人属的范畴。化石材料包括上下颌骨、牙齿以及少量肢骨。

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哈达尔遗址的年代与上述地点的年代几乎相同或稍晚一些。从1973年以来，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材料，其中包括极好的头骨和体骨标本。在这个遗址中，与能人、南方古猿纤细种和南方古猿粗壮种有关联的三种类型之间的差别均可分辨。

实际上我们对350万年以前的早期人科类型一无所知，因为已发现的那些化石并没有对人属或南方古猿属的起源提供任何重要的答案，然而在300万年和100万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具有相当丰富的非洲化石记录。

从不到300万年的遗址中发现的比较多的标本材料表明，早期人科有两个不同的属，他们经常住在一个地区。人属和南方古猿属这两个类型，大概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虽然他们的自然地区可能重叠，但为了食物而进行的竞争显然还不足以使一类排斥另一类。目前已证实这两个属共同存在了150多万年，并确定了两个属的差异，但关于每个人科的适应性，还有大量情况有待了解。

南方古猿属是人属的祖先吗？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肯定的，然而，由于有了新的材料，答案就不再是肯定的了，某些工作者(包括本文作者)倾向于认为，这两种类型有一个与两者都有区别的共同祖先。为了证实这样一个论点，有必要通过他们的特殊适应性来研究这两个属并考虑每一组群适应性的变化速度(如果有这种变化的话)。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必须清楚地确定每个类型的鉴定性特征和长期一致性的特征。

最后，我们还可指出，某些研究人员把所有这些化石归纳到同一个属，他们认为这个属能表示重要的属内变异和显著的雌雄差异。

人属(智人以前)：直立人

人们最熟悉的智人以前的人属类型是分布很广的，形态多种多样，被称为直立人。这445 个人种最初是根据远东和中国遗址所发掘的材料而确认的。但在比较近的年代里，北非和东非也许还有南部非洲，也发现了相同的类型。虽然已发表了某些材料的推测性年代，但亚洲标本都没有可靠的测定年代，直立人似乎都出自150万年和50万年之间的遗址中。北非出土的直立人遗址的时代也是推断出来的，所用的是中更新世这类术语。东非的材料是从可以测定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其中最早的标本估计是160多万年前的。东非的这种

类型有古老的记录，这表明他们是起源于非洲的。许多学者接受了这一论点，即非洲以外大陆的直立人居群是在早更新世时期起源于非洲的迁移居群。然而，爪哇直立人有许多极早的新的年代测定。

目前，还没有丰富的材料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但是，有充分的资料表明，这个物种不仅在非洲广泛分布，而且在亚洲和欧洲也有。肢骨的材料说明直立人已适应两腿跨步的姿势，在特征上与现代人的那种姿势是接近的。智力发育的程度可根据测定颅容量(脑颅的容量)粗略估计。从已知的材料来看，直立人颅容量约为750毫升到1,000毫升，而智人的平均颅容量则大得多，为1,400毫升。

直立人使用的技术可根据其遗物来推断。看来直立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制工具，他们作为猎人或采集者生活在非洲的辽阔草原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手斧或阿舍利工业与直立人有联系；这种石器工业类型是很特别的，非洲和欧洲的遗址中都有，亚洲则比较少见。究竟直立人是否是导向智人的发展的最后阶段，还不能肯定，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在得到关于这个人种的进一步资料之前，不对这个问题下结论。

在结束直立人的问题之前，应该扼要地讨论一下这个人种的特征。头骨最富于供鉴定的特征：粗壮突出的眉嵴，低窄的前额和头骨后部的形状。牙齿虽然可供鉴别，但人属系统内的不同形态种可能有非常相似的牙齿形态。同样，下颌的形态可能不象目前想象的那样明显，事实上，只包括牙齿和上下颌的某些称之为直立人的标本，可能代表同一属内的不同形态种。

人属(智人以前)：能人

446

属于人属系统、但又有自己特点并出现得比直立人还早的材料，只在东非发现过。最早的类型是从哈达尔和莱托利尔遗址中发现的。这种类型还有待于详细研究，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类型是以后物种的祖先。中间的物种，如果确定是中间物种的话，或许可以称之为能人，其依据是从奥杜瓦伊得到的以及最近从图尔卡纳湖东侧的科比富拉得到的材料。

能人的主要特征是有较大的脑子，颅容量超过750毫升，头骨薄而呈高拱形，眶后收缩程度最小。前面的牙齿比较大，臼齿和前臼齿是中等大小的，而下颌的外面有加固物。体骨的形态特征与现代人非常相似。

能人的最好标本是从科比富拉找到的，已知的有若干头骨标本、一些下颌骨和肢骨。最完整的头骨被称之为KNM-ER 1470(照片18.4)。

南方古猿属

为南方古猿属下物种定义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而我认为，在科比富拉地层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能有信心地确立这个属具有两个种的证据。最明显的就是南方古猿鲍氏种，它是很独特的，其特征是：极粗壮的下颌骨，臼齿和前臼齿比前面的牙齿大，颅容量小于500毫升，头骨表面特征表明雌雄两性差异显著，例如雄性头骨的矢状嵴和项嵴(照片

18.1)。已知的体骨，如股骨、肱骨和距骨也是很独特的。这个广泛分布的种在其他地点也有过报道，例如在东非南裂谷的切索万贾、佩宁季和奥杜瓦伊峡谷。鲍氏种是否够得上作为一个种，要重新考虑，也许应该象南方古猿粗壮种南非类型的一个同类群一样，降格为一个亚种。如果我们打算解决这种经常与古脊椎动物学方面的改进分类有关的问题，就必须掌握更多的材料。因此，把两个密切联系的但在空间上却是分开的粗壮种保留下来，在目前似乎是可取的。

东非的南方古猿纤细型的情况是不那么肯定的。但是假如全部材料都包括在一个种内，那末，变异的程度似乎就太大了。东非最好的纤细型标本是从科比富拉地层中找到的——OH_5(照片18.1)。各种不同的下颌骨和某些体骨也可能包括在内，但同时必须记住，对下颌骨分类是困难的。至今还没有为东非化石进行这样的分类提出详细的建议，然而典型的特征应该包括带有较小颊齿的纤细下颌骨、颅容量600毫升或不到600毫升，以及罕见的或不存在的矢状嵴。虽然体骨比南方古猿鲍氏种的小些也不那么粗壮，但形态上仿佛与鲍氏种相似。在这两个种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股骨的连接部分：长长的股骨颈从前向后挤压，股骨头小，近似球形。还有一些其他特征，但关于变异情况，则了解得很少，目前这类标本还不太多。

447

我认为这个种与南非纤细的南方古猿非洲种有密切关系；也许是那个种的一个比较靠近北方的同类群。南非的非洲种和粗壮种都有髋骨，并且已注意到，在两个类型之间有细微的差异。东非没有可归属于南方古猿的髋骨，但有两件时代相同的人属髋骨，这些髋骨说明，此二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面这些差异大于可以合理期望在空间分布广泛的单一物种内的差异。

工具和居住地

给人印象最深的工具和居住遗址的记录来自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埃塞俄比亚的默勒卡孔图雷和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在过去30年中，在这些地方发掘了许多地点。从简单的石器工具到复杂而精致的两面手斧的进步过程，这个区域具有可靠的证据。据此还可以推论从群体意义上讲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的规模和狩猎的偏爱。在奥杜瓦伊的一个地点发现了石头建筑的遗物——可能是环形窝棚的地基；这个遗址的精确年代为180万年。在默勒卡孔图雷发现了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也是圆形的。确切指出这种技术能力的开始时间，是很困难的，最多也只能推测，它出现在上新世，也许与人属分化过程中所具备的适应性反应有关。

在早更新世，大约160万年以前，两面工具，如粗制的手斧，已经出世。其发展过程可追溯到奥杜瓦伊原地，并可用其他的东非遗址的发现物证实。到不久以前为止，欧洲最早发现的石器是手斧。我认为，现有的证据可以说明，使用手斧的人在早更新世或更早一些时间就从非洲迁移到欧洲和亚洲。后来的石器发展是复杂的，在世界大部地区有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虽然尚未证实，但我们可以假设，阿舍利文化以后的技术或手斧技术与智人的出现有关。早期人科遗体与石器共存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而许多中更新世或中

更新世以后的遗址，除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例外，只有一两件标本。

很明显，在最近几年，这方面记录的资料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继续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许会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现在有明显的证据证明，非洲上新/更新世的人科在形态上有相当大的变异，这是上新世具有延续到早更新世的不同进化趋势的不同造成的。根据头骨和体骨材料可以证实，东非至少有三个同时代的物种，而对这些类型所作的任何回顾必须把所有的化石分析结合起来。

表格 18.1 非洲直立人材料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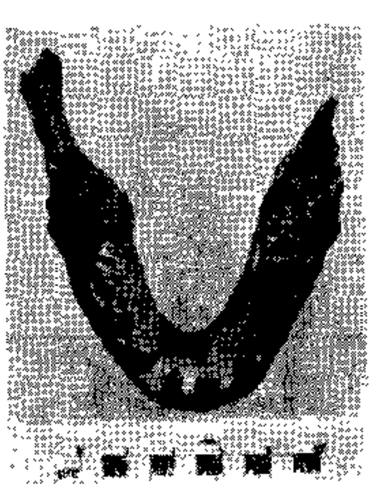
地区	国家	遗址	标本情况
西北	阿尔及利亚	突尼芬	3 块下颌骨和头骨残片
西北	摩洛哥	西迪阿布德拉曼	2 块下颌骨残片
西北	摩洛哥	拉巴特	下颌骨残片和头骨
西北	摩洛哥	泰马赖	下颌骨
东	坦桑尼亚	奥杜瓦伊	头骨，一些体骨和一个可能的下颌骨
南	南非	斯瓦特克朗斯	一个不完整的头骨和一些下颌残片

（吴茂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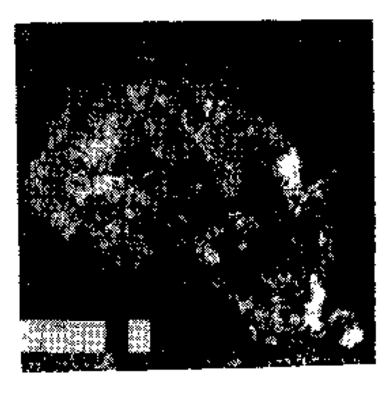
449



照片18.1　南方古猿鲍氏种，头骨侧面观，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OH_5）（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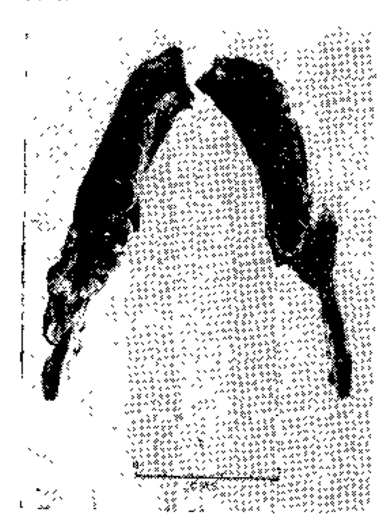


照片18.2　南方古猿鲍氏种，下颌骨咬面观，肯尼亚科比富拉（KNM-ER 729）（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照片18.3　南方古猿非洲种，头骨侧面观，肯尼亚科比富拉（KNM-ER 1813）（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照片18.4　南方古猿非洲种，下颌骨咬面观，肯尼亚科比富拉（KNM-ER 992）（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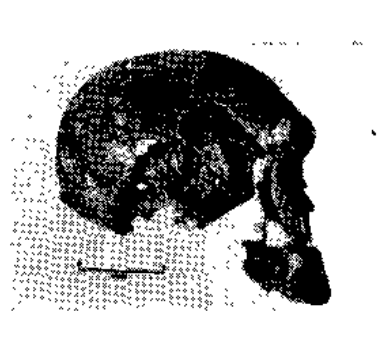


450

照片18.5　直立人，头骨侧面观，肯尼亚科比富拉（KNM-ER 3733）（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照片18.6　能人，头骨侧面观，肯尼亚科比富拉（KNM-ER 1470）（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19 东非史前史

452

J. E. G. 萨顿

史前史研究：方法论引言

大约在300万年以前，人类已作为一种直立的、制造工具的动物出现在非洲的东部。因此，世界这一地区的历史比其它地方长，尤其是东非的石器时代比其它大陆和非洲的其它部分延续得更长。从第一批原始人作为一种正常活动开始用石头制作具有特定形状和式样而可以认为是工具的时候起，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由于有了制造工具的能力，换言之，由于有了这种体力与智力的结合而增进了肌体的能力，以及由于对于生理之外的即文化上的能力和活动的日益依赖，终于使人类得以区别于其它动物而具有了人类的特性。人类进化成为一种能够站立和用双脚行走的在地面生活的动物(不同于类人猿、猴子和其它四足动物或灵长类动物)后，通过解放双臂和双手，获得了拿取、搬运、紧握和操作等活动能力，因而促进了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且，对于人类在世界上战胜各种障碍而继续生存，尤其是为了取得和制作食物，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活动。每一代新生的人都必须学会他们父母积累下来的文化上和技术上的各种技能与知识。现在，很可能人们仍然无从了解人类最早制作的那些工具，因为那些工具很粗陋，或是与天然的物体很少区别，以致不能辨认。已经腐烂而无从稽考的其它物质，如木头、皮革和骨头，也可能至少象石头一样早地被利用过和加工过。(但是，在人类掌握了基本的技能、能够用另一块石头或合适的硬物对选好的石块进行精确的敲击和破碎以制造出锋利而实用的切割工具之前，对其它材料的使用肯定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因此，工具的制造——和人类的形成——可能是在我们所掌握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说明出现这些关键性发展的年代以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证据包括最初的可辨认的石器；我们应当认为这就是为了方便起见而称之为石器时代的开端。

这一石器时代从大约300万年以前一直延续到人类历史的近期阶段，即石头被金属代替作为基本材料发展技术、制造工具和制出有锋利刃口的器具的时期。从石头(或石器的)技术到金属技术的这种转变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时间略有不同。在西亚，制铜技术始于6,000到9,000年以前。在东非，铁(第一种也是唯一经常使用的金属)大约在2,000年以前已被制造了。 453

人们可能怀疑，“石器时代”这个术语对于下述这样一个时期来说是否真正合宜，这个

表格 19.1 非洲史前时期和工业：相对名称表

由H.J.于戈绘制

	马格里布	东　非	西撒哈拉	南撒哈拉	工　业	相应水平的英国考古学对等时期	欧　洲
更新世	西部(地区)	马卡利亚洪积期	现在 吉尔	现在 沙漠化再次洪积期	金属时代 新石器时代	晚期石器时代	现在 冰期后
更新世晚期	佐尔丹	后甘布勒干旱期 甘布勒洪积期	佐尔丹	干旱期 最后大湖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阿特利文化 莫斯特文化	第二中间期 中期石器时代	武木冰期 里斯－武木(间冰期)
更新世中期	坦西夫特 埃米尔 萨里特	后坎杰拉干旱期 坎杰拉洪积期 后卡马西亚干旱期 卡马西亚	乌加尔特 塔乌里特	干旱期 大湖 撒哈拉	有两面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	第一中间期 早期石器时代	里斯 民德　里斯 民德 贡兹－民德间冰期
更新世早期	穆卢扬	后卡格拉干旱期 卡格拉	穆卢扬		有卵石文化的旧石器时代前早期	(更早期石器时代)	贡兹 多瑙－贡兹 多瑙

时期约占人类在东非生活的漫长时期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而且，这个时期人类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经济或文化方面。可能有人会争议说，从时间方面说，石器时代太久远了，从文化方面说，局限性太大了。然而，对于这种异议是可以作出回答的，只要对某些事情有共同的理解，石器时代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仍然是有用的。对于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仅凭考古学证据（大多数是石头制品）才有所了解，由于这个既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流传至今的任何口头传说的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东西，实际上只有这些石头制品，因此选择这么一个反映其主要特征的名称，是合理的。

石器时代不是一个静止的时期。技术上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演变，是很容易根据各种石制工具的变化和多样化，根据其效能及制造方法来加以证明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年代和地域把石器时代再划分为若干时期。观测所收集的石器（如果巧妙地加以选择和陈列）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事，但是，除非按照年代和发展顺序来安排，否则，它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如"生活在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的人类"，如果他们是以人类及其生活方式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一直保持不变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为根据的话，那同样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石器时代人群的工具随着时期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人群本身在文化上和身体上也是发展的。在石器时代跟随着由考古学所揭示证明的技术上的不断进步，人类在体格和大脑方面，在经济、社会组织和文化方面都有变化和演变。在这里要提出的另一种看法是，虽然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变化用现代标准来衡量是很缓慢的，但在更早的时期，这种变化是最慢的。愈接近现今时代，变化就愈快。后期出现了区域性的专门化和多样化，这意味着在一个区域内慢慢发展起来的特点，可能通过人群的迁徙，或通过文化上的来往，以其特殊形式不时地被带进另一个区域。这样一来，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发生了变革的错觉。所以，就发展的意义来说，在石器时代终结时的两三代人的时间可能比得上早期的 50 万年。

因此，对石器时代的研究并非只涉及石头或石器。考古学家偶尔幸运地发掘出其它东西。这些东西通常出现在属于石器时代结束时期的一些现存的遗址上，在那里可能以炉边的木炭碎片和动物碎骨形式保存下来关于烧食物吃的直接证据。在非洲，早期的有机体遗物是非常罕见的，但有几个遗址例外，在那里，有利的成矿条件使骨头在腐烂之前形成了化石。但就是在只有石头可供研究的地方，考古学家也应设法根据他的证据作出较广泛的推论，对更广大的地区作出较广泛的解释。 454

首先，重要的不是所发现的个别工具，而是可以从一个遗址发掘出的各种成套工具，即工具系列，不管这个遗址可能是一个群体生活的地方，或是一个临时的狩猎宿营地，还是一个制造工具的工场。通常，比成品工具更常见得多的是一些废石片和石核（制造时从原料上敲打下来的石屑和块石，以及无用的剩余物）；这些东西需要拿来同制好的实际工具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因为它们表明了制造技术和技能水平。同时，这些废物品并不都是被丢弃的；尤其在石器时代的早期年代，许多这类石片往往都有刀一般锋利的刃口，如果它们的大小与形状便于使用，则可能是笨重成品工具的补充，因而构成了工具系列的基本部分。仅仅搜集和研究一些洋洋大观的成品手斧和砍砸器，会使人对史前人群的技术和活动得出一种极有限的和大大歪曲了的印象。到石器时代晚期，手斧类重型石核工具让位于较

小的、较细致的和较精密的石器，这些石器的用途常常是装到木棒或骨柄上，是用石核经过熟练加工制成的，或是对敲落的石片或石叶进行复杂的再加工制成的。在这里把成品物件连同废料尽可能完整地组合起来，对于分析和推论都是同等重要的。

带有各式各样刃口和用来进行切、削、剥、刮、钻孔、开槽、敲击、砍、挖的尖头石器系列（在解释实际用途和使用时甚至允许有某些明显的疑点），将使人联想到那个社区还可能有着用易腐烂的动植物材料制作的其它工具。例如，由这些工具可以联想到制取动物皮，刮去油脂、晒干、打软后，这些动物皮就可能割成皮绳和皮带。在捕捉、杀死动物和剥制动物皮时，以及在制备皮革和制作皮绳和皮带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各种石头工具、木质工具和其它武器。很可能把皮绳和皮带同石头工具结合起来，用来捆缚打猎用的投掷器，或者利用树胶把一块石叶或一尖状器牢牢地固定在一木制矛或箭杆的端头上。除了这种武器外，根据对石器时代末期发现的石制物的研究，重现这种普通的组合工具是有可能的，组合工具是巧妙地固定并粘到木制和骨制棒柄上的精制的小石片和石叶，虽然木头和骨头部件的直接证据很少见。但即使在更早的时候，在木制工具和石制工具并不联结到一起从而比较笨拙之时，它们依然是相互配合使用的。譬如，一根矛竿会不会用石刀切成所需要的长度，暂且不说，但它肯定需要用石刮器、整修器或皮带和植物纤维进行修平或打磨，才适合紧握和投掷。此外，制作长矛的尖端可能需要锋利的石头工具，随后可能还要用火锻烧，使其变硬，正如已发现的标本所显示的那样。在石器时代晚期，能否成功地把石头尖状器装接在木矛柄上取决于用精细工具进行细致的切削和开槽。

455

这些例子说明，对石器进行聪明而富于想象力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使这些石器不再是死物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活物。也许还可以把木头和兽皮的用途的论点扩大到帐篷和防风篱上面。在这里，就象刚才讨论的工具和武器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经超出对技术的研究，进而对发现的证据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作出更广泛的说明，从而重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不同狩猎部落和天然食物采集部落的生活情况。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在整个石器时代，大多数工具，甚至石头工具，都不是武器。虽然狩猎一向是获取蛋白质食物的主要手段（在鱼类丰富和捕鱼手段人人皆晓的地方除外），但植物食品的采集，尤其是挖掘含淀粉的块根和块茎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提供了大部分食物。大部分工具的用途是进行这些活动，以及用于一般家务活动和木头加工。由于运水困难或无法运水，宿营地的选择受到很大限制。一个家族群的季节性宿营地往往不得不靠近河流或湖泊。自然，这样的地点具有丰富的植物和各种食物，因而猎物也更多一些。

对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技术的研究，只要具有一般的知识和想象力，就能据而想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但不能否认，即使在东非石器时代的最晚期，借以考证的遗物也是极其罕见的，如试图作更广泛的解释，那必然是推测性的。的确，人们不应进行漫无边际的理论性推测。但在承认上述看法后，悲叹缺乏遗物是无用的：倒是需要敏锐地和富有想象力地面对已有的东西，以便看看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推断出何种事实和设想。因此，人们正努力想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寻找新的证据。本章其余部分讨论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料并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在某些早期遗址上偶尔发现过一些已成化石的动物骨头，在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区，特别是在岩石隐蔽所下面还发现过一些未曾变为化石的食物骨头。这就提供了当时被猎食的动物类型的直接证据。有时，对有工具痕迹的骨头及其碎片，甚至对碎片的形状和散布形式进行仔细观察，都可能揭示出动物被屠宰和被烧食的方法。但甚至这种直接的证据也只能说明一部分情况。举例来说，小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鸟类和昆虫都可能被捕捉过，但没有它们的痕迹，这是因为它们的骨头或坚硬部分质地太脆而未保存下来，或者是因为猎人在捕杀的地方吃掉了这类小猎物，而没有把它们带回宿营地。同样，也没有蜂蜜、水果、浆果、坚果、甚至鸟蛋的痕迹，这些东西有可能在野外被吃掉了，没有带回家，采食这些食物并不需要什么石器。事实上，史前期的植物性食物的遗留证据是很难得到的。尽管如此，早期以狩猎和采集为食的人群，其食物中动植物成分肯定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因此对这些食物比例的考证也要做到符合实际，其办法是根据实际的考古发现和当地环境可能提供的食物来源作出合理的估计。 456

对于某些区域(例如坦桑尼亚中部)，考证石器时代最晚期狩猎者-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可以从残存的岩画标本得到很好的旁证。姑且不论许多这类岩画所表现的技巧、艺术意义及其成熟程度如何，然而这些岩画提供了关于为获取食物而猎取的动物种类以及关于用矛、弓、箭和各种陷阱进行狩猎的方法的重要资料。其他获取食物的活动在岩画中似乎也有证明，例如挖掘块根和采集蜂蜜。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有启发的，它大大扩大了我们对史前生活的眼界，尤其因为我们可以把岩画中表现的各种活动同东非民族近代的或现代的习俗进行比较。

岩画提供的证据必须同可能作为经济用途或文化用途的手工制品一道加以研究。一旦确定了其生活方式，我们便能进一步探究关于狩猎、诱捕、采集的方法以及狩猎队伍的规模，还可进一步探究整个部落的情形、它的领土范围以及为维持本部落的存在而创造的社会组织形式。对这种推测的印证仍在试验阶段，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少有充分的把握。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进展取决于原始的考古证据，所以必须用最仔细、最系统和尽可能最先进的方法搜集证据。

有石器的遗址在东非还不是少见的。在二十世纪初，这些遗址便开始被发现，继已故路易斯·利基博士在二十年代所开创的调查工作之后，在该区域被发现的史前各时期的遗址数目越来越多。估计会有许多发现。史前各时期的遗址常由于泥土侵蚀或地面破坏被揭露出来——石器或废石片由峡谷、河床或陡峭山坡冲刷出来，或者由于耕种、牲畜的活动或建筑施工而被带到地面上来。不仅是职业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遗址和遗物，还有一些普通业余爱好者，包括农夫和学生，也发现了一些遗址并收集了发现物。任何一种遗址都值得注意，并且应当报告给有关的教育和考古部门。收集的全部石器和其它考古材料应当保管在博物馆，在那里，这些东西能够用来研究并同其它地方的搜集品进行比较。外国考古学家把他们的发现物运回他们自己国家博物馆的那种做法，就东非而言一直是不多见的，而且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幸运地结束了。虽然大部分的和最有价值的东非考古记录已珍藏在一些有关国家的国立博物馆，然而，在本世纪初发掘的几件东非搜集品现仍保藏在欧洲博物馆里。 457

从地面搜集到的物品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石器和废料已经从它们的原始位置移开。此外，搜集本身通常是有选择性的。不过，甚至少量的地面搜集也可能含有关于其所属石器时代某个时期的线索(如一定类型和大小的工具或制造方法)及该遗址与其它已知遗址在文化方面的关系的线索。这就有助于确定是否值得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和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要有计划，并且要由对该遗址类型具有经验的考古学家进行。然而正如刚才所说，专业考古学家依赖业余爱好者和学者们所提供的当地资料。而且后者常常能协助发掘并学会发掘技能。考古学家只有采用正确的方法，现代的发掘技术和现代的检验技术，才能在发现物的原址并在记录和运走发现物之后，从一个遗址中搜集到最大量的资料，并能对人类先前在这里的活动提供最充分的——如果不是最详尽的——描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对东非早期石器时代遗址所做的某些发掘工作，有助于在方法、分析和解释诸方面为世界其它地区的研究工作定出一种格式。

可是从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并不以找到个别标本为其目标，他们关心的是通过对文化遗物的鉴定和尽可能详尽的研究，并通过获得一切可能得到的关于环境背景的资料，尽量揭示出从前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得到全部物件，并且要恢复原地面的一切特征，包括表面轻微的凹凸不平或土壤颜色的差异(可能说明曾在该处生火或某些其它活动)，那就需要采取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发掘方法。估计可能有细小物件例如石片、碎骨片、甚至植物种子的地方，通常需要采用筛滤土壤的办法。在晚期石器时代的岩石隐蔽所里(那里的埋藏物往往非常软并覆盖着一层尘土)，筛选是最常用的方法。通常在岩石隐蔽所里和在露天遗址里，这些实物往往不只是人类某次居住后遗留下来的，而是连续数次在该地居住的结果，而每次居住都在上一次之后重新遗留下遗弃物，因而需要分别对它们进行研究，因此发掘者要特别细心地进行地层分析；因为，如果一个居住时期的物件与另一个居住时期的物件混淆了，那么作出的解释将会严重失真。

458

虽然鉴定、记录和考察一切发现物的责任在于发掘者自己，但他仍然需要其他科学家帮助。有些帮助，如动物骨头的鉴定，可待以后在实验室进行。同样，如果发掘者幸运地发现保存下来的植物残存物(如碳化的种子和坚果或木头碎块)，那么他需要在现场进行特别处理，然后把它们分送给植物学家。对这类标本的鉴定和研究将提供关于先前人群的食物和经济情况的补充资料。然而，这些标本揭示的当时环境的情况将是同样重要的。如果偶尔保存下来古代花粉，那么通过孢粉学的检验可能说明当时存在何种植物及其演化过程。含有微小动物或蜗牛壳的土壤样品同样可以起揭示作用。这些东西同样有助于鉴定曾经盛行过的植物类型，因而可以鉴定当时的气候条件。地质学、地貌学和土壤结构方面的研究也有益于确定古代环境和史前人类利用过的资源。显然，如果环境考证要做到彻底和可靠的话，至少应在某一段时间内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亲临发掘现场，这对许多这样的考证是有好处的，因为不仅是搜集起来并运往实验室的样品本身包含着研究线索。这些标本必须仔细挑选并按遗址现场的条件加以保存。从所考证的时期在目前为止，地形可能发生过很大变化，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和地质作用，或更经常地是因为人类活动，尤其是近代耕种以及为开垦耕地而砍伐林木的活动。但要对往事进行探讨就必须精心研究发现遗址时的情形，深入研究遗址所包含的一切线索，包括考古学线索和其他线索。

还要进行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因为，即使这种研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也可对史前时期的情况提供有价值的间接旁证。

第一种相关的研究是对世界上现存的仍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非洲的一些民族，开展人类学研究。事实上，上述的许多推想都是通过观察现代的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民族，如坦桑尼亚北部的哈扎人和卡拉哈里的桑人的生活方式后提出来的，研究人员近年来一直在注意他们的生活方式。从现在哈扎人和桑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使我们对于以狩猎和植物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的可行性、组织情况和各种限制条件获得许多有益的见解，而且有些情况是考古学家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不过，我们要是把这些社会完全比作石器时代社会的模型，或看作是石器时代留存下来的残余部落，就大错特错了。 459

当然，现今某些狩猎－采集部落，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桑人，确实仍然反映晚期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状况，因而能说明该时期的一些问题。举例来说，晚期石器时代的一些常见文物是一种带圆形钻孔的石头。今天桑人有时还使用这种钻孔石头装在削尖的木棒上，来挖掘可食用的植物块根，南非显然还有一些岩画，说明这种用途。但这种具体的相互印证是少见的。此外，由于各种原因，桑人的社会起了变化，原因之一是，他们同那些使用铁器的和以生产粮食为生活手段的群落有不同程度的来往接触。只有很少数桑人仍然经常加工石头，因为铁器可以从交易或废料中获得，这必然引起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些残存的狩猎－采集部落已跟学会生产食物的人群更频繁地来往，另外还有一些人纯粹是土著人，他们在近代又在偏僻的森林地带回到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同邻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群交换林产品来维持生活。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见于许多被称为多罗博人的部落，多罗博人仍然生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高原。这些例子说明，在现代狩猎－采集部落和史前晚期的狩猎－采集部落之间划等号是危险的，考察更远的时代时危险更大。但是，尽管有这种危险，由此得到的关于陆地食物来源和关于采集这些食物所需要的组织情况，还是有价值的。

另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料来源是从灵长类动物，特别是同人类关系最近的两种非洲猿(黑猩猩和大猩猩)以及狒狒的生活和群落中发现的。后者是猴子类，从生理上讲同人类关系要远一些，但从行为上看它们对研究人类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狒狒比大多数其它灵长类动物在地面群居的时间更多些。因此，狒狒易于观察。正如在其它地方已解释的那样，人类并不是这类猿猴的后裔，而且在这里也没有表明，任何史前社会，哪怕是最早的史前社会，都比现代人类更接近猿猴。可是，在考察灵长类的基本行为和人类从人类以前的祖先继承下来的习惯时，以及在试图了解比人类更早的那些没有能力制造工具和利用工具的直接的祖先是如何过素食生活时，有许多想法是从实地考察中得来的，大量的这种考察已在东非进行。 460

正如我们强调的，史前史是极长的，史前时期终了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完全不同于史前史开始时的早期人类。此外，东部非洲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其中有些直到近代仍然存在)明显地就是非洲人。有些同桑人有关系，另一些被同化于铁器时代的近代黑人中。作为对比，早期石器时代的居民，特别是石器时代最早阶段的居民，虽然出现在东非并且很长时间局限在世界这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同样是人类祖先。这些最早的石器

制造者，通常已被看作是人类(Homo)，他们的骨头已经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最低层、在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图尔卡纳湖区发现。然而，在躯体和大脑两方面，他们同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是有区别的。因此，东非的早期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而且正是这个因素使它具有世界意义。由于它包含了关于早期人类及其文化，以及关于灵长类生态学这样非常宝贵的资料，东非已经很正当地变成研究人类生活、环境和起源的世界中心。

年表和分类

在亚洲、欧洲和北部非洲的大多数地区，石器时代通常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而在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这种分法已被大多数现代作者所抛弃。这里，人们通常按三大时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来考察和研究石器时代，它们主要根据可以认出的重大技术变革来划分(当然，这种变革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和经济含义)。分类上的这些差异并不是指概念上相同事物的两种分法，而且从年表上来说，这种分类的标准也全然不同(见第343页表格19.2及其注释)。

非洲的三个时期的年代可大体划分如下：

早期石器时代：从最早的石器时期(比方说，在300万年以前)到大约10万年以前。

中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0万年前至15,000年以前。

晚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5,000年以前到铁器时代开始(在大多数地区，铁器时代出现在2,000年以前)。

必须着重指出，这样确定的年代是大体性的，事实上还有争议。迄今，人们通常提出的从中期石器时代到晚期石器时代的过渡年代，尤其是从早期石器时代到中期石器时代的过渡年代还要更晚一些。这种保守的态度部分地是由于遗址和石刻收藏品缺乏令人满意的确定、记述和年代鉴定，还由于放射性碳测定法未能提供第一个过渡(即从早期到中期石器时代)的确切年代。虽然人们得到的和经常引用的年代是5万至6万年，但这可能是从最低限度估计的年代，而不是完全可靠的年代(事实上，不仅中期石器时代开始的具体年代，而且早期石器时代的整个后阶段的年表仍然很不肯定。本书其它地方阐述的新技术正在试用中。特别是钾-氩测定法已经有助于粗略确定50多万年以前各个时期的年代。可是，人们通常需要依靠由考古地层学、地质地层学和类型学中推算出来的相对年代)。

因此，这里为把石器时代划分成若干个时期而提出的年代要比在以前大多数标准叙述中所见到的年代长些。但是，这些年代的确定并不象研究这个课题的某些人员现在坚决主张的那么过激。(甚至修正论学派也不象它可能显得的那样激进，因为所提出的问题涉及更多的是定义，而不是实际年代。)

石器时代划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年代是不精确的和有争议的。此外，设想三个时期的内在关系是静止的或不变的，或者设想从一个时期转到下一个时期必定是一种突变，这将是错误的。在三个时期中的每个时期内和从一个时期转到另一个时期的过程中均有发展。而且，从早期到中期石器时代和从中期到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过渡是复杂的。有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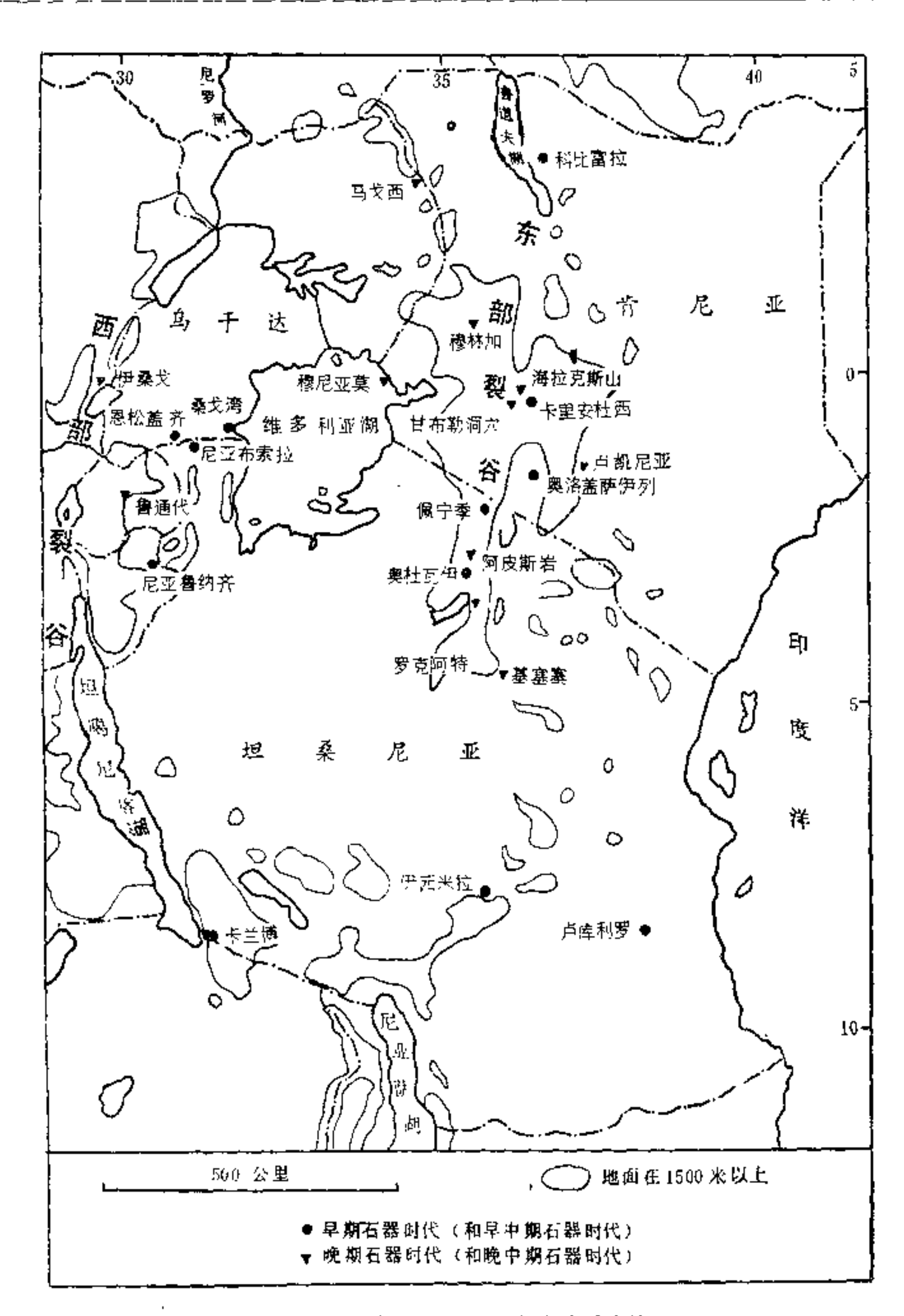


插图 19.1 东非：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

者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谈到中间时期。但是，最近的倾向是，不把这些中间时期作为石器时代年表中的正式时期。（中期和晚期石器时代中间的第二个中间时期无论如何总是一个令人很不满意的解说。现在，由所谓福尔史密斯工业和桑戈工业组成的第一个中间时期有时也被看作早期石器时代的终端阶段；但它在这里包括在扩大了的中期石器时代内。这有助于解释本文所述的中期石器时代的年代开始得更早的看法。）

放弃"中间"一词只是为了方便，并不表示对史前人类技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更简单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正在日益被人们承认。首先，在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甚至在有限的地区，不同的技术可能被同时采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技术可以用环境

的差异来解释，比如在森林地带或河岸地区出现一种技术传统，在干燥的或开阔的地区则会出现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同时代的技术传统。在后面这些地区，食物资源和获得这些食物资源的方法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和技术①。然而，可能作出的解释总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有时，一个社会进行各种活动(猎取大大小小的猎物，诱捕，挖掘植物块根和块茎，加工木头和皮革)，其中有些活动是季节性的，这些似乎足以说明在一个具体地点同一时期有着不同类型的工具系列。另一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别，它们表明了更大的文化歧异和经济专业化，可以设想，这些文化歧异和经济专业化存在于不同的群体或种族——或者在早期石器时代是存在于不同人种之间的。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最近在东非的发现证明，过去一度认为两个本质上无联系的早期石器时代的分期——卵石工具文化(或奥杜瓦伊文化)和由其继承和演进而来的手斧文化(或阿舍利文化)却重叠了一段很长的时期(至少持续了50万年)。把活动方式理论扩大到能令人满意地包容这种证据是困难的，某些古典学者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代表两个并列存在但开发不同食物资源的完全分离的人群的不同文化传统。

而且，在任意划分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石器时代之间可以看得出有时间上的交叉。人们可以在一个基本上属于中期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内找到早期石器时代的工具类型或早期制造技术的证据。革新和保守特征的遗物混合在一起可能是逐渐变化的标志。但是，过渡的标志并不总是存在着：在某些地层顺序清楚的遗址上，会偶然发现，一种新技术突然以发达的形式出现，而无任何局部演进的痕迹。这表明某种文化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可能是，但并不一定是居民迁移的结果。影响环境的气候变化也是一种对文化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刺激；但是，考古学家在此必须提防用简单的决定论进行解释。

因此，对石器时代分期的这种相当武断的划法，按现在认识状况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参考标准，然而，必须使它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适应不断修改的要求。但总有一天它可能归于无用。虽然这一天可能还没有到来，但这种标准是否有用正处于受破坏的危险，因为有些人在应用时过分拘泥于形式或过分死板，取得的结果根本不是这种标准想要取得的。

表格19.2列出了一个详细的标准，以便说明，考古学家在东非确认的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和石制工业应当怎样适应所划分的这三个时期。所提供的这种标准只作为现有认识和主要研究的参考，并不是作为一种正确的解释，也不是一个能概括今后的研究成果或对过去工作的重新评价的标准。只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指南和一种灵活使用的标准。这里命名的某些文化(有些故意略去)是根据不充分的研究或描述，有时只根据一个作过充分调查或描述的遗址来分别确定的，所以，它们作为不同文化单位的有效性可能引起怀疑。其它文化是非常广泛的，无论从时间上讲，还是从地理上讲，或者从这两方面讲，都是如此。早期石器时代的阿舍利文化在东非长达100多万年，它不仅跨越整个大陆，而且还进入欧亚大陆的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中期石器时代的第一阶段，桑戈文化由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伸展到大陆的最西部。在东非后期工业中，斯蒂尔贝文化和威尔顿文化首先在南非的开普省被描述和命名。这方面的专家或许宁愿给东非各种文化以新的和独特的名称。但

① 关于中期石器时代的叙述参见第346－352页。

表格 19.2 东非史前史

绝对年代（约年前）	分期		鉴定用技术特征	主要石器工业			在地中海和欧亚地区大致对应年代	地质纪（大致的对应关系）
				河滨—森林	高原—热带大草原			
300万	早期石器时代	第一阶段	手斧工具和石斧	奥杜瓦伊（卵石工具工业）			前期旧石器时代	更新世前期
100万		第二阶段	两面石片工具 薄刃砍砸器等	阿舍利（两面器工业）				更新世中期
	中期石器时代	第一阶段	用制成的石核制造石片工具	桑戈	福尔史密斯		中期旧石器时代	更新世后期
4万		第二阶段	装柄小型精巧工具	卢彭巴	斯蒂尔贝			
1.5万	晚期石器时代		石叶和修饰过的细石器；组合工具	奇托洛	（马戈西）威尔顿		后期旧石器时代	全新世
				肯尼亚卡普萨“石钵”文化（晚期石器）		肯尼亚高原	或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某些部分）	
我们纪元				铁器时代				

是，在本文中，采取了更全面的态度，在适当的地方指出一些明显的问题和可能的修正意见。同意这样做的人可参考本书参考书目所列各种著作提出的新发展和争论——然后可以进而应用更成熟的术语。

表格 19.2 注释

表格 19.2 所列均为术语。术语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过分重视它，反而有碍于理解。但是，石器时代作为一个史前时期，我们只有通过考古学家创造的术语和符号，才能认识它，并合理地讨论和研究它。因此，凡是想认真了解这个时期及其繁多的文献的，无论整体考察，或是具体分析，都必须熟悉不同学者使用的术语，即使某些术语可能不一致和不妥当。

表中右边的两栏表示与地质分期和与地中海、北非以及欧亚体系旧石器时代分期的大致相互关系。这两栏的内容，仅供参考，尤其是作为阅读本书其它各章和其它出版物（包括东非考古学的一些旧著）的参考。这两栏对于单独阅读本章内容并非是必需的。

前期、中期和后期等术语是遵照基于地层学顺序的正常地质分期法定的，其中前期为最早。因此，在大多数地质学著作和许多考古学著作里，这类表的逻辑顺序应是由下而上的，而这里的表的次序则是由上而下的，以便与历史发展的时序相一致。

正如该表所示，旧石器时代这一术语并不相当于非洲的早期石器时代。在欧洲首次使用并且现在仍然使用的旧石器时代，表示尚无食物生产的石器时代，以区别于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后者表示有食物生产的石器时代（食物生产是指金属使用之前的农业或畜牧业）。偶然遇见的对新石器时代所作的稍有不同的解释偏重以先进的物质文化（主要是指陶器或磨石）作为标准，而不看重食物生产的具体证据。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人们承认有一个过渡时代（有人认为这是文化的停滞），它被称为中石器时代。除了说明它与非洲中期石器时代无任何联系外，它在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这是非洲史著作中最常见的错误）。

466

在赤道以南的几乎所有非洲地区，正如在大部分东非地区那样，没有相当于世界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铁器时代开始以前，那里的食物生产并未普及②。可是，在肯尼亚高原和坦桑尼亚北部，存在着 2,000－3,000 年以前晚期石器时代末期的食物生产的证据（畜牧，也许还有一点农业）。某些论文称这种具有陶器和石钵证据的时期为新石器时代（参见本章结尾部分）。

A1：早期石器时代（第一阶段）

人类制造工具的已知最早年代，即使不在 300 万年以前，也在 200 万年和不到 100 万年之间，并且曾经在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裂谷附近从前的湖边和沼泽地带发现过这些工

---

② 许多作者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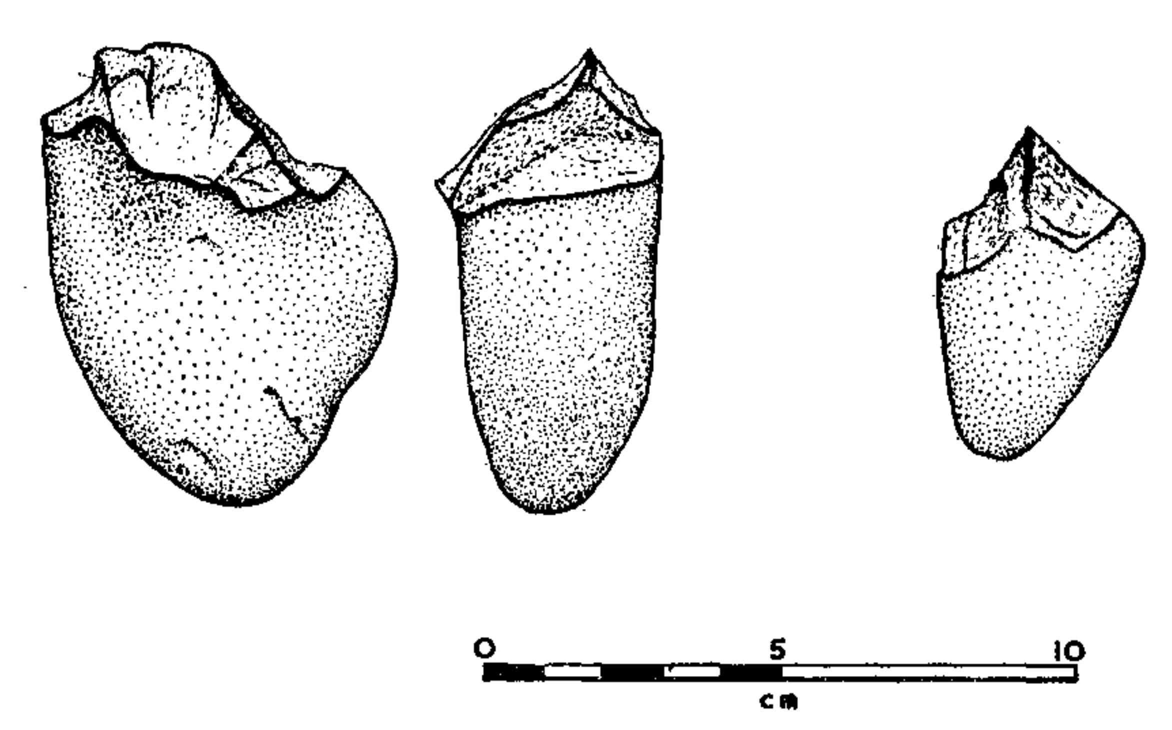


插图 19.2 早期石器时代，第一阶段：典型的奥杜瓦伊（“卵石”）工具

具。这类工具是手掌大小的卵石和石块，从这些卵石和石块上再用其它石头敲打下来一些石片，以制造粗陋而有用的切割石器。繁重的工作，如切割动物皮，或打破和碎裂坚韧的植物原料，通常需要使用手握的大型工具。许多石片（而通常错误地说成是废物）都比较薄，因而比较锋利，它们适用于从事轻巧的工作，比如把杀死的猎物加工成食物，制造木质武器，或用于营地的家务活。事实上，特别是玛丽·利基博士在奥杜瓦伊峡谷的最低层，对所谓斧头工具工业或卵石工具工业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所发现的工具种类之多和技术之复杂均超过迄今为止人们的假设。把这种工具说成是石斧工具是不确切的，对早期石器时代这一阶段所常用的卵石工具文化一词也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因为制造斧头、石片和其它工具所选择的石头未必都是卵石。还使用了骨头，无疑还使用了木头。因此，大多数考古学家宁愿依照首次认识和记述这种工具的地方名字，即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来命名这个阶段为奥杜瓦伊文化（插图 19.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工具首先是在奥杜瓦伊③制造的。

人们一度认为，这些卵石工具的制造者只能猎取和屠宰小猎物，如飞鸟、蜥蜴、乌龟和岩狸，作为采食水果、蔬菜和昆虫的补充。现在看来，他们显然也屠宰大动物。在宿营地遗址及其附近，与这些工具同时发现的骨骼化石中就有大象和大羚羊的骨骼化石。有些野兽可能自然死亡，或因意外事故致残，或被狮子和其它动物所害，但另有一些动物也可能在这个早期阶段被一群猎人用陷阱捕捉，或被追逐到水边泥潭里，被木矛和棍棒，也许被石头投掷器杀死。 467

无疑，一部分肉是被这些猎人在杀死动物的地方吃了。但还有一部分肉一定被带回营

③ “Oldowan”这一奇特的拼法系从德语 Oldoway 派生的，在早期的地图上，可以找到它。本来的地名叫做玛赛（Masai），称 Oldupai 更为正确。

地，供给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本部落其他人食用。由于残存的垃圾里常有各种不同的动物骨骼和各种切割、刮削和捣碎工具，因此构成最明显的证据，说明在人类这个最早阶段，已经有了家庭基地的思想。此外，对垃圾散布的方式进行的研究表明已建立了实际的防风篱，在奥杜瓦伊，有一个大致的石头圈被认为是小木屋或者也许是用皮革覆盖的住所的地基。在默勒卡孔图雷，一种人工平台可能也是作地基用的。

除了从东非以前的几个湖岸(由奥杜瓦伊伸展到图尔卡纳湖——那里有已知的最早遗址)获得的情况外，人们从南非直到地中海海滨也发现了属于"卵石工具"的遗物。它们可能产生于比东非最早期还要早的演进阶段。有可能但不绝对肯定，这种工具的制造开始于非洲的中部和东部，后来传播到整个大陆。考虑到这些工具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偶尔在东非发现它们同真正的人骨在一起，所以"卵石工具"遗物可以归因于最早的原始人，南方古猿类——或者正如某些人现在强烈地主张的，尤其[4]归因于能人。

46

A2：早期石器时代(第二阶段)

阿舍利文化或手斧文化象奥杜瓦伊文化一样，在非洲广泛地流传过，而且遗址的数量更多。这可能由于人口多，同样也可能由于可辨认的大型工具(见插图19.3)制造的数量多的缘故。与奥杜瓦伊文化不同，阿舍利文化伸展到非洲以外，进入亚洲西部和南部，以及欧洲南部和西部。阿舍利文化在非洲起始于100多万年以前。这类技术持续了100多万年，直到比较近代，即大概不过10万年以前。在这100万年里，发生了世界性的气候变化[5]，在已发现阿舍利工具的地区不可能全部连续有人居住。此外，在印度以东地区，真正的阿舍利工业是罕见的，或者并不存在，看来亚洲东部始终有一种与先进卵石工具类型比较类似的石器技术。这可能代表东部和西部之间一种重要的文化差异。在这些阿舍利工业中，手斧是最闻名的工具。这种工业通常是与直立人(一种处于南方古猿类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人种)有关系。可是，到了阿舍利文化阶段的末期，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进化已准备就绪。

非洲是出现直立人的地方之一。与直立人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文化的演进，这种演进的标志是阿舍利工具制造技术的改进和他们采用的更有效的生活方式，尽管较古老的文化传统(也许还有较早期的体力方式)无疑与新的文化共存了一个时期。这一点在奥杜瓦伊的古老湖底的连续地质层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在那里，在100万年前后的数十万年的时间里，独特的奥杜瓦伊工具系列和阿舍利工具系列一直在被制造和使用。而且，阿舍利文化包括许多阶段和变化，但是对一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主要的分期，即把较粗陋的或较简单的早期阿舍利文化和发达的阿舍利文化划分开来，最精美的手斧和砍砸器就属于发达的阿舍利文化。东非博物馆选择和展出了这类工具，这些出土于坦桑尼亚南部高原伊西米拉的物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石器的一部分。显然，演进的阿舍利文化一定是由早期阿舍利文化在某个时候发展而开始的，但是，在发生了这种情况之后，新的技术和古老传统仍将继

472

④ 参见前面第十七章。
⑤ 参见前面第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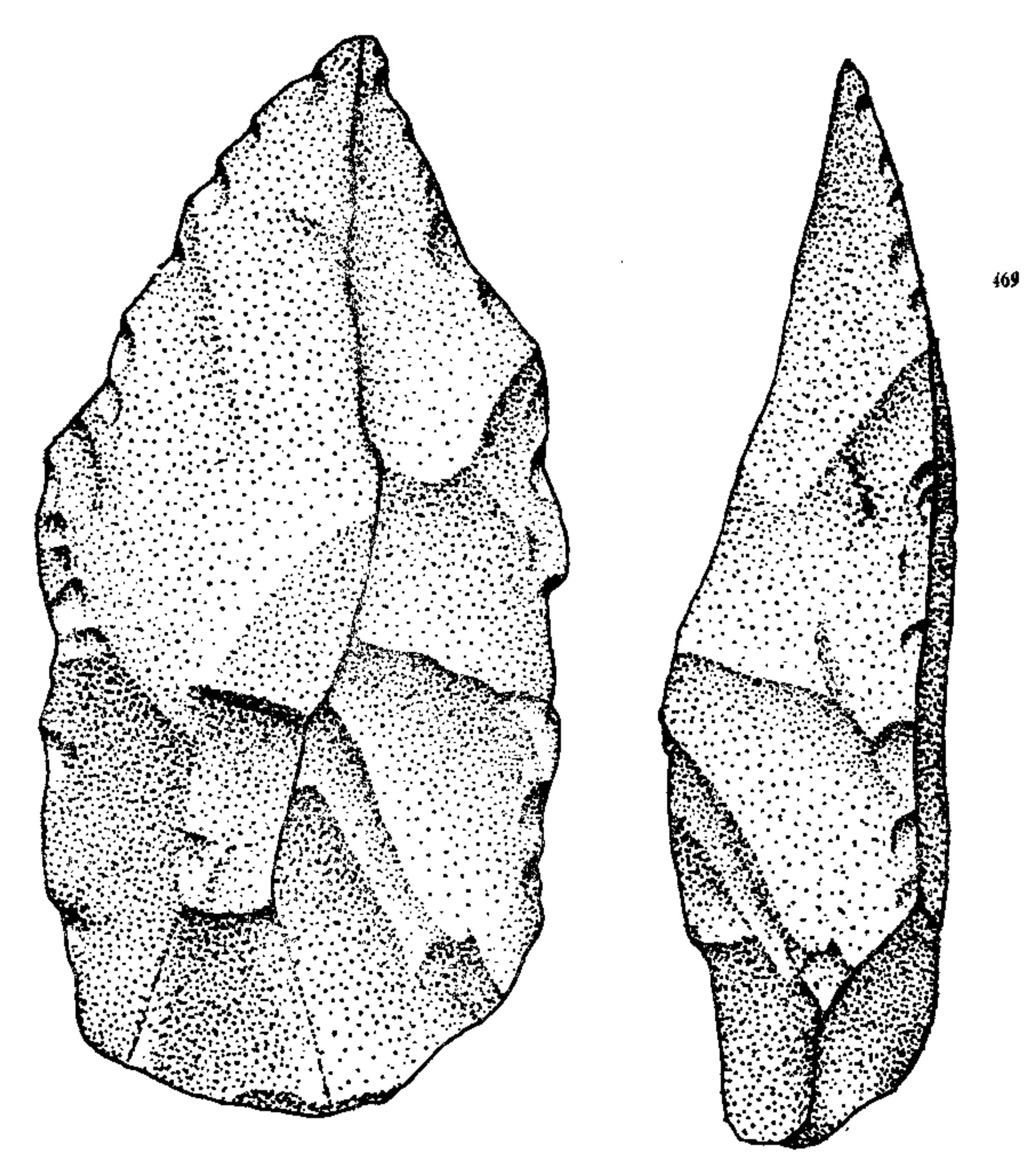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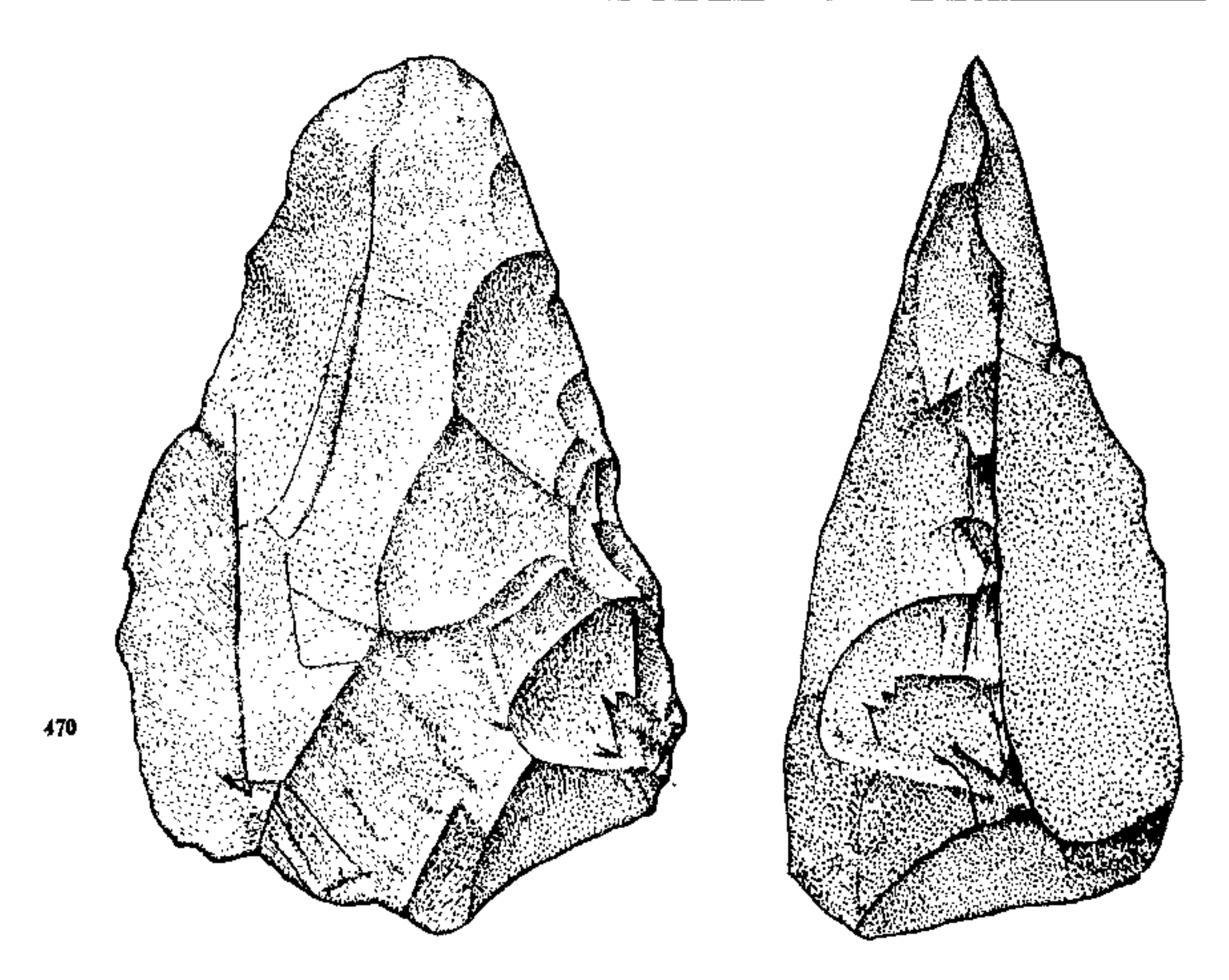


插图 19.3a 早期石器时代，第二阶段：阿舍利手斧，正视和侧视图

续共存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种阿舍利文化阶段，东非只是人类居住的“旧世界”的许多地区之一。然而，东非有许多遗址提供了一些有关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技术和经济的最有价值的资料。除了奥杜瓦伊遗址（它有无与伦比的连续地层岩系）和该地区其它一些遗址外，还有肯尼亚裂谷中的奥洛盖萨伊列和卡里安杜西，图尔卡纳湖东部几个遗址，靠近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边境的恩松盖齐和其它地区，坦桑尼亚南部的伊西米拉和卢库利罗以及与赞比亚接壤的边境上的卡兰博瀑布。

当然，两种最典型的阿舍利工具的名称——手斧和砍砸器是考古学为方便起见使用的



470

插图 19.3b　早期石器时代，第二阶段：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正视和侧视图

术语。这里所述的手斧并不是一个斧头，它可能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尤其它的尖端和长长的切削利刃还可能曾被用于挖掘和剥皮等。带一个扁平切削端头的砍砸器尤其适用于剥动物皮。奥杜瓦伊技术和阿舍利技术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在后一阶段，工具系列和个别工具类型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而且，比较精细、比较规则和比较耐用的双面石片的阿舍利技术很少使用石锤(象在奥杜瓦伊阶段那样)，而是更多地使用圆柱形木槌或用动物长骨制造带有较长切削利刃的更大型工具和作为刀用的锋利骨片。

在整个早期石器时代，人们组合成狩猎者－采集者群体，他们随着动植物食物资源的变化按季节在大草原和稀疏林区迁移。他们很可能在一定时间里分成几部分漫游，在临近旱季结束时，他们又聚集成大的群体迁到湖边或其它富裕地区。曾经有人提出，在伊西米拉和奥洛盖萨伊列这样的一些地方，大量集中精美的阿舍利工具可能说明了每年的这种聚集情况。

在非洲东部发现的第一个使用火的证据，是在具有发达的阿舍利工具系列的考古遗址里发现的。在以前的出版物里，这一发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5万年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年代的估计是过于谨慎了。据说，还有50万年前亚洲东部的直立人使用火和烧饭的可靠证据；即使迄今尚未证实，但似乎很有可能在非洲大部分阿舍利时期，人类已知道使用火，并吃过烤制食品。

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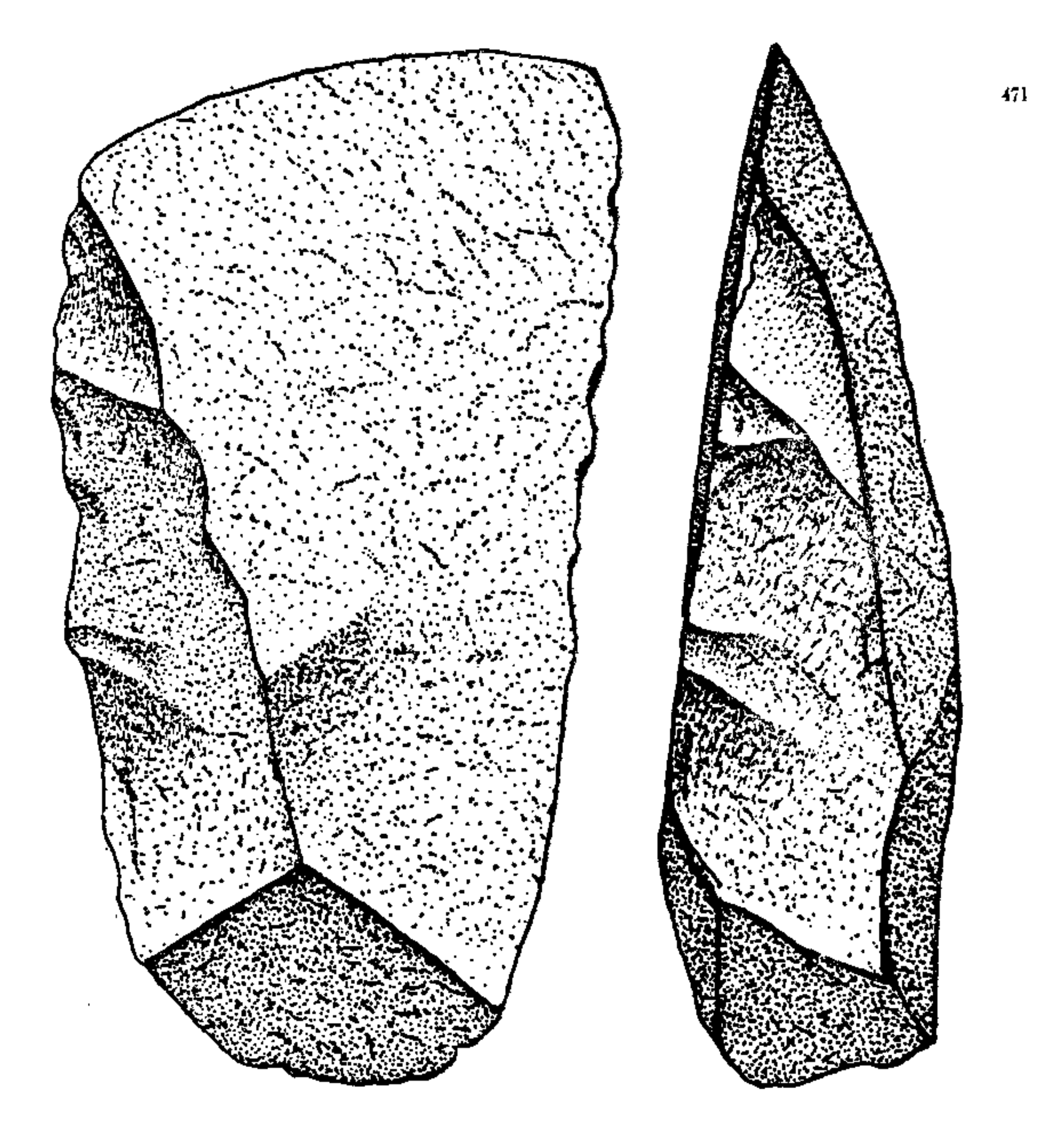


插图 19.3c 早期石器时代，第二阶段：河舍利砍砸器，正视和侧视图

B：中期石器时代

中期石器时代居民尽管在初期可能属于多少有点不同于现代人类的亚智人种，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智人种。然而，到了中期石器时代末，不仅出现了现代人类，而且现在存在的种族的明显体形特征在非洲和在其它地方已相当充分地形成了。

473

在技术方面，中期石器时代有重大进展（插图19．4）。基本的石器制造不再是从一块石核上敲下石片直至石核被敲小到带有刃口的合适形状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日益采用比较复杂的技术，即通过精细地剥落石片将石核制成所需形状和大小，最后敲打出成品石

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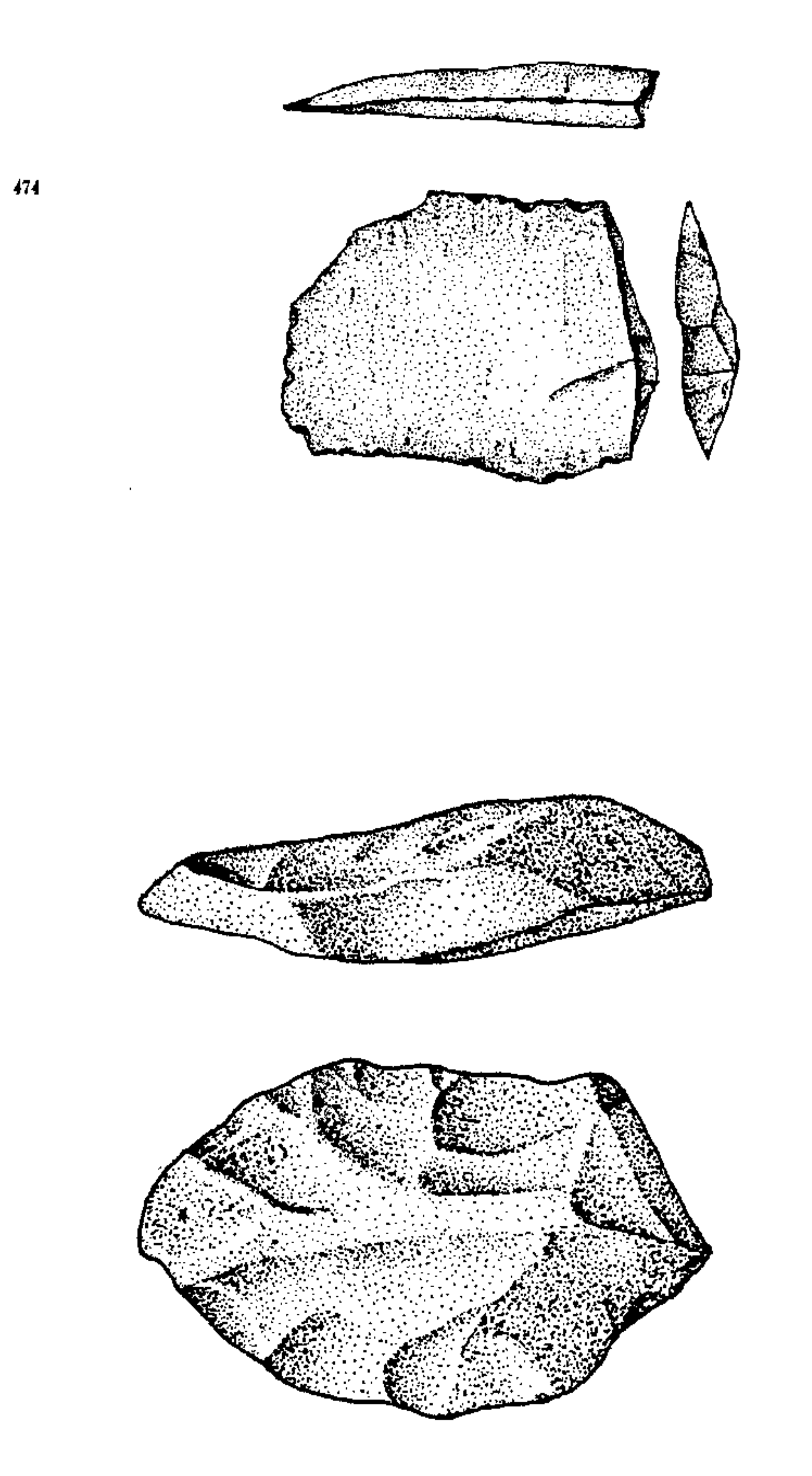


插图 19.4　中期石器时代和过渡期的工具：右边的标本是适合装柄的，也许作为矛头的精美尖状器

器。与此同时，先打下不规则的石片，然后将其修饰成形的技术也相当熟练了。这样就能生产较小的、形状更加理想的精制工具；通常，这种工具比早期石器时代的工具薄，因而更加有效。在中期石器时代的第二阶段跟着出现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革新——将加工好的石件装配到木柄或其它材料上。与斯蒂尔贝工业不同的叶片形尖状器，用压制石片法进行细致加工后，无疑地经常被粘接到木柄一端的狭槽里而形成矛。许多家用工具大概都同样被装到方便的木柄上。这不仅涉及从树脂制备树胶，而且也涉及比较复杂的木头成型、剥皮和开槽，可能还涉及用火锻烧。

与中期石器时代这些技术发展齐头并进的是经济调整或至少是环境调整。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是气候的变化。[8] 由考古证据证明的气候变化的详情、年代和联系等，人们知道的还不多，因而试图轻易地参照其它情况来解释这点可能是轻率的。而且，气候的变化——从比较干燥变为比较潮湿和从比较潮湿变为比较干燥，都影响森林的扩大和缩小，影响湖泊和河流出现的多寡及面积大小，从而影响各种食物资源的分布和丰富程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要问，气候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导致中期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技术和经济的突破。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这个问题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有人可能推测说，日益增多的人口迫使采用各种更有效的方法开发环境。因为，不管什么原因，这种情况肯定在中期石器时代发生了。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区域专业化。人类开始居住在新的土地上。在全世界，智人一直在施展他天生的多才多艺的本领，并一直把它的定居地方的边界向后推移。在非洲，在草原和树木稀疏的热带草原的人类与当时进入潮湿、密林地区的人类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分工。前者发展了用矛猎取大猎物（但不能排除植物采集），后者则主要是采集植物和水果、捕鱼并且用长矛以及无疑地还用各种陷阱来捕捉水边动物。

475

在中期石器时代的第一阶段，这种区域专业化并不象有时设想的那样极端。在肯尼亚高原，即使不在森林也是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搜集到了称之为福尔史密斯的工具。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种经过改进的阿舍利技术。这种技术的工具范围基本相同，但它们一般较小而且是用新技术制造的。传播比较广泛的桑戈工业则与此形成对照，桑戈工业最好的东非标本出土在乌干达南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西部的维多利亚湖周围和西部裂谷。这种桑戈工业也是一些阿舍利型工具和新技术的混合物，但重点则与福尔史密斯型工具不同。人们对于桑戈工具的第一个印象是粗陋，但这大概并不标志着文化退步，而是标志着更加多样化的技术活动，因为许多看上去很粗陋的工具很可能是用来制造其它工具的，特别是制造木头工具；而大型尖锄大概是用于挖掘作为森林地带食物一部分的块根的。

在东非，首先碰到了发达形式的桑戈工业，这说明桑戈工业是在另外什么地方起源于阿舍利文化，并得到发展，后来又流传到非洲大陆中部和西部。桑戈工业可能是在潮湿时期，当赤道附近森林向外扩展时，被引进东非西部地区的。但是，这一点可能争论得过多。宿营地遗址可能位于森林地带和林区水边而不会位于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值得注意的是，在扎伊尔河流域有记录的桑戈文化遗址的分布清楚地表明，进入赤道森林的情况几

---

⑧ 见前面第十六章。

乎不比阿舍利文化时期发生的更多。然而，在中期石器时代的第二阶段，卢彭巴工业的制造者显然依附于森林及其水源，卢彭巴工业主要是桑戈工业的发展和改进，并因它们精美的石制矛头而著名。

在维多利亚湖和东非西部的其它地方以及在扎伊尔河流域，也发现过卢彭巴文化。这种文化正好与接壤于裂谷高原草原、具有叶片形矛头的斯蒂尔贝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在其它地区，特别是在坦桑尼亚东南部，广泛流传过不同类型的中期石器时代的工业，它们的特征不那么明显，或更确切地说，还有待于适当地分类。在这些工业中，有些可能具有桑戈文化和卢彭巴文化的普遍特征。但是大概有一些地区性传统，它们的起源可以解释为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但这些传统一旦巩固下来，就可能保持着它们许多不同的特点，这既是因为文化的隶属性，也是因为环境压力和经济压力。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革新一旦被采用，这种地区性文化因素对东非明显存在的文化变异性是会有重大影响的。

476 C：晚期石器时代

一万到两万年以前，这些比较复杂的石器制造技术已成为普通的了。中期石器时代重点是从制好的石核上制造石片，而晚期石器时代主要集中在制造石叶上——从一块合适的石头上打(或间接地冲压)下长长的、精巧的、两侧平行的石件(插图19.5)。然后这些石叶可以按各种形状和用途加以修整(或修饰)。修整好的石件通常是非常小的石器——细石器，有时长度不到1厘米。常见的形式是一种具有笔直的切削锋利刃口和曲线形钝背、考古学家称之为新月形或半月形的样子。这些石件不是为了用手拿着作为一个完整工具用，而是为了装在或粘接在骨柄和木柄上。当时，装柄方法已有所发展，而且经常应用。此外，很可能经常把几个细石器按刻槽顺序一起固定在木柄上，制成组合工具，例如一把刀或锯。在石头适合于石叶制造的地区，特别是在靠近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裂谷地区，可以找到燧石或不透明火山玻璃(黑曜石)，人们已经制出美观的新月形石片、有背的石片、钻子、开槽刀、刮削器和其它不同工具。但在其它地区只能得到石英或石片不匀称的一些次等石头，虽然用这些次等石头制出了整套有用工具，但这些工具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粗糙的和不规则的。有时，考古学家在晚期石器时代居住遗址找到几千块石英石片和石屑，但只有百分之二、三能够被归类为可辨认的工具形状。

根据这些技术革新，人们可辨认或推断若干文化和经济革新。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弓箭开始用于狩猎。人们能够把一、两块细石器固定在木箭杆一端，制成箭头，可能再放置几块细石器作为倒钩。把毒物放在箭头上大概也要追溯到这个时代。这一点以及在林区使用网的习惯，均可由现存的或近代的狩猎－采集者人群的习俗来说明，因为在他们之中，仍然保持着晚期石器时代的某些传统。骨头无疑被用得更多了，对骨锥和石锥的辨认说明，皮革已被缝起来做成衣服或帐篷。用植物种子、骨头、鸵鸟蛋壳和石头等做成的串珠可能被缝在这种衣服上或用绳子串起来做成项圈。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某个时候出现的磨石，曾被用来压碎红赭石，但捣碎植物食物很可能是更根本的经济目的。

晚期石器时代的某些宿营地位于河边或湖边的开阔地带，必须想象，在那里用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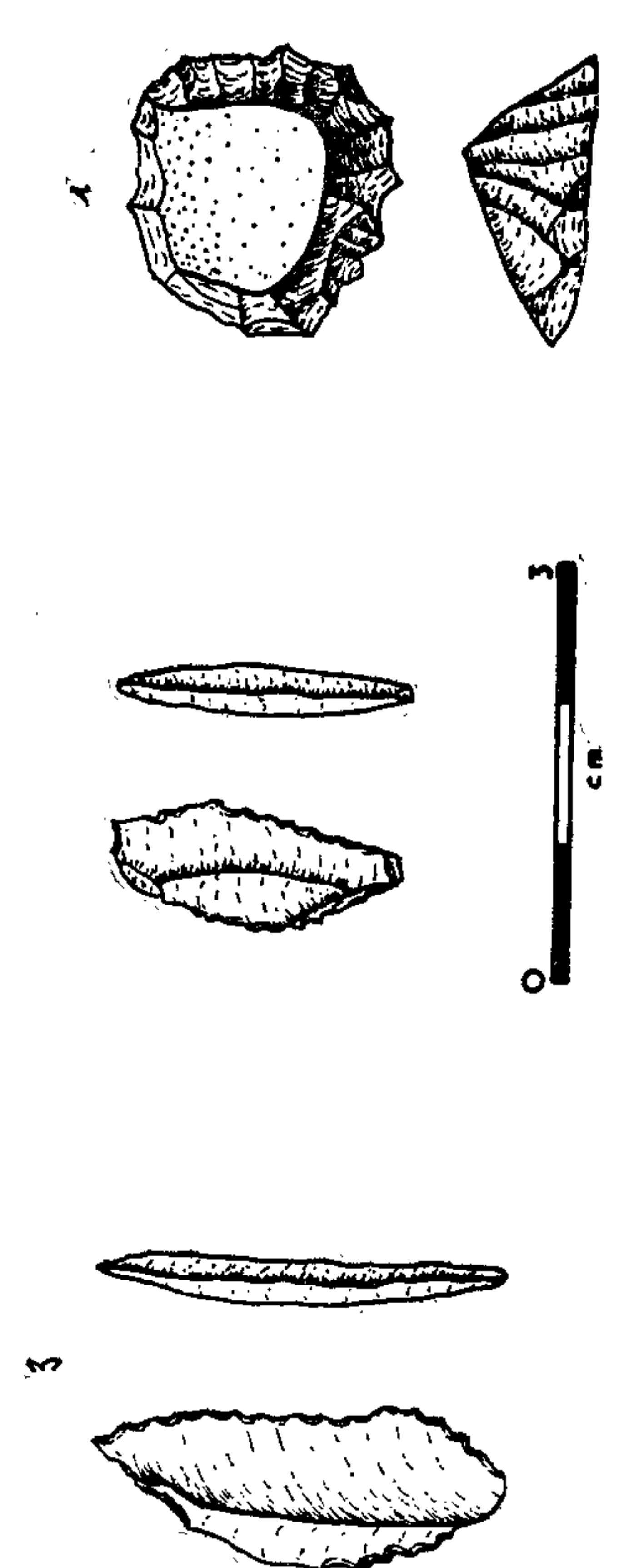


插图 19.5 晚期石器时代：用肯尼亚裂谷的黑曜岩制成的“拇指甲”状刮削刀(右图)、砍刀(中图)和新月形器具(左图)

茅草以及可能还有兽皮做成防风篱或小屋。这时居住在岩石隐蔽所(有时不大准确地描述为洞穴)也是很普通的。这些天然隐蔽所是在能够充分防雨、避风而又不过分遮光的悬崖下、峡谷两侧或花岗岩巨石下面发现的。有些岩石隐蔽所有意设在能够注视宽阔平地猎物活动的高处。狩猎队可以在这里过夜，一个家族或家族群可能为渡过某一季节建立基地。有些中意的掩蔽所年复一年地用下去，用的时间至少以晚期石器时代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计算。因此，发现了一层层的垃圾，这些垃圾中通常包括烧饭留下的灰烬、吃过的动物骨头、石器和废物。

前面指出，在坦桑尼亚中部偏北的一个地区，许多这种岩石隐蔽所的后面石墙装饰着动物画、狩猎场面和其它图案。虽然很少可能把各个岩画同在隐蔽所中呈现的晚期石器时代顺序中的具体地层联接起来，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此外，存留下来的绝大部分艺术品似乎属于最近数千年，接近晚期石器时代末，其中某段时期同铁器时代群体的扩展期相重叠。然而这种狩猎者的艺术——信仰及其所依据的宇宙观——的起源一定更古老得多。

一种古代传统可能是在好多万年前形成的，如果不能追溯到中期石器时代，至少也可以追溯到晚期石器时代初期，这就可能造成坦桑尼亚狩猎者艺术和非洲南部狩猎者艺术大致是相似的。同样，两个地区的石器工业，尽管并不相同，但也有某些共同特点(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威尔顿石器工业)。在非洲南部，业已证明，岩石艺术和威尔顿石器工业的某些晚期标本是桑人部落的作品，其中某些桑人部落仍然在某些地区过着狩猎者兼采集者的生活，这些桑人的人体特点和科伊桑(倒吸气音)语言都是与众不同的。目前，在东非只有一个很小的地区讲倒吸气音语言，这就是坦桑尼亚中北部岩石艺术所在的地区。这些讲科伊桑语言的人除了显露桑人祖先的某些自然证据外，还保留了浓厚的狩猎者-采集者的文化传统⑦。

肯定不能说这是桑人在较近时期从非洲南部迁移出来的结果。更确切的讲，一定存在过一个从坦桑尼亚北部到好望角的狩猎者-采集者连续统一体，而且这个连续统一体由于最近3,000年期间具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畜牧业或农业经济的民族到达这个地区而解体了。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热带草原，这个文化连续统一体的起源，如果不同中期石器时代的斯蒂尔贝文化阶段有关系，也可追溯到晚期石器时代。然而，如果不对各中间区域的中期石器时代的第二阶段，以及向晚期石器时代(及其没有充分确定的马戈西工业)的过渡时期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时间的深度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关于晚期石器时代热带草原文化长期传统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明威尔顿工业总类中包括的某些地区性差异。考古学家过去倾向于把非洲东部和南部具有明显细石器特征的几乎所有工业都包括在这一类里，其中东非靠北边地区的某些工业可能与它只有一点关系，可能同南方桑人毫无关系。此外，在东非的西部地区，人们可能发现一种同扎伊尔河流域有关的不同传统，在扎伊尔河流域，繁荣的奇托洛工业曾源于中期石器时代的桑戈-卢彭巴林地和森林文化。但除了在卢旺达外，这点不是特别明显的。

⑦ 参见前面第十一章。

肯尼亚高原和裂谷有一个具有某些显著特点的地区。在这里发现了与威尔顿工业有亲缘关系的某些晚期石器时代工业。但是还有其它一些地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用长石叶而不是用细石器制造工具。这些以当地黑曜岩为原料制造的,称之为肯尼亚卡普萨文化的工业大约距今有 5,000－10,000 年。最好的工具系列是利基博士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在靠近马库鲁的甘布勒洞穴发现的。有关的和派生的工业一直延续到石器时代最末期。这种肯尼亚卡普萨文化属于曾广泛分布在非洲东北部许多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古老石叶传统。但是，对石器工业的比较不是唯一重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肯尼亚卡普萨文化及其创造者代表了黑人水域文明在西南的高峰，这种水域文明曾在撒哈拉南部地带穿越非洲向尼罗河上游伸展,一直到东非。似乎有人在湖面水位很高、河流上涨的一个暂时性潮湿时期在这些地区居住过。这种水域文明大约在距今 7,000 年前达到了顶峰。住在河边的人民靠用石器工具制造的典型骨矛和鱼叉捕鱼和捕捉水上动物。它们曾在裂谷西部的爱德华湖和纳库鲁湖从前的湖岸线上被发现过。这些水域居民已经知道制造篮筐和陶器，后者代表了世界上最早利用陶器的情况。所有这些都表明有一个定居社会，其主要住所位于水边。

D：新石器时代

仅在几年前，由于缺乏考古证据，人们还认为在第一个千年期以前，家畜饲养尤其是农业是很不发达的，只有同喀土穆新石器有关的沿尼罗河流域的几个遗址除外。捕鱼者群体(从第七个千年期和第六个千年期起，就有一部分定居在大湖边和大河边)是否开始了畜牧业和农业，仍然是一个推测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环境(从第三个千年期初开始，撒哈拉突然更加干燥起来)的压力，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先进技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有了陶器。然而，有人认为，这些人已接受了集体食物生产概念，尤其是接受了驯化动物、栽培植物的概念；而且从第三个千年期起，这种集体食物生产传遍了整个区域，缓和了气候变化对天然资源的影响。 480

这个时期的最出名的遗址是苏丹境内位于青、白尼罗河汇合点偏北古老台地上的沙海纳卜遗址。A.J.阿克尔除了在那里发现了不同形状的细石器组成的石器工业外,还发现了后部穿孔的鱼叉和贝壳制造的鱼钩，两者都证实存在着持久的捕鱼活动，还发现了流纹岩手斧、半圆凿、刮光的小骨斧以及具有波纹线和虚线图案装饰的陶器。骨头遗物包括野生类，其中许多是鱼，还有山羊，偶尔还有绵羊。沙海纳卜遗址出现于第四个千年期的后半期。卡达罗遗址在沙海纳卜遗址附近，在这两个遗址处发现的物品的式样非常类似。在卡达罗遗址收集的遗物中，十分之九属于驯养类，包括牛科。

在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省的阿戈达特，发现了作为半永久性居住地的四个村落的遗址。虽然研究工作只限于表土层，但是从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有斧子、磨光石锤、石盘和手镯、具有浮雕或刻有鲱鱼骨图案的陶器、珍珠、器皿边缘装饰品和项圈等。磨石、石臼和象征一种牛(这种牛类似集居在努比亚及其以西的C组人群所饲养的牛种)的小石雕的发现，并不一定证明有过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但说明了可能有过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在从第三个千年期就开始存在的阿克苏姆附近的戈德卜拉隐蔽所内，发现各种龙爪稷类谷类颗粒

以及各种形状的细石器工业和陶器。在埃塞俄比亚还没有发现古代种植画眉草、阿比西尼亚芭蕉、小麦和大麦的痕迹，而画眉草今天仍然是埃塞俄比亚北部许多少数民族食用的、营养价值很高的主要谷类，阿比西尼亚芭蕉则遍布埃塞俄比亚南部。

在肯尼亚，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有过农业，但是在远至坦桑尼亚的整个裂谷地区以及高原都留有畜牧业的许多遗迹。这些遗迹有的是在埋葬地发现的，如靠近纳库鲁附近的恩乔罗河洞穴处的火化遗址和莫洛附近的凯林盖特洞穴火化遗址，有的是在坦桑尼亚北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乱石覆盖的墓穴中发现的，墓穴中骷髅重叠。所有这些遗址提供了一系列古代人工制品，如磨石和捣具，或提供了一系列定居点，如奈瓦沙湖附近的新月岛遗址和肯尼亚南部的讷罗苏拉遗址。在讷罗苏拉遗址，所辨认出的动物群的百分之九十五属于家畜，而且其中的百分之五十七是山羊和绵羊，百分之三十九是牛。对骨骼遗物的研究表明，当这些大动物衰老时，大部分被屠宰，而山羊和绵羊则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屠宰。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是，饲养牛更多的是为了喝它们的奶——或许象今天马赛人那样，为了喝它们的血——而不是吃它们的肉。磨石和捣具在这里的出现依然仅仅间接证明存在过某种农业。

畜牧业和农业往往形成一种混合经济，它在东非的采用和推广，常常被认为是以下两方面的影响的结果：一方面的影响是从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向苏丹地区推进，另一方面是从埃及向努比亚（喀土穆）推进。新石器化的过程可能到达了埃塞俄比亚高原，后来由讲库希特语的氏族的小规模迁移带向南方。但情况经常是，某一种生产经济的变化是逐渐的，而且考古学证据表明：当时已有的基础继续起了重要的经济和技术作用。狩猎和捕鱼象过去一样继续进行，并且一些捕鱼者小部落的物质文化从未间断过，这些捕鱼者小部落在第三个千年期前很久就有一部分定居下来，甚至还同不知道使用陶器的（肯尼亚卡普萨－埃尔门泰塔）狩猎－采集群体一起定居。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当时的农业是很发达的，但人们知道存在农业，而绵羊的饲养，随后是山羊和牛的饲养，从第三个千年期起，尤其是在第二个千年期间就很快地发展起来。当铁器时代开始时，这些东非民族大概已经很先进，超过了农业的前期阶段。

E：非洲中部和东部的水域生活传统

在8,000－10,000年前，非洲气候异常潮湿，因此湖泊又大又多，沼泽比较广阔，河流水多且长，季节性小溪经久不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与水源、浅滩和水中食物资源，特别是与先进的造船和捕鱼技术密切相关的独特生活方式遍及非洲大陆，从大西洋沿岸到尼罗河流域，遍及大大缩小的撒哈拉沙漠与绵延的赤道森林之间的广阔地带。我们这里所称的这种水域文明，是从撒哈拉高原上的以及从尼日尔北部开始、经过乍得河流域到尼罗河中段、然后再向南到达东非裂谷和赤道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区上的许多考古遗址中了解到的。在裂谷西部，在爱德华湖扎伊尔沿岸上的伊桑戈辨认出了水域文明遗址。在裂谷东部沿着图尔卡纳湖和纳库鲁湖的古老的高湖岸线也发现了水域文明遗址，前者地势低洼，后者位于裂谷地势较高的南段。靠近这一较大的纳库鲁湖旁的最重要遗址叫做甘布勒

洞穴：事实上它是一个岩石隐蔽所，L.S.B. 利基博士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发掘过。发现最低居住层含有称之为肯尼亚卡普萨文化型的晚期石器时代遗物。但是，独特的陶器和骨制品的存在以及现在断定此地层约有 6,000 年历史，使我们现在能够认为肯尼亚卡普萨文化是伟大非洲人水域生活传统在当地的体现。

在这些古老的水边宿营地和定居地出现的龟骨和软体动物的贝壳以及水中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芦苇鼠和甲鱼，有时还有河马和鳄鱼）的骨骼，提供了有用的经济分析证据。但他们也猎取陆地动物，很可能还采集和食用有营养的水中植物和沼泽植物，而且可能是经常采集。获取和制作食物技术已有某种明显的先进特点——用骨头雕成的鱼叉头（利于精细石器）和陶制容器等。将这种鱼叉固定在木矛一头，用绳捆扎，在船上或水边捕鱼和捕捉其它水上动物。罐子很大并且常常用鱼骨或贝壳装饰起来，图案是波纹线和波纹虚线，虽然有所变化，但波纹线和波纹虚线是明显的，足以防止与这些广阔地区中的其他晚期陶器混淆。有些装饰图案和陶器的宽大口形可能是仿照那些很可能用来装鱼的筐子做成的。

东非湖岸遗址边沿、尼罗河中段沿岸和撒哈拉的水域文明的祖先距今已有8,000－5,000年。在第七个千年期的时候，这种水域文明达到了顶峰，进入全盛时期。第一批鱼叉也许是在稍早时候雕成的，而发现如何制陶器距今至少 6,000 年。这些陶器不仅是非洲最古老的，而且也是世界最早制造的陶器的一部分。不容置疑，这是非洲中部地带某地独立出现的一项发明。

任何东西都不能说明，这些水域人民在 7,000－10,000 年以前从事过任何农业，不管是在东非还是在他们活动的其它广泛地区。不过，这种水域文明的发展和发展速度，以及其生活方式的复杂技术表明，它的文化影响和优势所持续的时间同这个潮湿时期是一样长的。因此，把水域文明看作是晚期石器时代采集者－狩猎者文化的另一种变体，就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特色和成就。这些人可能没有居住在永久定居的村庄，但是，由于大湖和河流有可靠的食物供应以及掌握有效利用这种资源的技术，他们已能建立比以前任何定居点更大、更稳定的共同定居点。这不仅鼓励了人口的增加，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求知风气，既表现在制造船只、鱼叉、篮筐和陶罐方面涉及的复杂技艺上，也表现在利用这些东西的更高阶段的生活方式上。 483

陶器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历史学家，甚至比考古学家通常所评价的还重要。由于陶罐易碎，对于没有固定基地的流动性社会，也就是对于大多数狩猎者－采集者来说，陶器用途是有限的。而对于定居部落，罐子能使制作和烧煮食物多样化并能提供复杂技术，具有创造文明和建立家庭的意义。

这些西非和东非的水域人民在体型上可能稍有不同。但已经发现的几具骸骨说明：祖先基本上是黑人⑧。事实上，看来正是 9,000 或 10,000 年前水域文化和经济这种广泛的分布和成功，使某种黑人在横贯苏丹地带、尼罗河流域中上游以及东非北部地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这可能与格林伯格称之为尼罗－撒哈拉人的一个大型语系（或语族）在地理上的扩展以及后来的解体与分化有关。现在这个民族已分崩离析，从尼日尔北部一直到达坦桑尼亚中

⑧ 关于"肯尼亚卡普萨"人民是高加索人种这种经常出现的说法，是以对利基在甘布勒洞穴及其它地方进行的研究的错误解释为基础的：参见《非洲史》，XV（1974 年），第 5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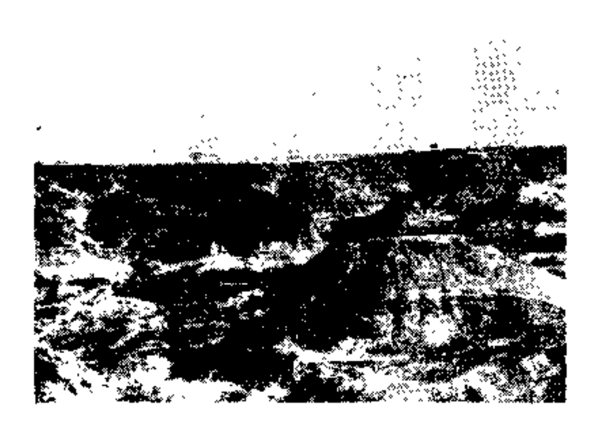
部都有，因为这种分裂本身就是这个广泛分布的氏族已有几千年之久的标志，并且比侵入非洲中部地区的其它语系(即尼日尔－刚果语系和亚非语系各种分支)的人要古老。在尼罗－撒哈拉人始终占据的地区(包括称之为沙里－尼罗的东部地区)中间，有些地区存在着湖泊、沼泽和河流，也就是以下这种地区，人们可以想象，在那里，与尼罗－撒哈拉人语言密切相关的古老水域生活方式持续的时间最长(即使有些改变)。

关于伟大的水域文明和尼罗－撒哈拉人语言的讨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这是非洲人民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至今被人忽略的一个方面，它给以后住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包括东非地区)的居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经济留下重要的痕迹。

从距今大约 5,000 年起，普遍的干燥气候开始产生影响。湖面水位下降，以获取水上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衰退了。然而，在肯尼亚裂谷，这种经济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在距今2,000－1,000年期间，从埃塞俄比亚来到这个区域的新居民带来了牛群，或许还带来了某些农业习俗。

484

(吕陈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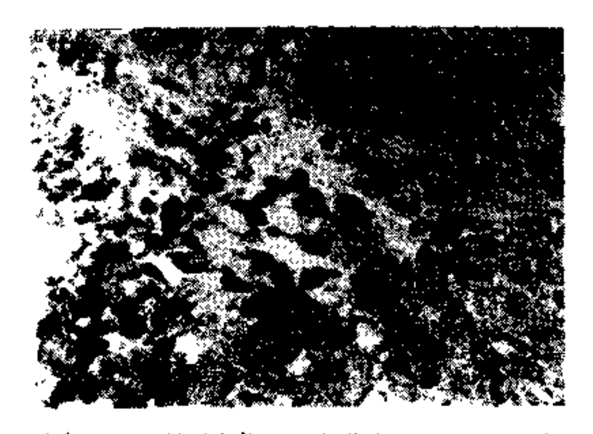


照片19.1 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穿过平地100多米的这个峡谷显示了相继形成的地层（绝大多数是旧湖底）。最下面几层大约为200多万年，其中藏有一些最早居民的遗骨、工具（奥杜瓦伊类型）和吃剩的遗弃物。上边几层埋藏有阿舍利文化传统的手斧和其它工具(J.E.G.萨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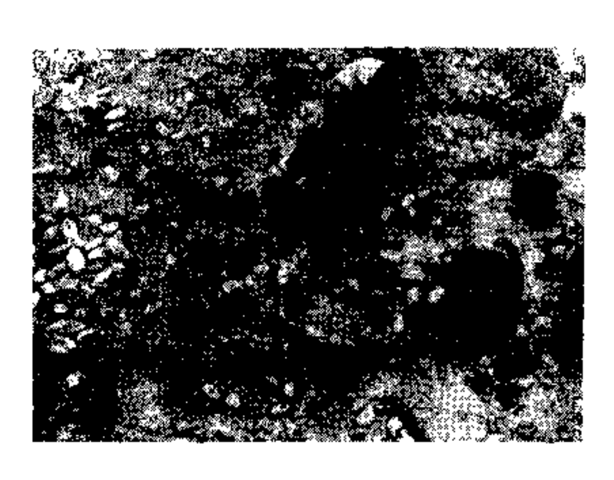
485



照片19.2 坦桑尼亚高原南部的伊西米拉，这是被侵蚀的峡谷的景象，图为发现阿舍利工具的地层(J.E.G.萨顿)



照片19.3 伊西米拉。阿舍利手斧、砍砸器和其他工具密集处（中心处的小镘刀是供比较大小用的）(J.E.G.萨顿)



照片19.4 肯尼亚裂谷的奥洛盖萨伊列。发掘人员正在阿舍利文化遗址进行工作(J.E.G.萨顿)

486



照片19.5 坦桑尼亚北部的阿皮斯岩（纳塞拉）。发掘工作显示晚期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个隐蔽所下面相继居住的情况，照片右侧清楚可见(J.E.G.萨顿)

487

南部非洲史前史

20

J.D.克拉克

最早的人类

达尔文和赫胥黎认为热带，其中也许还包括非洲大陆，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灵长目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这些猿类象类人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一样，居住在森林里，从形态特征可以看出它们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进化才适应了在热带低地和山林中生活。然而，人类的进化却不是发生在森林，而是发生在大草原。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半干旱草原和落叶森林地区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说明，人类祖先为求得生存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他们拥有比类人猿所能利用的不知要丰富多少的潜在资源。

关于人类是在什么时候从猿类系统中分化出来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根据对古生物学证据所作的解释，人类从猿类分化出来可能发生在新生代早期，即中新世早期，距今约 2,500 万年。另一方面，根据比较生物化学最近对灵长目的测定(人类、类人猿和旧大陆猴之间在染色体、血浆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免疫学上的差异)证明，人类从猿类分化出来的时间不早于 1,000 万年，可能只有 400 万年。有人可能认为，化石所提供的证据是最可靠的，然而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漫长的地质年代分期是准确的话，那么人类与类人猿已有明显差别的决定性的时期是在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早期(距今 1,200万 - 500万年)，但在目前所取得的有关这一时期的灵长目的化石证据却几乎没有。现在能够发现的只有上新世末期的一些残缺不全的化石，可以肯定，关于化石人类的存在只能记载在那个时代。

从维多利亚湖盆地特南堡发掘出来的拉玛古猿威克种化石属中新世晚期，距今约 1,200 万-1,400 万年。遗憾的是，这个发现只是根据面骨的某些部分和牙齿，然而这些化石却显示出一些属于人类的特征。但是，为了肯定这具化石的其他部分及其变动形态与人类没有明显的差别，还需要比较完整的骸骨，特别是躯体四肢的骨骼。因此，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暂时还不能判断这种形态是否已经可以区别为人类。拉玛古猿的居住地紧靠海岸森林、河川和大草原，当时，生长在南部非洲的常绿森林所分布的地区比现在要广阔得多，而现在这种森林只在南非大鬣丘南部继续保存下来。既然在东非和印度西北部都发现了拉玛古猿，那么在南部非洲大草原也同样可能有拉玛古猿。

489

距今约 500 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地区已经出现南方古猿(或人猿)，这是人类诞生年

代的最早的可靠证据。与东非出现过南方古猿一样，在南方大草原也居住过南方古猿，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经测定，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最早期，距今250万－300万年。

488

上新世的大部分地质年代是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气候适于大草原各种生物生长，对这些生物的发展和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后来，由于世界气候温度普遍下降以及发生了巨大的地壳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尤其在整个大裂谷狭长地带)，这一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由于地壳构造运动所造成的弯曲，一系列非洲河流和湖泊盆地的水系型也起了(往往是剧烈的)变化。气温变冷是更新世时期开始的标志，随之而来的是雨量减少和土地干化，因此，南部非洲干旱的卡鲁台地灌木林就向周围大大伸展，草原和森林大大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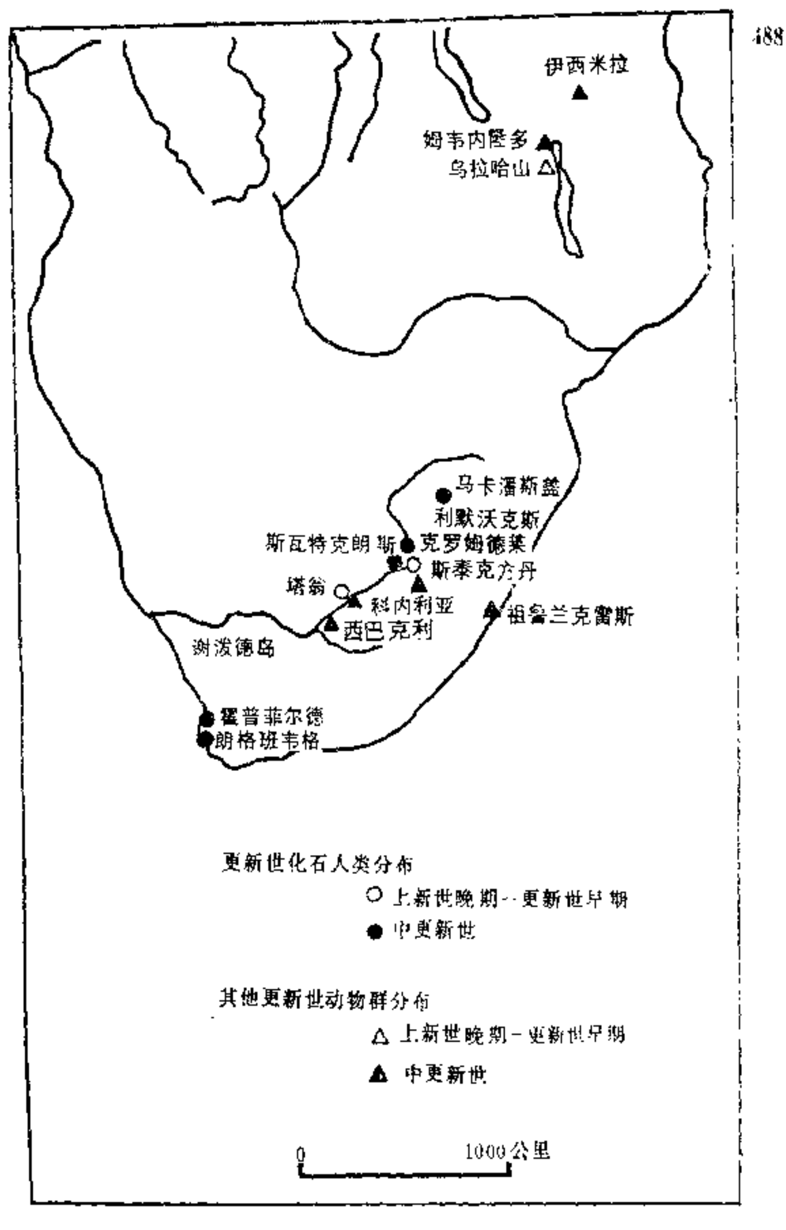


插图 20.1 上新世晚期－更新世早期南部非洲主要的动物群和化石人类分布(据J.D.克拉克，1970年)

由于气候和环境的这些巨大变化，人类必须作出重大的调整，同时在形态上发生较大的变化，以适应新环境的压力。① 到了这个时期，可以肯定，在上新世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从森林进入大草原生活的人类祖先(无论是指踠爪行走者还是比较固定用两足行走者)已经历了相当迅速的遗传变化，为适应环境而具有不止一种新的生态功能，因此，在早更新世的南部非洲，人类至少有三种形态，而且很可能已有种与种之间的杂交。

490

1924年，在南非开普省北部塔翁的一个采石场的山洞里，发现了第一个南方古猿幼年化石。1936年又在一个古老山洞的一堆沉积物中发现了第一个成年个体，这次是在德兰士

① 在南部非洲发现这一时期化石的唯一重要遗址是西开普的朗厄班韦赫。这一地点离海岸不远，周围是海湾和陆地，保存有丰富的原始形态的非洲动物群化石，经测定年代距今约300万－500万年。虽然这里至今尚未发现人类遗骸，但灵长目化石是有的，而且在朗厄班韦赫继续进行的工作很可能提供有关人类的化石证据，用来与东非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进行比较。

瓦地区的克鲁格斯多普发现的。后来，由于加强合作和研究，在东非大裂谷的沉积物中，以及在具有保存这一年代化石有利条件的南非内陆石灰岩高原各地区的深洞里，又陆续找到了大批南方古猿和其它人类化石。

除这些地区外，只有乍得湖盆地的科罗托罗发现的另一化石被认为是南方古猿化石。然而，现在这一标本被认为年代较近。因此，尽管现在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数量很多，但这些化石来自有限的地区，主要是来自南非山洞和大裂谷地区，因为保存骨化石的有利条件是比较罕见的。在非洲的许多地区，由于酸性土壤、侵蚀作用以及其它一些现象，化石很难保存下来，茂密的西非森林地区就是这样；但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距今约200万－300万年前，曾有几种不同形态的人类散居在热带草原。在东非，化石正在用放射性测定法和古地磁反向地质年代表的方法日益准确地测定年代，然而在南非发现的化石至今仍只能用古生物学和地形学的比较法作相对断代。最近通过对猪化石、象化石和鬣狗化石的研究所作的估计认为，德兰士瓦早期化石所属年代至少距今有250万年左右。在马卡潘利默沃克斯和斯泰克方丹典型遗址，在发掘出这些化石的角砾岩山洞中，有少量哺乳类动物群化石，这些化石与东非的那些动物群化石是相同的，其形态特征与早更新世时期的化石差不多。

南非的早期南方古猿大部分属纤细体型（南方古猿非洲种），平均身高1.4米，能直立行走，后肢适合于完全象两足动物那样步行，前肢适合于使用工具，脊椎下部由与人基本相同的骨盆支撑，头颅位于脊椎圆柱的中央，头骨的脑容量更近似大猩猩（450－550毫升），并不近似现代人，但躯体和齿列的形态与人基本相同。然而，面部形状却更象类人猿，面骨下部前倾，颧骨突出，眼眶上方形成宽厚的眉嵴。咀嚼器官和颈肌附着部分说明，这些器官非常强壮有力。

491 在较近期的洞穴遗址斯瓦特克朗斯和克罗姆德赖（现在认为，很可能还包括塔翁）所发现的化石大部分显得更加粗壮（南方古猿粗壮种），个体重量重得多，约68公斤，硕大的雄性南猿的头顶上有一条多骨的矢状嵴，颅骨的后部另有一条，上面附着非常强壮有力的颈肌和咀嚼肌。通常认为所有纤细型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非洲种）属早期形态，所有粗壮型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粗壮种）属晚期形态，但是新近对南方古猿的研究表明，这种区别并不象起初认为的那样清楚。现在已经证明，在南非的至少一个遗址（马卡潘）已同时发现粗壮型和纤细型两种形态。同样，在东非的下更新世地层也同时发现粗壮型和纤细型两种形态的化石。从这一地区获得的证据也说明，这两者从一个共同的、比较纤细的祖先的分化可能早在500万年以前已经发生。

最近，1972年，在图尔卡纳湖盆地东北部发现了年代测定属300万－260万年以前的一个头骨（脑容量约为810毫升）、几块长骨和其它一些破碎头盖骨和躯体化石，这些化石表明与人属有许多亲缘关系，虽然从显示出来的外貌特征（尤其从面骨和齿列）来看，这些化石也与南方古猿有关。从东非的其它地点，特别是从坦桑尼亚北部奥杜瓦伊峡谷又发现了同类亲缘关系的脑容量更大的头骨化石，这些化石既可以归入进步的南方古猿属，也可以归入早期的人属（能人），测定年代为200万－175万年以前②。在南部非洲很可能也有早期

② 从巴林戈湖盆地切索万贾发现的南方古猿粗壮种面骨碎片和上颚骨，现在认为，是300万年前的，因为这些化石还表明了与智人未定种有关的某些外貌特征。这些化石可能属于人属系族开始从南方古猿分化出来的时候。

人属化石，虽然至今尚未发现这类特征的化石。

1975年在哈达尔，在埃塞俄比亚称为阿法尔三角地带的大裂谷地区发现的人属化石证实了这种可能性。这些化石的年代为300万年以前。D. 约翰逊博士认为，已发现的十二个个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种是以一具保存得非常好的骨骼为代表的纤细型人属形态，一种是与南非古猿粗壮种相似的南方古猿粗壮型形态，第三种是根据上下颌来识别与智人有密切关系的形态。如果这一点被证实，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将是：早在300万年以前，人属系族已从南方古猿系中分化出来。

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

虽然已经在南非一些洞穴里发现大批南非古猿人类化石，但若认为发现的环境正是这些古猿的家园，即它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简直是不能令人置信的。有一个时候，人们往往认为德兰士瓦的石灰岩深洞是人类居住过的地方，洞内的动物骨化石是被捕食动物的骨骼，人类把它们搬回住地是为了制作武器和其它器具。然而，对这种被称为骨牙角文化的骨化石的比较可靠的解释是：它们是某种食肉动物的食物残余，因为对斯瓦特克朗斯遗址的动物群骸骨进行细心研究的结果表明，南方古猿的堆积物与其它哺乳动物化石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成因，最重要的成因是，它们是巨大的食肉动物的捕食物，最可能是豹或虎。然而，对这一点尚无一致看法(参阅第十七章，第307－309页)。 492

现在保存下来的人类最早期的制品都是用石头制造的，因为，除特殊情况外，大部分其它质地的器具很快就腐烂了。然而在南非(马卡潘、斯泰克方丹)发掘出古人类化石的角砾岩洞穴中并未发现通常认为的石器，虽然从东非三个属于250万年前或更早的密封人类遗址发现了石器。正如在东非发现的证据向我们表明的那样，那里的居住地点靠近湖岸或注入湖泊的河流，并且已被数量不多的骨堆和石器所证实。在这些遗址发现的被砸碎的动物遗骸属于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个体，这一点无疑说明这些骨头是人类利用石器进行集体狩猎活动的遗迹，他们的活动之一是利用石器处理肉、骨头和植物，后者必定是他们的主要食物。遗骸的种类很多，保存情况也不同，这表明这些家园至少被占据过好多天，而且不是只住一次便放弃了，虽然现已发现另外还有集体宰割巨大动物的地方。居住地点的生活废弃物遗迹的面积通常是小的，这说明这个人群可能人数不多，也许不超出两个或三个家庭。这些早期人类有时被定为食肉动物，但是他们的肉食程度是可争议的，看来更可能的是，他们虽然以肉食维持生命的比例不断增加，但他们并不比其他大个食肉动物更具有攻击性，而且很可能次于那些动物，因为他们不仅依靠肉食，而且还从丰富的植物资源取得食物。然而，狩猎组织对早期人类的确是一种刺激因素，推动了他们逐渐建立一种结构更加稳固的社会经济形式，而这种形式之所以能建立，是由于他们具有为特定目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从东非这种家园(狩猎和采集活动的收获经常搬回住地)所得到的证据表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很可能是成员经常发生变化的自由结合的群体。这些群体的结合是由于共同分享食物的做法以及子女依赖父母得到食物和教育(与今天父母对子女差不多)的时间长短。狩猎和食肉大概是促使人类为了得到切割用的石片而制造石器的重要 493

活动。狩猎需要参与者之间的有效组织和联络，到了一定时候，这种需要引起了语言的发展。男女之间活动的分工可能也在这时开始，男性从事狩猎，女性从事采集植物性食物和抚育幼儿。

然而，如果德兰士瓦洞穴不是人类的居住地，而是其它大个食肉动物贮存食物的处所(人类自己往往成为这些大个食肉动物的捕食物)，那么，南方古猿可能实际上也不会住得太远，因为在斯泰克方丹洞穴群(斯瓦特克朗斯、斯泰克方丹延伸遗址和克罗姆德赖)这些距今约有150万年的晚期角砾岩洞穴群里，除了骨化石外还发现简单石器，这些石器是用洞穴周围没有的岩石——石英岩、石英和辉绿岩巨砾——制成的，估计是从邻近营地带去的。

因为从斯瓦特克朗斯和克罗姆德赖的角砾岩晚期洞穴发现的人类遗骸大部分属于粗壮型南方古猿，人们认为这种古猿是石器的制造者。邻近的斯泰克方丹延伸遗址的情况也是一样。可是，在斯瓦特克朗斯的同一堆积物中又发现早期人属特征的头骨和面骨残片以及某些躯体部分的骨片，因为可以认为，这种形态的人更可能与工具制造有关。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南方古猿也可能制造工具，因为最近在布里斯托尔进行的实验生动地证明，一头幼年猩猩在看到打制石器的过程以及石器可作什么用途以后，是具有为获得食物而打制石片的能力的。由于在东非和南非的一些遗址既发现了南猿化石，又发现了人属化石，而且这两者又非常相似或生态学位置完全相同，南猿粗壮种具有制造简陋工具——属于已发现的最早工业复合物，即奥杜瓦伊工具——的能力就更加有可能了，虽然工具制造的发明似乎更具体地与距今250万年的早期人属形态(如能人等)的出现有关。

最早的石器：奥杜瓦伊工业复合物

494 虽然保存至今的人类最早期的人工制品是用石头制造的，但是应该记住，其它许多材料——木头、树皮、骨头、兽角、兽皮等等——也可能被利用过。

在有意识地**制造**工具之前可能已有过一段漫长的**使用**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形状合适的工具没有经过加工或只稍稍加以修整，而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明确目的则是用某种不同的材料制成少量各不相同的工具。在做成薄片或采取其它方法改变形状以后，有时对这些制品还要进一步修饰或修整。最原始的石器制品已证明，人类已具有打制石片和懂得石器制作方法的能力。

我们在世界上已有证据的最早的石器复合物被命名为奥杜瓦伊(由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而得名)，它的最早期的例证来自东非，断代为距今260万年。[③] 在古老河流的砾石(瓦尔河或赞比西河的砾石)中以及在南部非洲海岸高出水面的海滩台地发现的遗迹有些也可能属于同一时期。然而，由于这些石器不是在能够确定年代的封闭环境里被发现的，现在还不宜判断其年代，它们也有可能年代较近。我们可以预料，与东非大裂谷一样，马拉

---

③ 科比福拉KBS凝灰岩石器，经钾-氩法测定的年代是260万年前。然而，对奥莫盆地顺古纳地层和图尔卡纳湖沿岸的科比福拉地层的最近研究结果和动物群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对这些石器的年代可能估计得过早，可能性更大的年代是180万年前。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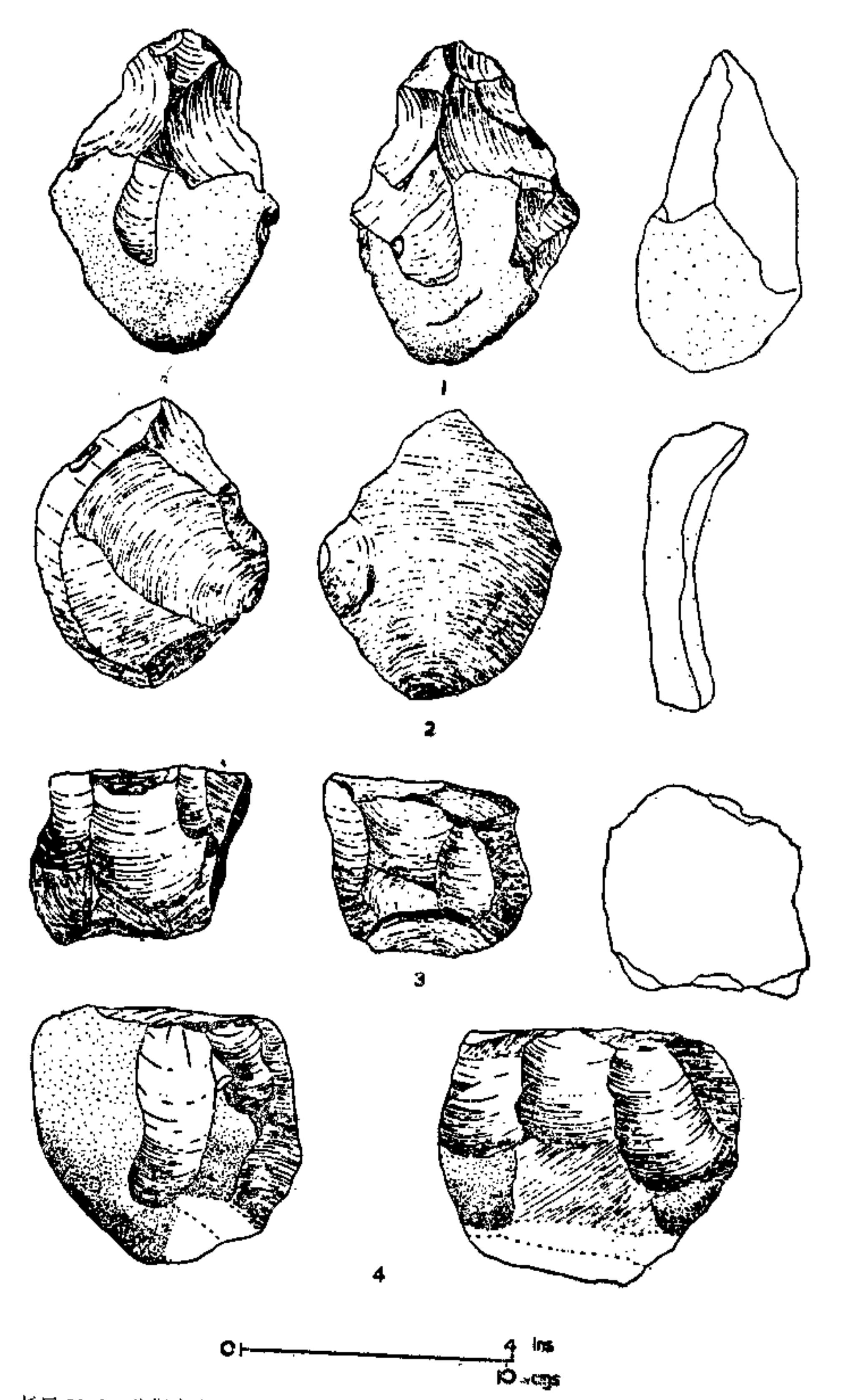


插图 20.2 从斯泰克方丹中角砾岩中发掘的早期阿舍利手斧、石片砍砸器和两件石核或砍砸器(据 R. 梅森,1962 年)

维裂谷既保存有这一时期的石器，也保存有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虽然在南部非洲北端（马拉维）发现的上新世更新世的动物群化石是在东非和南非发现的上新世更新世动物群化石之间的唯一重要环节，但由于某种原因，直至很晚这一地区仍不适于早期人类居住，一般说来，灵长目化石在南部裂谷盆地的深层沉积物中仅仅偶尔有所发现。

从克鲁格斯多普附近晚期南方古猿遗址（斯瓦特克朗斯、斯泰克方丹延伸遗址和克罗姆德赖）发现的工具可分为以下几类：用巨砾（或大石块）上剥落的石片在一面或两面加工制成的有不规则锐缘的砍砸器；往往有砍砸和重击的痕迹的多面石器；外形部分有削成锐缘的平底和圆背石器；适于切割和刮削的石片以及剥剩下来的石核。一般说来，石片和从石片上打落的碎片在斯泰克方丹延伸遗址和斯瓦特克朗斯遗址是罕见的，这一点也是某些人认为这两个遗址不是居住地点的理由。然而，随着对这两个遗址的角砾岩进行系统发掘，随着比较完整的文物遗址的发现，我们能够期望对早期人类使用石器的情况的了解大大增加。

496 同东非遗址的石器比较，这些南非石器的特征更接近于晚期而不是早期的奥杜瓦伊文化，因此，说它属于发达的奥杜瓦伊文化复合物最为恰当。在东非，发达的奥杜瓦伊文化的最早年代距今约 150 万年，而且，根据动物遗骸判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南非的后期南方古猿遗址也属于同一时期④。在那个时候，看来已相当明显地存在两个人类谱系，一个是南方古猿粗壮种谱系，另一个是包括真正人属早期代表的谱系。

阿舍利工业复合物

大约从这时开始，出现了第二个工业实体。这一实体被定名为阿舍利工业复合物，以被称之为手斧和砍砸器的大型双面切削器为特征。它同奥杜瓦伊文化的区别是，普遍说来石器体积较大，往往用大块石片制造，从石块和巨砾取得这样大的石片需要力气和技能。与此相反，奥杜瓦伊工具全都可以用一只手握住，有的还能用两个手指夹住，进行较精细的加工。发达的奥杜瓦伊复合物和阿舍利复合物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在同一时代演进的实体。在同一层位，有时只发现奥杜瓦伊工具，有时只发现阿舍利工具，有时则发现两种工具程度不等地混合在一起。对这两种工业技术传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两种传统是由遗传上属于种类不同的人类祖先创造的，或者是由与不同行为模式有关的不同活动对于不同工具的需要造成的结果（参阅第十九章）。这两种传统延续下来，直到距今约 20 万年前还与无数其他工具混在一起，这就是说，一直延续到粗壮型南方古猿和人属之间的竞争以前者灭绝而告终的很久以后。因此，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工具系列，我们倾向于这样的解释：这两种工具系列与不同的活动或资源利用方式有关，是受个人的和传统的倾向性所影响的，是由受环境制约的某一人群所制造的。因此，阿舍利文化相当突然的出现表明，

499 当时有些新的资源正得到利用，或者已发明更好的方法，用来处理已用奥杜瓦伊型工具加

---

④ C.K.布雷恩（C. K. Brain）博士最近宣布，埋有南方古猿和人属遗骸的最古老的角砾岩层可分为两个层位。从属于较早时期的层位 I 出土的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和人属化石以及一件能确切辨认的石器，而在属于较晚期的层位 II 据说则埋有人属（巨人）和以两把阿舍利型手斧为特征的砾石工业。层位 II 的年代可能是 50 万年前。（据 C.K.布雷恩个人书信。）

工过的物件。

阿舍利文化最早期的一组文物可能与斯瓦特克朗斯发现的人类祖先(人属和粗壮型南方古猿)几乎属于同一时代，这种文物出自瓦尔河及其支流克利普河汇合处费雷尼欣附近的两个毗邻遗址。这些文物埋在高出现在河面10米的阶地砾石层中，石器大半受到磨损，所以其现在所处的地层已不是这些石器的原先位置。出土的石器有好几种：用搬来的极少量的大石片制造的尖状手斧、砍砸器、多面器、砍削器、石核刮削器和一些略经修饰的石片工具，此外还有一些石核和废屑。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硬锤技术，这一点相当于欧洲阿布维尔文化。在斯泰克方丹延伸遗址发现的两种类似手斧的工具证实，它与克利普河遗址（三条河流和克勒普拉特渡口）在时间上相距不远。其他看来属于早期的文物在南部非洲各个不同地区也偶有发现，例如在开普省斯泰伦博希的古老河流阶地和赞比亚的利文斯敦附近，但这些文物不完整，年代测定更不够令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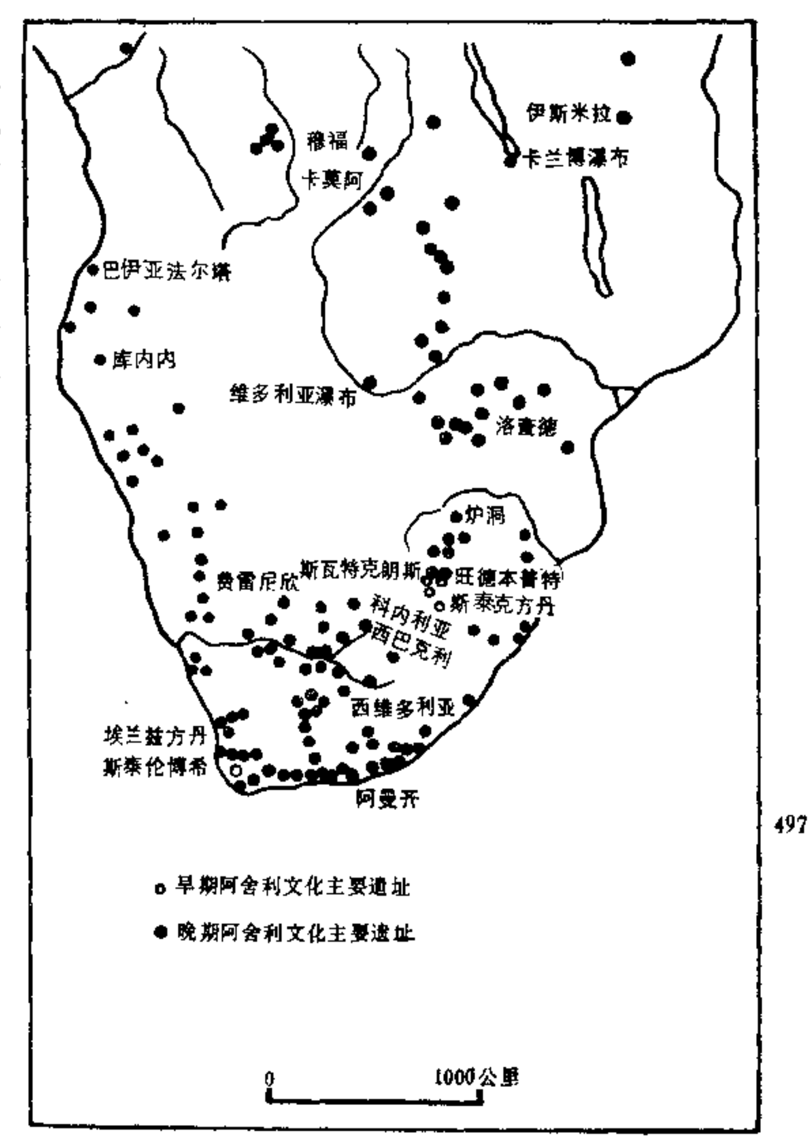


插图 20.3 南部非洲阿舍利文化遗址分布图(据J.D.克拉克，1970年)

497

在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间，早期人属的祖先(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图尔卡纳湖东岸科比福拉发现的1470号人属头骨和在奥杜瓦伊峡谷、奥莫盆地和其他一些遗址发现的能人化石)被一种比较粗壮的、脑容量较大的直立人形态所代替。大约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人群曾迅速扩散到北非以及从非洲迁移到欧洲和亚洲，因而在旧大陆的几个彼此相隔很远的地区都发现了直立人的化石和文化遗物。在非洲，现在从奥杜瓦伊峡谷第II层的上部，从埃塞俄比亚默勒卡孔图雷的发现中，从与早期阿舍利文物系列有联系的西北非和马格里布的沿海和内陆地点，都发现了脑容量大的直立人化石。直立人很可能是南部非洲阿舍利文化的成员，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其化石。

正如在整个非洲大陆一样，在南部非洲，我们是随着较晚期的阿舍利文化的发现才越来越多地发现了遗址，它们有力地说明当时的人群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要更多一些。早期

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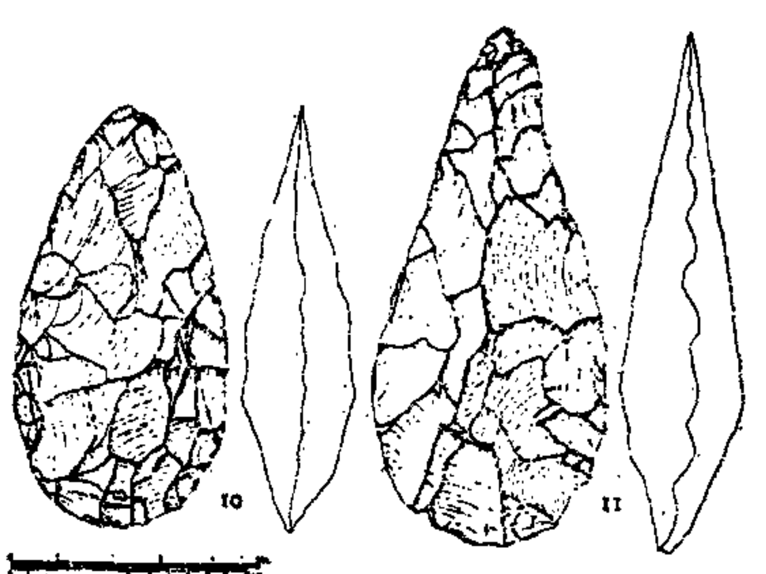


插图 20.4　赞比亚卡兰博瀑布出土的晚期阿舍利石器（据 J.D.克拉克，1970 年）断代为距今 19 万年（大型石英岩工具，小型燧石工具）：1.聚合刮削器；2.凹缘刮削器；3.锯齿状刮削器；4.多刃砍砸器；5.修整边缘的薄片刀；6.双刃砍砸器；7.卵形手斧；8.橙形石器；9.尖钻或喙形器；10.长卵形手斧；11.矛头形手斧

化石遗址之所以比较少，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沉积物保存下来的比较少，但这不大可能是说明晚期阿舍利文化在数量上明显增加和分布地区更广的主要理由。但是，虽然已发现的遗址很多（根据《非洲史前史地图》对南非的记载，这样的地点有389处，已经过考察的大部分水系都有成批的这种独特的手斧和砍砸器出土），然而已发掘的却很少，而且，石器的分布状况和居住者离开居住地点后留下的其它居住证据原封不动[⑤]保存下来的也不多。 500

从已发掘的遗址可以看出阿舍利人居住地的不同性质和某些行为习惯。这些遗址至今尚未确定准确年代，因为它们存在的年代远远超过放射性碳所能测定的时间界限，这些地点的岩石和沉积物又不宜用钾-氩法和古地磁反向地质年代法进行测定。最北的遗址位于中非赞比亚－坦桑尼亚交界处的卡兰博瀑布，那里曾发生过一系列独特的事件，以致在六层或层位更多的居住层中保存了木料。这些木料的年代是能够测定的，用氨基酸消旋法测定其中某些从较近期地层发掘出来的木料的年代是我们纪元前19万年（据J.巴达，个人书信）。这一年代与坦桑尼亚中部伊西米拉测定的年代一致，那里的一个有些类似的阿舍利文化层位用铀钍法测定年代约为26万年前。这些文物不大可能早于70万年前，即最后的古地磁倒转期（松山反向期）结束的时候；也不大可能早于125,000年前，即最后一个间冰期（义米期）开始和工业已比较进步的时期。因此，它们基本上属于中更新世的时间界限。

卡兰博瀑布地区居住集中地位于紧靠河流的沙洲，估计是在当时沿河岸生长的森林里。花粉证据表明，阿舍利文化初期的气候比较温暖，雨量比现在少，但是气候条件向干旱的转变并不足以使植物群落的类型发生明显变化。同现在一样，那时的植被类型有紧靠河岸的常绿森林，长满青草、季节性涨水的浅水河谷（泛滥平原）和生长在较高坡地的短柱豆属林地。然而，在将近阿舍利文化末期时，花粉和可见的植物遗迹所提供的证据说明，温度下降了，雨量有些增加，所以某些现在生长在比当时高300米的高度的植物下移到了卡兰博盆地。人们认为，每一居住层位至多只代表一次或两次季节性居住，尔后表层便被河中流沙、淤泥和泥浆的沉积物覆盖，在这些覆盖物上面又产生了后成的类似居住层。这些层位是互相没有关联的集中地，有相当明确的界限，在那里出土了大量手斧和砍砸器、许多修饰过的石片工具和石核刮削器，还有数量较少的尖凿、多面器和橙形器。

与石器同时发现的木制工具有一根木棒、挖土用的一些木铲、短尖器（可能也是用来挖土的）、一个薄刃状木制工具和一些可能作托盘用的树皮碎片。有些居住层为火的使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那里，发现有烧焦的树枝、木炭、灰烬和碳化浓缩的椭圆形或盆形草料和木料，在这些草料和木料附近，可能曾经是夜宿地点。此外，还发现一些烧焦了的可食类植物的种子和果实，这些植物至今仍在卡兰博盆地生长。由于这些植物的成熟是在旱季末期（9－10月），所以人们认为，这些阿舍利文化的居住层是旱季营地遗址。

在卡兰博瀑布，没有保存下来动物群化石。但是，在另一个定为中更新世的遗址，即位于马拉维湖西北端卡龙加附近的姆万甘达，曾宰杀过一头象，地点是在向东流入马拉维湖的一条溪流附近。看来，至少有三组人群参加了这次屠宰活动，因为发现了三堆骨骸，

⑤ 譬如，在瓦尔河流域西部及其支流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大量阿舍利石器。但是，虽然其中有些文物系列仍可看出一些技术上的变化，但几乎全部这种文物都似乎在地质结构中被腐蚀变形了，而且，位置也有了变动。

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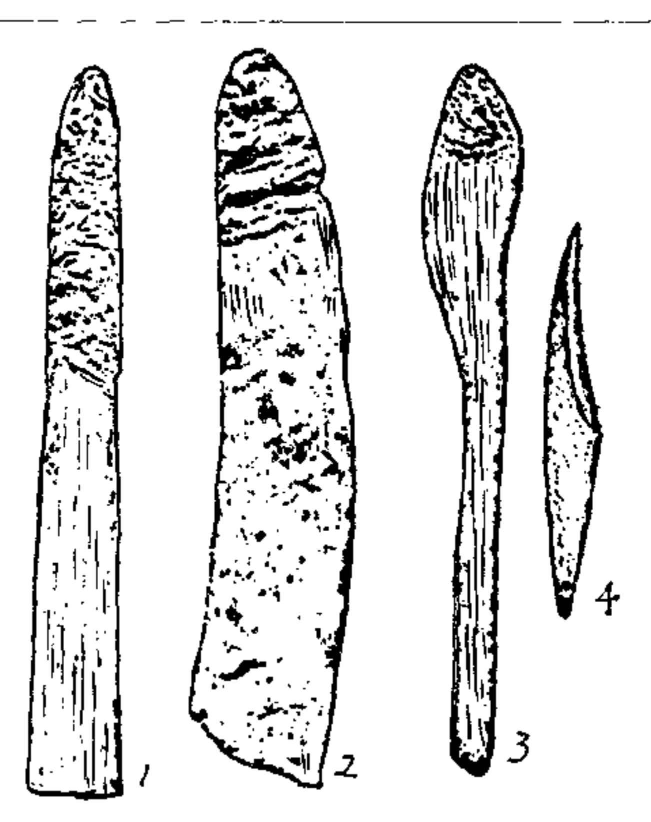


插图 20.5 从南部非洲更新世遗址出土的木制工具(据 J.D. 克拉克，1970 年)：1. 弗洛里斯巴德矿泉皮特Ⅰ号发现的投掷器柄端，距今约 48,000年；可比较 2. 澳大利亚投掷器柄端，柄端上有防止手滑脱的明显刻痕；3. 木棒和 4. 双尖头器，发现于津巴布韦卡兰博瀑布阿舍利文化层，距今 19 万年

502 每堆附近都有为这种特定场合制造而用后被抛弃的石器。这些工具大半是略加修饰的石片、小型刮削器和少量砍削器(实际上属于发达的奥杜瓦伊文化)，它们反映了更早的、奥杜瓦伊时期的屠宰工具使用情况。在瓦尔河流域布卢姆霍夫附近奥珀曼斯渡口出土的文物，不但说明了阿舍利人的屠宰技术和对剩余骨头的处理，而且也为他们的狩猎技术提供了很有意义的证据。在河道附近有几堆骨骸，与手斧处于同一层位。

有时发现阿舍利工具与相应的原料露头共生，有时又与岩屑和工场碎石混杂。我们从这类遗址(譬如津巴布韦的圭洛丘陵)了解不到环境情况，但它们似乎是经常使用的地方，例如德兰士瓦比勒陀利亚附近的旺德布姆普特，那里发现了三米厚的废弃物，而且似乎与位于南非中草原和高草原之间野生动物迁徙路线上的马加利斯堡的山口有关。

然而，在阿舍利文化时期人们喜爱的居住地点总是靠近水源，例如泛滥平原，因为那里经常有野生动物群聚居，用水也方便。卡布韦(布罗肯希尔)就是这样一个遗址，它在发掘出罗得西亚人的头骨及其它遗物的著名山丘附近。在那里，发现有一小组大型切削器与楔形器以及一些用石英制造的小型工具。另一个尚未发掘的泛滥平原化石遗址位于津巴布韦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分界处的洛查德地区，那里出土了很多手斧和砍砸器。奥兰治自由邦(南非)北部的科内利亚是另一例证。与前面提到的两个遗址不同，科内利亚出土了很多动物群化石，其中有些被认为与由少量手斧、砍砸器以及一些多面器、砍刀、石核刮削器和小型工具组成的工业有关。各种动物，尤其是大羚羊，可能是先被赶到泛滥平原的泥浆地里，然后捕杀。有理由认为，当时的高草原水源充足，而且覆盖着长有矮草的草地，间

或有小树丛以及沿河森林，可以说与现在没有很大差别。在开普省北部和博茨瓦纳的干旱的卡鲁台地灌木丛地区，阿舍利人群在浅水盆地和浅水湖周围地区定居下来。那时，在这一地区有很多浅水盆地和浅水湖。位于金伯利附近的杜伦拉赫特就是这样一个地点。在那里的一个显然被石灰岩胶结和密封了的原始结构里，发现了一个石器集中地。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地点曾被多次用来居住，可是这里没有动物群化石。

在开普省西部霍普菲尔德附近的埃兰兹方丹，有一片古老的稳定沙丘间凹地，那里的池塘或沼泽周围是阿舍利人经常狩猎巨大哺乳动物的地方。这里发现的动物群化石属于中更新世时期，一般说来具有历史上开普动物群的特征，其中包括：象、犀牛、长颈鹿、河马、大中羚羊、马和猪。这些动物群也可能是先被赶进沼泽地然后捕杀，有人认为，当时可能还使用了在水坑里投放毒物的办法。这个遗址出土的一个人类头盖骨与卡布韦(布罗肯希尔)出土的头盖骨很近似，并且明显地比直立人要进步。同样，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开普省西部的环境与现在有根本差别。 503

再往南，在福尔斯湾杭克勒普角狭窄的海岸平原，在18米海滩之下的坚硬沙丘里，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阿舍利文化遗址，它表明这条沿海地带也是阿舍利人喜爱居住的地方。那里没有发现动物群化石，但发现了大量制造精细的手斧、数量较少的砍砸器以及很多石片刮削器、石核刮削器、橙形器和小型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地中海沿岸盆地，人们尚未食用海生哺乳动物或鱼类，只食用陆地上的哺乳动物。

被作为居住地的还有泉水地区，如伊丽莎白港附近大陡坡以南冬季降雨区的阿曼齐遗址。这里的一个山脊上有几处泉水。泉水流动时，周围堆积沙层；泉水静止时，周围是泥炭层，还生长芦苇和其它植物。阿舍利人经常来到泉水旁住宿，他们抛弃在那里的工具又被来到泉水旁饮水的大象和其它动物所践踏。几组各自独立的文物已被发掘出来，在这些文物中发现了木料、植物遗迹和花粉，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植物与现在马基亚角的植物没有很大不同。

最后，南部非洲的阿舍利人有时居住在洞穴里，其中有两个洞穴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第一个是哈斯洞穴，位于德兰士瓦北部灌木丛草原的乌卡潘，其中约有9米厚的阿舍利人居住层沉积物和不同层位的炉床。对这些沉积物的分析表明，那时的降雨量比现在大。动物群化石总的说来属于中更新世，并与有历史记载以后的灌木从草原的动物群化石相似。洞内发现了一片颌骨碎片，属于一个少年，他与尼安德特人可能有亲缘关系，所以也可能与罗得西亚人有亲缘关系。石器的种类与卡兰博瀑布、杭克勒普角以及其它一些遗址的石器种类相似。在那些地方，大型切削器与重要的小型器物一起被发现。第二个洞穴是开普省南部的蒙塔古洞，它靠近常流不息的泉水和河流，位于密林植物丛中。洞内还有晚期阿舍利形态的一些叠加居住层，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动物群化石。

这些各不相同的遗址是很好的例证，说明中更新世阿舍利人喜爱的各种居住地和各种各样的文物组合。所有这些居住地都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它们都在原野上，从落叶森林(例如卡兰博瀑布和卡布韦－布罗肯希尔)到开阔的草原和草地(例如洛查德和科内利亚)或密林(例如蒙塔古和阿曼齐)，都靠近水源，有树木可遮荫，有水果可采食，在旱季则有动物群聚集。这些居住地点的位置在今天都有几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植物中间带)，如果象现 504

在已有的证据似乎表明的那样，当时总的格局与现在相似的话，那么所有植物群落都离遗址不远，可供采用。有动物群化石保存下来的遗址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喜爱捕食一些大动物，例如象、河马、长颈鹿、较大的牛和马，但是残余食物遗迹证明，也包括较小的牛和猪等等。

阿舍利人就地取材用各种原料制造石器，这表明他们有相当高的技能，用硬锤和软锤两种技术从许多石块上打制石片和制造形状适当和精巧的工具，还表明他们有能力从几种不同技术中选择最适合于加工材料的技术。在可用原料是卵形燧石或卵形石英岩的地方，便直接用卵形石打制成手斧；在必须用漂砾或大岩石作原料的地方，则发展几种巧妙的技术⑥，即先打制大石核，从大石核上打下大石片，然后用这些石片制成手斧和砍砸器。

晚期阿舍利文化在南部非洲所包括的时间可能与它在东非所包括的时间差不多长，在东非，这一时期延续的年代大约是我们纪元前70万至20万年，但现在还没有足够精确的方法可以测定阿舍利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年代差异。等到有了精确的测定办法，以及待发掘出更多的在密封条件下的遗物以后，就有可能知道是否能从数量上确定石器技术的普遍性倾向，并考证出已鉴定为属于阿舍利文化复合物的各种变异形态同居住遗址当时的古生态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

本文系概论，不得不就简叙述，但是已能说明：阿舍利文化的各组遗物已显示出整个阿舍利世界的大致格局。有些阿舍利文化系列的主要成分是手斧和砍砸器，有些是发达的奥杜瓦伊型的砍刀和小型工具，还有一些是这两种传统的混合，另外还有一些是以尖状器、石核刮削器和其它重型工具为主。因此，虽然各种工业的构成千差万别，居住地及其资源也各不相同，但是整个阿舍利文化仍有某种一致的式样，这表明这个手斧世界从这一端到另一端，主要的生活方式并无很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更新世的人类活动概括地来说就是成群地进行狩猎和采集的活动，总的说来他们过着类似的生活方式，有相当有效的联络能力。他们生活的群体比以前大了，比较经常地来到他们认为适宜的地点，有一定的随季节迁移的习惯。社会结构必定依然是开放的，允许个人自由移动和交流思想。然而，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包括森林在内依然无人居住，人口极其稀疏，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各个人群大概都生活在彼此相距很远、互不往来的状态。

505

阿舍利末期文化，即福尔史密斯文化

人们早已知道，有些文物系列是在内陆高原。这些系列的特征总的说来是手斧的器型较小和制作精巧，石片工具、石核刮削器种类多，砍砸器数量较少。在时间上，这些系列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阿舍利文化晚些，但不能十分肯定。如果确是这样，那么这些系列很可能是手斧传统的最后阶段。然而，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在表层发现的，所以可能有后来的物质混杂其间。在硅质板岩(硬化了的页岩)丰富的地区，通常采用这种岩石作石器原料，而在其它地区一般是采用石英岩。

⑥ 例如：仿勒瓦卢瓦技术、原始勒瓦卢瓦技术、勒瓦卢瓦技术、泰欣吉特和孔贝瓦技术。参阅 M.W. 布勒齐隆(M.W. Brezillon)：《高卢史前史：打制石器的名称》，增订第四版(巴黎)，第79-96页和第101-102页。

已发掘出来的这类文物的标本只有极少数也许可以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其中有一个文物遗址位于金伯利市西面鲁伊丹的一个以前的浅水盆地。那里，各种制品存在于覆盖有大片干草原石灰的约 5 米深的沉积物内，这些沉积物是由雨水冲刷淤积而成的稳定的堆积物。两面器有时是小型的，而且制造颇为粗糙。比较多的器具大都是用硅质页岩制造的小型刮削器和其它经过修饰的小型石器。在这些成组文物中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一种同时制造多片小型石片的名为圆盘状石核技术的石核制造方法，但是另一种一次制造出一片大石片的名为勒瓦卢瓦技术的石核制造方法却似乎并不存在。在另外两个密封的遗址(在温泽顿附近的瓦尔河上和奥兰治河上的弗武德水坝)，保存了类似的工业，但是那里既有勒瓦卢瓦技术，又有圆盘状石核技术。因此，除了时间差异之外，传统使用方法，也许还有其它 506 一些因素，部分地造成了石片和石核形态的这种多样性。

典型的杏状手斧是在奥兰治自由邦首次大批发现的，这些工业因此被称为福尔史密斯文化。然而，这些工业是否代表一种与阿舍利文化迥然不同的实体以致应该给予一个不同的名称，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工业经常发现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草原、卡罗台地灌木林和密林地带。对罗伊丹发现的碳酸盐用铀钍法测定的年代是距今[7] 115,000 ± 10,000年，这可能是对这些工业年代的唯一推断。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福尔史密斯工业是在什么时候被一种新的工业技术复合物，即以石片和石刀工具为主体和标志着中期石器时代开始的传统所代替，但有可能是在距今 10 万- 8 万年之间。

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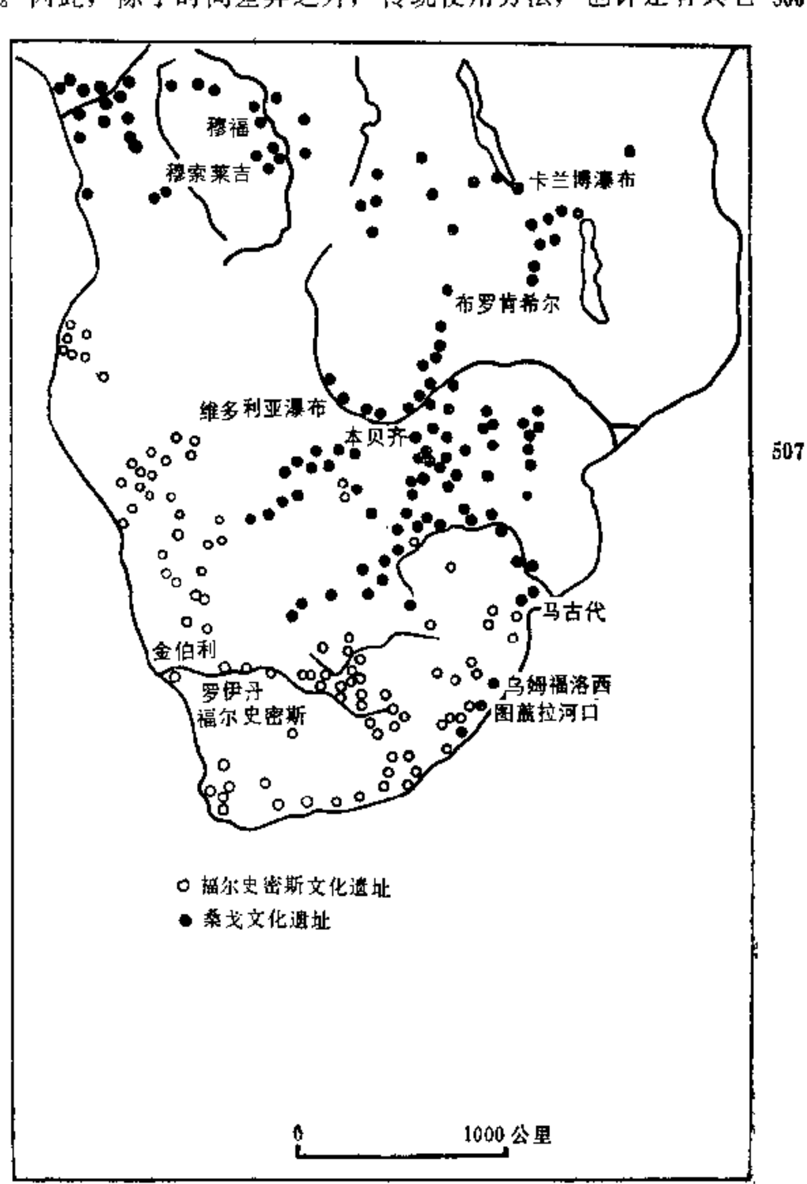


插图20.6 南部非洲福尔史密斯和桑戈文化遗址分布图(据 J. D. 克拉克，1970 年)

在中非的雨量较大、植

⑦ 这里所说的“距今”，是指首次采用碳 -14 法的 1950 年。

物生长比较茂密的地区，取代阿舍利晚期文化的不是福尔史密斯文化，而是以重型工具——尖嵩、石核斧、砍刀和石核刮削器占很大比重的工业实体。当然，这类工具在阿舍利各系列中也有存在，但除了很少为人们所知道的重型工具的变种外，在数量上并不比其它种类工具占优势。然而在上述工业实体中，这类工具在雨量较大、气温较高的地区成了重要工具，与由石片和碎片制造的轻型工具一起被发现。这类工具在赞比亚、津巴布韦、东南非某些地区（尤其是莫桑比克平原）和纳塔尔沿海地区被发现，称为桑戈工业复合物。桑戈文化系列的年代大部分难以确定，除非用比较地层学方法。因此，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些系列与分布在广阔大草原上的阿舍利晚期文化（福尔史密斯文化）属于大致相同的时代，还是较晚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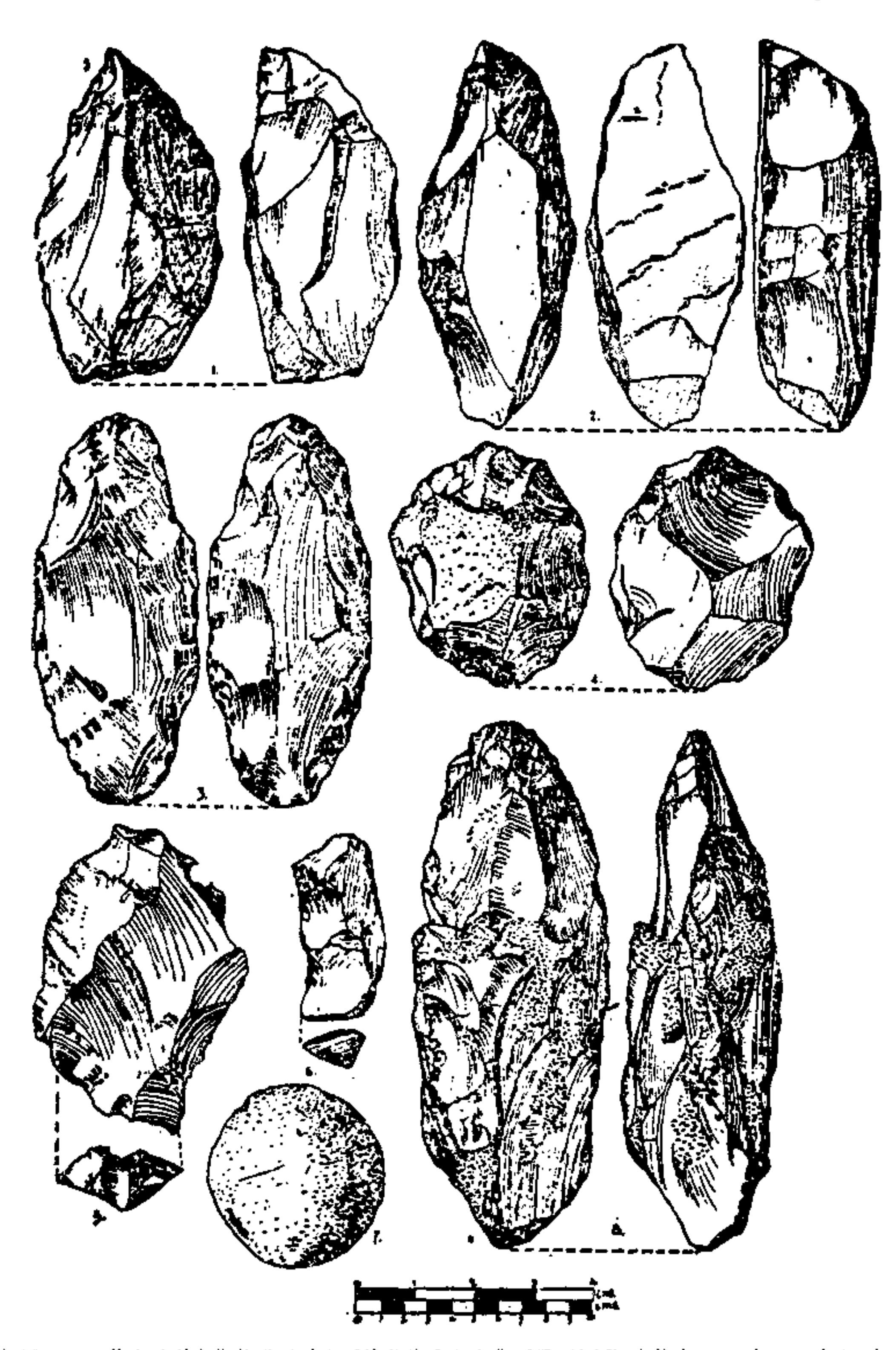
在卡兰博瀑布地区发现的桑戈文化（奇佩塔工业）根据碳－14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6,000-38,000年。在安哥拉东北部穆福发现的一个差不多的阶段的年代是距今38,000年。在津巴布韦发现的桑戈文化（圭洛工业）与所谓的原始斯蒂尔贝文化系列⑧很相似，但是据认为在时间上要早些。由于生态因素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这些类似桑戈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难断定，因为，在生活环境、传统或其它一些特有条件都以使用这种重型工具为宜的地方，重型工具可能从早期就成为重要工具，后来在这些基本原因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工具也继续保持了重要地位。这种工具与雨量大、植物生长茂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认为这种重型工具的使用是由生态因素造成的，要比认为这种重型工具的使用是石器工具进化发展中的某个特定文化阶段要有意义得多。同样，由于这些桑戈文化因素可能与植物比较茂密的类型有关，因此这些地区的较早期桑戈文化的发生可能与南非大草原的末期阿舍利文化（福尔史密斯文化）属于同一时期，它们在比较空旷的居住地是不存在的，因为，象我们已见到的，这类居住地所注重的是其它类型的工具。据说，桑戈型工业在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南非的北部和东南部都有发现。因此，在福尔史密斯文化和桑戈文化中，我们可发现工具系列已经开始有地区性专长，反映了适合草原地区的工具类型与适合林地和森林地区的工具类型互有不同。

508

中期石器时代

必须把史前人类的石器（通常是指全部遗物）看作是石器制造者生活的直接需要及其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因为遗传不同和人种不同而必然形成的不同人群的工具系列，如果联系到长期以来被称为中期石器时代的地区性系列的各种不同成分来看，这一点尤为明显。把某一个系列归入中期石器时代基本上是根据技术上和类型上的某些特征，以及可以从地层学上证明它属于介于早期石器时代和晚期石器时代之间的时期。但是，这些表示发展阶段的年代地层学术语今天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些术语的定义仍然象第一次使用时那样不够明确。此外，放射性碳地质纪年表明，由这些概念所规定的技术阶段的推测性大于真实性，

⑧　从波蒙圭和班巴塔这样的密封洞穴遗址和查武马高原上的敞开的遗址，能最清楚地看到津巴布韦这些早期斯蒂尔贝文化的成分，因此这一工业实体现改称查武马工业。尽管年代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是查武马工业的年代是距今42,000年以上，因此圭洛工业被认为更早。



539

插图20.7 赞比亚利文斯敦附近赞比西峡谷的桑戈文化石器(据J.D.克拉克,1950年):1和2.尖凿;3和8.石核斧;4.圆盘状石核;5和6.修饰过的石片;7.橙形器

而且，它们的最终产物技术和工具类型超越了石器层位的界限。有时，史前史学家在专注地研究石器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史前的大批器物和材料没有保存下来，现有的石器只是大批器物和物质的残存部分。如果当时的器物全保存至今可供我们研究的话，必定会大

大改变我们对史前工业技术的看法。此外，哪里有这种需要，哪里的工业技术就会为了适应新的压力和人群对石器的选择利用的方式而发生变化。对代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期间文化行为模式的石器工业作出各种评价时，必须考虑以上事实。

在距今10万－8万年间的某个时期，海平面开始下降5－10米，现在非洲大陆南海岸一些地点的高位海滩遗迹相当可靠地说明了这一点⑨。在那以后不久，人类就开始在新近露出水面的海滩上占据有利地点。在这些地点中，有些是洞穴，尽管这时地中海盆地和南部非洲的工业技术模式各有特点，但总的说来是类似的。

北半球最后一个冰期开始时，在热带伴随而来的是温度下降(可能约下降摄氏6－8度)和湿度下降，尽管蒸发率的降低保证了地面水的正常供应量，甚至也许比现在的水域面积更大。同时，位于赤道地带的扎伊尔盆地的半干旱气候限制了常绿森林的生长，这些森林为草原和林地所代替，这样，就为人类和动物群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栖息地。人群开始纷纷移向这片以前基本上无人居住的地区。同样，在晚更新世期间，一群群狩猎者来到了今天已成为条件恶劣的纳米布沙漠的地方，在一些宿营地遗留下他们的工具。

从中期石器时代各主要地区的地层顺序看来，技术发展的格局是一致的，从不怎么精心制造的产品到比较进步的产品，而且，总的说来，石器的体积逐渐缩小。然而尽管某些总的趋势和格局是有迹可寻的，但是一个地区的文化顺序与另一地区的文化顺序未必相仿。许多因素(生态的、技术的和社会的)很可能是造成作为这些晚更新世工业特征的地区性变异的原因。不同的生活方式要求不同的工具组合，或者要求把工具系列作不同的用途，而且，虽然非洲大陆的技术的发展可能有助于判断看上去具有新特点的技术的采用年代，但是资源的性质及其传统的开发方法可能是任何新技术特点是否和何时被接受和被采纳的决定性因素。

这时的基本技术是用勒瓦卢瓦方法和圆盘状石核方法制造石片以及先用直接撞击法、后用钻孔法制造石叶。这些石片和石叶被制成一系列小型工具，随后又修改成尖头器、刮削器、石刀、雕刻器(凿子)、钻孔器和其它一些工具。在南部非洲，这些地区性实体可根据技术的不同情况分为三大单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全部)也是根据年代顺序划分的单位。因此，把它们称为不同的类别或方面要比称为阶段更恰当，因为阶段包含年代顺序关系。

第一类别或方面(Ⅰ类)的特征是用勒瓦卢瓦方法制成的辐射状的大石片和用直接撞击法打下的长条石叶。现在发现的只有几个互不相关的系列⑩。在少数有地层进化顺序实体存在的遗址，这种技术上比较进步的遗物是在地层表面发现的，第一类文物系列是其中最早的(例如在哈斯洞穴和卡兰博瀑布)，但不同地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年代顺序上的一致关系。例如，有人认为，克拉西斯河"中期石器时代"Ⅰ号遗址距今将近8万年，而卡兰博瀑

⑨ 有人认为，海平面这最后一次的上升高度与地中海盆地最后间冰期（义米期）海平面的上升高度是一致的，后者上升的高度通常为6－8米之间。

⑩ 从马卡潘哈斯洞穴第4层发现的早期彼得斯堡文化；在克拉西斯河河口紧靠6－8米海滩上方发现的中期石器时代Ⅰ号遗址；奥兰治河规划区域(埃兰兹克卢夫)的一个敞开遗址；德兰士瓦中部的一个遗址(鲁杜斯兰德)。此外，属于类似形态的还有在卡兰博瀑布发现的纳卡萨工业，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两面重型工具，这些工具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望在布拉奇斯泰吉亚林地的实体中发现。

布纳卡萨工业距今约 39,000－30,000 年。至今尚未在可以断代的环境中发现其他系列。

其他一些属于晚更新世早期(即距今 4 万年)但不列入第一类的文物系列显示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例如，一种用粗玄岩打制的非正式石片、石核、石核刮削器、多面器、石钻和磨石是在奥兰治自由邦弗洛里斯巴德皮特I号遗址发现的。这些工具大部分特征不明显，不足以代表当时这一地点工具制造的全貌，但是也可能同时存在经过修整的长条石叶工具。皮特I号遗址还出土了一种看来象雕刻过的木制投掷器把柄和人类头盖骨碎片。弗洛里斯巴德这一层位的年代距今 48,000 多年。另一个与第一类不同但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的工业是在津巴布韦发现的查武马工业，上面已经谈到它的存在年代是 42,000 年以前。这种工业的特征是挖掘器和稀有手斧以及一组重要的小型用具，其中有尖状器、刮削器和利用过的叶片。制造工具的原料种类很多，有石髓、乳白角砾岩、石英岩和石英等。津巴布韦特温河工业(年代为距今 22,800±1,000 年)与查武马工业相似，虽然年代测定(如果准确的话)说明，现在把基本技术方法作为了解各地区的文物系列的相互关系的办法已没有什么价值。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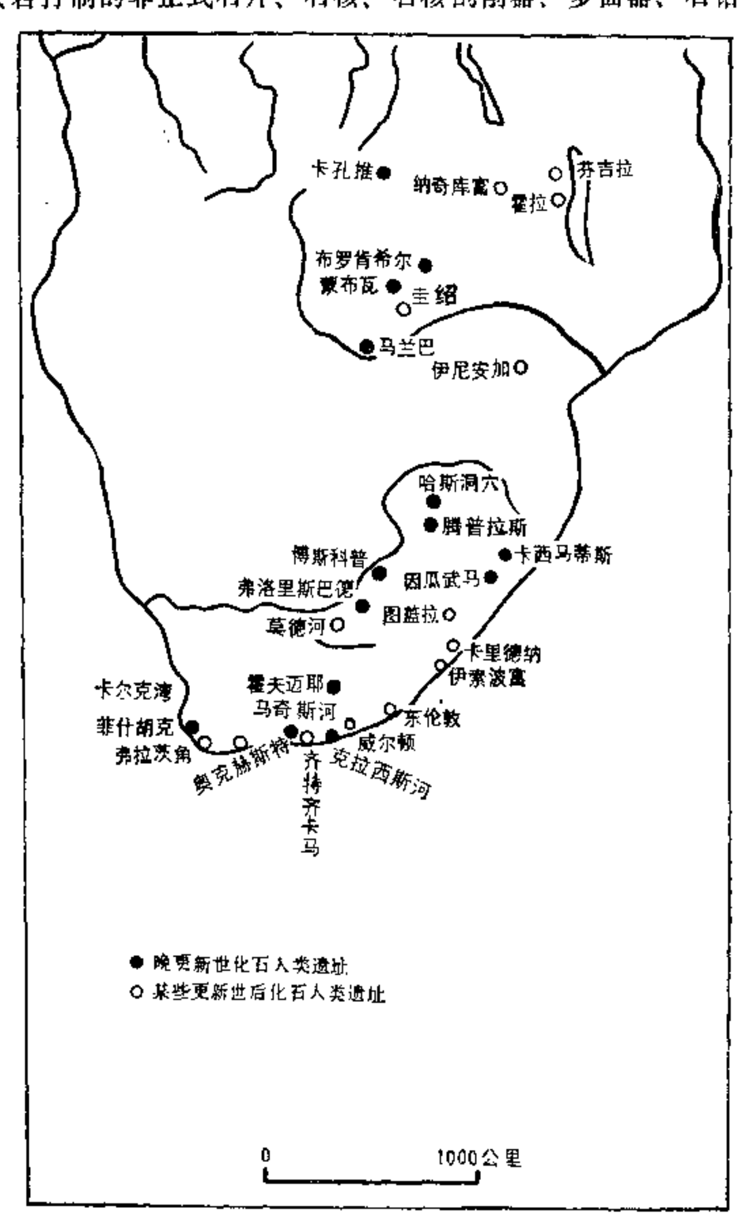


插图20.8 南部非洲晚更新世和某些更新世后的化石人类遗址(据 J.D.克拉克，1970 年)

从洞穴遗址和地层表面遗址发现的许多文物系列属于第二类工业(II 类)⑪。这些地点的年代一般在距今 4 万年到 2 万年之间，但有时也可能延续得晚些，例如在南海岸。圆盘状石核和勒瓦卢瓦技术的不同用途(尤其是用于制造三棱石片)以及一种重要的石叶工具是这

513

⑪ 第二类文物系列的例证有：哈斯洞穴第 5 层的文物系列，德兰士瓦姆武卢洞穴第 1 层的文物系列，克拉西斯河"中期石器时代"第II号遗址的文物系列，开普南部莫塞尔贝和斯基尔德盖特洞穴的文物系列以及赞比亚蒙布瓦洞穴发现的斯蒂尔贝工业。

些工业的特点。石叶和三棱石片主要是用石英岩和硅质板岩制造的，在大鬣丘以南的冬季降雨地区，在西南非，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高草原都有发现。属于第二类的这些工具修饰不多，而且只限于器具的边缘，边缘上常有齿状突起。在林波波河以北的热带林地，石英使用得很广泛，重点放在把截短的石片加工成各种刮削器和修饰不多的其它类似形状的器物。这里的工具有一部分大型工具，虽然为数不多，然而颇有意义，据说，之所以制造这些工具是由于木材及其副产品可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

第三类工业（III类）⑫ 的年代是在距今约 35,000 年到 15,000 年之间，特征是，经过修饰的石器的使用更加广泛。刮削器的修饰是采取半撞击方法，压制的方式也不罕见，叶片形尖状器可能采取从一面或两面进行整体修饰，钻孔器和晚期磨石是这一类别工业所特有的。一般说来，第三类工业的器形较小、加工细致，这种特点是前两类工业所没有的。

除上述三种类别外，还有与这三种大不相同的第四类（IV类），通常被称为马戈西工业或第二过渡性复合物。这种工业把演进了的往往是小型圆盘状石核和勒瓦卢瓦技术同用骨制、角制或硬木制的凿孔器从石核上打下来的精细的往往是带状石叶结合起来，选用的原料常常是隐晶质岩石石块或石叶，用这些原料制成的三棱尖状器、边缘刮削器和顶端刮削器往往采用圆盘状石核和勒瓦卢瓦方法，有时用压制石片的方法完成最后精细加工。在发现这些工具的同时还发现更具有中期石器时代传统的用石叶和石叶断片制造的工具，它们往往是缩小了比例的，这是些磨钝了的或有背的，或使用过的和用各种方法修整过的工具；还发现几件雕刻器或凿状工具，主要是脊状或多面体形式。这种石器似乎只存在于次大陆某些地区，如津巴布韦、赞比亚、奥兰治自由邦东部、开普省南部和纳米比亚某些地区。但在把硅质板岩作为主要原料使用的内陆高原中部显然不存在这种石器系列。如果这种分布有生态学的根据，我们就应该设法确定，在发现存在 IV 类工业的各个地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515　人们往往认为，这些演进了的工业是中期石器时代制备石核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穿孔石叶这两种技术的融合，年代大概不会比距今 15,000-20,000 年早很多（有些年代测定确实在这一时期内）。然而后来发现几种年代测定大大早于 IV 类工业，⑬ 即马戈西工业，在南非称为豪伊松斯普特（用格雷厄姆斯敦附近的一个遗址命名，第一个有特征的文物系列是在那里发现的）。遗憾的是，除了开普省的蒙塔古洞穴和津巴布韦的灿古拉工业外，有关这些发现的成分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还不能肯定这些文物系列究竟是同类的，还是代表一个以上的工业实体。

暂且假定这些文物系列是同类的，那么这些古老的年代表明，在南部非洲，发达的石叶技术和中期石器时代传统的制造石片技术是同时存在的。

北非的情况并无不同，那里两个同时代的工业复合物（达班工业和阿特利工业）存在地区差别。过去，石器系列的变革和更替通常是用遗传学上不同种族的人群的假设性迁移来

⑫ 例如，从哈斯洞穴和姆武卢洞或纳塔尔省的博德洞发现的晚期彼得斯堡工业，从开普省皮尔洞穴发现的斯蒂尔贝工业晚期部分以及从这些洞穴遗址和从津巴布韦的卡米发现的班巴塔工业。

⑬ 经测定 IV 类工业的年代是：蒙塔古洞穴为 −23,200 − > −48,850 年，开普省南部克拉西斯河工业距今约 ±36,600年，奥兰治自由邦罗斯小屋洞穴的年代是 50,000 年以上，彼得斯堡附近博德洞穴的年代是 46,300 年以上、津巴布韦马古兰的地区性 IV 类工业在距今 21,700±730 和 25,650±1,800 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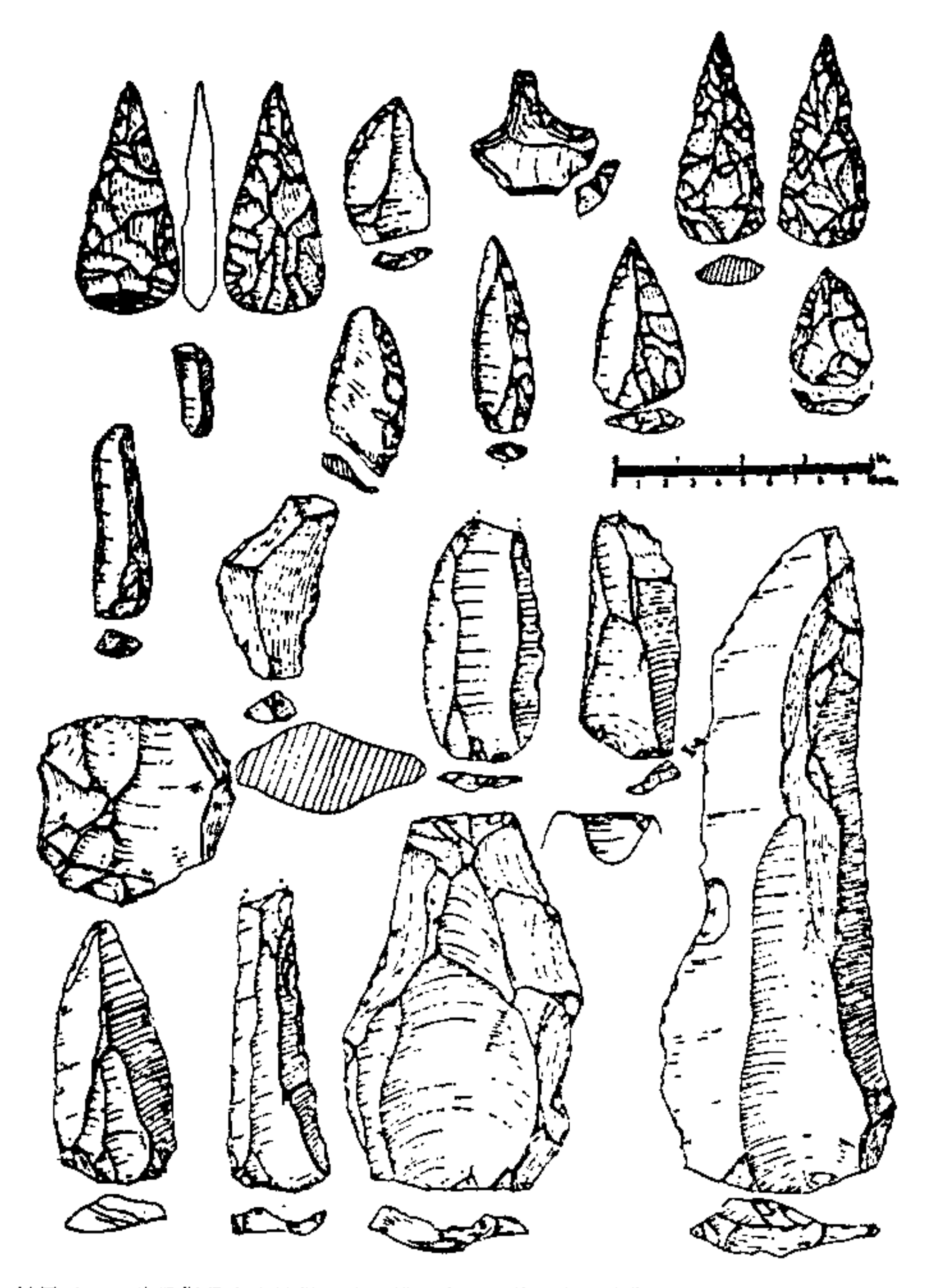


插图20.9 彼得斯堡和班巴塔工业石器，发现于德兰士瓦哈斯洞穴和津巴布韦班巴塔洞，是开阔的有刺灌木丛地区和灌木丛草原地区典型的石器(据J.D.克拉克，1970年)

解释的。不过，这种迁移假设几乎找不到其他方面的根据，在狩猎和植物采集人群中，工具被采用和传播的程度更可能是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传统工具的优点或优越性，特别是在便于利用新资源的地方。就狩猎和植物采集群落而言，除非为了占领空旷地区，如新大陆或中更新世末期以后的扎伊尔盆地和西非森林地带，这种长距离迁移的可能性较小。这种迁移更可能同食物生产群落有关。在利用同类资源和采用同样方法但彼此相当隔绝的群落间，独立的发明更可能是同时代的工具所显示的变异的原因，把这些工具的变化解释为由于大规模的人群迁移造成的，还不如解释为激发性传播更合适。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阿舍利文化结束后南部非洲的化石证据。有人认为，在萨尔达尼亚发现的头骨与阿舍利文化有关。由于在卡布韦（布罗肯希尔）发现的头骨与萨尔达尼亚头骨非常相似，因而这两者之间相隔的时间可能不是太长。在卡布韦发现的516为数很少的小型石器和橙形器被认为与这些人类化石有关，但无法测定时间，可能属于阿舍利文化晚期与中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某个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成层居住层的位置十分靠近，因此虽然可以推测这具几乎完整的头骨和其它遗物代表着一种创造当地桑戈文化或阿舍利末期文化的人类，但是在没有发明更精确的测定化石年代的方法以前，这一点依然无法证实。然而，由于萨尔达尼亚与卡布韦（布罗肯希尔）化石、在奥杜瓦伊峡谷第四层发现的头骨断片（人属 12 号）以及在东非埃亚西湖峡谷恩贾拉西发现的头骨碎片之间有些相似之处，因此，看来这些罗得西亚人和有关的智人形态，正如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那样，在中更新世晚期代替了直立人，而且，到了晚更新世初期已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带地区广泛分布。⑭

花粉学、湖沼学和其它方面的研究表明，晚期冰川作用在欧亚大陆引起了气候变化，与此同时，非洲的气候也发生了变化。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气候变化，加上人群稀少和几乎互相隔绝，才出现了朝几个不同方向的变化和发展，因为这时人类已比较有能力在遗传上和文化上适应当时他们已经安定地生活的各种环境。

不管什么原因——是发达的语言、比较进步的社会结构和技术还是其他原因——使现代人（新智人）无可否认地优越于其他人类形态，这些原因显然促进了遗传交替，从而比较迅速地代替了尼安德特人、罗得西亚人和其他适应能力较差的人类形态。现代人（以在奥莫盆地南部基比什地层和坎杰拉维多利亚湖盆地发现的头骨为代表）在距今约 20 万年前出现在东非。在南非弗洛里斯巴德发现的头骨的年代距今已 48,000 年以上，它代表一种接近现代人的早期粗壮形态。一些比较晚期的、但年代不大有把握的化石（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在距今 35,000－20,000 年之间，如在博斯科普、博德洞穴、腾普拉斯、斯克尔德哈特－皮尔洞穴、蒙布瓦以及其它地点发现的化石）代表一种以上的有地区特征的早期现代人群，这些人群创造了中期石器时代的这种或那种文化变异。

到了更新世末期，即大约一万年前，互有遗传关系但地区不同的人群（他们是今天某些种族的祖先）分化出来了：在南非和非洲中部偏东地区的大型和小型布须曼人种、在赤道非洲和西非的类黑人以及东非的尼罗河人种。化石证据是不完整的，而且通常只有一种517标本，在一种标本中的个体也很少，不足以充分说明任何一支人群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变异。然而有一点仍是十分清楚的，即非洲大陆上的土著“种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认为，他们是在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最早期在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经过长期适应和选择而进化的。

如上所述，与 IV 类（豪伊松斯普特）工具系列一起发现了钻孔石叶器件和各种有背衬的和截短的小型石叶工具，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工具是人类迁移的证据，意味着这些工具系列是现代人移居群体引进的。这种种族假设以后是否能得到证实，这些工具系列是否反映

⑭ 使用新的消旋法测定，卡布韦两件人类化石的年代距今已 10万－20 万年（J.巴达〔J.Bada〕，个人书信）。

了接受新技术(由激发性传播而传入,采用新技术是因为更有效地在当地开发有用的资源),或者,这些工具系列是不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的产物,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等待对发掘的遗址进行更具体的研究来决定。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小型或微型石叶技术的产生是与组合工具的发展相联系的,而这种组合工具需要由两种或更多的部件和(或)材料结合在一起才能提高使用效率。有柄石器或其它能提高效率的材料的使用可能开始于II类工业时期。有人认为,莫塞尔贝尖状器背面刻有凹槽以及石器的腰部经修整打出台面都说明是一种与装柄有关的改进。用来安装石刀柄或投掷尖状器等工具的最简便的物质在非洲可能是各种形态的胶质(树脂、橡胶、乳液等),必要时还用筋和韧皮捆绑。

在史前资料中,现代人的出现伴随着一系列革新文化的实践和特点。在洞穴和岩棚中以及某些在地层学上处于有利地位的敞开的遗址的深厚堆积物表明,从这时起,定期的季节性居住便成了一般性规律。看来这里的人群的结构已严密得多,虽然,当时这些人群显然仍是开放性的,其组成的变化可能也是频繁的。

各种工具的大量增加和标准化,对死者的有意识的埋葬和陪葬器物和食物,使用颜料进行装饰,可能还有仪式的出现——在北非甚至还发生了对音乐的爱好——这些都是新智人在遗传学上占绝大优势的表现。在对某些种类猎物的地区性爱好中,以及在某些需要磨细和捣碎的食用植物的越来越多的食用中,可以看到各地区的工具系列更趋向于专门化。在III类和IV类文化中开始大量出现磨制工具,尤其在我们纪元前25,000年以后。在赞比亚北部和西北部,占很大比重的重型工具与轻型工具同时存在,反映了与扎伊尔盆地和安哥拉类似的开发方式,开发的资源也是差不多的。 518

过去一向认为,中期石器时代包括大致属于同一时代的几种独立的地区性变异形态的文化(斯蒂尔贝、彼得斯堡、莫塞尔贝、豪伊松斯普特文化等),区别这些文化的是少量的地表化石,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更恰当的看法是,中期石器时代的各种工业是在生物地理上逐步适应不同地区的产物,在这些地区,人群的需要和活动决定着对不同石器原料的选择和使用程度。了解这些不同原料——木材、石料、骨和角等——对人群的相对重要性的最好办法是,对史前生态学资料与遗址沉积物的分析研究资料进行比较。⑮一组简陋的石器不一定意味着落后,一组精制的石器也不一定意味着先进。单凭石器得到的有关石器制造者的活动情况是微乎其微的。石器必须与同一居住地保存下来的所有其它物件及其特征联系在一起才能提供重要情况。现在从中期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特点不如从阿舍利文化和更早期的文化遗址发现的特点多。我们从哈斯洞穴发现了炉床的证据,从蒙塔古洞穴还确实发现了石器与炉床一起散布在同一层位的现象。在奥兰治亚I号遗址发现了几处小型防风墙石头地基,在奥兰治规划地区济库哈特27号遗址发现了一处大屏蔽活动地区的证据。从德兰士瓦中部卡尔克班克的灌木丛草原遗址发现了一次或多次成功的狩猎所形成的骨堆,从斯威士兰的狮洞则发现了早在28,000年前就已开始从赤铁矿提取颜料的证据。在卡兰博瀑布碎石I号层位发现了剥制石片用的固定石钻,其存在年代大约距今27,000

⑮ 文化遗址沉积物的分析方法是维塔·芬齐和希格斯发明的(1970年),用以从某一史前遗址测定当时这个被开发地区的潜在资源。采取这种分析法需要先确定地界并确定当时的生境和生物气象同目前的生境和生物气象有多大区别。见维塔·芬齐(Vita Finzi)和E. S. 希格斯著(E. S. Higgs):《巴勒斯坦卡尔梅山地区的史前经济:文化遗址沉积物分析》,载《史前社会年报》,第36期,1970年,第1-37页。

年。那里还有围成小圈的石块，可说明当年的炉床位置。另外，在博茨瓦纳的纳塔河流域还发现了班巴塔工业狩猎者的一个营地的零散石器。看来是吃剩的动物遗骸表明，较大的猎获动物是主要的食物来源，某些动物如水牛、角马、狷羚、斑马和猪是经常被带回居住地点的动物。一般说来，被发现属于中期石器时代的动物的种类似乎比在阿舍利遗址发现的种类要多得多。但证据表明，虽然狩猎活动似乎因为狩猎工具比较优良而提高了效率，但是猎获物的种类依然五花八门，直到晚期石器时代，猎获物才具有比较有选择的特点。

519

总之，所谓中期石器时代的遗物，再也不能认为是自始至终走向比较精细或进步的技术的简单进程。如果断代正确的话，应该认为这些遗物表明，它们是基本上属于同一经济基础的不同技术。这些技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作用，并且可能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已经辨明了的不同变异很可能反映了各地区的资源和爱好，虽然其中大部分仍有待于作出精确的说明。有些地区，某些成层遗址(例如哈斯洞穴)显示出明显的演化顺序，然而在其他一些遗址(例如南非南海岸的克拉西斯河和津巴布韦的宗贝帕塔洞)，地层顺序显示出一种与法国西部的莫斯特文化传统相似的格局，不同类群的遗物会以表面不连贯的格局相继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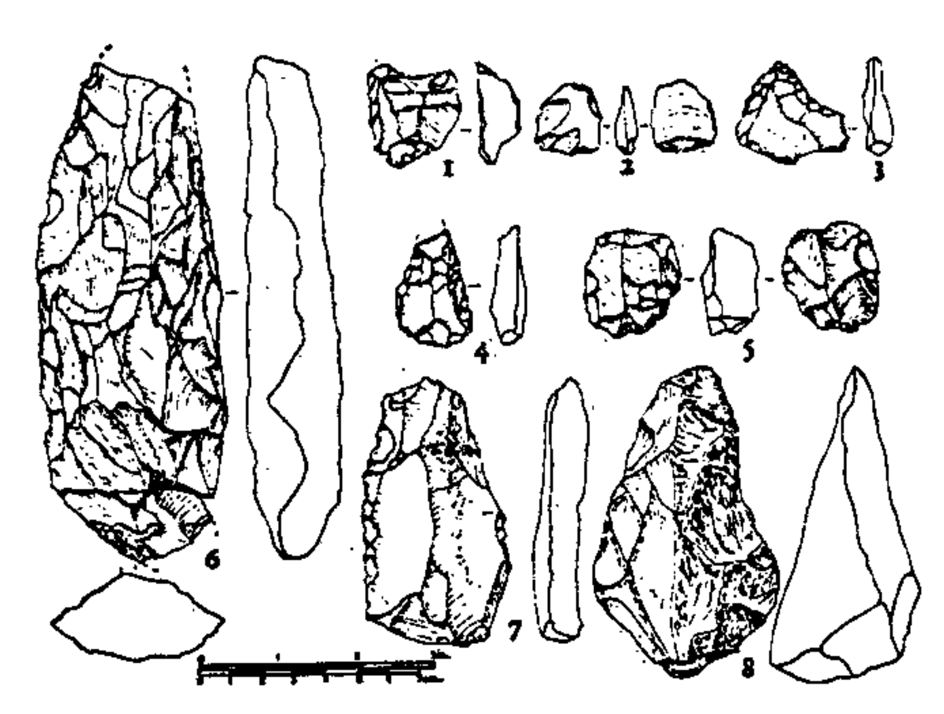


插图20.10 在特温河流域发现的中期石器时代工业，赞比亚的布拉奇斯泰吉亚林地的典型石器(据J.D.克拉克．1970年)，断代为距今32,000-22,000年：1.角形刮削器；2.由小圆盘状石核制成的利用过的石片；3.拉削器；4.有缺口的拉削器；5.窄边刮削器；6,7.大双面器；8.手斧(3为燧石，8为粗玄岩，其余为石英)

这些由某一类遗物取代了另一类遗物的现象可能有经济的原因，反映生态变化和由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对食物选择的变化。从一些肤浅的证据看来，是这种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的动物群化石分析和花粉资料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些变化是否能确定是在广大生物地理区域内同时发生的，还是仅仅反映了某单一遗址在很长时期里食物来源的地方性变化。

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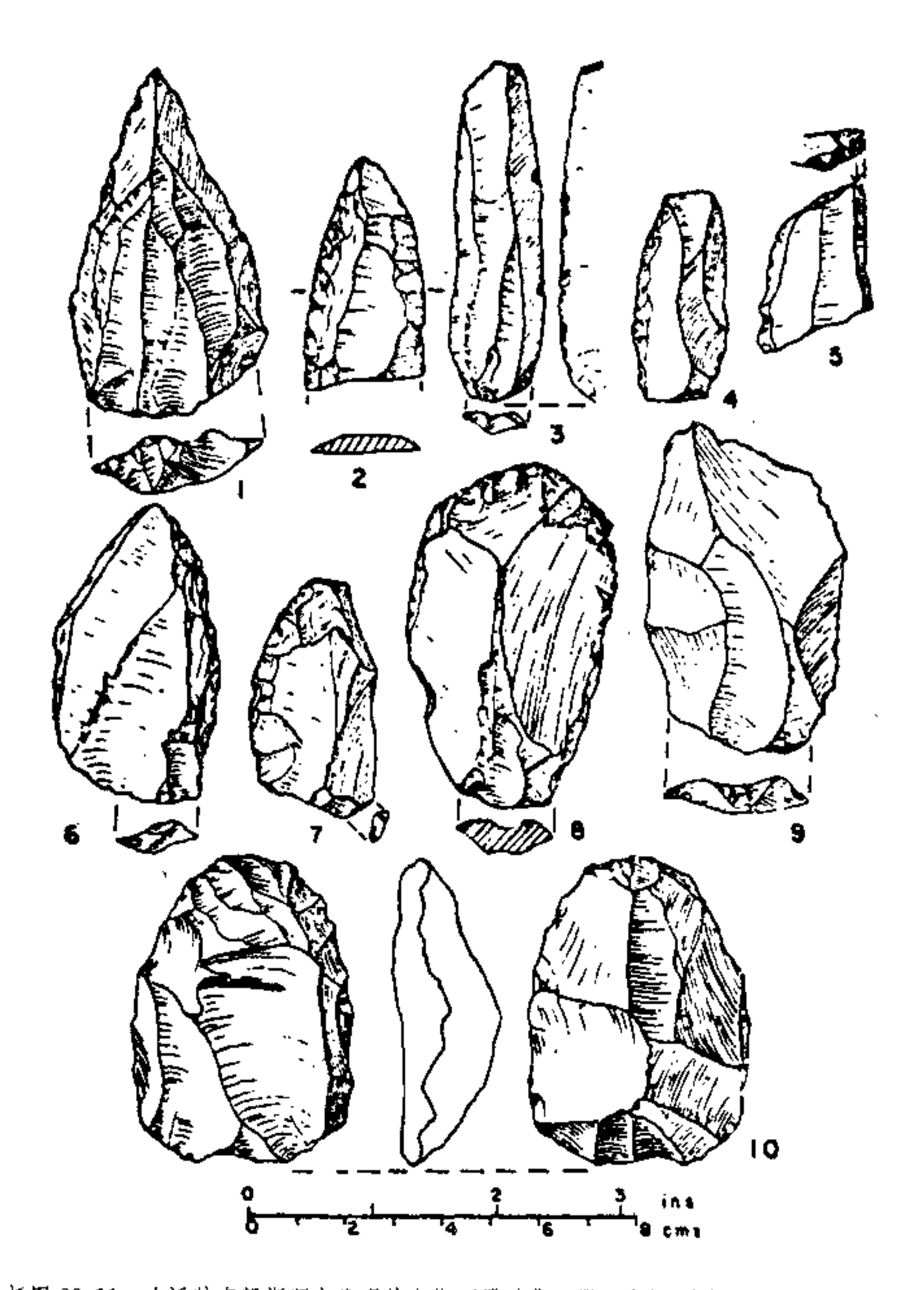


插图 20.11 在沃特克朗斯洞穴发现的中期石器时代石器，卡罗.卡拉哈里荆棘草原典型的猎人工具(据 J.D.克拉克，1971 年)，除 6 是页岩石器外，其余都是燧石石器：1 和 2.单面尖状器；3.利用过的石叶；4，6 和 7.单边刮削器；5.截顶雕刻器；8.顶端刮削器；9.勒瓦卢瓦石片；10.勒瓦卢瓦石核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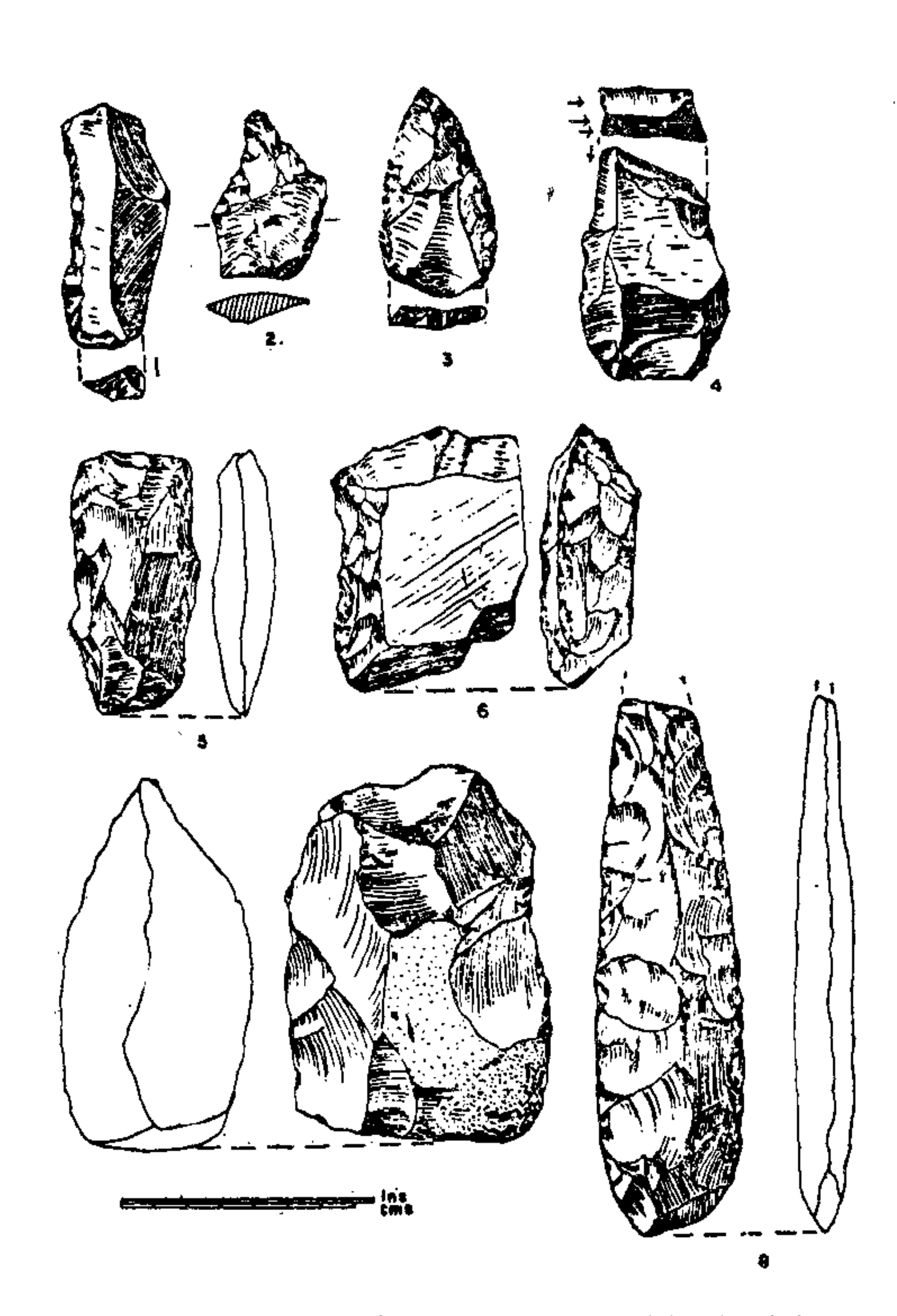


插图 20.12 1956年从与布拉奇斯泰吉亚林地和常绿森林有关的卡兰博瀑布碎石Ⅰ号B1遗址发现的卢彭巴工业复合物中期石器时代的工具(据 J.D.克拉克，1970年)：1.单凹边刮削器(燧石)；2.齿状、聚合和鼻状刮削器(燧石)；3.单面尖状器(燧石)；4.双面雕刻器(石英岩)；5.石核手斧(燧石)；6.石核刮削器(燧石)；7.砍刀(石英岩)；8.矛头(燧石)

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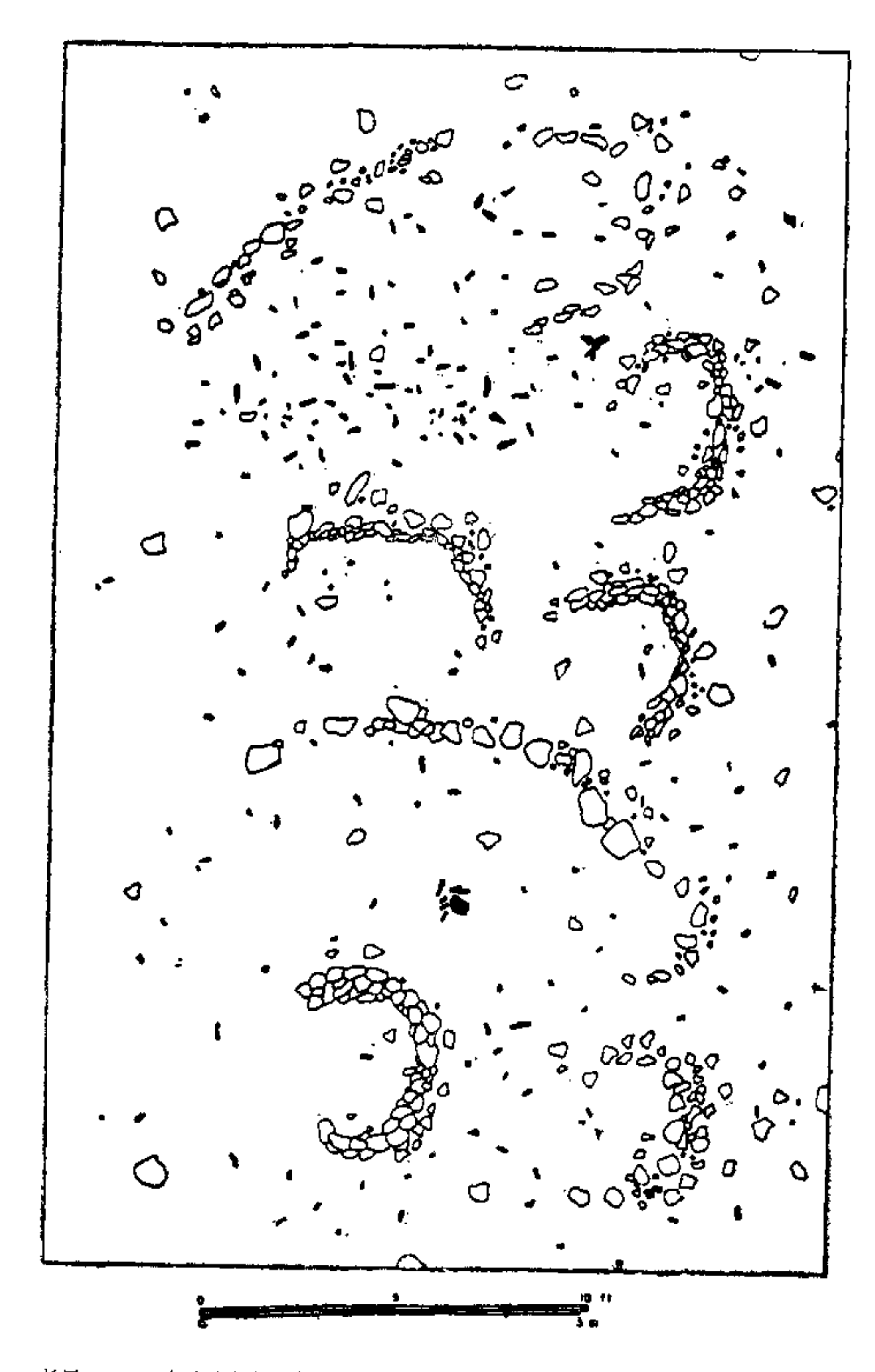


插图 20.13 奥兰治自由邦奥兰治亚一个居住地遗址的与粗玄岩巨砾石结构有关的利用过的石叶和石叶碎片分布图(据 C.G.桑普森，1974 年)

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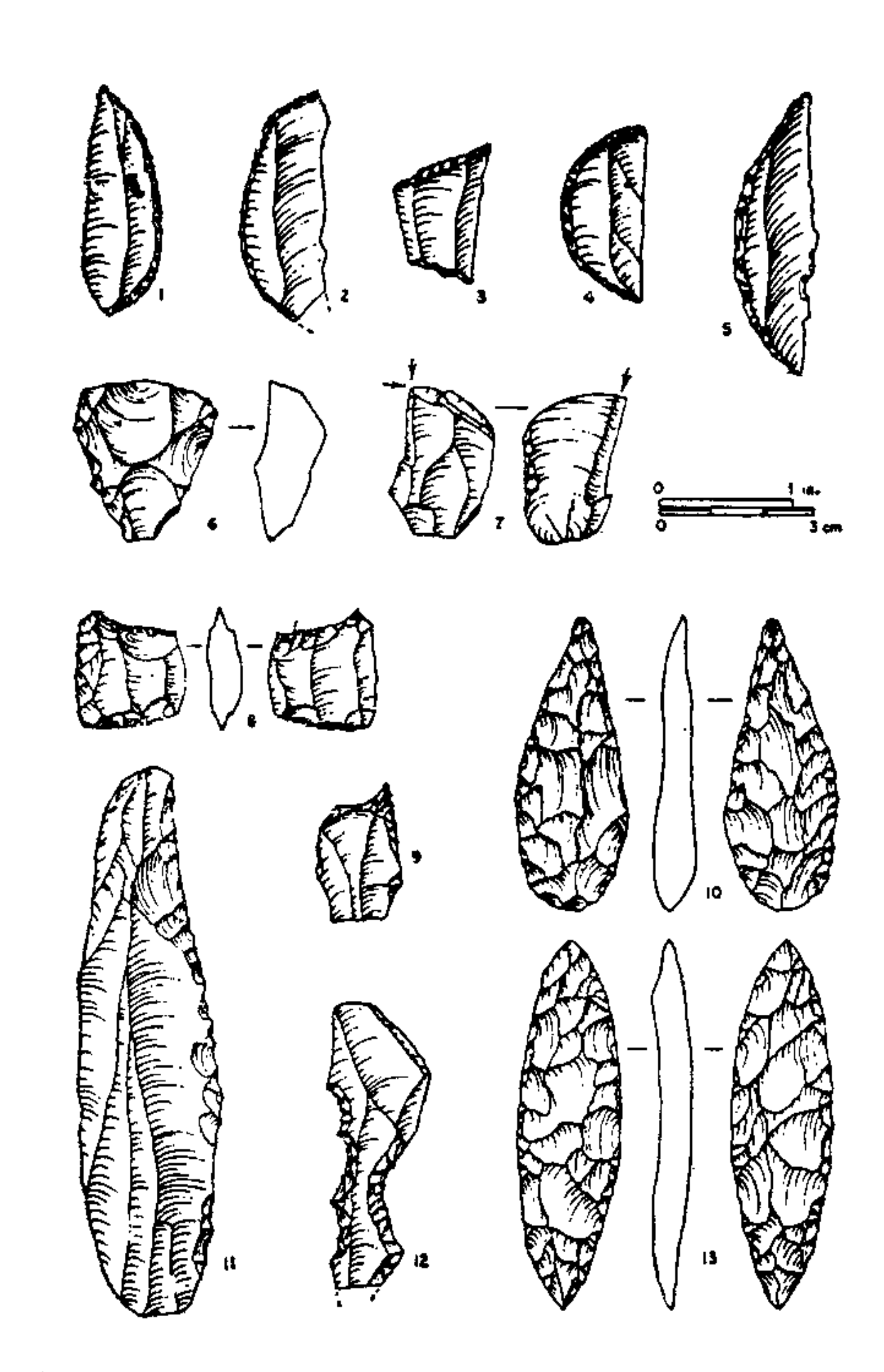


插图 20.14　在南部非洲豪伊松斯普特遗址发现的属于中期石器时代 IV 类的石器，发现于从密林到温带草原和干旱林地的环境(据 C.G.桑普森，1974 年)：1、2，4.5.弯背衬月牙形石器；3.利用过的勒瓦卢瓦石核；7.雕刻器；8.贝壳器；9.钻孔器；10.13.双面尖状器；11.单边刮削器；12.双边刮削器。标本 2、3 和 5 发现于豪伊松斯普特，其余发现于隧道洞穴

虽然南部非洲中期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致属于同一时代，但是它的几个早期阶段（尽管已知的情况还很不充分）总的说来似乎与欧洲莫斯特文化或中东雅布鲁德和前欧里尼亚文化更属于同一时代。

晚期石器时代

人们对南部非洲的晚期石器时代的传统概念是一些以细石器为主的工业，具有这种特征的工业在开普省西部一个洞穴遗址首先被发现和叙述，因此通常称为威尔顿文化。还有一种是高草原硅质板岩地区的史密斯菲尔德刮削器工业。然而，在次大陆的某些地区还发现了一些被称为前威尔顿文化的工业，这种工业出现的时间略晚于 20,000 年前，代表石器技术的一种根本性变化。中期石器时代的经过预制的石核技术被非正式的石核和从石核上打下的不规则石片的出现所代替。唯一始终使用的正式工具看来是各式各样的包括石片和陡缘刮削器在内的比较大型的刮削器，还有一些器型较小的凸面刮削器。这类石器发现于南海岸⑯、奥兰治自由邦⑰、德兰士瓦⑱和纳米比亚⑲。在纳米比亚发现这类石器时还发现了宰杀三头象的遗迹。

在津巴布韦，类似的工业是距今±9,400 年和 12,200 年的波蒙圭文化。这种工业特别与大量白灰炉床有关，某些最初的骨制尖状器属于这一时代。从赞比亚豹山洞发现了可能与此有关的遗物，时间距今 21,000－23,000 年。在庞多兰（乌姗加扎纳洞穴）、赞比亚赞比西河流域中部（卢坎达）以及其它地区发现了另一些至今未确定年代的类似遗物。这种分布状况表明，在距今大约 20,000 到 9,000 年之间，这种技术上的根本变化可能相当普遍。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现在还不清楚，但据笔者推测，可能由于两种原因，一是环境的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变化在南部非洲的一些遗址（如纳尔逊湾洞穴、宗贝帕塔洞穴等等）已可证实；另一个原因是更有效的工具的独立发展或传播，尤其是与新狩猎方法有关的工具。

525

有些证据表明，这些前威尔顿工业与有蹄类大动物群即狷羚、角马、兰羚、斑驴有关。此外，在纳尔逊湾洞穴，这种工业看来与距今 12,000 年以后不久的生态变化有关，那时草原植物群被常绿森林所代替，同时，相当大量的海生动物遗骸也表明，由于更新世末期海平面升高，人类有可能从这个洞穴直接从海内取得食物。

现在看来，有背衬细石器占很大比率的小型石叶工业在中南非的出现比人们想象的还早得多。最早的这种工业之一是在赞比亚发现的最早期的纳奇库福工业复合物，（纳奇库福Ⅰ号）其最早的年代是距今 16,715±95 年。当地的威尔顿工业在津巴布韦是开始于距今约 12,000 年（灿古拉洞穴），在南非则略迟一些（例如，距今 8,000－5,000 年以前）。与这些工业以及中南非其他一些早期工业同时存在的有在东非一些遗址——乌干达（布武马岛的穆尼

⑯ 距今 18,000 年到 12,000 年的纳尔逊湾洞穴；距今 11,250－10,500 年的马奇斯河；还有奥克赫斯特。在纳尔逊湾洞穴里，有一种覆盖着至今尚未命名的陡缘刮削器工业，距今 12,000－9,000 年。大部分石器是大型石片工具，没有细石器。类似的前威尔顿工业在南部山区的其它遗址，如梅尔克象特布姆等也有发现，年代为10,500±190年。

⑰ 史密斯菲尔德文化，例如在济库哈特 13 号发现的Ⅰ类工业。

⑱ 奥伊特孔斯特，时间距今 7,680 年。

⑲ 温特和克，时间距今± 10,000 年。

亚马洞穴，距今14,480±130年)、肯尼亚的纳库鲁-奈瓦沙裂谷(长沙堆，距今13,300±300年)和坦桑尼亚中部(基塞塞岩洞，距今18,190±300年)——发现的完整细石器有背衬石叶工业。扎伊尔盆地的奇托洛工业(距今12,970±250年)是与此同源的，但具有地区性的发展特点。

细石器传统是与效率较高的组合工具的发展相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弓和箭。虽然尚未弄清这种武器在非洲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很可能是在更新世末期)，但是各种形式的骨制尖状器和连结轴(据说也是箭头)与月牙形石器和其他小型有背衬的当箭头的石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中有些箭头的年代可能是12,000年以前。

有人认为，在南部非洲许多不同地区的细石器工业中，石器的发展顺序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在其它地区，如赞比亚西北部，圆盘状石核显然一直存在到我们纪元前第二个千年期，而这时其它地区(例如奥兰治自由邦)的威尔顿文化细石器成分似乎已经消失，后来被以刮削器为主的工业(史密斯菲尔德 B)所代替。526

已知的晚期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比中期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得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全新世早期是一个人口增加的时期。也是从这时起(即从距今约一万年开始)，住人的洞穴和岩石隐蔽所开始比以前多了，当地资源被利用也比以前多，而且在居住地点发现的动物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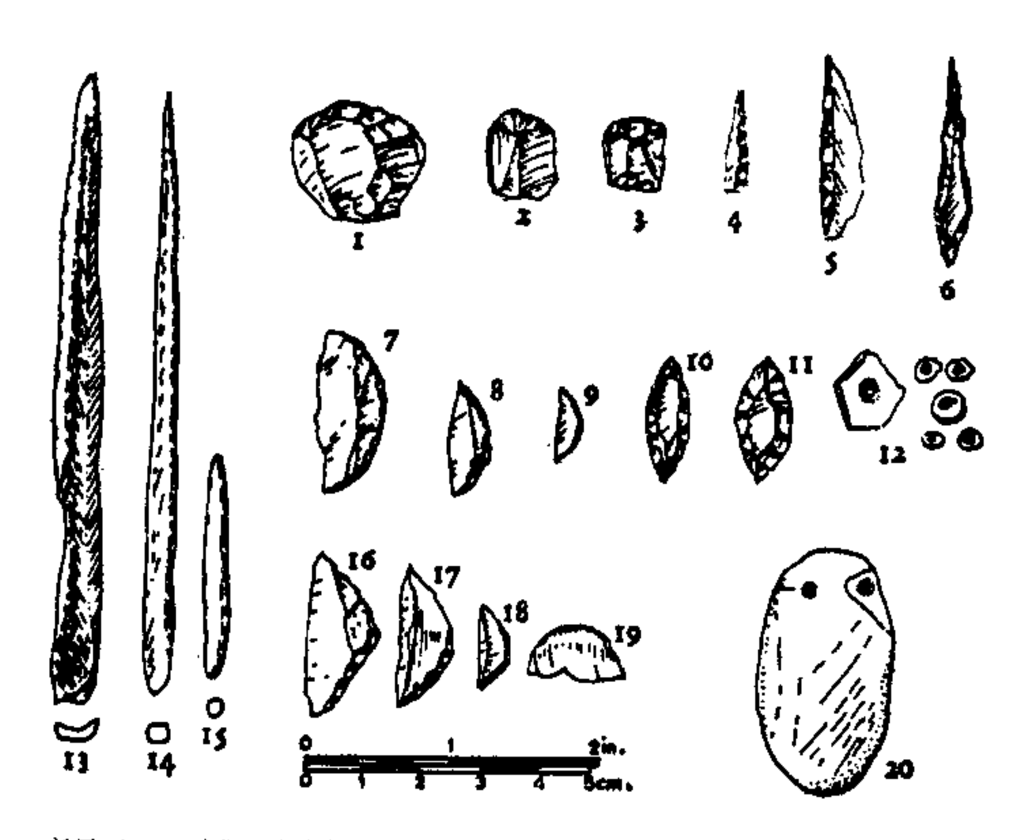


插图 20.15　晚期石器时代威尔顿综合体石器(据 J.D.克拉克，1970 年)。1-12.燧石和玉髓，南非开普省(据 M.C.伯基特，1928 年)：1-3.短顶端刮削器；4,5.直背细石器；6,尖锥：7-9.月牙形石器；10,11.双面月牙形石器；12.鸵鸟蛋壳串珠；3,4,12.发现于威尔顿岩洞，其余发现于弗拉茨角；13，20.马托波(=罗得西亚威尔顿)工业石器，发现于津巴布韦马托波山阿马津巴洞穴(据 C.K.库克和 K.R.鲁宾逊，1954 年)；13.抹刀形骨锥；14.粗的一端有斜角的骨制尖状器；15.连结轴：16-19.月牙形石器和深陷月牙形石器，石英；20.石板垂饰

系列表明，这时更注重狩猎或设陷阱捕捉动物。这种利用资源的方式，同今天的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以及赤道干旱地带的其他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利用资源的方式没有很大差别。

人群的迁移和居住范围势必受到水、植物和动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的调节，并且还应估计到各邻近人群经常性的相互影响。住在淡水水源地区和海边的人群，这时已利用鱼类、贝类和水生哺乳动物资源。有些人群集中捕捉大的羚羊群，还有一些则集中猎取小动物。在开普省南部山区的腹地，最普遍的石器是各种各样的小型刮削器，食物残余主要是较小的哺乳动物的，这些动物可能是用陷阱或罗网猎取的。另一方面，在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其它一些地方的草原和林地，各种工业包含大批月牙形细石器和有背衬石叶工具，一起发现的还有大型哺乳动物的食物残余。这些工具表明，当时主要武器很可能是弓和箭，这种细石器单个地或成对地装上柄，成为宽而锐利的箭头，与流传至今的古王朝时代的埃及人和有历史记载的桑人用的箭头相似。人群的地区分布势必与不同生态因素有关，但是在开普省西部(德杭恩)发现的情况是，史前晚期的桑人群体冬天住在海边，主要从海里取得食物为生；夏天住在离海边140公里的内陆山区，在那里以各种植物和蹄兔、乌龟等小动物为食物。

527
528

晚期石器时代生活在南部非洲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占据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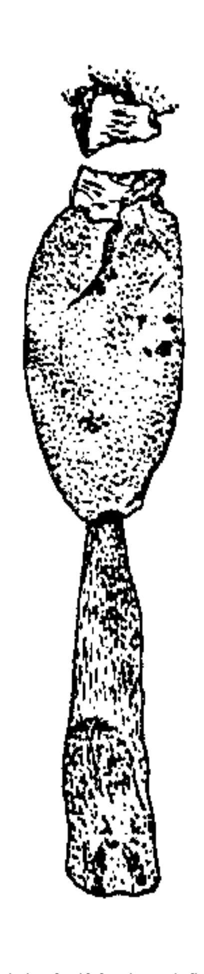


插图20.16 燧石制月牙形片状手斧或刮削器，用乳香树脂粘合，装有犀牛骨手柄，发现于南非开普省西部普莱滕贝赫湾的一个洞穴(据J.D.克拉克，1970年)

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一些地区。这里的狩猎资源几乎取之不竭，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充分时机从事智力趣味活动，这在德拉肯斯堡山区、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出色的岩石艺术中可得到一些证明。虽然这些艺术有很大一部分不早于 2,000－3,000 年前，但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些史前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生活方式的无可比拟的记载，这种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直至今天仍在卡拉哈里中部桑人的生活中保留着。

这种艺术的起源显然也非常古老，在南部非洲所发现的最早的绘画是在纳米比亚的阿波罗 II 号岩洞的距今 28,000 年的层位的石板上。

在我们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群体在南部非洲许多地方已被具有冶金知识的人群所代替。这些人群很可能是从他们某地的故乡——有人认为是在西北非(乍得和喀麦隆)——迁到次大陆的班图语人群的先锋。因此，在南部非洲找不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证据，这意味着当时那里只存在使用石器，尤其是使用磨尖和磨光手斧的人，不存在会制造陶器和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然而，必须说明，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在早期铁器时代人群来到之前那里种植过植物，但是有一点可以相当肯定，就是在西南非的晚期石器时代，有些人群养过羊，后来又养过牛，至少在我们纪元前的第一个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是这样。这些人群中有一些可能与历史上的科伊科伊人有关系，他们是游牧者，不种庄稼，可是却制造一种有特色的陶器。然而至今尚未发掘能肯定判明是游牧者居住的遗址，因此，关于这些人群的了解只能从历史资料中获得，至今还不能从考古中获得。至于他们是在何时开始有家畜的，现在还有争论。有人根据语言资料认为，家畜是从非洲东部和中部的苏丹语族传去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早期铁器时代的移民传入的。不管最初来自哪里，这一游牧阶段最早也不可能开始于我们纪元前 300 年以前，它的结束是在我们纪元十八世纪。

因此，南部非洲史前史研究提供的材料表明，内陆高原的工具制造者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后继的人群以越来越大的创造力和效率发展了各种生活模式，他们使用文化工具对他们居住地的生态系统中的资源进行更多的开发，这些情况都有助于解释当今南部非洲土著居民(桑人、科伊科伊人、伯格达马人、奥瓦津巴人、特瓦人和班图人)所表现的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同样也有助于证明，至今依然保持下来的许多行为习俗源远流长，是同过去有着密切联系的。

529

(吴长福　吴　名译)

21 中非史前史

第一部分

R. 德贝勒·德爱尔芒

引言

从地理上说，扎伊尔盆地西起几内亚湾，东至大湖群地带，南起南纬10度左右的安哥拉和沙巴(前加丹加)，北至乍得和扎伊尔两大水系的分水岭①。

这个地区大部分处于赤道地带，其植被包括一部分非洲最稠密的森林。现已知道，这个森林地带在历史上几个多雨时期，向北延伸的范围远比今天宽阔。千万年来，森林逐渐缩小了，如今只剩下一些宽窄不同的沿着河流伸延的条形林带。我们强调这一植被的重要性，是因为植被在这一地区史前史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根据最近的研究，一般认为，史前史文化，看来尤其是阿舍利时期以后的史前史文化，由于受原始森林的局限，未曾与植物生长较为稀疏地带的居民发生任何接触，其发展是地区性的。在北部，新石器时代的大批移民从东向西迁徙，从未穿过森林，只沿着边缘活动，好象森林是一个可怕的屏障，一个可怕的天地，习惯于生活在大草原和空旷原野的人不敢贸然进入。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和后期的工业，还是新石器时期的工业，或洞穴艺术（而且，洞穴艺术在扎伊尔盆地并不常见），都提供不出什么根据，使人相信这里的人与生活在撒哈拉的人有过接触；那时的撒哈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片干旱大沙漠。为寻求接触的痕迹，我们必须放眼于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同样地，必须在那些地方寻找移居西部赤道大森林的部落群当年大规模迁移的出发点。

在第四纪，扎伊尔盆地的气候看来与东非的气候十分相似，但在海拔高的山区，气候条件可能因地而异。G.莫特尔芒(1952年)认为，曾经有过四个洪积期和两个潮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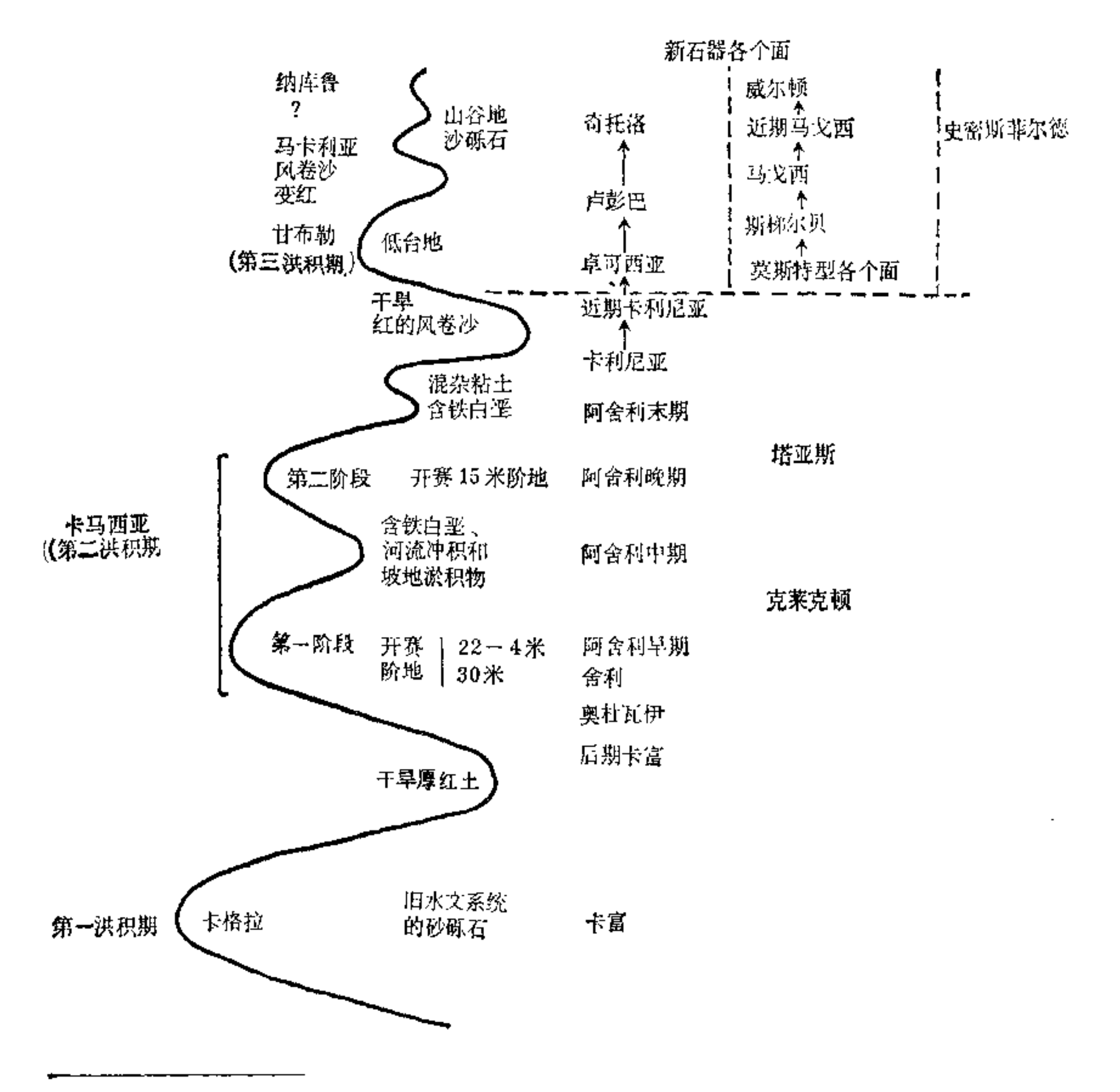
纳库鲁	第二潮湿期
马卡利亚	第一潮湿期

① “中非”一语在这里包括下列国家：扎伊尔、中非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加蓬以及安哥拉、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一部分。

甘布勒	第四洪积期
坎杰拉	第三洪积期
卡马西亚	第二洪积期
卡格拉	第一洪积期②

人的定居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降雨量大的时期和相对干旱时期的交替变化，这些交替

532　表格 21.1　G. 莫特尔芒(1952 年)编制的刚果盆地气候变化和史前工业表



② 纳库鲁：根据肯尼亚的纳库鲁湖 102 米界限以下的阶地沉积物命名的潮湿期。

马卡利亚：根据纳库鲁湖地下 114 米和 102 米阶地情况确认的潮湿时期。

甘布勒：在肯尼亚的纳库鲁湖、奈瓦沙湖、特别是在埃尔门泰塔湖(甘布勒洞穴)周围确定的第四洪积期。

坎杰拉：L.S.B. 利基(L.S.B.Leakey)根据在卡维龙多湾的坎杰拉发现的一个有化石的沉积层命名的第三洪积期。

卡马西亚：第二洪积期；该名称根据格雷戈里（Gregory）在肯尼亚裂谷的卡马西亚进行考察的硅藻土沉积层确定。

卡格拉：第一洪积期；根据坦桑尼亚卡格拉河阶地系统确定；这一系统是 E. J. 韦兰(E. J. Wayland)于 1934 年发现的。

表格 21.2 各种工业的名称，目前的碳－14断代法和环境和植物群的演变情况

	西部地区				沙巴—坦噶尼喀湖地区				
距今	金沙萨平原	贡贝	丁巴 比托里 穆桑达	隆达地区	卡兰博	卡莫阿莫塞	马图皮	环境的演变	植物群
1000								天气的演变	
2000			新石器						
3000		恩多利							
4000	晚期奇托洛		晚期奇托洛		卡波斯瓦（A·P·R）	晚石器时代			
5000	晚期奇托洛			晚期奇托洛					
6000		恩多利							
7000			中期奇托洛					潮湿状况？	
8000		卓可西亚						腐蚀于旱循环？	稠密森林的延伸
9000	奇托洛							湿润状况	
10000				卢彭巴 奇托洛 或				坡地固定、海古土质形成、湖泊延伸	
11000				奇托洛	波隆古（过渡）				
12000	中期卢彭巴						时代		
13000									
14000	进化年代			早期奇托洛		过渡期工业			
15000	中期卢彭巴	卓可西亚							
16000				晚期卢彭巴 或				半干旱阶段的干燥	
17000								山区温度下降、坡地严重腐蚀山、峡谷两侧、间歇河流的腐蚀	
18000				卢彭巴—奇托洛					
19000			晚期卢彭巴						
20000			卢彭巴—奇托洛				石器		
21000									
22000						中石器时代			
23000									
24000									
25000									
26000	斯坦利湖第二								
27000	和早期卢彭巴	卡利尼亚						随河流切入的潮湿阶段？	
28000									
29000									
30000					纳基萨萨				
31000	斯坦利湖第				（卢彭巴）				
32000	一和卢彭巴								稀疏干燥森林
33000							晚		炎热赤道草原
34000									
35000	？								干旷大草原
36000				？				半干旱阶段的干燥	
37000								由小溪汇成的间歇河流和山头伴随的山谷演变	
38000				早期卢彭巴					
39000									
40000									
41000				？					
42000									
43000		卡利尼亚			奇佩塔				
44000					（桑戈）				
45000									
46000		？					中石器时代		
47000									
48000									
49000									
50000									
51000									
52000									人类活动：稠密森林退化
53000									宽阔森林和草原的延伸
54000							？		
55000									
56000									
57000									
58000									
59000									
60000	--为阿舍利时期确定的H期								

• 以碳－14法鉴定年代

的情况改变着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

森林稠密，难以穿越，这一事实使几位史前史学者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直到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带人口稀少。我们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关于人类难以在这个地区居住的神话亦应摈弃。如果说发现的石器比较少，那是因为研究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进行长期考察工作裹足不前。最近在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和扎伊尔的几次考察所获得的成果以及所收集的大量片状石器表明，在史前史时代，热带森林的人口稠密程度与非洲其它地方是一样的。

最后，应当指出，在赤道潮湿地带，土壤的酸度有碍有机物残骸的保存，因而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动物的残骸和骨制工具；但也有极少数例外涉及到离我们非常近的时期，甚至涉及到有历史记载的时期。

研究史

很长一段时期，刚果盆地赤道森林的史前史一直无人知道，因为这一盆地有极稠密的植被，还有极厚实的红土地层，在这些红土层内，深深埋藏着一系列史前史文明的工业。

研究它的史前史的初步尝试一直等到一些公共工程（铁路、公路、桥梁和下水道的修建）完毕之后，在这个地区作了矿藏勘探之后才得以进行，因为这时候，地质学家和史前史学家才能接触可能发现石器的地层。

534 在扎伊尔，正当修筑铁路时，指挥官兹鲍因斯基上校第一次偶然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工具。1899年，X.斯坦尼尔研究了这些发现，尽管缺少地层学的资料，也得出了尝试性的结论。1927年至1938年，研究有所进展，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主要研究者有：J.科莱特，F.卡布，E.波利纳尔，M.贝卡尔特；G.莫特尔芒，P.安西奥·德法沃神父，以及H.步日耶神父。最近期的工作是H.范莫塞尔、F.范诺顿和D.卡亨完成的，他们都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刚果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森林地带，而关于这个国家的研究著作却发表得比较少。但是，应当提到的是J.巴贝特、R.L.杜瓦兹、G.德鲁、H.凯利、J.隆巴德、P.勒鲁瓦等人的考察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从黑角到布拉柴维尔铁路沿线的发现。

由于有了居伊·德博舍纳、B.法林、B.布兰科夫和Y.波默雷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加蓬的史前史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们的知识仍然有限，因而未得出确定的地层学结论。

拉克鲁瓦教授在中非共和国进行了首次调查，1930年以前，在穆卡高原一些河流的淤积物中发现了史前史时期的工具。1933年，H.步日耶神父公布了这些成果；同年，费里克斯·埃布埃提请人们注意在各种公共工程施工中挖掘出来的石器。从1966年到1968年，R.德贝勒·德爱尔芒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于先前几乎没有任何发现的一个地区的史前工业，得出了相当明确的概念。

最近几年以前，我们对喀麦隆史前史所知甚少，等到N.戴维、J.埃尔维厄和A.马利亚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我们才对非洲这一地区的情况第一次有了一个总的认识，但考古

工作仍然有待于全面展开。

安哥拉的研究工作与J. 让马尔、H. 步日耶和J. D. 克拉克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把开采金刚石矿的丰富冲积层当作他们的考察范围。

年代学依据

这一节，我们采用G. 莫特尔茬于1955－1957年为研究扎伊尔盆地所创立的第四纪时代编年学，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是最合宜的一种。（插图21.1） 535

卡格拉洪积期

这个时期看来是连续四个洪积期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是山谷被猛烈冲刷的时期，藏有扎伊尔盆地最古老的工业的古砾石阶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些远古工业几乎完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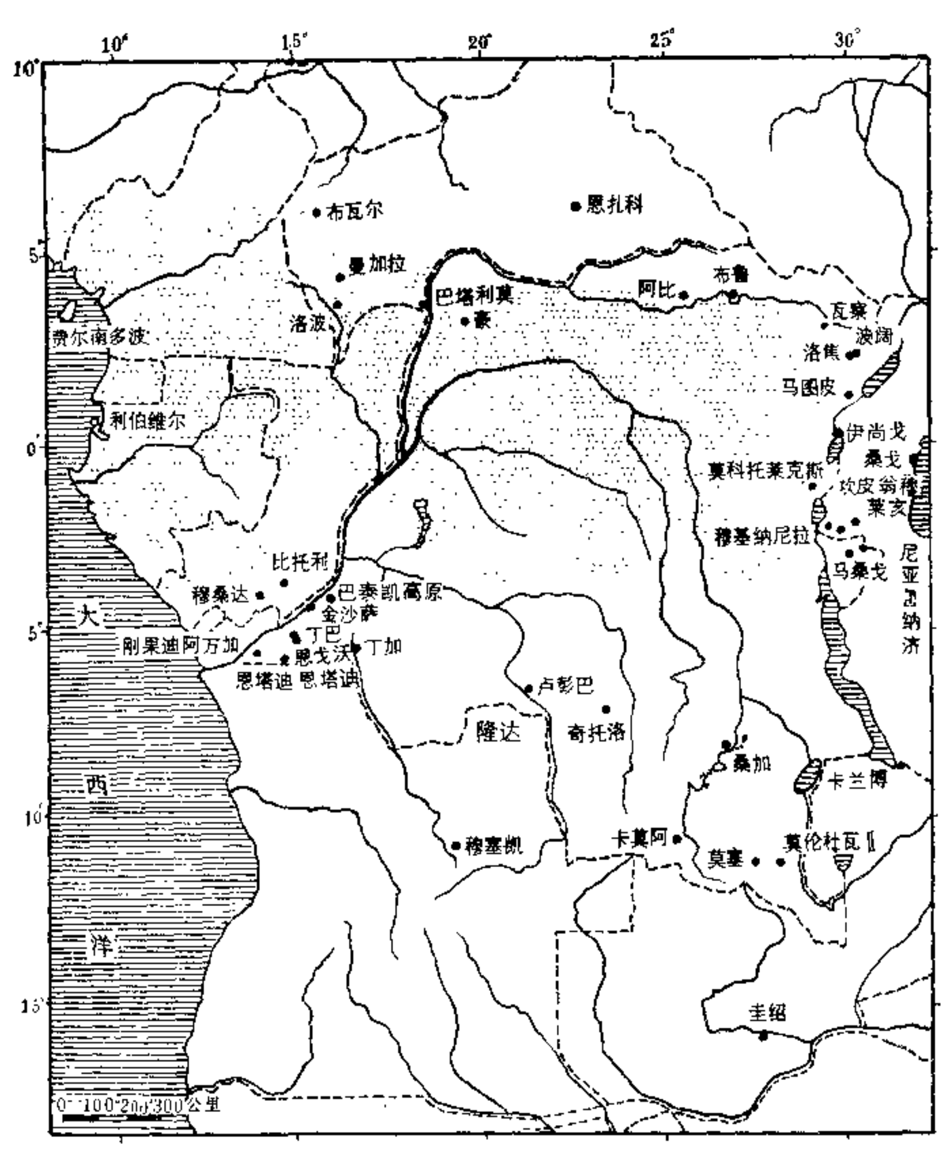


插图21.1 中非：文内提到的一些地点

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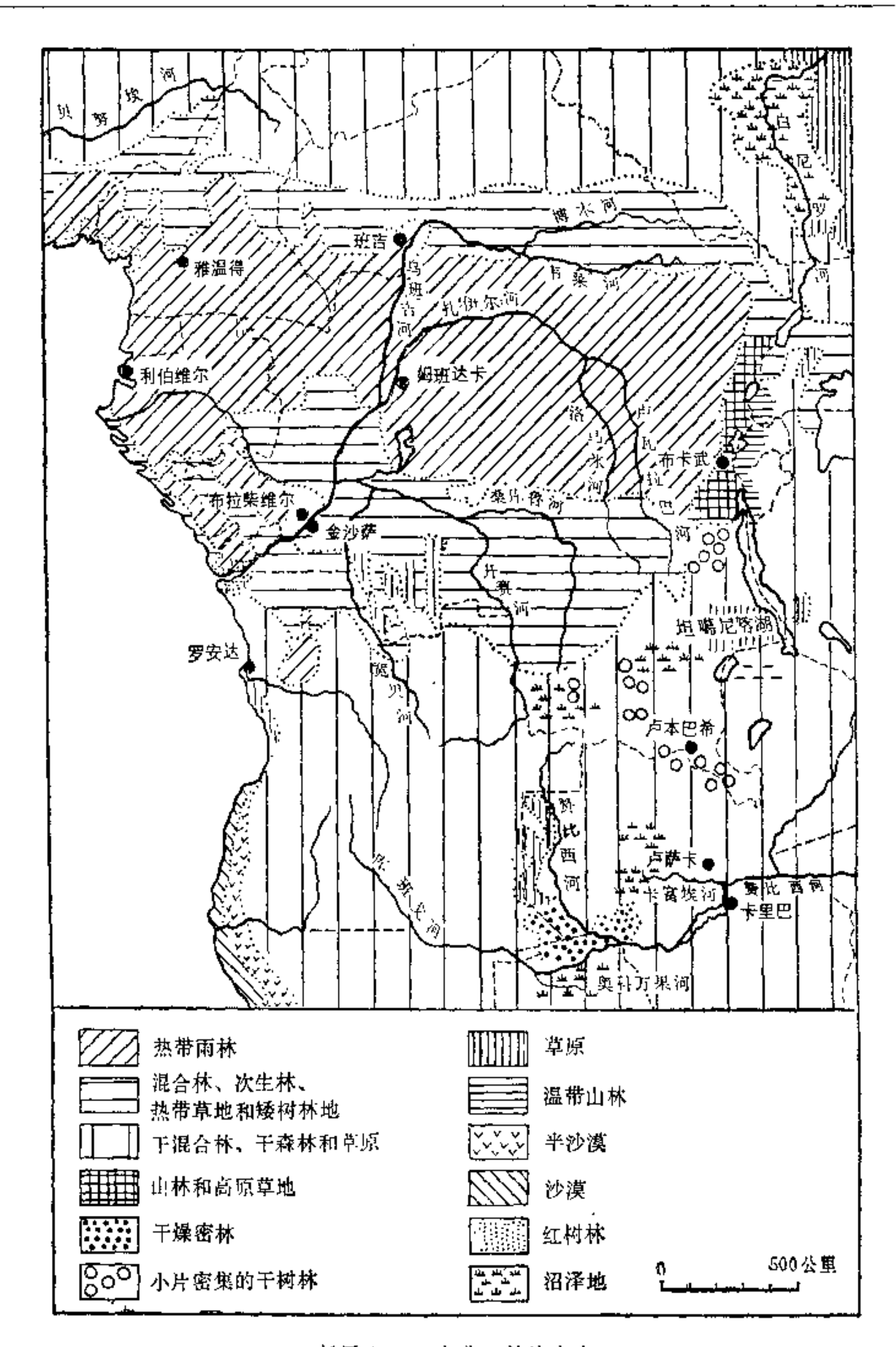


插图 21.2 中非：植被分布

537 粗磨的卵石，属于前早期阿舍利工业（G.莫特尔芒的卡富）。紧接着卡格拉洪积期的是一个长久的干旱期，古老的台地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红土。在这里，发现了阿舍利时期以前的工业，但由于缺乏地层学的证据，无法进行年代鉴定。

卡马西亚洪积期

这个洪积期发生于更新世早期的最后阶段，延续了整个更新世中期。它包括由一段较

为干旱的时期分开的两个阶段。在开赛河流域，30 米和 22－24 米台地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在沙巴和似乎在中非共和国的西部，砂砾石台地、山谷地、以及溪流的含化石河床代表了这个时期。在这一多雨期间，在某些地势平缓的地区，一些河床被完全注满，水流冲出新的河道。在这些含有化石的河床的较低地层里，发现了阿舍利时期以前的工具；这些工具比在古老的卡格拉台地发现的那些工具要精巧得多。一些双面的石器开始出现，但是，肯定地确定其年代也是困难的。

卡马西亚洪积期的高潮过后，粗糙的卵石工业被早期阿舍利工业所代替。早期阿舍利工业仍然包括许多打磨成石片的人工器具，但新工具开始出现，即双面工具，尤其是手斧。虽然手斧开始时非常少见，但不久便在这一文明所产生的工具中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

卡马西亚洪积期第一次高潮过后，是一个适度干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形成了新的红土层，坡地溃裂，河道出现淤积层。中期阿舍利工业与这个阶段有联系，其打制工具一般都打磨成片，通常从一个岩核侧面开始，被称为维多利亚西部一号技术。[③]

到了卡马西亚洪积期第二次高潮[④]（不如第一次高潮那么明显），新的砂砾石淤积起来，开始奠定开赛河 15 米台地。新的干旱期造成了新的红土层。阿舍利工业继续演变，出现了被称为"维多利亚西部二号"的新的石器技术和一种新工具：尖凿；在森林地带阿舍利以后的工业所产生的物件中，那种尖凿占主要地位。

在这个地区，卡马西亚以后的干旱期是最重要的。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展，卡拉哈里沙漠则向北扩展。一些学者认为，赤道森林几乎已经消失，只有一些狭长的林地留存下来。沙漠的红沙一层层堆积起来，有时堆积到相当的厚度。阿舍利工业趋于消亡，或者可以说，它似乎在本地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工业，尤其是在赤道非洲和森林地带，人们把它称为桑戈工业。 538

工具发生了变化。手斧变得稀少起来，最后消失。双面石器变得越来越厚、越大，尖锄多了起来，并出现了阿舍利时期从未有过的新型工具——大而长的双面工具。这些工具似乎适用于森林生活。但是，如果假定在开始产生这种工业的卡马西亚之后的干旱期中赤道森林几乎已经消失，那么这个结论是不符合桑戈工业得以发展的那个环境的。应该承认，桑戈工业是我们目前所知甚少的非洲远古工业之一。

甘布勒洪积期

在甘布勒洪积期，赤道森林重新形成，河流开拓出河谷，堆起了形成低阶地的淤积层——这个淤积层由前一干旱期大风带来的沙土所积成。在扎伊尔河和开赛河西面，桑戈工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轻便的石器工业，称为卢彭巴，它也被看作是一种森林文化。在东南地区，形成了与南非和肯尼亚的某些工业相似的工业。这些工业中的石片和石刃具有莫斯特时代的特点，但又似乎是中期石器时代的产物，因此，很难从类型学和地层学

③ 这是给予在赞比西河维多利亚瀑布附近发现的工业中观察到的两种勒瓦卢瓦打磨石片技术的名称。

④ 某些著述者认为卡马西亚第二次高潮是坎杰拉洪积期。分为四个，而不是三个潮湿期(其中一个潮湿期具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角度作出鉴定——地层学的证据往往没有。

甘布勒以后的潮湿阶段：马卡利亚阶段和纳库鲁阶段

这两个时期的雨水远不如先于它们的几个洪积期那么多。它们中间隔着一个短短的干燥时期，在扎伊尔盆地，纳库鲁潮湿期并不很明显。在马卡利亚潮湿期，河流冲刷出浅浅的河床，河床又重新注满河水。卢彭巴工业发生了地区性的演变，工具变得越来越小，而在奇托洛时期，錾子和箭头大量出现；这是一种狩猎文化。在扎伊尔东部，沙巴和安哥拉发现的石器已失去了晚期石器时代的一些特点。对于这些文物应当重新全面研究，因为它们包含着几种不相同的而且似乎是不能共存的工业；对于这些工业，现在还不可能在时间顺序上作出确定的结论。

在纳库鲁潮湿期期间和以后，包括奇托洛工业在内的新石器工业扩及整个赤道非洲，这些工业看来在赤道非洲延续的时间比其它地方要长得多。直到晚得多的时期，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才渗入到这个相对不易进入的地区；这一点又可以表明，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富有地区性的。

539 扎伊尔盆地的史前工业

阿舍利时期前的工业

由打磨的卵石构成的早期史前工业几乎在整个扎伊尔盆地都可能找到。它们一般都埋在古老的红土下边，例如在扎伊尔的上卡菲拉盆地，在中非共和国上桑加的萨洛高地的红土层中。在这个共和国，又可以发现它们被深深埋在化石河床的厚冲积层中。在安哥拉，它们存在于许多条大河河床冲积层的深处。

这些古老的史前文化，通常称为卵石文化或早期石器时代文化，其繁多的名字是根据所发现的地点或作出首次报道的史前史学家而得来的。就事实而言，它们都是延续近200万年的石片打磨技术缓慢演变过程的一部分。

卡富工业

这个命名所依据的遗址在乌干达的卡富山谷。1919年，E.J.韦兰发现的这种石器由河卵石构成，为了打制一个粗糙的砍削工具，从河卵石三面劈下三片石，只从一面劈的则很少见。现在，卡富工业又再分为4个阶段：古卡富、早期卡富、后期卡富和晚期卡富。在恩松盖齐(乌干达南部)82米和61米的台地中发现了这四个阶段的遗迹。晚期卡富工具与奥杜瓦伊工具十分接近，甚至相同。一些史前史学家认为，不能把早期阶段的卡富工具看作是人类制造工具的证据，那些劈削的卵石是大自然造成的。

奥杜瓦伊工业

这个命名所依据的遗址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平原的奥杜瓦伊。1911年为卡特温凯尔发现，1926年由于L.S.B.利基的研究和发现而闻名。

奥杜瓦伊峡谷深深割断了在更新世中期和后期存在过的一个湖泊的沉积层。在十一处舍利或阿舍利层的下面，有一层阿舍利以前的石器，即奥杜瓦伊工业。

奥杜瓦伊工业是一些用河卵石打制而成的石器工业，绝大部分不如卡富工具那么扁平。石器打磨有了更高的发展，弧形的砍刃是通过交替磨削两侧而成的。在这种工业的最后阶段，卵石的加工品在形状上已显出以后几种文化中双面工具的最初雏形。在沙巴，在中非共和国西部(上桑加冲积层中)发现了奥杜瓦伊工业。看来，这种工业也曾存在于安哥拉的东北部。另一方面，虽然在喀麦隆、加蓬和刚果人民共和国都发现了一些散布很广的粗糙打磨的卵石样品，但是在濒临几内亚湾的上述三个国家内，都无法准确地鉴别出属于奥杜瓦伊工业的东西。 540

阿舍利工业

阿舍利文化在扎伊尔盆地的分布尤其广泛，一些雨水冲积层台地中埋藏的石器特别丰富。阿舍利时期分为四个或五个阶段(根据你接受哪位作者的意见而定)，阶段的划分主要是对不同的打磨和加工石器的技术加以分类的问题。区别的标准主要是类型学的而不是地层学的。阿舍利时期的沉积物主要是在形成台地的早期河道的冲积层中发现的，是在河谷底层的砂砾石和沙石中、在改变流向的溪流的化石河床中发现的。因此，这些打制工具不是在河流的源头发现的，河水湍流移动并把它们堆积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受到磨损。因此，研究这些沉积物中阿舍利时期的工具主要以类型学而不是地层学为依据，正如在奥杜瓦伊的情形那样，埋着打制工具的湖泊沉积层大约有100米厚。

阿舍利工业的特点是工具种类相当多，这些工具发展水平远比阿舍利以前的文化为高。打磨的卵石继续被使用，但随着工具打制技术的进步，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新工具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双面工具，顾名思义，这种工具是打磨一块卵石的两个侧面制成的，呈椭圆形或梨状，有一个锐利程度不等的尖头，底把部分磨圆，断面一般是凸形，体积大小不等。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砍砸器，这是由一块片石敲砸而成的，与底把相对的一边有一个切削刃。此外，还有一种尖咀锄，虽然在阿舍利早期和中期为数不多，但在这一文化的最后阶段却十分丰富。除了这四种工具之外，还有多种多样大小很不相同的石片工具也被使用，只是没有加工磨制，因而没有形成侧刮器、端刮器以及打磨成V型的工具等。

基于类型学和打磨技术，阿舍利时期可再分为五个阶段。

阿舍利第一时期(一些作者把这一阶段称为阿布维尔时期或舍利初期)

这个时期的工具包括在大石台上撞击石块得到的很大的石片。这种克拉克顿石片有时不经磨制就使用，但常常被加工成双面工具和砍砸器——都是具有明显弧形边刃的沉重而厚笨的工具。卵石打磨技术并未消失。相反，我们知道，阿舍利时期以前的这种技巧已臻完美，因为一些所谓未经打磨底把的双面工具正是卵石石器的最佳标本。 541

F.卡布在沙巴发现的卡莫阿和卢埃纳两个沉积层代表了这个阶段。也有些标本出现于安哥拉北部，是在卢恩贝盆地发现的。中非共和国西部的一些沉积物也属于这个阶段。从

台地沉积层或化石河床中挖掘的阿舍利第一时期的工具由于受水的作用，大部分严重蚀损。这在中非共和国的洛波和利邦盖沉积物中特别明显。

阿舍利第二时期(阿布维尔晚期或阿舍利早期)

这一时期的工业与前一时期十分相似，也是出现在安哥拉和沙巴的河流的砂砾石中，但是，这些工具受到水的损坏较少，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二步打磨技术的精细程度还优于阿舍利第一时期的工具。双面工具和手斧的边刃更加平直，很明显这是用类似木头和骨头那样的软质材料所制的一种磨削工具进行再加工的结果。

阿舍利第三时期(阿舍利中期)

这个阶段的工具都是在靠近卢埃纳和卡莫阿的砂砾石层的表层发现的，它们混杂在河中的淤泥里。在这个阶段，石器技术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即为了获得很大的薄片工具，而加工一块岩核。这种技术称为维多利亚西部第一号，在南部非洲十分出名。这一技术标志着勒瓦卢瓦第一时期技术的开端。打制石核的准备工作是造成一个多面体碎石台。石片从侧面被敲砸下来，然后再仔细加工成一个双面工具、一个砍砸器、或一个侧刮器。用以敲砸的是一个软质的敲砸工具。各种工具都十分整齐、对称，侧面石刃几乎平直。砍砸器的边刃经过修整，横面呈菱形。

阿舍利第四时期(阿舍利后期)

在这个阶段，打制技术基本上与前期相同，但有所改进(维多利亚西部第二号)。石核圆多了，放在多面体的碎石台上，从而去掉弧形的大片石。这些工具有一个细窄的底把，代替了维多利亚西部第一号技术所特有的宽厚底把。这些石片被用来制作双面工具，侧刮器以及砍砸器等——这些工具都经过精细的修饰。手斧的切面呈梯形或两面凸状，阿舍利后期工业是在卡莫阿的卡马西亚第二洪积期冲积形成的开赛河 15 米台地发现的。

阿舍利第五时期(阿舍利晚期或末期)

阿舍利末期阶段开始了一场文化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各地气候环境和植物环境的地区性形式。在这个时期，人类定居点出现在这时已经干旱的中层和低层台地上。除了以前的一些打制技术外，勒瓦卢瓦打制技术也开始使用。除了在总的方面有所改进，特别是修饰更加精细，以及出现了很大的双面工具和砍砸器之外(有些双面工具和砍砸器有 30 多厘米长)，这一时期的工具与前几阶段的工具没有很大区别。在此期间大为进步的一种工具就是尖凿。它结实、沉重、横切面呈三角形或梯形，可能是和很大的长方形双面工具一起用来加工木料的。因此，它是桑戈工具系统的先驱。我们也发现了石球，形状完美，可与南美的石球媲美。在中非共和国西部曼加拉河的淤积物中发现了很多这种石球。在沙巴、卡莫阿和扎伊尔的卡利纳附近发现了这种阿舍利末期的石制品。在安哥拉，或许在布拉柴维尔附近，中非共和国，在上桑加的恩戈埃雷河的丰富淤积物中，也有所发现。

542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创造这种文化的人却一无所知，由于扎伊尔盆地土壤含酸性，在盆地的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有机物的残骸保存下来。

桑戈工业

这种文化定名所依据的遗址是在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西岸的桑戈湾。那是1920年E.J.韦兰发现的。

桑戈工业直接渊源于当地的阿舍利技术，毫无外来影响的迹象。它与坎杰拉洪积期的最末阶段是同时的，其存在时间在这个洪积期和紧接着的主要干旱期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是一种相对来说不太为人所知的工业，显示了本地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似乎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适应于一种森林环境，或者说，适应一种稀疏树林的环境，因为这种工业正处在一个干旱期的开端。这一文化被分为五个阶段：桑戈原始期，桑戈早期，桑戈中期，桑戈晚期和桑戈末期。

桑戈时期的石器(因为只有石器保存了下来)与在此以前的阿舍利末期的工具很不同。在桑戈工业开始时期，双面工具仍遵循阿舍利时期的传统，但这些双面工具渐渐变得更重、更宽、更短。而与此同时，开始产生与尖凿相似的和有两个尖端的其它双面工具。但是，砍砸器迅速消失，保存下来的很少数标本都是小型的，从宽大的石片上取下来的打制成形的两面刃都呈波形。仍然可以发现粗糙打磨成的卵石，但为数不多。阿舍利末期开始出现的尖凿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这种尖凿都很大，横断面呈三角形、菱形或梯形。由于它们是与许多侧刮器同时发现的，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是为了加工木头而设计的。最显著的技术发展是窄长的双面工具的创造。这种工具是碰撞出来的石片，一般都打磨得很精细。在一个沉积层中所发现的桑戈工具中，这种工具有时几乎占四分之一。这些工具被分为不同的类型：尖凿、石刮、錾子、槽凿和短刀。这些工具还常常合二而一制成多种用途的工具，如尖凿子、尖刮凿、尖槽凿、尖短刀等等。有些工具特别大，有25厘米多长。随着桑戈工业的发展，这些在类型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异的工具变得愈来愈小，而石片打磨技术此时已接近完美。 543

在扎伊尔盆地，发现了大量桑戈工业品。我们知道，扎伊尔的金沙萨平原和上沙巴都曾发现这种工业、在沙巴，这种工具与西部地区工具的区别在于没有短刀和树叶形尖刀。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时期的打制工具包括许多石球，多面体或运用锤打技术精心制作的石球，以及大量遗弃的石片。在堪达拉的卢恩贝河的冲积层中以及在安哥拉东北部的隆达发现一些样品；在安哥拉北部，它们与其它时期的打制工具混在一起，因为它们埋在被搅乱的砂砾石中。在刚果人民共和国，在斯坦利湖右岸，在加蓬，也发现了这种石球——是最近才鉴别出来的。在中非共和国，位于中部东侧的特别丰富的沉积层有这种工业；在该国安比莱、泰雷、蒂亚加和科诺的恩扎科金刚石开采区的冲积层里，发现了上千种保存完好的工具，据考证，它们属于桑戈阶段的中期或晚期。

直至今天，在喀麦隆，桑戈工具还未肯定地鉴别出来，这就产生了桑戈工业是否曾向西非扩展的问题。一些权威人士报道在塞内加尔有所发现。事实上，他们所发现的工业包括双面工具，与桑戈工具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但是，迄今还未确定其在史前史中的年

代。有人设想，曾有一些群落沿赤道森林地带向西迁移，但现今我们还无法对他们或他们的影响找到确切的根据。

象它以前的阿舍利工业一样，桑戈工业也是在一个局部地区形成的，未曾与森林环境以外的天地接触。紧接着它的是一种称为卢彭巴的工业，但我们尚未完全了解，这种转变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

卢彭巴工业

根据1955年泛非大会所建议的历史分期，卢彭巴⑤是中期石器时代的一种工业。但544 是，"中期石器时代"这个术语使用时应该谨慎，因为有一批在时间表上仍未得到适当位置的不同性质的工具归属于它的名下。

卢彭巴工业形成的时间是在第四个洪积期或甘布勒洪积期之初，降雨量处于正常水平之时。它的全盛期是在这个非常潮湿时期的第二阶段。通过绝对年代技术鉴定，它延续了大约25,000年。正如在地区性发展过程中的末期阿舍利工业一样，桑戈工业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为细致，并且形成了打磨石片的新技术。这种技术在卢彭巴时期臻于完善，未曾发现有外来影响的痕迹，但它十分适应于森林环境。在卢彭巴时期开始时，这种工具仍包括一些双面工具，但很快便被废弃了。没有发现砍砸器。勒瓦卢瓦技术主要表现了石刀和石片的制作。在较后的阶段，勒瓦卢瓦技术仍然用来获取石片，然而，一种被称为压力打磨法的更加先进的技术问世了，它用于打制漂亮的石刀，而一些加工技术令人赞叹的窄长工具就是用这些石刀制成的。

卢彭巴工业分为5个阶段。

卢彭巴第一时期

这个阶段的标本在整个扎伊尔河西部流域都能找到，在这里，这一工具似乎是桑戈工具在当地的一种发展。阿舍利工具的特点完全消失了，石片打制和打磨通过撞击技术来进行。桑戈工具仍被制作，但逐渐变小了。尖凿、尖刮凿和平刃凿的最大长度是15厘米。槽凿、錾子、切削工具以及由石刀做成的锯子问世了。除了这些精制的工具之外，基本工具仍是粗制的石片。在卢彭巴第一时期末，尖利石器、短石刀和真正的石镞开始出现。

卢彭巴第二时期

这个阶段是由J.科莱特在卡利纳角确定的，但标本是在斯坦利湖发现的。卢彭巴第一时期的叶状錾子经过改进，变成斧子。直刃錾子和一种有斜刃的新罐石刀代替了桑戈类型工具。武器包括15到35厘米长的短剑，有磨得很薄的、叶状的锋利尖刃。

卢彭巴第三时期

在斯坦利湖的表层沉积物和在安哥拉的某些沉积层中确定了这一阶段的工具。在这一

⑤ 卢彭巴：得名于开赛河上卢彭巴史前遗址。首次使用这一术语的是H.步日耶神父(H. Breuil)。

阶段，由于运用了压力修整技术，石器成形技巧达到了极为完美的程度。以一种先进的勒瓦卢瓦技术所获得的石片呈三角形、长方形或椭圆形。带柄的工具出现了，发展了，并传布很广。在这里也发现卢彭巴早期类型的工具，但尺寸比较小，有尖凿、錾子、小双面工具、一些侧刮器、锉刀、带有垂直或倾斜砍刃的燧石刀、配柄的石刀，等等。短剑的尺寸有时很大，最大的达46厘米长。尖刃呈齿状，因此成为致命的武器。斧子更加常见，但是为数不多。重要的进步是不同类型的、打磨得十分精细的箭头：有叶状的、菱形的、带柄的，另外还有成齿形尖刃的。 545

在安哥拉，卢彭巴工业晚期阶段的年代用碳-14法鉴定为我们纪元前14,503±560年。

卢彭巴第四时期

有关卢彭巴第四时期工业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的主要特点似乎是一种与勒瓦卢瓦技术十分接近的石器制造技术。

卢彭巴-奇托洛时期

根据地层学的证据来看，这个最末阶段的时间似乎是在中非和东非结束其更新世的干旱时期，处于马卡利亚第一潮湿期以前。已知的沉积物都堆积在砂砾石的河床冲积层上，或者埋在覆盖河床的潮湿层的底部，还经常出现在河心的小岛上。

在卢彭巴工业其它阶段中所使用的石片打磨技术保持不变，在类型上仍是勒瓦卢瓦型。另一方面，石器加工是用一种既砸又压的新技术进行的。这是粗糙的加工法，带有中石器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的工具仍然包括錾子、槽凿和双面工具，但没有打制侧刮器和带柄石刀。在燧石刀之中增加了一种刀刃打磨得比较锋利的小燧石刀，可以看作是一种横砍刃武器。石制箭头日趋多样化，有叶状的、菱形的和倒钩的，极少数是齿形的和带柄的。

在安哥拉，被归类为卢彭巴-奇托洛工业的年代被定为我们纪元前11,189±490年。

在中非共和国或喀麦隆，尚未发现卢彭巴工业。另一方面，在刚果人民共和国和加蓬有报道说，发现了这种工具。但是，由于沉积的石器位于不易进入的地区，现有的详细材料很少。

非森林环境的史前文化

卢彭巴工业在盆地西部森林地带继续发展的同时，非森林环境的文化也在沙巴和东部安哥拉发展起来：原始斯梯尔贝文化、斯梯尔贝文化和马戈西文化。这些文化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广为传播。

原始斯梯尔贝文化 546

这个命名依据的遗址是斯梯尔贝，在开普省海岸。原始斯梯尔贝工业包括单面尖刃石器、端刮器、凹形箭尾石器、投掷石器以及一些小型双面工具，加工粗糙的半叶片状厚尖刃工具和一些錾刀。这些工具的制作都比较粗糙。

斯梯尔贝文化

斯梯尔贝工具与前一阶段的工具没有明显区别，但是，这些工具却说明，这时的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勒瓦卢瓦式石片打磨技术。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压力整饰方法的出现，主要用来打磨单面或双面武器、以及常常保留一个平面握把的莫斯特类型的尖刃器。在最末阶段(已知在肯尼亚存在过)，斯梯尔贝工具包括有背面的石刀、錾刀和扇形石器。

原始斯梯尔贝工业在沙巴很盛行。斯梯尔贝工具则不太常见。在扎伊尔所发现的最古的人类残骸属于斯梯尔贝文化时期。那是两颗臼齿，是 P. 安西奥·德法沃神父在卡孔推含有骨头的角砾岩中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打磨过的石英片和一个双面尖刃器的标本。

马戈西文化

这种工业命名所依据的遗址在乌干达的马戈西。这是 1926 年韦兰发现的。马戈西文化仍旧沿用斯梯尔贝工具打制的主要方法，这一工业包括一些细石器：有背面的石刀、扇形石器、三角形石器、U 形端刮器、微形錾刀，还有用鸵鸟蛋壳制做的珠子。马戈西文化可能在沙巴存在过，但至今未能准确地确定其遗址。

中石器时代的工业：奇托洛时期

在更新世末，两个比较干旱的时期导致赤道森林，尤其是高海拔地带的森林的衰退。奇托洛时期的人定居在已无稠密植被的土地上，在泉水附近，或在台地顶端或山口关隘。⑥这种类型的沉积物在巴泰凯高地，斯坦利湖，在金沙萨平原和安哥拉东北部都有发现。各处沉积层中的工具不尽相同。其中仍然有加工木料的相当大的工具，虽然今天的这种工具都很小。新工具或者在前几个阶段的工业里鲜见的工具被发现了：有利凿、尖刃锋利的石刀，有背面的刀子，尤其是几何图形的细石器，如梯形石器、三角形石器、橘瓣形石器和小燧石刀，等等。石镞在类型和形状大小上很不相同，有叶状的、菱形的、椭圆形的、三角形的、倒钩形的、柄形的、小齿形的或横断形的。它们的制作几乎完全是采用压制加工法，使砍刃非常锐利。

547

由于奇托洛工业中的武器只限于石镞，所以它被看作是没有陶器和光面石斧的新石器时代前的文化。它是西扎伊尔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以前非洲森林文化的一种晚期形式。

新石器时代的工业

上面提到的存在于整个扎伊尔盆地的各种史前文化，从阿舍利以前时期一直到奇托洛时期，它们代表了在森林环境中未曾接受任何外来明显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庞大文化体系的连续阶段。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方面——首先必须了解，存在着几个方面，而且有时互相间很不相同——是在最后一个较短的洪积期即纳库鲁洪积期内发展起来的。那时，气候与今天

⑥ 奇托洛人：这个名词是在开赛河附近的奇托洛发现石制工具沉积层时创造的。

大致相同；不过当时森林比较稠密，因为未受到人类进入造成的损害。植物种类与今天存在的一样。

因而，正是在稠密的热带森林中，创造了“西刚果”这种新石器文化的人逐渐从北部侵入这个地区，越过伊散吉拉湍流滩附近的河流。这些人带来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地的技术合为一体。这种新石器工业的主要特点是几乎专门使用极难加工的岩石，诸如片岩、石英和硬玉等，所以生产了加工粗糙的石片，结果所生产的工具十分低劣。这些工具随着遗址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包括粗制的尖凿，錾子，非常粗糙的小卵石片，形状、重量和材料都不同的穿孔石器，此外还有大量石斧。石斧首先打制成形，大致磨光，然后进行雕琢，精工磨平。在扎伊尔发现了许多磨石。毫无疑问，那是用来打磨石斧的。石制箭头不少，但一般工艺都很粗劣，多数都由石英石片制成。在一些遗址，尤其在伊桑戈，打制工具包括骨制工具，特别是带有一、两排倒钩的鱼叉。除了这些石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以外，在一些沉积层中还有许多装饰美观的陶器。

在西宽果河（这里的石器和奇托洛工具有关联），在位于斯坦利湖和刚果迪亚万加之间的扎伊尔河两岸，在刚果人民共和国的几个地点，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扎伊尔北部的韦莱河流域，发现了藏有大量赤铁矿石斧、特别是精心磨光的赤铁矿石斧的一处遗址。在喀麦隆、加蓬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了多种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在中非共和国洛巴伊的巴塔利莫沉积层中，发现了一种硬玉工业，其中有与精致的陶器混在一起的大量石斧。经热发光法鉴定，这种工业的年代是我们纪元 380±220 年。这个年代初看起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思考一下，再根据现有的知识判断，看来新石器时代在赤道森林所延续的时间确实比其它地区要长得多，一直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金属的使用在这个地带看来非常晚。权威人士认为，铁器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我们纪元九世纪左右。 548

巨石器时代的古址

巨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整个非洲，尤其在北非和撒哈拉，以多种形式发展。在扎伊尔盆地，这种文化只是在现今的中非共和国的西北部存在过。在安哥拉、扎伊尔、加蓬和刚果人民共和国，未曾发现巨石器时代的古址；在喀麦隆，只有少许耸立的石头。

另一方面，中非共和国在布瓦尔地区具有相当壮观的巨石器。这些石器遗址座落在扎伊尔河和乍得河流域分水岭的一片长 130 公里、宽 30 公里的土地上。在喀麦隆或中非共和国的其它地方，好象没有这样的遗址，因而毫无疑问，这种文化在地理上限于中非共和国的西北部。

这些古址形式上象古墓，大小不等，最上层矗立着一些石块，数量从几个到几十个，有些露出地面三米。对一些古址进行的发掘揭示了内部结构，但是除了埋在上层的一些石英片、陶器和金属器具的标本之外，并没有发现什么考古学的资料。然而，所发现的木炭使得运用碳-14 鉴定年代法成为可能。⑦ 于是得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年代。埋在古址最低层的一批文物的年代是：7,440±170 年前，即我们纪元前 5490 年；6,700±140 年前，即我们

⑦ R.德贝勒·德艾尔芒(R.de Bayle des Hermens)和 P.维达尔(P. Vidal)，1971 年。

纪元前 4750 年；另一批的年代是：1,920±100 年前，即我们纪元 30 年；2,400±110 年前，即我们纪元 450 年。这两组年代中较早的年代是巨石器竖立起来的时间，较迟的年代是它们重新被利用的时间。从地表层发掘出少数金属器具证实了，这些巨石器曾被重新利用。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我们无法确定布瓦尔巨石器在新石器时代是什么时候竖起的，但是，把它们竖立起来的这种文化至少可以说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同时的。

岩石艺术

549 扎伊尔盆地正好位于撒哈拉和南非这两个岩石艺术发达的大地区之间，它也有自己的岩石艺术，不过在数量上并没有达到如同它的地位所应有的那么丰富。

在乍得的恩内迪和博尔库产生的一种岩石艺术属于大撒哈拉体系。在喀麦隆北部的比扎尔有一处遗址，从中发现一些水平岩石板上的石刻，但由于雨水冲蚀，已残缺难认。大部分图形是几何形的，显示出大小不同的圆圈。它们有的是单幅图形，有的是成组图形。

在安哥拉的卡洛拉地区也有石刻，都是刻在平面岩板上，图案与在喀麦隆的一样，也是几何形状。据报道，在同一地区发现了时间离我们较近的绘画。在扎伊尔，有一些遗址属于不同的时期。沙巴似乎是岩石艺术最丰富的省份，与赞比亚和安哥拉东部的岩石艺术是一类。它在特点上是抽象性的，不象南非艺术那样是自然主义的。1952年，亨利·步日耶神父公布了在基昂塔波洞穴⑧发现的切刻和点刻的图象，G.莫特尔芒公布了对沙巴岩石绘画的初步综合分析⑨。他强调，由于缺乏考古学的证据，鉴定这些不同风格的石刻的年代是很困难的。在扎伊尔河下游流域发现了经过雕刻的岩石板，在这里直到近代仍有人继续从事岩石艺术。在韦莱流域的贡杜山发现的一系列雕刻似乎与祭水祭火仪式有关。

迄今为止，在中非共和国发现的岩石艺术位于这个国家的北部和东部。在北部，图卢、昆巴拉和迈拉山的洞穴里藏有用黑、白和红赭色绘制的图画，图画里有人，有各种不同的符号，但没有动物。在东部，巴库马附近的伦戈和姆帕图遗址，有刻于水平红泥板上的雕刻画，从画中的许多飞刀和矛尖来判断，这些雕刻似乎是比较近期的，是已经熟悉铁器的人们的作品。

扎伊尔盆地的岩石艺术与撒哈拉的艺术毫无相似之处。我们必须在南非和东非寻找它的发祥地。这种艺术非常接近在班图土地上发现的那种艺术，因而它是近期的，甚至是有史时代的作品。但是，这对于研究我们了解甚微的热带非洲原始史或历史某一时期的人口迁徙和人口流动情况，是很重要的。

结 论

从前面对于扎伊尔盆地史前史的叙述来看，很明显，直到阿舍利晚期，其史前工业与非洲赤道南部其他地区的已知的工业差异不大。从桑戈工业以后，森林地带文化开始了一550 个地区性的向多样化发展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来自北方的新石器时

⑧ H.步日耶神父(Abbe H. Breuil)，1952 年。
⑨ G.莫特尔芒(G. Mortelmans)，1952 年 a。

代的人到达之前(由于撒哈拉地带越来越干旱，他们恐怕就是从那儿逃出来的)，生活在森林地区的人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

巨大的赤道森林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限制了赤道南北地区的接触。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在这个地带延续的时间远比在其它地方的要长，因为这些文化是孤立发展的，受到封闭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其它地区由于使用金属和铁器而早已进入历史时期为止。

第 二 部 分

F. 范诺顿与 *P.* 德马雷，*J.* 莫埃尔松斯，
K. 摩亚和 *E.* 罗什合写

引 言

在本章这一节的叙述中，我们把扎伊尔以及与其接壤的下列国家都包括在中非之内：刚果人民共和国、加蓬、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和安哥拉。

十九世纪末以来，非洲大陆的这个地区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是很零散的。

最早对中非产生兴趣的研究者起初力图考证出中非类似于欧洲史上所叙述的各个时期。1899 年，X. 斯坦尼尔曾尝试进行一次初步的综合研究，但最早在 1925 年进行挖掘工作的，却是J.科莱特(贝夸特，1938 年)。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从那时起，J. D. 克拉克在赞比亚和安哥拉，R. 德贝勒·德爱尔芒在中非共和国，J. 南库因在卢旺达和布隆迪，G. 莫特尔芒、J. 德海因策林和 H. 范莫塞尔在扎伊尔，加蓬史前史和原始历史学会在加蓬，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扎伊尔，自从 1970 年国家博物馆研究所成立以来，研究工作有了明显的增加。

然而，我们的知识仍然是零星散乱的。虽然科莱特率先进行了首次年代与地层学研究，但是，他的先例几乎无人接续，因此，就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来说，我们的知识还是完全以地表层的发现物为依据的。

但是，必须认识到，在中非进行考古研究，困难重重。某些地区，如北部，由于红土层厚，不适于挖掘，而在森林中，勘探工作异常困难。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使工作复杂化。气候条件和土壤的酸性一般说来影响了骨头的保存，在许多经过探测的遗址中一无所获，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也有例外，明显的是在伊桑戈和马图皮，在那里，由于土壤是石灰质的，骨骼物质保存完好。 351

命名的术语不断被订正，历史的分期又反复出现疑点。由两个中间期隔开的早期、中期、晚期石器时代的顺序无论按照年代学，或者甚至按照地层学来看，都不再是可以接受的了。经过一段进行准确分类的尝试之后，现在意见正趋一致，形成这样一种见解，即这种广泛的分期都具有极大的暂时性和相对性。

对最近发掘的和已经系统鉴定其年代的遗址进行的研究工作已证实了这种见解。以晚期石器时代为例，1959 年，J.D.克拉克把这段时期的起始定为 7,500 年以前。1971 年，我们获得乌干达穆尼亚马山洞的一个年代是 15,000 年以前左右（1971 年，范诺顿），六年之后，鉴定出马图皮细石器时代工业的年代约为 40,000 年以前（1977年，范诺顿）。于是，在过去的分期和近年的发现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

在世界其它各地，考古学家开始主要对史前史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兴趣，研究他们的环境以及与这种环境的关系。与此同时，中非史前史却长期停留在对地层学和年代学的研究上，注意力都集中在命名上，对人类本身不够重视。

我们认为，与其对那些只有少许地表层的发现物的遗址造一个详尽的一览表，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能说明年代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系统挖掘上，即伊桑戈、冈比、比托里、卡莫阿、马图皮以及卡兰博。这些分散很广的成组资料，当然需要用对其它地方进行研究得出的更多的材料来补充。

我们比以往更加深信，划定范围广而精确的文化地区是不可能的。我们应满足于指出人类在某些时期的存在，虽然迄今不能说明他是在本地演变而来的、还是来自其它地方。人类当然很早就会适应具有不同特殊气候和动植物生长的界限分明的各种生境。原始的猎人和寻食者为了生存，就必须探索这些生境；到需要制造工具时，他的行动就要由可资利用的原料来决定了。由于中非环境的变化，形成一些根本不同的条件，人类显然一定对这些条件作出不同的反应，结果便产生那些可以区别的地区，有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也表现出地区性的、甚至是当地的一些差异；只根据不同生态状况的影响是不能解释这些差异的。然而，把它们认作是文化区域也还为时过早。

552

地 理 背 景

中非这一广大地区的主要地貌特征是一系列地壳运动造成的，在第三纪开始时地壳运动就已开始，至今可能还未完结。

盆地中部海拔不过 460 米，四周是一圈高地、山岭和山脉，它们是在覆盖着前寒武纪晶体层的地质层上形成的。这一地质层裸露于地球外表，多山，尤其在基伍，更是隆起，有时高度超过 3,048 米，但遭侵蚀的地方很深。在某些地方，底层上方有很大的地势起伏，诸如基伍湖东南的玄武岩高地（3,048 米左右），阿达马瓦山脉（2,440 米左右），维龙加山脉的火山峰（4,507 米），鲁文佐里山脉的地垒（5,119 米），以及万博高地（2,610 米）。由于造成高地的地壳运动，也产生了断层，如中非东部的大裂谷，尼日尔－贝努埃凹槽。

除了安哥拉南部沿海地区和库邦戈－赞比西河流域之外，整个中非雨量充沛。在中部盆地，降雨量终年保持平衡，一年达 1,730 毫米，在加蓬、木尼河和喀麦隆沿海，年雨量高达 4,060 毫米；在其它有旱季（3 到 7 个月）的地区，年降雨量仍有 810 到 1,220 毫米。

在北纬 5 度和南纬 4 度之间的中非雨带成长起来的稠密雨林覆盖着扎伊尔盆地，刚果人民共和国大部、加蓬、木尼河和南部喀麦隆。在东面，这片雨林让位给过渡性的森林，然后变为稠密的山林；山林覆盖了北纬 2 度和南纬 8 度之间的布隆迪、卢旺达和东扎伊尔

的山峰和雨量高的坡地。凡是稠密森林被毁的地方，新的植物和次生林便又生长起来。

赤道森林的边缘与浓密的、常常是退化的、能够度过 2 到 3 个月的旱季的半落叶森林相连接。在北边，它形成一条窄窄的林带，从喀麦隆开始，经由中非共和国南部地区、博穆和韦莱河之间的地区，一直到维多利亚湖。在南面，它与人工草原相连接，形成了覆盖刚果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扎伊尔河下游以及宽果、开赛－桑库鲁和洛马米低地的一片片植被。

在几内亚密林区周围的弧形地带，开阔的林地和苏丹－赞比西草原覆盖着每年旱季延续 7 个月的一片地区，即中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苏丹南部、卢旺达和布隆迪东部、扎伊尔的沙巴、赞比亚和安哥拉。 553

沿着各河道有大片的沼泽洼地，特别是在苏丹南部的白尼罗河岸，在扎伊尔的中部盆地和乌彭巴湖洼地，以及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的赞比西河流域。

环境的演变

考证史前人类的环境已成为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领域里首先进行的工作是在东非。包括 E. J. 韦兰(1929 年、1934 年)、P. E. 肯特(1942 年)、和 E. 尼尔森(1940 年、1949年)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人员考察了第四纪内潮湿期(亦称为洪积期)和干旱期(间雨期)的交替变化。洪积期被认为与北半球冰河时期同时，并且被命名为(按时间先后次序)坎杰拉、卡马西亚和甘布勒洪积期。后来还考察了从全新世开始时的两个潮湿期——马卡利亚和纳库鲁潮湿期。L.S.B.利基(1949 年)、J.D.克拉克(1962 年、1963 年 a) 以及其他一些人随后力图把这些名称的运用范围扩大到非洲其他地区，在东非，这些名称获得了地层学的特别含义。另一方面，如 T.P.奥伯赖恩(1939 年)、H.B.S.库克(1958 年)、R.F.弗林特(1959 年 a、b)、F.E.佐伊纳(1959 年)和 W.W.毕晓普 (1965 年) 等作者对这种理论的普遍应用持保留意见。在中非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洪积期阶段与另一地区的洪积期阶段当中有相当长的间隔时间把它们分隔开来。

J.德普罗耶(1963 年)第一个发现，在更新世晚期，中非曾有过一段半干旱期，这段时期与欧洲的武木冰期同时(或基本同时)。许多作者(J. 亚历山大和 S. 亚历山大，1965 年；莫埃尔松斯，1975 年)都在沙巴发现了这个干旱阶段。大约 6,000 年以前的一个更为潮湿的气候变化在扎伊尔河下游被 J.德普罗耶(1963 年) 发现；同时在沙巴的莫塞(亚历山大个人的报告)和在扎伊尔的穆桑达(戴利布里斯和其他一些人，1974 年，第 47 页) 也有所发现。在卡莫阿的研究表明，这个阶段之前，在 12,000 年以前和 8,000 年以前之间还有另一场气候变化，与 6,000 年以前的大起伏隔着一个联系着干旱反复出现的短暂腐蚀期。K.W.巴策尔和其他一些人(1972 年) 发现，12,000 年以前和 8,000 年以前间的这段潮湿起伏期与东非湖泊延伸的时期相一致。J. 德普罗耶在扎伊尔河下游的研究工作(1963 年、1965 年、1968 年、1969 年)和 J. 莫埃尔松斯在卡莫阿的研究工作(1975 年)表明，这些较为干旱的时期的特点是地貌形成过程的加强。这样，在利奥波德维尔时期的金沙萨地区，山峦被严重剥蚀，结果是平原地带大大垫高。同样，在卡莫阿，这个时期使坡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谷变

554 得狭窄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证实H.罗登伯格(1970年)关于与各干旱期、稳定的潮湿阶段相应的地形变动阶段发生更迭的观点。

中非的环境演变因此受到过去5万年气候条件的很大影响。对于现在的植被形态及其在某种气候条件下的平衡性的研究，对于不同遗址的花粉学分析，已经使人们有可能查明古代植被的面貌以及导致其生长的气候条件。

在东部的山区，气候变化可以充分从植物生长阶段的变动中推断出来。根据泥煤含量高的沼泽地的花粉图解，就可以看出从一种寒冷的植物期到一种温暖、湿润的植物期，然后再到一种干旱的植物期的这一连续过程。这一点在赞比亚海拔1,140米的卡兰博瀑布的遗址尤其清楚；J.D.克拉克和E.M.范津德伦·巴克(1964年)在那里发现了55,000年以前和10,000年以前之间的一段漫长的干旱阶段，其中在43,000年以前和28,000年以前有两个潮湿起伏期，在10,000年以前左右是一个较长的潮湿阶段的开端。正如以前J.A.科齐和E.M.范津德伦·巴克从肯尼亚山报道的那样(1970年)，在干旱时期，濒临大裂谷的高地温度大幅度下降，在那里，他们对肯尼亚山在26,000年以前－14,000年以前的冰蚀提供了证据。

J.D.克拉克和E.M.范津德伦·巴克(1962年)还研究了隆达地区的植被演化。在40,000年以前－10,000年以前，这个地区是长满短柱豆属植物的干燥林地草原。在10,000年以前－5,000年以前潮湿阶段，这片草原已变成较稠密的森林。E.罗什(1975年)为补充J.莫埃尔松斯(1975年)的地貌学研究报告，对卡莫阿遗址进行了花粉分析，根据这个分析，看来从阿舍利末期到15,000年以前有一段干旱期。可以看出，存在过干旱大草原向林地逐步演化的明显过程，然后形成较为稠密的森林，从12,000年以前起气候变得愈加湿润之后，狭长林带也扩展了。

M.斯特里尔(1963年)认为，干燥林地和金合欢属植物草原的广泛延伸发生在50,000年以前和20,000年以前之间。这次延伸起了阻挡热带森林向中部盆地扩展的作用，有人认为，延伸始于赞比西河东部地区。根据P.迪维尼奥(1958年)的观点，沙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交叉路口，即那里的植物表现出几个地区——扎伊尔和几内亚，赞比西和东非——的影响。

根据米兰科维奇关于热赤道移动性的理论，A.施米茨(1971年)认为，在12,000－5,000年前的一个炎热潮湿阶段，热赤道向南移了8度，导致热带森林大为扩展。有人认为，森林覆盖了整个扎伊尔，甚至安哥拉的一部分，今天这些地区的林地草原上的狭长干燥热带
555 森林就是见证。热带森林也进一步向北延伸，覆盖了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大部分。

在这个潮湿阶段，草原和林地草原在有利的条件下，即在高地和贫瘠的土壤上，保存下来。很有可能在南部扎伊尔和安哥拉的高地从未生长过稠密的植物，正是从这里，在距今5,000年之后气候变得更加干燥时，林地草原又开始延伸了。然而，A.施米茨(1971年)认为，在过去一千年当中，导致热带森林减退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活动。

简言之，距今50,000－10,000年以前，中非经历了与武木冰期同时的一个长久干旱阶段，而在大约12,000年以前开始的潮湿阶段与全新世时代早期的气候起伏是同时的。在这个长久的干旱期之中(其间在28,000年以前左右可能穿插一段潮湿期)，地貌运动活动频

繁，林地草原也大规模延伸。在全新世时代起始时的潮湿期，热带森林扩大，覆盖了中非大部，它在近代的减退应归因于人类的活动。

人类在中非的定居

在缺乏人类骨骼化石的情况下，一般认为，经过切削或打制的卵石是说明人类生存的首要标志。这些卵石类似坦桑尼亚以奥杜瓦伊峡谷命名的遗址中发掘出的奥杜瓦伊工具。几乎整个中非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物品，例如在扎伊尔的开赛河流域和沙巴，在喀麦隆、加蓬、扎伊尔以及中非共和国，在安哥拉东北部，这些工具埋藏在沉积物中。然而，要想确定卵石被打磨成片究竟应当归功于人类，还是应当归功于各种自然力量，这不总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认为，把确切表明具有特意加工迹象的所有卵石都当作工具，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常见的错误)。就其大部分来说，这些都是岩核，石片是从上面敲下来的；而这些石片或者按原样使用，当作万能工具，或者经过加工修整当作侧刮器和端刮器。

至今既未发现始于这个时期的居住遗址，也未发现任何木制和骨制器具，而它们在使用过的工具中一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可以假设，卵石片是南方古猿或能人的作品。根据在非洲其他地方所进行的考察，他们肯定过着以尸体为食的生活。但是，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大概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形成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时期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而且它一直延续到大约50万年前。

然而，只是由于有了阿舍利时期的工具，我们才获得人类出现于中非的无可争辩的第一个证据。人类存在的最古老的阶段——阿舍利早期的证据，只发现于隆达地区(克拉克，1968年b)。阿舍利晚期的文物一般出现于干旱的环境，已在中部盆地边缘上的几个地点被发现。J.D.克拉克在安哥拉，J.南库因在卢旺达和布隆迪，R.德贝勒·德爱尔芒在中非共和国，对它都有描述。最有参考价值的遗址是赞比亚的卡兰博和扎伊尔的卡莫阿。 356

双面工具和砍砸器是阿舍利时期的特征。为了根据形状把它们加以分类，人们做了各种努力(卡亨和马丁，1972年，及其他人)。一些作者力图根据从阿舍利第一时期到第五时期这样五个连续阶段，查明从一个古老阶段到一个比较近代阶段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些类型学上的特点没有什么年代学的意义。一个双面工具，顾名思义，是以加工修整一块卵石或一块大石片的两个面的方法打制出来的，其特点是它有一个相当锋利的尖刃，底把几乎总是圆形的。另一种有显著特点的工具是砍砸器，随双面工具一起被发现，但不象双面工具，顶端是一个砍刃。除了这些工具之外，其它特点不突出的工具也有所发现，诸如三面石器、尖凿、石刀、扁球状石器以及各种小型工具。虽然阿舍利时期的文物数量甚多，但是，这种工业在考古学上或甚至在类型相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却很少。在发现阿舍利文物的少数几个分层遗址中，有一个在沙巴的卡莫阿河河岸(卡亨，1975年)。那是一个很大的遗址，面积有几英亩。曾经在此居住的狩猎人和采集户遗留下工具，还遗留下制造工具时的废石片。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我们在这儿叙述的遗址原是一个工场兼住区。鉴于这些工具只有一种类型，从中辨别不出新的发展，这些工具可能是一个季节活动所积存下来的。从离这个遗址1.6公里的某一地方获得了原始材料，在那儿发现了巨大的

基岩石核。石片被运到这个遗址后，大概又对工具加以切削和打磨。卡莫阿的阿舍利近期或末期的打制工具与在撒哈拉和南非所发现的打制工具类似。为此而提出的6万年以前这个年代可以当作一个定论，而我们的意见则是，实际年代要早得多。

从非洲其他地方的发现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工业的制作者应是直立人，一种依靠打猎和采集食物生存的人。可以认为，当时社会组织继续发展，人类掌握了火。

适应性改造和技术的发展

在一系列地区发现的阿舍利以后的工业虽然互不相同，但仍给人以一种统一的印象。557 为了实际需要，让我们把中非分为东半部分和西半部分；前者可以再分为两部分。不过由于缺乏中非以南以北地区的资料，这种进一步的划分必然多半是推测性的。在由安哥拉延伸到加蓬的西半部分，大部分情况已经了解的地区包括扎伊尔河下游、金沙萨、隆达地区、宽果以及开赛，即扎伊尔盆地的西南部分。东半部分包括湖泊相间的地区和沙巴－坦噶尼喀湖地区。

在西半部分，初步鉴别了一系列工业，这些工业通常被说成是构成一种年代学和类型学的顺序：首先是桑戈工业，然后是卢彭巴工业，最后是奇托洛工业。据推测，桑戈工业被认为是阿舍利工业和卢彭巴工业之间的过渡，属于第一中间期。卢彭巴可能属于中期石器时代，卢彭巴－奇托洛工业是第二中间期，后来发展成为奇托洛工业本身；奇托洛工业被认为与东非和南非的晚期石器时代同时。双面石器的打制是所有这些工业的特点，似乎它们就是阿舍利工业的技术的延续。勒瓦卢瓦技术极少发现。

中非东半部分显示出更加多样的工业，它们与西半部分的工业种类相似，但是双面石片的打制却比较少见。另一方面，所谓的莫斯特时期和勒瓦卢瓦时期的石片打制技术有高度的发展，石刀和薄片石刀很普遍。从第二中间期以后，重大的变化显著可辨，传统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显地与早期工业无关的细石器工业。在这个地区，桑戈工业和卢彭巴工业非常典型，使得有可能区别这个地区的两个不同部分。短剑、叶状石器和双刃尖矛是一个部分的特点，它大概包括北部地区，即湖泊间隔地区。另一部分包括南部地区，即沙巴和坦噶尼喀湖沿岸，其特点是没有尖刃石器，却有錾子和槽凿类型双面工具。十分奇怪的是，在湖泊间隔地区几乎完全没有这些工具。这一点清楚地表明，根据这些遗留物来区分森林工业和草原工业，是荒谬的。此外，在这一时期，似乎没有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的树木更多。相反，气候一定比今天明显地干旱；将近这个时期末，森林才扩展了。马桑加遗址是这个地区工业类型的范例；除了有尖凿这类较笨拙的工具，还有各种双面尖石器。勒瓦卢瓦的特征表现得很明显(卡亨，海萨厄兹和范诺顿，1972年)。在桑加，显然发现了一连串从桑戈时期到晚期石器时代的石器工业，但尚未进行仔细研究(南库因，1958年)。

558 现在我们进一步仔细地观察一下西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工业包括在东部地区发现的全部类型，这一点使其类型更加多样化，也使它更接近对桑戈工业和卢彭巴工业的公认的描述。这里有类似在阿舍利工具中发现的粗糙尖凿，而且一直延续到奇托洛时期。因此，被

认为是桑戈时期主要化石的这种工具事实上没有什么年代学的意义。但是，与这些工具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制作十分精致的工具，包括一些优美的叶状尖矛和长剑。人们还发现箭头随之出现，说明人已经发现弓的用途。这些适应性改革可能是智人的作品，虽然直到现在还没发现人类的骨骸。

地层学上发现几个层次的遗址很少。在冈比，J.科莱特发现了中非的第一批工业系列，提供了连续四个时期工业的证据：卡利尼亚、卓可西亚、恩多利和里奥波德，随后还有铁器时代的痕迹。194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一届泛非史前史大会忽视了科莱特的命名法，而采用了依据不适当的考古证据得出的桑戈和卢彭巴这两个术语。这些新术语载入了文献，此后不仅在中非不加区别地应用，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个地区的范围。冈比是能提供确立一种年代学希望的唯一已知的遗址，1973年和1974年(D.卡亨，1976年)D.卡亨重新加以挖掘，目的在于对J.科莱特发现的顺序加以明确的年代鉴定。除了类似阿舍利时期的一些物件之外，这个顺序始于卡利尼亚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卵石片打制的粗糙尖凿、厚重的刮削器、带锯齿形的大工具，以及相当大的刮凿。还有尖矛双面工具，聚敛刮削器以及带有或多或少平行刃的窄小的双刃和单刃工具。此外，还有许多横砍刃的石片工具(小削皮刀)和莫斯特型圆石核。劈削的废料包括勒瓦卢瓦型石片和一些劣质石刀。较大的工具很象桑戈时期的工具，而细致的工具则象卢彭巴或奇托洛时期的工具。下一个层次是卓可西亚层次，其特点是主要有带把柄的或叶状的箭头，通常以压磨石片的方法加工。片屑与卡利尼亚层次的一样。卓可西亚层次很象金沙萨平原的卢彭巴晚期(莫塞尔，1968年)和卢彭巴－奇托洛时期，即G.莫特尔芒(1962年)和J.D.克拉克(1963年)所确定的奇托洛晚期。第三层次是恩多利层次，其代表性的文物很少，小型叶状箭头是这一层次的典型。在当地所进行的双极石片打制说明了裂碎片的存在。这种工业多少与奇托洛晚期工业相同(莫塞尔，1968年；卡亨和莫特尔芒，1973年)。

关于卡利尼亚时期，已经确定的一个年代与估计的桑戈时代相吻合(克拉克，1969年，第236页)，另一个与卢彭巴的早期几个阶段一致(克拉克，1963年，第18到19页；莫塞尔，1968年，第221页)。从卓可西亚层次获得的样品的年代与其他地方给同类工业估计的年代相差甚微。在与恩多利有关的年代中，有一个年代与以前在金沙萨平原和隆达地区获得的奇托洛晚期的年代相符。

559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用地层学的方法在隆达地区、冈比和金沙萨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工业在类型学上相去不远，在年代学上也密切关联。桑戈-卢彭巴早期被定在45,000和26,000年以前；卢彭巴晚期和卢彭巴－奇托洛时期被定在15,000和10,000年以前；奇托洛早期被定在10,000－7,000年以前；奇托洛晚期被定在6,000－4,000或3,500年以前(见表格19.1)。

P.德马雷在丁巴洞穴发掘的一条取样沟中发现了15个连贯的古地层，以及2,000±650年以前卢彭巴－奇托洛型的卢彭巴晚期的一种工业。这种工业应该追溯得更远一些，大约到25,000年以前。这个年代会弥补D.卡亨(1977年)所记载的27,000年以前和15,000年以前两者之间年代鉴定的空白。

豪洞穴可能是在其被占用期间在赤道森林中的唯一遗址。F.范诺顿在这里发现了晚期石器时代的工具以前的一种"卢彭巴"工业的痕迹，但用放射性碳进行的年代鉴定没有取得

可接受的结果。

J.P.昂福(1970年)在1966年挖掘了比托里山洞，发现20层在石器时代先后被居住过的痕迹。有一层以放射性碳鉴定出的年代是3,930±200年以前；较低一层是4,030±200年以前。其中的石制工具没有表明一层与另一层之间有什么发展，这些工具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统一的类型，这种工具很象奇托洛晚期的工业。同一位研究工作者鉴定出穆桑达的奇托洛中层的年代是6,600±130年以前(戴利布里斯等，1974年，第47页)。

在加蓬，多处发现了据认为是卢彭巴时期的工业(布兰科夫，1965年；哈吉乔治和波默雷，1965年；法林，1965年)。

专职的狩猎和采集户

在某个时期，可能在距今50,000和40,000年前之间，几何形细石器出现了，即扇形、三角形、长方形以及梯形石器。最典型的可能是扇形工具，虽然在南非发现它们最早用于中期石器时代末，那时可能是当作装在矛尖下面的倒钩来使用的[10]。另一方面，在晚期石器时代，这些细石器是单独被使用的，当作箭头、矛尖和鱼叉尖，以及錾刀和刀片。

560 正如在前一个时期那样，这里所研究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分为明显不同的两部分。西半部分包括安哥拉北部、开赛河、宽果河、扎伊尔河下游和刚果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部分中，所谓的卢彭巴传统仍然存在，似乎它是在当地发展起来并且促使形成了奇托洛工业。几何形细石器数量很多，但是并不象在东半部分那样居主导地位，在东半部分，这种细石器是工具中的基本成分。S.米勒(1972年)对奇托洛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总结了以往的成果，根据发现的尖錾凿型双面工具、叶状尖刃工具、带柄尖刃工具、小型剥皮刀以及一些几何形细石器，确定了这种工业的定义。隆达地区发掘出的一种工业具备所有这些特征，虽然在各个遗址，这些工具并不完整。这样，由于在丁加等地发现了一大批小型剥皮刀，一种山谷风格的打制工具被辨别出来，还有主要包括带柄尖刃工具的一种高地风格也被辨别出来(贝夸特，1952年)。1959年莫特尔芒在巴泰凯高地的一处遗址进行了一次抢救挖掘(卡亨和莫特尔芒，1975年)，发现一种工业，据说是综合性的，与在隆达地区所描述的那种工业类似。实际上，从一些沉积层中发掘出的多形沙岩是已发现的那些工具的唯一制作原料；最近的一个沉积层离遗址大约9.6公里。这种工业的特点是，石片和废石屑占很大比例(96.1%)，还有一些岩核(1.4%)，以及一些用具(2.4%)。除了叶状的和带柄的箭头之外，发掘出一大批几何形细石器，还有一个砍刃锃亮的石片。大部分岩核都是圆形和片形；还有许多完全磨损的小岩核。片屑主要是加工石器的废碎片，其中还有少量勒瓦卢瓦石片和一些石刀、薄片。这些都是奇托洛晚期工业的典型特征。这个遗址很可能是一个狩猎营地，因为，虽然巴泰凯高地在性质上象个干旷草原，但也存在一些狭长林带，这些树林肯定吸引过寻猎的史前人类。虽然使用的石料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但许多工具可能是在这里打制成的，可以想象，在挖掘期间发现的胶状乳液和硬松脂是用作玛璋脂来把细石

---

[10] F.卡特(F. Carter)，个人书信。

器固定在箭杆、矛杆之上的。毫无疑问，刮削器，錾子和斧子用来制造组合工具；这些组合工具都使用偏斜砍刃和带柄双面箭头。

在J.D.克拉克研究的隆达地区，产生了一个奇托洛时期的年代，确定为13,000－4,500年以前(克拉克，1963年b，第18－19页)，但是，有人认为这个时期的工业一直继续到我们纪元开始(克拉克，1968年b，第125－149页)。另一方面，金沙萨平原的奇托洛工业则定为9,700年以前到5,700年以前(莫塞尔，1968年，第221页)。

我们不妨在这里停一停，研究一下奇托洛工业各种风格的含义。问题是，这些风格是否意味着适应各种环境，例如专门的狩猎方法，或者它们是否仅仅代表文化的差别？ 561

从东半部分，在从中非共和国到沙巴的赤道森林的边缘，发现了所谓晚期石器时代的各种工业。由于一些专门的工具只是在后来才出现，所以这些工业中最早期的工业还未从类型学上辨别出来。这一点是在马图皮山洞观察到的，1973年和1974年在那里连续进行两次挖掘，发现有人类长期居住的痕迹，从距今40,000年开始，一直到3,000年以前，中间没有明显的间断(范诺顿，1977年)。迄今据以研究的材料仅仅是从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获得的，共8,045件人工制品，几乎都是运用两极加工的技术由石英石打制而成的。这种打制过程是真正细石器的特点。废片屑占挖掘材料的90%，而工具本身只占5.4%，此外有一些虽有使用过的迹象，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成形的工具。这些工具占5%。这种工业是典型的细石器，石片最长为17.7毫米。所有这些石制工具肯定都是用来制作组合工具的。这种工具本身(以发现的多少为序)包括凹形刮削器、钻孔器、刻刀、有槽刃的薄石片、细加工的石片、截成平面的石块、以及一些几何形细石器(扇形、半圆形和三角形)。由石英岩、沙岩和片岩制成的大型石器有磨石、杵、砧、石锤、四面刮，以及一些錾子。一块刻有装饰的钻孔石器断片被鉴定为距今20,000年左右。⑪ 动物骨骼保存完好，这说明当时环境比现在干燥。被山洞居民猎获的动物按多寡顺序排列是牛(羚羊和野牛)、蹄兔、啮齿动物(特别是竹鼠)、猪，以及少数长毛猴和豪猪。虽然现在这个山洞位于赤道森林之中，但几乎在整个占用时期，它一定是在草原范围之内，然而，据花粉分析的证据来看，离林带并不远。在这个山洞被连续占用的一段时期内，起初并不典型的工业变成了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产生了几何形细石器、零星的骨质工具、当作一种颜料使用的红铁矿石、以及由鸵鸟蛋壳制做的扁圆形珠子。鉴于能够用作器具和武器的物品数量很少(尤其是在较早地层中)，我们认为，那些工具多半是木制的，正如我们在圭绍发现的那样(费根和范诺顿，1972年)。

J.德海因策林1950年在伊桑戈的一系列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三种细石器工业(海因策林，1957年)。虽然最早的一种工业不包含几何形细石器，但是在下一种工业里有一些，在最后一种工业中，数量甚多。从类型学上看，这种工业大部分很粗糙，石片打制综合了所有的技术，并且受到用作原料的劣质石英石硬度的影响。这些特征与在马图皮观察到的工具发展情况十分相象。在伊桑戈发现了一系列鱼叉，据猜测是用来狩猎和捕鱼的；它表明了一种显著的进步，即从较低地层中发现的一种双排倒钩的类型发展到较后期地层中发 562

⑪ 也称为"克维"，在晚期石器时代的工业中发现的钻孔石块大概是用作挖土棍上的坠石。

现的一种单排倒钩的类型。最突出的发现物之一是一根刻饰过的小骨棒，用作一块石英片的把柄。伊桑戈工业的年代为21,000±500年以前；在有关这个遗址的专著发表时，作者认为这个年代似乎早了一些。可是根据在马图皮获得的年代来看，这个结论现在好象并不那么不可能了。

伊桑戈的居住者以捕鱼、狩猎为生，猎获的动物主要是河马、羚羊，也有其他哺乳动物，其中一些现已绝迹。鸟类也是猎取对象。鱼类主要包括鲇鱼、肺鱼和丽鱼。F.特威塞尔曼(1958年)研究了在烧制食物的残迹中发现的人体残骸，这些残骸表明，在这个遗址居住过的人具有毛蓬蓬的非人面目，并不具有与任何现代人的直接关系。

除了这些纯属细石器的工业以外，在类型学上属于纯粹细石器和典型的中非西部工业之间的居间性工业在湖间地区、同时也在沙巴和坦噶尼喀湖沿岸有所发现。这些工业异乎寻常的特色有可能是由于它们继承了上述中期石器时代的传统。J.南库因不得不创造"威尔顿－奇托洛"这个术语来描述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晚期石器时代（南库因，1967年）。遗憾的是，在这两个地方，已鉴定出年代的遗址很少．卡莫阿过渡性工业的时代可与西部地区的卢彭巴－奇托洛时期相比较，其年代被认定为15,000－12,000年以前。在同一遗址，质量不好而且没有特点的晚期石器时代工具的年代大约在6,000－2,000年以前（卡亨，1975年）。因此，看来很可能是，不同的石器传统能够共同存在，长久延续，而且，事实上也是和各种特点的工业，或诸如在穆基纳尼拉（范诺顿和希尔诺，1967年）和莫科托莱克斯（范诺顿，1968年a）发现的纯细石器工业一起并存。

中非至今未发掘出一个埋藏物丰富、足以详细考证这种以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的遗址；卡拉哈利的桑人今天仍然实行的生活方式大概与这些以狩猎为生的人的生活方式差不多。赞比亚的圭绍遗址非常全面地体现了据今第五千纪晚期石器时代的生活。非常侥幸、与磨光工具一起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木制和骨制物品，这证明了甚至在有果树的草原上，木材加工也具有重要性（费根和范诺顿，1971年）。

563

石器时代的结束

一些地区发掘出大量磨光工具，使这些工具已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工具发现于晚期石器时代，而且在韦莱河地区，在十九世纪，人们还依然在制造和使用它（范诺顿，1968年b）。由此可见，脱离考古学的环境，这种磨光工具的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而，这些工具的分布并不是没有研究价值的。因为，只在中部盆地的边缘才发现这些工具。在东部，这类发现极其少见。只在布隆迪发现了两个磨光的石斧和一个埋有一些磨石的山洞（范诺顿，1969年；卡亨和范诺顿，1970年）。在东南方向，发现的东西数量有所增加。在东南的沙巴发现了一些磨光石斧和磨石，而在开赛河，虽然也发现了一些磨石，但磨光工具几乎没有（赛利斯，1972年）。

另一方面，在赤道大森林以北，这类工具是考古发现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韦莱盆地和伊图里，发掘出400多件器具，包括一些精细磨制的别致的红铁矿石斧，和数量很多的打磨用的石槽。迄今只制出一幅这些工具分布图（范诺顿，1968年b）。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韦莱新石器的技术的年代不会早于十七世纪，因此，它是铁器时代的一部分。在布鲁的发掘物似乎说明了这一点(F.和E.范诺顿，1974年)。

再往西，在乌班吉河穿入森林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磨光石斧的集中地。它们都不如韦莱的石斧那样精细，大部分只是部分磨光。对这个地区的勘查未能发现具有考古价值的任何类似的工具，但在河的另一边，在中非共和国的巴塔利莫，R.德贝勒·德爱尔芒在一次挖掘中首次发现了一个有光刃的石斧，还有一种非细石器工业和一些陶器。陶器都是平底的，整个表面常常有装饰，一般是用一个梳子类的东西勾线、刻纹、刻印而成的。根据热发光法进行的年代鉴定，这种陶器一般开始于我们纪元四世纪；对于这样一种工具来说，这个年代显得太晚了。虽然在中非共和国不同的地点发掘出其它一些零星的磨光石斧，但是，就我们所知，在这个地区没有出现任何磨石。

在介绍打制工具集中的最后一个地区以前，我们应该提到，在喀麦隆海岸外的费尔南多波岛上，与陶器一起发现的磨光石斧的年代经鉴定为我们纪元七世纪(马丁·戴尔·莫利诺，1965年)，而且直到近代它仍在使用。

最后一个地区是从加蓬延伸到安哥拉西北部、与大西洋海岸平行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发现的所谓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一般都是粗糙砍劈制成的，只有砍刀被磨光。 564

在加蓬，石斧刃呈波浪形，形成具有特点的榫舌(波默雷，1966年b)。在大规模建筑工程期间挖掘出一个罐子，里面盛有一个磨光了的工具的碎片和一些木炭。遗憾的是没有把年代鉴定出来(波默雷，1965年)。在刚果人民共和国和安哥拉(马丁斯，1976年)，只有一些表层的发现物。另一方面，在贡贝，J.科莱特于更早的时候发现一个明显与平底陶器同时出土的磨光石斧(贝夸特，1938年)，为此，他创造了利奥波德新石器这个术语。随后，这个术语便用来描述在扎伊尔河下游发现的许多磨光石斧。莫特尔芒(1959年)在刚果迪亚万加的地表层发现了磨光石斧、经过某种加工的石英石和平底陶器。在恩塔迪-恩塔迪、丁巴和恩戈沃山洞又发现了同样的陶器，在后两处遗址，它们与磨光石斧混在一起。四次在附近发现的木炭，鉴定年代在我们纪元前最后200年(马雷，1977年a)。遗憾的是，这些标本都太小了，不足以绝对排除它们起源于铁器时代，尤其是因为新的挖掘表明：贡贝的利奥波德石器大概属于铁器时代(卡亨，1976年)。然而，这个遗址的地层受到严重扰动，很可能同上面几层混杂了。

丁巴和恩戈沃是保存骨骼的仅有的遗址，在这里，对于有关动物群的分析研究，至今并未揭示出家畜的存在。由于缺乏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推测存在一个真正的新石器时代为时还过早。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使用陶器和磨光工具的，同时饲养家畜，从事农业。对于在中非迄今发现的一切其他新石器时代风格的工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对使用这种工具的人、这些人的时期和经济体系一无所知。但是，最近有人提出一种假设，认为这些残骸可能属于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可能相当于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左右说班图语的民族向扩张的早期阶段，即在他们掌握铁器技术以前(菲利普森，1976年；马雷，1977年b；范诺顿，1978年)。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提到在布瓦尔地区发现的巨石器，其年代大概在我们纪元前的第五千纪，要不然就是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但也可能是第二次被使用(贝勒·德爱尔芒，

1975年)。根据它们的大小来判断，这些石碑肯定是定居的人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已渡过了狩猎和采集食物阶段。阿比的巨石路面是天然形成的，非人工制造(范诺顿，1973年)，迄今在扎伊尔所发现的其他一切所谓巨石建筑物也都是这样。

565

探索完整的年代顺序

1967年在达喀尔召开的泛非大会上，J. D. 克拉克试图把扎伊尔盆地各种名称的石器排一个次序(克拉克，1971年a)。人们曾以各种不同的名称来描述中非地区在阿舍利时期以后的各种工业，D.卡亨总结了这些不同的命名的来历，并且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命名是多么混乱(卡亨，1977年)。

近来在贡贝的挖掘使得有可能重新确立J. 科莱特首先奠定的古代文化顺序，并鉴定其年代。但是，不同层次的文物之间的联系表明，遗址地层严重扰动，发现的工具都不是同一类型(卡亨，1976年)。实验室的试验证明(莫埃尔松斯，1977年)，遗物在土壤中被变动了位置。因此，同样的扰动过程可能也在其它遗址发生过，在这些遗址中，考古遗物被埋入卡拉哈里流沙中，正如在东北部安哥拉、扎伊尔河下游、开赛河、沙巴河和刚果河那样(卡亨和莫埃尔松斯，1977年)。然而，我们无法说明，各种工业在多大程度上受了这些土壤运动的影响。此外，在南部扎伊尔盆地的各个史前遗址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的趋同现象，在中非也有，不过程度小一些。D. 卡亨(1977年)建议把这些趋同的史前遗址群归结为一个单一的中非后阿舍利工业系统。该系统在开始时遍布整个中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积缩小，最后只限于扎伊尔盆地西南部。他还认为，诸如桑戈、卢彭巴和奇托洛这些术语与科学地确定的任何事实都不相符。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这一节已尽力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在阿舍利时期以后各种石器工具中区分出地区的变种并考证其演变过程还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这些区别可能是图解式的，可以争议的，但是，它仍反映一定的真实性，尽管我们现在看来，它远比我们最初设想的情况更为复杂。新的发掘情况不断完善我们的分类，这将是了解石器时代中非地区极为多种多样的工业的最好途径。我们认为，现存的命名不妨作为一种方便工具暂且保留。

结 论

由于学者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系统研究中非的历史，因此，现在对中非历史的情况仍然了解甚少。但是，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一些初步发现。这样，在近几年之内，以放射性碳方法鉴定的年代的数量几乎增加四倍(马雷、范诺顿和卡亨，1977年)，因而可以据此作出初步的综合性分析(范诺顿正在准备)。

566

新的考察工作首先是进行一系列包括不同地区和针对不同时期的挖掘工作，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确定中非年代学和地层学的一个梗概。这个宏伟的计划暂时还只能放在第二位。象贡贝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遗址，不仅使人们对现存的命名产生怀疑，而且甚至对地层学考察的有效性都产生了怀疑；而象马图皮这样的其他遗址发掘出的新的石器工具，其年

代鉴定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怀疑它们在整个事物的安排中所应占的位置，而在这种安排中，对各种工业和文化都应该给予确定无疑的正确地位。

新遗址发现得越多，就越清楚表明：一些独特的和意料不到的文物时有发现，这一点与我们依据的假设之一是符合的，这种假设就是，在每一种“工业”或每一种文化之中都可能存在很大的多样性。人类面对某一小范围的环境，必须使其工具适应他的生境。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在其领地范围内过着一种比较稳定的生活，而不是人们常说的狩猎人和采集户所过的那种完全游移不定的生活。这样，这些人远远不是长年累月地进行狩猎活动，肯定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即环境因素和祖先传统的和谐综合（我们不相信环境的影响绝对是第一位的）。生态平衡一旦确立，工具就能长期保持不变。毫无疑问，这些工具充分满足了具体生境及其居住者的需要。只要这种微妙的平衡得以保持，人类就不会感受到必须迅速演化的特殊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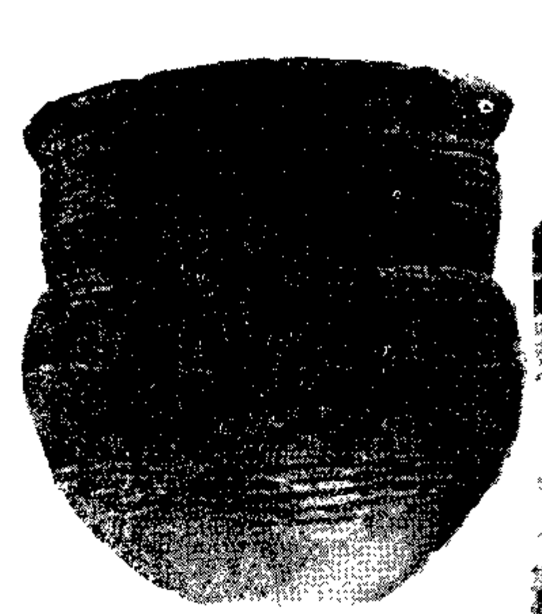
（杨德友译）

567

照片21.1　阿舍利晚期双面工具，发现于中非共和国，上桑加的恩戈埃雷河（国家自然博物馆）



照片21.2　阿舍利晚期手斧，发现于中非共和国，上桑加的恩戈埃雷河（国家自然博物馆）



照片21.3　新石器时代的平底花瓶，发现于中非共和国洛巴伊的巴塔利莫沉积层（国家自然博物馆）



照片 21.4　中非共和国布瓦尔地区石器时代的石碑（R. 德贝勒·德爱尔芒）

22 北非史前史

L. 巴卢

568

由于马格里布地区接近欧洲，并地处地中海沿岸，因而成为史前史研究的最早对象，有些研究工作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结果产生了相当大量的研究文献，但其可靠程度很不一样。后来曾对这种学术著作进行澄清和整理（1952 年，1955 年，1974 年），但对北非地区史前史的研究却不能象过去那样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相反，在两个重要方面却落后了：一方面，除了少而又少的例外，发掘方法落后了；另一方面，绝对年代的测定仍只限于使用放射性碳测定法。面东非在这两方面已取得了十分巨大的进步。

结果是，缺乏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还缺乏使用钾－氩测定法面获得的旧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年代，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动物群和石器工业类型之间假设的关系来确定马格里布和撒哈拉地区人类祖先的居住点的年代。

由于没有更多和更充分的地层学资料，要确定人类居住的连续性是困难的，虽然这种连续性是很可能存在的。各类型的遗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彼此都是孤立的：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阿特拉猿人)就是一例。莫斯特文化的问题，它与阿特利文化的关系问题，具有阿特利文化的人类类型问题，从阿特利文化到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的过渡问题，卡普萨的地层学和新石器时代的各阶段问题，等等，大都没有解决。史前史的研究，无论在地层学上还是在古生物学上都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了第四纪，并且促成建立了超出马格里布地区范围的类型学。因此，史前史研究应该采用古人种学的方法：研究**在**某一环境**中**的人，而不是人**和**他的环境。

人类最早的工业：前阿舍利文化

虽然证据并不缺乏，但是，除了从类型学上解释之外，从其他的角度解释是困难的。解释的依据一直是摩洛哥(比伯森)沿海第四纪地层、阿尔及利亚(塞提夫附近的艾因哈奈什，由 C. 阿朗布尔发掘)和突尼斯(克比利附近的艾因卜林巴)的动物古生物学，或者只依据撒哈拉(雷冈，因阿法莱赫等)的类型学。因此可以推断出，前阿舍利文化与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遗址有一点点联系；之所以有一点点联系，是由于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为卵石工具的进化提供了唯一的证据。P. 比伯森曾把这些工具作为他的结论的根据，但他的一些结论已遇到新的挑战，因为那些动物不一定是同时代的，因为我们一方面面临古文物的**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还面临古文物的**结构**问题，还因为类型学分析的种种方法，

569

从法语非洲国家到英语非洲国家各不相同，等等。

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而言，看来人类祖先在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出现不象在东非和南非那样早。早于砾石器的片形石器一直没有发现，没有骨(角)器文化的遗迹，也没有南方古猿的遗骸。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卵石文化在年代上与奥杜瓦伊工业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它可以追溯到200万年至100万年以前(如果算上奥莫的双面型砾石石片的话，距今有250万年)。

因此，考证工作必须主要依靠年代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其发展演变中的相互关系。由此编制出了包含年代因素的"类型学系列表"，正如P.比伯森在摩洛哥、H.于戈和L.拉曼多在中撒哈拉、H.阿利芒和J.夏瓦伊隆在西撒哈拉的著作所证实的那样。他们的分析是以技术特征为依据的，而这些技术特征的反复出现使得有可能确立一些系统的类型。分类的顺序是由简单到复杂：单面的、双面的、多面的石器。这种分类法十有八九符合年代学的顺序。P.比伯森为摩洛哥大西洋海滨的第四纪海滩，J.夏瓦伊隆为萨马拉的沉积物构拟了至少具有地区价值的历史过程。古生物学为把艾因哈奈什出现的削面球状石器归入更新世初期的动物进化过程中提供了基础，正如在摩洛哥（福瓦拉特），阿尔及利亚（艾因布舍里特、艾因哈奈什），突尼斯(艾什凯勒湖、艾因卜林巴)所发现的那样。

一般说来，我们的推断是建立在对更新世时期地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又以动物考古学为依据。人类制造的各种石器就是按照这种顺序出现的，这种石器工艺向双面工具及其正统的早期旧石器时代的手斧逐渐演变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象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那样，存在着一个古文物结构，从而构成了一个古代人种学的轮廓。

570

阿舍利工业

自从布格瓦登斯泰因专题讨论会(1965年)和达喀尔泛非史前史会议（1967年）以来，整个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工业已统称为非洲阿舍利工业。这种工业在西欧不仅与阿布维尔和阿舍利工业一致，而且与克拉克顿和勒瓦卢瓦工业一致，两者都是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

在马格里布，阿舍利工业的例子很多。除了在地面遗址外，这种工业还在三种典型的遗址中发现：

（1） 与海岸、陆地甚至海洋第四纪有联系的遗址。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P.比伯森提出了阿舍利文化系列性的见解，即从前阿舍利卵石文化的卵石工具开始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阿特利时期)。由于与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地理有关的许多原因，这个地区不能提供很充分的遗物，但是，在卡比利海岸(吉杰利)或安纳巴(波尼)的附近已经发现了沉积物。我还不知道，在突尼斯的海岸上有任何这类阿舍利工业遗址。

（2） 存在于河流和湖泊洪积期沉积物中的遗址。前者比起欧洲来要少得多而且保存得很不好，它们在地层学和生物学上的联系往往极不明确。在摩洛哥(迈拉赫河)和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附近的乌齐达恩、麦迪亚附近的香普兰）的大量

遗址，在塔姆拉(塞巴奥河)、曼苏拉(君士坦丁)、克莱尔方丹(特贝萨的北部)和塞贝伊基耶、特别是马艾卜耶德(特贝萨的南部)的遗址，已证明都是如此。在突尼斯有雷德耶夫(加夫萨)的阿舍利工业。除了东非的突出例子(即肯尼亚的奥洛盖萨伊列)外，湖滨遗址几乎不值一提。只是在布尔的指导下，很久以前曾在卡腊尔湖(特莱姆森)进行过多次发掘，但方法很不好，而阿布基尔的发掘(穆斯塔加奈姆)则更少人知道。在这些情况不明的发掘中，只有西迪津(突尼斯的勒凯夫)一个遗址是例外，在这里发现了含有手斧的地层，它处于包含有双面工具但没有手斧的另外两个地层之间。另一方面，湖泊沉积物中的阿舍利文物从毛里塔尼亚到利比亚是普遍存在的。

(3) 过去曾有过自流泉的遗址，这种自流泉从阿舍利时期直到阿特利时期似乎一直吸引了人类。具体的例证有摩洛哥的提特迈利勒(卡萨布兰卡)和艾因弗里蒂萨(乌德亚的南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阿尔及利亚的卡腊尔湖以及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舍特马(比斯克拉)，然而，最重要的是突尼芬(穆阿斯凯尔)。只有最后这个遗址受阿尔及利亚当局委托最近(1954－1956年)由C.阿朗布尔教授进行了彻底的发掘。但我们不应当过于仓促下结论。工业是极为有趣的，动物是异常丰富的，而且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阿特拉猿人。但是，这个著名的遗址在地层学上存在着一个问题：它的年代跨度太宽，很难确定发现物的具体时间；可能由于这个遗址的性质，加上不断受自流冲击沙的干扰，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地层年代。到现在为止其年代仍没有得到确证。对工具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不是制造工具的场所，而更为可能的是，这曾是经常猎取前来饮水的动物的场所。

571

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阿舍利文化与以前在法国被确定的那种阿舍利文化有着根本的差别。经过种种分析(博德斯在1961年，巴卢在1967年)，没有发现在双面工具方面有任何根本区别，三面工具亦然。因此，在突尼芬发现许多薄片工具和一个小型工业，是不足为奇的。在早期阿舍利文化将结束时开始使用木槌(用于成形和再成形)，在突尼芬仅仅发现了一个标本(双面的)。我们发现有加工成三面体切削石尖的工具标志。长期一直强调的最独特的特征，是片形砍砸器的重要价值。它伸展成一个尖端，说明它是一种真正的非洲工具(一种砍劈工具)。实际上，它并不始终出现于非洲的阿舍利文物遗址中(并且，在著名的马艾卜耶德文物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这仅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例子)；但是，它的确存在于从近东一直到印度半岛的这一地域。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曼萨纳雷斯河)和比利牛斯山脉都有这种工具，这一点促使H.阿利芒在最近一次考察(1975年a)中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远在新石器时代的航行以前，人类是怎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结论是，在里斯冰河期回归期间可能形成浅水地势，这种地势造成了一部分地峡，从而使人类能够通行。

对马格里布手斧进行的类型学上的最恰当的分析是J.蒂克西埃完成的。所得出的两个结论具有极重要的价值。第一个结论是，远在早期阿舍利时代就出现了勒瓦卢瓦石器加工技术，这一技术导致了所谓塔贝勒巴拉特-塔欣吉特砍砸器令人难以置信的普遍标准化(阿尔及利亚西部的撒哈拉)。第二个结论是，出现了从石核上打制石片的技术，这项技术促进

了具有完备锋利刀刃的双面石刀的制造(南非的孔贝瓦技术)。这些高度精巧的技术是不是从非洲传到欧洲去的呢？在欧洲，至少第一种技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起过重要作用。

阿舍利时期的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考古学术语来表述的。与双面工具相联系的各种工业跨越了两次冰期(民德冰期，里斯冰期)和它们之间的间冰期以及这些间冰期被划分成的若干段。比伯森曾试图把它们与海侵和海退相提并论：即埃米尔冰期=民德冰期，安法特冰期=里斯冰期，坦西夫特冰期=里斯冰期。不过这种相互关系仍然是纯理论性的。在里斯－武木间冰期中间的延续期似乎是完全可能的。

572

由于绝对年代的缺乏，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理论建立在古生物学的基础上。整个动物群失去了他们更新世晚期存留的成分，因而，按照阿朗布尔的说法，变成了“大乍得-赞比西河动物群”。但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对那些小的动物或突尼芬的植物群仍然一无所知。

在突尼芬发现的阿特拉猿人以及在摩洛哥(拉巴特人)和西迪阿布代拉曼(卡萨布兰卡人)发现的阿特拉猿人都属于直立人人种。准确测定这些猿人标本的年代是困难的，他们实际上接近北京人，最合乎情理的假设是至少在40万-50万年前。在其他地方，他们已掌握了火的使用，也许可能有了某种原始的语言。马格里布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莫斯特－阿特利文化

1955年，我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我怀疑北非是否存在过一个独立的莫斯特文化。戈贝尔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地反驳了我。他这样做是对的。随后(1965年)我欣然修正了我的判断；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不过是转变了角度。马格里布存在着真正的莫斯特遗址是不容置疑的，但其地理分布是特殊的，与任何公认的关于史前人种的统一概念都相当矛盾。在突尼斯，有6个遗址没有争论：西迪津(勒凯夫)、艾因姆赫罗塔(凯鲁万)、艾因迈特凯舍姆(沙姆比山)、西迪·曼苏尔·德加夫萨、盖塔尔(加夫萨)、瓦迪阿卡里特(加贝斯)；在阿尔及利亚仅有一个：赖泰米亚(谢利夫峡谷)；在摩洛哥有三个：塔福拉勒特(乌德亚)、基法贝勒戈马尼(塔扎)、伊古德山(萨菲)：撒哈拉没有。但是，存在着几百个在莫斯特时期之前或之后的遗址。但这里没有反映出研究的情况，因为发掘莫斯特文化，是法国培训的史前史学家的专门工作。在法国，莫斯特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和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一样，而且向南直到直布罗陀。西迪津(勒凯夫)离赖泰米亚800公里，后者离塔福拉勒特洞穴360公里，而塔福拉勒特又离伊古德山700公里。在这里，也有典型的莫斯特遗址，它可以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尤其是勒瓦卢瓦的石片技术相比拟，而且在每个地理上的末端，我们都获得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证据：伊古德山的尼安德特人和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仪式纪念物——圆锥形石堆或盖塔尔的“赫耳米斯”，不过，仅仅是它的顶部露在泉水上面，该纪念物无疑是献给这个水泉的。除瓦迪阿卡里特之外，在接近海岸的地方没有确实的莫斯特遗址。那么，当时加贝斯湾的海岸在什么地方呢？马格里布的莫斯特文化只能来自东方。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莫斯特文化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最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在它之后产生了当地的阿特利文化。因为我把推论建立在地质学分类规

律的严格运用上，我曾把那些莫斯特的工业系列看作是阿特利文化，在这些工具制造场所的遗址中发现了阿特利式的梗节尖状物(盖塔尔，艾闪迈特凯舍姆等)。我认为这不能作为 573 证明莫斯特文化和阿特利文化属同一时代的证据。我认为，马格里布的莫斯特文化的发展不同于所有其他莫斯特的传统。J.蒂克西埃曾毫无疑问地说明了那不是另外加上梗节尖状物或者加上刮削器的问题，而是通过制造一个梗节基础把大约30种莫斯特式的工具转变为阿特利式工具的问题。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莫斯特式工具的发展是不同的。马格里布式工具的发展甚为独特，因而曾被赋予特殊的定义，但现在再也站不住脚了：阿特利文化仅仅是非洲一部分地区特有的莫斯特文化演变出来的一个方面，它同莫斯特文化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年代上也一致。因此，R.沃弗雷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阿特利文化的说法实质上再也不能成立了。一些早期作者已经提出过"带有梗节制品的莫斯特文化"的存在，那无异于我们今天使用"带有锯齿状人工制品的莫斯特文化"这一术语。而且，因为以地名命名的一个阿特利遗址中(瓦迪杰卜巴纳，在特贝萨以南的比尔阿特附近)的工业遗迹从来没有被其发现者进行过彻底的分析，所以，正象M.安托万说的那样，阿特利文化仍然是一个"徒有其名的东西"。再有，因为这是莫斯特文化早期从北向南贯穿撒哈拉的发展，经历了极为长久的时间，遍及整个马格里布，因而它在年代上部分地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至少相当于旧石器晚期的开始阶段。

但是，能够作为依靠的明确年代证据依然很少。G.康提出的关于麦克伯尼对昔兰尼加的年代测定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主张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没有准确的证据能够证明那些工业是有联系的。阿特利文化是"很值得争论的"(康)，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是"不存在的"(蒂克西埃)。撒哈拉和马格里布与大陆或海洋第四纪的地层学关系也已确定下来，不仅相对年代而且绝对年代都已确定下来。我们纪元前四万年无疑不是阿特利文化开始的最早年代。由于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的可靠性有限，所以产生了困难。但在马格里布和撒哈拉测出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前37,000年至30,000年之间，这些年代构成了一种连续性的、可以成立的顺序。根据测出的开始年代看，阿特利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较早阶段。因此，它与卡斯特尔佩隆文化和欧里尼亚文化属于同一时代，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初阶段，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它与第四纪的形成的联系是连贯的。有时，原样未变的阿特利工具在新第勒尼安海滩被发现，这些新海滩是作为最后一次巨大回归开始时造成的后果而产生的(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穆斯塔加奈姆附近的卡鲁巴)。这个武木冰期的间冰段的结束(1/2武木冰期)，大约在我们纪元前48,000年发生。这些大陆地层——一般变为红色——在阿特利时期很多，它们在现在的海滩下面；低于现在的海平面，它们的形成起源于退潮 574 期，其深度当时大概达到150公尺左右。

明确地测定阿特利文化的终结时期，确实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任务。它曾遍布整个撒哈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工业的发展多少预示着新石器时期的到来。于戈认为，阿特利文化的传播不会越过那些含硅藻的大湖，这些大湖直至我们纪元前7,000年时还充满着水。关于"新石器时代前的"阿特利文化，没有获得什么确实的证据，不管这个论点多么饶有兴味。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中间工业的遗迹，而古人类学方面的一个主要障碍正处于解决的过程中：在摩洛哥最近的考古发现，有力加强了这一理论，即

阿特利人不是伊古德山莫斯特人那样的尼安德特人，已经是智人人种了。

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

不管阿特利文化在撒哈拉有哪些分支，在马格里布，它的序列是不同的。这里无须回顾对R.沃弗雷那些理论的争辩，尽管数十年来这些理论一直被认为是权威性的。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我们目前的认识。下面是四项重要见解：

（1） 我从人类学和古人种学的角度已把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从卡普萨文化中区分出来。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比原来所设想的古老得多。它同法国的马格达林文化同期，因此，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

（2） 在对“科利格洛地层”的争论中，R.沃弗雷的观点与戈贝尔博士和我本人的观点不同，现在这场争论已经结束。这种切刃工具接近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的程度比接近卡普萨文化的程度更大而且比后者早得多。

（3） 沃弗雷关于典型的卡普萨文化为后期或发达的卡普萨文化所取代的定义，已由全盛时期的卡普萨文化理论所代替，这种理论是以大量的用辐射法测定的年代数据为基础的，但这些年代并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承认。

（4） 沃弗雷提出的“卡普萨传统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主张，其证据是非常贫乏的，然而，他却扩展到包括非洲广大的地区。这种传统应限制在原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同时，应使不正确地归于它的广泛领域的部分归属于非洲新石器时代的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化。

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

1909年帕拉里提出的、至今仍在使用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了。他强调了具有背面的刀片的这一技术的广泛使用，但这几乎是所有石器制品的技巧中共有的特色。J.蒂克西埃作出的非常精细的类型学分析，终于使人们有可能用一套准确的类型标准来代替笼统命名该技术的主张。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已被相当多的史前史学家，尤其是突尼斯的戈贝尔博士相当强烈地意识到了。E.萨克森在塔马尔哈特遗址(阿尔及利亚的贝贾亚峭壁)所进行的最新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些极早期的标本，这些经过同位素确定年代的标本，提供了关于野羊、猎人和洞穴人的更丰富的资料；这些人生活在海岸地区，但是，由于沼泽地和一个露出水面并盛产贝壳类水产动物的大陆架的存在，他们又与海洋相分离。实际上，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是一种沿海文化，然而，在某些地方也渗入到内陆。例如，最近科卢姆纳塔遗址(阿尔及利亚的提亚雷特)也提供了一个证据，但并不完全可靠。可是，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的遗迹在丹吉尔地区和突尼斯的萨赫勒海岸却极少发现。在突尼斯的迈杰尔达河的南部之所以很少见到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是由于那里的文化独立发展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甚至详细的分析也几乎无法揭示伊比利亚-毛鲁西亚石器技术的奥秘。在拉穆维拉赫典

型遗址(阿尔及利亚的马尼亚附近)进行的最初发掘以后不久搜集到的几百件小型雕刻品证实了，它们同一种带有三面体的尖状器的制造有联系(叫做拉穆维拉赫尖状器)，而与卡普萨工业中某些几何形的细石器毫无联系。骨器的制造是相当粗糙的，它只有一种独特的外形：皮刀。当时还不存在人工艺术和壁画艺术，虽然这种文化在时间上与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艺术是同时的，而迈什塔阿尔比类型的克鲁马农人当时已在地中海北部和南部同时出现。

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证据足以证明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这一文化起源于东方，分出两个分支：欧洲的克鲁马农人沿着地中海北岸扩展，迈什塔阿尔比人则沿着非洲海岸向南扩展。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可能被认为是由尼安德特人经过阿特兰人繁衍下来的。但是，不管这一理论如何吸引人，却不能解释这样一种工业的发展，这种工业同莫斯特文化，甚至与作为其先驱的阿特利文化都毫无共同之处。认为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不是上述文化享有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文化不是扎根于一个地区的。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这些马格里布的克鲁马农人的职业和命运与他们的欧洲同类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石器工业至少在其早期是同马格达林石器同时发展的，这种石器是中石器时代的，而以前被说成是柏柏尔阿齐利文化。他们的骨器制造水平与马格达林时代骨制技术水平是相差很远的，也根本没有人身艺术品和壁画艺术，尽管在摩洛哥的说法与此相反。但是，他们一直存在到新石器时代，甚至在我们纪元前第三个千年期末还曾定居于加那利群岛。马格里布文化还具有许多其他明显特征：残缺的牙齿、在洞穴或岩石隐蔽所内的墓穴(阿尔及利亚的阿法卢布鲁姆迈勒，摩洛哥的塔福拉勒特)和墓碑(科卢姆纳塔)。 576

“科利格洛地层”和其他前卡普萨石刀工业

以地层学和地貌学为依据，已经证明撒哈拉突尼斯(加夫萨、拉拉、盐沼地区等等)之前存在的刀片工业要早于整个卡普萨时期。在加夫萨(西迪曼苏尔)，“科利格洛地层”是在洪积期淤积形成的地层；泻湖沉积物的最后阶段的特点是含有大量石膏质的地层。沉积过程重新开始后，由于加夫萨盆地的沉陷过程而停止，与此同时，引起了新的浸蚀过程。典型的、发达的卡普萨文化覆盖着这种浸蚀层的表面，其土墩可作为见证。除了最低层沉积物中有一些莫斯特文化的遗迹外，无法确定精确的年代。这些石刀工业只能与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与卡普萨文化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除了形成刀背的工业技术外，它们的类型是不同的。毫无疑问，这种石刀工业的起源应是来自东方(昔兰尼加、埃及、近东)。

其他有特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在有些地方可以放在伊比利亚一毛鲁西亚文化和卡普萨文化之间。我们纪元前7,000年时期的科卢姆纳塔遗址及其墓地的特点是，细石器十分丰富。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遗址，其中最大的是基芬拉赫达山(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艾因穆利拉)遗址，这里的卡普萨石器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纪元前7,000年前。“片形石器”这一术语被建议用来描述这种超级细石器的复合工业，毫无疑问，它与一种尚不明确的生活方式有关。另外一些岩相在阿尔及利亚的西部有所发现，特别是在卡里米耶和克里斯泰利亚地

区，即奥兰海岸上，这些石器的年代看来可以远溯到我们纪元前8,000年。上述种种情况决不是完整无遗的。实际上，在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的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和卡普萨文化之间，各种工业都在扩展，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欧洲的中石器时代。

卡普萨石器的岩相

卡普萨序列是R.沃弗雷理论的基础。他把卡普萨石器划分为“典型的卡普萨”、“后期卡普萨”和“卡普萨传统”。尽管人们批评了这个过分简单化的结构，而且由于有大量的同位素年代作为依据，批评得颇为中肯，但是，必须承认，对这个序列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获得人们过去20年所期望的进展。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对于贝冢的考古发掘也没有提供出一种确定地层学和考古学结构的方法。在大量的地层剖面使我们能够发现具有各种特征的卡普萨岩相的重叠地层之前，我们只好把碳同位素测定法确定的年代作为我们关于相同时代和年代序列的假设的依据；当然，这种方法的可靠性与地层学方法是不能相比的。

577

由于在几个地方出现了覆盖在“典型的卡普萨”上面的“后期卡普萨”的确切证据，这仍然是整个分类的依据。这两种石器的遗址都是混杂的废料堆：灰烬和烧黑的石头、成千上万的蜗牛贝壳、被人吃剩下的兽骨碎块、石器和骨器、装饰物和身上佩带的艺术品、人的遗骨等等。让我们对这些废料来源的房舍加以推测：如果我们通过在肯谢拉(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发现——遗憾的是，这一发现是在有可能采取精确的测定年代技术以前——作出判断，那么这种房舍可能是用编织的芦苇涂泥造的茅屋。

“典型的卡普萨”石器工业通常质量优异，用钝了尖角的雕刻刀比比皆是。比较少见，但又具有独特风格的则是带有背脊的长石片，有时称之为“刀子”，已经钝了的锋刃常常染上赭石的颜色。带有背脊的刀占这些石制工具系列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有时，它们是通过再加工雕刻刀的断片制成(戈贝尔所谓的“尖直的刺棒”)。微型雕刻刀已经产生，它们不是制造拉穆维拉赫尖状器的结果(象在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中那样)，而是属于真正的几何形细石器(不规则四边形，不等边三角形)。骨器十分少见。典型的卡普萨文化遗址只是在一定范围的地域内发现，即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线的两侧，更准确些说，是在北纬35度的南面而不是在其北面。根据同位素确定的年代判断，它存在于我们纪元前第七个千年期，不会超出这一千年以外。因此，在这个地区内，看来它与“后期卡普萨”文化处于同一时代，但这同已知的地层并不一致。如果发现“后期卡普萨”文化是在“典型的卡普萨”文化的下层，我是会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已公认的“发达的卡普萨”文化的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此外，关于创造了“典型的卡普萨”文化的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发达的卡普萨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岩相，遍及整个西非和至少撒哈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切不要犯沃弗雷的错误，依据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就坚持说他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

我称之为“特贝萨岩相”的石器，仍然连带有典型的卡普萨重型工具，除此之外，发达的卡普萨文化是一种小型的人工制品，其中包括各种几何图形的、技术质量普遍高超的大量细石器，尤其是三角形和不规则的四边形工具。以统计学数据为基础所下的定义是无意

义的，因为它们是来自博物馆的搜集品（一般地说，这些材料的选取和分类都不严格），来自非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地层的厚度很不一样，随发掘者的兴趣而异。我在艾因多卡拉遗址上研究的一个“贝壳冢”，是自我们纪元前第七个千年期的中叶至第六个千年期中叶整整1,000年间由人类居住过的遗址。我们能够以累计的统计数字来给其中的工业作出正确的说明吗？ 578

后期的卡普萨文化，或者至少是它的南部分支，一直延续到我们纪元前5,000年，保持到开始新石器化的漫长过程。可以说，典型的和后期的卡普萨工业与各地区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是在同一个时期。

因而，卡普萨文化延续了近二千年，比法老的埃及只少几百年。即使不可能记载它的历史，至少我们能够掌握人种学方面的主要成分。卡普萨人并不属于迈什塔阿法卢的克鲁马农人类型，他们是地中海人，在没有争议的地层中发现的保藏最好、最完整的标本是艾因多卡拉（特贝萨）人，起源于我们纪元前第七个千年期中叶。至今发现了数百处卡普萨人的住所，它们大都存在了几个世纪，有些甚至超过1,000年。这些人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之前的定居生活是值得注意的。然而，他们的住宅不过是芦苇和树枝搭架、用粘土涂抹、或者用兽皮覆盖的小房而已。打猎并不起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并不是从动物遗迹的种类判断的，而是从其数量很少判断的。虽然对陆上软体动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但植物采集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这难免会使人有进一步的推断，但是无论科卢姆纳塔的镰刀，还是中间穿孔的石碳，还是搅棒，还是某些镰刀上有“收获作物的光泽”，都不能作为农业存在的证据。

卡普萨人有各种各样的埋葬仪式，经常可以发现遗体以蜷伏姿势侧身躺着。为什么经常使用赭石，一直是个谜。更使人吃惊的是，人骨的某些部分也被使用，如在法伊德苏纳尔（阿尔及利亚的艾因贝达）发现的头骨，可能是作为一种面具使用的。卡普萨人对活人，特别是对妇女早已有敲除牙齿的习俗，多至去除8个门牙。

不过，在马格里布，他们是最早的艺术家：从典型的卡普萨文化起就出现的雕花鸵鸟蛋壳装饰品、雕刻的石头，雕刻的小石片，这一切也许预示着岩石艺术的到来。

新石器化和新石器时代

早在1933年，R.沃弗雷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石器时代的完整、系统、统一的图景。他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他声称曾经扩及整个马格里布、撒哈拉和南撒哈拉的一部分）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以致“NTC”这个缩写（代表“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已被普遍使用。然而，戈贝尔博士和我对于把一些资料七拼八凑而得出的人为产物表示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资料是彼此不相关的。 579

我们的确摸不着沃弗雷进行推论的思路。为什么他把极不正常的贾恰方山（突尼斯）遗址作为他的考证依据呢？C.罗贝特在他的论文（1976年）里描述了沃弗雷得出结论的经过。沃弗雷对新石器时代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本身的缘故，而是渴望确立“卡普萨传统”的持续性，尽管随着它离开发源地越来越远，该传统的特点就越来越少。因而，新石器时

代不过是卡普萨文化的晚期表现。他通过外加一系列自以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为其关于“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广泛传播的说法辩护。这就造成了新石器时代的类型的概念，而没有考虑在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明显因素：一种生活方式的瓦解。但是，事实上，卡普萨传统强有力的持续存在并不能为产生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理论作证明。而且，在撒哈拉发现的如此大量的投弹夹、箭头，则提供了证明持久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确切证据。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轻易地被认为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在这种情况下，“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必须被局限在原来的范围内。这就是C.罗贝特依据对卡佩莱蒂岩洞发掘物(阿尔及利亚的奥雷斯)所作的研究工作。除了主要的类型学因素外，生态学，即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因而，可以证明当时存在着一种以放牧为主的前农业经济，人们随季节变化在山地和草地之间往返迁居，这不是史前史的最后阶段，而是今天奥雷斯、沙维斯山地居民的早期阶段，这些山民都是小规模的牧羊人。

这样，在我们纪元前5,000年与2,000年之间，在马格里布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而是存在着一些形式不同的新石器化的类型。首先，未受卡普萨人影响的地区是分散发展的，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已被取代，从我们纪元前5,000年起，他们很快就与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往来接触。这又产生了渡海问题。新石器有着几种海滨的岩相，完全独立于卡普萨传统，证实他们在陶器和输入的黑曜岩方面与欧洲有来往接触。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

另一方面，象康提出的那样，“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的范围并不能扩展到撒哈拉北部，更不能扩大到撒哈拉更南的地区。在那里出现的是阿哈加尔和阿杰尔高原的岩石艺术。

然而，象沃弗雷所指出的那样，岩石艺术与新石器时代的联系是非常可能的，当然，580 关于“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的贡献大小是可以争议的。即使如此，这种联系只反映在一部分雕刻品上，其余则属原始时代这些早期的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能与欧洲或撒哈拉联系起来，虽然工业和艺术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证明，但它们的起源应当属于卡普萨的新石器化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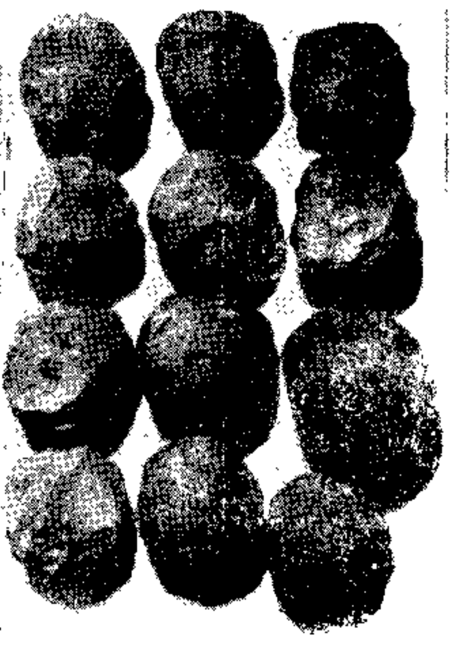
尽管在马格里布发现了史前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遗物，但它的史前史仍然没有完全弄清。只有按照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北非史前史的研究工作才能取得进展。

(张谦让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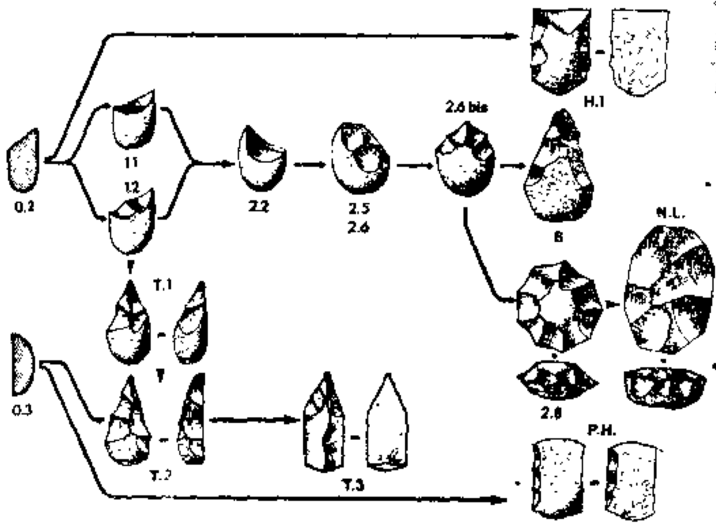
581



照片22.1 艾因哈奈什地方用卵石打制的双面石器和一个石斧(M.博维斯)



照片22.2 艾因哈奈什地方球形多面体卵石器(M.博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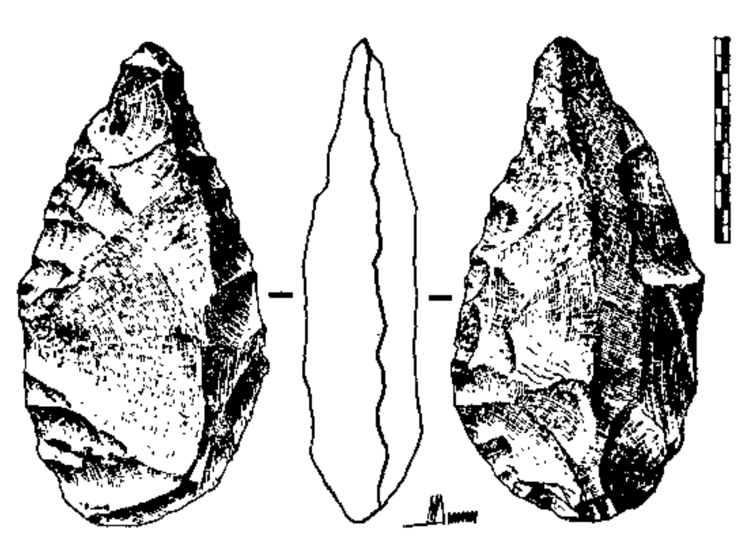


照片22.3 "卵石文化"向阿舍利文化形式发展的过程：数字和图形指用于非洲前阿舍利工业的分类系统(M.博维斯)

582



照片22.4 在提胡代因沙漠的阿舍利遗址发现的手斧，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M.博维斯)



照片22.5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突尼芬遗址发现的最先进的双面阿舍利石器工具(M.博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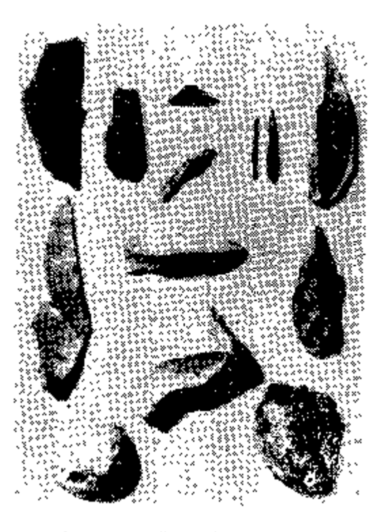


照片22.6 由M.格鲁特领导在突尼斯的盖塔尔发掘的莫斯特尖状石器(M.博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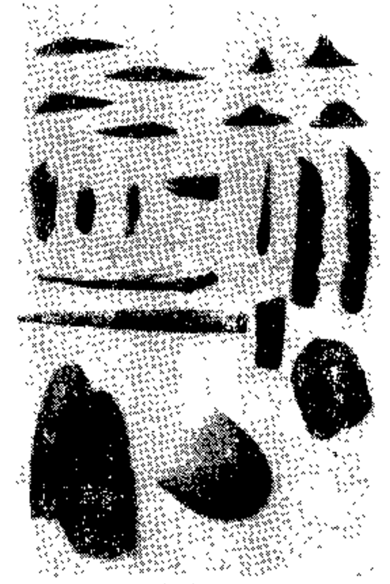
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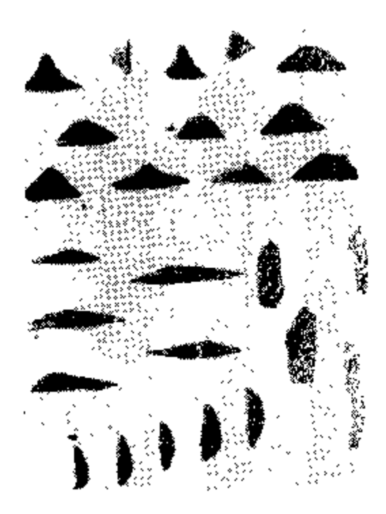
照片22.7 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瓦迪朱夫贾迈尔发现的阿特利工具：带柄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勒瓦卢瓦石核(M.博维斯)



照片22.8 典型的卡普萨工业(M.博维斯)



照片22.9 后期卡普萨工业：不等边三角形器、不规则四边形器、锯子、槽纹刀、雕刻刀、小型雕刻刀、钻孔器、刮削器等等(M.博维斯)



照片22.10 后期卡普萨工业：各种几何形状的细石器(不规则四边形器、不等边三角形器、新月形器和小型雕刻刀)(M.博维斯)



照片22.12 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穆哈德山口发现的后期卡普萨文物：石灰炭雕刻小石板(M.博维斯)

照片22.13 新石器时代的卡普萨传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达穆斯艾哈迈尔发现的杵和臼，显示出涂有赭赭石的痕迹，以及黑利克斯贝壳石的碎片(M.博维斯)

584



照片22.11 1952年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约迈什塔阿尔比发掘期间发现的后期卡普萨文物：人骨制作的匕首(M.博维斯)



585

23 撒哈拉史前史

H.J. 于戈

撒哈拉是包括北非大半部分的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沙漠。确定它的疆界或者它的特征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然而干旱少雨却是沙漠各个地区的共同现象。这片沙漠地区的面积甚为广阔，约为860万平方公里，东临红海，西濒大西洋，长达5,700公里；从北到南，由接近撒哈拉沙漠的阿特拉斯山脉到苏丹的萨赫勒地区，长达1,500公里。可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撒哈拉从史前时期以来，历经沧桑，变化很大。

撒哈拉各个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湿度异常低，它是世界上湿度最低的地方。撒哈拉除了水源极为缺乏之外，它的其他特征是白昼和夜间温差很大，满地沙土，沙土不断被风吹刮，并且在迅速侵蚀着正在老化的地面。

尽管撒哈拉现在是一片沙漠，但是在远古时代却是人类广泛聚居的地域。最后一批居民的离去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干旱和酷热难忍的气候，从而雨水稀少，泉溪干涸。这又造成人类赖以为生的动植物逐步消失，人类被迫退到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那里的气候条件比较宜人。

许多专家研究了撒哈拉变成沙漠的问题，以及这种变化的前因后果，其中有E.F.戈蒂埃、① T.莫诺、② R.卡波-雷伊、③ J.杜比夫、④ L.巴卢、⑤ K.巴策尔⑥ 和 S.A.胡扎伊因，⑦ 以及其他许多人。现在，我们已经从理论上了解到，为什么几内亚湾的季风和冷极锋不再给撒哈拉带来雨水，而在史前时期每年的这两次降雨机会使其成为一块气候宜人和人口众多的沃土。可是，撒哈拉气候的演变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我们依然不知道，撒哈拉气候的恶化情况是否已经达到顶点，是否有待于达到顶点，或者最高峰已经过去。此外，沙漠地带扩大的方式也不清楚：是围绕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展的？还是从撒哈拉北部边缘和南部边缘交替延伸的？

586

目前我们仍然远远不能重构使撒哈拉时时成为人类可住之地的各个气候时期的精确年代表。尽管已在一两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太少了，而且没有作出重大的努力来发展这类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不仅从科学角度看是

① E.F.戈蒂埃(E. F. Gautier)，1928年。
② T.莫诺(T. Monod)，1915年；布尔格石碑维护讨论会，1961年。
③ R.卡波-雷伊(R. Capot-Rey)，1953年。
④ J.杜比夫(J.Dubief)，1959年。
⑤ L.巴卢(L. Balout)，1952年a。
⑥ K.W.巴策尔(K.W. Butzer)，1958年。
⑦ S.A.胡扎伊因(S. A. Huzayyin)，1936年，第19-22页。

如此，而且它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影响全人类生活的气候现象；了解第四纪时期撒哈拉所发生的气候变化对于研究生态的演变是必不可少的，在不久将来，当地球表面每一平方米土地对人类都变得极其珍贵的时候，对撒哈拉“大沙漠”的过去了解得愈透彻，它的作用也就愈重要。

研究工作的历史发展

介绍整个撒哈拉史前史研究情况的期刊已停止出版，因此拟定已完成的研究项目的时间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确了解一些殖民时期的这类研究项目，但是很不全面，并且有些材料是零星分散的。例如，某些重大发现是在军事报告中描述的，要得到这些资料比较困难。撒哈拉的政治区域划分也造成了研究史前文物工作的分散，因为不仅有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而且后来还有德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对撒哈拉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

然而，直到近代人们才深入考察撒哈拉沙漠的情况。关于撒哈拉史前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很可能是阿贝·理查德于1869年[8]发表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著作。对埃及的调查研究大约是在同一时期以A.阿尔塞林1867年2月的一封信开始的[9]。但是，对西撒哈拉的研究几乎到本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自1876年起，富罗率领的考察队对中撒哈拉的考察工作[10]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1898-1900年进行的重要考察工作[11]。与此同时，1886年O.伦斯[12]曾就陶德尼史前史遗物的发现进行了论述。从此以后，对撒哈拉史前史的研究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注意，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妨碍研究工作的进展。

587

当然，许多科学家被撒哈拉的大量史前遗迹所吸引。尽管在这里是不可能一一列举的，但是早期权威人士的重大贡献给了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例如，G.B.M.弗拉芒[13]、弗罗贝尼乌斯[14]和G.卡顿-汤普森[15]女士的研究工作对于撒哈拉史前史的任何认真研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撒哈拉史前史的研究工作比任何其他研究工作都更容易受到临时工作的影响。此外，对这项研究工作的特别必要性的认识多年来由于下述情况而模糊起来，即人们认为它不是各种穿越撒哈拉的探险队的主要任务，而是一种附带性工作。因此，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一些业余人员或其他专业的专家进行，而这些人都不可能提供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加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可能要取决于所携带的每磅行李，因此大块沉重而又累赘的史前遗物常常只好被抛掉。另外，还应当指出，撒哈拉并非旅行者漫游的理想地域；更谈

---

⑧ 阿贝·理查德(Abbe Richard)，1868年，第74-75页。

⑨ A.阿尔塞林(A. Arcelin)，致《人类远古历史杂志》期刊编辑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1869年第五卷。

⑩ F.富罗(F. Foureau)，1883年。

⑪ F.富罗，1905年。

⑫ O.伦斯(O. Lenz)，1884年。

⑬ G.B.M.弗拉芒(G. B. M. Flamand)，1902年，第535-538页；1921年，第114-115页；R.佩雷(R.Perret)，1937年：考察的遗址名单

⑭ L.弗罗贝尼乌斯(L. Frobenius)，1937年。

⑮ G.卡顿-汤普森(G. Caton-Thompson)和E.W.加德纳(E. W. Gardner)。

不上有时间或手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书都提到撒哈拉“不曾有过工业”，“根本没有地层学”，“空无一物”等等。其实，撒哈拉的史前史同任何其他地区一样丰富多采。

自从有了组织专业考察队去调查撒哈拉的时间和资金，局面就迅速改观了。这种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且产生了一些——遗憾的是比较少——主要论述阿哈加尔、萨乌拉、乍得、毛里塔尼亚、利比亚沙漠、费赞等的专业作著。经过一次科学和工业的联合考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考察成果载于《贝利埃-特内雷-乍得考察队科学文献》[16]中。

然而，尽管人们渴望调查研究撒哈拉史前史，并且已得到大量证据，但要编写这类教科书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人类已登上月球的这个时代里，甚至连一篇通俗的叙述也没有。关于撒哈拉史前史，现有的只是许多深奥的论文和一般著作中的少数章节，特别是H.阿利芒[17]、H.J.于戈[18]和R.沃弗雷[19]的一般著作中的。

588

编制年代表的尝试

撒哈拉史前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欧洲的，特别是与法国的史前史作比较。因此，“克拉克顿-阿布维尔”、“舍利-阿舍利”、“莫斯特时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石刀”以及“梭鲁特时期的叶状箭头”这类术语甚为流行。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所引起的错误至今仍然影响着撒哈拉当前的研究工作。同所有的史前史一样，撒哈拉的史前史主要依靠详细论述特定工业的专著来进行分析，而这类专著至今尚未写出。撒哈拉问题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章法，这种情况造成的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十分轻率地得出结论说，某些确定的社会组织起源于早已消失的民族，但他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无法判定。

关于年代学[20]的问题必须作两点说明。第一，至今在撒哈拉尚未找到一处十分全面的地层结构[21]，使我们能够定出精确的史前年代顺序。第二，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年代资料使我们能定出一个绝对的年代表。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我们拥有一

⑯ H.J.于戈(H. J. Hugot)，1962年。

⑰ H.阿利芒(H. Alimen)，1960年。

⑱ H.J.于戈，1970年。

⑲ R.沃弗雷(R. Vaufrey)，1969年。

⑳ 第四纪年代学：不同气候阶段的顺序。一般来说，我们只希望制定一个撒哈拉的相对年代表，因为它在地层学方面的资料太少了。一个最好的比较年代表是J.夏瓦伊隆提出来的（《西撒哈拉的第四纪地层》巴黎：CNRS，1964年）。作者把位于西北部撒哈拉的萨乌拉阶地自下而上地划分为：

第四纪后期（更新世初期）	艾迪
	麦哲
第四纪中期	塔乌里特
	乌加尔特
第四纪近期	萨乌里
	吉尔
全新世	

㉑ 地层学：研究和解释连续沉积在一个地方的地层　象撒哈拉这样的在历史上经历了巨大气候变化的地区不会有很多地层遗迹，这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充分的地层遗址表明，在许多地方都有一系列老、中、新三层阶地，这证明了三个较长的气候时期的存在。但我们不应当过分拘泥于公式，因为如果我们把小气候考虑在内，那么根据地层结构推断气候时期的问题就会变得极为复杂。地层学资料表明，我们纪元前大约1,000年的时候，撒哈拉就已经是一片大沙漠。

批出色的研究报告，如J.夏瓦伊隆关于萨乌拉[22]、H.富尔关于乍得[23]、P.夏马尔关于毛里塔
589 尼亚[24]的报告，这些著作的依据是对阿尔及利亚[25]、摩洛哥[26]、利比亚[27]等作过的扎实的边缘研究。

根据这些研究报告，我们可以对撒哈拉史前时代的分期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但是，古生物数据太少了，而且一般能用来进行放射性碳测定以使我们得到比新石器时代更远古的绝对年代的有机物质太少了(见表格 23.1，第 445 页)。

当然，表格 23.1 已经大大简化了，特别是它没有说明那些常常是以勒瓦卢瓦技术制成的一系列大型石器，这种石器的下面是一堆很薄的双面石器，这些双面石器体积很小，分量较轻，很可能源于阿舍利时代末期。上述大型石器是在提盖勒盖敏[28]和布鲁库[29]以及其他地方发现的。最后我们应当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遗物使我们能够说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后期旧石器时代[30]，因为这个词没有实际的证据。更不必说有可能谈及中石器时代了，虽然这个词已逐渐被人废弃。

表格 23.1 也许会有助于产生一个比较详细的年代表，因为它与人们所了解的史前时期的气候趋势和人口密度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与可以分类的工业一起发现的骸骨极少，然而，已发现的这些骸骨却表明了撒哈拉在极为远古之时就有人类存在。

撒哈拉地区人类的出现；“卵石文化”的工业

在久已干涸的河流沿岸，常常可以看到过去河水流动时所形成的阶地。这种阶地构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平面，为了方便起见，被称之为老、中、晚期阶地。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萨拉赫以东 120 公里的伊杰兰山[31]，在老期阶地上发现了卵石工具。我们知道这些卵石是经过人类加工制作具有可以识别标志的最早工具。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只不过是河床
591 里的卵石，人们把它敲成一些薄片，制成粗糙的、边缘不平整的切削刃。有人设想，这些物体属于能人人种的工业。

在尼日尔的撒哈拉地区，在乍得湖古老的支流泰法萨塞特[32]干河岸上，也发现了大量的卵石工具，但却不如在伊杰兰山脉所发现的卵石工具的情况那么重要。而其他的，比如

[22] J.夏瓦伊隆(J. Chavaillon)，1964 年。
[23] H.富尔(H. Faure)，1962 年。
[24] P.夏马尔(P. Chamard)，1969-1970 年。
[25] L.巴卢，1955 年b。
[26] P.比伯森(P. Biberson)，1961 年b。
[27] C.B.M.麦克伯尼(C.B.M. McBurney)和 R.W.海伊(R.W.Hey)，1955 年。
[28] H.J.于戈，1962 年。
[29] 同上。
[30] 旧石器时代，由于承认能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因而必需对这个时期进行新的年代划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与撒哈拉有关的问题。目前，看来在撒哈拉根本就不存在中期的旧石器时代或者晚期的旧石器时代，而是存在以阿泰尔人为代表的末期旧石器时代，因此，它是在莫斯特时期之后，距新石器时代只有很短的间隔。
[31] A.邦尼特(A. Bonnet)，1961 年。
[32] H.J.于戈，1962 年，第151-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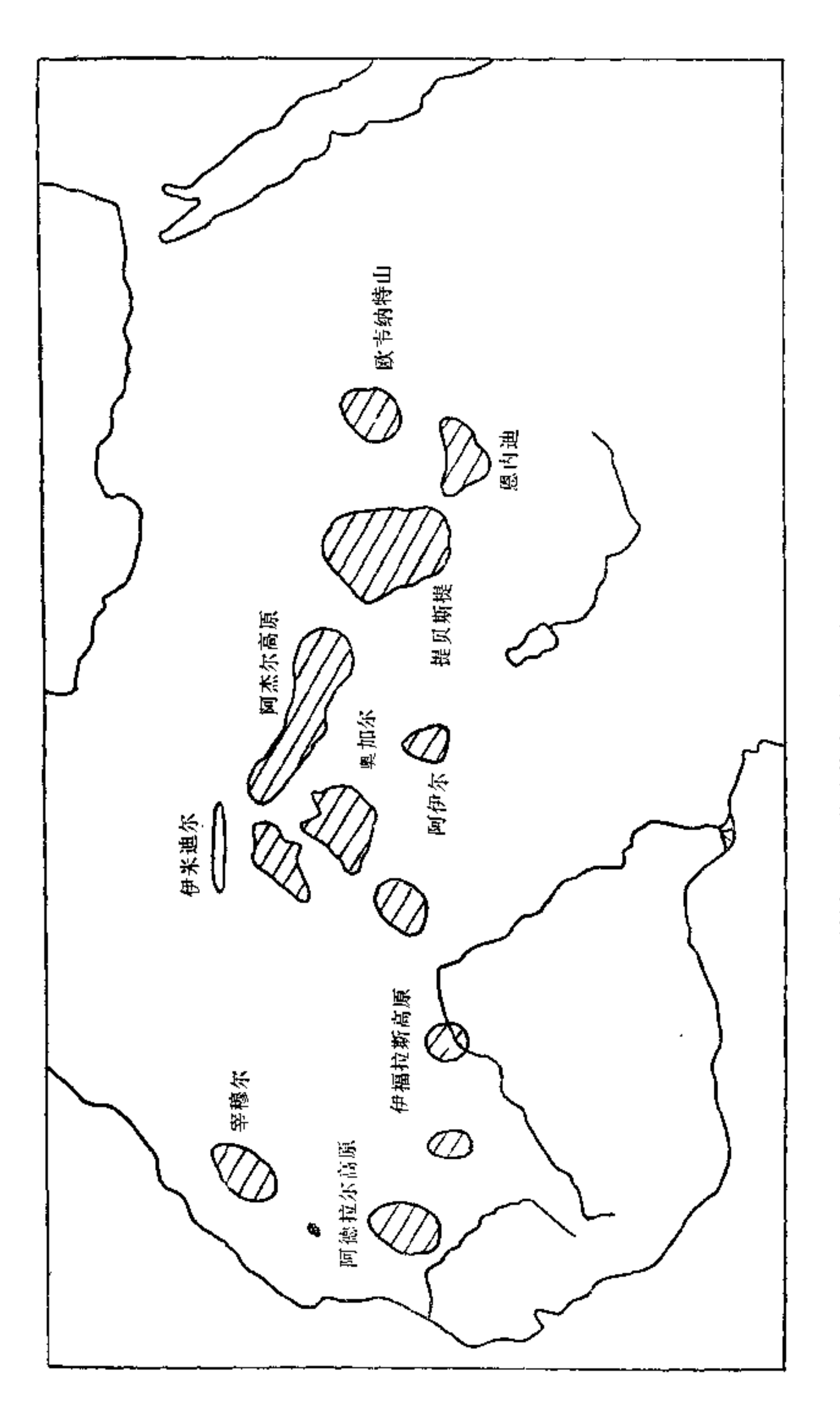


插图 23.1 撒哈拉绘画和石雕的主要遗址

在奥莱夫[33]收集的卵石工具都很分散或已被破坏，另一方面在萨乌拉[34]所发现的一系列石器数量太少，不能为研究工作提供足够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撒哈拉到处都可以发现卵石文化，那时撒哈拉的气候比较湿润，与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大沙漠截然不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任何动物或人类的化石，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分布于几乎整个撒哈拉的并在某些遗址大量出现的这种十分粗糙的工具就是我们远古祖先制成和使用过的工具。

直立人——双面工具的制造者

在卵石文化时期末期，出现了技术改革，从而导致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时仍在使用的工具的发展。而围绕着这一伟大人类和技术进展的奥秘依然未能揭开。在撒哈拉，至今仍未发现这种非凡工具（也未发现由这种工具演变出来的砍砸器，说明那个时期这里是大片森林）的制造者的骸骨。但是，尽管我们对卵石文化时期的生态一无所知，但我们对直立人所处的生境还是知道一些。那时，撒哈拉是一个拥有许多大湖泊的地区，湖泊水位很高，降雨量充足，因此生长着气候凉爽地带所特有的植物。目前只在大沙漠南部才能见到的一些大动物，当时曾遍布整个撒哈拉地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随后一个时期所常有的倾盆暴雨破坏了或者严重损害了几乎在这些大湖泊各处所积聚的沉积物，此外，上一个时期和这个时期之间的大干旱又很可能加速了这种破坏进程。

由于这些沉积层普遍被打乱了，今天尽管在撒哈拉发现的双面工具为数不少，但可靠的地层学证据极其稀少。

我们决不至于断言，乍得化石人[35]制造了双面工具。沃弗雷[36]在其《撒哈拉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一书一开始就论述了乍得化石人，但是，鉴于我们并不了解这位可尊敬的祖先是否制造了工具，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古生物发现。1864年杜韦里埃[37]首先提到了提胡代因。后来，1932年，E.F.戈蒂埃和M.雷加斯[38]考察了这个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种阿舍利工业以及许多犀牛、象、河马、牛、水牛、疣猪、斑马、鳄鱼、瞪羚等动物的残骸。提胡代因的一切资料都属于阿舍利晚期的，并且常常包括骨雕或木雕，因此这些资料是阿舍利晚期阶段的，并不是上面所谈到的文化所直接产生的。

距提胡代因（沙漠）不远，有两处极其完好的阿舍利遗址，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双面工具，大都比较小，并且几乎是塞贝伊基耶工具，此外还有各种砍砸器。这是阿德迈尔沙漠沉积[39]，是1934年一个士兵发现的，1936年由H.洛特和H.凯利首先公布[40]。同贝利埃-特

592

---

[33] H.J.于戈，1955年b。
[34] J.夏瓦伊隆(J. Chavaillon)，1956年。
[35] Y.科彭斯(Y. Coppens)，1962年，第455-459页。
[36] R.沃弗雷，1969年，第21页。
[37] H.杜韦里埃(H. Duveyrier)，1864年。
[38] E.F.戈蒂埃(E.F.Gautier)和M.雷加斯(M. Reygasse)，1934年。
[39] H.洛特(H. Lhote)和H.凯利(H. Kelley)，1936年，第217-226页。
[40] 这种地表层很好地说明了，要分清当时的主要工具和后来混杂的物件是非常困难的。

内雷考察队在塔法萨塞特干河[41]所发现的一个遗址一样，这个地表遗址的年代很难确定，因而其重要性至今未能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以便充分使用这些文物资料。

塔贝勒巴拉和塔欣吉特[42]以其浅红色的石英砂岩双面工具著称，尤其是以其各种精美的砍砸器著称，这些工具显示了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

在非洲的同一地区，J.夏瓦伊隆和H.阿利芒发现了发达的阿舍利文化的一个未受干扰的遗址，这种文化要么是先于石片工业时期，要么应当包括在阿舍利中期内。马泽尔、贝尼阿巴斯和凯尔扎兹[43]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乌努纳山(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萨乌拉)[44]，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人工制品，只是这些人工制品太少了，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因埃凯尔、曼耶特和阿拉克[45]，在埋藏着阿舍利中期文化遗迹的地层中还发现了阿特利人分散的零落物品。

此外，在奥莱夫[46]、谢尔达[47]、拜耶斯[48]、沙海纳卜、[49]西撒哈拉的哈里杰[50]以及利比亚沙漠[51]还发现了许多阿舍利时期的文物。我们可以断定，阿舍利文化存在于整个撒哈拉，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其年代，除了四、五个遗址之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地层遗址。这一最重要的工作(精心细致的挖掘和考察)仍然有待完成。 593

一个尚未查明的问题：石片工业

在欧洲和撒哈拉，旧石器时代早期是以基本双面工具为特征，这些工具的形状极其粗糙，开始时被称为舍利文化，以后又发展成为象在米科克发现的那种精致、对称和雕琢完美的成品。在撒哈拉，先于双面工具的是经过加工的较小卵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石片切磨技术中的根本性变化，石器艺术出现了精美的形式，部分原因是由于掌握了这种新的比较复杂的石器艺术，在欧洲和撒哈拉，只有在发现使用比较富有柔韧性的撞锤来代替石锤的优点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进展，当时前者是用骨头或木头制成的，而后者需要很大的冲击力，所以使用起来精确度欠佳。

虽然双面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特点，或者说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化石，但是，它绝对不是直立人所制造的唯一物品。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技术一旦有了发展，石片也得到利用，并且从岩心脱落的大量碎片也得到了利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时发现石片工具占优势是很自然的[52]。因此，石片工具是一种

[41] H.J.于戈，1962年。
[42] B.尚帕特(B. Champault)，1953年。
[43] H.阿利芒，1960年，第421-423页。
[44] J.夏瓦伊隆(J. Chavaillon)，1956年，第231页；1958年，第431-443页。
[45] H.J.于戈，1963年。
[46] W.P.庞德等(W.P.Pond)，1938年，第17-21页。
[47] M.达洛尼(M. Dalloni)，1948年。
[48] P.比伯森，1965年，第173-189页，
[49] A.J阿克尔(A.J.Arkell)，1954年，第30-34页。
[50] M.阿尔马格罗·巴希(M.Almagro-Basch)，1946年。
[51] G.卡顿－汤普森，1952年。
[52] 可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真正的突变是人类，并且是以莫斯特工业的创始者——尼安德特人的出现为标志。

发展，而不是一种发现，这一发展采取了缩小双面工具体积的形式，并且越来越多地用作武器。另一方面，所出现的变革就是普遍应用勒瓦卢瓦技术。这种变革很早就出现在撒哈拉，并且影响到塔欣吉特[53]，以及布鲁库和廷卜鲁林地区制造某些双面工具所使用的技术。尽管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勒瓦卢瓦技术，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改变其发明者的生活方式，他们肯定不是尼安德特人，也有可能他们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需要比较轻便的工具和武器，这与某些人认为使用笨重的双面工具和切劈工具的设想完全不同。虽然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它也并非意味着在撒哈拉不存在任何莫斯特或莫斯特时期，而是意味着，取而代之的、受到莫斯特文化影响的阿特利时期主要是提供打猎武器的工业。制造一种带柄武器的能力，不仅意味着人们已经有了箭杆的概念，而且还会想到制造长柄矛和末端装上重球的飞绳。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游牧部落的工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工具比前一时期文化的工具轻便。

594

因此，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阶段，在莫斯特文化占领其他地方的同时，阿特利文化[54]却在撒哈拉占了统治地位，但阿特利文化也具有莫斯特文化的某些特点，比如使用勒瓦卢瓦技术，这不仅表现在工具修饰的风格上，而且表现在各种精致物品的种类上。可是，阿特利文化在以下两个基本特点上与莫斯特文化是有区别的：

（1） 出现了带柄物品，可以用作镗孔刀具（有经过修饰的，有外形粗糙的）、刮削工具、锥子、甚至钻孔器；

（2） 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与莫斯特文化的传统工业有显著差别。

然而，除此之外，认为还存在莫斯特底土层的想法仍然十分强烈，尽管我们没有发现阿特利人的骨骸，但通常人们都认为，这种有趣的工业与尼安德特人有关。

我们知道，阿特利文化是北非的一种工业，后来传播到南方[55]，大致传到南撒哈拉大片湖泊沿岸。在向南方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直到产生了象布斯山[56]那种光辉灿烂的文化，在那里除了各式各样的传统石核、刀片、刮削工具、开槽口石片、以双面技术制造的双叶片箭头和石球以外，我们还发现十分精致的带柄箭头，它们也是用双面技术制造的，其中有一个箭头大约长19厘米。

阿特利文化传播极为广泛。我们在突尼斯[57]、摩洛哥[58]、阿尔及利亚[59]、萨乌拉、提迪凯勒特（在这个地区，阿特利文化成功地利用阿兰卡里亚化石作为基本材料）[60]，以及毛里塔尼亚都发现阿特利文化，其界限大约到毛里塔尼亚的阿德腊尔地区为止[61]。我们到处

---

[53] J.蒂克西埃（J. Tixier），1957年。

[54] 阿特利文化：起源于北非的一种工业，以莫斯特文化为基础，但增加了一些装柄物品。阿特利文化比莫斯特文化晚一些。受到勒瓦卢瓦技术明显影响的石器，在遍布撒哈拉的时候，已经高度发达了。阿特利文化地域最南端的界限看来很可能是南方的一些大湖泊，这些湖泊目前只有在乍得可以找到。在乍得西北部边境，发现了我们纪元前大约9,000至8,000年的遗址。这种工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而不是中期。

[55] H.J.于戈，1967年，第529-556页。

[56] H.J.于戈，1962年，第158-162页。

[57] M.格律埃（M.Gruet），1954年。

[58] M.安托万（M.Antoine），1938年。

[59] M.雷加斯（M.Reygasse），1922年，第467-472页。

[60] E.F.戈蒂埃（E.F.Gautier），1914年；《圣马丹的蝙蝠铁矿》，1908年；M.雷加斯，1923年。

[61] R.吉塔特（R.Guitat），1972年，第29-33页。

都可以发现阿特利文化，在阿哈加尔山脉[62]，在阿德迈尔沙漠[63]、在提胡代因[64]、在布斯山[65]，此外还在费赞、祖姆里，其东边的终点是埃及的哈里杰[66]。 595

确定阿特利文化时期的前后年代是相当困难的。它很可能起源于我们纪元前大约35,000年。在乍得边境地区，阿特利文化的扩展似乎为最后一次大水所阻挡，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阿特利文化时期就延续到了我们纪元前9000－7000年。但是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受莫斯特文化影响如此明显的工业之后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又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能把阿特利文化时期——阿特利文化的出现毕竟很晚——列入旧石器时代中期？L. 巴卢在其杰出的论文中认为，这种思想倾向是错误的。第二，我们对撒哈拉真正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知道些什么？确实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且，至今仍未解开 R. 莫尼在埃谢德干河[67]发现的工业的奥秘。此外，在塔代迈特[68]南部边界发现的许多卡普萨风格的石器依然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因为只有很久以前在迈尔朱马(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中部塔代迈特高原的迈亚干河)发现的一组石器证明了，目前属于撒哈拉的这个地区曾有过真正的卡普萨人群，而这仍然不足以令人信服。

为了对年代问题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有人建议，阿特利文化时期应当放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无可争议的标题之下。

间 断 期

为了说明阿特利时期以后布斯山(尼日尔)的一种发达的工业，J.D. 克拉克最近使用了中石器时代这个词。幸运的是，这个已逐渐废弃的词一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适用于在撒哈拉已知的任何东西。使用这个词只能加重阿克尔的错误[69]，当阿克尔在尼罗河畔工作的时候，这种错误是很可以理解的。但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法国的史前史学家并不倾向于使用这个词。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问题不复存在，因为埃及塞比利亚第三期文化在其侵入时传入的几何形细石器[70]先于新石器时代 A，而没有与它合并，并且有些迹象表明(虽然这些迹象很少)，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人们已公认的地区。 596

---

[62] H.J.于戈，1962年，第47-70页。
[63] J.博博(J. Bobo)，1956年，第253-268页。
[64] L.巴卢(L.Balout)，载于C.阿朗布尔(C. Arambourg)和L.巴卢合著的一书，1955年，第287-292页。
[65] H.J.于戈，1932年，第158-162页。
[66] G.卡顿-汤普森，1952年，1946年。
[67] 一份未发表的论文已送交达喀尔大学非洲基础问题研究所史前史研究室。
[68] H.J.于戈，1952年，1955年a。
[69] A.J.阿克尔(A.J. Arkell)，1949年a，1953年。
[70] E.维格纳德(E. Vignard)，1923年，第1-76页。

新石器时代

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人的起源知道的很少，或者说一无所知⑪。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从几个不同的地点扩散到整个撒哈拉的。根据 M.-C.夏姆拉的论述,⑫新石器时代人在撒哈拉栖居的一个因素就是杂交，一头是黑人，另一头是统称为"地中海人"的中东人。

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人口远远不是同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排列一下移居浪潮的先后次序，那么最早的移民定居点似乎是在喀土穆和沙海纳卜附近的尼罗河堤岸形成的，后来又沿着一些大湖的堤岸向西延伸。这一移居浪潮似乎没有扩展到比奥卡尔东部边缘更远的地方，也没有穿过森林，但是它的确向北伸出了两个触须似的细条，一个延伸到阿哈加尔，远至阿杰尔高原前面山脉的北部边沿，另一个是从提莱姆西伸向萨乌拉。从其独具一格的特点及其陶器的精美装饰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这一时期的光辉灿烂文化。但是，对于它的工业却很难准确地加以描述，因为"苏丹传统的新石器"使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撒哈拉的第一批居民是以捕鱼、打猎、采摘浆果为生的人群，他们非常喜爱捕捉河马和采摘荨麻树上的浆果，此外他们也不讨厌食用湖里的鱼、淡水甲鱼或者西瓜。他们制造手斧、锄头、597 磨具、磨石和类似物件，但这一事实决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从事任何形式的农业⑬。纵然他们不断采摘荨麻树浆果装满罐子，纵然在挖掘遗址的时候常常可以发现葫芦种子的痕迹，但这最多只能使人们提出一种原始耕种的假设。当时人们从事的专门行业都是有分工的，划分为一些专门的任务。磨光石器十分普遍，武器种类也很多。猎人使用弓和(或)投枪，也使用骨制鱼叉和钓钩捕鱼。磨光的石斧、锄和手斧是他们日常用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善于用硬石，如天河石、石髓、赤铁矿和红玉髓来制造珠饰。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还十分精巧地改进了钻孔器具⑭，包括雕刻刀片、针以及同松香和细砂一起使用的钻孔器。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碾磨器具，并且大都十分精美。这充分证明，即使当时没有真正的磨坊，至少碾磨这门技艺还是知道的。他们碾碎的产品当然是赭石，但是也许还有野生谷物、浆果、干草、植物染料或药材。当时居民制造的陶器值得特别提一提，这不仅是因为其华丽的装饰，而且还因为其美观的造形。与此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至今尚未发现空心圆锥形的臼和细长的酒罐形的容器，纵然有少量陶器嘴嘴、把手和圆头把。

---

⑪ 新石器时代：这个词是指当时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尤其在陶器制造、石器琢磨、开始饲养家畜、农业耕作以及都市化方面)，这些新技术补充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高度发达的石器工业。撒哈拉最古老的新石器遗址的年代，似乎可认为是在我们纪元前5,000年和6,000年之间。当然，新石器时代的确定并不一定要以懂得上述所有技术为先决条件。但是有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最显著的现象是烹煮食物：食物烹煮后产生的化学变化对人类的肌体发育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撒哈拉的新石器的各种形式是一种技术大突变，而不是通常说的技术革命。

⑫ M.-C.夏姆拉(M.-C. Chamla)，1968年。

⑬ 农业："在特地整理过的土地上有意栽培某些植物"。我们可以从下述情况推断出某一种文化已具有农业方面的知识：

（1） 孢粉学统计的有效证据。

（2） 存在曾经耕种过的土地的痕迹。

（3） 发现可辨认的植物化石

发现各种所谓的农业工具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多大重要意义，因为锄头可以用来挖掘制造陶器的粘土，磨石可以用来碾颜料、野生谷物、药材等等。因此"农业"是一个只能按照固定标准使用的术语，而不能根据未经证实的假设。

⑭ M. 戈森和J.戈森(M. and J. Gaussen)，1965年，第2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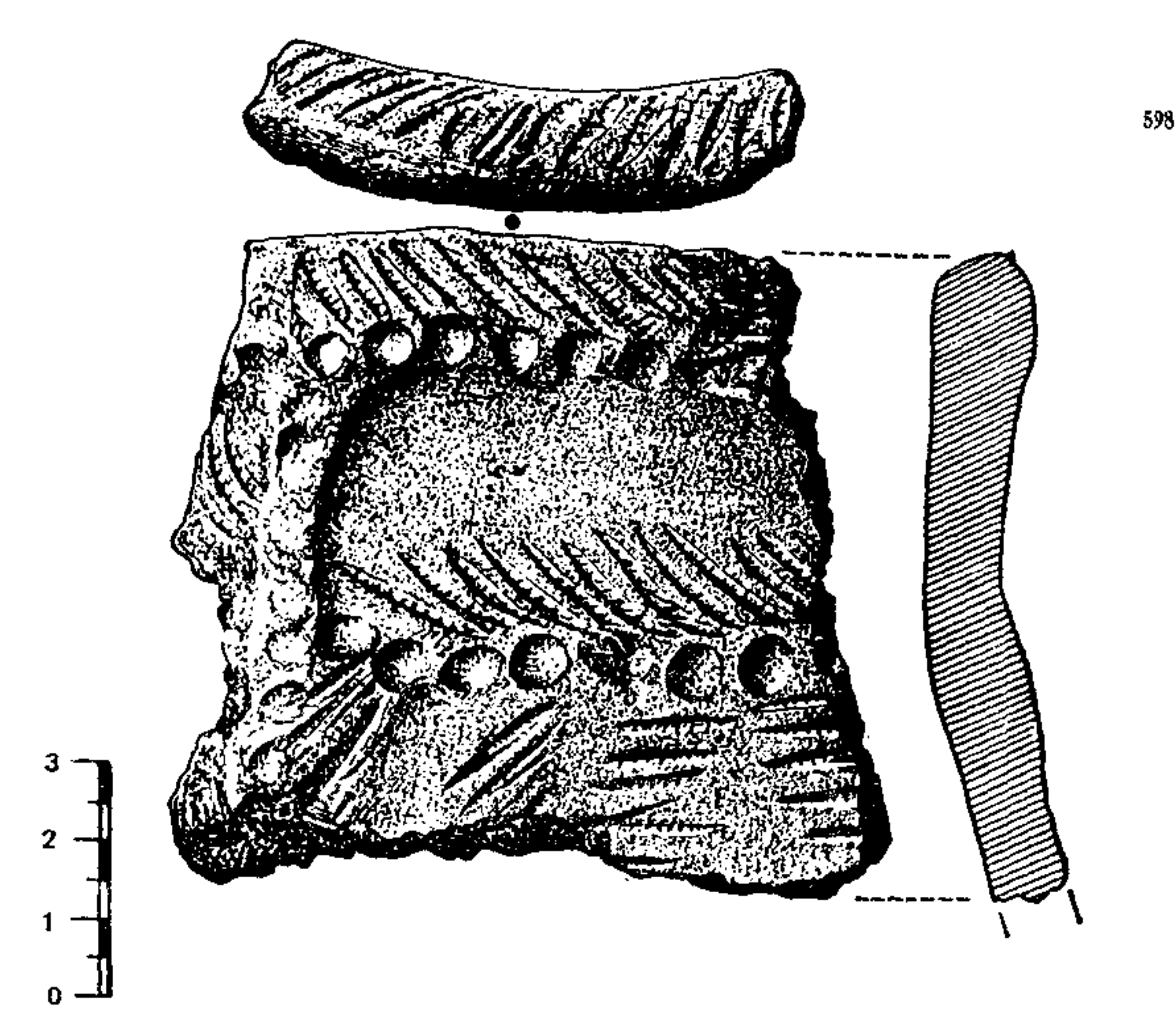


插图 23.2　毛里塔尼亚，阿克雷吉特的陶器

因此，关于第一批移居者的情况，我们是充分了解的。后来，另一个非洲民族继续向南迁移，他们一直扩张到森林地带。由于这一新石器的文化在森林中埋藏得很好，因此尽管它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始终未被发现。在几内亚，这种文化被明确地鉴别出来，因而名之为几内亚新石器，不过事实上，它很可能起源于中非[79]。

不久，由于古老的北非卡普萨文化的新石器化，“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开始向南推进。它从东北地区一直抵达毛里塔尼亚，并且远至阿哈加尔山脉，因为在曼耶特，正好在苏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表下面发现了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但是我们不大能确定其东边的界限，因为至今还没有可参考的关于利比亚的专题论著。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比苏丹的新石器粗糙一些。其陶器如果有任何装饰的话，那也是很少的。但苏丹的石器工业大都是老一套的形式，而卡普萨工业使用的都是很严格的技术，在撒哈拉，到处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和箭头。磨制石器通常都十分精美，用硬石制造的碗和兽形小雕像[80]都是出色的

---

[79] R.德尔克鲁瓦(R. Delcroix)和R.沃弗雷，1939年。

[80] 《史前文物》、《巴尔杜(阿尔及尔)人种史和史前史博物馆，第一卷》(巴黎：AMG，1956年)，照片107-110。

杰作，因此这就完全弥补了其陶器给人留下的不良印象。在新石器文化这个范围内，我们还发现了有穿线孔的小珠子，有时是石莲的碎片，但多半是用小片鸵鸟蛋壳制成的圆片。有时，整个鸵鸟蛋被吸空，然后制成容器，其中有些还雕刻着花纹。

599　我们知道，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和卡普萨人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卡普萨人主要生活在阿尔及利亚高原上，他们在那里遗留下大堆奇妙的贝壳，人们认为是蜗牛壳。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居住在突尼斯至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但是我们无从确切了解，这些克鲁马农人是如何定居在北非的，也不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分为两个民族的。所能确定的是两个民族都经历了北非的新石器化过程。新石器时代的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虽然生活在沿海一带，但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如果有人顺着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继续向南，就会发现一堆堆的蠔和牡蛎壳，再往前，将发现老年蚶。在塞内加尔，人们至今仍然吃这种东西。摩洛哥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的整个海岸都被新石器时代的奇特工业所占据，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工业的研究极少(如果说有所研究的话)。新石器时代的奇特工业拥有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粗制陶器、炉石和极少的石器工具。了解这种工业是怎样形成的，它来自何处，都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尽管这种工业受过摩洛哥的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的影响，但对其构成因素，我们却一无所知。

新石器文化有一个第五支系，自从引起专家的注意以来，人们已在布斯山发现了一个第五支系的遗址，并且由于这个原因而称之为泰内雷文化。J.D.克拉克实地查看了这个遗址，提出这个遗址可作为“撒哈拉的新石器”的代表，但是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认为“撒哈拉”这个词是指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区。

儒贝尔1941年[77]发现的泰内雷遗址是以莲花形的投枪、厚凹形刮削器、原始锯子和装有柄的斧子为特点的，在类型分析和统计数字分析方面也可看出它的特点，因而再次证明不可能把它称之为正统的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因为这个词已专门用于包括撒哈拉大部分地区的苏丹文化和卡普萨文化。沃弗雷往往倾向于把一切都同卡普萨新石器[78]联系起来，他说，“可以承认，埃及人的影响，以其最高度完美的形式扩大到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并远至阿哈加尔山脉”。他还说，“泰内雷遗址是撒哈拉新石器工业的顶峰，并且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王朝时期以前的埃及文化”。[79]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泰内雷之外的地方并没有发现埃及人的任何明显影响，尽管沃弗雷的断言是肯定的。

因此，我们至今还未发现显著的外界影响是如何波及这种以独特精美碧玉制品著称的特内雷工业的。

但是人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侧重一种文化地相。现在我们了解到，任何一个民族都600　会以旺盛的生命活力来适应各种环境因素的限制，例如生态条件、土壤条件以及土壤中所含的矿物等等。在有碧玉和燧石存在的地方可能导致制造石器工艺精品，而在只有易碎的砂岩这种物质的地方，结果则完全不同。布斯山和戈索罗鲁姆[80]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人

---

[77] G.儒贝尔(G. Joubert)和R.沃弗雷，1941－1946年。
[78] R.沃弗雷，1938年，第10-29页。
[79] R.沃弗雷，1969年，第66页。
[80] H.J.于戈，1962年，第154-163页和第168-170页。

表格 23.1 撒哈拉史前年代概要

−1000年至−1000年	最后一次洪积期。	所谓的前伊斯兰古迹。
−1000年至−2000年	支流河床的淤塞。	全新世新石器时代。
	泉溪的干涸。	提希特。
	最初的水井。	法德里文化。
	高山小气候的消退。	博尔库。
−2000年至−5000年	河谷最后一次冰蚀。	新石器时代早期。
	湖中生长芦苇。	曼耶特。
		因盖扎姆。
		提莱姆西。
−5000年至−7000年	古沙丘，第II类。	？
	奥卡尔。	
−7000年至−15000年	含有硅藻大湖的最后一次高水位。	阿特利文化。
		萨乌拉。
	鲶科鱼类、象，	提迪凯勒特。
	河马、	毛里塔尼亚。
	犀牛。	阿伊尔。
	暴雨。	
	古沙丘，第I类	据比伯森（1961年）确定的阿舍利时代III-VIII。
	火山活动。	
	砾岩的铁化。	
	侵蚀的终止。	
	泰法萨塞特阶地的形成。	
	大河的通流。	
	大湖的形成。	卵石文化。
	强烈的侵蚀。	

们必须认真研究陶器、圆盘和斧子，以便认识这种情况，但这两种工业的共同之处在于制造石器的质量。

此外，关于在毛里塔尼亚东南部沿着提希特陡崖[10]走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十分完好的地相，还有必要谈几句。在该地区进行的广泛挖掘情况表明，这种相当晚期的工业与一组罕见的干石村落有联系，这组干石村住宅区由于都市化[11]的程度及其显示的筑城技术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此我们终于得到证据证明，从我们纪元前1,500年起，当地的村民就开始吃谷子，我们至少认为，在这些村庄住宅遗址发现的这么多碾磨器具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提希特陡崖的文化属于非洲文化，这点可以从其陶器以及其他特征看到。它也许来自东方，很可能来自邻近的提莱姆西，但是这仅仅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假设。因此，

601

[10] H.J.于戈等人，1973年。

[11] 都市化：研究一组通常由定居人群居住、并按劳动分工和居民宗教信仰精心安排的住宅区的布局。符合这一定义的唯一的一组撒哈拉住宅区是毛里塔尼亚的提希特陡崖，这一住宅区的形成约在我们纪元前2,000年。

可以看出，新石器文化涉及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支流，这些文化支流借以产生影响的共同基础是陶器制品，而不是石器工业或骨器工业所使用的某种技术。

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开始于我们纪元前5,000年前，一直延续到大约我们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期初。在此期间，湖泊的水位不断下降，直到各种大动物群最后退却到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特别是退却到南部；植物群也逐渐退化，居民只好带着牧群移居他乡。

这一时期的动物群是阿特利时期遗留下来的，阿特利时期结束时湖水曾达到其最后一次高水位。在这些湖泊沿岸和湖木中曾发现所谓的"埃塞俄比亚"动物群，其中包括犀牛、鳄鱼、河马、象、斑马、长颈鹿、野牛和野猪。鲇鱼和尼罗河鲈以及淡水甲鱼大量出现在水中，而水草丰美的牧场则有成群的山羊和羚羊。唯一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类别的动物竟然适合在撒哈拉地区生长。植物群的情况甚至更加使人震惊。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仍然可以发现榛树、菩提树、柳树和梣木。而在曼耶特(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穆维迪尔高原)所发现的充满烂泥的贝壳显然说明，当时的年降雨量至少可达500毫米，一些山地覆盖着茂密的石南属植物。然而这些植物很快就退化了，并且被一种更加干旱地带特有的植物所取代，其中有雪松、阿勒颇松树、杜松、橄榄树和橡胶树，以及在当地居民食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荨麻树。

此外，湖泊中还盛产水生贝壳类动物，在某些地方还发现了大量蛤蜊贝化石。

在新石器文化初期，撒哈拉地区的特点之一是有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湖泊。苏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往往是沿着这些湖泊的岸边逐渐迁移，因为这些地方可以给他们提供适宜的新住处，并给他们提供各种食物资源。

撒哈拉——农业的发源地

602

撒哈拉是农业发源地这一观点已为人们多次提出，但常常没有考虑到，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对如此重要的一个词的滥用。不能说有了可能应用于农业的工具或其他物件就证明有过农业；只有利用化石谷物或花粉证实关于应用这些工具或物件所提出的假设之后，才能提供证据。在毛里塔尼亚的提希特所发现的大量谷粒进一步证实了芒森[83]和莫诺[84]关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观点。

此外，我们已经了解到，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曾采摘过大量浆果（朴属种和荨麻树浆果)，他们肯定用这些浆果作过食物。我们还在曼耶特和提希特发现了葫芦属的种子(很可能是西瓜种，但不是药西瓜)。但这两种植物只为当时的食物采集者提供了主要食品来源，或者至多说明了原始耕作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存在过农业，因为农业指的是有目的的耕耘土地，以便有选择地种植某些植物。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提不出很多的证据。在曼耶特[85]，对新石器时代沉积物所进行的孢粉学分析仍然未能确定当时究竟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在布斯山所进行的总结分析没

[83] P. J. 芒森(P. J. Munson)，1968年，第6-13页。
[84] T. 莫诺(T. Monod)，1963年。
[85] G. B. M. 弗拉芒(G. B. M. Flamand)，1921年。

有什么结果，在廷阿萨科也毫无结果，同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所研究的许多遗址中的任何一个遗址也没有产生结果。在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可以确切证明蔬菜产品为当时居民所食用的唯一遗物是朴属迷枣和各种野生谷物的种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提到芒森所发现的狼尾草属植物的痕迹，以及在提希特所发现的已变成炭化石的谷粒。

但是，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应该期待对新石器时代的沉积物作出一个系统的分析。尽管在孢粉学研究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但是，在撒哈拉几乎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然而即使在那里曾种植过某些植物，这个地方看来也不大可能具备发展为北非居民普遍食用的谷类作物的条件。

很久以前，几乎各个地方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人群就已进化为以饲养牲畜为生的居民了，虽然在各处或多或少发现了诸如锄、碾子、磨石、用以平衡挖木棒的重物，以及尖嘴锄等石器工具，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当时已有了真正的农业。而在农业广泛发展的埃及，人们发现了十分确切的遗迹，因此在毛里塔尼亚的提希特这类地方，定居的人群很可能从事农业，在这些地方也会发现这类痕迹的。但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可能都是这样。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纪元前 1,000 年的时候，撒哈拉 603 几乎完全变成了大沙漠。然而，尽管洪积期的结束难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原始耕作，或者在这以前的有选择的采集食物都不为人们所知。此外，我们可以确信，对植物性食物的尝试必然促使人们特意寻找某些植物品种，这一作法本身就是选择作物的初期形式。但是耕作只可能出现在定居的，或者至少是季节性的定居人群之中。然而在撒哈拉大部分地区，处于鼎盛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地使人联想到的是游牧营地，而不是组成的村落，虽然那时确实存在某些村落。

饲养家畜的起源和撒哈拉

新石器时代的撒哈拉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阿杰尔高原的牲畜饲养者是绘制“飞奔”的马拉战车的艺术家的同时代人。尽管其确切的时期不得而知，他们很可能生活在入侵的“海上人”企图征服埃及而被击退的那个时期。无论如何，这些牲畜饲养者所发展的放牧技艺竟然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常常使那些外行人感到惊讶，因为处于鼎盛时期的这种文化在管理牲畜的办法方面已经相当熟练，因而不能不认为它已经有了长期的经验。埃及人好象试图饲养过许多种动物，不过我们只能根据浅浮雕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些浅浮雕，我们就决不会知道他们曾竭力驯养猫科动物、犬属动物、瞪羚，甚至鬣狗。而撒哈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苏丹的波斯猎狗曾经是内马迪猎人非常宝贵的助手，这种波斯猎狗似乎是最古老的家畜，而且它很可能就是饲养牲畜的民族的那些绘画中所描绘的波斯猎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但不能从中得出任何结论。我们知道，我们纪元前 2,000 年在奥卡尔就有过牛和狗，但是，从岩画中看不出早期人类曾试图饲养哪种动物。

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苏丹新石器时代的人总是不断地想学会各种新技术。他们仍然加工石头，制造各种精巧的箭头和工具，这些工具通常十分轻便，是用片状燧石以各种方式加工制造的，其中有钻子、各种样式的刮削器、几何形的细石器、锯子等等。其新颖之处是制造斧子、锄、凿子和錾子所使用的比较精巧的石器磨光技术。除此之外，在各种人工制品中，还有硬石容器，天河石，红玉髓和石英制造的小珠子以及可能是弹弓用的小石丸。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大量固定的碾子和磨；但这未必证明当时人类已掌握了农业。还发现许多"克维斯"——绑在挖土棒上的石头——在南非俾格米人中至今仍在使用这种工具。最后收集的文物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陶罐，从其形状和装饰来看，属于典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晚期艺术。此外，还发现经过加工的骨头，用骨头制成鱼叉、钻子、针、陶工梳、修光工具，可能还有匕首。苏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尽可能利用了他们住地周围的石头原料，因此，这就使人产生这种看法：他们有可能来自若干不同的民族。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文化是稳定而统一的文化，至少，其陶器装饰方面的设计风格的一致性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另外，我们还应当提到，既然这些民族已经形成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那么他们肯定知道如何使用船，也许曾经乘坐那种仍然可以在乍得找到的、称之为卡代伊的芦苇船在湖里航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卡普萨新石器时代的人与其苏丹新石器时代的人和祖先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后者在几次迁徙浪潮中离开了苏丹，向西迁移，但看起来并没有抵达大西洋沿岸。他们的皮肤呈黑色，大都是真正的非洲人。而离开阿尔及利亚高原的居民多半是地中海沿岸一带的人，他们继承了卡普萨祖先加工燧石的真正才能。他们有大量各式各样的工具。十分精美的石片几乎看不出加工的痕迹，常常可以同珠宝饰物相比美。在发现钻子、针和小刮刀的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几何形的细石器，这些石器是用加工不等边四边形、长方形和部分圆形石器过程中的"废料"制造的。此外，他们还懂得打猎，因为他们制造了无数箭头，但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箭头已成为大规模旅游贸易的商品。还发现有大量磨光的斧子，但是它们不象苏丹新石器时代的斧子那么坚实和粗短。卡普萨文化拥有的石器工具要比苏丹文化更加繁多，而且使用的技术要更加多种多样。除此之外，他们还懂得如何磨光硬石碗，以及如何制造类似锡莱特的公牛、塔曼提特的公羊以及伊马卡森的瞪羚等各种维妙维肖的雕刻品。然而，他们的陶器在式样和装饰方面却远远不那么丰富多彩，但这并非因为艺人缺乏想象力——他们对鸵鸟蛋壳进行的技巧装饰就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用整个鸵鸟蛋壳作容器，用其碎片制造了无数珠子。人们发现有许多鸵鸟蛋壳的碎片，上面有十分精美的线条画装饰。当然，他们还安装过磨石和磨墩，而且我们确实了解到，其中一些磨石很可能是用来碾碎涂抹身躯的各种颜料的。

关于沿海新石器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尽管该问题的研究材料至今尚未发表，但我们已经了解到，沿着自摩洛哥向南的大西洋沿岸都发现了无数混杂着骨灰和陶瓷碎片的贝壳堆——其中有些是具有考证价值的遗址。在远至塞内加尔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地方似

乎是史前时期的一次种族迁徙的边缘。但是在毛里塔尼亚和奥罗河之间的边境地带，究竟为什么在撒哈拉常见的圆底或平底陶器却为圆锥形底的精美陶器所取代，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澄清；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材料。 605

再往东，在阿伊尔的布斯山，发现了一个地层，从中得到的石器明显地包括已知的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不论其来源如何。这就是泰内雷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使用浅绿色碧玉制造的各种相当精美的工具，其中许多工具的形状都有点类似埃及的新石器。不错，象平圆盘、莲花形投射器、通称作"新月形刀"的带刻痕的刮削器，以及经过使用而磨光了的锄这类工具的共同形状也许不过是巧合，但是这种巧合的情况如此之多，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与这一光辉的文化有联系的某些固定磨石同在埃及浅浮雕中所看到的那种磨石十分相似。因此，几乎可以确信，在布斯山曾经居住过与尼罗河有密切联系的民族。但奇怪的是，他们所使用的陶器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与苏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相类似。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后者的原型来自沙海纳卜。

在那样一个比当今更湿润的时代，湖泊以南的森林一定比今日的森林更加葱茏茂密，这可以说明，撒哈拉人从来没有穿越过这道屏障。这些森林的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为了方便并照顾先后次序，我们称它为"几内亚文化"，但是，实际上它似乎起源于更遥远的地方，甚至可能源自扎伊尔。

结 论

关于撒哈拉以往历史的引人入胜的研究工作目前刚刚迈出探索性的步伐。面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最终有可能使我们永远丧失探索非洲历史的机会，归根到底，这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因此各位专家和友好人士应当迅速把握这一时机。人类只有洞悉它过去的经历，才能决定它的未来。我们的经验不仅仅来自现今，而且是从史前史直接贯通下来的。否认这点，就等于否认史前史的研究工作具有任何合理基础，或科学价值。撒哈拉的史前史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研究的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为一项集体事业，它需要协同工作，也需要资金。对于撒哈拉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被如此拖延搁置，如此忽视怠慢，实令人痛心。对这一浩瀚无垠的大沙漠负有责任的人士应当切实负起责任，组织人力，揭开这一大沙漠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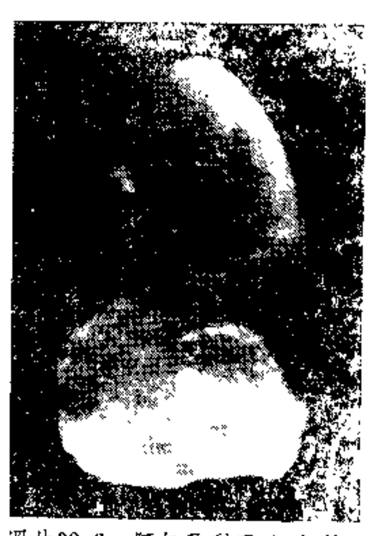
（刘光琴译）

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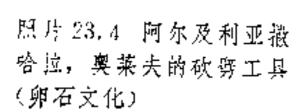
照片23.1　尼日尔，戈索罗鲁姆的扁平凹口斧

照片23.2　马里，廷阿萨科的砍砸器



照片23.3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奥莱夫的砍劈工具（卵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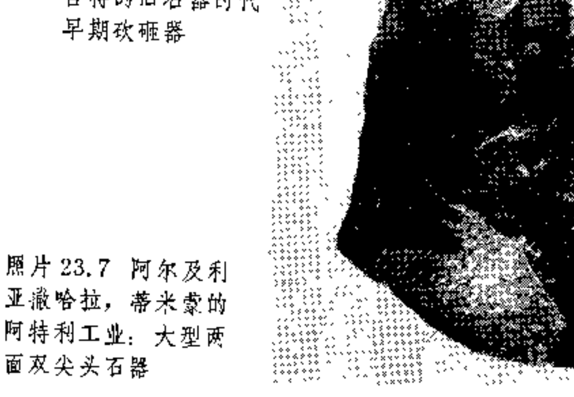


照片23.4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奥莱夫的砍劈工具（卵石文化）

607



照片23.5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塔欣吉特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手斧



照片23.6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塔欣吉特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砍砸器



照片23.7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蒂米蒙的阿特利工业：大型两面双尖头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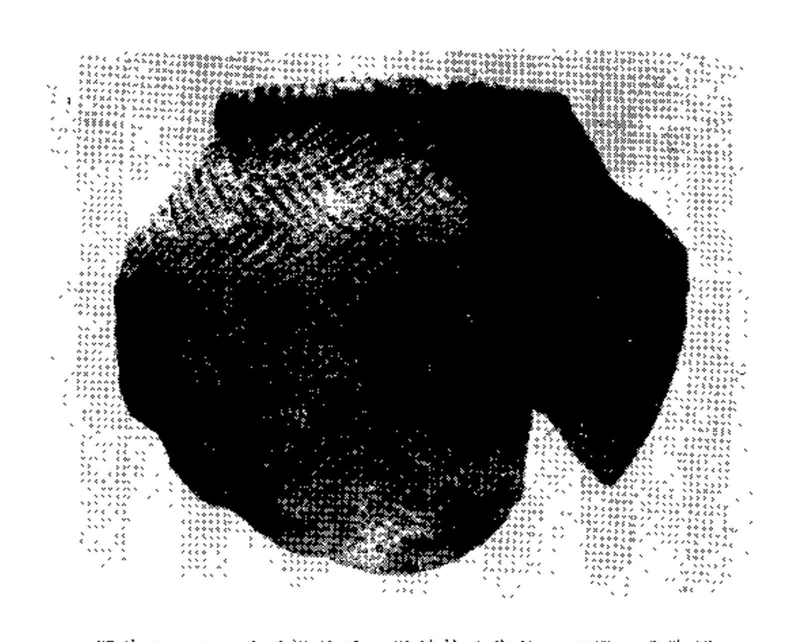


照片23.8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奥莱夫的阿特利尖状石器



608

照片23.9 尼日尔，布斯山V的阿特利两面双尖头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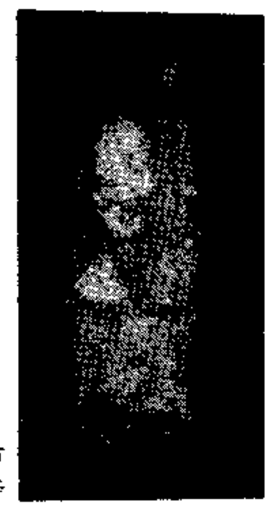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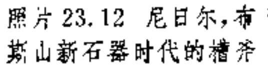
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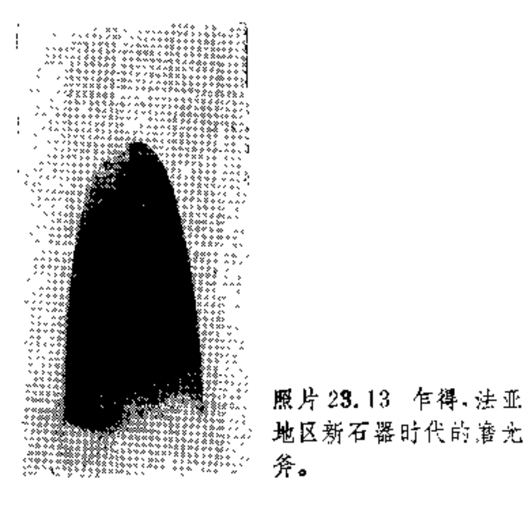
照片23.10 毛里塔尼亚，提希特陡崖的新石器时代陶器

610

照片 23.11 尼日尔，因盖扎姆新石器时代的箭头




照片 23.12 尼日尔，布斯山新石器时代的槽斧


照片 23.13 乍得、法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磨光斧。

611

24 西非史前史

C.T.肖

气候和环境

各主要气候带和植物带都是从东到西，横贯整个西非广阔地域，西非靠近海岸的地区降雨量最大，越往北和内陆雨水越少。在北部大沙漠的南部边沿，被干燥的萨赫勒气候带所环绕。这一地带南面是广袤的大草原地带。大草原与沿海岸线的热带雨林之间是衍生热带草原，该地带过去是森林，但人类的活动使之成了大草原。

在西非，降雨有明显的季节性，南部降雨主要在4－10月（7月和10月为高峰），北部降雨主要在6－9月。雨水是西南风聚集了大西洋的水蒸气形成的。然而，热带锋从东到西穿过西非，把南大西洋上空形成的热带海洋气团同撒哈拉上空的干燥大陆气团分隔开来。热带锋的位置随当年的季节而变动，一月份在最南部。结果，来自北部干燥气团的东北信风直达几内亚海岸，使空气湿度显著下降。

了解这种气候和植物生长状况，对通晓西非史前史和考古学很重要。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各植物区域的位置和范围以及热带锋的位置都不一致，这影响到人类在西非不同时期的生活环境。

这些植物生长带具有一些地理特征，使得在总的格局中形成地区性的差异：富塔贾隆高原和几内亚高地，多哥/阿塔科腊山系，包奇高原和曼达拉/喀麦隆高地；尼日尔内陆三角洲及其宽阔的北向河湾，乍得湖，以及尼日尔河口三角洲。在加纳和尼日利亚之间，连绵不断的热带林之中，有一处间断，被称为达荷美间隙。

早期人类

613

骸骨遗迹

在西非，迄今尚未发现东非和南非那样的早期人类或人类祖先的遗骸，① 亦未发现相应的早期人工制品。② 是不是能够假设在西非有这样的遗迹呢？我们现在没有资料，是否由于

① R.E.F.利基(R.E.F.Leakey)，1973年b。

② M.利基，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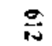


插图 24.1 西非植物带

人类祖先当时不在西非居住，或者只是因为尚未找到证据？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回答，但应该看到，在西非尚未进行能与东非相比的研究工作。西非这一时期的文物似乎较少，这也必须承认。在湿度高、土壤酸性大的情况下，保存物质的条件要差得多，这也是众所周知的。③很久以后一个时期的资料说明了这种情况。在石器时代晚期非洲人类遗骸遗址分布图上，扎伊尔－西非地区就完全是空白。④但是在那幅地图绘制出来后，在尼日利亚和加纳已经发掘出一些东西，经判明年代，证明空白只是说明研究工作现状，而不是说明无人居住。⑤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更早期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⑥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脊椎动物化石发现分布图上也有着类似空白，其情况可能也是如此。⑦就我们所知，在西非某些部分，必定存在着一些与东非南方古猿得以生存的生态条件极其相似的生态条件。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早期人类确曾在这些地区生活过。今天热带雨林的许多地区都有大猩猩得以生活的条件，但是事实上只是在两个有限的地域才能找到大猩猩。⑧尽管条件有某种相似，但在西非大草原地带生长的野生动物在种类上与东非并不一样，动物密度也不相同。⑨

有人认为，在西非一些条件适宜的地方，必能发现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在拉若西南方偏西2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头颅骨的额骨碎片，为这种想法提供了一个肯定的证据。它被定名为女性乍得猿人，⑩起先认为它是南方古猿，⑪但是后来认为它更接近于能人。⑫这种不能肯定的原因是因为无法确定年代，还因为颅骨只有碎片。对这个既有原始特征又有进步特征的头骨作进一步考察后表明，它显现了向直立人这一更进步阶段发展的清晰迹象⑬，脑容量850毫升－1,300毫升。但是在西非却没有再发现这种直立人的遗骸，尽管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称作摩尔大西洋猿人的同一类型的标本。⑭ 614

手工制品

虽然史前时期的人类制造了骨器、木器和石器，但是木器难于保存，西非的土壤条件对骨器保存也不利。最早和最简单类型的石器，除利用过和略加修整过的石片之外，主要是卵石和石块，它们被敲成边缘有3－12公分长的切割工具。这些石器被称作奥杜瓦伊型工具，这是以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命名的。这样的工具在非洲许多地方均有发现，制造

---

③ J. D.克拉克(J. D. Clark)，1968年a，第37页。

④ C.加贝尔(C.Gabel)，1966年，第17页。

⑤ C.T.肖(C.T.Shaw)，1965年b，1966年b；D.布拉思韦尔(D. Brothwell)和C.T.肖，1971年；C.弗莱特(C. Flight)，1968年，1970年。

⑥ Y.科彭斯(Y. Coppens)，1966年b，第373页。

⑦ 同上书，第374页。

⑧ J.P.多斯特(J. P. Dorst)和P.丹德洛(P. Dandelot)，1970年，第100页。

⑨ 同上，第213页，第223页。

⑩ B. G.坎贝尔(B. G. Campbell)，1965年，第4页，9页。

⑪ Y.科彭斯，1961年。

⑫ Y.科彭斯，1965年a，1965年b。H. B. S库克(H. B. S. Cooke)，1965年。

⑬ Y.科彭斯，1966年a。

⑭ C.阿朗布尔(C. Arambourg)和R.霍夫施泰特尔(R. Hofstetter)，1954年，1955年；C.阿朗布尔，1951年，1966年。

这类工具的早期人类，很可能散居在非洲茂密的大草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西非一些地方发现了这类工具，[15]但是，现在无法断定其中哪一件真正源于同东非奥杜瓦伊文化同一个时期。东非奥杜瓦伊文化的时间可能是在200万年前和70万年前之间。对塞内加尔冈比亚河流域发现的砾石器作了仔细研究后证明，其中有些很可能源于新石器时代，另一些可能源于石器时代晚期，没有任何地层方面的证据证明是旧石器时代之前的文化。[16]因此，如果发现这种砾石器的地方有其他文物，而这些文物的年代又能相对或绝对地予以确定，从而能独立地测定这种砾石器的年代，那也只能断定它们是早期石器。古生物学对产生乍得猿人的亚约沉积层作了某种相对的年代测定，但是偏巧没有同这种沉积层相关联的工具。从博尔努一口深58米的井中发现的一些已绝种的河马骨化石的证据看，[17]乍得盆地的沉积物中，很可能含有更新世的古生物物质——或许也有考古学材料——但是，它被很厚一层后来的漂积物覆盖了。

615

气候的变化

在第四纪期间，欧洲发生过几次不同的冰川作用，主要的四次是以德国的河流命名的。但是，现在认识到，在冰川现象中，无论总的韵律和形态如何，许多局部性的差异必须考虑进去，因此须以地方名称来命名每一个特定的地区，而所得出的则是一幅更为复杂但很可能更近于真实情况的图景。[18]

非洲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从升高的湖面，从受侵蚀的土地和砂砾沉积物中进行考证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地方始于第四纪，那时非洲的气候同现在相比要潮湿得多。这样一些雨量增大的时期被命名为洪积期。鉴于人们已经认为在北温带有过冰川期，因此人们也就认为，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一个冰川期时，气温较高的热带地区也出现一个相应的洪积期。哪有比这种想法更自然的呢？[19]后来那种认为非洲出现过三次、四次洪积期的看法终于成了正统的看法。[20]据推测，它们与欧洲冰期时出现的冰川作用是相应的，[21]但还有人提出另外一种理论，认为非洲的一次洪积相应于北方的两次冰蚀。[22]由于有可能提出这种观点，这说明任何年代上的真正对应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无论如何，辽阔区域内地质上的相互关联，不应以气候而应以岩石的形成为基础。此外，同说明冰川作用的证据相比，发生洪积的证据就不足为凭，并引起许多混乱。[23]后来，关于非洲有过四次洪积期的证据本身受到了怀疑。[24]

---

⑮ O.戴维斯(O.Davies)，1961年，第1－4页；1964年，第83－91页；R.莫尼(R. Mauny)，1961年；R.C.索珀(R.C. Soper)，1965年，第177页；H.J.于戈(H.J. Hugot)，1966年b。

⑯ R.莫尼1968年，第1283页；C.巴比(C. Barbey)和C.德康(C. Descamps)，1969年。

⑰ C.M.塔塔姆(C.M. Tattam)，1944年，第39页。

⑱ R.F.弗林特(R.F. Flint)，1971年；B.W.斯帕克斯(B.W. Sparks)和R.G.韦斯特(R.G. West)，1972年。

⑲ E.J.韦兰(E.J. Wayland)，1934年，1952年。

⑳ L.S.B.利基(L.S.B. Leakey)，1950年；1952年，决议14(3)；J.D.克拉克，1957年，第xxxi页，决议2。

㉑ E.尼尔森(E. Nilsson)，1952年。

㉒ G.C.辛普森(G.C. Simpson)，1957年。

㉓ J.D.克拉克，1957年，第xxxi页，决议4；K.W.巴策尔(K.W. Butzer)，1971年，第312－315页。

㉔ R.F.弗林特，1959年b。

对西非，也同样采用了这种外推法，并尽力利用从非洲其余地区推断出来的结果来解释本来是孤立的或难以解释的资料。[25] 然而最近的两件事有助于改进对西非的科学研究，这就是相关的研究有了增加[26]并出现了关于非洲气候变化的新理论。[27] 616

我们没有地质或地貌方面的可靠资料说明早于欧洲最后一个冰川期的西非气候变化。对乍得湖的调查研究表明，从我们纪元前 40,000 年起湖水水位一直很高。[28] 这个湖以巴马山脊为界限，迈杜古里城屹立于巴马山脊。巴马山脊向西北和东南延伸，然后延伸的两端蜿蜒转向东北，直到把拉若、整个博德累盆地和加扎勒河包围起来。这条山脊的形成可能经历了 6,000 年，它被看作泻湖的一道屏障，而不是被看作实际的湖岸线。[29] 这个年代久远的湖泊海拔 332 米，而今天乍得湖的高度为 280 米。它有时因泛滥而淹没邦戈尔溢道，把洪水排入贝努埃河。因此看来，在这个雨量较多的时期，西非森林伸展的范围与今天的相比，很可能更加往北得多。诚然，它是否到达北纬 11 度[30]，或现在的 750 毫米的等雨量线[31]，在我们从孢粉学得到确证之前，是无法肯定的。

大致与北欧最末一次冰川作用达到最后高峰期的同时，约从我们纪元前20,000年开始，西非地区似乎比现在干燥得多。在这个时期，西非各河流注入的大洋因两极冰块挡住大量水而使大洋水面比现在大约低 100 米。结果，贝努埃河在马库尔迪切出了一条比目前海面低约20米的水道，在约拉切出了更深的河道；与此同时，尼日尔河在杰巴的凹陷水道低于海面 25 米，在奥尼沙的凹陷水道比这更深。[32] 塞内加尔河流经的水道也比它现在的水面低，但是大片沙丘堵住了河口。尼日尔河中段也是这样受堵。这时乍得湖干涸了，在它的湖床上和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些地方形成沙丘。尼日利亚的那些地方当时平均年降雨量不到 150 毫米，而现在却超过 850 毫米。虽然只有塞内加尔河河口和乍得湖周围的变迁是能够推断出绝对年代的，但是根据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十分适当地说，我们纪元前约 18,000 年的时候是个普遍干燥期。如果沙丘是在卡诺所处的纬度形成的，那么大草原和森林地带必定会更向南推进；但事实上，除了降雨量最高的地区，如利比里亚海岸、象牙海岸沿海部分、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喀麦隆山脉这些尚有残存森林的地区之外，大部分森林很可能消失了。 617

到我们纪元前 10,000 年，雨水似乎开始逐渐增加，马里尼日尔河泛滥，淹没了塔乌萨西勒。人们称之为梅加－乍得湖的湖面又变得宽广了[33]。前一个干旱时期形成的沙丘，由于季节性的雨量增多而变红。在伊博乌库地区，断定为我们纪元前第十一至第七个千年期的木炭的分布情况，可说明发生过丛林火灾以及在此之前这一纬度的大草原型植物的

㉕ G. 邦德(G. Bond)，1956 年，第 197-200 页；B. E. B. 法格(B. E. B. Fagg)，1959 年，第 291 页；O. 戴维斯(O. Davies)，1964 年，第 9-12 页；J. 皮亚斯(J. Pias)，1967 年。

㉖ 塞内加尔研究协会季刊，1966 年，1967 年、1969 年；K. 伯克(K. Burke)等人，1971 年；K. W. 巴策尔，1972 年，第 312－351 页。

㉗ E. M. 范津德伦-巴克(E. M. van Zinderen-Bakker)，1967 年。

㉘ M. 塞尔旺(M. Servant)等人，1969 年；A. T. 格罗夫(A. T. Grove)和 A. 沃伦(A. Warren)，1968 年；K. 伯克(K. Burke)等人，1971 年。

㉙ A. T. 格罗夫和R. A. 普兰(R. A. Pullan)，1964 年。

㉚ O. 戴维斯，1964 年。

㉛ O. 戴维斯，1960 年。

㉜ C. 沃特(C. Voute)，1962 年；H. 富尔(H. Faure)和P. 艾吕雅(P. Elouard)，1967 年。

㉝ R. E. 莫罗(R. E. Moreau)，1963 年；M. 塞尔旺(M. Servant)等人，1969 年。

生长情况[34]。在这一时期，森林又会从前一个干旱期残存的靠近海岸的地区向北扩展。把第四纪末西非气候变迁同北欧气候变迁联系起来的最令人满意的理论产生于以下正在不断充实的论据，即气温的变化是世界性的，这些变化引起赤道两侧气候带的改变，并受到陆地和海洋大气团的形状的调节[35]。当世界气温下降的时候，北部地区便出现一次冰川变动，使北极反气旋向南伸展，南面的气候带被迫向赤道方向压缩，因此西非地区的热带锋便从原有位置向南移动。结果引起干旱季月份刮干燥东北风的时候较长，并以较强的风势横扫西非。雨季期间带着雨水的西南"季风"，风势较弱，也没有干燥东北风刮得远。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西非出现干燥期的时间大体与北部出现冰川期的时间相一致。与此同时，北部撒哈拉的雨水比现在要多，因为来自大西洋的风暴所经路线是经过阿特拉斯山系南部，而不是经过它的北部。

世界气温上升时，冰盖北撤，热带风也向北移，海平面大致恢复到现在水平。撒哈拉北部由于大西洋风暴所经路线北移而变得更为干燥。但是，撒哈拉有着充足的地下水和植物，这使它的最后干涸推迟到我们纪元前3,000年以后。当撒哈拉变得太干燥以致居住在那里的人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时，这种情况自然也波及撒哈拉以南地区。

石 器 时 代

618

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这些专门术语，仍然应用于北非。但是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考古学家认为，使用他们自己的专门术语更为恰当。这些专门术语是根据本大陆的实际，而不是照搬欧洲体系定出来的，而且得到20年前召开的第三届史前史泛非大会的正式赞同。因此，本节将使用早期石器时代、中期石器时代和晚期石器时代这些专门术语[36]。撒哈拉以南非洲石器时代划分这些阶段的年代界限在各个地区都有所不同，但是大体可以认为，早期石器时代为我们纪元前250万－5万年；中期石器时代为我们纪元前5万－15,000年；晚期石器时代为我们纪元前15,000－500年。由于新知识的积累，这样一种简单的阶段划分和相应年代必将逐步加以修改，而且还会要求划得更细一些。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名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无论是说明一个时期，一种技术类型或一种经济，还是说明这三种的结合，其含义都不清楚。[37]

西非的早期石器时代

阿舍利文化

在东非、南非和西北非，继奥杜瓦伊文化之后，是通称的阿舍利文化，其特点是人类

[34] C. T. 肖，1970年，第58和91页。
[35] E. M. 范津德伦-巴克，1967年。
[36] J. D. 克拉克，1957年，第xxxiii页，决议6。
[37] W. W. 毕晓普(W. W. Bishop)和J. D. 克拉克(主编)，1967年，第687-899页；C. T. 肖，1967年，第9-43页；J. C. 沃格尔(J. C.Vogel)和P. B. 博蒙(P. B Beaumont)，1972年。

制造了双面手斧，这些手斧是一种有刃口的椭圆形或尖头椭圆形的工具，两面都经过仔细修整。另一种称为砍砸器，它有一种直的横向刃口。虽然至少有一半食物仍由妇女和儿童采摘野生浆果、坚果和挖掘植物块根来提供，但现在男人已结合在一起，集体活动，猎取大的野生动物。至少到阿舍利文化的末期，人们已懂得使用火。制造这些阿舍利工具的早期人类，无论发现于何地，都是被称为直立人的人类，其大脑比现代人小得多，但是体形与现代人很相象。

在撒哈拉，没有通常认为的早期类型的双面手斧(旧称舍利手斧)，但有人宣称，在塞内加尔[38]、几内亚共和国[39]、毛里塔尼亚[40]和加纳都存在这种手斧，据说从地层上来讲它们处在"中间阶地"的冲积层中，呈弯曲状态[41]，不管"中间阶地"的相对年代顺序如何。它们的分布情况已绘成地图[42]，据说这表明，当时人类是从尼日尔河流域沿阿塔科腊山系和多哥山脉来的。

阿舍利文化较后阶段的特征是采用先进圆柱锤技术制造的精细手斧，其遗物在大约北纬 16 度以北的撒哈拉地区很丰富。这种分布或许与欧洲倒数第二个冰川期(里斯冰期)有关，也可能与最后一个冰川期(武木冰期)的最初高峰期有关。在这样一个时期，撒哈拉北部雨水会增多，沙漠地带会南移，不会吸引人类去居住。看来乔斯高原的高地例外，那里的气候不很干燥，有阿舍利人喜爱的无树或稀树的草原。因此从阿伊尔和北纬 16 度以北主要的撒哈拉阿舍利文化区向南延伸的地方形成了一片适于居住的岬角地带。与阿舍利工具有联系的物质的年代，经放射性碳测定，"早于我们纪元前 39,000 年"。[43]这些阿舍利工具是在以前更潮湿时期雨水冲出的水道的底层砂砾中。 619

阿舍利人喜欢在乔斯高原生活的时候，富塔贾隆山很可能也适于人类居住。在这一地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阿舍利物质。[44]阿舍利文化中期和晚期的文物也分布在塞内加尔河上游周围及其以北地区，由此可以认为，富塔贾隆地区同毛里塔尼亚众多的遗址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加纳东南和沿多哥/阿塔科腊山脉，已发现阿舍利文物的纪录[45]，这说明可能有一条环境适宜的由北向南伸展的路线，但这种伸展似乎并不十分强烈。这一地区的阿舍利文物并未从地层学上得到切实证明，单凭收集到的少量物件和个别工具，往往很难肯定它们属于阿舍利类型。因为许多工具形式是这一时期和那一时期重复出现的，或者同后来桑戈文化时期使用的工具类似。[46]

---

[38] R.科贝尔(R.Corbeil)，1951 年。
[39] P.克雷阿什(P.Creach)，1951 年a，b。
[40] R.莫尼，1955 年a。
[41] O.戴维斯，1964 年，第 86-91 页。
[42] O.戴维斯，1959 年。
[43] G.W.巴伦德桑(G.W.Barendson)等人，1965 年。
[44] J.D.克拉克，1967 年b。
[45] O.戴维斯，1964 年；J.D.克拉克，1967 年。
[46] O.戴维斯，1964 年，第 83-97 页，114 页，137-139 页。

桑戈文化

要给桑戈工业体系下定义是困难的[47]。在西非，是否有真正的桑戈文化存在，人们一直有疑问。[48]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继阿舍利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工业体系。它保留了阿舍利文化的某些工具系列，如尖头锄和双面手斧的式样，但是砍砸器不见了，各种球状工具少了，又重又大的尖头锄往往受到很大重视。还有往往用卵石制成的手斧。

620 在西非，桑戈文物比阿舍利文物在地域分布上更往南，[49] 这表明一种新的定居格局。在达喀尔的曼努埃尔角发现的一种工业，以前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的文化[50]，现在则被认为是桑戈文化[51]，或许是桑戈文化的后来发展。从巴马科搜集到的某些物质也是这种情况[52]。在尼日利亚，桑戈文物是在乔斯高原以南和热带雨林以北与河谷联在一起的原野发现的。在高出现代河面 10－20 米的砾石层中也有发现。[53] 在布萨附近的尼日尔河流域发现的一种工业主要是用卵石制造的工具而没有尖嘴锄，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这种工业认为与桑戈文化同时代。[54] 据说沿阿塔科腊－多哥山脉面下一直到加纳南部都有桑戈文物的分布。[55] 这种文物在加纳北部很稀少，但在南部分布很广。

在非洲其余地区，[56] 桑戈文化的时间被确定为我们纪元前 5 万年以后。有人认为，桑戈工业可能是在日益干旱的时期为适应树木较多的环境而产生的。[57] 在西非，还没有通过放射性碳测定桑戈工业的年代。加纳南部修筑阿索克罗乔纳铁路时得到的桑戈文物，全部是在戴维斯第四号海滨层上面发现的。戴维斯认为，第四号海滨层至迟相当于戈特韦格间冰期[58]。这一地层的位置只表明我们所需要的起点界限而已。如果高出杰巴周围尼日尔河 10－20 米的砂砾层是在尼日尔河河面达到因奇瑞洪积期后期的海面高度时沉积下来的[59]，那么在这些砂砾层中出现未弯曲的桑戈制品，就表明其年代为我们纪元前大约 3 万年，而弯曲的标本可能与此同时，或者更早。在西非，桑戈文化分布于南方的河岸和林地，这可能说明它是一种适应我们纪元前 4 万年前干旱环境的生活方式，此后，乍得湖开始充溢和扩大。也许以前进行捕猎的猎场少了，移向南方了。对尖嘴锄形工具的重视可能表明两方面的需要：挖掘植物块根和块茎；挖掘陷阱，以捕捉在开阔地面不容易猎获的野生动物。

---

[47] J. D. 克拉克，1971 年 a。
[48] B. 瓦伊－奥古苏(Wai-Ogusu)，1973 年。
[49] J.D. 克拉克，1967 年 b。
[50] R. 科贝尔(R. Corbeil)等人，1948 年，第 413 页。
[51] O. 戴维斯，1964 年，第 115 页；H. J. 于戈，1964 年，第 5 页。
[52] O. 戴维斯，1964 年，第 113-114 页。
[53] O. 戴维斯，1964 年，第 113-114 页；R. C. 索珀(R.C. Soper)，1965 年，第 184-186 页。
[54] R. C. 索珀，第 186-188 页。
[55] O. 戴维斯，1964 年，第 98，100 页。
[56] J. D. 克拉克，1970 年，第 250 页。
[57] J. D. 克拉克，1959 年，第 149 页。
[58] O. 戴维斯，1964年，第23，137-142页。
[59] H.富尔(H. Faure)和P.艾吕雅(P. Elouard)，1967 年。

西非的中期石器时代

621

中期石器时代这一术语，是用来表述年代大致在我们纪元前35,000－15,000年的一组工业体。

在西非，属中期石器时代的各种工业，其正确程度不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余地区。在加纳[60]和尼日利亚[61]，发现了稀有的卢彭巴型工具标本，但是没有一件能令人满意地表明它们在地层学上的年代。在乔斯高原及其北面的利鲁埃丘陵，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物件，并被归入了中期石器时代[62]。这批物件的特点是，工具采用加工石髓的技术制成，后部削成几个面；它们在诺克出现的地层处于有阿舍利文物的底部砂砾层与含有诺克文化的较后沉积层之间[63]。这些工具同卢彭巴工业体系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同北非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型的一般工业关系密切，很可能属于一种更为开阔的大草原生活方式。与它类似的工业，加纳和象牙海岸[64]，达喀尔[65]和撒哈拉中部[66]都有报道。在产生莫斯特文物的沉积遗址之一、尼日利亚北部泽纳比发掘的一块木头，通过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为我们纪元前3,485±110年，但没有记录这块木头相对于那些石制工具的精确位置，测定的年代比这类工业应有的年代也晚得多。[67]

在靠近塞内加尔海岸的捷马萨斯的一次考古发现中有两面经过切削的投射尖状器．此外还有旧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后期类型的手工制品。起先认为这次的考古发现是新石器时代和更早时期各种成分的混合物[68]。然而，进一步仔细考察证明，这些两面加工的尖状器是一种并不包含新石器时代其他成分的沉积工业的组成部分，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莫斯特型文化，在这里，它包含那些成分，并代替更北面的阿特利文化[69]。阿特利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末阿尔及利亚的一种工业系列，它向南延伸到沙漠地区。戴维斯认为这种工业传入了西非，并称它为几内亚阿特利文化[70]。但是他所列举的证据不能使人信服，受到了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怀疑[71]。

622

晚期石器时代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晚期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制造了很小的石制工具，因此称它为“细

[60] O.戴维斯，1964年，第108-113页。
[61] 是D.D.哈特尔(D.D. Hartle)教授在阿非克波地区的地表发现的，以前被恩苏卡的尼日利业大学收藏。
[62] R.C.索珀，1965年，第188-190页。
[63] B.E.B.法格(Fagg)，1956年，第211-214页。
[64] O.戴维斯，1964年，第124-142页；J.D.克拉克，1967年b。
[65] R.科贝尔等人，1943年；R.科贝尔，1951年a、b；C.德理查德(C. de Richard)，1955年。
[66] J.D.克拉克，1967年b。
[67] G.W.巴伦德桑(G.W. Barendzon)等人，1965年。
[68] T.德甘(T. Degan)，1965年。
[69] R.吉约(R.Guillot)和C.德康(C. Descamps)。
[70] O.戴维斯，1964年，第116-123页。
[71] H.J.于戈，1966年a。

石器”。这些细石器是一些细小的石块，经过细致雕琢，开出装箭杆的槽口，形成各种尖状器和带钩的器具，以及其他种类的复合工具，这些工具证明，它们的制造者拥有弓箭，用弓箭打猎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新石器时代”一词及其不明确的含义，使我们感到苦恼。在非洲最好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当然要避免使用这个词[72]，但是必须考虑在北非和撒哈拉继续使用它。撒哈拉广泛发现的各种工业。因为它们是成套工具，而且在中部地区这些工业始于我们纪元前第六个千年期，因而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湿润，使地中海类型的植物群得以生长，使牲畜放牧者得以生存，这些放牧者有可能但也不一定种过谷类作物[73]。到我们纪元前 4,800 年[74]，在昔兰尼加出现了粮食生产者，这是有确实证据的。但是，继此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化之后，在非洲西北部广为传播的具有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一直存在到我们纪元前第二个千年期[75]，但现在却被证明没有粮食生产的证据。有人认为，在塞内加尔吕菲斯克发现的物品属于具有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76]，不过最好把它们归入西非总的细石器连续体[77]。除达喀尔附近的上述发现之外，这种细石器连续体，或称几内亚细石器，在西非东半部到处都有，但在西半部最南边的遗址，在利比里亚地区、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共和国，却似乎没有。在西非发掘的第一批古文物遗址，是几内亚共和国南部的许多岩洞和天然岩石隐蔽所，其中有些是在 70 年前发掘的[78]。在一些遗址里有双面工具，很象晚期石器时代以前的工具式623 样。有些人把这类工具看作锄头，因而也认为是农业生产的间接证据。对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必须考虑的，因为在西非的西半部，稻子代替薯蓣成了主要作物，而非洲稻子（无毛扁形稻）可能是在中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培植的[79]。在加纳，扁平宽大的石英石块在粗糙地切削加工成形后，也被看作锄头，从而认为是耕作的证据[80]，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两者的联系，或它们的年代。几内亚共和国的大部分遗址也和几内亚比绍的一个遗址情况相同[81]，有细石器、磨光石斧、磨石和陶器。虽然据说卡金邦洞穴的陶器只在上层[82]，但几内亚的一些遗址是有陶器的。在几内亚共和国东南角，布朗德地方的天然岩石隐蔽所遗址，也发现一种使用磨制石斧和陶器的工业，同时还有一种大的双面工具，很象金迪亚和富塔贾隆岩洞中的东西，但是没有细石器成分[83]。塞拉利昂延盖马岩洞遗址同样没有细石器，遗

[72] W. W. 毕晓普和 J. D. 克拉克（主编），1967 年，第 898 页，决议 Q；J. D. 克拉克，1967 年 a；C.T. 肖，1967 年，第 35 页，决议 13；P. J. 芒森(P. J. Munson)，1968 年，第 11 页。有些作者不同意这种意见。

[73] H. J. 于戈，1963 年，第 148-151 页；F. 莫里(F.Mori)，1965 年；G. 康(G. Camps)，1969 年。

[74] C. B. M. 麦克伯尼(C. B. M.McBurney)，1967 年，第 298 页

[75] C.罗贝特(C. Roubet)，1971 年。

[76] R.沃弗雷(R. Vaufrey)，1964 年；H.阿利芒 (H. Alimen)，1957 年，第 229-233 页；O. 戴维斯，1964 年，第 236 页。

[77] H. J. 于戈，1957 年，1964 年，第 4-6 页；C. T. 肖，1971 年 a，第 62 页。

[78] E. T. 哈米(E. T.Hamy)，1900 年；P. 盖布阿尔德(P. Guebhard)，1907 年；L. 德斯普拉格内斯 (L. Desplagnes)，1907 年 a；E.休(E. Hue)，1912 年；R. 休伯特(R. Hubert)，1922 年；H. 步日耶神父(AbbeèH. Breuil)，1931 年；R. 德尔克鲁瓦(R. Delcroix)和 R. 沃弗雷，1939 年；C. T. 肖，1944 年。

[79] R. 波蒂埃(R. Porteres)，1962 年，第 197-199 页。

[80] O. 戴维斯，1964 年，第 203-230 页。

[81] A. 德马特斯(A. de Mateus)，1952 年。

[82] E. T. 哈米，1900 年。

[83] B. 奥拉 (B. Holas)，1950 年，1952 年；B. 奥拉和 R. 莫尼，1953 年。

址最下层有小石英石片工具，发掘者觉得它可以同爱德华湖的伊尚戈型工具相比拟；遗址中层有两面加工切削的尖锄和扁锄，同几内亚共和国那些岩洞里的某些工具相似，发掘者把它列入卢彭巴工业系列；遗址上层有磨光石斧和陶器，对其中两片进行热发光测定，表明它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前 2,000－1,750 年[84]，然而在塞拉利昂更北的亚加拉和卡马拜的两处天然岩石隐蔽所，发掘了细石器成分，由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是从我们纪元前 2,500 年，即此地晚期石器时代起，直至我们纪元第七世纪[85]。

因此看来，西非的这个西部地区有某种中期石器时代的传统（在达喀尔和巴马科也可能有这种传统），在大多数南部遗址，这种传统保存下来，无大变化，没有采用或发展细石器技术。原因很可能是生态方面的，因为细石器技术是同狩猎起着重要作用的大草原地带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绘制一幅没有细石器的遗址分布图（科纳克里、延盖马、布兰德），在它们和有石器的遗址（卡马拜、亚加拉、金迪亚、尼扬帕赛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我们就会发现，这条界线与森林地带和大草原地带之间的分界线非常相近。对磨制石斧和陶器的技术革新，后来由北部传入这一地区。这些影响出现于我们纪元前第三个千年期中，正好是撒哈拉广泛干涸的时期。因此，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并以此观察使人离开撒哈拉的影响，是合乎情理的。虽然我们尚无骨骼证据加以证明，但是这些人很可能是带有牲畜的，这种牲畜也许是富塔贾隆恩达马种的祖先，它们对锥体虫引起的睡眠症有免疫力。

624

在西非其余大部分地区，陶器和磨光石斧的制造技术产生于细石器连续体以后，并以它为基础。这种技术似乎融合了细石器的传统中，而不是取而代之。

在巴马科附近库龙科罗卡莱的遗址上，下层是粗糙的细石器和加工过的骨头，上层是比较精细的细石器、磨光石斧和陶器。[86]在尼日利亚包奇高原的罗普[87]、在西部州的伊沃伊莱鲁以及在岩石隐蔽所，发现了没有陶器和磨光石斧的细石器层，它处于有陶器和磨光石斧的细石器层之下。在伊沃伊莱鲁，经放射性碳测定，靠近下层底部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前 9,200 年，向上层过渡似乎是在我们纪元前 3,000 年稍后[88]。在旧奥约的梅吉罗洞穴，发现一种没有陶器或磨制石斧的细石器工业，但是工具样品细小，未测定年代。[89]在加纳阿贝提菲的博孙普拉岩洞里发现，细石器陶器是与磨制石斧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未测定年代。[90]在加纳，有一种晚期石器时代的文化形式，被称为金坦波文化。金坦波文化，继有陶器和细石器的早期阶段之后，有磨光石斧，石制臂饰（是从撒哈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以及刻有线纹、类型独特的石磨具。早期阶段（蓬蓬）的时间定为我们纪元前 1,400 年以前，后期阶段有小山羊和同西非小短角类相近的家畜品种。[91]甚至在毛里塔尼亚南部，提希特文化的最

---

[84] C.S.库恩(C.S.Coon)，1968 年。

[85] J.H.艾瑟顿(J.H.Atherton)，1972 年。

[86] G.舒莫夫斯基(G.Szumowski)，1956 年。

[87] B.E.B.法格(B.E.B.Fagg)，1944 年，1972 年；E.埃约(E.Eyo)，1972 年a；A.罗森菲尔德(A.Rosenfeld)，1972 年；A.法格，1972 年，a、b。

[88] C.T.肖，1969 年 b。

[89] F.威利特(F.Willett)，1962 年 b。

[90] C.T.肖，1944 年。

[91] O.戴维斯，1962 年；1964 年，第 239—246 页；1967 年b，第 216—222 页；C.弗莱特(C.Flight)，1970年；P.L.卡特(P.L.Carter)和C.弗莱特，1972 年。

初阶段(阿克雷吉特)，也有陶器和磨光石斧同细石器一起出现，时间约为我们纪元前1500年，但在后来各阶段，陶器和磨光石斧全部消失。[92]

沿本地区的北部边缘，在紧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区，晚期石器时代后一阶段情况稍有不同，以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中的当地生态条件。在加奥以北的卡卡里欣卡特，

625 放牧牲畜的人们，在我们纪元前 2,000-1,500 年之间，生活于高于季节性河流的小山丘上。他们有陶器和包括磨光石斧、撒哈拉型双面箭头（虽然后部不空心）在内的石器[93]，偶尔有细石器；正象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整个南撒哈拉地区得到广泛证实的那样，[94]捕龟是其经济中一个重要方面。尼日利亚东北达伊马一千年以后的情况与此有些相似，那里的牲畜饲养者还很可能在乍得湖缩小后留下的肥沃粘土上种植高粱类作物。他们有陶器、磨光石斧和丰富的骨器，但他们却没有任何种类的细小石器。[95]

在本地区的另一端，即大西洋沿岸沿西非南部边缘，出现了一种适应完全不同生态条件的特殊情况。在那里，晚期石器时代的人，利用礁湖和河口港湾里的丰富贝类，既作食用又作捕鱼的诱饵，留下了巨大的贝冢。在象牙海岸，此类贝冢的时间为我们纪元前 1,600年，一直到我们纪元十四世纪。[96]在塞内加尔的一个贝冢里，有一把磨制骨斧[97]。在卡萨芒斯，那些经过考察的贝冢的年代属石器时代以后。[98]

在尼日利亚南部的阿菲克波，发现了一批陶器、磨光石斧和石制工具，没有细石器。这种文物的年代范围，经放射性碳测定为我们纪元前 3000-1 年。[99]在非尔南多波，已辨认出晚期石器时代一种工业的 4 个主要阶段，[100]有陶器、磨光石斧，但无细石器。经放射性碳测定，最早阶段的年代为我们纪元第六世纪，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差错，这种文化的时间是很晚的。细腰形斧子表明，它与尼日利亚东南部、[101]喀麦隆和乍得共和国的类似工具有亲缘关系[102]。

简而言之，西非晚期石器时代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起点不晚于我们纪元前1 万年，有两种文化形式。文化形式（A）有细石器型的石制工具，它同大草原地区的狩猎活动相关联；文化形式（B）属于西非最西南部森林地区的文化，没有细石器。第二阶段，始于我们纪元前 3,000 年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有四种文化形式。文化形式（A），在大草原大部分地区有细石器，还有陶器和磨光石斧。文化形式（B），在萨赫勒地区，其经济中

626 有捕鱼的成分，实际上无细石器，而有各种骨器，包括鱼叉、鱼钩等。文化形式（C）属沿海地区类型，它的经济适应于利用礁湖和河口港湾的资源。文化形式（D）同森林环境相关联，有陶器、磨光石斧，而无细石器。

---

[92] P.J.芒森(P.J.Munson)，1968 年，1970 年。
[93] R.莫尼，1955 年b；A.史密斯(A.Smith)，1974 年。
[94] T.莫诺(T.Monod)和 R.莫尼，1957 年。
[95] G.康纳赫(G.Connah)，1967 年，1969年，1971 年。
[96] R.莫尼，1973 年；I.U.奥尔森(I.U.Olsson)，1973 年。
[97] J.乔伊雷(J.Joire)，1947 年；R.莫尼，1957 年；1961 年，第 156-162 页。
[98] 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O.Linares de Sapir)，1971 年。
[99] D.D.哈特尔(D.D.Hartle)，1966 年，1968 年。
[100] A.马丁·德尔莫利诺(A.Martin del Molino)，1965 年。
[101] R.A.肯尼迪(R.A.Kennedy)，1960 年。
[102] J.D.克拉克，1967年 a，第 618 页。

当撒哈拉的牲畜放牧者在我们纪元前第三个千年期第一次向南迁移的时候，他们不仅遇到了在他们南面的、有细石器的猎人，而且还越过了一个可以获得燧石的地区，进入了用石英石和其他一些较难制作两面箭头的石料制造箭头和倒钩的地域。因此看来，他们大部分人采用了当地的细石器技术来制造有尖头和倒钩的箭，因为即使现代人认为从美学上说并不可取，然而在他们看来，却是一种有效的工具。那些在我们纪元前第二个千年期后半期到达加纳中部恩泰雷索的人们是例外，他们保留了自己特有的两面箭头。[103]

如果说这种由撒哈拉向南迁移的运动意味着同当地土著居民在种族上的混杂，那么在体型上对他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黑种人。[104] 假如迁入者是讲原始尼罗-撒哈拉语的人，那么人数不多的这些人很可能丧失掉自己的语言，而采用当地流行的尼格罗-刚果语，看来很可能是这样。只有象桑海人的祖先那样大批大批的人才会保留自己的语言。[105]

食物的生产

从依靠狩猎、捕鱼和采摘野生浆果，到种植五谷和饲养家畜这一转变，是人类近一万年中采取的最重大步骤。这一革命并非只发生于一个地方，然后遍及世界各地，而是存在着若干数目有限的、逐步形成这种变革的中心。对欧洲、西亚和东北非来说，主要的一些中心分布于安那托利亚的丘陵、伊朗和伊拉克北部。这些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种植，绵羊、山羊和牛的驯养。后来，这种食物生产技术以及所涉及的排灌方法，被应用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印度河这些大河流经的地区。[106]到我们纪元前第五个千年期，埃及已有驯养的绵羊和牛，并种植了谷物。[107]在撒哈拉中部高地，驯养牲畜比这更早。我们现在有这方面的证据，而且有一些关于种植谷物的证据，但是证据不多。[108]由于谷类种子是从尼罗河流域引进的，古代生长在那里的谷物小麦和大麦是冬季降雨区作物，所以在热带锋以南夏季降雨区很不适宜于生长，这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易发展谷物耕作的原因。因此对这一地区来说，培育适合本地生长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是必要的。结果产生了非洲栽培的各种粟类。在这些粟类作物中，最重要的是双色玉米，或称几内亚玉米。这种作物是我们纪元前第二个千年期上半期，在撒哈拉和大草原地带之间的尼罗河至乍得湖地区培育的。[109] 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被培育成珍珠粟和手指粟。关于非洲稻谷，前面已经讲过。[110] 在毛里塔尼亚南部提希特周围，有利用本地禾本科各类的证据，但是在我们纪元

627

---

[103] O.戴维斯，1966年a，1967年a；1967年b，第163页；C.T.肖，1969年c,第227-228页。

[104] M.-C.夏姆拉(M.-C. Chamla)，1968年；D.布罗思韦尔(D. Brothwell)和C.T.肖，1971年。

[105] J.H.格林伯格(J.H. Greenberg)，1963年b。

[106] G.克拉克，1969年，第70页以后；P.J.乌科(P.J. Ucko)和G.W.丁布尔比(G.W. Dimbleby)(主编)，1969年。

[107] G.卡顿-汤普森(G. Caton-Thompson)和E.W.加德纳(E.W. Gardner)，1934年；D.塞登(D. Seddon)，1968年，第490页；F.温多尔夫(F. Wendorf)等人，1970年，第1168页。

[108] F.莫里(F.Mori)，1965年；G.康(G. Camps)，1969年。

[109] J.M.J.德韦特(J.M.J.de Wet)和J.R.哈伦(J.R.Harlan)，1971年。

[110] R.波蒂埃(R. Portores)，1951年b，1958年，1972年。

前约 1,000 年，珍珠粟的比例从 3%一跃而为 60%。[111]在西非那些较为湿润多雨的地区，主要的作物是薯蓣，在各种非洲薯蓣中，不止一种是这一地区培育的。[112]虽然这一过程的发生可能早在我们纪元前 5,000 年，但对此至今还无考古学和植物学方面的证据。薯蓣种植的悠久历史，加上能从受保护或经培育的油棕树获取果实作为辅助食物，可能是尼日利亚南部人口稠密的原因。[113]

发展食物生产虽然是城市化的必备条件，但是它本身并不自动地导致城镇的产生。城镇的产生似乎还必须具备某些其他条件，如人口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和耕地的短缺。[114]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农业用地的开垦和较大的固定村落的出现，发生疟疾的情况增加了，结果使采用农耕之后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它应有的速度要慢。[11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耕地并不短缺。[116]尽管如此，到我们纪元前第一个千年期，已形成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足以维持加纳、马里、桑海和贝宁这样一些古老的王国。

628

金属的出现

尽管很早以前，有人出于充分的方法论方面的理由，建议在欧洲放弃使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种三时代分期体系，[117]但是由于使用方便，还是继续这样使用。从整个西非来说，几乎没有涉及青铜时代，但是有一种青铜文化从西班牙和摩洛哥传入毛里塔尼亚，在那里发现了近 130 件铜器，阿克儒特丰富的文物资源得到了发掘。这些器物的时间，经放射性碳测定为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在马里和阿尔及利亚东南部，还偶然发现了扁平的铜箭头。[118]

为什么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青铜时代？为什么古代埃及没有更多地利用青铜？其原因部分地与以下事实有关，即我们纪元前第三个千年期，埃及牢固地形成了冶金术，有了书写文字和大型石头建筑物，使用了轮子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的年代，也是撒哈拉最后干涸、人们迁出这个地区、使它再也不能作为联系埃及与西非的间接环节的年代。它们之间的联系，直到三千年后借助骆驼得以实现之前，一直没有恢复。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后来西非建立农业经济比较缓慢有关，上面已经讲过。一些著作家极力设法证明，西非同古埃及有联系，努力给西非历史增添尊严和光彩，[119]使西非因为过去而享受荣耀，这似乎没有必要[120]。

[111] P.J.芒森，1968年，1970年。
[112] D.G.柯西(D.G.Coursey)，1967年，1972年。
[113] C.T.肖，1972年，第27-28页；A.R.里斯(A.R.Rees)，1965年。
[114] C.M.韦布(M.C.Webb)，1968年。
[115] F.B.利文斯顿(F.B.Livingstone)，1958年；S.L.威森费尔德(Wiesenfeld)，1967年；D.G.柯西和J.亚历山大(J.Alexander)，1968年。
[116] C.T.肖，1971年b，第150-153页。
[117] G.丹尼尔(G.Daniel)，1943年。
[118] R.莫尼，1951年；R.莫尼和J.赫莱门斯(J.Hallemans)，1957年；N.朗贝尔(N.Lambert)，1970年，1971年。
[119] J.O.卢卡斯(J.O.Lucas)，1948年；C.A.狄奥普(C.A.Diop)，1955年，1960年，1962年b。
[120] C.T.肖，1964年a，第24页。

铁器时代早期(约在我们纪元前400－我们纪元700年)

在整个铁器时代早期，西非许多地区同外界没有接触。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同西方古典文化的接触不多，只是零散的和间接的。[121]关于历史上汉诺的航行，传说纷纭，但是对航行经过的记述很可能是伪造的。[122]希罗多德所说的迦太基人悄悄进行换取西非黄金的交易，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事实根据的。[123]当然，肯定有某种原因促使同外界接触，因为炼铁知识传入西非正好是这个时期的开始。这不仅是铁器的输入，而且也是铁器制造知识的输入。由于以前完全没有冶金术的知识，铁器制造不大可能是独自的创造发明。[124]在尼日利亚中部的塔鲁加发掘出一些熔铁遗址，以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前五至三世纪。[125]在尼日尔河流域，在那些有人居住过的小丘上发掘出的文物也表明，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就已经有了铁。[126]根据现有材料，西非炼铁的知识，似乎并不象常说的那样来自麦罗埃，[127]十有八九是由北非迦太基人影响所及的地区传入的。它们之间的传递媒介也许是使用双轮马车的加拉曼特人。连接费赞和尼日尔河中部河曲的道路上，沿途都有这种马车的石刻画。[128]再往西的石刻画表明，当时还有一条连接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南部的马车路。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或四世纪以后，迫使晚期石器时代(阿金杰尔阶段)提希特的居民设防保卫自己村庄的，可能正是这些使用铁器的游牧部落的猛烈攻势(用装有铁尖的矛代替了弓箭，因为在石刻画中最常见的是这种武器)。[129]塔鲁加的发掘物同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硬陶土小塑像有关，这种艺术被以最初的发现地尼日利亚诺克村命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开采锡矿过程中发现的。[130]由于它们埋在含锡的冲积层中，所以整个小人像往往只有较坚实且不易腐蚀的头部仍然保持了原样。在这些砂砾层中发现的其他手工制品是否全部与这些小人像同时代，或是同一时代的器物同较古老器物的混合，在一开始要弄清这些问题很困难。因为除铁制品和熔铁通风管外，还有磨光石斧，以及具有石器时代末期特点的小型手工制品。[131]现在看来石器时代的物质较古老，是一种冲积混合物。[132]但是无论如何在塔鲁加不存在石器时代的物件，虽然在稀有的诺克住所遗址之一也发现了一把磨光石斧。[133]根据对这些诺克砂砾层考察后测定的年代，推断这些小人像的出现约在我们纪元前500年至我们纪元200年之间。后来，对上述塔鲁加的一个住所遗址以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我们纪元

629

[121] R.C.C.劳(R.C.C.Law)，1967年；J.弗格森(J.Ferguson)，1969年；R.莫尼，1970年b，第78－137页。

[122] G.C.皮卡尔(G.C.Picard)，1971年；R.莫尼，1970年；1971年，第73－77页。

[123] 希罗多德(Herodotus)，1964年版，第四卷，第363页。

[124] O.戴维斯，1966年b；C.T.肖，1969年c，第227－228页。

[125] B.E.B.法格，1968年，1969年。

[126] A.J.普里迪(A.J.Priddy)，1970年；D.D.哈特尔(D.D.Hartle)，1970年；F.山崎(F.Yamasaki)等人，1973年，第231－232页。

[127] G.克拉克，1969年，第201页。

[128] R.莫尼，1952年a；H.洛特(H.Lhote)，1966年；C.T.肖，1969年c，第229页；C.丹尼尔斯(C.Daniels)，1970年，第43－44页；P.瓦尔(P.Huard)，1966年。

[129] R.莫尼，1947年，1971年，第70页；P.J.芒森，1968年，第10页。

[130] B.E.B.法格，1945年，1956年b，1959年。

[131] B.E.B.法格，1956年b。

[132] C.T.肖，1963年，第455页。

[133] A.法格，1972年b。

前二世纪)，和以热发光测定的时间(我们纪元前620年±230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年代推断，而且使之更为精确[134]。诺克硬陶土小人像的式样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表现了出色的艺术成就。一些艺术史家从中发现了某些约鲁巴艺术形式的渊源，而约鲁巴艺术的时间比它晚一千年，地点在诺克西南640公里[135]。在乔斯高原以南和以西长达480公里的地区内，也发现了诺克文物。

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冈比亚河中游周围地区，有一个地方有大量孤立或排成圆圈的装饰石柱。最精细的石柱是成双的，形似古希腊的竖琴。对此地的发掘物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定，得出了我们纪元七－八世纪中的三个年代。发掘物表明，这些石柱是墓碑。对其中一块墓碑所处的古老地层表面进行测定，得出了两个年代，都在我们纪元一世纪。这就提供了这些石碑的起始年代[136]。在尼日尔河中部河曲地区的通迪达鲁，大量的阴茎形石碑被二十世纪那些无知而热情的挖掘者和行政官所抢劫，结果我们对这些石碑几乎毫无实际了解。它们可能与塞内冈比亚石碑属同一时期[137]。

到铁器时代初期结束的时候，黑种居民沿着西非北部边缘，同沙漠地区的柏柏尔游牧民有了接触。这些柏柏尔人当时备有骆驼，他们穿过沙漠，把西非的黄金运往北部。到八世纪末，“黄金之国加纳”的美名已传到巴格达[138]。当时西非的这些北部地区已经有了农业和铸铁技术，并准备发展政治和组成国家，以抵抗来自北方游牧民的压力并控制有利可图的黄金贸易。再往南，在塞拉利昂北部地区，看来直到八世纪才开始向使用铁器转变，这种转变也并非突如其来[139]。

（罗建国译）

[134] B.E.B.法格和S.J.弗莱明(S.J.Fleming)，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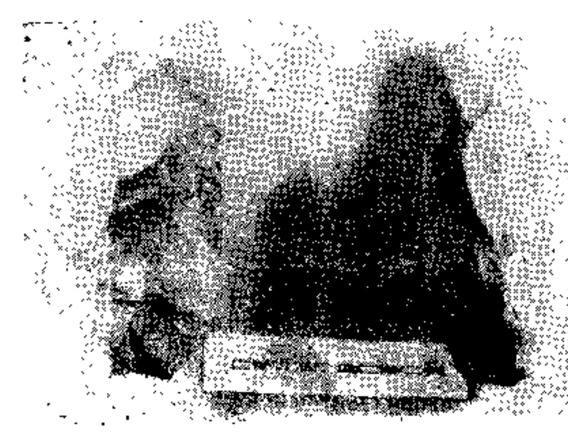
[135] W.法格和F.威利特(F.Willett)，1960年，第32页；F.威利特，1960年，第245页；1967年，第119－120页，134页；1968年，第33页；A.鲁宾(A.Rubin)，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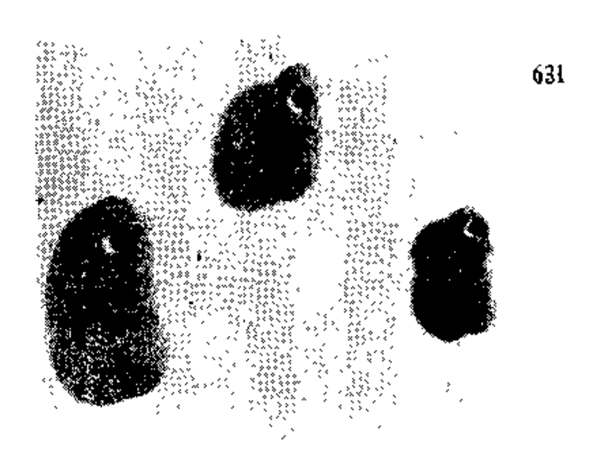
[136] P.奥赞(P.Ozanne)，1966年；F.C.比尔(F.C.Beale)，1966年；K.西瑟(K.Cisse)和G.蒂尔曼斯(G.Thilmans)，1968年；B.M.费根(B.M.Fagan)，1969年，第150页；G.德康(G.Descamps)，1971年。

[137] A.M.L.德斯普拉格内斯(A.M.L.Desplagnes)，1907年a，第40－41页；E.马斯(E.Maes)，1924年；R.莫尼，1961年，第129－134页；1971年a，第133－1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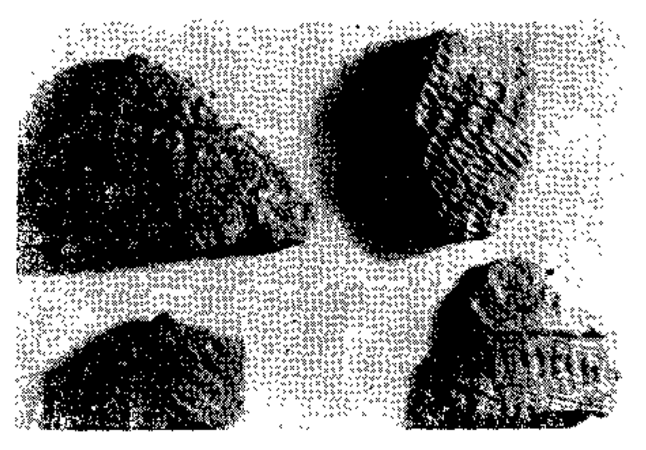
[138] N.列夫吉翁(N.Levtzion)，1971年，第120页。

[139] J.H.艾瑟顿(J.H.Atherton)，1973年。


照片24.1 石器，塞内加尔曼努埃尔角（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4.2 石垂饰（玄武石），帕特杜瓦新石器时代遗址（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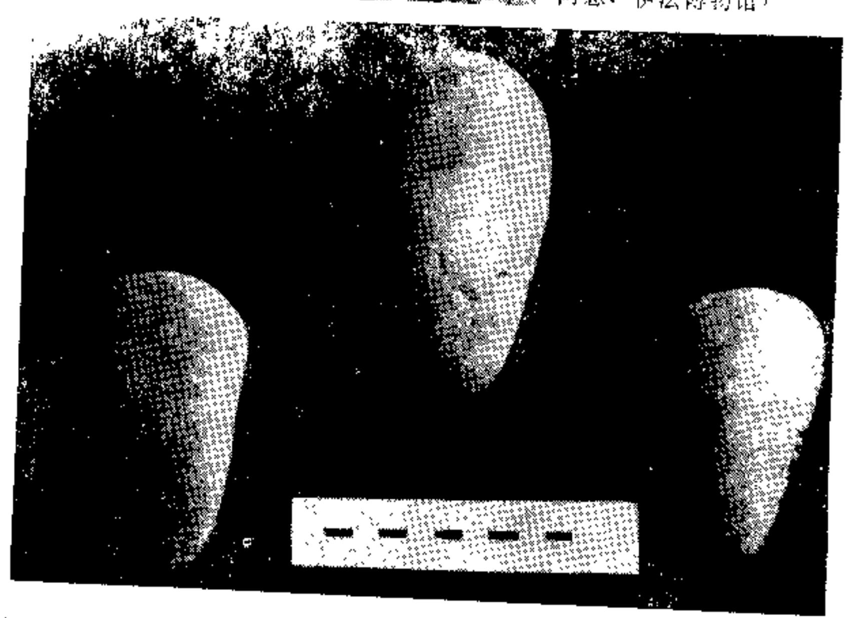

照片24.3 新石器时代的"贝尔埃尔"陶器，塞内加尔贾基泰遗址（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4.4 陶器：有装饰的碎片，塞内加尔曼努埃尔角（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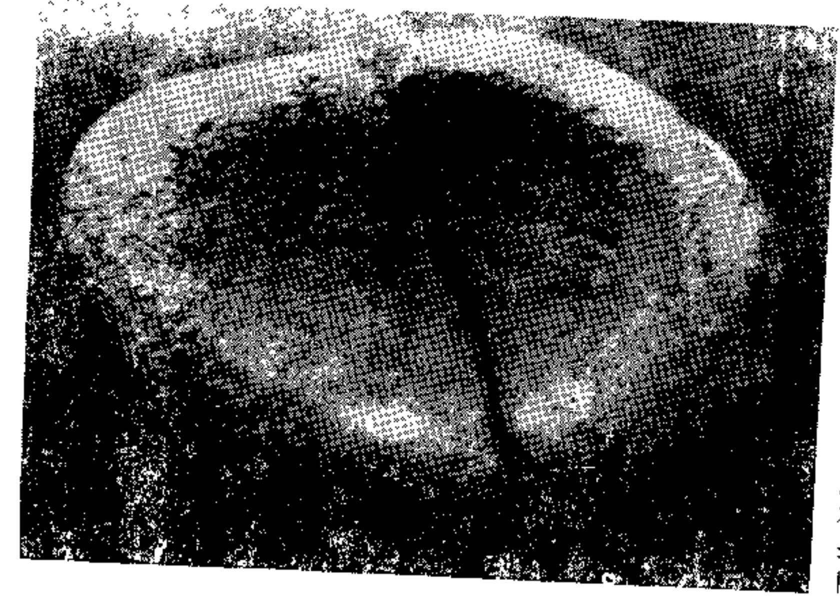
632



照片24.5　巨石区、前面的"国王墓"清晰可见，塞内加尔捷肯布苏拉(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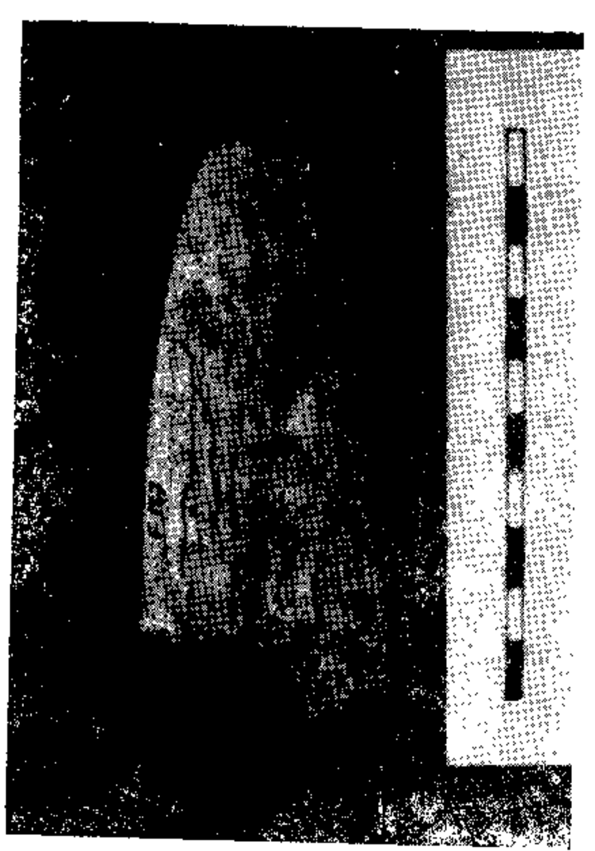
照片21.6　以粗结晶状玄武石制成的"贝尔埃尔"磨光石斧(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1.7　火山岩制成的磨石，恩戈尔新石器时代遗址(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4.8　铁器时代的平底罐（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4.9　骨制磨平器，曼努埃尔角新石器时代遗址（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照片24.10　人神同形同性雕像，塞内加尔佳罗伊遗址（摄影：I.迪阿恩，伊法博物馆）

634

25 尼罗河流域史前史

F.代博诺

苏丹、努比亚和埃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仅由一条河流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独特的流域。今天实难想象，从两边包围了这一流域的大片沙漠过去既是隔绝非洲其他地区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沟通关系的桥梁(这完全取决于该时期的气候和环境因素)。同样的自然因素也左右了尼罗河流域最早期居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为了适应不利的或有利的生存环境，始终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打算简要地谈谈这一地区人类的漫长进化过程，从人类的起源，直至法老时期的繁荣昌盛。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已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研究工作不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对研究成果采用的分类方法不妥当，结果造成一种零碎无序的历史论述，将来也许会证明这种历史是主观臆造的，有些地方甚至是错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时在仅仅相距几里地的情况下，竟会出现名目繁多的文化"类型"。一些史学家对这种零碎无序的历史概念很不满意，他们设法把已确定"类型"的文化归纳起来，形成广泛的编年类别，即使将来可能会证明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缺陷的或不充分的。

奥杜瓦伊时期[①]

这一时期的文化在各处都是以经过加工的卵石(砍砸器)为特征。最近有关人类起源的新发现证明，不仅在非洲其他地区，而且在尼罗河流域，也存在远古人类的踪迹。从1949年起，在苏丹的努里和瓦瓦发现了仅加工成粗糙工具的卵石，成为人类祖先存在的早期证据，但是这些孤立的表面发现并不等于确凿证据。直到1971年在底比斯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后，才肯定了这一点。这里对第四纪初的25处冲积层进行了勘探，得到了大量原始工具。1974年对藏有已加工卵石(砍砸器)的三处层叠遗址进行发掘，获得大量资料，从而将残存的疑点一扫而光。这种经过加工的卵石层处于阿舍利时代早期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早期之下，阿舍利文化最早是以三面体工具为显著特征的。最近，在底比斯小丘上早期冲积层里，发现一枚人类祖先的牙齿，同它在一起的是一些砍砸器。人们还记得，1925年前后，在开罗附近阿巴西亚的冲积层里，也发现过类似工具，但是当时把那些已加工卵石看作原

635

① 这一时期由奥杜瓦伊峡谷的考古发现而得名(见下面第二十八章)，以前常称它为前阿舍利时期或原始旧石器时期。

始石器。由于我们(IFAO② 考察队)在上埃及和阿达伊迈的发掘结果,因而能够对这个遥远时期的情况有新的了解。这是一个仍在研究中的新遗址,但是它显然与上述那些遗址类似。

早期石器时代③

以两端狭小的双面工具为特色的这种精细的石器工业实际上存在于整个非洲。它甚至可能起源于非洲，开始于前一时期的已加工的卵石，后来不断发展到世界各地。在尼罗河流域发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证据，从苏丹到埃及并无明显的中断。由于近来工作的结果，它在苏丹北部比在较远的南部更为人们所熟知。在阿特巴拉、瓦瓦以及努里，发现了阿舍利早期文化和加工的卵石，这种文化常以粗糙的、有波状刃口的双面工具为标志。在努里遗址，它还有一种过渡性的综合工具。阿舍利中期文化和阿舍利后期文化，以工艺的改进和勒瓦卢瓦技术的出现而与众不同。对它们的研究主要是在苏丹北部进行的。勒瓦卢瓦技术在阿布安贾湾也能看到，它随后产生了勒瓦卢瓦燧石片技术。尽管阿舍利文化在其他各洲均有发现，但与此同时，一种桑戈型文化却是非洲所特有的，它是阿舍利文化(继续存留了一个漫长时期)的最后形式。迄今为止主要发现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这种文化，现在也开始在苏丹发现，例如在阿布安贾湾和赛。但是在瓦迪哈勒法以南，它的某些特征似乎已经消失。在苏丹，显然存在着极少的末端倾斜的双面砍砸器。

在埃及努比亚地区，在古老河流阶地上也发现了阿舍利文化，根据石器技术改进的情况，可以看出那是一种新的发展，但对它的类型特征还了解不够。另一方面，在埃及，从开罗附近阿巴西耶的层叠遗址中，从最近(1974年)我们在底比斯考查的这些遗址上以及从古老的尼罗河阶地上，都发现了连续几层的阿舍利工业。在以加工卵石为特征的奥杜瓦伊文化层之上，是包含三面体工具、粗糙的双面工具、还有加工的卵石的阿舍利文化层。紧接着一层是更先进的双面工具和勒瓦卢瓦(勒瓦卢瓦早期)物件。哈里杰遗址上面还有一层时间更晚的阿舍利文化层，它结束于中期石器时代。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双面石器的传统样式，在埃及也时常发现它的一些样品，但是被重新加工成一端倾斜的砍砸器：这是目前埃及发现的唯一的一种砍砸器。按照一种与所谓的维多利亚西部技术类似的工艺制成的双面工具也是埃及所特有的。维多利亚西部技术本身，先于正统的勒瓦卢瓦燧石片技术④。其他桑戈型双面工具，几乎远至开罗，都有所发现，它的时间可能更晚些。

636

中期石器时代⑤

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燧石片而不是双面工具的广泛应用，双面工具很快变得稀少，然

② 法国东方考古学会考察队。

③ 大体上说，这一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常常称为阿舍利时期，即我们纪元前60万年至我们纪元前20万年。

④ 对大块石片采用敲击方法进行加工，通常是敲击一面，但有的也敲击一端，然后把这种石片本身作为工具使用。

⑤ 一般说来，这一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从我们纪元前20万年开始。

后消失。通常采用上述勒瓦卢瓦技术制成的下端有小刻面的燧石片来自一种特别处理过的石核，用这种石核制成预定形状的石片。在非洲某些地区，这种工艺程序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这表明当时它确实是极先进的技术思想的产物。

对苏丹南部运用勒瓦卢瓦燧石片技术的莫斯特文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研究，虽然它有可能产生在坦加西，而且可能以更高度发展的形式出现在阿布塔巴里和努里。另一方面，最近在苏丹北部的研究确定，将莫斯特文化分为截然不同的四类。（1）努比亚莫斯特文化：类似欧洲莫斯特文化，但并不完全相同。有少量勒瓦卢瓦燧石片存在；也有一些莫斯特型工具，很少修整，类似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可与阿舍利型的双面工具(约我们纪元前 45,000 年－33,000 年)相比。（2）齿形莫斯特文化：也只有少量勒瓦卢瓦燧石片，几乎没有什么石刀，而锯齿形工具却很丰富。（3）卢彭巴桑戈文化：勒瓦卢瓦石片有了增加，此外还有双面工具、侧面刮削器、凹形和齿形石器、压削燧石片，以及修薄的双面尖状器。（4）霍尔穆斯文化：其分布大体上是从杰迈起，远至栋古拉，并且拥有大量修整过的勒瓦卢瓦燧石片，有一些齿形工具，而刻刀比较少些。近来的研究认为，它的时间是我们纪元前约 25,000－16,000 年。但是最近对这种估测作了修正，将它的时间推前到我们纪元前 41,490－33,800 年。

与苏丹北部相比，在埃及努比亚地区搜集到的资料是不够全面的。桑福德和阿克尔所进行的早期研究工作证实，该地区占优势的是勒瓦卢瓦燧石片技术，有时表现为阿舍利传统。1962 年在阿菲耶和达乌德湾所进行的近期考察报道了这一情况。1962 至 1963 年，我们自己在阿马达发现，那是一种纯粹的勒瓦卢瓦型文化；在塞布阿于河，我们研究过一种工具，它与包括许多刻刀在内的非勒瓦卢瓦燧石片在一起，这无疑是属于该时期的最后阶段。

637

阿特利工业是马格里布和南撒哈拉的典型工业，是以一端明显狭小的燧石片和石叶修整的应用为标志的。它无疑始于莫斯特时期，在某些地区它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最近，在埃及努比亚地区阿布辛拜勒[⑥]西北的利比亚沙漠中，发现了这种文化，同它一起的有种类繁多的动物——白犀、大种牛、野驴、两种小羚羊、羚羊、狐狸、豺、疣猪、鸵鸟、一种绝迹的单峰驼和龟。在努比亚，阿特利工业似乎与阿马达工业混合在一起，而阿马达工业又是莫斯特－勒瓦卢瓦传统的混合体。在埃及，阿特利文化以纯粹的形式，产生于东部锡瓦、达赫拉和哈里杰诸绿洲；在东部沙漠的哈马马特干河发现了它。在尼罗河流域，它散存于底比斯和达拉（？）的一些小堆冲积物中。在后来的时期，它有可能影响到伊斯纳和底比斯的哈瓦拉文化。在开罗附近阿巴西亚和艾哈迈尔山的哈瓦拉文化中，它以细石器的形式出现、至少是从我们纪元前 44,000 年到我们纪元前 7,000 年)。

在埃及，尽管有许多中期石器时代的文物，但是对这一时期成套工具进行的彻底研究，远非臻于完善。对尼罗河流域的古老阶地和法尤姆进行的早期研究工作为这一时期存在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总的轮廓。然而我们自 1971 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在底比斯小丘上所获得的出土文物，使人们对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地质沉积物成层的发

⑥　这些发掘始于 1976 年，地点在比尔塔法维和比尔撒哈拉。

现，以及这一时期在年代上具有连续性的大约一百个层叠遗址，已使人们有可能勾画出这种工业发展的主要轮廓，它可能以勒瓦卢瓦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所有这些研究的主要方面都集中表明，曾经存在一个“阿舍利－勒瓦卢瓦文化”早期，后来是以众多的石核为标志的时期，这些石核逐渐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精致。在下一时期，层纹状石片⑦越来越多地显示出经过重复修饰的痕迹，正如其他各种工具一样，使人联想到莫斯特文化。尽管这些工业与非洲其他工业有共同特点，但我们还必须提到一种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而为埃及所特有的工业，这就是大量的所谓“苏汉山”工业，它因使用一种扁平石核而著称，这种石核是采用勒瓦卢瓦技术、沿两个平面敲打而成的，用过以后再对一端进行加工，成为凹形刮削器。关于这一时期的人类，我们于1952年在锡尔西拉山发现两块可能是这一时期⑧的头盖骨碎片。对它们的研究尚未完成，但是已经显示出一些古老的特征和另一些较近期的特征。对这方面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可能使人们对新石器时代中期非洲人类起源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有新的了解。迄今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是根据在昔兰尼加、摩洛哥和赞比亚的一些孤立发现面得来的。 638

晚期石器时代

在欧洲和非洲其他地区从上一时期向这一时期的过渡一般说来是以技术发展以及有时亦以人类发展的突然明显中断为标志的。但是尼罗河流域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因此，要在一个时期与另一时期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是很困难的，这使得确定年代序列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自上一时期起，由适应地方性生境而引起的演变产生了新的地区性种类，它适应地方条件，但有时是并行的。与此同时，环境的变化似乎已经改变了尼罗河流域居民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旧的联系中断了，新的联盟形成了。现在和新近查明的文化类型给人的印象是散乱无绪；但是在作出更详细的分析，使之有可能阐明它们的联系特点之前，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解释。这些意见同样适用于继之而来的时期即中石器时代。

在苏丹北部地区，对这一时期的情况刚刚进行了研究。它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业：一是地处瓦迪哈勒法附近的杰迈工业，以斜面刮削器、一头的刮削器、刻刀和锯齿形石器为特征，有燧石片，其中只有少数属勒瓦卢瓦型，还有略加修饰的尖状器（我们纪元前15,000年－13,000年）；一是塞比利亚工业，先前在埃及的考姆翁布已有报道，现在又出现于苏丹瓦迪哈勒法第一阶段。其经压削修整的燧石片，是从石盘或称勒瓦卢瓦石核敲击下来的（我们纪元前13,000年－9,000年）。

在埃及的努比亚地区，已知有两种工业：一是阿马达工业，是我们德国学院考察队1963年在阿马达发现的，有各种工具，主要是勒瓦卢瓦型工具，混杂有采用哈里杰技术（见下文）制成的擦洗－刮削器、锥子及其他工具，偶尔还可看到一些使人联想到阿舍利文

⑦ 从它一时期起，发现了两种石片技术：正统的勒瓦卢瓦石片技术和派生的制造较长石片的技术。这两种技术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形式。

⑧ 承蒙巴黎第四大学自然科学原人类古生物实验室的P.旺代马斯什（P. Vandermeersch）提供资料，他是负责研究这方面材料的。

化的石片修整技术的例证；塞比利亚文化，是我们（法国东方考古学会1964年考察队）在塞布阿几个地方考察确定的，它与普通石片或勒瓦卢瓦石片、少量刮削器以及许多刻刀混杂一起，也属于瓦迪哈勒法第一阶段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达乌德湾也可能存在。至于吉萨文化，早在1938年在开罗附近就已得到确证。它包括勒瓦卢瓦文化的一些内容。它那几何形燧石片被认为与霍尔穆斯文化类似。哈瓦拉文化（以前通称上勒瓦卢瓦文化）[⑨]分布的地区，至少是从上埃及的伊斯纳起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及其邻近地区（参看瓦迪图米拉特）。那是一种细石器文化。象塞比利亚文化一样，它显示了勒瓦卢瓦技术，而且包含不同阶段和式样，这些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哈瓦拉文化以许多有两端的石核为特征，这种石核可能来源于上述所谓"苏汉山"石核，始于中期石器时代。其中一些石核也许在时间上比较晚些，可以同时加工成石片和末端有小刻面的薄石片，这标志着向后部光滑的薄石片过渡。这种后部光滑的薄石片，在晚期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是占优势的。伊斯纳和底比斯的哈瓦拉文化被认为显示了阿特利文化的影响，因为偶尔有石叶修饰工具和混合工具的出现。另一方面，从开罗附近阿巴西亚和艾哈迈尔山的哈瓦拉文化中，发现了有梗柄的细石器，在类型上同阿特利型工具有联系。可以想象，这些影响可能是沙漠地区居民侵入尼罗河流域的结果。哈里杰文化（一些史前史学家对它的独立存在持异议）大约与哈瓦拉文化同时。它产生于哈里杰绿洲，在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以前，曾以勒瓦卢瓦哈里杰形式出现。哈里杰文化有勒瓦卢瓦石片，这些石片造工粗糙，看上去无一定形状；它也产生在埃及的库尔库尔绿洲以及加榛和底比斯。在伊斯纳（上埃及）和阿马达（埃及努比亚），它与其他工业联系在一起。

中石器时代

在尼罗河流域，这一时期一般说来同前一时期有所不同，因为（除重现、残存或仿制的情况外）细石器石刀和粗端有小刻面的薄石片的生产代替了燧石片的制造。在苏丹北部和埃及努比亚地区南部进行了研究，出土了一批石器，毫无疑问这种石器有时代表某一种文化的不同种类。

有人认为，瓦迪哈勒法（库萨干河）的哈勒法文化在埃及考姆翁布的北部也得到了证实；也许它是自前一时期的勒瓦卢瓦技术向使用燧石片或薄石片的细石器技术的一种不成熟的过渡阶段。它采用的所谓乌什塔塔修整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先进技术，这种技术后来同马格里布的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技术同时出现。哈勒法文化显示出相继使用有衬背的燧石片和薄石片、刮削器、刻刀以及齿形或扇形工具（我们纪元前约18,000－15,000年）。

巴拉纳文化是较近期在瓦迪哈勒法和巴拉纳发现的，它包括压削细石器、背面略加修整的其他工具、压削燧石片、刻刀、尖状器、单面或双面石核（我们纪元前14,000－12,000

⑨　最初认为，这一整个时期到处都是塞比利亚文化。研究表明，塞比利亚文化事实上只是考姆翁布地区的特点。后来证实，存在一种时期相同而类型不同的文化，于是称它为上勒瓦卢瓦文化。在同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探讨之后，作者不主张只凭其技术来命名一种文化，而主张以第一次的发现地点来命名。就这样，上勒瓦卢瓦文化改称哈瓦拉文化了。

年)。

卡迪文化来源于努比亚的阿卜卡和图什凯，包括先由细石器燧石片、后由薄石片制成的一整套工具，其中有刮削器、圆筒状容器、刻刀、压削工具和后来退化的尖状器。位于居住区以内或以外的椭圆形坟墓都有石板覆盖：它们揭示了这些居民与马格里布的克鲁马农人极其相似(我们纪元前约 12,000 - 5,000 年)。

在埃及，阿基文化是从瓦迪哈勒法附近仅有的一个遗址发现的，主要是一种燧石片文化。该文化包括带有端头刮削器、有衬背的以及采用乌什塔塔修整技术加工的薄石片、半圆形工具、扇形工具以及小碾槌(我们纪元前约 7400 年)。

卡卜文化发现于卡卜附近，分布在连续三个居住层中，其中获得的一件文物看来好象是一块磨光的方形骨制研色板(我们纪元前 5000 年)。

瓦迪哈勒法地区的沙马克文化有多面石核，在其最后阶段有几何形工具，同较为粗糙的工具混杂在一起。它可能是马格里布卡普萨文化的分支(我们纪元前约 5000 - 3270 年)。

在埃及，我们(以及我们以后的其他人)在考姆翁布附近的锡勒西拉山地区，研究了锡勒西拉文化。它包括三个阶段。锡勒西拉文化 I 有略加修整的薄石片，有时有柄脚；有不规则三角形工具，它们偶尔有柄脚；有微型刻刀、少量刻刀和刮削器；还有一些骨制工具。人类遗骸似乎属克鲁马农人类型(我们纪元前约 1,350 年)。锡勒西拉文化 II[19] 有石刀；有经过断续修整的薄石片，具有柄脚；有刻刀和刮削器，以及一些骨制工具（我们纪元前约 12,000 年)。仍在研究之中的锡勒西拉文化 III，展示出大量薄石片，往往未加修整，有烧火石以及一间圆形小屋，这是迄今在埃及发现的最早的小屋。

在伊斯纳地区经过研究的法库尔文化，似乎与伊比利亚 - 毛鲁西亚文化有些近似。在埃及其他地区也可能有这种文化(我们纪元前约 13,000 年)。这种文化是以精细修整的薄石片、锥子和投枪为特征的。

塞比利亚文化保留了勒瓦卢瓦燧石片技术，其特点是燧石片变为几何形状，而且底边是直的。它属于埃及南部文化，主要产生在考姆翁布和锡勒西拉地区和达劳，特别是第二阶段。在努比亚，已证明有这种文化，但是北部稀少得多(往往未定型)。在锡勒西拉，我们也获得一套骨制工具、磨石和小杵、以及尚在研究的人类遗骸(我们纪元前 11,000 年)。塞比利亚文化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物理 - 化学法测定的年代表明一个乍看起来与这种文化所产生的技术数据相矛盾的年代表。由于塞比利亚文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距卡库尔文化都不远，所以更加值得注意。

641

门奇文化(锡勒西拉地区)产生了与近东欧里纳克期文化近似的石制工具、骨制工具、小碾槌、刃口光亮的薄石片、个人饰物以及人类遗骸。与塞比利亚文化 I 的工具类似的某些新的中间型工具表明，这两种文化处于同一时代，而且相互关联。

拉凯特文化是我们在东部沙漠地区发现的，其独特处是有锋利的锯和带柄的投枪。

赫勒万文化是我们在开罗以南赫勒万附近查明的，它包括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有

---

[19] P.E.史密斯(P.E.Smith) (1966年 b)依照鳄鱼神的名字称这一阶段为塞贝克，因为该神同该地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从而我们建议称它为锡勒西拉文化(来自该地区锡勒西拉山) 第二阶段，因为这更符合按地名命名各种文化的习惯。

许多石刀和薄石片，往往依照乌什塔塔的技术风格略加修整。第二阶段的特色在于有不等边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石器、扇形石器和微型刻刀构成的细石器。第三阶段有扇形石器；而最后第四阶段则有一种新型的、底边为直线的扇形工具。

纳图夫文化是源于巴勒斯坦的一种工业，有人认为它曾多次进入埃及领土。在赫勒万发现了这种文化的一种，它以采用交叉修整法制成的有衬背工具为特征。另一方面，早在1876年曾在赫勒万发现底边呈匀称凹口的箭头，这种箭头起源于纳图夫文化。1936年我们自己在赫勒万发现了更多的标本，甚至最近，1953年，我们在东部沙漠的北部地区发现了一些这类箭头(我们纪元前约8,000－7,000年)。从那时以来，在巴勒斯坦的基亚姆和杰里科发现了这种箭头，在专家中间以"基亚姆尖状器"著称。关于纳图夫文化进入的假设，仍有待彻底核查。

新石器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本文要详细分析的这一漫长时期大约延续2,000年左右(我们纪元前约5,000-3,000年)。每种"文化"的实质或构成这种文化的"文化地域"将详尽地加以描述；而且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结论对正确评价其缓慢演化的自然条件是极其重要的。这种演化从游牧或半游牧群体开始，逐渐形成社会，即埃及这样高度集中化的社会或尼罗河流域苏丹那样的一些独立的小公国。关于新石器时代和前王朝时代这种社会的历史发展情况，本卷第二十八章有所论述。因此这两种论述可相互补充，因为它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各种问题。为了便于读者在第二十八章关于"文化地域"的历史发展总概述中找到本章所述的某种"文化"的参考材料，特在脚注中注明页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新时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尼罗河流域的人，一旦从游牧或半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便创造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文明的一些主要内容。定居的生活环境带来了陶器的使用、牲畜的驯化和饲养，带来了农业和许多工具，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苏丹⑪，喀土穆文化⑫也许是这一时期最早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十几个地方均有发现，分布于广大地区，从东部的卡萨拉起，横过400公里沙漠，到西部，北部远至栋古拉，南部几乎远至白尼罗河畔的阿布胡加尔。我们参加了喀土穆的挖掘工作，从这里出土的文物资料提供了定居生活条件的证据，即使用枝条搭成的小屋，大量使用精致的陶器和使用石磨。陶器主要是碗，其特点是刻有"波状线"和"虚线"的装饰。大量石器用石英石制成，以细石器和几何形石器最为突出。其中包括各种类型，如半圆形和扇形、不等边三角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四边形的石器，以及扇形燧石片和锥子。在刃口上也加以修整的半圆形和扇形石器表明，与威尔顿时期和津巴布韦海德拉克斯山的新石器时期的工具相类似。用一种称作火山岩的硬石制成的工具比石英制工具要大些；它们包括石片和粗陋的石刀，

⑪ 见后面第二十八章，第536－537页。

⑫ 见第二十八章，第536页的"早期喀土穆"。我们宁可使用"喀土穆文化"一词以防将来的发掘揭示出比这种文化更早的阶段。

其中一些有修琢得较小的后部(刮削器)，以及半圆形大石器和少数刮削器。带钩刺的骨制鱼叉，也是喀土穆文化的一个特点，其中许多都是单刃的。此外还有中央有杯状凹形小石杵、磨、砧石、中间有孔的石饼、少量的磨石、以及鱼网坠子，它们可能与法尤姆、欧迈尔(埃及)和撒哈拉中南部的工具同属一类。个人装饰品包括用鸵鸟蛋壳作成的扁圆珠子，还有少量耳坠；红黄色的赭石用于涂抹身体。死者以侧卧姿态安葬于各自的住所内；他们属于非洲最早的黑色人种。象马格里布的卡普萨人和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以及肯尼亚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的习俗一样，他们生前按习惯拔去一些牙齿而使牙齿残缺不全。这种做法在苏丹和非洲其他地区持续了很长时期。这一时期的动物，已确定的主要有水牛、羚羊、河马、野猫、豪猪、鼹鼠、鳄鱼以及大量鱼类。(我们纪元前约 4,000 年?)

沙海纳卜文化分布在第六瀑布以南的许多遗址中。在沙海纳卜发掘出一种文化的各种文物，它无疑来源于喀土穆文化，其特征是有一种特别陶器，以及凿子和磨光骨斧的应用。陶器主要是碗，有时象喀土穆文化型的碗一样时常有虚线装饰，所不同的是，这些碗表面光滑，使用了红色泥釉，并有黑边和三角形刻纹的装饰。成套的石制工具还包括细石器、磨光石斧、桶状刨以及平面和凸面的大锤。骨制鱼叉在继续使用，与此同时出现了珍珠母鱼钩，还出现了同天河石、红玉髓珠子以及嘴唇装饰物，这些东西至今还在使用。人们猎取水牛、羚羊、长颈鹿和疣猪，驯养矮小山羊。没有发现简便住所的痕迹，但是找到了深掘的炉床。沙海纳卜文化⑬与埃及法尤姆文化的一个阶段有共同特征，即使用磨制工具、凿子、鱼叉、大锤、天河石以及挖掘炉床。那些光滑而有黑边的上埃及陶器将沙海纳卜文化与前王朝初期联系起来。它与西撒哈拉(提贝斯提)的共同点是，有天河石、凿子、以及采取凹刻法装饰陶器；矮小山羊的驯养是它与西北部相同之处，目前卡达罗遗址只进行了一般发掘，它属于较后时期，有墓葬(我们纪元前 3,500-3,000 年)。在发掘中(1976-1977 年)的申迪地区卡达达遗址，发现了沙海纳卜文化的第三个变种，有与住宅区在一起的墓葬，其时间可能更晚些。它的显著特征似乎是有磨光石斧、由于磨损严重几乎成了扁菱形的化妆用研色板、尚不知用途的穿孔石饼、杯形容器以及小孩的瓮葬。

643

阿卜卡⑭文化分布于苏丹北部和南部，至少远至赛。它同喀土穆文化和沙海纳卜文化可能属同一时期，而且在时间上相衔接；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存在时间可能比沙海纳卜文化更长。第一阶段可能由卡迪文化发展而来，有小型陶器。另一阶段有各种罐，罐口是经过雕刻的，罐面以雕刻成文字形线条以及圆形或长方形的点绘图案装饰。第三阶段有石制工具，包括用燧石片作成的锥子，它们常常是两端作用相同；还有薄石片，其边缘或者粗糙，或者经过修整。此外这一阶段还有红色磨光面或起棱纹的黑边陶器，这多少使人想起沙海纳卜文化，努比亚 A 组文化以及埃及王朝前的文化(我们纪元前约 3380-2985 年)。

后沙马克文化，仅在两处遗址中有所发现，特点是拥有细小的尖状器、凹形薄石片、有侧面的燧石片以及磨制工具。这表明它与法尤姆和哈里杰绿洲是有接触的(约我们纪元前 3650-3670 年)。

---

⑬ 有时称作"喀土穆新石器时期"。

⑭ 见第二十八章，第 537 页阿卜卡文化。

埃及努比亚地区没有上述文化或年代相应的文化，这是由于环境条件的特殊关系、遗址的稀少，或纯粹由于勘查工作不全面。另一方面，埃及努比亚地区的文化，除某些特性外，显示了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化很相近，甚至似乎与拜达里文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644

纳加达文化I⑮主要产生于伊奈拜、塞布阿、奈拉勒和阿布达乌德湾(努比亚)。阿布达乌德湾是迄今发现的有生活区的唯一遗址，生活区内设有储存食物的处所。

纳加达文化II⑯产生于阿布辛拜勒附近，以及达乌德湾、塞布阿、巴罕和奥黑姆希特。从第一王朝起，埃及同努比亚的接触减少了。努比亚文化是在它原有的地域发展起来的，直到新王国时期一直保持着史前期的特征。它们被称为努比亚A组⑰、B组和C组。

在埃及，由于种种不同的地理和环境条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群。它们在埃及领土的南北两端平行发展，保持着各自文化的独立性，直至第一王朝时期埃及的统一。铜的使用是一个第二位的因素：南方使用铜比北方早得多，因为就近的小铜矿足以满足有限的需求。

南部文化群(上埃及)

南部文化群一开始就是作为先进文化群出现的。已在研究许多大墓地和少许住区遗址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描述。

塔萨文化产生于中埃及的塔萨、拜达里、穆斯塔吉达以及迈特迈尔，迄今只作过粗略的考查，一些史前史学家甚至对它仍有疑问。从其墓地和一些小村庄遗址来看，它显示了某些在其他地方尚不为人所知的新颖特征。陶器多为黑色碗，很少有红边或黑边，碗面有时有罗纹，其独特处是平直或倾斜的上部与狭小碗底之间呈倒尖角形。还有雕刻或点绘装饰的杯形容器，这是另一独特的类型，完全是非洲式的。石制工具包括硅酸化石灰石的特大磨光石斧、刮削器、石刀和锥子。长方形的化妆研色板主要用雪花石膏作成，戒指、象牙镯子和穿孔贝壳是与个人装饰有关的一系列物品。此外还有骨制汤匙和鱼钩。至于葬礼，坟墓是椭圆形的或长方形的，侧面往往有一壁龛似的地方，内放尸体，死者侧卧，手足蜷缩，头部向南，面部向西。死者陪葬物品有工具、罐子和个人装饰品。

645

拜达里文化⑱产生于拜达里、穆斯塔吉达、迈特迈尔和哈马米耶。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在中埃及。它的特色主要是十分精美的陶器，这些陶器主要是红色、棕色和灰色的各种彩色容器，红色的带黑边，容器上常常刻有精美线条，通常是斜线。容器以小平底或宽口碗为主，也有玄武石的碗和高脚杯，以及象牙容器。容器内侧常常刻有各种植物图案。成套的石制工具包括齿形刃口的凸圆形石核，后端空心或月桂叶形的箭头，以及其他薄石片工具。骨头或象牙的勺子、梳子、手镯、鱼钩以及小雕像等等显示出相当的艺术水平。女人与河马的雕像是举行仪式时用的。个人装饰品有镶在铸铜里的石英珠子、

⑮ 见第二十八章，第531-532页“前王朝古期”。

⑯ 见第二十八章，第532-533页“前王朝中期”。

⑰ 见第二十八章，第537-539页。

⑱ 见第二十八章，第531页“前王朝早期”。

海贝、以及用长方形石片制作的化妆用研色板，它的一端往往呈凹状。人们栽培小麦、大麦和亚麻，喂养牛和绵羊，而且猎捕小羚羊、鸵鸟和龟作食用。简陋的窝棚已完全消失。坟墓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偶尔也有长方形的，墓中死者呈弯曲姿态，一般是侧卧，头部向南，面部向西；给他们准备了上述各种器物，以便死后享用。在东部沙漠(哈马马特干河)、阿尔曼特(上埃及)、阿达伊迈地区(上埃及)，甚至在努比亚，都有可能发现这种文化的不同分支。

纳加达文化 I[19]，从地层学来说，是在哈马米耶和穆斯塔吉达的拜达里文化层之下发现的，该文化始于中埃及、努比亚，甚至东部沙漠。纳加达文化 I 与拜达里文化截然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表面光滑或磨光的红色、棕色或黑色的陶器。纳加达 I 的典型特征是对陶器的装饰：它不再采用雕刻方法，而是用白色在红色容器上描绘，描绘出几何图案、以植物为主题的图案和一些自然主义的作品。管形石罐常用玄武岩做成，有带孔的罐耳，底部经常呈圆锥形。两面加工的石器包括后部呈凹形的箭头，菱形或弯形的石刀，以及底部为 U 形分叉的石器、磨光石斧、薄石片工具、圆锥状和盘状的大锤头。化妆用研色板多用石板制成，先是菱形，后来制成各种动物形状。具有新风格的骨头和象牙器物，例如梳子和饰针，都用人和动物的小像加以装饰，这种器物用于迷信行为，但有时也作鱼叉用。在马哈斯纳发现的房屋，是用栅栏围起来的简陋棚子。铜的应用明显增多。粮食存放在地下储藏室里，但是在穆斯塔吉达和代尔迈迪奈，也贮存在容器里。至于丧葬习俗，死者被埋入长方形坟墓，侧卧蜷缩，头部向南，面部朝西；此外也有复合墓葬和肢解尸体墓葬的例子(我们纪元前约 4,000-3,500 年)。 646

在哈马米耶、穆斯塔吉达和阿尔曼特，从地层学来说，纳加达文化 II[20] 晚于纳加达文化 I。从法尤姆入口盖尔扎起，远至南部埃及努比亚地区都有发现。纳加达文化 I 的传统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口窄些，边宽些。用白色装饰的这种器皿为粉红色陶器所代替，上面有棕色装饰，其形式是具有某种风格的象征性图形——螺旋形图案、小船、各种植物以及手臂举起的人像。有波状耳的大肚容器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有陶器，这种波状耳后来变成管状，最后在进入早期历史时代就完全消失了。各种石制罐大都十分精致，许多是仿效粉红色陶制器皿的样式。许多石制工具都相当先进，其中包括一头是 V 形的分叉石刀以及有双刃的其他工具。双刃中，一面呈凹形，另一面为凸圆形，其中一面先加以磨光，然后修整得十分精巧。容器的波状耳上偶尔镶有金箔或象牙细片。大锤头呈梨形。铜制品技术比较先进，产品有各种尖状物、针和斧子。研色板日益具有独特风格，最终成为圆形或长方形。骨头和象牙的小雕像也变得别具一格。殡葬进一步讲究了：椭圆形或长方形坟墓的四壁上镶有木板，抹有泥浆或铺上砖头。最近我们(法国东方考古学会考察队，1974年)在阿达伊迈进行发掘，发现一种新型墓穴，形状象浴盆，时间为纳加达文化晚期。陪葬物品按这一时期的标准方式铺放，有时放在侧室。肢解尸体的墓葬也常有报道，但复合墓葬已不复存在，此外死者安放的方位不再统一。在阿姆拉发现的住所主要是用粘土造的圆形或部分圆形小屋，不坚固的窝棚以及长方形土垒结构(我们纪元前约 3,500-3,100 年)。

---

⑲ 见第二十八章，第 531-532 页"前王朝古期"。

⑳ 见第二十八章，第 532-533 页"前王朝中期"或盖尔泽文化。

北部文化群（下埃及）

北部文化群同南部文化群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居住区面积的增加、单彩绘陶器的出现以及为期不长的将死者埋入各自房屋内的做法等方面。

在法尤姆湖的北部一直在对仍然不大为人所知的法尤姆文化B[21]进行研究：它被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要不就属于陶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它包括无装饰的、背面经过修整的细石器石片、骨制鱼叉以及小杵。最近的研究证实，在法尤姆文化B最早期和法尤姆文化A较近期之间存在一个中间阶段，这一阶段有凿子和带长柄的两面加工箭头。这种箭头与来自西部沙漠(利比亚沙漠的锡瓦绿洲)的箭头相似，并成为法尤姆文化同撒哈拉的联系。我们建议称这一阶段为法尤姆文化C。它的时间为我们纪元前6500-5190年。

647

就居住区而论，对法尤姆文化A[22]的调查要充分得多。它有一种简陋的单色陶器，表面光滑或经过磨光，呈红色、棕色或黑色。这种陶器包括碗、高脚杯、茶杯、长方形桶以及有脚的或边缘有凸饰的容器，这些容器同拜达里型的容器类似。石制工具显示了两面加工的先进技术，它包括后部呈凹形或三角形的箭头、尖状器、装有直木柄的镰刀、磨光石斧以及一种盘状大锤头。还有骨针，锥钻和后部狭小的尖状器。粗糙的化妆用研色板用石灰石制成，用闪长岩作的很少。海贝壳、蛋壳片以及钾微斜长石(亚马孙石)均用来作成串珠。在人们居住的地方，窝棚的痕迹已不复存在，这些窝棚也许很不牢固。不过挖出的许多炉床与苏丹沙海纳卜的炉床十分相似。地窖是由埋在住所附近地下的成批篮子构成，用以贮存小麦、大麦、亚麻和其他物品。人们食用的动物有猪、山羊、牛、河马和龟。坟墓遗址尚未发现，它们和住区无疑有一段距离。这种文化(我们纪元前约4,441－3,860年)很可能与拜达里文化是同时代的。

美利得文化[23]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占有一大片居住区，其面积超过两公顷。这里的发掘物表明，存在着器物碎片的三个连续的古代沉积层均属于一种文化，它延续发展而贯串好几个时代。但是对该地区的发掘尚未完成，而且迄今只在初步的简短报告中发表了发掘情况。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是北部文化的典型。它的单色陶器包括各种不同类型，主要是碗、高脚杯、盘子和水罐，但没有带边的小口容器。这些陶器有的表面光滑，有的经过磨光，有的表面粗糙。特别样式的陶器有勺子，与拜达里文化的勺子相似；有凸饰的碗，与拜达里和法尤姆的碗类似；有带脚的罐，与法尤姆的罐子相象。这些罐子的边上有时点绘出齿形花纹，或者刻有垂直线，浮雕花纹或棕榈叶图形。少数罐子是用玄武岩或硬绿岩制作的，底部有纳加达Ⅰ类型的脚。两面加工的成套石器包括与法尤姆文化同类的石制工具。有一把梨形的大锤头；有雕刻过的骨头和象牙锥钻、针、锥子、鱼叉、刮勺和鱼钩。个人装饰品有发针、镯子、戒指、穿孔贝壳和各种不同材料的珠子。有两块化妆研

㉑ 见第二十八章，第528页新石器时代——法尤姆(B)。
㉒ 见第二十八章，第531页“前王朝早期”。
㉓ 见第二十八章，第531页。

色板值得一提：一块是板岩的，呈盾形，另一块是花岗岩的——这两种材料都来源于南方。早先的住所是不坚实的椭圆形小屋，用柱子支撑着，柱子间隔较大；后来是较坚实的小屋，支撑的柱子紧靠一起，间隔较小；最后是有墙壁的椭圆形小屋，墙壁用土块粘连砌成，这些房屋甚至排成街道。法尤姆型的地窖紧邻小屋，后来为埋入地下的瓮所代替。死者(但显然并非全体)被安葬在住所之间的椭圆形坟墓里，没有陪葬物，坟墓明显地朝向他们的房屋。家畜有猪、绵羊、山羊和狗；猎取的主要动物是河马、鳄鱼和龟，此外还捕鱼。这种文化是在我们纪元前 4,180 - 3,580 年间发展起来的，它与法尤姆文化可能同时期，并继续存在到纳加达 I 的初期。 648

北部文化群的另一种文化欧迈尔文化 A㉔是在一个大居住区遗址中发现的，这个居住区位于赫勒万附近通向霍夫干河的通道，长达四分之三公里。同这个史前期的村庄有联系的附属建筑物，屹立在一处悬崖顶端的台地上——这在埃及是绝无仅有的。这里的发掘是我们自己进行的，但尚未结束。从发掘物中发现了一种新型文化，正如美利得和法尤姆两处的文化一样，它不同于南部地区的文化。陶器质地精良，种类繁多，虽然是单彩绘，但是式样比上述两个遗址中的陶器更为精致美观。容器有 17 种样式——表面光滑的或磨光的、红色、棕色或黑色的——包括一些小口容器、卵圆形容器、高脚杯形容器、圆柱形容器、敞口或凹口形容器、圆锥形容器、以及一些瓮。同美利得和法尤姆陶器相似的只有凸饰的罐。方解石和玄武石的罐很少使用。燧石的两面加工技术与上述遗址的两面加工技术并非完全不同；但是石刀的制造技术却表现了在埃及说来是从未有过的某些特点。有刀脊的石刀尖端弯曲，后部呈W形，有一小柄；这些很可能是前一时期在此居住的“纳图夫”人的遗物。还有一种网坠，与喀土穆、法尤姆和撒哈拉中部偏北地区的网坠同类，那几个地区也存在丰富的燧石片工具。高超的骨制工业显示出正统的物品类型；然而鱼钩却是用角质物制成的。个人装饰物更是丰富多彩，包括来自红海的腹足纲软体动物壳，以及用鸵鸟蛋壳、骨、石以及鱼脊骨作成的珠子。耳坠是用穿孔的钱形化石贝做的。方铝矿和树脂是从外输入的。用以碾碎赭石的粗糙小石板是用石灰石和石英岩做成的。动物群包括牛类、山羊、羚羊、猪、河马、狗、鸵鸟、可食用的蜗牛、龟以及大量的鱼。栽培作物有小麦、大麦和亚麻。草木有小无花果树、枣椰树、柽树以及芦苇草。住房分两种类型：一些是卵圆形的，有柱子支撑的屋顶；另一些是圆形的，较大，部分埋入地下，其特征是到处都有谷物储存室。死者埋入村内，坟墓比在美利得的更为集中；一般来说，尸体安放的方位都一样，它们被放在陶瓮内，头向南，面朝西。有一具尸体手里拿着木制权杖(阿梅斯权杖)，其形状同北方法老时期以来的权杖一样，他可能是一位酋长。这一文化始于(?)我们纪元前约 3,300 年。 649

欧迈尔文化 B㉕似乎是在纳加达文化 I 初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是我们在纳加达遗址以东发现的，在丧葬习俗和工业方面都与纳加达文化不同。墓地同居住区完全分开，构成墓地的坟墓上堆以圆锥形石标。尸体的安放没有统一格式。居住区比欧迈尔文化 A 的小得多，但是我们的研究还远远未完成。陶器表现了某些共同特征，但与此同时，成套石器

㉔ 见第二十八章，第 532 页。

㉕ 也许应放在第二十八章，第 533 - 534 页的“前王朝晚期”(也称作晚期盖尔泽文化)之内，但时间仍未确定。

工具却截然不同。石器主要采用燧石片技术制造，包括小石刀，圆形扁平小刮削器和凿子形小砍砸器，关于欧迈尔文化A的时间，在我们的研究工作恢复之前，确实无法确定。

马阿迪文化㉘是在开罗附近一个大居住区发现的，这个居住区毗连着开罗附近马阿迪的两块大墓地，迄今为止尚未完全发掘。我们自己在开罗郊区赫利奥波利斯发现了第三块大墓地，并进行了发掘，也发现了这种文化。这是一种与任何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在年代上与欧迈尔文化并无直接继承关系，它代表北部文化群中一个次等的文化群。它的单色陶器大部分表面光洁，呈黑色或棕色，但是偶尔也有红色的，或者涂上一层白色泥釉的，但没有欧迈尔型的陶器精致。最普通的陶器类型是卵圆形的细长容器，有醒目的边缘，但也有圆颈小罐，罐面带有波状点线的装饰。比较具有特色的是有圆形底圈的罐，与玄武岩制造的这类石罐(此地也有发现)很相似。人们很少发现纳加达II用棕色装饰的陶器(可能是从南方输入的)。在纳加达II和巴勒斯坦发现的波状耳大肚子容器，这时也出现了。这很可能反映了尼罗河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不断的文化接触。而且玄武岩的管状罐还与上埃及纳加达I时期的同类物相似。精制而丰富的石片技术大量涌现，石片被加工成这种文化的典型工具。呈U形的分叉石刀较少，或许也是在纳加达I时期传入的。个人装饰物十分缺乏，尽管为数不多的石制菱形研色板也是在纳加达I时期传入的；其余研色板用石英制成，或者仅仅是扁平的燧石石核。

重要之点在于，在埃及北部前王朝文化中，马阿迪文化第一次使用铜，而且规模也很大(虽然上埃及使用铜较早，但是法尤姆人、美利得人和欧迈尔人对铜的使用却一无所知)。从拜达里时期，特别是从纳加达时期开始，尼罗河流域的人就在东部沙漠的南部地区开采近便的小矿床。铜制的别针、凿子、锥子、鱼钩以及斧子已被发现。与此同时，似乎还发现一些储存的铜矿矿石。在马阿迪，铜开始占据头等重要地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当时马阿迪人与西奈铜矿有联系：它与东部文化的几个共同特征证实了这一点（已经提到的马阿迪类型的陶器在巴勒斯坦也有发现，此外还有燧石工具和锰)。动物包括牛类、绵羊、山羊、猪、河马、龟和鱼；植物有小麦、大麦、蓖麻和苇草。在居住区内发现了许多打入地下的桩子，这可能表明椭圆形小屋的存在和粗陋棚屋的痕迹。还发现了更为先进的长方形小屋，象马哈斯纳的小屋一样，是砖头建造的，还有地下室，沿阶梯而下，便可进入。埋入土中的瓮用来作地下粮仓，圆形洞是食物储存室，象纳加达的食物储存室一样，里面往往有许多罐。同村子分开的墓地里，有圆形或椭圆形坟墓，从未发现方形墓。死者在墓中蜷缩侧卧，最常见的方位是头向南、脸朝东，常有各种容器陪葬。小羚羊常常同许多容器一起，也被埋入坟地，据推测，这种小羚羊是作祭祀用的。在赫利奥波利斯的大坟地边缘，我们发掘了许多狗，是任意排列的，没有陪葬的其他物品。据猜测，这些狗的作用与活狗一样，是作为看门用的。

马阿迪文化的产生并非紧接着欧迈尔文化：它出现在纳加达文化I结束之时，并一直发展到上埃及纳加达文化II终结之时。

㉘ 也许属于，至少部分属于"前王朝晚期文化"或"晚期盖尔泽文化"(见第二十八章，第533－534页)；但它也可能与前王朝中期文化或盖尔泽文化属同一时代(见第二十八章，第532－533页)。

法老时期石器的继续使用

在略述埃及前王朝时期各种文化趋势之后，现在让我们扼要地叙述其主要特征，尽量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并说明它们在法老时期又如何趋于一致。

从法老时期至第一王朝的创建者、传统中的美尼斯统一南北两个埃及，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以看得见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的，这些材料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史前期极远的年代。最近的出土文物现在被认为证实了这方面的传说是真实的，证明埃及南北的区分早在所谓"新石器"阶段就已存在。这种区分不只是地理方面的，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确实，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促使产生了两个独立的主要文化群，其根源是不同的地理和环境条件。南部的文化沿着为不毛的悬崖峭壁所包围的尼罗河走廊发展；北部的文化则在肥沃而又广阔的三角洲大扇形地带形成。北部有若干种文化，这些文化在大的方面相似，而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它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继承关系。南部的文化具有共同的背景，但是它表现出的差异却比北部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显著得多。这些差异产生了两个主要文化群的特点，后来这两个文化群结合形成了大埃及文化。因此，北方在城市发展方面，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就显示了突出的成就。在法尤姆，我们发现了一些小村庄，彼此十分靠近。在美利得，一个大的村庄占地将近 2.25 公顷，包括成排的房屋。欧迈尔伸展达四分之三公里以上，马阿迪长达 1.6 公里。另一方面，由于南方遗址数目显然不多，残存的居住区遗址非常稀少。 651

关于埃及这一时期人类生活方式和成就的其他证据也表明，在北方，陶器——无论棕色、黑色或白色——尽管在样式上有所改进，但仍然全是单色绘，几乎完全没有装饰。另一方面，在南方，陶器的显著特点是样式繁多，装饰精美，当然还有著名的黑边器皿。北方的陶器虽然低劣一点，但是燧石工业的情况并非如此，它在技巧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进步——这并不是说南方的某些工艺品没有达到高水平。在纯艺术领域里，与南方开放着的伟大艺术之花相比，北方是非常贫乏的。这一点，从拜达里文化起，在杰出的骨雕、象牙和陶质的雕像方面，以及在日常用品如梳子、勺、耳坠和碾磨化妆品的美丽研色板等方面，在雕刻的绿色片岩护符方面，就可以看出。

因此，我们认为埃及南北两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可以说，北部在经济和城市发展方面较为先进，与此同时，南部在艺术技巧方面达到了极为先进的水平，它预示着法老时期艺术的繁荣。据推测，法老埃及的伟大可能正是由于统一了这两种互有区别而又互为补充的文化。

历史时期的到来使人类有了书写文字，埃及统一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下，金属技术方面有了发展，但这并未改变尼罗河流域居民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我们要特别提到燧石的不断应用。燧石是该地区蕴藏量丰富的一种高效能物质，它的使用延续到整个法老时期。诚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王朝时期，燧石加工技术实际上已达到顶峰，在上埃及的阿拜多斯，以及开罗附近的赛加赖和赫勒万的王室墓穴中发现的十分精致的所谓"祭祀"刀就是证明，因为其工艺之高超，制品之规模，都是惊人的。在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里，还发掘出全套 652

燧石家庭用具，铜器只是在上埃及的耶拉孔波利斯和卡卜以及东部沙漠的哈马马特干河才有极少发现。最近我们发掘了在凯尔奈克的古底比斯中王国遗址，从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燧石工具；在制造技术或种类方面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使用的燧石工具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有许多刻刀和一些细石器。特别是1971年以来，我们在卢克索的底比斯小丘上进行了系统发掘，发现了 200 个燧石器制造场，其中一半以上完全不是史前时期的，而是产生于新王国时期。这些制造场以大量燧石工具供应首都，这些工具的生产技术比中王国时期还要粗糙；产品几乎全是刀身和晚期仍继续使用的镰刀头。

在法老时期，燧石不只是用作家用工具。在哈马马特干河，新月形燧石被用于片岩手镯的钻孔，这种手镯是一种装饰品，从早期历史时期一直使用到古代时期结束。在第三王朝末期，新月形燧石被用来劈开大块石料，以便用来建造在赛加赖的法老左塞的梯形金字塔。在法尤姆紧靠方解石矿层的石器工场里，新月形燧石器被用来把软石挖空制成容器，这种办法一直沿用至旧王国时期。从最早的王朝开始，直至新王国时期结束，埃及射手们的箭都用燧石作箭头。法老图坦卡蒙（第二十八王朝）的箭头是用玻璃制成的，具有燧石效能的玻璃，是一种难得的昂贵原料。

在法老时期的埃及，为了满足特殊需要，还使用一些比燧石脆弱一些的矿物制造工具。矿山和采石场用的鹤嘴锄和锤子，有装柄的颈部，在旧王国时期是用硬石制作的，但是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则用硅酸化石灰石来制作，而且更为粗糙。开罗附近吉萨的旧王国地下墓室，中埃及的中王国地下墓室，以及底比斯小丘上的新王国地下墓室，都是用这些粗糙的石制工具挖掘和建造的。

目前埃及努比亚和苏丹努比亚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了，到抢救工作结束时，考古研究未有很大进展，这就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关于这些地区过去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在各个历史时期使用石器的资料。但是，从塞布阿一个属努比亚 C 组的村庄（中王国）挽救出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鉴定各种各样的燧石刀、薄石片和镰刀头。镰刀头在各方面都与最近在凯尔奈克发现的同时期的镰刀头相同，正如上文所述，这些石器无疑是从埃及输入的。此外，在阿马达另一个 C 组村庄里，发现了石器时代延续到金属时代的进一步证据，这个村庄也位于埃及努比亚，是我们不久前发掘的。正如在塞布阿一样，那里有燧石刀、薄石片和埃及出产的镰刀头，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阿马达遗址发现了本地产的小玛瑙箭头、横向光玉髓箭头和磨光硬石斧，它们与这类输入的石器紧靠在一起。

653

关于苏丹努比亚，正如预期的那样，在米尔吉萨的埃及堡垒中发掘了各种武器。它们产生于第二十八王朝，包括正统类型即上述装有石制箭头类型的箭。但是有所改进的是，矛头不象当时法老时期埃及的那种金属矛头，而是燧石矛头，这是采用与新石器时期相似的精湛的两面修整技术制成的。之所以重新采用这种技术，主要是打算尽可能准确地做出金属矛头的式样；重新采用这种已被遗忘数千年的制造方法，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在这种偏僻地区得到金属或现成的矛是相当困难的。

结 论

因此，尽管对最早生活于尼罗河流域的居民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但仍需概括一下，把已获得的可靠材料集中起来，并指出仍然有待填补的许多空缺。

关于最遥远的时期，新近的发现证明，已知的最原始人类奥杜瓦伊人，不仅存在于南非和东非，而且存在于尼罗河流域北部。这一点，我们是从大量的石器考证出来的，但是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以便充实古生物学的证据，这方面迄今只有一颗人类牙齿作代表。在苏丹地区需要进行有关这一时期的类似考察，因为这是与埃塞俄比亚进行联系的地点，而在埃塞俄比亚，有关这一时期的发现是相当丰富的。

早期石器时代成套石器的分类几乎只在瓦迪哈勒法地区才作过彻底研究。底比斯地区提供了关于最早一个阶段的资料。但是仍存在多方面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这一时期的人种问题。

再看中期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的痕迹沿整个尼罗河流域比比皆是。再者，瓦迪哈勒法地区的考察工作已有进展，这使我们得到更多关于这一特定地区石器形态的知识。对在底比斯小丘上获得的大量出土文物仍在进行研究，这将有可能与南部的资料进行有价值的比较。那块后枕骨碎片仍然是迄今出土的唯一人类遗骸。在瓦迪哈勒法西北的利比亚沙漠中，第一次发现一整套石器与动物遗骸混在一起。为了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苏丹的大片地区仍然有待勘查。

根据最新报道，与此同时代的阿特利工业在阿布辛拜勒西北的沙漠地区几乎也有发现。这种来自北非西部的、与动物骨骼相关的工业很晚才传入这一地区。弄清它在时间上与埃及其他发现的对比关系，以及它是否影响埃及石器工业的类型，是很有意义的。 654

关于晚期石器时代，仅从很有限的地区所发现的文物就得到了大量新资料。但是也许由于缺乏地层学证据而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有时凭借一些极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和物理-化学试验，来杜撰新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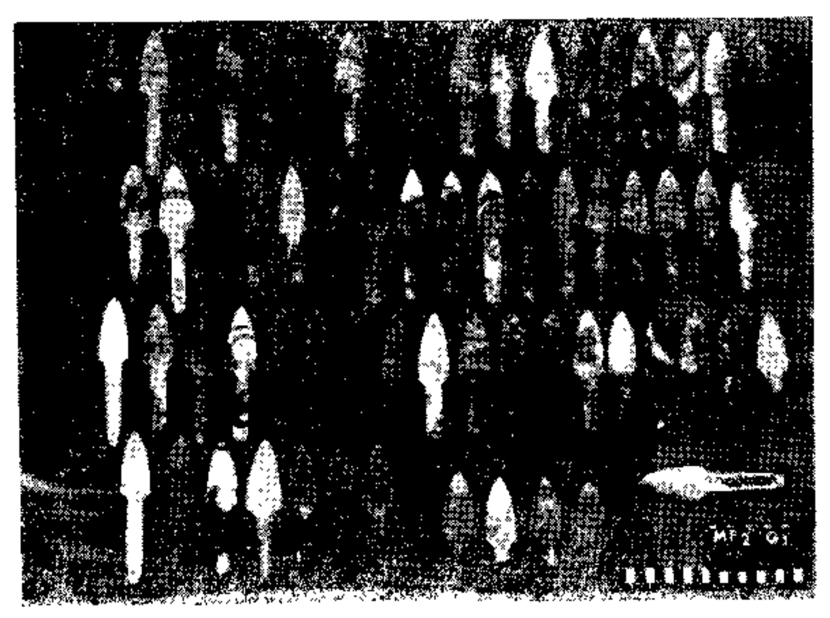
对尼罗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该术语在埃及毫无确切含义)和前王朝时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从埃及南部文化群的遗址已得到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墓地。对居住区尚需进行更广泛的研究，这将在住所、家庭日用陶器和石器方面获得更充分的资料。

埃及北部的遗址由于分布的面积极广而未能彻底挖掘，因此只有从部分报告中获得某些资料。尽管如此，作为对住区和墓地两方面进行研究的结果，它所提供的资料比同时期的南部遗址所提供的还充足得多。因此为了使现有的材料补充完整，看来必须恢复对埃及北部的考察，由于各种原因，那里的考察工作已中断了多年。

关于苏丹努比亚，对属于该时期的几种文化已进行了艰苦而周密的研究，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显然是喀土穆文化和沙海纳卜文化。但是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因为许多遗址的地点显然与这些文化或它的不同阶段有关，正等待着发掘者的注意。当然，这种调查的目的是把法老时期以前的非洲历史各阶段有机地衔接起来。

（罗建国译）

655



照片25.1 燧石标枪头，发现于苏丹的米尔吉萨；F.韦库泰领导的探险队（法国赴苏丹考古队）



照片25.2 王后河谷（J.德维斯）

26 非洲史前艺术

656

J. 基-泽博

引　言

人类一出现就有了工具，但也有了艺术。人工制品(Homo faber)和手工艺(Homo artifex)这些词都可用于非洲史前史。

几千年来，非洲大陆的史前遗物一直受到人和自然力量的毁坏。甚至在史前时代，人类有时通过推翻传统习俗进行破坏活动。今天，外国军队、殖民者、旅游者、石油企业家和当地居民仍然在进行破坏和“露骨的掠夺”。L.巴卢在“沙漠前的撒哈拉”展览会简介那本小册子的序言中曾谈到这种情况。①

大体说来，史前艺术主要是在非洲高原和高地发现的。赤道地带的山脉、洼地，江河流域和森林低地，在这方面发现的东西要少得多。

在发现这种艺术最多的地区，遗址多半座落在高地边缘的悬崖上，特别是濒临现存河道或古代水道的河谷线的悬崖石壁上。最重要的两个地区是撒哈拉和南部非洲。在北抵阿特拉斯山脉、东至红海、南接热带森林、西临大西洋的这一广阔地域，已经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遗址，包括几万件或几十万件雕刻和绘画作品。由于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以及日益增多的非洲的史前学者的工作，有些雕刻和绘画已闻名全世界。发现这些实物的地区有：阿尔及利亚的南奥兰和阿杰尔高原(例如贾巴伦、塞法尔、提苏凯和贾内特)，摩洛哥南部，费赞(利比亚)，阿伊尔和泰内雷(尼日尔)，提贝斯提(乍得)，努比亚，埃塞俄比亚的高地以及达尔提希特(毛里塔尼亚)。另一主要地区是非洲南部的尖角部分，以印度洋和大西洋为界，包括莱索托、博茨瓦纳、马拉维、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南非共和国，而在奥兰治自由邦、瓦尔河流域和德兰士瓦发现的特别多。在那里，绘画是在岩石隐蔽所的石壁上，雕刻则在暴露的岩石上。开普省坎戈石窟那样的洞穴是罕见的。差不多在所有非洲国家都发现了艺术遗迹(有些可能并不是史前的)，但调查工作却远未完成。

657

至于为什么沙漠地带和大草原会有这种发现，一个原因是，当时这些地方并不是沙漠

① H.洛特(H. Lhote)说，1954年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曾给哈吉拉马希塞拉的壮观大象的画脚涂上一层油彩，以拍摄更好的照片。另外一些军队用机枪扫射附近加雷特埃特－塔列布的巨大蝎子浮雕壁画，打得满是窟窿。在贝尼乌尼夫，雕刻的墙帽石被拿下来当建筑材料用，等等，见H.洛特著作，1976年。但是，甚至某些学者也是应受责备的。埃米尔·霍勒布(Emil Holub)在十九世纪末把许多艺术品凿下来，运到维也纳。

和草原。在变成沙漠和草原之后，再加上空气干燥，有助于保存物品，并使之成为天然博物馆。例如，在撒哈拉发现的艺术品完好无缺地埋存了数千年。至于为什么发生在高地河谷的边缘，原因是，那里是最好的居住地，最易于防御，距水源和猎物较近。例如塔西利，沙石岩覆盖着阿哈加尔山脉的结晶状岩心，向南有500米高的峭壁，寒热的交替（这在地平面上最明显），加上坡面受雨水和融雪的冲刷，侵蚀岩石的基底，形成了巨大的悬岩和隐蔽所，高于河流谷底线之上。最动人的实例之一是廷塔扎里夫特的岩壁隐蔽所。在其他地方，沙板岩被风力蚀刻和磨擦，形成天然长廊，给人们提供了现成的住所。这就是真实而生动地体现在非洲岩石艺术杰作中的环境。

年代和发展

确定年代的方法和问题

在这里，把地层学的方法运用于自然岩石往往是无效的，因为长期潮湿的史前气候，使隐蔽所的地面经受了很深的地层滤淋。然而，在南部非洲浮雕有时出现在绘画的下面。人们可从有机物着色体的碎屑中获得考证的线索，这些碎屑从岩壁上落下，进入一个没有被翻动的地层中，但是，这些地层有的已被翻动过（有时是故意进行的干扰），这就使得甚至确定其相对年代也成了非常麻烦的事。

有时，我们对绘画色泽的变化和画底岩石颜色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是得体的，因为它重视研究的材料本身，是以这种推断为根据的：年代最晚的颜色最鲜明，而且最明显地有别于自然岩石的色泽。古色的形成事实上是在包括白沙岩在内的所有岩石上逐渐演变的。它类似红土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雨水和湿气形成的溶液中所渗入的氧化物和碳酸盐，通过毛细管作用，被带到表面，然后由于蒸发的结果，结成一层硬皮，随着年代加深而越来越黑。因此，拿它同自然岩石相比，从理论上说可以为确定相对年代提供一个根据，但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很多的。一切都视岩石的硬度而定，视岩石是否遭受风吹日晒等侵蚀而定。这种确定年代的方法充其量只能产生相对的成效。②

有时，可从图画上所描绘的动物群去推测一幅画的年代，因为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可能存在着所有种类的动物。例如，非洲大野牛就是非常早的一种动物，现在已经绝种了，人们只能从它的化石遗体有所了解。然而，这些动物很可能被很好地描绘下来，成为往年给我们留存的标记。我们将会看到，风格也不是一个可靠的依据——远非如此。诚然，在开始时，观察似乎最为重要，而结果却是一个独特的半自然主义的方法。另外，在撒哈拉的大野牛雕刻一般早于绘画。埋存的人工制品具有同绘画上一样的装饰，通常与它们是同时代的，但是，对此却绝对没有一条普遍的规律。人们有时采用的另一方法是根据涂盖层确定相对年代，湮没其他线条的线条在时间上就是最晚的。可是，涂盖层绝不是到处都可

② 雕刻槽纹的形状天长日久是会变样的，由于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的结果，从原来的V形变为大开口的V形，随后变平，但这些改变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年代。

找到的，而且岩石的风化和颜色的褪淡往往使得作出的解释会有风险，相互矛盾。③

还有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法，但由于上述原因，很少能够使用。人们还必须特别谨慎，因为颜色碎屑可能同晚近的有机物接触，或者某一炭屑可能是雷电引起着火形成的。然而，这种确定年代的应用实例在逐渐增多。作为例子，从撒哈拉中部曼耶特(穆维迪尔)的一个深地层发现的木炭被估测为距今5,410±300年前。

政治也可能与确定年代有关。例如，生于南非的欧洲观察家非常不愿意接受非洲本地艺术文化的那个伟大时代，想通过时间重叠或机械地运用对欧洲岩画的估测法去缩短它的发展历程。因此，他们认为德拉肯斯(山脉)的绘画晚于十七世纪，即在班图人来到很久之后。现在纵然我们不考虑这个地区某些南非岩石艺术描绘了年代更早的动物群，但桑人似乎不大可能会等到他们同班图人进行战争时才发展一种艺术形式，因为这种艺术形式至少需要最低限度的安定局面才能发展起来。 659

时 期

如果我们要对史前艺术发现物编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年代表，我们第一步必须从地质和生态着手，因为古人没有我们的技术条件，当时环境给他们造成的困难要比今天大，而且生态和地质两者都可以规定人们总的生存方式。特别是群落生境制约了当地生存的物种的生活，包括人本身的生活、他的技术和风格。尽管象J. 吕菲耶所说的，“人最初是一种热带动物”，产生于非洲，但在冰河时代结束后，北部的温和条件使欧洲的拓殖能够发生，最终导致40个世纪前地下画廊那种岩石艺术的繁荣灿烂。非洲岩石艺术要晚得多。诚然，一些学者如E. 霍尔姆等人认为，这种艺术最远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但实际上它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④

已经成为习惯的是，以某种动物的名字称呼岩石艺术的主要时期，即以该时期的主要动物类型作为参考依据。因此，四个主要系列被命名为大野牛期，公牛期，马期和骆驼期.

大野牛(古生野牛)是一种巨大水牛，根据古生物学家考证，始于第四纪初。从岩石艺术开始(大约在9,000年前)就描绘了它，直到6,000年前左右。这个时期还以大象和犀牛为

---

③ J.D. 拉约(J.D. Lajoux)在1977年把最新摄影技术应用于因阿胡安加特(塔西利)的绘画上。红色的人像好象是涂在一个绿褐色带面纱的妇女之上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那个妇女的白色装饰物实际上是后来加在红色人像上的。澳大利亚的岩石画一般地都重绘，使其显得新鲜，土著居民同时讲述祈雨的传说故事。弗罗贝尼乌斯(L. Frobenius)观察到塞内加尔一些年轻人也这样做。

④ 撒哈拉新石器时代，根据新近的发现物正一步一步地向后推移，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保藏处经过放射性碳确定为8,450年前，因而实际上同近东的新石器时代同时。可参看第十一章中D.奥尔德罗格(D.Olderogge)为努比亚的巴拉纳(12,050年前)和图什凯(12,550年前)的遗址所推测的年代。在有牛的绘画的因-伊提缴的一个岩石隐蔽所已经发现食物碎屑 最早的炉床经放射性碳测定为4,860±250年前的物品。在阿卡科斯丛山(利比亚)中，F. 莫里(F. Mori)在两个地层之间发现了一块掉落的炉壁上有绘画，这种画最早是从公牛期开始。对这两个地层一直在进行年代测定，证明这块炉壁可追溯至4,730年前，参看H. J. 于戈(H.J. Hugot)，1971年著作，第274页。J.D. 克拉克(J.D. Clark)同样报道了索卢韦齐(赞比亚)的6,310±250年前年代。另一方面，J.T. 洛乌(J. T. Louw)的论文确定马茨隐蔽所(开普省)的年代为11,250±400年前，被认为根据不足 在廷哈纳卡滕的异常遗址，有一些壁画，可以认为同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作和更晚的、包含有头盖骨的地层有关，而这些地层的年代是容易确定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个阿特利时期地面(见“塔西利的特殊发现”，载《考古学》第94期，1976年5月，第28和59页)。

660 特点。公牛有两种：一种是 Bos ibericus（或短角类）长着短而坚实的角；另一种是 Bos africanus，长着一对竖琴状的角。它的出现在大约 6,000 年前。

马（Equus caballus），有时拉战车，它的出现大约在 6,000 年前⑤。那种"飞奔"的步态，不是写实主义的，但奔驰在从摩洛哥到苏丹的西边小道的马却是自然主义的，而在从费赞东来的"大路"上⑥，它却是高度风格化的。现在，我们已进入有史时期，这时，河马从岩石绘画上消失，这无疑标志着常年大水的结束。骆驼在历史上是最后出现的。大约我们纪元前 500 年由于波斯人的征服埃及而把它传入非洲，大约公元开始时，已普遍存在⑦。

关于史前史，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前两个时期和马期的开始阶段，因为它们包括这个广大的、后来变成撒哈拉沙漠的地区人类活动最繁荣的时期。注重年代分期的学者在确定主要时期中某些阶段方面有争论，但是，仍在不断有所发现，我们不应太急于对毕竟还不清楚的各个历史时期硬贴上标签。可以说，这只是绘画中没有清楚确定的动物朝代，因为有很多重叠。例如公羊，在分类上晚于大野牛和大象，但有时却好象和它们同时代。这表现在同样的岩壁上，用同样的技巧描绘并显示同样的古色。也许，它还没有驯化，或者为了宗教的目的被拴着。同样，在塔西利的迪德尔的雕刻大牛（其中之一高 5 米多，有竖琴式的犄角，体现一种象征），看起来同大野牛同时代。一些学者把在杰拉特干河的带有垂环的这种牛列入大野牛期。此外，新的动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如坦-泰里特的猫头鹰，约有 40 个同牛的画像同时出现。

撒哈拉以外的地区，几个主要时期往往要晚一些。它们用不同的标准来确定，这些标准因著作家不同而不同，特别是有的著作家是根据技巧、体裁和风格划分时期的⑧。

661

技巧、类型和风格

技 巧

刻 画

总的来说，在刻画和绘画两者都存在的地方，刻画要早于绘画，而且最好的刻画技巧是最早的时期中发现的。刻画作于较软的沙岩上，也作于花岗岩和石英岩上，用新石器时期的锤石敲打尖石进行镌刻，这种工具样本已在刻画作品附近找到。尽管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工具，但技巧的精细却是出色的。在巴尔达伊（乍得）刻画的大象是运用浅的单线条勾勒的，它不过是一幅速写，但表达出神形实质。另一方面，因加勒杰恩（马坦杜斯）和因哈贝特 II 刻画的大象，却是运用生动的粗线条深刻出来的，在戈诺阿（提贝斯提）刻画的犀牛

⑤ 人们经常把马传入非洲同喜克索人来到埃及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见 J. 基-泽博（J. Ki-Zerbo），1978 年，第 99 页。

⑥ 关于"马车道"，见 R. 莫尼（R. Mauny），1961 年。

⑦ 骆驼从法老时期以来似乎已为人所知。参看 E. 德蒙若（E. Demougeot），1960 年，第 209-247 页。

⑧ 在南部非洲，一些学者根据雕刻槽纹的形状、操作技巧（切割、锤打是否明显、磨光等等）以及描绘的某个时代的动物来划分两个时期，第一个主要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二个主要时期包括四个阶段。

也是这样。刻纹凹槽或是V形，或是U形，深度约1厘米。凹槽不是用石斧就是用极坚硬的木片刻成，潮湿的沙子可能用作摩擦工具。有时还把技术同例如灵巧地运用锤子和V形的雕切结合起来。预备草图的记号小眼在刻纹底部到处留下粗糙的痕迹。最后的琢磨是通过轻轻锤敲完成的。这些刻画的制作有时必然要求独特的、动作敏捷的才能。例如，在杰拉特干河有一个刻画的大象高4.5米，一头犀牛长达7.5米。

在非洲中部和南部，宽雕刻线条的刻画，被认为同宗教的目的有关，而精细镌刻的刻画可能表示一种开导或教导的目的。精细的效果是通过挖空和高度磨光线条之间的某些表面从而表现出动物的皮毛或负载物的阴暗部分而获得的。这种技巧预示了将要出现法老埃及的浅浮雕。实际上，形象有时完全用凹雕手法刻成，如宝石浮雕。天然岩石利用得非常恰当。举例来说，一只长颈鹿是刻在一块长方形辉绿岩上的，它的形状正好适合(西德兰士瓦)。同样，在利乌方丹地区，一头犀牛是刻在一块表面粗糙、带有棱角脊背的岩石上，正好形成这个动物的背脊。在马雷奇斯方丹山(西德兰士瓦)，一头斑驴由交错使用线刻和点刻法刻在一块辉绿岩上。它的下巴刚好是这块岩石上的稍稍凸出的部分，形象栩栩如生。德兰士瓦博物馆有一幅出色的雄羚羊刻画像，它的长毛用点条纹描绘，它的前额簇毛则巧妙地用刻线表现。岩石的内部色彩(蓝色)和它的表面(红赭色)用来形成对比，精美绝伦。另一个史前非洲石刻杰作是布拉卡的一组长颈鹿，它们的斑点皮毛、腿部甚至摇动的尾巴，都表现得活灵活现。然而，总的来说，技巧都趋向退化。到了所谓公牛期，刻画有时已经变得平庸无奇，比如，格雷里巴特的长颈鹿，就是用粗笨的点刻法弄成的。 662

绘 画

绘画不应脱离刻画孤立看待。例如，在提苏凯，留在岩壁上的草图，说明艺术家先刻画，后涂绘。此外，艺术作品有时还需要敏捷的才能技艺。在杰拉特干河，有一幅马期的绘画，长8.5米，画在一个陡峭的倾斜顶壁上，而在塔西利的一些遗址，如提苏凯，绘画差不多从离地面4米的地方开始，似乎要避开人们能及的高度。这就必须利用粗制的梯子，甚至脚手架。绘画有的是单色，有的是多色。⑨在较低的迈图泰克，采用紫色高岭土，而在布拉卡河南面的隐蔽所，采用红赭石，颇象血色。在其它地方，可以看到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深浅色彩的巧妙搭配，表现出现实的外貌，布局谐调。这就需要一种相当复杂的调配技术，而这种制作的痕迹已经找到。例如，在因伊提嫩，已发掘出把石子磨成粉的小扁磨石和小磨盘，还有盛颜色的小碗。那些颜料非常经久，直到今天还保持一种惊人的新鲜感。比较多的色彩是以一定的基色为主的，比如红色和褐色，来自氧化铁赭石；白色来自高岭土、动物粪、植物乳汁或氧化锌；黑色取自木炭、焙烧的骨粉，或取自烟墨。还有黄的、绿的、紫的和其他颜色。这些配料用杵臼研成细粉，混在一起，然后用液体，也许是牛奶、酪蛋白、油汁，或蛋清、蜂蜜或熬的骨胶调和，其中酪蛋白是最佳粘合剂。这就是几千年后色泽依然鲜明的缘故。着色用手指、羽毛、干草或木调刀，或用皮筋把动物毛固定在杆子上作成刷子。此外，也用人嘴喷射颜色。这最后一道工序，使技巧的轮廓仍

⑨ 在南部非洲，单色绘画主要是在德兰士瓦和纳米比亚发现的，而在博茨瓦纳、格里夸兰和纳塔尔，绘画倾向于多色。

然可以在岩石表面看到，这也是这些杰作上的证明标记。有时在修改后没有擦去原先的线条。于是，牛有四只角，人有三条臂，等等。此外，岩石的自然特征也非常巧妙地加以利用，例如在提希拉希，岩石上的一个罅隙成为画中兽群正要喝水的水坑。⑩

663 **珠宝饰物**

珠宝饰物的艺术要求同等先进的技术，事实上，情况是相反的。有些珠子是用光玉髓这种特别坚硬的石头加工的。宝石匠人运用的技术，可从研究不同工作阶段留下的碎石想象出来。首先，扁平圆片是锉出来的，接着加以打磨。然后从一个坚硬的岩心凿出一个大的针状物，断面为方形，可作为雕刻工具。它的尖头先后打入圆片两面的中心，背对背的钻孔。最细致的工作是使两面孔眼吻合。坚石的尖头起着麻花钻的作用，利用某些掺和树脂的细沙，直接钻出中心孔眼。其他一些同样坚硬的石头，如铜绿长石、赤铁矿石和玉髓石，也加以利用，骨头和象牙也是这样，用以做耳环、手镯和脚镯，并用浮石磨光。在廷哈纳卡滕，已在鸵鸟蛋壳做的珠串物中间发现小的闪长岩钻锥。

陶 器

做陶器的泥是以牛粪制作的粘合剂制备的。陶罐用旋绕法制造，即用长泥绳旋绕，同时用手指和棍子把它弄光滑。颈口的形状各式各样：螺旋口、外张口、歪口和倾斜侧口。烧窑的火候必须恰到好处，视细致的色彩变化（从粉红到深褐）而定。泥釉和植物釉已是人们熟悉的，今天在非洲仍被用于陶器、油漆或装饰房屋地板、墙壁和屋顶。奇异的装饰花纹是用骨梳、鱼骨制造的，上有玉米穗、绳子或种子的印纹，表现出巨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主题。在马里北部的瓦迪埃切德，烧陶的窑集中在一个地方，证明这种工艺很受重视，制造者同他们在沙海纳卜（在现代的苏丹国）的同行一样熟练。⑪

雕 塑

雕塑也通常表现为小件物品，如埋藏在阿马扎尔干河（塔西利）的反刍动物像，或出土于塔辛鲁克（阿哈加尔山脉）的一头牛。在阿杰富有一个小野兔塑像，它的长耳朵沿着它的身子向后伸着；在图瓦特的塔曼提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公羊头；在东部大沙漠的万西迪，有一个石头人像雕塑；在塔巴勒巴莱特，有一只出色的独具风格的猫头鹰头；在廷纳哈卡滕，发现许多小型泥塑像，独具风格的鸟、女人和牛，其中一头牛还残留一对丫杈型双角。

664 **类型和风格**

大体而言，在撒哈拉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典型和风格，或多或少地同上面提到的时期一致。第一种是古风的，画面大，其象征主义使半自然主义的表现黯然失色。人类好象仍然

⑩ 插图，J. D. 拉约(J. D. Lajoux)，1977年，第151页。
⑪ 参看H. J. 于戈，1974年，第155页。

由于最初受动物王国的力量所惊吓而心有余悸，这种力量定要加以征服，必要时用巫术征服。这一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野牛风格，主要集中于南奥兰、塔西利和费赞，刻画的形象表现了敏锐的观察力，主题通常是大动物，往往是单独站立的。半自然主义的处理手法，简单朴素，以熟练的技巧勾画出主要轮廓。这类实例有：杰拉特干河(塔西利)的犀牛和鸵鸟，巴尔达伊(乍得)的大象以及马坦杜斯干河的因加勒杰恩的大象。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羚羊和摩弗伦羊的出现，大多数是绘画。人的画像随处可见，人的脑袋是圆的。处理手法仍然是半自然主义的，有时是象征主义的；但是，线条与其说简朴，不如说是生动，而且可以表现兴奋甚至悲怆。巫术并不遥远，可以在动物图腾、带面具的人和宗教仪式舞蹈中体会出来。描绘的物象并不是单独站着的。有小型绘画，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性横条画和壁画。这种风格集中于塔西利，创作的画面描绘了摩弗伦羊，长着有力的角，以及塞法尔地方的带面具的舞蹈者，女祭司或万盖特的白夫人。

第二种主要类型包括自然主义的绘画和小的、单独的或成群的物像的雕刻品。处理手法是率直的描绘。可以感到人在运动，在管束和控制牛、狗、绵羊和山羊。使用的颜色更多了。画面是撒哈拉的乡村和野营地。有人认为，这个文物遗址就是贾巴伦。

第三种类型是风格化、象征主义或抽象的作品。较早的技法被保留下来，但往往退化了。然而，并没有普遍衰落。那些刻画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呈现点子或粗糙的点刻状，但在绘画中，灵巧的线条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如早期简朴有力的线条，却更好地勾勒出动态，有的是四分之三的侧面像，可以更好地形成风格化和新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戈诺阿（撒哈拉乍得）的人像轮廓非常优美，使人想到它是用笔墨细描的，眼睛、瞳孔、头发，嘴和鼻几乎同照片上一模一样。薄涂层的运用使作者有可能表现颜色的细微差别，以伊海伦(塔西利)的羚羊画为例，羊羔迈着不稳健的小腿去吮吸母羊的奶，母羊几乎低头温柔地俯就它。这种类型能很好地使马和马车以及随后的单峰骆驼的画法风格化，但是，它也能以风格化的手法去画人，人变成两个等腰三角形，如阿塞坚万梅伦的情况，或者在他的脑袋的部位只有一个长脖子。因此，这既趋向于独特格调的铅笔素描，也趋向于几分草率的风格化的几何图形描绘，在这个阶段末尾，随着努米底亚蒂菲纳格文字母符号的传入而产生几何图形描绘。从许多细节，比如带弓形后部的阿拉伯马鞍(它显然晚于我们纪元第七世纪)来看，这种构图显然已不属于史前史的范畴。 665

对这些一个接一个、没有明确的年代界线的类型，需要作一些说明。特别是古代风格的第二阶段是两种类型交叉的，而且在塞法尔的徐步缓行的公牛同戴面具的头像和象征性的图形没有什么联系。此外，还有某些固定程式，夹杂着几种类型和风格，例如有一种绘画惯例，象万班德尔的例子，牛的画法是，头部呈侧面，而两只角是正面的。同时还有固定形式的姿态，象牧人，一只胳臂伸出，另一只叉腰。最后，还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性样式，比如奥兰南部的公羊，塔西利的螺旋形图样，后者是在费赞或奥兰南部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性爱的主题尤其是费赞和塔西利的特点。

至于其它艺术形式，我们发现，带几何图形装饰的鸵鸟蛋壳出现在上卡普萨的珠宝饰物中，但是，主要是由于新石器时代的苏丹传说，我们才有那些工具和武器，点缀着绿色、深红色斑纹的华美燧石饰针，绘着波浪纹装饰的陶器，以及提希特的带有精致磨光的

牙饰和完美三角形的箭头。

在非洲其他部分，学者们正在研究古代艺术的类型。例如在纳米比亚，一个权威人士宣称，20种不同颜色的层次和风格中，有4个主要阶段：(a)大型动物，以古代风格表现，没有人物的描绘；(b)描绘人像的小型画；(c)单色阶段，表现狩猎和生动的仪式舞蹈；(d)多色时期，其艺术技巧达到了很高程度，如菲利普洞穴（达马拉兰）和布兰德堡的绘画，年代断定为1,500年。弗罗贝尼乌斯把南部非洲的岩石艺术分为两种主要风格。在南部，从德兰士瓦到好望角，从东德拉肯斯到纳米比亚海岸，他看到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动物居支配地位，往往单个地描绘，而且技巧完美无缺，厚皮动物的皮层褶皱和斑马身上的条纹都准确地表现出来。但是这种风格却令人感到生硬冷漠，即使绘画是多色的，着色非常灵巧。有些是固定形式的狩猎场面，舞蹈，游行队伍和聚会。另一方面，从中部德兰士瓦到赞比西（即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绘画是单色的，主要是红色和氧化铁赭色，有时近于紫色。天然岩石是花岗岩，而前面的那些则是沙岩。技法属于素描，而且象南部的淡彩一样，是写实的，但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写实主义。风景是写实主义的，但它们的描绘却显示出非常丰富的想象力。⑫

666

人们把自己的外形描绘为宽肩膀和细腰，简言之，成为楔形。从正面看，他们的四肢是侧面描写的，如埃及的浅浮雕。在南部，狩猎和战争场面有时混在一起，人更显得自然，四肢更为丰满，面在北部，我们发现庄严的丧葬场面（也许是皇家葬礼），人们流露出深切的悲哀表情。动物，例如伊诺罗的大洞穴中的动物群画，它们的描绘不象排列整齐的诺亚方舟，而象一群奇形怪状的中古野兽。有些大鸟，嘴象鳄鱼的颚；有些大象，背部成雉堞状，甚至还有两个头的动物。有些神话故事，比如雨的神话，被详尽描绘出来。这些怪诞壁画的背景由风景画组成，其中，风格化的岩石，可以从植物学来辨认的树木，以及充满鱼类的湖泊都安排得比较合理，这是津巴布韦的风格，不象南方风格那样生动，但富于强烈的或辛辣的感情。据弗罗贝尼乌斯说，这种楔形山风格是同高度发展的文明相联系的，而且我们知道，这样的文明存在于津巴布韦地区。他还认为这种简朴的、生硬的风格，在社会堕落时，即让位于比较柔和的、流畅的、比较矫揉造作的和比较柔弱的风格。⑬

在上沃尔特，北部（例如在阿里宾达）的岩石刻画是半自然主义的或风格化的，而在南部，则趋向于几何图形。在邦福拉岩壁的洞穴中也有绘画。

在中非共和国的挖掘中，已经发现从石器时代以前直到铁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址。已经查明5个岩石艺术中心：恩代莱地区的图卢隐蔽所，从史前时代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居住，内有年代很早的风格化的红色人物画像和白色的、双手叉腰的人物画；昆巴拉隐蔽所；以及姆帕图泉和伦戈（姆博穆）的有刻画的一些遗址。这种传统同撒哈拉的传统没有多少关系，但同东非和南亚发现的图画有较多的关系。⑭

---

⑫ 大体上说，野生动物和一般动物的描绘为了巫术的理由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图画必须尽可能确切地再现那种仪式的祭物。另一方面，人的形象则往往有意地以图解式手法表达，因为要使他们不受巫术的影响。

⑬ 参看E.哈贝兰德(E. Haberland)，1973年，第27页。

⑭ 参看R.德贝勒·德爱尔芒(R. de Bayle des Hermens)，1973年，第27页。

图形和含义

667

“岩石雕刻”一词，是为在岩石上雕刻的图画而撰造的。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这种艺术就是一种符号语言，也就是现实和思想之间的桥梁。它是一套图形符号，人们阅读它需要一把钥匙。

在恰当地对它进行阐述时，主要障碍是，我们不了解产生它的那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以下一点十分重要：不能撇开描述的阶段匆忙作出解释，在这一阶段中，要对符号语言本身进行形式分析。在许许多多例子中，实际的描述已在描述的术语中表达了。理想的办法可能是采用统计法，从数量和质量上收集资料，收集尽可能多的图象，进行比较性的分析。⑮这样就有可能说明，例如从特定数目的图象中发现的符号体系中在时间或空间上是否符合某一普遍的原则。资料编得越完善，这种重现的发展型式就越可靠。无论如何，来自这种形式分析的假设将会得到证实，如果它们符合大量的资料，从这种资料可以推定所谈的整个社会体制。一幅史前图画终究不过是资料大系中的微小部分，即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化中的微小部分。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开始懂得：我们需要一个多么复杂的符号体系才能掌握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此外，一件艺术品还可能有它的隐蔽的意义以及明显的意义，因为一个符号不仅是某个事物的符号，而且是对某人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也就是一种象征。因此，我们必须逐渐从个体形态学转到社会总体结构，而且必须能从简单地评论一个意义平易的纯表象的图画进一步去解释一个抽象的图画所传达的暗号信息。在这里绝对有必要用文化联系起来，因为所表达的含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一个符号离它所表示的事物越远，它就越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就越有意义。几种语言中相同的象声词并不是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特点，因为它实际上仅仅反映同一种声音，但是，对某一特定语言中的单词则不是这样。大量的艺术品也许可以看作是讯号发射台，发出文化的信息，这就产生了使用什么样的接收机的问题。发射台播放的东西可能往往主要是为了安装者所用的，同时也是为了当时的整个社会所用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其他遗物使我们能听懂和译出它们的信息，简言之，艺术探索的问题和方法，最后必须归结为文化类型的描述，这种文化是这些局部表现的基础。如果我们能确定作为其自然因素的那些文化，那末，我们就能试图重现切合实际的历史概貌。

668

因此，给非洲岩石画加上标题，例如“治安官”、“白夫人”、“拔牙的人”、“约瑟芬被她姊妹出卖”、“火星人”等等，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些艺术品的含义，因为这种做法是从有着完全不同的符号和暗码的另一种文化的角度把单独一个观察者的解释强加给它们。⑯必须参考本地的价值标准来阐述非洲史前艺术，而且只有在当地的时间、空间和文化条件无法提供答案时，我们才有资格向其他地方寻找答案。

---

⑮ 这种数量的处理也许可以设想由计算机进行计算分析，但应采取一切适当的谨慎措施。关于这个题目，见A.施特里特(A. Striedter)在法兰克福的弗罗贝尼乌斯研究所的著作，哈贝兰德教授是该所所长。

⑯ 关于这个问题，见J.D.拉约(Lajoux)的有关评论，1977年，第115页和以后各页。我们不否认步日耶神父有权发挥幽默感，也不否认他那渊博的学问以及他对一般史前史、特别是非洲史前史的研究的巨大贡献，但必须说，他往往屈从于这种倾向。

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阐述史前艺术主要有两个方法，即唯心主义方法和唯物主义方法。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这种艺术主要表现创造者的世界观。只要知道这种观点，就可对题材和处理手法进行解释。埃里克·霍尔姆写道，“南部非洲的艺术，只有我们把它当作宗教的热诚和一种远离现实世界的强烈愿望的表现，才会看出它的真正含义。这是原始人的玄学，而动物的形象不过是掩盖人的真正愿望的一种伪装而已。与其让我们投入争论，不如让我们满足于神话所提供的知识。这是很明白的。”⑰

因此，神话的和宇宙论的象征主义是了解岩石艺术世界的主要钥匙。弗罗贝尼乌斯出色地提出了这种主张，虽然他也加上了社会学的考虑。根据他的说法，利乌方丹的狮子刻画在岩石的东面，是为了使它可以被初升的太阳照亮，因为它象征太阳，而犀牛则面向西方，因为它是夜晚和黑暗的精灵。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犀牛的角象征新月的月牙，在许多非洲神话中，都认为它谋杀了月亮。霍尔姆也谈到了偏僻从山中一些洞穴的“宗教仪式用途”。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布勒克搜集的十九世纪桑人口头传下来的宇宙论传说，使他得出这样的见解：他们“分不清物质和精神”。好望角的羚羊画，四肢萎缩，象征初升的月亮。当表现它面对人们时，象在海伦芬画廊（德拉肯斯）那样，人们可能是在朝拜它。那个兴奋的、红色条纹的小羚羊象征暴风雨的天气；那个祈祷的螳螂象征闪电；那个大象，象征雨天，如同在圣保罗山（德拉肯斯堡）看到的那样。这种神话不仅在非洲其他地方一再出现（例如，在纳米比亚的菲利普洞穴和阿尔及利亚的塞巴山和艾因盖贾），而且也表现在法国拉马德莱娜的一个象牙雕刻上。

德兰士瓦博物馆的非常动人的羚羊画的颜料是蜂蜜色的。有人认为，这只是要人想到羚羊是由太阳的化身、祈祷的螳螂创造的，螳螂用最纯的蜂蜜去涂抹它的毛皮，使它产生光泽。为什么斑驴有时不画上斑条纹（例如津巴布韦马托波山区的恩斯瓦图吉洞穴的），原因是，最初斑驴身上没有条纹，只是由于太阳照射它的背部，在毛皮上留下晒痕，等等。根据对事物的这种看法，就需要有一把万能钥匙去解开所有非洲岩石艺术——象神话一样久远——之谜，那将是一门详尽研究非洲一切神道信仰的学科。这肯定是毫无希望的。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方法的拥护者则认为：史前艺术，象其它艺术一样，仅仅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一种“意识形态”潮流和那个社会文化的一种工具，表达了一种生态学的和社会学的特定平衡，使人们能够保存它或使它适应自己的利益。

这两种方法本身似乎都不完善，我认为，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非洲史前艺术无疑传达了一种社会的和教育的信息。桑人是今天最接近岩石艺术所描绘的生活的民族，他们宣称，他们的祖先通过岩石艺术这本巨大图书向他们阐述了桑人的世界观。没有文字的民族，教育手段主要靠视听，就是说，基于声音和形象，就象在南撒哈拉的非洲，直到今天在年轻人的入教仪式中可以见到的那样。岩石的刻象也是同样的东西。然而，显然不能用神话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在神话产生之前，社会本身就必然产生了，因而，神话可以成为一种改进（或损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想主义的手段。霍尔姆自己在引述年轻的桑人的例子时提出了这点：“年轻的桑人确信他的闪光的石英箭头是他所祈祷的那个星星的微粒，

⑰ E.霍尔姆(E. Holm)，《世界艺术，石器时代》第183页和以后各页，第170页和以后各页，等等。

他在削尖他的箭端时说：'你从未失误，你忠实可靠，助我射中目标！'"这句话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恰恰同作者所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相反。人为了生存，必须安排和调动天地万物。那就是神话的作用，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它唯一的作用。我们千万不要让象征主义的树挡住我们的视线，看不见现实之林。[18]

670 事实上，精神的作用有时独立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它停止作为一种手段而变成目的本身。神话，通过对宇宙的安排，就是说，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合理地处理它，毕竟为人提供了一条了解宇宙的途径，因为神话并非没有某种内在逻辑的。精神的目的确实存在，即使它不时带有一种功能的内容。描绘一个对之惧怕的事物，这一行为就已经是把自己从中解放出来，而把它置于人们的眼下，就是要去征服它。在因伊提嫩和提苏凯，那些十分静寂的，笼罩着阴森可怕而神秘莫测的气氛的石头小径，究竟是表明这里曾是记忆中的祭坛仪式和入教场合，还是隐藏了偷来的牲畜的地方呢？也许是两者。戴着动物面具的人和头上顶着圆盘、光环、枝条等物件的动物，[19]往往一起在南奥兰和杰拉特干河发现，这说明人们在动物面前采取了祈祷的态度。此外，贾赖特的三个戴面具的猎人，显然在包围一个顶着圆盘的公牛，这可能表现一个和谐的巫术的场面。由于非洲民族仍然使用面具，根据这一实际的文化素材进行解释可能更为可取，而不要作纯粹的推测。人们将会发现，图画的主题并不总是宗教性的。直到今天，萨赫勒地带的猎人仍戴着犀鸟的头象，把它拉上拉下，摹仿这种鸟，以便爬在羚羊背上匍匐着，从近距离放箭。然而，方法与结果之间有时很不相称，因此便强烈地联想到巫术，比如在利比亚的因哈贝特的一件雕刻中，一个戴面具的男人无力地拖拽着一条死犀牛。在某些情况下，画出那些看来在进行性交的人物（比如，在利比亚的廷拉兰，一个女人和一个戴面具的男人之间的性交）或者那些挺着生殖器表演热烈的舞蹈的人物，这种图画的目的显然是作为祈求生育的礼仪用的。实际上，生育是最紧要的事，特别是在史前时代末期，那时在撒哈拉和纳米比亚沙漠，面对无情扩展的旱灾，各种生命都在衰退。在廷菲勒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的一个六角形光玉髓的宝石饰物，已被哈姆帕特·巴辨认为一种生育护符，富拉尼妇女至今使用。[20]在这种特别的例子中，美学的动机也不能全然不顾，因为非洲新石器时代的男人和女人就象我们一样，都是智人，因此不能不让他们享有我们在仅仅为了欣赏的乐趣而造型时所获得的具体快感。今天我们对这些艺术作品一定仍然赞叹不已，因为这些绘画非常新鲜，它们的模特儿在我们周围是很多的。泰内雷的研磨化妆粉的小磨和天河石、石髓和鸵鸟蛋壳的有孔珠子，尤其是那有柄的斧子的优美线条，都充分说明当时非洲人的美学鉴赏力。

671 许多未加工的草图由于不够满意而被摈弃。而且，许多绘画受到风吹雨打，供偶尔过路的人欣赏，因此，它们的世俗性是毫无疑问的。它往往是民间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能为了子孙后代而有意识地记录下来。回忆往事的乐趣和使个人或集体的功绩留传万世的愿望，也是我们人类的特点之一。人生来就是历史的编者，而史前的艺术家则是最初的

---

⑱ 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有时从神话里可以知道许多东西。根据桑人的说法，太阳在斑马的背上感到厌倦，于是舍弃斑马而躲藏于公牛的双角之间。这就使我们转而想到这个大陆的另一端，在埃及、南奥兰和撒哈拉，描绘的公牛都饰以日晕盘，我们也许怀疑，是否牛的女神哈索尔（Hathor）实际上不是一个泛非洲神话的产物。

⑲ 利比亚的迈亚迪布的牛和撒哈拉阿特拉斯山的布阿莱姆的公羊，是有名的实例。

⑳ 阿加德兹或伊费鲁安的十字，也许从塔尼特的符号演变而来，那是女性的象征。

史学家，因为他们留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记录，说明了非洲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的各个阶段。

历史的责任，或作为文献的艺术

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非洲史前艺术看成是第一部非洲史的插图版。

首先，它是一部纪录影片，展示了我们大陆上的最初社会的基础结构，例如人们如何利用自然环境生活。关于这种群落生境的面貌，我们可以直接从原地发现的物件进行考察，也可以从绘画的题材进行推断。但必须注意一点，绘画表现的并不一定是一个实际环境的客观写照。艺术家可能追述往事，或者描绘他们的幻想或梦境。然而，事实上，大量证据与对史前湖泊和远古水道进行的地貌学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因而使这个问题无可置疑。H.洛特在布斯山的一个遗址上发现了河马骨头，经放射性碳测定，距今5,140年，它证实了(例如)在阿塞坚万梅伦描绘的河马群的历史是正确的。现在这种动物是生态学上的一种标志，因为它需要终年有水才能生存下来。每天吃大量植物的大象是另一种生态标志，因此从史前时代的绘画来看，当时的撒哈拉，肯定是一片广阔的草木区，有地中海的植物，它的痕迹至今犹存。这种环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象苏丹那样的萨赫勒生境。[21] 在"马和马车"时期，一些描绘树木(如棕榈树)的画已被发现，无疑这是绿洲的标志。

在南部非洲，北部的或"罗得西亚的"风格充满描绘树木的绘画，其中有些树木是可辨认的。在许多现已成为沙漠地区的隐蔽所拥有很多各色各样的动物雕刻画，象近代的挪亚方舟，又象刻在石上的动物园。其中所雕刻的有各种鱼，有长满粗毛的巨大野生动物，有长着高达3米的交叉巨角的绝种的牛，有猫科动物如猎豹和南非土狼，还有长尾猴和狒狒(在廷塔扎里夫特)、鸵鸟、猫头鹰，等等。到处都有打猎的场景，令人想起人与兽的长年搏斗。这些猛烈的、有时是残暴的搏斗场景，表现出智慧战胜野蛮，多少使人联想到约约泰的报告所描述的埃及王朝之前的尼罗河流域的猎人：两腿之间有阴茎护套，佩着弯曲的武器和假尾巴，尾巴实际上(热带非洲至今如此)是斜挂在肩上的野兽皮。在伊海伦，有一个猎狮场景，猎物被一圈威胁性的长矛围住。在提苏凯，一个被杀死的野驴即将被切割。在尼罗河流域，在利比亚以及整个撒哈拉，有无数描绘陷阱的画，显示人以其多方面的天才，按照野生动物的习性和栖息地来改革打猎技术。[22]

672

从尼罗河到大西洋，大量的狩猎场景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狩猎文化。即使大象那样的大动物也无法逃掉，在上迈图泰克的巨大狩猎场景所见到的就是这样。几乎每个地方的陷阱都带有猎人的象征，他们的文化是非常奇特的。这种文化直到很晚的有史时期以前，几乎存在于整个非洲好几万年，如松迪亚塔的传说所证实的那样。

这些绘画还显示出从诱捕或关禁动物逐渐到饲养然后驯化的过程。有一幅画上，一个

---

[21] 参看Y.维埃以及M.维埃(Y. and M. Via)，1974年。

[22] 正如在尼日尔-乍得边界的道提姆尼见到的，有栅栏、网、板机捕捉器、壕沟和坑、绷紧器、关锁器、牵引器和扭摆器。在那里，一只长颈鹿被一种绷紧的机械装置卡住不能动弹，这种装置把它的头和脖子直压到地面。有关这个重要题目的研究细节，见P.瓦尔(P. Huard)和J.勒克朗(J. Leclant)的著作，1973年，第136页和以后各页。

男子佩带着一张弓，把一个动物系在皮带上，而在提苏凯，画上的野山羊正被猎狗追捕，在塞法尔，一个栩栩如生的卷尾巴的猎犬，显然是沙漠人的朋友，在今天也是这样。在贾巴伦，有一个场景，表现一个男人潜伏着等待野兽。他拿着一件弯曲的武器，身后还有一个动物竖着耳朵，看来已经驯化了。各式各样的牛都被描绘出来，比如南部的有短硬角的伊比利亚牛，在塔吉特、贾巴伦和其他地方则是长着大竖琴状角的阿非利加牛。这些动物有时脖子上带着一个垂环，如杰拉特干河那样。

另外，还有饲养的牛，它们的角被出色地描绘、装饰并人为地扭成螺旋状，如因伊提嫩的例子。在提苏凯的一个场景中，人们正在追逐驴，这驴就是新石器时期以来驯化的品种，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中这种驴是被人骑着的。还有绵羊和山羊。甚至船也描绘了，包括在廷塔扎里夫特的一种船，形状有点象乍得和努比亚的江上和湖上人们使用的纸沙草船。

在因伊提嫩有许多绘画表现人俯身使用弯曲的工具，这使人联想到丰收的场景，所用的镰刀是法老时期浅浮雕上那种。再者，绘画上的妇女，弯着身子，是簸谷或拾穗的那种特有姿势，使人想起新石器时代撒哈拉的粮食栽种，这已由发掘的大量磨臼所证实。[22]波伦的研究是根据撒哈拉的实例进行的，但他仍然指出需要小心谨慎，画面上所画的可能只是人在采集野生植物。此外，种植小片土地与正式所谓的农业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在巴特尔洞穴，桑人的姑娘被描绘为出发采集食物，肩上扛着挖掘用的棍子。不管怎样，大量的岩石艺术和非洲广大地区、特别是今天已成为沙漠的地区出土的大量工具和武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说明那些地区曾是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工制品的数量之多有时使人觉得，当时已出现了半工业的生产，例如在贝沙尔的东北部、埃鲁里沙漠、甚至(如T.莫诺所报告的)马朱巴(西撒哈拉)都有这种情况。

673

非洲史前艺术也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当时人类的衣着情况。象早期一些文化中常见的那样，我们发现男人的穿戴比女人更花哨，到了公牛时期，情况似乎完全倒转过来。

他们穿着动物皮，装饰着华美的束发带或羽毛外衣，有时以衣领、臂章和手镯的形式炫耀形形色色的、不可思议的标志。对妇女的描绘常常是衣着很少，有时系上"伦佩"(Lempe，一种棉布条，穿过两腿间，然后围成腰带打褶，带端松散地前后下垂)，这在苏丹姑娘当中是常见的。还有缠腰布，其下褶有各种不同的式样，以及紧身衣裳；各色各样的胸罩和各种款式的头巾，包括一种有顶饰的，如贾巴伦的那样。

家庭常常被简单地画成一个半球形的小木屋，其中，可以看到家具和家庭生活场景。在提希特(毛里塔尼亚)的峭壁地带，127个乡村遗址已经被识别出来，那里的发掘物显示，新石器时代的非洲人也学会了建筑。在达尔向南延伸的凸出部分有成群的干石头建筑物，每一个可住3,000人，这些建筑物往往建立在巨大泥石结构的基础上，令人联想到中南非的津巴布韦的建筑。这种建筑在那个时期是了不起的，特点是有雕刻的石头支柱。[23]

因此，非洲岩石艺术壁画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且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社会图象。例如，在塔克德图马丁，体形丰满的妇女看起来好象因平时喝牛奶而养得很好，她们坐在棚屋门前抱着孩子，成排的小牛犊被系在一根绳子上，男人们则忙着挤牛奶。这是一

[22] 显然实例是贝利埃·特内雷(Berliet Tenere)考察队带回的。
[23] 见 H.J.于戈在 H.J.于戈等人论述提希特的著作，1973年。

674 幅黄昏景象，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平静安宁气氛。我们可能怀疑，这么多妇女是否暗示一夫多妻制。在奥兰治斯普林斯和恩科西萨纳河(纳塔尔)，有生动的舞蹈场景，显示出许多人(大部分是妇女)成群地围着戴面具的舞蹈者，一边看一边拍手。

在贾巴伦，一个妇女拖着她那不愿意走的孩子向前走。在塞法，一个男人牵着小牛缰绳，在今天的富拉尼牧人中间，这种牛缰绳仍然被视为神圣的物件。伊海伦隐蔽所的一幅巨大壁画是一幅高水平的史前绘画，它细致地描绘了几头华丽鞍辔的牛被盛装的妇女赶着，她们腰上挂着革制水袋。一些动物把头低向水坑，另一些大牲畜步履稳重地向前走动。妇女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家门前闲荡，男人们拿着木贼属植物停下来，好象在招呼她们。在小屋内可以看到各种家具。

在因伊提嫩有一个场景，显要人物穿着盛装，武士则身穿戎装，表明那个社会正向等级制度发展。身披外套的弓箭手好象是在一个指挥官指导下进行整队。这甚至暗示那可能是一支警察部队。

在南部非洲，战争场景很多，说明桑人和班图人曾不断进行战争。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描绘爱情。许多场景说明，非洲史前艺术家并不禁忌生活中的性爱方面，有不少显示动物春情发作的图画，如布拉卡河西岸石崖的情况，上面画有两条犀牛，一个在嗅着另一个的性器官。另一处，一只公山羊正要骑到母山羊的背上。有些画表现人们进行各种姿势的性交的场景，画法是天真的，但是写实的，表明人类自从远古以来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发明。在杰拉特干河(塔西利)的阿汉纳岩石，整个画面是描绘一些带面具的男人伸着巨大而勃起的阴茎正要插入那些躺着的、摆好性交姿势的妇女阴部。所有细节都一一加以描写。在廷拉兰(利比亚的阿卡科斯)的大壁画上，大部分都是表现放荡的主题(于戈－布鲁格曼，第164号)。在因阿胡安加特，有一个更逼真的从背后性交的场面，而在提门祖津(塔西利)，画上描绘一对正在交媾的男女，有另外三对男女陪同，他们仍然站着，妇女们半推半就的神态画得维妙维肖。

谈到巫术和宗教，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图画仍然难解，难以揭开神话的奥秘。我们并不知道在杰拉特干河的两个脑袋的牛或那个雌雄同体两个躯身一个脑袋的牛表示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雕得非常精美的、把许多动物联在一起的螺旋形有何意义，比如在杰拉特干河的大野牛画。这种主题也可在格尔泽陶器上找到，似乎同狩猎仪式或善意的巫术有关，675 象提乃特(第一和第二埃及王朝)时期以来的螺旋形梅亨蛇那样。[25] 一些学者认为这螺旋形象征生命的延续。至于在两人之间以一条脐带连在一起，例如，有一幅画从一个妇女的两股交叉处画出一根脐带一直连到一个外出打猎的弓手的脐眼为止，它似乎象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从母亲(她正在合掌祈祷)一直流向她处于危险境地的儿子。还有，在南部非洲(博茨瓦纳)，一幅画表现一头将为求雨而献祭的动物正由一队轻松活泼的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穿过田野。太阳的图形同样是宗教背景的一部分。然而，有些图画却仍然难解，关于这些画，只有参考真正的非洲文化和宗教背景才能得到说明。这就是在廷塔扎里夫特遇到的一个画面，以前称之为“常规化的牛”。由于它们的腿看上去极为粗短，人们猜测它们是躺着的，

[25] 又见蛇在非洲宇宙观中的作用。

但是A.哈姆帕特·巴认为，事实上，它们被牵到水里作为“洛托雷”仪式的一部分，以纪念牛的水栖起源。靠近这个场景的是一个难以辨认的手指图形，哈姆帕特发觉，这是暗指有关第一个牧人基卡拉的手的神话。这只手象征富拉尼人部落、牛的毛皮的颜色和四种自然力量。[26]

一般来说，这种发展暗示着从巫术到宗教的过渡，巫术往往连带有突发性的舞蹈，在因伊提嫩的横幅壁画上一组连续场景，描绘着杀羊祭奠的场面，就是一个实例。

各种影响和移居

必须摒弃用外界影响的理论去解释非洲文化一切特征的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任何外界影响，只是说需要仔细确定。法兰西－坎塔布连山脉的岩石艺术，可以追溯到约4万年以前，是旧石器时代的，早于非洲史前艺术（在另一方面，撒哈拉的新石器时代又早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27] 因此很多人不禁论证说：非洲大陆的艺术家的灵感来自北方，甚至有一种欧非艺术的说法，把中心点放在欧洲——事实上是非洲史前艺术领域中的一种含米特理论。

事实绝非如此。这两种艺术学派在发展的时间上相差15,000年，除了这一事实以外，人们还承认，西班牙东部的艺术（它是任何可能影响的联系环节）同南奥兰、塔西利和费赞的艺术没有共同之处。L.巴卢论证说：史前的北非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班牙没有联系。此外，南奥兰和撒哈拉的雕刻来源于卡普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被所有作家所否定。史前艺术的真正繁荣来自阿特拉斯山，而它的中心点不可能不在非洲。 676

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类型的艺术是不是从东部（那就是说，从尼罗河流域）传到这个大陆内地的。现在很清楚，埃及尼罗河的艺术的繁荣比撒哈拉和苏丹非洲的艺术要晚得多。撒哈拉那些描绘两角间顶着圆盘的牛的图画，远远早于母牛之神哈托尔*的图画。在吉尔高原的沙岩板上精致雕刻的鹰也比埃及王朝之前的埃及陵墓菱形碑上类似的小雕像（鹰头太阳神的先驱）早得多。在布阿莱姆的玩球的公羊远远早于阿蒙的公羊，阿蒙的公羊仅仅在第十八王朝时代的埃及出现过。安德烈·马尔罗观察了杰拉特干河的动物头像，他认为它们都是“埃及动物神像的前驱”。毫无疑问，贾巴伦的鸟头女神也是这样。半自然主义只是在盖尔泽时期在埃及出现，而且是来自撒哈拉公牛时期的雕刻。例如哈马马特干河的图画，这幅画的做工粗糙低劣。在撒哈拉（例如在廷塔扎里夫特）描绘的极好的埃及式船只无疑只是撒哈拉式的船只。盖尔代斯的侧面像被认为是描绘喜克索人、法老和安蒂尼，戴着头饰，据推测，这种头饰是法老时期的古埃及王的双重皇冠。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侧面像需要从另一方面考察。当然，埃及对非洲内地有着巨大影响，尽管无疑是有限度的，但更能肯定的是，撒哈拉的史前文化在时间上较早。除了地理的距离把阿哈加尔、塔西利

[26] 我们显然必须提防自动用外测法判断现代神话和古代传说，以便解释从史前史中发现的象征符号的每一细节。参看J.D.拉约，1977年。

[27] “撒哈拉新石器时代至少可追溯到我们纪元前八千年，不太久以前已被公认的看法是，它晚于北非、埃及和近东的新石器时代”。H.洛特，1976年，第227页。

* 哈托尔(Hathor)，埃及神话，爱情和喜悦的女神。——译者注

和费赞民族从尼罗河流域分开外，并没有其他障碍，这也是事实，尼罗河流域长期(在撒哈拉变干旱之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沼泽地区。只有从所谓“历史”时期以后，埃及的文明才大放光彩，结果(大概根据“谁有就给谁”的原则)，现在把所发现的一切都归于它。然而，就艺术和技巧而论，中心点原在撒哈拉，在现代的苏丹共和国、东非和近东。而且，史前的撒哈拉受益于东南部的影响多于近东的影响。至于所想象的南部非洲和撒哈拉地区之间的接触，似乎没有可靠的证据，尽管弗罗贝尼乌斯提请人们注意它们之间的某种共同点。[28] 甚至还有一种“马戈西文明”的说法，据霍尔姆说，那几乎是泛非洲的，但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明显的证据。南部非洲的史前艺术作品，在任何情况下，一般都晚于赤道以北的非洲，尽管这个大陆的南部很早就有人居住。[29]正如已经着重指出的，把德拉肯斯堡山的绘画的伟大时期放在十七世纪，就是说，放在班图人来到之后，那是完全错误的。无论如何，南部的绘画同撒哈拉的所谓“圆头”时期在风格上都没有密切关系，看起来仅仅同公牛时期有关。其不同处是具有某些独特主题，如茂盛的草木、以风格化手法描绘的风景以及葬礼场景。不管怎样，仍需要进一步对比研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先弄清非洲史前人类历史总的背景情况，然后才能具体定出各种艺术运动的发展方向。

当我们讨论创始这种类型艺术的“人种”时，这种意见更加适用。诚然，在这里运用人种的概念，肯定是不恰当的。[30] 因为，已经发现的极少数的头盖骨和骨骼，是否足以证明那些大胆提出的关于史前的“人种”曾经在这里栖息的理论，是大有疑问的。尽管如此，一些作者仍描绘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口变化过程。在本土的“非洲人”最初居住之后，据推测，尼安德特人从近东分两支移居非洲，一支远至摩洛哥，另一支则经过非洲之角到东非高地。这些人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阿特利人。后来，在可能同埃及的塞比利亚人有关的一段中石器时代插曲之后，另一批克鲁马农人来到北非，其中包括一支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族系和一支卡普萨族系。这些人群可能在他们新的生活环境发展了石器业，特别是在北撒哈拉(以及其它地区)产生了卡普萨人的新石器时代传统。与此同时，在其它中心明显地产生了技术与艺术上的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丹人和“几内亚人”新石器时代传统的巨大影响，其次要的中心点是在泰内雷和北毛里塔尼亚的大西洋海岸。[31] 一些作者认为：造成大野牛时期岩石艺术的应是尚无确切定义的“地中海”人，据不同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白种或欧亚混血种。造成所谓的“圆头”时期的种族是“尼格罗人”，一些人认为他们曾同来自近东的民族杂交，而且推测他们形成了苏丹新石器时代传统。据推测，公牛时期的艺术为富拉尼人祖先的作品。最后，所谓几内亚人的影响向南扩展得更远，直到提特岩壁(毛里塔尼亚)的建筑物。整个这种历史考证，应该说，根据还是非常不充足的，而且过分看重了来自非洲之外的移民，人们甚至谈到一幅撒哈拉岩石图画中有“明显的非洲影响”。但是主要的是，这种历史见解总是同等看待种族、种族群、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些互不相同的概

[28] 参看 E.哈贝兰德(E. Haberland)，1973年，第74页。

[29] 参看本卷J.D.克拉克写的第二十章。一些学者认为：岩石艺术从津巴布韦扩展到纳米比亚和开普省，然后到德兰士瓦以及奥兰治自由邦，最后(高度发展的多色绘画)又从津巴布韦到纳米比亚。参看A.R.威尔科克斯(A.R.Willcox)，1963年。

[30] J.R.吕菲耶(J. Ruffie)提到的人种形成过程大都必须颠倒过来，特别是因为整个撒哈拉地区生境的单一性肯定促进了种族间的杂交。见《关于非洲“人种”和历史的若干理论》，第261-269页。

[31] 参看 H.J.于戈，1974年，第62页和以后各页。

念。人们在提到黑人、白人、富拉尼人、非洲人、卡普萨人和苏丹人等民族时，没有给其中任何一个下过定义——这里有明显的理由。例如，洛特否认在野牛时期雕刻中有卡普萨人影响的想法，[32]不过，他说，在杰拉特干河的雕刻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黑人侧面像。所有那些能辨认的人像，无疑都是白种人。因此，我们应该假定：这些都是白种人，这正是我们观察南奥兰和费赞的人像所得到的印象。一位南非的同事有一天对我说，只可惜他们不会说话"。[33]

根据这种同样不足为凭的人种考察的线索，把"圆头"时期归之于黑人，把公牛时期归之于富拉尼人。然而，种族的鉴别也往往以生活方式和文化为根据，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常规的做法。苏丹新石器时代的民族被解释为"来自东部的牧人－猎人民族群"。那种"清秀的面貌，放牧的技术，妇女的有冠毛的头饰以及男人的编绳"，都是把显示这些特点的所有岩石艺术归之于富拉尼人所不可缺少的，尽管现在的富拉尼人没有这些爱好，甚至没有保持对它们的记忆，象桑人表现的那样。而且，尽管所有的"阶段"和风格，以及各种人体形态广泛融于岩石艺术中，但还是提出了以上说法。直至今天，几乎热带非洲的任何部分，都可能找到撒哈拉绘画中所发现的侧面像的全部标本。[34]这种主张还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一个"富拉尼人"画家也可能描绘带面具的舞蹈者，正象一个"尼格罗"艺术家可以很完美地描绘畜牧生活的场景，或者改变他描画的男人和女人的面目，象一些塞内加尔画家今天所做的那样。小个子的桑人常常把他们自己画得相当高大、细长和文雅，具有特别魁梧的体型。一切艺术都是沿习成俗的，而且从未有人见过一个黑人民族全是"圆头"的。此外，当时的牧民和农民是不是象今天这样界限分明，也值得怀疑。[35]

679

H. J. 于戈十分正确地谈到毛里塔尼亚的新石器时代："当提希特的黑人来到时，也带来了他们的牛"。他还在其他地方说："中畜牧时期，尼格罗人来到。这就是伟大的公牛时期，大量描绘放牧。"[36]因此，畜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头盖骨的表征和各种面貌的主观印象，也都不是绝对的标准。造成历史的并不是"种族"，而且现代科学也不把种族作为区分人体特点的根据。[37]非洲岩石画中的"白夫人"，象南非的壁画一样，只有面部是白色的(使步日耶神父想起克诺索斯的壁画和"波斯湾来的勘探者队伍")，毫无疑问这是描绘从入会仪式出来的非洲姑娘中的牧师和猎人，正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用白色高岭土涂绘的。这表明原来的一个人物已死亡，但人们希望他取得新的身分。[38]

非洲南部的岩画是什么人创作的，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关

[32] 参看 H. 洛特，1976 年，第 110 页。

[33] 同上书，第 41 页。

[34] P. V. 托拜厄斯(P. V. Tobias)指出，各种尺寸、形状的头盖骨都可在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中间找到。

[35] "值得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并无区别大野牛期的人与早期畜牧时期(ox.)人的可靠标准。因此，在精致的自然主义雕刻时代出现了几乎肯定已被驯化的牛，这意味着家畜已相当早地出现了"。T. 奥诺 (T. Monod)，1951 年 1 月。

[36] H. J. 于戈，1974 年，第 225-274 页。

[37] 参看《关于非洲"人种"与历史的若干理论》，第 193-199 页。

[38] 许多作者认为：布兰德山的"白夫人"(复制品并不忠实于原作)，从弓、窄屁股和突出的性器官来判断，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男子，正如时常在桑人中发现的那样，他们的阴茎是半勃起的。至于颜色，应当指出，面部不涂绘，而是利用自然的岩石来表现。身躯从脚到腰是粉红色，腰以上为黑色。在任何情况下，颜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发现有红色的大象、猴子和妇女，以及白色的人。参看 A. R. 威尔科克斯(A. R. Wilcox)，1963 年，第 43－45 页。

于它的一般历史背景，人们知道的比较多，首先是科伊科伊人与桑人之间，其次是科伊桑人与班图人之间发生了种种关系。有许多图画描述这次历史性的人口活动。从岩石上的手掌印痕所作的统计对比来看，这种人近似桑人的体形，从过肥的臀部和半勃起的阴茎来看也是这样。马和车时期的撒哈拉刻画说明了有关的历史时代。

另一方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画家和雕刻家是不是出自不同的民族，前者作画于岩石隐蔽所，而后者的作品则出自山坡上？看来并非如此。画家一般都不可能在空旷地方绘画，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作品就会被雨水冲刷掉。另一方面，对刻画来说，粗玄岩或辉绿岩是较好的材料。岩石的古色表面的赭色同内部的灰色或兰色形成美丽的对比，而这是隐蔽所上的石灰石做不到的。而且，绘画和刻画有时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甚至还有一些刻画被绘画盖上，如塔卡斯塔德地区的情况。再者，同样的美学手法有时出现在两类图画中。

580

在美学领域本身，非洲史前艺术是现代非洲艺术的灵感泉源，也是出色的序曲，迄今为止，对它的根源却很少研究。史前艺术包含众多的风格，它有时几乎可以一步一步地往下追踪到现代非洲艺术。后者从阿拉伯和欧洲艺术吸收了许多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它的根源可在岩石隐蔽所和史前画廊中找到。绘画所用的颜色是少数原色，例如红赭色、白色、黑色和黄色，另外增加的是蓝色和绿色。直到今天，这一系列颜色还表现在面具和华丽的舞蹈服装上。

这是一种以观察为特点，以几乎是令人感动地、有时是虔诚地注重现实生活为特点的艺术。刻画和绘画都有这种特点，但是显示的方式不同。奥格斯堡(博茨瓦纳)的牛，仅仅前面部分存在下来，线条的勾划非常完美，极其细致地表现了口鼻、眼睛和茸毛的生理细节。布拉卡河的长颈鹿是一幅出色的现实主义刻画。毛皮上的斑点是用锤子凹雕的，细致的明暗显示出头部、颧骨弓、双角、球状眼睛、鼻子以及分趾蹄的发光蹄尖的轮廓。这个雕刻栩栩如生，这是由于得心应手的勾勒技巧，把它的侧面极为完美地勾画出来；由于凹雕，它体现了内部的细节：而且还有一只小长颈鹿，它以一种动人的、出于自然的姿态偎依着它的母亲。

这种观察在伊海伦的壁画中也有脉络可寻，该壁画显示出一个沸腾生活的世界，清清楚楚地以完善面准确的线条描绘了所有细节。16只长颈鹿，很考究地搭配在一起，一群群打扮得俗气的妇女骑在驮牛上旅行，瞪羚和羚羊(多加羊、达马羊、非洲大羚羊和南非大羚羊)可以从其纤细的杈角和白毛皮、后掠杈角和伸长的头部一一辨认出来。在同一画面上，一只新生的长颈鹿，仍然连着脐带，正蹲伏着并努力获得身体平衡。一头狮子，爪子抓着一只绵羊，注视着带着武器正要追赶它的男子，而另外一只绵羊吓得惊惶奔跑。一头公牛走向一个池塘去喝水，吓得青蛙乱蹦。这是一幅多采多姿的动人自然风情画，而作为主宰者的人，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

然而，自然主义的细节描绘并不妨碍画家通过某种技术体现作品的主要内涵，这种技术颇象用雕塑手法处理绘画。为此，主要人物画得很大，使次要人物相形见绌，因为他们的尺寸相对缩小，例如一个高大的戴面具的猎人高于野兽，巨大的法老使他的敌人显得矮小，或者，贝宁的奥巴(小预言家)在同他的臣民相比时显得高大许多。

这种对实质的强调产生了象征主义的形式，这是与巴罗克风格截然相反的。结合雕塑手法，产生了特别的节奏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干净利落线条勾绘的大野牛，以及贾巴伦的牧牛图，在这些画中，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得得的蹄声，噗噗的鼻息声和哞哞的叫声（参看拉约的插图）。

这是日常通俗的艺术，具有幽默感，表达了对生活的又苦又甜的嘲弄，也是奥妙的艺术，洋溢着画家、雕刻家所感受的神秘激情，它产生了世界艺术的一些珍品，如布阿伦的顶着日神盘的公羊，它那教士般的姿态既充溢着神秘，又令人冥思。[39] 这种双重的处理手法很好地表达了现代非洲人性格的两个方面：在一般事务中他们带有听其自然和漫不经心的态度，而当他们参加仪式的舞蹈时，则庄重而神秘。

非洲史前艺术没有死亡。它继续生存，只不过是生存在没有改变的地名中，例如，一个溪谷伸入杰拉特干河，叫做廷特赫德，或"母驴村"，那里的确有一个精美雕刻的驴。伊苏凯阿非利亚被认为是神灵常出没的地方，也许因为那里有一个可怕的半鸡半猫头鹰的动物雕像，长着一个异常大的性器官，它窥视着人们为了赎罪而奉献给它的一堆石头。

非洲人由于地理距离而同这种艺术形式隔绝了，这种障碍只有富裕国家的学者专家才能消除，它值得重新介绍到他们的生活之中，至少通过学校课程加以介绍。

非洲史前艺术需要严加保护，不要使它遭受天天威胁它的各种损害，因为它是无价之宝。[40] 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记录，以便进行比较和研究。

史前艺术提供了关于最早的非洲人类生活方面的许多特征，包括他们的外界环境直至他们的崇高感情，而那种形象有时是一种符号，象文字一样说明问题。当然，这种遗迹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莫测高深的，需要许多资料如古生物学、气候学、考古学和口头传说等加以补充。但是，即使它只向我们显示一个冰山的尖顶，我们也应当有理由把史前艺术看成这个大陆的第一部史籍，或者当作重现在山岩隐蔽所石壁上的久已消逝的生活图景。它形成一个纪念馆，在那里非洲人宣告他们曾经不顾一切进行斗争，以控制自然，并获得创造世界的无限欢乐和信仰上帝的人类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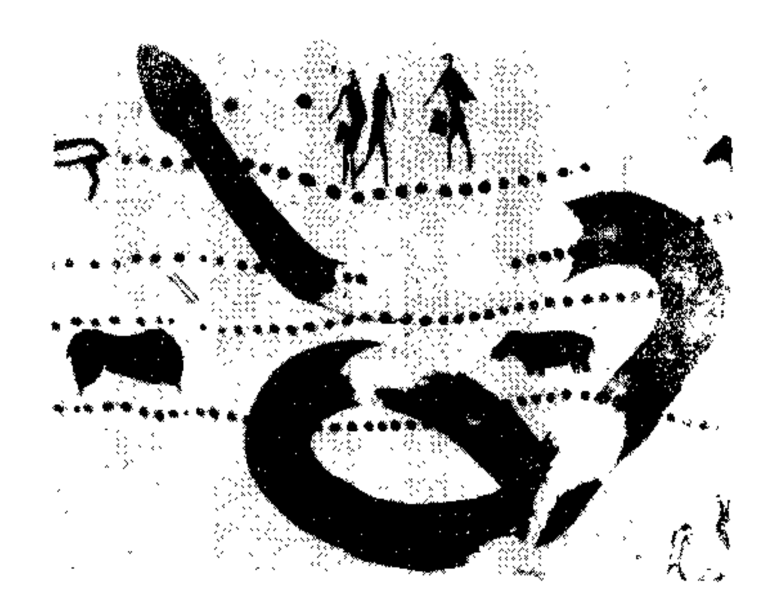
（刘萍君译）

[39]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文学中提到在十四世纪马里皇宫的两只公羊曾保护国王免遭伤害。其他非洲皇宫，包括戈罗埃、阿坎（加纳）、库巴（扎伊尔）、加奈姆（乍得）的皇宫，也有关于公羊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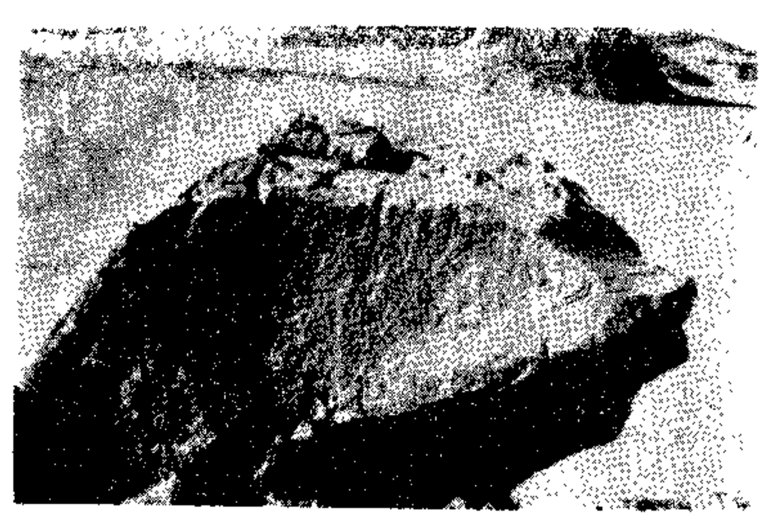
[40] 1974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法规，使整个塔西利绘画和雕刻区成为国家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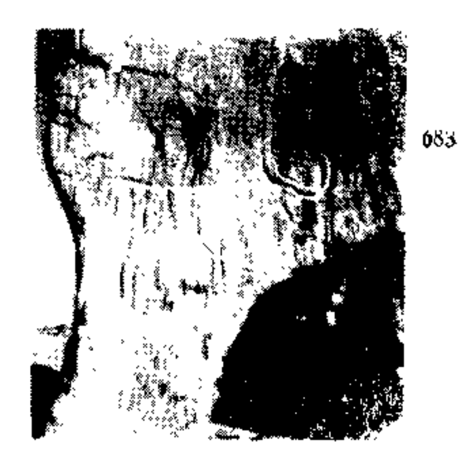
照片 26.1 洞穴绘画《白夫人》细部图，南非(摄影 A.A.A.，迪韦尔热)



照片 26.2 洞穴绘画《蛇迹》(摄影 A.A.A.，贝迪)



照片 26.3 犀牛刻画，布拉卡，尼日尔(H.J.于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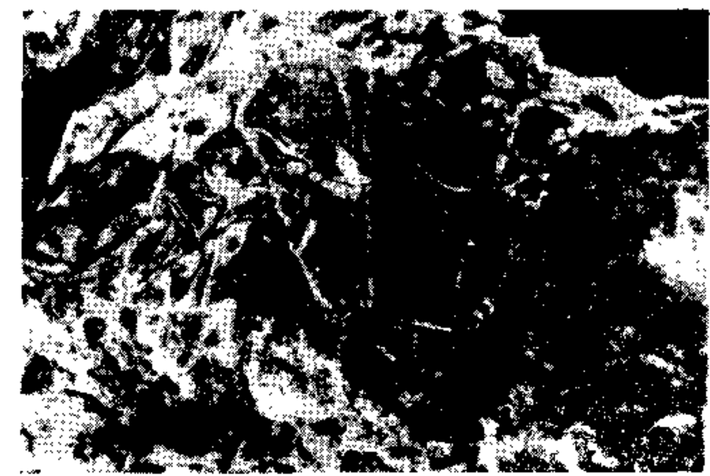


683

照片26.5 牛，廷加罗，马里(H.J.于戈)



照片26.4 大象刻画，因埃克，阿尔及利亚撒哈拉(H.P.C.哈恩)



照片26.6 瞪羚，布拉卡，尼日尔(H.J.于戈)



照片26.7 洞穴刻画，上沃尔特(J.德维斯)

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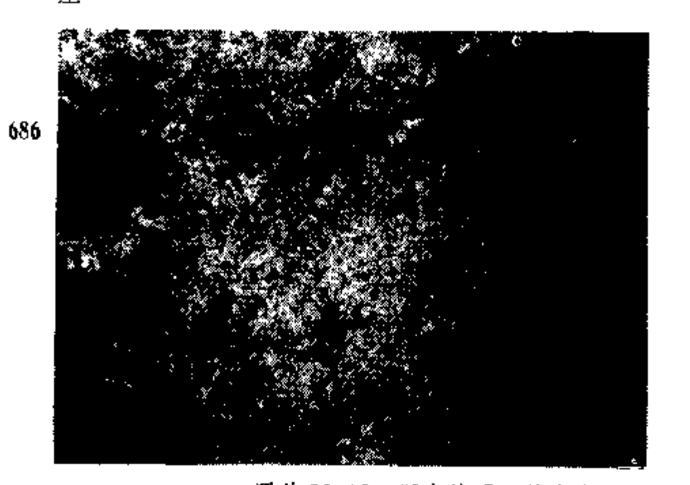
照片26.8 洞穴刻画近景，上沃尔特(J.德维斯)

照片26.9 性爱图景，塔西利(P.科隆贝尔)

照片26.11 洞穴绘画，乍得提贝斯提(豪·圭)

照片26.10 性爱图景，塔西利(P.科隆贝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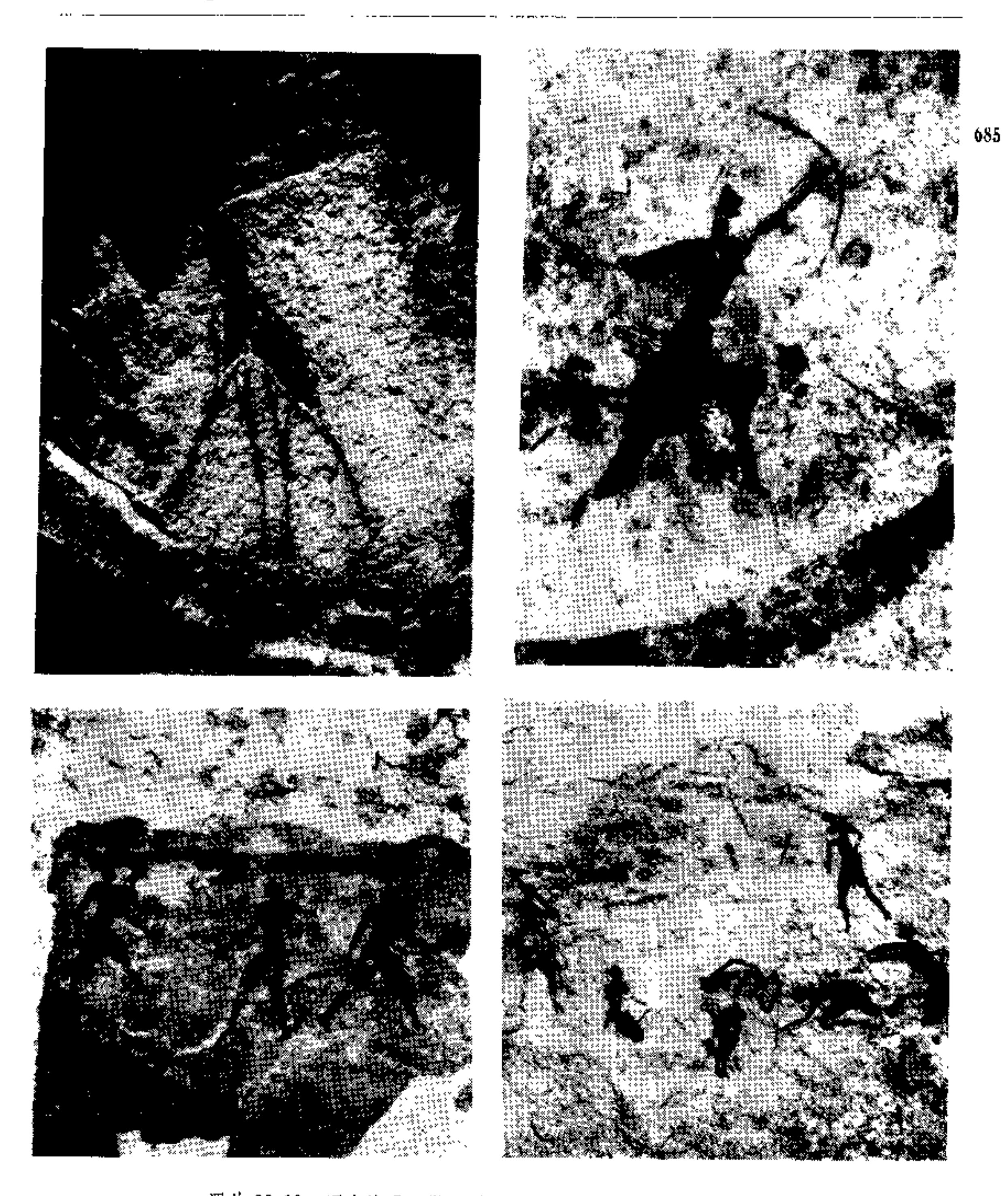
686





照片26.12 洞穴绘画，纳米比亚(摄影A.A.A.，苏迪兹，纳乌德)

685



照片 26.13 洞穴绘画，塔西利(摄影 A.A.A.，苏迪兹，纳乌德)

687

27 农业技术的起源、发展和推广

*R.*波蒂埃[1]和*J.*巴罗

关于农业起源的见解，长期以来一直渗杂着某种程度的民族优越感。以往倾向于（现在有时仍然倾向于）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据戈登·蔡尔德的提法[2]，发生于近东的一个农业和畜牧业摇篮，这摇篮不仅是成为今天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的主要谷类植物（象小麦和大麦）的栽培和畜牧业（绵羊、山羊，后来还有牛）的发源地，而且就旧大陆而论，也是文明本身的发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近20年的考古研究无疑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狭隘的而且多少有点以我为主的观点。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肥沃新月”在世界农业史上的重要地位，[3] 但也表明了其他地区在人类生活这一重大转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从先前只不过是**采集**野生食物到**生产**食物的转变。其结果是更清楚地认识到美洲的农业发明、植物的种植[4]、位于热带的东南亚农业摇篮的较早发展[5] 以及最后还有非洲对于世界农业史的贡献的重要意义。

688

然而，在大约50年前，著名的俄国农学家和遗传学家N.I.瓦维洛夫[6] 就已断定，非洲可能存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后来，他的一个助手A.库普特索夫[7] 证实，这样的中心确实存在。数年之后，本章作者之一详细测定了这些起源中心的位置和数目，并阐述了它们的作用[8]。

然而，殖民主义偏见，加上对于许多非洲农作物以及一般对该大陆史前史的无知，使长时期以来把非洲对发展农业技术和资源的贡献不是贬低，就是全然置之不顾。

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近几年来，人们对非洲农业的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1968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的文章[9] 以及这些文章引起的广泛评论，就

① 雅克·巴罗(Jacques Barrau)注：罗朗·波蒂埃(Roland Porteres)是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教授，于1971年3月20日逝世。他受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之托，撰写了农业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这一章。他写了大纲，但这却成了他的遗作。我接过这份未完成的工作，根据他的已出版的许多著作、笔记以及我同他对这个问题的无数次讨论，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仍力图忠于波蒂埃对令人神往的非洲、它的起源、它的人民以及它的文明的强烈感情．我承认，拙作缺陷不少，但它是作为一种敬意献给一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对于非洲大陆的农业和栽培植物有更好的了解的导师和朋友。

② V.G.柴尔德(V.G.Childe)，1954年。

③ 例如，见 R.J.布雷德伍德(R.J. Braidwood)，1960年。

④ 例如，见 R.S.麦克尼什(R.S. MacNeish)，1961年。

⑤ 见J.巴罗，1975年。

⑥ N.I.瓦维洛夫(N.I. Vavilov)，1951年，第1－6页。

⑦ C.D.达林顿(C.D. Darlington)，1963年。

⑧ R.波蒂埃(R. Porteres)，1962年。

⑨ O.戴维斯(O. Davies)，《西非农业起源》；H.J.于戈(H.J.Hugot)，《撒哈拉农业起源》；D.塞登(D. Seddon)，《东非和南部非洲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还必须提到 J.D. 费奇和 R.A. 奥利弗编辑的研究报告，[10]以及最近W.G.L.兰德尔斯对研究班图文明史所作的贡献。[11] 但是在我们简单地谈谈我们对非洲农业史前史的了解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谈谈它的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和非洲农业的起源

农业技术的起源、发展和多样性显然同自然环境的某些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如，气候、水资源、地势的起伏、土壤和植被的性质、最初利用的植物种类、这些植物提供的食物性质，等等。然而，尽管这些因素在种植植物和饲养牲畜方面很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它们并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力量。还应考虑到当时存在的文化和文明的影响。

甚至在未有农业的时代和农业刚开始出现时，人类在不断迁徙中就随之带来了工具、技术、了解和说明环境的方式、以及控制和利用空间的方法。他还带着在他原来的生境中 689 同自然界的关系所产生的一整套看法和行为。因此，当欧洲刚刚越出旧石器时代的时候，近东已经有了植物的种植和牲畜的饲养，在那里，第一批城市开始出现，也正是近东，把一些技术发明介绍到多少有些落后的欧洲，这些技术及其附带的办法使欧洲也有可能发生一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非洲内部以及在相邻的大陆之间的人口移动，非洲也发生了同样的迁徙和交流。

但重要的是，要掌握创立农业、畜牧业和种植植物以及驯化动物的含义。人类经历了从**采集**(采集和打猎)食物到人工**生产**(种植和饲养)食物的过程。这样，人类开始逐步使自己部分地摆脱他所从属的生态系统的约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在他开始掌握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以前，他同其他各种动物一样，遵照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过着差不多一样消极的或生物群落的生活。

因此，农业和牲畜饲养业的出现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使人类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有可能改变生物过程，以便生产更多的东西，或生产不同于任其自然产生的东西。人类作为种植者和饲养者的新作用还使自然环境以及生产的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尽管人类已制服了周围自然环境的某些成分，但还是不能使自己完全和立即摆脱自然环境所强加的一切限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非洲农业史前史和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特征，必须大致描述一下非洲大陆的环境。我们发现，非洲环境可以沿着纬度划分为若干在生态上彼此不同的宽阔地带，对称地分布于赤道南北。

正如兰德尔斯(1974年) 指出的，某些这样的地带曾经起着阻隔南北迁徙的屏障作用。撒哈拉、巨大的赤道雨林、坦桑尼亚大平原和卡拉哈里沙漠就是这样的屏障。但是其他一些地带则提供了迁徙浪潮或人口移动可以涌进去的空地和袋形地带，例如，北部和南部的 690 热带大草原。不过，兰德尔斯还指出，这些屏障都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例如，撒哈拉和

[10] J.D.费奇和R.A.奥利弗(J.D.Fage and R.A.Oliver)，1970年。
[11] W.G.L.兰德尔斯(W.G.L.Randles)，197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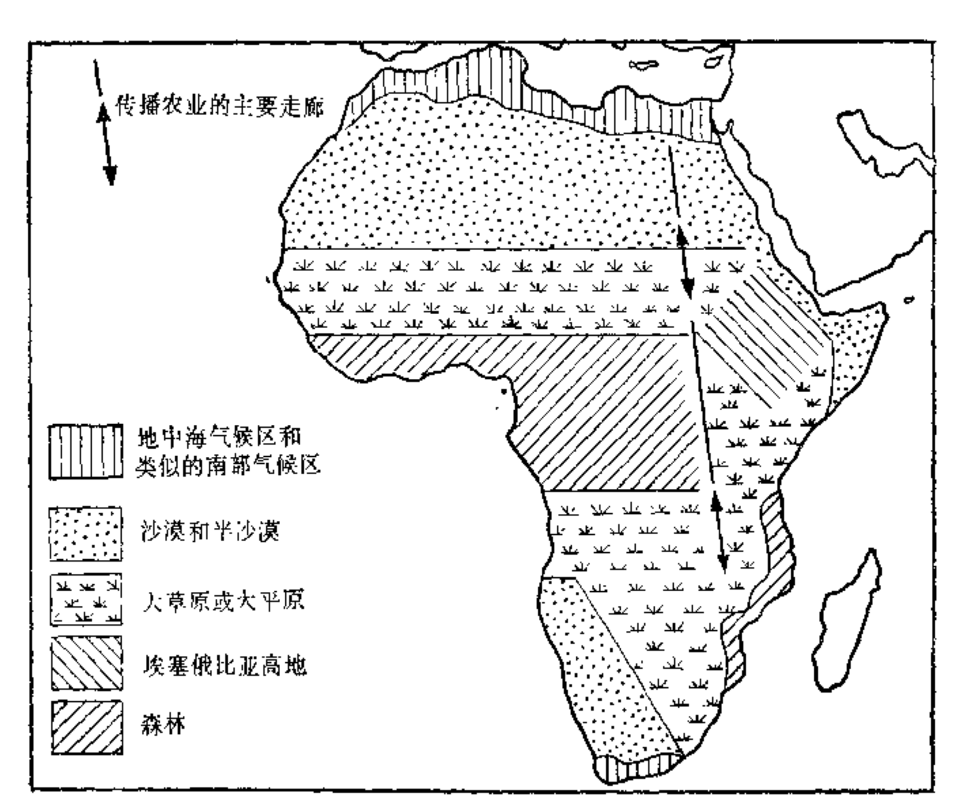


插图 27.1 非洲大陆纬度地带的划分

巨大的赤道雨林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曾有迁徙的人穿越其间。

纬度并不是划分非洲主要生态区的唯一因素。地理上的地势起伏，因而还有高度，也起着作用，例如，扎伊尔河-尼罗河标轴就把东非高地同西非准平原分隔开来，而西非准平原本身则又被普林西比岛和乍得之间的地壳隆起形成的较小界线等分为二。

因此，这种从纬度上来划分的非洲大陆各区域是有例外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要算前面提到的高地，这些高地同大裂谷平行，从维多利亚湖北边起直达穆钦加山，用兰德尔斯的话说，它们起着一条穿过赤道屏障的狭窄而安全的走廊的作用(插图 27.1)。还有埃塞俄比亚高原，它在非洲栽培植物的起源方面的作用将在下文谈到。

如果我们眼下把这幅画面的各个组成部分综合一下，那么，尽管可能极其粗糙，但仍可大致看出整个非洲的地貌：北部、东部和南部是几乎半圆形的大草原和大平原区，包围着中央的一块赤道森林，再往北和往南是那块干旱地区——撒哈拉和卡拉哈里沙漠——以及最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有两块狭窄的几乎是气候相同的地区，说得简明一点，这两个地区从气候上讲都可以说是地中海气候，尽管在非洲最南端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生态上的特殊现象(插图 27.2)。从非洲赤道森林心脏地区向外并撇开沿海地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象就是从极潮湿的地区到极干旱的地区，从赤道雨林型的一般化生态系统到大草原、大平原和沙漠灌木丛型的比较特殊化的生态系统。⑫

691

关于沙漠，说得明确些，撒哈拉，尽管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但这里仍不妨提醒一下，撒哈拉过去并不象现在这样全是一片沙漠，那里曾经有过农业和畜牧饲养业，有些作

⑫ 关于"特殊化生态系统"和"一般化生态系统"这两个词，见 D.哈里斯(D. Harris)，196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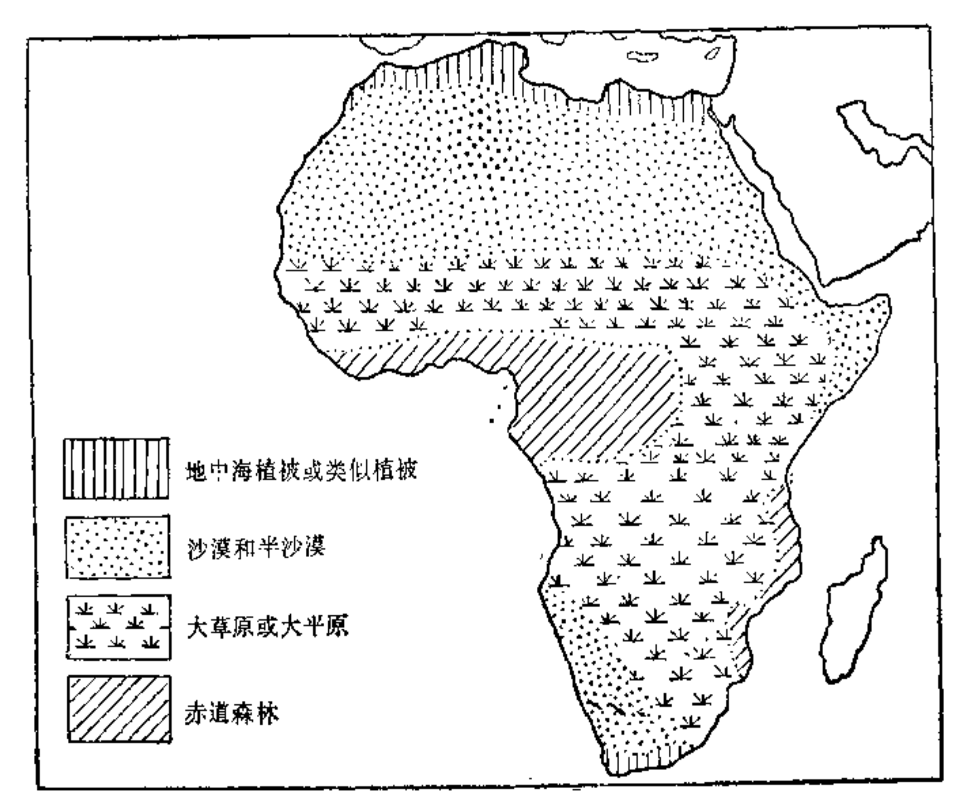


插图 27.2 非洲大陆的生态系统

者[13]曾经提到，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源地将在撒哈拉找到。

可是，回头来谈我们的非洲生态地图，我们可以假定，在有农业以前的时代，类似今天的俾格米人仍然进行的食物采集和狩猎曾在巨大的热带雨林的一般化生态系统中进行过，热带雨林中有着多种多样的食物资源，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种类繁多，数量丰富。 692

假设成群的俾格米人能得到大量食物资源而森林中的人口又很密集，那么很清楚，他们不必过分努力和担心便能获得所需要的食物，无须为食物操心。

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比较特殊化生态系统中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R.B.李[14]所研究的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这些人所能得到的食物样数较少，并且由于各季节在降雨方面的差异很大，食物资源往往局限于靠近水源的地方。

回头再看非洲产生农业以前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继更新世之后被称之为马卡利亚时期(我们纪元前 5,500－2,500 年)的潮湿期使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以南地区之间的接触较为容易，而水道和湖泊——甚至在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区——水位的增高也促进了渔业的发展并使依靠渔业为生的人作某种程度的定居。这两种情况都有利于逐步向农业过渡[15]。这个时候来自近东和地中海农业发源地的移民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16]。

从更新世末起，即我们纪元前 9,000 年到马卡利亚时期开始时，看来某些地方曾经大量生长着适合采食的那种野生植物，这无疑鼓励了早期人类集中居住在这些地方。赤道雨林边缘的森林和大草原的边界地区、东非草地高原、湖滨和尼罗河这样的大河两岸，以及北

[13] A.薛瓦利埃(A. Chevalier)，1938 年；H.J.于戈，1968 年；J.J.赫斯特(J.J.Hester)，1968 年。
[14] R.B.李（R.B Lee)，1966 年。
[15] 关于渔民的定居和农业起源的关系，见 C.O.索尔（C.O.Sauer)，1952 年。
[16] 见 J.D.克拉克（J.D.Clark)，1970 年b。

部和南部的海岸地区都属于这一类[17]。

这些过渡性地区，尤其是森林和大草原接界地区，具有农业发展和晚得多的——这是毫不奇怪的——非洲文明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特点。兰德尔斯谈到这一点时说，"在两块大草原(萨赫勒和森林周围)的边缘，就可找到最有影响的班图文明"。

我们现在应当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非洲种植植物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根据生态学的逻辑，植物是主要的生产者。

某些栽培作物的非洲起源

693 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人们才把兴趣集中到栽培植物的起源上来。如果除开1883年出版的A.德康多尔的杰作不谈，那么只有苏联遗传学家N.I.瓦维洛夫及其小组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开始的工作，才对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采取全球性方法，才研究人类利用环境和资源的尝试[18]。瓦维洛夫的出发点是在栽培植物中看到的变异，他和他的助手把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数据的系统分析同农业植物编目和遗传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指出了栽培植物最早出现的8个地区。这8个地区包括具有较多局部重要性的3个次级中心。只有1个主要中心，**阿比西尼亚中心**，是在非洲，虽然另一个中心，**地中海中心**，涉及一部分非洲大陆(北非和埃及)，并显示出同无比重要的近东起源中心相近，我们已经说过，除了其他栽培植物外，主要谷类植物(小麦、大麦和黑麦)出现于近东起源中心。

关于非洲，瓦维洛夫的结论同康多尔的结论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康多尔只承认3个主要的农业和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中国、东南亚(延伸到埃及)和美洲。

在考察栽培植物起源的理论方面，瓦维洛夫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因为他确定了区分初级变异中心与次级变异分区的必要性。在初级变异中心，一种特定植物的多样性是同显性性状的持续结合在一起的，而次级变异分区表现出在初级变异中心被掩盖的许多隐性性状。

如果变异中心在同一地区是彼此紧密相联的，那么这些中心便共同构成一个"农业摇篮"，而其存在通常表明，一种文明曾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改变并培植那个社会所需要的植物。

强调指出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一个栽培植物品种的植物起源地不一定就是这种植物第一次被人类为了人的自身利益而加以干预改造的地区。所以，人们常常必须区分一个栽培品种的野生亲本的起源地和该植物被人培植和选择以后以改变的形式出现的地方。关于后面这一点，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即在采食野生植物的漫长岁月里，一个野生的亲本必定经常被带离它原来的生境[19]。

694 一位现代作者完成了瓦维洛夫的[20]工作，他表明，除了阿比西尼亚中心和地中海中心的非洲部分以外，还存在一个西非中心和一个东非中心，东非中心可能是阿比西尼亚中心

---

[17] 见J.D.克拉克，1970年b。

[18] 关于N.I.瓦维洛夫(N.I.Vavilov)的重要工作，见前引书，1951年。

[19] 见J.巴罗(J.Barrau)，1962年。

[20] 见R.波蒂埃(R.Portères)，1950年，1951年a。

向赤道高地的延伸。[21]

现将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地中海中心。该中心的非洲部分包括一批现在具有地中海地区特色的栽培植物，如谷类植物(特别是小麦和大麦)和有可食籽粒的豆科植物(鹰嘴豆属、扁豆属、豌豆属、蚕豆属)，这些植物在近东中心也有发展。我们在这里还发现共同的地中海栽培品种，如橄榄树（*Olea europa* L.）和角豆或地中海刺槐树（*Ceratonia siliqua* L.）。但是，某些植物却是非洲特有的，如源于摩洛哥的山揽科树(*Argania sideroxylon* Roem.)，这种树产油和树胶。埃及属于这一中心，因为它同近东有十分明显的联系，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对北非的影响十分重要。在埃及和叙利亚，亚历山大车轴草（*Trifolium alexandrinum* L.）得到了发展并被证明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虽然地中海中心的这一非洲部分在热带非洲的农业发展方面并不起直接作用，但当它在撒哈拉的气候有利于种植和饲养牲畜的时候，它确实对撒哈拉产生过深远影响[22]。

阿比西尼亚中心在其出产的栽培植物种类方面同近东中心有着亲缘关系(大麦、小麦和鹰嘴豆属、扁豆属、豌豆属、蚕豆属这种豆科植物)，也同在非洲诸中心本身发现的某些栽培植物有亲缘关系，如我们在下文谈到的高粱。看来很明显，源于亚洲的植物是通过该中心传入非洲的。然而，这个阿比西尼亚中心也产生某些特有的栽培植物种类，其中有阿拉伯咖啡（*Coffea arabica* L.），阿比西尼亚香蕉树（*Musa ensete*, I. F. Gmelin)，埃塞俄比亚画眉草（*Eragrostis abyssinica*, Schrad.）以及尼日尔含油籽的黑色种草（*Guizotia abyssinica*, L. f. Cass.）。

东非中心的特点是具有多种蜀黍属植物，其中包括轮生花高粱以及各种狗尾草属植物，如龙爪稷和各种芝麻。

西非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芦苇状高粱衍生而来的多种蜀黍属的起源；密穗狼尾草以及蹄状狼尾草的狗尾草属植物的起源；此外还有包括伊布若马唐(*Digitaria ibura* Stapf.)和无毛马唐(*D. excilis* Stapf.)的黍状马唐以及几种下文将要论述的稻属植物[23]。

我们可把该中心分为两个主要的植物分布区：热带区和次赤道区。在热带区内又有几个分区(塞内加尔冈比亚、中尼日尔、乍得－尼罗河流域)，其中每个分区都生产特有的栽培作物，主要是谷类植物，但也出产一些块茎作物(特别是鞘蕊花 *Coleus dazo* Chev.)和一些油料作物，例如帕卡牛油果(Don.)，科茨楚(Kotschy)(也被植物学家叫做橘揽)。三暑蓣属植物(黄薯蓣，萝丛薯蓣，园薯蓣)，油料作物(油棕，葫芦科植物)以及刺激物(苏丹可乐果)特别属于次赤道区。实际上该中心已延伸到中非地区，正如上述某些品种的植物(可拉植物、鞘蕊花、油棕属)的分布区那样。此外还有落花生或大豆(豆科植物)和非洲的豆科植物（*Kerstingiella geocarpa* Harms.）也起源于西非中心。

695

现代作者认为，在赤道森林的正东和正南方向，最初有一个综合品种栽培作物带，它类似北非中心所发现的作物带，并且大致上沿着森林地带的边缘，成为东非中心的外围，

---

[21] 见R.施内尔（R.Schnell），1957年。
[22] 见J.D.克拉克，1970年b，和H.J.于戈，1968年。
[23] 见R.波蒂埃，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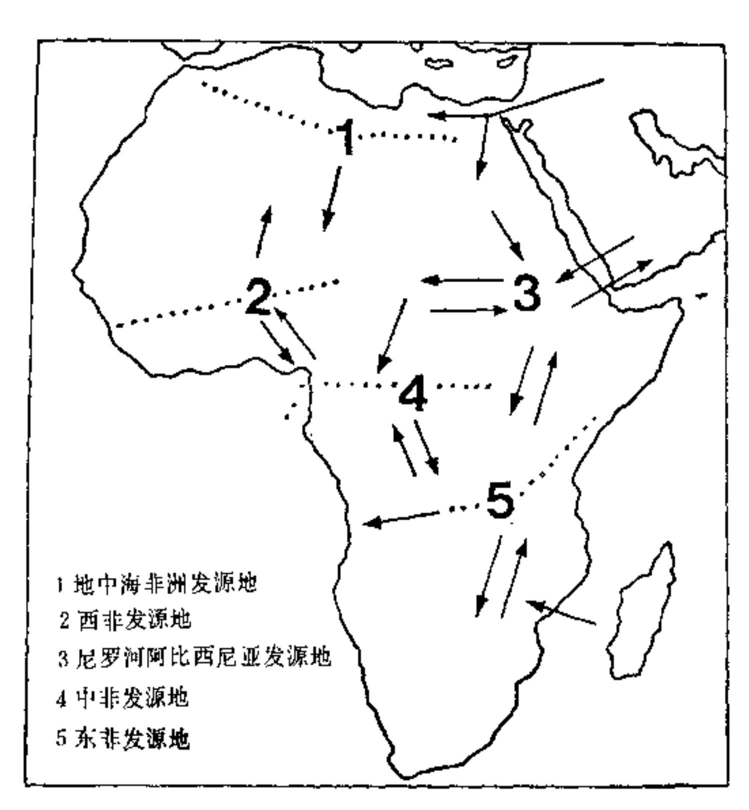


插图 27.3 非洲农业的发源地

从而实际上它同上述森林周围的主要食物采集地带同样大。㉔

所有这些考虑都使㉕我们推测，在非洲存在若干农业发源地，我们可将其列述如下（插图 27.3）：

（1） 非洲－地中海发源地，从埃及延伸到摩洛哥，它推动了撒哈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埃及它也成为与近东发源地进行交流的一个渠道。

（2）（a） 西非发源地，包括热带部分和亚热带部分。

（b） 在非洲东部的尼罗河－阿比西尼亚发源地，包括两部分：尼罗河部分和阿比西尼亚部分。

（3） 中非发源地。

（4） 东非发源地，位于中非发源地以东，向西延伸到安哥拉。

再往南，看起来食物采集者无疑拥有足够的资源，而且被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所隔绝，以致长期以来他们竟然抵制了来自上述发源地，尤其是东北发源地的农业和畜牧业的渗入。㉖

“农业发源地”这一概念有语病，使人以为农业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中的发展是东一块西一块孤立进行的。然而，根据已经说过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可能作出比较连贯而全面的描述。

在森林中间的核心地带，当时有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由此而发展成一个“园艺中心

㉔ 见 D. 塞登（D.Seddon），1968 年。
㉕ 见 R. 波蒂埃，1962 年。
㉖ 见 D. 塞登，1968 年。

区"(我们认为这个词比较可取，而R. J.布雷德伍德和 C. A. 里德[27]所提出的"植物栽培中心区"这个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在森林环境中，在采集野生食物方面仍然有足够的资源使这种生活方式继续存在。应当注意到，该中心可以栽培的植物在品种上少于亚洲或美洲湿润热带森林中心所发现的植物。其次，在森林边缘地带有一望无际的热带大草原，提供了比较单一化的生态系统，这个大草原已变成栽培谷类作物的农业中心区，而且已经从西非延伸到东非，向南延伸到安哥拉。 696

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谷类作物的栽培已从美索不达米亚遍及整个埃及。而且在环境适宜的时候，谷类作物的栽培也传播到撒哈拉地区，这一事实大大有助于说明作物栽培向当今这个大沙漠南部的传播，以及向与南撒哈拉非洲相反的方向传播的情况。

此外，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也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但该地区与热带大草原和干燥草原的农业中心区也有某种关系，同时也具有自己的栽培特点。

园艺中心区不同于农业中心区，前者主要栽培块茎植物而且在栽培方法上更多地是园林栽培(森林的园圃及其边缘)，而不是大田种植(热带大草原和干燥草原的耕地)。 697

在整个非洲大陆，使用的农具主要有锄、掘土棒及其变种工具，但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引进的原始犁也传到了谷类作物栽培中心区的一部分地区。

高粱和水稻的栽培

与森林带综合生态系统园艺中心区相反，处于热带大草原和干燥草原比较单一化的生态系统的非洲农业中心区的特点，首先是食用通过播种所生产的栽培植物，其次是谷类在当地居民的各种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农业制度是大面积栽培农作物，完全不同于作为在森林带所发现的园艺区的特征的单一作物种植。毫无疑问，农业文明是以砍伐森林为代价来扩充耕地面积的，因为在农业文明扩大其地域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大森林，因此这样一来势必扩大了热带大草原的范围。从生态学方面来讲，这些农业文明将其某种程度的专门化强加于原来是自然形成的生态系统，并以这种办法使自然环境受技术的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使自然环境服从于人们对于环境应当发展成什么样的设想。然而，在农业渗入森林环境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例如，可能为了种植更代表森林特性的粮食作物而放弃谷类作物，甚至——这种可能性不应排除——以采集植物作为热带大草原人群的生活手段，这些人通常都是些不得已而在森林环境生活的从事农业的人。

可是，实际情况依然是这样的，栽培谷类作物是干燥草原和热带大草原农业的主要特点。在这些谷类作物中，特别有一种——高粱(*Sorghum* spp.)或玉蜀黍——似乎是该农业中心区整个地域的特有栽培品种，纵然也发现了一些其他不同来源的品种。

长期以来，各种高粱品种的来源问题已成为种种不同意见争论的主题[28]，但是，看起来，高粱似乎确确实实起源于非洲，而且事实上它们在非洲农业中心区确实有若干独立的起

[27] R. J. 布雷德伍德(R. J. Braidwood)和 C. A. 里德(C. A. Reed)，1957 年。
[28] 见R.波蒂埃，1962年。

源点。起源于自佛得角至印度洋的热带湿润地区的野生芦苇状高粱派生出一批在西非栽培的高粱品种，其中有深黑高粱、光亮高粱、德拉蒙氏高粱、珍珠高粱、几内亚高粱、冈比亚高粱、展穗高粱。起源于东非地区自厄立特里亚至东南非的野生轮生花高粱派生了两类栽培高粱品种：东南非高粱或卡菲高粱：卡弗罗鲁姆高粱、草质高粱、甜高粱，以及通常可在自尼日利亚苏丹至厄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乍得河－尼罗河型品种：发黑高粱和尾状高粱。而起源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野生品种埃塞俄比亚高粱又派生出在青尼罗河发现的硬高粱、在自乍得至印度以及所有半沙漠型国家栽培的硬杆高粱、在尼罗河地区发现的垂头高粱、近光秃高粱以及在尼日利亚三角洲中部地区栽培的黑高粱。

在西非发源地热带区尼日尔河中段，有一种特别的栽培高粱品种，蜜甜变种高粱，由于含糖量很高，所以可以用来酿制含酒精的饮料㉙。其他品种高粱也被用以制成"高粱酒"。

这些不同类型的栽培高粱品种之间有杂交关系，大粒高粱（在坦噶尼喀至津巴布韦和安哥拉发现的）以及罗克斯伯氏高粱（在乌干达、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发现的）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两种高粱品种似乎是高粱品种的杂交结果，其中有些品种与芦苇状高粱有亲缘关系，而其他一些品种与轮生花高粱有亲缘关系。

在这些高粱品种中，值得注意的是硬高粱，因为它广泛分布于自东苏丹至小亚细亚和印度，以及自美索不达米亚至伊朗和古吉拉特整个地区。

以上情况足以说明这些谷类作物在非洲热带大草原和干燥草原的植物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这一重要性远远超出非洲大陆的界限，因为这里培养的某些类型的高粱品种很早就传到世界其他地区了。

因此，似应把非洲视为一个既拥有若干农业发源地又拥有多种栽培中心的地区，许多栽培作物起源在这里，其中有些栽培作物已在全世界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非洲也是其他栽培品种的发源地，当然首先包括水稻，这些品种主要由本地品种发展而来。在西非发源地，更确切地说，在尼日尔河中段的一个主要变异中心，以及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的一个次要变异中心都曾发现过这些品种。

在古典时代，斯特拉波曾经谈到非洲水稻的栽培情况，在十四世纪，伊本·巴图塔也提到，水稻产于尼日尔㉚。但是，这一证据常常被忽视，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非洲水稻栽培是从引进亚洲水稻（*Oryza sativa* R.）开始的。直到大约1914年，才承认存在一种主要的非洲水稻品种（光秃水稻 *O.glaberrima* Steudel）。这是一种具有坚硬笔直散穗花序和棕色或红色颖果的品种，既可以野生采集，也可以栽培种植，看来它与在非洲大部分热带区发现的短舌水稻是有亲缘关系的。

这种非洲水稻给N.I.瓦维洛夫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苏联农学家和遗传学家证实，如果要将野生母本植物改变为栽培品种，那么就需要相当广阔的土地。就非洲水稻来说，很可能不同于尼日尔河三角洲中部（主要中心）的以显性性状为主的品种，并且也不同于上冈比亚和卡萨芒（次要中心）的各种隐性性状品种。因此，非洲各种栽培水稻从尼日尔

㉙　见 R.施内尔(R.Schnell)。

㉚　同上。

河三角洲中部地区向周围发展，遍布西非至几内亚滨海区。当然采集各种野生的光秃水稻曾经是极陈旧的做法，而在这些比较集中的采集食物中心区这类野生谷物一定十分繁多，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最初的植物栽培。因此，可以设想，非洲水稻的栽培至少象其他非洲谷物的栽培一样，很早就开始了。

后来，亚洲的栽培水稻品种（*O.sativa*）传入非洲，可能是东非滨海地区的阿拉伯人从八世纪起传入的，也可能是西部沿岸地区的欧洲人十六世纪开始传入的。

既然上述各种栽培品种的起源问题已得到证实，那么本章必需作出总结，看来非洲的农业文明显然是内源的，而且是以源于当地自然环境的植物资源为基础的，因此，没有任何必要牵涉到来自大陆以外的各种影响。

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提到，农业和畜牧业从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的传播在非洲农业的早期历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从阿比西尼亚经过埃及尼罗河流域延伸到北非的这片地带可以被认为是奥迪库尔和黑迪（1943年）所提出的“古地中海”地域的一部分。但是甚至在这里，尤其在埃塞俄比亚，还有埃及和北非，我们都发现了栽培品种，严格地说，是非洲的栽培品种。

古时候，非洲和亚洲（除近东以外）的交往历史更值得注意，但很少有人知晓。正如上述有关高粱的栽培情况清楚表明的，非洲曾传给亚洲许多经过栽培的植物。非洲也从亚洲不仅得到了近东栽培作物（小麦、大麦等等），而且得到了东南亚热带地区传入的各种植物品种。看来香蕉、大薯（*Dioscorea alata* L.）、芋头（*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可能还有甘蔗（*Saccarum officinarum* L.）是从西南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传到非洲海岸的，也许是早先在东南非登陆的航海家带进来的。在这些产于亚洲的栽培植物中，某些植物，特别是香蕉，使农业在非洲热带森林地区比较容易落户。 700

非洲－亚洲相互交流品种的一个很好的实例[30]就是高粱。亚洲至今仍然有非洲品种的栽培高粱，除上述高粱品种之外，特别是，例如，双色高粱，似乎是埃塞俄比亚高粱和野生苏丹品种杂交的一种栽培高粱。这种双色高粱可能与近代再度传入非洲的印度、阿拉伯半岛和缅甸的都卡那高粱、近年来传入肯尼亚的印度的粟状高粱以及东非高粱特别有关。然而，另外一种栽培高粱，具脉高粱似乎与埃塞俄比亚高粱和双色高粱有亲缘关系，看来，缅甸高粱、中国高粱以及其他品种高粱也与它有亲缘关系。

在没有对这种遗传的杂交高粱品种的不可避免的复杂细节进行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有大量迹象表明，在非洲高粱品种和亚洲高粱品种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一切都说明，亚洲和非洲东部之间栽培作物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和相互交流。当然我们还知道，在殖民统治以前的时期，非洲就已经拥有若干起源于热带东南亚的栽培作物品种。

---

[30] 见 R.波蒂埃，1962年。

我们已经说过，由于香蕉和芋头这些起源于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湿润的热带森林的栽培作物品种的出现，农业在非洲森林中获得立足之地，可能是比较容易的。早期移居者到达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海滨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带走了许多培植过的植物品种。

尽管古时候非洲曾经与东方交流过栽培作物品种，但是看来，在驯化动物方面显然是亚洲得益于非洲。例如，东非的某些猪类看来与亚洲驯化的猪科有亲缘关系。正如C.C.里格利所说的[32]，"完全可以肯定，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并非独立发展起来的，那里的动物群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包括驯养的牛、绵羊和山羊这些动物品种的原型。"这些动物品种是从埃及通过尼罗河流域传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古地中海区域的非洲部分曾经驯化过某些这类动物品种。就牛而言，这似乎是特别有可能的，因为新石器时代前的人类似乎猎取过埃及的原始牛和短头牛。

701

这一简单的叙述有助于说明，非洲决非依赖其他地区的发展而取得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同欧洲或亚洲一样，非洲也没有忽视本大陆以外的贡献，而且确实同欧洲和亚洲一样，非洲北部地区当时也属于地中海区域，早先曾有过比现在大得多的生态连续性。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非洲大陆也栽培过某些使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得益的本地植物，例如各种经过栽培的高粱品种。但如果非洲某些地区在很长时期内仍然以采集和打猎作为主要生存方式，那么这并不是由于不发展的缘故，而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丰富食物资源，这使得人类可以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在其生态系统中生活下去，而不必通过驯化的手段来改造它。

结　论

在采集食物的同时就有了初生形态的农业。这种农业只是有意维护某一种植物的生长，但不直接涉及其繁殖过程。某些结出可食果实的乔木和灌木，如可乐果、乌地卡榄和油棕榈，现在仍是这样。但我们也在非洲大陆上看到园艺和农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总而言之，存在着一系列传统的农业技术，包括种植稻米的精巧的整地方法、火的利用，尤其是用于开垦丛林和土地施肥，以及适合于林地的栽培和畜牧的结合。

实际上，非洲农业是在三个主要中心或集中点开始发展起来的(插图27.4)。第一个中心包括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非，形成地中海范围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肯定受到近东农业和牲畜饲养业发源地的发展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也经历了自己的独特发展过程。第二个中心包括非洲森林心脏地区周围的热带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带，生产谷物的农业(高粱和小米)在这里形成。第三个中心包括森林及其边缘地带，其特点是园艺业同食物采集并存（并从食物采集过程中选取了某些作为培植的农作物）。

在这些中心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小麦、小米和高粱几乎传到了绿洲；起源于从事园艺的森林边缘的粮食作物在热带大草原的田野里落了户，而园艺中栽培的则是从热带雨林中从事专门采集食物的地方得到的植物。埃塞俄比亚是另外一个例子，它的经济作

[32] C.C.里格利(C.C.Wrigley)，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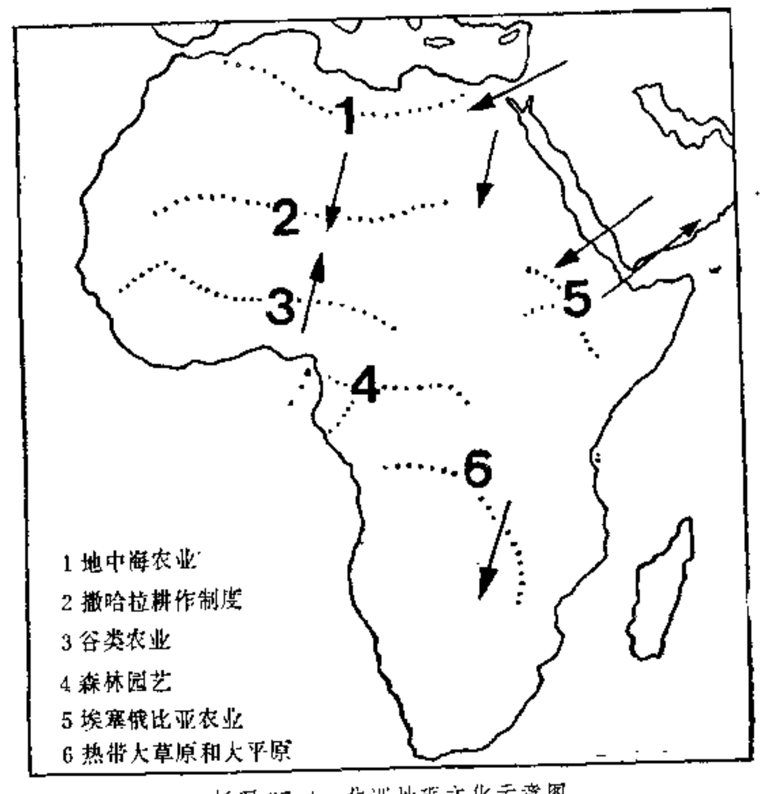


插图 27.4 非洲地理文化示意图

702

物中不仅有本地的植物，而且有来自地中海区域的植物，还有来自热带大草原和大平原以及甚至来自亚洲的植物。

在所有这些农业发展中心中，看来最重要的是热带大草原和大平原中心，特别是其中靠近森林或重要水道和湖泊的地区。

要确切确定非洲农业史前史和历史的年代现在仍有困难。但是有理由认为，开始栽培植物的关键性时期是在更新世末期，即在我们纪元前 9000 年到 5000 年之间。在这段时期中，食物采集活动增加了，并且在中央森林带的边缘和内陆水域的周围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业化工作，渔业得到了发展并导致某种程度的定居。实际上，出现了有利于栽培植物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虽然这有待于考古学证实或驳倒这个看法——当近东肥沃新月正在奠定农业和畜牧业基础(它们后来同其他因素一起成了欧洲文明的基础)时，非洲就开始了植物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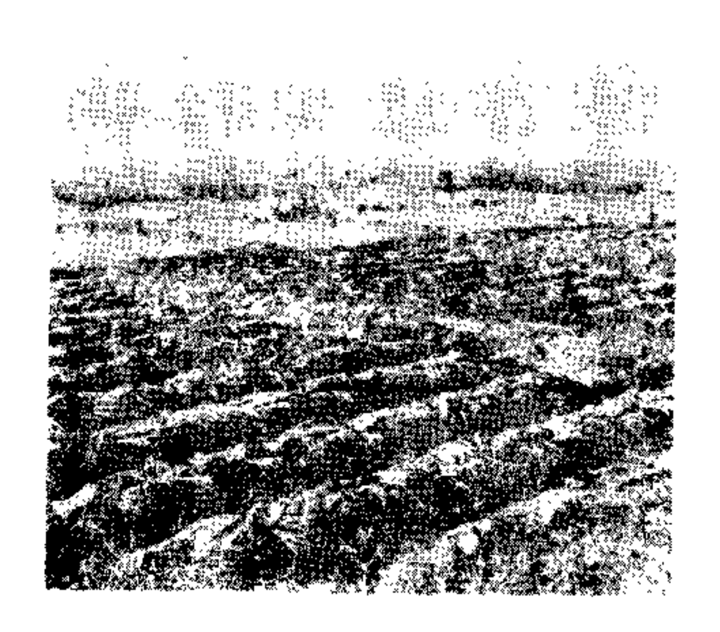
(郑玉质译)

703

照片 27.1　表土烧荒，富塔贾隆；皮塔，廷比马迪纳(R.波蒂埃摄影)



照片27.2　塞内加尔“小海岸”群岛上从事捕鱼和种稻的塞雷尔人使用的“蒿”或铲。这种工具用于红树林沼泽重粘土稻田中的耕耘和起垄，它相当于卡萨芒斯河迪乌拉人的“卡坚多”以及几内亚沿岸巴加人的“科菲”或“科帕”(R.波蒂埃摄影)



照片27.3　土地的耕作，卡迪安多，乌索罗（卡萨芒斯）的久拉人在整地准备再植秧苗（R.波帝埃摄影）

704



照片27.4　在无法排除淡水的低洼水地用来种植水稻的人工岛屿，几内亚比绍（R.波蒂埃摄影）

705



照片27.5　在雨季期间暂时清水沼泽化的永式土 稻田 垄沟（种植水稻的贮雨池）；毛亚萨卡萨芒斯的巴约伊村（R.波帝埃摄影）

706

28 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以前金属的发现和传播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

J.韦库泰

在非洲全部历史中，尼罗河流域起着特殊作用。长6,500公里的尼罗河虽有大瀑布的艰险——有时被过分夸大了①——但仍然是非洲南北交通和横贯大陆的贸易通道，这个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尼罗河由北向南，越过纬线16度，在西面的拜尤达沙漠和东面的布塔纳沙漠之间穿过，进入一个终年降雨的地区和横跨非洲的东西通道，这条通道从大西洋通达红海，中经尼日尔河流域和乍得盆地、达尔福尔和科尔多凡高原、阿特巴拉和巴腊卡山麓平原。这样，除了有沟通赤道大湖和地中海之间南北交通的优点以外，由于从尼罗河流域可以进入扎伊尔河、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又有沟通东西交通之便。

因此，占据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广阔地区对于非洲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不幸的是，在考古学或历史学方面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应有的考察。从第二瀑布到地中海这一段尼罗河流域的下游，由于考古学家的努力，人们知道得比较多一些。从十九世纪初至今，考古学家一直在对这一段进行调查。但对于尼罗河流域中段，即第二瀑布和第六瀑布之间那一段，以及尼罗河上游，即从喀土穆到大湖，尤其是尼罗河及其支流两边的沙漠地区，考古工作进行得很少，几乎未曾涉足，历史上所知道的仅仅是一些假设，而且往往是根据不充分的甚至片面的观察作出的假设。

本章将按年代学和地理学的顺序，分两个时期来谈。第一个时期从新石器时代到第三个千年期初期，其时已有书面证据——即历史记载——出现于尼罗河下游：我将从略有所707 知的地段追述到一无所知的地域，换句话说，从北说到南，谈谈已知的尼罗河两岸的所有文明。第二个时期从第三个千年期初期到我们纪元前第五世纪，就和谈第一时期一样，地理上从尼罗河下游谈到上游。

从新石器时代到我们纪元前第三个千年期

这个时期大体包括我们纪元前约5,000年到3,000年的2,000年时间。在这个时期里，尼罗河流域出现了金属，并传播开来，同时也出现了最初的社会制度，因而，从历史观点看，这个时期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第二十五章已经论述了新石器时代尼罗河流域的各种文化，这里我不再细谈其物质方

① 关于大瀑布及其实际的或人们想象的困难，描写得最详尽的仍推A.切留(A. Chelu)的著作，1891年，第30-73页。该书描写了每一个大瀑布并绘出可通航的水道航线图。

面，但我要再扼要地提一笔，因为论述原始尼罗河流域历史的黑暗时代(从我们纪元前3,800年到3,000年)而不提及它以前的各种文化，是难于做到的。事实上，新近在努比亚和埃及进行的全部研究都充分证实了，金属的出现并不是东北非文明总的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突破：黄铜时代的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直接和正统的继承者，而且在现场上往往无法分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与铜器时代的遗址。埃及塔尼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新石器时代最后一批种族的首领的合法后裔，正如底比斯时期的大法老都是孟菲斯帝国君主的真正继承人一样。

尼罗河下游(我们纪元前4,500年至3,000年)[2]

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纪元前大约3,000年时，埃及尼罗河下游建立的社会组织毫无疑问是由于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灌溉技术。人类占据尼罗河流域始于新石器时代，并继续演化，形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度。

正如希罗多德所说的，“埃及是尼罗河的献礼”，后来无数作家都引述这一说法。从人类历史时期开始，当从大西洋到红海的撒哈拉的干旱过程处于最后几个阶段时，埃及如果没有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汛期，是无法生存的。如果没有冲积层，这个国家会象内格夫或者撒哈拉本身一样成为一片沙漠。但是，埃及从尼罗河得到的造福生灵的礼物也可能成为一剂毒药。在奥索孔三世三年(我们纪元前754年)时，洪水泛滥，坝堤尽毁，“底比斯的神庙尽成泽国”；阿蒙的祭司长不得不祈求神灵，制止河水上涨。塔哈卡六年(我们纪元前683年)，洪水再次肆虐，整个整个村庄“成为一片汪洋”——可是国王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竟把尼罗河河水泛滥说成是天赐之福。

708

河水泛滥是差异很大的：往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很少恰到好处。[3]例如，1871年到1900年，尼罗河每年的泛滥情况是：3次泛滥成灾，3次中平，10次有益，11次水量过大，3次险些酿成洪灾。在这30次河水泛滥中，真正令人满意的只有10次。[4]

因此不妨说，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历史，是人类“驯服”该河的历史。在驯服河流的过程中修建了水坝、土堤或大堤——有些是同河流的航道平行的，有些则拦腰截断。因而也就有可能在河两岸修建水库以拦蓄洪水并浇灌河水泛滥不到的土地。

这种灌溉制度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发展起来的，而且只能逐步形成。[5]为了使水库真正发挥效益，就需全国加以周密规划，至少是各大区的周密规划。这意味着事先要在一大批人中间达成协议，才有可能共同努力。这就是尼罗河下游第一批社会制度的起源：首

② 关于在出现了第一批社会制度的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前的埃及社会发展，参见W.C.海斯(W.C.Hayes)出色的调查报告，1965年版。由K.C.西尔(K.C.Seele)编辑的这部遗作有一整章论述埃及的社会发展(第一卷，第1-29页)，并附有丰富的分析性文献目录(第29-41页)。

③ 关于尼罗河河水泛滥的危险，参见J.贝桑松(J.Besancon)，1957年，第78-84页。

④ 同上，第82-83页；参考书目，第387-388页。

⑤ 据我所知，关于埃及灌溉问题的一般性著作并未考查埃及灌溉的出现和逐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描述过去灌溉制度的有贝桑松，同上，第85-97页；F.哈特曼(F.Hartmann)，1923年，第113-118页。L.克尔齐赞尼亚克(L.Krzyzaniak)，1977年著作把它分为自然灌溉时期(第一章，第52-123页)和受到控制的灌溉时期(同上，第127-167页)。人们认为受到控制的灌溉时期开始于盖尔泽时期(纳加达第二时期)，参见上书，第137页，我们纪元前大约3070年，增加或减少290年。关于这个年代，见H.A.诺德斯特龙(H.A.Nordström)，1972年，第5页。

先围绕着一个地方农业中心形成一些种族集团，然后几个中心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两个比较大的政治集团，一个在北，一个在南。⑥

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我们纪元前5,000年到3,000年这一时期的证据没有提供什么线索，说明占据尼罗河下游并在那里进行耕作的社会制度的确切性质。上文用过的"种族集团"这个词可能引起误解。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那个时候住在尼罗河沿岸的集团在人种上彼此明显不同，尽管认为那时已经存在政治或政治-宗教集团的说法看来已经证实。我们作结论的根据只是小小的祭祀奉献物上的艺术作品：化妆用的研色板和具有巫术或宗教意义的棍棒。这个证据反映出——而且只是非常简要地反映出——这个时期末的状况，即第四个千年期的最后几代人的状况⑦。但不妨假定，我们从这个证据中略窥其端倪的那个社会制度在这个时期的最初两千年中改变甚少。

709

成文史的起源同南北两个政治集团融为一个国王统治下的单一制度的过程在时间上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纪元前5,000到3,000年之间尼罗河下游的简要历史，其特点是，不但出现了金属——这是次要的现象——而且主要是人类占领了整个尼罗河流域。这不但涉及堤坝和水库的修建，而且涉及平整土地，消除积水的洼坑，将水疏导到尼罗河流域的所有可耕地去。毫无疑问，这是农民对于任何人都认为基本上是敌对的大自然所取得的一次胜利。

新石器时代

本卷第二十五章详细叙述了构成社会发展的文化形式的不同文化或文化水平的重要特征，而这些文化是在苏丹和埃及尼罗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埃及前王朝时代的标题下提出的。下面我们只着重谈谈这些文化的社会方面和历史发展情况。实际上，在尼罗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埃及前王朝时代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统一体。仅举一例，第二十五章（第480页）详细分析的拜达里文化只是从塔萨文化（同上，第480页）开始而在纳加达文化II（同上，第481页）和塔尼特王朝前各社会达到顶峰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换言之，本章将对第二十五章分析过的事实加以综合。所提出的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六角括号〔 〕表明应参阅的段落，以便读者查阅本章只一带而过的各种文化的详尽材料。

关于埃及新石器时代，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寥寥可数的遗址，而且往往甚至不属于同一时期。最古老的遗址发现于中埃及尼罗河流域以西法尤姆凹地的边缘〔＝法尤姆B——第二十五章，第481页〕。⑧在埃及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开罗西北约48公里三角洲西岸的沙漠边缘的美利得－拜尼－撒拉迈〔＝美利得，第二十五章，第482页〕⑨和离开罗不远的赫勒万附近的欧迈尔〔＝欧迈尔A和B，第二十五章，第483页〕。⑩在中埃及

710

⑥ J.韦库泰(J.Vercoutter)，1967年，第253-257页。

⑦ 关于这些问题，见J.-L.德塞尼瓦尔(J.-L.de Cenival)，1973年，第49-57页。

⑧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法尤姆，参见W.C.海斯，1965年，第93－99页和第139－140页，并参阅F.温多尔夫(F.Wendorf)，R.赛义德(R.Said)和R.席尔德(R.Schild)的评论，1970年，第1161－1171页。

⑨ 关于美利得－拜尼－撒拉迈遗址，参见W.C.海斯，第一章，第103－116页和第141－143页，又，有关陶器制品，参见L.赫亚勒玛(L.Hjalmar)，1962年，第3页及以后各页。

⑩ 参见W.C.海斯，1965年，第117－122页和第143－144页。

和上埃及，一个遗址在艾斯尤特东南的代尔塔萨，还有两个不甚重要的遗址在底比斯地区的图赫和阿尔曼特杰贝勒。⑪ 不妨将这些遗址作个对比，以确定这些遗址所体现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的性质和年代，可是，由于这些遗址不属于同一时代，使得这种对比工作就更加困难了。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最古老的遗址法尤姆 A 溯源于我们纪元前 4,400 年(±180 年)，其次是美利得－拜尼－撒拉迈遗址，属于我们纪元前 4,100 年(± 180 年)和欧迈尔遗址，溯源于我们纪元前 3,300 年(±230 年)，最后是塔萨遗址，溯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⑫

换句话说，从已发掘的遗址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法尤姆和尼罗河三角洲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情况以及三角洲以南和中埃及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情况；但是在我们纪元前 4,000 年到 3,300 年之间，即七个世纪，我们对于整个新石器时代埃及的一般发展情况都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中埃及以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的确，在尼罗河流域边缘和沙漠中，地面上的发现是不少的：这些发现证实，第六个千年期末存在过被称之为潮湿的间隔期或新石器时代次洪积期，⑬ 这个时期标志着东北非气候干燥过程中的一次间歇。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发掘，这些遗留物的发现说明不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唯一真正有用的是根据前面提到的作了适当发掘的遗址写成的研究报告。因此，很清楚，还有很大一片空间和很长一段时间尚未进行考察，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人们普遍承认，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是从业已证明有悠久历史的近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肥沃新月”传到埃及来的。杰里科的原始新石器经鉴定是在 6,800 年，比法尤姆的新石器文化早得多。但是要证明尼罗河下游新石器文化，特别是三角洲和法尤姆的新石器文化确实是来自亚洲，就得从沿海边缘和三角洲的东部远至孟菲斯这一带的遗址中取得资料。而这方面恰好是我们知识的空白。结果是，关于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亚洲的说法至今仍是一种假设⑭。这是一个目前需要佐证的假设，特别是因为过去十年在撒哈拉进行的考古调查已经表明，那里的新石器文化同样很古老，尤其是在阿哈加尔，那里的阿迈克尼遗址差不多和杰里科原始新石器文化是同时代的⑮。事实上，撒哈拉－苏丹新石器文化的年代都比埃及新石器文化年代早，至少比新近确定年代的法尤姆和美利得－拜尼－撒拉迈的遗址⑯ 和努比亚新石器文化⑰ 的年代早。而且，如果我们又仅以新近得到的材料为根据，那么努比亚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比埃及早⑱。 711

鉴于撒哈拉－苏丹新石器文化年代较久，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埃及和

⑪ 关于上埃及，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海斯的调查报告和必要的文献目录，海斯的著作《最古老的埃及》因作者去世而成为残篇(参见第一章，第 118 页注 1)。可资参考的有 J. 旺迪埃(J. Vandier)的调查报告，1952 年，第 166－180 页。

⑫ 关于塔萨新石器时期的年代，参见 G. 布伦顿(G. Brunton)，1937 年，第 5－33 页。又参见 W. F. 利比(W. F. Libby)，1955 年，第 77－78 页。

⑬ K. W. 巴策尔(K. W. Butzer)，1964 年，第 149－153 页和 G. 康(G. Camps)，1974 年，第 222 页。

⑭ E. 鲍姆加特尔(E. Baumgartel)夫人在研究埃及前王朝时期埃及人口的起源问题时于 1955 年写道，她否认西方、北方和东方起源的可能性（参见 E. J. 鲍姆加特尔，1955 年，第 19 页）。最近在撒哈拉进行的考古工作（参见下文）表明这个观点在涉及西方起源方面尚有待于证实，但关于东方起源的说法却是正确的。

⑮ G. 康(G. Camps)，1974 年，第 224 页，和 1976 年，阿迈克尼的年代始于我们纪元前 6700 年，杰里科的原始新石器文化始于我们纪元前 6800 年。

⑯ H. A. 诺德斯特龙，1972 年，第 5 页。

⑰ 同上，第 8 页，第 16－17 页和第 251 页。

⑱ F. 温多尔夫(F. Wendorf)，1968年，第1053页。在努比亚，沙马克文化的陶器出现于我们纪元前 5750 年，而在法尤姆，到了距今 6391 年，即大约我们纪元前 4400 年才有陶器出现。

苏丹的尼罗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源于非洲新石器文化的可能性。但当然要采取审慎态度，因为埃及尼罗河下游新石器文化的遗址相当缺乏，而且努比亚只对尼罗河两岸作过调查，尼罗河流域和撒哈拉东部之间狭长地带的考古工作迄今尚未进行。即使这样，在卡普萨时期和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时期从北非向努比亚方向以及在塞比利亚时期和旧石器时代中期从中非同样向努比亚方向[19]扩散的影响，很可能继续到原始新石器时期。由于三角洲十分明显是个交叉点，因此它很可能是来自西方和南方以及东方和东北方的影响的会合点。

新石器文化在尼罗河下游一出现，就可看出北部各群落和南部各群落在文化上的区别。虽然南北各群落仍是从事渔猎的耕种者和畜牧者，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实物按其所属群落在种类、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在某些习俗方面也是如此。

在北方，房舍比较紧密地聚在一起可能表明，当时存在着一个已有相当秩序的社会结构，死者葬在村里，就好象他们依然属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20]另一方面，在南方，却是把坟墓挖在沙漠边缘；房舍比较分散；更加紧密地以家庭为基础组织在一起。北方群落和南方群落的差异还可以从他们的技术上看出：北方的手工匠的石工比较精良，他们制造石瓶采用的技术后来仍然是最具有法老时代古埃及特征的技术之一。但在陶器方面，北方花色品种方面多样化一些，而南方在生产技术上却略胜一筹，除饰以白彩的黑陶外，还有饰以黑边、做工出色的红陶器，南方转而将这种红陶器传给前王朝时期的古埃及，这种红陶器今天仍然是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流域最富有特色的工业之一。

所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也许可以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空间上说，一个属于环绕孟菲斯、法尤姆和三角洲西北边缘的地区，另一个属于艾斯尤特与底比斯之间的中埃及和上埃及[21]。这两个文化群之间虽然不排除存在一些接触点，但它们在文化上的差别在第四个千年期的最后几百年间变得更加明显，后来正好在大约我们纪元前3000年在埃及尼罗河流域出现一个统一的君主国[22]之前，随着一个共同文明的出现而消失。

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化（参见上文第481－484页）

埃及前王朝时期往往被称为铜器时代，好象金属的出现是尼罗河流域发展的一个决定性事件，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事实上，而且必须强调，在尼罗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并没有中断。相反，显然是一个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此，我宁愿沿用埃及前王朝时期一词来表示这几百年，关于这几百年，我们知道得很少，但这几百年对于非洲历史却是非常重要的。

金属是缓慢地出现在埃及的，看来并不是入侵者传入的。与其他文明中所发现的次序相反，铜的出现先于黄金[23]，尽管黄金在离尼罗河流域不远的矿床中比较易于发现。第一

---

[19] 同上，第1055页，插图8。

[20] H. 容克尔(H. Junker)，1930年，第36－47页。

[21] 将会看到，北部文化群并没有伸展到海边，它同南部文化群一样是大陆性的。参见J.－L. 德塞尼瓦尔，1973年，地图A，第50页。

[22] J. 韦库泰，1967年，第250－253页。

[23] 参见A. 卢卡斯(A. Lucas)，1962年，第199－200页。

批铜器很小，出现于南部文化群的拜达里遗址(已定名为拜达里文化)。[24] 在北部，铜器发现于法尤姆的代迈赫、卡伦堡和海斯迈迪卜(这一组遗址被称为法尤姆 A，以别于新石器时代的法尤姆或法尤姆 B)。 713

关于铜的熔炼是否起源于埃及，是有争论的[25]。铜的熔炼也许是从海外，即从近东传入的，但是，如果是那样，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规模进行的，少数个人把这次技术传给尼罗河流域的人民。但是不约而同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尼罗河流域的人民也可能大约在"肥沃新月"发现铜的同时自己也发现了铜。拜达里人确实是在同一时期通过给磨石或研色板加热发现了青瓷釉，这也许是出于偶然。画眉粉就是在磨石或研色板上捣烂成粉——一种用孔雀石作基本原料的化妆品，而孔雀石则是一种铜矿石(绿色碳酸盐)[26]。这可能意味着，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同时发现了铜和被称为埃及彩陶或青瓷釉的瓷釉，铜不加冶炼就加以使用，瓷釉还用来制作念珠。

但不论金属是从亚洲传到埃及，或是埃及自己发现的，金属的利用是非常有限的，石器工具仍然是北部群落和南部群落最普遍使用的工具。看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正如埋葬情况所证明，金属的发现或传播并没有引起社会组织的变化。

埃及前王朝时期，我们纪元前约 4000 到 3000 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说明这一段至今仍很不了解的时期的尼罗河流域的发展情况。这四个阶段是：早、古、中、晚。

在埃及前王朝早期〔＝拜达里时期，第二十五章，第 480 页〕，北方群落和南方群落仍然彼此独立地发展。在南方，我们今天关于这一阶段的知识多半来自代尔塔萨附近的拜达里遗址。尽管金属已经出现，拜达里文化[27] 仍然是那么接近新石器文化，以致于人们有时要问，拜达里文化是否不只是塔萨新石器文化的地方变种。对骸骨的研究业已表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拜达里人在身体方面十分接近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埃及人。他们仍然住在椭圆形棚屋中，虽然这些棚屋有了编织的席子、皮座垫、甚至木床，比以前的棚屋稍稍舒服一些了。对死者的迷信开始发展；尸体这时被放在椭圆形墓穴的葬室中，并在周围放着随葬品、食品、坛子和日用品。同塔萨新石器时期的人一样，拜达里人种植亚麻并把它织成亚麻布，还利用狩猎所得的以及自己畜群中所得的皮革。所以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既进行种植又从事畜牧，仍然辅之以渔猎。他们继续制造黑顶红陶器和精工打磨的优美红陶器。瓷釉的发现使制造有光泽的蓝色念珠成为可能。眼部化妆品是在用石板做成的研色板上磨成粉末的，研色板有时加以装饰，就象象牙梳的装饰一样。艺术就这样逐渐出现了。 714

在北方，埃及前王朝早期阶段〔＝法尤姆 A，第二十五章，第 482 页；美利得－拜尼－撒拉迈的最新地层可能也属于这个埃及前王朝早期阶段〕是通过法尤姆 A 遗址[28] 而为

---

[24] 参见第二十五章，第483-484 页。拜达里文明是经常有人研究的。基本著作仍然是 G. 布伦顿(G. Brunton)和 G. 卡顿-汤普森(G. Caton-Thompson)的著作，1928 年，以及布伦顿的著作，1918 年，第六章，第 9－12 页。

[25] 参见 A. 卢卡斯，1962 年，第 201－206 页。关于古代近东的炼铜起源，参见 R. J. 福布斯(R. J. Forbes)，1964年，第 16-23 页。"铜"的象形文字只是到了最近才破译出来。参见 J. R. 哈里斯(J. R Harris)，1961 年，第 50－62 页。

[26] A. 卢卡斯，1962 年，第 201 页。

[27] 关于拜达里文明，主要著作仍然是 G. 布伦顿的，1928 年，第 1-42 页；1937 年，第 33－66 页；1948 年，第 4－11 页。

[28] G.卡顿-汤普森和 E. W.加德纳(E.W. Gardner)，1934 年。

世人所知的。同拜达里文化一样，同燧石制造的工具要比用金属制造的多得多。法尤姆B的陶瓶在款式品种方面比拜达里的多得多，但其技术却没有那么先进。北方的工匠在多半用黑色片岩雕刻精制的石碗和石瓶方面又胜一筹；但总的说来，这两个文化群不相上下，都是那先于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常发展。这两个文化群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迹象表明，其社会成员之间有明显的社会方面的差别。尤其是在群落内似乎并不存在大大富于他人的个人。一切情况都表明，社会不同成员之间，不论年龄和性别，其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当然，这个结论根据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已为人们所知和已发掘的各个墓地都是属于整个这一集团的，换句话说，社会成员没有因种族、宗教或某种社会歧视而被埋在这些墓地之外。

埃及前王朝古代阶段〔=纳加达 I，第二十五章，第481页〕可惜只是通过南部遗址才为人所知晓。该阶段亦称阿姆拉时期，因在拜达里再往南相当远的阿拜多斯附近的阿姆拉遗址[29]而得名。阿姆拉文化也相当于现在有时仍称之为纳加达 I 文化，后者是沿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中经常使用的弗林德斯·比特里的命名。

阿姆拉文化在时间上说是拜达里文化的直接继承，虽然这里又是没有间断的；根据一些遗址来看，阿姆拉文化层是同拜达里文化有直接联系的。阿姆拉人同拜达里人一样生产黑顶红陶器，但同时又有在红色或红褐色底子上绘出灰白色几何图案和自然主义图案的陶器；有时，偶尔也有在黑底上填上白影线的花纹。阿姆拉陶工比他的前辈更富于创造性，他创造了一些新的形式，尤其是动物形状的形式。狩猎仍然是自然主义装饰的一个主题，715 特别喜欢描绘追猎河马的图景。因此，在埃及前王朝古代阶段，由一个多少是游牧的猎人和渔人组成的社会制度向一个以定居的种植者和牲畜饲养者的村落或集团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过渡，看来还没有完成。

阿姆拉人特有的武器是棒槌，往往是用坚硬的石头制成的，形同一个截头圆锥体。[30]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类武器在阿姆拉时期之后已完全消失，而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形文字的一个符号今天仍在语音上沿用。[31]这意味着象形文字系统定然是在阿姆拉时期形成的，因此，这是在埃及前王朝古代阶段之内，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大约在我们纪元前3,800年。

艺术继续发展，出现了各种小雕像：有把阴部遮起来的蓄胡子的男人和翩翩起舞的女郎，也有各种动物雕像。还出现了更精美的有兽饰的研色板和梳子。[32]

北方艾斯尤特和南方底比斯之间的阿姆拉文化遗址包括纳加达、拜拉斯、侯和阿拜多斯。北方没有发现同时代的遗址，这是更加令人遗憾的，因为阿姆拉文化表明南北之间有明显的联系迹象：例如，阿姆拉坟墓的随葬品中有同北方发现的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石瓶一模一样的东西。从殡葬习俗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姆拉文化的埃及前王朝早期与埃及前王朝古代时期之间的社会组织有任何变化。这些社会组织看来仍然是享受平等的个人组

[29] 参见 J.旺迪埃(J. Vandier)，1952年，第231－232页。这个遗址是在1900年发现的。关于这个遗址的著作是 D.兰德尔-麦基弗(D. Randall-MacIver)和 A.C.梅斯(A. C. Mace)出版的，1902年，第3-53页。

[30] 关于这种棒槌，见W. M. F.比特里(W. M. F. Petrie)，1920年，插图26和第22－24页。

[31] A. H.加德纳，1957年，第510页，表格1。

[32] J.-L.德塞尼瓦尔，1973年，第16－21页。

成的人类群体，即使这些人是在一个首领或一批人统治下。

阿姆拉文化存在了一个世纪(也许不到一个世纪)以后，便逐渐溶合为一种新的综合文化，阿姆拉成分和无疑是起源于北方的其他成分被结合在一起。这种混合文化，即埃及前王朝中期文化〔＝纳加达 II，第二十五章，第 481 页，也许是欧迈尔文化 A，同上，第 483 页〕，或称盖尔泽文化（按弗林德斯·比特里的术语，称纳加达 II）是按下埃及法尤姆附近的盖尔泽遗址的地名命名的[33]，因为这种文化在法尤姆表现得最清楚。这种文化具有两种形式，北方是地道的盖尔泽文化，南方是阿姆拉文化和盖尔泽文化的结合体。[34]

在北方，这种新文化集中在孟菲斯周围、法尤姆和三角洲南部边缘。北方的盖尔泽文化首先在制陶方面表现它的独创性，用完全不同于南方的材料制造出涂浅黄色的瓶罐。装饰是自然主义的，在浅色底子上绘以红赭色图画，增加了新的主题：山、大角野山羊、火烈鸟、芦荟，特别是船。象他们的先人法尤姆 A 的艺人一样，盖尔泽人也制造石瓶，但除片岩外，他们还用较硬的石块，如角砾岩、玄武岩、闪长岩和蛇纹岩。盖尔泽人的典型武器是梨形棒，[35] 这种棒后来成为有史时期早期的典型王室武器，并象阿姆拉棒槌一样作为象形文字的一个符号留存下来。[36]

710

还有证据表明社会和宗教的发展。现在死者是葬在长方形的墓穴里，头朝北，面朝东，而不是从前的头朝北，面朝西。盖尔泽陶器上最常画的船只是在船头上绘有徽记．从这些徽记中不难看到法老时期的埃及各省的标志或旗帜的原型。

现在看来，当时群居在一起的人类群体已比以氏族或村落为单位的群体大多了。新的社会组织产生了力量，使得有可能利用灌溉更好地开发尼罗河流域，于是财富大增，其结果是出现了更精良、更丰富的石制器皿以及更大量的铜制工具和武器：凿子、匕首、鱼叉和斧头。随葬的珠宝饰物现在使用黄金和次级宝石——天青石、玉髓、绿松石、肉红玉髓和玛瑙，已不是偶然现象了。雕塑艺术也取得了进步，以鹰头和牛头为雕塑主题表明，法老时代的宗教当时还处在胚胎状态：太阳神和爱神已受到崇拜。

在南方，继埃及前王朝古代时期的阿姆拉文化之后出现的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盖尔泽文化影响。有红色自然主义绘画的传统浅黄色盖尔泽陶器同有黑边或灰白色花纹的传统南方红陶一起被发现。

事实上，南北两个文化群彼此互有影响，这个时期相似之处是很多的，例如，化妆用研色石板和制造燧石刀。制造燧石刀的技术这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个文化群正在逐步走向完全的熔合。

南北文化的这种熔合发生在〔＝欧迈尔文化 B 和马阿迪文化，第二十五章，第 483 页〕埃及前王朝晚期，或盖尔泽时期的晚期，亦称塞美内时期。[37] 这时已接近成文史的开端，

---

[33] 盖尔泽村座落在法尤姆同一纬度，因此，处于今天开罗的正南。这个埃及前王朝时期的遗址发掘于 1911 年；参见 W. M. F. 比特里，E. 麦凯(E. Mackay)和 G. 温赖特(G. Wainwright)，1912 年。

[34] J. 韦库泰(J. Vercoutter)，1967 年，第 245-267 页；和 J. 旺迪埃，1952 年，第 248－252 页和第 436－496 页。

[35] W.M.F.比特里，1920 年，图 26 和第 22－24 页。

[36] A.H.加德纳，1957 年，第 510 页，表 3。

[37] 这个措词同弗林德斯·比特里的说法是一致的，1939 年，第 55 页及其以后各页，塞美内是上埃及基纳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名字。另参阅 J. 韦库泰，1967 年，第 247－250 页。

因为最后这个阶段很可能是十分短暂的。如果我们忠实于传统的历史年代，把我们纪元前3,000年定为历史的开端，那么，埃及前王朝晚期也许持续时间最多不过二、三百年。对埃及前王朝中期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中期到我们纪元前3,066年，从而使从埃及前王朝中期末到历史的开端的过渡，还不到四分之三世纪。历史的开端也许应定在比从前的定法晚200年，但即使定在2,800年，[38]那也只给这样一个阶段留下200年略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一阶段，完成了对尼罗河流域的开发并建立了一个以神权进行统治的君主为首的社会制度。

717

这个阶段经常接近有文字记载的阶段，所以人们想用书面文件的证据去印证考古得来的证据。[39]

历史文献似乎表明，在埃及前王朝晚期开始(如果不是中期末)，南方最强大的城市是纳加达附近的温布（在埃及语中叫努拜特)，地处阿姆拉文化的心脏地带。该城之神是塞思，是一种兽神，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神，至今仍有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食蚁兽，有的说是猪，有的说是长颈鹿，也有的说如不是虚构的动物，就是已绝种的动物。这些文献告诉我们，这个南方的神同一位鹰头神，即太阳神打仗，太阳神是一个叫拜赫代特的村庄供奉之神，而这个村庄必定是在三角洲，即在盖尔泽文化地区。所以，在埃及前王朝中期末，埃及看来是分成两种社会结构的，一个在北方，由拜赫代特的太阳神统治，一个在南方，由温布的塞思神统治。不幸的是，我们手头的资料不足以说明这些社会结构的性质。所能推测的至多是，以神权和宗教权力为基础的一个集团首领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历史时期，他将反映在王宫人物的神性上。[40]也许可以这样说，社区的首领对该社区的个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如果首领的神权已经削弱，这些人有时也可以杀掉他们的首领(参见A.莫雷〔A.Moret〕:《埃及神的死亡》)。

根据文献，南北两个群体的斗争以北胜南败而告终，随之建立了以开罗附近的赫利奥波利斯[41]（盖尔泽遗址以北约65英里）为中心的统一王国。用考古学的话说，北方对南方的这一胜利与盖尔泽文化渗入阿姆拉文化区是一致的。

如从有书面证据的时期继续推断一个无文献的时期，那么埃及前王朝晚期的社会和政治可能在北方和南方群体中都有所发展。埃及前王朝中期末或晚期初，由于北方战胜南方而形成的政治统一只延续一个短暂时期，嗣后各群体便又各自独立存在了。随之，北方的政治中心便从拜赫代特(其确切位置尚不知道)移到布托，布托在三角洲西部，离海约10公里，考古工作在这里还没有发现与埃及前王朝时期同时代的材料。与此同时，南方的政治首府从温布南迁约90公里，到了卡卜(古埃及语为尼黑布)。[42]因此，南方群体更南方化；北方群体更北方化了。

718

在布托，他们崇拜女蛇神瓦杰特，在卡卜，他们崇拜雌秃鹫。这两种神仍然是这一历史时期法老的守护神，在国王加冕典礼中经常出现。[43]大约一千年以后写的某些文件保存

[38] A.沙尔夫(A.Scharff)，1950年，第191页。
[39] 主要著作仍然是K.泽特(K.Sethe)的那篇杰出文章，1930年。
[40] 参见G.波泽纳(G.Posener)，1960年。
[41] K.泽特，1930年，他的假设受到基斯(H.Kees)的驳斥，1961年，第43页。
[42] J.韦库泰，1967年，第248-249页。
[43] 参见A.H.加德纳，1957年，第71-76页。

了埃及前王朝晚期这些政治集团的统治者的名字，但是这些文件残存下来的甚少。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个时期起，南方和北方在文化上是统一的。特别是源于北方的太阳神在南方也受到崇拜，而南方和北方的政治领袖都把自己看成是太阳神的侍从和供奉者，号称“闪束神”。[44]

从纯唯物的观点来看，埃及前王朝中期文明和末期文明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艺术和技术方面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人像成了经常性的主题，耶拉孔波利斯(埃及古称尼肯)出现了岩画．耶拉孔波利斯是尼罗河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几乎同卡卜隔河相望。[45]耶拉孔波利斯成了南方王朝的发祥地，大约我们纪元前3000年，该王朝对北方进行了斗争。

这场斗争到底进行了多久，还无法说。埃及前王朝晚期仍在进行这场斗争，以北胜南败告终，从而创立了一个包括从卡卜到地中海这整个流域的统一国家。这个国家后来被来自阿拜多斯附近锡斯地区的南方国王所统治，[46]他们建立了最初两个王朝，或塔尼特王朝。由于这个原因，短暂的埃及前王朝晚期便常被称为前塔尼特时期。

前塔尼特时期的遗物，凡是传到我们手里的，都是在耶拉孔波利斯发现的，[47]主要是一些用石板制造的雕有历史场景的大型谢恩研色板，[48]和用石灰石制造的大雕棒。这两种证物都饰有场景，从这些场景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尼罗河下游推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国家分成若干省或若干群体，各省都有一个标志或旗帜在盛大场合随伴国王。 719

将盖尔泽陶器的船只上和前塔尼特研色板和棍棒上的标志同这一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文件上的各省标志进行对比，表明从盖尔泽时期起，尼罗河下游——南方和北方——的社会制度的发展是在地理和经济方面，而不是在人种方面。人群是围绕着某一生境和某一神祇组织起来的。这是尼罗河洪汛周期对南方和北方同样造成的农业需要的结果。一个群体只有在人数上充足，并能很好地组织起来进行保护土地、防御洪灾、扩大可耕地面积、建立水库以防旱涝等必要工作，才能生存和发展。这种组织既是农业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为只有神才能保证工作的成功，从而保证该群体的繁荣昌盛。这种双重性的组织是尼罗河下游社会制度的基本的和固定的特点。

但这种以地理分布为基础的制度有可能被加在一个由种族和社会因素决定的更古老的制度上。三个在有史时期一开始就存在而且继续存在到埃及文明末期的埃及字似乎说明了这一点。这三个字——Pât(帕特)、Rekhyt (雷希特)和Henememet(赫内米米特)[49]——看来是指三个非常大的人类群体。帕特显然是尼罗河上游的居民，信奉太阳神；雷希特是尼罗河中游的人民，在埃及前王朝晚期末年被征服；而赫内米米特，即“太阳的人民”，是埃及东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地区的居民。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和埃及前王朝时期仍有人

[44] 关于“闪束神”，参见 J. 亚迪埃，1952年，第129-130页和第635-636页。

[45] 耶拉孔波利斯曾经建立了许多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纪念碑，参见 B. 波特(B. Porter)和 R.L.B. 莫斯 (R.L.B. Moss)，1937年，第191-199页。

[46] 首府的遗址尚未发现。在尼罗河西岸的阿拜多斯有一个出于这个时期的皇陵（参见 W.M.F. 比特里，1901年），说明都城就在附近。

[47] 189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参见 J.E. 奎贝尔(J.E. Quibell)：《耶拉孔波利斯》(伦敦，1900-1902年)。

[48] 最精致的器件是 W.M.F. 比特里(W.M.F. Petrie) 收集的，1953年。

[49] A.H. 加德纳，1947年，第1卷，第98页及其后各页至112页及其后各页。

居住，对尼罗河流域的经济很重要，因为这一地区出产铜和金。这个巨大的社会和种族制度显然分裂成为许多地理和农业小单位。君主政体的作用后来成了单纯政治性的。开始时，各省群体组成两个大联盟，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然后，通过武力将这两个联盟统一成一个王国，由此导致更加有效地开发整个国家。这第二个任务便落在塔尼特王朝开头几个法老身上。而同他们一起，我们进入了有史时期。

尼罗河上游（我们纪元前5000－3000年）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尼罗河下游的各种文化，南边最远不超过卡卜地区。阿斯旺和第一瀑布地区属于另一个不同的文化区。从人种学观点看，尼罗河上游的人似乎接近尼罗河下游南部群落的人——拜达里人和阿姆拉人。这种对比或许可以加以扩展以适用撒哈拉东部的毗邻部族，但有关的考古研究报告仍然太少，还不足以作出结论。[50]

720

正如我们业已知道的，关于新石器时代和前王朝时期的埃及，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经过科学探索的遗址寥寥无几。关于尼罗河上游，情况更为不利：只有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北部，相对说来，进行过较好的考察，但即使在这里，1960到1966年进行的发掘的结果也还没有完全公布。

从第二瀑布到赤道大湖，能够找到的仅有的材料是从地面勘查得来的，因为实际发掘过的遗址实在非常少。因此，关于尼罗河上游，我们所知道的——无论从时间或空间来说——远远不如我们对尼罗河埃及部分的了解。

新石器时代（大约我们纪元前5000年－3800年）[51]

第一个无可争议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的发掘，是在喀土穆附近进行的。发掘所揭示的文化（有时被称为喀土穆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多地通称为沙海纳卜文化〔沙海纳卜，第二十五章，第478－479页〕。[52]

沙海纳卜是居住遗址，没有发现墓地，但那里发现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大量证据说明，居住在那里的苏丹人虽然主要是猎人和渔民，但同时也是畜牧者。对他们用旋转齿轮刻花的陶器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是另一种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文化的后裔，这种文化的遗迹已在喀土穆本身的一个遗址中发现。这个遗址，早期喀土穆〔喀土穆文化，第二十五章，第478页〕[53]包括埋葬黑人的墓穴。如果象全部情况似乎表明的那样，沙海纳卜真是早期喀土穆的后裔，那么，我们便应当承认，在沙海纳卜看到的是一个黑人聚居地，由从事渔猎的群体组成，猎人的猎获物有狮子、野牛、河马以及羚羊、瞪羚、直角大羚羊和野兔：所有这些动物的骨头都是在他们的家中发现的。他们的武器有磨光的斧子和圆头棒，这种棒有时被认为阿姆拉棒的雏型，棒头象一个截头圆锥体。他们制造木器并懂得纺织，但显然喜欢

---

[50] 参见O.V.尼尔森（O.V. Nielsen），1970年，书中各处和第22页；参考书目，第136-139页。

[51] 关于我们这里谈到的各个时期，首先应参阅F.温多尔夫（F. Wendorf）的著作，1968年，和H.A.诺德斯特龙（H.A. Nordstrom）的著作，1972年。

[52] 参见A.J.阿克尔（A.J. Arkell），1953年。

[53] 参见A.J.阿克尔，1949年b。

穿皮衣服。他们的文明有时被称为“半圆凿文化”，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半圆凿或空心凿。它的别具一格的陶器可能表明，沙海纳卜文化不仅向东和向西(泰内雷和提贝斯提)伸展，而且沿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向喀土穆以南伸展。关于社会组织情况，则尚无任何线索。 721

了解沙海纳卜新石器文化同尼罗河下游文化，尤其是同法尤姆文化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趣的。但不幸的是，在喀土穆以北第六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尚未发现历史遗址，因此无法进行这种比较。最近在第二瀑布以北的下努比亚进行的调查似乎表明，那里的新石器文化同沙海纳卜的新石器文化非常接近，但它的不同之处仍然使对它作过研究的英美考古学家有足够的理由，称它为“喀土穆变种”。[54]

关于尼罗河上游从新石器文化向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化，从而向铜器时代文化过渡的情况，我们还很不清楚。在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汇合处发现的几座古墓也许可以说明，那里曾有过一种受努比亚埃及前王朝文化影响的文化，被称为A组(见下文)，但这种文化的确切存在时代无法确定。

然而在第二瀑布附近，最近发现了一种工业，被称为阿卜卡工业，因最能代表这种工业的遗址阿卜卡而得名[55]〔阿卜卡文化，第二十五章，第479页〕。迄今为止人们还只知道它的石器业和陶瓷业，因为关于所发现的遗址的材料尚未全部发表。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这种文化似乎属于一个由渔民和猎人组成的人群，这同沙海纳卜的情况是一样的，但这里的猎物并不很多，这也许是因为气候已进入紧接着潮湿期而出现的干旱阶段。看来，阿卜卡人已采用了大型永久性鱼网来捕鱼，在水位低的时候，他们巧妙地把网设在瀑布的沟渠里，水退时鱼就自投罗网了。阿卜卡人以采集野果和野生植物作为其补充食品来源。设置鱼网的地方有石墙结构，有时规模很大，这意味着社会群体已有相当组织。这种文化同沙海纳卜文化显然没有关系，由于后者接近喀土穆变种的形态，看来它同前者既属于同一时代又有相当大的区别。阿卜卡文化也许是新石器文化的一个特殊形态，同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都无关系。另一方面，努比亚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化看来正是从阿卜卡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

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化(我们纪元前3800年－2800年)

1907年，埃及政府决定把第一道阿斯旺水坝加高6米多，因而涨水期能够泛滥到从舍拉勒到库鲁斯库的整个下努比亚，当时对计划要被淹没的地区作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参加调查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他们所熟知的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不同，便给他们所发现的这些新的文化作了临时分类，按所确定的相应年代，将它们分为A组、B组、C组等等。[56]从那时以来，人们一直想按照用于尼罗河下游的分类法定出一个适用于这些新文化的分类。按尼罗河下游的分类法，譬如说，努比亚早期文化和努比亚中期文化可相当于古王国和中王 722

---

[54] F.温多尔夫，1968年，第768-790页，和H.A.诺德斯特龙(H.A. Nordstrom)，1972年，第8-10页。

[55] F.温多尔夫的书描写了这种工业，1968年，第611-629页；又参见H.A.诺德斯特龙，1972年，第12-16页。

[56] G.A.赖斯纳(G.A. Reisner)，1910年，第313-332页。

国。[57]但是要使这个分类法既适合于第二瀑布以南的努比亚，又适合于第二瀑布以北的努比亚，却是困难重重的，从而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因此，我将沿用A组这个词，它包括埃及前王朝时期。

从时间上说，A组[58]从新石器时代末，即大约我们纪元前3800年起，至古埃及王国末期，即大约我们纪元前2200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A组早期，从大约我们纪元前3800年到3200年；A组古典期，从大约我们纪元前3200年到2800年，和A组晚期（或B组早期），从大约我们纪元前2800年到2200年。我将只谈头两个阶段。

A组早期的情况，人们知道得最少。[59]1960到1966年在苏丹努比亚新近的发掘过程中，人们才注意到，A组的铜器文明是从阿卜卡新石器文化直接继承下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等到这些发掘结果的完整材料公布以后，才能了解确切情况。在下努比亚，舍拉勒以南拜汉干河的遗址显然属于这个早期阶段，看来同盖尔泽文化是同时代的，因此也同埃及的前王朝中期同一时代。在这个时期，下努比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阿卜卡文明中没有发现农业和畜牧业），因为各农业群体使用尼罗河上游所特有的一种技术在浅水处筑坝，拦截河道，以阻滞流速，使沿河两岸形成冲积地，扩大可耕地面积。此外，在墓葬中发现了牛羊骨头，这些显然是陪葬牺牲的遗骸，说明这些群落是半游牧群体。由于牧场不足以饲养大群牲畜，我们想象，人们在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要到邻近高原去放牧，这些高原当时一定是干燥草原，羚羊和狮子的存在说明了这一点。

723

在A组早期遗址发现铜制器件这件事提出了铜在尼罗河上游的传播问题。同拜达里人一样，A组的非洲人用孔雀石作为涂饰眼圈的化妆品，也是放在石英研色板上研磨的；他们还知道如何制造埃及的彩釉陶器。由于努比亚有铜矿，远古时代便已开采，因此，在A组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尤其是铜针）很可能都是当地制品。[60]

从北方输入的物品似乎仅限于用雪花石膏、板岩、角砾岩制造的石制器皿，以及燧石之类的原料，这种原料在努比亚实际上不存在而在埃及却很丰富。陶器还是那种黑顶红身型的，系本地制作，工艺精良。至于工具和武器，A组人民主要用石头和骨头作原料，而不是金属：刀子和棍棒，在形状上与阿姆拉的相同，是用燧石或闪长岩和玄武岩制造的；针、扣子和钻子则通常用骨头和象牙制造。珠宝饰物中出现了金子。化妆用的研色石板很可能是仿效埃及的，但也有一些是用白石英制造的，研色板是A组文化中的典型物品。[61]

相对说来人们对A组早期还知道得很少，在这之后是A组古典期，从遗留下来的古墓和大墓地的数目来看，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可称之为人口急增的阶段。[62]从物质方面说，这个阶段同它前面的阶段非常近似，所不同者，主要是该阶段从尼罗河下游输入的物品比前者多得多。有人认为，这是尼罗河下游和上游有过繁盛贸易的证据。陶器仍然是质地优

---

[57] B.G.特里格尔（B.G.Trigger），1965年，第67页及其后各页和第46页插图1。

[58] 关于应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在努比亚进行的发掘以及在埃及和苏丹进行的发掘的报告还没有全部发表。关于A组，见H.A.诺德斯特龙，1972年，第17-32页。

[59] H.A.诺德斯特龙，1972年，第17-28页及该书各处。

[60] 人们将注意到，在古王国统治下当地已有铜矿石的熔炼，特别是在布亨神庙，参见W.B.埃默里（W.B.Emery），1965年，第111-114页。

[61] F.欣策（F.Hintze），1967年，第44页。

[62] B.G.特里格尔，1965年，第74-75页。

良，造形雅致的，但也进口了许多淡色的盖尔泽型瓶罐。陶器造型讲求实用，可能是用来盛放容易腐烂的食物，例如为换取南方象牙和乌木所输入的油。

A 组古典期文化继续繁荣到大约我们纪元前 2,800 年，突然间几乎完全消失，继而代之以非常贫乏的 A 组晚期文化(B 组早期)。[69]人们认为这是第一个塔尼特王朝的法老劫掠的结果。从第二瀑布稍北一点所发现的这个时期的埃及碑文来看，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即将脱离史前时期了。

对于尼罗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埃及前王朝末期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概而言之，我们不妨说，在下埃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从一个以家族或从事渔猎的小群体为基础(并附带少量畜牧业和仅限于沿河两岸和法尤姆的一些农业)的社会制度向一个组成村庄或成批村落并从事灌溉和专业化农业的定居人民的复杂制度的过渡。在我们纪元前 3000 年左右，这些村庄是联合在一起的，由一个统治着从第一瀑布直至地中海的尼罗河下游的法老或单一统治者管辖。 724

在尼罗河上游，我们看到的是从渔猎者群体(只有很少量的畜牧业)向一个可能由半游牧的农民和畜牧者组成同时也同尼罗河有地理联系的制度过渡，他们挖掘同尼罗河形成直角的渠道，以便通过灌溉扩大可耕地。这些渠道的构筑必有一个广泛的社会组织为其前提，尽管这里的社会组织在规模上不及尼罗河下游。

在这个时期内，即大约从我们纪元前 3300 年开始，铜的使用已传播到整个尼罗河流域。虽然对于炼铜的起源，人们所知甚少，而且仍然是个争论的问题，但制铜的技术产生于或重新创始于尼罗河流域，却不是不可能的。

有史时期，从我们纪元前 3000 年到我们纪元前第五世纪

到了第一批埃及文献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纪元前 3000 年左右，社会制度似乎已在整个尼罗河流域建立起来，这些制度后来几乎没有显示出进一步的发展。在北方，实行的是一个人权神授的君主制度，其属下人民至少在理论上说，在国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南方的制度看来不那么刻板，而由于游牧或半游牧仍然存在，一个多半是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组织可能延续了几乎整个这一时期，即从我们纪元前 3000 年到我们纪元前第五世纪。只是在这个时期的最末尾，第一瀑布和青、白尼罗河交汇处——也许还要靠南一些——之间的这一部分尼罗河流域才建立起一个也许是类似尼罗河埃及部分的社会制度。

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很少变化，所以关于它们的演变情况可以十分简略。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文化上构成这一时期特征的两个事实：铜的发现和传播以及后来铁的发现和传播。

社会制度的演变

我们对于尼罗河下游社会组织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残存下来的法律和行政文件十分稀

[69] H.S.史密斯(H.S.Smith)，1966 年，第 118-124 页。

少。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包括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的说法，埃及社会被分成界限分明的等级。除了法老时期末期武装部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以外，这种说法肯定不符合实际。从来不存在斯特拉波所认为的那种僧侣阶级，甚至不能肯定存在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725 奴隶阶级。[64] 事实上在这个历史时期，埃及的社会制度是相当灵活的。它建立在对土地的利用上，建立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上，而不是建立在僵死的法律上。由于埃及当时没有使用货币，所以每一个人，不论属于哪一级，为了生活下去，都得依附于供他衣、食、住的某个组织。

这些组织中最简单的是家庭庄园。土地在理论上虽然属于法老，但种地的权利有时是赋予个人的，他可以传之后代。[65] 远古以来，就存在着这种家庭产业，有时很小，收入任凭家长分配，整个家庭(广义的家庭)都依附于他。他的唯一义务是满足国家的要求：税收、法定劳务和差役。

同家庭庄园并存但规模大得多的是宗教和皇族领地。宗教领地，特别是从第十八王朝起(我们纪元前1580年以后)，往往都是非常富庶的地带。神父阿蒙的领地有81,322人，421,362头牲畜，433个园圃，2,393平方公里田地，83艘船和65个村庄。[66] 这些财产分布在上埃及、下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王室庄园的构成也是一样，散布于全国各地，通常靠近王宫和宗庙。每个人都必须属于某一庄园，庄园则按照严格的等级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实物酬劳根据职业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一个抄写员的配给量比一名农民或手工匠多。因此特权阶层可以通过出售他们当官得来的某些报酬——不是出卖官职——从而换取奴仆和地产。

任何人想摆脱埃及社会制度的约束，除逃走之外是别无良策的。逃亡者或往西逃至沙漠的边缘，在那里靠劫掠尼罗河流域的农场为生，或出走国外，逃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7]

这个社会制度的稳定多半取决于中央政权——国王和政府——的权威和能力。当权威和能力削弱时，这个制度的功能便受到严重损害。有时甚至发生革命，我们纪元前大约2,200年到2,100年之间的情况便是这样，那时法老的权威发生了问题，他的亲信宠臣的财产被剥夺一空。[68] 地方上有时也发生骚乱，我们纪元前1165年代尔迈迪奈王室庄园的工匠

726 因未拿到月饷或应发的衣着而进行罢工。

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倒是有可能经常出问题，或因国王一念之差，或因某项任务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都有可能被降职。官员降职、革职或放逐归田的事在埃及文献中累有所述。[69]

从大约我们纪元前1580年起，军队在埃及社会制度中占有特殊位置。为了把喜克索

---

[64] 参见G.波泽纳(G. Posener)、S.索内龙(S. Sauneron)和J.约约泰(J. Yoyotte)合著的书中G.波泽纳关于"奴隶制"的有关意见，1959年，第107页。

[65] J.皮朗(J. Pirenne)，1932年，第206-211页；和G.波泽纳，1959年，第76页和第107页。

[66] J.H.布雷斯特德(J. H. Breasted)，1906年，第97页。

[67] 这方面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锡努埃由于害怕一个宫廷阴谋案件的牵连而逃往巴勒斯坦。他得请求法老宽恕才能重返埃及。参见G.勒费弗尔(G. Lefebvre)，1949年，"锡努埃史"，第1-25页；不同译本的参考书目，第4页。又见W.K.辛普森(W. K. Simpson)，1972年，第57-74页。

[68] J.旺迪埃(J. Vandier)，1962年，第213-220页和第235-237页。

[69] 引人注目的是在瑙里法令中，此为普通惩罚形式之一；参见F.L.格里菲思(F. L. Griffith)，1927年，第200-205页。

人驱逐出埃及并实行袭击努比亚和小亚细亚的政策，法老创立了一支近似职业性的军队。⑩士兵取得的报偿是土地和农庄，只要子孙后代也从戎，这些财产可以传给后代，这个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埃及有史时期结束的时候，便形成一个真正的军人阶级了。

关于尼罗河上游社会组织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仍然很少。前面已经谈到，在埃及前王朝末期，至少在下努比亚，已经建立了一种社会制度，其人民中既有定居的，也有游牧和半游牧的，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不同的群体究竟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仅仅是近邻。提到第一瀑布以南人民的政治组织的为数不多的埃及文献表明，整个流域存在着一些由当地世袭首领统治的分散的小集体。⑪

考古学在这方面毫无进展。畜牧业仍然是尼罗河上游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这可能是促使家族结构维持下去的原因。从我们纪元前1580年起，埃及的干涉肯定改变了当时存在的制度，或者说，摧毁了这个制度。埃及对阿斯旺以南土地的占领很快使这些地方的人口减少；⑫埃及为了推行它的亚洲政策，在尼罗河上游敲骨吸髓，搜刮百姓，致使居民失散，很可能逃往南边和西边，逃到迄今考古学仍一无所知的地区。

直到大约我们纪元前750年，一个依照埃及模式组织得很好的王国，才在栋古拉地区苏丹统治者的领导下诞生。这个王国，纳巴塔王国，看来是从南边的青、白尼罗河交汇处起向外伸展，先到第二瀑布，后到地中海；从我们纪元前750年到650年，它还包括下努比亚。⑬母权制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在统治阶级的家族里是如此，但有关的文献不多，也不明确，看不出这个社会制度的整个组织情况。 727

金属的传播

在有史时期初期，贵重金属金和银，也象铜一样，已被人们认识并广泛地在尼罗河流域传播。这三种金属的冶炼在第三千年以后继续发展；在第二千年后出现了黄铜——一种铜和锡的合金；铁是从我们纪元前1580年开始零散出现的。

埃及人和努比亚人开采的金矿⑭多半在第一瀑布和第三瀑布之间。中王国寻找贵重金属的埃及人到达了第二瀑布和更远的地方。在新王国统治下，黄金可以用来"收买"地方的同盟，在埃及的亚洲政策中起过重大作用。从埃及和努比亚矿山开采的黄金含有很高比例的银，⑮于是人们又认识了白金和黄金的区别，白金又称银金〔埃及话叫海得吉(hedji)〕，含有至少25％的银，黄金一词，埃及语叫努比(noub)，努比亚这个名字并非不可能是从这个字演化来的。黄金在埃及有许多用途：用于陪葬品、饰物、甚至用于建筑物上——神殿的门廊和房间，方尖塔的塔顶常常镶有金片。

在尼罗河上游，金子的使用也同样是不吝啬的，虽然不断发生盗墓，使得留存的物

⑩ R.O.福克纳(R.O.Faulkner)，1953年，第41-47页。
⑪ G.波泽纳(G.Posener)，1940年，第35-38页和第18-62页。
⑫ W.Y.亚当斯(W.Y.Adams)，1964年，第104-109页。
⑬ H.V.蔡斯尔(H.V.Zeissl)，1955年，第12-16页。
⑭ J.韦库泰(J.Vercoutter)，1959年，第128-133页和第129页地图。
⑮ 参见A.卢卡斯，1962年，第224-234页。

件已所剩无几。但是我们仍然还发掘到金制的护身符、串珠、发饰、手镯、戒指和耳环。八世纪的陪葬品也多用金银制品，如在第四瀑布下游的努里所见，尽管很早以前有人盗过墓，但仍发掘出许多物件。[76]

铜和青铜只有经实验室检验才能区别。[77]青铜直到大约我们纪元前2000年才在尼罗河流域出现，到了我们纪元前1500年即广为传播，但青铜从来也没有完全取代铜。青铜是一种铜和锡的合金，只要锡含量不过高，它的强度就比铜高，熔点比铜低，而且易于浇铸。

虽然埃及确实拥有一些锡矿，但未在尼罗河流域发现青铜，看来青铜是从叙利亚输入的，[78]叙利亚从第二个千年开始便有青铜。在埃及的合金中，锡占的比例从2%到16%不等。锡的比例不超过4%时，青铜才比铜硬；锡的比例在4%以上时，青铜即易碎裂，其优点多半失去。这可能是青铜从未取代铜的原因。铜只需锤打便可大大加强硬度。

728

在尼罗河上游，特别是在凯尔迈，已经发现了一些物件，如果加以分析，看看这些物件到底是铜制品还是青铜制品，我们或许便可知道，在我们纪元前第二个千年期，尼罗河上游是否已经采用了青铜。但迄今尚没有做过这种分析。不过铜——或青铜——制品在那里却相当多，比在埃及本部发现的多得多：在凯尔迈发现了130把铜匕首，是属于我们纪元前大约1800年到1700年这一时期的，比整个埃及发现的都多。在这个时期，铜是用来制造梳妆用具(特别是镜子)、武器、工具、瓶罐、贵重饰物和家具的镶嵌物的。通常是锤打成形，很少浇铸成形。

从凯尔迈发现的物件的数量和质量来看，[79]尼罗河上游在第二个千年以后对于非洲的冶铜技术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尼罗河基性地质杂岩中铜矿的存在使铜的冶炼传播得更为广泛。

尼罗河流域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只知道陨铁。[80]只是到了我们纪元前800年，熔炼的氧化铁才开始在尼罗河下游传播；一百年以后，就同青铜和铜一样得到广泛使用。在这个时期，埃及的铁是在一些受到希腊影响的中心熔炼和制造的。

尼罗河流域在促进铁在非洲的传播方面占有重要地位。[81]尼罗河上游铁的制造可能早于下游，这才可以解释何以第二十五王朝时铁的使用比较普遍，因为第二十五王朝最初是从栋古拉来的(大约在我们纪元前800年)。尼罗河上游虽然既有铁矿石，又有森林提供炼铁用的木炭，但铁的使用却没有变得很普遍。[82]只是到了我们纪元前一世纪随着第三瀑布和第四瀑布之间麦罗埃文明的兴起，铁的使用才广为传播。所以，纳巴塔尼罗河文化在非洲铁的传播中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麦罗埃文明是从纳巴塔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郑玉质　刘光琴译)

---

[76] D.邓纳姆(D. Dunham)，1955年，书中各处。

[77] A.卢卡斯，1962年，第1章，第199-217页和第217-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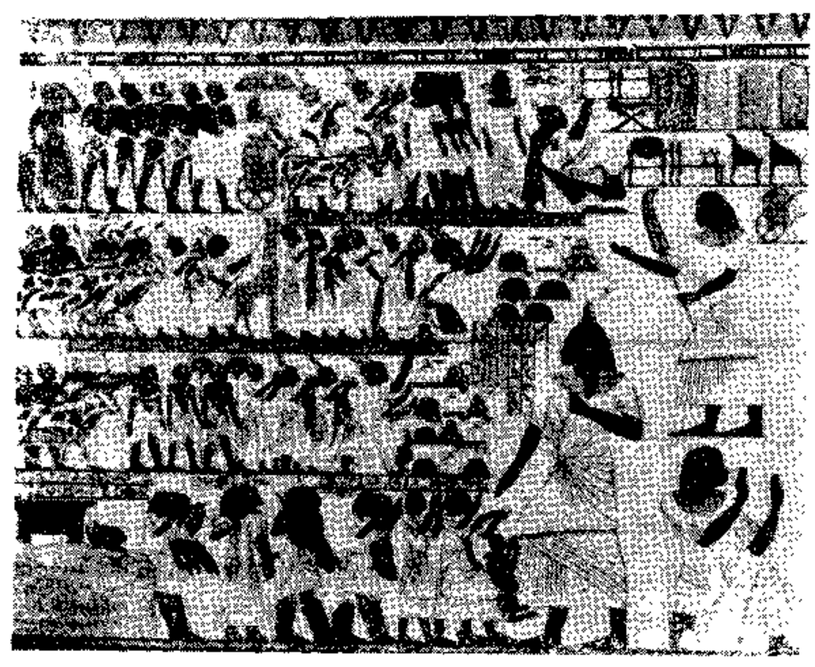
[78] 同上书，第217-218页和第255-257页。

[79] 参见G.A.赖斯纳(G.A.Reisner)，1923年，第26章，第176-2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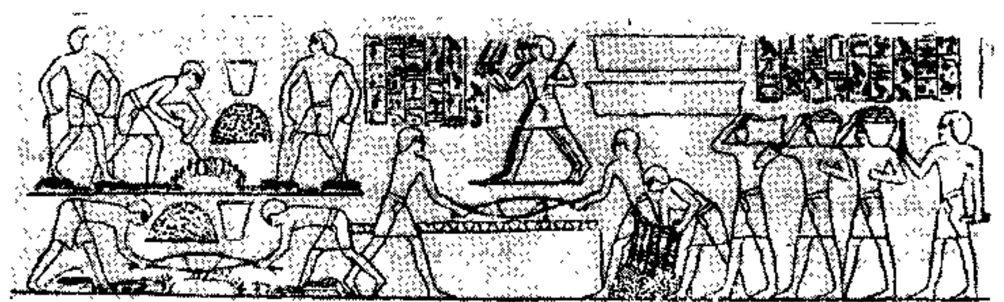
[80] P.L.欣尼(P.L.Shinnie)，1971年，第92-94页。

[81] 参见A.卢卡斯，1962年，第235-243页。

[82] 麦罗埃在非洲铁的传播方面的作用并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么明显；参见P.L.欣尼，1971年，第94-95页，他还引用了B.G.特里格尔的材料，1969年，第23-50页。事实上，麦罗埃不是唯一可能的传播中心。铁可能是从北非通过撒哈拉商队之路传播的：参见P.L.欣尼，1967年，第168页，其中提到P.瓦尔(P.Huard)的著作，1960年，第134-178页，1964年，第49-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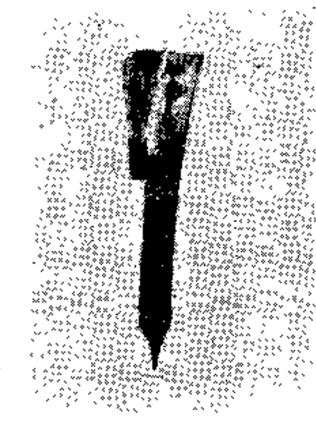
照片28.1 于伊墓地.东壁，南侧，据R.莱普西乌斯(《埃及探险》，第10卷)



照片28.2 底比斯的雷克米雷墓地(城市艺术博物馆)



照片28.3 佩比一世铜像(古王国)(开罗博物馆)



照片28.4 剃刀，米尔吉萨(法国赴苏丹考古队)

结　　论：
从未经斧凿的大自然到解放了的人类

J. 基-泽博

以上各章充分说明非洲在人类历史黎明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今天，从技术发达世界这一角度来看，非洲和亚洲从南方古猿和直立猿人时候起，在世界历史的前150多万年中，曾经站在进步的前沿。现在我们知道，非洲既是作为地球上最高贵物种的人类出现的主要地点，又是政治社会出现的主要地点。但是，在史前时期所起的这种卓越的作用，在最近的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被一种以被剥削和沦为工具为特征的发展"规律"所代替了。

非洲，人类的故土？

尽管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绝对把握（假定这只是因为人类起源的历史，即人类未被发现的历史还未被全部发掘），但是迄今为止，各种发现都证明，非洲人是人类发展的伟大的（即使不是主要的）中心之一。今天，挖掘工作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而且非洲土壤的酸性毁灭了大部分化石遗迹。尽管如此，还应得出这种看法。有人认为肯尼亚古猿（肯尼亚古猿威克种）是人类历史的开创者，出现于1,200万年前。亚洲的拉玛古猿只是其变种之一，大概是从非洲流入印度去的。但是，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非洲种或阿法种）无可争辩地是最早的人类祖先，即非洲东部和中部热带大草原的两足探险者。这种类人猿的颅内膜模型显示了脑前额骨和颅顶部顶叶的发展，证明智力官能已发展到高级水平。此后就出现东非人和享有高贵的能人称号的变种，这些最早的人类象征着逐步走向现代人身分中一次新的跃进。

随后出现的是猿人（直立猿人和阿特拉猿人），古生代人或尼安德特人，最后出现智人型（肯尼亚的埃尔门泰塔人，埃塞俄比亚的基比什人）。许多作者指出，这一人型具有上欧里尼亚时期常见的黑人特征。所有的科学家，不论是多中心论者，或是单中心论者，都承认，把我们同最古老的人类及其祖先和前人类及其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链条中的一切环节，都是在非洲发现的。这些祖先中包括那些似乎从来没有发展到超过类人生物阶段的各变种。它们没能在跃进到成为亚当形态的进化过程中迈出最后的一步。此外，人类祖先或者说假想中的人类亲族都有待于在非洲这个地方去发现。根据W. W. 豪厄尔斯的说法，非洲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同人类的关系比这三者任何一种同印度尼西亚巨猿的关系都更近。[①] 这一说法是有充分理由的！亚洲离赤道较近，特别是非洲，由于明显地深入到南半

① 见W. W. 豪厄尔斯（W. W. Howells），1972年，第5页。

球，不曾受到北部地区不良气候条件的影响。因此，欧洲在卡格拉时期的20万年左右的时期内为冰层所覆盖，没有任何早期石器时代工具的遗迹，而同一时期在非洲则产生旧石器时代三种相连续的越来越高级的工具。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热带纬度有利的条件是气候温和，便于动物生命的发展。的确，人们为了考察导致人类出现的各种影响，必须首先考虑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然后，考虑技术条件，最后还要考虑社会发展情况。

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是影响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发展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非洲人的形态和躯体特征正是在这个重要史前时期逐渐形成的。许多非洲人光洁无毛的皮肤，棕色、铜色或黝黑的肤色，丰密的汗腺，扩张的鼻孔和厚厚的嘴唇，卷缩的头发，无不来自热带的自然条件。例如，黑色卷结的头发可以防晒避热。而且据某些史前学家说，采取直立的姿势（这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步骤，它引起骨盆带的改变），是为适应东非高原热带大草原高草丛生的地理环境的需要，即为了了望高原对面，以潜近猎物或避开敌对的野兽，总是需要直立的姿势。

另一些科学家(例如阿利斯特·哈迪)认为，水上环境不仅促使生命出现，而且推动人类发展。埃莱恩·摩根夫人也持有这一见解，她认为非洲大湖湖畔或海洋沿岸直立姿势的发展是因为潜入水中想要逃避较强大而敌对的猛兽的生物，为便于呼吸而不得不站立起来，把头露出水面。摩根夫人把人类的某些特征还归因于水上环境，如人类的皮下脂肪层，女子性器官缩进和男子性器官相当伸长，以及人类是唯一会哭的灵长类，等等。[②] 所有这些生物适应性的变化都逐渐成为遗传性的，成为永久性特征。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也支配了人类最先使用工具的式样。克赖顿·加贝尔认为，卡普萨型的工具原是土产品，刀剑、刻刀、刮刀的式样都是为适应那种特殊材料，即黑曜石而产生的。 732

技术环境

非洲的人类及其祖先所创造的技术环境是使他们感到与周围大自然不同而后来又能控制周围大自然的第二个因素。

因为人是工具的制造者，所以人就成为智人。由于人的双手获得解放而不再用手来支持人的躯体，人就解除颚和头盖骨筋骨的很多任务。这样，就使脑盖得到解放，又增大脑盖的体积，使运动感觉中心得以发展。不仅如此，手使人接触到自然世界。手是一根捕捉无数信息的天线，而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刺激脑以发展行使判断的能力，特别是通过以适当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这一观念(同一性和偶然性原则)来行使判断的能力。

史前时期的非洲人在学会把石头破成随意大小的石块这种粗糙的砍石办法(奥杜瓦伊人的卵石文化）后，进步到更自觉的创造阶段。在金沙萨附近的那类大作坊贮存的不同制

---

② 阿利斯特·哈迪(Alister Hardy)，海洋生物学专家，E.摩根(E.Morgan)引述，1973年，第33-55页。

作阶段的石器工具表明，最终完成的物件是从一开始就在人的头脑中明确设想过，而后又一片片制成的。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先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而形成工具，后来发展到用一种圆柱体的不那么坚硬的打击器(用木头、骨头等制成的锤子)来制作，再后来是通过间接的叩击(使用凿子)，最后是加大压力，特别是在薄石片上挤压加工成形。

史前人类在制作工具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从一开始，人们就通过所使用的材料的变化，通过工具和武器的制成而认识到，人在不断努力争取更大的效率并力求适应日益复杂的目的，这种努力是智力的标志，使人类从旧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这样，那种多用途的舍利型尖头工具就被各种薄片手工业(埃及、利比亚、撒哈拉)所代替，然后又过渡到阿733 特利、[3] 福尔史密斯、[4] 桑戈、[5] 斯蒂尔贝[6] 等工业比较专门的外形，最后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更精致的形状（卡普萨、威尔顿、马戈西、埃尔门泰塔）。在非洲，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不可能勾划出一条按年代顺序的确切界限，以准确地测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时期。因为非洲的各个史前阶段似乎都是重叠的，相互套住的或长时期并存的。在同一地层学的级别上，人们可以发现早期石器时代的证物，更高级的精美工具，甚至金属物件。这样，开始于早期石器时代的桑戈石器一直拖延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这一进步的标志是连续不断的技术交换和转借，表现形式是一批又一批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有时是互相重叠的，但大体上形成一条基本上升的曲线。在农业－畜牧业技术和制陶器技术被掌握之后，这条曲线就伸向古代时期。小麦、大麦和供纺织用的植物(如法尤姆亚麻)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一样，都广为传布。农业选择和开发的两个主要中心，即尼罗河谷和尼日尔弯曲地带，毫无疑义地早在第六个或第五个千年期就产生了明显而广泛的影响。高粱、小米、某些大米品种、芝麻、福尼奥(fonio)、以及更南方的薯蓣、为利用其叶子和纤维而种植的木槿植物(锦葵科)、油棕榈、可拉，可能还有某特殊品种棉花，都已成为家生作物。此外，尼罗河谷因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几种农作物而得到好处，如二粒小麦、大麦、洋葱、小扁豆和豌豆、瓜和无花果；同时，从亚洲引进甘蔗、另一些大米品种和香蕉。香蕉无疑是通过埃塞俄比亚引进的。埃塞俄比亚从尼罗河谷的农民学到了种植方法，并发展了咖啡的种植。肯尼亚的纳库鲁湖和恩乔罗河旧址也说明种植过谷类植物。

史前时期的许多家生植物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有时是以改良的形式，成为非洲饮食的一部分。对这类植物的利用，推动了人类的定居生活。没有定居生活，是不会取得走向文明的进步的。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直到距今 3,000 年前至 2,000 年前才在西欧发展起来，而在埃及，则比西欧早 3,000 年就开始了。埃尔门泰塔(肯尼亚)的陶器大概出现于距今 5,000 年前，这种陶器表明关于陶器的知识已从非洲东部高地传到撒哈拉和埃及。陶器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它是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来的，这种原始积累采取的形式是人类通过辛勤劳动从大自然之手攫取的资产。

随着烧煮知识的取得，开始出现一种最雅致的文化，使我们能够衡量自能人时代以来

---

③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比尔阿特(Bir el-Ater)。
④ 来自南非福尔史密斯(Fauresmith)。
⑤ 来自维多利亚湖西岸桑戈湾(Sango Bay)。
⑥ 来自开普省斯蒂尔贝(Stillbay)。

所取得的质的进步以及他们以树叶、树根和生肉为食物的情况，总之，是衡量他们的狩猎－采集经济。 734

质的变化

这些质的变化证实并且加强了人类固有的天赋，这些变化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人同他的伙伴之间有了交换，还因为有了社会动力。这种动力对于人类的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至少相当于从他的活力的最深层发出的动力，相当于他的脑叶或其下意识空隙的动力。此外，通过侵略行为，以暴力消灭弱者，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因素。于是，智人必定是经历了几万年的某种世界战争之后，才灭绝了尼安德特人。但是社会因素也起过比较积极的作用："对古生代人和智人化石内脑壳模型的比较研究表明，智人的脑区与有目的的劳动，即体力活动、语言和对个人社会行为的控制有联系，因而发生很大变化。"⑦

的确，社会接触的需要在得到语言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语言是从动物祖先遗传下来的声音信号发展成组成各种音节的清晰发音而来的。单音节呀呀学语的阶段，好象是由于条件反射，总是伴以一定的手势、动作或态度，或总是要求注意过去的或即将来临的某一事件。总之，起初，语言主要是一种关系。同时，颚部的伸长迫使喉头器官向后，从而压低舌头的联结点。"气流不再直接导向双唇，象类人猿那样，现在必须克服种种障碍，主要是舌头造成的障碍。"⑧简言之，语言是生物、技术和头脑的辩证过程，依赖于集体的相互协调。如果没有对方作出回响，没有对话者参加，人类还会处于缄默的状态。相反，语言会使社交过程重新动起来，使之大大充实和完美化。语言是这样一种宝贵的可以学到的东西，以致在非洲魔法或宇宙进化的描述中，都认为语言有左右事物的作用。言词是富有创造力的。言语也是推动进步的工具。言语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传统，或是"用耳朵继承下来的"。言语使知识变为资本，使人类永远高于本能的盲目的单调动作。⑨言语也是社会权威的出发点，即领导和权力的出发点。

政治社会的出现

735

如果说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那是早在史前时期就这样的。要根据智人的进化过程中各种动力和各个阶段来划分各个时期，是很困难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生产技术和社会关系起了主要作用。

技术发展

前人类及其祖先和史前时期的非洲人是群居的，后来是成帮结伙、成群结队地生活，

⑦ V.P.伊阿基莫夫(V.P. Iakimov)，1972年，第2页。

⑧ 参阅V.博纳克（V. Bounak），1972年，第69页。

⑨ "语言既然使人类能够把日常生活经验中随时了解到的知识形成概念、把它记住并传布给别人，那么，语言难道不是无知的社会之科学潜力的最超乎寻常的产物吗？"B. 维尔海根(B. Verhaegen)，1974年，第154页。

这都是为某种具体任务而组织起来的，这些任务都是人类生存之需要，而且只有形成群体才能完成。

其基础结构是随着人类智力最早的曙光而出现的团体。那时，一定经常有一个集合场所，即使这个场所是临时性的，还会有个适于休息、防御和供应食物的地方。这个队伍的成员必定是定期地聚集在一团火的周围，以防御野兽的侵袭，免于恐惧和周围黑暗的威胁。在奥莫河谷(埃塞俄比亚)，曾经挖掘出低劣的石头遗迹，从中仍能看出最初人类及其祖先居住的茅舍平面图。这些居住处所的布置逐步改善，直到我们发现栖息在有利位置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这些居住处所可不受洪水淹没，不受外来袭击，但都是靠近水源的，如提希特－瓦拉塔悬崖处(毛里塔尼亚)。但是这种团体只有以捕鱼，特别是以打猎为目的时才能把它的意图充分显示出来。我们史前期的祖先无法杀掉比他们强大的动物，除非通过优势的组织形式。他们一定是聚集在一起，潜近野兽，把它们赶近悬崖或深谷，守在下边的一些同伙就会把野兽杀掉。在干燥季节有较大兽群集中的水坑附近，他们挖掘巨大的陷阱，让野兽跌进去。随后，他们把野兽杀掉，肢解、搬走——这一切工作都需要一定的分工。到新石器时代，各种活动更加多样化，分工也更细了。在早期石器时代，一个青年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他一生的方向是受限制的：采集、打猎或捕鱼。但是在新石器时代，选择的机会多多了。而且由于工作越来越专门化，必须有一个明智的分工：有些是男人做的工作，有些是女人做的工作，有农民和牧民，有鞋匠，有制作石器、木器和骨头工具的工匠，不久又出现了铁匠。

社会关系

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和它所占有的工具效率不断提高，使盈余能够积累下来，也使群体的某些人不再充当商品生产者的角色，而专门致力于服务工作。由于各个群体逐渐固定成736 为最早的等级制度，社会关系也随之复杂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种族，并且集中在各自的地区，其中最古老的就是科伊桑族和俾格米族。高大的黑人(苏丹人或班图人)，还有阿塞拉尔人(在马里的提莱姆西河)，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看来，不久以前扩展到其他大陆的黑人，[10] 在他们的发源地非洲（自撒哈拉开始）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成功地发展着。然而在别的地方，则把他们驱逐回来，如在亚洲，曾发生德拉维达向德干的退却；或者如在欧洲，被那些更能适应严酷气候条件的种族所排挤。在北非，在地中海各种族的压迫下，也发生被排挤的事情。据弗朗的说法，欧里尼亚的小塑像正是黑人种族形态的特点。确实，按照该作者的观点，"黑人中的欧里尼亚人保留着一种称为卡普萨的文化。"[11] 关于迪穆兰·德拉普朗特，他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来自非洲南部和中部的霍屯督型黑人移民被认为曾经遍布北非……，并曾以武力把一种新文化，即欧里尼亚文化传到地中海欧洲。"[12]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在黑人世界的边缘，古代的

---

⑩ 参见"黑种人在世界上已有三万年"，载《科学与未来》(Science et Avenir)，1954年10月，第92期。又参见A. 莫雷(A. Moret)，1931年，第19页。

⑪ 弗朗(R. Furon)，1943年，第14–15页。

⑫ P. 迪穆兰·德拉普朗特(P. Dumoulin de Laplante)，1947年，第13页。

异种交配是出现那些具有不太明显黑人特征的人口的原因，这种人被轻率地称为棕色人种，包括富拉尼人、埃塞俄比亚人、索马里人、尼洛特人等等。有人甚至提出，可以称之为"含米特"族。

有一个领域无比轻快地向我们展现出一种觉醒中的社会生活，这个领域就是史前期非洲石器和造型艺术。既然非洲是史前发展方向最重要的大陆，在这个大陆上居住过的人类及其祖先是最古老、最众多、最有创造性的，那么，史前期非洲艺术应是全世界最珍贵的艺术，而且在当时，非洲艺术应占有很大的优势，象今天黑人非洲音乐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一样，就不足为怪了。这种艺术的遗迹特别集中南非和东非、撒哈拉、埃及和阿特拉斯高原。自然，这种艺术常常反映个人看到聚集在其住所周围的动物生活所感到的惊慌情景。但它主要是以日常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技术，即表现这个团体的"工作日"情景：他们和野兽或敌对民族的冲突，他们的忧虑和恐惧、悠闲和娱乐，总之表现集体生活的主要方面。生动而充满活力的画廊或壁画在石壁的镜面上反映出最早人类民族的激情和田园生活。这种艺术源于一种精美的技术，常常反映团体的精神忧虑和痛苦，它描绘用符咒魅惑人的舞蹈，一群群戴面具的猎人，专心工作的巫师，面部涂成白色的妇女(今天在黑非洲的一些开幕仪式上仍保留这个风俗)匆匆忙忙好象奉召参加某种神秘的约会。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感到从魔术向宗教的过渡，这也证明人类是朝着政治社会的方向进化的，因为早期的许多领袖人物既要成为政治首领，又要成为宗教教士。 737

新石器时代对于食物生产的掌握必定引起了人口的急速增长，而人口增长又促进了移民活动。具有风格相似的石器制品的某些史前时期的作坊是分散在各地的，这一特征证明上述推论的正确。劫掠和永久性移民的范围随着器具和武器效率的提高而扩大，因为这些器械已经不那么笨重而便于使用。在非洲大陆，人类曾经向四面八方游荡，就象是被这片辽阔土地上茫茫无际的旷野所拉开似的。

今天，非洲种族地图所呈现的分解不开的重叠现象形成一副拼板玩具，连电子计算机也无法解开，这正是几千年来这种褐色民族迁徙的结果。根据所能作出的判断，最初移民的推动力量似乎来自东部和东北部的"班图"族，从此向西部和北部流动。自新石器时代以后，总的趋势是向南迁徙，好象是由于大沙漠的抵制所造成。自此以后，这个由生态形成的可怕的壕沟专横地把非洲隔成两部分。向南和向东方向(苏丹人、班图人、尼洛特人等等)的这种退潮现象在整个历史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其最后的波浪消失在南海沿岸。

商队的首领身披护身符，带着大量武器，率领氏族走向进步或冒险事业，这位首领就是推动他的人民进入历史时期的祖先，这个民族就以他的名字为名，他的名字经过多少世纪，光荣地赢得宗教礼仪式的尊敬。事实上，这类移民活动基本上是团体现象，是具有高级社会性质的行为。

这类移民活动是受原来环境中取得的成功(或失败)所激发的，对移民活动的结果是不清楚的。一方面，这类移民活动有助于进步，因为他们连续不断的集聚浪潮逐渐保证了非洲大陆能够被他们占领(即使不是被他们控制的话)，而且通过交换，传播了新的知识，并具有越来越广泛的效果。但另一方面，这类移民活动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使人口稀少了，

从而使人类团体不能达到那种集中的程度，而只有达到那样的集中，人类大众才能获得为了生存而进行发明创造的优越境地。分散在一个广阔地理范围虽然增加了对周围环境的优势，但是却产生了这样的倾向、即把最初的非洲民族拖回到那种黑暗的原始时期中，从那时起，人类通过无情宇宙的黑暗躯壳，在痛苦的挣扎中趋向成熟。

历史的运动

我们已经非常简要地说明人类进化的方向及其各个阶段。人类进步的线索向我们表738明，史前期的非洲人极力使自己脱离自然的控制，逐步沉没到人类社会之中，形成多种群体和原始社会，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然后又以其他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越来越依靠对铁制器械或武器的使用。他们的重新组合是通过婚姻或对抗形成的，反映在历史上最早的情歌和最早的武器冲突中。但是这种向上的进步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最早在史前时期诞生的社团在整个历史时期竟然一直延续不断，以至于深入到二十世纪。

此外，如果说最早的历史应从使用铁器的时期计算，那么，可以说，在非洲的若干地区，史前时期曾延续到大约1,000年左右。迟至十九世纪，有许多非洲群体(不仅是古黑人群体）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基本上和史前时期的情况无甚差异，只是使用了金属工具。即使在本世纪，俾格米人的打猎技术还是和几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非洲人相同。

虽然灿烂夺目的高度埃及文明以及许多非洲王国和帝国的辉煌成就也许会使人感到上述重大现实有些失色，但这种现实仍然存在，它赋予非洲社会发展以主体和气质，应该而且值得在这里强调。

的确，对历史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人人一致同意的单一方向。人们对历史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和泰亚尔·德日进就各有各的看法。非洲出了一些思想家，有些曾对历史运动的手段和目标做了深刻的阐述。圣奥古斯丁(354－430年)的见解向前跨了一大步，突破了当时流行的那种永恒反复循环的观念，承认从原始的罪恶到最后的审判，存在一条不可逆转的直线，这条线是完全按上帝的意旨描绘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沿着这条线得到挽救，或遭到毁灭，都决定于自己的行为。因此，研究世人之城的历史，不过是为了从中探测预告上帝之城来临的迹象。

就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来说，他一方面承认安拉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他又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创立者，而这门科学的依据是经过理性证实的证据。“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证实我们的信念，因为任何真理都能以智力想象出来。”他进而主张，这门科学的目的不仅是浮光掠影地擦过各种事件的表面，他问道：“如果只是记述从前某一君主的妻子们的名字，或这位君主的戒指上铭刻的字样，那有什么好处呢？”他特别研究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总之研究了文明（*al-umran al-bashari*）。最后，他为解释历史的前进阐述了一种辩证理论，把平等主义团结精神（*asabiyya*）的作用与国王的独裁统治对立起来，一个是在农村或畜牧地区(*al-umran al-badawi*)，一个是在城市(*al-umran al-hadari*)。

于是，从一种文明形式统治过渡到另一种文明形式的统治不断交替着，尽管不是循环739的方式，因为每一次都是以更高的水平重新出现，结果形成一种向上的螺旋式进步。伊

本·哈勒敦断言，“不同民族在习惯和制度上的差异取决于每个民族提供其生存资料的方式”，从而在卡尔·马克思以前几个世纪明确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马克思以他闻名于世的综合能力分析了西方世界的进化过程，顺便谈到了外国的生产方式。1859年，他在《前锋》报上提出了，“亚洲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种生产方式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三种“自然”农业社会的形式之一。马克思认为亚洲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存在着若干基层村社，受国家机构所控制，由这个国家机构收集农民的剩余产品，农民不是从属于个人奴隶制度，而是从属于一个“全体奴隶制度”，是作为一个群体受支配的。因此，统治者不仅拥有公职权力，而且拥有剥削下级村社的权力。这个高级村社握有最高的土地所有权，⑬使剩余产品商业化，并承担重要的公共工程，特别是灌溉工程，以增加生产，总之，它对广大群众行使一种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权力。然而马克思以后所获得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知识证明，某些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定，并由斯大林规定为不可改变的教义的五个发展阶段，也不一定符合“亚洲生活方式”这一前资本主义的变异形式——马克思认为这是欧洲以外的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变种。特别是根据后来否定这一论断的专题研究，对非洲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不能显示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各种生产方式连续的特征。

情况是这样的：在原始社会，欧洲的经验(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是，土地私有制是从公有制发展而来的，非洲的情况则相反，那里没有私有制的迹象。⑭除了这样一个重要特征之外，非洲最早的村社具有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特征。非洲的结构和亚洲生产方式的差别也是很显著的。在非洲村社中，较高级的权力机关，即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和私人一样。此外，国家一般不承担重要的公共工程。至于权力结构本身，则被认为是一种上层建筑，不属于生产方式的任何定义，虽然权力机构表明阶级的存在。然而非洲的这种结构并不具有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的那种特征。⑮尽管有血腥专制统治的情况，但是在黑非洲，国家权力几乎总是采取一种有限制的君主制形式，其基础则是法人团体和风俗习惯，确确实实的不成文宪法，以及常常是由早先的组织或社会阶层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十四世纪伊本·巴图塔曾以钦佩的口气描述马里帝国那样的负有声望并具有高效率的国家，即使当这类国家遍布于大片领土的时候，自愿选择的分权制仍允许基层社会行使真正的自治措施。无论如何，由于一般不大利用书写，加上交通技术条件不很发达，国都的统治能力总是因距离太远而不能充分发挥。距离遥远还经常带来真正的威胁，使老百姓四处奔逃，以免受到君主专制的控制。

740

此外，超过基层村社需要的剩余产品在非洲似乎是不多的，只有由国家垄断贵重商品的地方例外，如加纳或阿散蒂的黄金，以及象牙、食盐等。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酋长提供的相应的服务(治安、司法、市场等等)也不应被忽视。而且不应低估这一事实：有一

⑬ 对较高级的单位，称为“高级所有者”，或“唯一所有者”。确实，“马克思有时强调这一事实，即：国家本身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又指出村社财产权的重要性，这两种趋向无疑是没有矛盾的。”J. 谢诺(J. Chesneaux)，1969年，第29页。

⑭ “从罗马法或民法的意义上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J. 絮雷-卡纳尔(J. Suret-Canale)。

⑮ “如果把专制主义理解为绝对的和专断的权力，那么，非洲专制主义这一观念只能被排除”；同上，第125页。“我们认为，试图在非洲国家组织中找到从亚洲引进的模式的复制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多只能看到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点”；同上，第122页。

大部分税收要根据让那些应过高贵生活的人的荣誉法典在传统节日加以重新分配。[16]这就说明为什么马里皇帝曼萨·穆萨于1324年在他那次豪华的朝圣期间会那样穷奢极欲、慷慨大方了。

至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在非洲是否存在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必然是否定的。在撒哈拉以南的几乎所有社会，奴隶制只起过很小的作用。奴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俘虏，几乎全是战俘。然而作为俘虏并没有把人降到奴隶的地位，即降到象加图所说的单纯财产的地位。非洲奴隶时常享有财产权。他并不是象工具或牲畜那样被使用。战俘如果不是偶尔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那他就会很快结合到使他成为其集体财产的那个家庭中去。他就是这个家庭中新增加的成员，不久，他就享有权利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被用为步兵的俘虏有时享有很大的好处，有时，比如在卡约尔，他们甚至以总司令的身分参加到政府中来。在阿散蒂，为了确保民族统一，甚至严禁提到任何人的奴隶出身，因此，一个原先的俘虏可能成为一村之长。“俘虏的处境，虽然在非洲很普遍……但并不意味着在生产上只起有限的作用，而生产是一个社会阶级所具有的特征”。[17]

741

在奴隶制具有人数众多而性质互不相同的地方，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达荷美、阿散蒂和桑给巴尔，其社会结构产生于已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外来经济影响的结果。我们能把这看做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对等物吗？草率的比较曾使某些作者把非洲的这种或那种酋长制的性质定为“封建式”的。[18]但是，一般说来，这里也没有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人转让，因而也不存在封地。土地是这样一种不可割让的社会资产，以致一批夺取政权的征服者常常把村社土地交由当地管理者，即“土地的主人”负责，如莫西族的腾-梭巴。事实上，贵族的权力“是对物品、奴仆和人行使的，不涉及土地财产，土地财产是土著的特权”。[19]此外，在非洲，“贵族”不从事商业。贵族永远享有生来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其社会头衔。

最后，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母系家庭制度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母系制度原是非洲社会的突出特征，至少在后来伊斯兰教或西方文明的影响逐渐引进父系制度以前是这样。这种社会结构不仅在确定妇女在社会的突出作用方面很重要，而且还带来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后果，因为它在物质财富的继承方面，以及在王位袭替的继承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加纳就是如此。同母异父的亲族关系似乎来自远古的非洲史前时期，那时，在新石器时代的永久性定居提高了妇女在家庭职能中的地位，使妇女成为社会实体的中心成

742

---

⑯ J. J. 马奎特(J. J. Maquet)在注意到按照G. 巴朗迪埃(G. Balandier)的观点即“从全面考虑，掌握政权者所应付的价格从来没有清偿过”之后，他本人认为，统治者的公共服务“除非在幅员广大的异族城市社会，是不需要行使强制性权力的。在其他地方，属同一世系亲属及其不以武力强加的制裁是很多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除非实行重新分配，否则对于统治者从一个传统社会榨取的剩余产品，是无法从经济上予以补足的。”马奎特，1970年，第99-101页。

⑰ J. 絮雷-卡纳尔(J. Suret-Canale)，1964年，第119页。另参看迪恩(A. A. Dieng)，1974年，对马赫耶穆·迪奥普(Mahjemout Diop)，1971-1972年关于“弹性的”马克思主义论文提出的尖刻而有根有据的批评。

⑱ 即使人们赞成马奎特，引述布洛赫(Bloch)和冈肖夫(Ganshof)的观点，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封地，而在于领主和奴仆的关系”，但显然两者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本文作者所描述的“封建主义的”关系似乎又是两湖之间的社会所特有的，而且常常是建立在上层阶级成员之间，例如在安科莱(Ankole)或布哈(Buha)。在此情况下，有关制度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否和欧洲的情况一致呢？

⑲ 参阅 V. 卡博雷(V. Kabore)，1962年。

分。许多惯例都是由此形成，例如这样的兄妹婚姻"玩笑关系"，向未来妻子的父母纳聘礼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怎样描述非洲史前社会具有特征的进化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非洲在大陆间的关系上曾经是各方注意的中心，是技术发明和传播的主要发源地。但是继这种崇高的作用之后，很快就降到次要的边缘地位，这不只因为上述内部因素的矛盾，而且因为对非洲资源和劳务的开发没有足够的相应措施，例如没有与之相当的资本和技术转让。对非洲进行的这种开拓延续了几千年，有三次高峰时期。第一次是在古代，当埃及衰落之后，尼罗河谷以及罗马在北非的其他省份被开拓成为罗马的粮仓。除粮食外，非洲还向罗马帝国进口大宗物品，包括野兽、奴隶和格斗士，供军队、宫廷、大庄园以及竞技场血腥格斗使用。

十六世纪，开始了贩卖奴隶的不祥时代。最后到十九世纪，附庸关系表现为占领土地和殖民地化的形式。如果没有亚洲、美洲，特别是非洲被迫的贡献，欧洲同时出现并互为补充的欧洲资本积累现象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是不可思议的。

和这种现象并存的是，甚至在外来的掠夺不那么明显的那些世纪(从古代到十六世纪)，非洲制度本身有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当地的结构性障碍，使社会内部结构无法向进步的方向发展。正如J.絮雷-卡纳尔关于亚洲生产方式问题所敏锐指出的(但是他更多提到的是非洲的包括殖民地时期的情况)："事实上，在这种制度下，阶级剥削的尖锐化远远没有破坏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结构，反而加强了这种结构，使之成为榨取剩余价值即剥削的先决条件的基础。"当然，提供剩余价值的是基层社会。当时，非洲还存在着氏族和村落，非洲不大习惯于土地私有制(象空气一样广泛而宝贵，但又象空气一样自由的公有资产)，很长时期不知道获取土地是造成社会群体冲突的根源。但这不是在非洲考察到的唯一古代社会形式。低水平的技术和生产的恶性循环同时也是实际上广阔无垠的大陆空间中的人口退化的原因和结果。 743

自然障碍阻滞了长途商业往来，结果，商业一直不能广泛开展，而经常从事的一般是给宫廷运送奢侈品。确实，即使不同意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的观念("地理环境"只是历史环境的一个侧面)，也必须考虑本书总论中所提到的生态障碍。应该指出，凡是克服贸易障碍的地方，不论是全部克服或部分克服，如在尼罗河谷，或是较小程度上在尼日尔河谷，由于人口和私有制的增长，社会发展总是繁荣的。

因此，在黑非洲，除少数例外，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20] 我们甚至不能认为在非洲有过这两种制度的变种，因为不存在代表这两种制度特征的成分。这是否意味着非洲不受人类进化一般原则的支配呢？显然不是的。但是，即使这些原则对所有人类普遍适用，即使我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普遍适用，但我们总应该记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即一方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可看到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是无阶级的社会形式向有阶级冲突的各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因此分析非洲情况时不应回到卡尔·马克思的教条，而应依靠马克思的思想所放射出来的光辉。如果理性是普遍性

[20] 谢诺(J.Chesneaux)，1969年，第36页："看来成为定论的是，认为前殖民地的非洲社会，除少数情况外，都是依靠某种奴隶制或恰当地称为封建制的说法，多半是不可能的。"

的，那么学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理性应用于它的各种实际表现中去。

总之，非洲提供了一种具有显著的连续性的本土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类似其他的"原始"社会，但又存在根本的差别，特别是它没有产生私有制或国有制。[21]

然而曾有过一个逐渐和偶尔向国有形式发展的过渡，这种国有形式长期处于构成国家产生以前的关系的基础的系统之中，但由于内部推动和外部压力从已分解的原始集体制中逐渐摆脱出来，并在私人财产和国家发展的基础上重新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是占主要地位，后来成为垄断性的。

殖民地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管理资本主义商业边缘区域而产生的，在二十世纪中期则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这种过渡方式是从占主要地位的村社制到占主要地位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一种社会主义发展类型。

744

无论如何，在非洲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由于社会结构至少有500年没有改变，尽管人口增加，生产力却一直停滞不前，虽然不排除偶尔有局部地区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一般没有兴旺起来。这种停滞状态并不排除艺术上有特殊的繁荣，也不排除高尚的个人关系。好象非洲人把他们的创造能力主要用在这些领域。[22] 总之，史前时期起源于非洲和亚洲热带地区的物质文明向北方一直传播到欧洲地峡，在那里经过先进技术与资本积累的结合，把这种文明确定下来，而且似乎可以说得到发扬光大了。地球体系起于西方核心地带呢？还是起于重演野蛮人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的角色的边缘地带呢？历史将对此作出回答。我们所能肯定的是，非洲的史前时期是从灵长类发展成为人类的历史，是后来通过这种推进一切进步的动力使大自然人文化的历史——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平衡被逐渐打乱而倾向于理性发展的一次长征。人类群体之间，不论在这个大陆内或大陆外，仍然存在平衡或者不平衡。然而生产力越是提高，各种对抗力量就越是使自私自利动机和权欲的锋芒毕露。今天，非洲某些领土上仍在进行的解放斗争，既说明又否定了把这个大陆纳入可称为"生产不足的非洲方式"的体制的企图。但是从能人最早的朦胧时代起，一直进行着这种的解放斗争，一直追求着改善境遇的同一个顽强而不可控制的目的，靠自然或人的力量把自己从外来控制下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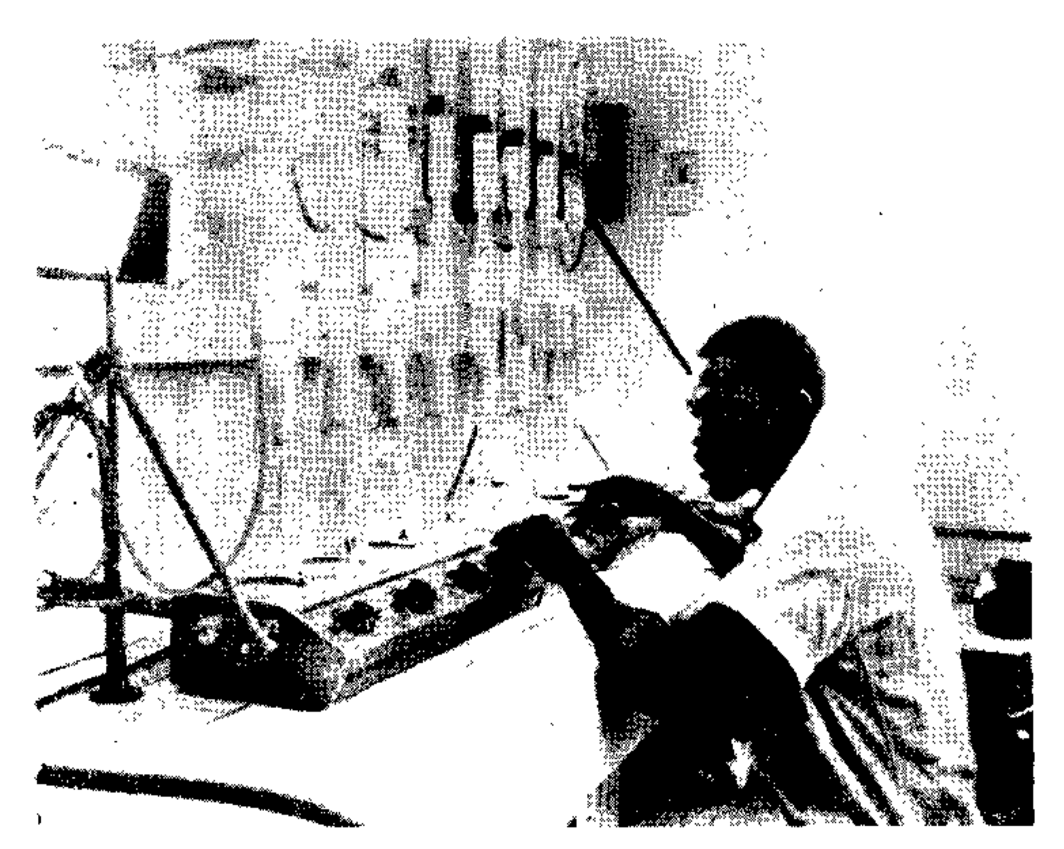
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非洲史前时期还没有结束。

（梅祖培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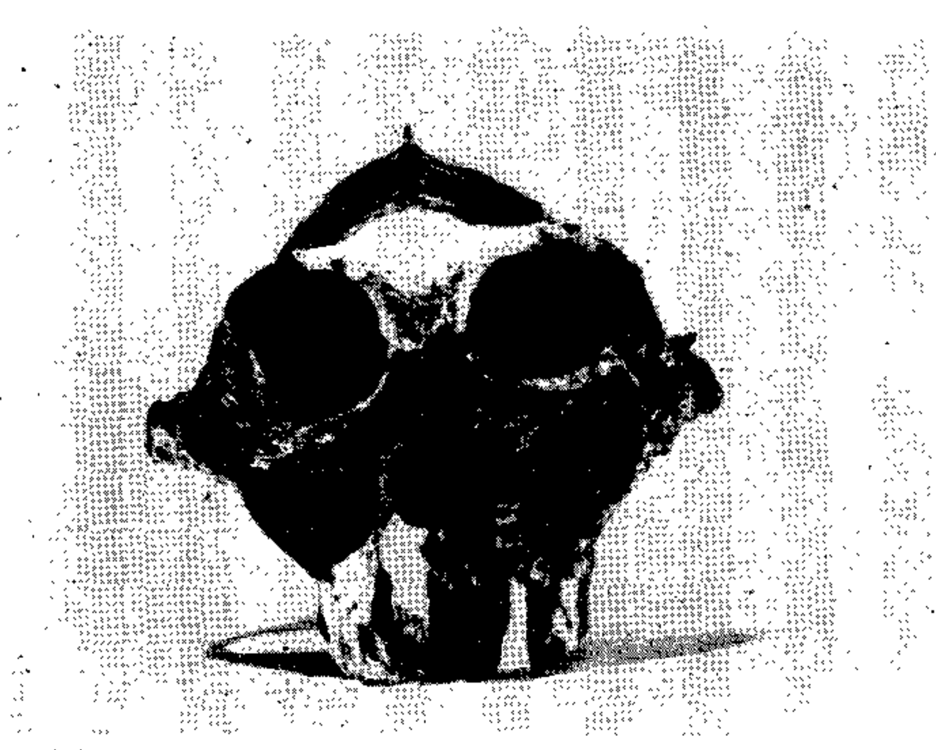
---

[21] 这种情况与先天的具体情况并无联系，与不同的自然状况也无关，而与原始历史环境有关。

[22] 正因为如此，在将来确定任何"非洲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时，应特别注意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传统，特别参阅格拉姆希(A. Gramsci)和普兰特萨斯(N. Poulantzas)的分析



照片结论.1 为研究塞内加尔河三角洲的发展在罗索贝乔建立了实验室(B.南泰特)



照片结论.2 南方古猿头盖骨，奥莫遗址(摄影:J.奥斯特，人类发展博物馆收藏品)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的是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 F. A. 阿贾伊(J. F. A. Ajayi)教授
(尼日利亚)，自 1971 年起
第六卷编辑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 (F. A. Albuquerque Mourao)
(巴西)，自 1975 年起

A. A. 博亨(A. A. Boahen)教授
(加纳)，自 1971 年起
第七卷编辑

布布·阿马(H. E. Boubou Hama)阁下
(尼日尔)，1971-1978 年

M. 布尔夫人(Mrs M. Bull)阁下
(赞比亚)，自 1971 年起

D. 查奈瓦(D. Chanaiwa)教授
(津巴布韦)，自 1975 年起

P. D. 柯廷(P. D. Curtin)教授
(美国)，自 1975 年起

J. 德维斯(J. Devisse)教授
(法国)，自 1971 年起

M. 迪富伊拉(M. Difuila)教授
(安哥拉)，自 1978 年起

H. 贾伊特(H. Djait)教授
(突尼斯)，自 1975 年起

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J. D. 费奇(J. D. Fage)教授
(联合王国)，自 1971 年起

M. 法西(M. El Fasi)阁下
(摩洛哥)，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编辑

J. L. 佛朗哥(J. L. Franco)教授
(古巴)，自 1971 年起

M. H. I. 加拉勒(M. H. I. Galaal)先生
(索马里)，自 1971 年起

V. L. 格罗塔内利(V. L. Grottanelli)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 1971 年起

E. 哈贝兰德(E. 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 1971 年起

A. 哈普特(A. 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 1971 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 (Amadou Hampaté Bâ)阁下
(马里)，1971-1978 年

I. S. 哈雷尔(I. S. 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 1978 年起

I. 赫尔贝克(I. 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 1971 年起

A. 琼斯(A. Jones)博士
(利比里亚)，自 1971 年起

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 (Abbé Alexis Kagame)
(卢旺达)，自 1971 年起

I. M. 基曼博(I. M. Kimanbo)教授
(坦桑尼亚)，自 1971 年起

J. 基-泽博(J. Ki-Zerbo)教授
(上沃尔特)，自 1971 年起
第一卷编辑

M. D. 拉亚(M. D. Laya)
(尼日尔)，自 1979 年起

A. 列特涅夫(A. Letnev)博士
(苏联)，自 1971 年起

G. 莫赫塔尔(G. Mokhtar) 博士
(埃及)，自 1971 年起
第二卷编辑

P. 马蒂布瓦(P. 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 1975 年起

D. T. 尼昂(D. T. 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1971年起
第四卷编辑

L. D.恩康科 (L. D. 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1971年起

T. 奥邦加(T. 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1975年起

B. A. 奥戈特(B. A. Ogot)教授
(肯尼亚)，自1971年起
第五卷编辑

C. 拉沃雅纳哈里(C. 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1971年起

已故 W. 罗德尼(W. Rodney)博士
(圭亚那)，自1979年起

已故 M. 希贝卡(M. 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年

Y. A. 塔利布(Y. A. Talib)教授
(新加坡)，自1975年起

A. 特谢拉・达莫塔(A. Teixeira da Mota) 教授
(葡萄牙)，自1978年起

T. 齐邦古(T. Tshibangu)主任
(扎伊尔)，自1971年起

J. 旺西纳(J. 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1971年起

E. 威廉斯(E. 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年

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编辑，非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M. 格莱莱(M. Glélé)先生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处，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1 rue Miollis)75015

作 者 简 历

总　　论　J. 基-泽博(J. Ki-Zerbo, 上沃尔特)；非洲历史教学法专家；关于黑非洲及其历史若干著作的作者；瓦加杜古高等教育中心历史学教授；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秘书长。

第 一 章　J. D. 费奇(J. D. Fage,英国)；西非历史学专家；关于非洲历史若干出版物的作者和副主编；伯明翰大学代理副校长兼该大学非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第 二 章　H. E. 布布·阿马(H. E. Boubou Hama,尼日尔)；口头传说专家；有关尼日尔和苏丹地区历史许多著作的作者；曾任关于口头传说和发展非洲语言的研究和文献区域中心主任。

第 三 章　P. D. 柯廷(P. D. Curtin, 美国)；奴隶贸易史专家；有关该论题许多著作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四 章　T. 奥邦加(T. Obenga, 刚果人民共和国)；非洲语言学专家；若干有关非洲历史的文章以及有关古代非洲的著作的作者；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文学系教授。

第 五 章　H. 贾伊特(H. Djait,突尼斯)；马格里布中世纪史专家；关于突尼斯历史许多文章的作者；突尼斯大学教授。

第 六 章　I. 赫尔贝克(I. Hrbek,捷克斯洛伐克)；非洲史及阿拉伯史专家；关于非洲历史许多著作的作者；布拉格东方问题研究所阿拉伯及非洲问题研究室主任，教授。

第 七 章　J. 旺西纳(J. Vansina,比利时)；非洲历史专家；关于赤道非洲历史许多著作的作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 八 章　A. 哈姆帕特·巴(A. Hampaté Bâ,马里)；口头传说专家；许多有关古代非洲帝国和非洲文明的著作的作者。

第 九 章　Z. 艾斯坎德(Z. Iskander, 埃及)；埃及历史专家；许多有关古埃及的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文物局技术事务主任。

第 十 章　P. 迪阿涅(P. Diagne, 塞内加尔)；政治经济学博士；语言学家；关于非洲政权和沃洛夫语法西部著作的作者；达喀尔大学副教授。

第十一章　D. A. 奥尔德罗格(D.A. Olderogge, 苏联)；非洲社会科学专家；一些有关非洲著作的作者；苏联科学院院士；

第十二章　J. H. 格林伯格(J.H. Greenberg,美国)；语言学家；许多有关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文章和著作的作者；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

第十三章　S. 迪亚拉(S. Diarra,马里)；热带地理学专家；阿比让大学地理学教授。

第十四章　A. 马博根耶(A. Mabogunje, 尼日利亚)；若干有关约鲁巴人著作的作者；伊巴丹大学地理学教授。

第十五章　J. 基-泽博(J. Ki-Zerbo)。

第十六章　R. 赛义德(R. Said, 埃及)；物理学家；埃及地质调查及矿业局局长。

第十六章　H. 富尔(H. Faure,法国)；理学博士；法国属地地质学专家；西非地质学论著的作者；达喀尔大学和巴黎第六大学的讲师；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第四纪地质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第十七章　L.巴卢(L. Balout,法国)；非洲史前史专家；许多有关北非的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曾任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第十七章　Y.科彭斯(Y. Coppens, 法国)；史前史专家；许多有关人类起源的著作的作者；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副馆长。

第十八章　R.利基(R. Leakey,英国)；非洲史前史专家；论述涉及东非人类起源的出土文物著作的作者；内罗毕国际纪念路易斯·利基非洲史前史研究所所长。

第十九章　J. E. G. 萨顿(J. E. G. Sutton,英国)，史前史专家；许多论述非洲史前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考古系主任。

第二十章　J. D.克拉克(J. D. Clark,美国)；非洲史前史专家；许多论述非洲史前史及古代文明的出版物的作者；历史学及考古学教授。

第二十一章　R.德贝勒·德爱尔芒(R. de Bayle des Hermens,法国)；史前史专家；许多论述非洲史前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在巴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第二十一章　F.范诺顿(F. Van Noten,比利时)；史前史专家；史前史著作和出版物的作者；皇家史前史及考古学博物馆馆长。

第二十二章　L.巴卢(L. Balout)。

第二十三章　H. J.于戈(H.J. Hugot,法国)；史前史专家；许多有关史前时期及第四纪自然史著作的作者；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副馆长。

第二十四章　C. T.肖(C. T. Shaw,英国)；有关西非史前史许多著作的作者；古代史教授；泛非史前史大会副主席。

第二十五章　F.代博诺(F. Debono,英国)；埃及史前史专家；有关史前研究著作的作者；研究工作人员。

第二十六章　J.基-泽博(J.Ki-Zerbo)。

第二十七章　R.波蒂埃(R.Portères,法国)；其大部分生涯均献身于非洲植物学研究；原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教授；已故。

第二十七章　J.巴罗(J. Barrau,法国)；许多有关热带植物著作的作者；巴黎人种-植物学及人种-动物学实验室副主任。

第二十八章　J.韦库泰(J. Vercoutter,法国)；古代史专家；若干有关古埃及及其考古学出版物的作者；历史学教授；开罗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所长。

结　　论　J.基-泽博(J. Ki-Zerbo)。

参考文献目录

本书出版者谨指出，尽管参考书目已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本著作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错误在所难免。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A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Washington, DC
AARSC *Annal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Brussels
AATA *Art Archaeological and Technical Abstracts*, New York
ACPM *Annals of the Cape Provincial Museums*, Grahamstown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Actes du 1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Africaine*, Fort Lamy, 11–16 December 1966,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national tchadien pour les sciences humaines, Fort Lamy
Actes 2e Coll. Intern. LNA *Actes du second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ique negro-africaine*, Dakar
Actes II Congr. PPEQ *Acts of the Second Pan 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y*, Algiers, September–October 1952
Acts III PCPQS *Acts of the Third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ies*, Livingstone, 1955,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Actes III Congr. UISPP *Act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 Zurich, 1950
Actes IV Congr. PPEQ *Actes du IV Congrès Panafricain de Préhistoire et de l'Etude du Quaternaire*, Leopoldville, 1959, Tervuren, 1962, AMRAC 40
Actes V Congr. PPEQ *Acts of the Fifth Pan 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ies*, Tenerife, 1966
Actes VII Congr. PPEQ *Actes du VII Congrès panafricain de préhistorie et de l'étude du Quaternaire*, Addis Ababa, 1971
Actes VI Congr. UISPP *Act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 Rome, 1962
Actes IX Congr. UISPP *Act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 Nice, 1976
Actes 46e Congr. AFAS *Actes du 46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pour l'Avancement des Sciences*, Montpellier, 1922
Actes Coll. Intern. Fer.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Le Fer à Travers les Ages; hommes et techniques*, Nancy, 3–6 October 1956, Annales de l'Est, Mémoire no. 16, Nancy, 1956
Acts IX INQUA Congr. *Act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ongress for Quaternal Research*,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Acts XV Congr. IAAP *Act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Paris, 1931
ADG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Geographentags*
Africana *Africana Bulletin*, Uniwersytet Warszawski, Studium Afrykanistyczne, Warsaw
AG *Archaeologia Geographica*, Hamburg, West Germany
AGS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AJHG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 Chicago
AJP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Philadelphia
ALR *African Language Review* (now *Africa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ALS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AMRAC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Afrique Centrale*, Sciences humaines, Tervuren, Belgium
AMRCB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u Congo belge*
AN *African Notes*, University of Ibad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Ibadan, Nigeria
Annal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nt. Afr. *Antiquités Africaine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ASAE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Cairo

ASAM *Annals of the South African Museum*, Cape Town
AT *Agronomie Tropicale*, Institut de Recherches Agronomiques Tropicales et des Cultures, Vivrières, Paris
BASEQUA *Bulletin de l' Association Sénégalaise pour l' étude du quaternaire de l'ouest africain*, Dakar-Fann, Senegal
BAUGS *Bulletin of the All Union Geographical Society*
BCEHS *Bulletin du Comité d'E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BFA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Cairo
BGHD *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Paris
BGS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New York
BIE *Bulletin de l'Institut d'Egypte*, Cairo
BIEGT *Bulletin d'information et de liaison des Instituts d'Ethnosociologie et de Géographie Tropicale*, Abidjan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puis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Dakar
BIFAO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airo
BIRSC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du Congo*
BJBE *Bulletin du Jardin Botanique de l'Etat*, Brussels
BML *Bowman Memorial Lectures*,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BNHSN *Bulletin of New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BSA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Paris
BSA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and Egyptian Research Account*, London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BSERP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Les Eyzies, France
BSGC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de Bordeaux*, Bordeaux, France
BSG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Géologique de France*, Paris
BSHNA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Naturelle d'Afrique du Nord*
BSL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Paris
BSP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Paris
BSPM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du Maroc*, Rabat
BSPPG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et Protohistorique Gabonaise*, Libreville
BSRBAP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Anthropologie et de Préhistoire*, Brussels
BSRBB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Botanique de Belgique*, Brussels
BUPA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1967
CA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CAEH *Cahiers d'Anthropologie et d'Ecologie Humaine*, Paris
CDAPC *Companhia de Diamentes de Angola*, Lisbon
CEA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HE *Cahiers d'Histoire Epytienne*, Cairo
CHM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 Paris
CJA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LAD *Centr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de Dakar*
CM *Cahiers de la Maboke*, Tervuren
Coll. CNR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CORSTOM *Cahiers de l'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Outre-Mer*, Série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CRAS *Compte Rendu hebdomadaire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Paris
CRSB *Compte rendu de la société de biogéographie*
EAJ *East Africa Journal*,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 Cultural Affairs, Nairobi
Ecol. Monogr. *Ecological Monographs*
Econ. Bot. *Economic Botany*
GA *Geografiska Annaler*, Swedish Society of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 Stockholm
G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GSAB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oulder, USA
GSAM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emoir*, Boulder, USA
L'Homme *L'Homme, cahier d'ethnologie, de géographie et de linguistique*, Paris
HT *Hesperis-Tamuda*, Université Mohammed V, Faculté de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 Rabat, Morocco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Chicago, USA
INEAC *Institut national pour l'étude agronemique du Congo belge*
IP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per Historians*
IR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Université d'Alger*)
ISHM *Institut des sciences humaines du Mali*
JA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USA Washington, DC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UP, London, New York
JAL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Hertford, England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JATBA *Journal d'Agronomie Tropica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J. Afr. Soc.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London
JEA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London
JEASC *Journal of the East African Swahili Committee*, Kampala
JHS *Journal Historique du Sokoto*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MA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CUP, London
JNS *Journal of Negro Studies*, Washington, DC
JR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é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WAL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Ibada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 Nigerian Languages, Ibadan, Nigeria
Kush *Kush, Journal of the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Khartoum
LNR *Lagos Notes and Records*, University of Lagos,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Lagos, Nigeria
MAI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es*, Paris
MAM *Mémoires de l' Académie Malgache*, Tananarive, Madagascar
Mém. Soc Ling.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nguistique*
MIRCB *Mémoires de l'Institut Royal du Congo Belge*, Brussels
MN *Masca Newsletter*, The University Museum, Philadelphia
MSB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Biogéographie*, Paris
NA *Notes Africain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de l'IFAN, Dakar
OJS *The Ohio Journal of Science*, Ohio Academy of Science, Colombus, USA
OM *Oduma Magazine*, Rivers State Council for Arts and Culture, Port Harcourt, Nigeria
PA *Practical Anthropology* (now *Missiology*) 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 Pasadena, USA
PR *Polish Review*,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 in America, New York
Proc. Burg Wart. Symp.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eld at Wartenstein, Austria, on the origin of African domesticated plants*, 1956
Proc. Conf. Cult. Ecol.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Cultural Ecology*, Museum of Canada Bulletin
Proc. VII Congr. INQUA *Proceedings of the V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Quaternary Studies*, Denver and Boulder, 1965
Proc. IX Congr. INQUA *Proceedings of the IX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ongress for Quaternal Research*,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Proc. III Intern. WAC *Proceedings of the IIIrd International West African Conference*, Ibadan, 1949
Proc. Sem. ASEWA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n Application of Sciences in Examination of Works of Art*, Boston, Mass., 1958
PTR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London
RA Revue Africaine, Journal de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Algiers
Rap. 12e CISH *Rapport du 12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SO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Scuola Orientale della Università di Roma, Rome
RE *Revue d'Egyptologie*, Paris
SAAAS *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AAB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Cape Town
SAJ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LLR *Sierra Leone Language Review*
SPPG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et protohistorique gabonaise*, Libreville
SWJA *South 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now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SA
TGSSA *Transaction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Legon, Accra

TMIE *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thnologie*, 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Trav. CAMAP *Travaux du Centre d'Archéologie Méditerranéenne de l'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d. K. Michalowski), Warsaw
Trav. IRS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University of Algeria, Algiers
UJ *Uganda Journal*, Uganda Society, Kampala
WA *World Archaeology*, Henley on Thames, England
WAA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ical Newsletter*, Ibadan
WAJ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WAR *West African Review*, Elder, Dempster & Co., London
ZES *Zeitschrift für Eingeboren in Sprachen*, Berlin
Z. Phon. *Zeitschrift für phonetik und allgemeine Sprach wissenschaft*

Adams, W. Y. (1964) 'Post-Pharaonic Nubia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JEA*, 50. **(Chap. 28)**
Aguessy, H. (1972) 'Traditions orales et structures de pensée: essai de méthodologie, *CHM*, XIV, 2, pp. 269–97. **(Chaps 4, 7, 10)**
Aitken, M. J. (1961) *Physics and archaeology* (New York: Interscience Publishers). **(Chap. 9)**
Aitken, M. J. (1963) 'Magnetic location', in D. Brothwell and E. Higgs (eds),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 Hudson), pp. 555–68. **(Chap. 9)**
Aitken, M. J. (1970) 'Dating by archaeomagnetic and thermoluminescent methods', *PTRS*, 269, 1193, pp. 77–88. **(Chap. 9)**
Akinjogbin, I. A. (1967) *Dahomey and its Neighbours, 1708–18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n. Introd.)**
Alagoa, E. J. (1968a) 'The use of oral literacy data for history', *JAF*, 81. **(Chap. 7)**
Alagoa, E. J. (1968b) 'Songs as historical data. Examples from the Niger delta', *Research Review*, V, 1. **(Chap. 7)**
Alagoa, E. J. (1971) 'The Niger delta states and their neighbours, 16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Vol. I, pp. 269–303. **(Chap. 3)**
Alagoa, E. J. (1973) 'Oral tradition and archaeology. The case of Onyoma', *OM*, 1, 1. **(Gen. Introd., Chap. 4)**
Al-Alawi, ('Aidarus b, Al-Sharīf 'Alī al-'Aidarus al-Nadīrī al-'Alawī) (1374/1954–5) *Bughyat al-Amāl fī tarikh al-sumāl* (Mogadishu), in Arabic. **(Gen. Introd., Chaps 5, 6)**
al-Baydaq (1928) *Documents inédits d'histoire almohade* (tr. and ed. Lévi-Provençal) (Paris). **(Chap. 5)**
al-Shinqiti, A. (1910) *Al-Wasit fi tarajim Udaba Shinqit* (Cairo). **(Chap. 6)**
Alberti, L. (1811) *Description physique et historique des' Cafres sur la côte méridionale de l'Afrique* (Amsterdam: Maaskamp). **(Chap. 6)**
Alexander, Sir J. E. (1967) *An Expedition of Discovery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Chap. 6)**
Alexandre, J. and Alexandre, S. (1968) 'Contribution à l'élaboration d'une stratigraphie du Quaternaire, basée sur les variations de climat dans une région du monde inter-tropical', *VIIe Congrès INQUA*, 7. **(Chap. 21)**
Alexandre, P. (1970) 'Afrique centre-équatoriale et centre-occidentale',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ed. H. Deschamps, vol. 1 (Paris: PUF). **(Chap. 10)**
Alexseev, K. (1973) 'Sur la classification anthropologique de la population indigène de l'Afrique',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s études africaines* (Moscow). **(Chap. 11)**
Alimen, H. (1955) *Préhistoire de l'Afrique* (Paris: Boubée) tr.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Hutchinson), 1957. **(Chaps 13, 21–4, 28)**
Alimen, H. (1960) 'Découverte d'un atelier de l'acheuléen supérieur, en place, à la limite du 2e pluvial et du 3e pluvial dans les monts d'Ougarta (Sahara occidental)', *BSPF*, 57, pp. 421–3. **(Chap. 23)**
Alimen, H. (1962) 'Les origines de l'homme', *Bilan de la science* (Paris: Fayard), Conclusion.
Alimen, H. (1963) 'Considérations sur la chronologie du Quaternaire saharien', *BSGF*, 5, pp. 627–34. **(Chap. 13)**
Alimen, H. (1975a) 'Les isthmes hispano-marocains et sicilo-tunisiens aux temps acheuléens', *Anthropologie*, 79, 3, pp. 399–430. **(Chap. 22)**
Alimen, H. (1975b) 'Limite Pliocène-Quaternaire et définition du Quaternaire', *Prace o Plejstocie, Livre jubilaire du Prof. Rozycki* (Warsaw). **(Chap. 16)**
Alimen, H. (1976) 'Variations climatiques dans les zones désertiques de l'Afrique nord-équatoriale durant les quarante derniers millénaires', *Actes VII Congr. PPEQ*, Addis Ababa, pp. 337–47. **(Chap. 16)**

Alimen, H. and Chavaillon, J. (1956) 'Industrie acheuléenne in situ de l'oued Fares, dans les monts d'Ougarta (Sahara occidental)', *BSPF*, 53, pp. 202–14. **(Chap. 23)**

Alimen, H., Chavaillon, J. and Margat, J. (1965) 'Contribution à la chronologie préhistorique africaine. Essai de corrélation entre les dépôts quaternaires du bassin Guir-Saoura (Sahara) et du bassin du Tafilat (Maroc)', *Congrès 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Monaco, 1959, pp. 161–267. **(Chap. 16)**

Allen, J. W. T. (1959) 'The collection of Swahili litera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oral tradition and history', *TNR*, 53, pp. 224–7. **(Chap. 6)**

Almagro-Basch, M. (1946) *Prehistoria del norte de Africa y del Sáhara Español* (Barcelona: Instituto de Estudios Africanos). **(Chap. 23)**

Amari, M. (1863) *I diplomi arabi del R. Archivo Fiorentino* (Florence). **(Chap. 5)**

Amer, M. (1935) 'The excavations in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Maadi', *BFA*, II, pp. 176–8. **(Chap. 25)**

Amer, M. (1953a) 'Rizkana I. Excavations in the Wadi Digla', *BFA*, XV, pp. 97–100. **(Chap. 25)**

Amer, M. (1953b) 'Excavations in the Wadi Digla', *BFA*, XV, pp. 201–5. **(Chap. 25)**

Anciaux de Favaux, A. (1955) 'Les gisements préhistoriques de Kansenia', *Actes II Congr. PPEQ*, pp. 333–4. **(Chap. 21)**

Anciaux de Favaux, A. (1957) 'Une industrie sur galets speciale aux plateaux des Biano (Katanga, Congo Belge)', *Acts III PCPQS*, pp. 210–13. **(Chap. 21)**

Anciaux de Favaux, A. (1962) 'Evolution parallèle de deux ou plusieurs techniques a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sur les hauts plateaux Katangais. Fouilles 1960–61', *Actes VI Congr. UISPP*, III, pp. 230–5. **(Chap. 21)**

Anderson, B. (1870)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Musardu,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Mandingoes* (New York: Green). **(Chap. 6)**

Antoine, M. (1938) 'Notes de préhistoire marocaine, XIV: Un cône de résurgence du Paléolithique moyen à Tit-Mekil, près Casablanca', *BSPM*, 12. **(Chap. 23)**

Apter, D. E. (1955) *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Arab-Faqih (1897–1901)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byssinie (XVIe siècle)*, ed. R. Basset, 2 Vols (Paris: Leroux). **(Chap. 6)**

Arambourg, C. (1949) 'Sur la présence dans le Villafranchien d'Algérie de vestiges éventuels d'industrie humaine', *CRAS*, 229, pp. 66–7. **(Chap. 22)**

Arambourg, C. (1954) 'L'hominien fossile de Ternifine (Algérie)', *CRAS*, 239, pp. 293–5. **(Chap. 24)**

Arambourg, C. (1962) 'Etat actuel des recherches sur le Quaternaire en Afrique du Nord', *Actes IV Congr. PPEQ*, 40, pp. 255–77. **(Chap. 16)**

Arambourg, C. (1966) 'Aperçu sur les résultats des fouilles du gisement de Ternifine', *Actas V Congr. PPEC*, I, pp. 129–36. **(Chaps 16, 24)**

Arambourg, C. and Coppens, Y. (1967) 'Sur la découverte dans le Pléistocène inférieur de la vallée de l'Omo (Ethiopie) d'une mandibule d'Australopithécien', *CRAS*, 265, pp. 589–90. **(Chap. 17)**

Arambourg, C. and Coppens, Y. (1968) 'Découverte d'un Australopithécien nouveau dans les gisements de l'Omo (Ethiopie)', *SAJS*, 64, 2, pp. 58–9. **(Chap. 17)**

Arambourg, C. and Hofstetter, R. (1954) 'Découverte en Afrique du Nord de restes humains d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CRAS*, 239, pp. 72–4. **(Chap. 24)**

Arambourg, C. and Hofstetter, R. (1955) 'Le gisement de Ternifine. Résultats des fouilles de 1955 et découvertes de nouveaux restes d'Atlanthropus', *CRAS*, 241, pp. 431–3. **(Chap. 24)**

Arambourg, C. and Hofstetter, R. (1963) 'Le gisement de Ternifine', *IPH Archives*, XXXII, Paris, Masson. **(Chap. 22)**

Arbousset, T. (1842) *Relation d'un voyage d'exploration* (Paris). **(Chap. 6)**

Arkell, A. J. (1949a) *The old stone age in the Anglo-Egyptian Sudan*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s No. 1). **(Chap. 25)**

Arkell, A. J. (1949b) *Early Khartoum.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of an early occupation site carried out by the Sudan Government Antiquities Service, 1944–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23, 35, 28)**

Arkell, A. J. (1950) 'Gold Coast copies of fifth to seventh century bronze lamps', *Antiquity*, 24, pp. 38–40. **(Chap. 24)**

Arkell, A. J. (1953) *Shaheinab: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 of a neolithic occupation site carried out for the Sudan Government Antiquities Service in 194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23, 25, 28)**

Arkell, A. J. (1954) 'The late Acheulean of Esh Shaheinab', *Kush*, I, pp. 30–4. **(Chap. 23)**

Arkell, A. J. (1961)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1*, 2nd edn (London: Athlone Press). **(Chap. 28)**

Arkell, A. J. (1964) *Wanyanga, and a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of the South-West Libyan Desert. The British Ennedi Expedition 1957*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Arkell, A. J. (1975) *Prehistory of the Nile Valley* (Handbuch das Orientalistik, VII, Vol. 2, pt A, no. 1, Leiden: Brill). **(Chap. 28)**

Arkell, A. J. and Sandford, K. S. (1933) *Palaeolithic Man and the Nile Valley in Nubia and Upper Egypt* (Chicago). **(Chap. 23)**

Armstrong, R. (1964) 'The use of linguistics in ethnogeography', in J. Vansina *et al.*,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Armstrong, R. (1971) 'The collection of oral traditions in Africa', *AUA*, pp. 579–83. **(Chap. 7)**

Arnett, E. J. (1922) *The Rise of the Sokoto Fulani* (Kano). **(Chap. 6)**

ASEQUA (1964 and following years) *BASEQUA No. 1* and following. **(Chap. 16)**

ASEQUA (1966) 'Etat des recherches sur le Quaternaire de l'Ouest Africain, 1ère série', *BIFAN*, 28, pp. 371–429. **(Chap. 24)** (See *BASEQUA*.)

ASEQUA (1967) 'Etat des recherches sur le Quaternaire de l'Ouest Africain, 2ème série', *BIFAN*, A, 29, pp. 821–65. **(Chap. 24)** (See *BASEQUA*.)

ASEQUA (1969) 'Etat des recherches sur le Quaternaire de l'Ouest Africain, 3ème série', *BIFAN*, A, 31, pp. 210–83. **(Chap. 24)** (See *BASEQUA*.)

Atherton, J. H. (1972) 'Excavations at Kamabai and Yagala Rock Shelters, Sierra Leone', *WAJA*, 2, pp. 39–74. **(Chap. 24)**

Atherton, J. H. (1973) 'The Stone Age Iron Age transition in northeast Sierra Leone', *Underground West Africa*, 7. **(Chap. 24)**

Aubreville, H. (1949) *Climats – forêts, désertification de l'Afrique tropicale*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Chap. 13)**

Aubreville, H. (1962) 'Savanisation tropicale et glaciations quaternaires', *Andansonia*, 2, 1, p. 1684. **(Chap. 13)**

Ayache, G. (1961) 'Les archives marocaines', *HT*, 2. **(Chap. 6)**

Bâ, A. H. (1972) *Aspects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ersonne, culture, réligion)*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8)**

Bâ, A. H. and Cardaire, M. (1957) *Tierno Bokar, le sage de Bandiagara*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8)**

Bâ, A. H. and Daget, J. (1962) *L'empire peul du Macina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Mouton). **(Chap. 8)**

Bâ, A. H. and Dieterlen, G. (1961) *Koumen, texte initiatique des pasteurs peul* (Paris: Mouton) **(Gen. Introd.)**

Ba, O. (1972) *Glossaire des mots étrangers passés en Pulaar du Fouta Toro* (Dakar: Centr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de Dakar). **(Chap. 10)**

Babet, V. (1936) 'Note préliminaire sur un atelier de pierres taillées à Brazzaville (Afrique Equatoriale française)', *BSPF*, 33, pp. 153–5. **(Chap. 21)**

Bada, J. L., Schroeder, R. A., Protsch, R. and Berger, R. (1974) 'Concordance of collagen based radiocarbon and aspartic acid racemization ages', *AATA*, 11, 2. **(Chap. 9)**

Bailloud, A. (1966) 'L'évolution des styles céramiques en Ennedi',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Gen. Introd.)**

al-Bakri (1968) 'Routier de l'Afrique blanche et noire du Nord-Ouest' (Cordoue, 1068), trans. V. Monteil, *BIFAN*, B, 30, pp. 39–116. **(Chap. 24)**

Balandier, G. (1971) *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3rd edn. **(Gen. Introd., Chap. 15)**

Balandier, G. and Maquet, J. (1968) *Dictionnaire des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Paris: Hazan). **(Chap. 4)**

Balbi, A. (1826) *Atlas ethnographique du globe ou Classification des peuples anciens et modernes d'apres leurs langues* (Paris: Rey et Gravies). **(Chap. 12)**

Ball, J. (1939) *Contributions to the geography of Egypt* (Cairo: Government Press, Bulâq). **(Chap. 16)**

Balout, L. (1952a) 'Pluviaux, interglaciaires et préhistoire saharienne', *Trav. IRS*, 8, pp. 9–21. **(Chaps 16, 23)**

Balout, L. (1952b) 'Du nouveau à l'Ain Hanech', *BSHNAN*, 43, pp. 152–9. **(Chap. 22)**

Balout, L. (1954) 'Les hommes préhistoriques du Maghreb et du Sahara. Inventaire descriptif et critique', *Libyca*, II. **(Chap. 22)**

Balout, L. (1955a) in C. Arambourg and L. Balout, 'L'ancien lac de Tihodaine et ses gisements préhistoriques', *Actes II Congr. PPEQ*, pp. 287–92. **(Chap. 23)**

Balout, L. (1955b) *Pré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essai de chronologie* (Paris: AMG). **(Chaps 12, 22, 23)**

Balout, L. (1958) *Algérie préhistorique* (Paris: AMG). **(Chap. 23)**

Balout, L. (1965) 'Le Moustérien du Maghreb', *Quaternaria*, 7, pp. 43–58. **(Chap. 22)**

Balout, L. (1967a) 'Procedes d'analyse et questions de terminologie dans l'etude des ensembles industriels d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n Afrique du Nord',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701-35. (Chap. 22)

Balout, L. (1967b) 'L'homme préhistorique et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ROMM*, III, pp. 9-29. (Chap. 22)

Balout, L. (1968) 'L'art rupestre nord-africain et saharien. Etat de quelques problèmes', *Simposio internacional de arte rupestre* (Barcelona), pp. 257-64. (Chap. 22)

Balout, L. (1976) *Orientations nouvelles de la préhistoire maghrébine. In memoriam Pedro Bosch Gimpera, 1891-1974* (Mexico), pp. 99-113. (Chap. 22)

Balout, L. *et al.* (1967 onwards) Nine Collections of Papers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PEQ Congresses. (Chap. 22)

Balout, L., Biberson, P. and Tixier, J. (1967) 'L'Acheuléen de Ternifine, gisement de l'Atlanthrope', *Anthropologie*, 71, pp. 217-37. (Chap. 22)

Balout, L. and Roubet, C. (1970) 'Datation radiométrique de l'Homme de l'Aïn Dokkara et de son gisement l'Escargotière du Chacal, région de Tébessa, Algérie', *Libyca*, 18, pp. 21-35. (Chap. 22)

Barber, E. J. W. (1974) *Archaeological decipherment. A Handboo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4)

Barbey, C. and Descamps, C. (1969) 'A propos des Pebble-tools de la Moyenne Gambie', *BIFAN*, A, 31, pp. 276-82. (Chap. 24)

Barbot, J. (1732)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North and South Guinea* in Churchill and Awnsham (comp.),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Chap. 1)

Barendson, G. W., Deevey, E. S. and Gralemski, L. J. (1965) 'Yale natur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III', *Science*, 126, pp. 916-17. (Chap. 24)

Barrau, J. (1962) 'Les plantes alimentaires de l'Océanie, origines, distribution et usages', *Annales du Musée colonial de Marseille*, 7, III-IX, 275pp. (Chap. 27)

Barrau, J. (1975) 'L'Asie du Sud-est, berceau cultural?' *Etudes rurales*, pp. 53-6. (Chap. 27)

Barrow, J. (1801-3)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797 and 1798*, 2 Vols (London). (Chap. 6)

Barry, B. (1974) 'La chronologie dans la tradition orale du Waalo. Essai d'interprétation', *Afrika Zamani*, 3, pp. 31-49. (Chap. 4)

Barth, H. (1857-8)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London), (Chap. 1)

Basch, M. A. and Gorbea, M. A. (1968) 'Estudios de arte rupestre nubio', *Memorias de la Misión arqueologica en Egypto*, 10 (Madrid). (Chap. 23)

Basset, R. (1894) *Etudes sur les dialectes berbères* (Paris: Leroux). (Chap. 10)

Basset, R. (1909-10) *Mission au Sénégal*, 3 Vols (Paris: Leroux). (Chaps 6, 10)

Battistini, R. (1967) *L'Afrique australe et Madagascar* (Paris: PUF). (Chap. 13)

Baulin, J. (1962) *The Arab role in Africa* (Baltimore: Penguin). (Chap. 5)

Baumann, H. (1936) *Schöpfung und Urzeit des Menschen im Mythus der afrikanischen Völker* (Berlin). (Chap. 7)

Baumann, H. and Westermann, D. (1940, 1948) *Völkerkunde Afrikas* (Essen) tr. *Les Peuples et les Civilisations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1948, 1968. (Gen. Introd., Chaps 1, 6, 10)

Baumgartel, E. J. (1955) *The Cultures of Prehistoric Egypt*, rev.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8)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67) 'Premier aperçu d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Anthropologie*, 71, pp. 135-66.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69) 'Les collections préhistoriques de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au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CM*, VII, pp. 27-40.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1) 'Quelques aspects de la préhistoire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JAH*, XII, pp. 579-97.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5)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Laboratoire d'ethnologie et de sociologie comparative, Université de Paris, Série Recherches oubanguiennes no. 3, Paris: Klincksieck)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6) 'A la découverte de la préhistoire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Archeologia*, no. 92 (Chap. 26)

Bayle des Hermens, R. de and Vidal, P. (1971) 'Deux datations sur la méthode du Carbone 14 des monuments mégalithiques de Bouar, RCA', *CM*, IX, pp. 81-2. (Chap. 21)

Beale, F. C. (1966) *The Anglo-Gambian Stone Circles Expedition 1964/65* (Bathurst: Government Printer). (Chap. 24)

Beattie, J. (1968) 'Aspects of Nioro Symbolism', *Africa*, 38, 4, pp. 413–42. (Chap. 7)
Beauchene, G. de (1963) 'La Préhistoire du Gabon', *Objets et Mondes*, Vol. III (Paris: Musée de l'Homme). (Chap. 21)
Bébey, F. (1969) *Musique de l'Afrique* (Collection Expressions, Horizons de France).
Beccari, C. (1905–17) *Rerum aethiopicarum scriptores occidentales inediti* (Rome). (Chap. 1)
Becker, C. H. (1968) 'Materialen zur Kenntnis des Islam in Deutsch Ost-Afrika', *INR*, LXVII. (Gen. Introd., Chaps 5, 6)
Beckingham, C. F. and Huntingford, G. W. B. (1954) *Some Records of Ethiopia 1593–1646* (London: Hakluyt Society). (Chaps 1, 6)
Behrensmeyer, A. K. (1975) 'The Taphonomy and paleoecology of Plio-Pleistocene vertebrate assemblage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Bull. Mus. Comp. Zool.* (Chap. 17)
Beidelman, T. (1970) 'Myth, legend and oral history: A Kaguru traditional text', *Anthropos*, 65, pp. 74–97. (Chap. 7)
Bello, M. (1951) *Infaqu' l-maysur*, ed. C. E. J. Whiting (London). (Chap. 6)
Benezet, A. (1772) *Some Historical Account of Guinea* (London). (Chap. 1)
Bequaert, M. (1938) 'Les fouilles de Jean Colette à Kalina', *AMRCB*, I, 2, pp. 29–88. (Chap. 21)
Bequaert, M. (1952) 'Fouilles à Dinga (Congo Belge)', *Actes II Congr. PPEQ*, pp. 317–53. (Chap. 21)
Bequaert, M. (1953) 'La préhistoire du Congo Belge et ses relations avec la préhistoire africaine sud-saharienne à l'Holocène', *BSRBAP*, LXIV, pp. 37–49. (Chap. 21)
Bequaert, M. and Mortelmans, G. (1955) 'Le Tshitolien dans le bassin du Congo', *AARSC*, II, 5. (Chap. 21)
Berg, F. (1968) 'The Swahili community of Mombasa 1500–1900', *JAH*, IX, pp. 35–56. (Gen. Introd. Chaps 5, 6)
Berger, R. (1970)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PTRS*, 269, 1193, pp. 23–36. (Chap. 9)
Berggren, W. A. (1973) 'Correl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late Pliocene and Pleistocene marine and continental biostratigraphies', *Acts IX INQUA Congr.* (Chap. 16)
Berque, J. (1957) *Histoire sociale d'un village égyptien au XXe siècle* (Paris: Mouton). (Chap. 15)
Berthier, H. (1933) 'Le cahier de l'écriture de Radama I', *MAM*, 36. (Chap. 6)
Besançon, J. (1957) *L'homme et le Nil* (Paris: Gallimard). (Chap. 28)
Biberson, P. (1961a) *Le cadre paléogéographique de la préhistoire du Maroc atlantique* (Rabat: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Maroc). (Chap. 22)
Biberson, P. (1961b) *Le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du Maroc atlantique* (Rabat: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Maroc). (Chap. 23)
Biberson, P. (1965) 'Recherches sur le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de l'Adrar de Mauritanie', *Actes V Congr. PPEQ*, pp. 173–89. (Chap. 23)
Biebuyck, D. and Mateene, K. C. (1971) *The Mwindo epic from the Banyanga (Congo Republic)*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7)
Bird, J. (1888) *The Annals of Natal, 1495–1845* (Pietermaritzburg). (Chap. 6)
Birdsell, J. B. (1972) *Huma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phys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Chap. 4)
Birot, P. (1970) *Les régions naturelles du globe* (Paris: Masson). (Chap. 13)
Bishop, W. W. (1965) 'Quaternary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in the Albertine rift valley, Uganda', *GSAM*, 84, pp. 293–321. (Chap. 21)
Bishop, W. W. and Clark, J. D. (eds) (1967)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16, 19, 22, 23, 24, Concl.)
Bishop, W. W. and Miller, J. A. (eds) (1972) *Calibration of hominoid 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haps 16, 20)
Bittner, M. (1897) *Capitel, die topographie des indischen Seespiegels Mohît* (Vienna). (Chap. 6)
Bivar, A. D. H. and Hiskett, M. (1962) 'The Arabic literature of Nigeria to 1804: a provisional account', *BSAOS*, XXV, 1. (Gen. Introd., Chaps 5, 6)
Blankoff, B. (1965) 'Quelques découvertes récentes au Gabon', *BSPPG*, I, 3, pp. 52–60. (Chap. 21)
Blankoff, B. (1966) 'L'état des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au Gabon',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62–80. (Chap. 21)
Bleek, D. F. (1929) *Comparative Vocabularies of the Bushman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Bleek, W. H. I. (1851) *De nominum generibus, linguarum Africae australis, copticae, semiticarum, aliarumque sexualium* (Bonn: Marcus). (Chap. 12)
Bleek, W. H. I. (1862–9)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uth African languages*, 2 Vols (Capetown: Juta/London: Trübner). (Chaps 10, 12)
Bloch, M. (1939) *La Société féodale, Vol. 1: La Formation des liens de dépendance* (Paris: Albin Michel). (Chap. 1)

Bloch, M. (1949)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le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Colin). **(Chap. 7)**

Blundel, H. W. (1923) *The Royal Chronicle of Abyssinia, 1769–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Blundel, H. W., Boaz, N. and Howell, F. C. (1977) 'A gracile hominid cranium from Upper Member G of the Shungura formation, Ethiopia', *AJPA*, 46, 1, pp. 93–108. **(Chap. 17)**

Boahen, A. A. and Webster, J. B. (1970)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sation. West Africa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Gen. Introd., Chap. 8)**

Bobo, J. (1956) 'Un ensemble de stations moustéro-atériennes aux environs de Djanet (Tassili des Ajjer)', *Libyca*, 4, pp. 263–8. **(Chap. 23)**

Bonatti, E. (1966) 'North Mediterranean climate during the last Würm glaciation', *Nature*, 209, 5027, pp. 985–7. **(Chap. 16)**

Bond, G. (1956) 'A preliminary account of the Pleistocene geology of the plateau Tia Fields region of northern Nigeria', *Proc. III Intern. WAC*, pp. 187–202. **(Chap. 24)**

Bonifay, E. (1975) 'Stratigraphie du Quaternaire et âge des gisements préhistoriques de la zone littorale des Alpes-Maritimes', *BSPF*, 72, 7, pp. 197–206. **(Chap. 16)**

Bonnefille, R. (1972) 'Associations polliniques actuelles et quaternaires en Ethiopie (vallées de l'Awash et de l'Omo)' thesis, 2 Vols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 16)**

Bonnefille, R. (1974) 'Etude palynologique de dépots pliopléistocènes d'Ethiopie', *ASEQUA*, B, 42–3, pp. 21–2. **(Chap. 16)**

Bonnefille, R. (1976) 'Végétation et climats des temps oldowayens et acheuléens à Melka Kunturé (Ethiopie)', *L'Ethiopie avant l'histoire*, Vol. 1, pp. 55–71. **(Chap. 17)**

Bonnel de Mezières, A. (1920) 'Recherches sur l'emplacement de Ghana et de Tekrour', *MAI*, 13, 1, pp. 227–77. **(Chap. 24)**

Bonnet, A. (1961) 'La "Pebble Culture" in situ de l'Idjerane et les terrasses de piémont du Sahara central', *BSPF*, 58, pp. 51–61. **(Chap. 23)**

Bosman, W. (1967) *A New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 eds J. D. Fage, R. E. Bradbury (London: Cass). **(Chap. 1)**

Boston, J. S. (1964) 'The hunter in Igala legends of origin', *Africa*, 34, pp. 118–20. **(Chap. 7)**

Boulle, M., Vallois, H. V. and Verneau, R. (1934) *Les Grottes paléolithiques des Bani Ségoual (Algérie)* (Paris: Masson). **(Chap. 22)**

Bounak, V. (1972) 'Du cri au langage', *Le Courrier* (August–September). **(Concl.)**

Bouyssonie, J., Breuil, H. *et al.* (1956) Musée du Bardo, collections préhistoriques, Planches, album no. 1 (Paris: AMG). **(Chap. 23)**

Bovier-Lapierre, P. (1925) 'Le Paléolithique stratifié des environs du Caire', *Anthropologie*, XXXV, pp. 37–46. **(Chap. 25)**

Bovill, E. W. (1933)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Boxer, C. R. (ed.) (1959)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1589 16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Boyle, A. H. and Jeffreys, W. (1947) 'Speculative origins of the Fulany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Africa*, 17. **(Chap. 10)**

Bradbury, R. E. (1959) 'Chron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Benin history', *JHSN*, I, pp. 263–87. **(Chap. 24)**

Brahimi, C. (1970) *L'Ibéromaurusien littoral de la région d'Alger* (Paris: AMG). **(Chap. 22)**

Brahimi, C. (1972) *Initiation à la préhistoire de l'Algérie* (Algiers: SNED). **(Chap. 22)**

Braidwood, R. J. (1960)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 (September). **(Chap. 27)**

Braidwood, R. J. and Reed, C. A. (1957) 'The achievement and early consequence of food production; a consider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ical evidence',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Chap. 27)**

Brain, C. K. (1958a) 'The Transvaal Ape Man Bearing Cave Deposits', *Transvaal Museum Memoir* No. 11, Pretoria. **(Chap. 20)**

Brain, C. K. (1958b)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Chap. 20)**

Brasio, A. D. (1952) *Monumenta missionaria africana*, 9 Vols (Lisbon: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Chap. 6)**

Braudel, F. (1969) *E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Gen. Introd.)**

Breasted, J. H. (1906)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IV. **(Chap. 28)**

Breuil, Abbé H. (1931) *L'Afrique* (Paris: Cahiers d'Art). **(Chap. 24)**

Breuil, Abbé H. (1944) 'Le Paléolithique au Congo Belge d'après les recherches du docteur Cabu: VI; Plateau de Bena Tshitolo', *TRSA*, XXX, pp. 143–60. **(Chap. 21)**

Breuil, Abbé H. (1952) 'Les figures incisée et ponctuées de la grotte de Kiantapo (Katanga)', *AMRCB*, pp. 1–32. **(Chap. 21)**

Brézillon, M. N. (1969) *Dictionnaire de la préhistoire* (Paris: Larousse). **(Concl.)**

Brothwell, D. and Shaw, T. (1971) 'A late upper Pleistocene proto-West African Negro from Nigeria', *Man*, 6, 2, pp. 221–7. **(Chap. 24)**

Broutanoh, A. (1867) 'La tradition orale chez les Agni Ahali de Moronou', *BIEGT*. **(Chap. 7)**

Brown, E. J. P. (1929) *A Gold Coast and Asiatic Reader* (London). **(Chap. 1)**

Brown, G. (1941)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iberia* (Washington, DC: Associated Publishers). **(Chap. 3)**

Browne, W. G. (1806) *Travels in Africa, Egypt and Syria from the year 1792 to 1798* (London: Cadell & Davies). **(Chap. 6)**

Bruce, J. (1813)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 5 Vols (Edinburgh: Constable). **(Chap. 6)**

Brunschvig, R. (1942–7) 'Ibn 'Abd al-Hakam et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 les Arabes', *Annales de l'Institut d'études orientales d'Alger, VI*. **(Chap. 5)**

Brunton, G. (1928) in G. Brunton and G. Caton-Thompson, *The Badarian Civilisation and Predynastic Remains near Badari* (London: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Chaps 25, 28)**

Brunton, G. (1937) *British Museum Expedition to Middle Egypt 1928–1929 [Mostagedda] and the Tasian Culture* (London: Quaritch). **(Chaps 25, 28)**

Brunton, G. (1948) *British Museum Expedition to Middle Egypt 1929–1931 [Matmar]* (London: Quaritch). **(Chaps 25, 28)**

Bryant, A. T. (1929) *Olden Times in Zululand and Natal, Containing Earlier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astern-Nguni Clans* (London/New York: Longman, Green). **(Chap. 6)**

Bucha, V. (1970)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PTRS*, 269, 1193, pp. 47–55. **(Chap. 9)**

Bucha, V. (1971) 'Archaeomagnetic dating', in H. N. Michael and E. K. Ralph (eds), *Dating Techniques for the Archaeologis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 57–117. **(Chap. 9)**

Buedel, J. (1958) 'Die Flaeschenbildung in den feuchten Troppen und die Rolls fossier solcher Flaeschen in anderen Klimazonen', *ADG*, pp. 89–121. **(Chap. 16)**

Bulck, G. van (1948) 'Les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au Congo Belge', *MIRCB*. **(Chap. 10)**

Burke, K., Durotye, A. B. and Whiteman, A. J. (1971) 'A dry phase south of Sahara, 20000 years ago', *WAJA*, I. **(Chap. 24)**

Burton, R. F. (1864) *A Mission to Gelele, King of Dahomey* (London). **(Chap. 1)**

Butler, J. (1967)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in Africa*, II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Concl.)**

Butzer, K. W. (1957) 'The last "pluvial" phase of the Eurafrican subtropics', *Les Changements de climats. Recherches sur la zone aride* (Paris: Unesco), 20, pp. 211–16. **(Chap. 13)**

Butzer, K. W. (1958–9) *Studien zum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n Landschaftswandel der Sahara*, (Mainz: Verlag der Akademie de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Wiesbaden: Steiner). **(Chap. 23)**

Butzer, K. W. (1964) *Environment and Archaeology: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Prehistory*, 2nd edn 1972 (London: Methuen, Chicago: Aldine). **(Chaps 16, 24, 28)**

Butzer, K. W. and Hansen, C. L. (1968) *Desert and River in Nubia; Geomorphology and Prehistoric Environments at the Aswan Reservoi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hap. 16)**

Butzer, K. W. and Isaac, G. L. (1976) *After the Australopithecines: Stratigraphy, Ecology and Culture, Change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The Hague: Mouton). **(Chap. 19)**

Butzer, K. W., Richardson, J. L. and Washbourknkamau, C. (1972) 'Radio-carbon dating of east African lake levels', *Science*, 175, pp. 1069–76. **(Chaps 16, 21)**

Butzer, K. W. and Thurber, D. L. (1969) 'Some late Cenozoic sedimentary formations of the lower Omo basin', *Nature*, 222, 5199, pp. 1132–7.

Bynon, J. (1970) 'The contribution of linguistics to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Berber studies', in D. Dalby (ed.),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op. cit. **(Chaps 6, 10, 15)**

Cabu, F. (1935a) 'Considérations sur la stratigraphie de gisements pléistocènes à outillage paléolithique de la région de Léopoldville', *BSRBAP*, 50, pp. 269–84. **(Chap. 21)**

Cabu, F. (1935b) 'Les industries préhistoriques de la cuvette centrale congolaise et leurs rapports avec la préhistoire générale', *BSRBAP*, 50, pp. 399–411. **(Chap. 21)**

Cadenat, P. (1957) 'Fouilles à Columnata. Campagne 1956–57. La nécropole', *Libyca*, V, pp. 49–81. **(Chap. 22)**

Cadenat, P. (1962) 'Sur l'extension de la civilisation capsienne vers l'Ouest', *BSPF*, 59, pp. 27–32. **(Chap. 22)**

Cadenat, P. (1970) 'Le columnatien, industrie épipaléolithique de l'Algerie', *BSERP*, 20, pp. 40–50. **(Chap. 22)**

Cadornega, A. de O. de (1940–2) *História general das guenas Angolanas* (Lisbon). **(Chap. 1)**

Cahen, D. (1975) 'Le site archéologique de la Kamoa (Region du Shaba, République du Zaïre). De l'âge de la pierre ancienne à l'âge du fer', *AMRAC*, 84. **(Chap. 21)**

Cahen, D. (1976) 'Nouvelles fouilles à la pointe de la Gombe (ex-pointe-de Kalina), Kinshasa, Zaïre',

Anthropologie, 80, 4, pp. 573–602. (Chap. 21)
Cahen, D. (1977) 'Vers une revision de la nomenclature des industries préhistoriques de l'Afrique centrale', *Anthropologie*, 81. (Chap. 21)
Cahen, D., Haesaerts, P. and Noten, F. Van (1972) 'Un habitat lupembien à Massango (Burundi). Rapport préliminaire', *Africa-Tervuren*, XVIII, pp. 78–80. (Chap. 21)
Cahen, D. and Martin, P. (1972) 'Classification formelle automatique et industries élithiques. Interprétations des hachereaux de la Kamoa', *AMRAC*, 76. (Chap. 21)
Cahen, D. and Moeyersons, J. (1977) 'Subsurface movements of stone artefac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Nature*, 266, 5605, pp. 812–15. (Chap. 21)
Cahen, D. and Mortelmans, G. (1973) 'Un site tshitolien sur le plateau des Bateke (République du Zaïre)', *AMRAC*, 81, 46pp. (Chap. 21)
Cahen, D. and Noten, F. Van (1970) 'Des polissoirs dans la grotte de Mpinga (Burundi)', *Africa Tervuren*, XVI, 1, pp. 13–17. (Chap. 21)
Caley, E. R. (1948)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stry to Archaeology', *OJS*, XLVIII, pp. 1–8. (Chap. 9)
Caley, E. R. (1949) 'Validity of the specific-gravity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ineness of gold objects', *OJS*, XLIX, pp. 76–92. (Chap. 9)
Campbell, B. G. (1965)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Hominidae'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 22). (Chap. 24)
Campbell, R. (1861) *A pilgrimage to my motherland, or Reminiscences of a Sojourn among the Egbas and Yorubas of Central Africa in 1859–60* (London: Johnson). (Chap. 6)
Camps, G. (1969) *Amekni, néolithique ancien du Hoggar* (Paris: AMG). (Chaps 22, 23, 24, 28)
Camps, G. (1974) *Les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u Sahara* (Paris: Doin). (Chaps 22, 28)
Camp-Fabrer, H. (1966) *Matière et art mobilier dans la préhistoire nord-africaine et saharienne* (Paris: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Préhistor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Chaps 22, 23)
Camp-Fabrer, H., Bouchud, J. *et al.* (1975) *Un gisement capsien de faciès sétifen Medjez II, El-Eulma (Algérie)* (Paris: CNRS). (Chap. 22)
Candolle, A. L. P. (1883) *L'Origine des plantes cultivées* (Paris: F. Alcan). (Chap. 27)
Caporiacco, L. di and Grazinzi, P. (1934) *Le pitture rupestri di Aïn Dòua (el-Auenàt)* (Florence: Coitipi dell'Istituto geografico militare). (Chap. 23)
Capot-Rey, R. (1953) *Le Sahara français* (Paris: PUF). (Chap. 23)
Caprille, Y. P. (1972) *Carte des langues du Tchad* (Paris: IGN). (Chap. 10)
Carr-Saunders, A. M. (1964) *World Population, 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 (London: Cass). (Chap. 14)
Carré J. M. (1932) *Les voyageurs et écrivains français en Egypte, 1517–1840*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6)
Carson, P. (1962)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of Belgium and Holl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Chaps 6, 24)
Carson, P. (1968)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French Archives* (London: Athlone Press). (Chaps 6, 24)
Carter, G. F. (1964) 'Archaeological maize in West Africa: a discussion of Stanton & Willet', *Man*, 64, p. 95. (Chap. 24)
Carter, P. L. and Flight, C. (1972) 'Report on the fauna from the sites of Ntereso and Kintampo Rock Shelter six in Ghana: with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animal husbandry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Man*, 7, 2, pp. 227–32. (Chap. 24)
Casalis, E. (1859) *Les Bassutos* (Paris). (Chap. 6)
Castanhoso, M. de (1548) *Historia das cousas que o muy esforçado capitão Dom Christouão da Gama fez nos reynos de Preste João* (Lisbon: Academia real dos sciencias). (Chap. 6)
Caton-Thompson, G. (1928) see Brunton, G. (1928).
Caton-Thompson, G. (1946) 'The Aterian industry: its plac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Palaeolithic world', *JRAI*. (Chap. 23)
Caton-Thompson, G. (1952) *Kharga Oasis in Prehistor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Chaps 23, 25)
Caton-Thompson, G. and Gardner, E. W. (1934) *The Desert Fayum*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Chaps 23, 24, 25, 28)
Cavazzi de Montecudolo, G. A. (1687) *Istorica descrizione de tre regni Congo, Matamba et Angola, situati nell'Etiopia inferiore occidentale* (Milan: Stampe dell'Agnelli). (Chap. 1)
Celis, M. (1972) 'Gepolijst archeologisch stenen materiaal uit de Demokratische Republiek van Zaïre', thesis (Gand: University of Gand). (Chap. 21)
Cenival, J.-L. de (1973) *L'Egypte avant les pyramides, 4ème millénaire*, Grand Palais, 29 May–

3 September 1973 (Paris: Editions des musées nationaux). (Chap. 28)
Cerulli, E. (1926) 'Iscrizioni e documente arabi per la Storia della Somali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pp. 1–24. (Chaps 3, 5, 6)
Cerulli, E. (1931) *Documenti arabi per la storia dell' Etiopia*. (Chap. 5)
Cerulli, E. (1957)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Vol. I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 P.V.). (Chaps 5, 6)
Chamard, P. (1969–70) *Le Bassin versant de la Sebkha de Chemchane (Adrar de Mauritanie)* (Dakar: Faculté de Lettres et de Sciences humaines). (Chap. 23)
Chamla, M.-C. (1968) 'Les populations anciennes du Sahara et des régions limitrophes: Etude des restes humains néolith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MCRAPE*, 9. (Chaps 23, 24)
Chamla, M.-C. (1970) *Les hommes épipaléolithiques de Columnata (Algérie occidentale)* (Paris: AMG). (Chap. 22)
Chamla, M.-C. (1973) 'Etude anthropologique de l'Homme capsien de l'Aïn Dokkara (Algérie orientale)', *Libyca*, XXI, pp. 9–53.
Chamot, E. M. and Mason, C. W. (1938) *Handbook of Chemical Microscopy*, 2nd edn (New York: Wiley/London: Chapman & Hall). (Chap. 9)
Champault, B. (1953) 'L'industrie de Tachenghit', *70ème Congr. AFSS*, Tunis, 1951. (Chap. 23)
Chasseloup Laubat, F. de (1938) *L'art rupestre au Hoggar (Haut Mertoutek)* (Paris: Plon). (Chap. 23)
Chavaillon, J. (1956) 'Quaternaire de la vallée du Guir (Sahara nord occidental)', *Comptes rendus sommaires des Séances de la Société géologie française*. (Chap. 23)
Chavaillon, J. (1958) 'Industrie archaiqu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n place dans les alluvions de l'oued Guir (Sahara nord occidental)', *BSPF*, 55, pp. 431–43. (Chap. 23)
Chavaillon, J. (1964) *Étude stratigraphique des formations quaternaires du Sahara nord-occidental, Colomb-Béchar à Reggane* (Paris: CNRS). (Chap. 23)
Chavaillon, J. (1973) 'Chronologie des niveaux paléolithiques de Melka-Kunturé (Ethiopie)', *CRAS*, 276, pp. 1533–6. (Chap. 17)
Chavaillon, J., Brahimi, C. and Coppens, Y. (1974) 'Première découverte d'Hominidé dans l'un des sites acheuléens de Melka Kunturé (Ethiopie)', *CRAS*, 278, pp. 3299–302. (Chap. 17)
Chavaillon, J., Chavaillon, N., Coppens, Y. and Senut, B. (1977) 'Présence d'hominidé dans le site oldowayen de Gomboré I à Melka Kunturé, Ethiopie', *CRAS*, 285, pp. 961–3. (Chap. 17)
Chelebi, E. (1938) *Seyahatnume* (Istanbul). (Chap. 6)
Chelu, A. J. (1891) *De l'équateur à la Méditerranée; Le Nil, le Soudan, l'Egypte* (Paris: Chaix). (Chap. 28)
Chesneaux, J. (1969)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p. 29. (Concl.)
Chevalier, A. (1938) 'Le Sahara, centre d'origine des plantes cultivées', Société de Biogéographie, VI: *La Vie dans la région désertique Nord-tropicale de l'ancien monde* (Paris), pp. 309–22. (Chap. 27)
Childe, V. G. (1954)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rev.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Chap. 27)
Cissé, K. and Thilmans, G. (1968) 'A propos de la datation des mégalithes sénégambiens', *NA*, 117, pp. 13–17. (Chap. 24)
Cissoko, S. M. (1966) *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Gen. Introd.)
Claridge, W. W. (1915)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hanti* (London). (Chap. 1)
Clark, G. (1969) *World Prehistor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9, 24)
Clark, J. D. 'The Stone Age Cultures of Northern Rhodesia', *SAAB*.
Clark, J. D. (1957) *Third Panafrican Congress on Pre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Chap. 24)
Clark, J. D. (1960)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Chaps 19, 21, 24)
Clark, J. D. (1962) 'Vegetation patterns, climate and sands in north-east Angola', *Actes IV Congr. PPEQ*, pp. 151–66. (Chap. 21)
Clark, J. D. (1963a) 'Ec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African Pleistocene', *SAJS*, 59, 7, pp. 353–66. (Chap. 21)
Clark, J. D. (1963b)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Angola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ropical Africa', *CDAPC*, 62. (Chap. 21)
Clark, J. D. (1964) *The Sangoan Culture of Equatoria: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stone equipment*. Instituto de Prehistoria y Argueologia, monographies, Barcelona, 9, pp. 309–25. (Chap. 20)
Clark, J. D. (1966)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culture in Angola', *CDAPC*, 73. (Chap. 21)
Clark, J. D. (1967a) 'The problem of Neolithic culture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601–28. (Chap. 24)
Clark, J. D. (1967b) *Atlas of African Pre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19, 24)
Clark, J. D. (1968a) 'Review of Oliver Davies's "The Quaternary in the Coastlands of Guinea"', *WAAN*, 13, 9, pp. 37–40. (Chap. 24)

Clark, J. D. (1968b) 'Further palaeo-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northern Lunda', *CDAPC*, 78. **(Chap. 21)**

Clark, J. D. (1969–74) *Kalambo Falls Prehistoric Site*,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9, 20, 21)**

Clark, J. D. (1970a) 'The prehistoric origins of African cultures', in J. D. Fage and R. A. Oliver (eds),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1)**

Clark, J. D. (1970b) 'The spread of food pro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J. D. Fage and R. A. Oliver (eds)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7)**

Clark, J. D. (1970c)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s 14, 19, 20, 24)**

Clark, J. D. (1970d) 'African prehistory: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archaeologists, ethnographers and linguists',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London: Cass). **(Chap. 15)**

Clark, J. D. (1971a) 'Problems of archaeological nomenclature and definition in the Congo basin', *SAAB*, XXVI, pp. 67–78. **(Chaps 21, 24)**

Clark, J. D. (1971b) 'Human Behavioural Differences in Southern Africa during the Later Pleistocen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73, pp.1211–36. **(Chap. 20)**

Clark, J. D. and Haynes, C. V. (1969) 'An elephant butchery site at Mwanganda's village, Karonga, Malawi and its relevance for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WA*, 1, 3, pp. 390–411. **(Chap. 20)**

Clark, J. D. and Le Gros, W. E. (1967) *Man-apes or Ape-men? The Story of Discoveries in Africa* (New York). **(Chap. 20)**

Clark, J. D., Mawby, J. E. and Gautier, A. (1970) 'Interim report on Palaeo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ke Malawi rift', *Quaternaria*, XIII, pp. 305–54. **(Chap. 20)**

Clark, J. D. and Zinderen-Bakker, E. M. van (1962) 'Pleistocene climates and cultures in north-eastern Angola', *Nature*, 196, 4855, pp. 639–42. **(Chap. 21)**

Clark, J. D. and Zinderen-Bakker, E. M. van (1964) 'Prehistoric cultures and Pleistocene vegetation at the Kalambo falls, Northern Rhodesia', *Nature*, 201, 4923, pp. 971–5. **(Chap. 21)**

Clarke, J. (1848) *Specimens of Dialects: Short Vocabulary of Languages and notes of countries and customs in Africa* (Berwick-on-Tweed: Cameron). **(Chap. 12)**

Clark-Howell, P., Kleindienst, M. R. and Keller, C. M. (n.d.) 'Isimilia. Preliminary report', *Proc. 4th PCPQS*. **(Chap. 19)**

CLIMAP (1974) 'Mapping the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circulations and other climatic parameters at the time of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bout 17,000 years ago', Climatic Research Unit,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Chap. 16)**

CNRS (ed.) (1974) 'Les Méthodes quantitatives d'étude des variations du climat au cours du Pléistocene', *Coll. CNRS*, no. 219. **(Chap. 16)**

Cockerell, T. D. A. (1907) 'A fossil tse-tse fly in Colorado', *Nature*, 76, 414. **(Chap. 14)**

Cockerell, T. D. A. (1909) 'Another fossil tse-tse fly', *Nature*, 80, 128. **(Chap. 14)**

Cockerell, T. D. A. (1919) 'New species of North American fossil beetles, cockroaches and tse-tse flies', *Proc. NS St. Nat. Mus.*, 54, pp. 301–11. **(Chap. 14)**

Coetze, J. A. and Zinderen-Bakker, E. M. van (1970) 'Palaeo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Quaternary of Africa', *SAJS*, 66, pp. 78–84. **(Chap. 21)**

Cohen, D. W. (1972)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Busoga, Mukama and Kint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3)**

Cohen, M. S. R. (1947) *Essai comparatif sur le vocabulaire et la phonétique du chamito-sémitique* (Paris: Champion). **(Chaps 10, 12)**

Cohen, M. S. R. (1958) *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Chap. 10)**

Cole, D. T. (1971) 'The history of African linquistics to 1945', in T. A. Sebeok (ed.) *Linguistics in South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1971) (The Hague: Mouton). **(Chap. 12)**

Cole, G. H. (1967) 'Nsongezi. Summary account',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pp. 481–528. **(Chap. 19)**

Cole, S. (1964)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ap. 19)**

Coleman, J. S. (1958)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3)**

Coles, J. M. and Higgs, E. S.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London: Faber). **(Chap. 19)**

Colette, J. R. F. (1931)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u Congo Belge', *Actes XV Congr. I A.AP*, pp 285–292. **(Chap. 21)**

Colette, J. R. F. (1935) 'Complexe et convergences en préhistoire', *BSRBAP*, 50, pp. 49–192. **(Chap. 21)**

Commonwealth Arts Festival (1965) *Treasures from the Commonwealth*,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Chap. 24)**

Connah, G. (1967) Progress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work in Bornu, Northern History Research Scheme, Second Interim Report (Zaria). (Chap. 24)
Connah, G. (1969) 'Settlement mounds of the Firki –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lost society', *Ibadan*, 26, pp. 48–62. (Chap. 24)
Connah, G. (1971)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Bornu chronology', *WAJA*, I, pp. 55–60. (Chap. 24)
Connah, G. (1972) 'Archaeology in Benin', *JAH*, 13, 1, pp. 25–38. (Chap. 24)
Conti Rossini, C. (1928) *Storia d'Etiopia* (Milan). (Chap. 1)
Cook, R. M. (1963) 'Archaeomagnetism', in D. Brothwell and E. Higgs (eds),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 Hudson), pp. 59–71. (Chap. 9)
Cooke, C. K. (1969)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iddle Stone Age" industries of Rhodesia', *Arnoldia*, 17. (Chap. 4)
Cooke, C. K. (1971) 'Excavation in Zombepata cave, Sipolilo district, Mashonaland, Rhodesia', *SAAB*, XXVI, pp. 104–27. (Chap. 20)
Cooke, H. B. S. (1958) '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Quaternary environments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TGSSA*, Appendix to Vol. 61. (Chaps 16, 21)
Cooke, H. B. S. (1964) 'Pleistocene mammal faunas of Afric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outhern Africa', in F. C. Howell and F. Bourlière (eds), *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pp. 65–116. (Chap. 20)
Cooke, H. B. S. (1965) 'Tentative correlation of major Pleistocene deposits in Africa', *Wenner-Gren Symposium on the Origin of Man* (Chicago). (Chap. 24)
Cooke, H. B. S. (1972) 'Pleistocene chronology: long or short?', *Maritime Sediments*, 8, 1, pp. 1–12. (Chap. 16)
Coon, C. S. (1968) *Yengema Cave Repo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ap. 24)
Copans, J. and Godelier, M. (1971) *L'Anthropologie, science d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Paris: Editions Denoel). (Gen. Introd.)
Coppens, Y. (1960) 'Les cultures protohistoriques et historiques du Djourab',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Gen. Introd.)
Coppens, Y. (1961) 'Découverte d'un Australopithéciné dans le Villafranchien du Tchad', *CRAS*, 252, pp. 3851–2. (Chaps 23, 24)
Coppens, Y. (1962) 'Découverte d'un Australopithéciné dans le Villafranchien du Tchad', *Coll. CNRS*, 104, pp. 455–9. (Chaps 23, 24)
Coppens, Y. (1965a) 'L'Hominien du Tchad', *CRAS*, 260, pp. 2869–71. (Chaps 16, 24)
Coppens, Y. (1965b) 'L'Hominien du Tchad', *Actes V Congr. PPEC*, I, pp. 329–30. (Chaps 16, 24)
Coppens, Y. (1966a) 'Le Tchadanthropus', *Anthropologia*, 70, pp. 5–16. (Chap. 24)
Coppens, Y. (1966b) 'Le gisement des vertébrés quaternaires de l'ouest africain', *BIFAN*, A, 27, pp. 373–81. (Chap. 24)
Coppens, Y. (1970a) 'Localisation dans le temps et dans l'espace des restes d'hominidés des formations plio-pléistocènes de l'Omo (Ethiopie)', *CRAS*, 271, pp. 1968–71. (Chap. 17)
Coppens, Y. (1970b) 'Les restes d'hominidés des séries inférieures et moyennes des formations plio-villafranchiennes de l'Omo en Ethiopie', *CRAS*, 271, pp. 2286–9. (Chap. 17)
Coppens, Y. (1971) 'Les restes d'hominidés des séries supérieures des formations plio-villafranchiennes de l'Omo en Ethiopie', *CRAS*, 272, pp. 36–9. (Chap. 17)
Coppens, Y. (1972) 'Tentative de zonation du Pliocène et du Pléistocène d'Afrique par les grands Mammifères', *CRAS*, 274, pp. 181–4. (Chap. 16)
Coppens, Y. (1973a) 'Les restes d'hominidés des séries inférieures et moyennes des formations plio-villafranchiennes de l'Omo en Ethiopie (récoltes 1970, 1971 et 1972)', *CRAS*, 276, pp. 1823–6. (Chap. 17)
Coppens, Y. (1973b) 'Les restes d'hominidés des séries supérieures des formations plio-villafranchiennes de l'Omo en Ethiopie (récoltes 1970, 1971 et 1972)', *CRAS*, 276, pp. 1981–4. (Chap. 17)
Coppens, Y. (1975a) 'Evolution des mammifères, de leurs fréquences et de leurs associations au cours du plio-pléistocène dans la basse vallée de l'Omo en Ethiopie', *CRAS*, 281, pp. 1571–4. (Chap. 17)
Coppens, Y. (1975b) 'Evolution des hominidés et de leur environnement au cours du plio-pléistocène dans la basse vallée de l'Omo en Ethiopie', *CRAS*, 281, pp. 1693–6. (Chap. 17)
Coppens, Y. *et al.* (1976) *Earliest Man and Environments in the Lake Rudolf Basin: Stratigraphy, Paleoecology, and 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17, 18, 19)
Corbeil, R. (1951a) 'Les récentes découvertes au Cap-Vert concernant la Paléolithique', *BIFAN*, B, 13, pp. 384–437. (Chap. 24)
Corbeil, R. (1951b) 'Mise en évidence d'industries lithiques anciennes dans l'extrême ouest sénégalais', *Comptes-rendus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Africanistes de l'Ouest I*, 2, pp. 387–90. (Chap. 24)
Corbein, R., Mauny, R. and Charbonnier, J. (1948)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 de la presque'île

du Cap-Vert et de l'extrême ouest sénégalais', *BIFAN*, B, 10, pp. 378–460. (Chap. 24)
Cornevin, R. (1962) *Histoire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Chap. 5)
Correia, E. A. de S. (1937) *História de Angola* (Lisbon). (Chap. 1)
Coupez, A. and Kamanzi, T. (1970) *Littérature de cour au Rwa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7)
Coursey, D. G. (1967) *Yams* (London: Longman, Green). (Chap. 24)
Coursey, D. G. (1972) 'The origins and domestication of yams in Africa', *Proc. Burg. Wart. Symp 56*. (Chap. 24)
Coursey, D. G. and Alexander, J. (1968) 'African agricultural patterns and the sickle cell', *Science*, 160, pp. 1474–5. (Chap. 24)
Courtois, C. (1955)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AMG). (Chap. 5)
Creach, D. A. (1970) 'A tale type index for Africa',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Austin, Texas), I, 1, pp. 50–3. (Chap. 7)
Créach, P. (1951) 'Sur quelques nouveaux sites et quelques nouvelles industries préhistoriques d'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C-R Conf. Intern. des Africanistes de l'Ouest I*, 2, pp. 397–430. (Chap. 24)
Creach, S. A. (1852) *A Vocabulary of the Yoruba Language* (London: Seeleys). (Chap. 12)
Crone, G. R. (ed) (1937) *The Voyages of Cadamosto* (London: Hakluyt Society). (Chap. 1)
Crowther, S. (1885) *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up the Niger and Tshadda Rivers* (London). (Chap. 16)
Cugoano, O. (1787)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n the Evil and Wicked Traffic of the Slavery and Commerce of the Human Species* (London). (Chap. 6)
Cuny, A. L. M. (1946) *Invita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et des langues chamito-sémitiques* (Bordeaux: Bière). (Chap. 10)
Cuoq, J. (trans.) (1975) *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 concernant l'Afrique occidentale du VIIIe au XVIe siecle, Bilād al-Sūdān* (Paris: CNRS). (Chap. 5)
Curry, R. R. (1969) 'Chronologie glaciaire absolue de la Sierra Nevada, Californie, pour les derniers 2 700 000 ans'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 16)
Curtin, P. D. (1960) 'Archives in tropical Africa: a reconnaissance', *JAH* I, i, pp. 129–47 (Chap. 6)
Curtin, P. D. (ed) (1967) *Africa Remembered* (Madison). (Chap. 6)
Curtin, P. D. (1968) 'Field techniques for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oral data', *JAH*, IX, 3, pp. 367–85. (Chap. 7)
Curtin, P. D. and Vansina, J. (1964) 'Sources of the 19th century Atlantic slave trade', *JAH*, I. (Chap. 6)
Cuvelier, J. and Jadin, L. (1954)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d'après les archives romaines 1518–1640*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Chap. 6)

Dahl, O. C. (1951) *Malgache et maanjan: une comparaison linguistique* (Oslo: Egede Institut). (Chap. 12)
Dain, A. (1961) 'Témoignage écrit et philologie', *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 Encyclopédie de la Pleiade* (Paris). (Chap. 5)
Dalby, D. (1965) 'The Mel languages: a reclassification of southern "West Atlantic"', *ALS*, 6, pp. 1–17. (Chaps 10, 12)
Dalby, D. (1966) 'Levels of relationship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ALS* (Chap. 10)
Dalby, D. (1967) 'Survey of the indigenous scripts of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LS*, 8, pp. 1–51. (Chap. 6)
Dalby, D.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Sigismund Wilhem Koelle and Malcolm Guthrie', *ALS*, XI (Chap. 12)
Dalby, D. (1970)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London: Cass) (Chaps 10, 12)
Dalby, D. (1977) *Language map of Africa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provisional edn.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Chap. 12, appendix)
Dalloni, M. (1934–5) *Mission au Tibesti (1930–1931)*, 2 Vols (Paris: Gauthier-Villars). (Chap. 23)
Dalloni, M. (1948)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u Sahara oriental, région entre la Libye, le Tibesti et le Kaouar (Niger): géologie et préhistoire* (Algiers). (Chap. 23)
Dalloni, M. (1952) 'La station moustérienne de Retaïma près d'Inkermann (Algérie)', *Actes II Congr. PPEQ*, pp. 419–27. (Chap. 22)
Dalloni, M., Dalrymple, G., Brent and Lanphere, Marvin A. (1969) *Potassium-Argon Dating.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to geochron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Chap. 4)
Dalloni, M. and Monod, T. (1948) 'Géologie et préhistoire (Fezzan méridional, Kaouar et Tibesti); Mission scientifique du Fezzan (1944–45)', *Trav. IRS*, 6. (Chap. 23)
Dalton, G. (ed.) (1968)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New York).

(Chap. 13)
Dalzel, A. (1793) *The History of Dahomy.* **(Chap. 1)**
Damas, D. (ed.) (1966) 'Ecological essay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cultural ecology', *Museum of Canada Bulletin*, 230. **(Chap. 27)**
dan Fodio, A. (1963) *Tazyin al-waraqat*, ed. and trs. M. Hiskett (London). **(Chap. 6)**
Daniel, G. E. (1943) *The Three Ages: An essay on arche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4)**
Daniels, C. (1970) *The Garamantes of Southern Libya* (Wisconsin, Mass.: Oleander Press). **(Chap. 24)**
Dapper, O. (1668) *Naukeurige Beschrijvinghe des Afrikaensche Gewesten* (Amsterdam: van Meurs).
Darlington, C. D. (1963) *Chromosome Botany and the Origins of Cultivated Plants*, 2nd edn (London: Allen & Unwin). **(Chap. 27)**
Davidson, B. (1959) *The Lost Cities of Af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Gen Introd.)**
Davidson, B. (1965)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London: Gollancz). **(Gen. Introd.)**
Davidson, B. (1967a) *The African Pa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Gen. Introd.)**
Davidson, B. (1967b)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1000–1800* (London: Longman). **(Gen. Introd.)**
Davidson, B. (1968) *Black Mother; Africa: The years of trial* (London: Gollancz). **(Gen. Introd.)**
Davies, O. (1959) 'The distribution of Old Stone Age material in Guinea', *BIFAN*, B, 21, pp. 1–2. **(Chap. 24)**
Davies, O. (1960)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in tropical Africa', *THSG*, 4. **(Chap. 24)**
Davies, O. (1961) *Archaeology in Ghana: Papers* (Edinburgh: Nelson). **(Chap. 24)**
Davies, O. (1962) 'The Neolithic culture of Ghana', *Actes IV Congr. PPEQ*, 3, pp. 291–301. **(Chap. 24)**
Davies, O. (1964) *The Quaternary in the Coastlands of Guinea* (Glasgow: Jackson). **(Chap. 24)**
Davies, O. (1966a) 'The invasion of Ghana from the Sahara in the Early Iron Age', *Actas V Congr. PPEC*, 2, pp. 27–42. **(Chap. 24)**
Davies, O. (1966b) 'Comment on: J. Arkell, B. Fagan and R. Summers, "The Iron Age in sub-Saharan Africa"', *CA*, 7, pp. 470–1. **(Chap. 24)**
Davies, O. (1967a) 'New radiocarbon dates from Ghana', *ASEQAB*, 14–15, p. 28. **(Chap. 24)**
Davies, O. (1967b) *West Af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London: Methuen). **(Chap. 24)**
Davies, O., Hugot, H. J. and Seddon, D. (1968) 'The origins of African agriculture', *CA*, 9, 5, pp. 479–504.
Davison, C. C. (1973) 'Glass beads in African Archaeology', *AATA*, 10, 2. **(Chap. 9)**
Davison, C. C., Giauque, R. D. and Clark, J. D. (1971) 'Two chemical groups of dichroic glass beads from West Africa', *Man*, 6, 4, pp. 645–9. **(Chap. 9)**
Day, M. H. and Leakey, R. E. F. (1973) 'New evidence for the genus Homo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 *AJPA*, 39, pp. 341–54. **(Chap. 17)**
Day, M. H. and Leakey, R. E. F. (1974) 'New evidence for the genus Homo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II', *AJPA*, 41, pp. 367–80. **(Chap. 17)**
Day, M. H., Leakey, R. E. F., Walker, A. C. and Wood, B. A. (1975) 'New hominids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 *AJPA*, 42, pp. 461–76. **(Chap. 17)**
Day, M. H., Leakey, R. E. F., Walker, A. C. and Wood, B. A. (1976) 'New hominids from East Turkana, Kenya', *AJPA*, 45, 3, pp. 369–436. **(Chap. 17)**
Dayrell, E. (1911) 'Further notes on Nsibidi signs with their meanings from the Ikom district, Southern Nigeria', *JRAI*, 41, pl. LXV–LXVII. **(Chap. 10)**
Deacon, H. J. (1970) 'The Acheulian occupation of Amanzi Springs, Uitenhage district, Cape province', *ACPM*, 8, 11. **(Chap. 20)**
Deacon, H. J. (1972a) 'Wilton: an assessment after fifty years', *SAAB*, XXVII, 1–2, pp. 10–48. **(Chap. 20)**
Deacon, H. J. (1972b) 'A review of the post-Pleistocene in South Africa', *SAAB*, Goodwin series 1, pp. 26–45. **(Chap. 20)**
Debono, F. (1948a) 'Le Paléolithique final et le Mésolithique à Hélouan', *ASAE*, XLVIII, pp. 629–37. **(Chap. 25)**
Debono, F. (1948b) 'El-Omari', *ASAE*, XLVIII, pp. 562–8. **(Chap. 25)**
Debono, F. (1951) 'Expédition archéologique royale au Désert Oriental', *ASAE*, LI, pp. 59–91. **(Chap. 25)**
Debono, F. (1954) 'La nécropole prédynastique d'Héliopolis', *ASAE*, LII, pp. 625–52. **(Chap. 25)**
Debono, F. (1956) 'La civilisation prédynastique d'El Omari (Nord d'Hélouan)', *BIE*, XXXVII, pp. 331–9. **(Chap. 25)**
Debono, F. (1969) 'Le sentiment religieux à l'époque préhistorique en Egypte', *CHE*, XI, pp. 1–13. **(Chap. 25)**

Debono, F. (1970)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 région d'Esna', *BIFAO*, LXIX, pp. 245–51. **(Chap. 25)**

Debono, F. (1971) 'Etude des dépôts de silex', *Graffiti de la Montagne Thébaine*, I, 2, pp. 32–50 (Cairo). **(Chap. 25)**

Debono, F. (1971) 'Prospection préhistorique (Campagne 1972–1973)', *Graffiti de la Montagne Thébaine*, I, 4 (Cairo). **(Chap. 25)**

Debono, F. (1975) 'Thèbes préhistorique, ses survivances a l'époque pharaonique', *Actes du XX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I. **(Chap. 25)**

Debono F. (1976a) 'L'homme oldowaien en Egypte', *BIE*. **(Chap. 25)**

Debono, F. (1976b) 'Survivances préhistoriques de l'usage du silex à l'époque pharaonique', *BIE*. **(Chap. 25)**

Degan, T. (1956) 'Le site préhistorique de Tiémassas (Sénégal), *BIFAN*, B, 8, pp. 432–61. **(Chap. 24)**

Delafosse, M. (1901) *Essai de 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mandé ou mandingue* (Paris: Leroux). **(Chap. 12)**

Delafosse, M. (1912) *Haut-Sénégal-Niger (Soudan français)* (Paris: Larose). **(Chaps 1, 10)**

Delafosse, M. (1914) 'Mots Soudanais du Moyen Age',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Paris* 18. **(Chaps 10, 12)**

Delafosse, M. (1921), *Les Noirs de L'Afrique* (Paris). **(Chap. 1)**

Delafosse, M. (1924) 'Groupe sénégalo-guinéen', in A. Meillet and M. Cohen (eds), *Langues du Monde* (Paris: Champion). **(Chaps 10, 12)**

Delany, M. R. (1861)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iger Valley Exploring Party* (New York: Hamilton). **(Chap. 6)**

Delcroix, R. and Vaufrey, R. (1939) 'Le Toumbien de Guinée Française', *Anthropologie*, 49, pp. 265–312. **(Chaps 23, 24)**

Delibrias, G., Guillier, M. T. and Labeyrie, J. (1974) 'Gif natur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VII', *Radiocarbon*, 16, 1, pp. 15–94. **(Chap. 21)**

Delivré, A. (1974) *L'histoire des rois d'Imerina: interprétation d'une tradition orale* (Paris: Klincksieck). **(Chap. 8)**

Demougeot, E. (1960) 'Le chameau et l'Afrique du nord romaine', *Annales*, 209–47. **(Chap. 26)**

Denis, J., Vennetier, P. and Wilmet, J. (1971) *L'Afrique centrale et orientale* (Paris: PUF). **(Chap. 13)**

Denninger, E. (1971) 'Use of paper chromatography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albuminous binde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ock paintings', *SAAAS*, 2, pp. 80–4. **(Chap. 9)**

Deny, J. (1930) *Sommaire des archives turques du Caire*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6)**

Descamps, G. (1971) *Senégal, préservation et mise en valeur du patrimoine archéologique*, D: *Les mégalithiques du Sine-Saloum* (Paris: Unesco). **(Chap. 24)**

Deschamps, H. (1962) 'Pour une histoire de l'Afrique', in *Regards sur l'Afrique, Diogène*, 37, pp. 113–20.

Deschamps, H. (1964) *L'Afrique tropical aux XVIIe-XVIIIe siècles*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Introd.)**

Deschamps, H. (1969) *L'Afrique noire précoloniale*, 2nd edn (Paris: PUF). **(Introd.)**

Deschamps, H. (ed.) (1970–1)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de Madagascar et des archipels*, 2 Vols (Paris: PUF). **(Chap. 7)**

Desplagnes, A. M. L. (1907a) 'L'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n Guinée Francaise', *BSGC*, Bordeaux. **(Chap. 24)**

Desplagnes, A. M. L. (1907b) *Le plateau central nigérien. Un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au Soudan français* (Paris: Larose). **(Chap. 21)**

Despois, J. and Raynal, R. (1967) *Géographie de l'Afrique du Nord-Ouest* (Paris: Payot). **(Chap. 13)**

Destaniq, E. (1911) 'Notes sur des manuscrits arab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RA*. **(Chaps 5, 6)**

Deva, I. (1974) 'La tradition orale et l'étude des sociétés agricoles', *Diogène*, 85, pp. 123–42. **(Chap. 4)**

Diagne, P. (1972) *Teerebtanu ladab ci wàlàf: anthropologie de littérature la wolof* (Dakar: IFAN). **(Chap. 10)**

Diagne, P. (1976) *Enquête linguistique* (Tchad: Unesco). **(Chap. 10)**

Diallo, T. (1968)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Fouta-Djallon au XIXème siècle', roneo (Dakar). **(Chap. 6)**

Diehl, C. (1969) *L'Afrique Byzanti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Byzantine en Afrique (533-709)*, 2nd edn. 2 Vols (New York: Franklin). **(Chap. 5)**

Dieng, A. A. (1974) *Classes sociales et mode de production esclavagiste en Afrique de l'Ouest* (Paris: Cahiers du Centre d'études et recherches marxistes, No. 114). **(Concl.)**

Dieng, A. A. (1978) *Hegel, Marx, Engels et les problème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Ed. Sankoré).

Dimbleby, G. W. (1963) 'Pollen analysis', in D. Brothwell and E. Higgs (eds),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139–49. (Chap. 9)
Diop, C. A. (1955) *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s 10, 24)
Diop, C. A. (1959) *L'Unité culturelle de l'Afrique noire; Domaines du patriarcat et matriarcat dans l'antiquité classiqu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iop, C. A. (1960) *L'Afrique noire pré-coloniale; Etude comparée des syst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l'Europe et de l'Afrique noire, de l'antiquité à la formation des états modernes*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24)
Diop, C. A. (1962a) 'Réponse à quelques critiques', *BIFAN*, B, 24, pp. 542–74. (Chap. 24)
Diop, C. A. (1962b) 'Histoire primitive de l'humanité: évolution du monde noir', *BIFAN*, B, 24, pp. 449–541. (Chap. 24)
Diop, C. A. (1973)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migrations en Afriqu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 (Dakar: IFAN). (Chaps 6, 10)
Diop, C. A. (1974) *Physique nucléaire et chronologie absolue* (Dakar/Abidjan: NEA). (Chap. 4)
Diop, M. (1971) *Histoire d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Afrique de l'ouest* (Paris: Maspero). (Concl.)
Doblhofer, E. (1959) *Le Déchiffrement des écritures*, trans. M. Bittebière (Paris: Arthaud). (Chap. 4)
Doize, R. L. (1938) 'Les boules de pierre et les pierres perforées des collections de préhistoire du Musée du Congo', *AMRAC*, 1, pp. 89–140. (Chap. 21)
Doke, C. M. and Cole, D. T. (1961)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African Linguistics*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2)
Doresse, J. (1971) *Histoire sommaire de la Corne orientale de l'Afrique* (Paris: Geuthner). (Chap. 5)
Dorize, L. (1974) 'L'oscillation pluviométrique récente sur le bassin du lac Tchad et la circulation atmosphérique générale', *Revue de géographie physique et de géologie dynamique*, 16, 4, pp. 393–420. (Chap. 16)
Dorson, R. M. (comp.) (1972) *African Folklo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Chap. 8)
Dorson, R. M. (1976) 'Oral literature, oral history and the folklorist', in R. M. Dorson, *Folklore and Fakelo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7–44. (Chap. 8)
Dorst, J. and Dandelot, P. (1970) *A Field Guide to the Larger Mammals of Africa* (London: Collins). (Chap. 24)
Drar, M. (1963) 'Flore du continent africain: région au nord du Sahara', *Enquête su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Paris: Unesco), pp. 257–70. (Chap. 13)
Drioton, E. and Vandier, J. (1962) *Les Peuples de l'Orient Mediterranéen – L'Egypte*, 4th edn enlarged, 2 Vols (Paris: PUF). (Chaps 5, 28)
Droux, G. and Kelley, H. (1939)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 région de Boko-Songho et à Pointe-Noire (Moyen-Congo)', *JSA*, 9, pp. 71–84. (Chap. 21)
Dubief, J. (1959) *Le Climat du Sahara* (Algiers: Institut des recherches sahariennes). (Chap. 23)
Du Bois, W. E. 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essays and sketches* (Chicago: McClurg). (Gen. Introd.)
Du Bois, W. E. B. (1939) *Black Folk, Then and Now: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he Negro race* (New York: Holt).
Dumoulin de Laplante, P. (1946–7) *Histoire générale synchronique* (Paris: Gallimard). (Concl.)
Dunbar, J. H. (1941) *The Rock-Pictures of Lower Nubia* (Cairo: Government Press). (Chap. 23)
Dunham, D. and Bates, O. (1950–63) *The Royal Cemeteries of Kush*, 5 vols.; El Nuri, vol. 2, 195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8)
Dunhill, A. (1969) *The Pipe Book*, rev. edn (London: Barker). (Chap. 24)
Dupuis, J. (1824)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Ashantee* (London). (Chap. 1)
Duveyrier, H. (1864) *Les Touareg du Nord* (Paris: Challamel). (Chap. 23)
Duvigneaud, P. (1958) 'La végétation du Katanga et de ses sols métallifèr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botanique de Belgique*, 90, 2, pp. 126–278. (Chap. 21)
Duyvendak, J. J. L. (1949)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Probsthain). (Chap. 5)
Duyvendak, J. J. L. (1973) 'Eastern African coast', *JRAS*, pp. 98–122. (Introd., Chaps 5, 6)

Eboué, F. (1933) 'Les peuples de l'Oubangui-Chari. Essai d'ethnographie, de linguistique et d'economie sociale', *Ethnographie*, 27, pp. 3–79. (Chap. 21)
Edwards, I. E. S. (1970) 'Absolute dating from Egyptian records and comparison with carbon-14 dating', *PTRS*, 269, 1193, pp. 11–18. (Chap. 9)
Egharevba, J. U. (1960) *A short history of Benin*, 3rd edn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 24)
Ehret, C. (1968) 'Sheep and central Sudanic peoples', *JAH*, IX, 2, pp. 213–21. (Introd.)
El-Fasi, M. (1971) 'Berber, the sister language of Arabic' *Acts of the Academy of Cairo*. (Chap. 12)
El-Kettani, M. (1961) *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 (Pari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Introd.)

El-Kettani, M. (1968a) 'Les manuscrits de l'occident africain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du Maroc', *HT*, 9, 1, pp. 57–63. (Introd.)
El-Kettani, M. (1968b) 'Les sections d'archives et de manuscrits des bibliothèques marocaines', *HT*, 9, 3, pp. 459–68. (Introd.)
El-Tounsy, O. (1845) *Voyage au Darfour*, tr. Person (Paris). (Chap. 6)
Emery, W. B. (1961) *Archaic Egypt* (Harmondsworth: Penguin). (Chap. 28)
Emery, W. B. (1965) *Egypt in Nubia* (London: Hutchinson). (Chap. 28)
Emiliani, C. (1955) 'Paleoclimatological analysis of late Quaternary cores from the north-eastern Gulf of Mexico', *Science*, 189, 4208, pp. 1083–7. (Chap. 16)
Emphoux, J. P. (1970) 'La grotte de Bitorri au Congo-Brazzaville', *ORSTOM*, II, pp. 3–20. (Chap. 21)
Encyclopédie de l'Islam (1954), 2nd edn, ed. J. H. Kramers (Leiden: Brill). (Introd., Chap. 5)
Engelmayer, R. (1965) *Die Felsgravierungen im Distrikt Sayala Nubien* (Vienna: Böhlau). (Chap. 23)
Ennouchi, E. (1962) 'Un néandertalien: l'homme du Djebel Irhoud', *Anthropologie*, 66. (Chap. 22)
Erman, A. and Ranke, H. (1952) *La Civilisation égptienne*, trans. C. Mathieu (Paris: Payot). (Chap. 28)
Evans-Pritchard, E. E. (1939) 'Nuer time reckoning', *Africa*, 12, pp. 189–216. (Chap. 7)
Ewing, G. W. (1954) *Instrumental Methods of Chemical Analysis* (London: McGraw Hill). (Chap. 9)
Eyo, E. (1969) 'Excavation at Ile-Ife', *African Arts*, pp. 44–7. (Chap. 24)
Eyo, E. (1972a) 'Rop rock shelter excavations 1964', *WAJA*, 2, pp. 13–16. (Chap. 24)
Eyo, E. (1972b) 'New treasures from Nigeria', *Expedition*, 14, 2, pp. 1–11. (Chap. 24)
Eyo, E. (1974) 'Excavations at Odo-Ogbe Street and Lafogido, Ife, Nigeria', *WAJA*, 4. (Chap. 24)
Eyre, S. R. (1963) *Vegetations and Soils: A world picture* (London: Arnold). (Chap. 14)

Faegri, K. and Iversen, J. (1950) *Textbook of Modern Pollen Analysis* (Copenhagen: Munksgaard). (Chap. 9)
Fagan, B. M. (1969) 'Radiocarbon dat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VI', *JAH*, 10, pp. 149–69. (Chap. 24)
Fagan, B. M. and Noten, F. L. van (1971) *The Hunter-Gatherers of Gwisho*, *AMRAC*, 74. (Chap. 21)
Fage, J. D. (1961) 'Anthropology, botany and history', *JAH*, 2, 2, pp. 299–309.
Fage, J. D. (196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3r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trod.)
Fage, J. D. (1970) *An Atlas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Arnold).
Fage, J. D. (1970) *Africa Discovers Her P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5)
Fage, J. D. and Oliver, R. A. eds (1970)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cl.)
Fagg, A. (1972a) 'Pottery from the rock shelter excavations of 1944 and 1964', *WAJA*, 2, pp. 29–38. (Chap. 24)
Fagg, A. (1972b) 'Excavation of an occupation site in the Nok valley, Nigeria', *WAJA*, 2, pp. 75–9. (Chap. 24)
Fagg, B. E. B. (1944)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microlithic industry at Rop rock shelter, northern Nigeria',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Cambridge), 10, pp. 68–9. (Chap. 24)
Fagg, B. E. B. (1945) 'A preliminary note on a new series of pottery figures from northern Nigeria', *Africa*, 15, pp. 21–2. (Chap. 24)
Fagg, B. E. B. (1956a) 'An outline of the Stone Age of the Plateau minesfield', *Proc. III Intern. WAC*, pp. 203–22. (Chap. 24)
Fagg, B. E. B. (1956b) 'The Nok culture', *WAR*, 27, pp. 1083–7. (Chap. 24)
Fagg, B. E. B. (1959) 'The Nok culture in prehistory', *JHSN*, 1, 4, pp. 288–93. (Chap. 24)
Fagg, B. E. B. (1962) 'The Nok terracottas in West African art history', *Actes IV Congr. PPEQ*, III, pp. 445–50. (Chap. 24)
Fagg, B. E. B. (1968) 'The Nok culture: excavations at Taruga', *WAAN*, 10, pp. 27–30. (Chap. 24)
Fagg, B. E. B. (1969) 'Recent work in West Africa: new light on the Nok culture', *WA*, 1, pp. 41–50. (Chap. 24)
Fagg, B. E. B. (1972) 'Rop rock shelter excavations 1944', *WAJA*, 2, pp. 1–12. (Chap. 24)
Fagg, B. E. B. and Fleming, S. J. (1970) 'Thermoluminescent dating of a terracotta of the Nok culture, Nigeria', *Archaeometry*, 12, pp. 53–5. (Chap. 24)
Fagg, W. (1963) *Nigerian Imag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Chap. 24)
Fagg, W. and Willett, F. (1960) 'Ancient Ife: an ethnographical summary', *Odu*, 8, pp. 21–35. (Chap. 24)
Farag, N. and Iskander, Z. (1971) *The Discovery of Neferwptah* (Cairo: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hap. 9)

Farine, B. (1963) *Sites préhistoriques gabonais* (Libreville: Ministère de l'Information). (Chap. 21)

Farine, B. (1965)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au Gabon, BSPPG*, I, 3, pp. 68–84. (Chap. 21)

Farine, B. (1967) 'Quelques outils principaux des divers faciès préhistoriques des districts de Ndjole et de Booué', *BSPPG*, pp. 22–36. (Chap. 21)

Farrand, W. R. (1971) 'Late Quaternary paleoclimat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ea in Late Cenozoic glacial ages', in K. K. Turekian (ed.), *The Late Cenozoic glacial 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529–64. (Chap. 16)

Faulkner, R. O. (1953) 'Egyptian military organisation', *JEA*, 39, pp. 32–47. (Chap. 28)

Faure, H. (1962) 'Reconnaissance géologique des formations sédimentaires postpaléozoiques du Niger oriental',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 23)

Faure, H. (1967) 'Evolution des grands lacs sahariens à l'Holocène', *Quaternaria*, 15, pp. 167–75. (Chap. 16)

Faure, H. (1969) 'Lacs quaternaires du Sahara', *Internationale Vereiningung für theoretische und angewandte Limnologie* (Stuttgart), 17, pp. 131–48. (Chap. 16)

Faure, H. and Elouard, P. (1967) 'Schéma des variations du niveau de l'océan Atlantique sur la côte de l'Ouest de l'Afrique depuis 40,000 ans', *CRAS*, 265, pp. 784–7. (Chap. 24)

Ferembach, D. (1970) *Les Cro-Magnoides de l'Afrique du Nord. L'Homme de Cro-Magnon* (Paris: AMG). (Chap. 22)

Ferembach, D., Dastugue, J. and Poitrat-Targowla, M.-J. (1962) *La nécropole épipaléolithique de Taforalt (Maroc oriental); étude de squelettes humains* (Rabat: Edita-Casablanca). (Chap. 22)

Ferguson, J. (1969) 'Classical contacts with West Africa', in L. A. Thompson and J. Ferguson (eds), *Afric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4)

Fields, P. R., Milsted, J., Henricksen, E. and Ramette, R. W. (1971) 'Trace impurities in copper ores and artefacts',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pp. 131–43. (Chap. 4)

Filesi, T. (1962) *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Evo* (Milan: Giuffrè). (Chap. 5)

Filipowiak, M. (1969a) 'L'expédition archéologique polono-Guinéenne à Niani en 1968', *Africana*, 11, pp. 107–17. (Chap. 24)

Filipowiak, M. (1969b) 'Discovering Niani', *Polish Review*, 4, 92, pp. 14–16. (Chap. 24)

Finnegan, R. (1970)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8)

Fisher, H. J. (1972) 'He swalloweth the ground with fierceness and rage: the horse in the central Sudan', *JAH*, 13, 3, pp. 367–88. (Chap. 24)

Fisher, R. (1912) *Twilight tales of the black Baganda* (London). (Chap. 1)

Flamand, G. B. M. (1902) 'Les pierres écrites (Hadjrat Mektoubat) du nord de l'Afrique et spécialement de la région d'In Salah', *Anthropologie*, 12, pp. 535–8. (Chap. 23)

Flamand, G. B. M. (1921) *Les pierres écrites (Hadjrat Mektoubat). Gravures et inscriptions rupestres du Nord-Africain* (Paris: Masson). (Chap. 23)

Fleming, H. C. (1969) 'The classification of West Cushitic within Hamito-Semitic', in D. F. McCall, N. R. Bennett and J. Butler (eds), *Eastern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pp. 3–27. (Chap. 12)

Flight, C. (1968) 'Kintampo 1968', *WAAN*, 8, pp. 15–19. (Chap. 24)

Flight, C. (1970) 'Excavations at Kintampo', *WAAN*, 12, pp. 71–3. (Chap. 24)

Flinders-Petrie, W. M. *see* Petrie, W. M. F.

Flint, R. F. (1947) *Glacial Geology and the Pleistocene Epoch* (New York: Wiley; London: Chapman & Hall). (Chap. 16)

Flint, R. F. (1959a) 'Pleistocene climates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BGSA*, 70, pp. 343–74. (Chaps 16, 21)

Flint, R. F. (1959b) 'On the basis of Pleistocene correlation in East Africa', *Geology Magazine*, V, pp. 265–84. (Chaps 21, 24)

Flint, R. F. (1971) *Glacial and Quaternary Geology* (New York: Wiley). (Chaps 16, 24)

Flutre, F. (1957) *Pour une étude de la toponymie de l'A.-O.F.* (Dakar: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Fodor, I. (1966) *The Problem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African Languages* (Budapest: Centre for Afro-Asian Research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ap. 4)

Foerster, R. (ed.) (1893) *Scriptores Physiognomonici* (Leipzig: Teubner). (Chap. 11)

Forbes, R. J. (1955–72)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Vol. I (Leiden: Brill). (Chap. 28)

Ford, J. (1971)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se-T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Introd.)

Forde, C. D. (ed.) (1954) *African Worlds; studies in the cosmological ideas and social values of African peopl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trod.)

Forde, C. D. (1956) *Efik Traders of Old Calabar*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Fortes, M. and Evans-Pritchard, E. E. (eds) (1958)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 Introd.)

Fosbrooke, H. A. (1950) 'Rock-paintings of north-central Tanzania', *TNR*, 29. (Chap. 19)

Foureau, F. (1883) 'Excursion dans le Sahara algérien', *L'Explorateur*, 16. (Chap. 23)
Foureau, F. (1903–5)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la Mission saharienne, Mission Foureau-Lamy, d'Alger au Congo par le Tchad*, 3 Vols (Paris: Masson). (Chap. 23)
Fournier, F. (1963) 'Les sols du continent africain', *Enquête su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Paris: Unesco), pp. 227–55. (Chap. 13)
Freeman, T. (1844) *Journal of Various Visits to the Kingdom of Ashanti, Dahomey and Abeokuta* (London). (Chap. 6)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8) 'Swahili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JEASC*, 28, 2. (Introd., Chaps 5, 6)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9) 'Medieval evidences for Swahili', *JEASC*, 29, 1. (Introd., Chaps 5, 6)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 'East African coin 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AH*, 1, pp. 31–43. (Introd., Chaps 5, 6)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1, 6)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Frobenius, L. (1912–13) *Und Afrika sprach* (Berlin, Charlottenburg), tr. R. Blind, *The Voice of Africa* (London: Hutchinson): (Introd.)
Frobenius, L. (1921–8) *Atlantis; Volksmärchen und Volksdichtungen Afrikas* (Jena). (Chap. 1)
Frobenius, L. (1937) *Ekade Ektab. Die Felsbilder Fezzans* (Leipzig: Harrassowitz). (Chap. 23)
Frobenius, L. (1949) *Mythologie de l'Atlantide, le 'Poseidon' de l'Afrique noir, son culte chez les Yorouba du Bénin* (Paris: Payot). (Introd.)
Frobenius, L. (1952)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trans. H. Back and D. Ermont (Paris: Gallimard). (Introd.)
Frobenius, L. and Obermaier, H. (1923) *Hádschra maktuba, urzeitliche Felsbilder Kleinafrikas* (Munich: Wolff). (Chap. 23)
Froger, J. (1965) 'La machine électronique au service des sciences humaines', *Diogène*, 52, pp. 110–44. (Chap. 4)
Froude, J. A. (1888) *The English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 Longman; New York: Scribner). (Chap. 1)
Fuller, F. (1921) *A Vanished Dynasty: Ashanti* (London). (Chap. 1)
Furon, R. (1943) *Manuel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Paris: Payot). (Concl.)
Furon, R. (1958) *Manuel de préhistoire générale: géologie, biogéographie, 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les métaux et la protohistoire*, 4th edn (Paris: Payot). (Concl.)
Furon, R. (1960) *Géologie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Chap. 13)
Fynn, N. F. (1950) *The Diary of Henry Francis Fynn*, eds J. Stuart and D. Malcolm (Pietermaritzburg: Shuter & Shooter). (Chap. 6)

Gabel, C. (1966)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of Africa', *BUPA*, pp. 1–37. (Chap. 15)
Gabel, C. and Bennet, N. R. (1967) *Reconstructing African Culture History* (Boston, Mass.: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15)
Galton, F. (1891) *Narrative of an explorer in tropical South Africa*, 4th edn (London/New York: Ward Lock). (Chap. 6)
Gardiner, A. H. (1947) *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8)
Gardiner, A. H. (1957)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 3rd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8)
Gardner, J. V. and Hays, J. D. (1975) 'Eastern equatorial Atlantic: sub-surface temperature and circulation responses to global climatic change during the past 200,000 years', *GSAM*, 145. (Chap. 16)
Garlake, P. (1974) 'Excavations at Obalara's Land, Ife, Nigeria', *WAJA*, 4. (Chap. 24)
Gasse, F. (1975) 'L'évolution des lacs de l'Afar Central (Ethiopie et TFAI) du Plio-Pléistocène à l'Actuel', thesis, 3 Vols (Paris: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 16)
Gaudefroy-Demombynes, M. (1927) *L'Afrique moins l'Egypte* (Paris). (Chap. 5)
Gaussen, M. and J. (1965) 'Un atelier de burins à Lagreich-Néo. 1, Oued Tilemsi (Mali)', *Anthropologie*, 69. (Chap. 23)
Gautier, E. F. (1908) *Le Sahara algérien* (Paris: Colin). (Chap. 23)
Gautier, E. F. (1928) *Le Sahara* (Paris: Payot) 2nd edn 1946, 3rd edn. 1950. (Chap. 23)
Gautier, E. F. (1933) 'Deux centres d'influence méditerranéenne qui rendent intelligible l'Afrique occidentale', *BSGF*, pp. 71–2. (Introd.)

Gautier, E. F. and Reygasse, M. (1923) 'Découverte d'un outillage moustérien à outils pédonculés atériens dans le Tidikelt, oued Asriouel, région d'Aoulef Chorfa', *Actes 46e Congr. AFAS.* (Chap. 23)

Gautier, E. F. and Reygasse, M. (1934) 'Les monuments de Tin Hinan', *AARSC*, 7. (Chap. 23)

Gentner, W. and Lippolt, H. J. (1963) 'The potassium-argon dating of upper Tertiary and Pleistocene deposits', in D. Brothwell and E. Higgs (eds),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72–84. (Chap. 9)

Germain, G. (1957) 'Qu'est-ce que le périple d'Hannon?' *Hesperis.* (Chap. 5)

Geus, F. (1976) *Rapport annuel d'activité 1975–76* (Khartoum: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u Soudan). (Chap. 28)

Giegengack, R. F. (1968) 'Late Pleistocene history of the Nile valley in Egyptian Nubia', PhD disser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Chap. 16)

Giglio, G. (1958) *L'Italia in Africa. Serie storice, Volume primo: Etiopia/Mar Rosso* (Rome). (Chap. 6)

Gilbert, E. W. (1932) '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48, 3. (Chap. 14)

Girard, P. P. (1937) *Textes de droit romain*, 6th edn. (Chap. 5)

Glélé-Ahanhanzo, M. (1974) *Le Danxomé, du pouvoir Aja à la nation Fon* (Paris: Nutria). (Chap. 10)

Glover, T. R. (1977) *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5)

Gobert, E. G. (1951–2) 'El-Mekta, station princeps du capsien', *Karthago*, 2. (Chap. 22)

Gobert, E. G. (1963)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 la préhistoire tunisienne', *Cahiers de Tunisie*, 41–2, pp. 37–77. (Chap. 22)

Godée-Molsbergen, E. C. (1916–32) *Reizen in Zuid-Afrika in de Hollandse Tijd*, 4 Vols ('s-Gravenhage: Nijhoff). (Chap. 6)

Goeje, M. J. de (1879–94)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Leyden). (Chap. 5)

Goiten (1960) 'The Cairo Geniza as a source for Mediterranean social history', in *JAOS.* (Chap. 5)

Goiten (1967)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Los Angeles: Economic Foundations), Vol. I. (Chap. 5)

Goodwin, A. J. H. and Riet Lowe, C. van (1929) 'The Stone Age cultures of South Africa', *ASAM*, 27. (Chap. 20)

Goody, J.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7)

Görög-Karady, V. (1966–72) 'Litterature orale africaine: bibliographie analytique (périodiques)', *CEA*, 21, VIII, pp. 243–501; 36, IX, pp. 631–66; 40, X, pp. 583–631; 45, XII, pp. 174–92. (Chap. 7)

Gourou, P. (1970) *L'Afrique* (Paris: Hachette). (Chap. 13)

Graft Johnson, J. C. de (1924) *African Glory* (London). (Chap. 1)

Graft Johnson, J. C. de (1928) *Towards Nationhood in West Africa* (London). (Chap. 1)

Graft Johnson, J. C. de (1929)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Chap. 1)

Grandidier, A., Charles-Roux, J., Delhorbe, C., Froidevaux, H. and Grandidier, G. (1903–20) *Collections des ouvrages anciens concernant Madagascar*, 9 Vols (Paris: Comité de Madagascar). (Chap. 12)

Gray, J. M. (1940) *A History of the Gambia* (London). (Chap. 1)

Gray, R. (1965) 'Eclipse maps', *JAH*, VI, 3, pp. 251–62. (Chap. 7)

Gray, R. (1968) 'Annular eclipse maps', *JAH*, IX, 1, pp. 147–57. (Chap. 7)

Gray, R. and Chambers, D. S. (1965)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Italian Archives* (London: Athlone Press). (Chaps 6, 24)

Graziosi, P. (1942) *L'arte rupestre della Libia* (Naples: Edizione della Mostra d'oltremare; Florence: Le Monnier). (Chap. 23)

Greenberg, J. H. (1948) 'The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AA*, 10. (Chap. 10)

Greenberg, J. H. (1954) 'Etude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s langues africaines', *BIFAN*, B, XVI. (Introd., Chaps 1, 10)

Greenberg, J. H. (1957a) *Essays in Linguis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10)

Greenberg, J. H. (1957b) 'Nilotic, nilo-hamitic and Hamito-Semitic', *Africa*, 27, pp. 364–77. (Chaps 10, 12)

Greenberg, J. H. (1963a) 'Langues et histoire en Afrique', *Présence africaine*, 45, pp. 35–45. (Chaps 10, 15)

Greenberg, J. H. (1963b)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IJAL*, 29, 1, pp. 1–177. (Chaps 1, 10, 12, 24)

Greenberg, J. H. (1963c)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Kwa problem', *Actes 2e Coll. Intern. LNA.*

Greenberg, J. H. (1966)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The Hague: Mouton). (Chap. 12)

Greenberg, J. H. (1971)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Greenberg, J. H. (1972) 'Linguistic evidence regarding Bantu origins', *JAH*, 13, 2, pp. 189–216. (Chap. 12)
Gregersen, E. A. (1967) 'Linguistic seriation as a dating device for loanword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 *ALR*. (Chap. 10)
Gregersen, E. A. (1977) *Language in Africa: An Introductory Survey* (New York: Gordon & Breach). (Chap. 12)
Griaule, M. (1947) 'Mythe de l'organisation du monde chez les Dogon du Soudan', *Psyché*, 6, pp. 443–53. (Chap. 8)
Griaule, M. (1949) 'L'image du monde au Soudan', *JSA*, 19, pp. 81–7. (Chap. 8)
Griaule, M. (1952) 'Etendue de l'instruction traditionnelle au Soudan', *Zaïre*, 6, pp. 563–8. (Chap. 8)
Griaule, M. and Dieterlen, G. (1951) 'Signes graphiques soudanais', *L'Homme*. (Chap. 10)
Griaule, M. and Dieterlen, G. (1965) *Le renard pâle*, Vol. I: *Le Mythe cosmogonique*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Chaps, 8, 15)
Griffith, F. L. (1927) 'The Abydos decree of Seti I at Mauri', *JEA*, 13, pp. 193–208. (Chap. 28)
Grohmann, A. (1934–59) *Arabic Papiri in the Egyptian Library*. (Chap. 5)
Grohmann, A. (1955) *Einführung und Chrestomathie zur Arabischen Papyruskunde* (Praha). (Chap. 5)
Grove, A. T. and Pullan, R. A. (1963) 'Some aspects of the Pleistocene palaeogeography of the Chad Basin',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36, pp. 230–45.
Grove, A. T. and Pullan, R. A. (1964) 'Some aspects of the palaeogeography of the Chad Basin', in F. C. Howell and F. Bourlière (eds), *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London), pp. 230–45. (Chaps 16, 24)
Grove, A. T., Street, F. A. and Goudie, A. S. (1975) 'Former lake levels and climatic change in the rift valley of southern Ethiopia', *GJ*, 141, 2, pp. 177–202. (Chap. 16)
Grove, A. T. and Warren, A. (1968) 'Quaternary landforms and climate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Sahara', *GJ*, 134, pp. 194–208. (Chap. 24)
Gruet, M. (1954) 'Le gisement moustérien d'El Guettar', *Karthago*, 5. (Chaps 22, 23)
Gsell, S. (1920–8) *L'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8 Vols (Paris: Hachette). (Chap. 5)
Guébhard, P. (1907) 'Trois abris sous roche fouillés dans le Fouta—Djallon', *BGHD*, 3, pp. 408–20. (Chap. 24)
Guernier, E. L. (1952) *L'apport de l'Afrique à la pensée humaine* (Paris: Payot). (Introd.)
Guillain, M. (1848)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a commerce de l'Afrique orientale* (Paris). (Chap. 1)
Guillot, R. and Descamps, C. (1969) 'Nouvelles découvertes préhistoriques à Tiémassas (Sénégal)', *BIFAN*, B, 31, pp. 602–37. (Chap. 24)
Guitat, R. (1972) 'Présentation de pièces pédonculées d'El Azrag (Mauritanie)', *NA*, 135, pp. 29–33. (Chap. 23)
Guma, S. M. (1967) *The Form, Content and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Southern Sotho* (Pretoria: Van Schaik). (Chap. 7)
Guthrie, M. (1948)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ntu Languages*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2)
Guthrie, M. (1962) '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JAH*, 3, 2, pp. 273–82. (Chap. 12)
Guthrie, M. (1967) *Comparative Bant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prehistor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Farnborough: Gregg). (Chap. 10)
Guthrie, M. (1969) *Linguistics and History* (London). (Chap. 10)

Haberland, E. (ed.) (1973) *Leo Frobenius* (Wiesbaden: Steiner). (Chap. 26)
Hable-Sélassié, S. (1967)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of Ethiopia', Communic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fricanists, Dakar. (Chap. 5)
Hadjigeorgiou, C. and Pommeret, Y. (1965) 'Présence du Lupembien dans la région de l'estuaire', *BSPPG*, 1, 3, pp. 111–31. (Chap. 21)
Hair, P. E. H. (1965) 'The enslavement of Koelle's informants', *JAH*, 6. (Chap. 6)
Halk, P. (1972) 'Pour une localisation du Royaume de Gaoga', *JAH*, XIII, 4.
Halkin, L. E. (1963) *Initiation à la critique historique* (Paris: Colin). (Introd., Chap. 15)
Hall, E. T. (1965) 'Recent research at the 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n Applications of Science in Examinations of Works of Art*, Boston. (Chap. 9)
Hall, E. T. (1970) 'Analytical techniques used in archaeometry', *PTRS*, 269, 1195, pp. 135–41. (Chap. 9)

Halpern, J. W., Harris, J. E. and Barnes, C. (1971) 'Studying skulls in Egypt', *Research News* XXII, 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ap. 9)**
Hamet, I. (1911) *Chroniques de la Mauritanie sénégalaise* (Paris). **(Chap. 6)**
Hamilton, E. I. (1965) *Applied geochronology* (London/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7-79. **(Chap. 9)**
Hammen, T. van der (1974) 'The last glacial sequ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CLIMAP*, pp. 56-7. **(Chap. 16)**
Hamy, E. T. (1900) 'La grotte de Kakimbon à Rotoma près de Konakry', *CR 12 Congr. Intern. AAP*. **(Chap. 24)**
Hanotaux, G. and Martineau, A. (eds) (1931)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8 Vols (Paris). **(Chap. 1)**
Hardy, G. (1937) *Vue générale de l'histoire d'Afrique* (Paris). **(Chap. 1)**
Harlan, J. R. (1975) *Crops and Man* (Madison, Wis.: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Chap. 27)**
Harlan, J. R., Wet, J. M. de and Stemler, A. B. L. (eds) (1976) *Origins of African Plant Domestication* (Paris/The Hague: Mouton). **(Chap. 27)**
Harley, G. W. (1950) Review of 'Masks as agents of social control in northeast Liberia',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Vol. XXXII. **(Chap. 15)**
Harries, L. (ed. and trans.) (1962) *Swahili Poet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Harries, L. (1964) 'The Arabs and Swahili culture', *Africa*, XXXIV, pp. 224-9. **(Introd., Chaps 5, 6)**
Harris, D. (1969) 'Agricultural systems, ecosystems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P. J. Ucko and G. W. Dimbleby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 Duckworth). **(Chap. 27)**
Harris, J. R. (1961)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in Ancient Egyptian Minerals*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28)**
Harrison Church, R. J. *et al.* (1966) *Africa and the islands* (London: Longman). **(Chap. 13)**
Harrison Church, R. J. (1969) *Africa and the Islands* (London: Longman). **(Chap. 13)**
Hartle, D. D. (1966) 'Archaeology in eastern Nigeria', *WAAN*, 5, pp. 13-17. **(Chap. 24)**
Hartle, D. D. (1968) 'Radiocarbon dates', *WAAN*, 9, p. 73. **(Chap. 24)**
Hartle, D. D. (1970)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s Kainji rescue archaeology project, 1968', *WAAN*, 12, pp. 7-19. **(Chap. 24)**
Hartmann, F. (1923) *L'Agriculture dans l'ancienne Egypte* (Paris: Librairies-Imprimeries réunies). **(Chap. 28)**
Hassan, F. A. and Wendorf, F. (1974) 'A Sibilian assemblage from El Elh', *Chronique d'Egypte*, 49, pp. 211-22. **(Chap. 25)**
Hau, E. (1959) 'Evidence of the use of pre-Portuguese written characters by the Bini', *BIFAN*, XXI. **(Chap. 10)**
Hay, R. L. (1976) *Geology of the Olduvai Gorge: A study of sedimentation in a semi-arid basi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17)**
Hayes, W. C. (1964) *Most Ancient Egypt*, ed. K. C. See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28)**
Hays, J. D., Saito, T., Opdyke, N. D. and Burckle, L. D. (1969) 'Pliocene-Pleistocene sediments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their paleomagnetic, biostratigraphic and climatic record', *GSAB*, 80, pp. 1481-513. **(Chap. 16)**
Heintze, B. (1976) 'Oral traditions. Primary sources only for the collector', *History in Africa: A journal of method*, 3.
Heinzelin de Braucourt, J. de (1957) *Les fouilles d'Ishango* (Brussels). **(Chap. 21)**
Heinzelin de Braucourt, J. de (1963) 'Paleo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Lake Albert-Lake Edward rift',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36. **(Chap. 16)**
Heinzelin de Braucourt, J. de (1968) 'G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ile Valley in Nubia', in F. Wendorf (ed.), *The Prehistory of Nubia* (Dallas: Fort Burgwin Research Center and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Chap. 16)**
Heinzelin de Braucourt, J. de, Brown, F. E. and Howell, F. C. (1971) 'Plio-Pleistocene formations in the lower Omo Basin (Southern Ethiopia)', *Quaternaria*. **(Chap. 16)**
Henige, D. P. (1971) 'Oral tradition and chronology', *JAH*, XII, 3. **(Chap. 7)**
Henige, D. P. (1974) *The Chronology of Oral Tradition: Quest for a Chimer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2, 7)**
Herbert, E. W. (1973) 'Aspects of the use of copper in pre-colonial West Africa', *JAH*, 14, 2, pp. 179-94. **(Chap. 24)**
Herodotus (1964) *Histories*, Vol. 1, trans. George Rawlinson (London: Dent). **(Chaps, 1, 24)**
Herodotus, *Works*, trans. A. D. Godley 1920-4, 4 Vols (London: Heinemann).

Hervieu, J. (1969) 'Les industries à galets aménagés du haut bassin de la Benoué (Cameroun)' *BASEQUA*, 22, pp. 24–34. **(Chap. 21)**

Herzog, R. (1938) *Punt* (Glückstadt). **(Chap. 11)**

Hester, J. J. (1968) in 'Comments', *CA*, 9. **(Chaps 5, 27)**

Heusch, L. de (1972) *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Etat; mythes et rites bantous* (Paris: Gallimard). (Chap. 7)

Hiben, F. C. (1967) 'Lukuliro', *Archaeology*, XX, pp. 247–53. (Chap. 19)

Hiernaux, J. (1970) 'La Diversité biologique des groupes ethniques'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Introd., Chap. 11)**

Hiernaux, J. (1974) *Rapport sur le concept de race* (Paris: Unesco). **(Gen. Introd., Chap. 11)**

Higgs, E. S. (1970) 'Prehistoric economy in the Mount Carmel area of Palestine: site catchment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36. **(Chap. 20)**

Hill, P. (1963) *The migrant cocoa-farmers of Southern Gha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Hintze, F. (1951) 'Revue de l'essai comparatif sur le vocabulaire et la phonétique du chamito-sémitique de M. Cohen', *Z. Phon*, 5, pp. 65–87. **(Chap. 10)**

Hintze, F. (1955) 'Die sprachliche Stellung des Meroitische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chaften Veröff*, 26, pp. 355–72. **(Chap. 12)**

Hintze, F. and U. (1967) *Alte Kulturen im Sudan* (Munich: Callwey). **(Chap. 28)**

Hiob, L. (1681) *Historia Aethiopica* (Frankfurt). **(Chap. 6)**

Hirth, F. (1909–10)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AOS*, 30. **(Chap. 5)**

Hiskett, M. (1957)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 state of learning among the Fulani before their jihad', *BSAOS*, 19. **(Chap. 6)**

Hjalmar, L. (1962) 'Die Merimdekeramik im Mittelmeermuseum', *Orientalia Suecana*, XI. **(Chap. 28)**

Hockett, C. F. and Ascher, R. (1964) 'The human revolution', *CA*, 5, 3. **(Chap. 4)**

Hodge, C. T. (1968) 'Afro-Asiatic 67', in *Language Sciences*, Indiana. **(Chap. 10)**

Hodgkin, T. (1956)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Muller). **(Chap. 3)**

Hodgkin, T. (1966) 'The Islam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Ghana', in I. M. Lewis (ed.),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2–60 (Chaps 1, 6)

Hofmann, I. (1967) *Die Kulturen des Nilstal von Aswan bis Sennar, vom Mesolithikum: bis zum Ende der Christischen Epoche* (Monographien zur Völkerkunde-Hamburgischen Museumfur Völkerkunde). (Chap. 28)

Hohenberger, J. (1956) 'Comparative Masai word list', *Africa*, 26, pp. 281–7. **(Chaps 12, 26)**

Holas, B. (1950) 'Notes préliminaires sur les fouilles de la grotte de Blandé', *BIFAN*, 12, pp. 999–1006. **(Chap. 24)**

Holas, B. (1952) 'Note complémentaire sur l'abri sous roche de Blandé (Guinée)', *BIFAN*, 14, pp. 1341–52. **(Chap. 24)**

Holas, B. and Mauny, R. (1953) 'Nouvelles fouilles à l'abri sous roche de Blandé (Guinée)', *BIFAN*, 15, pp. 1605–17. **(Chap. 24)**

Holm, E. (1961) 'The Rock Art of South Africa', in *The Art of the Stone Age* (London: Methuen).

Homburger, L. (1930a) 'Les dialectes copte et mandé', *BSL*, 3, 1. **(Introd.)**

Homburger, L. (1930b) 'Le bantou et le mandé', *BSL*, 135, 43. **(Introd.)**

Homburger, L. (1936) 'Le verbe en peul et en massaï', *Anthropologie*, 46. **(Introd.)**

Homburger, L. (1941) *Les langues négro-africaines et les peuples qui les parlent* (Paris: Payot). (Introd., Chap. 12)

Homburger, L. (1948–50) 'Eléments dravidiens en peul', *JSA*, 18, 2. **(Introd.)**

Homburger, L. (1958) 'La linguistique et l'histoire de l'Afrique', *BIFAN*, XX, 3, 4, pp. 554–61. (Chap. 10)

l'Honoré-Naber, S. L. (1931) *Reisebeschreibungen von deutschen Beamten und Kriegsleuten im Dienst der Niederländischen West und Ost indischen Kompanien 1602–1797*, 13 Vols (The Hague). (Chap. 6)

Hoore, J. L. d' (1964) *Soil Map of Africa, scale 1 to 5,000,000: Explanatory monograph* (Lagos: Commission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Africa). **(Chap. 13)**

Horton, J. A. B. (1868)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s ... and a Vindication of African Race* (London: Johnson). (Chap. 6)

Houdas, O. (1899) *Sadhkirat an nisyan* (Paris). (Chap. 6)

Houdas, O. (ed. and trans.) (1964 revised.) *Documents arab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Soudan: Tariqh-es-Soudan par Abderrahman ben Abdallah ben 'Imran ben' Amir es-Sa'di* (Paris: Maisonneuve). **(Introd.)**

Houdas, O. and Delafosse, M. (ed. and tr.) (1913) *Tarikh el-Fettach* (Paris: Leroux). **(Introd.)**

Houis, M. (1955) 'Problèmes linguistiques de l'ouest africain', *Guide bleu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Chap. 11)

Houis, M. (1958) 'Quelques données de toponymie ouest africaine', *BIFAN*.
Houis, M. (1961) 'Mouvements historiques et communautés linguistiques dans l'ouest africain', *L'Homme*, I, 3, pp. 72–92. **(Chap. 11)**
Houis, M. (1971) *Anthropologie linguistiqu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Introd., Chaps 10, 11)**
Howell, F. C. and the editors of *Life* (1965) *Early Man* (New York: Time Inc.). (Chap. 19)
Howell, F. C. (1969a) 'Remains of Hominidae from Pliocene-Pleistocene formations in the lower Omo Basin, Ethiopia', *Nature*, 223, 20, pp. 1234–9. **(Chap. 17)**
Howell, F. C. (1969b) 'Hominid teeth from White Sands and Brown Sands localities, lower Omo Basin, Ethiopia', *Quaternaria*, XI, pp. 47–64. **(Chap. 17)**
Howell, F. C. (1972) 'Pliocene/Pleistocene Hominidae in Eastern Africa: absolute and relative ages', in W. W. Bishop and J. A. Miller (eds) *Calibration of hominoid evolution*, pp. 331–68. (Chap. 16)
Howell, F. C., Coppens, Y. and Heinzelin, J. de (1974) 'Inventory of remains of Hominidae from Pliocene-Pleistocene formations of the lower Omo Basin, Ethiopia (1967–1972)', *AJPA*, 40, 1, pp. 1–16. (Chap. 17)
Howells, W. W. (1972) '20 millions d'années pour faire un homme, les origines de l'homme', *Unesco Courrier*, August–September, pp. 4–13. (Concl.)
Hrbek, I.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ies (Vienna, 1965)*. (Horn, Austria: Berger) ed. H. L. Mikoletzky, V. (n.d.). (Chap. 5)
Hrbek, I., Kalous, M., Petráček *et al.* (1966) *Dějiny Afriky*, 2 Vols (Prague: Svoboda). **(Introd.)**
Huard, P. (1960)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anthropologique des Teda du Tibesti', *BIFAN*, B, XXII, 1–2, pp. 179–201. (Chap. 28)
Huard, P. (1963) 'Gravures rupestres de l'Ennedi et des Erdis', *BIRSC*, 2, pp. 3–39. (Chap. 26)
Huard, P. (1964) 'Un établissement islamique tchadien ouogavi', *BIFAN*, B, XXVI, 1–2. **(Chap. 28)**
Huard, P. (1966) 'Introduction et diffusion du fer au Tchad', *JAH*, 7, 3, pp. 377–407. **(Chap. 24)**
Huard, P. (1969) 'Aires ou origines de quelques traits culturels des populations pré-islamiques du Bas Chari, Logone',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179–224. **(Introd.)**
Huard, P. and Beck, P. (1969) *Tibesti, carrefour de la préhistoire saharienne* (Paris: Arthaud). **(Chap. 26)**
Huard, P. and Leclant, J. (1973) 'Figurations de chasseurs anciens du Nil et du Sahara', *RE*, 25. **(Chap. 26)**
Hubert, R. (1922) 'Objets ancien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BCEHS*, 5, pp. 382–99. **(Chap. 24)**
Hue, E. (1912) 'L'âge de la pierre au Fouta Djallon', *BSPF*, 2. (Chap. 24)
Hugot, H. J. (1955a) 'Du Capsien au Tidikelt', *Actes II Congr. PPEQ*, pp. 601–3. **(Chap. 23)**
Hugot, H. J. (1955b) 'Un gisement de pebble-tools à Aoulef', *Trav. IRS*, 13, pp. 131–49. **(Chap. 23)**
Hugot, H. J. (1957) 'Essai sur les armatures de pointes de flèches du Sahara', *Libyca*, 5, pp. 89–236. (Chap. 24)
Hugot, H. J. (ed.) (1962)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s missions Berliet-Ténéré, Tchad, 1959–60* (Paris: AMG). (Chap. 23)
Hugot, H. J. (1963)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haggar nord-occidental 1950–1957', *Mém. CRAPE*. **(Chaps 23, 24)**
Hugot, H. J. (1964) 'Etat des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frique de l'Ouest, 1964–1965', *WAAN*, 1, pp. 4–7. **(Chap. 24)**
Hugot, H. J. (1966a) 'Limites méridionales dans l'Atérien', *Actas V Congr. PPEC*. **(Chaps 22, 24)**
Hugot, H. J. (1966b) 'Présence d'un faciès archaïque d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à Dakar', *BIFAN*, A, 28, pp. 415–16. **(Chap. 24)**
Hugot, H. J. (1967) 'Le Paléolithique terminal dans l'Afrique de l'ouest',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529–56). (Chap. 23)
Hugot, H. J. (1970) *L'Afrique préhistorique* (Paris: Hatier). **(Chaps 21, 23)**
Hugot, H. J. (1974) *Le Sahara avant le désert* (Paris: Editions des Hespérides). **(Chaps, 25, 26)**
Hugot, H. J., Davies, O. and Seddon, D. (1968) 'The Origins of African Agriculture', *CA*, 9, 5. **(Chap. 27)**
Hugot, H. J. *et al.* (1973) 'Tichitt I, rapport scientifique', roneo, Paris. **(Chap. 23)**
Hugot, H. J. and **Bruggmann, M.** (1976) *Les gens du matin: Sahara, dix mille ans d'art et d'histoire* (Paris: La Bibliothèque des arts). (Chap. 23)
Huntingford, G. W. B. (1956) 'The "Nilo-Hamitic" languages', *SWJA*, 12, pp. 200–22. **(Chap. 12)**
Hunwick, J. O. (1962) 'Arabic manuscript material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 supplement, *BNHSN*, VII, 2, pp. 1–9. **(Introd., Chaps 5, 6)**
Hunwick, J. O. (1973)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capital of Mali', *JAH*, 14, 2, pp. 195–208. (Gen Introd., Chap. 24)

Huzayyin, S. A. (1936) 'Glacial and pluvial episodes of the diluvium of the old world', *Man*, 36, pp. 19–22. (Chap. 23)

Huzayyin, S. A. (1941) *The Place of Egypt in Prehistory: A correlated study of climates and cultures in the old world*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25)

Iakimov, V. P. (1972) 'Deux grandes théories sur l'apparition des races', *Le Courrier* (August–September). (Concl.)

Ibn Battuta (1922) *Les Voyages*, ed. and tr. C. Defrémery and B. R. Sanguinetti (Paris). (Chap. 1)

Ibn Khaldun (1925–6) *Histoire des Berbères*, tr. M. G. de Slane (Paris). (Chap. 1)

Iliffe, J. (1969) *Tanganyika under German Rule, 190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Inskeep, R. R. (1969) 'Some problems in relation to the Early Stone Age in South Africa', *SAAB*, XXIV, 3–4, pp. 174–81. (Chap. 20)

Irstarm, T. (1944) *The King of Ganda* (Uppsala). (Chap. 1)

Isaac, G. L. (1966)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Olorgesailie area', *Proc. 5th PCPQS*, 2, pp. 125–44. (Chap. 19)

Isaac, G. L. (in press) 'East Rudolf', *Proc. 7th PCPQS*, 1977 (Chap. 19)

Isaac, G. L. (1971) 'The diet of early man: aspects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Lower and Middle Pleistocene sites in Africa', *WA*, 2, pp. 278–98. (Chap. 20)

Isaac, G. L., Leakey, R. E. F. and Behrensmeyer, A. K. (1971)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early hominid activitie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Science*, 173, pp. 1129–34. (Chap. 17)

Isaac, G. L. and McCown, E. R. (eds) (1976) *Human Origins: Louis Leakey and the East African evidence*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 (Chap. 19)

Isaacs, N. (1836–7)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Eastern Africa*, 2 Vols (Cape Town: The Van Riebeeck Society). (Chap. 6)

Iskander, A. (1960) 'The scientific study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objects and materials found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wooden boat at Giza', *The Cheops Boats*, pt 1 (Cairo: Antiquities Department of Egypt), pp. 29–61. (Chap. 9)

Iskander, A. (1961) 'Chem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amples found at the monastery of Phoebammon', in C. Bachatly (ed), *Le Monastère de Phoebammon dans la Thébaïde*, Vol. III (Cairo: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copte). (Chap. 9)

Iskander, A. and Shaheen, A. E. (1964) 'Temporary stuffing materials used in the process of mummification in ancient Egypt', *ASAE*, LVIII, pp. 197–208. (Chap. 9)

Isnard, H. (1964) *Géographie de l'Afrique tropicale et australe* (Paris: PUF). (Chap. 13)

Isnard, H. (1966) *Le Maghreb* (Paris: PUF). (Chap. 13)

Ita, J. M. (1972) 'Frobeniu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JAH*, xiii, 4. (Chap. 1)

Jabavu, D. T. (1920) *The Black Problem*, papers and addresses on various native problems (Lovedale). (Chap. 6)

Jackson, J. G. (1820) *An Account of Timbuctoo and Hausa, Territories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London; reprinted 1967). (Chap. 6)

Jacquard, A. (1974) 'Distances généalogiques et distances génétiques', *CAEH*, pp. 11–124. (Chap. 10)

Janmart, J. (1953) 'The Kalahari sands of the Lunda (N-E Angola), their earlier redistribution and the Sangoan culture', *CD IPC*, 20. (Chap. 21)

Jason, H. (1959)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oral literature', *CA*, X, 5, pp. 413–26. (Chap. 7)

Jeffreys, M. D. W. (1963) 'How ancient is West African maize?', *Africa*, 33, pp. 115–31. (Chap. 24)

Johanson, D. C. and Coppens, Y. (1976) 'A preliminary anatomical diagnosis of the first Plio-Pleistocene hominid discoveries in the central Afar, Ethiopia', *AJPA*, 45, 2, pp. 217–34. (Chap. 17)

Johanson, D. C. and Taieb, M. (1976a) 'Pliocene hominid remains from Hadar, central Afar, Ethiopia', *Actes IX Congr. UISPP*, pp. 120–37. (Chap. 17)

Johanson, D. C. and Taieb, M. (1976b) 'Plio-Pleistocene hominid discoveries in Hadar, Ethiopia', *Nature*, 260, 5549, pp. 293–7. (Chap. 17)

Johnson, S. (1921) *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ritish Protectorate* (London: Routledge). (Chaps 3, 10)

Johnston, H. H. (1899, 1913) *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London). (Chap. 1)

Johnston, H. H. (1919–2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antu and Semi-Bantu Language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12)

Joire, J. (1947) 'Amas de coquillages du littoral sénégalais dans la banlieue de Saint-Louis', *BIFAN*, 9, pp. 170–340. (Chap. 24)

Jones, D. H. (1949)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Rhod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cl.)
Jones, D. H. (1958) 'Report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London o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Africa', *Africa*, 28, 1. (Concl.)
Jones, D. J. (1970) 'Problems of African chronology', *JAH*, XI, 2, pp. 161–76. (Chap. 7)
Joubert, G. and Vaufrey, R. (1941–6) 'Le néolithique du Ténéré', *L'Anthropologie*, 50, 3–4, pp. 325–30. (Chap. 23)
Journaux, A. (1976) *L'Afrique* (Coll. Hatier) (Chap. 14)
Julien, C. A. (1931)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Payot) rev. edn 1978. (Chap. 5)
Julien, C. A. (1944) *Histoire de l'Afrique* (Paris: PUF). (Gen. Introd.)
Julien, C. A. (1952) *L'Afrique du Nord en marche* (Paris: Julliard). (Gen. Introd., Chap. 3)
Junker, H. (1929–40)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Grabung der Akademie des Wissenschaften in Wien auf des neolitischen Siedlung von Merimde–Benisalame (Westdelta), in *Anzeiger des philosophist. Klasse des Akademie des Wissenschaften in Wien*, XCI XVIII, pp. 156–248; V–XII, pp. 21–82; I–IV, pp. 82–6, XVI–XVIII, pp. 53–97; X, pp. 118–32; I–IV, pp. 3–25. (Chaps 25, 28)

Kabore, V. (1962) 'Le caractère féodal du système politique mossi', *CEA*, pp. 609–23. (Concl.)
Kagame, A. (1969) *Introduction aux grands genres lyriques de l'ancien Rwanda* (Butar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Chap. 7)
Kagame, A. (1972) *Un abrégé de l'ethno-histoire du Rwanda* (Butar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Chap. 7)
Kaiser, W. (1977) 'Zur inneren Chronologie des Nagadakultur', *AG*, 6. (Chap. 28)
Kalk, P. (1972) 'Pour une localisation du Royaume de Gaoga', *JAH*, xiii, 4, pp. 529–48. (Gen. Introd.)
Kamal, Y. (1926–51)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 16 vols (Cairo/Leyden). (Chap. 5)
Kamara, C. M. (1970) 'La vie d'El-Hadji Omar', *BIFAN*, B, 32, pp. 370–411. (Chap. 3)
Kardiner, A. and Preble, E. (1966) *Introduction à l'ethnologie* (Paris: Gallimard).
Kees, H. (1961) *Ancient Egypt. A Cultural Topography* (London: Faber). (Chap. 28)
Keller, C. M. (1970) 'Montagu cave: a preliminary report', *Quaternaria*, XIII, pp. 187–204. (Chap. 20)
Kennedy, R. A. (1960) 'Necked and lugged axes in Nigeria', *Antiquity*, 34, pp. 54–8. (Chap. 24)
Kensdale, W. E. N. (1955–8) *A Catalogue of the Arabic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badan, Nigeria.* (Introd., Chaps 5, 6)
Kent, P. E. (1942) 'Pleistocene climates in Kenya and Abyssinia', *Nature*, 149, pp. 736–7. (Chap. 21)
Kent, R. K. (1970)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170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hap. 3)
Kesteloot, L. (1978) *Da Monzon de Ségou. Epopée Bambara*, 2 Vols (Paris: Nathan). (Concl.)
Khalatyanc, G. (1899) 'Armyanskiy pamyatnik XVII v.c. geografii Abissinii i Severnoy Afrike vounchsche' (A seventeenth century memoir on the geography of Ethiopia and North Africa in general), *Zemlevedeniye*, 1–2. (Chap. 6)
Khalil, F. (1963) 'La faune du continent africain: taxonomie, écologie et zoogéographie', *Enquête su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Paris: Unesco), pp. 285–325. (Chap. 13)
Khanykov, M. (1859) *Mélange asiatique* (St Petersburg). (Chap. 6)
Kilham, H. (1828) *Specimens of African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Colony of Sierra Leone* (London). (Chap. 12)
Kiwanuka, M. S. H. (1967)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oral tradition in the writing of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Africa', *Acta Africana*, VI, 1, pp. 63–74. (Chap. 4)
Ki-Zerbo, J. (1957) 'Histoire et conscience nègre', in *Présence africaine*, 16, pp. 53–69. (Introd.)
Ki-Zerbo, J. (1964) *Le Monde africaine noir,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Paris: Hatier). (Introd.)
Ki-Zerbo, J. (1969) 'La tradition orale en tant que source pour l'histoire africaine', *Diogène*, 67, pp. 127–42. (Introd.)
Ki-Zerbo, J. (1978)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2nd edn (Paris: Hatier). (Introd. Chaps 10, 13, 26)
Klein, R. G. (1970)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Stone Age of South Africa', *SAAB*, XXV, pp. 127–35. (Chap. 20)
Klein, R. G. (1972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July through September, 1970, excavations at Nelson Bay cave, Plettenberg Bay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Palaeoecology of Africa*, 6, pp. 117–208. (Chap. 20)
Klein, R. G. (1972b) 'The late Quaternary mammalian fauna of Nelson Bay cave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its implication for Negafaunal exti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changes', *Quaternary Research*, II, 2, pp. 135–42. (Chap. 20)
Koechlin, J. (1963) 'Le flore du continent africain; région du sud du Sahara', *Enquête su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Paris: Unesco), pp. 271–84. (Chap. 13)

Koelle, S. W. (1963) *Polyglotta Africana, or,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nearly 300 words and phrases in more than 100 distinct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Chaps 6, 10, 12)**

Kohler, O. (1955) *Geschichte des Enforschung des nilotischen Sprachen* (Berlin). **(Chap. 10)**

Kolb, P. (1719) *Vollständige Beschreibung des afrikanischen Vorgebirges der Guten Hoffnung* (Nuremberg). **(Chap. 6)**

Kolthoff, I. M., Sandell, E. B., Meehan, E. J. and Bruckenstein, S. (1969) *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4th edn (New York: Macmillan). **(Chap. 9)**

Kouyate, N. (1969–70) 'Recherches sur la tradition orale au Mali (Pays Manding)', Mém. de recherche non edité (Algeria: University of Algeria). **(Chap. 8)**

Kramers, H. (1938) 'L'Erythée décrite dans une source arabe du Xe siècle', *Atti* del xixe Congresso degli Orientalisti (Rome). **(Chap. 5)**

Krzyzaniak, L. (1972)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of excavations at Kadero, Sudan', *Trav. CAMAP*. **(Chap. 25)**

Krzyzaniak, L. (1977) 'Early farming cultures on the lower Nile', *Trav. CAMAP*, 21. **(Chap. 28)**

Kubbel, L. E. and Matveiev, V. V. (1960 and 1965) *Arabskie istochniki po etnografii i istorii Africi yuzhnee Sakhary (Sources arabes pour l'ethnographie et l'histoire des peuples d'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2 Vols (Moscow). **(Introd., Chaps 3, 5)**

Kukla, G. J. and Matthews, R. K. (1972) 'When will the present inter-glacial end?', *Science*, 178, pp. 190–1. **(Chap. 16)**

Kuptsov, A. (1955)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flora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UGS*, 87. **(Chap. 27)**

Labouret, H. (1946) *Histoire des Noirs d'Afrique* (Paris: Payot). **(Chap. 1)**

Lajoux, J. D. (1977) *Tassili N'Ajjer* (Paris: Chêne). **(Chap. 26)**

Lall, B. B. (1967) *Ind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to Nubia, 1962*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Chap. 25)**

Lamb, H. H. (1974) 'Remarks on the current climatic trend and its perspective', *WMO*, 421, pp. 473–7. **(Chap. 16)**

Lambert, N. (1970) 'Medinet Sbat et la protohistoire de Mauritanie occidentale', *AA*, 4, pp. 15–62. **(Chap. 24)**

Lambert, N. (1971) 'Les industries sur cuivre dans l'Ouest africain', *WAJA*, 1, pp. 9–21. **(Chap. 24)**

Lanfranchi, R. (1976) *Rapport des missions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pour l'année scolaire 1975–76* (Brazzavil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Brazzaville). **(Chap. 21)**

Laroui, A. (1970) *L'Histoire du Maghreb* (Paris: Maspero). **(Chap. 5)**

Lassort, A. 'L'écriture guerzée', *CR 1ère Conf. Afr. Ouest* (Dakar: IFAN). **(Introd.)**

Laude, J. (1966) *Les Art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Introd.)**

Lauer, J. P. and Debono, F. (1950) 'Technique du façonnage des croissants de silex utilisés dans l'enceinte de Zozer à Saqqarah', *ASAE*, Vol. I, pp. 2ff. **(Chap. 25)**

Law, R. C. C. (1967) 'Contacts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civilisations and West Africa in pre-Islamic times', *LNR*, 1, 1, pp. 52–62. **(Chap. 24)**

Law, R. C. C. (1971) 'The constitutional troubles of Oyo', *JAH*, XII, 1 **(Introd.)**

Lawson, A. C. (1927) *The Valley of the Nile* (Berkeley: Univ. California Press), 29, pp. 235–59. **(Gen. Introd., Chap. 16)**

Laya, D. (1972) *La Tradition orale: problématique et méthodologie des sources de l'histoire africaine* (Niamey: Centre régional de documentation pour la tradition orale). **(Chaps 7, 15)**

Leakey, L. S. B. (1949) 'Tentative study of the Pleistocene climatic changes and Stone Age culture sequence in north-eastern Angola', *CDAPC*, 4, 82pp **(Chap. 21)**

Leakey, L. S. B. (1950) 'The lower limits of the Pleistocene in Africa', *Report on the XVIIIth International Geology Congress, 1948* (London), 9, pp. 62–5. **(Chap. 24)**

Leakey, L. S. B. (1952) *Proceedings of the Panafrican Congress on Pre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Chap. 24)**

Leakey, L. S. B. (1965) *Olduvai Gorge, 1951–61: Fauna and Backgr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17)**

Leakey, L. S. B. (1968) 'Bone-smashing by a late Miocene hominid', *Nature*, **(Chap. 17)**

Leakey, L. S. B. (1970) *Stone Age Africa; An outline of prehistory in Africa*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y Press). **(Chap. 19)**

Leakey, L. S. B. (1971) *The Stone Age cultures of Kenya colony*, repr. (London: Cass). **(Chap. 19)**

Leakey, L. S. B. and M. D. *et al.* (1965–71) *Olduvai gorge*, Vols I–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e vols in preparation. **(Chaps 18, 19, 20)**

Leakey, L. S. B. and M. D. (1971) *Olduvai Gorge – Excavations in Beds I and II, 1960–19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17)**

Leakey, M. D. (1970) 'Early artefacts from the Koobi Fora area', *Nature*, 226, pp. 228-30. (Chaps 17, 24)
Leakey, M. D., Hay, R. L., Curtis, G. H., Drake, R. E., Jackes, M. K. and White, T. D. (1976) 'Fossil hominids from the Laetolil beds', *Nature*, 262, pp. 460-6. (Chap. 17)
Leakey, R. E. F. (1970) 'New hominid remains and early artefacts from northern Kenya', *Nature*, 226, pp. 223-4. (Chap. 17)
Leakey, R. E. F. (1971) 'Further evidence of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s from East Rudolf, North Kenya', *Nature*, 231, pp. 241-5. (Chap. 17)
Leakey, R. E. F. (1972) 'Further evidence of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s from East Rudolf, North Kenya, 1971', *Nature*, 237, pp. 264-9. (Chap. 17)
Leakey, R. E. F. (1973a) 'Evidence for an advanced Plio-Pleistocene hominid from East Rudolf, Kenya', *Nature*, 242, pp. 447-50. (Chaps 17, 24)
Leakey, R. E. F. (1973b) 'Further evidence of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s from East Rudolf, North Kenya, 1972', *Nature*, 242, pp. 170-3. (Chaps 17, 18)
Leakey, R. E. F. (1973c) 'Skull 1470', *Natural Geographic*, 143, pp. 818-29. (Chaps 17, 18)
Leakey, R. E. F. (1974) 'Further evidence of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s from East Rudolf, North Kenya, 1973', *Nature*, 248, pp. 653-6. (Chaps 17, 18)
Leakey, R. E. F., Butzer, K. W. and Day, M. H. (1969) 'Early *Homo sapiens* remains from the Omo river region of south-west Ethiopia', *Nature*, 222, 5199, pp. 1137-43. (Chap. 17)
Leakey, R. E. F. and Isaac, G. L. (1972) 'Hominid fossils from the area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photographs and a commentary on context', in S. L. Washburn and P. Dolhinow (eds), *Perspectives on Human Evolution*, Vol. 2 (San Francisco: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p. 129-40. (Chaps 17-18)
Leakey, R. E. F., Mungai, J. M. and Walker, A. C. (1971) 'New australopithecines from East Rudolf, Kenya', *AJPA*, 35, pp. 175-86. (Chap. 17)
Leakey, R. E. F., Mungai, J. M. and Walker, A. C. (1972) 'New australopithecines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I', *AJPA*, 36, pp. 235-51. (Chap. 17)
Leakey, R. E. F. and Walker, A. C. (1973) 'New australopithecines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II', *AJPA*, 39, pp. 205-22. (Chap. 17)
Leakey, R. E. F. and Wood, B. A. (1973) 'New evidence for the genus *Homo*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I', *AJPA*, 39, pp. 355-68. (Chap. 17)
Leakey, R. E. F. and Wood, B. A. (1974a) 'A hominid mandible from East Rudolf, Kenya', *AJPA*, 41, pp. 245-50. (Chap. 17)
Leakey, R. E. F. and Wood, B. A. (1974b) 'New evidence for the genus *Homo* from East Rudolf, Kenya, IV', *AJPA*, 41, pp. 237-44. (Chap. 17)
Lebeuf, J. P. (1956) 'La civilisation du Tchad', *Proc. III Intern. WAC*, pp. 293-6. (Chap. 24)
Lebeuf, J. P. (1962a) *Archéologie tchadienne; les Sao du Cameroun et du Tchad* (Paris: Hermann). (Chap. 24)
Lebeuf, J. P. (1962b) 'Caractères particuliers de 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n Afrique', *Revue de psychologie des peuples*. (Chap. 15)
Lebeuf, J. P. (1969a) 'Essai de chronologie sao',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234-41. (Chap. 24)
Lebeuf, J. P. (1969b) *Carte archeologique des abords du lac Tchad au 1/300 000* (Paris: CNRS). (Chap. 24)
Leclant, J. (1956) 'Le fer dans l'Égypte ancienne, le Soudan et l'Afrique', *Actes Coll. Intern. Fer.*, pp. 83-91. (Chap. 28)
Lee, D. N. and Woodhouse, H. C. (1970) *Art on the Rocks of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Purnell). (Chap. 26)
Lee, R. B. (1966) 'The !Kung Bushman subsistence: an input/output analysis', in D. Damas (ed.),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 Ecological Essays, Proc. Conf. Cult. Ecol.*, Ottawa 1966 (published Ottawa 1969), p. 230. (Chap. 27)
Lee, R. B. (ed.) (1968)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Chap. 19)
Lefebvre, G. (1949) *Romans et contes égyptiens de l'époque pharaonique* (Paris). (Chap. 28)
Lefebvre, H.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Chap. 15)
Le Gros-Clark, W. E. (1972) *The Fossil Evidence for Human Evolution*,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18)
Leiris, M. and Delange, J. (1967) *Afrique noire, la creation plastique* (Paris: Gallimard). (Introd.)
Lenz, O. (1884) *Timbuktu*, 2 Vols (Leipzig: Brockhaus). (Chap. 23)
Leo Africanus (1956)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tr. A. Épaulard (Paris). (Chap. 1)
Lepsius, C. R. (1863) *Standard Alphabet for Reducing Unwritten Languages and Foreign Graphic Systems to a Uniform Orthography in European Letter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Chap. 12)

Lepsius, C. R. (1880) *Nubische Grammatik mit einer Einleitung über die Völker und Sprachen Afrika's* (Berlin: Hertz). **(Chaps 10, 12)**
Leroi-Gourhan, A. (1943) *L'Homme et la matière, Evolution et Techniques, Vol. 1* (Paris: Albin Michel). (Concl.)
Leroi-Gourhan, A. (1945) *Milieu et technique, Evolution et Techniques, Vol. 2* (Paris: Albin Michel). (Concl.)
Leroi-Gourhan, A. (1969)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Concl.)
Leroi-Gourhan, A. (1974) 'Analyses polliniques, préhistoire et variations climatiques quaternaires' – in 'Les méthodes quantitatives d'étude des variations du climat au cours du Pleistocène', *Coll. CNRS*, 219, pp. 61–6.
Leroy, P. (1953) 'La préhistoire à Brazzaville et dans le Moyen Congo', *Liaison*, 31, pp. 39–43. **(Chap. 21)**
Leslau, W. (1949) 'Revue d'essai comparatif sur le vocabulaire et la phonétique du chamito-sémitique', *LG*, 25. **(Chap. 10)**
Leslau, W. (196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Harari*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11)**
Le Tourneau, R. (1954) 'Les archives musulmanes en Afrique du Nord', *Archivum*, 4. **(Chap. 6)**
Le Vaillant, F. (1790) *Travel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London: W. Lane). **(Chap. 6)**
Lévi-Provençal, E. (1922) *Les historiens des Chorfa.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et Biographique au Maroc du 16e au 20e Siècle* (Paris). **(Chap. 6)**
Lévi-Provençal, E. (1954) *Arabica*. **(Chaps 5, 10, 12)**
Levtzion, N. (1968) 'Ibn-Hawqual, the Cheque and Awdaghost', *JAH*, 9, 2, pp. 223–33. **(Chap. 24)**
Levtzion, N. (1968)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Oxford). **(Chap. 1)**
Levtzion, N. (1971)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western Sudan to 15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 (London: Longman), pp. 120–37. **(Chap. 24)**
Lewicki, T. (1961) *Les Historiens biographes et traditionalistes des Ibadites*, Folia orientalia, 3 (Krakow). **(Chap. 6)**
Lewicki, T. (1969) *Arabic extern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Africa to the south of the Sahara* (Warsaw, Krakow, Wroclaw). **(Chap. 5)**
Lewicki, T. (1971) 'The Ibâdites in Arabia and Africa', *CHM*, XII, 1, pp. 51–130. **(Chap. 5)**
Lewicki, T. (1971) *Perspectives nouvelles sur l'histoire africaine*. A report of Dar-es-Salaam congress. **(Chap. 5)**
Lewin, S. Z. (1968) 'The conservation of limestone objects and structures', *Study of Weathering of Stones*, ICOMOS (Paris), pp. 41–50. **(Chap. 9)**
Lhote, H. (1958) *The Search for the Tassili frescoes*, trans. A. H. Porodrick (London: Hutchinson). **(Chap. 23)**
Lhote, H. (1966) 'La route des chars de guerre libyens, Tripoli-Gao', *Archéologia*, 9, pp. 28–35. **(Chap. 24)**
Lhote, H. (1970) 'Les gravures rupestres du Sud Oranais', *MCRAPE*, XVI, 208pp. **(Chap. 22)**
Lhote, H. (1976) *Vers d'autres Tassili: nouvelles découvertes au Sahara* (Paris: Arthaud). **(Chap. 26)**
Lhote, H. and Kelley, H. (1936) 'Gisement acheuléen de l'Erg d'Admer (Tassili des Ajjers)', *JSA*, 6, pp. 217–26. **(Chap. 23)**
Libby, W. F. (1955) *Radiocarbon Dating*,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9, 28)**
Libby, W. F. (1970) 'Radiocarbon dating', *Phil. Trans. Roy. Soc.*, Vol. A, 269, no. 1193, pp. 1–10.
Libra, L. (1963) 'I Cinesi e l'Africa orientale', *Africa*, 18. **(Chap. 5)**
Lichtenstein, H. (1811) *Reisen in südlichen Afrika, in den jahren 1803, 1804, 1805 und 1806*, 2 Vols (Berlin: Salfeld). **(Chaps 6, 12)**
Linares de Sapir, O. (1971) 'Shell Middens of Lower Casamance and problems of Diola protohistory', *WAJA*, 1, pp. 23–54. **(Chap. 24)**
Linington, R. E. (1970) 'Techniques used in archaeological field surveys', *Phil. Trans. Roy. Soc.*, Vol. A, 269, no. 1193, pp. 89–108. **(Chap. 9)**
Livingstone, D. (1957)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Murray). **(Chap. 6)**
Livingstone, D. A. (1967) *Postglacial Vegetation of the Ruwenzori Mountains in Equatorial Africa* (Durham, NC). **(Chap. 16)**
Livingstone, F. B. (1958)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sickle cell gene distribution in West Africa', *AA*, 60, 3, pp. 533–62. **(Chap. 24)**
Lo, A. (1934) *Bindoum Cholofol ti arab toubab* (St Louis). **(Chap. 10)**
Lods, A. (1950) *Les Prophètes d'Israël et les débuts du Judaïsme* (Paris). **(Chap. 5)**
Lofgren, O. (1936–50) *Arabische Texte zur Kenntnis der Stadt Aden im Mittelalter*, 3 vols (Leipzig-Uppsala). **(Chap. 6)**

Lombard, J. (1935)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Quaternaire de l'Afrique tropicale équatoriale', *JSA*, V, pp. 175–80. **(Chap. 21)**

Lovejoy, P. E. (1979) *Indigenous African Slavery*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Ontario)

Lucas, A. (1962)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4th edn,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J. R. Harris (London: Arnold) **(Chaps 9, 28)**

Lucas, Sir C. P. (1887–1923)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15 Vols. **(Chap. 1)**

Lucas, J. O. (1938) 'Der hamitische Gehalt der Tschadchamistischen Sprachen', *ZES*, 28, pp. 286–99. **(Chap. 12)**

Lucas, J. O. (1948) *The Religion of the Yorubas in Relation to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Lagos: CMS Bookshop). **(Chap. 24)**

Lucas, S. A. (1967) *L'Etat traditionnel luba*, pt. 2: *Mythe et structure politique luba – Problèmes sociaux Congolais* (Kinshasa). **(Chap. 7)**

Ludolf, H. (1681) *Historia Aethiopica* (Frankfurt). **(Chap. 16)**

Lukas, J. (1936) 'The linguistic situation in the Lake Chad area of central Africa', *Africa*, 9, pp. 332–49. **(Chap. 10)**

Lynch, H. R. (1967) *Edward Wilmot Blyden: Pan-Negro Patriot, 1832–191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Macaulay, T. B. (1971) '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 of February 2, 1835', in P. D. Curtin (ed.),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Chap. 3)**

McBurney, C. B. M. (1967) *The Haua Fteah (Cyrenaica) and the Stone Age of South East Mediterran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4)**

McBurney, C. B. M. and Hey, R. W. (1955) *Prehistory and Pleistocene Geology in Cyrenaica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McCall, D. F. (1964) *Africa in Time-Perspective*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15)**

MacGaffey, W. (1974) 'Oral tradition in central Africa', *IJAHS*, VII, pp. 417–26. **(Chap. 8)**

MacGregor, J. K. (1909) 'Some notes on Nsibidi', *JRAI*, 39, pp. 215, 217, 219. **(Chap. 10)**

McIntyre, A *et al.* (1974) 'The Climap 1700 years BP North Atlantic map', *CLIMAP*, pp. 41–7.

McIntyre, A. *et al.* (1975) 'Thermal and oceanic structures of the Atlantic through a glacial – interglacial cycle', *Proceedings of the WMO/IAMAP Symposium on long-term climatic fluctuations, Norwich*, no. 421, pp. 75–80.

MacMichael H. A. (1922) *A History of the Arabs in the Sudan*, Vol. II (Cambridge). **(Chap. 6)**

MacNeish, R. S. (1964) 'Ancient mesoamerican civilisation', *Science*, 143. **(Chap. 27)**

Maes, E. (1924) 'Notes sur les pierres taillées de Tundidarou', *BCEHS*, pp. 31–8. **(Chap. 24)**

Mahabava, J. (1922) *The Colour Bar in South Africa* (Lovedale). **(Chap. 6)**

Maitre, J. P. (1971) 'Contribution à la préhistoire de l'Ahaggar. I, Tefedest central', *MCRAPE*, XVII. **(Chap. 23)**

Malcolm X (1967) *On Afro-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Merit Publishers). **(Introd.)**

Maley, J. (1973) 'Mécanisme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aux basses latitudes', *PPP*, 14, pp. 193–227. **(Chap. 16)**

Mallams, Hassan, Shuaibu (1952) *A Chronicle of Abuja*, trs. F. L. Heath (Ibadan). **(Chap. 6)**

Malowist, M. (1969) *Europa i Afryka Zachodnia w dobie wczesnej ekspansji kolonialnej*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Introd.)**

Manessy, G. (1971) 'Les langues Gurma', *BIFAN*. **(Chap. 11)**

Manso, P. (1877) *Historia da Congo, Documentos* (Lisbon). **(Chap. 6)**

Mantran, R. (1964) *Inventaire des documents turcs du Dar-el-Bey, Tunis.* (Paris: PUF). **(Chap. 6)**

Maquet, J. J. (1961) 'Une hypothèse pour l'étude des féodalités africaines', *CEA*, 6, 11, pp. 292–314. **(Chap. 15)**

Maquet, J. J. (1970) *Pouvoir et société en Afrique* (Paris: Hachette). **(Concl.)**

Maret, P. de (1977a) 'Premières datations pour les haches polies associées à la céramique au Bas-Zaïre', *Actes IX Congr. UISPP.*

Maret, P. de (1977b) 'Bribes, débris et bricolage', *Coll. CNRS, L'expansion Bantu* **(Chap. 21)**

Maret, P. de, Noten, F. van and Cahen, D. (1977) 'Radiocarbon dates from central Africa: a synthesis', *JAH*, XXVIII, 4. **(Chap. 21)**

Marin, P. (1972) 'Classification formelle automatique et industries lithiques. Interpretation des hachereaux de la Kanoa', *AMRAC*, 76. **(Chap. 21)**

Marin, P and Moeyersons, J. (1977) 'Subsurface movements of stone artefac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Nature*, 256, pp. 812–5. **(Chap. 21)**

Marin, P. and Mortelmans, G. (1973) 'Un site tshitolien sur le plateau des Bateke (Republique de Zaïre)', *AMRAC*, 81. **(Chap. 21)**
Marliac, A. (1973) 'Prospection archéologique au Cameroun', *CORSTOM*, X, pp. 47–114. **(Chap. 21)**
Marrou, H. L. (1954)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Paris: Seuil). **(Introd., Chaps 5, 6)**
Martin, B. G. (1969). 'Kanem, Bornu and the Fazza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trade route', *JAH*, 1, pp. 15–27. **(Introd.)**
Martin, B. G. (1969) 'Mai Idris of Bornu and the Ottoman Turks, 1576–8', in S. M. Stein (ed), *Documents from Islamic Chanceries, Series 2* (Oxford). **(Chaps 5, 6)**
Martin, D. and Yannopoulos, T. (1973) *Guide de recherches – l'Afrique noire* (Paris: Colin). **(Chap. 15)**
Martin del Molino, A. (1963) 'Secuencia cultural en el Neolitico de Fernando Poo', *Trabajoz de prehistoria, seminaria de historia primitiva, del hombre de la universidad de Madrid*, XVII. **(Chaps 21, 24)**
Martins, R. (1976) 'A estação arqueológica da antiga Banza Quibaxe', *Contribucoes para o estudo da anthropologia portuguese* (Coimbra), IX, 4, pp. 242–306. **(Chap. 21)**
Marty, P. (1927) *Les chroniques de Oualata et de Nema* (Paris: Geuthner). **(Chap. 6)**
Marx, K. (1972)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Concl.)**
Marx, K. and Engels, F. (1952) *Formen* (Berlin: Dietz). **(Concl.)**
Marx, K. and Engels, F. (1968) *L'Idéologie allemand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Concl.)**
Masatoshi, N. and Roy Coudhury, A. R. (1974)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races of man', *AJHG*, 26, 421. **(Chap. 11)**
Mas-Latrie, L. (1866)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et documents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 d'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âge; Supplément, 1872 (Paris). **(Chap. 5)**
Mason, R. J. (1962) *Prehistory of the Transvaal*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0)**
Massaquoi, M. (1911) 'The Vai people and their syllabic writing', *JAS*, pp. 10–40. **(Introd.)**
Massoulard, E. (1949)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 d'Egypte', *TMIE*, 111. **(Chap. 28)**
Mateus, A. de (1952) 'Nota preliminar acerca da estação prehistórica de Nhampasseré', *CRCIAO*, IV, pp. 375–86. **(Chap. 24)**
Mauny, R. (1947) 'Une route préhistorique à travers le Sahara', *BIFAN*, 9, pp. 341–57. **(Chap. 24)**
Mauny, R. (1947) 'L'ouest africain chez ptolémée', *Actes de la IIé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Africanistes de l'ouest, Bissau*. **(Chap. 5)**
Mauny, R. (1951) 'Un âge de cuivre au Sahara Occidental?', *BIFAN*, 13, 1, pp. 168–80. **(Chap. 24)**
Mauny, R. (1952a) 'Essai sur l'histoire des métaux en Afrique occidentale', *BIFAN*, 14, pp. 545–95. **(Chap. 24)**
Mauny, R. (1952b) *Glossaire des expressions et termes locaux employés dans l'Ouest africain* (Dakar: IFAN). **(Chap. 10)**
Mauny, R. (1955a)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Paléolithique de Mauritanie', *Actes II Congr. PPEQ*, pp. 461–79. **(Chap. 24)**
Mauny, R. (1955b) 'Les gisements Néolithiques de Karkarichinkat', *Actes II Congr. PPEQ*, pp. 616–19. **(Chap. 24)**
Mauny, R. (1957) 'Buttes artificielles de coquillages de Joal-Fadioute', *NA*, 7, 75, pp. 73–8. **(Chap. 24)**
Mauny, R. (1960) 'Reviews of Cheikh Anta Diop's "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 and "L'Afrique noire précoloniale"', *BIFAN*, B, 22, pp. 544–5. **(Chap. 24)**
Mauny, R. (1961) *Tableau géographiqu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Age, d'après les sources écrites, la tradition orale et l'archéologie* (Dakar: IFAN). **(Chaps 5, 24, 25, 26)**
Mauny, R. (1963) 'Contribution à la préhistoire et la protohistoire de la région de Kédougou (Sénégal oriental)', *BSA*, 5, 11, pp. 113–22. **(Chap. 24)**
Mauny, R. (1965) 'Les problèmes d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 X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Vienna, II: *Rapports*, Histoire des Continents. **(Chap. 5)**
Mauny, R. (1968) 'Commentaires sur "West Af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par Oliver Davies', *BIFAN*, B, 30, pp. 1283–4. **(Chap. 24)**
Mauny, R. (1970) 'Le périple d'Hannon, un faux célèbre concernant les navigations antiques', *Archéologia*, 37, pp. 78–80. **(Chap. 24)**
Mauny, R. (1971a) *Les Siècles obscur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ayard). **(Chaps 5, 24)**
Mauny, R. (1971b) 'The Western Sudan', in P. L. Shinnie (ed.)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66–87. **(Chap. 24)**
Mauny, R. (1973) 'Datation au carbonne 14 d'amas de coquillages des lagunes de Basse Côte d'Ivoire', *WAJA*, 3, pp. 207–14. **(Chap. 24)**
Mauny, R. and Hallemans, J. (1957)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 de la région d'Akjoujt (Mauritanie)', *Acts III PCPQS*, pp. 248–61. **(Chap. 24)**

Mazrui, A. A. (1969) 'European exploration and Africa's self discovery', *JMAS*, 7, 4. (Chap. 6)
Mazrui. S. A. (1944) *Tarikh al-Mazari.* Arabic MS. in photostat in the possession of G. S. P. Freeman-Grenville. (Gen. Introd., Chaps 5, 6)
Mbiti, J. (1967) 'Afrikaanse begrippen van tijd, geschiedenis en de dood', *Africa*, 21, 3, pp. 78–85. (Chap. 7)
Meek, C. K. (1931) *Tribal Studies in North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Paul, Trench, Trubner). (Chap. 10)
Meillassoux, C. (1972) 'L'itinéraire d'Ibn Battuta de Walata à Mali', *JAH*, 13, 3, pp. 389–95. (Chap. 24)
Meillassoux, C. (ed.) (1975)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Maspero); 17 studies. (Concl.)
Meillassoux, C. (1975) *Femmes, greniers et capitaux* (Paris: Maspero)
Meillassoux, C. (1977) *Terrains et théories* (Paris: Anthropos)
Meinhof, C. (1904) *Linguistische Studien in Ost Africa* (Berlin: MSOS). (Chap. 10)
Meinhof, C. (1906) *Grundzüge ein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Bantusprachen* (Berlin: Reimer). (Chap. 10)
Meinhof, C. (1912) *Die Sprachen der Hamiten* (Hamburg: Friederichsen). (Chaps 10, 12, 19)
Meinhof, C. (1919–20) 'Afrikanische Wörtezin Orientalischer Litteratur', *ZES*, 10, pp. 147–52. (Chap. 12)
Meinhof, C. (193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onolog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Berlin. Reimer). (Gen. Introd., Chap. 10)
Meknasi, A. (1953) *Sources et bibliographies d'histoire marocaine du XVI[e] à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Rabat). (Chap. 6)
Menghin, O. and Amer, M. (1932 and 1936) *The Excavations of the Egyptian University in the Neolithic site at Maadi. First and 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s* (Cairo: Misr-Sokkar and Government Press). (Chap. 25)
Mercier, P. (1966) *Histoire de l'anthropologie* (Paris: PUF). (Gen. Introd.)
Merivale, H. (1861)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Longman). (Chap. 1)
Metcalfe, G. E. (1964)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London: Nelson). (Chap. 6)
Michael, H. N. and Ralph, E. K. (1970) 'Correction factors applied to Egyptian radiocarbon dates from the era before Christ', *Nobell Symposium 12*, pp. 109–20. (Chap. 9)
Migeod, F. W. (1911) *The 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London: Paul, Trench, Trubner). (Chap. 10)
Miller, J. C. (1976)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8)
Miller, S. (1972) 'A new look at the Tshitolian', *Africa-Tervuren*, XVIII, 3–4, pp. 86–9. (Chap. 21)
Minette de Saint Martin (1914) 'Note sur une collection préhistorique saharienne', *RA*. (Chap. 23)
Miquel, A. (1976) *La Géographie humaine du monde musulman jusqu'au milieu du 11e siècle*, 2 Vols (Paris/The Hague: Mouton/De Gruyter). (Chap. 5)
Mischlish, A. and Lippert, J. (1903)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Haussastaaten* (Berlin: MSOS). (Gen. Introd., Chaps 5, 6)
Moeyersons, J. (1975) 'Evolution paléogéographique du site de la Kamon', *AMRAC*, 84, pp. 18–46. (Chap. 21)
Moeyersons, J. (1977) 'The behaviour of stones and stone implements buried in consolidating and creeping Kalahari sands',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Leeds). (Chap. 21)
Moffat, R. (1842) *Missionary Labours and Scen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Snow). (Chap. 6)
Moffat, R. (1945) *The Matabele Journals of Robert Moffat, 1829–1860*, ed. J. P. R. Wallis (London: Chatto & Windus). (Chap. 6)
Mohammadou, A. and E. (1971) 'Un nouveau manuscrit arabe sur l'histoire du Mandara', *Revue camerounaise d'histoire*, 1 (October), pp. 130–55.
Mokhtar, H. and Heymowski, A. (1965–6) *Catalogue provisoire des manuscrits mauritaniens en langue arabe préservés en Mauritanie* (Nouakchott/Stockholm). (Gen. Introd., Chaps 5, 6)
Molema, S. M. (1920) *The Bantu, past and present* (Edinburgh: Green). (Chap. 6)
Moniot, H. (1962) 'Pour une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Annales*. (Chap. 15)
Moniot, H. (1965) 'Les sources orales dans le problème d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jusqu'à la colonisation européene', *Rap. 12e CISH*, II, pp. 198–208. (Chap. 15)
Monod, T. (1932) 'L'Adrar Ahnet.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n district saharien', *TMIE*, 19. (Chap. 23)
Monod, T. (1932)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archéologique d'un district Saharien* (Paris: Larose). (Concl.)
Monod, T. (1945) 'La structure du Sahara atlantique', *Trav. IRS*, 3, pp. 27–55. (Chap. 23)
Monod, T. (1951) 'Peintures rupestres du Zemmour français au Sahara occidental'. *BIFAN*, 1.

Monod, T. (1957) 'Découverte de nouveaux instruments en os dans l'Ouest africain', *Acts III PCPQS*, pp. 242–7. **(Chap. 24)**

Monod, T. (1958) 'Majâbât al-Koubrâ. Contribution à l'etude de "l'empty quarter" ouest saharien', *Mem. IFAN*, 52. **(Chap. 23, Concl.)**

Monod, T. (1961) 'The late Tertiary and Pleistocene in the Sahara and adjacent southerly reg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primate and human distribution', *Symposium, 15, 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Chap. 23)**

Monod, T. (1963) 'The late Tertiary and Pleistocene in the Sahara and adjacent southerly regions', in F. C. Howell and F. Bourlière (eds), *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Chaps 16, 23)**

Monod, T. (1969) 'Le "Maeden Ijafen": une épave caravanière ancienne dans la Mâjâbat al-Koubrâ',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286–320. **(Chap. 24)**

Monod, T. and Mauny, R. (1957) 'Découverte de nouveaux instruments en os dans l'Ouest africain', *Acts III PCPQS*. **(Chap. 24)**

Montagu, M. F. A. (1952) *Man's Most Dangerous Myth – The Fallacy of Race* (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Monteil, C. (1929) 'Les empires du Mali', *BCEHS*, 12, pp. 291–447. **(Chap. 1)**

Monteil, V. (1965) 'Les manuscrits historiques arabo-africains', *BIFAN*, B, XXXVII. **(Gen. Introd., Chap. 6)**

Montfrans, H. M. Van (1971) *Palaeomagnetic Dating in the North Sea Basin* (Rotterdam: Prince NV). **(Chap. 16)**

Moodie, D. (ed.) (1960)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Amsterdam: Balkema). **(Chap. 6)**

Moorsel, H. van (1959) *Esquisse préhistorique de Léopoldville* (Léopoldville: Musée de la vie indigène). **(Concl.)**

Moorsel, H. van (1968) *Atlas de préhistoire de la plaine de Kinshasa* (Kinshasa: Publications université Lovanium). **(Chap. 21)**

More, B. (1969) 'Contribution du Libéria à la science de la communication par écrit', *Symposium du festival panafricain d'Alger*. **(Introd.)**

Moreau, R. E. (1963) 'Vicissitudes of the African Biomas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41, pp. 395–421. **(Chap. 24)**

Morel, J. (1953) 'Le capsien du Kahnguet el Mouhaâd', *Libyca*, 1, pp. 103–19. **(Chap. 22)**

Moreno, M. (1940) *Manuale di Sidamo* (Rome: Mondadori). **(Chap. 10)**

Moret, A. (1931) *Histoire de l'Orient*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nd edn. 1950. **(Concl.)**

Morgan, E. (1973) *La Fin du Surmâle* (Paris: Calmann-Lévy), trans. G. Fradier, *The Descent of Woma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London: Souvenir Press) **(Concl.)**

Morgan, W. B. and Pugh, J. C. (1969) *West Africa* (London: Methuen). **(Chap. 14)**

Mori, F. (1965) *Tadrart Acacus: Arte rupestre e culture del Sahara preistorico* (Turin: Einaudi). **(Chaps 23, 24)**

Moritz, B. (1892) *Sammlung arabischer Schriftstücke aus Zanzibar und Oman, mit einem Glossar* (Stuttgart: Spemann). **(Gen. Introd., Chaps 5, 6)**

Morner, N. A. (1973) 'Climatic changes during the last 35,000 years as indicated by land, sea, and air data', *Boreas*, 2, pp. 33–53. **(Chap. 16)**

Morner, N. A. (1975) 'Eustatic amplitude variations and world glacial changes', *Geology*, 3, pp. 109–10. **(Chap. 16)**

Morrison, R. B. and Wright, H. E. J. (eds) (1968) 'Means of correlation of Quaternary successions', *Proc. VII Congr. INQUA*, 8. **(Chap. 16)**

Mortelmans, G. (1952a) 'Les dessins rupestres gravés, ponctués et peints du Katanga, Essai de synthese', *AMRCB*, pp. 33–55.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2b)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cultures pre-Abbevilliennes à galets taillés du Katanga: le site Mulundwa 1* (Brussels: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anthropologie et de préhistoire).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2c) 'Les industries à galets taillés (Pebble Culture) du Katanga', *Actes II Congr. PPEQ*, pp. 295–8.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3a) 'La Pebble Culture africaine, source des civilisations de la pierre', *BSRBAP*, LXV.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3b) 'Vue d'ensemble sur le Quaternaire du bassin du Congo', *Actes III Congr. UISPP*, pp. 114–26.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7a) 'Le Cennozoique du Congo Belge', *Acts III PCPQS*, pp. 23–50.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7b) *La préhistoire du Congo Belge* (Brussels: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7c) 'The early Pebble Culture of Katanga', *Acts III PCPQS*, pp. 214–16. **(Chap. 21)**

Mortelmans, G. (1959)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 du Bas-Congo Belge, une esquisse', *Volume de Homenagem ao Prof. Doutor Mendes Corrêa* (Porto: Sociedade Portuguesa Anthropologia e Ethnologia), pp. 329–44. **(Chap. 21)**

Mortelmans, G. (1962) 'Vue d'ensemble sur la préhistoire du Congo occidental', *Actes IV Congr. PPEQ*, pp. 129–64. **(Chap. 21)**

Mortelmans, G. and Monteyne, R. (1962) 'Le Quaternaire du Congo occidental et sa chronologie', *Actes IV Congr. PPEQ*, pp. 97–132. **(Chap. 21)**

Moscati, S.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Semitic Langua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Chap. 10)**

Mukarovsky, H. G. (1966) 'Ueber die Stellung der Mandesprachen', *Anthropos*, 61, pp. 679–88. **(Chap. 12)**

Muller, D. K. (192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rn Hottentotenmission 1737–1744* (Herrnhut). **(Chap. 6)**

Muller, F. (1853) *Geographi Graeci Minores* (Paris). **(Chap. 5)**

Muller, F. (1863) *Die Musik-sprache in Zentral Africa* (Vienna). **(Chap. 10)**

Muller, F. (1867) *Reise der österreichischen Fregate 'Novara' um die Erde in den Jahren 1857, 1858, 1859. Linguistischer Teil* (Vienna: Staatsdruckerei). **(Chap. 12)**

Muller, F. (1876–84) *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4 Vols (Vienna: Hölder). **(Chap. 12)**

Munson, P. J. (1968)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Dhar Tichitt region of south-central Mauretania', *WAAN*, 10, pp. 6–13. **(Chaps 23, 24)**

Munson, P. J. (1970)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al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Tichitt Tradition"', *WAAN*, 12, pp. 47–8. **(Chap. 24)**

Murdock, G. P. (1959)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Introd., Chaps 3, 10, 12)**

Murray, G. W. (1920) 'The Nilotic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essay', *JRAI*. **(Chap. 10)**

al-Murshidi, Hamid bin Al-Hasan b. Hamid Bá Fajin (1937) *A History of the Walis of Lamu* (Arabic text with draft trans.). **(Gen. Introd., Chaps 5, 6)**

Muzur, A. and Nosek, E. (1974) 'Metal examination of iron objects from Niani', *AATA*, 11, 1. **(Chap. 9)**

Myint Hla, U. (1964) *The Econom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Hutchinson). **(Chap. 3)**

Nachtigal, G. (1879–89) *Sahara und Sudan* (Berlin, Leipzig). **(Chap. 1)**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C (1975) 'Understanding climatic change. A program for action',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for the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Program* (Washington). **(Chap. 16)**

Nei Masatoshi and Roy Coudhury, A. R. (1974)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races of man', *AJHG*, 26. **(Chaps 10, 11)**

Nenquin, J. (n.d.) *Inventaria archaeologica africana* (Belgium: Tervuren). **(Concl.)**

Nenquin, J. (1957–8) 'Opgravingen te Sanga' (Fouilles à Sanga), *Gentse Bijdragen tot de Kunstgeschiedenis en de Oudheidkunde*, XVIII, pp. 289–311. **(Chap. 21)**

Nenquin, J. (1963) *Excavations at Sanga, 1957: The Protohistoric Necropolis* (Belgium: Tervuren). **(Chap. 21)**

Nenquin, J. (1967)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Rwanda and Burundi', *AMRAC*, 59. **(Chaps 19, 21)**

Newbury, C. W. (1965)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 Documents, 1786–187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Newbury, P. E. (1899) *The Amherst Papyri* (London). **(Chap. 5)**

Newman, P. and Ma, R. (1966) 'Comparative Chadic: phonology and lexicon', *JAL*, 5, 3, pp. 218–51. **(Chaps 10, 12)**

Newton, A. P. (1922–3) 'Africa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J. Afr. Soc.*, 22 **(Chap. 1)**

Niane, D. T. (1960a) 'Recherches sur l'Empire du Mali', *Etudes africaines* (Conakry). **(Chap. 7)**

Niane, D. T. (1960b) *Soundjata; ou, L'épopée mandingu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s 3, 7)**

Niane, D. T. (1970) 'Notes sur les fouilles de Niani, ancienne capitale du Mali', *WAAN*, 12, pp. 43–6. **(Chap. 24)**

Nielsen, O. V. (1970) *Human Remains: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Vol. 9 (Stockholm: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Chap. 28)**

Nilsson, E. (1931) 'Quaternary glaciations and pluvial lakes, in British East Africa', *GA*, 13, pp. 249–349. **(Chap. 16)**

Nilsson, E. (1940) 'Ancient changes of climate in British East Africa and Abyssinia: a study of ancient lakes and glaciers', *GA*, XXII, 1–2, pp. 1–79. (Chaps 16, 21)
Nilsson, E. (1949) 'The pluvials of East Africa: an attempt to correlate pleistocene changes of climate', *GA*, XXXI, 1–4, pp. 204–11. (Chap. 21)
Nilsson, E. (1952) 'Pleistocene climatic changes in East Africa', *Proc. II PCPQS*, pp. 45–55. (Chap. 24)
Nketia, J. H. (1975) *History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Music in West Africa* (Legon: University of Ghana,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Gen. Introd.)
Nordström, H. A. (1972) *Neolithic and A-group sites: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Vol. 3 (Uppsala: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Chaps 25, 28)
Norris, E. (1841) *Outline of a Vocabulary of a Few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s of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London: Parker). (Chap. 12)
Norris, T. H. (1968) *Shinqiti Folk Literature and Songs* (Oxford). (Chap. 6)
Noten, F. van (1968a) 'Note sur l'âge de la pierre récente dans la région des lacs Mokoto (Kivu, Congo)', *BSRBAP*, 79, pp. 91–101. (Chap. 21)
Noten, F. van (1968b) *The Uelian. A culture with a neolithic aspect, Uele-Basin (N.E. Congo Republic)*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Chap. 21)
Noten, F. van (1969) 'A ground axe from Burundi', *Azania*, IV, p. 166. (Chap. 21)
Noten, F. van (1971) 'Excavation at Nunuama cave', *Antiquity*, XLV, 177, pp. 56–8. (Chap. 21)
Noten, F. van (1973) 'Mystificatie en archeologie in Noord-Zaïre (Mystification et Archéologie au N. Zaïre)' *Africa-Tervuren*, XIX, 4, pp. 97–102. (Chap. 21)
Noten, F. van and E. (1974) 'Het IJzersmelten bij de Madi (La fonte du fer chez les Madi)', *Africa-Tervuren*, XX, 3–4, pp. 57–66. (Chap. 21)
Noten, F. van (1977) 'Excavations at Matupi cave', *Antiquity*, LI, 201, pp. 35–40. (Chap. 21)
Noten, F. van (1978)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interlacustrine region', *JAH*, XIX, 1 (Chap. 21)
Noten, F. van, Cahen, D., Maret, J. de, Moeyersons, J. and Roche, E. (in press) *The Archaeology of Central Africa*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Chap. 21)
Noten, F. van and Hiernaux, J. (1967) 'The Late Stone Age industry of Mukinanira, Rwanda', *SAAB*, 22, IV, pp. 151–4. (Chap. 21)

Oakley, K. P. (1961) *Man the Tool-maker*, 5th edn, British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hap. 19)
Obenga, T. (1970) 'Méthodologie en histoire africaine: sources locales', *Africa*, XXV. (Gen. Introd.)
Obenga, T. (1973) *L'Afrique dans l'antiquité – Egypte Pharaonique – Afrique noir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10)
O'Brien, T. P. (1939) *The Prehistory of Uganda Protector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1)
Olabiyal, J. (1968) *Remarques sur l'état actuel des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au Dahomey*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10)
Olderogge, D. (1966) 'Ecritures méconnues de l'Afrique noire', *Le Courrier* (Unesco). (Chap. 10)
Olderogge, D. (1971) 'Astrakhanec v Tombuktu v 1821g' (A man from Astrakhan in Timbuktu in 1821), *Afrikana/Afrikanskiy etnograficheskiy sbornik*, VII (Leningrad). (Chap. 6)
Olderogge, D. and Potekin, I (1954) *Les Peuples de l'Afrique* (Moscow). (Gen. Introd.)
Oliver, R. (1966) 'The problem of the Bantu expansion', *JAH*, 7, 3. (Chap. 12)
Oliver, R. (1973)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1963–1973', *Proc. III Intern. WAC* (unpublished paper). (Chap. 3)
Olsson, I. U. (1973) 'The radiocarbon dating of Ivory Coast shell mounds', *WAJA*, 3, pp. 215–20. (Chap. 24)
Onde, H. (1963) 'La géographie régionale et le monde africain', *Genève-Afrique*, II, 2, pp. 149–62. (Chap. 4)
Organ, R. M. (1968) *Design for Scientific Con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London: Butterworth). (Chap. 9)
Orhonlu, C. (1972) 'Turkish archival sources about Ethiopia', *Proc. 4th ICES*. (Gen. Introd., Chaps 5, 6)
Orlova, A. S. (1967) *Histoire de l'Afrique au XIX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Moscow: Institut d'Afr. de l'URSS). (Gen. Introd.)
Oussedik, O. (1972) 'Les bifaces acheuliens de l'Erg Tihodaïne: analyse typométrique', *Libyca*, 20. (Chap. 22)
Ozanne, P. (1964) 'Notes on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Accra', *JHSN*, 3, 1, pp. 3–23. (Chap. 24)
Ozanne, P. (1966) 'The Anglo-Gambian stone circles expedition', *WAAN*, 4, pp. 8–18. (Chap 24)

Ozanne, P. (1969a) 'The diffusion of smoking in West Africa', *Odu*, n.s., 2, pp. 29–42. **(Chap. 24)**
Ozanne, P. (1969b) 'A new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fe', *Odu*, 3, 1, pp. 28–45. **(Chap. 24)**
Ozanne, P. (1971) 'Ghana', in P. L. Shinnie,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36–65. **(Chap. 24)**

Padmore, G. (1961) *Panafricanisme ou Communisme?* (Paris: Presence africaine). **(Gen. Introd.)**
Pager, H. L. (1971) *Ndedema* (Graz: Akademische Druck).
Pager, H. (1975) *Stone Age and Myth* (Graz: Akademische Druck).
Palmer, H. R. (1928) *Sudanese Memoirs*, 3 Vols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Chaps 1, 5, 6)**
Palmer, H. R. (1929) *History of the First Twelve Years of the Reign of Mai Idris Alooma* (Lagos). **(Chap. 6)**
Palmer, H. R. (1936) *The Bornu, Sahara and Sudan* (London). **(Chap. 6)**
Pankhurst, R. K. P. (ed.) (1966) *The Ethiopian Royal Chronicles* (Addis Abab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Parenko, P., Parenko, R. P. and Hebert, J. (1962) 'Une famille ethnique; les Gan, les Padoro, les Dorobe, les Komono', *BIFAN*, B, I, XXIV, pp. 3, 4 and 6 **(Chap. 15)**
Parkington, J. and Poggenpoel, C. (1970) 'Excavations at De Hangen, 1968', *SAAB*, XXVI, pp. 3–36. **(Chap. 20)**
Patterson, J. R. (1926) *Kanuri Songs*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Chap. 6)**
Paulme, D. (1956a) *Les Sculpture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Gen. Introd.)**
Paulme, D. (1956b) *Parures africaines* (Paris: Hachette). **(Gen. Introd.)**
Paulme, D. (1960) *Les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Paris: PUF). **(Gen. Introd.)**
Payddoke, E. (1963) *The Scientist and Archaeology* (London: Phoenix House). **(Chap. 9)**
Pédelaborde, P. (1970) *Les Moussons* (Paris: Colin). **(Chap. 16)**
Peet (1920) *The Mayer Papyri* (London). **(Chap. 5)**
Peet (1930) *The Great Tomb-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 2 vols (Oxford). **(Chap. 5)**
Pelletier, A. and Goblot, J.-J. (1973)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et histoir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2nd edn. **(Concl.)**
Pender Cutlip, P. (1972) 'Oral traditions and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some contemporary myths', *Azania*, VII, pp. 3–24. **(Chap. 8)**
Pender Cutlip, P. (1973) 'Encyclopedic informants and early interlacustrine history', *IJAHS*, VI, pp. 468–79. **(Chap. 8)**
Perlman, I. and Isaro, F. (1969) 'Pottery analysis by neutron activation', *Archaeometry*, 11, pp. 21–52. **(Chap. 8)**
Perret, R. (1937) 'Une carte des gravures rupestres et des peintures à l'ocre de l'Afrique du Nord', *JSA*, VII, 71, pp. 107–23. **(Chaps 8, 23)**
Perrot, C. (1974) 'Ano Aseman: mythe et histoire', *JAH*, XV, pp. 199–212. **(Chap. 8)**
Person, Y. (1962) 'Tradition orale et chronologie', *CEA*, 7, II, p. 3. **(Chap. 7)**
Person, Y. (1963) 'Classe d'âges et chronologie', *Latitudes*, special no. **(Chap. 15)**
Person, Y. (1968–70) *Samori. Une révolution dyula*, 3 Vols (Dakar: IFAN). **(Chap. 3)**
Petrie, W. M. F. (1901) *The Royal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London). **(Chaps 9, 28)**
Petrie, W. M. F. (1920) *Prehistoric Egypt* (London: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Chaps 23, 28)**
Petrie, W. M. F. (1921) *Corpus of Prehistoric Pottery and Palettes* (London: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Chap. 23)**
Petrie, W. M. F. (1939) *The Making of Egypt* (London: The Sheldon Press; New York: Macmillan). **(Chaps 25, 28)**
Petrie, W. M. F. (1953) 'Ceremonial slate palettes', *BSAE*, LXVI. **(Chaps 25, 28)**
Petrie, W. M. F., Mackay, E. and Wainwright, G. (1912) *The Labyrinth, Gerzeh and Mazghuneh* (London,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Chap. 28)**
Peyrouton, M. (1966)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aghreb* (Paris: Michel). **(Gen. Introd.)**
Philips, J. (1828)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2 Vols (London). **(Chap. 6)**
Phillipson, D. W. (1976) 'The early iron age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 critical re-appraisal', *Azania*, XI, pp. 1–23. **(Chap. 21)**
Pias, J. (1967) 'Chronologie du dépôt des sédiments tertiaires et quaternaires dans la cuvette tchadienne', *CRAS*, 264, pp. 2432–5. **(Chap. 24)**
Picard, G. C. (1971) 'Le Periple d'Hannon n'est pas un faux', *Archéologia*, 40, pp. 54–9. **(Chap. 24)**
Pigafetta, F. and Lopez, D. (1965) *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ongo et des contrées environnantes* (Rome, 1591), trans. and annot. by Willy Bal (Louvain: Nauwelaerts). **(Chaps 1, 4)**
Piotrovsky, B. (1967) 'The early dynasty settlement of Khor-Daoud', *Campagne internationale de*

l'Unesco pour la sauvegarde des monuments de la Nubie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Chap. 25)
Pirenne, J. (1932)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u droit privé de l'ancienne Egypte* (Brussels: Fondation é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Chap. 28)**
Piveteau, J. (1973) *Origine et destinée de l'homme* (Paris: Masson). **(Chap. 18)**
Plaatje, S. T. (1916)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since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Boer Rebellion* (London: King). **(Chap. 6)**
Plaatje, S. T. (1930) *Mhudi: an epic of South Africa native life a hundred years ago* (South Africa: Lovedale). **(Chap. 6)**
Plenderleith, H. J. (1962) *The Con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and Works of Art; Treatment, Repair, and Resto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9)**
Ploey, J. De (1963) 'Quelques indices sur l'évolution morphologique et paléoclimatique des environs du Stanley-Pool (Congo)', *Studia universitatis Lovanium*, 17. **(Chap. 21)**
Ploey, J. De (1965) 'Position géomorphologique, génèse et chronologie de certains dépôts superficiels au Congo Occidental', *Quaternaria*, VII, pp. 131–54. **(Chap. 21)**
Ploey, J. De (1968) 'Quaternary phenomena in the western Congo', *Proc VII Congr. INQUA*, 8, pp. 500–18. **(Chap. 21)**
Ploey, J. De (1969) 'Report on the Quaternary of the western Congo', *Palaeoecology of Africa,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and Antarctica*, IV, pp. 65–8. **(Chap. 21)**
Poirier, J. (1969) *Histoire de l'ethnologie* (Paris: PUF). **(Gen. Introd.)**
Polotsky, H. (1964) *Egyptians at the Dawn of Civilisation*,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Series I. **(Chap. 10)**
Pommeret, Y. (1965) 'Notes préliminaires à propos du gisement lupembien et néolithique de Nodjobé', *Mém. SPPG*, II. **(Chap. 21)**
Pommeret, Y. (1966a) 'Principaux types d'outils de tradition forestière (Sangoen-lupembien-tchitolien) découverts à Libreville', *BSPPG*, II, 4, pp. 29–47. **(Chap. 21)**
Pommeret, Y. (1966b) 'Les outils polis au Gabon', *BSPPG*, II, 6, pp. 163–79. **(Chap. 21)**
Pond, W. P. *et al* (1938) *Prehistoric habitation sites in the Sahara and North Africa* (Logan Museum Beloit College: Wisconsin), pp. 17–21. **(Chap. 23)**
Porter, B. and Moss, R. L. B. (1927)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28)**
Portères, R. (1950) 'Vieilles agricultures de l'Afrique intertropicale', *AT*, pp. 9–10. **(Chap. 27)**
Portères, R. (1951a) 'Géographie alimentaire, berceaux agricoles et migrations des plantes cultivées en Afrique intertropicale', *CRSB*, pp. 239–40. **(Chap. 27)**
Portères, R. (1951b) '*Eleusine coracana Gaertner*', céréale des humanités pauvres des pays tropicaux', *BIFAN*, 23, pp. 1–78. **(Chap. 24)**
Portères, R. (1958) 'Les appellations des céréales en Afrique', *Journal d'Agriculture Tropica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5. **(Chap. 24)**
Portères, R. (1960) 'La monnaie de fer dans l'Ouest africain au XIXe siècle', *Recherche africaine*, 4. **(Chap. 15)**
Portères, R. (1962) 'Berceaux agricoles primaires sur le continent africaine', *JAH*, 3, 2, pp. 195–210. **(Chaps 14, 24, 27)**
Portères, R. (1972). 'Le millet coracan ou Finger Millet', *Proc. Burg Wart. Symp.* 56. **(Chap. 24)**
Posener, G. (1934) Catalogue des ostraca hiératiques littéraires de Deir el-Médineh (Cairo). **(Chap. 5)**
Posener, G. (1940) *Princes et pays d'Asie et de Nubie* (Brussels: Fondation é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Chap. 28)**
Posener, G. (1951) *RE* VI, pp. 27–48. **(Chap. 5)**
Posener, G. (1960) 'De la divinité de Pharaon', *CSA*, 15. **(Chap. 28)**
Posener, G., Sauneron, S. and Yoyotte, J. (1959) *Dictionnaire de la Civilisation Egyptienne* (Paris: Hazan), trans.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Civilisation*, A. Macfarlane (London: Methuen). **(Chap. 28)**
Posnansky, M. (1969)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 (Nairobi/London: Longman) pp. 49–68. **(Chap. 19)**
Posnansky, M. (1971) 'Ghana and the origins of West African trade', *Africa Quarterly*, II, pp. 110–25. **(Chap. 24)**
Présence africaine (1971) *Perspectives nouvelles sur l'histoire africaine* (Paris). **(Chap. 5)**
Priddy, A. J. (1970) 'An iron age site near Yelwa, Sokoto Province: preliminary report', *WAAN*, 12, pp. 20–32. **(Chap. 24)**
Prins, A. H. J. (1953) *East African Age-Class Systems* (Groningen: Wolters). **(Chap. 15)**
Prins, A. H. J. (1958) 'On Swahili historiography', *JEASC*, LXXVIII, 2. **(Chaps 5, 6)**
Pritchard, J. C. (1855)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2 Vols, 4th edn (London: Ballière). **(Chap. 12)**

Quezel, P. Pons (1957) *Première étude palynologique de quelques paléo-sols sahariens* (Algier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Chap. 4)

Rabie, H. (1972)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Egypt*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5)
Radcliffe-Brown, A. R. and Forde, D. (eds) (1960) *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 Introd.)
Ralph, E. K., Michael, H. N. and Han, M. G. (1973) 'Radiocarbon dates and reality', *MN*, 9, 1, pp. 1-20. (Chap. 9)
Ramendo, L. (1963) 'Les galets aménagés de Reggan (Sahara)', *Libyca*, II, pp. 43-74. (Chap. 22)
Randall-MacIver, D. and Mace, A. C. (1902) *El Amrah and Abydos, 1899-1901* (London). (Chap. 28)
Randles, W. G. L. (1958) *South East Africa and the Empire of Monomatapa as shown on selected printed map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isbon). (Chap. 6)
Randles, W. G. L. (1974) 'La civilisation bantou, son essor et son déclin', *Annales*, 29, 2. (Chap. 27)
Ranger, T. O. (1962)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frican Historians*, Dar es Salaam. (Chap. 15)
Ranger, T. O. (1967)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97; A Study in African Resistance* (London: Heinemann). (Chap. 3)
Rattray, R. S. (1923) *Ashant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24)
Reed, C. H. (1964) 'Natural history study of Karkur oasis, Libyan desert', *Postilla-Peabody Museum*, 84. (Chap. 25)
Reed, C. H. (1965) 'A human frontal bone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the Kom-Ombo plain', *Man*, 95, pp. 101-4. (Chap. 25)
Reed, C. H. (1967)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Yale University Prehistoric Expedition to Nubia, 1962-1963*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Chap. 25)
Rees, A. R. (1965) 'Evidence for the African origin of the oil palm', *Principes*, 9, pp. 30-6. (Chap. 24)
Reindorf, C. C. (1895)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Basle). (Chap. 3)
Reiniseh, L. (1891) *Die Kunama-Sprache in Nordost-Afrika* (Vienna). (Chap. 10)
Reisner, G. A. (1910-27)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1908*, Vol. I (Cairo: National Printing Dept). (Chap. 28)
Reisner, G. A. (1923) *Excavations at Karm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African Studies). (Chap. 28)
Renan, E. (1855) *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 sémitiques* (Paris: Calmann-Lévy). (Chaps 1, 2)
Revue de Géographie Physique et de Géologie Dynamique (1976) *Oscillations climatiques au Sahara depuis 40 000 ans*, special number (Paris: Masson). (Chap. 16)
Reygasse, M. (1922) 'Note au sujet de deux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pour lesquelles deux termes nouveaux me paraissent devoir être employés', *Actes 46e Congr. AFAS*, pp. 467-72. (Chap. 23)
Reygasse, M. (1923) 'Découverte d'outillage moustérien à outils pédonculés atériens dans le Tidikelt, Oued Asriouel, région d'Aoulef Chorfa', *Actes 46e Congr. AFAS*, pp. 471-2. (Chap. 23)
Rhodenburg, H. (1970) 'Mosphodynamische Activitats und Stabilitätszeiten statt Pluvial und Interpluvialzeiten', *Eiszeitalter und Gegenwart*, 21, pp. 81-96. (Chap. 21)
Rhodenburg, H. and Sabelberg, U. (1969) 'Zur Randschaftsökologisch-Bodengeo graphischen und klimagenetisch – Geomorphologischen Stellung des westliche Mediterrangebietes', *Göttinger Bodenkundlige Berrichte*, 7, pp. 27-47. (Chap. 16)
Rhotert, H. (1952) *Libysche Felsbilder* (Darmstadt: Wittich). (Chap. 23)
Richard, Abbé (1869) 'Sur la découverte de silex taillés dans le sud de l'Algérie',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primitive de l'homme*, 4, pp. 74-5. (Chap. 23)
Richard, C. de (1955)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stratigraphie de Quaternaire de la Presqu'île du Cap Vert (Sénégal)', *BSPF*, 52, pp. 80-8. (Chap. 24)
Richardson, J. L. and Richardson, A. E. (1972) 'History of an African rift lake and its climatic implication', *Ecological Monograph*, 42, pp. 499-534. (Chap. 16)
Rightmire, G. P. (1974) *Comments on Rac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in Africa* (New York). (Chap. 11)
Robert, D. (1970a) 'Les fouilles de Tegdaoust', *JAH*, 11, 4, pp. 471-93. (Chap. 24)
Robert, D. (1970b)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Tegdaoust', *WAAN*, 12, pp. 64-8. (Chap. 24)
Robert, D., Robert, S. and Devisse, J. (1970) *Tegdaoust I,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Paris: AMG). (Chap. 24)
Roberts, A. (1967) 'Oral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s of Tanzania', *EAJ*, 12, pp. 23-5. (Chap. 7)
Roberts, A. (1968a) *Recording East Africa's Past: A brief guide for the amateur historian*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Chap. 7)

Roberts, A. (1968b) 'Oral tradition through the sieve: notes and comments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Tanzania's oral history', *FAJ*, pp. 35–8. **(Chap. 7)**

Roberts, A. (1968c)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Chap. 3)**

Roche, E. (1963) *L'Epipaléolithique marocain* (Lisbon). **(Chap. 22)**

Roche, E. (1975) 'Analyse palynologique du site archéologique de la Kamoa', in D. Cahen, *Le Site archéologique de la Kamoa (Région du Shaba, République du Zaïre). De l'âge de la pierre ancienne à l'âge du fer*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Chap. 21)**

Rodier, J. (1963) 'Hydrologie du continent africain', *Enquête su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Paris: Unesco), pp. 185–226. **(Chap. 13)**

Roget, M. (1924) *Le Maroc chez les auteurs anciens*. **(Chap. 5)**

Rognon, P. (1974) 'Modifications naturelles du cycle hydrométéorologique depuis 10,000 ans. Leur utilisation pour la prévision climatique à long terme', in *Influence des activités de l'homme sur le cycle hydrométéorologique 13e Journée de l' hydraulique, Société Hydrotechnique française* **(Chap. 16)**

Rosenfeld, A. (1965) *The Inorganic Raw Minerals of Antiquity* (London). **(Chap. 14)**

Rosenfeld, A. (1972) 'The microlithic industries of Rop Rock Shelter', *WAJA*, 2, pp. 17–28. **(Chap. 24)**

Rotberg, R. I. (ed.) (1971) *Africa and its Explorers: Motives, Methods and Impact* (Cambridge, Mass.). **(Chap. 6)**

Rotberg, R. I. and Mazrui, A. A. (eds) (1970)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Rotberg, R. I. and Roubet, C. (1968) 'Nouvelles observations sur l'Epipaléolithique de l'Algérie orientale. Le gisement de Koudiat Kifene Lahda', *Libyca*, 16, pp. 55–101. **(Chap. 22)**

Rotberg, R. I. and Roubet, C. (1972) 'The microlithic industries of Rop rock shelter', *WAJA*, 2, pp. 17–28. **(Chap. 24)**

Rotberg, R. I. and Roubet, C. (in press) 'Une économie pastorale pré-agricole en Algérie orientale. Le néolithique de tradition capsienne. L'exemple de l'Aurès'. **(Chap. 22)**

Rotberg, R. I. and Roubet, F. E. (1966) 'Présentation comparative d'un gisement côtier, des environs de Berard, à l'ouest d'Alger', *Congrès de préhistoire français, Ajaccio*, pp. 109–28. **(Chap. 22)**

Roubet, C. (1968) *Le Gisement du Damous el Ahmar* (Paris: AMG). **(Chaps 21, 22)**

Roubet, C. (1971) 'Sur la définition et la chronologie néolithique de tradition capsienne', *Anthropologie*, 75, pp. 553–74. **(Chaps 22, 24)**

Rouch, J. (1953)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Songhay* (Dakar). **(Chap. 5)**

Rubin, A. (1970) 'Review of Phillip Allison's "African Stone Sculpture" and Franck Willett's "If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Sculpture"', *Art Bulletin*, 72, 3, pp. 348–54. **(Chap. 24)**

Ruffié, J. (1976) *De la biologie à la culture* (Paris: Flammarion). **(Chap. 11)**

Ruffié, J. (1977) 'Génétique et anthropologie', *Science et vie* (Paris), no. 120. **(Chap. 11)**

Ryder, A. F. C. (1965a)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Portuguese Archives* (London: Athlone Press). **(Chaps 6, 24)**

Ryder, A. F. C. (1965b)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fe-Benin relationship', *JAH*, 6, 1, pp. 25–37. **(Chap. 24)**

Saberwal, S. (1967) 'The oral tradition, periodiza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CJAS*, I, pp. 157–62. **(Chap. 7)**

Sacid, H. (n.d.) *History of Sokoto*, trs. C. E. J. Whiting (Kano). (Chap. 6)

Said, R. (in press) *The G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River Nile*. (Chap. 16)

Saleh, S. A., George, A. W. and Helmi, F. M. (1972) 'Study of glass and glass-making processes at Wadi-El-Natrum, 1st part. Fritting crucibles, their technical features and temperature employed',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useum Objects (London), 17, pp. 143–70. **(Chap. 9)**

Samb, A. (1971) 'Langues négro-africaines et leurs emprunts à l'arabe', *NA*. (Chap. 10)

Sampson, C. G. (1968) *The Middle Stone Age Industries of the Orange River Scheme Area* (Bloemfontein: National Museum). **(Chap. 20)**

Sancho, I. (1781) *Letters of the late I. Sancho, an African ... to which are prefixed memoirs of his life*, 2 Vols (London). **(Chap. 6)**

Sander, E. R. (1969) 'The Hami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 in time perspectives', *JAH*, X, 4, pp. 521–32. **(Gen. Introd., Chap. 12)**

Sandford, K. S. and Arkell, W. J. (1929) 'Palaeolithic man and the Nile-Fayum divide',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 10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Sandford, K. S. and Arkell, W. J. (1933) *Palaeolithic Man and the Nile Valley in Nubia and Upper Egypt, with some notes upon a part of the Red Sea littoral; A study of the regions during Pliocene and Pleistocene tim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Sapir, D. (1973–4a) *Linguist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Paris: Mouton). (Chap. 10)
Sapir, D. (1974b) 'West Atlantic: an inventory of the languages, their noun class systems, and consonant alterations', in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VII (Paris/The Hague: Mouton) (Chap. 12)
Sauer, C. O. (1952)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ion', *BML*, 2. (Chap. 27)
Saunders, A. M. C. (1964) *World Population: 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 (London). (Chap. 14)
Sauvaget, J. (1946) *Historiens arabes* (Paris, Maisonneuve) (Gen. Introd.)
Sauvaget, J. (1961)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Orient Musulman* (Paris). (Chap. 5)
Savage, G. (1967) *The Art and Antique Restorers' Handbook* (London: Barrie & Rocklilf). (Chap. 9)
Savary, P. (1966) 'Monuments en pierres sèches du Fasnoun', *MCRAPE*, 6. (Chap. 23)
Sayce, R. U. (1933) *Primitive Arts and Craf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4)
Sayre, E. V. and Meyers, P. (1971) 'Nuclear activation applied to materials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ATA*, 8, 4, pp. 115–50 (Chap. 9)
Schapera, I. (1933) *The Early Cape Hottentots described in the writings of Olfert Dappr, 1668, Willem Ten Rhyne, 1668, and Johannes Gulielmus de Grevenbroek, 1695*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Chap. 6)
Scharff, A. and Moorgat, A. (1950) *Ägypten und Vorderasien im Altertum* (Munich: Bruckmann). (Chap. 28)
Scheub, H. (1975) *The Ntsomi: A Xhosa Performing A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7)
Schlözer, A. L. von (1781) in Eichhorn, J. G. (1777–86) *Repertorium für Biblische und Morgenlandische Litteratur* (Leipzig), part VIII. (Chap. 12)
Schmitz, A. (1962) 'Les Muhulu du Haut-Katanga meridional', *BJBE*, XXXII, 3 (Chap. 21)
Schmitz, A. (1971) 'La végétation de la plaine de Lubumbashi', *Publ. INEAC*, 113, pp. 11–388. (Chap. 21)
Schnell, R. (1957) *Plantes alimentaires et vie agrico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Larose). (Chap. 27)
Scholtar, I. (1970) 'Magnetic methods of archaeological prospecting – advances in instru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 *PTRS*, 269, 1193, pp. 109–19. (Chap. 9)
Sebeok, T. A. ed (1963–74)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Paris/The Hague: Mouton). (Chaps 10, 12)
Seck, A. and Mondjannagni, A. (1967) *L'Afrique occidentale* (Paris: PUF). (Chap. 13)
Seddon, D. (1968)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CA*, 9, 5, pp. 489–94. (Chaps 24, 27)
Seligman, C. G. (1930) *Races of Africa* (London: Butterworth). (Chap. 10)
Servant, M. (1973) 'Séquences continentales et variations climatiques: évolution du bassin du Tchad au Cénozoïque supérieur', *CORSTOM*. (Chap. 16)
Servant, M. (1974) 'Les variations climatiques des régions intertropicales du continent africain depuis la fin du Pléistocène', in *13e Journée de l'hydraulique, Société hydrotechnique française*. (Chap. 16)
Servant, M., Servant, S. and Delibrias, G. (1969) 'Chronologie du Quaternaire récent des basses régions du Tchad', *CRAS*, 269, pp. 1603–6 (Chap. 24)
Sethe, K. H. (1930) *Urgeschichte und älteste Religion der Ägypter* (Leipzig, Deutsche morgenlandische gesellschaft). (Chap. 28)
Seydou, C. (ed.) (1977) *La Geste de Ham-Bodedio ou Hama le Rouge* (Paris: Colin). (Chap. 2)
Shaked, S. (1964) *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Geniza Documents* (Paris, The Hague: Etudes Juives).
Shaw, C. T. (1944) 'Report on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in the cave known as Bosumpra at Abetifi, Kwahu, Gold Coast Colony',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Cambridge), 10, pp. 1–67. (Chap. 24)
Shaw, C. T. (1960) 'Early smoking pipes: in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JRAI*. (Chap. 24)
Shaw, C. T. (1961) *Excavation at Dawu* (Edinburgh: Nelson). (Chap. 24)
Shaw, C. T. (1962) 'Chronology of excavation at Dawu', *Man*, 72, p. 217. (Chap. 24)
Shaw, C. T. (1963) 'Field research in Nigerian archaeology', *JHSN*, 2, 4, pp. 449–64. (Chap. 24)
Shaw, C. T. (1964a) *Archaeology and Nigeri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4)
Shaw, C. T. (1964b) 'Smoking in Africa', *SAAB*, 19, 75, pp. 75–6 (Chap. 24)
Shaw, C. T. (1965a) 'Spectrographic analyses of the Igbo and other Nigerian bronzes', *Archaeometry*, 8, pp. 86–95. (Chap. 24)
Shaw, C. T. (1965b) 'Akure excavations: stone age skeleton 9000 BC', *AN*, 3, pp. 5–6 (Chap. 24)
Shaw, C. T. (1967) 'Terminology', *WAAN*, 7, pp. 9–43. (Chap. 24)
Shaw, C. T. (1969a) 'Further spectrographic analyses of Nigerian bronzes', *Archaeometry*, 11, pp. 85–98. (Chap. 24)
Shaw, C. T. (1969b) 'The Later Stone Age in the Nigerian forest',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364–74. (Chap. 24)
Shaw, C. T. (1969c) 'On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the Iron Age in sub-Saharan Africa', *CA*, 10, pp. 226–31. (Chap. 24)

Shaw, C. T. (1970a) 'The analysis of West African bronzes: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Ibadan*, 20, pp. 80-9. (Chap. 24)
Shaw, C. T. (1970b) *Igbo-Ukwu: An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Faber, for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badan). (Chap. 24)
Shaw, C. T. (1971a) 'The prehistory of West Africa',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London: Longman). (Chap. 24)
Shaw, C. T. (1971b) 'Africa in prehistory: leader or laggard?' *JAH*, 12, 1, pp. 143-53. (Chap. 24)
Shaw, C. T. (1972) 'Early crops in Africa: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roc. Burg Wart. Symp. 56*, (Chap. 24)
Shaw, C. T. (1973) 'Trade and the Tsoede bronzes', *WAJA*, 3, pp. 233-8. (Chap. 24)
Shaw, F. (1906) *A Tropical Dependency* (London). (Chap. 1)
Shayyal (1958) *Majmu'at al-Watha'iq al-Fatimiyya* (Cairo). (Chap. 5)
Shelton, A. K. (1968) 'Causality in African thought; Igbo and other', *PA*, 15, 4, pp. 157-69. (Chap. 7)
Shepperson, G. and Price, T. (1958) *Independent African; John Chilembwe and the Origins, Sett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yasaland Native Rising of 191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Shibeika, M. (1947) *Ta'rīkh muluk al-Sudan* (Khartoum). (Chap. 6)
Shinnie, P. L. (1967) *Meroe: a Civilization of the Sudan* (New York: Praeger;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8)
Shinnie, P. L. (1971)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24, 28)
Shumovskiy, T. A. (1957) *Tri neizvestyne lotsii Akhmada ibn Majida* (Three unknown pilot books of Akumed ibn Majida) (Moscow). (Chap. 6)
Sibrava, V. (ed.) (1975) *Quaternary Glaciation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Prague: Unesco). (Chap. 16)
Silva Rego, A. da (1949-58) *Documentaça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a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n). (Chap. 6)
Simpson, G. C. (1957) 'Further studies in world climate', *JRMS*, 83, pp. 459-85. (Chap. 24)
Simpson, W. K. (ed.) (1972)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and Poetry*, trans. R. D. Faulkner, E. F. Wente and W. K. Simpson (New Haven/London). (Chap. 28)
Singer, R. (1958) 'The Rhodesian, Florisbad and Saldanha skulls', in G. H. R. von Hoenigswald (ed.), *Neanderthal Centenary* (Utrecht), pp. 52-62. (Chap. 20)
Singer, R. and Wymer, J. (1968)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t the Saldanha skull site in South Africa', *SAAB*, XXV, pp. 63-74. (Chap. 20)
Singh, G. (1973) 'Late Quaternary changes in vegetation and climates in the arid tropics of India', *Acts IX INQUA Congr.* (Chap. 16)
Slane, M. de (1911)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 (Chap. 5)
Smith, A. (1974) 'Preliminary report of excavations at Karkarichinkat, Mali, 1972', *WAJA*, 4. (Chap. 24)
Smith, H. F. C. (1958)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 *JHSN*, 1, 3, pp. 238-48. (Chaps 5, 6)
Smith, H. F. C. (1961) 'Arabic manuscript material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 a seventeenth century writer of Katsina', *BNHSN*, VI, 1. (Chaps 5, 6)
Smith, H. S. (1966) 'The Nubian B-group', *Kush*, XIV, pp. 69-124. (Chap. 28)
Smith, P. E. (1966a) 'The late Paleolithic of northern Africa in the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es', *AA*, 68, pp. 326-55. (Chap. 25)
Smith, P. E. (1966b) 'New prehistoric investigation at Kom-Ombo', *Zephyrus*, XVII. (Chap. 25)
Smith, P. E. (1967) 'New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of the Kom-Ombo plain', *Quaternaria*, IX. (Chap. 25)
Soga, T. B. (1929) *Intlalo ka Xosa* (Lovedale). (Chap. 6)
Soga, J. H. (1930a) *The South-Eastern Bantu* (Johannesburg). (Chap. 6)
Soga, J. H. (1930b) *Ama-Xhosa: Life and Customs* (Johannesburg). (Chap. 6)
Sommer, F. (1953) *Man and Beast in Africa* (London: Jenkins). (Chap. 14)
Soper, R. C. (1965) 'The Stone Age in northern Nigeria', *JHSN*, 3, 2, pp. 175-94. (Chap. 24)
Souville, G. (1958-9) 'La pêche et la vie maritime au Néolithique en Afrique du nord', *BAM*, 3, pp. 315-44. (Chap. 22)
Souville, G. (1973) *Atlas préhistorique du Maroc* (Paris: CNRS Etudes d'antiquités africaines). (Chap. 22)
Sow, A. I. (1968) *Chroniques et récits du Fouta Djalon* (Paris: Klincksieck). (Chap. 6)

Sowunmi, M. A. (1973) 'A preliminary palynological study in the Rivers State', *OM*, I, 1, pp. 13–14. (Chap. 4)
Sparks, B. W. and West, R. G. (1972) *The Ice Age in Britain* (London: Methuen). (Chap. 24)
Sparrman, A. (1789) *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wards the Antarctic Polar Circle, round the World, and to the Country of the Hottentots and Caffres, from the year 1772 to 1776*, ed. V. S. Forbes, rev. trans. J. and I. Rudner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1975–7. (Chap. 6)
Stainer, X. (1899) 'L'âge de la pierre au Congo', *AMRAC*, III. (Chap. 21)
Stanton, W. R. and Willett, F. (1963)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maize type in West Africa: an experiment in technique', *Man*, 63. (Chap. 24)
Stigand, C. H. (1913) *The Land of Zinj* (London). (Chap. 1)
Streel, M. (1963) *La végétation tropophylle des plaines alluviales de la Lufira moyenne* (Liège: FULREAC). (Chap. 21)
Stross, F. H. and O'Donnell, A. E. (1972) *Laboratory Analysis of Organic Materials* (USA: Addison-Wesley), Module 22. (Chap. 9)
Strouhal, E. (1976) *Problems of Study of Human Races* (Prague). (Chap. 11)
Struever, S. (ed.) (1971)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Sourcebooks in Anthropology). (Chap. 4)
Stuvier, M. and Suess, H. E. (196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ocarbon dates and true sample ages', *Radiocarbon*, 8, pp. 534–40. (Chap. 9)
Suret-Canale, J. (1964)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en Afrique tropicale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ensée*, 117, pp. 21–42. (Concl.)
Suret-Canale, J. (1968) *Afrique noir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 Vol I: *Géographie, civilisations, histoir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Gen. Introd., Chap. 13)
Suret-Canale, J. (1969) Preface to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Swadesh, E. (1966a) 'A preliminary glottochronology of Gur', *JWAL*. (Chap. 10)
Swadesh, E. (1966b) 'Glottochronology', *JWAL*, III. (Chap. 10)
Szumowski, G. (1956) 'Fouilles de l'abri sous roche de Kourounorokale', *BIFAN*, B, 18, pp. 462–508. (Chap. 24)

Taieb, M. (1974) 'Evolution quaternaire du bassin de l'Awash (Rift éthiopien et Afar)', 2 Vols,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 17)
Taieb, M., Coppens, Y., Johanson, D. C. and Kalb, J. (1972) 'Dépôts sédimentaires et faunes du Plio-Pléistocène de la basse vallée de l'Awash (Afar central, Ethiopie)', *CRAS*, 275, pp. 819–22. (Chap. 17)
Taieb, M., Johanson, D. C. and Coppens, Y. (1975) 'Expé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far, Ethiopie (3e campagne, 1974), découverte d'Hominidés plio-pléistocène à Hadar', *CRAS*, 281, pp. 1297–300. (Chaps 17, 18)
Taieb, M., Johanson, D. C., Coppens, Y. and Aronson, J. L. (1976) 'Geological and paleontological background of Hadar hominid site, Afar, Ethiopia', *Nature*, 260, 5549, pp. 289–93. (Chaps 16, 17)
Taieb, M., Johanson, D. C., Coppens, Y., Bonnefille, R. and Kalb, J. (1974) 'Découverte d'hominides dans les séries plio-pléistocènes d'Hadar (bassin de l'Awash, Afar, Ethiopie)', *CRAS*, 279, pp. 735–8. (Chap. 17)
Talbot, P. A. (1923) *Life in Southern Nigeria: the magic,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e Ibids Tribe* (London: Macmillan), pp. 448–64. (Chap. 10)
Tardits, C. (1962) '*Religion, épopée, histoire* – notes sur les fonctions latentes des cultes dans les civilisations du Bénin', *Diogène*, 37. (Chap. 15)
Tattam, C. M. (1944) *A Review of Nigerian Stratigraphy*, annual report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Nigeria, 1943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Chap. 24)
Tauxier, H. (1882) 'Les deux rédactions du périple d'Hannon', *RA*, pp. 15–37. (Chap. 5)
Tauxier, L. (1942) *Histoire des Bambara* (Paris). (Chap. 1)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4) 'Les recherches pour la découverte des origines humaines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Anthropologie*. (Concl.)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5) *Le Phenomène humain* (Paris: Senil), p. 203. (Chap. 22)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5) 'L'Afrique et les origines humaines', *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 (Concl.)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6) *Le Groupe zoologique humain* (Paris: Albin Michel). (Chap. 15)
Theal, G. M. (1898–1903) *Records of South-Eastern Africa*, 9 Vols (London). (Chap. 6)
Theal, G. M. (1897–1905) *Records of the Cape Colony*, 36 Vols (London). (Chap. 6)

Thomassey, P. and Mauny, R. (1951)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Koumbi Saleh', *BIFAN*, 13, 1, pp. 438-62. (Chap. 24)

Thomassey, P. and Mauny, R. (1956)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Koumbi Saleh (Ghana?)', *BIFAN*, B, 18, pp. 117–40. (Chap. 24)

Thompson, L. ed. (1969)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Gen. Introd., Chap. 24)

Time-Life Books (1972) *The Missing Link –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3. (Chap. 19)

Tixier, J. (1957) 'Le hachereau dans l'Acheuléen nord africain. Notes typologiques', *CR XV Congr. Préhist. Fr.*, pp. 914–23. (Chaps 22, 23)

Tixier, J. (1958–9) 'Les pièces pédonculées de l'Atérien', *Libyca*, 6, 7, pp. 127–57. (Chap. 22)

Tixier, J. (1963) 'Les industries lithiques de l'Aïn Fritissa', *BAM*, 3, pp. 107–247. (Chap. 22)

Tixier, J. (1963) *Typologie de l'épipaléolithique du Maghreb* (Paris: AMG). (Chap. 22)

Tobias, P. V. (1967a) *Olduvai Gorge – The Cranium and Maxillary Detention of Australopithecus (Zinjanthropus) boise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17)

Tobias, P. V. (1967b) 'Cultural hominization among the earliest African Pleistocene hominids',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Cambridge), 33, pp. 367–76. (Chap. 20)

Tobias, P. V. (1968a) 'Middle and Early Upper Pleistocene members of the genus Homo in Africa', *Sonderdruck aus Evolution und Hominization* (Stuttgart: Kurth), pp. 176–94. (Chap. 20)

Tobias, P. V. (1968b) *Man's Past and Future*. Fifth Raymond Dart Lecture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0)

Tobias, P. V. and Coppens, Y. (1976) 'Les plus anciens hominidés', *Actes IX Congr. UISPP*. (Chap. 17)

Tricart, J. (1956) 'Tentative de corrélation des périodes pluviales africaines et des périodes glaciaires', *CRSGF*, pp. 164–7. (Chap. 16)

Trigger, B. G. (1965) *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69. (Gen. Introd., Chap 28)

Trigger, B. G. (1965) 'Meroitic and Eastern Sudanic, a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Kush*, 12, pp. 188–94.

Trigger, B. G. (1969) 'Meroe and the African iron age', *AHS*, II. (Chap. 28)

Tschudi, J. (1955) *Nordafrikanische Felsmalereien* (Florence: Sansoni). (Chap. 23)

Tucker, A. N. (1940) *The Eastern Sudanic Languag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Tucker, A. N. (1948) *Distribution of the Nilotic and Nilo-Hamitic Languages of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Tucker, A. N. and Bryan, M. A. (1966) *Linguistic Analysis: the non-Bantu Languages of North-Eastern Africa* (London/New York/The Ca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0, 12)

Turekian, K. K. (ed.) (1971) *The Late Cenozoic glacial 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 16)

Turner, L. D. (1955) 'The odyssey of a Zulu warrior', *JNH*, 40, 4. (Chap. 6)

Twiesselmann, F. (1958) *Les ossements humains du gîte mésolithique d'Ishango, Mission J. de Heinzelin de Braucourt en 1950* (Brussels: Institut des parcs nationaux du Congo belge). (Chap. 21)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1969)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Chap. 24)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1970) 'The history of Africa', *CHM*, XII, 4, pp. 527–605. (Chap. 15)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1972) 'Les origines de l'homme', *Unesco Courier*, August–September, special issue. (Concl.)

Unesco (1965) L'Art de l'ecriture.

Unesco (1973) *Recueil sélectif de textes en arabe provenant d'archives marocaines* by Professor Mohammed Ibrahim El Kettani (Paris). (Introd.)

Unesco (1974) *Colloque sur le peuplement de L'Egypte ancienne et le déchiffrement de l'écriture meroïtique* (Cairo, 28 January–3 February). (Introd.)

Urvoy, Y. (1936)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u Soudan central* (Paris). (Chap. 1)

Urvoy, Y (1941) 'Chroniques du Bornou', *Journ.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II, (Chap. 6)

Urvoy, Y. (1949) *Histoire du Bornou* (Paris). (Chap. 1)

US National Report (1971–4, publ. 1975)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15th General As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Grenoble, *Review of Geophysics and Space Physics*, 13, 3. (Chap. 16)

Vajda, G. (1950) 'Contribu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arabe en Afrique occidentale', *JSA*, XX, pp. 229–37. (Chaps 5, 6)

Vandier, J. (1952) *Manuel d'archéologie égyptienne* (Paris: Picard). (Chap. 28)
Vandier, J. and Drioton, E. (1962) *Les Peuples de l'ouest Méditerranéen, II, l'Egypte* (Paris: PUF). (Chap. 28)
Vansina, J. (1961) *De la tradition orale; essai de méthode historique* (Tervuren: Mémoire no. 36 du Musée Royal d' Afrique Centrale). (Gen. Introd., Chap. 7)
Vansina, J. (1971) 'Once upon a time: oral traditions as history in Africa', *Daedalus*, 100, 2, pp. 442–68. (Chap. 7)
Vansina, J. (1973) *The Tio kingdom of the Middle Congo, 1880–189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Vansina, J. (1974) 'Comment: traditions of Genesis', *JAH*, XV, pp. 317–22. (Chap. 8)
Vansina, J., Mauny, R. and Thomas, L. V. eds (1964)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 Introd., Chap. 15)
Vaufrey, R. (1938) 'L'âge de l'art rupestre nord africain', *Ipek*, Berlin, 12, pp. 10–29. (Chap. 23)
Vaufrey, R. (1939) *L'Art rupestre nord-africain* (Paris: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em. 20. (Chap. 23)
Vaufrey, R. (1946) 'Le Néolithique de tradition capsienne au Sénégal', *Rivista di sciencia prehistorica* (Rome). (Chap. 24)
Vaufrey, R. (1949) 'Le Néolithique paratoumbien, une civilisation agricole primitive du Soudan', *JEA*, 35. (Concl.)
Vaufrey, R. (1953) 'L'âge de la pierre en Afrique, exposé synoptique', *JSA*, XXIII, pp. 103–38. (Concl.)
Vaufrey, R. (1955 and 1969) *Préhistoire de l'Afrique*, I: *Le Maghreb*; II: *Au nord et à l'est de la Grande forêt* (Paris: Masson). (Chaps 22, 23)
Vavilov, N. I. (1935) *Bases théoriques de la sélection des plantes*, I: *Sélection générale* (Moscow/Leningrad). (Chaps 14, 27)
Vavilov, N. I. (1951) 'The origin, variation, immunity and breeding of cultivated plants; selected writings', trans. K. Staar, *Chronica Botanica*, 13, pp. 1–6. (Chap. 27)
Vedder, H. (1938) *South-West Africa in Early Times* (Oxford; reprinted London 1966). (Chap. 6)
Vercoutter, J. (1959) 'The gold of Kush', *Kush*, VII, pp. 120–53. (Chap. 28)
Vercoutter, J., Bottero, J. and Cassin, E. (1967) *The Near East,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New York: Delacorte). (Chap. 28)
Verhaegen, B. (1974)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immédiate* (Gembloux: Duculot). (Introd., Chap. 15, Concl.)
Vermeersch, S. (1976) 'L'épipaléolithique dans la vallée du Nil', *Actes IX Congr. UISSP*. (Chap. 25)
Via, Y. and M. (1974) *Sahara, milieu vivant* (Paris: Hatier). (Chap. 26)
Vidal, O. E. (1852) in S. A. Crowther, *A Vocabulary of the Yoruba Language* (London: Seeleys). (Chap. 12)
Vidal, P. (1969) *La civilisation mégalithique de Bouar. Prospections et fouilles 1962–1966* (Paris: Didot). (Chap. 21)
Vignard, E. (1923) 'Une nouvelle industrie lithique: le Sébilien', *BIFAO*, 22, pp. 1–76. (Chap. 23)
Voegelin, C. F. and F. M. (1973)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Washington, DC). (Chap. 12)
Vogel, J. C. and Beaumont, P. B. (1972) 'Revised radiocarbon chronology for the Stone Age in South Africa', *Nature*, 237, pp. 50–1. (Chaps 20, 24)
Voute, C. (1962) 'Ge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Niger and Benue valleys', *Proc. IV PCPQS*, 1, pp. 189–207. (Chap. 24)

Wainwright, G. A. (1949) 'Pharaonic survivals between Lake Chad and the west coast', *JEA*, 35, pp. 170–5. (Chap. 24)
Wai-Ogusu, B. (1973) 'Was there a Sangoan industry in West Africa?', *WAJA*, 3, pp. 191–6. (Chap. 24)
Wai-Ogusu, B. (1974) 'Pleistocene man in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 *JHSN*, 7, 2, pp. 357–68. (Chap. 24)
Ward, W. E. F. (1948) *A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Chap. 1)
Watts, A. D. (1926) 'The early hunters and explorers in South West Africa', thesi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hap. 6)
Wayland, E. J. (1929) 'Rift valleys and Lake Victoria', *CR XVe CIG*, II, pp. 323–53. (Chaps 21, 24)
Wayland, E. J. (1934) 'Rifts, rivers and rains and early man in Uganda', *JRAI*, 64, pp. 332–52. (Chaps 21, 24)
Wayland, E. J. (1952) 'The study of past climates in tropical Africa', *Proc. 1st PCPQS*, pp. 59–66. (Chap. 24)
Webb, M. C. (1968) 'Carneiro's hypothesis of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a

Latin Americanist's approach to an old problem', *South Eastern Latin Americanist*, 12, 3, pp. 1–8. (Chap. 24)
Webster, J. B. and Boahen, A. A. (1967)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West Africa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Welmers, W. E. (1973) *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12)
Wendorf, F. (ed.) (1965)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history of Nubia* (Dallas: Fort Burgwin Research Center and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Wendorf, F. (1968) *The Prehistory of Nubia* (Dallas: Fort Burgwin Research Center and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6, 28)
Wendorf, F., Laury, R. L., Albriton, C. C., Schild, R., Haynes, C. V., Damon, P. E., Shafiquillah, M. and Scarborough, R. (1974) 'Dates for the Middle Stone Age of East Africa', *Science*, 187, pp. 740–2. (Chap. 16)
Wendorf, F., Said, R. and Schild, R. (1970) 'Egyptian prehistory: some new concepts', *Science*, 169, pp. 1161–71. (Chaps 24, 28)
Wendorf, F. and Schild, R. *Late Paleolithic stratigraphy in the Lower Nile Valley of Egypt* (unpublished).
Wendt, W. E. and Reed, C. H. (1966) 'Two pre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Egyptian Nubia', *Postilla*, 102, pp. 1–46. (Chap. 25)
Werner, A. (1915) *The Language-Families of Afric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Chap. 12)
Werner, A. (1930)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New York: Longman, Green). (Chap. 12)
Werner, A. E. A. (1970) 'Analysis of ancient metals', *PTRS*, 269, 1193, pp. 179–85. (Chap. 9)
Westcott, R. W. (1957) 'Did the Yoruba come from Egypt?', *Odu*, 4. (Chap. 24)
Westermann, D. (1911) *Die Sudansprachen, eine sprachvergleichende Studie* (Hamburg: Friederichsen). (Chap. 12)
Westermann, D. (1927) *Die westlichen Sudansprach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Bantu* (Berl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Chap. 12)
Westermann, D. (1952) *Geschichte Afrikas* (Cologne). (Chap. 1)
Westphal, E. O. J. (1962) 'On classifying Bushman and Hottentot languages', *ALS*, III, pp. 30–48. (Chap. 11)
Westphal, E. O. J. (1966) 'The non-Bantu languages of southern Africa', in A. N. Tucker and M. A. Bryan (eds), *Linguistic Analy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2)
Wet, J. M. J. de, and Harlan, J. R. (1971)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sorghum-bicolor', *Economic Botany*, 25, pp. 128–35. (Chap. 24)
Wheatley, P. (1964) *The Land of Zanj: Exegetical Notes on Chinese Knowledge of East Africa prior to AD 1500* (London: Liverpool Essays). (Chap. 5)
Wickens, G. E. (1975) 'Changes in the climate and vegetation of the Sudan since 20,000 BP', *C-R VIII Reunion ABIFAT*, pp. 43–65. (Chap. 16)
Wiercinsky, K. (1965) 'The analysis of racial structure of early dynastic populations in Egypt', *Materialow practical anthropologicanich*, 72. (Chap. 11)
Wieschoff, H. A. (1943) *The Zimbabwe–Monomotapa culture* (Menasha). (Chap. 1)
Wiesenfeld, S. L. (1967) 'Sickle cell trait in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Science*, 157, pp. 1134–40. (Chap. 24)
Wiet, G. (1960)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aris). (Chap. 6)
Wilcox, A. R. (1963) *The Rock Art of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Nelson). (Chap. 26, Concl.)
Wilks, I. (1956) 'Tribal history and myth', *Universitas*, 2–3. (Gen. Introd.)
Wilks, I. (1961) 'Begho and the Mande', *JAH*, 2, pp. 25–34. (Chap. 24)
Wilks, I. (1963) 'The growth of islamic learning in Ghana', *JHS*, 2, 4, pp. 409–17. (Chaps 1, 6)
Wilks, I. (1975) 'Do Africans have a sense of time?', *IJAHS*, VIII, 2. (Chap. 2)
Willett, F. (1960) 'Ife and its archaeology', *JAH*, 2, pp. 231–48. (Chaps 15, 24)
Willett, F. (1962a) '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west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evidence', *Africa*, 32, pp. 1–13. (Chap. 24)
Willett, F. (1962b) 'The microlithic industry from Old Oyo, western Nigeria', *Actes IV Congr. PPEQ*, 2, pp. 261–72. (Chap. 24)
Willett, F. (1964) 'Spectrographic analysis of Nigeria bronzes', *Archaeometry*, 7, pp. 81–93. (Chap. 24)
Willett, F. (1966) 'On the funeral effigies of Owo and Beni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fe-size bronze heads from Ife', *Man*, 1, pp. 34–45. (Chap. 24)
Willett, F. (1967) *If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4)

Willett, F. (1968) 'New light on the Ife–Benin relationship', *African Forum*, 3, 4; 4, 1. **(Chap. 24)**
Willett, F. (1969) 'New radiocarbon dates from Ife', *WAAN*, 11, pp. 23–5. **(Chap. 24)**
Williams, M. A. J. (1966) 'Age of alluvial clays in the western Gezira, Republic of the Sudan', *Nature*, 211, pp. 270–1. **(Chap. 16)**
Williams, M. A. J. (1975) 'Late Pleistocene tropical aridity; synchronous in both hemispheres?' *Nature*, 253, 5493, pp. 617–18. **(Chap. 16)**
Williams, M. A. J., Clark, J. D., Adamson, D. A. and Gillespie, R. (1975) 'Recent Quater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Sudan', *BASEQUA*, 46. **(Chap. 16)**
Willis, R. G. (1964) 'Tradition,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Ufipa', *Africa*, 34, 4, pp. 340–51. **(Chap. 7)**
Wilson, A. C. and Sarich, V. M. (1969) 'A molecular timescale for human evolution', *PNAS*, 63, 4, pp. 1088–93. **(Chap. 20)**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eds (1969–7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3)**
Wilson, W. A. A. (1966) 'Temme and the West Atlantic Group', *SLLR* (Indiana), 2, 26–9. **(Chap. 10)**
Winkler, H. A. (1937) *Völker und Völkerbewegungen im vorgeschichtlichen Oberägypten im Lichte neuer Palsbilderfunde* (Stuttgart). **(Chap. 23)**
Winkler, H. A. (1939) *Rock Drawings of Southern Upper Egypt*, 2 Vol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Chap. 23)**
Winston, D. (1960) 'Greenberg's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 *ALS*, 7. **(Chap 12)**
Wollin, G., Ericson, D. B. and Wollin, J. (1974) 'Geomagnetic variations and climatic changes 2,000,000 BC – 1970 AD', *Coll. CNRS*, 219, pp. 273–88. **(Chap. 16)**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 (1975) 'WMO/IAMAP Symposium on long-term climatic fluctuations', *Proc. Norwich, WMO*, no. 421. **(Chap. 16)**
Wrigley, C. C. (1970) 'Speculations on the Economic Prehistory of Africa', in J. D. Fage and R. Oliver (eds),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7)**
Wymer, J. J. and Singer, R. (1972) 'Middle Stone Age occupational settlements on the Tzitzikama coast,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in P. J. Ucko, R. Tringham and G. W. Dimbleby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pp. 207–10. **(Chap. 20)**

Yamasaki, F., Hamada, C. and Hamada, T. (1973) 'Riken natur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VII', *Radiocarbon*, 14, 1, pp. 223–38. **(Chap. 24)**
Yilbuudo, J. T. (1970–1) 'Tradition orale', Mémoire, *Séminaire de Koumi, Haute Volta.*
York, R. N. (1973) 'Excavations at New Buipe', *WAJA*, 3, pp. 1–189. **(Chap. 24)**
Young, W. J. (1958) 'Examination of works of art embracing the various fields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n Application of Sciences in Examination of Works of Art* (Boston), pp. 18–19. **(Chap. 9)**
Yoyotte, J. (1954) see Posener, Sauneron, Yoyotte, op. cit. **(Chap. 28)**
Yoyotte, J. (1956) 'L'Egypte ancienne', in *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Pléiade). **(Chap. 5)**

Zahan, D. (1963) *La Dialectique du verbe chez les Bambara* (Paris). **(Chap. 8)**
Zaki, A. and Iskander, Z. (1942) 'Ancient Egypt cheese', *ASAE*, XLI, pp. 295–313. **(Chap. 9)**
Zeissl, H. V. (1955) 'Athiopen und Assyrer in Ägypten', *Ägyptologische Forschungen*, 14 (Glügstadt/Hamburg/New York: Augustin). **(Chap. 28)**
Zeuner, F. E. (1950) *Dating the Past* (London: Methuen). **(Chap. 16)**
Zeuner, F. E. (1959) *The Pleistocene Period, its Climate, Chronology and Faunal Successions* (London: Hutchinson). **(Chaps 16, 21)**
Ziegert, H. (1967) *Dor el Gussa und Gebel ben Ghnema* (Wiesbaden: Steiner). **(Chap. 23)**
Zinderen-Bakker, E. M. van (ed.) (1975) *Paleoecology of Africa*, Vols 1–9. **(Chap. 16)**
Zinderen-Bakker, E. M. van (1967)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Stratigraphy and Ecology on the basis of vegetation change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p. 125–47. **(Chap. 24)**

总 索 引

人 名 索 引

地 名 索 引

民族名索引

朝 代 索 引